

373. 王力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有关人员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元旦)

同志们：

首先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祝贺同志们新年好！没有什么报告，也不是向大家作什么报告，主要是和同志们见见面，交换意见。……

一九六六年过去了，一九六七年今天开始了，我们现在面临总的形势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势呢？就是全国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的形势，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在各条战线上，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及其他一切领域里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总反击，向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展开总的反击。在这些领域里，是他们首先向我们展开了斗争，是他们展开向我们挑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表人物，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断地向党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五九年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庐山会议上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国家暂时经济困难时期，特别是六二年，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以及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肆出笼，在各个战线上，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部门，向我们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资产阶级对我们进攻，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断地胜利地反击。五七年我们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五九年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对于六二年所出现的种种歪风邪气，如单干风、包产到户、三包一奖，文艺上的自由化，教育上的多少条，统一战线当中的没有阶级性，胡说什么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要改变，要变成无产阶级，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强调地提出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以后，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地斗争，特别是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说，在工矿企业、农村、学校等各条战线上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在文化战线上，我们进行了京剧改革等。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高级发展的新阶段，全面地向资产阶级发动的总反击。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以六五年的九、十月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批判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海瑞罢官》，可以说是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前年的九、十月间，毛主席提出批判“海瑞罢官”，可是毛主席的这样一个指示没有得到很多人的响应，特别是在当时的北京，不能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旧北京市委控制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手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是陆定一把持着，他们也是抵制的。实际上戳穿来讲，在当时中央的大权是在刘、邓的控制下，政治上一直是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所以，毛主席是在上海发动的。姚文元同志的文章 11 月 10 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当时，同志们可能没注意。这一篇文章是毛主席发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击。姚文元同志主要是集中在后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核心问题。可是这一篇文章结果北京所有报纸都不刊登。不能登就在上海出了小册子，可是北京还是不出版。同志们看看今天的形势，再看看当时的情况，那时连一个小小的吴晗都轰不得，为什么？因为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突破口，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都轰不得，同志们思考过没有？但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在群众压力下，北京不得不转载这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在北京发表以后，又是一个咋样的形势呢？这时，这些家伙又把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吴晗的政治斗争扭转到纯学术批判。他们利用手上掌握的职权，对革命左派执行专政，左派文章不能刊登，对资产阶级开绿灯，对革命左派开红灯，所以批判吴晗的文章不能登，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到一九六六年二月，他们认为是最得意的时候，搞了一个五人小组，写了

一个汇报提纲，这个提纲是意识形态领域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性文件，把斗争锋芒指向革命左派，提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并盗用中央的名义，用文件的形式发到各个地方，他们自以为得意，现在翻过来看，他们不能代表中央。当然刘邓的中央也就不奇怪了，因为这个纲领也是他们(指刘邓)的纲领。这样一来，就暴露了彭真的面貌，他干坏事干得起劲，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以在一九六六年的三月底彭真的问题就戳穿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问题就在报上公开批判了，再加上在党内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斗争，特别是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这个通知的重要段落是毛主席亲自修改多遍的，这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的历史文件。五月十六日的这个通知，毛主席提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更重要的是毛主席提出对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让这些人担任文化革命的领导工作。并指出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时机一成熟，就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代表人物一个一个被揭发出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件，提出了政权问题，提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同志们经过了七、八个月的斗争，是不是看的更清楚了。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接班人”就睡在我们身旁，现在看的更清楚了。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自从毛主席提出批判吴晗，吴是一个代表，接着就批判三家村，对邓拓就看得更清楚了，他是市委的书记，这样就涉及到北京市委和北京日报了。在党内批判了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又发出了五月十六日通知。这时候毛主席从理论上、从政治上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从一九六五年的九、十月间提出这个问题到开始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毛主席对我们讲过，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准备阶段。

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转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这是一个战斗的号令。从六月一日开始，群众就发动起来了，毛主席说，从六月一日开始就全面的向资产阶级发动反击，毛主席把它作为新的革命阶段。(王力同志问传达过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吗？众说：没有！王力说：红卫兵已抄出来了！)毛主席讲了我们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在当时还搞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毛主席讲过，对有的同志对这场大革命不理解这种情况讲的，十六条讲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的。所以毛主席批转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写了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同群众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革命群众起来了，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攻击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一批一批地被揪出来，运动发展很快，没有几天群众就起来了，当时的接待站是政治的寒暑表，可以测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群众到北大参观，支援北大，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就很高兴，欢呼这个形势好得很。可是当时刘邓在北京掌握了领导权，就觉得不得了啦，就想办法限制群众运动，不许上街，内外有别，并要通知学生，其实这是一个笑话。人家通通上街了，他们还通知不许上街，这不是笑话吗？他们对大字报更是怕得要死，强调什么内外有别，但后来也就被突破了，他们总是想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到资产阶级的轨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派工作组的。派了工作组要群众听工作组的话，群众当然不听，同志们还是有必要重新读一读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实际上有许多问题在当时都已经提出来了。还有五月十六日通知的精神，毛主席也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他们就是不听，就是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他们的轨道，派了工作组，有的就把群众压下去，有的就压不下去，到了六六年的六月二十日前后就向革命群众开刀了，北大工作组不许群众斗黑帮，群众六月十八日起来自发地斗了黑帮，斗的都是些坏人，在斗争时打了一点人，他们就说这一件事是反革命事件，刘、邓也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并把这个事件批转给全国，叫全国仿照这个，同志们接触到许多群众，你们的印象是不是这样？在这一段时间，什么“六·一八”、“六·二〇”反革命事件很多，镇压了革命学生运动，有些工厂也发生了。同志们回忆一下，是不是在这一

段搞得冷冷清清，这是什么问题？就是要把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当时，谁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谁起来赶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还有种种谬论，说什么工作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革命。有的机关也就这样搞，我们接触到对外文委，外办的张彦，无非就是革命群众对他老婆提了点意见，就把人家打成了反革命。陈伯达同志亲自去调查，凡是与陈伯达同志谈话的都成了反革命，打出二十九位反革命骨干分子，打出了好几百名反革命分子，这个单位也总共只有几百个人，他们说人家要搞政变了，原来的民兵掌握了枪支，说人家夺了武器，原来人家负责电话的工作，就说人家已经掌握了电话。在这之前，西安交大又发生了“六·六事件”，这些东西也不都是刘、邓搞的，六月六日刘澜涛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但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六月六日西安事件发生后，刘、邓要人写社论，要写“假左派，真反革命”的社论，但当时是陈伯达掌握人民日报，当时没有听他们这一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一切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东西都要批判。当时，涉及到各级党团组织，群众创造了文革和文革小组，而刘、邓呢，他们一定要各级党团组织来领导。强调党的领导作用，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领导，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各级党的组织如果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他就能起到作用，相反的，如果站到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立场，那就不能起到党的领导作用。借口党的领导，不管各级党组织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许人家革命，不许人家造反，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对群众运动的问题，派工作组，所谓恢复党团组织都是压制群众，我也看到我们接待站回答群众的问题，很多同志是站在错误路线的立场上，当然不能怪同志们，主要是周荣鑫、许明，他们就是搞这套的。

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这是主流，但是，当时掌握党中央领导的是刘、邓。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七月十八日，毛主席回北京，看了不少材料，了解了不少情况，很快地提出撤工作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起了压制群众的作用，镇压了群众运动，所以七月底到八月上旬开了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会，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中央的领导在组织上作了变更，这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它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失败，十六条的核心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毛主席扭转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结了革命群众的创造，总结了经验，使革命路线更具体化，大的方针、政策都作了具体规定，在这个大会上，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接着王力同志读毛主席的大字报。)这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本质、阶级根源、社会根源，短短几百个字都说明得清清楚楚，陈伯达同志两个月的总结也引用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揭发了，纠正了。

从十一中全会到现在四个多月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高潮，这个新高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直接与群众见面了，直接与群众的革命感情相结合。出现了新高潮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性的批判。这一段的主要特点，一是红卫兵运动，一是大串连。红卫兵运动最初在刘、邓统治时期被打击，清华附中的一论、二论，被当时认为是反革命文章，后来江青同志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当天就写信给清华附中的小将，热烈地支持了红卫兵。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发展了红卫兵，出现了革命大串连。革命的串连，毛主席在最初就提倡了，支持了，这样，就把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和文化教育单位上的连成一片。

同志们请回想一下，这一段工作不是没有斗争的。这一段时间革命群众把运动发展到对各省、市、中央各部门，批判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工作组，群众这样做也是有阻力的，他们不同意工作组作检查，他们怕得要死，为了对抗群众运动，为了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大量地采用了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在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采用更大的谎言制造群众斗群众，这一条周荣鑫、许明也有这一条，周荣鑫、许明要对西城区纠察

队负政治责任，调他们去镇压群众，把他们当作宪兵队。这一段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学生运动发展为工人运动，最初工人运动起来了一点，在八、九月间出了工业六条，起了一个压制的作用，到了十月份，林总同志的讲话，《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还有军委十月五日的通知，工人运动起来了，很多的工人要组织自己的革命组织，要到北京反映情况，有的人拿了“抓革命，促生产”这篇社论，光“促生产”，不抓革命，有的拿分期分批来压人，过去把人打成反革命就不分批分期，现在要平反了，就提分批分期，就是不让人家革命，采取压的态度，但是压总是压不住的，所以到处发生了事件，这样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引起中央负责同志的严重注意。

我还讲一下，《再论抓革命，促生产》这一篇社论，里面有些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正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而且这些人(有一句看不清)，而不是批评压制革命的一面，社论一发表，有些工厂的当权派就组织了一些人去抓人，文革知道了，写上支持了工人，提出决不许拿这篇社论去压制工人，这点我们要检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工厂、农村情况，反映的情况晚了，我自己对党对人民没有尽到责任，反映情况晚了，应当检讨。但是，我们同一些人不一样，我们是坚决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对于压制工人，压迫工人，不许工人革命的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进行斗争，毛主席讲从古到今先有事实，再有概念。先干起来，然后才有几条。我们要支持群众干起来，有了《十六条》，干起来再说嘛！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我们怎样对待革命，怎么样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也应该向群众作宣传。有的人对中央指示的精神不学习，不传达，不了解精神实质，完全凭自己的感想去办事，就不能不犯错误，但是只拿这些东西，不听群众的意见，说中央指示没有的你不能干，这样也不行，我只能说，我们有责任向中央反映群众的要求、呼声，特别是要革命的不能捆人家的手脚。比如，我们去工厂、农村宣传《十六条》，要放手让他们搞，自己解放自己，支持他们搞，但是对于条文有意见的也要听取。

我们一定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凡是革命的意见，我们都要听取，在作思想工作中，也要贯彻阶级斗争这个纲，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东西，我们都要提出批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成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士，不要那些四旧官架子。现在全国全面展开了阶级斗争。首先最重要的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问题。文艺也要搞几条，文艺问题他们要求很简单，第一停演，第二要串连，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文艺几年不演也可以，他们现在几万人到北京，这还不是串连？我们提倡徒步串连，文艺工作者也要到工农当中去。小学的问题正在研究，小学的问题主要是要求停课。陈伯达和我们准备下乡去征求意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也很重要，单是学生、工人、农民还不够，机关的同志还有的党员、团员，他们很不理解毛主席批转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这篇文章有这段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要读《红旗》重新发表的评论员文章，重新讲了这段话，并加上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的领导”，特别加了“正确”二字。并且指出，“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有的同志讲少数应当服从多数，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纪律是全党服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了刘邓路线的不能无条件服从，服从了便是反对党中央，服从了便是最大地违反了党的纪律。机关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很重视，现在正在起草文件。接待站怎么搞，也准备搞几条。红卫兵也要搞几条，最初不可能搞，现在有可能原则搞几条了。现在学生大部分回来了，斗争形势有很大变化，有的由原来的少数变为多数。如北航、地质、清华都在最近十天内发生了质的变化，由少数变为多数，有的学校有了统一的组织，过去【反】对他们的人，大多数回到毛主席这边来，现在主要是内部比较散。另外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中央有这么一个意见，要搞政治、军事训练，主要是军事训练，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老三篇、《学习和时局》、《反对自由主义》、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讲话的核心是批判刘邓路线，通过学习，提高毛泽东思想的水平，使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队伍。这个大革命象法国的巴黎公社的大革命，涌现好多英雄好汉，但他们不是马列主义者，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同，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涌现出来的英雄好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有毛泽东思想的，有反毛泽东思想的，有马列主义的，有反马列主义的，有无产阶级的，有资产阶级的，有小资产阶级的，都要靠自己在大革命中去提高，要靠自己在运动中去锻炼，在文化大革命中，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批判队伍中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去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批判资产阶级路线。带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各种问题，活学活用，在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要用毛泽东思想去提高，使自己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

同志们在斗争中一定要贯穿阶级斗争这个纲，文化大革命这个纲，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纲，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这个纲，来分析错综复杂的事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是保护四旧，保留旧的秩序。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核心是扫四旧，扫除旧秩序，同志们要仇恨这些旧东西，热情地欢迎革命群众，站在他们一边，旗帜必须鲜明，革命派我们就支持，反对革命的我们就不支持。我同姚文元同志负责处理塘沽××工厂2500人到京告状，开始想批评他们，但听了他们二十九位老工人的发言，我们很受感动，不应该批评他们，他们非常关心生产，非常关心革命，我们支持了他们，只有一条没有支持他们，就是立即罢官，因为罢官要通过他们斗争，要他们在斗争中去解决。后来，另外一派工人也派了二十几位代表来了，我们和他们谈了四个多小时，他们提了二十几个要求，我们一个也没有答复，给他们讲：你们受蒙蔽，不知道刘邓路线的实质，你们要按十六条办事，我们宁可被杀、被抓也要站在毛主席一边，不能站在他们一边，不能采取调和、折中。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只有一个大队没有动起来，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保，一派造反，形势非常好，坏人要组织武斗就让他们暴露，不要怕，这样大的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我们每个同志必须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必须旗帜鲜明。中央文革小组有个副组长叫王任重，他自吹是第二副组长，其实没有人封他，人家不看招牌，不看商标，其实你搞鬼，搞两面派，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让他表演，不管什么人，只要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要进行斗争，不能提倡奴隶主义，不能盲从，一定要从各种事物，各种人物中辨别谁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什么一视同仁，必须旗帜鲜明，刘邓就不是一视同仁，刘要把蒯大富当活靶，没有这一种超阶级的东西，要贯穿阶级斗争这个纲，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必须用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来对待群众，这是一点。

再一点，同【第】一点是一致的，就是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群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从【以】普通一兵，普通劳动者出现。我们是人民群众的儿子，不要摆架子，不要用旧社会的那一套，站在群众头上拉屎，这是国民党的官吏，我们是群众的儿子，我们无条件地为群众服务，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受一些旧框框约束，可以为群众跑跑腿，跟他们聊天，跟他们睡在一起，吃一样的饭，与他们一起搞一点工作，多想一点办法，从部队到地方工作要接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不能很快的适应。另一个，军队里也有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军队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林彪同志，我们军队解放以来，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讲过，没有改造好或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市场，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搞掉，军队中的待遇高都会产生不好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要搞掉的。同志们之间要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很好的风气，不要讲资格，讲级别，要跟革命学生、工人、农民一起，不要摆军官的架子，前一阶段部队派工作组很多犯错误，主要是刘邓路线，但我们自己也要检查，我们要正确对待自己。

再一条是希望同志们用新的方法来接待群众，组织工作方法都要搞新的一套，要打破旧的一套，现在有二十万人在北京告状，排队要等到今年三月，可调北航红旗、三司和一些革命的工人组织结合起来，和他们商量，把二十万人的工作作好，不要墨守成规。

374. 李富春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接见北京钢院革命同学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日)

北京钢铁学院“东方红”二十二名战士，因抗议国家计委余秋里等同志不对冶金部部长吕东的私设拘留所，违反党纪国法的罪恶行为进行严肃处理，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时三十分起进行的绝食斗争。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下午，李富春副总理到国家计委接见了钢院“东方红”二十二名战士和前往声援钢院的其他院校的革命同学及冶金部的革命干部，并做了讲话如下。(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首先，北京钢院“东方红”战斗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了冶金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及吕东的罪行。略)

各位同志们，同学们：

我支持钢铁学院二十二个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支持冶金部机关联络站的革命行动，支持第三司令部和其他各学校同志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关于吕东的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报告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作出决定以后，向同志们、同学们，向机关干部们宣布。

同时，我们欢迎同志们、同学们造冶金系统的反，革冶金系统的命。工交系统十年来是在反党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操纵下面的，是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薄一波的问题，各位同学或许还不十分清楚，我在这里简要提一提。

从一九五六年薄一波就是反冒进，抵抗毛泽东思想。六二年困难时期，薄一波是吹冷风的，把问题、局势看得很严重，而当时的局势正在好转，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薄一波只取了两个字，变成“调整”阶段，把“巩固、充实、提高”都不要了，这也是对抗主席。六二年以后，搞了工业七十条，这七十条完全违背主席思想，违背主席提出的鞍钢宪法的。毛主席主要提出大搞群众运动，大走群众路线，要政治挂帅，要搞技术革命，要破除迷信，要敢说、敢想、敢干。而工业管理七十条呢，用几种管理用责任制来代替了群众路线，用物质刺激代替了政治挂帅，用技术革新来代替了敢想、敢干、敢革命。六五年小计委新成立，由余秋里……同志，他们成立小计委，薄一波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小计委，小计委是主席提出的，而薄一波却千方百计地排斥小计委，打击小计委。

文化大革命不论是在学校，不论是在机关，都是完全彻底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要清理薄一波在工交各个部门、各个系统这条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在工交各个部门各企业来清理、来调查。在这里，冶金部革命的干部回去，应该向冶金部的所有同志传达我今天的意见，要彻底革命，肃清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要把冶金系统革命化，要把冶金系统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同时，冶金部的革命同志，必须与钢铁学院革命学生结合起来、串连起来闹革命，矿业学院对于煤炭部，林学院对于林业部，同样也要帮助，林业部、煤炭部的革命干部起来闹革命，要把工交系统从薄一波的错误路线下面解放出来。所以这个工作是很大的一个工作，很大的一件事情，很大的一个工作，很大量的工作，所以希望同志们在这个广阔的天地中间

来努力。

对二十二位绝食的同志表示慰问，希望他们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吃好饭、睡好觉、闹革命。这个行动你们是被迫的，你们从今天起吃饭，有什么问题找我联系，我坚决支持你们，坚决支持大家闹革命(鼓掌)。因为我最近这个时期管外省来的同志多，管党中央的工作多，管工交系统的工作很少，我直接插手的时间很少，也对不起各位同志。现在我们首先从冶金部来插手，把冶金部作个试点吧！(热烈鼓掌)

另外，金川的四位同志，还有一个摄影师，鞍钢的革命造反司令部十一个组织代表同志们，我另外再抽出时间来同你们单独谈一谈。单独接见你们。(有同志问：什么时间接见？)现在我还很难预定，我是毫不偷懒的，有的时间是我自己都不能主动的，有时到这里开会，有时到那里开会，有时接见这里，有时接见那里。今天这个事情就是临时插进来的嘛！非要接见你们不可，非要支援你们不可吧！总而言之，我是要接见你们的，你们等了很多时间了，非接见这一次不可，听听你们汇报不可。你们刚才给了我这个材料，这个照相是好材料。(有同志提了一个问题)嗯！是的，不知道。原要知道我也想找赵敏、罗定丰一起来！(原来)鞍山现在他们正在开会呀，要他们解决问题呀！现在看起来，是不能等赵敏和罗定丰找你们谈话，他们既然不想，我找你们谈。

(钢院“东方红”战士提出希望李富春同志谈谈自己对吕东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家违反党纪国法行为的意见)

李富春同志说：我已经说了，吕东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至于他如何处理，我要报中央，现在我不能表这个态。

同学提出：吕东是不是违反党纪国法？

李富春同志说：有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

同学讲：吕东私设拘留所，我们砸了。

李富春同志说：你们砸得对的。

同学要求把吕东开除党籍，依法逮捕，送交公安部，请李富春同志转达中央。

李富春同志说：我一定报告中央，一定转达。(鼓掌)

同学们提出要求，要李富春同志明确表态。

李富春同志说：我只能表示：第一，承认你们是革命行动，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吕东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第三，这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报告中央，决定对他的处分。这三条。

同学们要求李富春同志谈谈自己的看法，谈谈计委上报中央的意思。

北京矿院同学要求李富春同志谈谈个人对吕东的处理意见。

李富春同志说：我认为他是违反了中央布告的规定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应按党纪国法办事，如何办由中央决定。

钢院“东方红”战士要求李富春同志谈是开除党籍，还是逮捕法办，是罢官，还是撤职……

李富春同志说：我个人认为是应当撤职。(大家热烈鼓掌)

“东方红”战士向大家宣布：李富春同志认为吕东应该撤职。

李富春同志说：嗯！(大家热烈鼓掌)

“东方红”战士将李富春同志的意见写成文字：“我个人认为吕东私设拘留所，应当撤职。”请李富春同志签字，李富春同志在上面签字。(大家热烈鼓掌)

北京钢院“八·一八”战斗队战士提出：在鞍钢的王鹤寿为首的鞍钢党委组织不明真象的工人、学生，围攻和殴打外地学生，要轰走外地革命师生，要李富春同志严肃处理。

李富春同志说：鞍山的问题我正在处理。

劳动部同志提出劳动部的问题。李富春同志说：关于劳动部的问题请李××同志和你们谈。此时总理来电话请李富春同志去开会，接见到此结束。

375. 周恩来在接见外语学院“少数派”各革命组织代表时谈话记要 (1967年1月3日)

(当外语学院代表谈到一些领导、工作组，和“少数派”一些人用平时的一些思想汇报来攻击“少数派”的革命同志时)

总理：把别人平时的思想汇报都翻出来攻击，这个方法好不好？

同学：当然不好。

总理：这个办法不仅左派不应该，而且对其他同学也很不好。你们说，经常汇报思想这个方法好不好？

同学：我觉得不好。但以前谁汇报思想多，谁就能靠近组织，不仅平时要经常汇报思想，而且期终也得写思想汇报。

总理：(摇头)我看这个办法很不好。这不是群众教育自己，这是党内生活不健康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党的传统。我调查了一下，是从莫斯科学来的，加上安子文搞了二十多年组织部，刘仁搞了北京市委，这种现象很严重。所以刚才谈这一点，很触动我的思想。这是党内很坏的东西。

同学：这次文化革命中，很多党员保皇，我觉得与党内生活的这一坏现象很有关。

总理：你说得很对。你叫什么名字？许多党员就因为缺乏独立思考，这不能怪党员。他们也以为自己忠于党。所以当你们批评他们时，他们就感到很委屈。所以你们要把眼光放大些……党内这种作风很不好，灌输奴隶主义，使党员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我们党内一直没有肃清，这次非把它肃清不可，按这种恶劣作风培养的老实党员都是盲从。我们说的忠诚是心怀坦白，眼光远大。你们学校两派对立时间较长，有许多因素。“多数派”作了许多工作使你们不满，加上一些党员不独立思考，对党的干部迷信，主要责任在于领导，领导要把责任承担过来，把同学解放出来，就会好些。

376.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穆欣在接见赴广州揪王任重代表团时的讲话(1967年1月4日)(见《系年录》第五十三卷)

377. 周恩来在接见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4日)

同志们，同学们：

这两天听了你们很好的意见，对我是学习。我没有过问过军队文革的工作，有时也被找去接见你们，十三日、二十九日大会临时找人，打电话把我找去，绕场一周就走了，这说明任何事情蜻蜓点水，浮皮了草接触一下不顶事，这次用两天认真听了你们的意见，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集中几点来回答。

一、我们完全支持你们各院校造反派在全军中，在各校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同志插话：还有文艺团体中。)你们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我们完全支持。(鼓掌、呼口号)并愿意考虑你们一切合理的要求，具体问题不在这里答复了。

二、你们提出的陈、叶两位副主席十一月的两次讲话，确有原则性错误，你们有意见，我们研究也认为是如此。十二月三十一日叶剑英同志作了检查，我们认为基本上是好的，正确的，因为他指出要在全军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自己讲话中的错误作了检查，这些错误影响了院校、文艺团体的运动，同时，他坚决主张坚持大方向，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检讨是好的，在北京八千多人面前检讨的，能听到的都听到了。陈毅同志是军委副主席，但不是直接负责军事，他在外交系统讲话多一些，他正准备检查，在检查中同时也回答对军事院校讲话的问题，先向你们通知一下。

你们所在院校、文工团领导和前工作组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虽然没有核实，你们说的是可信的，对这些错误应彻底揭露批判。你们受围攻、受打击，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我们宣布一律平反，恢复名誉。(鼓掌、呼口号)当然还有些材料，就是被整、被迫写的一些材料，被领导挑起一些同学写你们的材料，应按紧急指示、补充规定处理，这两个文件适用于军队院校和文艺团体，如果不能解决，由上级派人去检查协助解决。军事院校要比地方院校解决得快一些，把材料集中，除本人检讨归还本人外，其他一烧了之(鼓掌)，在这方面，军事院校、文工团要作出榜样。

三、既然要批判军队内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如同在全党、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中一样是存在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哪能不存在呢？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说过，从建军以来，就有两条路线，不仅过去，就是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像萧华主任讲的，最先是高、饶集团篡政。第二，批判过军队中的教条主义。第三，彭德怀直接反对毛主席，反对总路线，他有一套旧式的建军反动思想，也是要篡党、篡军、篡政。五九年后的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现在主持中央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八年多的成绩，你们都看到了，文化革命以前有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罗瑞卿这个反党分子，虽然在林彪同志领导下，但是他搞两面派手法，反对突出政治，搞大比武，直接反对林彪同志，被揪出来了，你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从路线问题不改，发展到对抗，搞反党阴谋活动，变成敌我矛盾。现在我们来审查全军两条路线斗争，谁是反动路线代表？你们看是陈、叶，但从全党全国来看，他们不是。陈、叶正如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副主席一样，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坚决反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在这个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的，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我们中央文革的同志可以证明。必须从全面看问题，我们承认他们讲话有错误，但把他们作为代表，矛头指向他们两位，不恰当，不符合实际。昨天康生同志回答了斗批改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分开，矛头不能指错，指错了的会犯另一种错误。“十六条”讲了，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就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军队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一切。林彪同志在去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的要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要变颜色，军队保护政权，枪杆子靠人民拿。我们要挖修正主义根子，断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切反党分子都要钻这个空子。我们不要只看一个侧面，不看全部，我们要全面衡量。林彪同志要我告诉你们，要看全局，林彪同志很关心你们。要放手发动群众搞运动，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是林彪同志建议的，主席同意，政治局通过，转发全国的。

四、问题怎么造成的呢？关键的问题是军队文革小组，刘志坚只是初步的检查，你们的揭发，对我们很有帮助，军全文革小组放在总政之下，不伦不类，刘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应该向中央文革请示，(康生插话：既不请示，又不报告)如关于文艺单位的“三点指示”，今天才查出，江青同志是顾问，又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也没有向她报告，也没有请示林副主席，这三条是完全违背紧急指示的。(呼口号)全军文革组织形式不对，必然有问题，上不向主席、林副主席请教，也不请教中央文革。刘志坚每次出席中央文革会议(江青同志插话：大多数会议他参加了)上不说，林副主席、萧华同志不在京，他就派了工作组，叶剑英同志他管军事多，管政治工作、院校文革少，彭、罗、陆、杨的影响还要肃清，罗是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副总理、中央书记，集党政军于他手中，他是两面派，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彭、罗、陆、杨他们的特点，要在关键时期才能发现他们。罗瑞卿不是没有他手下的人(萧主任、杨代总长插话：萧向荣、梁必业、王尚荣、许英夫、史进甫、陈鹤桥、谭友林……)，过去罗把叶副主席放在一边，元帅们都是受打击的，刘志坚的检讨是初步的检讨，中央文革有过批评，你们这样大揭发，我们才看清楚。刘、邓派工作组他也派，主席回来要撤工作组，他迟迟不撤。八月五日林副主席从外地回来，萧华同志八月八日从外地回来，他才撤。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是林彪同志在国庆节讲话中提出的，然后提出十月五日的紧急指示。全军

文革跟不上，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揭发了，主席已经三次接见了，十一月就不需要单独接见了，大可不必了，林副主席是不同意见的，大家积极要求见，也起了点作用。林副主席要管全党全国的事，不能使他太劳累了，只好请其他副主席出来，把我找来绕场一周，这两次接见是多余的，一说话没准备好，即席讲话，言多必失，陈伯达同志说过祸从口出嘛。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四位副主席讲话都没有讲路线，稿子是全军文革起草的，林副主席和我们都不知道，没有认真地讨论要不要开这样的会，这事情本身就不慎重，但是不能把他们两位作为刘、邓路线的代表，他们是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坚决反对彭、罗、陆、杨的，反对刘、邓路线的。关键是全军文革小组负责全军文革，也有反对派唐平铸、胡痴、谢镗忠、李曼春都提过反对意见，他根本不听。你们有人提议，陶友鉴同学提出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这有道理(鼓掌)，我和萧华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康生同志插话：全军文革不象真革命)。中央文革有这么高的威信就是因为干革命，这从实际斗争中得到证明，刘志坚躲在机关办事，上不请教，下不接近群众，冲国防部叫他去，他睡了不去，他没有关心群众的精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这就没有按照林副主席的要求，吃透两头，全军文革还要检查，我就不说了。

五、明天的大会，我们不赞成。不是不支持你们革命造反，我们不能参加你们的会，我们的任务是来劝大家，不开这个会，我们把你们的话听得差不多了，激愤的情绪也接受过来，你们的大会不宜开，因为于全军不利，攻击矛头错了，所以劝说你们不开，这不等于停止这个斗争，还要继续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此来衡量本单位的领导，分清两类矛盾。就全军来说，我们比你们清楚，希望你们不开这个会，当然我们不能强加于你们，你们要开，我们中央、中央文革、军队负责的同志不能出席。(高呼拥护总理指示等口号)(康生同志插话：责任是刘志坚的，刘志坚矛头搞错了，责任不在于你们。)对，关键在于全军文革刘志坚身上。(康生插话：责任是刘志坚的，刘志坚不是折中主义、和稀泥，而是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学生提出：刘志坚停职反省！)你们要求停职反省，一个人的反动路线，还是先批判，依靠你们挖深挖透，不要过早停职反省。(学生提出：我们明天开会的票都发了，来不及了。)来得及，八、九月间我说服两个十万人的大会不开，有这个经验。(江青同志插话：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调查研究，立于不败之地，你们可以商量一下。)(学生提出：延期开，准备批判刘志坚，我们回去商量。)(江青同志插话：你们也可以批判本单位的问题，我们不包办代替。)你们自己商量，要批判刘志坚，你们同全军文革联系。(江青同志插话：全军文革应设在中央军委之下，最近我们要他们汇报过一次，我个人对刘志坚帮助过好几次，今天他初步作了些交代，今天以前，不知他干了些什么。)

378. 江青、周恩来在接见文艺界、小学教师、新闻、体育界 以及上山下乡的青年大会上的讲话记录 (1967年1月4日)

地点：北京工人体育场

江青：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问你们好！(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问你们好！(呼口号、热烈鼓掌)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你们是来自全国的文艺界、小学教师、新闻出版界的革命同志，我们认为你们闹革命的理由完全合理的，我们支持你们！(群众呼口号)不能用种种借口压制你们革命的行动，有许多问题都要承认事实，你们的大串连这个既成事实，就得承认，我们向你们学习！

我们已开了一些座谈会，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从

主观愿望出发，不然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你们说对不对？（群众齐答：对！）我建议文艺界徒步串连，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工农兵的生活，才能拜他们为师，才能了解他们，才能正确地表现他们。

这个问题，有的同志说：“我们也可以坐坐火车。”我个人要求你们徒步串连，目前有些地方火车有堵塞。你们要同学生、工人讲清楚，火车、汽车、长途汽车不能拦，不能堵塞，你们要带头去说服他们，你们能不能？（群众齐声回答：能！）最后我们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周恩来：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战士们：

我现在向在场的文艺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群众鼓掌）

我现在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你们问好！祝你们健康！（群众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

同志们、朋友们，你们来到这地方前前后后已经等了好久了，因为事情多，耽搁了，很对不起你们。（群众呼口号）

我们希望，你们今天和我们见面后，除了少数代表留下，我们有些事情还要商讨，绝大多数回原单位去闹革命。（群众高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万岁！）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愿，你们想见到毛主席，你们要晓得现在天气很寒冷，要让他老人家多休息，让他用更多的时间关心国家大事、国际大事。

希望你们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常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精神经常在我们中间，（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也就是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了。

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的要求我们知道了一些，我们中央文革要起草一个文艺界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同你们开几个座谈会，然后公布。那么你们就可以更好地（或更有规律地）搞革命。

我同意江青同志的提议，文艺界的同志最后徒步到农村、工厂、部队中去串连。一方面更好地向工农兵学习，一方面通过文艺形式向工农兵宣传毛主席的思想。

小学教员同志，关于小学界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已起草若干文件，提请中央通过，小学界也有干革命的文件了。

体育界我们也起草了几条规定，经中央文革审查后，也可以向全国公布了。

新闻出版界，你们有很多工作可做，你们已经在搞文化革命，今年，尤其下半年，你们要多出版毛主席著作。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去年毛主席著作印了三千万本，今年准备印八千万本，我们应该在这里表扬一下出版界的职工们的工作，感谢出版工作的努力（口号：徒步深入工农兵，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

如果我们能生产更多的纸张，把过去不必要的书，尤其坏的书，节约下来，我们就可以印更多的毛主席的书！（口号：毛主席万岁！）

还有，我们许多机关，印了许多不必要的公文、报告，都节约下来。希望在座的红卫兵战士应当大大节约纸张，反对浪费纸张，更多地印出毛主席的书。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来到你们中间，应该说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呢？你们应该向广大的工农学习，学习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很好地在那里读毛主席的书，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他们坚定的政治立场，劳动人民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学习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

要学习解放军，学他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需要文艺界、教育界、新闻界朋友们注意的。

还有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你们的岗位是在农村中参加农民的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为农民服务，宣传毛泽东思想，锻炼自己，也帮助农民搞革命，促生产。你们的困难，我们找你们的代表座谈，帮你们解决。我现在再一次要求你们，现在来北京的人很多，我们要接待徒步来的同志，希望今天见面后早点回到本地区闹文化革命，回本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现在高呼：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379. 陈伯达、聂荣臻讲话 (1967年1月5日)

被接见群众：北航“红旗”红卫兵、红教工、西军电临委会、军事医科大学、北航“红旗”、国防科委部分群众。

陪同接见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同志。

地点：北京业余航校体育馆。

陈伯达：

我讲话你们听不懂？(众：听得懂！)

今天大家的这个态度很好，欢迎聂荣臻同志到这里来和大家见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听懂吗？(众：听懂！)刚才聂荣臻同志向大家说的话是诚恳的，他一方面有许多工作，另一方面身体也不太好，他现在来到这里，他已经算不容易了。(弥补)过去没有跟大家见面的一些缺点嘛！刚才他说的，他有些事情出去了，来不及了，他现在来了，还是和大家见面上了，说了许多自我批评的话，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我们要爱护这个老同志。听懂吗？(众：听懂！)还要翻译吗？(众：不要！)你们这些同学，最近不是很辛苦吗？(众：不辛苦！)

北航的同学，名誉不错，文化大革命以来名誉不错，你们要尊重、爱惜这个名誉，要爱惜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所取得的荣誉。听懂吗？(众：听懂了！)这样，你们刚听懂一句，我的中国话总说得不好是了。希望大家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好地工作，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现在是有许多经验，应该根据毛主席思想做一些总结。你们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事情，可以跟聂荣臻同志好好商量，聂荣臻同志有事情跟你们大家商量。你们有事情要采取商量的态度，双方都采取商量的态度。对不对？(众：对！)商量，事情就能办好，你们对聂荣臻同志不要采取强迫命令，你们也不要采取强迫命令他，可以吗？(众：可以！)你们有

许多细节，许多细节就是要商量，细节不一定要那么坚持，要坚持斗争大方向，听懂我的话吗？（众：听懂！）坚持斗争大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方向，坚持毛泽东思想，有些个别细节，不一定非那么斤斤计较不可，是不是呀！（众：是！）过去有一些细节上一定非要翻不可，大方向的帐是可以翻的，是不是呀！（众：是！）大方向是可以批评的，是可以翻的，一些小账就不一定要翻，只要改正了，就可以不一定要翻了，你说改正了，聂荣臻同志改正错误了。今天我要重申一点，今天我在这里说话，说不定要给你们抓住尾巴。也可能有错误呀！我今天说的话不晓得有错误没有，同学们不要记呀！（众：大笑！）大家不要笑。“陈伯达站起来，罢你的官”，“你在北航‘红旗’里胡说八道”，这也很可能嘛！我也承认有说错话的可能，但终归是细节，说话中有一些缺点是细节。最后还是重复一句，我希望北航同学，革命师生，保持北航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荣誉，就是在全国人民中所取得的荣誉。

聂荣臻：

同志们，因为我昨天才回来，同学们对我有意见，我想在电话里讲，回来以后没有讲，我错了，我欢迎大家批评。

科委成立十年时间，十年的工作不可能没有错误，我相信会有很多错误的。对于学校工作才六年，我们更无经验，我相信有很多错误，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回北京来的，大半年在生病，所以回来时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间。在外地也没考虑到了，在今后应补上这一课。但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错误路线，我不是推卸责任，我没有听指示，也没听汇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以来对北工、北航的工作有很多错误，不多讲。特别是北航红旗在科委二十多天，这不管是八局赵如章，还是参加北京市工作的同志有责任，作为我主任应负责，你们提出任何批评我都欢迎，你们不是提出火烧聂荣臻？我愿意，烧掉错误的聂荣臻，在火中重生，我愿意改正错误。

我刚回来！我交待给了科委同志要见你们，我欠你们的帐一定要还！但请同志们原谅！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还要回忆一下，有错就承认，没有什么可躲的，一个共产党员有错就敢承认。我们不搞鬼，我也不搞地下活动，我的错误也可以揭发的。同学们在两个二十五（即十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两次——整理者）找我，可能（没有）那么巧，两个二十五都走了，一找就走了。我决不会撒谎瞒人。听说同志们今天在这里，我不能再让同志们等二十八天，一个晚上也不能等，以前的一些误会，可能讲不通，但一天不通，讲两天总会通的，今天的时间很短，不要弄得很晚，看同志们怎么样？

380. 王力、戚本禹在清华附中接见清华附中同学时的讲话(记录) (1967年1月6日)

有的同学谈到，被公安部拘留的一些人有逼、供、信现象。

戚：对无产阶级专政应当爱护，不应当说是逼、供、信。我们的公安机关没搞逼、供、信。

王：什么叫逼、供、信？就是他根本没有这种事逼迫得写出来的，叫逼、供、信。

戚：这件事就谈到这里，说逼、供、信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有压力。

王：现在看来，大家对这一段时期什么叫无产阶级大民主，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看来大家认识不够，回去还要好好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

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专政问题？问题是说公安部不是“左”倾，而是右倾。

王：前一段公安机关软弱无力，不分别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不分别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基本弱点，这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少奇一边的重要问题。

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我们有一段革命的友谊（对革委会），你们是第一批红卫兵，是受压制的造反者，望你们不要玷污红卫兵的荣誉。

同学问：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有没有？

王、戚：没有。

（这时，两方面就革委会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王力和戚本禹小声交谈说：我们都学得了很多东西，这就是个大学校。这些青年人受到很大锻炼。）

最后王力说：这样很好，这样清华附中就有希望了。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抓住两条路线这个纲，从运动开始到现在的都可以摆。当前这一段是最重要、最艰巨的时候。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最激烈，我们怎样站到毛主席这一边。

戚：过去错了就交待检讨。这个责任不能让个人负担，清华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希望你们要保持这个荣誉，你们要继续你们的老传统。

（有一部分同学去辩论时老说：老红卫兵……）

王、戚：不要把老红卫兵和新红卫兵区分开，才几个月就老了？

戚：不要叫老红卫兵，一老就不好了。过去有错误就交待，就改正，最后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你们自己辩论，自己辩明。

（同学反映：觉得没事干，没意思。）

戚：照现在的精神状态是不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大有搞头。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现在的某些人的水平落后于九百年前《水浒传》里的英雄的水平（举李逵负荆请罪的例）。李逵不是共产党员，不是革命者，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难道你们红卫兵连他们都不如吗？

王：有错改错，希望你们早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戚：立足清华附中，关心国家大事。路线斗争，搞头大得很，抓住两条路线的纲。（指革委会）你们是有错误的，应该承认、认识，不要躺在成绩上，任何人躺在成绩上都是不行的。你们说刘少奇没有成绩吗？也有这么一点吧！但是改成修正主义了，我们就一笔抹杀？成绩是群众、老百姓、毛泽东思想做成的。你们躺在成绩上，成绩就没有了，我们就不承认你们的成绩了，你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成绩应归功于党、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群众。

王：“转入斗、批、改”，普遍地就是用这个口号来抵制批判反动路线。

戚：批判反动路线是伟大的斗、批、改，清华附中在反对刘、邓路线中应当起先锋作用，辩论是为了作战、统一思想，向刘、邓路线开火。为辩论而辩论是不行的，国家都变颜色了，还辩论什么？辩论就是为了统一战士的思想，统一队伍的思想，向修正主义作战，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你们现在的态度是不行的，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光荣的、伟大的。

戚：一部分人下厂、下乡，大多数人还要搞斗、批、改。

（有的同学说：我们在学校没事干。）

戚：怎么没事呢？我们整天都干不过来，刘少奇那十几部大毒草影片你们都批了吗？《人的阶级性》你们都批了吗？我看你们学校没有几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说，学校没有人。）

戚：这都不是人吗？只有认错，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就是阶级兄弟，团结一起作战。你们既能当司令、统帅，又能当小兵。只能当官不能当兵是不能接班的，接毛主席的班，你们要有这种气魄。不要有私心杂念，要提倡“公”字，破“私”字，林彪同志就是提倡破“私”立“公”。“私”字左派也是有的，有私心杂念的改了也可以当左派。清华附中几百人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还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很有威力，是生力军。刘、邓路线就是怕批判。你们就要抓住批判，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王：要作战必须分清敌我，只有分清敌我才能作战。

戚：毛主席解放了你们（指原革委会），你们还为刘、邓撕大字报，特别是你们嘛！你们是有成绩的，但不要站在成绩上。

（一个同学问：什么人算革命群众？）

戚：你就是革命群众。

(又问：不是反革命的一般群众，但表现不太好，给不给平反？)

戚：不是反革命的，就应该给平反，都是群众嘛！

381. 聂荣臻讲话

(1967年1月6日)

院部合并问题交给张××他们开会，我们先去听，不一定表态。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基地时，×院有十几个人要见我，我说部、院合并有两方面问题，一个是罗瑞卿搞的阴谋，他就是欺侮我们这些生病的人，什么权都要抓，科研工作他也要抓。我说，我给服点务不好吗？也不行。他得势时，红得发紫，蒙蔽了很多人，只好忍让一下，时机一到，盖子揭开了，原形毕露，这是个很大胜利。

另一个问题是当时放了很多空气，邓××一方面说科研成果不少，一方面说科研脱离实际。刘××也说：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中央作决定时我不在北京，我是事后才知道的。中央决定后，国防科委散伙风很重，国防科委还要存在，我还要干。

军工生产部门管不管科研，是有分歧的。中央既然决定了，我服从。但是现在搞大鸣大放，群众有意见，应该让大家讲，合并整两年了，到底有利没有利，到底对还是不对？有事实可以证明，特别是厂所合并，我反对。你把研究所都并入工厂，还有什么科研事业。有些人，对科研工作根本不懂，还到处摆老资格骂人，其实是狗屁不通。所以我给总理写了信，总理批示暂停。可是各工业部还在暗中合并，很多事情没有亲身经历，没有经历，没有教训就是说不通，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这些问题上是有重大分歧的，现在让他们去开会，不争论不能解决问题。这的确关系到我国国防事业前进还是落后的重大问题。工业部门为什么又不开了？这是中央决定的，他们不执行不对的。

382. 周恩来在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答群众问纪要

(1967年1月7日)

问：(湖北专揪王任重代表)

总理说：王任重主要在湖北，省委想卸包袱，让他到北京，不行，要在湖北批深批透，他身体不好，主席意见是让他留在湖北。总理谈到陶铸问题时说：

陶铸同志要检查，不能马上见你们，因为他是中央常委，首先在常委中检查，现在你们手头材料还不多，你们实事求是整他的材料交上来。

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我们不能参加，那就不好了，你们现在要多收集他的材料，可以贴大字报。

总理问一个中国留古巴学生情况后说：

“世界革命红卫兵”现在还不能发展，修字号国家害怕，资本主义国家不敢要，民主国家的左派(可能是右派)、中间派都害怕，因为这是个红色的种子。如果出国的留学生都搞这个，我们到外国是找同情分子，如果把这个名字亮出来，他们(别的国家)不敢要了。我们要重实不重名，外国可以因为你这个名字，找理由拒绝你到他国去留学，你们最好不要亮出这个名字。

总理问北师大一代表关于军训问题时说：

到工厂去的同学可以通知他们，让他们回校，时间紧，政治靠你们自己学，左派可以适当留工厂一部分，一般的都回来。

总理问海陆丰代表时说：

现在你们干革命有有利条件，有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也有不利条件，就是你们革命，

上面直接压力太多。这就靠你们自己闯一闯，但总的说来有利条件是多的。代表答：有毛泽东思想。

总理问北医代表关于整风问题：

代表答：北医八·一八在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先整风，随后保守派也整了风，他们整了风就团结到一起了，到十五期社论以前，他们相当一批人炮轰中央文革或赞成炮轰中央文革。

总理插话：这是他们反革命面目一个大暴露，现在怎么样？代表答：现在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

总理点头。

383. 王力、戚本禹在红卫医院的谈话

(1967年1月7日)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戚本禹二位同志于一月七日来红卫医院(原安定医院)，接见了该院红旗战斗队全体队员、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北医八·一八在该院串连的全体革命师生，进行了亲切谈话。同时被接见的有由于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迫害而被关在该院的“病人”陈里宁、王福显等四位同志。下面是谈话记要：

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先找到几个同学，说要见医院红旗战斗队，同学说正在开会。首长说：“好，我们去会场。”众：首长接见我们，我们热烈欢迎(热烈鼓掌)。

王、戚：这里没有首长，我们都是同志。我们看到红旗战斗队、清华井冈山等学校揭发你们医院的情况。很好的同志被打成精神病关在这里，象陈里宁从六二年就批评刘少奇，批评的很尖锐。是否还有类似的情况，可以当场叫他们出院，可以吗？

众答：可以！

王：我们支持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必须彻底造精神病院的反，全国有类似的精神病院，都要造反。

戚：从你们这一个角落揭露精神病院的情况，也是对刘、邓路线的揭露，也是重要的揭露，你们作了重要的贡献。

(陈里宁从病房来到与王、戚二同志握手。众高呼：“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戚问：你什么时候来的？

陈：十月份，这是第四次入院了。

戚：你现在怎么样？可以出院吗？

陈：可以。

戚：这几天你留下来和这里的同志们一起干革命，过几天，我们来接你，送你到马列主义学院去。你从六二年就批评刘少奇的错误，你没有精神病，你要出院。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的材料写的很好，他们才有精神病。你可能对院外形势不太了解，多看看报纸，你的马列主义水平很高，你还要向革命的小将们学习。不要骄傲，现在小将们超过你批判的水平了。

金大夫：他是第七次住院(湖南住三次，北京住四次)，从监狱到医院，秘密逮捕，眼睛

被蒙上黑布送到北京来。最近看守所仍不同意给他平反，还要让他去劳改！

戚：你们可以到其他精神病院去点火。

王：精神病院的人可以去，你们了解情况。(又进来一些同学)。看到你们的材料，你们造反造的好！

戚：你们是精神病院造反的首创者，造修正主义的反，将来苏联搞文化大革命也得这样。

王、戚对陈里宁说：先给你家里打个电报。

众：他没衣服。

戚：我们给他衣服。

王：你就在这里闹革命吧。

(同学介绍另一个反对刘少奇的“病人”王景瑞的情况。)

戚：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众：已经出院了，我们正在调查这件事。

王：你们医院与政治有密切关系，精神病院的大夫、护士要政治挂帅。

同学：我们要把陈里宁的事登在三司的报上，公布到全国。

王：可以嘛！

戚：你们精神病院的病人大部分是有病的，一小部分没病，要把这一小部分人解放出来。

红旗战斗队员(以下简称队员)：目前红旗战斗队还是少数，为了进一步促进运动，我向首长提两点要求：

1. 希望首长给我们讲话作指示。

2. 和全国精神病院串连。

王：讲话不要讲了，我们还有事情要回去，我们来了，就是支持你们。

戚：串连要安排一下，学生多去些，医院少去些。

同学：全国的精神病院唯心的框框很多，没有阶级观点，我们想到全国宣传。

队员：我们病区有个高干，根本没有病，就是要酒疯，后来大夫说：因为是高干就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吧，把他保护起来。

戚：你们看他是革命的吗？叫什么名字？

众：不革命的，叫周克刚。

戚：什么高干低干的，不革命的就叫他走。

队员：还有一个工人，运动中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为他揭发了问题，被送到这里来，其实没病。

戚：把他叫来。

(被打成反革命的“病人”王福显、李增印来了，与首长握手。)

王福显：啊！天亮了！(非常激动)同志们！咱们唱个歌好不好？众：好！(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在场的学生和队员有的感动的流下眼泪！)

戚问：你有精神病吗？

王福显：没有。红旗战斗队作的好，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王力：他对你们(指红旗战斗队)的评价很高啊！(热烈鼓掌)

戚问“病人”：他们为什么送你来？

王福显：我的意见和他们不一致，是少数派，要造党委书记的反，他们就说我没有精神病。

戚：这哪有精神病？他们才有精神病呢！

王福显：我是贫农出身，他们压迫我，我一直没有屈服，我相信毛泽东思想。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都必须沿着毛主席指引、开辟的航道、林彪同志指示的方向，乘千里风，破万里浪，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革命中学会革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革命一辈子，奋斗终生。

戚：很好嘛，这是主席的话，我看他们是精神病。

王力：都没有精神病，这是两条路线、两种立场的斗争。
戚：对！
戚问“病人”：你呆多少天了？
王福显：一个月了。
戚：比他(陈里宁)少多了(笑声)。
王福显：我很拥护他的意见(指陈)，他根本不是反党的！
戚：你们是好朋友。
陈：住一个屋子。
王福显：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我都看了，写到我心里了！不吃饭我也要看这些材料！
队员：扫干扰时期，他捧着红旗放不下，党支部说他是精神病。
戚：我看他们才有精神病。
王：都很正常。
戚：你怎么来的？(问“病人”)
王福显：用汽车送来的。
王力：旧社会就用精神病陷害劳动人民，鲁迅所写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被统治阶级认为是“狂人”、是精神病的。
你们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狂人”。
戚：要是修正主义变了天，我和王力都得成了“精神病”。
戚问金大夫：你是不是党员？
金：不是，我是团员。
众：他们不要这样的党员，说她是“毒蛇”，是“反革命”。
戚：他们修正主义的党不要，我们毛主席的党要。
(一个病人家属介绍一个解放军病人的情况，病人李红君进来与首长谈自己的情况。)
首长听完后说：因我们还要开会，不能详谈，可以让金大夫给你看看，给你诊断一下，如果有病就治疗，没病就出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好吗？
李：好。
戚：我和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建议：以金大夫和王志同志为首组织一个班子，到每个病区，一个一个病人的审查，作出正确结论。你们同学把材料好好整理出来。
同学：我们不参加军训留下来可以吗？
王、戚：可以，留下来把这搞好。
王志(红旗战斗队队员)：我们宣布一下审查小组名单。
戚：还是民主选举吧！
王福显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384.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的指示(1967年1月8日)(见《系年录》第五十五卷)

385. *毛泽东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1967年1月8日)(见《系年录》第五十五卷)

**386. 周恩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农林口部分师生和人大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7年1月8日)**

接见人：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汪东兴

周恩来：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关锋同志，汪东兴同志和我在这个地方接见你们。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同志们，你们在场的有从农林战线上来的，有从教育战线上来的，我们在场的，我们有一部分同志今天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大会，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同志们，你们刚才在中南海西门，提出批判中央政治局、国务院某些领导同志的错误，或没有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的、国务院的。比如谭震林同志、陈毅同志、谢富治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还有经委的余秋里同志，这些同志在文化革命中可能说了些错话，写了些错文章，犯了一些原则性错误，是在初期或在一段时间内犯的。而当时提出错误路线的是刘少奇、邓小平二位，责任应由刘、邓负，而不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同志。这些同志在十一中全会上，有的已经作过检查，有的正在作检查，要给他们一定时间作检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同志都处在我们党的政治工作的第一线。如谭震林同志负责农林方面的工作，李先念同志负责财政方面的工作，陈毅同志负责外交方面的工作，谢富治同志负责公安和司法方面的工作，李富春同志负责国家计划和党务工作，余秋里同志负责石油部门和大小三线的工作。他们的性质不同于制定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也不同于继续反动路线的陶铸同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方向指正了，不要把方向指错了。要指向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刘、邓，进一步指向继续反动路线的陶铸，进一步指向彭、罗、杨反党集团。经济战线上，也不应该指向余秋里同志，而应该指向和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沾边的薄一波。象安子文在党的工作上有和彭真一样的反党罪行，所以斗争的矛头一定要指对。

我们应当把批判反党分子和斗批改结合起来，因为在思想上有共同的东西，这是需要和大家讲清楚的。

所以你们要求批评在中央工作的某些负责同志，我们愿意听到你们的批评意见，把材料交给中央文革接待站，再转给中央，转给本人，让他们作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给某个单位作检查，这是第一部分要说的。

第二，你们的请愿是合理的，但主要接待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在那里我们派了几百名接待同志，反映给有关部门(漏记了几句)，这个地方或其他礼堂，是中央文革分别接待你们的地方。至于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钓鱼台，这些地方，我们要誓死保卫的。你们晓得，中南海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应该给予一定的安静，使我们伟大领袖能操心国内外大事，我们不要在那个地方请愿，从早到晚，好多大喇叭直对中南海，所以，我们呼吁北京市的学生，并通过你们向广大劳动人民说清楚这个问题。大家看好不好呀？(大家答：好！)所以我一直有个规定，无论是西门、西北门、南门、西南门、东门都要坚决保卫，不让任何人冲进中南海。在西北门、东北门都发生过这样情况，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挺身而出，保卫中南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们曾经处理过两次这样事情。大家无论如何要遵守这个最高的纪律。有些青年同志不懂这些，冲进去了，我们还是劝说，他们出去了，我们也没公布这些事。我们应该告诉来串连的学生、工友，向他们讲清楚，如果武装警卫人员态度生硬一点，如果他们莽撞一点，我替他们向你们道歉，同时要求你们对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给以应有的尊重。

同志们！刚才说你们要批判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要批判陶铸同志继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对的。但是，你们去揪他们，党中央、毛主席不同意这个作法，要党内批判。我们不同意你们这个作法，但我们愿意帮助你们转交揭发他们的材料，要负责帮你们办到。

现在各单位要有组织地串连，批判反动路线，比如政法战线、外交战线、财贸战线、农林战线等等，以便更好地串连，更好地交流经验。这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好处，希望得到你们赞助和支持。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江青：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你们好！(热烈鼓掌)我代表毛主席问你们好。(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我知道你们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因此，我要告诉你们，他很健康。(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此外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致无产阶级革命敬礼！(热烈鼓掌)

同志们是来自祖国的四方，在这里集合很不容易，你们革命热情、革命干劲，鼓舞着你们冲破重重困难障碍，来到祖国的首都，我们欢迎你们，首都人民也热烈欢迎你们。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革命干劲是可钦佩的，我向你们学习。

目前，全国正处在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斗争的方向，在社会上是两条道路斗争，就是你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我们党内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你要走资产阶级的道路，还是走无产阶级的道路，这是个大是大非、方向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相信同志们是懂得的。在我们党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本不希奇，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就存在。但是有的时候它占了主导作用时，革命就遭到损失、遭到失败。在有一段时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使得许多同志受到迫害，在这里我们是完全可以平反的，但是不包括地、富、反、坏、右。

同志们，斗争的锋芒，应该比较准确地针对着一小撮制定这条路线的人以及死不回头、坚持执行这条路线的人。

对于那些或多或少地执行过或者在日常工作中说错了话，犯了错误的同志，就不应该采取象对付(坚持)执行错误路线的那一小撮当权派那样的态度，你们说对不对？(对，热烈鼓掌)刚才总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有些同志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在工作中间，或者执行过一段错误路线，或者在日常工作中说错了一些话，做错了一些事，因此，我们希望同志们不要象对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样去对付他们，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目标打歼灭战。在这里发生一个问题，我相信同志们都是真正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但是可能有个别分子是假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以及其他有关重要的党和政府部门是应该保卫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有这个职责的，北京的红卫兵也说他们要保卫。希望你们不要一时激动就冲进去，这样以后就不好办事，你们说对不对？(对！)就很难区别是真是假了。你究竟是什么目的？假使有个坏人混进你们那里冲进去，作了你们十分不愿意的事情，同志们想想看，后果是什么？今天听说有一百多人冲进中南海，我劝告你们，以后不能这样，我的劝告是完全出于好意。

你们会说为什么不接见你们，不是不接见你们，我们最近差不多都是工作通宵，我们的总理有时到七、八点钟才睡觉，我们差不多也都是到天亮才睡觉，就是要看到全国的事情，不停地进行接见、座谈，并不是我们有意不接见你们，有些事情，我们排的很满，这要请同志们原谅。

同志们，我们的大方向一致了，那就容易办了，你们也好，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好，北京的红卫兵战友们也好，都说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那就好办了，那就一定要执行。毛主席不是有篇著作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学习的不够，我希望跟你们一块学习，你们赞成吗？

至于我个人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或者有什么错误的地方，同志们完全可以提出批评，贴大字报，也可以写信给我，我还要这样声明，同志们赞成吗？

387. 周恩来在接见石油系统在京造反派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1月8日)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我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现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问你们好！并且预祝你们在石油战线上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是从石油战线上四面八方来到北京的，你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石油战线上取得胜利的无名英雄。现在你们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你们现在在北京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要彻底击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斗争精神，我们支持你们(呼口号)。你们要批判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你们也要批判你们石油部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你们要搞你们学校斗批改工作，这样，我们支持你们。在进行路线斗争中，你们许多单位，石油学院、大庆油田，还有许多单位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打击、围攻，甚至错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等等。这些都由部党委、院党委、前工作组负担这个全部责任。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你们这些被错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宣布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并且我提议你们石油系统各单位回到本单位，要党委遵守军委十月五日紧急指示，十月十六日补充规定，限他们在一定期限内交出黑材料，对受压制，错打成“右派”“反革命”的工友宣布一律平反！(呼口号)……

在谈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总理郑重地、语重心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是说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誓死保卫毛主席吗？那么，我们说怎样捍卫呢？斗争的矛头应当指向哪一个方向？首先讲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首先要批判制定这条反动路线的人，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会者高呼：“打倒刘少奇！”此时总理不高兴，向后转，以示不同意。又呼：“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理这才又面向大家，以示同意此口号)这两个口号是有区别的。我们要彻底批判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口号应该区别。在十一中全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我今天是代表党中央常委的，这样的口号在我面前喊，使我处于为难的地位。

许多次，同学们，战友们冲进中南海，要包围中南海，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的指挥中心，要干什么？要把刘少奇、邓小平揪出来。毛主席给我的任务是叫我说服同学。你们可以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许揪出来批、斗，不需面对面，可以背对背。斗争可以是口斗的，也可以是笔斗的，贴大字报。你们要信任毛主席、信任我们伟大领袖采取每个步骤是对的。(高呼：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所以，去揪斗，毛主席不赞成，叫我说服你们。所以凡是我说能服你们，我都不惜时间来说服你们。(呼：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凡是毛主席要我见你们，不论怎么样，我也要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来劝你们。(最热烈鼓掌，并高呼：“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昨天晚上一直到天亮，我们还在办这事。中南海五个门，新华门、北门、西门、西南门、西北门都被包围了(约八千人)，包围干什么？他们要冲进去，结果西南门有一百多人爬着铁门冲了进去。大家想想，你们说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路线吗？这样事情该怎么办？我只能挺身而出挡住，(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我只好出去劝劝，我只能劝。同志们说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要叫毛主席办理国家大事，为世界大事操心，你们冲进中南海，不是……(不清)吗？这样的事我处理五次，两次在北门，三次在西南门。

我希望再不要出现这个事件。我希望同学们、战友们有机会宣传这个事情。(群众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提一提，就是这个大喇叭——宣传车，本来北

京没有这个，是从外面传来的，我决不是批评这个喇叭车，我希望不要从早到晚、从晚到早地把这个喇叭对准中南海广播，因为党中央、毛主席没办法安心工作，我们睡眠时间已经很少了。我们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这几件事我只是向你们建议，希望你们向同学们、战友们劝说，好不好？（群众：好！）

……现在（工交口）矛头不是对准彭真，而是转过来对准余秋里同志，甚至在一次会议上给他挂上“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口号的牌子，余秋里同志说得对：“我不能对抗革命群众，我心里有数。”石院一同学一职工曾和我把他押到中南海，我转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不同意这样做，临走时主席嘱咐我向同学们解释，方向不应对准余秋里。现在中央、国务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总理李富春、陈毅、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在第一线上，还有别的副总理，聂荣臻在国防……不错，这些同志在一段时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必须说明：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揭发批判了彭、陆、罗、杨时，刚才说的他们是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批判他们的，同样，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也是跟着毛主席的，他们必须向有关单位检讨，允许他们有准备，不放过日常工作，但不能揪来揪去，……不能把矛头转移了，某些地方要检讨，某些地方要讨论。为什么？因为不能把矛头搞乱了，防止反党集团及揪出的爪牙把方向指向在中央做日常工作的同志。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在地方流毒很深，必须批垮、批倒。我们很支持你们在石油部组织一个联络站。

总理在讲话中揭了彭真、薄一波合伙搞余秋里同志，企图砍倒大庆油田这面红旗的大阴谋，他指出余秋里同志的石油部长是毛主席选拔的，石油工业伟大成绩，首先归功于毛主席的关心和毛泽东思想，全体职工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必须说，毛主席选拔选对了，很清楚嘛！同时指出余秋里同志的错误，骄傲自满，不虚心，民主作风不够，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前两年成绩不能抹杀，这是我受毛主席委托，我必须向你们说清楚，我也完全赞成你们揭发石油部、余秋里的问题，但必须全面看，不能把主攻方向弄错，在工交战线上一些重大问题不是李富春、余秋里，而是薄一波、陶鲁笳，你们为什么矛头不是指向薄一波、陶鲁笳，而是指向李富春、余秋里同志呢？同志们，希望你们好好想一想，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总理接着谈到薄一波的罪行。

总理在谈话中也介绍了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同志抵制党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遭受打击迫害的情况。总理临走时与王进喜同志亲切握手。后来王进喜同志在大会上发了言。

总理在临走时指挥全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388. 戚本禹在接见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等单位六十二位代表时的讲话整理 (1967年1月8日 人民大会堂)

（一）戚本禹同志说：运动不靠黑材料来解决，主要靠毛泽东思想来武装群众。光靠黑材料不行，表面（上）黑材料给你们了，但是他脑子里还有黑材料，因为他们当权，他随时能整你们的黑材料，还能把你们打成“反革命”，连我也一样。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挖掉这个祸根。你们回去要把那些右派、当权派搞彻底，否则他们有势力、想东山再起。

（二）戚本禹同志说：我们最好不要用“保皇派”这个名词，但在群众中确实有两派，一派是“保”的，一派是“革”的。我相信“保”字号会逐渐少的，“革”字号会逐渐增多，大多数同志会逐渐认识清楚的。用“保皇派”这个名词容易和当权派混淆。当权派有缺点错误，就可以批判，要去保那就不对了。在两派分歧中要注意三个问题：

1. 原则分歧，不能合，要斗争；
2. 做法分歧，不能采取过分行动，要贴大字报来解决；
3. 作风问题，有私心杂念，要通过学习《老三篇》来解决。

(三)戚本禹同志说：要把目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起来，实际上从一九四五年以来，从“七大”以来，就有两条路线斗争。当时刘少奇就要搞妥协，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就把这个对国民党的妥协搞掉。当前有股搞妥协的思想，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在二次大战，都掌握了很多军队，如果他们要夺取政权，那完全行。但他们会参加会议，怕再打仗，结果把军队交了出去，结果实权没有拿在人民手里。当时刘少奇也要同国民党妥协，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以来，也是一直贯彻的。

有一次，我在会上说，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不同意，我是这样认识的。

他们认为对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剥削多了，而是剥削少了，不仅在东北说，在华北也说。他们在农村要发展农村经济，说什么出了新富农，这可以组织贫下中农，你们看这是什么话？这不是搞二次革命吗？在工厂搞新资本家，搞王光美那一套，叫王光美的哥哥、嫂嫂是大哥大嫂。还要资本家入党，东北同志向他请示新富农能不能入党？他说也能入党，这就是搞“三和一少”，这就是搞资本主义。说美国反对我们，苏联也反对我们，我们孤立了。他要和，以和为贵。和印度、苏联和美国不进行斗争。对支援外国要少，这不是搞和平共处吗？他对资本主义感兴趣，到印尼去丑态百出，你们看过这个电影吗？简直把中国人的脸丢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跳阿飞舞。他在国内搞“三自一包”，搞自由市场、自负盈亏、自留地，搞得可火热了，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好，能活跃经济。我对自由市场是调查过的，一个七元多的热水瓶，在自由市场上卖三十多元。企业也不搞国营的，而搞自负盈亏的。

尤其在六〇年和六二年的困难时期，党内斗争一直很激烈，以前都是党内斗争，保密。现在搞文化大革命，斗争都揭出来了。

刘少奇是当权派这没有问题吧，而且是大的，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叫什么呢？至于毛主席按什么矛盾来处理，我不管，我的认识是这样的。

(四)关于“左派”问题。戚本禹同志说：左派都是围攻出来的，没有右派的围攻，就不能出现左派。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你们被人家围攻，很好嘛！(问：还好？)好！很好！他们斗争你，使你更坚定了，你们还要感谢他们！(问：还要感谢他们？)当然这是一句俏皮话，你们理解这个意思吧！

戚本禹同志说：你们自己解放自己，中国人民就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自己解放自己的。你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北航把一些党员都开除了，但他们仍干得很欢。

福建文化系统同志说：我们和北京同志不一样。蒯大富，周总理还给平反了，我们得不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指示，只有报纸。戚本禹说：有报纸就够了，那是很有力的武器，我们去过的学校反而搞得不好，而没去的地方，他们自己在那里滚爬，在斗争中成长起来了。由少数变成多数，搞得很好。我举个例子，在文化革命开始不久，我就到北京轻工业学院去，第一次去了，工作组不让进门。第二次拿着陈伯达同志的介绍信去了，因为陈伯达同志是中央文革组长，他们就不敢阻挡，让我进去了。如开了控诉大会，许多同学都控诉得哭了。工作组就改变了方式，一夜间把反学生的大字报就糊住了。可轻工业学院文化大革命搞得不好，最近又找我说不行了。可北航红旗，开始搞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管他们，他们搞工作组，在国防部门口等了二十八天，抓赵如璋，自己在那儿滚爬，滚来滚去，结果在斗争中成长了，现在北航在北京大专院校中是搞得比较好的。还有矿院也是这样，这个学校很大，以前在我脑子中没有印象，也没有管他，他们就起来自己搞。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们胜利了。我们上次去(大约指十二月二十四日那次)，实际上去祝贺他们胜利的。他们写了一些材料，中央批发了，你们看见了吗？(答：没有见。)

(五)关于肖望东问题。肖望东是刘、邓反动路线忠实执行者，是急先锋，是干将，是打手。肖望东的文化部不是什么新文化部，陆定一的部长，还是旧的文化部。你们千万不要被这个“新”字所迷惑，只有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是新的文化部。

(六)戚本禹同志说：斗争越尖锐的地方，斗争就越有希望，我看北京有希望，上海、天津有希望，山西也有希望。

(七)戚本禹同志说：上海的问题，主要是要抓曹荻秋的问题，批判市委要和刘、邓联系起来。这样，斗争的水平就可以高些。上海最近开了个十万人的大会，会后形势有很大好转，中央文革姚文元、张春桥同志到上海去了。现在机关革命已提到日程上来了，机关革命是重要的，毛主席是很重视机关革命的。

(八)戚本禹严厉斥责了太纺红卫兵秦洪亮等一些人在北京抓太纺红卫队赴京代表的恶劣行为。戚本禹同志说：你们在北京还敢这样对待红卫队，那在太原就更凶了。你们都是工人阶级，都是阶级弟兄，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被杨丕夫挑拨？戚本禹问：“这次有打伤的人没有？”（答：这次没有。）你们还敢打人，我就叫公安部逮人，如果这次有流血事件，我们马上叫公安部逮人。（当时秦洪亮是太纺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想抵赖此事，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当场揭穿了他们的谎言，太纺红卫兵抓人时，公开宣称他们能代表红卫兵。）戚本禹同志说：“你们手下的人干的事情，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配做领导。回去查一下，要处理打人凶手，据说打女同志打乳房，简直是流氓！山西有位同志来信说：解悦同志在工作时间，也（被）围着人、进行围攻，怎么能搞生产啊！”

太纺红卫兵的恶劣行为引起被接见单位的极大愤慨，不少人提出要把打人凶手马上抓走。

389. 戚本禹在国防部接见测绘学院、技术工程学院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 (1967年1月8日)

首先戚本禹同志问了我们两个学校的文化革命情况，然后说，你们的情况我不了解，有些意见大家商量。我感到你们造反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有一个重要问题你们很少谈，忽略了那个问题，你们谈谈。有的同学说，我们没有讲到阶级斗争，有的说，我们没有上纲……。戚本禹同志说：你们讲到现在就是没有上到刘、邓路线的纲上，你们造反造谁的反？同志们说：“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戚本禹同志问：你们为什么不讲刘、邓呢？你们谈半天陶铸，你们连根都没找。你们是有弱点的，你们不如北航，你们可能不服气，怎么我们都是解放军了，还不如北航呢？不要以为自己是很高明的。我老实说，我是很不高明的。

我认为刘、邓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不同意，反对我，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说他是不是最大的，是不是党内的，是走社会主义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不是当权派，所以我说他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说我这是加起来的。当然，光有推理还不行，你们还要深刻地理解，这条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危险性，中国文化大革命，最大问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问题不是罢官，党内路线斗争，毛主席从来就不主张罢官的。比如王明这个人是一直反对毛主席的，还是叛徒，他现在在苏联还写文章反对、攻击毛主席。但是在七大、八大上还动员大家选他，同志们不同意，但是毛主席的指示，想不通也得执行，所以当时比如一个小组五个人，让三个人投票，其他二个人就不投了。因此他的票最少，是中央委员最后一名。比如刘、邓现在还保持中央常委，重要问题不在罢官，而在每个工人、每个农民、老百姓都要知道他们是错误的。我们军队每个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光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而是在四五年七大以后一直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现在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他的爆发点，是高峰。不得不解决。对建国十七年，以及十七年以前到七大共有二十二年了，对二十二年的斗争，我们要了解，都要关心，都要清楚。这样我们在斗争中才能了解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每个人武装起来。不但我们要了解，每个学员都要了解，每个工人都要了解。现在广大的工人、农民、军人和干部揭发了许多问题。如一九四五年，毛主席提出蒋介石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而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要搞和平共处，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毛主席就不交武装，就反对刘少

奇这个路线，当时国民党军队有五百万，后来到八百万，我们只有一百万，经过艰苦斗争解放了全国。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说要提防“糖衣炮弹”，刘少奇就是中了“糖弹”，“糖弹”就是王光美。刘就搞了个王光美结合起来篡党，用他们的观点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国家。刘少奇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他愿意吃这个“糖弹”。王光美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知道吗？王光美是个大资本家，她哥哥也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刘少奇过去在苏联留学，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很深，他讲中国农民受剥削不是受多了而是受得少了。有个党员变成富农，有人主张开除。刘少奇说：党员可以变成富农，富农可以入党，可以剥削人。刘少奇见王光美哥哥嫂嫂说：“大哥大嫂你们好啊，你们应入党啊……”。共产党的电影他不愿看。我过去在中南海工作过，他整天就看看戏，对资本主义黄色电影很有兴趣，江青同志反对他，反了以后，还偷偷地看。而这一点，你们虽是戴红五星，这很光荣，但我要不客气地说，你们比北航差些。同学们说，上面框框多，过去都不让我们出去，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戚本禹同志说，你们不要把责任往上推，没有冲破框框是你们的错。昨天我在神经病院碰到一个军人，别人说他是神经病，六二年就反对刘少奇，因为他反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以他送到神经病院，医院里给他上电刑、吃药……但是他还要反对刘少奇。四机部有个战士，也在神经病院，他老是看《红旗》十三期社论，当时就刘、邓上了纲。他们也说是神经病。我看这个医院简直是法西斯，我建议他们起来造这个医院的反。他们的条件比你们差吧，我看你们还不如那个神经病。我建议你们造反派回去开个会研究研究，分析一下全国形势，要总观全局，批判刘、邓是全世界人民的大事，否则中国就会改变颜色，变成修正主义。六一年、六二年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刘、邓鼓吹的。他们害怕帝国主义，特别怕他们的原子弹，什么苏变修了，××也变修了，印度和我们不好了，以和为贵，就拿王光美作交易，出国到处访问。和苏加诺很不象话，那个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可以放给你们看看，总参研究一下。你们自己要知道这是国家大事，反对刘、邓就是最大的国家大事，这比你们一个学校的、一个系的、两派间的斗争意义要大，要通过具体斗争，来突出与刘、邓路线的斗争。现在最大的突出政治就是突出反对刘、邓路线的斗争，要抓住这个纲，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结合反对刘、邓路线。你们写过批判刘、邓的大字报没有？我希望你们回去每个人写一篇批判刘、邓路线的大字报。不是光喊口号，而要具体批判。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要迷迷糊糊……。

毛主席从提出批判《海瑞罢官》到现在要打向谁？你们知道不知道？北航就派人到四川抓“海瑞”，海瑞是明朝人，三百年前的事了……“海瑞”就是彭德怀，彭德怀不是你们部队里的吗？你们部队里为什么就没有人去抓呢？我看你们又要把责任往上推，忘记了主席说的内因是起主导作用的。你们部队有一个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七月份就写过一封信批判刘少奇。毛主席在旧社会就起来造反：粪土当年万户侯。毛主席那时还没有党，现在你们还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当时就敢藐视困难，成立了马列主义小组，你们现在比毛主席好多了，你们要从内因、从思想觉悟上找差距。军内斗争与刘、邓路线联系紧密，庐山会议当时有个“军事俱乐部”，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个反党集团，他们反对毛主席路线，与刘、邓路线有密切联系，军队斗争仅仅揭开序幕。彭德怀在四川到处转，北航、地质把它抓回北京，他还向红卫兵说：我是拥护毛主席的，反对刘少奇的。有的红卫兵以为他还不错呀，拥护毛主席、反对刘少奇呀，这就是说北航里也有不高明的。

刘、邓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彭不仅反党而且里通外国，是个民族败类，他们想把毛主席反掉。他们在党内翻案，在党外作舆论准备，就搞“海瑞罢官”，叫“青天”回来吧！说彭德怀只不过是在党内提些意见，就被罢了官。刘、邓路线与部队关系很密切，后来罗瑞卿篡军，反对林总。你们要区别两条路线，这是两个纲，执行刘、邓路线是彭、罗、陆、杨，而林总是坚决反对、抵制刘邓路线的。有一次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刮阴风，在我们困难时期大反三面红旗，形成一股逆流，林彪同志挺身而出，起来讲话，坚决反对刘少奇这股逆流，越是困难时候越是要顶住，三面红旗好得很，越是困难时，越是要坚持，越要高举毛泽东思

想伟大红旗，将来这个报告可以给你们传达。部队以林彪同志一方执行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罗瑞卿一方执行刘、邓路线。每个人都要考虑，这个人是执行哪一条路线的，一定要搞清究竟是刘、邓路线一边，还是站在林彪同志一边，要区别这个大纲，把目标搞准确。要把部队斗争与路线斗争联系起来，要调查一下，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还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有时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可能说些刘、邓司令部的话，但对他们不能打倒、火烧、油炸，属于刘、邓司令部的可以打倒、火烧，还可以象你们说的“油炸”。不要“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打了一家人”。当然不打不相识，有时你们可以问一问是哪个司令部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就不要烧焦了，烧焦了就坏了，不能象烤鸭子那样。比如谢镗忠同志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错误是有的，不要尽抓小辫子。刘志坚不要看他官多大，他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就要“油炸”。

杨成武这个同志我可以给你们保证是忠于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很好的同志。他是有战功的，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的。我没有战功，我是个书生，而且是个很“蹩脚”的书生。肖华同志恐怕还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他的东西我看的不多，有错误可以批判嘛！你们不要再问了。杨成武是有特殊贡献的，要是没有杨成武和以他为首的拥护毛主席的军队顶着，罗瑞卿早下手了。你们每天不要想当然，也可以写信问问，问问杨代总长，某某是哪个司令部的？目标要准确，找一个就可以串连，比如解放军总编辑胡痴是毛主席司令部的。

你们要保护总参，没有总参我们文化大革命就不能进行，我也会变成“神经病”，甚至坐监狱，当然我们不怕，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准备，苏联现在有多少人因保卫斯大林被关、被杀？！部队很重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军队、法院、监狱，其中最重要的是军队。所以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不能搞坏。要关心部队里的两个司令部。不是你们院校的也可以点把火。街上标语你们看到没有？要打倒廖汉生（北京军区政委），还有人没有贴大字报，但你们要心中有数，要开动脑筋想一想。这些人头上是有皱纹的。要开动脑筋想一想究竟讲的有什么奥妙在里面。部队斗争复杂，因为反对毛主席的人的头上也是有个红五星的，要想想这个问题。刘志坚这个家伙很坏，想把叶总讲话中的错误以林总的名义印发给全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乱发很多指示。你们应一个一个研究，还有支持他的人。不要这样想：刘志坚的上级是谁，上级的上级又是谁。没有这么简单，有个曲折性，你们也要来个曲折。这样才能找到根子。找到了根子后还要讲究斗争策略，要善于斗争，想办法，把目标集中集中，分析一下形势，加强战略战术，这个很不简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毛主席为什么布局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让大家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将来不出修正主义。那些家伙的脑袋上有皱纹的，我们也要皱眉头，计上心来，毛主席不是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嘛！你们要善于分析形势，要把主攻方向对准，要掌握战略战术。我建议你们对黑材料不要花那么大的精力，主要是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垮，如果不打垮，他们思想里还是有黑材料，对黑材料要分析一下，哪些是黑材料，哪些不是。

我现在正在研究高干子弟，比如周荣鑫的女儿是个造反派的，我还研究了一些“造反派”，但不是（说）造反派是形左实右，我就研究出这么一个，暂不公布。

你们不要只蹲在学校里，只看到本单位的当权派，要研究分析，要顾大局，识大体。你们到国防部是不正确的，三大纪律你们没有执行好，但是就是愿意进来，我讲这个你们可能不高兴，但我是共产党员，要讲原则性，我还是要说的。

我来时跟总参讲了，总参让你们进来是严重错误，让你们进来是原则性错误，首先由总参负责，其次，你们也要负责任。但我不同意说冲国防部就是反革命，这在小组里是有争论的。后来叶帅作了检查，但不能因为叶帅作了检讨就认为作得对了，不是反革命的不一定都是对的，错误的东西就不能坚持，我们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建议总参同志们，在门口设立接待站。对同学们不要有对立情绪，因为他们也是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390. *毛泽东论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1967年1月初)

(见《系年录》第五十六卷)

391. *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谈贺龙及其他(节录)(1967年1月)

(见《系年录》第五十六卷)

**392. 周恩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来京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的
革命同志时的讲话**

(1967年1月9日 人民大会堂)

谢富治：

全国各地来北京的政法战线上的革命同志们，我代表公、检、法三机关和中央政法小组的同志们，欢迎全国来到北京的检察系统的同志们，欢迎全国来到北京的法院系统的同志们，欢迎全国来到北京的公安部门的同志们，欢迎你们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所在地——北京。你们来北京，有的是来告状的，有的是来请示问题的，我们热烈欢迎你们。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全面展开，学校、机关、农村、工厂，进入一个新的伟大的阶段。正在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地、富、反、坏、右分子，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展开全面反击。我们要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彻底打倒，只有把他们打倒，才能彻底树立毛泽东思想。全面反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猛烈地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我们政法战线必须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只有向他们开火，才能树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我们今天这个接见，就是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誓师大会。我们还要向与这些人有关系的彭、罗、陆、杨这些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坚决斗争，一定要把他们打垮，斗倒、斗臭。政法战线上的彭真、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罗瑞卿搞了十几年，要彻底打倒他们，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要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神秘主义的东西打倒，这样才能使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在政法战线上占统治地位，把政法机关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希望政法战线上的革命同志们起来，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罗瑞卿、徐子荣的命，要把他们打倒，彻底肃清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影响。

在政法战线上还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要把他们打倒、肃清。就我个人来讲，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很多方面受了他们的影响，我要彻底检讨，彻底批判，承认错误，自我批评，接受同志们批评。

在这场斗争中，公、检、法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富、反、坏、右，他们死心塌地地破坏革命，甚至杀人、放火、造谣污蔑、写反动标语、写匿名信、喊反动口号，他们污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污蔑、攻击以陈伯达、江青同志为首的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污蔑、攻击我们革命左派。我们要和这些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作坚决斗争。这条战线上的斗争非常尖锐，我们政法界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支持左派组织，同那些右派、反革命分子作坚决斗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大民主，没有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会巩固的。你们在北京看到了那些反动势力天天在进攻，他们没有什么力量。什么“联合行动委员会”，天天到公安部捣乱，大闹公安部。听说今天晚上还有大的行动，他们当中有一小撮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还有什么捍卫团，工人支队。哪里捣乱，

有右派进攻，我们一定要斗争，一定要把他们粉碎。当然，对于左派我们热烈欢迎，坚决支持。

我们一方面自己要闹革命，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命；要革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命；要革包括我们在内的自觉不自觉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命；要革当官作老爷的命。另一方面，我们要保卫左派，支持左派，保卫无产阶级大民主。首先要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保卫所有的革命群众、革命组织。我们还要维护社会治安，消防警、交通警、铁路警察等，任务非常繁重。还有检察院、法院，也要支持、保卫革命群众，同那些反革命作坚决斗争。我们政法机关一方面要抓本机关内部的革命，另一方面又要坚守岗位，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今天《人民日报》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我们也要抓革命，促工作。今天接见同志们，大家提出了很多困难，很多问题，除留下少数人个别交谈，解决问题，其余的人都要回去，没有来的今后不要再来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要依靠群众在斗争中解决问题，有些问题在北京也是解决不了的，今天《人民日报》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值得学习的。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开始是利用抓生产为名，压制革命。革命群众起来了，他们又反过来以抓革命为名，停止生产，我们不能上他们的当。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提出伟大号召。

我们正在酝酿关于加强保卫文化大革命的六条。经过与三司、一司、二司的造反派，还有中学的首都兵团、政法公社等革命左派组织的商量。今天向大家谈一谈，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不作为正式文件，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后，以中央文件为准。请严佑民同志谈一谈。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周总理要来接见大家。周总理很忙，昨天工作到今天上午十一点，才睡觉，现在还没有来，先给大家读六条。(从略)

谢副总理继续讲话：

今天会有四千多人。这六条还是草稿，可以留下少数人研究，什么时候通过，由中央决定。总理还没来，我再说一下。

同志们，你们来北京带来了许多问题，大会后，可以留下少数代表。现在北京已经有五、六十万人，招待所容纳不下，由于我们工作做的不好，有的饭也吃不上。最近中央准备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加强接待工作，一方面减少来北京的人。人少好办，人多不好解决，我相信大家会理解这件事的。

有同志递条子，原不打算答复了，现在等周总理，我再谈谈。

1. 全国来的同志，不管是来革命串连的，还是请示问题的，还是告状的，都是合法的，我们表示欢迎。

2. 过去有些规定如果不恰当，可以提。公安系统为了搞好社会治安，人民警察要进行正面教育。我们要一方面进行革命，一方面要保卫革命。这样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生产。关于各机关、公安系统大串连，现在中央没有规定，都想来，我们商量一下。我们支持革命，我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

3. 公安系统按“十六条”办事完全是对的，但是否都要大串连，我们还不能决定，中央还没有指示。在一个城市的公安系统进行串连是可以的，但全国都离开工作岗位是值得研究的。据说有一个检察院向回发了一个电报，要没有来北京的人都统统到北京来。有一个法院通知本机关，只留下两个人看门，其余的人都来。我们是不是商量商量，研究研究。我是坚决支持革命的，但是否大家都来，还可讨论。

4. 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假左派，真右派”的，不管哪个地区，哪个单位，不管干部还是警察，只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的，都要一律平反，都要按中央规定，把材料一律烧了，统统向他们赔礼道歉，进行检讨，进行批评。

5. 是否要搞联络总站，可以研究。大专院校建立了各种组织，还没有统一起来，企图很快统一是比较困难的。

林彪同志指示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精神都要很好地掌握。

周恩来：

同志们，你们好！我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现在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同志们，你们革命的精神、干劲和闯劲都很好，你们到北京来，陈述意见，你们这种革命热情，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刚才，谢富治副总理讲的很清楚，如没有革命的闯劲、干劲，就不可能有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面。这场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你们响应号召，跟在红卫兵小将后面来北京串连，我们应当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来自全国检察、公安、法院。你们代表公、检、法同志们的呼声，和一部分群众的呼声，应当把书面意见交到政法部门。你们来北京就看得很清楚，政法口就这么几个人，不可能都来，听取意见，谢富治同志管一个口，也不可能都直接听取意见，我也不可能在全国各个口都来听取意见，分批的接见。工作也不能不做。你们必须懂得，革命青少年是放假闹革命，我们抓革命又要抓工作，抓好革命，搞好工作，这和他们是有区别的。革命是主导，工作在政治统帅下进行的，不能放弃工作。今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十一个革命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绝大多数同志都看见这个宣言了吧！昨晚也向全国广播了。如果说六月一日，第一次广播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那么我们昨天又第二次广播了上海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仅在学校闹革命，现在已从学校走向工厂、企业、事业单位，科学研究部门，从城市到农村，是全面发展趋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面进攻，也就是说，向资产阶级全面进攻。这是一个进入新阶段的特点。面对将要掀起比去年更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我们的任务更加重了，去年的经验要加以总结，今年要有准备、有组织地进行。我们政法部门要担负这方面的工作。上海工人都懂得，这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在运动初期是用生产压革命，最近又放弃生产，自由地跑到外地。这是不健康的，这是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当然，我们机关同志也会说，正常业务不能进行，才到北京串连的。请你们很好读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我提议，政法部门今晚要印几十万份带回去，分发到全国各地。这个宣言书，是很清楚的响应了林彪同志的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号召。这个宣言书体现了上海工人是先进的，北京造反派就没有搞出这个宣言书。上海党的领导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部分工人被蒙蔽，组织工人赤卫队，在群众中造成对立，打群架，抢车，停车，码头停止起卸，这样使生产无法进行。这不能笼统地怪工人赤卫队，要怪上海市党、政领导犯了错误。“十六条”规定，要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左派，教育保守派，上海市党的领导对这一方针抵触，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月中央会议后，没有转变这种局势，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们要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进行全面进攻。政法部门决定采取措施，谢富治同志讲的公安部门的六条，还要经主席批准，相信中央会很快通过，发下去。你们要掌握这个武器，迎接和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新高潮。这个文件下达以后，等于你们来串连，已经达到了你们的目的，实现了你们的愿望。你们有这个武器，就应当高高兴兴地回到你们的岗位上去，你们闹革命要到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你们负有光荣的任务，实现专政的职责。你们公安部门，包括检察、法院的任务是：一方面对搞破坏的敌人，按六条中规定的，对他们实行专政，逮捕法办，严重的要镇压。不能因为在广大人民中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连，就放松了对敌人的专政；另一方面要保证劳动人民，首先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真正实现大民主的权力，保障正常秩序，叫他们闹革命，这是两方面的任务。这六条是保卫实现这两方面任务的，是神圣光荣的，是非常紧迫、重要的。你们要赶紧回去，要赶紧回到自己光荣的岗位上去。我相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在上海，在全国各地将起更大的作用。某一个地区革

命秩序受到干扰，会很快改过来的，因为有革命的造反派，一定会出现新高潮，你们保障这个号召，得到顺利进行。

科学性，你们要请教毛主席著作，请教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文件，请教广大群众。你们回去要接触城乡广大群众，接受教育，你们公安、政治工作会搞得更好。

组织纪律性，公安政法部门，既同于解放军，又不完全同于解放军。要靠解放军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又要保卫政权。公安政法部门对广大人民实行保护，对地、富、反、坏、右等犯法的人实行专政。从专政说，是同于解放军。另一方面，还要保卫人民大众的正常生活，保卫无产阶级大民主。带有广泛性的群众工作，公安、政法部门已开始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醒你们，不能受公安政法部门以外革命组织的领导。串连是允许的，应在指定的地方，不要妨碍专政工作，不要妨碍保卫人民的工作，要把光荣的任务放在首位。这个组织要有独立性，彼此上下关系，不要忙于成立全国系统的革命组织。因为，现在北京还在试点，群众和领导相结合，你们回去要向政法部门，向领导同志说清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浪高一浪，你们在高潮中要掌握形势，做好工作。

要有组织纪律性。政法部门是做专政工作，是同于解放军的，要学习解放军。今天把林彪同志指示讲一下。大家还要学习两个十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公安六条，最基本的是“十六”条。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六二年的十中全会文件，六三年的第一个十条，六五年的“二十三”条。要很好结合起来研究。因为这些材料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敌人虽是少数，但他们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在各方面进行反扑，我们就要对他们进行全面进攻，你们公安部门任务最大，回去要向领导、向同志们说清楚，才能实现这六条。我相信你们回去会比以前工作做得更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93. 江青、陈伯达在工矿企业座谈会上谈大夺权问题(摘要) (1967年1月9日凌晨)

江青：

现在同志们要夺权，在我们刚进城时叫做军事接管，也就是夺权。现在是革命工人大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力归革命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

陈伯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反对彭、陆、罗、杨的斗争开始的，这是一个夺权的斗争。半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群众的夺权斗争做了个思想准备。

在这个运动中，重新跳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大头目——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中跳出来的。它说明什么呢？说明无产阶级要夺资产阶级的权，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权。毛主席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

所以说，这个斗争不会是平坦的，会有很多曲折的。现在有些单位无产阶级夺了权，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反过来反夺权，要较量许多回合，要一个一个堡垒地夺，要有精神上的准备，不可能一下子就夺完了，也不可能使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就甘心他们的死亡。

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治的地方就要把权夺过来。凡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

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垄断的，都要把权夺过来。主要是政权，还有财权，生产权等。

要记住，这是无产阶级的夺权，是解放后夺权的继续。有毛主席的领导，有群众的这么多经验，我们的夺权斗争是一定能夺得很好的，这是当前世界上的一件大事，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

394. 王力对新华社革命群众的讲话 (1967年1月9日)

同志们：

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敬！

今天的报纸同志们都看了吧？(群众答：看了)今天的报纸第一版上转载了《文汇报》发表的上海十一个革命群众团体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事情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这是毛主席亲自决策的。(群众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这是继聂元梓等七同志在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后，毛主席亲自决定要广播的重要文件。它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到达了新的阶段，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上海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上海发生的事情，它标志着我们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出现这样的形势：就是革命群众的力量发展了，壮大了。革命群众在上海市从过去处于少数受打击、受围攻的地位，到了他们要掌握上海的革命的命运，掌握上海的工业城市的生产的命运，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了！(热烈鼓掌)

跟随着上海革命群众力量的发展，上海出现了那样一个崭新的、革命的《文汇报》同《解放日报》。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我们作了很高的评价，看作是一个大革命，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热烈鼓掌)看作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产物。

造反派起来了，革命的造反派自己掌握报纸，同革命的群众团体联合起来，使得这样一个报纸，成了推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领导，推翻了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自己掌握报纸，自己把报纸变成为一个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的报纸，变成了一个革命的报纸。这是我们的方向。对于这样一件事情，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它必然对整个华东，对整个中国，对各省、市，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起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担负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担负起一个革命报纸的责任，担负起上海这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城市的生产任务。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把国家的命运，生产的命运，把工业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的一件事情，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在这样一个时候，决定广播这样一个事件，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目前形势好得很。北京形势，特别是在最近一个时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揪出了陶铸。(打倒陶铸！打倒熊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揭露了他继续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路线，揭开这样一个盖子，这个变化突出表现在中央直属机关同宣传文教系统各个单位，把陶铸这个盖子一揭，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起来了，过去是一块大石头压着。

毛主席指示我们：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仅仅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机关干部起来积极投入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成的，有好多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依靠机关干部来揭露。同志们，《人民日报》、《红旗》的元旦社论就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指示，提出了机关文化革命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经过了革命群众对陶铸问题的揭露，好多以前死气沉沉的中央机关现在变了，盖子揭开了，斗争展开了。(热烈鼓掌)

什么陶铸、熊复呀，什么大大小小的人物呀，那些继续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人物呀，同志们揭露了。陶铸在刘、邓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就是忠实执行刘、邓路线的，他的屁股就是坐在那一边的。在几个重大问题上：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在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问题上，在所谓恢复党团组织问题上，他就是执行了刘、邓路线。刘、邓路线被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一边站了，陶铸还继续执行刘、邓路线，千方百计地阻止对刘、邓路线的批判，继续压制革命。特别是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起来了，他就更沉不住气了，千方百计地压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刚刚起来的时候，这种形势本来是好得很嘛，但是他怕得不得了，硬要把它压下去。凡是他领导的单位，凡是他操纵的单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得到贯彻，就得继续执行他的那一套。那一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红旗》杂志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变成了一个全国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运动时，陶铸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连这个词儿他都反对。(打倒刘、邓！打倒刘、邓追随者陶铸！)他在你们新华社搞的什么东西？什么照片，把邓小平的脑袋搬到陈毅同志的身上。(笑)光就这一条，什么货色呢？在机关彻底批判陶铸这一套，对于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我们看，许多机关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形势，我们觉得，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而且，根据毛主席决定广播的这个《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这样一个榜样，经过这样批判，经过辩论，经过斗争，经过一个发展，我们这些机关一定能够掌握在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手里边。(鼓掌)那些坏家伙，请他们滚下台！(鼓掌)

当然我们要区别对待，但是我们要相信自己，相信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自己一定能够掌握我们自己的命运，一定能够把所有的事情办好，办得比他们好。(热烈鼓掌，口号：打倒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陶铸！)

395. 王力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 革命造反团同志的讲话 (1967年1月9日)

中南海小礼堂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下午七时

我们到这里来向同志们学习，听取了很多意见，得到了很多益处。这个问题(指接待员提出的问题)很复杂，不能一下子作出判断，只能把同志们提出来的情况、问题、意见、要求，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文革小组对同志们关心帮助不够，今天不能讲得很多问题，恐怕要说一些空话。

我提议同志们很好研究一下今天的报纸，第一版发表了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这是一个重大事件。请同志们高度重视这个事情，这是最新的最高指示，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最英明的指示。请同志们很好地研究一下《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语，它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战斗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好形势。上海是一个代表，表明革命左派力量强大起来。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中，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有了新的壮大和发展，反动路线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攻破。在北京也是这种情况。同志们不要关起门来，我们的斗争是一个整体，要看到全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形势。在北京，特别是揭露陶铸继续执行的刘、邓路线问题，这盖子一揭，起了很大影响，这是革命群众首先揭出来的。这样揭，同志们是否注意到出现了什么新的形势？特别在机关，因为陶

铸是管机关的，机关被一块大石头压着，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个障碍。这样一番揭露，中央机关出现了大好形势。对这样一个大好形势可能有两种看法：保守派说糟糕了，而革命造反派认为好得很。机关的革命一定要起来，光有学生、工人、农民还不够，机关干部一定要起来，一定要造反，一定要发生两派争论。这是必然的。经过争论，吵架，革命造反力量占了优势。上海市是革命造反派掌握报纸，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新生事物，这是我们的方向。这不但对上海市，而且对华东、对全国起巨大的作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是昨天晚上毛主席决定的)，今天就广播了，这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起深远的影响。

接待室的同志们起来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露后来这一段陶铸继续执行刘、邓的反动路线。揭露要以两条路线为纲。你们工作涉及到中央另外一个司令部的一些东西。

我们支持你们总结工作，要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财富，是今后工作的宝贵的财产。你们总结工作，对今后工作很有好处，主要是为了改进中央这次很重要的工作。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充分考虑，一切合理要求都应当接受。同志们对过去负责接待室工作的领导的批评，揭露问题，我们支持你们批评。我们文革小组有这么两个意见，要分别对待同志的口号么，也有分别啦，对汪东兴，同志们都认为有什么缺点错误，我们决不包庇，但不同性质要区别，这是我们文革小组的提议。我们考虑到中南海和毛主席那里工作的需要，请同志们照顾这样一个情况(不清)，我们文革小组相信汪东兴同志会改正的，汪东兴要站到革命群众这一边来，对接待室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锋芒应对准周荣鑫，童小鹏比汪东兴同志负的责任大，应该检讨。对于童小鹏同志，文革小组有一个意见，他应好好工作，大家要他什么时候检讨，他就什么时候检讨。对于周荣鑫，我们有一条建议，他不工作挺舒服的，是否让他将功赎罪？不能叫他舒舒服服的，群众要斗争他，叫他随叫随到。汪东兴的性质与周荣鑫不同，我们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我们从这个斗争中看，汪东兴同志不应说是那边的分子，这一点我们文革小组向同志们讲，但对他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就是要照顾他中南海工作的需要，有很重要的工作要他做。希望同志们照顾这一点。

今天讲这一点，今后想和你们几个代表座谈一下，派五、六个代表或七、八个代表同志。

群众：我们有十八个战斗队。

王力：你们几派？

群众：我们就一派，因为刚成立起来，刚开始造反。

王力：你们一派，说明还不行。你们一个战斗队派一个人，二十个人我们谈一谈。

王力：今天报纸上发表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几个革命群众组织，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与报纸上发表的聂元梓等七同志大字报是一样的性质。

396. 戚本禹在接见北农大师生时的讲话 (1967年1月9日 政协礼堂)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非常好。从去年以来的斗争现在是达到高潮了。毛主席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海瑞罢官》开始。有《海瑞罢官》，有“三家村”。这个仗，一仗一仗打，打到现在提出刘、邓的反动路线问题，有很大的胜利。刘、邓的反动路线，这是党内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党内最大的问题，是十七年来党内最大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还在发展，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现在我也是很清楚。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场斗争是他们挑起的。十七年来他们全面地，从国际到国内向毛主席的路线展开进攻，所以这次斗争是全面的斗争。从意识形态开始，一直到现在，各个战线都开展了全面的阶级斗争。各个地方，各个机关，两派力量两种势力不断进行斗争，特别是上海、北京、天津、东北、西南、西北、中南全面地展开阶级斗争。为什么现在发生全国的全面的斗争？因为他们十几

年来向我们进行斗争是全面的。现在斗争最激烈也是最有希望的地方，有上海、天津、北京、西南，现在……转来……上海最近出了大事情，就是《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了！出了新的报纸了！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全国昨天晚上广播了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个很好的文件，意义和聂元梓的大字报相同。我们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都很重视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群众写的，这是革命造反派写的。你们看语言都是造反派的语言，提的口号很好。它是抓革命、促生产，打退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表现了上海工人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做国家主人的高度责任感，对国家大事极度地关心，英雄的气概，无产阶级气概。全国报纸都登了，昨天连夜广播，这表现斗争转入一个新阶段。

他们的新的反扑被打垮了，当然还会有反扑。这个高潮被打下去了，而且他们挑起这个高潮的结果把刘、邓挑出来了，他自己把问题挑出来了，把刘、邓路线新的执行者就是陶铸暴露出来了！当然，后面还会有新的斗争，究竟有什么斗争，问我也不很清楚，但是可以按主席思想分析，还会有新的斗争，还会有新的反复。但规律是他们不断失败，反动路线不断失败，我们不断胜利。陶铸被揭露了，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出现，阶级斗争总是这样的规律。一批力量打下去了，新的力量出来，新出来力量又打下去，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出来。因为他有一种社会力量，有社会力量就会有一种代表人物出来。所以不断地捣乱，捣乱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在不断的捣乱、失败里面，它的社会力量不断削弱，革命力量在斗争中逐渐增大。对斗争的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准备不断进行斗争。这是场大战役，毛主席英明的指挥，把十七年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提出来，而且正在解决当中。

十七年以来，不仅十七年以来，从“七大”以后，就是党内两条路线在进行斗争。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对毛主席的路线一直是在进行斗争，这是二十二年的问题，不是十七年的问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搞资产阶级革命。他的革命目的就是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他口号上喊共产主义社会，他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的目的是用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中国，改造党。日本投降以后，他们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就是要把武装交出去，参加国民党的“‘刮’民大会”，共产党参加他们的政府，变成一个跑龙套的角色，跟着蒋介石跑龙套。刘少奇在国民党政府当个官，国民党给你当个官，会给你当个大官，把军队交给人家。“和平、民主新阶段”就是搞资本主义，向资产阶级、向国民党投降。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他们得到机会大肆活动。毛主席在跟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就在延安搞“和平、民主新阶段”，要把军队交出去，交给国民党。那时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内广大同志把这路线抵制打垮，中国历史要走曲折的道路，到现在中国也解放不了，他们就要胜利。但他们不能胜利，因为有毛主席领导，他们就不能胜利。但是如果毛主席路线胜利，如果他们万一得胜，那么你们在座很多同志，如女同志无非是丫头、女工、童工；男同志还是受剥削，有的可能活不到现在，中国历史要走很大的曲折道路。你们看法国、意大利就是这样。当时是一种思潮逆流，不仅中国有，法国有列士。本来共产党力量很大，农村都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有武装。德国一投降，他们就把武装交出去，参加戴高乐的政府，而且当了议员，当了官，好几个部的部长，他们很得劲，过后几天，就当不下去了。你没有军队，资产阶级还会饶你？资产阶级也不是吃干饭的。你没有军队他就压你，压几天就完了。现在法国就不行了。当然法国最后会解放，但走了弯路，如果当时法国有毛主席这样一个无产阶级领袖，局面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为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感到幸福。

不仅十七年来，而且二十二年来就进行了斗争，后来全国解放，毛主席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什么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想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将革命进行到底，对国民党妥协。解放了这么多的地方了，可以以长江为界了，差不多了。毛主席的思想就不一样，就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毛主席解放南京后，打出第一个电报就是《七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个电报一打去，前线军事将领一看就明白了毛主席的思想，大军就劈里啪啦地南下，毛主席以他天才的诗篇指挥全国的战争。革命胜

利后，毛主席指出，要预防“糖衣炮弹”。刘少奇就很欣赏“糖衣炮弹”，你们都知道这个“糖衣炮弹”是谁？（众答：王光美！）打你“糖衣炮弹”，自己就不怎么样。臭鸡蛋，内部就完了，细菌才会进去。他本身就搞资本主义，搞资产阶级路线，所以他们臭味相投，结合在一起。有个人很臭，满身生疮谁都不爱理他，可是有一个人就非常欢喜闻这个臭味，追着他跑到北海去。王光美和刘少奇就是这个关系。解放后，两个一结合，“糖衣炮弹”一结合，就大规模篡党、篡政，用他们资产阶级路线改造党、改造中国。在农村，在工厂，在城市，全面推行他的路线。他主张在农村发展富农，他们的理论是说中国的劳动人民不是被剥削多了，而是少了，中国劳动人民都是喜欢人家剥削的。我说的都是公开的东西，大字报上很多，不是秘密，也许你们忙于谭震林没看这东西。统战部知道这件事。土改后，农村里有些党员干部变成了新富农，这些党员怎么办？他说新富农有什么关系，农村富农也可以当党员，他是保护富农的。城市资本家也可以当党员，他的王光美的哥哥是大资本家，大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有一年过年，刘少奇去他家拜年，他口口声声大哥大嫂，那都是资本家。刘说：“大哥大嫂可以入党啊！”他们问：“怎么可以入党？”刘说：“可以入党啊！”“当秘密党员嘛！”资本家可以入党，富农可以入党，我们的党就变成什么样的党了？资本主义的党，那不就变成资本主义的党了。他们就是用资本主义面貌来改造党，在中国全面推行他的资产阶级路线，一九六二年达到高潮，在国内提出“三自一包”，国际上“三和一少”就是他们全面的纲领。他们感觉时机成熟了，提出全面的纲领，他们就是对自留地、自由市场、包产到户非常感兴趣。我不是很高明的，在六二年我说过，他们说我是大毒草。我说过这个话：六二年如果不是毛主席领导广大人民、领导全党，击溃了他们的反动路线，如果他们的反动路线得到了胜利，那么我们中国很快就改变颜色。“三自一包”一搞，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厂、国营企业不就要垮了吗？他们说我是大毒草，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这怎么是大毒草？

在意识形态上也是这样，毛主席一开始就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他们就是不批判，到《武训传》、《海瑞罢官》、《红楼梦》，他们都是要保护的，对这些牛鬼蛇神都是要保护。多方面的，军事军队里面多方面和我们展开全面斗争，所以发展到现在全面内战，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我们整个斗争形势。现在我们在打什么仗？就是打这个仗。对这个形势，我们每个战士都要能注意地分析，注意研究。从你们的发言，我有这一点感觉，因为你们这一段揪谭震林，对整个形势分析还不够。如果我批评错了，算是提醒，你们就不要听，如果还有点儿道理的话，你们回去后各个战斗组织，对最近形势分析一下。我们不知道你们“八·一八”战斗队写了多少系统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同学们笑），所以我的感觉还有点儿道理，这一点应该向清华大学、北航红旗学习。比较起来，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有那么点差距，应该赶上去。清华大学写了一些很高质量的批判刘、邓路线的系统的文章，写得很好。这些文章，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每天都看，很有水平，他们这个孙猴子很有办法，不知怎么弄来弄去，弄出这么多材料。他们派了很多调查组，王光美不是吹嘘“桃园”大队的经验吗？那个桃园……搞得乌七八糟，她发展的贫协主席是个反党分子，最近被逮捕了。因为他写了个反动标语“蒋委员长万岁”，这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万岁，他叫他委员长，那是他们的人，被群众查出，他也承认了。你看王光美不是要扎根子吗？她扎的就是这样的根子，扎的国民党的根子，蒋介石的根子。老百姓说王光美下去和皇帝娘娘差不多，那种作风恶劣程度，你们可以找大字报看看。文化部一位女同志陈明凡给我写了一封信，后来用大字报贴出去了。王光美把我们的农村用资产阶级面貌改造了，“桃园大队”都是王光美的照片，没有毛主席的照片。王光美原来住的地方叫做“光美故居”。你们看竟有这样的事情，学生派人去调查，调查出很多事情。现在又找出王光美过去是北京的交际花，跟美国人、什么反动人物都有关系，黄色杂志封面上登她的大照片叫做王光美小姐，大照片登在反动黄色画报上，这些都是红卫兵搞出来的，我都不知道。从这一点来说你们“八·一八”要向他们学习。他们关心最大的国家大事，他们还弄出了安子文的叛党声明，安子文那一帮子，而且叛党是刘少奇指挥的，所以红卫兵好得很，这个群众运动好得很，把这一批人老底都揭了。他们不揭

我们还不明白，老底一揭，我们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是觉悟比较慢，我是六二年才开始看出一些问题，我觉悟很低，认识很慢，没有红卫兵高明，我们的确要向小将们很好地学习。红卫兵要互相学习。我相信还有很多问题会揭发出来，这是最大的国家大事，关系我国和世界的大事，是天大的事情。天下第一大事是什么？就是反对刘、邓路线，因此我们就要善于在我们的斗争中，和这个斗争全面联系起来，分析问题，判断问题，来确定斗争的目标。

农林口的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是我国解放十七年来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刘、邓路线在农林口的影响是十分深的，我们要把农林口的斗争和反对刘、邓路线结合起来。从解放以来，富农经济、砍合作社、单干风是一条线下来的，一直在进行斗争。毛主席对农林口的斗争非常关心的，我们看毛主席发表的文章，从农业合作化的文章，直到八届十中全会主席的讲话，到提出四清运动，毛主席对农业战线的阶级斗争抓得很紧的。这个斗争归根结底就是毛主席和刘、邓路线的斗争。砍合作社是谁在砍？当时是邓子恢，不过是幕前，幕后是刘少奇。包产到户是谁在搞？也就是邓子恢，邓不冤枉。你们不是说要斗争邓子恢，你们问他包产到户是谁指示搞的？要斗争这个问题，让他交代，你们就明白了，就能写出很多有水平的大字报来了。

我不知道你们对秦化龙是什么态度？在农林战线上秦化龙是刘、邓司令部的。这个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充分研究过，有充分的材料，他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要听我说的，要自己先研究分析。

你们还提出王震问题（“军垦战士造反团”提出的）。王震是很有名的将军，有战功的，有功绩抹杀，这一点我觉得是不公平的，但是十七年来他在农垦战线上不是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不信你们去农垦部好好调查一下。他是搞包产到户最积极的，这些问题我不是强迫你们接受我的看法，你们自己独立研究，充分调查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同学问：王观澜是哪个司令部的？）你们自己去分析。（又问：谭震林呢？）你别急，听我说。对王震我有点保皇，究竟将来怎么处理再讨论，当然要批判。王震有汗马功劳，过去是拥护毛主席的，在解放战争时期。究竟现在怎么处理，要看他的态度。如果肯于检讨错误，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很好地检查，我们党可以从宽处理。如果他坚持错误，并且挑动群众搞不正当的活动，要严肃处理。如果一个人功劳很大，但最后执迷不悟，走向反动道路，那么对他的功劳是要一笔抹杀的，这是我一贯的意见，要看他的晚节。如果他能回头保持晚节，我们可以几开嘛，你过去不是毛主席路线这一边，你又回来了，我们那可以来个三、七开，四、六开，来个几开。如果执迷不悟，一直要坚持反动路线，那你过去就是有天大的功劳也要一笔抹杀。不仅对王震，对其他人也是这样。

下面讲谭震林，你们最关心的问题了。总理讲了，你们不服气。我明确表示态度，我是同意总理的意见的。根据我现在的看法，我同意总理代表中央表示的意见。当然，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希望你们考虑总理的意见，总理讲这个意见也不是没有研究的，应该承认这个问题他有很大的发言权。我希望大家尊重他的发言权。他们在一起摸了十几年，总理认为谭震林是有错误的，做了错事，说了错话。当然这些事情我负责回去向陈伯达、江青同志充分反映，但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个问题仍然同意总理代表中央表示的意见。我认识谭震林这个人，和谭震林有过几次接触，有个印象也许是成见。但你们的“二十大罪状”还没有打破我的成见，但我并不固执这个意见。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材料，我可以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愿把过去情况提供大家参考。我不强迫你们接受我的意见，但希望你们考虑另一方面的意见。首先在刘、邓反动路线问题上谭震林过去有错误，但是在农业走什么道路问题上谭震林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亲身知道的一件事。在一九六二年，“三自一包”很嚣张，当时杨尚昆他们，那时我在中南海，要我们把包产到户的意见整理上去给中央看，当时我这个人不是很高明的，觉悟不是很高的，但我对这个进行了抵制，我不赞成包产到户。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讲了我的意见，讲了包产到户的几大危害性，只要一松，当时冲力很大，许多地方公社就要垮台，工厂成问题，吃饭也成问题。他们叫我整理材料，我说如果你为整

理材料给中央看动态可以整理，但反面意见也要整理，所以我把两种意见都整理上去了。当时有个奇怪现象，包产到户的意见很多，反面很多，正面意见很少，但我连几封来信也整理上去了。整理上去以后，对这个问题中央两条路线的人，很鲜明。赞成这个路线的人，说这个包产到户好得很，又跟我说为什么把不赞成包产到户的意见搞上去、干什么呢？说这个材料很好，最大缺点是把不赞成的也整上去了，说这是少数人的意见，不是主流，包产到户是主流。这我可以讲，当时农办的一些人，农办的领导人田家英，一个反革命分子，他是很积极的。这个人已经被揪出来了，农办也有些人支持，邓子恢更是支持的(问：王观澜呢？)。王观澜你们可以问他，他不一定看到这个文件，对包产到户可以问他什么态度(众：伪造笔记本，欺骗中央)。你们可以分析，他没有充分根据不了解这个事，反对他的材料也没有看到多少，也认识不到，我个人不保这个人。这时我看到谭震林在这个材料上亲笔写的意见，他逐条驳了这个包产到户的建议，这文件在，还可以查的，所以我有这个成见，在那么困难的时候他出来反对包产到户，所以要我改变这个成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事实。这几年在大跃进期间他讲了一些话，不当，但基本方向站在大跃进方面。他站在公社方面，他主张搞集体经济，这是确实的。因为包产到户提出后，当时我第一个看到反对包产到户的就是他。当时我看到他的字，他的字体我不认识，果然是他的签名，这个无论如何不能说他是刘、邓路线的。因为他反对包产到户，当时在农业路线上的斗争，就是这个斗争。这是一个印象，我讲大事，小事不愿多说了。至于高克明的老婆，这个人我是有意见的，你们反得对，批评得对，这个人应该烧一烧。另外一个印象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你们提的许多问题，如果刘、邓路线……我还要核实一下，如果是这样的问题，那是错误的。但是我要向你们公开讲一件事情，文化大革命，农村究竟开不开口子，这里有不同意见、有争论的。当时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要起草这个文件。我和王力到山东、江苏调查，山东大兴县县委听见我们去了，要把我和王力抓起来，骂了我们一顿。我讲能不能搞试点，他们很恼火。农村是个大海洋，没有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农民支持很难搞彻底。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个缺点，我提出要全面开展，你搞试点允许人家搞嘛，态度不是积极的，他不让人家搞，而用五条压，但又压不住。又用三个连去压，农村红卫兵很厉害，把三个连赶走了，以后他们也不敢去了，但又不让搞，当时应该冲破这个阻力。就是你们反对的谭震林，自己找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要在全国农村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文件还有，当然写的不好，后来主席指示重新写，陈伯达同志主持写的。他(指谭)还主张农村搞红卫兵，说红卫兵好得很，是他写的，你们可以看。阶级斗争就是这么复杂，做了那么多错事，又做了那么多好事，(下面说：阴一套，阳一套)不能那么说，在大的节骨眼里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但没有完全摆脱刘、邓路线的影响，我基本同意周总理的意见，我们要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要看大节，从十几年看哪个占主导地位。因此我个人到现在认为，他基本上还是毛主席司令部这边的人。这个人烧一下是可以，我同意他检查，他应该在群众中检查，但我不主张把他烧焦了。他们华侨很厉害，中侨委提出油炸方方，不仅要烧焦还要油炸！对谭震林烧一下可以，但我不主张油炸，打倒我也不赞成的，你们烧可以，烧一下帮他站起来，为毛主席路线服务。对王震这种人还要看，你们对谭震林的态度应该比对王震好一些，我不强迫你们接受我的意见，大家互相考虑对方的意见，不要急，研究一个阶段，先把刘、邓这个纲抓住，现在因谭震林放松了对刘、邓的斗争。现在这个问题放一放，看一看刘、邓的材料，把农业战线这几年形势分析一下，你们要给谭震林一个考虑问题的时间。你们成立一个勤务组，你们叫勤务员，这个勤务组和我们联系，我们双方看了材料，你们也要研究我刚才的意见，我们两方面协商一下，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矛盾。有矛盾总要解决，看采取什么形式，不解决不行，但不一定很着急，缓冲一下，你们冷静一下，考虑这个意见。我们也冷静，冷静考虑你们的意见。要给我一个时间给江青、伯达、总理汇报汇报你们的意见。你们在这空里就补这一课，补批判刘、邓这课。我希望你们农大的同志能从农业战线这个角度系统地批判刘、邓路线，最好每个人写篇文章，每人都写篇有质量的大字报，等你们大字报出来了，对刘、邓路线批

判形成高潮了，农业的刘、邓路线肃清的差不多了，这时我负责找你们勤务组的，咱们来商谈这个问题，谈谈看，谈不妥再说，把这个问题妥当地解决。也许经过这一段缓冲阶段以后，还有别的新的情况出现，也许你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说他不是刘、邓路线的，基本是毛主席路线的。也许了解了，说他还是刘、邓路线的。历史最厉害，时间越长事情越明白，你们明白，我也明白，事情就更好谈。现在我唯一希望是你们能考虑一下我的意见，考虑总理意见，因为总理这个意见是代表党中央讲的意见，不是他个人随便讲的，国家总理不能随便说，他临时说话照顾不那么周全，因为你们揪了那么多天了，是经过研究的，我希望你们尊重我们国家总理的意见。

你们有你们的长处，总理有总理的长处，应该承认这一点。周总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长期跟着主席的，一直学主席的，很虚心的，是中央很好的总理，我还是拥护他的。认识一个矛盾是很复杂的，事情是很复杂的。要抓住主要矛盾，还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因为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一错当然不好分析了，不象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不那么清楚。要很好分析研究。这些意见除了总理都是我的看法，我只希望同志们用一定的时间考虑我的意见。

我希望你们回到学校里去先把刘、邓路线问题补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是个高潮，你们失去这个战机很可惜，回去参加到这个高潮里去。谭震林的问题先了解、研究一个时间，我看你们把这个刘、邓路线好好批判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批判刘、邓路线胜利，不是把他罢官不罢官的问题。问题不是罢官，毛主席的政策从来不讲罢官，王明这么臭了，毛主席还让我们党内代表选他呢！是要我们每个工人、农民，每个红卫兵战士都认识刘、邓路线的危险性，这才叫把他们批判，一定要抓住战机，解决战斗任务。这是个大碉堡，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以百倍的战斗姿态、百倍的勇气攻克这个堡垒。

397.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人大会堂讲话纪要 (1967年1月10日)

参加单位：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矿院“东方红”、“政法公社”、第二军医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都兵团”等单位。

陈伯达：

现在的情况，阶级斗争形势很清楚，在上海，在北京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阴谋，他们的手法很不高明。铁路运输上就这样，铁路职工是受蒙蔽的，主要是铁道部的负责人。他们印发传单鼓励列车员等的罢工，这是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要坚决打退他，消灭他，敌人不向无产阶级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要以为没有戏了，还有一小撮搞阴谋的人，想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翻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有的人已被揭露了，马路上出现了很多“打倒陶铸！”的标语，我同武汉来的专揪王任重的造反队谈过话，陶铸同志在刘、邓路线推行时，他是坚决执行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特别在十一中全会，有的同志揭穿了这个问题，有人揭发了他，中央、毛主席知道他执行刘、邓路线，想挽救他，想让他过来，但十一中全会后，他没有过来，还是继续执行刘、邓路线，而且跟王任重两个人所领导的中南地区出现了许多事件，很典型的反动事件是镇压群众的事件，他推广了刘、邓路线，在武汉相当大规模地逮捕革命群众，以前在其他地区也发生过，想帮助他，但帮不过来，他的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不可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文革小组批评过他，中央常委也批评过他，但他的灵魂没有被触动。是不是帮助得不够呢？在他看来可能是这样，但我们确实是很认真的了，在十一中全会就帮助过他，

他那时执行刘、邓路线，就劝阻他能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但那时的劝阻还是比较婉转的。但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继续这样搞，我们就摊牌了。陶铸说：“摊牌就好了……(不清)”，但他说是那么说，做还是按他的轨道执行。路上这么多大标语“打倒陶铸”，这是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过错，或我陈伯达的过错？后来陶铸给主席写了封信，说“咎由自取”，给主席写这样的信是不适宜的。但他也真是“咎由自取”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上，帮忙帮不上。是不是除了陶铸就没旁的了呢？至少还有个别一、两个吧。我们按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病不能治，我们是必求医生，能治的尽量治。路上这么多打倒，当然还要看，这几个月来，表现得够瞧的了，在群众的压力下，是否可能好一点，看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能过关，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有许多人就过不了关。《人民日报》曾发过社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经过许多阶段，推翻了官僚机构，没收了官僚资本，推翻了资本主义企业，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他能同意，三反、五反，有的马马虎虎地过了关；三大改造，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反右，马马虎虎过了关，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没有反到他，他没有沾边，马马虎虎过关了，社会主义革命，主席告诉我们，是长期的，几十年、几百年，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因为不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的，事实上资产阶级因素在我们国家还是存在的，这思想就更不用说了。封建阶级有了几千年，他的思想影响是很深远的，不能低估，所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时，社会主义大关，很多人就通不过，相当多，当然这相当多还是一小撮。他的影响要逐步缩小是没有问题的，必须提高警惕，因为文化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革命，每个人都要在大革命中考验，过得了过不了这关，还是要继续考验。

所以我们是在斗争中前进着。现在，一片光明，一片大好形势，如果我们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修正主义有时有些看不出来，他是隐藏着的，可以麻痹人的。这回上海还有，其他地方和黑龙江等地方，他们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看情况对他们不妙，就要钱给钱，出去串连去，北上告状去，如铁道部伪装同情职工，使铁路交通中断，这是过去没想到的，使我们恍然大悟，这上海的事情，给我们上了一课。

再补充几句，虽然这样，你们不要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察一个人就抓，这对你们也不会得到锻炼，比如在我们中央中长期考验的几个同志，你们把矛头对准他们，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谢富治，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是支持谢富治同志的，他抓得对，他不抓就失掉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了，还有其他同志，功过要加以比较，不要随便抓。(伯达问中央文革和总理还有谁时，又补充了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余秋里等同志)这些都是好同志，长期考验过的，我们对他们都是有好感的，同志们对他们有好感的，他们做了很多事，不搞阴谋，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是有的，但和大是大非要分开。

江青：

今天这个会有各方面的同志，也有自己写信来说犯了错误不知怎么办的。这个问题好办，只要承认错误，认清方向，我相信大家都会欢迎你们归队的，你们说对不对？(众答：对！)今天在座工人同志比较少，最近接见工人同志也少，提不出名字，在座的多数是同学。

今天我们想把我们所想的告诉你们，就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我们要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邓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斗争的锋芒应集中，而不是到处这儿攻一下，那儿攻一下，这样会打乱我们的阵营。在当前有两个大前提值得我们警惕：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经济主义来转移斗争的目标，这个问题普遍存在，只是希望革命同学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瓦解我们的队伍，防止收买我们一些不明真相的人，造成对国家、人民的很大损失。吕正操是自己跳出来的，他本来就是“桃园三结义”之一，在彭真问题上他不闭门思过，承认过错，又自己跳出来，蒙蔽革命职工罢工，不能正常运送，他采取的手段，经济也有，政治上也有，如说“我支持你

们，你们受了委屈”，等等。可能有个别人受了委屈，他不是说服解释，而去挑动，使很多主要的交通枢纽不能通车，使国计民生都要受到困难，用这来抗拒毛主席的领导，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在北京也相当普遍存在，在数字上没上海厉害，上海已付出一千多万元，在四、五月以前我们就采取紧急措施冻结了资金(除了必要用的以外)，不然我们很多工厂都要破产，这一点希望我们全体同志都要提高警惕，要艰苦朴素闹革命。(北航和地质都受到了批评)当然，有的需要，要一点也可以，但不要要那么多，我希望你们把这些东西(车子)退回去。宣传车这种方法只能在一定的人群聚集的地方。很多地方都要睡觉，要休息，到处要车子这是八八团发明的，这弄得满街都是，听半句话车子就过去了，这对交通是有妨碍的。工厂区也不行，工人八小时劳动，强度很大。希望同志们要注意，主要要击毁经济主义破坏我们国家经济生活，破坏文化大革命，抗拒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就讲这一点，供参考。

另一个问题也想提醒同志们，目前有一种风气，想使斗争的锋芒极力对准我们军队的一些好同志，中央、国务院的一些好同志，这些同志不是没有缺点，而是有缺点，有的是严重的，有的话可检讨，可以批评，但是，应是同志式的。你们不要上这个当，有的人想把水搅混，使你们看到一个上面，不能看到整体。我完全相信同志们是好意，比如陈毅同志，说错话，写过一些诗，说过话不正确也有，我甚至可以同他当面争执，但他不是两面派，他都说，这是好的。从整个历史上看，他也是有错误的，他和我两人当面争得脸红脖子粗，后来他说：“鬼戏，鬼戏，丑恶。”陶铸还镇压我，镇压我们小组。这就不一样，我们要同志式的。我们要做很多工作。外交部你们不能去。他们要做很多工作，我对他不太熟。最近几年看他很坦率的，广州会议他说得不好，说过头了。一九六二年做了检查，现在也是。他历史上有很大的功勋，项英坚决执行王明路线，一万多人，装在人家的口袋里，陈毅执行了主席路线，重新发展成二、三十万。淮海战役，陈毅、刘伯承是很出名的，战上海打的很漂亮，是谭震林指挥。他尽说错话，但不搞阴谋，错就错了。他好一些，还是王观澜好一些呢？他好。他好一些还是王震好一些？他好。王震不好，王震是党中央委员，托谭震林去保下来的，他应闭门思过，他不，但是王震还在底下搞活动，他还用了一个大地主花花公子(张宗汉)，大搞活动。谭震林很赞美你们革命的红卫兵。李富春同志也是这样的同志，他就是不谨慎，粗，思想方法有缺点，有错误，他随大流，知道错了就跟正确的走。前一段住院，肺炎，小将要去斗他，关锋解了围，这要用同志的态度，叫他们承认错误。一来就揪是错误的，他们天天工作。李先念、谢富治同志都是好同志，谢富治原来是邓小平的部下，他第一出来揭发，但他弱一点，手软一点，叫他抓，他手软了。现在联合行动委员会，一百多人去闹，他们头头要抓起来，他的基本骨干很少，能带动的两、三百人，他们也可以分化瓦解。他们已出来了造反派，对小头目要抓起来，要专政。如果把斗争锋芒转向这些经过长期考验，现在还在工作，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但在关键时刻能站在主席这一边，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对陶铸还采取同志式的。陶铸在一次康生主持的会上，陶铸在会上命令要熊复照邓的照片，当时，陈毅在主席边上，邓小平的照片很小，就把陈毅的头剪下，把邓的头接上，还有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把这照片发到外国去了。这主要是陶铸，熊复他们搞的。还有一个人，你们看到很多了，经过坚决斗争，在十一中全会后还好些。肖望东是坚决执行反动路线的。但陈毅、聂荣臻等人，你们应该采取欢迎他们的态度，陈毅认真地写自己的自我批评，写了七天了，他还不知道自己照片的头给砍掉了，这很令人气愤，这锋芒你们要是被敌人利用了就糟了，如果采取同志式的态度是合理的。现在允许同志们批评。

另一个动向是指向我们军队，他自己躲在后面，到了军队，他说有三分之二时间在中央文革，到了中央文革，他又说在军队忙得很。刘志坚怎么帮也没办法。聂荣臻等他们也做了一些错事，但在大方向上，是跟主席走的，跟林副主席走的。聂也做过检查，他被别人整得很厉害的。“桃园三结义”也整他。彭真、林枫、吕正操在东北搞林彪，这实际上是反革命集团，开始想保他(吕正操)，但不成，他的反革命立场决定了他，他拿出了杀手锏，使火车

停车。要叫广大铁路职工同志们明白，同学要做宣传，(刚才有一个军事院校同学递了个条子)你们不揪刘志坚，当然，现在揪了象刘志坚这样的人，我们帮助你们揭了，刘志坚是军队文化顾问，但他根本不向我们汇报，直到去年召开军队文化工作会议的时候。这个会议是我请示了林彪以后召开的。是肖华好呢？还是刘志坚好呢？肖华好。再，重要的阴谋是矛头指向这些好的人，使得军队院校、整个文工团的锋芒向他们来了，刘志坚就躲起来了。甚至在你们面前装装“左”，“我是文革副组长”，所以斗他还是很难斗的。他就这样来回挑动。不久前，叶剑英做了个自我批评，这个自我批评还是不错的。后来他又挑动了一部分人，使我们这几位老帅误会了，以为是我们中央文革搞的。连贯起来看，实际上都是他搞的。肖华生病休息一两年，他(刘志坚)实际上是第一线。去年军委开了座谈会，是我请示林彪同志，让他做军队文化顾问，又捞了一些政治资本，现在是文革副组长，手法很隐蔽。再隐蔽，在我们中央文革小组里边也露出了狐狸尾巴。开始是王任重，后来是刘志坚，现在是陶铸。对说过一些错话，但在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这边的，就要用同志式的态度。要他们检查可以，不能象对刘、邓、陶铸、刘志坚那样，否则我们还剩下几个人工作？我们国家很大，能不能帮助大家在思想上解开一个口？(大家答：“能”。)能，那就好了。

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已把主要的好同志说出来了。李富春同志主要问题是在统战部，但统战部是李富春送了大字报以后，阶级斗争盖子才揭开的。叶剑英同志，在困难时期，地质学院、航空学院处在困难时期，我的处境也很困难，是叶剑英要接见你们要支持革命学生，我在电话上代表你们(即地院“东方红”)感谢他。在领导阶层也是如此，要分清敌我友，要进行深刻的调查研究。现在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队文革小组要改组了。

江青：对保守派

1. 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他们归队。
2. 如他们要挟我们，我们就不理他们，不能妥协，否则他们就会犯更大的错误，不要老冲公安部。

康生：

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谈的两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发表的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文章，这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决定广播的，这对文化大革命是大事，标志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央还要写个祝贺的文章。这两个文件，我们在一两天内要发表的，刚才念的社论，中央决定要给他们点火，点起上海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问题，不仅是工人，而且对全体革命同志都适用的。

同志们！看到了关于军训的文件吧，在那上面有一句话：“要加深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是林总的重要指示。革命性是更好地发扬革命的首创精神。科学性就是要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特别要紧跟毛泽东思想。军训规定的学习文件不够，毛主席说还可以多些，以后还可继续学。我们没有磅礴的革命精神不行，没有科学分析，没有掌握毛主席的调查研究也是不行的。

江青同志刚才讲的，一方面把陶铸的问题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又把好的，但又犯过错误的同志加以分析。这就叫科学性，这是活学活用，在用字上下功夫。

纪律性就是军训要加强纪律，加强革命的纪律。七号晚上冲中南海的西门，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没有纪律性。中南海是毛主席住的地方，这对革命有什么好处呢？这只有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的人才高兴，我们要革命，这一点要很好地掌握，只有这三性密切结合起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毛主席几次帮助过他，但他还是采取两面手法，有时讲话讲得很“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一九四九年以来，党内的斗争，有三次。一次是高岗、饶漱石，一次是彭德怀，一次是彭真、罗瑞卿等。当时陶铸是拥护高岗，在五七

年作了检查，第一次没过关，第二次才勉强地通过。《井冈山报》登了《陶铸论陶铸》，那完全就胡说八道，不要信他那一套，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你们可以看看《羊城晚报》，广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陶铸领导的，《羊城晚报》登了一篇《毛主席回韶山》，这是周扬儿子写的，这是一篇大毒草。后来觉得不好，但又登了一次。今年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登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搞了一个按语，十六日发现，马上通知全国各地不准登，而在四月三十日《羊城晚报》又登出，这是什么事。彭真这样玩滑头，他到底是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呢？这不清楚吗？陶铸自己搞一套，譬如武汉的问题就是如此。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全国报纸都登了，只有一个省例外，这就是湖南省。

中央经过好多工作，结果没有效果，他还是进行两面手法。江青同志在一次会上对陶铸问题的讲话，是经过大家讨论的。

现在有一小撮人搞陈总，进行混水摸鱼，还有人贴周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前，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还不清楚吗？（众：反革命！）怎么办？（众：抓起来！）对！有些人说过错话，作过错事，但在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对刘、邓路线（方面）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他们自己也勇于检讨，问题性质不同。不能只看现象，要用毛主席思想挂帅，要看到问题的实质。经济主义，经济收买，特别要注意。我赞成有些不必要的东西给他们退回去。

现在有些谣言，说主席第二张大字报，主席的三条指示，这三条实际是反对谢富治的，反对中央文件，反对革命路线。这统统是造谣。

上海文汇报代表：

同志们：

我们永远跟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边，和大家一起闹革命，特别是和首都三司、新北大和上海的革命小将、其它革命造反派一起，把《文汇报》及《解放日报》的权夺过来了，倒向造反派，为革命造反派大喊大叫。

周恩来：

这两篇文章，本来我们也要起草一个文件。没有起草好。主席就抓住了关键问题。主席一发现，就决定第二天发表，等于主席第一次批准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相信全国会响应起来的。和在北京的同学谈一谈，同时希望你们去做工作，读了文件，支持他们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他们三位讲话，我完全同意。

非常欢迎他们表示改革的决心和行动（指《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革命造反同志——整理者），要学习他们。我谈两个问题。

一、确实在各级领导中，极少数坚持继续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子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继续顽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破坏。刚才江青、伯达同志指出的危害是他们放出来的。开始是强调生产，破坏革命。现在提出两条路线斗争以来，新的斗争展开，加上十二月份把斗争转向工厂，从城市转向乡村，进行新的反扑。他们假装搞革命，破坏生产，抓革命是假的，破坏生产是真的，搞经济主义，使生产受到很大的影响。以前，群众运动激于一时义愤抢材料、卧轨，经过工作解决了。现在铁道部自己停工，这问题就大了，这想法是错的，尤为严重的是上海一部分运输停顿了，主要铁道，原来保守派也要“造反”停车了。造什么反呀！北京的列车员也如此，本来这问题能解决的，经列车员的工作、帮助总能解决，就是铁道部的一小撮人，表面支持他们，耍了阴谋。（已跟）各车站、机务段等很多代表谈了话，把铁路上的造反派联合起来，保证运输正常运行，但这工作一直搞不好。

首先要响应上海的号召，号召全体铁路工人起来揭穿这个新反扑，号召在京单位到本单位、本厂搞革命，否则对文化大革命也不利的，同时也动员部分代表到铁路战线做工作，现

在考验吕正操，看能否过关，要叫他去抓，要抓好，否则就是破坏革命，不仅是吕正操，还有薄一波、陶鲁笳。工交口到现在只能分两部分，一部分给余秋里，抓计划，在十一月、十二月搞了计划，一部分给谷牧，搞大三线，但也要做检讨，但余秋里的助手林乎加不得力。铁道部只能由李先念、我自己抓一下。为什么发生这事情，另一方面，他们把矛盾上交，他们不在本地解决，到北京来怎能解决？工厂、机关、省市一推都推到北京来，特别是广州、长沙、“湘江风雷”等，他们用了感情，陶铸给长沙打电话，在三千多人到北京来抓人，在火车上打起来，谁使他们如此呢？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在本地、本厂闹革命。大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主席号召的。所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提出了号召，他是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建立的大庆油田，已达到了一千多万吨石油，过去的成绩是伟大的，主要(原因)是：1. 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主席思想指导；2. 全体工人的艰苦奋斗；3. 全国人民的支持；4. 当时的领导是好的，当时挂帅的是余秋里，可是后两年骄傲了，当时余秋里，主席点将把他调到计委搞计委工作。这责任主要在石油部康世恩，他听不进反面意见，石油工业部和大庆油田，后两年铺张，结果抵制这次文化大革命，整个工委都抵制了文化大革命，不让串连，现在七万多职工，又让一万多职工(大部分学徒)出来串连，要钱有钱，要车票有车票，这是经济主义，但还好，王铁人同志站住了脚，他决定回去把这条反动路线改过来，这面红旗一定要举高，张洪池这次栽了跟头。

各部，现在很多司、局长要造反，不干工作，我为什么要提出搞几个战线呢？就是由革命小将去冲，把反动路线冲垮，把资产阶级反扑击退，把官僚主义取消，要抓革命、促生产，财金、外交、石油、铁道几个战线都要组织起来。中央文革是参谋部，军委是总司令部，国务院是执行机构。要呼吁你们好好地同心合作，左派队伍、革命派队伍一定要好好同心合作，这个问题要继续展开，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特别在北京，首脑机关要搞好，铁道学院要到沿线去做解释工作，宣传工作。

二、阶级斗争到关键时刻要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资产阶级要向我们进行全面的反扑，我们要全面进攻，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高潮，从城市到农村，最近造反派的队伍要经过辩论、军训、联合讨论，准备春暖后，向全国推动。象上海左派联合的方式值得学习，工人阶级先进的队伍在上海。

中学生中，“首都兵团”和“联合行动委员会”辩论，刚辩论就造谣，说主席不在北京，其实，主席就坐镇北京，“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就是主席先看到的，主席要为我们最高利益操劳。

什么主义批评了江青同志，什么中央文革小组怎样了，统统是胡说八道。文革小组我们都是支持的吧！刚才念的《紧急通告》，我们完全支持。

现在左派有些分化，我看在大前提下，可以统一起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上统一、团结起来，当然，互相批评还是需要的。

军队里来的工作队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主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要适当地尊重，一般要照顾，但肖望东、张霖之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

(以上均为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江青：

补充两句：今天指责你们多了些，不要灰溜溜的，今天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你们，而是信赖你们，向你们亮底，我们是很信赖你们的。我们小组成员和总理工作都很忙，每天工作到天亮，向你们亮底是请求你们帮助我们做工作，向你们亮底的这些事我们已经判断的差不多了。过去我们每次开会都是赞美你们，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现在我们成了救火队了。第一，我们把底亮给你们；第二，希望你们作工作。有人提出关于三司和北京公社合并的问题，我的意见，重要的是在行动，斗争中、实践中考验，只有战斗的友谊共同发展才能巩固，今天有保守派的同学参加了，有的人有意见，这不怕，经过揭发检讨，欢迎归队。如果坚持自

己的错误就不对了。昨天晚上我本来可以早一点休息，晚上两点听说保守派的同学要把关锋、王力扣下，这不妥当，我打了电话叫回来，他们扣关锋、王力的目的就是想要我们和总理接见他们，我们说这不成，就是不接见，什么时候你们改正了错误我们就接见。我们是把你们当成国家的财产、接班人来看待的，你们跌了跟斗有什么了不起的？第一是欢迎走错路的检查、归队；第二如果要威胁我们，我们不理他们，我们就不妥协，如果和他们的错误妥协，那他们的错误还是要发展的。我们对有些人实行了专政，专政也是要教育人，有些人为此老要冲公安部，这办不到！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作了自我批评，欢迎归队。第二条我看是撒娇，我们不能妥协。

398. 周恩来对铁路系统师生、职工的讲话 (1967年1月10日 中南海)

同志们，乘务员同志们：

我们听到你们沿途受到一些阻碍，甚至受到委屈，我们很关心你们的事情。所以今天接见你们。刚才同你们派出的六名代表(长春、齐齐哈尔、大连、牡丹江、广州、武汉)谈了，另外还跟铁路系统的局、分局、工厂、机务段、北京铁道学院、铁道医学院的同志们交换了一些意见，同部里的一些同志也谈了。你们在这里差不多等了五个钟头，我很不安。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每一个成员从思想上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把旧的，剥削阶级的东西破掉，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是触及人们灵魂的斗争，是更高阶段的斗争。

这次斗争不可能一点损失没有，成绩是伟大的，我们在运动中受点损失，也是运动中的代价，使我们从中吸取教训。你们有的被打、被骂，国家财产受到损失，你们心里很难过，这一切我们是要解决的。这是运动中总要出现的一些波折，出现了一些非解决不可的事情，把它解决了，运动就前进一步。

在过去的四个月中，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你们运输了一千二百多万人次，这是铁路员工，从机务组、司机到乘务组的努力，是沿途铁路职工的努力，是车辆的修理工、制造工的努力。

这次，在冬季红卫兵的免费串连的停止期间，我们要推动工矿企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对此，我们的注意开始是不够的，领导上要检查，但更重要的是缺乏经验，因为学生可以放假闹革命，不受时间的限制，组织学生运动比较容易。

现在进入到工矿企业，这样，就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个口号虽然在运动初期就提到了，八月初时，多半是机关、学校闹革命，还没有深入到工厂，直到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才推动了这次运动，这是个新的经验。缺乏经验，许多准备工作不可能做好。出现这个情况，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十一个团体发表的告上海市人民书，题目叫《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这时，我们要扩大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工厂企业里。这些地方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一些更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进行捣乱、破坏、捣鬼。现在，不是象运动初期那样。运动初期，他们不大赞同搞运动，因为害怕群众起来，矛头指向他们，以强调抓生产，用以压制革命。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关躲不过去了，就要破坏生产，破坏革命。其中有几种情况，就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说的那样，现在丢生产，跑革命，或者找(?)革命。跑到北京来，还能闹什么革命？从齐齐哈尔来的斗争对象不在他本厂，而跑到北京来，这怎么闹革命？要来北京可以按“十六条”讲的，派来几个代表，为什么偏要来几千人呢？这些全是让丢开生产，并进一步提高经济要求，不是提高集体利益而是讲个人的经济要求。我们的工资制度当然有些是从苏修那里来的，封建主义的也

有，但这必须在运动后期改变，否则不能变动。不这样做，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让工人都涌向北京，全国二、三千万工人、职工，北京怎么接待呢？你们去铁道部可以看出来，铁道部里都住满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必须改变。

你们乘务组，大部分是从东北来的，你们知道大庆职工有×万人，这次领导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运动初期，学生串连，大庆领导拒绝，本地职工起来了，他们压制，等到大庆职工觉悟了，要革命，大庆领导害怕了，当大庆领导揪出后，躺了下来，让学徒工、半工半读的学生一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结果大庆油田许多井停下来，这就是最大的损失，这就叫做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是真革命。他们随便开款，支出数量很大，把许多青年职工推到北京造反，本来应造他们的反，却把他们支到北京来(我举这个例子)，他们是会理解其道理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在本地闹革命。首先是解决政治、思想的革命，不是解决经济的革命。职工到北京的数目大大超过我们的设想，车辆拥挤，造成事故，以至对你们的打击，主要是因为客流太多。一种想法增加车辆行不行？越是增加车辆，来的越多，所以造成乘务员不可能接待好，我们必须把这些根子挖出来，这就是一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采取新的形式进行反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扑。

首先提倡抓革命，促生产，在本地闹革命，能促进生产，跑到外地不能生产，只能破坏生产。

二、沿途接待旅客，不如接待红卫兵的时候了。沿途没有水、饭，旅客不满意，就造成了对乘务员的对立，因此各站还应恢复供应水、食品。捏断是错误的措施，今后应由各站搞的更好。

三、发表中央、国务院的命令，保证交通运输的正常运行，保证乘务员的人身安全，因为你们是为旅客服务的，也就是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的，保证列车正常运行。

四、运输还要按计划进行，到春暖以后，再进行免费乘车，在以前要订计划，按计划卖票，严格计算票数，不能卖超员的票，要保证只能超 10% 左右。现在都在加倍地卖票，这样不许可。

五、进行铁路员工的全面的动员，我们也须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主要的运输部门从铁道部到各分局、支线、站段都要算上，各厂、各院校、医学院都要算上，全面动员，准备从北京一直动员到各县，保证运输安全，人身安全。

六、责成铁道部负主要责任。铁道部不负责任，前五点就不能执行好。铁道部以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吕正操部长应负主要责任，现在批判他的错误，有两种办法：一个是一些学校、各单位把他揪来揪去，这种做法对铁道部不利，对他个人却有好处。揪吕正操，把他带到长辛店去，摆在那里批四、五天我找不到他，这个事情对谁有利？对铁道部不利，对国务院没有好处，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事情办不了，这个办法并不好，应整个说一说，还是让他们从工作上去考验，你搞业务，就是抓革命。

现在革命都有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那不落空了吗？抛弃业务，怎么搞好革命，应该给各级领导考验的机会。怎么考验？现在铁道部里只有调度室保存，其他室都住满了，怎么搞业务，是不是可以分他一层楼，既搞业务又要搞革命，然后再腾出时间和你们接触，讨论工作，两者结合起来，当然要政治挂帅。

要责成他，给他以工作考验。

以上这些是与你们代表座谈出来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希望你们回去讨论，既然得出来了，就要实施。要求你们不要坚持原来的态度，留在北京不走。有人说，你们的行动本身就是革命的行动，我不同意，但这也不能责备你们，应同情你们，要给你们解决。向你们提出要求，回到岗位上去，那些困难逼着你们不能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但这样下去又要造成与你们的对立。对破坏国家财产，损害人身安全的加以处分。如不回岗位上，外地旅客要与你们对立起来，但这是客观造成的，客观问题解决了，你们要回到岗位上去。

我们号召同学，如北京铁道学院的同学，支持你们的意见，准备到外地去动员，这是个

办法。

我从实践中学来不少东西。这一次我同李先念副总理一道来研究你们的问题，以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

还有一个建议，全路系统成立一个联络站，鼓励各方面的铁道系统成立革命的组织，根据十条说的，铁路系统应提倡革命组织，铁道部里局、站、段、组，学校都有革命的组织，按铁路系统设立联络站，把革命组织联系起来，国务院依靠这样的革命左派组织，抓革命，促生产就更有力了。关于这个组织，在起初(一月三日)讲了个初步意见。

399. 中央首长接见有关单位代表的讲话纪要 (1967年1月10日)

一月十日深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等中央及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在人大会堂西小礼堂接见了有关单位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委员会和红卫兵联队派了王恩宇等三位同志参加，兹将记录整理如下：

首先，康老建议念几个文件。

总理介绍王力同志宣读三个文件。接着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

今天开这个会介绍上海的经验。现在阶级斗争的情况，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采用更阴谋狡猾的手段，差不多在全国各地都存在，不只在上海，所以上海的经验是具有全国意义的。比如北京铁路运输被中断，不是铁路职工的过错，铁道部负责人吕正操，鼓励中断交通。严重的阶级斗争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消灭阶级敌人。敌人不向无产阶级投降，就叫他灭亡。不要以为没有斗争了，我们还要斗争。有一小撮人搞阴谋诡计，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被揭露了，打倒陶铸，我给武汉××造反团谈话说，陶铸在刘、邓路线推行时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中央、毛主席想挽救他，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中的同志揭发陶铸执行刘、邓路线这件事，揭穿这件事，中央、毛主席是知道他执行刘、邓路线的，想挽救他，叫他过来。可是十一中全会后，没有过来，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还是继续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和王任重领导着中南局，出现了许多事件，是典型的反动事件。在武汉逮捕了大批群众，相当大规模地逮捕群众，逮捕革命群众在其它地方还没有发现过，我们想帮助他，帮助陶铸同志，但他没有转过来。他的世界观，他的思想不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因为他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他就不可能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我们在中央文革小组批评他，在常委批评他，但没有能触及他的灵魂，是否帮助他不够呢？他自己认为是这样，我们认为是认真帮助过他，在十一中全会前就批评过他，希望他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当然，我们说的婉转些。十一中全会后，他继续闹，我们就公开摊牌了，他说“公开摊牌好，不然，我就不安了。”他是这么说，做还是那么做，他仍然照他的轨道前进，街上这么多的大字报，打倒陶铸，这是不是文革小组的过错，是不是我陈伯达的过错？后来他自己写过一封信，有一句话——咎由自取，对党中央、毛主席写这样的信，不是那么合适。但事实上倒真的是咎由自取，他自己要这样嘛！所以对

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他的路上去，我们帮助也帮不上。是否除陶铸以外，就没有其他人了呢？恐怕还有个把吧！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事，但有的病不能治了，的确不能治了。陶铸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就表演，这几个月表演的够瞧的了。那当然陶铸在大街上那么多标语，有群众的压力，或许可能好一点吧，看看！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跑到我们党内来，也许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可以过关。但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过不了。《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我们社会主义要经过好多阶段，推翻了国民党，没收官僚资本的关过了，没收官僚资本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关他过了。三反五反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反右派、公私合营、三大改造也马马虎虎过关了。五七年反右斗争因为没反到他头上，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五九年反对彭德怀，不是直接反对他，他也马马虎虎过关了。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告诉我们，是长时间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因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不可能设想很快就没有斗争了，剥削阶级总是企图死灰复燃，事实上，资本主义因素在我们国家是存在的，在思想这个问题上影响是很深的，不能低估，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候。社会主义这一个大关，很多人、相当多的人就过不了。当然，相当多也还是一小撮（江青插话：七亿人口中就是有三千万也还是一小撮！）当然，拿到外国是一个大国了。它的影响要逐步缩小，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要有很高的警惕，因为这个文化革命是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每个人都要经受考验，能不能过这个关，还要继续考验，所以我们是在斗争中前进，一片光明，一片大好形势，如果我们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有时有些人有修正主义看不出来，他是掩藏着的，可以麻痹人，象上海，还有其它地方，不但上海、黑龙江，好多地方，要钱给钱，这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若情况不好，给你钱，串连去，北上告状去，上海就是采取这个手段。铁道部假装同情职工，挑动职工，使铁道中断。这是我们原来没想到的，现在使我们恍然大悟了。上海的经验给我们上了一课。说到这里，我的话完了（稍停）。

再补充几句，不然又要自己片面性。

虽然是这样，但是你们不要乱抓一通，没有全面考察一个人就抓这样不一定合适吧！对你们也不一定是很好的锻炼吧。比如，中央经过长期考验的，你们把矛头对准他们，如谭震林同志、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谢富治同志、陈毅同志、聂荣臻同志、叶剑英同志、徐向前同志、刘伯承同志。跟你们坦白地说，我们支持谢富治同志，他抓得对，不抓就失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安部门。

这些是好同志，是经过长期考验的，我们对他们是有好感的。同志们对他们也是有好感的。他们不搞阴谋，还在做工作，说错话，有错误，要和大是大非分开。还有一些同志他们的功过要加以比较。不要全都抓。余秋里做了许多工作。（有人喊：“贺龙”，“贺龙”！）我没提名的我就不清楚。（有的同志提陈毅的问题）

陈毅同志的问题还是同志的问题，他正在写检讨。

江青：

今天这个会，有各方面来的同志，也有最近写信来说犯了错误不知怎么办？我说，也好办，按大方向做，我相信大家都会欢迎你们归队的。大家说，对不对？（众：对！）

今天在座的，工人比较少，因为我们最近和工人接触少，于是，提不出名单来。多数是同学。今天我们把我们所想的先告诉同志们。就是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就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斗争的锋芒要集中，不是这攻一下，那烧一下，这样会打乱我们的阵营。

目前，全国有两大问题要注意。一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用经济主义向我们作斗争。刚才发给大家三份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我们文革小组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我想不多说，希望革命同志要提高警惕，敌人在以此瓦解我们的队伍。另一方面，收买、

贿赂不明真象的群众，例如，铁路，吕正操是自己跳出来的，是桃园三结义。彭真的问题揭发出来后，保护了他，他不知闭门思过，挑动一些受了委屈的人。他说，我同情你们，你们受委屈了。他挑动群众，以致许多重要的交通枢纽不能行车，他们利用经济主义来破坏国计民生，以此来抗拒毛主席的领导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北京也是普遍的。上海付出一千万元(总理：几千万元。)在北京，数字上不这么大，但是……我们采取措施，进行冻结。不然，就使我们的工厂破产了，这点我非常希望同志们注意。不然，就要停止生产。要保持艰苦朴素闹革命。(问北航同学：北京市给你们自行车了吧？北航：给了。给你们其它东西和钱了吧？)我们望你们退回去。钱和东西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吗？！大宣传车、两个大喇叭。闹的全市睡不着觉。工人和机关干部都要休息。不能那样做。你们到处要这种车子。这车子是从东北来的，你们的车子走的很快。听不到半句就过去了。你们可以在人多的地方宣传，但不要影响交通。主要的还是击溃经济主义，这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我们国家经济生活，抗拒毛主席领导，他哪来那么多钱，还不是人民的！另一个问题，想提醒同志们，刚才伯达同志讲的很多，我想补充一些。

目前有一种风气，就是把锋芒对准我们军队的一些好同志，对准了中央、国务院的一些好同志。这些同志，我不是说他们没有错误，他们是有缺点、错误，甚至是有严重错误。他们可以向你们做检讨，比如，我有缺点，也要向你们做检讨。但你们不要上当。就是有人要把水搅混。例如，陈毅同志说了错话，做了错事，话说过头了是有的，也写了一些诗歌，但这个同志不是两面派，说错了就改。我也可以和他当面争执，但他不是两面派。从历史上讲也是这样，他可以和我当面争执，但最后就说：鬼戏！鬼戏！退让了。陶铸不是这样。他镇压我们小卒[组]，和王任重勾结在一起。对陈毅同志的态度……他很忙，过去不了解。这几年有了了解，很坦率，广州会议是说过头话。但在六二年就检讨了，他在历史上有很大的功勋，比如新四军。项英支持王明路线，把军队掉在一个口袋里。新四军被俘，便是我军大耻。陈毅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正确指示，发展了三十几万人，淮海战役是他们指挥的，当然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他们是站到斗争前线的。谭震林同志指挥了上海战役，他不要阴谋，他好一些，还是王震好一些呢？他好，王震不好。王震有过一点战功，要“烧”他了，就快叫谭震林去保他，他不向党向人民认罪，不闭门思过，而要两面派。谭震林是好的，谭震林很支持你们红卫兵。你们听不到就是了。他说话有时好过火。李富春同志也是这样，他就是不谨慎。粗，有些问题他知道错了，还是跟正确走。他害肺炎住院，小将要斗他，对这样的同志要善意地提意见。关锋同志去解围，李先念同志、谢富治同志都是好同志。谢富治同志原先是邓小平的部下，但他是第一个揭发邓小平的。总理批评的对，他弱了一些。现在，有一小撮人造他的反，这个头子要抓起来。他们可以分化瓦解，他们里边现在也有了个造反派，但对他们的小头目要抓起来，要专政！如果有的好同志写了错文章，如果我们把斗争的锋芒转向这些同志，就不合适了，在大的关键他们是跟党走的。

我们对陶铸善意批评，他要两面派，他伪造照片。那次会议是康生同志主持的，他对熊复下命令，一定要有一张邓小平的照片，就把陈毅的头弄掉，换上邓小平的头，这是非常恶劣的！这是特务活动！这些说明陈毅不是他们的人。他们还搞了一张把毛主席、刘少奇和宋庆龄拼凑在一起的照片。已经发到了全国。(康生同志：已经传到外国去了！)。陶铸、熊复就是这样干的。还有一个人，可能还有。唯独陶铸和熊复这样干的。第三次接见的电影还是违背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都是陶铸同志干出来的，肖望东也照办，陈毅同志不是两面派，他还不知道他的头被人家弄掉了，这是很令人气愤的！你们要是被人利用了，可就不好了！如果你们善意地同志式地批评那完全合理，他们也想向你们检讨。

另一个大阴谋是指向军队。有个人到军队里就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文革，到文革就说军队里忙，这就是刘志坚。怎样帮也帮不过来。

桃园三结义，彭真、林枫、吕正操在东北合伙整林彪同志，整好同志，吕正操这样的人，保了一下，该改了吧，但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改，他拿出了杀手锏，停车，他停了车，

看我们怎么办？好办！揭，揭穿他！我看同学们也要做这个工作，做宣传。刘志坚这样的人，我们帮助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上的文化顾问，他什么问题也不向我报告。肖华同志好呢？还是刘志坚好呢？当然是肖华同志好，刘志坚最大的一个阴谋是给几个元帅提供不正常的情况讲了话，影响很坏，使得文工团院校对准他们了，而刘志坚躲起来了。还可以在你们面前装左，是中央文革副组长。

不久前，叶剑英同志向你们做自我批评，是不错的。刘志坚还说：要拉下一、二个。闹得几个老元帅觉得好象我们要搞他们了。我觉得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怪事情？原来是他一手造成的。萧华同志休息一、二年，刘志坚是第一线的。去年又捞一点资本，从此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不过，很隐蔽，但狐狸尾巴还是漏出来了，开始是王任重，后是他，接着是陶铸。

我们斗争的锋芒要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一些说了错话，犯了错误，但认识了，知道了，就不能象对待刘、邓那样，也不能象对待陶铸那样对待他们。如果那样，我们国家还能有几个人工作？我们国家很大。你们想一想。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众：清楚了！）那就好了。

今天接到一封信，某某同志提要上天安门开四十万人大会。你们已经开过一次了，是否开些中、小型的会。体育场、体育馆，还有很多戏院。在天安门前开，很多外地学生，要断绝交通，很困难。总理、伯达我们商量了一下，在这里说明一下，大、中、小结合，可以搞的深一点，宽一点。你们已经开过一次了，你们是否可以考虑我们的意见？（写信的同志站起来说：我们可以考虑。）

现在北京外来的人有七、八十万，有工人、农民，要动员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回本地一面生产，一面搞革命，不要矛盾上交，把矛盾交到北京来，负担很重。串连师生，在北京吃住，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很稳定。但是有一小撮人，抛出了这个经济主义，他们使用了杀手锏，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部分资金，他们要威胁我们。同志们，我们能叫他们这样干吗？（众：不能）我们就要做工作，把工农动员回去。李富春同志惹了祸，搞了统战部。统战部是李富春同志送了大字报去，才揭开了盖子。现在，有人要鼓动人来搞他，这合理吗？合乎毛泽东思想吗？（众：不！）这些同志在困难时候，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刘、邓、陶那样对待。过去教育你们，对自己的队伍，要分清敌我。现在教育你们，对领导也要分清敌我。

康生：

我很同意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江青同志讲这两个问题是重要的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这个《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是主席的决定，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定向全国、全世界广播的。王力同志念了。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文化革命的新阶段。刚才那两个文件：《人民日报》发表的按语，《人民日报》发表的《告上海市人民书》，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上海的问题，关系到全国，不仅是工人，而是关系到学生、机关、各方面。因此，同学们要好好学习这个文件。这是很重要的。同志们看到了中央关于军训的文件，有一句话，是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这是林彪同志提倡的。加强革命性，就是更加充分地发挥革命的创造精神。因此，要更大地发挥我们的创造性。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科学分析。特别是要学习掌握毛主席著作。文件里提出了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总而言之，没有蓬勃万丈的革命精神不行，没有科学精神也不行，如江青同志对刘、邓、陶的问题要彻底批判；对一些好同志要爱护，都做了尖锐的分析，这就是科学性。另一方面，组织纪律性，四号冲中南海，不对！这是毛主席住的地方，这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高兴。

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关于陶铸，我讲几句话。伯达同志讲了。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推广刘、邓反

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在文革小组、中央常委面前、毛主席面前都几次帮助他，批评他，他都采取两面派。有时很左，实际是形“左”实右。

建国以后，我们党进行了三次大的斗争。一次是同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一次是同彭、黄、张、周的斗争，一次是同彭、陆、罗、杨的斗争。陶铸在高、饶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检讨，第一次是没有过关的。第二次勉强过关。你们检查一下《羊城晚报》、《广东日报》也好。他们怎么对待毛主席、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周扬的侄子周立波写了《毛主席到韶山》，是大毒草，就登在《羊城晚报》上，并且还第二次发表。再比如，今年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把戏，搞“三家村”。《北京日报》作了按语，中央立即通知全国各地不准登载。但隔两个礼拜，广州报纸全篇登了，他是反对彭真，还是拥护彭真？王任重那一套就是陶铸那一套。姚文元的文章全国各省都登，就是陶铸领导的湖南省委没有登。因此，我们宣布陶铸的问题不是仓促的。在常委，在文革小组，批评他，他与李富春、李先念的性质是不同的。但有一小撮坏人，要把水搅混，要混水摸鱼。有个坏人，在天安门前贴周总理大字报，这是什么人？（众：反革命！）应该如何办？（众：抓起来！）是！同志们可别上当，问题要分清性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本质不同，不能只看现象。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讲的很重要。经济主义、收买主义要注意。我是希望同志们把东西给他们退回去。

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是造谣。主席的三条也是造谣，没有这回事。这三条实质是反对谢富治、中央文革，毛主席路线的，是反对毛主席和林总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天天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择手段，狗急跳墙，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周恩来：

由上海发动的抓革命，促生产，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一切都是由群众中来的。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是主席发现的，决定发表的，象毛主席提出发表聂元梓大字报一样，要影响全国。在这个关键时刻，希望你们去做些工作。江青、伯达、康老，他们几位同志讲的，我完全同意，我们非常欢迎《文汇报》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和决心，同时，《解放日报》和兄弟的《文汇报》联名发表。

我说两个问题：不在座的各级领导中有极少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继续顽抗，以新的反扑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强调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新的斗争展开了，加之十二月份两个社论，要把文化大革命由机关推向社会、工厂、农村，由城市推向乡村。他们转过来也喊革命，他们不是要真革命，喊革命是假的，反对革命是真的。他们停工破坏生产。比如，铁道本身就停工停车，上海一部分运输停止了，这是保守派搞的。但他们也装着要造反了。乘务员等有点误会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以吕正操为首的一小撮人表面上支持乘务员，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江青：武竞天把十七大箱黑材料放在毛主席坐的车上，三司抄出来了，这是栽赃！）

首先要响应上海这个宣言，回到本单位、本厂去闹革命，不然，对文化革命不利。铁道部全住满了外来人，号召回本厂闹革命，不能呆在北京。

要发动大三线的人，这是一个情况。我现在只好找李先念同志抓。现在地方上许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是把矛盾上交，陶铸给长沙要打电话，三千人来北京，有的买不上票，就打起来了。

把东北的等等本地本厂的矛盾交到北京来。大庆是一面红旗，主席提倡大庆，在最困难的时期建设成的。去年产一千多万。第一，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第二，归功于艰苦卓绝的工人；第三，归功于全国人民。我去过两次，第一、二年确实做的很好。第三、四年就不行了，骄傲了，我去年陪谢富治总理去参观就感到有些复杂。果然，文化大革命中，工交部门的都躺下来了。大庆七万多人有一万多是学徒工，到北京来造反，要钱给钱，要什么给什么，这

是经济主义。这是矛盾上交。我见了王铁人，他很难过，张洪池是官办的红卫兵指导员，跌了一跤。你们要去参观，去揭发，非揭发不行，非要冲不行，就是要把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要批评官僚主义，要把修正主义批臭。

文革小组是参谋部。军队是司令部。国务院就是要把具体事务抓起来。如果领导是那么一部分人捣乱，怎么能行？铁道学院要到铁道部去做工作、串连。

第二个问题，阶级斗争越到这个关键时刻就要走向新的高潮。面更广更深，从城市到农村。同学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在马列主义的原则下，要联合起来，这很重要。工人阶级表现在上海，先进阶级在上海。在中学里有人说，主席不在北京，我一听，这是谣言嘛！

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有的说，文革小组怎么样了，这是胡说八道。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逮捕他，我们完全支持，这是群众的呼声。

现在左派有些分化。中学、大学都如此。左一点，右一点，还要在大原则下团结起来，当然，要互相批评了。

在刘、邓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所派的工作组，军队的他们长期不作群众工作了，就是组长：希望同志们也能注意分寸，可以检讨，批评。有的坏人，不可轻易放过，要很好地批判。但不要不叫他们穿军装，不然，他们很难过。对极端恶劣的不放过，但对一般同志要尊重。我希望你们注意这个问题。

江青同志讲话：

一、我们今天不是批评同志们，我们是向你们亮底。

二、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到天亮，快成官僚主义了，请求你们帮助我们做工作，希望你们协助我们做工作。

(注：此系记录稿，可能有错。总理的讲话，记的不全。若有出入，由整理者负责)。

400. 康生与中共中央党校同志的谈话(摘要)

(1967年1月10日)

“第一次同杨献珍作原则性斗争是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斗争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到底需要不需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那个报告和主席三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两大重要著作。当时我向杨献珍、侯维煜提议把党校计划讲课停止，专门学习毛主席这两大著作，遭到杨、侯的坚决反对！因为那时我不管党校。具体表现在短训班，曹轶欧那时在短训班，她回家的时候，我对她说：‘你们应该停课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当时杨、侯反对。通过这一次斗争使我进一步觉悟到：党校对毛主席著作不重视，不把这看成经典著作，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斗争现在找证人都可以找到，现在人还在哩！”

“第二次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斗争的问题是高级党校要不要整风反右的革命运动。当时杨、侯(包括范若愚、孙定国、伍辉文)，他们认为党校放假，不要整风反右运动，理由是党校干部都是各地方来的，因此回到各地方好。当时我反对了。这是整风反右，是第一次社会主义大革命嘛，难道党校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吗？直到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写社论反对了，因为五月是右派向我们进攻之时，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向党进攻。六月八日有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击。这时邓小平、彭真要放假，借口各地方需要干部，回去帮助整风反右。当时我坚决反对，这些学生对主席两大著作没好好学习，他回去怎么整风反右呢？组织部还是决定放假，我就去找彭真、陆定一，讲了我的意见，他们又没有办法反对，才没有放假。我反对了他们，这是第二次斗争。”

“第三次是一九五八年，斗争的问题是关于党校学习、党校方针问题。到底是用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那个方针，还是用杨献珍的十六字方针！大家知道十六字是杨献珍、侯维煜和刘少奇、彭真一块儿制定的，叫作‘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本来这是抽象的。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吗？这四句话，表面上没什么问题，问题是用这十六字对抗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的干部的教育方针。到底是用主席的，还是用杨献珍的？”

“第四次在一九五九年上半，是关于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问题。到底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杨献珍认为没有，但毛主席在理论上认为有是的，苏联的米丁也认为没有。杨献珍打出这个东西，写过一篇文章给《红旗》，《红旗》没登，到我那儿去告状，我说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不对嘛！当时我好心哩！有一次让问一下主席，主席说：‘为什么没有同一性呢？要没有同一性那么辩证法在思维与存在上就不适用了。’

“一九五九年这个斗争不仅同杨献珍的斗争，还同范若愚、伍辉文作斗争。因为杨献珍在党校二次反对主席的讲话，范若愚、伍辉文还不讲，封锁中央。我找范若愚、伍辉文、许邦仪，说：党校到底是杨献珍的党校还是毛主席的党校？最后他们没办法才批判杨献珍。实质上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都支持杨献珍。这是第五次。”

“十年十次反对。那时我的党籍都成问题了，侯维煜是中直的党委第一书记，王从吾是监委副书记，侯维煜是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去控告，王从吾……”

“第九次，反对林枫、贾震的斗争。同时从这个斗争中才了解到彭真、安子文、杨献珍等原来不是共产党员，是一批叛徒。安子文这些人在刘少奇指示下，一九三六年在北京坐牢时，有一个《反共启事》，和国民党一起反共产党。这个《反共启事》是谁起草的？是杨献珍。彭真不是跟他一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把问题揭露出来。”

“第十次即这次同刘、邓路线的斗争，才把党校盖子真正揭开。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十年中间，党校的确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

对党校这个斗争我也是逐步认识的，逐渐一步步地认识到的，先认识杨献珍，后是王从吾、安子文、彭真，最后是刘少奇。我说揭开林枫仅是开始，后面还有一个又深又厚又大的盖子压着。”

“两条路线斗争是贯穿这样一个斗争，刘少奇在天津讲过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这是纲领性的两句话。因此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实际上是一个纲领。”

“你们简单想一想，我领导党校，把党校盖子揭开，把多少年反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基地，我揭开后，有人把矛头指着我，这不是错了吗？”

“智纯、武葆华、李广文反对林枫，受林枫迫害打击，结果林枫的问题揭开后，还把矛头指向他们，这个矛头就错了嘛！这样有两种情况，一部分人会觉悟起来，会有一部分人走得更远。”

401. 周恩来在中央、国务院、北京市接待人员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2日)

地点：人大小会堂

同志们！我首先代表党中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向你们致亲切问候！去年全国革命小将到北京来进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了一千二百多万，北京最高时期曾达到三百多万。经过你们的热情接待与安置，主席分批接见了他们，然后他们很满意地回去了。

你们的工作成绩显著，大家工作积极，我们几次提出的要求，你们都达到了，我们的愿

望又实现了。满足了全国革命小将的要求，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十一月以后暂时停止接见，停止了免费乘坐车、船的接待，当时主观愿望认为入冬后接待任务会轻一些，但实际上来的更猛，我们要迎接更大的新高潮。

去年接待工作，虽有很大困难，但由于当时北京学生们都出去串连，学校比较空闲，也还可以接待，到十二月后，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到京来的不仅有串连的，还有告状、请愿、解决问题的。革命冲向了厂矿、企业、事业、机关、科研、设计等单位，这种发展趋势，不能由主观设想来决定，革命已经冲向工厂、农村，这就成为几亿人的问题，这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到北京来，有的说见不到主席不走，一直要等到明春，准备在北京过冬。

其次，还有大批的徒步串连的，多数是北京郊区和河北、山东来的。其中还有小学生、小学教师，也要求来北京，都想要到北京来看看毛主席。还有来同国务院、中央文革请愿、解决问题的。

以上几种情况，都要说服、动员他们回去，过去我们没有设想有这么多人到北京来，现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都住满了，而且越来越多，还有些人不按中央规定，不执行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不在本地闹革命，他们一开始想到中央来解决问题。

当然，由于地方上的某些领导同志，有的在运动中尚未作深刻的检讨，有的还在那里抵抗革命路线，使他们不相信当地的领导。一定要到北京来。上海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确实是很好的文件，他同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一样，提出了新问题，抓住了关键问题。有些地方、部门，过去推行刘、邓反动路线时强调生产，反对革命，因此，群众一起来就斗群众，围攻群众，错打群众。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了刘、邓的反动路线。有的地方、部门没有引到领导上来，他们认识很差，有的甚至不承认错误，广大革命师生要冲破，到各地去打一下司令部，看一看，这些司令部到底是什么情况。然而各地的领导总想维持他们的旧秩序，于是就抗拒抵制，群众已经起来了，轰轰烈烈，领导是冷冷清清。第一个时期是怕群众；第二个时期是躲避群众。到中央工作会议后，躲不起来了，于是就瘫痪起来，什么都承认，反过来借口革命而破坏生产，放弃生产。这就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上所讲的那些大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放弃领导，实际上就是用修正主义路线来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从十二月到一月初，就发生了这种现象，群众要什么，就给什么，乱批条子。本来没有扣工资的也补发了工资。什么劳保福利、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等等，是有些问题的，是要改革的，但要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后，才能解决。但是，有些地方、部门，就瘫痪下来，什么都答应，如全国总工会过去就是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近又签定了通告。不经中央、国务院同意，这还有什么界限呢？自己规定了一些不利的条件。如上海、黑龙江等地，许多企业、事业单位，都超过了计划开支。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有问题，应该在本地解决嘛，但是，就是矛盾上交，一有问题就上交中央。因此，到北京来的，就是几千人，上万人，有的不买车票就上车，打乘务员，破坏财务等，××、上海、东北都发生了这种现象，所有到北京来的人，工人、干部比例最大，现在办公楼都住上了，每个行业都来，这种情况，如不制止，还要发展。

经济主义，矛盾上交，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结果。有些部门由此而瘫痪了，有些地方、部门自己便放弃了工作。领导不负责任，这样不利于向大好形势发展的。这是一股逆流，今天《人民日报》要公布的反对经济主义的社论，中央、国务院要发贺电，公布《上海紧急倡议十条》，这是一个配合，能不能纠正呢？可以纠正过来。如铁道部在去年运输一千二百万小将到北京来的时候，有成绩的，未出大问题。最近就不行了，发生了铁路员工与群众对立的现象，铁道部还发了传单，说这是革命行动。本来问题可以解决的，但吕正操、武竞天他们是犯了错误的，现在要让他们到现有工作岗位上，让他们将功补过，看他们实际行动。煤炭工业部也私自批发了奖金，总工会私自规定公告，北京市人委还印出来

进行传布。大庆油田工委也不愿再保持艰苦作风等等。说明这些部门领导是错误的，必须要立即改正。党中央发出对上海的贺电，也是对全国的号召。估计会有一个新的形势到来的，我们要有勇气认识错误，看清形势，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大家要敢于承担责任，这对每个人都是个锻炼，现在要善于在新问题中总结经验，进步、前进。为了搞好接待工作，汪兴东同志要我来讲讲形势。同时也搞出几条措施：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反对经济主义，不可能随便满足各方面的要求，不可能用物质刺激去满足群众要求，不能用经济主义来腐蚀我们革命队伍。

例如：对红卫兵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对房子、宣传车、交通车、纸张、印刷等的要求……。有的机关、学校都大大超过原来的开支。革命进入到企业、事业单位后更不能这样做。要用大道理来说服小道理。

二、要配备足够的力量搞好接待。特别要保证生活、服务的人员。各机关造反派起来后，有的放弃了接待工作、服务工作，这是不对的。各单位要再次动员一下，起模范作用。从国务院起担负这个接待任务，准备接待××万人，(问汪东兴同志能否办到？)事在人为，我看完全可以办到。每一个人都要在接待工作中锻炼一下，都要为人民服务，不然就怎么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呢？我愿意去当个接待员，每天一小时也好。从部长起到炊事员都要很好地为他们服务，用实际行动来影响他们回去，不要造成对立……。

三、各学校、机关的空闲房子，都要接待，各革命组织都要参加接待工作，才能把拥挤现象克服，生活上我们抓，不要矛盾上交。来此后，就要动员他们回去，接待上的困难才能解决。

四、到北京来请愿的，不可能在具体问题上解决。告诉他们大多数要回本地去解决……，总之要给他们做工作，要动员他们回本厂、本地去闹革命。

五、要多做政治思想工作，方针就是《人民日报》(十二日社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要回去闹革命！

402. 江青在新华社的讲话

(1967年1月12日)

同志们好！我想同志们很关心毛主席的健康，我告诉同志们：毛主席很健康！(鼓掌，欢呼)

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讲，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们新华社有多少人？刚才听来你们有好几个组织，对吗？我这是为《揭穿一个大阴谋》来的，这张东西收到后，我就跟伯达同志商量，虽没有调查研究，但知道你们这儿很复杂，阶级斗争就是这样，是复杂的，是曲折的。但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复杂曲折中学会斗争，学会判断，如何区别朋友和敌人。刚接到新华社江苏分社一封信，我想单独跟他们谈，今天不在这儿谈，好不好？(好！)

有同志写条子说：要我肯定革委会是革命行动。如果革委会不能领导运动，可以改选或部分改选。如果是革命的就不要封。如果已经阻碍运动，封了它是可以的。革委会里的一些同志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但最近出现了些怪事，革委会就可能有问题。这张照片令人气愤，这是资产阶级作风，弄虚作假，在新闻上是不允许的，伪造这张照片在全国发行，除《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外，其他报纸都用了，正如你们写的“这张照片发出后，为许多省委报纸利用，新华社还编发了展览稿，在各地公共场合橱窗展览，这在全国起了极恶劣影响。”这完全是正确的。从这问题看，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照片，也是你们新华社搞的，我就感到问题是比较严重了。如果由于这种事故，你们封闭了革委会这是革命行动。但是同志们，还是希望你们协商，你们可以协商，部分或全部改选。不要让那些居心不良的人挑动群众相互斗

争。今天时间不够，不能多听同志们的意见。今后将有更多的时间来听同志们的意见。

我对熊复这个人不了解，不熟悉，就这段工作来看，他作得不怎么好，可以说有些坏。这些照片都经过他的手。另外口号问题反复了三次吧？这件事也作得不好，你们说罢官，我看还是让他到新华社来检查。有一个问题跟大家讲一下，这有相当程度的核实，熊复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有疑问，他到延安时带的三青团员的介绍信，填表时，他填了党员，又把年代提早了些，证明这件事情的人还在，这个人很好，他在海军工作。也可能后来入党了，但把年代提早了些，这样党龄就长了，介绍人也成问题了，现在熊复又做了这些很不妥当的事情，我看还是让他来检查，提倡文斗。让他检查，问他为什么要印这样的照片？现在这张照片(指传单)不要在全国发了，影响很坏，不要登报，否则就等于宣传他(指刘少奇)了。可以发传单，我就看了这个，认为你们做得对。我是来向你们致敬的，了解的情况不多，还是让伯达同志讲一下吧。

403. 王力、关锋讲话 (1967年1月12日)

地点：政协礼堂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唐平铸，今天上午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和北京四清工作团部分人员时讲话。

王力：

同志们，听说同志们要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关锋同志同我，还有《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同志一起来见一见同志们。

昨天晚上在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广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组织发表的元月九日的紧急通告。(呼口号，热烈鼓掌)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的贺电，(鼓掌)你们是不是已经听到广播了？(部分人说：听到了。)关锋同志问：“四清工作团的同志们听到没有？”答“没有”“造反一夜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出了这样一个贺电。(念贺电。)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还发表了一篇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篇社论，同志们今天看报纸，也可听广播，这篇社论是支持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紧急通告》的，是支持《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念十条通告)

这是一件大事，上海一百万革命造反工人，产业工人的大军组织起来了，以工人为骨干，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联合起来了，(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是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起来了，现在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革命造反组织的两个文件，这就必然推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个大飞跃。上海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向上海市委内部掌握领导权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夺了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把生产建设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要学习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造反派的革命精神，我们北京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的造反的组织，我们需要不需要联合起来？（答：要！）我们要不要集中成一个拳头？同志们都讲需要集中起来，需要集中成一个拳头，对不对？（答：对！）我们也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生产的命运，自己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在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我们向同志们建议，首先一条是保卫中南海，你们赞成不赞成？（赞成！）保卫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等重地，中央指定的应当保卫的单位。（口号）需要向中央反映意见，反映情况，可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联合接待站，我们提议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你们是不是商议一下，是不是可以担负起这个任务，（呼口号）因为中南海这地方同志们都知道，是毛主席工作和学习的地方，许多人聚集在这个地方是不合适的，北京的造反派组织都了解，会有自己的办法。

同志们，不管哪一派有意见都可以提，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很鲜明的，我们支持革命造反派，我们不支持那些不革命的派别，这一条是很明确的，毫不含糊的。我们不管这一个组织叫什么名称，他提什么样的口号，它的口号也许讲得很响亮，因为有一些御用的团体，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欺骗蒙蔽之下，他们也往往把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口号接过去，他们明明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叫嚷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看行动，看他们把斗争的锋芒到底指向谁，我们相信受操纵蒙蔽的组织和团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他们一旦弄清事实真相，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是会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的。在这一一个问题上，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要做工作，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一天要发生很大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欢迎受欺骗、受蒙蔽的人赶快回到毛主席这边来。这个斗争任务还是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但是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没什么了不起，决不致被他们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他们用各种花样跟共产党斗争，跟无产阶级斗争，这只能表明他们快完蛋了，他们演得越凶，他们灭亡的越快。

参加北京市四清工作团会议的部分同志到了这地方，我希望这部分同志是否可以好好学习今天的文件、社论。这一天在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伟大的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伟大的事件，同志们在中南海都不知道。你们把刘建勋和解学恭两位同志抓起来，据说因为他们支持了革命造反团（四清工作团中的造反团），这个行动是错误的。陈伯达同志很客气地建议你们把他们放回去，你们不听，我们认为这个做法也是不对的。我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今天的文件，联系你们的实际，真正弄清楚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希望你们从这个学习中得到好处，希望你们离开中南海，同志们要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可以写信，很快就会收到的，叫谁亲手收都行。但是我们恳切希望同志们认真地学习今天的文件，联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及一些中央文件。今天同志们要见我们，我们还没有睡，我们三人就来了。

关锋：

刚才王力同志的讲话，我是完全同意的，应该讲的，他都讲了，我没有多少话要说了。下面简单说几句，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的同志来了没有？（来了！）还有其他的革命组织，我叫不上名了，请原谅，他们要对上海来的赤卫队员宣传宣传，解释解释，劝他们回上海。上海赤卫队的大多数同志也是要革命的，但是他们受了蒙蔽，《人民日报》前天发表了上海革命造反派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们就到《人民日报》社去纠缠，他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发表的，按语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写的。我们相信那些赤卫队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会明白的。一旦明白过来，就会起来揭露的，就会回到毛主席身边来的。希望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耐心地给他们做些工作，好不好？（好！）

下面我说几句关于四清工作团的话，可能到会的四清工作团同志不满意，但我们还要讲，

不讲的话就对不起这些同志。刘建勋、解学恭同志别的不讲，不熟悉，但是支持四清工作团中的造反团是正确的。我们也支持他们，今天到会的参加四清工作会议的同志们，我们相信你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好同志。但是因为刘建勋、解学恭支持了革命造反派，你们就反对他们，特别是跑到中南海抓这两位同志，是不对的，连陈伯达同志的建议也不听是不对的。据说你们提出了条件，要见我们，不放他们，如果我们接受是错误的。(王力同志插话：今天宣布，以后如果用威胁的手段要见我们，一律不见！)也许有的同志讲我们偏心，人心必须要偏，在阶级斗争中不偏心是不行的，我们绝不搞折中，绝不搞调和，绝不会一手支持这一派，一手支持另一派，这样做就不符合主席的教导，对不起革命造反派，对不起暂时受蒙蔽的同志，所以我们必须态度鲜明。希望参加四清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北京到底是什么形势，斗争矛头到底指向谁？应该指向谁？应该指向彭真，指向直接指挥四清的赵凡及他的党羽。你们四清工作团中的许多老同志好好想一想，把矛头对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向真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如果一时跟不上形势犯了错误，不要紧，应当赶快觉悟。我这活，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很不高兴，但是批评你们这是我的责任、义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这样。一切要革命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

王力：我们是不是就谈到这里，四清工作团的同志递条子要反映情况，我们派记者好不好？(好！)

404. 张春桥在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2日)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贺电内容略)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们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来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热烈地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了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

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那么今天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一个贺电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上海是我国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基地，帝国主义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他们要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一定要夺取上海这个基地。上海解放以后十七、八年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就是我们全国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个斗争中间，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捣乱，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无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斗争，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上海无产阶级在伟大的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万丈的灿烂的光辉照耀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的新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进军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于失败的，他们还会采取各种手段同我们较量。但是同志们，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是腐朽的力量，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藐视他们，在战术上重视他们。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贺电就是最新最活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方向盘和指南针。我们为了夺取新的胜利，一定要遵照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成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我们要永远地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及时地识破和揭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给予粉碎性的打击。我们要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坚决地执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规定的政策，把每一条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贯彻执行。

我们胜利的保证，就是伟大的毛主席撑我们的腰，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我们胜利的保证还在于我们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联合。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们希望你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这种联合，把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斗争，使得上海每一个工厂、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每一个街道，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的强大的堡垒，经过我们的斗争使整个上海成为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我国革命人民的强大基地。

全上海革命人民的大联合万岁！

伟大的上海人民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405. 周恩来在“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3日)

同志们，铁路的工友们，职员们，铁路工厂的工友们，职员们，铁道院校的同学们，革

命的教职员们：

我现在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呼口号)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呼口号)

现在庆贺你们铁路员工、铁路的工人，职员，学生誓师大会的成功！

这个大会你们是响应上海的工人，学生，职员的倡议和中央的号召，提出在铁路战线上同样的要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呼口号)

在铁路战线上，代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铁道部门的少数的领导人。(呼口号)所以，在你们铁道部门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应该集中力量彻底批判吕正操、武竞天这些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的一些罪行。(呼口号)

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要集中力量来反对经济主义。在铁道系统里助长这种经济主义发展的也是铁道部的少数领导人。(呼口号)

在抓革命，促生产当中，要反对矛盾上交。把一切的问题都推到中央来解决，把各条铁路上的工友、职员提出的问题都推到北京来，把工厂里、院校里的问题也推到北京来，(呼口号)这样子，就使铁路的运输工作，全国交通的大动脉容易陷于停顿，这正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中的一项新的阴谋，我们要戳穿它、揭露它、批判它、搞垮它！

所以，把矛盾上交的也是铁道部门的少数领导人负责，跟你们广大的工人、职员、学生无关。顶多有一部分受他们蒙蔽，这种蒙蔽很容易戳穿。

只要我们铁路上，首先是运输沿线的、车务段的、机务段的工友们、职员们觉醒起来，团结起来，通过各个铁路的院校革命师生的宣传、推动，就可以把这种矛盾上交的问题解决。

只要你们铁路沿线的工友、职员、学生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真正的动员起来，团结起来，通过各个铁道学院，不是一个，而是所有的，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下，真正地作动员的工作、宣传的工作、解释的工作，一个站一个站地宣传，一个列车一个列车地宣传。我相信这个矛盾上交会解决的，会就地解决的。(呼口号)

所以，反经济主义，反矛盾上交，也是如同别的问题一样，要靠你们广大的工友、职员、同学来解决。(热烈鼓掌)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上说的：革命要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现在为着进行这项紧张的铁路运输工作，你们过去五个月取得了伟大的成绩，把一千二百多万革命师生、红卫兵运到北京来，把全国的进行革命串连的六千多万革命师生在全国内输送。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这个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胜利！(呼口号)次之，应该归功于广大的工人、职员、学生，是你们辛勤劳动、不怕困难的结果。再者，应该归功于各方面大力协作的成绩。最后应该提到铁路系统的各铁路局、分局、铁路站、铁路段，以至于工厂、学校、铁道部门的一部分积极工作的结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目前一个很短时间，铁路上发生的一些障碍，这就是由于刚才说的两个原因，就是有人在进行搞阴谋，搞经济主义，把矛盾上交。所以我们铁路沿线在一个短时期不过几天的功夫发生了一些障碍。但是只要我们跟你们见面，三、四天前我跟你们各单位的谈话，同留在北京的列车的乘务员见了面，讲了话，把刚才这个精神给他们讲了，他们马上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岗位上去，交通客车运行得好起来了嘛，这就是一个证明嘛！(鼓掌)我相信，具有“二·七”光荣革命传统的铁路员工，一定不会辜负党对你们的期望！(长时间的鼓掌)

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铁道部怎么办？三天前，中央文革小组和我跟北京的各大学的造反派，也有一小部分的保守派谈了话。我们宣布了这个事。我们说，尽管吕正操、武竞天这些人犯了这些罪行，但是我们还要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最后的机会，要他将功赎罪，看他能不能做，给他一个最后机会！所以，我现在向你们呼吁，我们这个要求，你们应该让

我们，给我们国务院譬如说十天到一个月的功夫，给他们最后的机会，看他们能不能将功赎罪。(鼓掌)所以我向你们提议，不要用你揪他抢的办法。这个样子，形式上好象是打击了他，实际上他倒得到了休息。(鼓掌)有一个铁道学院把吕正操搞到一个工厂里去，搞了四、五天，找不到。他晓得我做总理的总要找部长办事嘛，这次我不打电话，因为这是他们一个合谋，因为一边抓，一边愿意在那里等、休息。四、五天不是休息得很好嘛！我就找不到这个机会嘛！(众笑)这个不是办法。你们要让他在这个最紧张的前线，站在那个地方指挥，有错误找他，看他能不能赎罪。所以，我向你们首先要求，是到北京来请愿的，具体问题只能回到本地去解决，不管是哪一个铁路局，哪一个分局，哪一个车务段，哪一个机务段，哪个工厂，哪个学校，只能回去闹革命。所以我赞成刚才提的一个口号：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呼口号)

第二，就是要反对经济主义。就是不要向铁道部，向铁路总局、分局、车务段、机务段要东西，要喇叭车，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正好让那种搞经济主义的领导分子，来欺骗你们，来收买你们。你们干不干哪？(众回答：不干！)对嘛！(鼓掌)

所以，我号召我们铁路上的工人，具有光荣的“二·七”革命的传统的工人、职员、学生不要留在铁道部，留在铁道部的招待所，留在北京城。应该经过这次誓师大会以后，回去闹革命。(鼓掌、呼口号)

第三，我号召你们，要反对经济主义，就要不管是在铁道部、铁路总局、分局、机务段、车务段、铁路工厂、铁道学院，我们不接受任何的经济上的贿赂、欺骗，东西的赠送。好不好？(众答：好！)(鼓掌)

只要我们下定这两条决心，彻底打垮经济主义，不要把矛盾上交，我们就会更高地举起我们“二·七”革命的光荣传统的伟大红旗！那末，我再向你们提议，你们住在铁道部里的，无论如何要让出两层楼作办公的地方，让铁道部恢复指挥系统。你们可以派一部分代表来组织一个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他们的工作。好不好？(众齐答：好！)(鼓掌)使他们没有任何借口，给他一个时期，也不东揪西抢，不要你推我打，认真地看他们做一个月的工作，能不能将功赎罪。这样子，我们铁路工作才能在你们铁道系统的，整个联络系统的工人、职员、学生组成的管理委员会来监督他们工作。这样子，使我们全国的运输大动脉不仅恢复正常，而且跟过去五个月一样，还超额完成任务！

这个管理委员会如何组织，明天晚上我就召开一个座谈会，邀请你们今天出席的或者没有邀请的补席邀请各个单位的代表，就是说，在北京串连的各个系统的代表，各个铁路局、分局的在北京的代表，车务段、机务段有组织的代表，工厂的代表，所有的铁道学院，六个铁道学院，两个铁道医学院的代表统统参加，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看，好不好！(众齐答：好！)(鼓掌)

如果你们同意我这个提议，那就是可以把这个经过你们保证，我们在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领导下，我相信，在铁路运输上会做得比过去更好。会在这条系统上，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新阴谋、新挑衅！这一点，我相信只要得到你们赞成，什么事都做得成的。好，让我们高呼：

光荣的、伟大的“二·七”革命传统发扬、胜利万岁！

我们要团结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上团结起来！

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打倒铁道系统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406. 徐向前、江青、关锋等在接见空军机关院校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3日)

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

今天和同志们座谈一下，我们大家都是革命的，我们究竟革谁的命？这个问题是每一个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明白这个，就不是革命派，也没法革，没法称为革命者。

我们革命，就是我们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派革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命，这一点必须弄清楚，不能含糊。如果含糊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起码不是坚定的革命派。目标要选准，要集中火力斗，一定要斗倒、斗臭、斗垮。斗争要注意策略，不能把打击面放宽了。不能把牛鬼蛇神放过，不能把好同志，不能把犯过错误已经改正的同志当成敌人，当作革命的对象。不能随便乱打，不能打错了，这样就不讲策略，就不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不成为林副主席的好战士。

吴法宪同志(抄者注：空军司令员)是个好同志，他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是坚决贯彻林副主席指示的。你们空军有真正的牛鬼蛇神，如果把他们放过去不打，而要打革命同志，那是不得了的，这是要同志们深思的。

全军文革副组长关锋：

同志们：昨天下午我和空军院校的十二位代表座谈了几个小时，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回来向江青同志、徐副主席以及其它领导同志作了汇报，看了一些材料，对你们的革命精神很赞扬，你们的革命精神很好。

现在徐副主席叫我讲几句话，我讲错了欢迎大家批评，请徐副主席、江青同志纠正，我讲的供大家参考，和大家商量。

昨天和十二位代表交换意见中，曾提出希望认真学习一下上海革命造反团《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贺电，《人民日报》、《红旗》发表的社论，这些文件同志们都看到了没有？(同志们答：都看了。)这是一件大事，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大事，这是关系文化大革命全局的大事。

大家知道去年六月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在全国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现在毛主席又亲自决定广播上海革命造反团体《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是又一伟大战略决策。这个伟大战略决策，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阶段，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阶段。

上海经验值得我们大家认真地学习，贺电概括了上海的经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根据中央的贺电，作了一些解释。下面说一点，上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正如中央贺电所指出的，“他们自己掌握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掌握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号召我们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用这个根本观点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可以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夺权反夺权的斗争。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们盘踞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党权、政权、财权，他们总是用这些权力来打击革命群众，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利用所掌握的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权

力，把我们党的纪律，革命的纪律歪曲成奴隶主义，变成不让革命的紧箍咒，谁反对他们，就把谁打成反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权，在他们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对革命的少数派进行镇压、扣工资、开除，甚至监禁。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财权，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工人，乱发物资，收买人心，破坏生产，妄图破坏金融，妄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事业。这一点，在最近几天报纸上讲得很清楚了。当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乱发物资，乱开条子，搞经济主义，企图把我们的银行、办事机关搞垮，他们自以为这一手很厉害，其实是纸老虎，更加暴露了他们，说明他们快接近完蛋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最重要的就是从他们手里夺权，只有夺了权，才能斗倒、斗垮、斗臭他们。

但是，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所以，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相结合，搞好调查研究，分清谁是敌人和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可以看出，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他们是死抱住他们的权不放，垂死挣扎，而且施出花招，甚至与地、富、反、坏、右勾结起来，他们也要向我们夺权，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反动堡垒一个一个攻下来，他们也要向我们夺权，惯于制造谣言，挑拨离间，煽风点火，欺骗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把火煽向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趁机夺权。这一点，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在斗争中引起警惕。他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因为我们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有毛主席与林副主席的领导，有广大的革命群众，他们越是要阴谋，越是暴露自己。但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擦亮眼睛，分清大是大非，分清敌我。象《十六条》中指出的，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严格区分犯了一些错误，说了一些错话，作了一些错事，写了一些错误文章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

当然在斗争中有时弄不清，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这就要好好调查研究，上下结合，只要这样去做，总能够搞清楚。在这个问题上要多花点脑筋，多作调查研究。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标，就狠狠地斗。

当然，对于那些在文化革命中和文化革命前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的同志也需要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是要按毛主席教导的“与人为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

下面谈到有关空军司令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昨天十二位代表的反映，大家的情绪和要求基本精神是好的。对吴法宪同志有意见可以提，可以批评。但在这里我向大家说明一点情况，昨天我和十二位代表见面时，我也不了解，你们不了解，这不奇怪，好多同志在三座门等了两夜三天，大家火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在这里向大家说明一点情况，为什么这几天，吴法宪同志没有和大家见面，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他担负着重要战备任务，组织上要他做最紧要的事情。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打下了敌人一架飞机。这是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指挥的，但是吴法宪同志做了具体工作。他执行了这个任务，很紧张的战斗任务。

第二个原因是吴法宪同志除了执行战备任务外，还有写检讨，还没写好。是组织上要他写好了检讨再和大家见面，向大家做检讨。是这样两个原因。

你们一些同志，对吴法宪同志提了些意见，意见是善意的。吴法宪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一些错误的。但是总起来看，在大关键紧要问题上是紧跟毛主席的，是紧跟林副主席的。从根本上说是一位好同志。昨天上午，徐副主席讲话，讲了吴法宪同志的情况和对他的看法，我们认为徐副主席讲的是对的。有错误不要紧，改嘛！

听说成钧和你们见面。他应该了解吴法宪同志的情况的，但是他和你们见面时，不但没有说明这些情况，而且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有的同志说成钧讲的说明了问题的本质，说明

了吴法宪同志问题的本质。同志们，不是的，这正好说明了成钧问题的本质。

空军司令部有这样几个人：一个是刘震，那是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的死党；还有一个叫何延一，他是反党分子罗瑞卿、杨尚昆的卒子；成钧这个人是另外一个大坏蛋手下的死党。(喊口号：打倒贺龙！)这三个人搞阴谋，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反对空军党委。他们暗中捣鬼，要夺空军的权，他们要趁机夺吴法宪同志的权。今天到会的有空军司令部机关的同志，你们要和广大革命同志一道揭发他们。

同志们在院校受了打击，但是根子在刘志坚那里。大家很激愤，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同情你们，支持你们。但是对空军党委的问题要看清楚。谁是真正的好同志，谁是真正的坏蛋？要把坏人揪出来。刚才讲的这几个人，就要揪出来斗倒、斗垮。

有的同志讲，军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落后了。这完全是刘志坚搞的，刘志坚要负责任。但是，不要紧，我们相信有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副主席的领导；有新改组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徐副主席作组长，江青同志作顾问；有广大革命同志的革命精神，我们的机关、部队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能搞好。林副主席的决心很大，因为军队最重要，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所以必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我名义上是军队文革的顾问，实际上既没有顾，也没有问。(徐向前副主席插话：过去刘志坚不让你顾，不让你问嘛！)怎么说呢？向你们承认错误，向你们检讨，请你们谅解。就是这个刘志坚，在去年春天，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全军文化工作座谈会，指定他参加，他捞了一点政治资本，当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到中央文革小组说军队的事情很多，回到军队又说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中央文革工作。实际上是两头都不沾边，他搞另外一套。这个人是执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那一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他参加座谈会后回到中央，在中央文革开会，那时我不在北京，是伯达同志告诉我的。撤工作组，他是投了票的，后来参加刘、邓主持会议，他又马上投降了。(徐向前同志插话：他还攻击伯达同志。)在上海，他也不请示，就自己走了。我感到在紧急关头，这个人靠不住。但是我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轻易怀疑一个人。现在才发现他是一个两面派。一方面对你们装出支持你们的样子，在另一方面，破坏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不应该指向的方向。这次把他识破是一个大胜利。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是资产阶级代表挑起来的。我们左派是最讲理的，向来没有围攻过什么人。现在他们既然挑起来了，那我们就坚决应战。

关锋同志讲的，我就不再重复。

他们当前反扑的形式，一个是搞经济主义；一个是把斗争锋芒引向不应当的方向，企图打乱我们的阵势。但是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识破了，我们现在发动全面的反攻。

两条路线的斗争，反映在军队内是十分尖锐的，也是十分复杂的。不要以为军队内部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徐副主席是最老的同志之一，这个他最清楚，有时间可以让他给你们讲革命故事。远的不要说，高、饶以后是彭、黄。彭德怀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带走了几个人？还是个小丑？以后就是罗瑞卿，目前就是刘志坚了。同志们要知道，政治部是我们党在军队作政治工作的一个部。前两天，肖华同志有病，他(刘志坚)是首任，他的手伸得特别长。政治部，无产阶级不挂帅，那是什么挂帅？(众答：资产阶级挂帅！)对了。因此在军队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尖锐的，而且也是复杂的。

我相信同志们都是满腔热情的，是要决心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我第一次接见同

志们，更多的情况不了解。我听了关锋同志的一些汇报，看了一些材料，也听说过一些东西，现在出现了一些情况，你们是不是住到空军司令部去了？（众答：是。）就是一些不许住的地方，你们住进去了，国防部、海军司令部、空军司令部，因为他们有备战任务：一是准备对付国外的敌人；二是保卫文化大革命。因此在北京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成立时，我出席了他们的会议，曾向他们建议，对这样的一些部门不要去冲击，他们同意了。

今天和你们关上门谈话，现在你们是由于受了气，气愤极了，冲进了司令部。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退出来，要当心敌人颠覆我们，因此，作战机关不能打乱。我今天建议你们退出来，不要把你们的司令员逼得到别的地方去完成任务。（徐副主席插话：如果把你们司令员抓去，今天的飞机就可能打不下来的。）（杨成武代总长插话：今天你们的司令员在别的地方指挥的，你们那指挥所不灵了。）我接到一个报告……（注：打下敌机情况的报告，略）吴法宪同志是个不成材的司令员，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去打下敌机吗？从这点上看，我就要保吴法宪同志，我保吴法宪同志并不是保他的错误。他的错误应该检讨，你们可以作同志式的批评，但是他不是犯路线错误。他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在大事大非问题上他是好的，至于在具体做法上有缺点错误，有的甚至很严重。听说他抓过你们的一个同志，他是上了刘志坚的圈套，上当了。至于你们那里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关锋同志讲的成钧、何延一、刘震，这三个人的材料，我过去看过，今天听了，并且又得到一些，今天他们又兴风作浪，利用同志们只看到一个侧面，看不到整体，造谣生事，企图打乱我们的阵营。这个何延一是罗瑞卿、杨尚昆的人，杨尚昆是个里通外国的家伙，他们有个小集团，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一句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至于刘震，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赤膊上阵，自己跳出来的。（杨成武代总长插话：成钧这家伙跳了两次了。去年六月在空军党委……会上他想夺权，这是第二次了。）一个空军司令部就出了三个，够你们揪的。现在也有空军机关的同志，这些问题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如果没有确实的材料，是不会讲这些问题的，正是有确实的材料，才向同志们亮这个底。同志们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清敌、我、友非常重要。有许多同志是受了蒙蔽，要赶快醒悟过来。这种革命造反精神是可贵的，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是世界上无敌的。正因为这样，我建议你们退出司令部，并替我们做工作。最好是退出来，我们的人少，不可能到处“救火”。（众笑）我们相信你们，今天把这个底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相信你们完全可以做好这个工作。

（院校师生代表高呼：我们明天就退出去了。）

江青同志高呼：同志们万岁！

同志们高呼：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徐向前：

江青同志、关锋同志的讲话我完全拥护，这真正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他家是湖北孝感的，很小参加革命，以后在徐海东的部队里，照理说，应该是革命的吧！可是到社会主义这一关就不行了，过不了这一关了，这不仅对你们是个教训，对我们也是很大教育，军队中有一批牛鬼蛇神他们从革命的立场转到反革命的立场上去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杨代总长插话：现在美蒋就是趁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袭击我们，破坏我们，我们××机关，早就得到了消息，所以我们的××、××、××部门是不搞乱的。）（江青同志插话：今天就钻进了某架敌机。）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空军你们自己搞乱了就危险。刘震这个人去年七月间，他自己承认他夺权。成钧去年七月是停职的。我们是保了他的，何延一是坏蛋，杨尚昆的死党，事情是摆着的。昨天，我讲了吴法宪同志的情况，说我是保吴法宪同志，你们说，我不保吴法宪同志，难道还保成钧、刘震吗？吴法宪同志是一方面军的，刘震是四方面军的，为什么保一方面军的，不保四方面军的呢？这有个标准，就是看谁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杨成武代总长插话：成钧在防空军时是副司令员，我那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兼防空军司令员，那个时候成钧就不好，这个人很阴险，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他是反对毛主席的，

他是有后台的，这你们都很聪明。)(众高呼：打倒贺龙！)所以我们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分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清敌、我、友，不然就要打错了方向。你们迷失了方向，我们有责任引导你们，不然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最高军事机关，他们的工作都很紧张，不能冲击，这点要明确。革命不能搞错方向，这些机关中有牛鬼蛇神，要把牛鬼蛇神都揪出来，牛鬼蛇神不仅空军有，海军、总参、通讯兵部门都有，我们心里都有个数，靠你们去揪。你们的目标要找准，要打正，要进行调查研究。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每天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应该响应江青同志的号召，从空军司令部退出来。(江青同志插话：不怪你们，你们受骗了，怪刘志坚。)(杨代总长插话：怪刘志坚、刘震、何延一，成钧。)

刘志坚的情况。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刚刚接见了后，他还要我们接见院校的革命师生，我们说不要了，他不听，非要我们接见不可。(叶群同志插话：林彪同志也不赞成接见。)林副主席的话他也不听，还要我们四位副主席都讲话，我们要他搞出讲话稿在军委常委会上通过，他是在要讲话了才把稿子送来，叫你连看都没有时间看。(叶群同志插话：搞突然袭击！)对！搞突然袭击，陈毅副主席本来不准备讲话，他临时也(被)拉上去讲。这仅是我最近对他的一些感觉。你们应该恨谁、气谁？不要目标搞错了，就象飞机扔炸弹，不要扔在自己人的头上。但有的同志打错了，应该向打得准的同志学习，我们就要把我军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江青解答问题

刚才一个同志递了一个条子，关于斗争方式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我们只提倡文斗，不提倡武斗，因为文斗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在斗争激烈时出现一些反常情况，这也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总的还是提倡文斗。

你们住进了司令部，这不怪你们，据我们所知，住在国防部的同学就是有人接进去的，他们上当。你们是不是有坏人捣鬼，还不知道。有牛鬼蛇神可以揪出来斗，不要打乱他们的秩序。作战系统是昼夜值班的，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还是向你们提出建议退出来，我不是怪你们，我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但不要打乱作战机构，你们不仅自己要退出来，而且要作说服工作。

杨成武同志是个好同志，他的党性是最纯的。去年十月份他昏倒了，在他醒来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健康，他虽然也有弱点，但他对毛主席是忠心的，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个人也很感激他。

王尚荣现在有人替他翻案，雷英夫也在闹翻案，雷英夫是个国民党的小军官，同志们说，他要翻案行不行？(众：不行！)

徐副主席带病出来工作，担任全军文革的组长，要讲门头的话，他最多，门头最大，但他没有私心，他坚决斗刘震、成钧、何延一，你们要费点力气，要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要善于斗争，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那么一小撮。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因为他们掌握了财、政、兵权，要讲究作战方法。小将们、战友们，仗是有得打的，要充分准备，不能只是横冲直撞。斗争的方法，我们还是主张文斗，不能武斗。

407. 周恩来指示 (1967年1月13日)

一月十三日17时，由周恩来同志电话传达关于处理贺龙问题的指示，指示如下：

一、抄家不能抄，要按军委八条指示执行。他(指贺龙)是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不

能够抄家，要严格执行军委八条命令。

二、关于文件问题。看文件的人可以回校了，文件应交军委办公厅，他们要借的文件，国家体委的文件，经军委办公厅的批准，军队的文件要请示军委副主席决定。

以上指示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金×同志接，经中央军委办公厅档案处王××同志向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贺龙问题专案组驻贺小组传达。

408. 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厅接见南大卫东、天大“八·一三” 和华北局卫东等五名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3日)

总理：(填表时)党员和群众，应该是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不应说是党员和群众，如果说，那就把党员和群众对立起来，好象是把党员凌驾于群众之上。(看到卫东同学时)我在南开也挂了个名，但我只能说是个南开的中学毕业生，因为我上了半年大学，闹学潮，但和你们现在闹学潮不一样，你们现在是幸福的。

卫东同学问总理：您对“八·一八”怎么看法。

总理：“八·一八”也做了点好事，调查集体自首是他们首先搞的。那时我对北京第二司令部谈话时，“八·一八”也在那里，那时他们很坦率，有马骏的孙子，他们承认他们是保守的，他们说他们开门整风。

卫东问：“八·一八”说：周荣鑫是他们卫东队的后台。

总理：(笑了笑)因为他女儿是造反的，是左派。她还上过天安门，我不知道，也不承认她，所以，他们说周荣鑫是你们的后台，这根本不是。

卫东说：我们的广播被“八·一八”砸了。

总理：现在天津还有打架的现象？

“八·一三”：比以前好了点，但还有。

总理：你们是造反派，你们要制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要自动做工作。挑动武斗，你们要写呼吁书，弄个宣言。

机关卫东问：关于接待问题……

总理：你们是机关的造反派，一定要负起责任，查清驻在机关里各派的来源，他们(指“八·一三”和“卫东”)来源很清楚，是两个大学造反的，他(指太原中学生)也来源清楚，来源闹不清要出乱子，化工厂就出了乱子。名字是三司，实际上是黑组织，他们冒充三司，撞进去，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抢走了很多军事机密，有坏人钻空子，你们(指机关卫东)要想办法保卫华北局机关。

机关卫东：华北局来人很多，大部分是天津来的。

“八·一三”：最近天津来了近两万，听说还要有人来，说也不听。

总理：非说服不行，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是为他们服务好，另一个是劝他们回去，“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华北局书记处接待任务不明确。

总理：接待就是让他们回去，到本单位闹革命，一个是为他们服务，另一个是劝他们打回老家去。

机关卫东：机关的干部不敢出来见群众。

总理：我做工作还有自由，他们一出来就被揪走，被一个单位斗了，其它的单位找不到，不象我这样，每天做十七到十八个小时的工作。

“八·一三”：现在华北局人很多，吃的很不方便。

总理：华北局接待，你们提意见，不要搞经济主义。

机关卫东：同志们认为李雪峰、陶铸是刘、邓司令部的哼哈二将。

总理：那不见得。

卫东：李雪峰的检查交到中央来，主席、中央常委、中央文革看了，提了几点意见，他加上又交上来了，主席看了，日子没改。李立三的问题，中央停止他出席会议，因为他没有参加文化革命。以前犯机会主义错误，还有其他问题。这个人不适合在中央工作。他最近还给中央写封信，对停止他出席会议表示不满。李雪峰也有问题，所以他就没参加书记处会议。

彭真半年来不紧张，养肥了，最近红卫兵把他揪出来，才紧张了一点。以前彭真根本没把李雪峰放在眼里，他指挥不动他，八千人大会是彭真留下的烂摊子，本来不应该开，这是老实人开的，同志们有意见没有？(对旧市委或是对新市委)我同意雪峰同志给他们文件。但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查他要经过中央同意，关于你们拿了解学恭的材料要送还。我们派代表，是军区的黄同志。

总理：(记下)并对他的秘书说，告诉北京军区。

总理站起来和我们握手。

卫东问：对“八·一八”怎么办？

总理：对“八·一八”分化、教育、争取。但不要分化的太激烈了，不然他们受不了。

卫东：“八·一八”说他们是造反的。

总理：造反不是自封的。

409. *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省委书记时的讲话(1967年1月14日)

(见《系年录》第五十七卷)

410. 周恩来、陈伯达“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5日 工人体育场)

陈伯达：

向同志们问好！向红卫兵们问好！

刚才看到一个《告全国人民书》，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个口号很好，我们这样作，我们一定要胜利，敌人一定要失败。自从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耍了很多花招，我们要步步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运动开始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派工作组的形式进行镇压群众运动，毛主席建议把工作组撤掉了(群众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告诉我们要充分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新的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是不会放手不干的，他们表面上同意撤离工作组，实际上改换了另外一种形式，利用当权派背后操纵一部分群众组织，来继续镇压文化革命，后来工人农民起来了，投入了文化革命运动，他们首先借口要搞生产，他们认为，搞革命生产就搞不好了，生产就乱了。我们用毛泽东思想识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群众呼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他们是要镇压革命，同时也是要破坏生产，后来他们就更露骨地这样搞了。他们用各种办法、用经济主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经济主义破坏国民经济。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是相互联系的。他们现在既不要革命，也不要生产，同时用大家要革命的名义，来破坏生产。后来他们说你们要革命就革命去吧！他们企图用抓革命来中断交通瘫痪国民经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这个阴谋被识破了。刚才在后面，有几个上海工人同志对我们讲：现在有一股接管风，工厂让你们接管，机关让你们接管，他们好跑在后台去，把我们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搞得不好，他们想看笑话。他们的阴谋诡计是会被继续揭穿的。刚才工人同志们商量了一下，是不是一般不采取接管的方式，而采取派群众代表监督的办法。他们想偷懒、想舒服，让我们忙的不得了，他们坐山观虎斗。当然，在个别机

关是可以接管的，不是要大量接管，大量接管这样会上当，因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要看我们的笑话，要当心啊！大家的行动，就正如大家提出来的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起来！有什么问题，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互相商量，这样妥当不妥当？（众：妥当）不要搞小团体而要搞联合，联席会议有不妥当的还是可以交给广大群众讨论。刚才有工人同志说：工人农民还有一些问题，矛盾怎样解决呢？我的意见是要开工农联席代表会议，商量解决，工农联席代表会议不要形成对立，工农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还是交给群众讨论，有不适当的还可以改进，这样革命的工农就联合起来了，敌人就挑拨不起来了。看这样说，这样的意见对不对？（众：对）同时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学生要联合起来，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群众要联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

战争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恩来：

同志们，工人们，红卫兵们，解放军战友们：

我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的敬礼！

我现在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问好！
(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现在，我首先庆贺你们誓师大会的成功。刚才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你们誓师大会表示了决心，要响应上海革命组织《告全市人民书》的倡议，支持党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你们作得对！作得好！

我们欢迎上海派来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誓师大会。他们不愧为上海先进工人、革命学生的代表。你们高举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我们支持你们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我们支持你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刚才陈伯达同志说得对，不要象上海形成接管风。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机关，都要依靠自己的革命派把群众组织起来，管理监督他们的业务部门。不要让他们躲在后边，看着我们上当。

我们全北京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全北京市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411. 周恩来谈夺权问题

(1967年1月16日)

周总理一月十六日凌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职工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代表谈话纪要：

谈到夺权问题时周总理说：你们现在提出来夺权问题是完全可以考虑的，夺权问题是很复杂的，现在要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夺权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出现了三种夺权形式：

第一种是基层造反派力量很强，业务上很熟，在外力支持下夺权。上海《文汇报》就是这样，夺了权以后面目一新。南京公安厅也是这样，在外力支持下夺了权，是比较好的；第

二种是没有准备好，造反派力量没有形成。外来的造反派在那里顶着，当权派睡觉或者看我们的笑话，这是一种准备不足的夺权；第三种是当权派做假的接管，自己躲在后面，自己躲在后台，这是变种，是当权派造的阴谋。现在看来第一种、第三种是少数的，第二种是多数。

周总理对“大庆公社”的代表说：你们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夺权的指导思想不成熟。“大庆公社”总的方向符合中央精神，缺点是没有商量，太急躁。

谈到领导机构时周总理说：考虑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新的联合委员会就叫“大庆公社”也未免不可，我不强加于你们。

总之要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掌握石油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又说：搞联合声明把全石油系统领导权夺来。

412. 王力在新华社对山西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1月16日)

十六日凌晨，穆欣、王力同志在新华社接见山西工人革命造反派代表，王力发表重要讲话。内容如下：

我很支持你们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有人主张对什么事情都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我们不同意，你们不偏向革命就是偏向不革命，你不偏向无产阶级必须偏向资产阶级(必有一偏)，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态度，必须旗帜鲜明，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对保守派要批评，要帮助，对这些组织中的群众要说服教育，争取批判他的领导集团，揭其幕后指挥，要批判他们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受蒙蔽的要宣传教育，对其头头可批判。

目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人起来，起来的标志首先还不在于有什么样的联合组织，最重要的还在于有一批工厂工人能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为大家心目中的旗帜。

从北京学生运动的经验来看也是这样。学生运动发动起来的标志，不在于有联合组织，而在于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学院东方红”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组织。

毛主席重视上海，是因为上海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人阶级立乾坤，学生运动如不和工人运动结合就没根基，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工人要和学生结合，互相支持，另外也不可轻视机关革命干部的群众运动。上海文化大革命给全国指明了一个新阶段，毛主席为新阶段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口号，上海工人也提出来了，毛主席支持，联合起来的目的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各报根据毛主席指示给上海工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北大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标志着一个单位、一个学校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夺权，上海经验标志着在一个市范围内向资产阶级夺权。要夺权一定要联合，不能采取小团体和分散主义，要联合起来，也不可能马上搞一个统一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为我们提供了适当的组织形式和经验，要掌握省市大范围的运动，最重要的是工人起来，因为许多部门和经济命运掌握在工人手里，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靠边站是客气说法，实际上要把他们打翻在地。

要把领导权夺过来，还要以革命机关干部为主，外边只是支持、帮助，夺权后凡是能用的是要用，监督他们工作，夺权要有组织、有计划进行。不能今天这一派才夺权了，明天那一派又去夺权，所以革命派要联合。今天《红旗》评论员文章发表后，估计将对全国影响很大，工人、农民、学生运动联合起来，夺取文化大革命胜利。太原形势很好，快回去，到火热的阶级斗争中去。时机不要放过，祝你们获胜！

413. 周恩来、江青在接见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晚八时四十分至凌晨零点三十分，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等同志在人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军队系统及中央机关革命造反派代表。

总理主持会议。总理先说：今天召集大专院校、中学、部队、机关的同志，主要是造反派的。主要是听听你们的意见，然后文革小组同志讲些意见。

三十个单位代表发了言。最后江青同志和周总理作了简短的讲话。

江青：

同志们，战友们：

我差不多没有精神准备讲话。我很难过，看你们的条子，分散了我的精力，没有很好地听你们的发言。我们文革小组的人手很少，以后我们想多带点助手来。

革命左派一定要在大是大非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大联合，一定要在斗争中联合，只有左派联合起来，才能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目前北京来了一百多万人，有些是来造反的，有些是当权派来避难的，有些是告状的，有些是来游山玩水的。希望你们去做工作。要革命，就要回到本单位去，联合本城市、本单位的革命左派，向本单位的当权派斗争、夺权，对不对？（大家：对！）住在这里不走，消耗国家的财力，这是一个阴谋。据说文化部门来了一、二十万，是陶铸通知来的。

建议外地受骗来的工人、农民，要揭穿这个阴谋。外地的当权派想逃避斗争，跑到北京来，要叫他们回去。游山玩水的人也要说服，不回去要给压力，要回去。吃国家的财富，吃人民的血汗，你们是不是认为这是反常呀！

左派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斗，对自己的思想也要斗，自己思想上有阴有阳。对自己的缺点看得多些，对别人的优点看得多些，就不是好团结了嘛！

北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点燃的火，现在落后了。你们应该下厂，到北京的十个县去，彭真搞四清搞了不少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一定走得远嘛。要照顾大局，要让他们回去夺权，谁也不能代替他们夺权。

北京的革命左派要搞革命的大联合，要注意两条：一条是在原则基础上联合，不能搞妥协，不能搞折中；二是不要计较个人、小集团的利益。不要搞小动作，要搞大动作。

周恩来：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今天时间关系，我不想多说了。明天还要找工厂的工人造反派谈。再过一天，开个来北京造反的、徒步串连的、上访的会。现在北京来了近一百万人。要把道理向他们说清楚，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

希望同志们和我们一起做工作。要搞好接待，和他们把关系搞好。当权派不负责任，我们造反派就要负起责任，说服他们回去。

清除一些不是有组织到北京来的，这些人没有职业，没有单位。如“中国红旗军”，东一撮，西一撮，那些头子是不好的。“中国红旗军”欺骗我们造反派。还有其他的，如化工部清查出的“工农兵造反总部”，他们的两个头子也是不好的，已抓起来了。我们内部也有，

如“联动”，是个中学生的组织，是有后台的，有人要插手，我们要唤醒他们，要说服他们的成员不要受骗。有些大学的附中过去一度搞的红卫兵，搞得很欢，后来接受了谭立夫的观点，被别人利用。说反动话的要教育他们，有反动行为的要抓他们，你们大学要做他们的工作，要比我们做得更好。

我们要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应该把刘、邓、陶(陶铸推行刘、邓反动路线，还做了很多坏事)批倒、批臭。各学校、各部门都要做好这个工作，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与我们都有关系，这是一个主题。与他们有关的人，当然也要给严厉的批评。另一类是在部门中工作的同志，也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他们推行了刘、邓路线，对他们应该批评，但这应区别以前一种。这些同志还在中央主要部门工作，有的正在检查，有的正在准备检查。对这些人批评，我们是欢迎的，批评这些同志的人，不能受到围攻。在座的同志对我个人也可以批评，贴我几张大字报也是欢迎的，我也是做到老，学到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种批判，与第一类制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一伙人要分开，这一点，上一次已给大家讲清楚了。

进行这种批判，一定要同当前的形势，当前的任务联系起来。当前的任务是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他们搞经济主义，矛盾上交，在革命组织中搞阴谋，制造分裂。革命的组织，要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前提下，在当前的斗争中大联合。联合也可以各组织保持独立，也可以组织合并，怎么办，由大家协商。各系统搞联合好，如财贸、工交等，便于把大家力量集中起来，这种组织有学生，有工人。要从北京做起，分系统组织起来。搞革命串连，搞实习劳动，又推动了文化大革命。

首先要把学生与工人联合起来。北京不仅大联合落后于上海，而且工人组织也落后于上海。明天想开个工人座谈会，请三司、二司造反派、一司、首都兵团等也来参加，推动工人阶级大联合。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的地方，要不要夺权？上海的同志回答要夺，应该夺。《红旗》评论员文章已经讲了这个问题，从批判到夺权。(江青同志插话：左派力量不成熟的地方先搞监督，逐渐走到夺权，从少数发展到多数，可以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暴露出来。)科委的左派奋斗了五个月，把韩光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了，夺了权，他们有一套经验，今天不讲了，以后开一个科技部门的会，请他们介绍。有的是先夺后改造，夺了权再揭。政法公社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中央文革小组帮助你们。也有一种形式是监督，监督比较主动。夺权主要是夺领导权(包括人权、财权)，业务上是监督。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经验，今天只能讲到这个程度。要靠实践。中央文革小组要议论一下，搞几个条条，提交中央常委讨论，请示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

江青同志说：对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不要用对敌人的方法来搞，要好好读一读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毛主席的书是一个宝库，要到那里去学习，不要向我们学习，我们也是学习，向毛主席学习，向你们学习。

(这时快要散会，有人问：动员外地来的人回去，火车很紧，买不到票，怎么办？)

江青同志说：可以组织他们徒步走到天津，到塘沽，到秦皇岛，再坐船回去。文艺工作者，可以徒步回去，沿途还可以宣传。

总理说：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414. 江青在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多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来广播事业局会见全体革命群众，江青同志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现根据录音整理如下：

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你们好！

我今天是来向你们致敬！（鼓掌，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的文化大革命干得好！（鼓掌）做得对！（鼓掌）我是来向你们取经来了！刚才就在另外一个房子听了几种不同的意见。才知道你们这里闹得热火朝天呢！（笑声，台下讲：江青同志坐下讲）站着有劲！站着有劲啊！我现在跟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越斗争越神气。（掌声）还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很好！（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志们，由于我们晚上还有一个活动，不能够把你们的意见听完全了。刚才我们已经初步地了解了一些情形，就是说，你们的一些好的做法，我们也知道。我们过去曾经派了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来过，这以后，又派王力同志来过。我们还是关心你们的！（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本来，伯达同志是在别的地方，可是我一打电话请，就请了来了。（鼓掌）我今天来取经取到火头上，哈哈……我看你们这个火现在有点要消了，是不是？

我只想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内部矛盾问题。（鼓掌，对！）刚才我听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听来听去，都还是属于你们内部的矛盾（对！）不是属于敌我矛盾。（对！）但是做法上呢，你们采取的有的过头了。（对！）这样呢，当然就不利于团结了。另外，本来是好心好意提意见，但是采取方法不妥当，那么也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自己呢，还气……（对！）因此，我建议同志们先采取个别谈话，或者少数人座谈，把思想打通，然后再摆到大会上来说，那就开一个团结大会。（对！掌声）现在据我了解，你们这两天开了两个不太有利于团结的大会。（对！）就是因为准备得不好，方法呢也用得不好。在这里我建议你们读几篇文章，真正好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鼓掌）《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还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四篇东西现在你们带着问题活学活用，就能解决你们的问题。（鼓掌）那是宝库啊！我最近又翻着看，我觉得对我也完全是新鲜的，难道对于你们不是新鲜的？（是！）你们现在单是读语录不行，你们的程度也是应该能够系统地读一些毛主席的著作。（鼓掌）到毛主席的著作这一座大的宝库里取得武器，来解决我们内部的一些思想问题，一些作风问题，一些不好的工作方法问题！否则，就会自己制造混乱啦！比方你们昨天开了个什么会，叫丁莱夫之流就钻了空子，这你们还不知道，对不对？（对……）今天你们开的这个会又不许别人发言，人家上来说，我想讲一点不同意见，你们就轰人家，这也不对吧！（鼓掌）那你们要说了，“噢！江青同志，你怎么来了就批评我们啊？”（笑声，鼓掌）刚才那个女同志，她名字我已经忘了，（有人插话：叫李娟）李娟，她进去的时候是哭着，流着泪，后来，讲着讲着她笑了，她平静下来了。我相信她是一个好同志，对不对？（对！）她很勇敢，她提出不同的意见，可是你们轰她，这就不对。（鼓掌）你们现在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的忠实的执行者丁莱夫之流丢到一边不斗，专门自己斗自己，这个对不对呢？（不对！）为什么丁莱夫躺在那里睡大觉啊？我都有气！对他，（鼓掌）你们觉得已经斗臭斗垮了吗？（没有！）噢，应该出题目，天天叫他交待！（对！）他跟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是什么关系呀？叫他交待！（鼓掌）这是敌人，他不是我们的人！（对！鼓掌）这是你们的斗争目标，你们并没有搞深搞透，也没有斗倒、斗臭、斗垮。现在呢，结果把你们自己的矛盾……当然啰，不怕，我们不怕把自己的矛盾摆出来。但是怎么摆，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然后统一起来，联合行动，向敌人开火。（对！鼓掌）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读这几篇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几篇著作，多了也不行，先读几篇著作，同时，个别谈心，大中小会议结合，打通思想。我呢，就讲讲我自己的缺点，多多着重讲我的缺点，我着重讲你的优点，你呢，就着重讲你的缺点，多多

着重讲我的优点。这样一来不就容易团结了吗？(对！鼓掌)当然，我讲的不是和稀泥。在大的是非、大的原则问题上，那是不能这样的，那是只有斗争的。那种斗争也要讲策略。原则斗争是不能出卖的，不能降低的。内部问题，属于思想方法问题、思想意识问题，态度问题，都可以用我们党一贯的最锐利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鼓掌)对自己人要和，对敌人要狠！(对！)现在我觉得你们把敌人丢到一边，让他睡大觉、休养，就不太狠！有没有这个缺点？(有！)而对自己人呢，就是说，反正只看到缺点了就不太和，因此就影响你们团结了，对不对？(对！)我看要狠，对敌人；对自己的人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做自我批评，批评别人，也要讲大道理，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这样子，我们自己的队伍才不分裂，才对斗争有利，否则对斗争没有利，敌人就笑话咱们了，他还可以钻空子，反过来夺掉你们的权[权]啊！提高这个警惕噢！(对！热烈鼓掌)丁莱夫他们以及他们的后台不会睡大觉的。同志们！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对！热烈鼓掌)现在你们开门整风，这很好的。但是要研究方法。读主席这几篇著名的著作，带着问题活学活用。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今天听说你们封了自己的红卫兵的门，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不妥当的。(对，热烈鼓掌)但是，去封门的人，如果你们再用那个办法来对他呢，我看也不好。就是要好好地叫作自我批评，给他提意见。但他还是属于你们内部矛盾嘛！他采取这种方法不对头，去封门，砸了热水瓶，这个不妥当，可是，你们不要再这样对他，也砸他的热水瓶，再去封他的门(江青同志笑，众笑)那就造成了……那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了。我不能干那样的事情，对不对？(对！)

我今天也没有更多的意见，以后再来听同志们的意见。本来我是想来看你们怎么斗争丁莱夫的，后来听说你们自己解决了。我现在看你们自己还没有解决得好，你们叫他们都躺在那里睡大觉，做休养员，你们倒斗啊，斗啊，斗、斗的要翻底了。我看这个不妥当，要改变这一个作法。

人呵，要自我改造，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没有每个人的自我改造，那么，这是很危险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光明面与阴暗面。也就是说个人与集体如何摆，没有个人，也就没有集体。但是，如果你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那你就错了，那势必要出问题。现在呢，就是有些人不善于分析自己头脑里头这个，我说的阴暗面，一般地说，就是个人主义，不善于给自己这个作斗争，又怕别人触及他自己这个个人主义。(对！热烈鼓掌)而把自己的光明面、优点又有夸张，说得不得了。那么，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这样子，也就不能正确对待别人。这就不利于团结，不能前进了，就会停顿了。所以你们自己的整风，应该着重于每一个人的思想自我改造与善意地帮助自己的同志来改造。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能够更坚强，更有韧性，才能够真正地搞深、搞透，把这个运动，把敌人斗倒、斗臭、斗垮。

我想请陈伯达同志给同志们讲几句，好不好？(好！热烈鼓掌)

陈伯达：

(找王力同志作翻译)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热烈鼓掌)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热烈鼓掌)

同志们万岁！(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全场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江青：

同志们，我们马上就有事情，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几位今天就不能给同志们讲了，我们就告别了。同志们，再见了！祝你们胜利！(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415.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他们(指王力、关锋)是五月三十一日同我一起到《人民日报》社的。今天这个会我看开得很快，你们造唐平铸的反，造得对！(口号)我们五月三十一日到《人民日报》社来，是带着毛主席的革命方针来的。六月一日以后，和一些同志合作，写了一些社论。六月份以后的社论我基本上不大管了。《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这篇社论是我主持搞的。有些社论不是我主持的，有些是我不同意的，有些是我反对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是我主持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不是我主持的。当然，不是说我主持下写的社论一点缺点也没有，但是大方向是对的。六月份以后，就想摆脱《人民日报》的工作了，以后我们几个人就不大来了。所以《人民日报》的情况就不大了解。但我们在座的三人对唐平铸的工作是不满意的，是有怀疑的。

《人民日报》的工作怎么搞？我来过一段时间，所以我好象还有责任的。另外，我们来《人民日报》时，是带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的，希望把《人民日报》办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党中央的机关报，变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党中央的机关报。

看起来，六、七月份的几篇文章，六月份的文章基本上是革命的，没有一篇文章是唐平铸有份的。那是我们这些同志集体搞的，唐平铸插上一句话两句话是可能的，但是无关紧要的。这里面有个矛盾存在，我们五月三十一日进来以后，就是带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这个组织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因此就影响到后来的工作。到后来，就不能执行六月一日以后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了，所以不能改良，只能革命。

我们在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同唐平铸没见过面，同胡痴也没见过面，都是临时从《解放军报》借些人来，实际上是刘志坚推荐的。我们不了解他们。七月一日以后，同他们俩谈过《人民日报》的问题是苦恼的。问题没有解决，七月一日就开始江河直下了，除了《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社论外，很少有象样的社论。我对唐平铸、胡痴说：“你们要集中一切精力把《人民日报》的社论搞好，使他能够成为集中代表党中央的东西。”可是我的话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没有改造好，没有改造过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有一个时候，我对他们讲，你们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但对毛泽东思想并不了解。你们要从头学起，象《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你们要抄，抄，印象深刻，对思想改造好一点。他们抄了几篇，送给我看过，但后来没有坚持下去。而且他们抄是不是解决问题？所以，需要你们这种革命风暴。

那么，怎样才能办好报呢？我相信你们这里有很多有生力量，能够掌握毛泽东思想，能够把报纸办好，要走群众路线，让大家来办报。你们打算成立一个什么委员会？(工人：我们工厂成立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总编辑部呢？(答：没有)希望今天解决，今天不能解决明天解决，后天解决。群众选举一个总编辑委员会，不一定要有总编辑了。看你们几个总编辑都垮台了，一个邓拓，统统都垮台了，不要总编辑，只要一个总编辑委员会。是七个人，九个人或十一个人，你们自己决定。大家协商，你们各组协商，按巴黎公社原则，如果不称职，也可以随时撤换的。撤了吴冷西，换了唐平铸，唐平铸不称职，不是也撤了吗？

所以，以后就只要一个编辑委员会，你们自己起个名字，起名不能包办代替。这个编辑委员会要负责报纸的版面，特别是社论，要真正搞得对，不愧为党中央的机关报。编辑委员会里面，可以不要总编辑了，可以轮流值班，或者几个人做主任，或者叫做勤务员，名字自己起，总之，要对党中央负责。我建议中央文革今后由王力、关锋同志同《人民日报》联系。关锋实际上要负责《红旗》杂志。他是《红旗》常务编辑，实际上是总编辑。王力同志可能跟你们联系多一点。

总之，我们就是这么几句话，要充分按毛主席的教导，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你们有首创精神，一定能把《人民日报》办好。能说比上海《文汇报》差一点吗？你们不要象《文汇报》那样在报上登。革命造反派已经推翻唐平铸了，内部搞就行了。必须把唐平铸交给群众批判，你们两个标语，一条是“打倒吴冷西！”一条是“打倒唐平铸！”(会场大标语)不要忘记打倒吴冷西，吴冷西是三反分子。不要低估吴冷西和唐平铸在《人民日

报》的影响，要彻底扫清它！

我在没管的较长的一个阶段里，唐平铸到陶铸那里去了。实际上后来是陶铸在管的。但名义上讲“你们(伯达等)不能不管啊！”陶铸也这么说。但实际上我没有管，所以我也有对不起《人民日报》群众的地方，这也是对不起党。没有抓下来，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但我不能解释。我管的时候有错误你们可以批判。(关锋：《人民日报》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陈伯达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力：学生也发现了。)可惜，我没有一直搞下来。你们明天可以出版吗？(众：可以)《人民日报》不能停，一天也不能停，不能象《工人日报》、《大公报》那样。《人民日报》有国际影响，《人民日报》还要办得更好。

革命派万岁！

毛主席万岁！

散会后，王力说：《人民日报》的事情，由《人民日报》群众自己解决。

陈伯达说：今天你们要解决组织问题，如果今天不行，原来的可以继续工作(暂时)，可以选个组织监督他们的工作。没有组织的也可以讨论。大字报还象过去那样，贴在楼内，外面的革命群众还不能进来。

416. 戚本禹在接见工人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你们夺权，还定什么框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不应夺。如组织部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应该夺权，上海市委曹荻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应该夺他的权。铁道部、劳动部的权就是要夺，吕正操最近跳出来了，应该夺他的权。至于怎样夺，应该由内部的左派来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不应该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就应该夺，没有什么首先不首先的。要有策略，但不能成为策略派，对于一些单位，要首先接管，其后再夺权。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应该监督，对他们没有监督的，就要夺权，接管以后，再监督。一般的说，就要接管，接管以后，再监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不监督，而应该紧紧掌握在左派手中。

“一切权力归左派”，这个口号一般不要提，不巧妙，应该团结大多数。假如这样一提的话，不是左派的，象原来保守现在造反的中间派，就没有什么权力了，应该以左派为核心，讲究策略，做的时候想点办法，把权牢牢掌握在革命左派手中。

接管以后再监督，工资权利要接管，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来就不发工资，这样他就怕了。哪些权是必须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就必须夺。(有人问：对技术员怎么处理？)戚本禹同志说：技术员有什么权可夺？假如他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就监督他。

《红旗》杂志副总编关锋同志他干的很好，很支持左派，他有什么权可以夺的？你还去夺他的什么权！让那些作官当老爷，不愿干工作的，自己检讨都不会写，还要叫人家写的人靠边站。夺他们的权，让有实干精神的符合林彪副统帅提出的三条标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的来掌权。

什么几级几级(干部)，都不要它，好象晋长封建社会的几品官似的，要打破它，这是资产阶级、封建社会的一套。什么作报告几级干部可以听，几级干部不可以听，这些都要打破，你们厂里有没有这些情况？(众：有。)应该打破它。有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听他的话就提级，不听他的话就不提级，有人造了十年、八年的反，一级也没提，不提的好，……有些提了级倒会变成修正主义。你们应造级别、资历的反，不要崇拜“权威”，青年人革命干劲足。也有的人说：“咀边无毛，办事不牢”，不是这样，“咀边无毛，办事很牢”。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你是哪个阶级的，究竟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少奇的。“咀边无毛，办事不牢”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说法。雷锋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他干的很好，大家都学

习他，假如雷锋不死，当总政治部主任肯定要比刘志坚当的好。……知识分子越高可能越不革命，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当然现在有许多大学生都是革命的，我们元帅里就没有几个大学生。

417. 戚本禹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北航红旗，我让你们派一百多人去天津，去了吗？(答：正在准备，我们去二、三百人可以吗？)可以，不要你们自己去，你们组织一下，别的学校也去。(北航红旗：我们准备步行去。)好哇，步行去站得住！(北航红旗：我们让解放军跟我们一块去。)行，行！让他们跟你们一块。(北航红旗：我们要军训。)这并不矛盾。

今天是个预备会，明天中央文革要开一个比较大型的会，江青、总理听你们讲意见，主要听你们讲。你们讲一下你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对于夺权，对于左派联合等多种问题都可以讲。

北京的运动已经不如上海，你们感不感到惭愧？我们感到惭愧！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都落后于上海，有差距，(众：差一大截呢！)上海左派组织联合起来夺权，把市委的权都夺了。可是北京的左派组织还有分歧，有原则的分歧，有非原则的分歧，方法的分歧，吵的不可开交，影响了集中矛头，你们还都是造反派嘛！为什么联合不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伯达同志推荐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你们学了，为什么效果不大？(有人讲：根本没有效果。)为什么？(众：没好好学。)

朱××(地质东方红负责人)你们要了吉普车，还分钱，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你们是有一些缺点和错误的！你们搞些自行车还说得过去。你们少坐些小轿车好不好？你们写大字报用红绿纸，为什么不用报纸？文化革命的经费学校都有嘛！你们再向人家那儿要，怎么行？

小团体主义！北京落后了！与上海为什么有差距？你们想一想，那天开那个会，我没有去，十万人只去了一半，五万人，左派联合都联合不起来，不用说全市了。

要说老实话，毛主席说嘛，不说老实话是要吃亏的，明天你们一五一十地给伯达同志、江青同志讲。

(北航红旗在下边问：我们要开始军训了，可以吧？)可以，我同意军训。北航最近出了一张大字报《谈谈孙悟空》，我看了看，是攻击中央文革。(北航红旗：他攻击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

(有人问陈云问题)陈云问题，你们自己可以做出结论的，陈云你们可以提。

(就办一个“全国性”组织问题问戚本禹时)全国性的组织我一个也不承认，总理、江青也是这样，一个兵、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就组织“全国工农兵革命造反总部”，这怎么行！全国性组织多如牛毛，你们几个能代表全国新闻界吗？

418. 王力、关锋在接见山西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王力：

各位同志来这里等了很长时间，昨天关锋同我去《红旗》杂志社见一部分同志，今天很

多同志来了。昨天我们听了山西同志反映情况和问题，我们主要是听同志们的意见，有这样的和那样的意见，回答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同志们说一些情况，因为当时还没有商量，没有研究，有些话要说的没说。今天请山西的同志多来一些，把昨天没说的话说一说，主要还是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讲了那么多问题，我们要带回去研究一下，才好作判断、下结论。

我们感到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到了转折点。在这个新阶段，摆在我们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上海的斗争的经验很丰富，但是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夺权！山西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是最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坚决支持上海的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他们的权力接管过来！革命的群众联合起来，向他们手里夺权！上海是这样，一切的地方只要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一切这样的行动都是革命的行动，我们都是坚决的支持，(群众热烈鼓掌)根据这样一个大原则，我们研究了，因为昨天才得到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有多少条，(有四条)对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热烈鼓掌)王力同志唸：“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令……我们庄严地宣告……为了……”这还说得很客气。(继续唸)……接管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关锋同志插话：接管得太少了！)在他们手里这一些机关应当接管！

昨天有一种意见，“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比工作队更坏，这是向左派夺权”。当时我们没有表示态度，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按“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斗争的矛头是对准敌人而不是对准革命群众，我们一定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当然，一切人都要在运动中受到考验，但只要革命行动，我们应当采取赞助的态度。山西革命造反派指挥部的行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是新生事物，也是刚从地平线上冒出来的事物，我们应当欢迎他，如果有缺点，我们应当谅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么！(关锋：因为毛主席发出了号召！)在山西出现了这样一种接管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要看到它的主流，这是群众首创精神的表现，是新生事物。有人叫：不行啦！乱得不得了啦！在这样一个大革命中是否会出现一些“乱”呢？当然会，但这不是主流。(关锋：有乱才有治嘛！)只有大乱才有大治。所以我们要看到主流的方向，是否有一种假接管呢？会有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搞一帮人来假接管，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会有的。但是，在这样大革命中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不怕，群众能识破它。

上海的革命群众经研究写了接管的经验以后，认为：(1)机关的接管，应当以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为主，以其他单位的革命群众为辅助；(2)在斗争中建立联合委员会，在接管方面建立联合，不是一个组织接管一个部门，而是有计划、有配合地来做这件事情；(3)在接管后，原机关的机构与人员还可以在群众监督之下执行任务。

这个办法也还好，这是群众创造。我相信，你们山西的群众也会有新的创造，你们的情况与上海不一样。毛主席说：过去的斗争是农村包围城市，接管城市以后实行军事管制，把原有的机构保存下来，从上面派人下去。这次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众、革命组织自下而上的接管，不单掌握自己单位的命运，而且把主要的工厂、矿山运输单位党政机关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建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成为坚强的堡垒，巩固的阵地，没有这样的阵地，就不能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在新的阶段，不限于在一个单位夺取阵地了，而是在一个市一个省的范围里夺权。上海的创造、山西正在进行的斗争，丰富了我们的经验。昨天有一位副司令员的儿子提出一个论点：“军区第二副政委张日清，居然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破坏了党的纪律”我们研究了他的意见，我们认为这意见是错误的，事实上没有不介入的。公安部门也有人说：“我不介入。”有没有不介入的？(群众：没

有！)问题是支持那一派，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抵制革命。我们认为解放军和公安部门应当鲜明地表示态度：支持革命派！支持造反派！支持一切革命的正义行动！(关锋：张日清同志支持你们，反对卫恒、王谦嘛！)张日清同志反对卫恒、王谦，支持造反派，我们赞扬他的革命行动！今天我们给你们亮明这个观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如果他们不支持造反派，我们怎么办呢？(群众高呼：造反！)对！造反！在这一点上，我们相信解放军，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军队的问题可以在解放军内部解决，不要冲击解放军。

是有一些当官做老爷，变了质。把群众看成洪水猛兽，群众对他们来说，就是洪水猛兽。(关锋：要冲击他们嘛！)他们开口闭口骂群众，背地里就说群众坏得了不得，如何如何不讲理。我们没有见过革命群众不讲理，倒是那些受蒙蔽被操纵的人是不讲理的。所以我们对一切革命的组织、造反的组织必须采取鲜明的观点：支持！一定要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的力量一定会大发展，这是历史的潮流。上海是一个典型，去年十一月造反派只有一千人，而仅有二个月，产业工人的造反大军就发展到一百万人，造反派的力量一定会发展的，而那些受蒙蔽的群众相信他们会站到毛主席一边来的，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用主席思想武装自己。至于一些做坏事的组织象从前的东西城“纠察队”，现在的“联动”，如“西安的红色恐怖队”，对它们就专政！如果公安部门不能执行这样的任务，就要造它的反！(群众高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相信太原市、大同市、山西省的命运一定能够掌握在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广大革命群众的手里。我们高呼：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政权夺在无产阶级手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关锋：

该讲的话王力同志讲了，我再简单地讲几句，同志们写了些材料，写了信，我看了一下，我看这些问题要上纲才能解决问题。上什么纲呢？就是把权夺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样才能解决，不然是解决不了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还掌握着部分党权、政权、财权，在这样情况下，革命群众怎么能不受压迫呢？我看到一个条子，太纺红卫队又挨打了怎么办？(群众：造反！)对！你们要自己处理自己的命运，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你们自己，我只能表示同情慰问。

十一月份我们接见了太纺一部分同志，他们回去发表了谈话记录，人家就说：关锋和戚本禹是群众斗争群众的罪魁祸首。所以问题得你们自己去解决。革命干部、学生和工人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太纺红卫队和一些红卫兵(当然是不同意他们领导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说：他们红卫兵中，有些头子专门打人，红卫兵向省委要求保证八小时工作，在上班时间不要打人，这是最低要求了，但是这样的要求也不能满足，这样的领导是什么领导？这个省委干什么的？(群众高呼：是修正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专政！只有把他们打倒！现在不是告状的时候，同志们！当前的形势很好，去年毛主席指示广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广大群众热烈欢呼。但也有人到电台质问：为什么广播大字报？现在毛主席又指示发表了上海各革命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新的转折点。广大群众也是热烈欢呼！但还有人到人民日报去闹，《红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还是夺权，这篇文章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今天有少数人跑到《红旗》去说：这是棵大毒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指出，我们告诉《红旗》的同志，你们要有底，他们就是毒草，你们就是香花，他们说是反毛泽东思想，你们说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同志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决定发表的。他们还是揪评论员呢？(众笑)同志们！不多讲了。时机要紧，要趁上海的东风，赶快行动起来！(群众高呼：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前几天我们把解悦找来研究一篇文章，事情完了，我们就叫他赶快回去，夺权！我们在

研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在研究，他们看到了中央给上海革命派的贺电，(王力插话：他们知道混不长了！)也在研究对付我们。

同志们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这里就不回答了，因为你们那个地方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我们讲几句话，起什么作用？我们还是靠你们干！山西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广大人民是会支持你们的，胜利是你们的，我们应当相信解放军和公安部门里也有左派，现在他们已经杀出来了。他们和你们联合起来就好办了。对那些打人凶手一定要专政，只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把权力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王力：要改变一个观念——有了什么问题要求省委解决，这没有必要。)那等于要他们的命嘛！他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单，一句话：要夺权！(群众高呼：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毛主席万岁！太钢工人代表发言后，山西大学一个人代表“8·14”及革命联合会等组织发言，群众怒吼：保皇派滚出去！)

关锋：那你就不要讲了。今天我们向大家谈点意见，供大家参考，我们知道大家有各种不同意见，但在这里不要辩论了。好不好？(群众：好！)

我们讲这一些谁都可以讲的，公开的。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山西的同志我接触过几次，看来看去就是这么回事，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转移点，毛主席发出了号召，所以我们今天亮明了我们的观点，旗帜鲜明的拥护大家闹革命！

419. 谢富治对公安部干部的讲话 (1967年1月17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七个多月了。现在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全面地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要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粉碎。运动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上海工人左派队伍发展很快，开始一千多人，现在已有一百多万人，斗争已发展到夺权和接管的新阶段，但是很多同志还不理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接管政权，从报纸宣传工具开始，接着就接管公安机关。今天北京市公安局被政法公社革命组织所接管，(鼓掌)这是一种革命行动，我们支持他们，欢迎他们。大致上，全国大城市公安机关都被接管了。他们做的对，这件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支持的。昨天毛主席讲过，接管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支持接管。主席还讲，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这是毛主席的话。所以我们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在党中央二十多年的遗毒肃清，再加上陶铸、王任重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西南局李井泉也是执行的反动路线，还有刘澜涛也是和刘少奇一伙的，中央又有彭、罗、陆、杨，刘、邓是总根子，这样的人来领导，毛泽东思想就不能贯彻。

同志们，这不是一件小事。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关系到我们国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关系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的问题。我们已夺取了政权，但仍要进行这场革命，不进行这场革命就要变成修正主义。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最高的马列主义、最高最高的威望，才能领导全国革命人民进行这场革命。我们每个人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今天我们就用实际行动拥护毛主席。

这一个极为伟大、极为英明的举动，是关系到子孙万代的事情，是全世界人民的事情，这是最大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子孙万代的大事，是让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的大事。所以要全心全意地拥护。周总理前几天谈到有三种人，一种人跟不上，第二种人思想不通，第三种人反对。我们希望公安部的人当第一种人，跟不上就紧跟，只要是毛主席、党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的，我们就拥护，包括革我们自己的命在内。不要有抵触情绪，抵触情绪就是立场问题。现在甚至有自杀行为，这是最反动的，我们要坚决反对。

现在有几种接管，一种是内部革命力量大接管，一种是主要以外部力量为主，第三种是内、外部结合起来接管。接管也是复杂的，有真正的左派接管，也有个别不好的假接管，那不可怕，但多数是真正左派接管的。总之，革命组织的接管，我们要支持，要欢迎，不可避免的要影响一些工作，但要尽量少影响工作。

我们公安部要以很大力量支持左派，同保守派斗争，反击右派。(像联合行动委员会，工人支队。)我们的斗争有时不得力，我们要支持左派，保护左派，一切公安部的人，一切革命力量，都要这样做，坚决镇压、反击右派的活动，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是右派都要镇压。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过去批转了一些束缚群众手脚的规定，如不要进入公安机关，如干部的正面教育等，这些东西一律作废，不作废当权派就会拿这些东西顽抗。所有接待的和各地来问的，通通这样答复。如果是革命组织群众接管，我们就要表示支持，要参加，如果是右派组织，如工人支队来接管公安局，那是右派，我们就把他们赶走。

第三个问题，公安厅本身的问题，已经揪出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是刘、邓的影响，彭、罗的影响还肃清的不够。我们这些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作了批判，但批判的不够。还有任务。彭、罗的影响要肃清，要把徐子荣批透。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搞臭，这些搞的都不够。

关于组织什么战斗组问题，我们没有什么文件规定。现在军队里也成立了什么战斗组，你们公安还不成立？如果是革命，我们都要支持他们。公安部将来怎么办？要看斗争发展的结果。

今天把最近的大问题，利用短短的时间和大家讲一讲，首先是北京的接管要支持，全心全意地支持。全国的要支持，北京的要支持。保护左派，同保守派作斗争，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分子。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昨天向主席谈了，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主席说了这是阶级斗争。

全体公安人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旗，坚决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作斗争，作决死的斗争。要进攻，一刀两断，划清界限，真正成为毛主席的革命战士。这是一个大革命。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运动不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毛主席昨天说了，转不过弯来就靠边站，但给饭吃。这是领袖讲的，但是你们不要用大字报贴出来，贴出去就不好办了。

总之，要紧跟形势，彻底闹革命。

420.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作重要指示 (1967年1月18日)

中央首长召集部分工矿企业代表在人大会堂举行座谈会，我校有代表参加。会上，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同志就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夺权问题，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周恩来：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今天召开工厂造反派为主的座谈会，学生中的造反派也来了，想先听听大家的意见，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我讲几句话。过去与工矿企业联系得少，上海走到前面去了，我们要急起猛追。

(下面十个单位的发言从略)

江青：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今天是开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群英会，同志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意见，使我们长了很多的知识，现在祝贺同志们夺权。在我们刚进城时，叫做军事接管，就是夺权。现在是革命人民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力归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预祝同志们胜利。

本来我不想辟谣，但是有些问题牵涉到群众运动，所以我要说一说。建工部革命造反派总部有一条子问，说中央指示在各级文革中要建立党组，中央没有这样指示，你们不要上当。此外，现在广州贴了许多大标语，说我到广州去了，这样就骗了许多人到广州去，广西就去了二十万。广州的当权派给机关干部每人发一百元去串连，这样外地去的人吃住就无法解决，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江青在北京，哪里也未去。(总理插话：前一段谣传毛主席不在北京，也出去了。主席哪也未去，一直在北京。)现在有些人用我的秘书和警卫员的名义出去搞些鬼名堂，在东北组织地下复仇军，全国青年……这些组织都是反动的组织，什么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中央一个也未成立。我们要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实行专政，这是反革命的组织。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但里面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我们要团结、争取、教育、改造他们。

陈伯达：我们到工人群众当中去得很不够，接触了一些，但接触得不全不够。我们经常说，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我们今天也是当你们小学生的。我们的工作一方面是接受毛主席的领导，一方面接受群众的经验。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群众经验，现在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总结群众夺权的经验。今天你们给我们上了一课，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要去消化它。以后我们还欢迎同志们经常反映情况。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来不断分析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谢谢你们。

周恩来：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各位战友！

方才江青、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同意。今天的会开得好，得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情况。现在在北京的外地工人等串连的大约有一百万左右。(下面谈了一下北京车站问题，略)铁道部已经夺了反党分子吕正操的权，我们一定要夺他们的权，一夺到底。我们今天的会开得很有必要，昨天开了大中学校的座谈会，着重谈了夺权问题。今天开这个会，也是研究夺权问题。我们要把夺权斗争汇成一个总的运动。目前主要是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里面关键问题是夺权斗争。如果哪个单位还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掌握，那么我们就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定要夺权。我们十几年前夺权，是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蒋介石的五百万军队扫到大海里去了。简单说来，这是打江山。我们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这次不同了，这次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但是还存在着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领导权必须夺过来。怎么夺？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自己动手来夺取领导权。这个权上面是毛主席授给我们的，下面是群众授给我们的。北京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央各个系统的，一种是市委的。中央各系统的，一种是党的各部，现在已经开始夺权了。政府各个系统是按各系统进行的，比如政法系统、外交系统等八个系统。铁道系统的大专院校造反派联合起来，这样形成一股力量进行夺权。以内因为主，吸收外部力量来解决。另一方面就是北京市的，今天晚上已经开始有三十多个单位到北京市委夺权去了，已经驻进北京市委大楼，我们要庆祝他们的胜利。夺权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不能陷到事务当中去。北京市的一些综合性大学，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大、师大等在北京市的夺权当中要下大的力量。不是派一小部分人去的问题，也不是就只开几个大会的问题，要起主要作用。具体的工作要原单位的人员来做好，我们去监督他们，只许他们好好地工作。夺权，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大家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要把政权夺过来。我们上面有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的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夺权就一定能胜利。最近北京出现了一些所谓全国性组织，象什么中国红旗军，全国青年……造反军^①(听不清)，其中好多都是反动组织，我们要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现在有些人要翻过去的一切案，象五七年的右派现在也要翻案了，右派怎么能翻案呢？四清工作队大多数是好的，大多数搞的是好的，个别是搞错了的。不是过去的一切错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国复员军人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这个中央已有指示。写大字报不写姓名，今天署名这个战斗队，明天署名那个战斗队，我们不赞成这样做。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是光明磊落，正大光明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座谈会仅仅是开始，今后还要开。

陈伯达：有的同志让我多讲几句，我再讲讲，讲的不对，请批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夺权的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反对彭、罗、陆、杨开始的，这是一个夺权的斗争。

半年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给广大群众的夺权斗争做了一个思想准备。在这个运动中，又重新跳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头目，代表人物是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中跳出来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夺权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权。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是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不会是平坦的，会有很多曲折的。现在有些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反夺权，因此要较量许多回合。一个堡垒，一个堡垒地夺。所以我们要有个精神上的准备，不可能一下子就夺完了。也不可能希望被打倒的资产阶级甘心他们的死亡。刚才江青同志、周恩来同志也说过，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中国夺权斗争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全国解放起，是军事接管，人民解放军夺权。现在是另一个阶段，是革命群众接管，工人阶级接管。因为只有军事接管还没有完全解决无产阶级夺权问题，也不可能彻底解决无产阶级夺权问题。因为那个时候，解放战争刚取得胜利，民族资产阶级都留下来了，还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我们接管的机关还保留了许多旧人员，旧的知识分子，他们还是在起作用，想和平演变，想把无产阶级政权倒退，变成资产阶级、封建地主的政权。如果他们的这个企图实现，中国就有亡国的可能。毛主席在进城以前就警告了我们，许多人可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考验。你们看王光美是不是个糖衣炮弹呀？(大家答：是！打倒王光美！)(江青插话：王光美在桃园的经验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假的。她在桃园涂脂抹粉、挂项链，这是给我们无产阶级丢脸。)有些同志就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考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他们还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十七年来，除了旧人员继续起作用外，有些人蜕化变质了。有些机关、有些单位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手中。毛主席在六二年给我们敲起了警钟，提出了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正如十中全会公报所说过的，这是总结了我们自己国家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总结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的教训，还有东欧、东方的一些国家的教训。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比较完整的经验，现在任命一个人、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任何一个领导人都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让群众辨别他是无产阶级代表人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统治的地方，我们统统要夺过来。所有资产阶级垄断的权力，无产阶级要统统夺过来。主要是政权，当然还有什么财权等等。我们在十七年中，已经锻炼出一批很有能力的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可以甩开那些不能够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人，这跟进城时不一样。那时我们把有些机构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现在凡是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都要斗垮

^①另本作“中国工农夺权军”。

它。所以说，夺权，就是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我们夺过一次了，还没有夺全，没有夺好。有的已经和平演变了。所以现在还要有个群众夺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里，我们识别了这个问题，群众识别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给我们总结了这个问题，毛主席给我们指出了斗争的正确方向。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给我们指点出来。开始是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放了第一炮，在学校、文化界开始了夺权。毛主席发现了这张大字报，并且要马上广播，这样就掀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这是全国无产阶级夺权的思想准备、舆论准备。但不会停留在这上面，运动继续前进。上海工人同其他革命团体一起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毛主席看到了，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写的。这样就从学校的夺权问题发展到工矿企业一系列的夺权问题。有很多单位夺权夺得很好。从一个单位出发，引起了全市的高潮，上海就是这样。现在北京也在工业方面开始了夺权的高潮，是这样吧？（答：是！）当然，别的系统，旁的地方也出现这样的无产阶级夺权的高潮。要记住，我们是同资产阶级夺权，是解放后夺权的继续，有毛主席的领导，群众这么多经验，我们夺权就一定会夺得很好。这是全世界当前的一件大事，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件大事。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但十月革命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经验还是很不完全的，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列宁死得早。斯大林也没有搞，后来又碰到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毛主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阶级要夺取政权，一个反动阶级要搞反动政变，都要做舆论准备。苏联十月革命后，没有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大肆吹捧俄国过去的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象彼得大帝、苏沃洛夫，大肆吹捧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大肆吹捧美国的东西，这样使许多群众迷惑了。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就搞了反革命政变。为什么那么容易搞？就是因为有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许多人脑子里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修正主义的侵蚀，修正主义就容易腐蚀他了。赫鲁晓夫大吹列宁，那是一个幌子，实际上是篡改了列宁主义的灵魂。所以林彪同志说，苏联在列宁死后，没有普遍宣传列宁主义，这使俄国吃了大亏。我们现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就使我国群众有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可以击退各种思想的侵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证实了这一点。大家要继续夺权，哪些权不在我们手里，就要夺过来。庆祝胜利吧！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421. 徐向前关于海军问题的讲话 (1967年1月18日17时45分)

当前全军文化革命形势很好，要继续更深入地发动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海军问题：

海军政委苏振华是要坚决贯彻刘邓路线的，他是邓小平在海军部队里的一个钉子，这种人不能保，他不是肃清罗瑞卿在部队里的影响，而是把李作鹏、王洪坤、张秀川置于死地，林副主席给海军的信不知怎的落在刘邓手里，并经修改发给海军。苏振华是要斗倒、斗臭、斗垮的，海军文革是要改组的，萧劲光为组长，王洪坤为副组长，李作鹏为主务秘书长，海军文革的成员由他们三人提名，只准打毛主席的红旗，不准打白旗灰旗。苏是贺龙政变的主要人物，贺政委的班子已经配好了，苏当军委的秘书长，许光达当总参谋长，罗斌根子在苏振华，罗斌的大字报是苏指示的，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贴，都有指示。罗斌是运动中的政治扒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与彭、罗、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直接参与彭、陆、罗、杨的反动活动，他与总参王尚龙，总政刘志坚、梁必业、史前进，铁道部司令员吕正操，

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装甲兵司令许光达，工程兵司令谭友，成都军区司令王新亭，济南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国家体委荣高棠、李达都有关系。贺龙外甥，北京部队政委廖汉生，两家关系极密切，来往神秘。早在大革命时期廖汉生之父就在贺龙手下做事，贺是廖舅，但还不亲，贺又将其外甥女嫁于廖(即廖前妻)，从此贺廖犹如父子，廖为了树贺龙旗号，四处奔忙，为贺家树碑立传。**61** 年国际上兴起反华恶浪，国内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廖在歌剧“洪湖赤卫队”上演时，写了忆贺英的毒草文章，把一个封建帮会色彩浓厚的大烟鬼捧为一个革命英雄。**62** 年“洪湖赤卫队”在京演出时，廖大请客，并且不知羞耻地在舞会上亲自演插曲，这还不够，并勒令总政参加，某同志在廖外甥陪同下奔走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写了近十万字的贺英传记，廖还亲自带领某同志朝见其祖宗贺龙，策划出版此臭书。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从不主张祝寿。廖竟敢违抗主席指示，命令部队用高级糕点作成寿礼，勾结贼父贺龙，并无耻地肉麻地吹捧贺龙，把他说成旗手。廖从不看望林副主席，贺每次到北京部队，廖总要亲自迎送。廖并不直接负责部队，为了抓取兵权，在许多部门安插亲信，廖解放战争时期还只是军级干部，解放后晋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北京部队政委。廖每七、八天到贺处密谈一次，前某军长唐金荣是道德败坏的大流氓，其丑事被揭发后，廖急忙向贺请示，在贺授意下，不但没受应有处分，反被升为武汉军区副司令。

422. 周恩来接见安徽革命造反派的重要讲话 (1967年1月19日 北京体育馆)

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战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主要接见的是安徽革命造反派的工人、学生、文艺界到北京来解决问题的。一起来的还有中共中央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在场的除了安徽来的，还邀请了其他几个单位，有全国妇联来京的几百位妇女。工作是李富春管的，所以就请他来了，还有其他单位一一列举了。

首先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问你们好！

你们来京是带着问题来的，我们只能从原则上告诉你们注意什么问题。安徽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教员、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你们是控诉安徽省委以李葆华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你们的压力，你们的控诉我们支持你们！(鼓掌)

你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北京解决，要回到安徽、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去解决，即回到安徽本地去彻底批判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那里把他们批透、批垮！(掌声)所以斗争锋芒要指向省委，打回老家去，就地彻底闹革命。前一些时期，在合肥、蚌埠、芜湖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强调生产，压制革命。现在既反对革命又破坏生产，并把革命的锋芒推向上面，把矛盾上交，他要走开，办法是经济主义。安徽的材料和全国一样。

关于合同工、临时工的问题。当然是有很多不合理的制度，在运动后期必须改革。临时工、合同工进行革命串连，不能扣发工资，不能调动工作，更不能撤销工作。回厂不能歧视，不能虐待家属。去年十二月九日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草案)已定了的，但这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右倾顽固分子，故意闹经济主义，把临时工、合同工不经分析，现在一律转正，把合同工已经离开工作岗位的一律复员，把六一、六二、六三年下放到农村的也恢复工作，补发工资，这样就超过了国家计划。这些用经济、个人利益来收买欺骗工人，这是有光荣传统的觉悟的工人不允许的。刚才我和一个工人谈话，那个地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增加工资发了几十万元给工人，觉悟了的工人把钱退给了银行，他们做得好！做得对！(鼓掌)所以这种行为必须揭，这种经济主义破坏文化大革命，这种经济主义侵蚀工人，是修正主义，是无产阶级不许可的，把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一起挖掉。但是总有一定影响，这事在

上海、东北、广州各地都发现，财政支出都增加了。所以中央下令，一切银行从中央到地方完全要军事保护，按计划开支，无论哪级党委，哪个工矿企业都无权开支。现在不仅工资、奖金多开支，还把矛盾上交中央，车票就多，几十、几百、几千来北京，很多地方接待都发生困难。他们不象红卫兵，毛主席、林副主席接见完就走了，他们住在北京不走，人越来越多，接待拥挤得很，接待的机关也要搞革命，会影响他们。

文艺界刚从本省领了补贴、粮票，到了文化部，每人每天又给七角钱补助费，开支大，不利市场稳定。出现了抢购，有些高价布和冬季物资现在就卖光了。公园挤得很，他们不是来闹革命的，来交流经验的，是来逛公园、溜大街的。红卫兵把高价商品、游览场所封了，这些红卫兵小将做得对！（鼓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不是来抓革命，促生产的，也不是来交流经验的，是来闲逛，妨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希望各方面来京同志回去告诉本地的工友、同学们。我们运动正向工厂、农村发展，在生产岗位上的同志要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不能抽空到别的地方闲逛，应更好好工作。自己在本单位要把工作搞好，……才能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领导下锻炼自己，不要把矛盾上交，就地闹革命，妇女同志们回去宣传这些道理。

还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并要按系统单位组织起来，比如学生以学校为单位，如蚌埠商学院以商学院为单位，合肥农学院以农学院为单位，再联合全市、全省的各个革命组织在共同目标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工厂也是这样，按所在厂矿为单位，无产阶级造反派联合，服务行业如此，职员如此，农村以公社为单位……。

至今还没有批准任何全国性组织，我们现在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组织，基础要打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打思想基础，现在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必须把基础打好。同时全国组织一律没有承认，我正式宣布，全国复、转、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我们没有承认，毛主席、林副主席没有批准。因为这些复转军人绝大部分是好的，从军事岗位上转到行政，党政，工厂，学校，服务行业，公社，在那里工作就成了那里成员，不需要把全国复转军人组成一个组织。这样搞，各单位成员出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不符合复转军人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国家一旦有事，听从号召，在各地登记。在上海的，在上海登记；在合肥的，在合肥登记；全国有军委、有武装部、有政府管，最多各市有个联络处，在本市统计，防止社会上一小撮坏人利用这些组织糟蹋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应参加本单位的组织内。我也是复员军人，工作不做，到全国串连，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许可的。

六五年毕业生没转正也想组织全国性的组织，也不适合，要按需要和不需要使他们转正，工作不需要，可以离开工作岗位回到母校参加文化革命，就回到母校，这部分可不转正，要区别对待，不要笼统更不要成立全国性组织。六四年也要组织，那我们也是过去的毕业生，都组织起来还得了。“同年”组织起来的，这是封建主义办法、资本主义办法，所以要按行业来组织。革命造反派要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一个市可联合，工人与工人、学生与学生，成为一个市的联合，如上海一月五日十一个革命组织发出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三十二个革命组织的十条紧急通告，这是革命造反派开始夺权，正在全国兴起，掀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

最近发现两个反动组织，一个是全国工农兵红色夺权总部，它要夺谁的权？夺无产阶级的权。他们不是工人、农民、学生，只笼统的到处骗人，霸占了化工部，在地下室搞秘密活动，抢了化工部秘密文件、国防尖端资料，被化工部的革命群众发现，揪了出来，把两个头头抓了起来。问他们，他们莫名其妙，连年龄都说不对，说年龄二十九岁了，解放前参军。解放十七年，那他十二岁就参军了吗？另一组织是“全国工农红旗军”，此组织在东北哈尔滨有，湖南有。最近杭州有（人）说这个组织是毛主席批准的，根本是造谣！这是头子是反动的，逮捕了（刘沙、胡国光）。群众大多数是好的，是受蒙蔽的。他们到处抢房子。抢了一幢中医研究院房子，在那里发号施令。我们逮捕时他们说：“你们镇压群众运动”，把解放军缴

了械。当我们宣布红旗军是反动的组织时，群众就把枪还给了解放军。他们到处破坏，这是一些对社会不满的反革命分子，我们革命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要划清界限。搞全国性组织，他们很容易混进去。

北京有“西纠”，其他还有。思想变坏的打人、杀人，逮捕了一些头子。最近这些人受人欺骗，组织了“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些人实际上乱串，下半夜活动，骑摩托车、自行车喊反动口号，也要把反动头子逮捕起来。在陕西省有个“红色恐怖队”，是一个思想走邪路，相信反动血统论，老子好，儿子就好，这是错误的自来红。陈伯达同志讲过，这种错误的思想，产生错误的行动，形成武斗、打人、杀人，必须把反动头子抓起来，教育自己，才能把群众争取过来，这是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是绝对少数，洪流正奔向前方。

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必须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手中。夺权形式多种，因事制宜，实事求是。革命造反派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要千篇一律，原则方向一致，做时实事求是。

革命造反派是多数，不能说在座的没有保守派，对保守派也要讲几句话，你们在运动中，受了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蒙蔽和欺骗，受旧习惯旧框框束缚，犯了一定错误。只要你们愿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受毛主席思想，跟党走，按“十六条”、按两个十条办事，你们还能和革命造反派一起，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这需要基本认识错误。你们要整风。革命造反派不要认为方向走对了，就骄傲、关门，要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艰巨的，需要反复斗争，才能进行到底。所以不能说，说的话，做的事，写的文章没有错，我们的工作也不能说没有错，有时候跟毛主席跟的不紧，就得跟上去，群众说得对就改正。把保守派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只有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才有力量，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有力量，工作才能做得更好。

最后说清楚，我只讲了原则问题，具体问题，回到老家去，根据情况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高呼几个口号(口号从略)

423. 康生谈两条路线斗争及其他 (1967年1月19日)

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集中地、更加尖锐地暴露出来罢了。其实，它是长期就存在着的东西。

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它的本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从全国解放，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个问题就立刻地、明显地、尖锐地表现出来。我们国家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布成立的。就在那一年五月间，刘少奇就有那样一个报告，也就是他从天津视察工作回到北京所作的那个报告(这是我后来从一个文件上看到的，那时我们还在山西)。这个报告概括地说就是两句话：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工人阶级不被资本家剥削反而很痛苦了，被资本家剥削反而很舒服。结论是什么呢？五三年刘少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所得的结论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实质上是说，中国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得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种理论不是什么新的，而是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共同的东西。从考茨基、苏汉诺夫、到托洛茨基、布哈林……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共同点和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达，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农村还落后分散，处在这样条件的国家，在解放后就不能立刻走到社会主义道路而应该是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再走。这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共同的东西，即生产力论。

可能你们的图书馆里有那么一本内部参考书，即一九三〇年考茨基写的《陷入绝境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他明显地吹嘘：十月革命应该是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当时不能

实行社会主义。他还狂妄地说：列宁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如果列宁是对的，那他多年以来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就要全部垮台。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是一九三〇年才有的，而是在十月革命成功不久，俄国就有了许多这样的理论。当时，孟什维克有个经济学家苏汉诺夫著了一部书《革命扎论》。在这本书里，苏汉诺夫讲：俄国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厂发展水平很低，农村中的农民没有文化，很落后，所以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后来布尔什维克内部的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也是这种理论，布哈林就提出过：“发财吧”！

对于这种反动的理论，列宁都给以坚强有力的驳斥。列宁在1923年所写的《论俄国革命》这篇很短的文章里，就驳斥了这个观点。他说：我国工人数量比其总人口是少的，但他可以与农民相联合；俄国的农民是赞成实行社会主义的。虽然生产力不如欧洲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从什么书上见过有这样的理论说不能这样做；工人和农民的相联合，为什么就不能先革命，再发展生产力呢？列宁还引用拿破仑的话：先投入战斗，然后见分晓；先把干部培养好，再去建设社会主义。那么，为什么不能在革命中培养干部呢？

邓子恢在一九五五年不是说过，合作社成立那么多，会计就不够用的了吗？所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读考茨基、苏汉诺夫的书，但是阶级的本能，修正主义的思想是没有分界的。拿我国的具体情况讲，我国的工业比俄国的更落后了，农村也更落后，更没有文化。所以，有人就讲：“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中国工人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因此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基本东西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不只是在建国初期到现在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后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还会这个问题。从农村合作化来说，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很难设想富农经济包围。如果有那样的社会主义，也是假的。波兰有90%的农村是个体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它在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而实质则是资本主义的。哪有农村是资本主义而城市是孤岛的社会主义？！毛主席在解放后不久就立刻赞成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当时刘少奇是反对的，他认为没有拖拉机、电气化就不能实现合作化，如果要实现的话，那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冒进的。那时候陕西老区要人搞合作社，刘少奇就提反对。我前面引用的话就是他（刘少奇）的批语。——而毛主席就特别支持组织合作社。人民不是沿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道路前进，而是沿着毛主席指出的革命道路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于是合作社风起云涌、有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了。这样就吓坏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要动手砍掉。毛主席当时就批评了这些人是小脚女人，不相信群众。《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讲了这个问题，历史的前进是这些人无法抗拒的。低级社向着高级社发展，同样遭到这些人的反对。当着高级社转为人民公社时，这一下可不得了，彭德怀、黄克诚从军队里跳出来，加以反对。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经过庐山会议把这些人的反对打下去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当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背信弃义，我国又连续遇到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单干风就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来了。刘少奇、邓小平又要起了那一套，特别是邓小平说过：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单干也好嘛！竭力鼓吹单干。这些人就象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一样并没有开过会，但单干风翻案风却搞得很厉害。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毛主席说形势大好，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彻底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人民公社不断地发展，巩固和壮大。

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在解放初期进行的这种斗争，主要是围绕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具体地也就是三大改造，改造所有制。所以这场斗争突出地表现在经济范畴。这不是说没有政治范畴，有肃反，有抗美援朝运动。也不是说没有思想范畴，有对《武训传》、《清宫秘史》、《红楼梦》……的批判。但是重点是经济范畴。这场斗争的结束基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到了五七年，这种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政治范畴，这就是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提出“轮流坐庄”的反动口号。但并不是没有经济范畴，如围绕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就有斗争。

从六二年起，思想范畴就更加突显起来，开始是吴晗的《海瑞罢官》、孟超的《李慧娘》，随后就是周扬、习仲勋搞的《刘志丹》小说，还有薄一波等要搞的他们坐牢的小说(未发表)，阶级斗争深入到了灵魂。这里边也有经济斗争相配合着，与单干风结合在一起。六四年有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和刘少奇的形“左”实“右”。最后通过对彭、罗、陆、杨的斗争，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为什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消除一切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进行文化思想范畴的阶级斗争，是因为资产阶级懂得要推翻一个政权，就要首先从思想上做好舆论准备。《海瑞罢官》以至《刘志丹》小说，都是为制造舆论准备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所以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邓反动路线更加暴露无遗了。

十七年的历史，就是在政治、经济、思想范畴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为主的历史。它的本质就是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从前有，现在有，今后还会有。六三年的《二十三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建议》就讲清楚了这个问题。它遇到了抗拒。象谭启龙这样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决不是偶然的。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诬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天天写文章，作报告，好象不写文章骂我们，它睡不着觉，修正主义吓的睡不着觉。有两种睡不着觉，我们是忙得睡不着觉，修正主义是吓的睡不着觉。他们的文章，反过来，复过去，无非是那么几句话。我们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们说不是无产阶级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我们说是文化大革命，他们说这不是革命，是破坏文化。

修正主义者已经堕落到连群众革命运动的常识也不懂得了。革命运动总是先从学生、知识分子开始，然后发展到工厂和农村。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都是这样。那是在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现在不同了，今天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革命运动的规律是相同的。这次运动从学校到了社会、机关，然后到了工厂、农村和军队。

不晓得你们青岛的干部对于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工厂有没有抵触。我知道有些干部是很接触的。他们有一种理论是：工厂不同于学校。这句话抽象地讲没有毛病，当然工厂不同于学校啦！学校可以停课，工厂不能停工，否认它是不对的。第二种理论是说：工厂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工厂是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生产任务，质量也高，品种也好！当然这些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得来的，这个不可能否认！但不是说，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有一种理论是，工厂总是无产阶级大本营，工人阶级与学生不同。还说：工厂的干部天天是搞生产，还有的参加劳动，与大学教授和搞意识形态不同。于是怀疑工厂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有一次开会，我就讲了这个问题，同志们想一想：一个是工厂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二是工厂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三是社会主义的工厂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四是社会主义的工厂能不能变为修正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工厂。如果没有，就不需要搞了，如果有，工厂的文化大革命就某种程度上比学校的更为重要，它不仅接触上层建筑，而且还接触到经济基础的问题。

社会主义阶段有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上有、工厂里就没有了吗？工厂有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学校里还很厉害，他掌握人权、财权。学校顶多是留级，开除。工厂有人权，一开除就不得了，就要失业；要不就不给你提级，比学校抵制的还厉害。刘少奇搞工厂，虽然有些理论上没有讲，但实质上是以利润为原则的，是利别尔曼的那一套。这样工厂里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很明显很清楚的了。工厂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干部懂得农村是小生产，可以产生资本主义。工厂搞大生产，社会主义的工厂能否产生资本主义，很多干部就没有想过。什么叫社会主义工厂？第一要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生产资料完全改变了，是公有制，与过去不同了。因而工人的劳动性质变了。过去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现在是为社会，为国家而劳动。因此，它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工厂。第二，为什么社会主义工厂还

会产生资本主义？按列宁讲：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不是从天生掉下来的。它存在资产阶级的法权，还有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痕迹。具体说，生产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分配却是以商品等价交换为原则的，是按劳付酬的。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的法权残余。按劳付酬，现在还不能取消。相反地，还要保护这个方针，因为它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按劳付酬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所以工厂里一方面生产是社会主义的，另一方面报酬却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里讲，这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按劳付酬其实是不公平的。一个没有结婚的青年小伙子，每月 60 元，他一人就是 60 元，和一个有几个孩子的老人比较起来，就很不一样。另外还有等级差别，这就不可能不产生资产阶级思想，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在农村是富农经济，在工厂是厂长、经理等高薪阶层，在文艺界有肖洛霍夫……这样上层建筑就不知不觉地“和平演变”了。就由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刘少奇提出的新工厂要用合同工，主要是利润原则，刘少奇说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能走向共产主义。这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毛主席提出的半工半读与刘少奇有着根本不同。了解这些情况，才能懂得工厂为什么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

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会使革命进行的更加深入，更加彻底。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走到这样一个新阶段：全国的全面性的斗争。只有在全国全面地深入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

工厂里还有个思想，就是去年工交会议上，邓小平做过这样的报告，把革命同生产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说生产第一，政治第二。这个相当普遍，有的人说：我又革命，又生产，两者都重，一半一半。最近报纸上摘录了毛主席有关反对经济主义的论述。林彪同志在军队问题上也讲过要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实际上，这也是老问题，你们去翻翻看。他们现在要夺权，忙得很，但是革命不要使自己成为不读书的人，也要翻翻看。《列宁全集》的三十一(三十二)卷的《再论工会》里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经济同政治比较起来说，政治是第一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布哈林说：也从政治出发，也从经济出发。这是典型的折中主义。如果不以政治为第一，就会使苏维埃制度灭亡。

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党的建设，还是军队建设，经济建设，都全面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党的建设首先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首先从组织解决问题，而是政治第一，政治是灵魂。红与专的关系问题，组织解决军队问题，都是政治第一。甚至在科学方面也是这样。同志们想一想，为什么我国原子弹爆炸发展的这样快，资产阶级不懂得这一点。他们说，科学就像上楼，就像上楼一样，“共产党不要楼梯，一下子跳上去了！”他们觉得不好理解。但是，我们说，我们的跃进，那是因为有毛泽东思想挂帅，他们是不可能懂得这一点的。在工厂里，人的思想革命化了，精神变为物质。64 年底，我到天津去，顺便问了一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因为 57 年我去天津，到几个工厂开了座谈会，谈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哲学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直接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件大事。杨献珍在党校时反我，说我提倡工人学哲学。我说，反我吧，那还不是我提出来的，我还没有那大本事呢，其实是工人自己提的。所以 64 年底，我到天津，又问起这件事，总觉得工人阶级掌握毛泽东思想是件大事。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掌握毛泽东思想才是防止修正主义的重大措施。我读了一篇黑板报稿，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总要占点时间，从这个意义讲，学习和生产的关系是减法。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以后，人的思想变化了，××变化了，生产变化了，在这个意义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又是乘法。文章写得好，写得生动，很辩证。我说这样的文章，我们在房子里是写不出的。我又问过近郊农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人，他们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很容易理解。我就想到大学里学哲学，越学越糊涂，而普通工人农民很容易懂这个问题。

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人的思想变了，生产增加了，所以毛主席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革命不会破坏生产，相反地，革命会促进生产。这个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会大大发展马克思主义。最近中央文革不仅要读主席语录，还要读一些毛主席一些著作，如《古田会议》、《反对自由主义》、《青年运动的方向》、整风的两个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等等。这个问题很重要，左派力量大了，左派本身就要触及到灵魂，有没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是大公无私，还是小公有私？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也造我们头脑中四旧的反。林总说：“既要做为革命的动力，又要做为革命的对象。”最近林总又指示：一个是革命性，一个是科学性，一个是组织纪律性。革命是火车头，要有革命的首创精神。你们就要有这种精神，不是要接管吗？但又要有科学性，必须调查研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掌握毛泽东思想。又要组织纪律性。你们要好好注意，我经常这样想，我们文革小组在毛主席没回北京前，刘邓等使文革小组受压抑，我觉得很放心，因为受压抑的时候总要慎重，也不会翘尾巴。毛主席回来了，把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打，文革小组的威信起来啦，解除了压力，我很担心，怕文革犯错误，因为这时就容易骄傲、粗暴，仓促处理问题。左派也是这样，压抑解除后，要特别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有时候我们忙的不能坐下把问题多思考一下，所以不容易放眼世界。现在运动到了左派要团结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

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有的干部问：“十六条指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这个省也不好，那个省也不好，那么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合不合十六条？你们犯了错误啦。”保字号常常拿这个反对造反派，甚至有些老干部也有这个想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但是不晓得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意义上讲是：“整干”运动，每个干部都要整整，倒不是说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说要触及灵魂吗？触及你的灵魂就不行吗？你没有灵魂？你那么干净？北京红卫兵说：“我们不是要把你们打成右派，而是想把你打成左派。”有的人就不懂这一点。

现在又有新问题，来了个夺权，又有问题了。实质上像毛主席说的，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是用解放军打江山的办法，解放那个地方，接管了，不是通过群众暴动，从底下起来接管的。军队占领，军队接管，包括许多留用人员，当时是需要这样的。现在革命深入一步，又要自下而上，以群众运动接管，革命就更加深入，接管的道理就在这里。接管有各种方式方法，有的完全接管，因为那些家伙全是黑帮。（我们插话说：青岛市委是不是全部接管？）那要看你们的具体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还有个王效禹。第二个是革命造反派接管文化大革命领导权，但对于某些人还要撤职留用，因为还有些具体事情，我们不熟，今天一个条子，明天一个条子，闹得你头昏眼花，不能抓文化大革命了。第三种轻一点的可以停职留用。第四种更轻一点的可以监督使用，你听我的。这里有的全部接管，有的撤职留用，有的停职留用，有的监督使用，这要看具体人、具体时间，还要看自己的力量怎么样？可能还有反复，接了又下台。你们要看具体的情况，青岛有个好条件，经过几次反复，还有个王效禹。谭启龙让王效禹任市长，可能是想拴住他，搞不好，再把他轰下去。所以要有革命性，又要科学性，要注意不要陷入被动状态。具体问题你们来研究。革命不是绣花，但革命又是艺术，是有政策的，它也不是简单化地一冲就完了。……

424. 李富春在团中央革命造反团夺权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19日）

同志们，青年团机关造反联合总部的同志们：

我代表党中央，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鼓掌，呼口号）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特点就是：第一，群众运动更加深入，左派更加壮大起来了；第二，就是在左派联合起来以后，向最顽固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进行接管，进行监督。这就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特点。那么青年团各机关的革命造反派，青年团中央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同志们，在这样一个时机同样起来造反，起来夺权，这是符合当前形势的，符合当前的潮流的，因此我表示特别的支持。但是，当着团中央各机关造反派起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坚决地站在造反派方面，完成地支持他们，所以我今天到会就是来向造反派道歉的。

所谓夺权是夺什么权？就是夺领导权。我们要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本机关运动的领导权，夺军事、业务、政治的领导权，夺行政管理权，夺财务管理权。我希望团中央各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要牢牢地控制领导权，在革命左派的领导下，要把日常工作的领导权抓起，同时监督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干部，继续考查他们，继续看他们。这就是夺权问题。因此今后我就直接与团中央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接头。我们已经把团中央书记处砸烂了，不要了！至于参加《红旗》组织的一些干部与同志，希望你们继续检查自己的思想，不要使自己的思想老是落后于形势，老是落后于群众，真正站起来，同造反派一起搞革命。

团中央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造反派接管以后，这只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一，就是彻底批判团中央各机关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执行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系统地研究些问题，系统地收集些材料，系统地揭发些材料，把这些问题揭深、揭透。把这些问题搞出来，搞清楚，让党中央和毛主席来考虑团中央的改造问题。第二，就是团中央的日常业务，行政工作，财政工作，对外联络工作，还有各级团委的请示，解答问题，这些都由你们来做。第三，就是接待工作，你们一方面把接待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还要对在团中央住的外地同志们多做些政治工作，让他们及早地回去，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今天我代表党中央在团中央礼堂，在团中央同志们面前，接受同志们的要求，支持革命的造反派造反！

425. 王力在接见上海工人同志时谈夺权

（1967年1月20日 北京工人俱乐部）

要你们久等了，很对不起，向你们致歉！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同志们很快就要到战斗的岗位上去了，上海的工人向全国人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你们上海工人同志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重视工人阶级的经验。毛主席把上海工人阶级经验总结了，提高了，归结到一点上就是夺权。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联合广大的革命群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向他们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一个新阶段的中心的战斗任务。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战斗的岗位上去，抓住这个中心任务夺权！我们只要把权掌握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里，我们就能决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就能决定一切。

有很多工人同志，还有其他方面到北京来的同志们，说到北京来告状，有的是来告状的，有的是来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有个工厂里要求罢官，把一个什么人罢官，到北京来，有的要求平反，到北京来，什么黑材料他不交到北京来。

同志们，这样一些问题，都用不着到北京来，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掌了权，就可以处理，自己来决定。选谁不选谁，应当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不称职的要不要让他们当官，本来就应当由工人自己来决定，应该随时撤换。如果权掌握在我们

无产阶级手里，那么我们那些被他们打成“反革命”的同志们，他们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如果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那么我们就翻了身了，我们就叫他们，叫那些资产阶级分子，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们就叫他老老实实了。我们不夺权，我们不掌握这权，如果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权，那么今天迫于形势给我们平了反，将来他们还要翻过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中心的东西，这就是权！我们有权，什么黑材料、白材料，都归我们自己来处理了。如果我们不能掌握这个权，如果我们掌握的权不牢靠，将来还会让他们翻过去，将来还会让他们整理我们的黑材料。所以一切的一切，中心的中心，就是夺权！

欢送同志们，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把革命的命运、生产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祝同志们一路顺利！

426. 陈伯达、江青电话转告北航“红旗”的重要指示 (1967年1月20日)

起草一个决定，不必开誓师大会，考虑准备北京市工农兵革命师生代表会，组织市人民政府，不一定用市长这一形式，标语和传单暂不印，转告其他组织。

工农兵都要派代表参加，那一些可以接管，用什么形式，应经代表会研究。立即放吴德同志回去，监督其工作。代表会马上准备，工农兵代表会不能交给这一派，也不能交给那一派。北京学生多，比例可以多一点，可搞主任轮流主持会议。接管问题在会上充分讨论。

伯达同志传达主席一句话：

凡是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最后都是搞不成的。把这个精神转告其他组织。

一月二十日 北航“红旗”传达

427. 王力谈北京学生运动(摘要) (1967年1月20日晚)

一月二十日下午，北邮东方红、清华井冈山等单位部分同学要冲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求把××××千周频率改为红卫兵广播站。为此，王力同志晚上找他们谈话，摘要如下：

……同学们今天采取的这个办法，不是一个适当的办法(指要冲人民广播电台)。同志们要求把电台办成革命电台，要求××频率开放，但不能冲进广播电台，用群众接管的办法。

……如果北京各个团体都采取这个办法。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同志们看那将造成什么结果。不能这样作，我建议开一个团结的大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团体都用权占领广播电台，那么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

最后理的办法，还要北京市各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使北京电台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喉舌。

昨天我们中央文革小组和清华井冈山座谈了，谈了话，批评了一些同志。这次毛主席号召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北京的学生运动没有紧紧地跟上主席的指示，同时暴露了北京学生运动中的两个问题：

1. 在有一些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分散主义、小集团主义、个人主义，各自为政，互相不服气，互相排斥。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联合不起来，各人打起一面旗子，打两枪就跑，战线不断延长，就象猴子吃桃子一样，咬一口就跑，追求新奇。已经打响的仗，要把它歼灭。

2. 同工人运动结合不够。有些飘浮，象浮萍草一样，没有要根茎，当然你们有成绩，但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特别是要以工人为主，工人为领导，各个要害部门都要掌握在工人手里，这方面得作艰苦的工作，夺权斗争也有这个问题，夺权首先要作群众的工作，要有大联合，要和工人相结合。今天搞一个告全国人民书，明天又搞一个告全国人民书，没有针对北京，这没有全国意义，不如写一个告北京市人民书。上海针对上海的问题，写了十条，我们要针对北京的问题来写，我们接管后要提出我们的政治纲领。总之，接管斗争是好的，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是关于接管问题要有各造反派的大联合，政治上的大联合，组织上的大联合，不一定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不是今天这个组织接管，明天那个组织接管，要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这个经验需要总结，要通过实践加以总结。

428. 陈伯达的两个重要通知 (1967年1月20日)

一、《解放军报》只能由本单位革命派自己革命，外单位都不得冲，违反就会犯错误。(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三时)

二、《解放军报》社内部革命派，前几天已经闹革命，外单位又去冲，又去闹，这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外单位革命派可以提意见，但要照顾大局，照顾解放军的伟大荣誉，请冲进去的外单位同志再三思考，深思熟虑，我的意见，以退出为好，这也是照顾你们，有问题以后再派代表商量，祝同志们好。我建议你们退出比较妥当，不然报社不好工作，这是好意的建议，请同志们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避免犯错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陈伯达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半)

429. 徐向前给内蒙的五条重要指示 (1967年1月20日)

- 一、不准随便抓人，今后抓人要经过上级批准。
- 二、不准随便抄家。
- 三、不准戴高帽子、黑牌子游街。
- 四、不准占领机关，不准随便封机关和办公室。
- 五、不准否定党的领导。

这五条是今晚徐向前同志讲的，很快要用军委名义下达。他说这五条谁不执行谁负责任。(刘华香副司令员秘书张清晨同志于一月二十一日一时从北京用电话传回来的，司令部办公室胡岩寿同志接的电话，并经过核对。)

430. 周恩来关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四清复查等问题的讲话 (1967年1月21日)

(周总理于1967年1月21日凌晨5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各军兵种机关、院校、科研等三十七个单位的九百余名四清工作队员代表时的重要讲话。这是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

各位同志：

我在十多天以前，曾和到中央文化部担任工作组的同志谈过话。今天到会的同志是参加

四清工作队的，有的在两年前，有的在一年前，有一部分是继续参加了一段文化大革命，但是主要的时间是搞四清工作的。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我们工作队究竟要负什么责任，我们工作队员究竟负什么责任，这是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四清复查问题。

我首先回答的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四清的关系。不错，我们是处于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我们不能把十中全会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现在文化大革命割裂开来。在解放全中国的前夜，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解放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表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指出我们许多同志可能在敌人面前绝不屈服、绝不投降，但是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经过十七年来的和平生活，（当然不是完完全全的和平生活，参加过抗美援朝，还有援越后勤工作；我们国内边界地区还有一些战斗，比如中印边界、福建沿海地区。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十七年是过和平生活的），我们整个社会起了变化，证实了毛主席这个预言。我们有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产生了我们伟大的领袖，组织了我们伟大的军队，建立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伟大的成绩。没有这五个伟大，我们不可能设想今天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波涛壮阔的、亿万人民动员起来的、世界上从没有过的群众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能够进行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归结为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表现了我们这五个伟大。当然，更应该归功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我们。我们的领袖也是中国广大人民革命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是从群众中来，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提炼加工，使它系统化，然后又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发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党，指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取得了全中国解放的胜利，同时进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既然如此，现在为什么还要进行新阶段的革命？我们说，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不满足十七年的成绩。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打下了基础，表现了我们自力更生的特点。就拿一件事情来说，我们的原子弹的试验，仅仅两年的时间，进行了五次的试验。每一次都有加级，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没有达到过的这么高的水平，所有核武器国家没有这个速度。难道我们可以满足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因为毛泽东思想本身是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既要阶段革命，又要不断革命的这样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应该继续向前，否则，我们就会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样，刘宁创造、斯大林曾经在一个时期继承，到后期停止了。事物的发展，不进则退，所以产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凡是如此，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革命，就产生更大的波折。不仅苏联如此，东欧也是如此，亚洲东方也有这样的国家。我们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正面经验，我们现在也学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反面经验。所以我们要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这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和林副主席辅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人人要在这场最大的风浪中考验、磨练，看能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社会主义革命还在途中，还没有达到完成的地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还没有结束。从思想上来说，林副主席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得多，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占领得多？人的思想具有两重性，非此即彼，有的时候两种思想都在头脑里，如果不进行尖锐的斗争，那就会和平共处，结果就是阶级调和，就会堕落到资产阶级泥坑里去，所以这是伟大的革命，是思想革命。具体的说，就是一种夺权斗争，首先是思想革命，就是每个人头脑里要进行思想斗争，所以要破资产阶级的四旧，要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由于这个初步的基础（此处未听清），我们就要把各级领导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夺过来。在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之前，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的，毛主席早就有战略部署。毛主席早在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指出当前形势有利于我们进行阶级斗争。所以，六三年提出

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六五年又提出了二十三条，就是《纪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纲领性文件。同时进行了文艺改革，即戏剧的改革、舞蹈的改革、音乐的改革等等。当然这些改革是从上而下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一直到发动群众，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的力量，在厂矿中依靠工人中积极分子来进这个斗争，有领导地分批分期的发动运动，这个基础打下来了。正是因为这样的行动，惊动了反党集团，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伸出黑手来，一个一个地被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揪出来了。罗瑞卿是林副主席亲自揪出来的，彭真是毛主席亲自揪出来的，杨尚昆发现得更早，陆定一早就被注意了。彭、罗、陆、杨勾结在一起，成为彭罗反党集团。比第一次高饶反党集团，比第二次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还要影响得深，范围大，时间久。这场伟大的革命已经触动了社会各个方面。首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各级党政机关进行文化大革命，半年多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你们在北京亲自看到了，有一千一百二十万的革命师生、红卫兵和革命教职员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这是从来没有的。有这样的青年，当文化大革命的突击队，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城市走向农村，从北京走向全国，当第一阶段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进行到第二阶段，这就是去年十二月九日我们接着十六条规定以后，又发表了城市、厂矿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十二月十五日又发表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十条(草案)，都是为了进入新阶段。就是要使运动按照它的规律向全国全面地开展。这个时候，不仅是彭罗反党集团的事情了。也不仅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了，各个战线上都会有些阻力，因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甘心他的失败，我们要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把资产阶级的根子挖掉，使资本主义复辟成为【不】可能，要保证我们的国家不变色。他们不甘心失败，不仅如此，他们还要起来进行挑衅，这就是我们现在提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就是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条红色路线来进行反扑，这场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是资产阶级代理人挑起的，我们必须给他反击，给他全面的总攻击，这就引起了全面斗争的新形势。从范围上来说，从彭真的批判走向全国，从城市走向农村，从学校走向各单位，工业的、交通的、财贸的、农林的、文教的、科研的各个方面，机关、街道、里弄都要影响。从内容上说，就会遇到一些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抵抗，那就是要跟他进行夺权斗争。还有一种习惯势力的阻力，主要是领导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维持原来状态，不愿意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把思想革命搞彻底，把斗批改搞彻底。这样就必然会触及到领导人，把革命坚持下来，能够真正地达到斗批改的目的。这样就必须发生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就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广大群众是不能等待的，一旦认识到，就要行动。我们的领导者，从去年六、七月份，发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以来，许多地方，许多单位的领导，到现在还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没有把自己放在群众中间锻炼。不怕引火烧身，你要经得起锻炼，经得起一切考验，真金不怕火烧嘛！经过千锤百炼，没有这个决心，你就会带着不满意的，委屈的，埋怨的抵触情绪。但我们相信，只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真正把语录作为座右铭，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真正地到阶级斗争的现场去考验，就会感觉到无穷的力量，就会感觉到前途无限光明，就会使我们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可能性减少，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减少，使我们子孙后代，能够不断地按照毛主席的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并且会可能使世界革命提早完成。所以我们个人的得失，应该放在一边，个人地位是次要的，极其渺小的，任何错误都是可以改正的，即使受到一些过分的责备，也没什么了不起。只有这样，就会受到人们的尊重。这是我们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彻底革命的心胸。我们解放军会有这个心胸。因为林彪同志讲，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解放军是模范，我们应该具有这样的信心，具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决心。我想，面对九百多位参加过四清又在文化大革命受过锻炼的同志面前说一句，我们首先应有这样的精神，如果不这样，就不能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是不是如此？

你们今天十一位代表说的，有许多事情我都不清楚。我必须从你们那里学习。有许多问

题，我能够直接回答吗？不能。可以说，现在确实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每人每天都遇到许多事情，考验我们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不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离开了这个就没有钥匙，没有真理标准。自己就要天天学习，天天考验，天天改造，具有这样的心胸。共产主义战士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要想到，这是时代的要求，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和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首先应具有这样的立场、观点，有许多问题，我们领导应给你们回答，有些问题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也应该自己负责回答。

首先是社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我开始就讲了，不能割裂开来，有历史的联系。四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先要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下个底子，然后才能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但是究竟这是两件事，应该有个界限。五月十六日发表关于党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批判了彭真的反党汇报提纲。这个发表以后，正式进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这个以前，还属于四清阶段。四清阶段的性质，同样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但是斗争的形式究竟不同。所以我们应该说，四清工作一般的说，是取得了伟大成绩，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机关中，学校中，工厂中，农村中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排除某些地方、个别地区、个别单位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者一般地犯了一些小错误，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此。

第二个问题，就是提到北京的四清的问题。因为北京由彭真、刘仁反党集团统治了十七年，四清是在北京市委领导下进行的。这个四清是不是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呢？我们讲，不能完全这样解释。为什么？因为彭、刘反党集团的揭发，是在去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前夕，也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斗争中揭发的，也就是从上海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时开始，从前年十一月份，到去年五月份，这个半年时间才把彭真反党集团揭露出来。在这以前，他在许多地方，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他的确打着真红旗，红旗还是真的，但是暗里另搞一套，但他是个阴谋家，两面派，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针办，但是他实际上是反对二十三条。彭真的两个报告，是错误的，违反二十三条的，但这不是每个工作队员都清楚的，人人要学习社会主义教育的前十条，二十三条贴在生产队的墙上，这就是标准的文件。绝大多数的工作队和工作队员他们是按毛主席的红线进行四清工作的。这是与全国共同的，但是在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也受到旧北京市委的干扰，的确也做了一些错事，这是北京与别的地区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不能把北京的四清一概说成是在彭真反党集团的领导下全盘都错了的，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既要找到共同点，又要找到区别。反过来，全国也是这样，也不是都没有缺点和错误，也不是都那样忠实地执行二十三条，有的地方一样也有三反分子，他就会把这个公社搞错了。西安就有这个例子，杨尚昆也去过嘛！我们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有现实意义，应该深入，这就是为了正确处理夺权斗争。因为夺权斗争是专门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其他的是一般的监督、考验、察看。深入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推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对于过去四清的审查，不是当务之急，应该要有区别，当然有些严重的问题经过群众的商议，要讨论，审查，这是个别的解决。但是，究竟怎样解决，我们将来请中央考虑这个问题，作一些规定，解决问题。总之，不能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利用四清的复查，进行新的反扑，也就是你们提出的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搞，首先会使当权派滑过去，把工作队员全部揪回去，甚至把四清中正确的人变成反面的人，把阶级斗争倒过来，这样，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端不利的。这就必须极端慎重研究，不能一提就答应。比如说军队拿出参加四清的××万人都回去复查，那还得，全国四清工作队员有几百万，统统回去，这就是一个新的大调动，新的“大串连”。那我们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连，就又有了新的“串连”。这不是串连，而是大调动。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如果提出这个意见，是另有意图，别有用心的。提出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这样作，那我们就上当了。想一想就会清楚的，如果这样作，会犯错误的。并且对四清工作中有些态度上不好，有些批评上方式不对，拿现

在大民主来要求，就不对了。时代不同，认识不同。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前进，运动推动我们前进，我们怎样拿现在的要求来审查四清中的问题，如果这样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了。当然一些搞错了的地方，由那里的当权派、上级党委和工作队长结合起来解决，而不是把工作队员揪回去。如果普遍地把工作队员揪回去，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要作工作，我们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反对经济主义，反对把矛盾上交。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进行夺权斗争。四清是前一阶段的事情了，要解决这些问题，今天不可能回答。今天只讲点形势，我们继续研究，继续解决。还是上一次我向大家提议的，在北京全军文革、总政设立一个联络站，各省也设立这么一个分站，用书信来往，不能人员频繁来往。都把矛盾上交中央，这是不可能解决矛盾的，这是扩大矛盾。我们通过军队的渠道，报到中央，用原则用条文来回答，这对大家有利，不仅全军有了方针，在地方上也得到了方针，这是大家首先关心的问题。

其次，至于解放军的地位问题。刚才我已经说了，没有人民的武装，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没有解放军，就不能够解放全中国。当然，解放军所以能够解放全中国，是依靠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武装，是由于我们的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所以成为无敌的力量。有了解放军才能够保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进行这一次几万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解放军保卫的，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没有这个，就不可能进行。我们的军队，不仅是保卫国防，而且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的伟大的政治任务。它跟打仗不同，它是保卫人民的最大自由，有五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另外一方面，又要拿出武装警惕着不仅是国外的敌人，还要防止国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各种阴谋破坏，才能保卫好。要作艰苦的工作，谨慎的工作，因为不是打明仗，有小部分敌人还是要煽风点火，解放军就要起来保卫，处于这样的地位，跟从前一样，要受到人民的尊重；再一方面，要接触人民群众，自己要加强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地位，把自己放在群众中来考验。所以，它的任务很艰巨，在这个上面，我们极端注意我们人民解放军的稳定性，就是不要使他受到干扰和冲击。

有些诽谤者，他就乱造东西。昨天在街上接连出了诽谤我们党内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这样讲，他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最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他怎么能这样讲，不可能嘛！毫无疑问的，是散发传单的人，为了破坏我们解放军的威信，破坏中央文革的威信。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这是阴谋。你们的代表说很难过，我也很难过，我听说你们有些人相信这个传单，我就更难过了。我相信我们的解放军不会不加辨别就相信了的，也许我听错了。我在十一中全会上说过，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是我们的副帅。因为他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的、最久的，把我们解放军培养最好的一位领导同志。另一个陈伯达同志，他把毛泽东思想阐明的最好，用理论的文章来宣传。我向全党推荐这两位同志，这是我们党、我们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我想，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来消除一切诽谤、造谣生事的现象。这就是因为有一些青年人，喜欢新的消息，以讹传讹，但是我们的军队不应该有这个事情。我们的军队应该有强大的稳定性，因为我们军队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思想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基础上，应该表现在坚定不移的信心和决心，当然，解放军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解放军战士不可能没有一些毛病和犯了一些错误，领导人不可能没有坏人的。彭德怀就是解放军嘛！罗瑞卿也是解放军嘛！但是，我们应该有高度的稳定性，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首先我们必须自尊。敌人的破坏就是要给你扰乱，使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能够按毛主席预见来进行，我们不让这些敌人高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他们作解释，现在有必要在政策上有所规定。

我今天要讲四清复查和解放军地位两个问题，着重从形势和政策讲这两个问题。

刚才有两个条子，提到对干部的态度问题。我刚才回答了，人民内部矛盾总是有的，错误总是有的。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有错

误不怕揭发，敢于让青年、人民群众在街道上贴大字报。但是，这有两类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有的人也会混淆两类矛盾。另有两类情况，一种是善意，一种是恶意，对善意的批评表示欢迎，而对恶意的诽谤，我们应该回击。当然回击应该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场合。属于诽谤我们领袖的，现在公安六条规定了，不允许。××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个别错误问题，这完全是军委内部讨论解决的问题，完全是内部问题，领导上还没批准，为什么把他公布于世？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都有些废弛，应该加强。因为，现在军队、院校和文工团同地方一样看待，它就无边无际，不该问的也问，不该外传的也向外传，甚至成立专门的泄密队，在军队是不允许的。现在我们应采取一些措施，让我们来读语录，来结束我的讲话(接着总理领着大家读《毛主席语录》219页——纪律中的一段)。

关于穿军装等几个问题，我们将来作个规定，这也在代表座谈会上说过了。

散会好不好！结束吧！

(最后在周总理指挥下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431. 周恩来谈萧华问题 (1967年1月21日)

周总理于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各军种、兵种九百余名代表，作了重要讲话：

一、重要辟谣

昨日街上流传的所谓“陈伯达同志的讲话”中提到“……实际上把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演变为资产阶级军队”一说是个大谣言，是个大诽谤，我们千万不要上一小撮人的当。

周总理在接见大会上说：

“陈伯达同志没有讲这样的话，也不可能讲这样的话，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对毛主席的思想发挥得最好，我听到了这个话(指传单上提所谓陈伯达的话)感到很难过，你们也很难过，你们有些同志相信了这个话，我就更难过了。这完全是有人造谣、诽谤，昨天大街上就出现了诽谤我们党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的大字报，毫无疑问，这是破坏解放军威信，破坏中央文革的威信，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消灭诽谤。”

二、关于肖华同志问题

周总理说：

“肖华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军委内部的问题。内部问题为什么不能批评呢？为什么要把党内没有公开的问题传到外面去呢？有的人泄露党的秘密和军队秘密，这是绝不允许的。”

432. 周恩来、陈伯达在接见外地来京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2日)

记录者注：大会从四点十分开始，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陪同阿尔巴尼亚外宾到各会场分别接见了到会同志。

陈伯达：

今天召开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请周恩来同志主持。参加今天大会的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卡博同志(分别介绍给到会的同志)。现在请恩来同志讲话。(鼓掌)

周恩来：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

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问你们好！(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鼓掌)

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宣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主要战斗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夺权。(鼓掌)在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掌握着领导权的地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派要联合广大的革命群众，把这些分子掌握的党权、财权都夺回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有革命群众夺了权，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只有革命群众夺了权，才能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才能有力地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倒经济主义。

现在，各地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玩弄的经济主义，有一种恶劣的手法，就是：发钱，发车票，发粮票……，鼓动人们上北京，把矛盾上交，逃避群众对他们的斗争。中央部门的一些人，象陶铸，文化部的肖望东，工会的马纯古等人，他们为了收买人力，破坏本部门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央施加压力，用发钱，发车票，发粮票的办法，鼓动学生、工人、退职的工人、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劳动人民，大批前来北京。当然，来北京的那些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你们反映了许多重要的情况，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推动了运动的发展。有些来京的团体，如果还有问题要向中央反映，也还可以留下少数的代表谈问题。但是，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提高警惕，识破坏人的阴谋。我们应当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抓革命，促生产，打倒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鼓掌)现在是大好的形势，机不可失，赶快回去闹革命！

我们要学习上海的革命群众，从那些资产阶级和他的代表人的手里夺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把生产和国家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鼓掌)

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北京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真正联合起来，夺了权，我们就有力量处理各种问题。上海的工人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接管了许多机关、企业和单位。他们创造了极其重要的经验：第一，必须实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在接管中也必须实行大联合，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对分散主义，各自为政。第二，各单位的接管，必须以本单位的革命组织为主体，外边的群众组织起帮助作用。第三，原来的业务，能够工作的人员都要照常执行任务，革命的群众组织起监督作用。这些经验都是很好的。山西省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各地方的群众，都发挥了首创精神，创造了各种新经验。

同志们，赶快回去，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我们要夺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绝对不允许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绝对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我们要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一个阶级夺另一个阶级的权，而绝不是个人主义的争权夺利，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我们必须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提倡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提倡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不良倾向。

但是，有些单位就不能采取群众夺权的形式，如军队。这些单位当然也是有阶级斗争的，可是由于他们担负的任务不同，如果这些单位有夺权问题，只能在本部门范围内，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进行。群众对这些单位有意见，可以送大字报，但是不要进到里边去搞夺权斗争。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

队，在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中，担负着重大的任务：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他们站到一起，共同战斗。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对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实行镇压。(鼓掌)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回到本地，同那里的广大群众一起，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权。到北京来的还有一批是受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蒙蔽和欺骗的群众。同志们！要对他们进行工作，带领他们一块返回本地。

对于极少数公开和秘密地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对他们进行镇压，把他们押回本地交给专政机关和革命群众处理。(鼓掌)《中国红旗军》、《湖南纠察队》、《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工农兵红色政权保卫军》等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组织。对这些组织的首恶分子必须坚决实行法律制裁。(鼓掌)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揭发这些组织中的首恶分子。(鼓掌)

我们认为，现在各个革命组织建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的条件还不成熟，建立和参加这些机构的人员，应当回到本地去进行斗争。

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新的斗争在等着我们，新的胜利在等着我们。让我们即刻整装出发，奔向斗争的最前线！(鼓掌)让我们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广大的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鼓掌)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

刚才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我们希望同志们响应恩来同志的号召，回到本地闹革命！

记录者注：大会于四时四十五分结束。江青同志领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此歌唱

完后，江青同志问大家：“同志们，唱一个《国际歌》好不好？”大家回答：“好！”随后，

江青同志又领大家唱《国际歌》。最后，陈伯达同志宣布大会结束。

433. 陈伯达与蒯大富通电话记录 (1967年1月22日)

第一次通话时间：1967年1月22日凌晨2时50分

陈伯达同志：我是陈伯达。我和你讲一件事。今天我们收到一份《公告》，是由“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发出的。这个组织内部有你们井冈山兵团，你知道吗？(答：知道！)你们态度怎么样？(答：准备退出。)你们应该出一个反公告。出这份《公告》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反动的，是同中央文革小组作对！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顾问，是中央信任的。(此时由于话听不清楚，即由陈伯达同志口授，关锋同志讲话)怎么样？你们能说服他们吗？(答：

能。)如果不能说服则开除！你们这样干就等于和中央文革小组决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康生同志一直是反对杨献珍，反对林枫的。你们的矛头完全错了！红战团(指中共中央党校红色战斗团)是反动的。不能与它联系。

关锋同志讲：那天谈话(指一月二十日凌晨，康生、王力、关锋接见清华井冈山代表座谈)，是受伯达、江青同志委托的。在你困难时，我们支持你，我们不愿意看到你跌倒，愿意你继续革命。你们不要随便收拢组织，要保持革命派的纯洁性。不然，你们的旗帜就会倒下去的。以上意见我们和你们商量，你们自己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不勉强，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是很肯定的！

第二次通话时间：1967年1月22日凌晨3时35分。

关锋同志：伯达同志要我补充几点。你们学校贴出了一些攻击总理、攻击康生同志的大字报，建议你挺身而出，痛加驳斥！

高级党校的权不能接管！那里的权在左派手里。向高级党校夺权，就是向左派夺权，向无产阶级专政夺权。建议你们撤出，那里的左派是李广文、智纯、武葆华。

你们不要丧失你们的荣誉，要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要懂得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继续，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再说一句，要作阶级分析，不要迷失方向。

声明：此记录只有个别字差错，意思保证无误。 蒜大富

公布人：蒜大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434. 陈伯达给蒯大富写的字条 (1967年1月22日)

深入地研究毛泽东思想，原来的功名得之不易，保持也不易，要珍惜。不要随便接受来历不明的组织(有人在借用你的名义)，不要随便同一些来历不明的组织到处乱冲，有人想拉你们下水。要知道，这些态度不但关系到一个人和一个组织的名誉，你很不注意，有可能跌下去，对革命派都是不利的。革命的考验是严峻的，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调查研究，不要自以为是。没有鲜明的坚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倾向，最终是经不住的。不要毁掉自己。听说清华现在有不少的反动大字报，你们不表示正确的立场，就把自己置于不利的地位。要驳斥。自己树立真正的旗帜，对于这些要批驳、反驳。指出那些是上当或有阴谋，故意扰乱阵线，混乱大是大非。我们是爱护你们的，怕你们被搞臭。你们旗帜要鲜明，不鲜明要被人利用。要利用你们可能的时间，整顿你们的队伍，明确方向，否则打仗是盲目的，方向是错误的。革命派要团结、通气。各个革命派要通气，要交流经验，争论是原则的。无产阶级大联合，不要有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不要个人主义。

435. 中央首长在与首都部分院校师生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1月22日、23日)

地点：人大礼堂

江青：同学们，同志们，现在周总理给我们讲几句。

周恩来：……我们是青年人，革命者要经得起锻炼，错了不要紧。我和你们谈过，谈得

很多嘛！我在党内犯过错误，过去民主人士我都敢和他们讲的，如何犯错误，如何改，现在我也是这样。我们跟毛主席，就是要跟紧。我们现在在大风大浪中，毛主席是有预见的，我们是跟毛主席来学习的。我们要紧做、紧学、紧跟。首先要做，没有斗争实践不能证明对还是错，不能证明你认识是对的，还是错。你做，才能在实际中来学习，才能高度感到毛主席的每句话，每个字，真是如林彪同志讲的，一字值千金，就是这个意思，感到一字千金这句语重心长的话了。紧跟毛主席，有时掉了队，跟不上。有时忙了，不那么冷静了，有些事务拖住了，那就冷静想想，紧做、紧学、紧跟，这是我在这半年多大运动中检验的。怎么能说没错误呢？没有说错的话呢？你比如，我在十一中全会选举后，在中南海国务院门口出了陶铸的大字报，那时我的责任是说明，出了第四号人物，我说不要这样提，错误是有的，但是要相信他。十一中全会刚选举出，你能不相信“陶铸同志”？那个时候还叫“陶铸同志”了，我没有根据嘛！后来逐渐发现一些问题，感到不对头了，越发现越多嘛，一直到了……特别是到了年底，我们内部批评他，主席还谆谆告诫他，他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了，我们看了。今年一月二日，对武汉赴广州同学还盛气凌人，那些话等于不满，我们是批评了他的，他那个牢骚。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不大对头，还没有看到他的(迹弱)，那时我们在三个附中里等着，也想帮助，如果揪他的话，还要出来解释。即从中南海抓出来总不好嘛！他承认了一个错误才解了围。他开始时抗议，后来他就说抗议错误了。对这样的人我们一步一步地认识嘛，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可以谈很多，今天不可能，我是举个例子。……敢于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不是容易的，你们还年轻，这不是摆老资格，我一辈子从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也为党作了很多事，也为党做了很多错事。既然党中央、毛主席相信我了，还让我工作了，但是我觉得做了错事，不好过嘛！跟毛主席跟了四十五年，同志们希望保持晚节嘛！晚节不是消极的保持晚节，要积极保持晚节，争取做一个更好一些的主席学生、战友嘛！这不容易的呀！

陈伯达：

(热烈鼓掌)你们鼓掌得太快太多！看看我的讲话值不值得鼓，我讲话不好，你们不好下场，我也不好下场，刚才恩来、江青同志也讲了，我没有更多话要讲，我讲三点：

第一，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很多人是这样做的，这样很好，可是现在有些人反而闹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这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过去也有现象，现在特别厉害一些，对于这一个问题，要用阶级观点来观察，这是无产阶级作风还是资产阶级作风？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应当说是资产阶级作风而不是无产阶级作风。

第二，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矛头是针对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斗争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可是现在有些人，反而把矛头指向革命派，指向中央文革，指向周总理，指向康生、江青同志，指向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对这种情况难道不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一下吗？看他们这种做法代表哪一阶级的灵魂，是不是资产阶级灵魂在作怪。

第三，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有许多单位从内部夺权，夺得不错，夺得好，可是现在从全国、全市范围来看还是少数。有些小单位到其他单位去夺权，你要夺，我也要夺，不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一些小团体互相夺，看谁先夺到，没有权的又要夺，这样形成内部斗争，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在全市范围内夺权，应当是巴黎公社式的，可以用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形式，进行全面夺权。这样要有一个准备，是不是你们先考虑一下，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店员和街道居民搞这样一个权力机关，那怕是临时的，比现在一团体和一些团体你夺来、我夺去好些。因为有些单位和机构是全市性和全国性的，你们每一个小团体还不能代表一个学校大多数，还要占领全国性单位，那末叫谁去承认呢？这不是谁承认的问题，而是人民承认，

应是人民授权，无产阶级授权去夺权，这样一个小团体夺了全市性、全国性单位、机构，这样就不好解决，这样另一个小团体就硬要夺回去，所以要大联合，要总结一下经验，不同形式机关有不同夺权形式，有的以本机关为主，外面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有的可以搞临时代表会议，有计划的，有组织的，这样比较好，也可能是各团体各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哪一个地方要夺权，提出方案大家讨论，还可以提出一般号召，这样就可以出现很多合理的夺权新形式，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权力，不要因为夺权而发展为小团体主义，所以大联合与夺权分不开，考虑看看总结经验，还有上海、山西经验，北京市经验……。

还是要总结些经验，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无产阶级接管政权有两种形式，两个阶段，进行军事接管，自上而下的命令派人去接管，现在出现群众接管，比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经验丰富一些，我们的经验比较多，接管得应当更好些，现在是一个过渡现象，总结经验，也便于工农兵学商开一个临时协商会议，筹备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工农兵学商代表会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北京开始的，可现在北京许多工作落后了，现在小团体主义闹得成为全国“模范”了。这种现象好不好？（众：不好！）不要在全国学北京这股风。小团体主义夺来夺去，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缺点。总结经验，增长我们的智慧，不要总是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吵闹得很凶，实际上搞武斗。刚才我们感受比较大，看到你们要武斗的样子我们也没有走。你们年纪轻，象你们这样搞就不好，应进步一点，吃一堑长一智，我们还是在胜利地前进，再逐步搞总结。不搞大联合，我们会要走比较曲折的路，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不必要的弯路就不一定要去走，其办法就是总结经验，象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提供的办法，三个月总结。北京市已经八个月了，可以搞一个总结，各战斗组织本身总结，在座的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少数工人），可能在目前斗争中对于你们是弱点，为什么上海好，上海工人组织起来大联合，里面也有一些小团体，工人阶级也会受旧影响，但也比较容易克服。北京工人运动没有上海那么老练，那么强大的无产阶级。现在北京大量工厂是解放后建立的，大量新工人，这一点要向上海学习，向上海工人组织学习，上海工人打了一些近仗、恶仗。捍卫团（指北京的）变化各种花样继续搞，我们赞成知识分子要真正搞夺权斗争，要很好与工人结合，现在比以前好。你们要有所作为，必须这样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将一事无成。今天闹这么厉害，再开下去还是吵，假如没有结合，这样开起会来，还是这样吵架，没有解决问题，象这样开二天会，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这给你们上了一堂课，给我也上了一堂课。教育了我们，究竟自己要怎么样变成无产阶级战士。从这二天会看来，同志们要努把力，大家可以有计划分期分批下厂、下乡，到一个工厂不要人海战术，听说第一机床厂共四千多工人，据说一下子去二千多学生，有的还是小学生，影响了工厂工人革命和生产，所以要有计划，分期分批。过去一机（指北京第一机床厂）不是有捍卫团吗？把工厂大门关起来，不让学生去，有些学生从墙上跳过去，我们向他们提出建议，要鼓掌欢迎学生，可现在一下子去二千多人，所以有的人要转移到其他厂。（王力、戚本禹插话：现在进去，没有大联合，都打自己的旗帜，散兵游勇，学生有的支持工人这一派，有的支持那一派。）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带到工厂去，不要把小团体、小派别这种风气带到工厂，作小学生，到工厂去作为工厂的一部分，善于同工人合作，不能带来不好结果，下厂、下乡要分期分批，过去毛主席就提出不要搞人海战术。一个村庄就用了好多人，甚至和那里群众总数差不多。“二十三条”反对刘少奇的人海战术，北京郊区这么多乡村可以安排，北京街道也可以摸索一些经验，现在从全国各地来北京，还端不出先进经验。要好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是思想革命，刚才好多讲话，好多都是思想革命问题，有些作法也是思想毛病。小团体冲突，反映世界观未改造好。刚才讲的，有些是对，有些是错，有的是大是大非，有的是小是小非。把内部当作敌我，把敌我搞错，这是少数，有些乌七八糟组织，他都可以联合，脱离无产阶级原则很危险，随便招降纳叛，不是无产阶级的原则，一些反动的、来历不明的都进来了，要警惕，有宗派观点作怪，要警惕，什么红旗军，红旗军啊！资产阶级不甘心灭亡，资产阶级、地、富、反、右他们的代理人不愿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要利

用革命同志内部弱点，施加影响，搞分裂。所以要搞好夺权，首先要搞好思想，我们现在是思想革命，从夺权搞起，这是我们革命的特点。每个人都受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还有坏人背后挑拨，这些东西在头脑中反映，我们要革命是痛苦的，把小团体、个人主义革掉是痛苦的，这种痛苦比流血痛苦还要痛，子弹打在身上一下子不知道，而这种思想经常在头脑中斗争，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革命和反革命的两种思想的斗争，看哪一方面胜利，头脑内的冲突是很痛苦的，是不是这样？我看现在是很痛苦的，今天的冲突就表现痛苦，自己又想革命，又有私心，又要大联合，又要小团体，这样不矛盾、不冲突、不痛苦？我们对你们奇怪，有些学校那么多团体，我想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分久必合，在组织内部渣滓清出去，也有这样情况，要排除个人主义、小宗派，排除一切私心杂念才可能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下面再说一点问题，我们曾经招呼过一些同学，不要去犯那些可以不犯的错误。文革小组招呼这个、招呼那个，是不是文革小组自己有问题，请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这里没有宗派，虽然我们团体很小，在北京也就几个，我们立场很清楚，态度很鲜明，没有什么拿原则做交易的事，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怕贴大字报，谁愿意贴就贴，一千张，一万张，更多的也可以。我同个别同学说，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是说我们怕痛，也不是为了对人家恐吓，我们照顾一些人比不照顾好一些，如果个别同学一定要贴，一意孤行，那么试试看吧！我们没有办法，对联动、捍卫团我们就不打招呼，那些不打招呼，对自己同志才这样打招呼，现在个别少数人对有些事自己主观先定调，先立为主，再去找一些莫须有的材料，这并不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说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请同志们用实践和生活来辨别是非，你们之间有些人参加调查康生联络委员会，这就荒唐了。要声明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表现很好的个人与团体，热烈希望大家能继续革命，今后合作下去，他们自己也能合作下去，要作到这一点，就一定要在斗争中改造自己旧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代替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内部问题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去解决，从而提高自己，这是我们的愿望。今天这样的会，你们不要难过，不要灰溜溜的，做一个经验教训，运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如果是同志就要善意批评，批评得对就更有则改之，不对就无则加勉，火气太大，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不好进行。好象打一架就解决问题了，但不能解决，好象这人声音比那人声音大就解决问题了，我在农村调查，经过天津在热闹的街道上，这边那边喇叭两派，这边高，那边更高，吵得一塌糊涂，实在不舒服，对群众影响不好，不要搞这一套，喇叭到处叫，挺反感的，这不但知识分子有，工人也有。几年前在天津一个厂，工会没事干，专门放录音机，放喇叭，那样不一定对，对工人没好处，工人不欢迎，在生产中放那么高音不舒服，影响工作。顺便谈谈你们的斗争方式，不一定抓了一个黑帮就用坐“飞机”斗，这种形式不一定采取，这样听说在北京出现后，当作典型，以后斗争就按照这个模型搞，对彭、罗、陆、杨大家愤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党、篡政、篡军。有的人还不到这种程度，有的人还没有定性，不采取这办法，现在说得差不多了，没准备，比较乱。

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每个人头脑。(口号略)

康生：

一下揍死的时候，就那么完了。现在林枫坐喷气式受伤了，他要死狗，到医院里看了看也有点伤，但他到医院里去了，他们舒舒服服的，好几次斗争会都没有林枫。就是彭、罗、陆、杨也要讲究斗争方式。把他揍的跑到医院里去了，就斗不倒了，材料也带到棺材里去了，还有陆定一去参加“喷气式”，他回去的时候反而感到他们的材料不要交待了，反正坐“飞机”就是了。当然斗争方式各种各样，有时也可以用一下，大家气愤得不得了，让他跪了，他不跪，让他低头不低头，群众气愤的时候，应该。我在那个时候，我也会那样的，但是经

常就不要。有的人，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坐“飞机”也可以，不是不可以，有时候不能完全用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方式，不是有创造性吗？让他们挖得更厉害的方式，安子文这几天没有去坐“飞机”的时候，可是这几天很不舒服，今天审讯他，明天审讯他，后天审讯他，比坐“飞机”还要难过的。……

真正掌握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要掌握毛主席的思想，掌握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掌握着无产阶级的立场。刚才我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会前我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上林彪同志告诉我们说，最最重要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不是第二，更不是第三、第四问题，头等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什么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一切东西它最重要。毛主席前几天和外宾谈话讲过，外宾都是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毛主席对他们说，你看大字报要一分为二，有的是革命的大字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字报，有的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少数的，很少数的大字报。有的是好的真实的大字报，有的是不好的或者是谣言的大字报。为什么？因为有张大字报说罗瑞卿自杀了，邓小平剖腹自杀了，外宾就问我，罗瑞卿是不是死了？我就用主席的话告诉他：一分为二，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这个是假的嘛。

毛主席的新诗词中有二十几首的，有三十几首的，有的人都印出来，印成小本子，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河南有个工厂，他们在毛主席生日的时候，给毛主席献礼的时候，印了一些，对毛主席尊敬和热爱是好的。他们的那个本子，要求我审查一下。我审查了一下，那还是比较完备的本子，那里面真有五首，这五首大都还没有定稿，还要修改，还不能发表，当然有一首是定了稿的，即“托洛茨基返故屋，不战不和意何如？”那首是定了稿的，还没有发表。除此之外，不超过五首，其他绝大部分是假的，其中还有黑帮分子邓拓的东西！同志们这一点千万不要上当。所以凡不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毛主席的著作，千万不要相信。最近谣言很多，对毛主席的文章，对毛主席的第二张大字报，还有毛主席的三条，还是四条，那都是假的。关于这个方面，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陈伯达同志讲，要好好学习，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同时也要真正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这一点我可以告诉同志们经验，在“五卅”运动以前的时候，我加入共产党了，也革命了，自以为知识分子比工人好的，总觉得这样，经过“五卅”运动以后，才慢慢觉悟到，要向工人阶级学习，知识分子不向工人阶级学习是危险的。就是毛主席说的，判断一个知识分子，他是真革命的，还是假革命的，最重要的一条是能不能和工农兵或无产阶级结合。敌人造谣，我们不怕，我们自己在实践中一定要让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436. 江青在中央文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3日晚)

同志们，战友们：

本来这个会我应从头到尾听完，刚才忽然有事出去了。

首都兵团小将不平，觉得没把他们置于重要的地位，这是可以谅解的，如果时间来得及，也可以单独给你们开会，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听了两天了，内部矛盾很大，对内部矛盾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和团结的愿望，我觉得还是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有了这个团结愿望，才能夺权。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话，就不能大联合，队伍就拉不起来。同志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我们很惭愧，我们不能包办代替，我们包办代替就成了工作组。我们对同志造反精神是大力支持、赞扬的。同时我觉得不要有这样一场争论就灰溜溜的了。比如，北航“红旗”，新北大“红旗”，清华“井冈山”。轻工业学院来了吗？(来了)矿院“东方红”，地质“东方红”，有许多学院，是直接跟我们联系的了，你们对自己的战斗组织要爱护，对不正确的观点要批判，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能玷污自己原来的战斗组织。开除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作思想工作是比较难，你们最怕作思想工作了，是不是？你们最讲究开除，你们文明也不文明，你们最大的一个问题，你们和工农结合很差，这里有一个条子，提到某地五类

分子把粮食分光，五类分子在那儿抢劫，因为在北京周围有十个县，彭真尽可能在这十个县反攻倒算，你们大串连大部队活动要打招呼一些，到附近十个县作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到工农中去，拜工农为师，我想你们脑子里可能澄清一些。你们是应该帮助工人农民起桥梁作用的。去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堡垒要一个一个地攻破。从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权主要靠内部革命造反派，有的靠你们去造反。在北京闹小团体主义，闹风头主义，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就是没有深入到工农中去，因此，就争论不休。我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听同志们的意見了。我建议你们还是与工人结合，不晓得对不对。

437. 中央首长在与北京高校革命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不是原话，仅供参考)

(1967年1月22日——23日凌晨 人大会堂)

王力：当前要大联合，大夺权，你们有什么意见谈谈。

三司代表：大夺权要首先联合，建议工农兵要联合起来……(略)

矿院代表：北京不如上海，目前地富很猖狂，通县活埋了一些贫下中农，很多人想往外跑。

清华28团代表：目前联合是时际，我校三总部联合有很大好处，联合后成立很多纵队，不要对联合估计太高，可在斗争中改进。

江青同志这时进来讲：刚接到一份公告，是调查康生委员会的，有四个组织参加。我很惊讶，有清华井冈山。党校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今天到会大多是和我们共过患难的战友，因此坦率地交交心。现在出现大量攻击陈伯达、康生同志的大字报，你们表态没有？这是敌人在挑拨。(问蒯大富)你当时被王、叶压着去中央，我们是如何对待你？我和伯达同志如何为你着急。我当时问王任重，王说你现不是反革命，亦不是革命的。你被打成反革命那么久没有翻身，后来我们在十万人大会上为你平反。我们希望你成长更好一些，才和你说这些话，听说你和北大“虎山行”、“红旗军”搞在一起。你们内部要好好整顿。过去有人诽谤聂元梓，我们大家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现在联合不起来，内部原因是个人主义，外部是有人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内部原因，现在出现了大量诽谤我们的大字报。你们表不表态？中央文革在北京共6人，有人造谣说：江、关是一派，陈、王是一派，要告诉你们，我们都和毛主席一派。

蒯大富：就28团一组搞。

戚本禹：你说自我批评再解释。(蒯解释，大家发表意见，有人提开除，有人提要触及灵魂)

聂元梓：我有很多缺点和错误，第一我主要把工作局限于北大，这几天蒯大富主动找我一起起草左派联合文件，我对蒯有意见，在会上提也可以。二十日下午，蒯打电话给我。我问他，江青同志有否要你转告我，把肖华的大字报盖起来，蒯未明说，晚上又告诉我听说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关于康生的大字报，我那天问蒯，他说不同意。又说王力说“给康生大字报是颠倒黑白”。可是井冈山一个劲儿贴，蒯大富一直未表态，刚才蒯说得很不深刻，井冈山通讯刊刊载攻击康生同志大字报，也没有加按语。

人大：目前在造反派中存在着非常危险的情况，什么人的反都想造，北大井冈山的后台是反革命，已经被逮捕了。

三司：昨天已决定把北大井冈山开除了，但公告还没有来得及印出来。

江青：这个事情，你们不要涉及群众，把头头解决就行了，你们要头脑清醒。

北大：三司刚才讲话没有触及灵魂。三司吸收进冈山时，我们早成立，他们就不吸收，北大井冈山和清华井冈山是同胞兄弟。

师大井冈山：现在我们内部问题很大，在北京日报的问题上，我们和北航红旗是有严重

分歧的。我们认为北京日报新一期第三版是大毒草。

外语：目前左派中出现了极左派贴陈伯达、康生的大字报，都是少数派中间的人。

江青：我们今天要与人为善，交心。28团烈火组不要全部开除。要分清，头头要负主要责任，要开除。要给他们改正的机会。(下面谈到报纸的问题)，为了维持几个大报，我们就很累，你们不要抓那么多报纸，你们小报不是办得很好吗？中央的意见，是让这些报纸(如北京日报)先停着，叫记者编辑下基层参加文化革命。清华井冈山出得不错，但你们注意不能走上邪路。你们不要忘记我们共过患难的战斗友谊，我们队伍目前有分化，有些人态度不明朗，怀疑一切的口号是反动的。是陶铸提出。肖华说了错话，有错误，不是不可以批评，但他和刘志坚不一样，又煽动抄肖华的家，是别有用心，想把肖华推到别人一边，想搞乱我们的阵营，我们要对敌狠，对己和，我们希望你们不要忘掉，你们在困难时我们是怎样支持你们的。现在你们对刘、邓、陶都狠不起来，却来给我们贴大字报。这样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江青同志激动流泪)给我贴也可以，我不计较，可以原谅你们。陈毅同志也作了深刻检查，你们知道吗？陈毅同志非常直率，有错误就能直率检查，陈毅是好同志，难道这样好的同志能上街游斗吗？

总理：

你们善意的批评，我一定很好接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恶意的批评我是坚决不接受的。

438.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同体育界座谈纪要 (1967年1月23日)

周恩来：

你们确实是上了当，你们应当去发表声明。

康生：

你们上了大当了。革命要有革命性，革命性有无产阶级革命性，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革命性要有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对象要分清敌我嘛。你们现在把敌人放在一边，把自己搞成对象。搞革命要有科学性，科学性是要调查研究。你调查我，你同我调查调查也好嘛！你调查调查党校也好！我今天不是来夸奖的时候，我同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作了十年的斗争。陈伯达同志、周恩来同志、江青同志都可以证明的。解放初期，我就有病，一九五七年，杨献珍拒绝学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是让他停课来学，他是完全反对，不学。反右派的时候，大家都在那里反右派，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杨献珍就来了个放假，放假到期时，第二次和邓小平勾结起来又放假。邓小平、安子文又放假，我又去停止了的，这是五八年。五九年上半年，杨献珍在那里搞思维存在没有同一性。什么叫思维存在没有同一性呢？这是苏联的《哲学辞典》上的，反毛主席的，杨献珍拿这个东西反毛主席。(关锋插话：反对大跃进的。)我们，也还有关锋，又同杨献珍作了坚决的斗争的，这是五九年的上半年。五九年下半年杨献珍又怎样呢？杨献珍反对毛主席，反对大跃进，反对总路线，反对人民公社，整个五九年我同杨献珍作斗争，一直到六〇年杨献珍撤职。你们要懂得党校的问题，很显然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安子文……，提起来我很激动，同志们，很难作斗争，上面那么大的盖子压着，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支持他，彭真是他们的一伙，安子文是他们共同的叛徒，陆定一也支持他们。这个斗争很艰巨啊！孙定国是什么东西！孙定国是杨献珍的最亲信的大弟子，让他们反对杨献珍，他不干的。所以，当时我召集会议，我问他：中央党校到底是毛泽东的党还是杨献珍的党？如果再不反对的时候，这党解散。这是五九年到六〇年。六一年他出去了，那哪去串连？

到西北。到西北找谁？去找刘澜涛去了，他们是共同一伙的叛徒。六一年底回来了，当时我就想：回来了，准备翻案了。把刘少奇所有的指示印了，就来反我了，他还有个助手叫侯煜，是党校的副校长。彭真、安子文、陆定一、杨献珍一道勾结起来，收集材料翻案。六一年刮翻案风、单干风。首先大反我的罪状有两条：第一是五九年我反了他，揭了他，揭了他反毛泽东思想。第二是什么呢？我提倡工人学毛主席的哲学。可凶了，那个时候，彭真、安子文换上一个校长，换上了谁呢？换上了王从吾。那时大权在人家手里，决定校长不校长，不决定于我咧！是决定于他们的，王从吾完全是他们一帮，而且同杨献珍搞的火热。完全是彭真管理。这是六一年翻案。翻案怎么样呢？十中全会批评了单干风、翻案风，这样他们才收敛一下。王从吾也撤职了。王撤了职，党校的决定权仍在人家手里，换上了林枫，林枫是什么东西呢？彭真的“桃园三结义”之一。……还有一场斗争，六四年就是合二而一，什么是合二而一呢？毛主席说是一分为二，当时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是针对毛主席的。什么样的党校？同志们，讲起来很通俗，十几年来是反毛主席的顽固堡垒，这里就是这么个地方。六四年，合二而一这个斗争是全国性的。你们晓得林枫干些什么？学生写信给毛主席，他夫妇俩怎么样呢？把给毛主席的信扣下了，六月份大家把写的信送到邮电局去，他们又用欺骗的手法把信收回来，把信扣下，封锁毛主席。同时让那个打进红旗队的××，那个保皇的××写信给江青，写信给毛主席。那么以后呢？李广文写大字报反对林枫，林枫又反对李广文，李广文写了大字报，在我支持下还在八月十五日把林枫这个盖子揭开。这个时候，红战团的人怎么样呢？开始是同林枫一起反对智纯，围攻智纯的。另一方面，反对马列研究院的。红战团的一个头子叫郑德修，郑德修写信给林枫：林枫你指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你指到哪里，我们打到哪里。揭开林枫以后，他们不去反林枫，去反王伟，又让我接见，找了五十个人接见，接见一次，我讲党校的阻力是又深又厚又大，那时我不敢讲刘少奇，因为当时还没有公开，只是盖子轻轻揭了一点，还有个大盖子在上头。他们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搞神秘化，反我的当中有个刘海潭，是林枫的走狗。当时我批评了他，让他去检查……保林枫的走狗是红战团。以后这个矛头不对李广文了，对着我来了。我不管它，我还是反林枫，林枫是谁撤职的，不是红战团要求撤的，是红旗给主席写信撤职的。以后他们红旗，李广文，××他们反对刘、邓，他们的一些材料那是人家红旗的。红旗联络站主要是谁呢？主要是吴炳炎，这点蒯大富是对的，我曾经告诉蒯大富应该同他们联系，他们没有听。红战团造了我许多的谣言，说我是谭力夫的后台，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谭力夫呢。又说我是“联动”后台，我告诉你们吧，“联动”是我主张逮捕的。昨天晚上我还把一个“联动”的送给谢富治同志。是林枫的老婆把我的电话号码交给了谭，谭就打电话和我联系，要见我。我老婆拒绝了，这是事实。说我看了谭的书，我根本不知道谭是谁，书是哪里来的。拿过那小册子，他说：“哎！写的不错。”王任重说写的人叫谭力夫。说是谭政文的儿子。王任重拿了去，我并没有看这本书，造了我许多谣言。……还说我同刘少奇一道到晋绥土地改革，胡说！我是同陈伯达一道进行土改的。延安撤退后，刘少奇往晋绥走了一趟，那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说同志们有的时候，你们说我是刘少奇的人的时候，我自己犯过“左”倾错误，但是反过来说，我犯“左”倾错误的时候，我讲刘少奇是右倾。我有文章，你们要看的时候，我可以拿出来给你们看看。……

彭真，我知道彭真，四月十六日，《北京日报》不是出了个假检讨吗？蒋南翔打电话找我商量，说咱们开一个北京市的学校的大会。我说不能开，现在中央讨论文化大革命，你这么开实际上不好。四月十六日我到主席那儿，四月十七日蒋南翔就根据彭真的指示开了会。我回来的时候想了解一下到底彭真在各大学搞什么，我们七个人成立了一小组，这个同工作组根本没有关系，那时候还是五月间，还没有聂元梓的大字报，有×××的人、《光明日报》的人、马列学院的人同学校里联系。当时的任务是调查彭真在学校到底搞了些什么阴谋。这个时候小组在专家招待所，到了北大，接触了聂元梓，接触了哲学系。同志们，可以告诉你们，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在这个小组督促和鼓舞下发出来的，这个小组是起了这么一个作用的，

不是同张承先那个组一道。我说主席一公布聂元梓大字报，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时聂元梓一个礼拜受打击，因为我们是督促她写大字报的，我们也感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华北局、北京市意见不一致的。他们不主张在学校里搞，他们主张北京市先开会。那时我们坚持，所以主席一公布，说是解放了，那么就解放了。……大字报出来以后，我叫他们还是得继续调查。张承先二十天的工作总结，说“六·一八”是个反动的东西。(录音不清)陶铸去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告诉了陈伯达，我把那个东西压下了。这以后，张承先在那里没有调查什么东西……那么一件事情，同张承先那个东西完全相反的。所以说，那么多谣言很明显了，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首先同志们知道，我不是中央党校的校长，我只是中央代管一下的。我还告诉同志们，这个党校不是我管的！你知道不知道党校是黑帮反革命分子陆定一管的，不是我管，我是从旁边硬攻的。党校多少年来，我管了一个时候，就是六〇年夏天，中央成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因此嘛，这个党校也叫我管了。六〇年我就反杨献珍，六一年他就出去了。六二年党校就大反我，那时候也写信给我，叫我去党校检讨，我不去，叫他看一看怎么样。六三年七月十四日从苏联回来以后，我们要写文章了，所以我说党校我不能管了，最后决定陆定一管。我管了不到三年，以后，就是陆定一黑帮管了，直到陆定一这一次被揭露以来，都是他管的，陆被揭露以后，叫我去问一问、管一管，那么问什么呢？人们以为我和党校那么密切呢！的确是我十年来向他们作了十次斗争。同志们，那时党校反我的时候是这一回事。

周恩来：

刚才许多同志问我材料的问题，我说，你们去调查研究，是好事，认真嘛！仔细嘛！但是材料拿来必须加以分析，要加以核实，不要有一个材料就捅出去。这样就常常会闯乱子。现在街上的大字报有两性质嘛！一类确实是敌我矛盾的，一类确实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写大字报，我们赞成，但是措辞要尽量恰当，下断语更要恰当，不然就把这两类矛盾混淆了。你批评的对象要区分两类矛盾，下断语应该弄清楚，要经过调查研究，你们没有把握的时候，应该问一问中央文革小组嘛！问问国务院接待站嘛！全军文革小组嘛！中央嘛！在这关口你们要认真，你们在中央跟前，在北京，你一捅出去，马上电报就打到各国。

另外，供应你们材料的有两种：一种是老老实实的把所知道的告诉你们，尽管这里有不完全真实的，但他以为真实的，这样，是许可的，因为他是老实的。你们拿来核对校正，以作实事求是的研究。另外一种，他有意识地给你诽谤的材料，你们觉察不出来。所以你们的材料有两种，老实人也可能给错了材料。恶意人他尽搞些诽谤的材料。你们要能够区别：是好意的供给了材料还是别有用心地给诽谤材料。刚才康生同志分析得很清楚了。党校就把你们拖下水嘛！党校的这个反动集团——红战团，你看，把这三个在斗争中经过考验的革命造反派，他故意地拖下水，所以这个调查研究要很慎重。你们多问，我们没有隔断你们。你们不要轻易作结论，对你们有好处，并不是我们来约束你们。你们可以自己写文章，但是在紧要关头，因为你们涉及到中央常委的同志嘛！中央不到最后非要宣布不可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宣布的，比如陶铸的问题嘛，因为一错再错，已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加深了！出了多少乱子！这样子逼着我们放了，并且我们批判了他，主席又告诫了他，还希望他改正的。以后，今年一月八日他跟广东、湖北来的同学发脾气嘛！要想压嘛！就这样，完全对立的态度了。带着一种对我们批评不满的态度。……

439. 周恩来重要讲话 (1967年1月23日)

各地革命造反派夺权的基本经验是：

第一条：必须实行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在接管中也必须实行大联合，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要反对分裂主义，各自为政。

第二条：各单位的接管必须以本单位的革命组织为主体，外边的群众组织只起帮助作用。

第三条：原来业务机构和人员能够工作的要照常执行任务，革命的群众组织起监督作用。必须明确，我们要夺权，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决不允许资产阶级夺无产阶级的权。

决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我们要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一个阶级夺另一个阶级的权，而不是个人主义争权夺利，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必须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提倡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提倡民主集中制，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等不良倾向。

440. 陈伯达谈穆欣问题

(1967年1月23日)

听话记录：《光明日报》燎原公社金涛、张忠孝等同志，我不保谁，一切人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考验，包括你、我。穆欣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定这个调子有没有把握？有没有证据？穆欣有问题，我们批评过他。对于他的工作，我们批评过，批评的比较严肃。

我们认为，这个人比较软弱，工作能力较差，对于行政工作，可以做一些。他过去的事，我们不太清楚，但总要在多年里看一个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间里，可能有很多错误、缺点，我没有调查，这是想当然的，因为每一个人不可避免，没有错误的人很难找的。如果他有缺点、错误，我赞成批评他，不要定反革命修正主义调子，使他没有改正的机会，使他不能在《光明日报》工作，这些看法你们考虑考虑，要考虑多年的工作，《光明日报》多年来工作比较不错的，他发表了不少好文章，这样一下子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众怎么分别好人与坏人呢？

对一个人不要马上弄成反革命，有错误与反革命是两类矛盾，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的意见不强加于你们，你们对于给他的文件不要动，有些是秘密的，你们是不应当看的。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具体工作，对他不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关于整风与古田会议决议等文章，要好好看一下，要一边斗争，一边学习。

《光明日报》金涛问：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陈答：1. 不要动他的文件，不要抄他的家，抄他家是不对的，要给他自由，恢复他的自由。2. 有错误可以批评。3. 不要抓住一点，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正确与错误要做适当估计，象对斯大林要做三七开，不能笼统定调子。

问：群众揭了他好些“三反”问题。

答：不要轻信，不要没有虱子抓虱子。

问：以后报纸如何办？

答：让他做工作，不要把他的行政事务搞掉了。

问：我们准备把穆欣问题整理材料，如何交给你？

答：材料送中南海。

问：我们能不能斗穆欣？

答：可以开批评会。

441. 中央文革关于萧华问题的指示

(1967年1月23日)

一月二十一日北航红旗战斗队关于萧华问题请示中央文革指示如下：

周总理、江青同志的指示：

不是萧华个人可贴不可贴，因为还是内部矛盾，不宜公开，扩大化，是因为传单是别有用心的歪曲，有很多是造谣。

江青同志指示：

把这个批示传达到每一个红卫兵战士。

中央文革办公室 江才熙同志口述传达记录

442. 周恩来在接见工交各部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24日)

(记录整理)

一、斗争薄一波的问题

现在看来工交各部对薄一波揭发的问题很多，经委揭发的很少，但对余秋里同志揭发的很多，似乎余秋里比薄一波还坏。薄一波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参与制造者。薄一波九月份见势不妙，就休息了，这个人一遇到问题就生病。陶鲁笳是帮助薄一波的，薄一波确实有一批爪牙，我们擒贼先擒王。先搞部长揭发，但都被揪走了，找不到。

余秋里同志是老老实实的，是诚诚恳恳的做检查的，如有阶级感情，就不应这样对待他。搞大庆，余秋里有功劳，主席提议大庆是面红旗。六五年调余秋里到小计委工作有成绩。

化工部搞的不错，但把高扬也给搞了。

余秋里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应该批判，但不是完全吃老本的。他是部长、主任的标兵。在困难时期，搞了个大庆，主席几次提保余秋里，我今天是奉命传达的。

经委对薄一波恨不起来，所以，薄一波回来就很嚣张。现在就有坏人揪部长，想搞死灭口。

现在是对部长轮流作战，弄得部长神智昏迷。

二、四清工作队问题

中央拟发一个通知，四清是按“二十三条”搞的，不能否定。四清运动给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基础，是对的。个别有错，个别对待。四清后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要批判。但与四清要分开，不然……(不清)。

三、夺权问题

中央保余秋里，计委能否夺权，并非清一色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夺权，外交部就夺了权。主席说，发表了夺权文章，必然引起连锁反映，但也不能说夺权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然就没有一小撮问题了。夺权首先是夺运动的领导权。

当权派的有五种情况：

1. 反动集团是敌我矛盾。
2.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不清)
3. 犯了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改了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改的是敌我矛盾。
4. 一般执行反动路线错误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5. 犯一般的错误。

当权派怎么划？支部书记、科长都是当权派，在你那个范围内都有权。各级当权派都要受群众的检查。不能把干部都看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各部夺权分两步走：首先是夺运动的权，对业务工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培养业务新生力量取而代之，如果造反派业务能力很强，就一气呵成。一时不能接管的，力量不够的，就积蓄力量，先监督业务工作，领导班子不太坏的，先夺领导运动权，对当权派监督使用。

没有业务工作的单位就完全闹革命，有业务工作的单位，夺权后搞两个班子。

对当权派要区别对待：

1. 坏的韩光、张劲夫要彻底甩开。
2. 有的撤职留用，带罪立功，定期考查，如吕正操……。
3. 有的停职留用，以观后效，半年为期，改好了可以用。
4. 再一种监督留用。
5. 再一种职务不变，监督使用。现在看来第三、第四种是多数。

夺权原则：并非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夺权，否则影响夺权，能夺的就夺。只能因势利导，不能包办代替；只能左派夺权，不能中间派和右派夺权……(记不清)。所以要左派联合夺权。

夺权是一次大演习。体现了我们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最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是否巩固了呢？看来有修正主义影响，所以都要夺权。所以演习就是自下而上的夺权，夺权是长期的斗争。

一个单位只要是革命的左派就要联合起来，夺权一家独霸，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青年一代(院校学生)要打破包办代替，否则你们要变成工作组了。首先是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反对工作组包办，也反对一派独霸。巴黎公社选举原则的实现是要斗争的。左派要做到团结大多数。

夺权的三个前提：

1. 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
2. 按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3. 按照“二十三条”“十六条”和两个十条办事。

要大同小异，团结中间，孤立少数右派。如果不接受以上三个前提就是右派。

夺权办法：

1. 自下而上的夺。
2. 首先是革命造反派联合，然后发展到大联合。

3. 以本单位的革命造反派为主，外地为辅，逐步地把内部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如果有的内部的革命造反派力量小，就由外部夺(如北京市公安局)。但也要扶植内部革命造反派，不能把群众当阿斗。

4. 一个系统应该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夺，不能自上而下的夺。全系统的夺，首先重点是本单位，然后是全系统的夺。全系统的夺应以工人为主力军，各部、各单位在先，然后才是全系统。

夺权和反夺权：夺权可能有反复，不能绝对了，如果革命造反派夺了，右派再夺，就是反革命。如果革命造反派夺权了，但不符合四个原则，其他革命造反派不满意也可以再夺。你夺了人家再夺，说他是反革命就不对了，如煤炭单位，十八个单位夺了，后有二十四个单位说没有大联合就又夺了。

多数与少数的问题：现在有一种理论，革命左派总是少数的。左派在革命初期是少数的，但总会发展成为多数。不是任何时候少数都是革命的，否则就成了《三国演义》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

罢官不是好办法……

科委的经验很好。(今天四点钟周总理继续接见工交各部造反派代表所谈的问题待续)

443. 陈毅：我的检查

(1967年1月24日)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多天里，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贯彻执行了一些条条框框。束缚了、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了国民党“训政”的办法。结果，把外事口初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外事口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严重的表现是，派出了大大小小的十五个工作队或工作组。其中有外办，外事政治部派往对外文委，中侨委，有关局和学校共八个，由外交部派往所属单位和学校的共七个。这批工作队中，以张彦和刘新泉两个工作队的问题最为严重。张彦工作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坏典型。张彦逼供信的办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对外文委和第二外国语学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问题中，最早发现张彦的错误，张彦就怀恨在心，不择手段的挑拨我们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企图借我们的名义，对抗陈伯达同志。特别恶毒的是收集材料，企图陷害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理论家。我从认识他以来，一贯尊重他，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他们有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敏感，他们能很快的发现张彦的阴谋诡计。我却远远落后，在事实证明之后，才识别出真象。张彦企图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无损于我们之间的团结，却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扒手的真面目。刘新泉工作队也用逼、供、信，整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一些工作队和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工作组所犯错误，我都应负很大的责任。

我为什么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主要是自己思想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很猛，我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相信我部有很多错误，旧思想，在这关键时刻，对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我站错了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害怕群众运动来势过猛，打乱正常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我口头上虽然也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多方限制，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在我所想像的轨道上进行。因此对那些条条框框，派工作组等等做法，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当时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接受和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大错误。

由于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在总的方面犯了错误，不言而喻，在运动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自然也是错误百出。外事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是使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很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悔恨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我开始觉悟到，运动初期我不自觉地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都沉痛的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

但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还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表现在：对革命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的不够，过多的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队的错误，站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调解的立场，强调避免冲突。对左派支持的很不够。没有抓住运动的主流，过分的重视了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从纠偏的角度出发，列举偏激的事例大讲政策。说了很多的错话。

在说话问题上，尽管当时主观愿望还是出于好意，希望革命群众掌握政策，把运动搞得更好。实际上却是批评指责了革命群众，压制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给群众运

动泼了冷水。我在各单位的讲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的讲话，错误很严重，打击了左派，压制了革命路线，讲话稿流传各地，影响很大，对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了阻碍的作用。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运动初期，由于自己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就滑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还自以为那样做是革命的。

十一中全会以后，在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还没有能够彻底转变，仍然把群众的觉悟水平估计过低，自称高明，继续站在群众之上，指导运动。因此就常常以教训人的口吻来对待革命群众。说错话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的问题。运动初期的错误，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十一中全会后，本应迅速转变，站到群众之中，与群众一道前进，我没有很快这样做，只是从群众的对面转到了群众的后头，而且站在群众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我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主要是由于我长期处于领导岗位上，很少深入群众，没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观点越来越浅薄。因此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和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而且习惯站在群众之上，好为人师、自以为是的发号施令。这样严重的脱离群众，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不犯错误。

这次犯错误，还集中暴露了我思想上、作风上的很多问题，都因过于自信，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等等。这些方面对于我犯错误，加重错误有关系。

为了彻底清理思想，纠正错误，回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曾讲过不少的错话，大中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广州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那次讲话的主要错误是对知识分子无原则的捧场，评价过高，而没有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以至被一部分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还有一九六一年，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和以后几次关于学习外语的讲话，在又红又专关系上，都没有强调突出政治，而过分强调了业务，助长了一些人的不问政治倾向。这些讲话有的曾公开发表，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这是我值得深刻检讨的。

几个月来，同志们给我写了很多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同志们要把我很好烧一烧，烧掉我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脏东西，这是对我的极大的帮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希望我改正错误，我也有决心，有信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给了我彻底改正错误的力量。今后，我必须坚决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学习他那样活学活用，运用自如。同时还要向周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及中央其他同志学习，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都学得很好。我必须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带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世界观。

彻底改造世界观，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端正对群众的态度，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高价征求批评，诚恳接受监督。以满腔热情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靠老本过日子，现在不够了，必须重新向群众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作出一些新的贡献。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决心投入这个伟大群众运动的大熔炉，彻底烧毁自己的错误，坚决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并且同你们在一起，共同来批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一起来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外事口的影响。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坚决支持你们革

命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向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致敬！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让我们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口号从略)

444. 周恩来在首都科学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5日)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下午，首都科学界的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群众大会。周恩来总理、李富春、聂荣臻、谢富治副总理出席了大会，周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根据记录整理如下：

同志们！战友们！

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鼓掌)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鼓掌)本来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想来参加会议，实在因为人手太少，工作繁忙，他们身体又不很强，分不开身，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托我向你们道歉。

这个大会，应该说是北京的科学系统的战友们夺权的誓师大会，(鼓掌)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点，就是以毛主席亲自抓的、批准发表的上海各革命群众团体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上海人民呼吁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紧急措施为代表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如同五月文化革命第一个阶段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发表的大字报一样，将要兴起一个新的轰轰烈烈的夺权斗争。(鼓掌)这个夺权斗争，我在前几天向来北京访问、串连、联络的七十多万群众大会上讲了它的本质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发动广大群众，把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鼓掌)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夺资产阶级的权。(鼓掌)本来这个夺权斗争，从一九四九年解放了全中国就开始了。这个斗争在一九四九年进入北京以前，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宣布，今后国内社会上的主要斗争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可以看出，谁是推行资产阶级路线的，还是遵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经过十七年的斗争，总的方向是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这是一条红线，(鼓掌)没有这条红线作指导，就不会有我们今天两万多个北京科技系统战友们的大会。(鼓掌)

我们建国十七年来，经济基础方面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我们曾经在经济、政治战线上进行三反、五反斗争、反右派斗争。这些斗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为我们进行更严重的两个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准备了更有利的条件。所以，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宣布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进一步深入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所以在一九六三年才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规定，经过两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经验，在一九六五年主席又亲自制定了《二十三条》纪要。这个时期，也同时进行了文化艺术改革。这个问题我在另一次文艺界的大会上讲过了。这样就为我们去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仅如此，并且在这个前夜，把党内修

正主义反党集团彭、陆、罗、杨揪了出来。(鼓掌)这个阻力，因为这个反党集团不仅在暗中活动，更危险的是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搞两面派活动，表现上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起，暗中背着党中央贩卖私货。最典型的是二月汇报提纲。这样，毛主席和林彪同志把他们一个一个揪出来了。(鼓掌)所以，这一个党内少数暗藏的反党集团被揪出来是伟大成绩，不要以为这些人是死老虎，认为是死老虎的讲法不正确，他们还没有被打倒，不仅没有死，不仅阴魂不散，而实际上在许多地方、部门、系统有潜在的影响。(鼓掌)这个潜在力量，在北京来讲，深入许多单位、许多部门，直到现在还需要做艰苦的挖掘斗争，因为他们是搞的阴的、暗的。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蓬蓬勃勃的，他们的活动是暗的，这就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阶段带来了困难。不这样提出，单提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不够，为什么当毛主席已经提出了去年五月十六日党内发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后来公开发表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来阐明这个主张，仍然，刘、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压制群众的意见，压制革命，打击左派，甚至围攻、监视革命左派，实行白色恐怖，造成那样严重的情况呢？在我们科学部门，科学院出现了把王锡鹏打成反革命，就是突出例子。为什么出现这些情况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种思想和党内各部门、各级党委中的一些人的思想是共同的，这就是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容易接受刘、邓推行的路线。一时，毛主席没在时，反动路线就遍及全国。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地研究我们党内外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针对的问题，思想革命的问题。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得很清楚，主席讲：要触及灵魂，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大家请总理坐下)，所以，谈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是触及灵魂深处的阶级斗争，这就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林彪同志的辅助下，每个人，包括在座的同志在内，进行一场思想大革命。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揪出了彭、陆、罗、杨反党集团，而且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批判了刘、邓提出、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批判各部门、各级党委执行或者有些地方还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科技界要更深入到每个人的思想革命。刚才读语录，读到这样一段，就是前十条上说过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当然，这些话不仅是对共产党人说的，而是对一切革命者说的。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思想革命，就不可能进行今天的新的夺权斗争。这个思想革命初期阶段的发动群众的形式和以前多次运动不完全相同，过去国内的经济所有制的改革，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三反、五反、反右斗争，都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进行的。今天采用史无前例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形式进行的，当然不能脱离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这就是相信两条根本原理，主要的是从群众中来，这是提倡的毛泽东思想主要精神之一，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鼓掌)有了群众的发动，充分的发动，这表现在四大民主发展为五大民主，加了一个大串连，发动群众更广泛。开始从大中学校、文化教育单位、党政领导机关发展到社会上，从学校到工厂、企业、事业单位，从北京到全国，从城市到农村，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滚滚向前，不可阻挡，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不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不住它，就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想按自己设想的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进行，也阻挡不了滚滚洪流奔向前去，不可阻挡。(鼓掌)所以，这样就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阶段要发展到夺权的新阶段，这也就是在抓革命、促生产，反对经济主义，反对矛盾上交，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斗争中进入新阶段，这就是十七年来夺权斗争的继续。当然，这并不是夺取全国的政权，那样就成了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修正主义的了。不能这样说，这是错误的。我们有毛主席，有毛泽东思想，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修正主义，有牛鬼蛇神的地方，就冲垮它！打倒

它！(鼓掌)我们懂得这个，就懂得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就是在酝酿，准备夺权斗争，目的就是为了夺权斗争。

思想斗争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每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主题。准备阶段，主要是思想革命。哪个地方思想革命深，思想革命透，哪个地方夺权就比较好。思想革命搞得不深不透，夺权就会有反复。夺权的反复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拿科学界来讲，为夺权斗争做的准备工作时间长，最突出的是国家科委和科学院，六、七月间，这两个机构都是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治的、包办的、垄断的，他们不仅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还有他们自己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点要特别指出。

我是七月初从国外访问回来的。在外事工作中，首先遇到对外文委张彦反党集团事件，跟着科学院党委对王锡鹏等同志不加分析，不加实际调查的由张劲夫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中央、向国务院谎报军情，造成我们错觉，真认为有坏分子在那里进行破坏活动。张劲夫当时用这样的办法来镇压革命运动，幸而张[王]锡鹏同志敢挺身而出，写信给中央、给林彪同志。得知了情况，我们就去问了。过问就调查，发现有些事不能马上作结论，需要作调查。接着国家科委张本同志受韩光迫害，这时张本同志给中央李富春、江青同志写了信，我们进一步知道了张本的情况。当时抓住了这两点。毛主席来了，中央文革就在这个会堂开大会，这就是有名的七月三十日万人大会。(鼓掌)在这个大会上，哲学社会科学部有人讲话……，张本、王锡鹏发了言，这样就把问题揭开了。(鼓掌)

接着举行了十一中全会。就在十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八月十三日，我接受中央的委托，对国家科委和科学院的两个案子进行亲自过问。(鼓掌)当时可以有两个设想：一种是满足一部分群众的要求，把韩光停职反省，指定一个同志或就由张本同志代替，这是一种办法，最省事的办法，最懒的办法，我一天就可以解决，大家也会得到暂时的满足。但是，这个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对毛泽东思想不忠，我不能那样作。我采取了第二种办法，这是最费时间的办法，拖长了六个月。(鼓掌)但是，最后是发动了群众，可以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国家科委就由极少数人批判韩光，发展到最大多数，认识了韩光是真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大会上已揭发了韩光，我予以支持，但他们仍制定方针，同我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有黑字记在白纸上。等一下张本同志可以向大家扼要地介绍一下。

这里说明一个问题，有时群众会有一些急躁，要做说服群众的工作，争取多数。每个单位都是一分为二，矛盾对立。到了这个月，我和张本及其他战友们见面，他们说多数了，百分之九十了。(鼓掌)在夺权斗争中，最后也要实现毛主席在《二十三条》中提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鼓掌)我当时向他们提出：我说既然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就要防止两个问题：第一是骄傲，第二是队伍不纯，坏分子乘机捣乱。在这两个问题中，第二个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依我看，一下子，仅仅半年，就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时间还太早。因为那里的特点既有自下而上，又有自上而下，发动群众很难深透，容易造成夹生饭。现在重大课题是既要防止骄傲，又要防止坏分子、反党分子的阴谋，防止敌人用这一手来杀你们一刀。毛主席说，既要反对外部的敌人，又要肃清内部的敌人。在我们全党来说，就是既要肃清彭、陆、罗、杨反党集团的影响，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又要不断地揭露尚未揭露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现在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那么在一个单位，有什么理由可急躁、自满呢？在胜利中不要被冲昏头脑，在胜利中要戒骄戒躁，提高警惕。(鼓掌)

国家科委的斗争是一种典型。另一种典型是科学院，作了长期的斗争。在座的有很多是科学院的。这样大的队伍，经过了半年斗争，他们是由下而上进行的。上面领导瘫痪了，这就是在张劲夫领导下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裴丽生、杜仁生、郁文、吴渝青(我最记不清他的名字)，这么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半年斗争中逐步把他们揭出来。他们不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自己的阴谋。总之，性质相同，半

年时间，科学院在京五十个单位。毛主席说，阵地一个个夺取，堡垒一个个攻破。现在开展了全面夺权斗争。这一范例比前一范例深入一层。但胜利并没有结束，结束了没有？(答：没有)还有斗争。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而且绝大多数在革命造反派领导下进行全面夺权。

由下而上起来革命的造反派，形成各种派别，有观点的差别，不是大方向的差别。大方向就是要夺张劲夫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和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拿什么思想来夺权呢？当然大家会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接受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走毛主席的方向和道路，按《十六条》和两个《十条》办事。但是，做起来，在认识上有距离，观点不同，形成不同派别。这在科学院很清楚。现在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有一种思潮不主张联合，认为越小越好，只能团结这部分人。大联合受到阻碍。当然，我们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不同观点，只能在实际斗争中实现大联合，但是大前提是相同的。我们要提倡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在这个斗争中联合，必须反对小集团主义、分裂主义。(鼓掌)这一点希望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注意这个大方向，允许大同小异。允许有不同观点，要尊重不同的观点，但在夺权斗争上要联合起来。(鼓掌)阵地一个个夺取，现在把科学院最主要以张劲夫为首的权夺过来了，但是，虽然停止了他们的职权，这命令的夺权还要由群众行动表现出来。(鼓掌)所以这一个斗争，必须要有阶段有步骤，联合行动是夺权的第一步，不是结束。夺权以后，还有许多问题，联合要扩大，要包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接着对没有参加革命组织的人，即中间的人，应该把他们吸收进来。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再孤立极少数顽固分子。另一方面，外面各分院、分所，应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夺权斗争，这当然是第二步了。你们不仅要抓科学院的革命，也要抓科学院的业务，共同抓革命促业务。还有向上要同中央保持密切联系，科学院不能孤立夺权，要有党中央的领导，要有毛主席和毛主席委托的机关的领导。(鼓掌)因此，夺权后，请李富春、聂荣臻多过问一些。(鼓掌)我不是不过问，也要分一点工。问题是在于这是两个夺权的范例。阶级斗争到处都存在，其他地方同样有着夺权斗争。整个夺权斗争象连锁反应，推向全国，必须认真严肃进行，不能掉以轻心，要一个一个加以解决，不能无政府主义，那里发生夺权，只支持，不去管，放任自流。如果是这样，就是对党、对人民、对毛泽东思想不忠。(鼓掌)当然，我不能所有的问题都过问，只能在必要时在必要的问题上过问，不能包办代替。

第二个问题，既然科学界正在进行夺权斗争，那么我讲一讲，今天科学系统的革命派、无产阶级的科学工作者，应该以什么态度立场来进行夺权斗争。林彪同志对大中学校的军政训练有三点意见，即有三个要求：第一、革命性；第二、科学性；第三、组织纪律性。这三个要求同样适合于科学界。革命干劲、闯劲是第一位的要素。没有革命的闯劲，造不成今天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革命怎么可能进行夺权呢？要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决心改革我国科学制度。我国现在的科学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还有封建主义的旧东西，斗批改要破这些东西，破四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没有革命精神不行。维持四旧，这是我们反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破旧秩序，大立社会主义的规章制度，建立一个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新的革命首创精神是第一要素。

毛主席说，不仅要一冲，还要有两冲嘛！要有智谋，要有科学性。你们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懂得这个道理。斗、批、改，夺权，夺权以后，要领导革命，熟悉业务，科学性就是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鼓掌)因为毛主席最精力充沛，最富有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也有最严格的符合无产阶级的科学精神。要很好学毛著。单学语录不够，要学两论，结合学习其他短文，也要学习军政训练中介绍的许多毛主席著作。这种学习，是为科学工作者打基础。不论是就地闹革命，还是搞串连，至少每天要保持一至二小时的学习，不管你怎么忙，只读语录不行，要读全文，要学全篇。向上请教毛主席，当然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的著作也要学习；下面请教于群众。我跟你们的代表接触，学到很多东

西，通过你们向群众学习，我是你们的小学生。(鼓掌)同样，也希望你们到群众中去学习，科学工作者不仅要搞科学实验，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不仅大中学生要和工农相结合，科学知识分子同样要和工农相结合。(鼓掌)这样，上请教于毛主席，下请教于群众，首先是工农群众，从群众那里来，经过加工提炼，逐步系统化，再回到群众中去，进行考验，有错的就改正，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多次反复，实践——理论——实践。

特别有一点要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是一分为二的思想。一分为二就是毛主席把列宁阐明的辩证法的精华——对立统一规律的概括和形象化，这是无产阶级认识问题的方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问题，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就能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就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处理矛盾，所以，你们对十几年来科学工作的评价，要一分为二的分析，不能说成漆黑一团，都是修正主义的。否则，你们从那里来的？一句话就问倒你，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下就把你们搞出来了？很简单的问题，但科学院辩论了很久。这问题，我没有多少功夫来讲。《矛盾论》《实践论》发展到最通俗的一分为二，是极深刻的真理。

对刚才讲的两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光为首的一小撮，张劲夫为首的一小撮，也要一分为二的处理。打击面不要越搞越宽，不能有过来往的就一律对待。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是无政府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鼓掌)这些绝对化的思想很值得想一想。林彪同志提出的科学性，不仅对军政训练适合，对科学工作者也是适用的。这是一条真理，必须把革命性科学性相结合。当然，革命性是第一的、主导的。

第三，组织性、纪律性。科学院总是要有一个岗位，来抓革命促生产，不能离开《十六条》中第十四条的方针。不能象有些人说的我们因为闹革命，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愿到那里串连就到那里去。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生到那个地方，要服从那个地方革命派的领导，不能有自由行动，那样，不符合民主集中制，不符合自由纪律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制度。不能要走就走，那样，全国会引起新的、复杂的问题。我在前几天报告中提出，一定号召上北京来串连、联络、请愿、上访的群众，在得到原则答复后，很快回原单位就地闹革命。

夺权斗争如果有了初期的胜利，就应该抓革命促业务。当然，领导不健全，可以加强，大多数同意可以改组。不能自由坐庄、轮流坐庄。我们为什么要学资产阶级的一套？现在很多思想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右派思想。分析一下，那种思潮？所以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行动上要有组织性纪律性，要学解放军，要有纪律性。

第二个问题是讲的思想革命要贯穿着整个历史阶段。林彪同志提出的三项要求贯彻整个革命时期，尤其是在夺权斗争要注意。

这两个问题，给你们北京科技界的群众大会提供一点意见，提供参考。任何人的讲话都只供参考。通过实践证明，对的就坚持，发现错误就纠正。当然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准则。(鼓掌)

我们高呼：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我们科学界的革命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445. 周恩来在接见回京驻外使馆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67年1月25日)

同志们：驻外使馆三分之二的人员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决定的。同同志

们好！

驻外使馆、留学生内部进行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教育，你们做得好，做得对！（鼓掌）你们的革命干劲不比国内的差，也叫大使站出来弯腰。但是外交战线根据“十六条”怎么做？光学主席语录还不够，还要学习毛泽东选集。要向林彪同志学习，要活学活用，林彪副统帅五个月前的讲话，我们还要好好学习。（念林彪同志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南。

我们要分清敌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重点是打击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性质不能由上级来定，或别的机关来定，而是由揭露的问题来定。他们犯了多少错误，你们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你们清楚，上级可能有偏听偏信，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要调查研究，执行了多少，犯了多少错误？一般的还是我们的同志，因此，斗争、批判也要有分寸，十条、“二十三条”、“十六条”都要最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对一些中间的教育帮助过来，不断扩大左派队伍。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不管是敌我矛盾的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都要用文斗，不能用武斗。林副主席讲，武斗只能触及皮肉。随便抄家，随便打人，变相体罚，喷气式飞机，下跪都是封建的。主席二十二日讲：“我们是无产阶级，斗争要文明一点，为什么要把封建的东西搬出来？”希望你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树立一个新的风气。

有同志递条子说我是泼冷水，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我是老老实实地把半年的经验介绍给你们，贴我的大字报，我认为没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北京的学生闹得很厉害，我还去作思想工作，我没泼冷水的意思。（众：拥护总理讲话！鼓掌）

夺权问题，外交部的夺权我是支持的，外办口的夺权我们没经验，要研究。夺权不要从形式上夺，比如外事政治部的权，没有什么夺头。

外交政策是主席亲自抓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外交政策。外交风习上受到帝、资、修的影响，要彻底改。外交部女同志穿旗袍形成风气，我没有下这个命令。我们在外交上是有错误的，中央批准的，我负责；部党委批准的，部党委负责；使馆批准的，由使馆领导人负责。只能烧这三级。

驻外人员，有没有三反分子？是有的，是个别的，至少有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的外交错误，彭真就不要说了。这个靠你们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靠你们的首创精神，在三大“千斤”下去乱，总会乱出个规律来。馆长制以后还用不用，也可用革命组织去监督，在其监督下去工作。要通过你们提几个方案，在国内通过，才能去国外实行。你们国内搞文化大革命，学工厂、学校、机关的经验，批深批透，彻底改革，建立毛主席的使馆新作风。

这场革命关系到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命运问题。外事同志一定要在这做出典范，对外要起积极的影响。

今天陈毅同志把我找来，没先当你们的学生，哇喇哇喇讲了一通，过后再和你们个别谈谈，我不找你们馆长、参赞、大使，找你们革命造反派，让他们放下臭架子，包括我在内。

我谈这段话，是和大家在一起谈心。认为不对，可以退回来，对就做个参考。

（最后总理指挥大家共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446. 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接见工交系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6日)

（有的代表反映斗争薄一波情况时）总理说：薄一波统治了多少年。为什么比彭真、陶铸等难挖得值得同志们深思，从罗、彭问题以后薄就坐卧不安，十一中全会他讲不出什么东西，他是参与制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地质部门是很清楚的，他反过来打××，在铁道部门他利用×××，在各部要手段，他想滑掉躲开，十一中全会还挣……六一年、六二年，他瘋狂得很，后来一下子一转，装得好象没有关系，我们要各部联系起来挖他……我们最好由下

而上发动，必要时或者搞部长们背靠背揭……示众的办法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薄一波很狡猾，你示众一下他看作没多少材料，下次就不在乎了。

(大庆代表反映情况后)总理说：对余秋里要全面看，大庆的成绩归功于：第一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第二，工人阶级的艰苦奋斗；第三，兄弟单位的支援；第四，技术人员努力；第五，指挥的作用。余秋里不是吃老本的，在前五年最困难时，他们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那么高，打出那么多石油，后二年毛主席提出学大庆，六六年把大小三线计划搞出来了，后来贯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余秋里和薄一波的性质是不同的，余秋里的认识也好，诚恳检讨六次，心脏病又发作了，七年来大庆还有新创造，所以我们对同志要一分为二，余秋里是中央部长主任级中的标兵。那天你们把他拉到门口时，毛主席对我说：“那你得赶快去啊。”所以我去了。不是我去保这个，保那个，我是奉命，是中央决定，不是个人行动。

你们揪人要跟我们打打招呼，如果不把薄一波看起来可能被人揪走，也可能被保护他的人拉去找不着了，甚至把他搞灭口，所以揪人要跟我们打招呼。可以揪，斗了放回来，……要和揪的人讲条件，有人愿被揪的休息几天，要信他能把触及灵魂的事交待出来，揪前和我们打打招呼，事后交回来，以便他能工作。

四清工作组问题，中央将有通知，从十中全会毛主席提出抓阶级斗争，经二年搞了“二十三条”，四清是革命群众运动，派了工作组，上下结合，基本上是成功的，也是为文化大革命打下了初步基础，不能否定有成绩。四清工作组和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工作组要严加区别，四清工作队个别人有错误是个别人问题。另外当时有些四清工作队是连着搞文化大革命的，四清情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交叉着，党内五月十六日有过通知，四清工作组兼管文化大革命，我们要把这二个时期分开，同一个工作队也要一分为二，以便检查有个范围，如果同等看待那还了得！那就在座的好多造反派同志也得回去检查！所以有的县来电报要求各个工作队回去检查是不妥当的。

关于夺权问题：夺权的不能看成统统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是坚决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自从发表上海的“紧急通告”后，我们估计会引起连锁反映的，如果统统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还有什么一小撮，试想在毛主席领导下，那么多基层单位怎么会是铁板一块。

夺权一般说，首先是夺文化革命领导权，再夺经济权。文化大革命是横扫一切错误的，不管当权派是哪一种，是彭、罗性质的，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或是改了但还有严重错误的，或是有一般错误的都需要……

当权派可分几类：第一类，反党集团三反分子，两面派，有阴谋的，这是敌对的了。他们自己把自己放在与人民为敌的地位，最后专案审查。第二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轻有重，坚持错误不改的是敌我矛盾，改了的还可以回过头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改的也会变为敌我矛盾。第三类，一般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批判以后改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第四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改了，但还有严重错误的。第五类，有一般错误的。

支部书记、组长、科长也算当权派。因此我们对于长字号的都是要经过广大群众审查考验的，把性质分清，经过批判和自我批判，不能够先定调子谁允许批，谁不允许批。

你们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铁板一块，要加以区别。如地方许多报纸犯了错误，有一半已被夺权，但也要分析，毛主席思想的红线是经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来贯彻的，现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内部也闹革命，所以不能都归于一类。我们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会懂得怎样看问题。

夺权的形式：

一、夺权一般分两步走，第一步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不管是官办的筹委会，或凑起的筹委会，都由革命造反派接管。第二步监督业务，从监督中学会管理业务，通过斗争可以个别吸取长字号的，青年积极分子，锻炼后也可以代替旧人员(不是不要旧人员)，从

监督走向领导，这是一般的做法。还要从上从旁帮助，不是不管。

二、如果造反派业务能力强，能担负业务领导，可以把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业务领导权都夺过来。这样会生气勃勃，不是死气沉沉。如新华社。

一时不能接管的，要积聚力量，领导班子不太坏，可以允许他工作一个时期，待群众发动起来接管。

三、没有业务的，如党内部门，妇委、青年团、文教单位等，可以彻底革命。

组织形式：不定框框，大家创造，我们提供一种意见。如造反委员会业务监督小组，如果业务一起夺过来了，也要主要抓革命。政治统帅一切。

现在各部处理情况：

一、烂掉的罢官，如科委韩光是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科研的张劲夫搞阴谋活动。

二、撤职留用，限期考查，允许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可以三个月，还可用，还可以延长。

三、停职留用，也是限期考查，以观后效。如限期半年，一边工作，一边检讨。

四、监督留用。

五、职务不改。

现在看来监督留用的多，停职留用的多，总之，要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权也不能把你们抬上台，摔大跤，一下子叫你当部长也当不起来。毛主席说：“要理解，还要认真，还要得力。”

处理方法，也许不只五类。大家在实际斗争中来创造，这不是框框。

夺权的办法或原则。

首先由下而上。提出夺权后，我们估计到会有连锁反应。势在必行，不能搞得太长时间，影响生产，要靠群众自己起来夺权，不能制造，我们只能因势利导。

夺权者必须是真正的左派，就是革命造反派，也不是没有一点中间派。至于是保守派，官办的那就不行。假夺权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左派起来还可以夺回来。我们要求左派夺权，但左派也不会是清一色的，是不断分化的。中央还有左、中、右，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只要方向对，不会影响革命发展，列宁在时，如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出了托洛茨基、季米诺也夫，他们向敌人告密，列宁准备开除他们，后来他们检讨，留下了，以后又出现布哈林，这些人都影响不了十月革命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即使是假左派，也不会是百分之百，其中也有真左派，真左派也不会都是左派。

左派我们联合起来夺权，要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各部门都夺过来，等于是又一次演习，这也体现了五个伟大：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体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巩固胜利。文化大革命是在高度领导下最大限度的民主，世界上没有这样例子的，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下，有了自己的军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动千百万人来夺权，将来如果出现修正主义，群众就会起来夺权。所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光是对付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而且当领导做的不好的时候，群众就会监督他。

大联合方向对的就联合，不能独霸。独霸是垄断思想，一个学校独霸就不对，在这里我很坦率地对矿业东方红同志讲，(矿业学院东方红代表说：我把总理指示带回去传达。)你们可以争论，但是你们一些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青年时候就要打破包办代替，如果我现在不提醒你们，那就不是同志的关系，我批评你们，是有材料有根据的。我们既要反对工作组，也反对一个单位包办。因为这都是把少数当做诸葛亮，把多数看成阿斗。左派要大联合，夺权也要争取广大群众，我们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选举要经过左派推动，要教育团结中间力量，分化孤立那些是右的，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

夺权的办法：

第一，夺权由下而上。

第二，夺权要联合夺权。有三个前提：(1)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承认党的领导。(2)走社会主义道路。(3)按“十六条”规定和两个十条，这是斗争的纲领，这是大前提，如果违背了就是三反分子。大联合可以是大同小异。首先是左派大联合，对于极少数不接受三大前提的，就孤立他，待最后处理。

第三，以本单位革命造反派为主，外单位为辅，革命靠自己。一般是这样。但也有造反派弱的，外力可以煽风点火，因为时机成熟了，你不夺就会被保守派夺过去。如公安局被政法学院夺去，这种特殊方法必须逐步把内部力量培养起来，如工作需要，也可吸收外力。

第四，一系统夺权必须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夺，不可能一下子整个系统夺权，首先部里夺，以内部造反派为主力军。铁路系统，既要搞本单位夺权，又要一下子搞整个铁路系统的夺权，因为他们有全国的运输……。夺权要以本单位为主，内因要站得住才行。蒙古过去不是靠北就是靠南，革命比我们早，我们帮助他也帮不过来，四十多年还是那么个样。阿尔巴尼亚就是靠内因……。

革命开始是少数，不是永远是少数，最后是多数取得胜利，小的变化，弱的变强，这是主席思想，左派先进思想开始是少数，团结了中间力量之后变成了大多数，再前进又是少数，这不是循环论，不是象三国演义上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们不赞成全国性的组织……。

在夺权的办法上，要加上一条，即第五条，夺权反夺权，有的夺的不那么完全的，有的是假的，就会有夺权和反夺权，不能一律把第一次夺权看作真夺权，第二次夺权看作假夺权；也不能一律把第一次夺权看作假夺权，第二次夺权看作真夺权；要看到斗争是有反复的——左派之间发生的问题有时是协商解决的，如把未联合的吸收进去。对假夺权是要再夺过来的。左派之间不要互相说：“你是二月革命，我是十月革命”“我是延安，你是西安”。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问题总是能得到解决的。

447. 陈伯达讲话 (1967年1月26日)

关于下厂的问题，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问题，学生要有计划地下厂，不要一涌而去。现在听说有些厂学生去的过多了。听说有一个厂四千工人，去了两千学生，到了车间，生产发生问题，生活发生问题。还是按中央规定，分期分批下厂，小学生和初中学生应该不要去，下到工厂要退出去。经济主义在这里也发生了，下厂补助了四角钱，应该不给这种补贴。下厂本来是参加劳动，向工人学习，结果是为了发财，结果背道而驰。有一个厂利用国家物质制造匕首，希望他们觉悟，劝告他们不要这样干，匕首要没收。

革命的工人如果不能处理这些事，就不能管理国家大事。但是我不赞成粗暴的作法。对这些小孩要进行教育，不要进行武斗。他们有兴趣的就是要搞武斗，他们迷失了方向，要劝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希望你们好好地做工作，造反派是讲理的。

国防工业系统和三线的建设，同学们没有国家的允许不要去串连。因为国防工厂制造保卫国家的武器，如果随便去冲，就要打乱我们的计划。凡是敌人赞成的事，我们不做。敌人就希望我们国防工业搞得乱七八糟，大家要保卫国防工业。我有个建议，看大家同意不同意。

北京是我们伟大国家的首都，是毛主席所在的地方。工厂抓革命，促生产要做好样的，就不要闹小团体主义，这样对革命不利，对生产不利。抓革命，促生产是联系的两个环节，如果生产不好对革命就不利。看看对不对，不对就贴大字报。

要克服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我们准备在报纸上发表毛主席的一系列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党的作风》。不然的话，革命就搞不好。有小团体主义、小派别主义、个人主义，夺权斗争就夺不好了。要克服这些，要有毛泽东思想，照顾整个国

家利益，照顾大局。

小学、初中开学的问题，我们觉得还是开学好，现在要准备。前些时候和小学教师接触，他们有些思想不对头。他们出来串连，把小学生放回家去，他们的思想出发点不那么对。小学教师要革命，才能教好书，不一定非出来嘛，可以就地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这个问题要有中央的正式文件才行。今天对小学问题还没有研究好，不久可能做出规定。

下面是关于“联动”的问题。略

448. 戚本禹会见小学革命教师的谈话

(1967年1月26日晚)

戚本禹同志于一月二十六日晚(6点半到7点25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会见了参加“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部分外地小学革命教师和北京小学红旗造反团部分红旗战士。

在会见中，戚本禹同志宣读了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给全国在京小学革命教师“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亲笔信件，进行了座谈。

陈伯达、江青同志给大会的亲笔信内容如下：

同志们：

听说你们在开会，我们今天有不少事，不能来，很抱歉。我们希望你们回到本地方去、回到本学校去，向工人、农民、士兵学习，同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考虑教学的具体改革问题。要边上课、边改革，不要再停留北京，脱离工作，脱离具体斗争。

祝你们平安！请你们就回去。在斗争中掌握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陈伯达、江青(签字)

一月二十六日

戚本禹讲话(座谈纪要)

小学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中央正在研究。可以把昨天在会上，陈伯达、江青讲的一些话透露一些。昨天和北京工人群众开了一个会，工人同志们对小学文化大革命提了不少意见。陈伯达、江青同志听了意见后，比较明确考虑决定，初中、小学，春节过后要复课。工人同志们很满意，他们都鼓掌了。你们如果到工人中间调查调查，这个意见是符合群众需要的。这是工人们的意见，这还得提请中央批准，方向是这样的方向。

目前的方针是要开学。现在开学有几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教员问题。开学了，学校里的教师没有威信，有的老师被打成“黑帮”、“反革命”，学生要造反，不听怎么办？学校上课教材问题、教室问题、领导班子问题怎么办？(有人插话：回去以后我们有问题反映怎么办？)可以写信到中央来。(问：你能看到吗？)可以看到，我每天看许多信，每天开七、八个会，很忙。(又有人问：小学问题很大，开学怎么办？)我很不清楚，其实上课也可以闹革命么！好啦，我先讲讲主要问题吧。江青同志说过小学有很多问题，小学一定要闹革命。上课也好，不上课也好，都要闹革命。上课就不能闹革命啦？我不相信。工人不是也边上班边闹革命吗？革命教师要和高年级学生结合。比如说，首都兵团不是很好嘛？要和左派学生搞好关系，他们可以帮助你们做工作。要依靠左派学生么！革命教师与高年级学生大联合，问题就能解决了。

革命教师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要自己组织领导班子。革命的教师与左派学生搞好领导班子，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可以吸收参加领导班子，也可以帮助做些工作，也可以请革命的中学生帮助，组织红卫兵、红小兵，当勤务员么！一边上课一边搞革命。以后学校不搞校长、

主任的资产阶级那一套，就搞一个革命委员会、教学小组、管理委员会。象巴黎公社那样进行选举，选个组长什么的。把权夺过来。(有人问：我们被打成“黑帮”、“反革命”，我们没有平反，学生不听怎么上课？)自己平反么！不是反革命，就不是反革命。大家认为不是反革命就平反。革命教师要把权掌握起来。学校当权派不要以为都是不好的，有无产阶级当权派，也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看他是拥护那个路线的。他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陆定一，彭真反动路线？如果基本上是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可以团结，也可以吸收参加领导班子。谁能高举伟大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就选入领导班子。领导上课，领导革命要打破框框，什么学历、资历不要。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干劲就可以选他。当领导叫组长，叫勤务员也可以么！至于什么长，你们可以自己考虑。要有领导核心，没有领导核心什么事也办不成。你们是学校的主人，要负担起重担。毛主席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学校，你们的学校，你们自己搞好么！你们要把权夺过来，要掌握领导权，把权紧紧掌握在革命派手中，什么都可以解决了。

教员问题。学校有政治、语文教员，要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的，好的可以选，比较好的可以选。你说都不好？我不相信。至于理、化、数教员属于有些毛病的，也可以教，只要不是反革命黑帮的都可以要。但是有错误的或比较大的，也可以让他教数学、图画，管理小组也可以监督他，放毒不行。都是革命派那有那么多的，教师队伍一定要纯洁的。

教材问题。物理、化、数暂时没有新的，可以用旧的，语文就讲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么！毛主席著作都是典范，让学生背，给学生讲。(有人说毛主席著作不能解释。)不对，“老三篇”很好讲么！不难，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廖初江的经验，学习心得不是讲得很好么？语文教员必须是条件好的教员，否则，教师学得不好，讲得也不好，学生也不爱听或反对你。教数学的可以宽点。(有人问：四月份大串连，小学开会，学生可以串连吗？)小学没有串连任务啊！初三毕业的不上课了，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和初一、二年级一起上课。至于具体问题，自己去讨论，学什么自己搞，这样是过渡时期么！学语文、常识等主要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请中学、大学红卫兵给小学生讲课么！也可以请工人左派给你们讲么！自己创造，革命时期不能按常规上课，具体问题将来研究，你们去酝酿你们去宣传，下下毛毛雨，使群众和教师不会因开会感到突然。大批小学教师到北京来，中央没有同意过，你们还要教课么，你们走了学生怎么办？(有人问：我是告状的……)告状？我提倡自己解放自己。

领导小组，不一定天天规定上课么，也可以这天搞革命，那天上课，可以搞实验么！自己去摸索，自己去创造。复课是方针，怎样上课，怎样搞革命，自己创造，创造出好的经验来，向全国推广么！向上海工人学习，可以提出倡议嘛！外地来的教师很多，都让他们回去。现在机关也住上人了，不能办公了，这是陶铸搞的鬼，一天还发七毛钱，有阴谋。有的人煽动农民到北京来，全国五亿农民，如一百人来一个代表，北京怎么办？中央没有叫他们来。有的学生是因为被压得很厉害到这里点点火的，工人、农民都来是不行的。现在连文化部的厕所都住满了人了，这是陶铸发的指示，让他们到北京来造反的。(有人问：串连问题有什么指示？)串连已停止。四月份再串连，怎么串连具体还没有规定，你们要出动宣传车，宣传总理指示“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外地串连学生也要回去，要截他们回去。

教室问题。革命教师要组织学生到学校修理嘛！上劳动课嘛！(有人说：我们学校的房子烧了)破坏国家财产，怪教师没有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不能怪学生。(有人说：玻璃全部打碎了。)学生打破了玻璃要赔，但教师要负责任的(教育责任)。(问：开学以后，小学生可以长征吗？)那么小的年纪，【怎】么可以长征呢？五、六年级可以短途长征。复杂不可以狭隘理解，你们可以创造各种方式，中央还要发正式文件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下面有约会，很忙，就谈到这里。(呼口号)

449.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交系统接管单位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1月27日)

总理首先谈左派，革命组织。部里、学校的革命组织的行动应光明正大，不要对党中央、对毛主席，对我们公安部、卫戍司令部等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采取保密。你们应告诉我们，你们的行动是光明正大，不告诉会受损害的，对我们不利。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点不损害是不可能的，但力求少损害。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的，是光明正大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我再三再四地说：左派不要搞秘密行动，我最反对窃听，这是对反革命或在白色恐怖时的办法。现在是毛主席领导搞大民主，对后代是一个教育。

夺权是本单位的造反派和本单位外的造反派大联合。十六号以来，我们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你们夺权目的是对的，但手段还是不对的。铁道部把吕正操弄到一个地方，四天不出来，你们非想弄得一点材料出来，他本人也想休息一下。这样的事我们心里有数。

现在有坏人把好人抓走的。总理举了天津市的一个例子：一月十八日在夺权斗争开始之后，天津市委召开市委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对各区委的讲话。天津市委书记(处)是新组织的，万晓塘死后，中央工作会议后最近改组的，中央指定了一个解学恭、胡昭衡、赵武成、阎达开、×××，五个。那天散会之后，天津市工农学联合战斗团、天津市荣复转退战斗兵团的人一拥而上，把五个书记抓走了，加上前面拉一个共六个，至今放了三个，这消息到二十五日已七天了，天津市工农学联合战斗兵团，天津市荣复转退战斗兵团遭到社会上的反对，社会舆论是不赞成的。社会上不赞成联合行动，这是对的。

天津市工农学联合战斗兵团，迫着要求市委承认他们是革命组织，并解决他们的物资问题。赵武成就是弱得很，签字给了二辆汽车、四千元钱。我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见过赵武成。现在群众看他好象有油水可捞，至今还扣住不放。有些不敢坚持原则，在强压下就签名，你们说对不对？(众答：不对！)

天津工农学联合代表团、荣复转退战斗兵团扣书记的地点非常秘密，从十八号到二十号晚，先后转移了六个地点，不让他们看报、听广播、打电话，只是叫写检查。设了三层岗哨把守，把书记还单独看住。

全国的组织要靠串连，现在还没有全国性组织，时间还早，我在二十二日讲话中已说了，现在还不够条件。从本单位发展到全国要个过程嘛！

总理说：从全国各单位抽人成立全国性的组织，特别是军人，这样会被坏人利用，如红旗军。

总理说：抢汽车，万万不可提倡。学生革命组织，主席提倡艰苦朴素。反对物质第一，提倡政治第一。

周总理又一次提到宣传车的问题，说宣传车本来没有，是外地传来的，哈尔滨“八八”带来的，大吵大闹。最近几天好了，那几天围着中南海转，声高得也听不清楚，你们知道这里是住谁的，我呼吁你们工交系统不要这样作。说话那么快，一会就走了，没有什么效果，在广场上放还有些效果。

有人说：夺印经过几次辩论，夺来夺去。

总理说：对印为什么兴趣那么大，主要是权嘛！

清华井冈山代表谈到西南电力系统红色造反军这个反动组织表示不同看法时，总理说：你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功，做调查研究，不要以为工人就都是好的。

提到黑材料时，总理说：要集中还是集中起来，不要马上销毁，黑材料集中起来，各造反派查清目录，以后再说。对黑材料的处理目前还没有典型，复杂之至。当前，一个机关常常为黑材料争论不休，政治上有价值的，有利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材料，可拿出来。

总理指出：每个单位，每个学校，可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把它查清楚。主席、林副主席、

中央常委、中央文革都主张把黑材料烧掉，这样对后代是有好处的。

总理指出：红卫兵烧旧、坏书也好，但不要烧绝了，烧掉点。

有人问到四清工作队问题。总理说：中央发了通知，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一刀两断，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前后分开，四清材料不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材料放在一起。

总理谈到成立保卫首都小组的任务：(1)保卫中南海的安全，中南海过去是杨尚昆统治的，过去他统治了十几年，一进中南海就是他的天下，他要来的人，成份很复杂，中南海直接在杨手里。要夺权，叫汪东兴搞，现在主席就很安全地住在这里，把坏人清洗了。说他们要串连，坏人要到中南海，绝对不行。你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中南海要保护。(2)要保卫首都，去年主席接见了一千二百万红卫兵，坐车没有危险。(3)保卫机要地方，如钓鱼台、人民大会堂、公安部、北京饭店等等，都基本保住了。卫戍部队选择是精悍的，他们遭到了多少骂，骂不动口，打不还手，打了也不回枪。但你们要知道，你们骂的、打的是毛主席的战士啊！

总理指示：广播电台不许冲。

总理念个条子，有关枪枝弹药问题，总理说：枪支弹药是民兵的，枪支封存，弹药收起来，各放一个地方保管。

冶金部代表讲他们只有一个组织，其余有地下的组织。总理问：为什么要地下的，叫他们出来。代表说：他们不敢出来。总理说：叫他们跑出来。下命令叫保守派解散是不好的。我给你们出个题目，叫他们公开出来，当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学习毛主席思想。

总理对邮电部代表讲：军队保卫电讯的问题，正在研究。铁道沿线电讯应由军队保护。

450. 周恩来接见新疆“12·9”绝食斗争革命造反派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1月27日)

总理：你们冲击过新疆军区，没有引起大的问题，这很好。现在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应该以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不要被苏修利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只要我们的军队在，敌人是不会翻天的。不要这也怀疑，那也怀疑的。毛主席有这样的信心，对你们这样的信任，你们要对中央军委有起码的信任。第一，新疆要将军队稳住，新疆这么多事情，先抽出一条来，什么应爱护？解放军嘛。

(群众谈到对区党委、军区党委领导和兵团党委的看法时)

总理：人是可以改造的嘛，应该给他们改正的时间，不要把他们看死了，人可以改变的嘛。你们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都要中央派人去管，让他们就地改造嘛！

我们的军队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只要我们的军队在，就好办了，你们对军区要有信心嘛，你们不能从一件事来看整个大体嘛。我们发动大家，就是发扬大民主，破旧立新，但如果把每件事都看得不得了，那怎么行。对于过去有错误的组织，应该允许他们改正嘛。中央一下达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命令，他们要立即改变态度的嘛，只要相信军委就要相信司令部。事实证明，你们夺权，军队不是派人保卫你们吗？党和毛主席在军队中享有绝对的威信，只要有反对毛主席的人，不用你们砸他们的狗头，他们自己会砸。你们怀疑新疆搞政变，多少人到新疆也没有把新疆拖跑，现在新疆有强大的国防工业，巩固的边防，这些你们应该好好想想，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嘛！

(群众汇报到兵团党委盗用中央名义篡改中央电文时)

总理：你们留一两个可靠的革命左派，组织一个联络站，有中央可靠的消息时，我们直接和你们联络站联系。

(说到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时)

总理：你们要团结，不要有一个观点不同就分裂，左派联合一般在困难时容易联合，在胜利时容易分裂。只要大前提一致，都应该团结。

(夺权后上级文件发下来应给谁)

总理：上级文件发至夺权委员会。

(秘密文件应该怎样保管)

总理：非常秘密的文件指定非常可靠的革命左派过问，一般地不必了。

(兵团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

总理：搞比较好，已经搞了嘛，这样可以把群众发动起来，兵团文化革命除持枪单位外，按一般学校和一般农垦区搞，但要和边境地区分开。农场分批分期搞。边境农场不串连，这个问题还要商量。

(关于石河子问题，即“一·二五”血案)

总理：关于石河子死伤人的问题，即使是反动的群众组织，也不能开枪，只能揪住头子，我立即打电报给区党委和兵团党委，命令停火，撤出部队，立即派调查组，去那里调查。新疆那位大学生死了，成了无头案，这次石河子事件不能搞个无头案。一定要调查清楚。

(关于张仲瀚问题)

总理：张仲瀚我本来想挽救他，但他不努力，我到了石河子看到他那样铺张浪费，批评他，本来想调他，但考虑到再给他个机会，他自己不想挽救，不接受批评，这次运动中就把他的问题搞出来了。

王震保张仲瀚，又保自己，王震调了一个学生团来保护他。

(关于夺权问题)

总理：夺权的对象，现在北京有反党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处理方法有不同：(1)撤职；(2)撤职察看留用；(3)撤职留用；(4)监督留用；(5)不加限制留用。新疆夺权问题，军区问题都很好处理，兵团问题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研究。

贵州夺权很好，它比山西夺权经验还好，准备把他们的经验介绍给各地。夺权你们要很好地考虑民族。

(关于“12·9”绝食斗争事件)

总理：“12·9”绝食、停工完全出于激愤，可以理解，责任归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但不提倡，你们回去着重宣传我们这几条。

(徐立清说丁盛是革命左派，那我们怎么办？能不能批判？)

总理：可以批判，有错误当然可以批判。

(左派问题如何理解)

总理：可能指中印边境上打得好吧？这次他偷偷地跑到北京来就是错误的。

451. 中央文革对穆欣问题的几次电话记录稿

(1967年1月28日)

1967年1月28日0时45分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韩树信给清华赵雪林同学的电话：

伯达同志的电话记录不要印，未经审查即发，伯达同志不同意。

穆欣的问题，可以揭发、批判。

1967年1月28日4时多

阎长贵同志电话，由罗杰接

伯达同志口授：这个讲话不要发，不管是否属实，都不要发。谁发谁负责。伯达同志打电话，是和来电话的同志交换意见，不能开把电话交换意见就印成传单这种先例。这样做以后就不好说话了。

1967年1月28日中午12点10分

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

戚本禹同志委托办公室同志，关于伯达同志对穆欣问题答复如下：

你们寄来的材料，伯达同志已经看到了。穆欣可以揭发、批判，而且应该彻底揭发、批判。伯达同志并不保谁。他只是说穆欣性质现在暂时不要定，以后待揭发事实后再定。

电话记录不能印发，因为没有经过他本人审阅。

452. 陈伯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讲话记要

(1967年1月28日)

开始陈伯达同志和到会的人员进行了座谈，听了该厂关于夺权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汇报。然后伯达同志根据大家提的问题作了一些回答。

伯达同志讲：你们能不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生产用的原料充足不充足？厂内有没有废料、废铁？两天之内就捡了几百斤。提炼结果99%是好钢。厂内遍地都是金，废工具及零用品你们厂就更多了。

有人问关于目前联络站问题时，伯达同志讲：内部问题可以用协商方法解决，不要拍桌子、瞪眼睛，不能让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笑话。为什么要分成两派？大方向一致联合起来吧。保守派要分化，瓦解他们，老工人要团结说服他们，搞成一个大派。

伯达同志又说：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大方向一致不要争来争去，革命派内部不要闹纠纷，要加强团结，把革命搞好，把生产搞好。革命是生产的推动力，搞不好当权派就要笑话。我们国家就是要把生产搞好，加强国防。你们厂要做北京的模范，敌人高兴的事，我们不要做，敌人反对的事，我们就要多做。关于改造，酝酿一个时候再改造。通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名单贴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赞成。经过民主讨论，不要包办代替，工作组包办代替错了，你们不要包办代替，听取大家意见。改造不要匆忙，匆匆忙忙不符合大家要求也不好。革命派之间有什么意见要协商办。要互相打招呼。互相不通气，本来之间没有问题，也会变成有问题了。

目前，你们之间争论激烈，是不是把脑子冷静一下，把核心名单贴出来，让大家分析，不称职的就撤职，这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全面改造，也不一定全部都掉换，掉换也没关系。要把工作搞好，帮助选上的人把工作搞得更好，不要互相抬杠，这才是共产主义的态度。养成共产主义作风，不要非我当选不行，这回没有选上，下回就可以当选，都锻炼锻炼嘛。培养接班人，老人要帮助年青人，他们搞的不好可以帮助他们，这样才能进行革命大联合，才能抓革命、促生产，才能联合起来，大夺权。

今后，你们有任何事情都要和群众商量，不管是干部还是领导人，都要和群众商量，把不同的意见都贴出来嘛，让大家辩论。不和群众商量就要倒台，凡是受经济主义风的同志，都给他退回去，这样我们腰板才能硬气，才能站出来说话。东方红、红色造反联络站要联合起来，希望你们革命、生产、产量、质量都搞好，一定要做北京工厂的模范。了解捍卫团，你们做了许多漂亮的工作，但不要骄傲起来，别的工厂虽然比你们晚了一些，但可能比你们搞的更好，你们一定要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希望你们成为北京市工厂的模范。

453. 周恩来对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1967年1月29日5:03—6:30)

地点：中南海会议室

(周总理进来后，和同志们一一握手)

总理：把你们等了这么久，你们二十多单位都没有走？(答：都没有走)(然后总理又一一点名)

总理：最早的时候来的？(答：最早是十月，一般是元月月中、月初)工人有哪些造反派组织？(答：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司令部，毛泽东思想九一三兵团)手工业在里面吗？(答：在)商业在里面吗？(答：在)(代表讲：工人分成两大营，旗帜很鲜明)

前些时来了些保守派，一千多人卧轨，我打电报，让他们来几十个代表，结果宋侃夫批了一百多个，既然答应了，我就委托李副总理接见他们，他们要辩论，我说，去你的吧，别理他。

(代表：我们夺权后，当权派大搞阴谋)是否他们在搞经济主义？(答：是)他们想破坏生产，阻碍我们夺权。

(武钢工人控诉他三次被打成反革命，讲武钢干部地富反坏右占80%)这么坏。你们(指造反派)有多少人？(答：三十多万)联合会的有多少人？(答：开始比我们人多，现在已改名了)他们叫什么名字？(答：有红旗军)什么？也叫红旗军？(代表：已抓到他们一个头头)怎么只抓了一个，那么你们回去和他们斗呢？

总理问：你们还有多少人？(答：十万人)红旗军有活动吗？(活动都很猖狂)为什么不斗争？(是斗争呀，他们也转入地下)(代表们讲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三次新反扑)军队对你们怎么样？(不好。代表讲了组织夜袭队，飞虎队在军区训练的情况，中学生多)你(指二十人中被打成反革命的张××)回去应把中学生组织起来。(代表汇报大联合中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不联合起来呢？(三司，二司……)大方向一致嘛，回去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进行批判。你们批判王任重大方向一致嘛，王任重又吹又写报告，说武汉文化大革命搞得最健康，吹捉了一些人，有四、五百人，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小毛病，好象武汉是全国一面红旗一样，我们怀疑文化大革命的红旗为什么捉那么多，当时北京就没抓，实质上武汉情况没有揭穿。所以，是一个先进“红旗”到北京来吹，做了中央文革的副小组长，插手北大、清华，当了北京市的顾问。实际上，武汉的革命派受苦最深。七月下旬北大赶走了工作组，八月初，我亲自去北大，清华闹起来了，但武汉十月份才动起来，才得到你们的材料。可是陶铸、王任重又把你们哄回去了。以前，陶铸包庇王任重，武汉大学五月下旬就搞文化大革命，你们那时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答：陆舒端)是典型的名字，不过现在是一个反面的典型的名字。

张体学主要是王任重拉坏的。王任重到北京斗了几个小阿飞，非常恶劣，你们武汉很受影响，王任重自吹自擂，一火车，一看，真不象样子。中央工作会议上，我点了张体学的名字，我特地看了王任重一眼，他好象满不在乎，下来，我向王任重说：“你要好好帮助一下张体学同志，他太不象话了。”他连忙点头“是呀！是呀！”其实都是他搞的，真是个两面派。

王任重到广州养病，你们把他揪回来了，你们到北京找陶铸诉苦，陶铸还大发脾气。

王任重是十二月回武汉的，你们进行批判斗争，刚刚开始斗一个月，你们就争论，闹意气了，为什么要分开呢？大联合搞嘛，斗了几次(三次)，武大斗了没有？(没有)要大小会结合。

批判材料要准备充分些，赶快回去联合行动。你们既可以联合干，也可以分开干，不要互相指责，总觉得比别人强，你说我，我说你，要在斗争中比较好坏(?)看谁在斗争中争取群众，批得深，三司、二司都要比。我劝你们赶快回去，你们来了三个礼拜了吗？(是)到现在矛盾越来越大，可在北京呆久了，赶快回去吧。

(代表讲要揪陶铸的问题。代表：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你们是不是想把他揪去来斗？还是让他呆在中南海里。

(一)形势发展很快，现在是夺权。

(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人物不甘心他们的死亡，他们以各种经济主义，矛盾上交，分散主义，他们就是要少数派越少越好。少数派越来越多，从思想上来说，少数战胜多数。多数中又产生新的少数，但组织上不能这样，要少数变成多数。

斗争的方法可以背靠背，当前面对面斗争把陶铸揪出来，中央不同意，我不能违背中央

指示，我还应服从党的纪律，但我可不是保他，要根据形势发展。

(代表反映省委干部的情况，说省委干部保得很厉害)

你们揭得不深，应当分化瓦解嘛！(代表反映：“张体学说：‘火攻张体学，烧不死。油炸王任重，炸不烂。’”)(省委干部说：“要犯错误就一起犯”。)后句话不对，以前张体学还是做过一些工作的，如果你们材料全都揭出来了，摧毁他的信心了，他就低头认罪了。

(代表反映湖北省委春节一百五十万农民要来武汉)你提醒我，春节不放假，革命放啥假呢？(问警卫员通知发出了没有)(代表谈到在《湖北日报》上是否可以点王任重的名)总理说：报纸都掌握在你们手里，大权在你们手里嘛(代表讲：十六条规定要上级党委批准，总理笑了)(代表反映：春节保皇派将停电、肉、蔬菜，进行大反扑。)你们回去准备反对经济主义。武汉落后了，建议你们联合起来，我有一个想法，每个省建立一个联络站，派两三个联络员，联络站少好照顾。(代表问：以后中央开座谈会时，我们外地的也应派代表参加)好，可以。希望你们联合起来，夺权范围我们准备发表，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可能你们现在联合起来，夺权范围我们准备发表，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可能你们现在还感觉不到，等几天发表贵州的情况，你们就会感觉到武汉落后了，你们要在三月份赶上去。(最后总理对二司、三司人讲)你们应该团结起来(三司说：不能搞大杂烩)象你们这样争论不休，联合不起来，武汉的运动要落后两个月。总理在会上讲：邓小平自杀，罗瑞卿自杀了，陶铸死……都是造谣，可能是保他们的人讲出来的。

454. 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的谈话记要 (1967年1月30日)

王力同志谈到《红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第四个问题时说：现在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了。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三方面协商建立临时的权力机构，散着不行。这是临时政府，是过渡，过渡以后，就成立新的巴黎公社，北京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主张用人民公社，毛主席在五八年就想的城市人民公社。这要经过一个过渡，可能再要经过一个筹委会，才能达到彻底的完全的形式。

《红旗》社论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还是第一次。

你们要作理论上的准备，要学习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苏维埃的经验，我们十七年的经验，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其实苏联有很多东西是不彻底的。

现在这一段是夺权，各省就是建立临时政府，临时的权力机构，斗争是非常错综复杂，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在《红旗》社论中大体都提出来了。

要报道各个省的经验，要提出他们的特点。已经报导夺权的地方还要继续报导他们的经验，无产阶级大联合要反复进行宣传。

现在我提出对干部的问题。象刘格平(目前山西省夺权领导人之一)、王效禹(青岛市副市长)……他们比较早地拥护毛主席的路线，他们受到刘、邓路线的打击。有这样的干部，但还是少。主席的思想是要这些人参加这场大革命，“从床底下拖出个黎元洪来”，这样的都有，只要他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只要不是死顽固。

《红旗》社论提出要立新功，这是主席的思想。要立新功不要老躺在过去的成绩上，不能象过去那样当老爷，不能恢复到过去一样，象过去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要加以区别。

请同志们注意主席在《红旗》社论中加了两个地方。社论中两次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都是主席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这是主席加的。

《红旗》这篇社论是根据主席的精神写的。一头是无产阶级大联合，一头是对反动组织的镇压。在反动组织中的群众要争取。

我们提议再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文章。你们在发表各篇文章时要加按语，隔些时发表一篇，好酝酿消化几天。

首都三司今天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提出了个普遍重要的问题，提出同时要进行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两个夺权斗争：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推荐，整篇写得很概括。(王力同志当即要人派车把文章的作者之一孟繁华——地质学院五年级学生，接到《人民日报》，让他介绍写作经过)。广播电台要广播这篇文章，《解放军报》要写编者按，要在《红旗》上登出来。

《红旗》社论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的敌人，不要忘记大方向，社论提出这个问题，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要区分两类矛盾，这个问题早提不合适，现在提最合适。

在谈到如何编发革命造反派写的文章时，王力同志说，泼辣的东西要留住，但要卡住一些东西，要去掉破口大骂的东西。现在要掌握情况，因为斗争变化快，报社同志要向革命造反派学习，第一是无产阶级战士，第二是编辑记者。《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也是人民公社，一切都是人民公社的原则，要创造，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创举。

455. 戚本禹在人民大学的讲话 (1967年1月30日)

同志们，因为今天时间很晚了，你们很多同志还要发言，因为时间很晚了，我们今天回去还要给负责同志汇报情况，所以会议不准备今天继续开了。今天我们不准备在这里表态，可能同志们很失望。因为我们听了很多情况后，还需要作些分析，同志们，还有许多材料需要看。但是我们愿意还继续来，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可以有两个办法。你们可以继续辩论，用录音机录下来，我们派专人来拿，拿回去后放着听，这是一个办法。另外我们自己召集一些座谈会，小型座谈会，因为开大会有些东西可以听得很清楚，有些东西听不清楚，开些小型的座谈会，你们的各党各派分别开。怎么搞，我们回去商量一下，你们也研究一下，看一看怎么搞好。

人民大学自从建立以来，在历次斗争中都是政治斗争的中心。我记得，我来过人民大学，一共来过二次。一次就是反右派期间，你们这里处理林希翎(是不是你们这里处理过？答：对对！)到你们这儿来谈过一次，因为了解些情况，来过一次。最近一次，文化大革命期间，总理有过一次接见外地的，大操场上，来过一次。除此之外，没来过这里，也没找过你们任何人谈过话，也没打过电话，也没有对人民大学的文化革命发表过什么意见。所以你们传说，我有三条、四条，没有这回事情。将来可能的，今后可能的。经过我们看过你们的材料后是要表态的，我们如果需要表态，我们会表态的。那时可能会有三条、四条，现在没有。

人民大学的运动，文化革命的一些问题，你们提出许多问题，差不多现在文化大革命里面碰到的全党的、全国的、全军的一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一些重大任务，一些重大问题，你们这儿都涉及了。什么陶铸，什么邓小平，什么刘志坚，什么王任重都跟你们这里有关系，而且你们这里，他们很多所谓大人物到你们这儿来过，什么陶铸，什么邓小平，所以你们这儿的斗争任务是艰巨的，而且是光荣的。

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解放以来建立的第一个大学，我们很多大学是接受的旧社会的遗产，旧中国的遗产，人民大学是我们新建立的，自中国解放以后是我们人民新建立的大学。

但是由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占了统治地位，所以他们干了许多坏事情，那么人民大学在他们的统治底下，变了颜色，成了推行

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阵地。我这样说是否定你们的成绩呀？当然，人民大学的广大的革命同学和多数的教职员，他们坚持了毛主席的思想的宣传，在这些阵地上，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是有斗争的，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抹煞。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人民大学在相当时期里面没有很好地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相反培养出很多受资产阶级影响很深的一些人，散布了很多毒素。这一点是我们大家应该感到痛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刚才就是很多同志表示的，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来保卫我们这块阵地，来把我们人民大学办成真正的人民大学，办成抗大式的，真正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大学。要做到这点，就必须按毛主席的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如果我们这次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不能把我们的大学办好，就不能把人民大学办成人民的大学，就办成资产阶级的学校。所以我们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改造我们的学校，革我们这个学校的命，使我们的学校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大学。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非常关心人民大学的。(众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从外地回来后，要了几个大学的材料来看，其中就有人民大学的材料。(呼：毛主席万岁！)他专门要了你们学校全套的材料，其中有清华的，北京大学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人民大学的。(热烈鼓掌，众呼：毛主席万岁！)所以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舵手，最伟大的导师是非常关心你们的。(众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的希望，辜负人民的委托，我们一定要努力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我们人民大学办成真正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学校。

我今天只能讲这些，愿意趁这个机会向人民大学的革命的同志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友们，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456. 周恩来在接见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1月31日)

按：元月三十日池必卿向华北局机关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的同志传达了所谓中央的三点意见：(1)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不能夺权；(2)雪峰不回来参加你们召开的揭发斗争大会；(3)那类大字报不要再出了。为了澄清这三点意见，我们要求中央负责同志接见我们。在我们的要求下，周总理于元月三十一日晨七点接见了我总部所属部分战斗队的代表。现将总理接见的讲话、插话整理如下：(那类大字报：池必卿解释，指批判李雪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

总理讲话：你们不是就三个问题吗？一个文件，一个夺权，还有揪李雪峰。我不给你们出主意，夺华北局机关的权可以，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这个问题我请示了主席，如果华北局书记处有问题可以改组嘛！夺权不成。夺了权你们准备当书记呀！你们有没有准备？把你们的意见谈一下。你们造反，中央是支持的。但你们要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大概是你们感到没有事作了吧？现在雪峰在搞天津问题。天津很乱，很紧张，天津市委的六个书记都被揪走了，叫雪峰把天津问题搞出头绪来，再回机关作检讨，不是不叫他回来参加你们的会，主要是时间问题。

代表：从已揭发的问题，我们认为李雪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开批判斗争大会，可是书记处去传达了所谓中央的三点意见。

总理：不是我的回答，谁讲的？

池必卿：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答复的。

总理：是谁？

池必卿：那位负责同志不让说。

代表：池必卿，总理问你谁回答的。你还不说。

池必卿：富治同志答复的。

总理：两句话，我没有讲后一句。为夺权问题我曾请示中央和主席。天津形势很紧张，我们又不能派人去，让雪峰去弄出个头绪来，再让他回去检讨。

代表：书记处说中央说不让再贴“李雪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类的大字报了。

总理：我没有那么说。(朝着池必卿问)谁回答你的呀？

池：谢富治同志。

总理：谢富治同志不会这样说吧？真要富治说了，我替他在这里承认错误。

池：也可能是我听错了。

总理：夺华北局的权不成。大字报可以出，可以批，可以揭。我从来没有说不能揭发批判，我鼓励机关造反。他们的文件你们不要抢，我现在还答应给你们找一份文件(众：是刘少奇为朱理治翻案的文件)。查雪峰这个笔记本没有找着，我答应给你们查。

代表：我们继续贴揭发李雪峰的大字报，并要开揭发斗争李雪峰大会。

总理：可以贴大字报，你们把“打倒李雪峰”的大字报都贴到街上了。李雪峰三个字都倒过来了，我每天都看到，也没有制止过。这两天，雪峰不能回来是主席派他出去的，伯达同志和我都很关心天津的问题。北京正在搞夺权，很紧张。首先抓北京，其次华东，包括上海，第三就是天津、华北、东北。然后再抓西北，西南。现在正在紧张时期，雪峰检查不是不可以，最好时间晚一点，他也没有说不给你们检讨。主席也说过，检讨检讨就够了，总尽管检讨干什么？要说服说服嘛。(总理接着说)又让你们等了几个小时，刚才我就从你们这里过去的。新疆问题很复杂，早知道你们就解决二个问题，我就先接见你们，怪我们不好。

代表：李雪峰问题不搞深搞透，他到天津去也不会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

总理：(笑)你说他不站在革命造反派方面，他站在那里呀？

代表：李雪峰六年来对主席的话不能如实传达，传达刘、邓的讲话多，彭真的讲话也多，就是不传达林彪同志和周总理的讲话。

总理：林彪同志那几年身体不好，主席讲话少。我的讲话可能不值得传达。还有个一线、二线的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邓小平是总书记，彭真嘛，说话就没有个准了。过去李雪峰给我反映过，他和彭真不同。

代表谈到李雪峰在中央面前说彭真不好，在下面又极力吹捧彭真时，

总理：(惊奇地)哦！还有这个事。彭真在河北厅的讲话我看了，很坏。彭真在通县的讲话怎么样？是否比在河北好一点？代表：一样的坏。

代表汇报卫恒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是李雪峰和薄一波、安子文商量后决定的。

总理：找安子文，因为他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长。薄一波早已离开华北，为什么要和他商量？

当代表们谈到华北局印发李雪峰的讲话，插话很多时。

总理：他的话就是多，我的话也多，但却没有他的多。

当代表讲到李雪峰抵制毛泽东思想时……

总理：我和他接触不多，一二年当中，只有二、三次。一次是去年三月天津会议，谈的较多，邢台地震见过一次，还有制定“二十三条”前刘少奇汇报那一次。

代表：邢台地震时总理亲自去灾区视察，中央还派了慰问团，可是华北局却不派主要干部去。

总理：刘子厚去了。

代表：刘子厚是代表河北省委的。

代表接着汇报李雪峰没有执行主席指示，而执行刘少奇那一套时，

总理：雪峰在北戴河时，对刘少奇给主席的他提出不同意见，后来不知怎的没有坚持。你们这个批评的有道理，北戴河问题我不晓得。几月？(答八月)啊！我当时在养病。

当代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

总理：六四年主席提出过批判吴晗的问题，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在石家庄，四月二日到邯郸碰到子厚、雪峰。雪峰对我说：主席批评了彭真，说彭真认为批判吴晗是个人问题。六日回来，我对彭真说，雪峰对你有意见，说你对主席指示听不进去。彭真表示他批评的对，我的认识同主席的话有本质的区别。我当时认为彭真还有一点觉悟，雪峰当时就认为彭真有问题的。当代表汇报到李雪峰留恋旧戏时……

总理：不少同志有这个习惯。

当代表们谈到华北局书记处企图通过把胡昭衡打成反革命以保万晓唐时……

总理：那是天津本身提出来的，天津本身的意见比较多。

代表：现在华北局还在军区存着蒯大富等人的一麻袋黑材料。

总理：这个材料不一定是雪峰本人搞的吧？

当谈到黑材料的处理问题时……

总理：材料处理是最苦恼的，当前全国还有一个典型。你们造反派可以搞个纲，把材料封起来，等夺权以后，山西、内蒙、河北、北京的造反派都派代表来共同清理，对有些有价值的材料(例如简报之类)留下来，个人材料和其他材料统一烧掉，以后不要再搞材料了，搞来搞去，搞材料最费时间和精力，有用的并不多，我不知为材料花了多少精力。你们不要搞文牍主义，不然你们就钻牛角尖里钻不出来了。我建议你们联络总部组织一个组，在处理材料方面搞个典型。你们华北局怎样搞的？档案里的东西你们没有动吧！我看军区都有，我让军区把材料都交给造反派，机密的不看，包括密码之类的东西，绝大部分要销掉，留下一二分有意义的，要不然把咱们后代急死也找不到有用的东西。

我不是不愿意接见你们，一天就接见你们两次，太消耗我的精力了，你们想见我，反映情况和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

代表：我们这次没有要求夺华北局的权，而是要求李雪峰参加我们开他的揭发斗争会。

总理：可能是传错了。

代表：明天总理的三点指示就出来了。

总理：你们给我辟谣嘛！

代表：让池必卿去辟谣吧！

总理：现在群众当权嘛！

代表：现在李雪峰家还有我们的黑名单(当场指出三个人)。

总理：那个东西最没有用。封着吗？(答：封着。)封着就好办，给你们要。

代表：山西省委搞特务活动要控制左派。

总理：你们可别搞那一套。(当场记了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尔亭、省委常委刘开基的名字，并指示苏谦益打电话警告山西省委刘格平查窃听器问题。)

代表：党政机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用提拔保守派压制造反派。(总理记下名字)

总理：你们造反派有多少人？参加搞接待了吗？一个“长”字号也没有吗？

代表：三百二十多人，有部分同志搞接待，一部分搞运动。有两个副处长加入了革命造反组织。

总理：对。“长”字号的可以逐步吸收。

457. 周恩来、江青在接见外地来京部队同志时的讲话

(1967年1月31日 京西宾馆礼堂)

随同接见的还有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肖华、关锋、王新亭、徐立清、王宏

坤、李曼村、王峰等同志。被接见的有部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工厂等单位的代表。

周恩来：

同志们：我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你们好！

同志们，本来一月二十二号我已经向来京的工人、学生、军人，还有其他各方面串连的、联络的、上访的、请愿的、徒步串连的讲了一次话，六、七十万人听了广播讲话。那次讲话，是动员大家回到本地、本单位去彻底闹革命。接着在二十三号又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邀集了军队的院校、文工团、医院、军工厂来京访问的同志讲了一次话。因为那次邀请不够全面，再加上半个多月来的形势发展，军委已经公布了八项命令，所以主席、林副主席要我把发布这八项命令的主要原因向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传达一下，通过你们向在京的军事院校革命师生、革命组织、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工厂的同志们，向他们传达。

这八条命令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目前形势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个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我们《红旗》杂志评论员已经写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的文章，今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今年《红旗》第三期社论，更全面进一步讲了夺权斗争的必要性和它的政策。这篇社论是代表党中央的意见的，毛主席亲自审阅过，其中有些语句是毛主席亲笔改的，增加的。这是一篇很好的解释形势和夺权斗争的政策的文件。有了这个，本来我不需要多讲什么了，现在解释一下，说一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一个思想革命，林彪同志在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已透彻地讲了这个问题。再把伯达同志同一时期的讲话结合在一起谈，就会更清楚。

在去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同志就讲了这个本质问题。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要夺取政权。十七年前，我们已经由农村包围城市，依靠我们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夺取反动的政权，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权，解放了全中国。可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是不是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就结束了呢？不是的，这只是夺权的开始，而不是终结。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不断阐明了这个道理。另外，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好，其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好，虽把全国政权夺取了，但被夺权的剥削阶级并没有消灭，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面，还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来加强被夺权的剥削阶级想要复辟的企图，加强被夺权的剥削阶级的破坏因素。在国内是如此，还有国外，资本主义世界的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刺激了他们企图复辟的野心。毛主席远在我们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夜，一九四九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明今后取得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将要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个问题，经过我们在三大改造的时候，虽然在经济基础上把所有制问题基本上改变为公有制，有的属全民所有制，有的属集体所有制，就在所有制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有部分个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也还没有最后完成为全民所有制；何况还有对资本家采取的赎买政策，允许资本家在一定时期拿取定息，所以在经济基础上，分配的问题、劳动关系的问题等，这里面就存在着许多资产阶级法权，还有许多修正主义的东西完全没有改变过来。许多上层建筑是不是适合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呢？不。我们进行了三反、五反的斗争，五七年又进行了反右斗争，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我们更进一步在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从学术上进行阐明。从这以后，我们就开始了一九六三年的毛主席亲手制定前《十条》，通过两年的四清运动，总结了四清运动，在六五年又制定了《二十三条》，这就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当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给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有力的基础。但是这一切的斗争，象关于上层建筑的部分，都是夺权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剥削阶级不甘心退出政治舞

台，它要复辟，它要从我们队伍中把蜕化变质分子拖出去，另一方面又派遣他们的人打进来，腐蚀我们，破坏我们阶级内部，想用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腐蚀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实行他们所企图的和平演变。尽管我们在国际斗争中，我们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以赫鲁晓夫集团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南斯拉夫以铁托为首的修正主义，同一切现代修正主义、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毛主席亲自挂帅指导这个斗争。在国际上，我们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吸引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向着莫斯科转到向北京，现在对毛主席的信仰，尤如十月革命后对列宁的信仰一样。我们的成绩确实是二十世纪后半世纪的光辉，而且要显出更大的光辉。林彪同志在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过，毛主席确实是列宁以后的天才。如果说十九世纪的最大天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最大的天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是列宁和毛泽东。我想林彪同志这样的估价没有一点过分，完全合乎历史事实，也合乎今天的实际，也完全合乎今后的发展。那末，是不是这样就保证我们中国不出修正主义分子呢？不能这样说。毛主席不知多少次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们稍一懈怠，我们国内同样会产生修正主义分子。照我刚才说的，从经济基础上看，从上层建筑上看，我们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苗并没有拔掉。单单靠在经济基础所有制上的基本解决，单单靠过去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四清运动还不够，还不能解决。为什么？毛主席说，这些运动虽然是上下结合，上面领导，下面运动，就是由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结合起来。但是这些运动总还是偏于有领导的，是有了政权以后的一种正规作法，就是在正常秩序下进行，结果还不能把千百万、亿万人动员起来，触及灵魂。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了三年之后，我们仍然揪出了彭、罗、陆、杨这样的反党集团，由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抓出来了。正是由于这样，更使我们伟大领袖看出，单单用过去那种方式，用正规式的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相结合的运动，还不能进行彻底的思想革命。所以在去年五月十六日我们发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内部通知后，主席首先提议发表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写的大字报。这样的一张大字报公诸于世，公诸于众，动员了全国文化教育单位，首先是学生，随后风行全国，也就影响了我们大中城市党政领导机关。这样做，不管遇到了多大的阻力，总是形成了一个不可阻挡的蓬蓬勃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这个高潮从学校奔向社会，从北京奔向全国，从城市奔向乡村。不管你领导是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是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你们，站在你们的对立面想要阻挡你们，也是阻挡不了。事实证明了，六、七两个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向着全国发展，等到毛主席回到北京亲自决定撤销了工作组，亲自主持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八月八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这就使我们的运动更加向前发展。毛主席亲自发现了地平线上的新事物红卫兵，马上加以提倡推广，八月十八日接见了他们，加以鼓励，因此红卫兵就风行全国，奔向全国，冲击了大中城市，文化教育单位，党政领导机关，大串连就将形成，就使我们不得不来支持，而且必须支持，这说明这次运动的特点，就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最高指示来提倡，一下子就变为亿万群众的动员，基本上主动的是由下而上的运动。这样的方法，以雷霆万钧群众力量冲击着领导层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刘、邓那样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象那些坚持不改、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非冲击不可。这样就有可能把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根子，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冲掉一些。

这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第一阶段的特点，也就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经常说的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林副主席辅助下把我们每个人都包含在内的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和伟大的阶级斗争。

斗争既然是这样发展，那么革命的洪流就按照它的规律前进。它不会停止在我们主观愿望要求的阶段，比如说，分期分批呀，加以某些规定呀，不按你的要求，它要按照它的规律发展，所以跟着来的，必然要冲击到事业部门、企业部门、科学机关、设计机关，必然要冲击到农村公社、一切服务的单位，也就同样要冲击到军事机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

医院、工厂等等。我们面临这问题不能躲避它，更不能限制它，我们必须要迎接它。所以在去年国庆节林副主席首先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接着《红旗》社论加以发挥，几次社论都提到这个问题，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加以发挥，经过两个月的发展，到去年十二月份关于企业事业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草案)，然后又发表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条。这都是为着迎接文化大革命洪流作奔向全国的准备工作。今年看的更清楚，既然冲向全国，夺权的斗争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所以毛主席在发现上海的革命群众团体提出了这个问题，首先是他们的致上海全市人民书，接着他们就发表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十条经济措施，毛主席就亲自决定发表这个，公诸于世，公诸于众，这就成为第二次新高潮的信号，象第一次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并且毛主席预见到这样的形势出现，夺权斗争的矛头尽管主要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可是这个夺权斗争的范围决不仅仅限在这个范围，必定有连锁反应，会遍及全国，首先是中央各部门的，接着就是全国二十八个省市，更接着就会到下层去。为着迎接这个新高潮，主席亲自抓这个夺权斗争，不仅推荐了上海夺权斗争的经验，而且也推荐了山西夺权斗争的经验，今天又批了一个文件给我，要新华社发表，是贵州的夺权斗争宣言，我们相信跟着来的会很多。在中央各部门，我们还没有推荐。一些部门都在进行一个系统的夺权斗争。我们已经发表了一个财贸系统夺权斗争和它对于经济措施十二条的呼吁，这种夺权斗争很快地就可看到会遍及全国。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地进入阶级斗争的新阶段。为什么说这是进入了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呢？因为经过第一个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较量，两条道路斗争的较量，剥削阶级和它的代理人懂得，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不仅中国的反动派们有反映，全世界的反动报纸、资产阶级舆论，他也认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取得彻底的胜利，它的影响就不仅是中国，要影响到全世界。因为很清楚，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还多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中国，如果胜利了，把修正主义根苗挖掉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减少了，或者保证那么一个时期不可能来了，那末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对帝国主义的死亡将会加速加快。这一点，资本主义世界也懂得。而我们自己在这个“庐山”当中，也许常常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个祖国，林彪同志常说，我们这五个伟大，首先要我们这个伟大的土地，这么大的幅员嘛！因此，涌现出了我们伟大的人民，有了伟大的人民，诞生了我们伟大的共产党，随着共产党的诞生，就涌现出了我们伟大的领袖，几十年艰苦斗争经验，也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验，而且超过它，出现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出现了我们伟大的军队，不可战胜的无敌的军队，也就组成了、诞生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祖国。这些伟大，集中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便成为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我们中国的胜利，也要指导全世界革命的胜利。

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想一想，敌人怎么甘心它的死亡呢？它不仅在中国的希望破灭了，它的一切希望都要破灭了，它的统治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在全世界的统治也危在旦夕。所以它就要反扑，用尽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这就是两个阶段，一个结合的不同时期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反扑阴谋。经济主义是一种形式，当然这种形式是要破坏我们党的威信，扰乱我们的经济建设；还有矛盾上交，把一切问题集中到北京来，使你不能解决，利用领导同志的一两句谈话，曲解、号召全国到北京请愿，使我们面临着不是现在能解决的问题。有的事情，我们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上回答过；我代表我们中央在二十二日广播演说中讲了。因此，我们可以预兆，今后还会层出不穷跟我们进行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许多牛鬼蛇神会在这个斗争中暴露自己。这很好，机会好嘛！都出来了嘛！既然要进行这样的斗争，那我们靠什么保卫？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的伟大领袖敢于在这样的时期，世界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以中国为主要敌人的时候，敢于发动这个斗争，就是因为相信我们广大人民是支持我们党的，这是领袖英明的决定。也相信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能够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那我们根本不能进行大家所公认的，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这样一个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国

不仅过去已经出现了亿万人的动员，今后还要出现几万万人民的动员，由下而上的发动。在这样的时机，我们提出来，号召大家认识资产阶级和它的代理人的阴谋，它这是一种反扑，要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的深入，要破坏我们的夺权斗争，要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那么，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武装同志，在座的是一部分，你们要想一想，你们所负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想到我们整个的武装队伍所负的神圣的使命的重大。因为我们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不仅随时要响应祖国的号召，当着敌人来进攻的时候要消灭它，当着敌人来破坏时要歼灭它，还要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当着敌人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时候，你们应该站出来保卫它。所以中央军委的这个命令，就是说这样一个本质问题。当着我们进入这个新阶段的时候，我们军队必须改变过去所谓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过去的不介入，本来开始是红卫兵才发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讲的，在街上游行示威，群众集会，我们武装部队同志保卫他们，如果群众有争执，而我们不能够参加在一起争论，我们只有保卫责任。即使对我们警戒部队，骂了我们，打了我们，我们都有个规定：不还口、不动气、不还手、不开枪，在当时是对的。因为当时是运动的初期，阵线还没分明，都是群众革命的组织，这是对的。但是到了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化了，这个时候再提出不介入，就是不对了。那么就变成不支持革命的左派了，而这件事情呢，又恰恰在十月五号，在军委总政紧急通知里提到了，这个批语正是我们要批判的刘志坚把这个意思加进去的。把我们保卫群众的时候及群众跟我们争论的时候，我们不要动气、不要还口、不要还手、不要开枪，把这解释成为不介入，这是两回事。这就影响了我们部队一个时期给群众的支持。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夺权的阶段了，我们要挺身而出，要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因为现在阵线分明了，革命派绝大多数站出来了，他们要夺权，我们武装部队要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争取和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只要我们武装部队站出来支持，那就会影响群众的多数逐步地认识，靠拢真正的左派，这样就会孤立右派，便于我们坚持反对右派。从这个斗争中，就可以暴露那些反革命，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采取专政的措施，轻的可以孤立他，重的逮捕他，严重的法办，更坏的镇压。这样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的斗争有利。所以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为什么要我们军事院校、文艺团体、体育工作人员、医院和工厂的同志回去？就是不仅要进行本单位的革命，而且要帮助本地方的夺权斗争，当然首先也包含你们本单位的夺权斗争。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决不是一个消极的方针。因为同志们到北京来有些是两次了，首都的情况，经验交流你们也清楚了，面临这样一个新阶段，你们回去锻炼你们的身手，锻炼你们的本事，要在那个地方的大风大浪中去学习。不仅如此，你们的结合，你们的发动要比一般的学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工厂发动的晚，因为军事院校发动在十月以后，也就是说比地方上晚了四个多月，这就需要你们……(不清)就现在来说，你们也有了四个月，接近四个月，所以你们有了初步的经验，你们回去就有利了，就可以对于本身进行斗、批、改，进行夺权的斗争。对地方上要进行支援的斗争，这是一个有力的力量。不仅如此，刚才说了，我们部队所负的任务，原来就有随时听从祖国的号召，去进行备战的任务。实际上我们不仅备战，我们在东南沿海还有实际的战斗任务，我们在西南边境不仅有实际备战任务，而且还有支持越南的任务，我们对于西线、北线、东北线，我们还有防修、反对反动派的任务，东边还有回击美日勾结向我们挑衅的任务，我们要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要保卫国防。

我们有备战的任务，这就使我们军队的工作不能象地方工作那样，比如说普通学校可以放假闹革命，可以不管其它，机关可以拿很大一部分人参加，直接参加搞文化大革命，拿三分之一或更少的人来管业务，轮流的管。而军队呢？就象我们的工厂一样，是不能中断的，特别是交通一刻都不能中断。现在我们抓军队备战工作，就等于我们抓交通铁路，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不能放松，所以在军队内部，我们提倡要坚守岗位，不能擅离职守，这是个纪律。规定你工作时间，你就应该留在工作岗位。因为敌情不因为你闹文化大革命，它就不出现。敌机来袭击，它不因为你闹文化大革命他就停下来，相反地，还有可能利用空隙来捣乱。所

以我们站在战斗岗位上，就应该遵守规定的时间八小时，不能离开。换班以后当然可以闹文化大革命，如果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也允许，但我们值班的时间就不能擅离职守。万一有特殊任务，要报告。这并不妨碍你们在业余时间、在规定时间以外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军队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有它的特殊性。这不是消极的方针，而是积极方针。这表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光荣的任务，既革命又工作。你们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搞的是革命，同时又是业务。

至于军队内部的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工厂，这些工作、这些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那当然和地方上是一样，它本身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同样地进行。所不同的，就是它对于上级的军事领导机关、保密机关都不许去冲击，因为那里有备战的任务，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有边防任务，临时支援国外的任务。一中断了，那就不利于反帝、反修、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就同样地对革命有损失。所以，分开的界线并不限制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工厂本身的斗争，本身的斗批改，夺权斗争还是很艰巨的。因为时间还很短，要把它搞彻底。这些地方搞的彻底也就是备战工作，也就是对于将来的备战，会很出色的完成你们新的任务。而且经过文化大革命还会涌现出很多在制度改革中出现的新的军事人材，很快地成长起来，成熟起来。

第三条中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并不是说没有敌我矛盾，对敌我矛盾应该按敌我矛盾处理，可是不能把对付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至于“不允许”的那些事情，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不要使它出现。那么有的同志会问，如何才能使它不出现呢？这在斗争中可以考验出来嘛！经过调查研究，材料的揭发，同志们的讨论，斗争、批判，就可能看出来是哪一类矛盾。如果彼此有争论，还可以观察他一个时期。可能各人看法不同，一个时期不能取得完全一致意见，时间长了，斗争久了，就会逐渐被大家认识。在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求这样写：没有命令，不要自由捕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因为是解放军。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你这样一做，就引导成了打态度，打威风上去，用各种方法，要攻心为上，要触及灵魂嘛！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而不采取体罚。武斗只能伤及皮肉，反而引起些中间思想的人觉得做过了，同情他，不能够真正触及他的灵魂。这种斗争方式不利于争取中间，也不利于把这种方式传给后世。主席说了，我们的斗争方式在解放军就应该文明一些，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子弟兵，是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文化的，是劳动人民出身的武装部队。

关于冲击的问题，主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因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很容易使军事领导机关瘫痪。因为随意逮捕、随意抓人，不仅把部长捉了，副部长统统捉了，司、局长也给捉了，常常几天找不到。我对军队部门不熟悉，但是我对国务院是很清楚的。我可以找一个部门事情，造反派虽然起来了，但只能监督业务，但还不能熟悉业务，他们没有丰富的经验，原来熟悉业务的几个人都被揪走了，不知去向何方。多少天找不到，工作停顿，打电话，电话断了。同志们给我想一想，这个对于我们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主席的号召的方针有利吗？今天已是一月最后一天了，离春节只有几天了；离春耕快的不到两个月，慢的三个月。“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动员粮食局今年要抓紧粮食问题。去年这时正是克服北方八省的灾荒，在前年年底，去年一月大抓了这个问题，对去年克服灾荒起了极大的作用。去年粮食产量超过前年，是解放以来最高的一年，照报告超过四千一百多亿斤，实际上差不多是两亿二千万吨左右。今年到现在动员还不够。因为粮食是一年一度的。当然有双季还有三季，但是开始你要动员，不仅是冬季盖土、积肥，你还要做一切的准备。生产上有农具的问题、化肥的问题、农药的问题、燃料的问题等等，牲畜的问题，水、抽水工具的问题、种子问题，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抓到底，譬如说拿农药这一环来说，从中央一级撇开，直接通过部门到省、地、县到公社，那也得四天。你们军事的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备战，我们国防工业的布置，你们在座的有国防工业的军事院校，现在我们都是要找部长很不容易找，部长多数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

总是要批判他吧！在现在的夺权斗争，一般地说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来说是监督业务，这是一般的。当然也有些部门可以，有的部门连业务的领导权也掌握了，这是少数。有些部门连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暂时也不夺取，这也是少数。所以不论是国防部门，不论是工业、农业部门，我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夺权斗争比第一个阶段繁忙的多。

我们必须彼此协商，要尊重群众的意见，每个部门都要回到本地，每个部门都要和你们协商你们院校怎么做。院校你们当然可以夺权。工厂夺权就需要研究，要和领导它的部门协商，你总要把业务班子组织起来吧！而且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如果自己斗批改有了成绩，还可以腾出力量来帮助国防工业，甚至帮助地方工业和运输来宣传。如现在的铁路运输始终还没整顿好，如果帮助宣传运输，那就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可以做，绝不是没有工作可做。

我们总是要求如命令中所说军以下的部队要有它的稳定性，这样来保卫我们的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这同样适用于军事领导机关和保密的部门。这绝不取消你们对军事领导机关提意见。可以送大字报，可以写意见信。对于你们给他们的检讨意见，必须回答，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夺权斗争搞好，也不妨碍你们本身的斗批改，还可以帮助地方的夺权斗争，又有保证我们在抓革命中保证业务、战略、国防工业生产。

这里要特别强调高级干部教育子女的问题。对于高干子女要严格地进行教育，要取消优越感，我们都应该跟老百姓一样，平等待人，我们要做群众的小学生，你们在群众中也应该如此，不能高人一等。过去的“西纠”后期的反动的活动和现在的“联动”的反动活动，我们要制裁，停止他们的反中央、反中央文革的反动行动。少数逮捕，还要教育，目的是教育他们，我们希望教育他们回过头来，成为中华人民的好儿女。我可以给你们宣布，我们国家副主席、党的元老董必武同志，他的小儿子，叫董良国，我亲自打电话给董副主席，他在广州，他亲自教他儿子到北京自己到公安部、公安局投案。尽管他一时思想不通，经过教育，慢慢可以教育好的。家庭教育不好，学校教育不好，用这样的教育，还是希望他们成材，毛主席用这样的方法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我们好好地把你们培养成为可靠的无产阶级接班人，希望你们后来居上，胜过我们，如果我们看到你们好的地方，朝气蓬勃、热情勇敢、敢闯敢干，我们不支持你们，那是错误的，那我们是右的。我们要鼓你们的干劲，鼓你们的革命性；但是另一方面，你们做了些错事，说了个错话，我们不告诉你们，任你们这样做下去，林副主席提倡的科学性，我们不告诉你们，任你们这样做下去，如果你们把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我们党内、军队内的一部分坏习气，骄横跋扈，做小动作呀，猜忌排挤呀，这些坏现象，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分裂主义等等，古田会议上说的那些，我们不告诉你们，不帮助你们，那我们是犯罪！为什么？因为主席、林副主席希望你们成为很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仅你们，还希望你们教育你们的后代，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子子孙孙，我们国家不变颜色，党不变颜色，如果我们只是称赞你们，只说好的，看到缺点毛病一句话不说，拿我个人来说，我心里也很难过。因为我们亲自听到主席的教导嘛，听到毛主席教导还常犯错误，我们怎能不把这些教导告诉你们呢，我们常常接近林副主席，我们怎么不把林副主席的话告诉你们？将来看到你们犯错误，这样代代下去，那怎么行呢？不仅将来，就是现在国际上敌人就要看我们的笑话，说你们的阶级教育、文化大革命也不过如此啊！使我们领导机关瘫痪、无法工作，不分敌我，不讲阶级路线是不行的。举例说，北京军区彻底批判杨勇、廖汉生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它扩大化，不能把许多人联系起来，这就会重复我们党的红军历史上肃反扩大的错误，这就不利于全军的团结。就全国大军区来说，北京军区是第二个大军区，又在北京，我们不能不找在座的北京军区的人。我前天听徐向前同志说，就是前天晚上讲了一夜的功夫，把许多事情跟他们讲，目的是什么，告诉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因为这不是一部分的错误，这样传下去会造成我们党内军内不好的风气。这是杨勇的阴谋，他要把清水搅混，这是不允许的。把我们人民内部矛盾都搞成敌我矛盾，那怎么行？所以必须制止，必须找一部分人来谈，这是为全军着想，为全国着想，为后代着想，为全世界着想。

我们要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真正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好接班人，使世界的革命事业能加快地前进，这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希望，我们根据他们希望的意见，我自己发挥了这么一段话，供你们参考了。完了。

江青：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为的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向你们学习。也有歉意，因为没有能充分听听同志的意见，对你们许多问题，我也搞不清楚，我个人很抱歉。刚才总理讲了很多，我只想在这里讲这么几点。

我对同志们、战友们革命精神是很钦佩的、敬仰的。但是革命总应该有个秩序。现在中央军委发了这八条命令。我们虽是院校、文工团、体工队，还有军队工本，基本上都是军人。军队和革命群众就应该遵守一定的纪律，特别在文化大革命、大民主的时候。如果没有纪律性，民主就没有保障。所以军队在斗争的新阶段，今天《人民日报》登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同志们都看过吧？（众：看过。）我建议同志们好好学学。

军的八条命令是在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坚决支持左派所采取的一种革命的措施。这八条命令，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应该遵守的。象在早一时期那样子到处捉人，到处封门、搜材料，方才总理讲的，比方说，象我对同志们是不了解的，没调查没有发言权。如果我要对同志们采取什么措施，我就必须做很多调查研究，我对军队就有很多不了解，应该说是脑子里没有底。难道同志们就会对军队许多事情就了解了吗？我想同志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看到某些现象，就觉得唉呀，这些问题可能是很大，就这儿冲啊，那儿冲呀，一下轰起来了，这样就使我们的战备系统就有紊乱的危险，这对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对战备系统、保密系统，我们应该绝对遵守党的纪律，军队的纪律。

对于军队院校当然也有不同的情况，大体上院校、文工团是可以通过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解决问题。现在同志们已经来到北京很久了，可能有个把月了吧？有了，有的可能还早一点，脱离了本单位，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别人都不能包办代替，要求同志们回去进行夺权斗争，逗留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就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同志们也不能对北京的单位进行包办代替，因为同志们从自己角度了解的东西，不一定全面。所以还是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搞文化大革命，那也不见得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在各个堡垒里可能都有人，而各个堡垒都需要自己起来闹革命，外人是不能包办代替的。我们也不能对同志们的革命包办代替，我们只有听同志们的革命经验，赞扬同志们的首创精神，而不是指手划脚的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是违反主席思想和主席教导的。

今天我也没有什么精神准备，调查研究也没有，只能对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致敬。希逗留在北京和外地的同志们，要回本地、本单位那里去，向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是比较迫切的。斗、批、改不是那么容易的，堡垒要一个一个的攻克的，而不是老是在那里冲啊，轰啊，那样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象总理刚才讲的，希望同志们在这方面响应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回到本单位去闹革命。留在北京久了也就脱离了实际，脱离了自己本单位那个实际。我这点意见只供同志们参考。因为我没有调查研究，发言权也就不多，我希望同志们谅解我。我的话完了。

458. 叶剑英在接见济南军区机关革命组织联合造反团时的讲话 (1967年1月31日)

大家都是济南领导机关的革命干部，……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都是有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同志，对我们党的政策应该是很能理解，很能掌握的。听说你

们在济南，对济南军区推迟文化大革命有怀疑，到北京来问一下，是这样吗？

毛主席对军区文化大革命开展的时间没有专门的文字、电报，因为不是专门谈这个问题。但是毛主席是有指示的，如果同志们对我相信的话，我以党性来保证。同志们不要机械的看，要理解主席对文化大革命战略布置的问题。要理解主席指示的精神。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坐在主席身边，我对主席说，地方乱，军队不能乱。主席说：军队要分期分批，要推迟，要和地方错开。全国有十三个军区，已开始的有六个军区，加上一个北京军区。一开始是很猛的，如果十三个同时开始，对保卫文化大革命任务和保卫国防是有影响的。因此要分期分批，有先有后，你们沿海几个军区(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新疆、武汉)不是不搞，一定要搞，要分期分批搞。现在已进入夺权斗争阶段。济南要夺权，青岛要夺权，烟台要夺权，徐州要夺权。主席指示：军队不是不介入，而是要坚决支持地方左派夺权。地方每次夺权，都要军队去支持，听说济南光左派(组织)就二十多个，互相争夺，甚至打架，军队很为难。如果军队搞瘫痪了，自顾不暇，哪还能支持地方呢？你们要按主席指示，分期分批，等地方左派占了优势，优势就是地方左派大联合，壮大力量，地方上的右派、保守派已经瓦解，地方稳定了，我们才能开始搞。

你们济南军区属于推迟的单位，要拿出主席亲笔的没有，亲口的是有的，命令上也写了。现在军、师、团、营、连搞正面教育，将来地方稳定后，军、师也可能搞四大，但要看形势。

帝、修、反、苏修公开挑衅，殴打我留学生，过去我们到反修路游行，他们很害怕，把门关得紧紧的。这次他们把门开得大大的，有意要我们冲。新疆有××人跑到苏联，就是苏军不来攻，他们组织返乡团一类的来是可能的。有些反动组织，象红旗军、赤卫军，在城市活动不行，到农村去了。要注意。文化大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军队要在地方稳定之后才能搞，不给敌人以可趁之机。这是主席的思想，主席的指示。林副主席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断指示，我们是根据这些指示制定了八条。命令是大前天通过的，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徐、聂和我一共六人讨论后，毛主席亲自签字的。为什么不先发表，也不后发表，这是运动的掌握，火候的掌握。同志们要很好地学习。你们的司令员、政委回去，要等毛主席点头。

(毛主席一月十二日是否有过指示？)不仅主席，还有林副主席决定的，就我的记忆，不是针对你们济南，还有一两个军区，有开始的要求，跃跃欲试，我们用电话请示了主席，主席重申还是要分期分批，地方乱，军队要稳定。

你们济南军区当时不是跃跃欲试？(不是的，我们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你们这样热情，这样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说明你们济南军区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是很高的，你们这种革命行动，革命造反精神，我是完全支持的。

现在是不是没有机会给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呢？有的，时间不是遥遥无期的。你们回济南，等地方稍微稳定，左派占了优势，才开展，当前左派正夺权，在全国来说，左派还不是完全占了优势，军队支持左派夺权，要用很大力量，支援地方左派夺权要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左派多得很，左派之间还有争执，军队要插进去，做联络工作、团结工作、调解工作，左派的革命精神很高，但有的左派有小团体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要把红军的老传统，古田会议决议念给他们听，教育他们克服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

(我们军区文化大革命暂不开展，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能不能搞“四大”？)对军队要不要搞战斗组织，大串连，党委领导。我们认为比较复杂，这个问题准备看一看。组织形式是不是按单位编制搞战斗组织比较好，这样互相熟悉，有利于战备，有利于工作。

对一个人要全面看，要有基本的估计，要从几十年看，看他全部历史，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从整个树林中研究这棵树，对一个老同志要把他几十年联系起来看，看他是基本革命的，还是基本上是反革命的，如果基本上是革命的，他有几件事做错了，有几句话说错了，要分析，要弄清楚。同志们回去斗争，要掌握运用“十六条”，八条，不要在批判人家错误时自己也犯了错误。你们回去是不是可以批判你们领导人的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哪有不可以？可以批判。而且肯定要搞四大。问题是回去后就搞，是等地方稳定后才搞？

对罢官问题，毛主席也有指示，有些人要罢官，但不能罢的过早，罢早了，就没有批判斗争的对象。定性质、罢官是批判斗争的结果。林副主席指示，罢官，要根据是非，不要根据山头，光搞山头，对我们军队有很大危险性，不是凡是贺龙手下一个好的也没有。那样就会搞的人人自危。这也是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

(杨得志插话：有次开会我问肖华主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搞法？肖主任说，一定要批，可以学习、讨论，有批评意见可以提出来的。)

军委的常务我管。文化革命有军委文革小组，这个问题，我要同徐向前同志商量，我个人认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定要批判，一定要搞四大，学习、讨论只能是批判前的准备，我们号召革命者要勇敢地跳到熔炉里去烧，烧成钢，但也不能烧焦。分寸你们要掌握，要顾全大局。如果是三反分子，烧焦了也不要紧，但好人犯错误不要烧焦。看来你们是要向上冲了，势在必冲，这个问题，等我和徐向前同志商量以后再告诉你们。

你们已经搞了的(指重点单位)就不要停了，但要掌握“十六条”、八条，不要搞喷气式，喷气式是天津发明的，是天津工人对付资本家的，主席对喷气式批评了几次。

同志们很好，革命精神很强，掌握的也很好，战斗组织也是可行的，但八条还没有规定。济南军区(指革命群众)水平较高，作风比较正。但要注意可能有人冲击你们。你们都是经过锻炼，从战争中锻炼过来的，要爱护我们的军队，拥护我们的领袖。林副主席讲，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能比地方差，而且要比地方搞得更彻底。不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我们就不可能保卫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上台下台都是武装力量搞的，武装力量不能马虎。

(机关文化大革命是由党委、支部领导还是由革命组织领导？)这个问题，八条没有，讨论时有人提出成立文革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党委不直接指挥文化革命，党委开会可以由文革派人参加，党委不直接指挥文化革命，文化革命由你们指挥，这一条正在讨论，还没有决定下来。党委不能取消，党委个别人冲掉了，有问题，可以补选，全部烂掉了，可以改组，这不是固定的，可以依靠群众创造。

(机关重点部门的领导烂掉了，可不可以夺权，怎么夺法？)革命军队不夺权，不行的采取调动撤换组织形式。文革可以和党委商量。如果部门领导全部不行了，干部没调来，革命群众可以暂时掌权，不能停锣息鼓，他们不敲我们敲，锣鼓自己敲起来。部长要配上，你们可以选，可以从运动中年轻有为的干部中选，由干部部门研究，最后还是要回到编制上去。

(机关职工、战士能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应该参加，不能让他们站在旁边看。他们是劳动人民，不能看不起他们，看不起，就是忘了本。但是，战斗分队是拿枪拿炮的，不搞四大。

(医院、疗养院搞不搞文化大革命？搞不搞四大？)有正式文件，马上下发。

(关于支持地方左派夺权问题，有些领导人至今还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能不能指挥部队支持地方夺权？我们革命群众不放心。)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好，应该有这个警惕，窝藏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的东西，要批判。如果是真正的好同志例外。你们可以反，提出来交给群众信任的人来指挥。你们可以派几个人参加党委会。

(根据记录整理，内容有删节，供参考)

459. *毛泽东关于夺权问题与周恩来的对话(1967年1月)

(见《系年录》第六十一卷)

460. *林彪关于朱德问题的讲话(1967年1月)(见《系年录》第六十一卷)

461. *林彪在中央会议上谈邓小平、陶铸及“二月兵变”(1967年1月)
(见《系年录》第六十一卷)

462. 周恩来在与工交各部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1日晚 国务院小礼堂)

一、关于夺权问题

工交二十三个部门，首先是个夺权问题。这是现阶段最紧迫的。政治思想革命进一步深入，就要夺权。基本上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子的权。但是这次夺权，与初期红卫兵炮打司令部一样。红卫兵的出现是件好事情，主席支持，一下子推广到全国。红卫兵的口号就是“炮打司令部”，因为主席写了这么一张大字报。红卫兵跑到全国各地，不管你那儿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没改，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轰它一轰。当时，我劝当权派不要反对，反对就与群众对立了，不要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给自己定调子，这样就等于说红卫兵炮轰司令部是错的了。我们给各部委、省市打了招呼，引火烧身。让大家打一打，如果你经受住考验，就好；如果确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揪出来。但这样并不等于各部委、各省市统统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能，结果事实也如此，有许多当权派站出来了，和群众站在一起，得到群众的支持，证明炮打得不准，过了这一关。

夺权的问题还是如此。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权，照主席的讲法就是指那些屡教不改的人，不是每部都有这样的人，也不是所有的当权派都如此。但是，也和炮打司令部一样，会形成连锁反应，都起来夺权。工交二十三个部门都夺了权，纺织部内部造反派未形成，外部要帮一下。国防口、农林口、文教口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但也夺了。各省市也都在夺。我们摸了一下，山西是自己搞起来的；上海是最先搞起来的，但问题没解决，还会有反复；贵州我们谈过了，回去要发表第二个宣言，过去他们落后，今后也可能先进。我们正一个一个地在摸。我们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权，但不能说都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或代理人，各省市统统都是资产阶级黑线，那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哪儿呢？我们要利用夺权把干部都考验一下，这样有好处。

我作了分析，真正烂掉了的，非夺不可，完全接管的，象国家科委韩光一伙。科委是由下而上，按张本的说法，是通过两派斗争，孤立烂掉的，然后把权夺过来；条件不成熟的，领导比较好，进展慢一些的，各省市都有，但是少数；大多数，是领导班子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屡教不改，要揭露他们。其中，也有与这些人意见不同的人，斗争过，这次在群众面前亮了相，站在群众一边。对他们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对那些要罢官的人中最坏的要捉起来，象彭真那样的人。有的撤职留用，定期考查，带罪立功，以观后效。有的停职留用，定期考查，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时间可以长点。有的监督留用，给他业务，监督他。有的可以留用，业务可以监督。

初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把党、政、财权夺过来，业务上进行监督，计划预算要经你们同意，经济主义不能乱搞。党委不起作用了，革命造反派组织起作用，党员都要经受考验。业务上的监督要逐步吸收那些改过自新的，监督留用的人一块儿搞。我们自己这部分要逐步地充实科长以上的人，首先是能革命的，业务熟悉的。如果革命意志衰退，只能监督留用，不能领导。

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干部要逐步从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数量上的优势，取得优势后，还要防止坏人钻你们的空子，思想要不断前进，生产也要不断前进！现在领导运动好又领导业务好的部门，我还没发现，过一阵子会发现的。

最重要的是从二月起，先把本身健全起来，向横的方向扩大，争取多数。以部内为主，争取外部的声援，条件成熟，再扩大到全国。铁道部要迅速扩大。本部门造反为主，外力为

辅助，本部门不行的，外部门再支援。

所有夺权的单位，今后我们发文件。一方面发给管业务的单位；一方面发给夺权单位，不管党员非党员都发。

机要人员保不保，要看怎么保法，他站在保密角度，不准人冲，这是忠于职守。思想可能保守。抵抗造反派，敌视到底又是另一回事。要一分为二，事情总不要看得绝对化。

我们承认你们，和你们挂号。我们有分工，富春同志负责处理你们的具体问题。我呼吁你们，现在就来建立正常的革命秩序。提几个要求：一般的事情，你们可以写给国务院秘书厅，让他们摘写给我。紧急的事情，国务院搞个联合办公室，设几台普遍电话，军用电话和专用电话，号码告诉你们。十分紧急的，把我们归口副总理的电话告诉你们。但要等稳定了后。一方面告诉管业务的当权派，一方面告诉你们。属于革命的问题一定和你们打招呼，关于业务的，找上当权派，与你们一块儿谈。

你们的指挥系统层次不要那么多，逐步改。过去我们谈什么，要部长一层层转达，现在直接和你们谈了，国务院现在抓业务的副总理有六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毅、谢富治……分工还不够呢！各口的政治部都不管事了，他们自己就搞不好，工作组大多是他们派出去的，学生们起初认为他们那儿油水很大，进去一看，没有什么业务可抓，又退了出来，让他们闹革命吧！

国务院的联合办公室要联络各方面，要有帮手。工交口找了谷牧和余秋里。文教口多数去找中央文革。文化部、教育部叫他们闹革命去！小学、初中一开学，就有业务了。现在最乱的是卫生部，医疗预防不能丢下。运动、业务班子怎么结合很复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可以直接给中央办公厅，转给中央文革，转给我；关于业务问题可以找国务院秘书厅，有时可以直接找我。电话告诉你们，保持联系。

你们汇报后，我们要一个一个部的抓，工交口请富春同志、秋里、谷牧同志抓，我还要抓别的事。总之，要在工作中对干部来个考验。

各部的编制，错误的东西，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如经济主义，矛盾上交……等等，立即废除！文化革命以前的，与今天无直接影响，如劳保、工资、补贴、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复原军人问题，……我们个别解决。造谣的，我们发通告说明清楚。

总工会，没有你们搞得好！青年团，没有红卫兵搞得好。妇联、青联……没有事干，主要是闹革命！他们都是官僚机构！你们去帮助他们，主要还靠他们自己。

部长、副部长的一切行动由你们负责。如果叫人揪走了，我们就找你们！你们在部大门上贴上公告，任何单位要抓人，必须找你们交涉。丢了人找你们负责，全部交给你们了，好不好？(好，鼓掌)

(二轻部谈到有人抢印问题)造反派自己是否站住了？(站住了！)站住了就好，印让他们抢去，抢去就抢去，宣布无效嘛！具体的业务你们要加紧学习，小业务你们监督，大业务你们审查，错了，叫他改，不要什么都管，不然你们就要成事务主义了！

(纺织部谈到上下不沟通问题)参加夺权的同学们，你们要动员同学下去沟通渠道，有什么问题打电报来，谈谈是原料问题、运输问题，还有设备问题……。

(纺织部谈到钱之光给司局长撑腰)你们怕什么，夺过来就完了，给我们打个招呼。要把部里的造反派扶植起来。最好是内部为主，内部没成熟的，外部才帮助。外部只能处在帮助地位，内部的造反派一定要相信。不要包办代替，现在要团结在一起，不要互相指责。

二、关于大联合问题

队伍不纯的，如有成员过去犯过错误，要耐心教育，屡教不改的，再开除，不要少数问题一不一致，就开除。吸收成员也是，要在斗争中逐步吸收。我在铁道部给他们开了八次会，今天上午还在开，他们一有不同意见，就把一个组织开除出去，排斥他们，私心要除啊！要耐心等待，给充分的时间改正错误，要允许不同意见的人答辩。

三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二月一日三版《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

派大联合》)是学习《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体会，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念第十小段，念到“这个‘私’字，就是很多同志头脑里的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话说得最透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头脑里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一段说得更透了(念第十一小段)光夺人家的权，不夺自己头脑的权，同样不能取得夺权的胜利！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毛病。对自己要“刺刀见红”，这是红卫兵常说的，对敌人的方法。这段最深刻了，拿主席思想，有新的提法。意思就是我们既要参加思想革命的队伍，同时也要把我们作为思想革命的对象，拿无产阶级之矛，攻我们头脑的资产阶级之盾。我听你们向我汇报了很多别人的坏话，就没听你们讲自己不好，这是很多人的通病，我和你们见了三次面了，讲错了，你们指出来，我很欢迎。我是满心热情地帮助你们。

(一轻部几个组织在会上因夺权问题争了起来)我建议你们部里的四个组织，院所的几个组织，北京和天津学校的几个组织，三个方面，各派六人，十八人开个圆桌会议，共同协商接管问题，设一个临时机构搞接管工作，不要排斥任何一方。各革命组织内部的问题，回去整风，内部解决，不要拿到圆桌会议上争。这样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答：我们回去协商。)

有人写条条给我说：“不光有‘私’字，还有坏人”。你们怎么不明白呢？你们把自己的“私”字都去掉，大家都为公，坏人就暴露了。大家都为私，坏人就利用了。三司的文章，那几段话，主席特别赞成，叫我们学。

三、关于区别对待当权派问题

最近，中央有些直属部门批判有问题的当权派，总是轰上台去，也不允许他回答，好象斗地主、恶霸、反革命等最残酷的敌人一样。根本让他无答话的可能。这种方法不符合主席的整风的思想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红旗》三期社论你们好好学一学。

在国务院负责抓业务工作的，你们如要批判，要给我们打个招呼，好排个队，让他们去检查。我们要彼此信任嘛！不要抓人！

我给你们念一下《红旗》第三期社论的第三段(边念边讲)，很重视你们革命干部的作用啊！……你们是处在夺权骨干和“夺权斗争中的领导”的地位。

(念到第二小段)这些领导同志在党内进行过斗争，你们不知道，是在党组内进行的。你们要相信他们。他们站出来，支持你们，你们把事情搞清楚后，就一定要相信他们。(念到不分青红皂白……)这是不合乎阶级路线的。陶铸在一次接见中南学生时就讲过，除去毛主席、林副主席都可以怀疑，看起来表面是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孤立毛主席。任何怀疑、打倒都要有根据。对领导干部一分为二，还是有好处的。

(念到第三小段)你们造反派中大多是科长以下的干部，这样初期有好处。领导干部，包括从科长到部长，如有在斗争中亮了相，站在你们这边的，你们可以逐步地部分地吸收他们，吸取他们的经验。

(念到第四小段的“而且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这是主席加的。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接近右的，要教育，一次不改，两次，允许他们将功赎罪。主席最反对一棍子打死。好人也不是百分之百都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主席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之后三十几年来一贯的方针。主席对王明、博古、瞿秋白、陈独秀都是这样。对外国的，如斯大林和所有有错误的人，别的党学苏共后期的经验，一棍子打死，主席就不是赞成一棍子打死。在你们看来，凡是犯错误的，都要戴高帽子，挂牌子，那全国有多少？这不是把主席的干部路线贯彻下去，而是高岗的路线。他就是高兴的人就留，不高兴的人就打死，比较起来，陈独秀对人还宽一些，当然他是资产阶级立场，立场错了。高岗如此，饶漱石也如此，他认为好的，连特务都用，认为不好的，一脚踢开。彭真也如此，认为好的人拉过去，认为不好的人一棍子打死。张闻天在外交系统也是这个政策。彭、罗、陆、杨最突出的是罗瑞卿和陆定一用人为私。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有这个倾向。特别是刘。我们反对这个错误。我们不要重复这个错误，如果把这个错误带过来，就不是紧跟毛主席了，就不是按主席指示办事了，就是瞿秋白、陈独秀、王明、博古，高岗、彭、罗、陆、杨和刘、邓的那套搬来了。这

不是完全背道而驰了吗？和同志们谈谈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主席的思想在书上写，生动的例子不能全讲。

你们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游街，本人能服吗？这是变相体罚。你们有句话：“打下他的威风”，我看打不下！北京医院有个党委书记，不好，他们把他搞到卡车上，后头跟一大帮医生，从西单，东单绕了一圈。群众问：是谁？“党委书记”，群众说：“这是小脚色，没看头！”他坐车，挺舒服，你们走路，没坐车，有什么意思？给外国记者拍了照，说你们的斗争就是这个样！攻心为上嘛，要让他心悦诚服嘛！他本人不心悦诚服中间群众也会反感。薄一波、彭真还可以看一看，一个医院的党委书记有什么看头！看了也记不清！中间群众大多数不赞成这个办法，造反派就得不到多数的同情，失掉了多数，就很危险。“否则是很危险的”这是主席加上的，你们熟悉的，一看就看出来。不仅过去犯错误的坚持下去危险，就是过去正确的人，犯了错误不改，也很危险。我们诚心诚意地告诉你们。

(念到第五小段)这是主席加的，对机关干部绝大多数作了肯定，也包括你们在内。你们是干部中的造反派，核心力量。

(念到第六小段)不能看轻你们。对你们看不起，站在旁边指手划脚，不能允许；站在你们后头不说话也不行；站在对面反对你们，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的，应当是站在你们之中，作得对的就支持，有缺点就提出。

同志们，社论的这一段很全面，各方面都说到，你们要好好学习。

四、关于黑材料

(总理问建材部长赖际发)你能否保证全部查封了？要以革命党人的党性、阶级性来保证。你作好了这件事，也是一个考验。

(建材部谈到查封以后又发现黑材料)有人是有意的，有人是忘了。举个例子。叶林抽屉里有一封三年前薄一波写给刘少奇的信，被蒯大富突然袭击搞出来了……他郑重其事地给我和江青同志看，说薄一波十一月份还密谋十二月开会。我一听就不大相信，时间不对头。薄一波去年十一月份不在北京，他也没这么大胆。可清华井冈山一下子就给铅印出来了，不可靠啊！叶林确实是忘了，他要有意，自己早可以查一遍撕掉。等你们管事时，你们的纸条子也少不了，也有放到哪儿忘了的事情……一定要区别对待，这是毛主席的思想，有的是无意的，不要一下就开除党籍，谁来开除呢？造反派？开除这么多怎么办呢？把事情搞清楚，后期再处理。把材料封存起来，现在先搞夺权斗争。

同志们，我建议你们按毛主席、中央的指示办事，留下有价值的作批判材料，其它的一律烧掉，不然就要影响后代了！

这件事等夺权斗争以后再搞不行吗？摆后一点没关系嘛！现在追黑材料普遍成风，脑筋都花到那里去了！追有政治性的大文件嘛！有些单位鸡毛蒜皮的也追，越追越低级，把大的革命的政治方向都丢了，忘记政治统帅一切了。你们造反派不要把大家引到细节中去，这是很重要的。

五、其他

(建工部汇报刘裕民一月十八日同意恢复借调关系，致使大批三线工人离职回原厂)这是变相的经济主义！这完全是一种新反扑嘛！你们把这个写成详细报告，把你们的建议也写来，将来国务院和你们造反总部一起下命令。这些当权派，都是在最关键的转折时期出来，讨好部分工人，保他们自己。这样，搞不好会犯罪的，结论以后再下。

现在有些人以开大会为满足(指全市大会)，开一个会又一个，连会议文件都没商量好，主席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要光欣赏琐碎事，要抓大的。

(谈到谷牧问题)谷牧不是和黑帮一起的……。薄一波相信宋邵文，他知道薄、彭的一些事情。孙志远，薄是用的，后三年用谷牧作助手，薄的野心是把经委、建委、计委合起来，他作经济统帅，他在主席面前透露过，主席印象最深，后来我们提议搞一个计委班子，主席亲自点了余秋里。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甚至反对王铁人(台下：还游了街)我很

着急，(此时总理很激动)恨不得飞去看一看。大庆前几年确实不错，很有成绩，罗马尼亚都承认我们先进。一面红旗，我们为什么自己毁了呢？有错误允许改嘛！我一提起这事就很激动，五年的成绩，确实不错。后两年骄傲了。贺龙反对主席点余秋里，小平反对点余秋里，我打电话给他们说不能反对。计委的造反派，你们年青，要谨慎，你们掌了权了。你们要让余秋里把计划问题向你们汇报，我同意。余秋里是军人，惯于发令，有缺点。“智者必有一失，愚者必有一得”嘛！我同意国家计划向你们谈，但你们的队伍一定要纯，谁泄露了按国法处理。在政协会议上，有个张东荪把我们的预算送到香港去，现在我们还看管他。计委的同志，我委托你们，信任你们，你们要负责任！严格审查。如果计委上层分子传出去，同样严办。高干子弟杀了人，我们都投案，何况泄密！

关于谷牧的问题我早讲过了，他犯了错误，执行了刘、邓路线，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材料说明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国务院有工作，检查定好时间，叫他回去。不要揪来揪去。一个余秋里，一个谷牧，他们不属于哪一派。余秋里肯定不是贺龙派，他是二方面军的，是王震系统，当勤务员上来的。谷牧也是当兵的，他们与彭、薄都无历史关系。

薄一波的思想乱，一会儿右，一会儿左。有人说他每年把自己的话编成一本东西，和主席对他讲的话摆在一起，到现在我还没看到，到底有没有？(经委同志：有！他要烧清样)你们给我搞一本，这就为党立了一大功。我不大相信薄一波这么仔细。也可能他早有准备，和彭真一样，也没准。薄一波难道比彭真更精明？他的思想是接近高岗的。

(当谈到合同工、临时工问题时)北京街上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照办？你们要顶住。凡是沒有正式文件都不能信。

你们回去检查一下，任何全国性的联络站都不能成立。只能留一两个人。其它一律撤销！

李富春：总理今天的讲话可以原原本本向群众传达。

463. 周恩来在工交系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 国务院礼堂)

(建筑工程部汇报情况)

总理插话：关于建筑工程兵的问题，要谷牧回答，要允许人家回答问题，不要轰上台，象斗地主、恶霸那样，那是对反革命。对内部问题要允许人家答复，这种方式不合主席的整风思想和斗批改的思想，要很好的看看《红旗》第三期社论。

谷牧有错误要回来向建委、建工部检讨，但关于成立建筑工程兵的事，我向主席汇报过，林副主席也知道此事。工程队伍东调西调，家属搬迁工程忙闲不均，工程急时劳动力不够，工程少时闲着，问题很多，要搞工程兵的问题，中央研究过。至于叫第二解放军的问题，我没听见过，详细可问谷牧同志。任何事情要作调查研究，可以问别人，问本人，也可以问主管机关。建筑工程兵现在是试点，以后逐步扩大，因为对老职工要逐步改编。改编工程兵师是试办，又不是作战部队，应开展文化大革命。内地运动迟一些，所以要谷牧去发动。但这次叫他回北京，到车站连我都没见面就给拉走了，他工作做得怎样我还不知道。你们怕他见到我后，给他交底，这是对我们不信任，我们充分信任你们，要彼此互相信任。他是工作出去的，到现在我还没见到谷牧，听说已放了他，谢谢你们交还回来，只要不是定了性的黑帮，要斗通知我们作安排，在工作上有问题要批判的也要通知我们安排去检讨。再一次向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工交系统。

基建工程部队，没有作战任务、战略任务的，只是加了解放军番号，只是试点，对领导当然可以批评，要使大家接受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不能和正规解放军相同。

(建工部汇报有些借调到支援西南内地建设的工人，大批回原单位时)总理插话：“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的口号是指外地来京的人说的，不是说最先从什么地方来，回什么

地方去，那我们打回延安去呀！我与富春同志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打到法国去呀！这也是变相的经济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西南搞建设，应在西南闹革命，跑到上海去干什么？

(建材部继续汇报)

总理插话：对革命队伍内部不纯的人应逐步教育，除非是屡教不改的，不要轻易开除，同样吸收也要慎重。不要少数人意见不一致就开除，互相排斥，希望你们慎重。改正错误要允许给他一个时间，思考几天，不要今天轰，明天轰，天天加码，最后戴高帽。我们自己的思想有抵触，也不是一下子能改过来的。

材料查封，是否保证没遗漏的了，赖际发同志来了没有？(赖际发站起来)各单位检查了吗？再有，要以革命性、党性来保证。

有的材料没封，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忘了，要区别对待。如经委叶林在封材料时，抽屉内遗留了三年前一封薄一波写给刘少奇的信。这封信给蒯大富突然袭击查出来了。蒯大富没弄清时间就将此信印成传单传出去了，说薄一波十一月份给刘少奇还写信。我与江青同志一分析条子上的日期是十一月一日，薄一波九月就去广州，他十一月份在广州怎能在北京写给刘少奇报告要十二月开会，经过了解这是三年前的事。我向他们说了，才把传单收回去。

我主张材料一纸不烧，说不清可拿出来，一对就清楚了，将来到运动后期一烧了之，不要再留给后代。一定要对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别对待，这样事以后处理，不要一下子就开除党籍。你们看看除留一些在政治上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价值的材料外，其他烧掉，否则给后代留一堆麻烦。你们如还有兴趣，可搞一个小组去做这件事，二月后还要抓革命促生产，这个事放在以后去，不要一头钻在材料里，搞文牍主义。现在有些单位把鸡毛蒜皮的事也拿出来批，越批越出不来，转移了大方向，把大事情放在脑后了。

材料封存起来了，就不要再砸，树一个好典型。大家讲定的事，要守纪律，要有信用。

夺权以后文件发放，发给部的，造反派也发一份，不管党员非党员。

密码不能给别人看，是出于工作人员的职守，当然思想保守对造反派抱敌视态度是不对的。造反派不能把别人看作铁板一块，事情总不要那样绝对化。

(周总理读《人民日报》《红旗》第三期社论第三段)总理：第三段是主席改得最多的。

陶铸搞两面派，在接见中南地区一部分学生时说：除主席、林副主席外，都可以怀疑。名义上是相信主席，实际上是把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不能绝对化，怀疑要有事实，对领导干部要一分为二，还是有好处的。

造反派初期都是处长以下的，开始是可以的，经下面起来。但领导干部出来亮相，站在你们一起，就要个别吸收，以丰富你们的经验。不要一概打倒，可以吸收一部分，逐步参加。对出来亮相的领导干部应合作，对犯错误的同志，主席精神是不要一棍子打死，好坏不要绝对化，社论中“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是主席的，这是主席从遵义会议后三十二年来一贯坚持的政策，不论是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都是那样，列宁也是这个经验，斯大林初期也是这样。斯大林后期是一棍子打死，其他东欧党学了苏联后期的经验，一棍子打死。你们把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人都带高帽子，挂黑牌子，这个范围多大。这是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实际不是贯彻毛主席的干部路线，这是高岗的作法。高岗是将他不高兴的干部一棍子打死的。只有反对毛主席的人，才用这个办法。饶漱石也是如此，对干部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甚至连特务杨帆、潘汉年也用，对认为不好的就一脚踢开。张闻天在外交系统也是这个政策。彭、罗、陆、杨中最突出的是罗瑞卿用人唯亲。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这样，特别是刘少奇带有宗派性。因此，我们反对这样做。我们不能把党内组织路线上错误带过来，这不是按主席指示办事。如果把不好的传统传过来，就变成了陈独秀、王明、博古、李立三、瞿秋白、高、饶、彭、黄、彭、罗、陆、杨的传统，这是背道而驰。社论中“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

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你们常读主席文章的人，应看得出来，是谁写的。

戴高帽不能使别人信服，也打不下威风。北京医院一个党委书记戴高帽游街，群众说小角色没看头。有的把戴高帽的弄到汽车上，自己后面跟着，他舒服，你倒跑了一大圈，挺累的，结果还给外国记者照了相去。

攻心为上，把思想弄透，使大家不犯同样的思想错误，才是攻心。戴高帽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大多数人不拥护反而反感。彭真、薄一波可以看一看，一个小角色有什么好看的呢？中间大多数不赞成这个办法，造反派会失去同情，不纠正是很危险的。

现在有的以开会为满足，成天开大会，一个接一个，不细致看文件社论。开会又不准备，有的会开完了文件还没出来。主席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这里我要替谷牧同志说几句话，他不是黑帮，不是薄一波的助手。财政经济委员会最初是由陈云负责，薄一波是助手。陈云的思想是右的。有一个线索，很清楚。薄一波的思想是乱的，一会左一会右，早晚不相同，基本上是右的。有人说薄一波每年要把他讲的话编成一本书，与毛主席的话对照，但至今没查出来(经委同志插话：确实有，他的秘书揭发的，印刷厂有清样)如果你们能找到清样就为党立了一大功。我不大相信薄一波那么细致，要么是彭真搞出来了，他心里有鬼，即使彭真也还留有东西。

给薄一波当助手的，第一个是贾拓夫，贾的思想是接近高岗、习仲勋的；薄一波还相信宋邵文，宋知道薄一波和彭真的一些事，以后当薄一波助手的是孙志远，后三年才用的谷牧，谷牧有能力。薄一波的野心是想把计委、经委、建委弄在一起，他总挂帅，他在主席面前暴露过这个思想，还说富春坏话，主席对这件事印象最深。富春身体不好，主席亲自点将，要余秋里搞小计委。大庆把康世恩、徐今强等几个部长副部长都揪回去了，我很想坐飞机去看看。大庆油田技术很先进，我去过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十九世纪就开始搞石油，现在技术上比我们落后得多。在这个运动中要把这面红旗毁了，我们很痛心。一面红旗为什么要毁了，有错误可以改嘛！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段，秋里、谷牧有错误，秋里作风不民主，但在大庆还是走群众路线的。主席点的将，那些人反对？贺龙、邓小平反对，薄一波更反对，我们打电话给贺龙，主席点将不能反对。

你们要秋里、谷牧给你们讲计划，我同意给你们报告，但你们队伍要纯，谁泄露要以党纪国法处理。政协讨论国家预算，张冬生将预算送往香港，现在还管制着。我信你们，但你们要严格审查人员。如计委上层有人泄露消息，同样处理。过去有一句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薄一波反秋里，讨论秋里提出的计划，他反对，但他又搞不出什么来，我们几个副总理都同意了，主席问他同意不同意，他说拥护，主席又问他是真拥护吗？他脸红了。

主席主张把建设工作从经委分出去，薄一波不同意，说要分谷牧不能拿出去，但我们态度一硬，他就改口了。谷牧有谷牧的帐，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所犯错误应检讨，但从现在有的材料看，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允许他住在国务院。秋里、谷牧要允许他们作为富春同志的帮手。秋里、谷牧不是他们那一派的，不是贺龙派的，余是当兵上来的，是王震部队的，谷牧是山东来的，与彭薄没有历史关系。

我就五个大秘书，人少了好，我可以直接处理一些重要的事。二年前我有二十多人，主席告诉我人不要多，人多了，你为他们服务，人少一些，三、四个，他们就为你服务。果然如此，现在他们五个人围着我团团转。现在正副秘书长都没有，有些事要交秘书厅，不知秘书厅造反造好了没有。

(建材部汇报保守派冲革命左派，发生了一些武斗的事)

总理：我劝造反总部的同志，千万不要扣人，扣人就惹是生非，结果人家来要，就引起武斗。

(二轻部汇报到一些全国性联络组织时)

总理：任何全国性的联络部除一、二个以外，我们研究一下，统统都不允许成立。

(有人反映外面有传单说，总理曾在国务院小礼堂说过江青同志对临时工、合同工讲的三条指示，不执行就造你们的反)

总理：我根本没有说过江青同志指示，不执行就造你们的反，这根本不是我的话！还有人说我跟刘宁一搞一个什么劳动工资五点指示，我根本没有与刘宁一起接见过工人。今后凡没有正式文件下来的都不算，不能根据一个负责人说的话，认为要研究的问题就当指示执行，正式文件没有发下去嘛！还有三个部，化工、劳动、林业，以后分别谈，工交口二十四个部门，首先是夺权问题，是目前最急迫的事，运动进入到新阶段，从思想革命进入新阶段，就要夺权。基本上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但是也和炮打司令部时一样，红卫兵一到各省市不管司令部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都轰一下，那时我们劝地方不要反对，不要自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封就定调了，就把炮轰的红卫兵放在错误的地位了，因为炮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要让他们打一打，革命的还是革命的，如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是好事，所以我们对炮打司令部向省市打了招呼，并不是说每个领导机关部、委、省市统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那样讲。炮轰的结果，有许多领导与群众站在一起，过了关。炮打司令部如此，夺权也是如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屡教不改的人的权，也不是每个部所有当权派都如此，与炮打司令部一样，连锁反应，财贸系统、外事系统、农业、文教系统都要夺权，各省市也如此。我们摸了，很多自己搞起来了，山西是第一个起来的典型，上海市大、复杂，有反复。贵州昨天出了公告，来谈过，回去可能发表第二次宣言。我们一个个摸，一个一个阵地夺权，这样不能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如这样统统变成黑的铁板一块，那毛主席的红线如何与广大群众结合？但通过夺权斗争考验一下有好处。我们分析真正烂掉的是少数，从部来说，完全烂掉了的要接管，对科委韩光一小撮的经验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相结合搞的。还有科学院是由下而上夺权，各部也有这样情况。另方面条件不成熟，领导比较好的省市、部也有，但不多，是少数。多数是只有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屡教不改的人，把权夺过来，其他的人出来亮了相。要一分为二，有好的，有犯错误的，有改了的。有的要罢官，有的要抓起来，如彭、罗、陆、杨；有的撤职留用，定期考察，戴罪立功，以观后效；有的停职留用，也是定期考察，以观后效，这个时间长一点。有的监督留用，当中这一类最多。现在把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夺过来，业务实行监督，如此准多少预算，要经你们造反派同意，不能乱搞经济主义。机关党委不起作用，无所谓党员、非党员，主要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

要逐步吸收业务熟悉的人到业务班子里来，要逐步充实，个别吸收科长以上的。革命意志衰退，虽然业务熟悉，只能监督留用，不能领导。首先要吸收革命的，充实革命委员会，逐步增加群众，从政治优势变为数量多数，思想要前进，推动革命。

现在夺权斗争，如有好的，敢领导革命又领导业务，就更好。现在未发现，过一段时间会发现。

二十四个部门，铁道部未谈，但个别谈过八次。铁道部派别多，要团结各方，不应排斥。国防口六个，还有农林、文教。要把国务院各部组织起来，要切实抓业务。管业务的有李富春、陈毅、叶剑英、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六位分管业务口子，搞几个人管事。各办和各办的政治部管不了，工作组大多是政治部派出来的，但各办人少，现在也不管什么事。真正的革命放在各部，在国务院搞一个联合办公室，每个副总理搞几个秘书联络各方。

文化部、教育部还未找他们，要让他们闹革命。小学、初中准备开学，开学后就有工作。

文革小组管政策，国务院管业务，业务当然也有政策。文化革命的事可直接送文件到办公厅转文革小组或我，业务上的事直接找国务院秘书厅或我。

现在先把本身健全起来，向横有方面扩大，争取多数，以部内为主体，争取部外支援。全国来说先搞本部再到全国。关于各部的规章制度过去错误的东西，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

如经济主义，引起派别斗争的首先要废除，你们提出来交秘书厅，下通知废除，其余的文化革命以前的制度如临时工、合同工、劳保制度、奖励制度、复员军人等问题以后，要一个一个研究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造反派监督业务，掌权了，部长副部长的行动由你们负责，谁揪走了，你们管，你们要他们八小时工作、劳动都可以。在大门上可贴出别的单位来揪走部长要与你们造反派交涉，我把人完全交给你们了。

464. 周恩来在接见接待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凌晨 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战友们：

我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现在代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候你们，慰劳你们！

你们半年多的工作，有的早来的，有的晚来的，的确是辛苦了。拿我的工作就有所体会。你们有时忙得一天吃不上一顿饱饭，冬天寒风刺骨，夏天汗流浃背，你们干的是文化大革命工作，你们的心是热的。尽管你们受了一些辛苦，有了一些疲劳，今天把毛主席的问候带给你们，你们应该感到温暖。

建国十七年了，为什么还要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发动一千万红卫兵，几十万工人、农民，也就是发动几万万群众起来造反，我们应该简单地说一说。十七年前取得了胜利那时是靠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胜利，三分之一是进行了土改，三分之二是军队打天下，是经军事管制、委派，这部分政权的建立不是由下而上的群众夺权，十月革命是如此，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更是如此。我们的革命要消灭剥削阶级，比新的剥削阶级代替旧的剥削阶级要艰苦得多。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多年来经过几次反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消灭剥削阶级，更加困难。苏联没有动员亿万人民起来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出了修正主义，我们学习了他们的经验，不仅十月革命的正面经验，还有反面经验。赫鲁晓夫的出现，具有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毛主席的伟大不仅吸取了苏联正面的经验，而且吸取了他们的反面教训，每一个问题是一分为二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辩证法的精华。

十七年来，在经济上解决了私有制，化私有为公有，但集体所有制还没有进入全民所有制，当然，还没有消灭个人所有制，上层建筑不能说完全适应发展，有很多规章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里残留得更多了，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我们也搞了许多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批判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东西，接着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社教运动，毛主席提出了前十条和二十三条。这一切运动就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这一段的特点就是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就在我们中央和毛主席的身边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了彭、陆、罗、杨，然后发动了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高潮就是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轰动了全国。就在这个时候，领导机关里出现了刘、邓制定的反动路线，围攻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甚至于实行了白色恐怖。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冲破旧统治，是按着革命的规律前进的。这一点不用毛泽东思想去认识是根本不能理解的。十一中全会以后，公布了十六条和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但各部有些人还是抵触的。但是，新生的力量是不怕这些抵触的。出现了红卫兵，毛主席加以提倡；出现了大串连，毛主席又加以提倡。由北京到外地，毛主席的提倡，很快地发动了群众，外地来京的人很多，你们的工作很辛苦。有很多问题无法答复，你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感到高兴，这是对我们的锻炼，我们应该主动地去接受这场锻炼。只有在我们伟大的国家，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伟大的中国人

民解放军和伟大的人民才有这种可能性，五个伟大集中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我们还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越南在打仗，苏修在备战，把我们当作第一号敌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下这样大的决心，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是办不到的。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是相信95%群众能够接受这个运动的规律，果然出现了新的局面。问题是有时我们跟不上，不理解，更不用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是相对抗的。我们应该紧紧做，紧紧学，紧紧跟，还是跟不上，还受红卫兵的批评，这是因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我们应该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你们批评领导，这是应该的，这个运动不是一下子就学会的。在座的有三千多人，有的原来在中央工作，这是少数。有的是各部门调来的，更多的是部队来的，共三千多人。你们的心是热的，但是走马上阵，没有很好交待政策，十六条出来才有了方向。半年来，我很想接见你们，但工作很忙，连接见你们的时间也没有，我感到很不安。今天也让你们等了很久，本来应该十一点半接见，让你们等到一点多。我起来就开会，有时开到睡觉。我了解你们一些情况，许多是新知识，有些东西也消化不了。现在还是运动的初期，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的，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现在正在进入夺权斗争，昨天《人民日报》刊登的《红旗》第三期社论指出，这是夺权斗争的新阶段，本来十七年前已经夺了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这仅仅是开始，要不断地进行夺权斗争。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不甘心自己的死亡，他们拉出去，打进来，用各种方式腐蚀我们的干部。鉴于苏联四十年的经验，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我国家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分子，照过去十七年统治下去，总有一天在领导里出现修正主义，这是无疑的。比如说六、七月间五十多天主席不在北京，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派工作组和原来的领导，全国无例外地风行。凡是对工作组和原领导提批评的都认为是反党的、错误的。现在看起来，工作组没有犯错误是极少极少。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全党思想统一了，全国就奔赴胜利，不到四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在胜利前就警告我们，胜利后的矛盾转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预言是伟大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刘、邓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六二年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清的形“左”实右，最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工作组和原领导暴露出来了。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林副主席的协助，我们就要走上邪路。大家想一想，这样走下去，何等危险！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方向错了，就糊里糊涂，连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苏联就是如此，现在不满的人不少，但不敢起来造修正主义领导的反。如果中国不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干部、青年突击队锻炼出来，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谁出来反抗？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剥削阶级的旧制度彻底摧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四新。这是长期的革命的任务。那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我们要培养出好的基础，更大的斗争、更大的辛苦、更大的锻炼还在前面。

今天一方面是来慰问你们，更重要的动员同志们继续工作继续战斗，作毛主席的好学生。
(鼓掌)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包括我自己在内，能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锻炼好，把我们世世代代锻炼好，就能使我们党不变质，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作出榜样，推动世界革命胜利。这个做好了，个人有点损失，个人利益，个人委曲，个人辛苦算什么呢？反过来，不理解这一点，带着烦恼心情，不仅使我们的工作做不好，也教育不好我们的世世代代。

青年一代有干劲、有闯劲，但不见得干的闯的都对。他们听说那里有反革命就开了车去，但实际没有那么严重。又如冲……把部长司令等拉出去不知道去向，还得找回。青年人要有智有谋，学会革命，我们不能把青年培养成二憨子。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态度是：

第一、支持他们，我们不支持就会犯严重错误。

第二、如果仅仅鼓舞他们，我们看他们犯错误也不去指出，那我们更要犯罪。青年人不仅是我们的接班人，而且通过他们教育我们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传下去。要热情支持，诚恳的帮助，缺一不可。所以林副主席提出来第一要有革命性，第二要有科学性，还有组织纪律性。当前进入了夺权斗争，问题更为复杂。只要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要有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我们就要夺权。但不是每个单位都是如此。现在已起连锁反应，任何单位都在夺权。就象八月份红卫兵起来那种形势，革命洪流锐不可挡，红卫兵要冲大会堂，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人大会堂。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有人还要冲，革命洪流不是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红旗》第三期社论说明了夺权问题的必然性，在夺权斗争中我们要分析。(大概)

条件成熟的，烂掉了，全面夺权是少数。

另一种条件完全不成熟，这也是少数。

大多数是夺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和业务的监督权。真正烂掉坏掉是极少数，次之是不能做原来职务撤职留用，立功赎罪以观后效。第三与其停职反省不如停职留用，改过自新，以观后效。第四可以留用，监督业务生产。总之后三种多。

以上是夺权在中央各部出现的情况。

省一级也有。这不是总结，这些问题在今天《红旗》第三期谈了。有一个问题没谈，但在《人民日报》登了第三司的文章，更重要是每一个人都要消除私心杂念，用公权去夺私权。在北京各部都是左派互相争夺，有的甚至武斗。这些青年经验少，不能怪他们。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不能不管，既不能阻挡，又不能不管，主要是在群众之中与他们一道前进。他们走错了帮助他们一道前进！

关于 5. 16 以前四清的，揪回去，我们不同意。5. 16 以前四清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亲自制订前十条和二十三条为主的。虽然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彭真又搞了一手，但那不成主要的！地方各种要求我们中央国务院出面说服，不要揪住不放，这样也如经济主义，如矛盾上交。

过去毛主席思想没有贯彻下去，组织部不组织，宣传部不宣传，统战也没有统战！这次文化大革命依靠群众，使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了广大革命群众。

四清工作队转到文化大革命的犯了错误的，要回去检讨。已检讨和多次检讨了的，不要总揪住不放。现在已转到夺权的新阶段。总揪住一些黑材料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影响夺权，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点必须说明。

465. 周恩来对轻部接管工作的指示

(1967 年 2 月 1 日)

(周总理看了一轻部及院校十一个革命造反派组织于一月三十一日签注的关于大联合的公告)

周总理：这个公告基本上不错吗，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嘛。

你们双方都没有检查自己，只是责怪别人。现在，我给你们读一段报纸(总理读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上的一段)我建议你们，部里派四人，院所派六人，每个学院组织派三人，共计十八个人开个圆桌会议，组织夺权委员会，先检查自己，不要老提以前的，选出六个常委轮流值班。

每个单位的问题自己解决，整风解决，通过一个过渡阶段以后再解决。

466. 周恩来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晨 中南海小礼堂)

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把铁道部实行军事管理，你们这样做是玷污了二七传统的铁路工人的声誉，总理心情深切地念了 1·31《人民日报》三司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说你们就是没有学习学习报纸，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不知那一位革命小将写的，权不是从手中夺过来吗？夺的好吗？我相信你们能管好的。

你们不少是工人、贫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出身也很好，难道可以保证没有私字吗？不会没有的，都要在脑子里夺权。

我是经历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 1921——27, 1927——37, 1937——45, 1945——1949, 1949 到现在。五个阶段都经历过做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工人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象苏征民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象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象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联，成为人民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前仆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多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我给你们大小会开过七次，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一时起来就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现在是在锻炼你们，不管在小道理面前，大道理面前都要抛掉一个私字，团结今后还要扩大，我就不相信团结不起来，陈伯达同志的倡议已压了多少天，可能在 5——6 天前。因为军队管理就复杂。我不相信工人、学生就是不行，过去在二七时要组织全国罢工，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你们都比我们那时多了，怎么会团结不起来？就是私字没有去，就是没有反省精神。(总理询问运输进展情况，铁道部有人回答，根据李副总理指示，二月份计划货运增加，客运减少)派同学到机务段下去宣传，不仅去站台，还要到大站到工厂，到码头的交通疏通，把铁路院校的学生都派下去，保守派不去的我就采取措施。(总理询问了十个铁路学院的在校学生情况)已经留很少的同学，现在阶级斗争非常尖锐，上海红革会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就是不对，同意你们发呼吁。

就是要联合，不联合就是破坏，破坏文化大革命就是分裂主义，从 2·1 起，以往的事都不提了，总是提不完的，要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把这些道理给人民大会堂服务队讲都讲得通，对你们就是讲不通，愈说愈不通，什么道理？

现在你们是大民主与个人独断结合起来，你们这样脱离群众会走向反面的，现在是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毛主席挂帅，一定会解决好的，有些学校过去还不错，现在意见多，就是大联合不起来，像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就是你挑我的毛病，我挑你的毛病，从 2·1 起你们应该大帐先算，以后再算小帐，学生总是要分化的，以前是这样，也有到现在还是这样，必定在今后还要分化，但是不能一开始就经不住锻炼，要把抓革命促生产马上抓上去，以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一切事情以后再算，对待错误也不要一下子就否定，像在十一中全会上刘、邓还选在中央，在你们来说，那是不可理解的，别人认识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不要着急。你们小将的革命干劲，我们是高兴，我们是欢迎的。对老干部不要笼而统之，一概打倒。现在副总理不是一个一个站出来了吗？对你们单位的当权派也要分析，要监督他们参加业务，在其中一个一个吸收他们。

再不能砸了，具有二七传统的铁路工人后代会联合起来！

(在高呼毛主席万岁声中结束)，

总理说，红旗第三期社论好好学习，有很多话是毛主席说的，你们自己琢磨。

总理这次讲话是在二次总理主持关于铁道部夺权的辩论会以后所发生的一些现象而讲的。

**467.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
矿院“东方红”和北京市公安局时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礼堂)**

会议主持者：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同志。李震副部长说：同志们，开会了，总理和中央文革派戚本禹同志和谢富治同志来听取你们的意见，最后戚本禹同志和谢富治同志还要讲话。
会这样开好不好？(众：好！)

矿院“东方红”代表讲话(略)

“政法公社”代表讲话(略)

戚本禹：

我代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向公安局的全体革命同志，向矿院“东方红”的同志，向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同志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政法公社”与矿院“东方红”这两个组织都是革命组织。我都接见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很多事情，做出了很大贡献。“政法公社”开始只有两百人，团结得很紧，对高院的、学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了坚决地斗争，不愧为左派。他们是经过大风大浪的。矿院“东方红”也是一样，斗争很艰苦，我也去过，他们把张霖之揪出来了，揪出张霖之不是我们，也不是煤炭部的群众。而是他们。

现在两个革命组织在公安局发生了斗争，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家里发生了这样大的斗争，惊动了北京市，连总理也惊动了。发生了流血事件，双方都打人了嘛，这双方都得考虑考虑。刚才你们说的话，有一点不大好，我不大满意，我们都是老同志，都是熟人嘛，可以提提缺点吗？(众答：可以)就是在讲话中双方缺乏自我批评，连一句话也没有。我觉得，在这两天里，两方面都说说，政法学院想一想，如果同意请你们先讲一讲，两方面都来讲一讲，好不好？

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陈荣金、徐贵春检查(略)

戚本禹同志接着讲：

陈荣金同志检查是诚恳的，徐贵春也作了一些检查，但后面说得多了些，有些话应由矿院的同志来讲或公安局的同志来讲，自己讲不合适，引起了一些不满，徐贵春的讲话调子高，但不大深刻，调子高是对的(矿院答：这是在煽动。)矿院也要作检讨，应该允许矿院的同志作检查，我想民警同志会同意的。我们文化革命小组是抱着解决矛盾而来的，你们两个组织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应用毛主席提出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但我怀疑在这些矛盾中坏人在起作用。石景山方面可能有，你们这边也可能有，大家要提高警惕，内部要搞好团结。下面就让矿院的同志作检查。

矿院“东方红”代表作检查(略)

戚本禹同志接着讲：

刚才我听到矿院的检查是抽象的，但检查的态度是好的。把打伤的人弄到台上来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当然对打伤的同志应该慰问，建议你们去看看。

我们考虑，斗争很需要考虑整个斗争形势。现在是什么形势？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到

了一个决战的时刻，这样就要考虑怎么斗争了，像现在这样打起来就是不符合当前形势需要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了十七年，当前的斗争达到了最高峰，也是到了决定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问题。矿院“东方红”与“政法公社”的斗争是不符合当前斗争形势需要的。经过八年抗战、十年内战、我们胜利了，革命胜利后的果实为谁？胜利果实谁来摘？对这个问题，资产阶级想，无产阶级也想。资产阶级统治了十七年，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说：“剥削越多越好”，“中国人民是欢迎剥削的，要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保护这种所有制。”这些都是写在书上的话。（众呼口号：打倒刘少奇！）对，是应该打倒的，不应该打倒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也不该打倒矿院“东方红”。高岗是里通外国，发展资本主义，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右派时有人反对大跃进，六二年他们提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一九六四年又提出“海瑞罢官”，这样资产阶级不断向我们进攻。在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时，左派组织应该联合起来，不应该扩大矛盾，打内战，这样我们就要联合，就要团结。

现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作了两个伟大决策，就是在决战时刻，军队要介入文化革命运动。不介入是假的，刘志坚不要军队介入，毛主席批评了这一点。主席又讲，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分清左派右派；分不清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可能支持了右派。主席在第一卷第一篇第一行就提到这点。不了解这一点就会辜负人民的希望，辜负毛主席的希望。脸上没有贴上“敌我”的字样，这就要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所以我们在阶级斗争中，首先应该分清敌我，不应该首先去搞内部斗争。可以仓促上战场，但要分清敌我，作调查研究。小时候孩子斗蟋蟀，拿一根草一挑，二蟋蟀就斗起来了。这就叫挑斗。真正革命左派是不受挑动的。所以我们要学好这篇文章，这样就能无往而不胜，攻无不克。否则就会战而不胜，攻而不克。

矿院和“政法公社”在这方面都是有缺点的，要接触实质问题。要学好第一篇主席著作，作好调查研究，多少兵，怎么打，不能仓促，要分清敌我。上战场也是这样，那是国民党的军队，那是解放军，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调查研究是很重要的。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几十年的经验，王明、李立三等人失败了，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调查研究。到战斗岗位，就应该调查研究，当弄不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时，就不要随便抓人，随便打人和随便开枪。

对敌人要狠，对自己要和。对内部问题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内部矛盾很多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思潮，是“私”字当头造成的，但有不少是敌人挑动起来的，你们这个事件是否由敌人挑起来的，我相信公安机关会调查研究的，谢富治副总理会处理这个问题的。

关于革命组织接管夺权之间的问题是内部矛盾，应该好好解决，为什么要抗议？为什么要来最后通牒？这个问题一定要分清楚。否则，不论你们矿院的学习了多少数理化，也是分析不好的，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学习很多马列主义的书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一点一定要学会。

我现在讲了很多原则的道理，供你们参考。你们矿院“东方红”没有弄清分局的问题。就发动那么多人去围攻，这样做不对。矿院“东方红”摘掉民警的帽徽，这也是不对。刚才矿院代表认错赔礼道歉是应该的。

具体问题由你们自己分析，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就行。

刚才陈荣金同志说了，调入调错了，去了发生武斗，不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去解决。矿院“东方红”对民警撕领章，也不对，民警过去是受压迫的。

刚才矿院检讨了，民警同志不爱鼓掌，不热烈，徐贵春说了几句就热烈鼓掌。刚才陈荣金讲话矿院给倒了一杯水，谢富治同志热烈鼓掌了，他喜欢你们团结了。谢富治同志是公安部门的最高统帅，他鼓掌了，你们不鼓掌，这是有差距的。《水浒传》里李达和张顺二人打架后拥抱，你们连这点精神都没有。谢富治同志是关心你们公安战士、与你们心连心的，他要靠你们去工作的。谢部长鼓掌，你们为什么不鼓掌？不打不相识，打了拉拉手。

对石景山分局根据总理指示，暂由卫戍司令部派人接管，这件事由傅崇碧、李震同志负

责处理。

北京市公安局怎么办？首先应该肯定，过去在黑帮统治下干了许多坏事，改组后黑线还未肃清。在这样情况下“政法公社”造了市公安局的反，接管是革命行动，这个行动好得很！应该承认是有功勋的，应该给他们鼓掌。徐贵春辛辛苦苦几天几夜没睡觉。有错误他承认了，学生嘛，又是一个单位接管，允许改正。他们接受了合理的批判。矿院来做也会犯错误，不要以为自己高明。我们做也会犯错误。现在检查官僚主义了，鼓掌欢迎(众：鼓掌)。你们提出不应由一个组织接管，应由几个组织。但应慢慢来，你们矿院来也行嘛，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也是联合的，也给其他单位打过电话，可能没与矿业学院的同志联系，他们不知道你们矿业学院几千人这个很大的力量也对公安局这样感兴趣。不过要协商一下，将来由卫戍区、市公安局造反派、“政法公社”等几个组织成一个接管小组，以后再具体研究。最近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副总理负责。谢副总理是各部第一个支持左派的，他首先支持了“政法公社”，他在左派组织中有崇高的威望。傅崇碧、李震来筹备，你们是否允许一个筹备时期。在这段时间怎么办？说要军队接管，首先是“政法公社”提出的，可是现在矿院“东方红”也提出。

主席讲过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人家墙的篱笆坏了，儿子对老子说墙该修一下，否则有人偷东西，老子没当回事。后来一邻居也说，墙坏了，修一下，否则有人偷东西。有一天一人偷了东西，于是老子就相信儿子对，而怀疑邻居偷的，后来才搞清不是邻居。军队接管，徐贵春(政法公社负责人之一)早就提出，现在是否军队接管，今后怎样，有谢副总理请示周总理。时间不多了，休息一下，矿院回去，可以监督，如果有问题再来，公安局的同志也应休息，请谢副总理讲话。

谢富治：

我来当学生的，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很好，我完全同意。

毛主席在前几天，要军队、公安部门大力支持各方面的造反派。我们必须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坚决支持左派，保护左派，这是我们的神圣任务，也是毛主席对我们下的最大命令。我们军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部队，公安人员，也应象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依靠左派，支持左派，保护左派，坚决站在左派一边，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斗争，对反动组织“工农红旗军”、“联合行动委员会”、“红色恐怖队”专政，用这个来支持左派。

前天石景山公安局出现了很不应该的事件，违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出动警察不是支持左派，不论主观如何，实际上助长了右派，这个，保皇势力欢迎。责任首先在领导人，其次民警。以后民警要坚决支持左派。当然可能有时搞不清，但必须要调查研究搞清，支持左派，不要随便抓人，所以这件事很不好。我虽然没有具体管，但是我是公安部长，向在石景山受伤的同志道歉，问候。

我们的左派组织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毛主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贯思想。现在是大好形势，左派力量大大发展，把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造反派斗争的胜利，但是当前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我们要联合起来，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下，取得最后胜利，这个胜利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关系到全世界。左派必须要联合，团结起来，在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下，团结、联合起来，巩固成绩，乘胜追击。

革命造反派的任务：一、继续打退反动势力。二、左派大联合，大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今天也是一件好事，我们不要上坏人的当，这是大事，我们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我们左派大团结，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向资产阶级当权派，向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斗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要解放军接管，要请示中央，解放军也有它的困

难。同志们的意见是很好的，今天我别的没什么，今天的事也是好事。现在回去睡觉，以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来解决，今天讲了不少，其实我是来当学生的。

李震：

今天会议开得很好。戚本禹同志和谢富治同志作了很重要的指示，我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希望，我们革命造反派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一致对敌。

现在天快亮了，太阳出来了，让太阳的光辉象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精神，让它永远放射光芒。

现在散会。欢迎矿院“东方红”回校。

468. 徐向前接见总后系统造反派部分代表 (1967年2月1日 京西宾馆)

接见单位：二医大红色造反纵队代表，301护校红色造反大队代表，总后政干红色造反革命纵队军代表和总后机关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代表等共九名。陪同接见的，有李曼村同志以及全军文革的工作人员七至八人。

徐向前：你们什么时候到三座门的？(指全军文革办公室三座门三号)

群众：我们是29日去的。

徐向前：你们干劲可真大呀！你们都是那个组织的？

我本应该找你们早一点谈一谈，因为事情很忙，顾不上，你们送上了来，这很好，你们是不是推举一、二个人把问题集中的讲一讲。接着代表简单地介绍一些情况后，提出了问题。

群众：徐副主席，你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想听一下，你对邱会作的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要邱会作来开会也要不到。

徐向前：邱会作的问题，那天(25日)我说收回来，不是把我的看法收回，而是指收回派王锋去这件事。王锋是我叫他去的，是听说你们要开斗争邱会作的大会，派他去了解情况，主要是想找造反派，后来王锋找不到你们，就先去找了张池明，他去的目的想开小会，揭发批判邱会作的技术性问题弄清楚以后再开大会。

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那时候刘少奇、邓小平是以中央名义，下面只好执行，如不执行不就是反党了吗？如刘志坚搞三名黑指示，下面的这些人都执行了，军队里大多数当权派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不是资产阶级阵营里的人。他们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对邱会作我们并没有看成是三反分子。我以前是这样看，现在这样看，以后还是这样看，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材料说明他是三反分子，从你们揭发的材料来看，

都是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的问题，不能说明他是刘邓的人，这些并不是我说的，军委对这些干部还是了解的。

邱会作还是拥护毛主席的、拥护林副主席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正因为有错误，才叫你们彻底批判，彻底揭露。批成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军队内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这个斗争很艰巨，你们那天汇报四个多小时，没有一条能说明他是三反分子，是搞政变集团的人，我并没有说他是三反分子。你们对邱会作彻底批判揭露斗争是你们的事，我还是我的看法，我是完全站在你们这边的，赞成你们的彻底造反精神，我不是保皇。你们总后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一定要揪出来，不揪出来，我们决不罢休。刀锋一定对准敌人，你们那里哪些是坏人靠你们调查研究，分析。这些人不同于好人犯错误，我们军委几个副主席对邱会作有一致的评价，过去后勤工作只抓业务，不抓政治，我们观察了好几年。没想到他在生活上这些问题引起很大公愤，这些性质是严重的。但是他并没有站在彭德怀、罗瑞卿一边反对毛主席。而北京军区的廖汉生、杨勇这些人，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我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说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邱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厉害点，对二医大红纵搞了许多小动作，我就不同意。邱会作说话有点不老实，喜欢搞点两派手法。这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都是为革命，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搞刘邓司令部的人，按两个阵营来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毫不含糊的。

这个我们军委常委都分析过，也不是听了那一个人的汇报改变了我们的看法。政治上坏人我们不能保。例如廖汉生我们就要打倒。郑维山就要保，听说北京军区造反派把郑维山关起来，他在接待红卫兵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他们造反派把郑维山关起来，我找不到，我很激动，一定要他们把郑维山放回来，他们先不放，要谈判后放出来。如这件事我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指造反派)，把郑维山打倒，那我就与刘邓站在一起，就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就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郑维山这个人的问题可能比邱会作小一点，我上次说蒙在鼓里，是没有想到邱的问题那么严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生活作风等问题。我听了你们四个多小时汇报，没有一点说明他与刘、邓、彭、罗有串连，阴谋搞政变的，所以不能说邱会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收回王峰就是等于没有派。我认为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是可以烧的，但烧而不能焦，烧焦了就会犯错误，应按主席教导：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那天那么多人的大会我不能讲，今天少数几个人，我说心里话，这是军委的看法。他的身体的确有病，特别是武斗以后，他身体不太好。(群众插话：我们没有武斗，这完全是造谣诬蔑)你们去批判斗争。(群众：我们要人)没有他也可以批判、斗争嘛！我们要以大局为重，他肯定不是牛鬼蛇神，我可以保一万个险。对于这些高级干部，那个拥护，那个反对，我们心中大体上有个数，是了解的。所以我们要顾全大局，保他出来就是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同志陈伯达同志都亲自写了信，你们看了没有？(答：看了)叶群同志也表了态，他的态度也和我同样。我和你们讲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现在周总理和我保了，林副主席，伯达同志也保了。我们要以大局为重，斗争以小局服从大局，你们再不要向总理提意见，递条子啦，他们从井冈山开始，他们了解。你们总后勤部，邱会作，张令彬，林总他们都了解，是熟悉的，谁拥护，谁反对，他们心里有底。我们没有就不好说话了。邱会作有严重的错误，但他不是他们刘、邓、彭、罗等反革命集团的人，看十六条和社论都是讲一小撮。我们要起来搞牛鬼蛇神。邱会作不是反革命，我们要保他，如果是牛鬼蛇神，我们不就成了保皇派了吗？那些人要推翻毛主席，你们后勤部都是有的，你们还没有揪出来(问：不是饶正锡吗？)你们去考虑嘛，何必问我，你们作一些调查研究，我们也作一些调查研究。我们和邱会作虽不经常在一起，但经常开军委会，我们军委常委对每一个高级干部都有看法。你们去烧，去斗，我们不好说，但到一定的时候，我们要出来说话。总理也讲过，烧错了对我们不利。但是把牛鬼蛇神放过了，对我们也不利。邱会作是烧而不焦的问题。我们到那里都是这个看法。你

们不同意我的看法，要同我辩论，就是把我关起来，我也不改变。总后只了解邱会作的表面，很多同志不了解邱的本质，在大的方面作了很多好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但是他们不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都是代表，我要你们回去向大家作工作，讲清楚，我个人意见，对于邱会作已搞得差不多了，是否适可而止，这是我个人意见，不代表全军文革，但是这个看法是我个人。军委是不会保坏人的。你们看到保彭德怀、罗瑞卿等人吗？为什么要保邱会作，你们深思一下，现在到时候了。从前没有给你们讲。你们不到三座门来也会找你们的，我们全军文革组织不健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也是在阶级斗争中锻炼，与你们各战斗组织没有接触，希望你们经常提意见。使我们工作做得好一点，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接着革命群众又提出了一些问题)

群众：刚才你讲了许多，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请举些例子，以便我们思考和说服群众。

徐向前：那么我问你们，你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何区别？

群众：就是看他是否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是否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群众：刘志坚是什么人？刘志坚包庇邱会作，紧急指示下达前，刘给邱预先打招呼，通风报信，是什么关系？

徐向前：刘志坚、罗瑞卿等人与邱的关系，都是一般的工作关系。但他的基本立场是站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我看到你们的材料都不能把他打成反革命，他的那些错误都是思想认识问题。现在没有材料能说明邱与刘、邓、罗、梁有关系。他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军委看法。邱会作做后勤部部长比任何一个后勤部长都好。过去后勤工作从不抓政治，单纯业务观点，他还突出一点政治。(有人问：29日给你送的材料你看了没有？)徐说：我还没有看。(有人说：我给读一段。接着读了一段三反言行和不突出政治的材料。)徐又说：这些问题都是工作上思想上的问题，你们不要断章取义。我们军委对这些同志都有评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那次你们大会上讲的材料，不能证明他不学毛著。今天我们讲过去后勤部不搞政治，邱搞了政治，他就是突出政治不够。今天革命主要是针对牛鬼蛇神，我不同意你们把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今天还是这样讲，烧而不焦。军队里不突出政治的军事干部多得很，不是他一个人，但不能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们拿不出一点根据来证明他与刘、邓、彭、罗、梁等人有关系，我们认为他在后勤工作上是有成绩的。我们体谅你们。我们并不保牛鬼蛇神。他与刘、邓、罗、梁不是一个山头的人，都是工作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斗廖汉生，你们应该清楚，如果邱会作是这样的人，我们早就把他揪出来了。

群众：廖汉生这个人，不是群众揪出来的吗？

徐向前：你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我们心中有底，这并不是群众揪出来的。

群众：刘志坚你知道吗？

徐向前：刘志坚揪出来我感到很突然，他不仅有这些问题，他还被日本人俘虏过。

群众：被俘虏过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当这么大的干部？

徐向前：过去有些成了叛徒的人，也有留用下来的，刘志坚被俘虏过，邱会作就没有被俘虏过嘛。

群众：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徐向前：他可以改吗？我们提倡文斗，不用武斗，(我们声明并没有武斗)就全军来讲，打人还是有的，对邱会作你们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看不要那样提。你们还说砸烂他的狗头，他不是狗嘛！怎么能砸烂狗头呢？我坚决支持你们揭发批判，但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要有分析，解放军要有纪律，要实事求是，要有革命性，科学性和纪律性。如果你们有材料，拿出一个定时炸弹来更好嘛！如果你们有大量事实，我可以承认错误，你们要顾全大局，邱会作不到会照样可以斗争，我肯定说：他不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而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王锋你们不要揪他了，要揪就揪我，那些话是我让他说的，他的错误就是到总后不应该

先到张池明那里去，而应该先到造反派那里去。

你们一定要注意以大局为重，你们想一想，林彪同志，伯达同志，周总理他们会不会保牛鬼蛇神？他们是不会的。

以上我讲的那些问题，如果你们不通，回去就不要给大家讲了，我是和你们商量的，交心的。

后来群众要求谈有关八条的问题，以及机关夺权等问题，徐副主席讲，今天就谈这一问题，别的就不提了，会议到此结束。

469. 陈伯达关于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在中宣部“夺权”问题的指示 及王力、关锋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晚 《红旗》杂志社)

关锋：

现在宣布开会。

中宣部的同志们，《红旗》杂志的同志们，外单位到这个大院来的同志们：

今天，王力同志和我受陈伯达同志委托，来干预一下中宣部的所谓夺权问题。现在我先宣读陈伯达同志的一件批语：

“中宣部的接管，要由中央直接干预，不能由外边的人随便接管。外边来接管的人必须立即退出。中宣部的印章一律收回。印刷厂、司机班、收发室、电话总机等单位已由《红旗》杂志接管，是正确的。《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机关杂志，不许来历不明的外人来扰乱。”

陈伯达

二月一日晚十时

下面，我讲点意见。

中央宣传部的权，主要是宣传的权，顾名思义，就是宣传的权。这个权已经由中央接管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等等。早已不归中宣部管了，归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管了。那么，中宣部的同志们的任务，就是进行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夺权”要“夺”什么权呢？司机班、印刷厂、收发室、电话总机等等，这本来是《红旗》杂志、中宣部两个单位的。一个行政处，是归两个单位，为两个单位办事的。现在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也是应这些单位的要求，《红旗》杂志把司机班、印刷厂等单位接管过来。

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听说分成两部分。你们刘桂芝、张力生这一部分，成立以后，作了什么事，我们不晓得。在这里，我不给你们作结论、下断语。希望你们好好革命。但是，你们到中宣部来搞“接管”，这个行动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你们犯了错误。你们没有理由把宣传部“接管”过去。特别是你们还印了一个《通告》，我看了，说印刷厂不通过你们不能印东西，这更是错误的。《红旗》杂志印东西，印我们的机密文件，难道还要经过你们批准吗？不能的。你们把印章收起来也是错误的。林杰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错误，他是正确的。你们来很多人要找他辩论，我已经通知办公室，他不跟你们辩论，他要忙于第三期《红旗》的出版工作。影响《红旗》杂志的出版，是对革命不利的，不好的。一切革命同志都应考虑到这一点。据说，你们当中还有人讲，王力同志和我是你们的名誉团员，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支持你们。我说明一下，我同王力同志见过他们的人。他们到甘家口宣传挨了打，早晨六点钟在中南海西门要求接见，我们正好在那里，接见了他们。他们宣传十六条是好的，打他们是错的。当时他们给我们戴了袖章，这是常有的事，决不是什么名誉团员。对你们的活动，我们不了解，不清楚，没有接触，就是见过那么一次。江青同志，你们也可能送了一个袖章。决不允许任何人打着江青同志的旗号来招摇撞骗。戚本禹同志同你们没有接触，不了解你们。说不上什么对你们支持不支持。再说一遍，你们在外边作些什么活动，我们不了解，也可能做了一些好事，但到中宣部来“接管”，搞这一套，是错了。希望这些同志认识

错误，改正错误，立即把中宣部的各种印章、钥匙等等一律交回来。印章交回之后，该封存的封存，该启用的启用。如财务科的印还要用，中宣部的大印可以封起来了。如果这些印章在谁手里不肯交回，而用来为非作歹，乱开条子。乱开介绍信，如果有人这样做的话，要以法律制裁！

下面谈谈阮铭同志的问题。

阮铭同志很长时间他的情况我不了解，所以我不能下结论，不能下判断。有的同志讲，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来，是阮铭引进来的，要他们到这里来“夺权”。阮铭说不是。这事到底是不是，这个问题总会把它查清。即使不是你引进来的，不是你策划的(因为还没有搞清)，阮铭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首先是你不应该支持他们来“夺权”，不应该表示支持。你说你看简单了，看错了，你的立场到那里去了？你头脑里的毛泽东思想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不很好分析呢？司机班、印刷厂等等是两个单位的，你是知道的。他们接管了，会不会影响《红旗》杂志的出版，你是想得到的。阮铭同志支持他们来搞所谓接管，是错误的。你说你判断不出来，为什么不报告呢？没有接到你的电话、信件嘛！进一步说，是怎么回事，大家在运动中是会搞清楚的。这里不多讲。

下面讲几个原则问题，希望革命同志考虑。

第一，要分清两类矛盾，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我们要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经过半年多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大家已经看清楚了。不要乱轰一气，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有各种分歧、意见，要通过同志式的讨论，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处理。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这个指示来处理。

第二，民主和集中的问题。我们发扬大民主，要不要集中，要不要纪律？必须要纪律。我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黑纪律，反对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歪曲我们党的纪律，但决不能因此就不要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必须要。阮铭同志你不是一个不懂事的人，你应该想到把中宣部的公章交给他们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你说你不了解，不是你操纵的，那你应当报告嘛！这里还要不要一点纪律？同志们，我们发扬大民主，不能忘记无产阶级革命的纪律。要砸碎资产阶级的反动纪律，但必须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纪律，乱来是不行的。

第三，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刚才念了一段语录，在人民内部是民主和集中。对待敌人，主席讲得很清楚，就是要专政。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民主，只给予人民。对那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社会渣滓，一点民主也不给。大民主不给，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

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向资产阶级发动了总反击时，有一批牛鬼蛇神跑出来了。他们组织了一些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件事好得很。他们出来了，我们正好来一个大扫除。当然，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是好人，反动组织中大多数是好人，是受蒙蔽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处心积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我们要实行专政！

我为什么要讲第三点呢？是希望真正革命的同志要提高警惕性。

我的话完了。

王力：

同志们，刚才关锋同志讲了很重要的讲话。这些话不是他个人的意见，是刚才陈伯达同志同我们一起研究的意见。我没有多少话好讲了，只是补充几点。

为什么讲你们这次到中宣部“夺权”是错误的？你们知道中宣部是干什么的？知不知道？(张力生等瞠目结舌，答不上来)你们根本不知道中宣部是干什么的。中宣部叫中共中央

宣传部，是党中央的一个部门，它是管宣传的。这一方面的权，现在用不着你们来“夺”了，这个问题老早就解决了，早就由党中央收回了。他们已经没有这个权了，没有宣传权了。关于宣传部工作的这一方面，党中央已经委托中央文革小组管了。请问你们：你们来“夺”什么？而这个权，告诉同志们，不能随便来“夺”的！这是一点。

再一点，现在的中宣部，它干什么？就是一条任务，搞自己的文化大革命，搞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搞。你们到这里来，是不是“夺”这个权？“夺”他们在本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权？(关锋同志插话：“夺”这个权就违背十六条了，当工作组嘛！)这就违背十六条，当工作组嘛。要你们来当工作组吗？中宣部的同志欢迎你们来吗？(中宣部革命同志答：不欢迎！只有阮铭是欢迎的)如果你们是来“夺”这个权，那也完全错了。这个权用不着你们来“夺”，可以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自己来“夺”。这是一点。

那么，你们来，是不是要“夺”《红旗》杂志的权呢？这里倒是有权可“夺”的。(关锋同志插话：《红旗》杂志还在照常出版。)《红旗》杂志是我们党中央的杂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的。《红旗》杂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是宣传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最重要的阵地。你们是不是到这里来要“夺”《红旗》杂志的权？如果是这样。那你们是完全错了。不但“夺权”不行，你们扰乱《红旗》杂志的工作也是极端错误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拥护毛主席的、真正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应该有责任保护《红旗》杂志，支持《红旗》杂志。谁破坏《红旗》杂志，你们应该挺身而出嘛！而同志们，你们现在的实际行动是什么？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革命的？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拥护毛主席的？叫我们怎么能相信你们是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你们不但不维护《红旗》杂志的正常工作，反而扰乱《红旗》杂志的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为什么要接管司机班，你们为什么要接管印刷厂，还有幼儿园呢？(众大笑)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不但这样做，当《红旗》杂志的林杰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评你们时(这是帮助你们)，你们还要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冲《红旗》杂志，叫嚷要同《红旗》杂志辩论。你们辩论什么？

在这样一个革命的紧要关头，这样一个大的革命风暴到来的时刻，《红旗》杂志要战斗啊！它要在第一线进行战斗啊！它要对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政治责任，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担负政治责任啊！你们这样做，究竟是帮助《红旗》的工作，还是阻碍了《红旗》的工作？你们对《红旗》杂志有什么帮助？这正是一个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全国决战的关头，为什么要冲我们的指挥部，冲我们的参谋机关？你们错了！你们根本不应该到这儿来。同志们，这样做是错了！

听说你们……叫“进驻”吗？(有人回答：他们叫“接管”、“夺权”)你们“夺权”以后，在这里私设公堂，打人，有没有这事？(张力生狡辩。群众喊：他扯慌！我们亲眼看见的。)你们“接管”中宣部，利用党中央的机关，就在这里私设公堂，在这里抓人、打人。你们知道这是犯法的、这是违法乱纪的吗？不管你多么革命，这样做，都是不许可的！

你们有什么权力掌管中央宣传部的印章？有什么权力？你们知道掌管中宣部的印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拿这个章可以做什么事情？你们做了没有？拿这个印章可以调干部，可以分配工作。这些印章你们都掌握了！你们要交出来！(关锋同志插话：不交回的话，要抓起来！)要立刻照陈伯达同志的意见办，所有的印章都要交回，所有“接管”的人必须一律退出！

(印刷厂有同志揭发，北京职工红色造反团有人曾盗用关锋同志的名义到印刷厂去招摇撞骗。)

关锋：

这倒说明一个问题，你阮铭确实同他们有联系。至于什么样的联系，我不知道。当时我确实打了一个电话给阮铭同志。说《红旗》要接管印刷厂，你要支持，不要挑

起群众斗群众。

这些事一下子难以判明，时间不长，可以把问题搞清楚的。今天不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的是：

- 一、北京职工人红色造反团要走，退出去；
- 二、把印章、钥匙等等交回来；
- 三、不许再到《红旗》扰乱工作。

有人煽动说要调十几万人来。好嘛！全北京的来都可以。我就不相信北京工人会听你们几个人的话。如果有人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来《红旗》扰乱工作，要由刘桂芝、张力生完全负责！

这里的善后处理，交印章，清查印章拿出后有没有用过，要成立一个小组。这里要有阮铭参加。他要负责。再由中宣部的革命同志、《红旗》杂志的革命同志参加几个人。

470. 张春桥、姚文元谈上海革会 (1967年2月1日)

张春桥：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组织还没有意识到。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姚文元：革会两次要求警备区派队伍，并带有威胁性口气说的。二十四日夺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夺权派了队伍，二十六日开常委会要派部队保护他们，三十日下午开炮打张春桥会说：“我们要开大会，要派部队保护我们，要警备区副司令员和师政委及上次参加行动的部队听我们的揭发控诉”。一个革命组织可以调动军队对付别人的革命组织，那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怎么办？革会恨我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打电话给公司，叫他们搞大联合。可革会把住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革会？

同学：破坏大联合的罪魁祸首是革会。

张春桥：他们已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适应了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了。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曹曾讲：你们中央在北京发号施令，到上海来尝尝味道。

张春桥：革会的头头是什么性质？可以考虑。所以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中说：革会的某些负责人。

同学：(把革会的情况谈了，略)

姚文元：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以武力来压别组织，发展到这个地步？……革会某些负责人非常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最近马路上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露，这个行为适合谁的需要，自己很清楚，揪出幕后策划者，大方向转移了，转移了矛头，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首要任务：(大意)

1. 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2. 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个都给革会破坏了。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要把革会的战士和负责人分开来，只通过斗争才能团结革会战士，不斗争不行。上海形势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在集中，牛鬼蛇神出笼了，另外在造反派内找代理人，革会就是，我们要作好精神上的准备……(大意：红旗社论第三期第五段都分析)。要站稳立场，对大反扑要作好准备。……大意：我跟革会接触了两次，有一次把我们斗了六个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想这是普遍真理，对任何人都适用。

张春桥：现在要好好学习社论，不要跟他们跑。要高举夺权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

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现在街上没有陈丕显、曹荻秋的标语是不正常的，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夺权！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目前上海砸风还很盛，互相砸，砸电话机……这是国家财产，电话机是无阶级性的。要用摆事实讲道理来处理内部关系。

姚文元：红革会不愿摆事实讲道理。

张春桥：红革会把别人都打成反革命，自己最革命，要和他们辩论大方向，讲大道理。现在正适合陈丕显、曹荻秋的要求，不斗他们的，联合破裂了。但是我们一定要联合……。二十八日复旦红革会反张春桥，×××说：“以前我两面派，现在我一面派，坚决和红革会一道搞张春桥。”这并不是孤立的，总要爆发的，就是不派军队也要爆发，这样也好，我们重新组织队伍大联合，没有分裂就没有大联合，和这部分人联合，就和那部分人分裂……。斗陈丕显、曹荻秋一定要干，只有这样联合才更好、更巩固。否则巩固不了，但将来还会分裂。在取得胜利时，易迷失方向。从夺权变当权。陈丕显在三年游击时很苦，但顶住了。进城后，政治地位改变了，他就越来越滑下去了。现在我们夺权，夺权以后就是当权了，你们大学生就要出来工作。但有可能半途而废，红革会就是这样。毛主席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只占百分之十几。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就在上海，上海两个阶级力量都很强，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这是大好事，我们要准备真正的反革命包围，开枪怎么办？那天我和姚文元议论了一天，到处都有反革命活动，可上海没有这一手，我们很怀疑。我们从来没有对红革会有恶意。同志们要考虑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把红革会看作孤立的现象，应和其它现象联系起来。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很重要，政策、策略要注意，对干部也要分析，一分为二，打击面不能过大。有些地方一开会，就把干部统统跪在地下。现在形势变化了，要强调区分干部，社论中干部问题就是这样，开始时区分是不行的，当革命群众占优势时，再不区分是不对的。

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是反马列主义的口号，过去不批评，是因为当权派用这句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句口号来压制群众的。

希望同志们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部分。

学生要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471. 江青、戚本禹接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命群众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2月1日晚，人大会堂小会议室)

江青：今天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

(新影厂代表们汇报了新影厂的运动情况、生产情况，并谈了关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影片情况)

江青：毛主席第一、二、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影片，能不能改一改，把刘、邓、陶的镜头剪掉，重新整一整。(答：可以)有人问我建议把刘少奇、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片子拿出来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片子一起上演，对比，对比。

戚本禹：还有人提出要将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片子也一起演，这样可以看出许多问题。

(新影代表：刘少奇访问印尼还有些材料。可以重新编。)

江青：不是说那些编余的片子都烧了吗？

(新影代表：可能还留有很多资料。)

戚本禹：你看，文化部至今还在欺骗我们。

江青：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影片上演，这是件很重要的事，这关系到许多革命小将。新闻电影厂就好象我们的报纸，是经常要做些报道工作的，你们(指新影)两派观点若没有什

么大原则的分歧，是不是可以合起来？当然这不是把两派的政治观点合二而一。

(八一厂代表汇报了一些厂里情况：厂里有些组织互相砸，还有抄家的，有的砸开了战备仓库，摄影机被抢走了。)

江青：砸、抢、抄家，这都不好，还是要讲道理。战备物资要保管好，要爱护国家财产，抢走的送回来了吗？(答：送回来了)以后不许再抢，这是破坏行为，破坏生产，破坏战备，要注意后面有坏人操纵，抢走的物资命令他们送回来，若不送回来，要逮捕问罪。

(八一厂代表：有的组织深夜抢走制片局大印，就说是夺权了。新影代表：我们厂也有这种现象。)

江青：拿走大印，不等于就是夺权。

戚本禹：那属于封建夺权。

(八一代表：有的人在警卫战士宿舍门上贴一张“铁杆保皇”，战士就给撕了，于是被斗一顿，脸上抹了黑，身上插了草，最后限二十四小时赶出八一厂。)

江青：(很气愤)这简直是胡闹，是对解放军的污辱。

戚本禹：要是我，也要把它撕掉。

江青：八一厂的陈播在哪儿？

(八一答：在天水，现在养得很胖，肥头大耳。)

江青：不能让这些人舒服，陈播拍了个军垦的片子之中，有一首是歌颂毛主席的歌子，却用一种罂粟花(大烟花)作背景，看了很不舒服，当时就给他们提了意见，他却说新疆到处是这种花，不愿意改。你是演过雷锋吗？(答：是)我看了你们那部片子，觉得很满意，为什么把雷锋的许多事情却给了那个中间人物(王大力)？还是在写中间人物。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被一些人吹捧，他的创作思想那就是好人最后就要死，很坏。这些人要揪来斗，但不必搞“喷气式”。新闻纪录电影厂与故事片不同，新闻影片不能弄虚作假，要突出政治，但不管怎样都要生产。你们新影厂要报道重大事件，现在已经进入了夺权，全面夺权。你们也需要夺权，把革命的领导权、生产权夺过来。只要不是敌我矛盾，就要注意要允许人家革命，要孤立一小撮敌人。你们两派之间的问题，实际也是夺权，可现在你们指责的很厉害，我看你们应该联合起来，加强团结。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不要上当，当前有这样一个苗头，就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内部，搞些假象，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现在你们斗当权派没有那样大的气，斗自己人却那么大气，这要注意有人在背后挑拨，而把当权派放在一边没人管了。

你们要注意，搞说理斗争，要把是非分清，多做一些深入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住他们大量的材料，斗争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新文化部和旧文化部是一回事，新文化部一直顽固地执行刘、邓、陶的路线。肖望东、赵辛初很坏。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六六年国庆节)的片子，他送来给我们看了两次。第一次就发现了问题，给打回去了。第二次送来，还不如头一次。我很气，当时就对他们说：“你们完全违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看了一半，我就不看了。他们尽力的美化刘、邓、陶，而这些人也总是凑上去跟主席讲话，刘少奇这些资产阶级人物，就是爱争镜头，犯了错误就该往后边站一站嘛！只有资产阶级才这样抢镜头，这是陶铸他们安排好了的。毛主席最不喜欢给他拍电影，在延安我认识主席时就是这样，我知道革命的摄影师都是想多拍一些领袖的资料。

(新影代表还揭发了熊复的问题)

江青：(接着说)熊复是不是共产党员还是个问题！他们都坏透了，赵辛初你们斗过了吗？

(新影答：斗过一次)

戚本禹：要好好斗斗他们，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斗倒、半垮、斗臭。

江青：象陈荒煤、夏衍、肖望东等，现在他们倒舒服了，你们要有气向他们出，不要让他们在一边，坐山观虎斗，我们自己每天斗来斗去，睡不好觉，都瘦了，可他们在那睡

大觉，可胖了。这不行，不能叫他们把我们搞瘦，我们要把他们搞瘦，要叫他们睡不好觉，要经常的斗，白天让他们劳动，晚上要他们写材料交待罪行，每天交一份。

(新影代表：根据公安六条规定，能否把地、富、反、坏、右等的名单公布？以便监督)

戚本禹：你们厂人员情况，你们还不了解吗？

(新影代表：人保科说是人事保密。)

江青：他们为地、富、反、坏、右保密！革命群众自己可以公布，要严防他们搞破坏，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新影代表：对于过去确实有些“保”的人，现在有些醒悟了，怎么对待他们？)

江青：那要欢迎他们，团结他们。

你们新影，不管哪一派，只要革命，在这个大前提下，就要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你们说：你们是为自己夺权，还是为无产阶级夺权呀？(答：为无产阶级夺权。)对替无产阶级夺权，希望你们各战斗组织要放下一切私心杂念，要好好学习几篇主席著作，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好好学习一下《红旗》第三期社论，和首都三司写的一篇文章《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这篇文章写的很有水平，他们说：“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革命：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和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我们同时进行着两个夺权斗争：“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

(江青同志带着我们一起学习了这篇文章)

我的头脑里也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我就时刻告诫自己头脑里的阴暗面。我建议同志们回去好好学学这些文章。你们两个厂有多少人？(新影答：七百人。八一厂答：一千多人)你们两个厂这么些人都联合不起来，全国怎么搞联合呀？要想我们为谁夺权。应该多看别人优点，多看自己弱点，(江青同志问了一些同志的年纪)你们都很年轻嘛！说话时火气大，你们应该互相谅解。多做些自我批评，把气向敌人出，自己内部要团结，要主席的思想，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要相信大多数是好人，关门主义、小团体主义也不对，可以联合起来，在斗争中求联合，为了无产阶级夺权的伟大事业，建议你们是否可以搞开门整风，开展批评。

(新影代表：我厂有因为观点不同而不让搞生产的现象，这怎么办？)

江青：两派观点不同，要协商，要平心静气的谈一谈，怎样把党的事业搞好。电影是教育人民的锐利武器，我们要反映工农兵，因为一切都是工农创造出来的，兵也是穿了军装的工农。过去我看了几部片子，比如《三年早知道》、《花好月圆》、《探亲记》等，这些片子严重的歪曲了我们国家的农民形象，但过去没有人出来进行批判，广东厂还有个《逆风千里》，这是很毒的。

(新影代表：过去黑帮们也利用新闻纪录电影放毒，出了很多毒草片，如《横扫五气》是直接攻击毛主席的，还有《迎春》、《诗人杜甫》、《梅兰芳》、《在激流中》等，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还说新影是红旗单位。)

江青：这些片子我们还都没有看过，有机会你们拿给我们看看。钱筱章、徐肖冰(原厂长)这些人还算“红旗”？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兴建设备，不但不能为人民服务，反而放毒，就糟蹋了人民财产，那还要它干什么？

(新影代表：过去工作队在厂里留下了在黑帮时期“越红越黑”的谬论，至今余毒很深，使很多老同志不敢讲话，也不让他们工作。)

江青：这样打击面太宽了，你们让他们工作，你们(指另一派)不让他们工作，我看可以让让他们工作，要相信大多数是好的。一些人犯有严重错误的，只要不是敌我矛盾，你们可以监督他们工作，让他们老实工作，不好好干就扣他的工资。

戚本禹：这个办法很好，对他们还是很灵的。

江青：北影的老人，一个都不能用吗？

(新影代表：不能这样，有的还是可以用的。)

我看××也还总有几部好片子，思想可以进行改造，八一厂××也总强调他那小桥流水人家的风格，我把他的片子都调来看了看，确实是那种风格，《二月》那部片子很为夏、陈所欣赏。他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他表示愿意改过来。

总之，你们要联合起来，没有革命的大联合，夺了权也会丢掉的。

戚本禹：凡夺权好的，都是联合的好，上海夺权的经验是很宝贵的。(新影代表：王守(新影新当权派)在作平反工作时，特别给那些被群众冲击的中层领导干部平反，要给黑帮五大权利，说这是根据中央指示。)

江青：有这种事？

戚本禹：那大概是他们的“中央”吧！

(新影代表谈两派都各自派摄影人员外出工作的问题)

江青：你们是在搞两个“公司”，你们也派，他们(指另一派)也派，能不能联合起来搞？要有个核心，组织一下，八一厂也要注意这些，你们抢机器可能有坏人挑动，要注意。两派观点不同，可以求同存异，你们厂(指新影厂)虽然不同于广播局，天天广播，但要经常出片子，不能全部停产，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你们这一派要警惕背后不要受坏人利用；你们(指另一派)也不要受蒙蔽。你们可以搞个联合小组，抓革命促生产。你们若再联合不起来，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影片还不能出，我看社会上左派要来砸你们了，背后若有坏人的，一定要看到，受蒙蔽的就要承认。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胸怀宽广。

这个厂那个厂，官僚机构太多了，为什么不能搞些人民公社？关于串连问题，现在搞大夺权，不适合再外出串连了。

八一厂你们也要联合起来，搞大联合，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文艺学术界的革命到底应该如何搞，电影方面你们可以互相串串(这时戚本禹同志催江青同志到总理那去开会)好吧，今天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获得许多感性知识，你们厂里的情况，也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过去我对你们关心很少，请你们原谅。我谈的意见不一定都对，供你们在斗争中参考，最后希望你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抓好革命，促好生产！

(最后代表们请江青同志转达毛主席：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

江青：(连连点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472. 李富春接见林业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委员会代表谈话记要 (1967年2月2日 李富春副总理办公室)

与会者：林业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接管委员会代表，中央文革，解放军报社记者，国务院联合接待室等单位的同志。

富春同志：你们先谈情况。

代表：汇报内容略。

富春同志插话：当代表汇报到我们夺权情况时，富春同志问：“你们是怎样夺的，你们的通告，纲领，要一条一条地讲。”

当代表汇报到我们夺权遇到很大阻力，阻力主要来自部党委和部东方红公社时，富春同志说：“你们说部东方红公社是保守派的主要论点是什么？”

当代表汇报部东方红公社有目的，有计划地保薄反谭，部党委吕涛，贺仁驷怕火烧到自己身上来的。

富春同志说：“这是有意识转移目标。”

当代表汇报到国务院一月十七日开会，十八日部东方红公社就把几个部长，当权派弄走扣了九天九夜，搞了一个假交权，实保权的阴谋时，富春同志说：“他们把政权交给了部机关东方红，而不是交给造反派！噢！这是玩的新花招！一月十七日把他们叫来！我们是一

番好意，要他们将功补过，到群众中去，准备交权把权交给左派，这样来减少夺权的阻力，但是，他们利用了这个搞了假夺权，反而增加了阻力！

当代表汇报到部东方红公社一月十一日夜冲中南海时，富春同志说：“那天总理讲话了，在人大会堂”，（大家回答：对，就是那次），这时，富春同志向我们要了付洪海同志写的那份传单。

当代表汇报到伊春当前很紧急的情况时，富春同志说：“伊春最近要来人，工人分裂，一个造反派，一个保守派，天天在武斗，军区已接管！”

当代表汇报到煤炭供应很紧张时，富春同志说：“你们写个情况给我，那个地方，那个部的缺少煤炭，由煤炭部调拔，否则缺煤炭木材就烧掉了！”

当代表汇报到下边各区基本都夺了权，但不知夺在谁手里时，富春同志说：“是不是四个大林区，四个林学院，北京林学院，东北林学院，中南林学院，南京林学院派学生到林区，你们造反派了解一下，到底夺权没夺权？权夺在谁手里？每个林学院去十多个人，你们造反派（指部机关）也去三，五人，走一走，去几天，从革命生产到生活情况怎么样？设备情况怎么样？差什么？你们了解一下回来我们研究，你们四点措施好，再加这么一点。”

当代表汇报到部东方红公社要调伊春两千工人和其他外地工人来北京帮助他们，林学院发出通电、布告到各林区，说明情况叫工人不要受蒙蔽，否则他们搞了鬼你们还不知道，你们大联合，把各学校，单位名字都写出去。”

富春：过一会总理要我开会，让我讲几句。你们要逐步扩大左派队伍，应争取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也可以和他们联合，要和四大林学院，还有内蒙林学院紧密联合。造反派队伍要稳定，壮大，这是一个问题。部党委几个人，不要他们坐在家里，叫他们每天到部里办公，坚守岗位，听我们调换。象惠中权，骏昭，吕青，贺仁驷这几个人，我们宁肯找几间房给他们办公，监督他们，不让他们再搞花样。他们作决定，发通知，做检查都要经过我们，否则，他们利用了东方红公社的力量你们还不知道。让他们到部里工作八小时，叫他们没有时间搞别的。总理讲的，要区别对待，有的要罢官，有的要撤职留用，有的要停职留用，有的要监督留用，要把他们区别对待，要分化瓦解。

你们作三天工作后，再找你们谈一次，一个是要联合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一个是联合四大林学院，叫部长到部里办公，四条措施要实行，以四大林学院为主体下去先了解情况，不参与政治斗争，这只是少要个把个礼拜，你们回去研究一下。

有的代表问：设计院党委书记开除党籍问题要我们批时，富春同志说：“昨天总理已经讲了，还是到运动后期处理。”

473. 康生、王力接见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两名代表和有关同志的谈话要点 (1967年2月2日)

康生同志：

(一)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向已经参加你们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外国同志讲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种话不管什么人说的都是错误的。

(二)向你们机关已经参加运动的外国同志谈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要如实地反映情况。不能歪曲事实，挑拨两党的关系，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这样做是错误的。

(王力同志插话：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绝对不许我们任何人对兄弟党同志进行挑拨离间，散布流言蜚语，破坏两党的关系，如果有这种情况，必须立即受纪律处分。如有反革命活动，要法办。)

(三)至于外国同志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兄弟党的同志各写各的大字报，谈自己的观点，这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的。

(四)(当康生同志问到在座一位同志的孩子的情况时说)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光听小孩

子讲的话是靠不住的。他们现在向你保密，千万要注意，千万要注意！现在不少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斗。现在外面有风声，说“联动”在中联部有据点，在统战部也有据点，这个教训一定要注意。现在儿子和女儿讲的一套不能完全听。刘菊芬是刘宁一的女儿吧，成了清华的一个反面头头。贺龙的儿子贺鹏飞，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还有乔冠华的儿子，我们千万不要主观。毛主席说过：“亲者疏”，就是说我们要从疏远的方面来看待自己的亲人。你们要他们好好学习军委八条，特别是最后一条。我跟好多人都讲了，要劝劝他们。(王力同志插话，对着在座的一位同志说：我们应该有鲜明的态度，要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亮相，要站到毛主席的路线一边，这个时候还不晚。最近毛主席指示，社论上也反复讲了这个问题，我们一些老干部都要亮相，要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机关那一套旧规章、旧制度统统要打垮，要群众自己起来搞，群众来监督。要打破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一套。)

(五)外边学生不能进来插手，不准到你们机关来夺权。(王力同志插话：坚决不能让学生进驻，来了立即请他们出去)

(六)(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请康老对复兴大路十八号的文化大革命作指示)今晚没有时间了，以后再看吧！你们自己搞吧，我相信你们可以自己搞，自己放手干。如果要我提意见的话，我就提一点意见：我觉得你们自己相信自己不够，放手干不够。

你们三个部长还专门给我写了一个夺权的请示报告，说“形势很好，要夺权”。你们机关的请示太多了，这个也要请示，那个也要请示。部长请示我，要夺自己的权，这怎么讲得通呢？这还要给我写报告？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笑话，我在请示报告上面划了一个大问号，不答复！这象话吗？真是荒唐！(王力同志插话：这是谁干的，简直荒唐得很。)

(这时，革命造反总部的代表扼要的说明，第三联络站还没有成立，部里向康老的请示就写上了，伍修权同志就知道了“三联”的领导人是谁，其矛头是指向谁。革命群众问伍修权同志怎么知道的？他说：“凭印象来的”、“印象就是印象”、“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等等)

哦！我还不知道，单凭这个报告，就是大笑话，荒唐！

(王力同志插话：十七级以上的干部要亮相，态度要鲜明，要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对他们要区别对待，根据社论上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为文化大革命建立新功劳。我们应该很好地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

474. 林杰接见北师大“井冈山”的讲话

(1967年2月2日 红旗编辑部)

按：2·1 高教部、教育部“北京公社”(保字号)乘师大井冈山联络站人员去车站欢迎我国留学生之时砸了北师大井冈山联络总部，抢走了扩大[音]器等，并无理打人！当天夜晚，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民族宫、首都兵团、中央党校几个单位革命组织采取了行动，造了“北京公社”的反，但是新北大夺权委员会某些人极力包庇“北京公社”，并无理扣押、殴打北师大井冈山人员。在北大进行军训的解放军人员参与了这一事件，为此，北师大同学到《红旗》反映情况，林杰同志接见了大家。

(师大同学汇报情况)

林杰同志说：大家先回去休息。我同意你们刚才的意见，有问题可有辩论。我认为说北师大井冈山是反革命的，要对你们实行专政，是完全错误的。

我对师大被打的同学王修楷、董桂林等同学表示慰问。有问题可以辩论，你们可以找聂元梓同志辩论，北大擅自扣押人是不对的，把你们说成是反革命，对你们专政是完全错误的。

我认为北师大井冈山和聂元梓同志所属组织都是革命组织。你们要求解放军不要参与围攻井冈山，我认为是合理的，我负责向中央文革转达。

好几个单位，民族宫……(没记下)你们要求所有围攻的被打的同志放出来，给予人身自由，这是合理的，我一定向中央文革反映。

你们先回去休息一下，打伤的找医生看看。

(同学反映情况)

林杰同志说：好，我把这些情况反映上去。

475. *毛泽东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3日)

(见《系年录》第六十二卷)

476. 李富春对化工部运动的重要指示

(1967年2月3日 中南海)

参加会的：化工部主要负责人，机关二人，六院一人，研究院一人，化工学院三人。

富春同志在化工部革命群众汇报情况时的重要插话及最后对运动的指示整理如下。

当富春同志听到化工部机关有78个单位宣布再次夺权时，问到：你们78个单位那来的？(××答：机关内部有三个单位，其余是外边的。)

当富春同志听到××同志汇报说：“红战团”主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批现领导徐今强、张珍。只有这样才能发动起群众时，富春同志问：梁膺庸是不是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从批判梁开始。

当富春同志听到说我们夺权是针对“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来的，我们根本不能和“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联合时，富春同志问：为什么不能联合？

当化院“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汇报说：有人说我们是保守的时候，富春同志问：说你们保？保什么？(××答：不知道，有人就是不分昼夜的搅乱斗争大方向)。

当富春同志听到说以徐今强为首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先批深批透，才能批斗薄一波、梁膺庸时，富春同志问：这个关系如何转？

当富春同志听到有的同志说：化工部三天万人大会发言人不能算保梁的，富春同志问：你能说服保梁的吗？(××答：可能有，但大部分是好的)。

最后富春同志指示，我讲点意见给同志们考虑。化工部造反派大联合还没有形成，因此你们还要做很多工作，至少是要在京单位革命派大联合起来，把医药院，一，六陆橡胶院，化工研究院，织维所，化工部机关，“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等联合起来。

什么是化工部斗争的大方向？这个问题不该争论不休，我认为应该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地，坚决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斗臭，斗垮，斗倒薄一波，梁膺庸，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徐今强，张珍以后可能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该批判，但程度不同，梁也执了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走上了敌我矛盾上去。徐今强、张珍、李苏是内部矛盾。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分清两类矛盾，要按红旗第三期社论第三段办事，你们要注意学习，这段是毛主席亲自改的，亲自加的：要分清两类矛盾，分清轻重不同情况。根据化工部情况讨论大方向，要求同存异。如你们拥护大方向，我们就支持，不拥护这个大方向就不支持。你们必须实行大联合统一起来，枝节问题摆在第二位，大家进行批评，自我批评，不要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对自我批评的人采取欢迎的态度，除屡教不改外，希望你们在大方向上团结起来。先批判徐今强、张珍也可以的，先把薄、梁批臭也可以，各部联合斗薄一波也可以，总的是要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分清两类矛盾。

你们要把在京单位造反派串连起来，各组织先实行内部整风，那些对了，那些错了，照大方向办事，过去的问题，除严重问题外，小问题不谈了，承认错误就改，不能口头上承认，要有行动，改就好了。再拿一礼拜时间大联合，整风，再辩论，取得大方向一致，搞大联合，组织起来，中心多端。目前不外乎文化大革命夺权，要夺党政大权，财权。化工部业务很重，我们担心抓革命促生产。拿生产压革命不对，只抓革命把生产扔掉也不对，特别在春耕时需化肥，弄得不好，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现在由张珍同志加一些处长把业务搞好，将来如何再进一步联合夺权，你们再商量。

薄一波、梁膺庸还不是死狗，这个狗没死，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梁膺庸的问题没有批深也没揭露。批判徐今强我不反对，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批判。但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要把薄，梁批倒，斗垮，斗臭。不能不抓不斗，不能光斗徐今强不斗梁膺庸，斗徐今强的你们不是不斗梁膺庸，斗梁的你们不是不斗批徐今强、张珍。要狠批徐今强、张珍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批斗薄、梁。徐今强、张珍他们不是敌我矛盾。张珍被打后，老婆，小孩带他到国务院西门，国务院送他入医院的，张珍对于斗梁庸是坚强的，张珍同志在化工部主要批判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留用让他工作。这次文化大革命，他经过大考验嘛！这次挨打就是考验，坚决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斗倒薄一波、梁膺庸，狠批徐今强，有那些批那些，有多少批多少，但要分清敌我两类矛盾，对司局长也要按红旗社论第三期精神办事，所以拿一周时间在大方向一致下进行大联合，大串连，你们现在不要忙于夺权，大联合好了再夺权，自己有错误就认错，组织不纯的要整风，以你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人，团结95%的人，是要有个核心，不能你是核心，我不是核心（秘书插话：核心内要注意梁膺庸爪牙），特别注意薄、梁爪牙，否则他们利用左派之间的矛盾。不能把这些人弄到你们革命派里，要注意。爪牙只能做争取对象，不能做革命派对象，你们化工部梁膺庸就有爪牙，经委就有薄一波的爪牙，他有兴趣贴我的大字报，他不贴薄一波的大字报，化工部梁膺庸统治了十年，他有一定的市场，有他的爪牙，但也有受蒙蔽的，我们要分化他们，不能一概抛掉。我讲这点问题，一个是大联合，一个是大方向，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要大联合，给你们一周时间做大联合工作，一周后你们再来汇报。

我向你们学习。我是建议你们，你们认为对就做，不对向我提出批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要好好学习社论，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在毛主席指导下积累经验，你们首先酝酿一个革命派大联合，革命派大方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臭，斗垮，斗倒薄、梁。分清两类矛盾。

总理谈很多了（指前三次接见）。你们比我年轻，不要那么大火气，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要以理服人，不要抓一点小辫子就不放，要允许人家承认错误，同一个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抓“十六条”（指“按十六条革命造反队”）小辫子，“十六条”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八事件”小辫子，抓来抓去你们如何团结呀！只要大方向一致了就好团结了，你们革命派队伍必须团结。既是革命就要联合，在方向一致下大联合，纯洁队伍，联合后再夺权。真正革命力量团结起来捏成一个拳头力量就大了。再联合一些革命左派，将来再来就加

上你们联合的革命左派。有些毛病思想错误，大方向一致，不要再纠缠。要化工部变成一个真正毛泽东思想化工部，革命化的化工部，还要做很多工作，将来斗批改还有新阶段，如何形成左派队伍，如何形成大联合，靠左派核心来批、斗。批斗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垮薄一波、梁庸，分清两类矛盾，树立毛泽东思想。你们有经验了，我向你们学习，化工部情况你们比我清楚。张珍同志更清楚。

红色战斗兵团，你们队伍要注意，搞纯洁了，要真正革命派，要革命首先队伍要纯。

477. 傅崇碧传达周恩来的紧急指示 (1967年2月3日 北京市公安局礼堂)

参加单位：政法公社、矿院东方红、北京九中、市局干警等。中央公安部李震副部长亦在场。

傅崇碧同志传达了周总理如下指示：

总理派我们来。矿院东方红和政法公社都是左派组织，出现了分歧。北京市公安局是我们的治安中心。在这里不能武斗，双方可派代表进行谈判，每方派十人，到人民大会堂，其它可以这里等待，但不许武斗，在这里也不许互相骂，骂就不好了，暂时不要在这里广播宣传了。

双方不要派太多的代表，太多了就不好谈了。

在公安局吵起来打起来，敌人会高兴的。而革命同志一点也不会高兴，这样闹下去影响非常坏。

谁武斗谁就犯法。我们每个革命造反派都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的伟大号召，有问题双方派代表协商解决。

478. 谢富治在“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红旗军的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3日)

同志们：

今天开这个彻底粉碎反革命组织红旗军誓师大会，我个人还有我们卫戍区和所有专政机关的同志们支持这个会。这个会开得必要，开得适时，开得很有意义。

同志们，我们伟大的领袖亲自倡议、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新的有决定性的时期，就是进入到同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手里把权夺过来。夺权就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要从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手里，我们革命造反派要把权夺过来。我们要掌握文化大革命的权，掌握经济权，首先是专政的权，生产的权，政治权，一切权力统统要夺过来，掌握在革命造反者手里。现在正是一个夺权的阶段，这个阶段斗争是很激烈的，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当权派顽抗，还有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耍花招，搞欺骗、收买，搞经济主义，还有反革命组织，受他们利用、唆使，甚至他们组织的各种各样的反革命组织来反对革命造反派，象北京的红旗军就是现行的反革命组织。他们做了许多破坏革命的事情，到处胡作非为。我们要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的顽抗，那么镇压这些反革命组织，镇压那些地富反坏右，特别是在红旗军这个反革命组织，就非常必要。

全市革命造反派，全市革命群众积极配合专政机关，首先是我们军队，其次是公安机关，镇压这些反革命组织、反革命分子，我们首先感激同志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红旗军算是个反动派，也是个纸老虎，只要我们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专政机关加以配合，很快就把他们消毁了，粉碎了。当然他们还不会最后死心，还要顽抗，还会变，他们可

以不打红旗军的臭名，改头换面，另外搞别的形式。不管他们采取什么形式都是逃不过北京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造反派的眼睛的。

同志们，目前我们同资产阶级一小撮当权派的斗争，在全国、全北京市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在胜利地进军。我们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个堡垒接着一个堡垒地夺过来，但是我们还要斗争。资产阶级当权派表面上垮了，把他们的权夺了，但是没有最后把他们彻底消灭。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也是一样，也没有最后粉碎。暗地里还有活动，和反革命一样，他们公开的组织已经宣布解散，宣布破产，他们还有暗地活动，我们要乘胜前进，不要给他们喘息机会，把他们彻底砸烂。为了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要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依靠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各个方面，不管哪方面都要按毛主席的思想，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按毛主席的每一点指示办事。这是我们要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还有我们办任何一件事情，同资产阶级当权派斗争也一样，要依靠广大的革命造反派。支持革命造反派，依靠革命造反派，团结革命造反派，跟革命造反派一起生活，一起战斗，战斗到最后胜利。

现在北京市造反派面临着相当艰苦的任务，表面上我们的敌人……就是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以及那些反革命组织红旗军，什么联动，表面上好象是不存在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彻底消灭，我们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斗争。目前，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之间，大学、中学、机关、工厂，特别是学校和工厂机关，革命造反派之间正在实现相互大联合。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谋部，以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号召我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在毛主席伟大思想基础上，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在我们党、毛主席所制定的一系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路线基础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现大联合。我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团结是我们胜利的重要的一个保证，但是现在在革命造反派中间最近有些不大团结。我们这个卫戍司令部支持造反派同保守派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斗争，要准备支持造反派，支持左派。最近，这类事情非常少。现在常有左派之间打架，结果却要专政机关去调停。这个事情你们看好不好哇？（众：不好。）我们要不要在伟大领袖的伟大思想下，在以伟大领袖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还有我们文化革命的参谋部以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为首的文革小组的号召，我们要不要联合呀？（众：要！）要不要团结呀？（众：要！）我们不要上敌人的当，我们要团结，我们要联合，我们不能自己天天打内战，把敌人放过去，我们要不要打内战呀？（众：不要！）。这一条很重要。我们左派之间，也是有参差不齐的，可以批评，可以自我批评，这是内部的。我要号召几件事不能做，左派之间不能武斗，不能打架，不要散传单，不要开宣传车，不要贴标语，内部之间可以批评，可以自我批评，行不行？可以不可以呀？（众：行！可以！）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左派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正如前天的《人民日报》，第三司令部写的文章，要打倒“私”字，要夺两个权，就是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权，还要夺我们脑子里那个“私”字的权。我也有。提了五点，什么“风头主义”、“分裂主义”、“山头主义”，什么“自由主义”，还有什么主义，最后归纳一个“私”字，要向这个“私”字夺权。这篇文章很值得读一读。那么，这个打内仗的问题，一个是参差不齐，第二个就是刚才那个“私”字。还有第三个，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在里边挑动，不要上他们的当。我们要团结起来，一齐对付他们，对付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地富反坏右。好不好？（众：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再讲就是对于反革命的政策，这些反革命红旗军要把他们彻底砸烂，彻底消灭，我们要向他们专政。但是我们还要有正确的政策，那些少数的头目，把他们逮捕，要专他们的政，但是对他们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我们要争取、要分化，不能把他们都当做反革命来对待。所以我们抓人只能抓头，大多数人，他们承认错误就算了。

但是这里面，出了问题，今后，我们各个群众组织（昨天我们在文革小组还讨论来的），

我们以后搞红旗军也好，打架也好，不要起动很多人。以后不要一听电话通知那里有什么事情，就去很多人。比如那一天，在一个“八一”中学那里有一百多个，不到两百个什么“联动”，其实有些都是不到十二、三岁的娃娃，当然也有很反动大人了。但不知谁调动的，去了一万多人。这个不行，还有空军学院的学生都去了，这个不要的嘛。以后那里捉红旗军也好，捉反动派也好，捉什么家伙也好，不要自动去，必须得到专政机关、卫戍司令部或中央公安部同意，说要去，去多少人，那才去。不然的话，甚至抓很多人，那个不好，是头头也抓，不是头头也抓，互相之间也抓，我抓你的人，你抓我的人，那怎么行呢？那就成了无政府了嘛！

我们中央准备向大家讲一下，打“红旗军”我们感谢你们，但是以后要不了那么多人。他们那里有几十个红旗军，甚至十个、二十个，最多一百、二百个，那我们部队去一连，去半个连，一个排，学生去了百、八十人不就够了吗？以后这类事情，在通常情况下得到中央公安部首先是卫戍司令部的通知，你们才能去，没有通知你们不能随便去。至于你们那个学校，你那个机关，你那个工厂附近出了事情，你们要及时派一百人、八十人或三、五十人，因为部队来不及，你们要去看一看，那当然应该，是可以的了。

总之，同志们，我们一切事情要按照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我们坚决同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作斗争，坚决向他们夺权，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坚决同那些反革命组织、红旗军作斗争，要向他们专政。我们坚决要支持造反派，支持左派，依靠左派，保护左派。

我们这些人总是要跟毛主席，要跟你们这些小将，但有时只是跟不上，跟不上就批判，批判以后我们就检讨，就向你们学习，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革命的小将、闯将们。

479. 聂荣臻在与科委院校革命造反派组织座谈会上讲话纪要 (1967年2月4日上午 京西宾馆)

聂荣臻同志首先听了各院校代表反映情况，然后在座谈中作了重要指示。

一、目前军队所处的地位很重要，解放军不仅要支持左派，而且还要做工作，因为派别很多，看不清楚，有时也会弄错了。

二、解放军一方面要支持左派，另一方面要加强战备，一点也不能疏忽。苏修对我们不断挑衅，新疆很乱，我们要提高警惕，因此，军事机关要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

三、公安系统在罗瑞卿手下管了十几年，我们对公安系统还不信任，你们夺权，我是支持的。

四、部队不能夺权。

五、要发展根据地，进行大联合，消灭山头主义，联合起来力量才大，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大联合，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

六、夺权以后，还让原来那些人干(个别除外)，你们只起监督作用，不要忙于事务工作。

七、夺权以后，在改的时候，你们可以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设立校务所，教务部。选出主任，采取集体领导，至于校长，不一定要了。

八、你们搞科委，是可以留一部分人的。不受军委命令的限制。

九、有些干部站在左派方面，你们要欢迎，因为你们不了解的情况，他们是可能了解的。

十、对于黑帮子女，一般不要清理，应该进行教育。争取一个算一个，看他是否与家庭划清界限，考虑将来分配工作。

十一、原毕业分配方案，可以重新分配，要群众重新讨论研究，对保守派也应分配，但要进行教育。

十二、许世友是一个老干部，人是好的，经过长征。只是性格有些特别。他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

十三、红旗军是一个反动的组织，发展相当快，你们要多注意一些。

480. 聂荣臻接见国防院校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2月4日)

开始，介绍代表。谈到北工情况时，

聂：“大方向一致的，都要联合起来。”

谈到成电、西电时，介绍了成电两派情况。

聂：“现在四川省混乱得很，有的部队有坏人，不能一样看待。有时部队弄不清楚，支持错了。因此，要求地方部队要了解情况。”

(又问了一下交大的情况)

聂：“交大两个组织观点一致，怎么不能合并呢？”

(交大回答：家里已合并)

聂：“交大夺权了吗？”

(交大回答：以前是“红革会”夺权，现在“红革会”与其他革命造反派矛盾很大，“红革会”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大搞沙文主义。)

聂：“怎么犯大搞沙文主义？”

(交大回答：他们是较大的组织，他们到处插手，控制《解放日报》，提出打倒托派，加剧造反派之间的矛盾，炮打张春桥，针对中央文革。)

聂：“他们是多大的组织？斗争是有反复的。上海交通恢复了吗？生产怎么样？学校夺权如何？”

(交大谈了一下上海的情况，下面问到南航情况，南航代表谈了一些南航的情况。)

聂：“中央反对山头主义。”

(南航谈到：……)

聂：“我不是保守，开除党籍慢一些，不要被事务性工作冲淡政治工作。”

(有人谈到：他也要夺，你也要夺。)

聂：“联合起来嘛！哪有一个人夺的呢？”

(谈到军事院校的军官如何打人等)

聂：“越是军官，越是不听话。”

(谈到军工问题)

聂：“‘八·一八’和‘红旗军’搞到一块，你们主要是争取他们中的群众，要把受蒙蔽的群众和他们的头头分开。主要要做他们群众的工作，不要歧视他们。”

聂：“你们应该站在潘复生的一边。”

(我们谈：潘复生应该站在我们一边。)

聂：“一样嘛！潘在省委是受排斥的，李范五和一些人排斥他嘛！他们支持他嘛！”“哈市在开始时很乱，我们也很担心。你们哈市没有其他组织吗？”

(军工：没有其他组织了。西工大谈了一些情况，说：科委支持保守派。)

聂：“我们没有支持临委会，我们来查一查。”

(西工大：昨天付德林还说支持多数派。)

聂：“少数多数还要看谁是正确的。总是会变化的。革命派总是由少数变成多数。”“西安的问题比较复杂，比较混乱。你们对霍士廉的看法怎样？”

(答：省委和西北局有矛盾。)

聂：“在军队一样么！霍在抗战时在山东。《红旗》十三期社论指的清楚。我没有和霍在一块工作过。不太了解。”

(同学说：李士英不是真革命，否则为什么自杀？)

聂：“陈总谈他原来受过害，对他有同情心，但希望在内部，夺权怎么样？解放军参加了吗？”

(西工大：没有反复，解放军支持了我们。)

(哈工大：目前哈市的运动情况有所变化，我们有些情况请示聂总，谈军委八条命令，给答复。)

聂：“可以派少数搞科委问题。”

(哈工大：科委的会议我们是否可以参加？)

聂：“公开的可以参加。我的意见是科委一下，可以找几个单位商讨一下，有意见交换一下。”

“关于毕业生分配，肯定也有争论，现在也没有决定，我的意见是实事求是。(因为有的学生家庭有困难)还可以讨论。

“关于经济主义，已经批了就算了，不要再追。”

(北航谈了一下夺权问题。聂又问了太机情况，南京炮工情况。谈到西军临委会时)

聂：“不是和稀泥，对于筹委会的人一定要区别对待，应该给予他们教育，帮助他们成为新人。”(谈到科委内部和院校串连问题。)

“我们和你们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串连。对于黑帮儿子，我们还要教育。父亲是黑帮，儿子不一定是黑帮。自来红思想是不对的。应该改造，应该教育，分配工作。可以提意见，(谈到材料问题。)关于材料问题，我们发给你们，(指八条命令以前)八条以后不能发，要同等待遇。现在解放军已介入，地方的问题也很复杂。为什么有的地方夺权成功一点，有的还不成功。现在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在台湾。苏修打留学生跟法西斯一样，我们要战备。新疆也很复杂。我们一方面要支持夺权，另一方面要搞战备。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一点不能忽视。所以军队上的要分批分期搞。支持左派问题上也很复杂，不能支持错的，在公安系统也要夺权，罗在公安部搞了好几年，我们也不放心。

481.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审查一九六六年国庆影片时讲话纪要 (1967年2月4日)

二月四日晚，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重新审查了重新录制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庆祝建国十七周年影片，现将审查时的意见整理如下：

放映前我们向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汇报了生产情况，并汇报说：这部影片是在师大“井冈山”、矿院“东方红”和地院“东方红”等院校革命造反派同学大力协助下制成的。康生同志问：有没有北航“红旗”？我们说：我们去请他们了，他们太忙，抽不出人，没有来。

片子放完后，江青同志说：“这部片子，我看过三次了，他们搞的比上次好。”

康生同志说：“我看一次，这次搞的很活泼，政治上好一些。”“几次国庆节，这次人最多，高举毛主席语录，表现主席思想真正深入人心，许多大场面，象人的海洋，很好。应该多些。”

江青同志同意康生同志的意见，并说：“游行结束后，人们拥向天安门的场面非常好，如潮涌。”

江青、康生同志意见，让在影片中加上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谢富治等同志的镜头。

康生同志提议加上新西兰共产党海因斯的镜头，江青同志说：“不加也可以，外宾已经不少了。”江青同志让把元帅的镜头剪短些，太长了。

对太阳升起后，第一次出现毛主席的镜头，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都认为不错。但画面是天安门的东角，象是在告别，江青同志让换上一个毛主席正在招手、情绪好的镜头。

江青同志三次提出解说干扰效果的问题。她说：“近景气氛声音小，效果气氛不好，老听一个人解说，超过了效果，现场人们的欢呼“毛主席万岁！”和“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声音最真实，最兴奋，最能激动人心，那时人们都注意看，解说声音不能提高画面的效果，应该听群众的声音和讲话。”

陈伯达同志说：“前面的镜头，工人农民少了。”

我们问康生同志对解说词有什么意见。康生同志说没有。

关于吴德的问题，研究了半天。最后，江青、康生同志的意见是：能做技术处理就重拍。把他卡掉。不能处理的话，就换成群众听的镜头。我们说：“有些重要镜头远处还得出刘少奇、陶铸等人。”

江青同志说：“我们没看见，你们看的次数太多了。”

关于文革小组成员的镜头，江青同志说：“去掉画面穆欣等两人，留下右边二人。”后来又说：“没有关系，一幌就过去了，不认识。”

我们汇报说：晚上看焰火时，王新亭在主席身边。康生同志说：“主席情绪很好，不要剪。”江青同志说：“王新亭没有什么大问题。”并问康生同志的意见，康生同志表示同意。

最后决定不看影片，看第一个拷贝。

482. 戚本禹在京棉一厂大辩论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4日)

工人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总理向工人同志们致以革命的敬礼！

最近几天京棉一厂发生了大事，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很关心。调查研究，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我听了四个小时以后，我有我的看法，不过我今天不谈，我还要继续做调查研究。这里的事不简单，不要以为自己的看法都是对的，不要以为自己的意见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最好双方都要有自我批评精神。武斗肯定是错的，是违反毛主席指示的。不要武斗，林彪同志在讲话中也多次提出的，也是中央八条里规定的，你们很多人都读了最高指示。讲话中运用毛主席语录，为什么我们正在宣传中央八条的时候，你们这里就发生了武斗，你们在这里就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定的，中央八条也不许武斗，工人阶级是最有觉悟最先进的阶级，但最先进的阶级，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为一厂的同志感到惭愧。大部分同志是不同意武斗的，武斗是有人挑动的，你们说是范以本挑动的，我看挑动者不是范以本，挑动者也许没有上台表演，也许以后也不会登台，但是总是要被揪出来的。你们自己做的事，以后要后悔，过了一年两年以后你们自己会后悔的。为什么要受别人的挑动呢？我看了许多诊断书和受伤的同志，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同志呢？为什么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当然我不能保证这里没有坏人，但这里大多数是自己的同志。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同志呢？不同的观点随时都是有的。为什么不用四大的武器呢？任何人动手压服别人都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有道理的人是不乐意动手的，动手打人是虚弱的表现。当然别人打你你需要自卫，但是要找出首先打人的人，武斗不能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如果能解决，那么很简单，也不用在这儿开会了，只要卫戍区派两连解放军就解决了，那样能解决问题吗？不能！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辩论，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一天不够，两天，两天不够两个月，两个月不够三个月，可以开大会讲道理，为什么要武斗呢？

京棉一厂乱一下是好事情，不乱死不水一潭不好，看不出问题，乱一乱水混起来了，什么东西都翻起来了，刚才这个乱就可以看出问题。这个乱不是打架，为什么要打架呢？每个工人家里都有孩子，有一家人嘛，打伤了丧失劳动力。大家愿意这样做吗？(众：不愿意)不

愿意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打架？为什么会受人挑动呢？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还是觉悟不高，毛泽东思想扎得不深。有坏人挑动，现在这个人还没有登台表演，也许永远不会登台表演，但一定要把他揪出来。双方都打人了，有的打的多些，有的打的少些，但没有听过一方检查自己打人不对，你就那么对吗？今天我们双方做一个协定，从今以后再不发生武斗，同意不同意？（同意？呼口号……）工人阶级说话是要算数的，（对！）特别是你们双方的代表，双方的领导人物应该保证这一点，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承认你们是革命左派。中央明确规定没有命令不能乱抓人。听说有一个杜继泽被抓了，（众：在印染厂）没有放出来，现在我们决定把他放出来。（鼓掌：呼口号）如果他犯了党纪国法，可以把他的材料送到公安局，如果你们认为公安局不可信，可以上报公安部，上报国务院，上报毛主席和中央文革，但不许武斗。有中央命令才能抓，抓人的命令是公安部的命令。也可能有个别的抓错了，但也要执行。可以造他的反，但执行以后再上报。无论是东方红还是造反队，双方都无权力乱抓人。除非是杀人放火的现行反革命，只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可以由群众抓起来，扭送到公安局，不能自己放在哪个地方。不能抓贴了一张大字报反对你这一派的人，反对你的大字报的人都抓？内部争论不管是反对了谁，反对了什么组织的领导人，无论是东方红的领导人，还是革命造反团的领导人，即便是反对中央文革的某些成员，反对我和关锋、王力的，都不能抓。

有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人贴了我的大字报，有送公安局的，我连夜打电话叫他们释放，不放的话，你们要负完全责任，不能随便抓人。老子天下第一，这样怎么能当权呢？谁反对你，你就抓谁，这不荒唐吗？对一条，有没有不同意的？（没有）不同意的举手，我和他辩论（……）有人举错了手是因为没有听清，不要抓小辫子。小辫子每个人都有一大把，要抓也抓不过来。要抓大辫子。不要因为人家说错了一句话，举错了一回手，骂了一句人，就抓住不放，好人还是坏人要看他是拥护毛主席还是哪个主席。反党反毛主席这是大辫子。

今天讲话主要的第一，不许武斗，第二，不许乱抓人，这是大家通过的。还有一条生产问题。我来之前到车间看了一下，车间里贴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大标语，但生产没有促好，时常处于停顿状态。无论什么原因，不能停产。停产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不想讲，否则又要争论起来。这个问题下次再争论。生产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工人阶级最光荣的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光荣的岗位，我们不能离开岗位。

东方红最近几天跑了许多人，我想恐怕是你们给他们施加压力，压力肯定是有，压力的原因我可以再做调查，但没有压力，我相信大多数工人是不会离开生产岗位的。（众：谁反对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

我不希望别人利用我的话压制另一方，有压力离开工作岗位对不对呢？（不对！）我认为是不对的，如果是左派就不怕压，要革命就不怕，有点压力就跑，这是不对的。有压力不跑，抓了是对他们的一个大暴露，比方你坚持生产岗位，如果他去抓，对东方红有利，说明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上。抓去无非是打一顿，打死人就要偿命，西城纠察队打死人的有副主席的儿子，部长的儿子，统统抓起来，没有什么人有打死人的权力，打死人就要偿命，打死敌人也应该有专政机构，对革命群众谁打死了就要偿命，国家副主席的儿子，部长的儿子，将军的儿子，打死人后同样要抓起来，特别是革命左派更不要打人，真理在你手里，你永远不要怕，当然怕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怕打人，怕别的什么，我没有了解。真正的革命左派，一定要坚守生产岗位，一方面抓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把生产搞好，不能把生产丢了，生产岗位就是战斗岗位，我们的革命同志，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生产岗位，同意不？（同意）有不同意的请举手，哪怕天上掉下来刀子也要坚守岗位，我今天和同志们达成三条协议，希望同志们从今天起要执行，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无命令的随便抓人，第三在任何条件下都不离开生产岗位，这三点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

你们厂的问题，只能通过四大武器来解决，不同意的问题以后可以辩论。但是我对大家

在辩论前要考虑形势，大家要看到现在的形势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进行决战。49年胜利，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这是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中国人民把三座大山推倒后，有了胜利果实，主席也说过……(没记清)就好象一棵桃树，上面结了好多桃子，桃子熟了，谁都想摘，无产阶级要摘，资产阶级也要摘。资产阶级想把革命烈士鲜血换来的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他们的代表人是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在宪法报告中说军内保护资产阶级利益，鼓吹工人阶级欢迎剥削，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这些都印成了本本，在北京和天津都有，中国的农民喜欢剥削，越剥削越高兴。他们反对合作化，把合作社砍掉一半，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农村，他们把自己变成特权阶层，走资本主义道路，让工人农民当牛作马。解放以来，他们和主席斗争了十七年。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大搞社会主义事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建立人民公社，但是他们要发展富农，提出富农可以入党。那个王光美访问印尼的电影你们看了没有？那个人是资产阶级分子，大资本家出身，他的哥哥嫂嫂都是天津来的大资本家，到了中南海，刘少奇口口声声称他们大哥、大嫂，要他们入党。他们是资产阶级党，对抗毛主席。彭真北京市委就是和平演变的典型，彭真搞的北京市委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斗争的前线，不是有个《前线》杂志吗？他们在文艺上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应当说从前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一直在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总攻击我们就要反击，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每个工人的命运。如果他们得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工人替资本家当牛做马，我们如果胜利，就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企业，毛主席路线胜利了，我们就不会替资本家当牛做马，我们的后代也不会当牛做马。同志们要紧紧地掌握这个大方向，不能让执行彭真路线的人执政，要让我们的工人执政，不能让修正主义执政。毛主席对我们工人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的作法，符不符合他老人家的希望，如果不符则要改正。同志们，他老人家希望我们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工人自己执政，而不是象现在还搞武斗。每个人都要考虑这个大方向，考虑我们的每一言、每一行是对资产阶级有利还是对无产阶级有利，怎样建立革命组织，谁来掌握。我们要想一想，要掌握这一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怕革命派掌权。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希望我们武斗，自己打自己。你们一二三厂本来女同志多，结果武斗最厉害，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你们当中有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很多都自己打自己人，你们回去想一想，这件事对谁有利。他们让你们自己打起来，他们就高兴了。他们不甘心失败，他们拿出十八般武艺。工人阶级要大联合，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不联合就不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工人阶级之间没有什么仇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和平演变的修正主义分子，你们的斗争矛头应该指向他们。要分清敌我。分不清敌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毛选第一卷头一条上写的，不分敌我就不是马列主义者。分不清敌我哇哩哇拉就不是马列主义者。自己人犯了错误就批评指出，而不是拿起木棍，敌人就是给块糖也不能要他的。打了人大多数是自己人，很多事情，要我们冷静地想一想，不冷静就容易上当，就容易被人利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怕你们冷静，必须冷静考虑才能分清是非，你们冲突他就很高兴，他们就可以利用，你们好好想一想，很多现象和本质不一样，必须冷静考虑，才能分清是非。

你们这里有很多青年，很单纯，我很喜欢你们。因为我自己也是青年，但我又很担心你们，因为你们脑袋上没有皱纹，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脑袋上有皱纹。希望你们学习主席著作，找准斗争目标，提高警惕。

另一条，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破坏，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他们向无产阶级进攻时，也打着造反的旗号。我们进行辩论时，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时，不要让他们参加，让他们靠边站。地富反坏右现在已经在动了，而不是蠢蠢欲动，青年人要特别警惕，不然容易上当，你们没有经验。不是打着造反旗号的都是革命者，甚至有反革命的。红旗军大部分是受蒙蔽的，但头头就是国民党特务，已被逮捕。打着“红旗”反红旗。还有化工部有个全国工农兵红色革命造反夺权兵团，只有三个人，一个工，一个农，一个转业军人，就叫“工农兵”，

他们专门抢国家最机密的档案。在抢国家机密时，当场被逮捕。这些是报得出来的，还有没有出来的，同志们要注意，有街道管制不容易识破，工厂里暗藏的就不容易识破。

在斗争中，第一要掌握斗争大方向，对敌人要坚决，毫不留情，对自己同志不能用棍子。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二要大联合，不要搞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夺权不是为自己夺权，而是为阶级夺权，左派夺权后，若不破私立公，不触及自己的灵魂，做官当老爷，矛盾就会向右转化，做官当老爷就会倒台。

前年冬天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人，去年冬天有变坏的，有变成保皇派的。去年夏天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的革命派，今年冬天就变坏了。当然这是个别的，我们不希望左派变坏，但不严格要求，就可能变坏。我告诉同志们，有一个经验，去年和我一起受打击的有八个同志，平反后，党和人民给了他们很大的荣誉，但是，他们当官做老爷，争权夺利，不下厂，不下乡，不和工农相结合，困难时期，人家吃定量，他大吃大喝，当时的左派现在成了黑帮。

要大联合。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善于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向真理投降，向真理投降是光荣的，而不是耻辱。

第三要警惕地、富、反、坏、右的破坏。

除了不准打人，不许无命令乱抓人，不离开工作岗位三点以外，要注意后三点，建议大家斗争中掌握大方向，搞大联合，而不是小集团主义，警惕地富反坏右和暗藏敌人的破坏。

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我的全部的话完了。

483. 李先念传达周恩来指示 (1967年2月5日 中南海)

二月五日李先念副总理在中南海传达周总理对外贸学院去全国各地建立财贸联络站人员的三点指示：

(一)去了以后干什么？主要是调查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自己，还要了解文化大革命搞的如何？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如果真正做到的话，可以了解到很多情况。

(二)一个地方去的人不要太多，主要依靠当地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个点去三个人，帮助那个地方，与那个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相信当地的革命造反派。阶级斗争很复杂，建立的组织很多。要分清真假，不要支持错误，要支持真正的左派，既要有革命性，又要科学性，还要有纪律性，真正的革命左派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

(三)时间问题，徒步串连中央要做一些规定，原来中央做试验点，现在长沙、韶山有三十五万人了，应该鼓励他们的精神，但出了问题，吃饭住房问题。下工厂中央也要做些规定，究竟要去多长时间，两个月时间，要扎扎实实地干两个月，还可以宣传一些，搞好了顶半年，甚至一年。边建立联系站，边搞“三同”，诚心诚意地跟当地的革命派搞“三同”，认真地向人家学习。人家能做到的，你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完全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李先念副总理接着讲：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准，中央文件为准，目前的大方向，左派的大联合，夺权中的大问题是左派大联合，不要分裂，近日报纸上连天累版，三令五申强调这个问题，现在“乱”，就是革命的“乱”，形势好得很，但左派之间，相互之间意见不少，甚至发生武斗现象，可能有人背后操纵。有人受蒙骗，你们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484. 陈毅接见西安交大及西医“八·三一”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谈话纪要 (1967年2月5日上午 中南海)

被接见人员：西安交大文革委员会代表九人，西医八·三一代表两人。

陈毅副总理与代表们一一亲切握手，问了每个人的姓名。

陈副总理：你们久等了，我们向你们道歉。今晚江青、康生同志可能接见你们。我先同你们谈一谈，下午再找指挥部的同志谈一谈。我们把李世英同志请来，明天我们见一见，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这次我们搞苏联斗争，很忙，对不起你们。与苏联、法国他们进行外交斗争。与苏联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要否要打仗？打仗不会，是否要断国交？看来断国交还不会。他们打了我们的人，我们也去打他们的人，这是报复。我们的目的是世界革命，不在于报复，三百人可以打死他好几十个，但理由不充分。苏联是个民族，刺激他们的民族感情没有什么好处。他打了我们的人，我们不报复，报告全世界。我们做得越有理，就越能使他们(的人民)觉醒，他们就是要挑起来使外交关系断绝。他已与美国勾结起来了，两面夹攻，南面来，北面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怕，我们作好准备的。但是敌人越少越好，不要打倒一切。万里长征本身是光荣的，但是万里长征是垮台的结果，毛主席上了台，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本来没有必要万里长征。马上可以从江西北上，解放上海，中国解放就可以提前十年，就是因为打倒一切，党内打倒一切，包括把毛主席也打倒，党外打倒一切，党内所有犯了错误的都要打倒，党外打倒一切，所有资本家，手工业者，地主、富农都要打倒。那时象你们三个戴眼镜的人，都是知识分子，穿长袍的人，都不行，都要打倒。现在中国又有了这个情况，国内打倒一切，国际打倒一切，这是个很危险的办法，这样来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错误的，不要一打倒就打倒一切，我们是没有这个本领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打击面不能过大，要象毛主席那样分化一切，瓦解一切。不论他几十年老革命，犯了几个月的错误，都要打倒。有打倒一切之风。我们要争取一切，分化、瓦解一切，孤立一小撮。毛主席的伟大就在这里。毛主席说：中央里面还要有几个右派，中间派，左派的中央是不行的。这个你们不要贴大字报，否则就不得了(陈总和同学们都笑了)。

交大：我们同意陈总的话。

陈副总理：我们这里也有左中右(指参加座谈会的人)，在某个问题上你是左派，我是右的，在另个问题上你是右的，我是左的了。这是必然的，符合自然规律。

好，言归正传，我希望活泼一些！交谈交谈活思想。

郑叔良同志交来的材料我们看过了，你们还有什么要谈的，或者重复谈一谈，到 12:00 结束，下午接见指挥部的同志。(薛焰同志入)

交大：首先请陈总代向毛主席问好，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陈副总理：我代你们转达你们的祝愿，这几天见到主席了，一定转达。毛主席对你们交大是熟悉的。

交大：扼要地向陈总汇报两派分歧的情况，最近出现的严重情况，1. 28 大会的真相等。

陈副总理：你们昨晚有电话吗？好一点吗？

交大：越来越厉害了。

陈副总理：就是矛盾还没有解决啰！

(交大继续汇报情况，讲话讲到依中央指示，提出要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他们的报纸上都登了批判文章时，把红卫兵报拿给陈副总理看，交大暂停汇报)。

陈副总理：你讲你讲。

(陈总看红卫兵报，看到第 15 期上的文章《只有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大联合，大夺权》中的口号时，念了出来：“打倒折中，打倒调和，打倒投降，消灭叭儿狗”(陈总笑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呵！）

交大：现在有些人把同意交大观点的叫保守派。有些同意我们观点的组织连生活都成困难，象西医八三一。

西医同学汇报情况，讲到西医临委会。

陈副总理：有多少人？

西医：800 多人。

陈副总理：你们多少人？

西医：400 多人。

陈副总理：就是在对交大问题上你们分成两派了。

(西医同学继续汇报情况)

陈副总理：(你们)是西北医大？

交大：他们是西安医学院。

(西医同学继续谈到被砸的情况)

陈副总理：打？砸？抢？

交大，西医：他们有人喊打砸抢万岁！

交大：不仅是西医八三一，还有很多革命的组织被砸，象 101 东方红兵团，他们支持保守派来夺我们的权，像公安局，陕西日报，西北局，车站都是这样。

(下面又简要谈到分歧由来，当讲到联络站时)

陈副总理：造反联络站是什么派？

交大：叫文革联络站，是保皇的。

陈副总理：现在怎么样？有多少人？

交大、西医：开始人较多，现在垮台了。

陈副总理：人都到那儿去了？

交大、西医：有的加入造反派组织了、有的退出后什么也不加入，有些群众入了另册。

陈副总理：什么另册？啊，另册？你们毛选学得比我们熟。这个不应该，不应入另册，应该入正册。

我对西安的情况不了解，他们(指联络站)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同学：去年九月份。

(交大同志继续解释三句半话，分歧的由来与实质，讲了交大革命师生的切身体会，受工作团反动路线的迫害 50 余天，“一千多人查上当，放包袱，几千人做检查，但工作团的撤走后，我们没有把矛头对准过去整我们的同学，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相信他们会自己解放自己，而是矛头一致向上，我们深深感到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所以交大里面两派对立不象某些学校那样凶。讲了李世英讲话时的条件与西安的情况，谈了关于造联络站大会的反的问题。)

陈副总理：就是冲他们的会场，你们冲了几次以后觉得不好，不主张冲了。完全可以讨论嘛，有什么罪过？为什么要公开出来？

交大：当时我们完全是为了提高斗争艺术才提出这个问题的。

(讲到分歧的公开时，提到“遍身赤”战斗队)

陈副总理：什么？呵，遍——身——赤。

(交大继续汇报开始组织辩论的情况，以后发生了马兴事件，罢工，组织同学下厂，可是他们一月十四日突然决定，要全市性公开批判，只有交大反对，全市性公开辩论是他们挑起的。)

陈副总理：指挥部有几个学校？

交大：十一个常委。

陈副总理：十一个常委，十票赞成，一个交大反对。

(交大同学继续汇报，讲到交大下厂较早，而他们下去后专门收集交大同学的“右倾”材料。)

陈副总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交大：他们说反帝必反修。他们还说李世英是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新的阻力。1月21日，他们一下子出动11辆宣传车在宣传反李世英，结果有的工人根本不知道李世英的讲话，连李世英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呢？

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怀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形式，象西工大文革副主任×××是大扒手。

(把大扒手的传单给陈总看)经济主义在他们内部也有反映，如四个人坐飞机赴京。

陈副总理：是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叫他们坐飞机来的，我们没有叫他们坐飞机。

吴彬(陈副总理的秘书)：坐飞机来我们不清楚。

陈副总理：你们坐火车要多少时候？

交大：24小时。

还有阶级敌人在这次大辩论中挑拨离间(下面讲了一些可疑现象)。象工农总部、红恐队趁机活动。

陈副总理：你们有没有把这些话同指挥部的同志讲过？

交大：讲过，我们在指挥部内没有什么发言权，他们叫嚷要开除交大。

陈副总理：开除了怎么可以，开除了不对！

交大：工农总部的头头雷力到我们学校来挑拨离间，被我们抓起来游街了。(陈总笑了)

陈副总理：现在工农总部还有什么活动吗？不是不合法了吗？

交大：我们怀疑背后有人在挑拨离间，使这次夺权发生了很大困难。

陈副总理：不是都夺权了吗？

交大：(把指挥部开会分配夺权任务的经过讲了一下)当时交大提出不同意见：(1)没有工农代表参加，(2)没有被夺权单位造反派参加。同时我们认为西北局、公安局我们做了一段时间工作，应该参与夺权。(接着讲了指挥部去西北局夺权经过，讲了指挥部提出“炮打临指，火烧总部”的口号。)

陈副总理：就是把两派都踢开。

交大：公安局也是这样。保守派东方红利用我们之间的矛盾提出打倒李世英的右倾投降主义，结果他们支持东方红了。

陈副总理：那省、市委怎么样？

交大：(简要汇报了省、市委夺权情况)。现在我们学校提出一个口号：争取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人、农民、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大联合，大夺权。

陈副总理：还有一个革命干部！

交大：对，我们提到革命干部。

陈副总理：我提个问题，你们准备怎么解决问题？下午我们也要同他们谈(接着一个个念了他们的名字)。

交大：我们的态度(1)有右倾坚决反右，我们多次炮轰总会，火烧李世英。

陈副总理：就是你们不包庇任何人。能不能说服他们实现大联合？

交大：我们的愿望是这样，但他们提出要打倒李世英，交大是朝鲜。

陈副总理：他们是否能代表交大、西医八三一以外的所有同学？

交大：不能，他们中有的人有不同意见，但不容易发表。(交大同学讲了事实)，提到×××)。

(继续讲交大的态度)(2)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联合，反对分裂，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在枝节问题上决不纠缠。

陈副总理：有否具体建议？

交大：我校文革号召大家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及老三篇和接班人五项标准，首先破私立公，克服已经露头的宗派主义情绪。

陈副总理：你们对西北地区、陕西地区接管和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意见？

交大：我们提出口号：工人阶级领导，以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大联合，大夺权。

陈副总理：马上就要搞春耕，抓生产，没有饭吃怎么办？起码西北局、省、市委得活动起来，你们内部问题并不重要。他(指薛焰)一个人也没有办法。

你们有什么表示，可以使指挥部一方满意？截止目前为止，他们对你们是不满意的。

今天下午我同他们见个面，晚上两家见了面，不要吵起来，吵起来，我们就不好办罗！

交大：他们有些人批评你上次接见时的谈话是右倾的。

陈副总理：那没关系，他们怎么批评都可以，我有记录。(陈副总理边讲边看记录稿)上次汇报时蒋文清的调子很高，说是敌我矛盾，沈荣水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说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做亲密战友处理。我说李世英这个人我不认识，但他是运动中起来的，有过贡献，吃过苦，不应把广播车开到街上，这时蒋文清马上说：是他们交大公开的！我说：哪一个公开的不要紧，你们自己回去解决，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样。毛主席几百年才出了一个，林副主席一百多年才出了一个。李世英同志若真有错误，因为当时我对他的讲话还不太了解，所以说如果真有错误是可以批评的，当然不是家丑不可外扬，刚树一面旗，就打倒，那不好。当然，若是一个月、两个月不改，那可以通过群众来解决，结果后来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我讲的李世英可以拿出来斗，另一个打电话来，说我讲的李世英是关键时候提升到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我还没有这样的权力这样说，我还没有做过这样冒昧的事情。(陈副总理念 16 条中的第五条：“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顶多李世英说过一些错话，但还没有做什么错事。你们看可不可以说服他们？我这样说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了。

交大：我们完全同意陈副总理的意见。

陈副总理：你们在北京与他们见过面吗？

交大：见过面，在一次国务院接待室召开的了解情况会议上，我们只谈了二分钟，他们就不让我们谈了。

吴彬：他们(指交大)说两分钟的话都不允许。

交大：象陈副总理这样讲，我们完全可以接受。

陈副总理：是否现在我先去同他们谈谈，不然晚上江青同志、康生同志见面都成问题，两派争起来怎么办？军区的态度怎么样？

交大：有的支持他们，有的支持我们。我们担心左派内部的分裂引到军队中去。军区胡炳云是否是反动路线的执行者？

陈副总理：如果他们(指军区领导)承认了错误，支持左派，但不介入你们内部分歧，你们团结起来，他们支持，你们看怎么样？

交大：我们完全同意。

陈副总理：你们要把军区与西北局分开，区别开。胡炳云是我的老部下，是可靠的，作战很勇敢，作战还得靠他们。他还是跟毛主席走的，我希望你们区别对待，他们是机械化，受了蒙蔽，是会觉醒，站到毛主席一边的。从他们出发要保西北局、省委，省委书记是军区第一政委嘛！广大人民解放军战士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要照顾解放军的威信。

西医：他们想到用军队来压交大，利用军区，宣布八·三一是保皇组织。

陈副总理：现在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军委要军区站到左派方面。如果他们过去犯了错误，可以检讨，现在要站到你们一边，他们不好表态。你们分成两派，有两个左派，他们怎么办？

交大：解放军同志最好不要介入两派分歧。

陈副总理：这个一定不能介入。

交大：还希望新华社也注意，有些报导只是加深分歧。

陈副总理：新华社里也很乱。

交大：不能单报导一方面，希望两方面都报导，否则对另一方面的压力很大。

(西医八·三一李同学，谈关于大会主席团把他们打成“保皇派”问题，指出西工大、西电利用解放军来压另一方。)

陈副总理：解放军怎么表示？

交大：8134 部队表示支持西工大。

陈副总理：那他们不了解情况。

薛焰：公安局也是这个问题，解放军开进去了，后来又撤出来了。

交大：我们有个小要求，他们指挥部应该承认错误。

陈副总理：把李世英的问题摆得比夺权还高，摆得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高，这个不对，说我是和稀泥，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我把这个要求带给江青同志，康老，总理，他们接见你们。我的意见，大方向是一致的，团结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观点不一致，互相讨论，作些自我批评，不要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三期社论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很能帮助你们解决问题。三期社论中很多章节是毛主席的手笔，是毛主席加的，很多中央文件都是毛主席的手笔，一看就看得出来。对敌人不能做原则的让步，否则是机会主义；但也有退守，迂回。万里长征，江西失败了，只好走，走到西北，走到你们的地方。对敌人也不能一味硬冲，也有退却，迂回，暂时承认敌人的强大，革新整顿。列宁在《左派的幼稚病》中说有两种妥协，革命的妥协与改良主义的妥协，前者是正确的，同志之间解决不了，只好暂时妥协，把问题挂起来。毛主席最会斗争，也最会妥协，否则怎么能领导这么个大国？一定坚持的非坚持不可，不必要的就让。对敌人斗争、夺权要坚持，对造反派内部要顾大局。有所让，有所不让。为了团结，顾全大局，这不是和稀泥。还要说，有些稀泥还得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机械地去理解。西安的解放军要支持左派，但有两个左派，不能站到你们这方压对方，也不能帮助他们压你们。以前他们有错误，压制过你们，你们这方面就要妥协，只要他们承认错误了，你们就不要去算老帐。六、七月份，你们要反省委，他们(指解放军)当然不答应，这与刘、邓不一样，你们要谅解。要是司令的话，也可能犯错误，因为省委书记是第一政委嘛！把黑材料送入军队，准许他们犯错误。要失去了解放军的支持那怎么行？中央报导了上海，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的接管，都是这样。军区代表、省革命干部参加的，这样才能接管下来。革命干部最好能争取一、二个，例如山西的袁振，再加上学生、革命群众这样才能接管下来。光学生是接管不下来的。你们可以搞文化，科学，但工、农业搞不来。接下来，马上生产变物质，这里面哪些人犯了错误，给他改错的机会，哪些人犯了罪，叫他立功赎罪，哪些人该调工作的，哪些人该逮捕的，哪些人以观后留用的。不能在左派内部纠缠，那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你打我打是没有什么结果的。自己伤了自己。就是刘澜涛，舒同，王林，霍士廉，肖纯也要区别对待，不能一根绳子串起来，不能简单地一律不要。有留用的，调工作的，甚至该捕的。但大部分要留用。西北局掌握西北五省，省委要对几千万人负责，掌握市委要对全市负责，油，盐，柴，米，酱，醋，茶。最好是监督，让他们干，我们慢慢学会了，我们来干，有工人，学生，青少年是骨干，逐步转到工人阶级来领导。一定要有一批老的骨干，如刘澜涛，他对西北地区熟悉，那怕是个废物也要利用，他是西北局书记，中央委员，还没有开除党籍，他要戴罪立功。交给大家斗，完全有权，前几天我们看到一张照片，一排人跪在一起这很不好，共产主义者最文明，抓到国民党的军、师长我们也是文明对待的。把革命学生也拉出来游街了，这个不知能不能克服？真理在我们手里，搞个办法对自己不相信，图痛快，是感情，是报复，这对你们是容易理解的，他们(指指挥部)那边不太行，你们可以同他们谈谈，不要坐在一起就吵架。他们到北京来，三期社

论发表后思想上有什么活动？

交大：我们顾全大局，中央有什么指示要我们让步，我们坚决执行。

陈副总理：今天下午同他们见见面，然后同他们协商，看看晚上能不能？

交大：根据您讲的精神，交大同学可以停止辩论，今天晚上打电话回去。

薛焰：只要他们不进攻，我们可以停止。这里面有宗派主义。许多工农群众是坚决反对这场“辩论”的。

陈副总理：你们反对打砸抢，群众是支持你们的。

交大：我们不是笼统的反对打，砸，抢的。国棉七厂的保字号组织垮台后，不加入造反派组织中去。

陈副总理：就是造反派的一些作法他们不同意。

交大：造反派不要他们。庆安公司也有这个情况，有一个人为了加入造反派，自己带了块牌子游街。

陈副总理：这样做不好。

交大：矿院保字号的临委会的人要加入造反派，筹委会就非要他们反右倾不可。

陈副总理：毛主席在1月22日讲过，戴高帽子，下跪是对土豪劣绅的办法，不能用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用来对人民内部，战犯犯了罪，不杀他，对我们还有些好处，也许我观点右了，讲了这番话。文化大革命左了不行，右了也不行。中央还没有指出，我提得是否太早，就是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要反右，要反左，李世英讲的不要冲三干部会场我很欣赏，蒋文清不同意，这是中央的决定，中央还叫他们搞个秘密地方，不让学生知道，好好开会。冲就不对，李世英讲的对！我不认识他，不必为他辩护。刘澜涛有罪，王林有罪，霍士廉犯了错误。但不能说西北的干部都有罪，开个三干会，说是大阴谋，去冲掉。要说服指挥部的人，说服你们，你们掌了权就会知道，你们将来要当权的，犯了错误怎么办？戴高帽子？游街？毛主席说：准许犯错误，准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准许在革命中改正错误。这是最伟大的思想。刘澜涛愿意改正错误的话你们不能拒绝他，他不愿意改正你们就砸烂他的狗头。今天晚上接见时希望你们不要闹对立。今天跟你们谈了，对西安的情况更清楚些，李世英可能讲了错话，可以在内部自我批评，指挥部作法不好，他们作自我批评，你们不要去指责他们，不要互相攻击，文化革命中革命左派有分歧就非要对方投降，一讲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根本不是这回事，自己做自我批评就行了。掌了权，天天都会犯错误。

西医八·三一：我们在家的同学连文化革命都搞不成，什么都没有了。

陈副总理：我向指挥部的同志们做做工作，主要是周总理，康老，江青同志来做工作。我想他们是会听中央的话的。

交大：西安地区的形“左”实右是否可以提一提，如高喊：“打砸抢万岁！”

陈副总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别有用心的人要利用这一点。

交大：西安的谣言很多，有人说，李世英的后台是陶铸。

陈副总理：肯定是对的，没有的事。

交大：西安市工农群众来京的很多，是否首长可以同他们谈谈，作些指示。

陈副总理：要把生产搞好，革命是精神，动力，引起生产上的变化。精神变物质，这也是一个考验，搞革命把生产搞坏，他们就秋后算帐，刘、邓的反动路线就是这样，你搞革命，结果火车不通了，米没有了，布没有了……(他们就会说)那你们不是和我一样。目前斗争的焦点不是造反派内部问题，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把它挂起来，明年再讲。你们年青人还可活几十年，我们是六十多岁的人了，活不了几年。刘少奇、邓小平看了他几十年。不要马上下结论。我这个话是“黑话”，(众笑)水平高的一看就理解，水平低的就认为是黑话，不要说陈老总又在和稀泥了。大革命是无穷的，你们在坐[做]的我现在承认你们是左派，但以后十年怎么样，还永远是左派吗？还要看！毛主席那时就是这样，35年以前就是挨打受气，

那时你也夺权，我也夺权，但都不行，我也反对过毛主席，只有毛主席行，1935年上了台，1945年在七大成为全党领袖，1949年解放成为全国各民族领袖，现在开始全世界承认是世界领袖了，但还有些人不承认，文化革命搞好了，越南把美国打败了，苏联人民起来造反了，将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开个会，承认毛主席是领袖。“是非不可不清，是非不可太清”（根据陈副总理当时讲话来理解是肯定这两句话的），这是典型的和稀泥。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一上台就不主张争论，先把军队救出来，十年之后，安静了，在延安整风，今天我可以劝他们，你们可以听得进我的话，他们如果不行，听不进，那就更高级领导同志与他们谈。夺权了，只搞接待接待，别的不干，那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打破新反扑，搞生产，麦子，工业。西安是个大工业城市，你们看这些话他们听得进听不进？我说错的话比李世英还要多，但毛主席，周总理还要我（众：大笑），要我接待外宾，还有内部接待。

交大：李世英在我校已作过几次检查，炮轰过几次。

陈副总理：也用不着炮轰，要帮助，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左派之间的民主问题，如果不民主，一定分裂，现在你们夺权，等于没有夺，瘫痪在那儿，一开始工作，争执很大，怎么办？一言堂？那可又要犯刘澜涛的错误，以后一大堆问题你不民主地处理，那过了几年又是一个刘澜涛的命运。搞文化革命不能专断，谁专断，砸烂谁的狗头。根据错误的性质分析，李世英讲错了一些话，但性质不那么严重，又不是反党集团。就是为了团结他们（指联络站）一部分人，讲了那些话，用谈判有什么错？今天下午同他们打通思想，外边的谣言不要轻信，没有中央文件不能信，北京大街上的大字报，不能轻信，以中央文件为准。有些人看热闹，通风报信，有些人别有用心，搞乱你的阵营，欺骗那些没有判断能力的人。一部分人的确别有用心。省委不能让他瘫痪，我们要抓头头。现在你们两派不一样，我们抓那一派？有些话一讲就改头换面地送到街上，我根本没有讲李世英是关键人物，也没有讲过可以公开批判，我只是说是内部矛盾。运动中一大批新人应该培养，有很多新人物，也有很多意见，中央做工作，允许改正错误，准许革命，准许再革命。你们回去，下午我们打电话告诉你们。

交大：我们的电话坏了，我们打电话来。

吴彬：那半小时打一次。

陈副总理：我们可以把同他们谈的情况预先告诉你们，大约下午五点可以结束。好吧，就谈这些。

交大×××：我代表交大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把红袖章赠给陈副总理。

陈副总理：呵，我可是老犯错误的。

（交大同学把红袖章给陈副总理戴上）

陈副总理：革命的交大，好，谢谢你们，再见。

485. 阎长贵给清华井冈山总部的电话记录 (1967年2月5日)

我前几天来你校看了一下大字报，发现了你们反托派，这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指向群众，而应当指向当权派，一般同学有错误缺点应当批评帮助，反托派对本身不好，对团结也不好，请转告蒯大富。

486. 陈伯达在北师大附中的讲话纪要 (1967年2月6日晚7:00—8:30)

地点：北京师大附中六·二〇北京公社井冈山战斗团

上次我来过你们学校，听说你们辩论对联问题，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横批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个“基本如此”。听说你们还要组织三万人和我辩论，三十万、三百万，这个我不怕。（六·二

○ 北京公社一同学：我们不知道，可能是“老左派”)今天我讲话，明天会不会有六万人？也可以。我可辩不过你们，辩论了，不见得道理输了，我的道理也许对，因为说不过你们么。我们来到群众中是当小学生的，我讲的话如果你们都记下来，写成大字报，贴在大街上，我就不讲了，因为我们有些是交换意见。今天我们和你们交换个问题，关于复课的问题。初中下学期复课，高中也打算复课，大学也在研究。

同学们每天到街上游逛，学生中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一个人一派，两三个人一派，这不好么！文化革命要触及每一个人的灵魂，不然也要成为修正主义。复课后初中可以少学一些，高中可以多学一些(指毛选)，将来如何上课还要研究。我过去十三岁的时候，我也不念私塾了，在家读《纲鉴易知录》，半年就读完了，就是自学，现在自学也可以。政治课可以大学毛选。数、理、化还可以学。地理、历史也可以自学，比如一个地名在什么地方，泰山是在中国东部，就不会在西部吧。现在学习数、理、化不叫不关心国家大事，到了共产主义还要学数、理、化。大家的心现在很浮，又不集中在学校，怎么能够批判呢？军训只能搞一两个月，不能搞得很久，我也搞过军训，学过排、连、营的教练，也是在上课中搞的，在操练课上。(同学：我们到了卫戍司令部，请他们派军队帮我们军训，他们说，如果中央文革不批准，我们一个也不能派。)中央文革从来没有下过命令，有事只能和群众商量。中央文革永远是学生。(同学问复课和下厂的关系)下厂下乡不能一下子全下去，几岁的小孩也下去，影响生产，本来一个车床只要一个人管理，现在一个车床上有好几个人，老师傅就看不了车床，光看人了。下厂应该分期分批下去。在学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以边上课边批判。你们可组织学生委员会自己管理自己，现在你们太涣散了。

(同学：组织起来，观点不一致怎么办？会不会吵架？)总的来讲，只有两大派吧。你们不要以为自己全是马列主义，联动的错误是搞一些恐怖活动，过去搞的只要教育教育就行了。如果他们现在不听教育，以后慢慢会听的，对联动的要研究，要一分为二，要等待他们的觉悟，他们觉得父母被斗过，心里有些不平，慢慢会平的。(有的同学问：元旦社论不是说要和工农相结合吗？)你现在多大了？(答：十九岁了)你起码还有二十年、三十年去和工农结合么！(有的同学说：现在农村、工厂斗争很激烈，需要我们同学们下去。)过去工作组包办代替，你们不能成为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同学提出阶级路线问题)看人要看他长期的活动。父母很好，儿子不一定很好，领袖人物不一定都是出身好的。出身好的也不一定都好，例如，英国工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出身都很好。

(同学：现在无政府主义很严重，因此我们想通过军训把大家组织起来)不一定通过军训这种形式才能组织起来，现在还可以通过上课么。现在提倡大集体小自由，要批评个人主义，你们可以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下厂下乡要分期分批，你们不能成为工作组，包办代替。

(公社一同学谈了谈公社的打算)可以通过上课把同学们组织起来，边上课，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进行斗批改。现在的比较涣散状态对你们很不利。

(同学谈到长征问题)今后长征不一定搞了，你们要搞时间还长着呢。(同学建议由中央下命令，要同学回校上课先搞一段文化革命抓革命，促学习。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这还有些道理，可以半天上课，半天文化革命。(有的同学问：要上课教师怎么办？)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过去你们给他们提意见，有的地方过了一点火，可以和他们谈一谈。(同学问：联动分子怎么办？)让他们回校，不要轰他们，让他们安下心来，思想转变要有一个过程么，对这些青年人不要一棒子打死，不要一开始就定高调子。

(附中同学汇报了一月二十日晚抄我校联动据点的事，抓到一些人送去公安部，并把《东方红》上登的“战报”给陈伯达同志看)你们这样做很好么(大家热烈鼓掌)。他们打人，以后会自知理亏的。(同学问党的阶级政策，一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表现。是毛主席说的吗？)你们到毛选中找答案吧！

(陈伯达同志听说中学文革报的《出身论》引起社会上的注意，要了中学文革报)说：有

辩论就好么，可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辨别能力，(公社同学问：红卫兵是不是以红五类为主体？)我本来要搞一个红卫兵条例，还没有搞出来，你们可以自己拟定么，不要谈什么红五类什么，红五类这个词没有阶级分析，不符合毛主席的分析。毛主席从来是说：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同学：左派队伍是不是要出身好的占多一些)你们看呢？(同学：青年学生是不是属于小资产阶级)你们可以叫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看一个学生要看他为哪一个阶级服务，就算那个阶级。(同学：对学校当权派怎么办？)(陈伯达同志摇摇头)说：有意见可以批评、揭发，不要揪揪的。

487. 李先念对《前进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代表谈话(摘要) (1967年2月6日)

我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同同志们商量，《前进报》暂时不办，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把内部整理好，把斗批改搞好以后再出版。等它半年八个月以后再办，怕什么？暂时不办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没有主。靠中宣部？现在中宣部的情况，等于没有。靠中央文革？现在中央文革的几个同志忙得很，哪里还有时间管报社(指《前进报》)。靠我？我老实说不会领导报纸，况且也没有时间管。

办报纸不能光靠你们，总要在上面找一个人。办报纸很可能犯错误，你们没有个主，犯了错误怎么办？当然不是怕犯错误。现在有的报纸办几期就垮了，何必呢？江青同志的意见完全正确，陈伯达同志也有这个意见。

另一条是没有纸。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写大字报、印传单，对纸张的需要量很大，我也没有办法解决纸张问题。

因此，我的意见报纸暂时不办了。等半年八个月，准备好了以后，还是办《前进报》。《前进报》还是《前进报》的同志办，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不要来办，可以监督、帮助。将来复刊还是用《前进报》这个名称好，因为这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说他现在题字很多了，不题了，可以用鲁迅的字。“前进”两个字意义很好，有共性。如果改用《红色财贸》的名称，意义太窄了。

报纸现在不办，有些编辑、记者可以深入到工农中去多打几个滚，同工农结合，向工农学习，体验工农群众的生活，将来可以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朝气蓬勃。编辑、记者下去以后，还可以写稿，寄给《财贸红旗》，也可以寄给《人民日报》。报厂可以代印一些小报。财贸联合委员会要办《财贸红旗》，我支持。如果有纸，你们给他印就是了，如果没有纸，也没有办法。运动期间，文化机关比较特殊，生产少一点，贴点钱不要紧。要很好利用这个时间把运动搞好，要很好利用这个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

以上这些意见，如果大家同意，我就找中央文革去讲一下，估计中央文革不会不同意。

488. 谢富治接见三个司令部及其他人员的谈话 (1967年2月6日下午)

- 一、支持成立首都革命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大会，但这个名词不太好，建议换一下。
- 二、赞成一个学校派一个组织。暂时不收中学生。在中学生中，目前左派队伍还比较混乱。
- 三、建议学生帮助首都三个工人造反组织进行整顿，并联合起来。
- 四、目前学生组织中你吞并我，我吞并你是不对的，应该联合，左派之间发生了很多矛盾，出现了武斗现象，这是不符合主席的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如发生了类似现象，应遵守以下三条：

第一，不能打架，

第二，不能撒传单、贴大字报，
第三，不要开动宣传车互相攻击，有缺点和错误应在内部讨论。

489. 王力、关锋接见山东省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纪要 (1967年2月7日 人大会堂)

一、关于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总部所策动的反革命事件问题。王力、关锋同志听了被接见同志的汇报后，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如下讲话。

王力同志：公安厅直到现在还被包围嘛！怎么能这么个搞法？

我们汇报了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冲进公安厅保密室、档案室，抢走了机密文件的罪行，并拘留了十七个人的情况。王力同志很气愤的说：对这样的人来多少抓多少，我看抓少了，对那个有严重问题的马上逮起来，这还有什么犹豫的。

王力同志接着问：现在地、富、反、坏、右跑出来的多不多？我们把济南有关“国际造反军”的情况谈了一下。王力同志问：青岛那个“全国红色劳动者”那些坏组织与工人联合会有联系吗？熟悉情况的同志谈了拘留了几个组织中的4~5个头头，因为转移“工人联合会”的人把这四个头头抢走了的事。

王力同志气愤的说：“工人联合会”把他放了，谁下的命令放的？把四个头目都放了！

关锋同志：公安厅造反派对业务工作都熟悉吗？现在你们的接待工作不用那么多人不行吗？光搞接待也不行，因为你们是专政机关，主要是镇压反革命。

王力同志：山西省搞无产阶级专政，选举了人民法庭。当谈到工人联合委员会等组织的一小撮人到处造谣说：军委成立了海陆空调查团，调查“一二一”事件时，关锋同志说：那些谣言太笨拙了。造谣多了就没有听他的了。调查团老不去，人家就不信了。

王力同志问到解放军对这个事件的态度时，我们说：“济南卫戍区对此发表了通告：提到山东省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王力同志说：他说的是总部，没有说这个整个组织，要考虑群众的多数。并问：现在退出来的有多少？代表说：退出来的不少，但他们还蒙蔽一部分群众，如淄博五〇一厂。王力同志说：要有这么一番大斗。

关锋同志说：要经过一番大斗。

王力同志说：青岛反复多少次嘛。

关锋同志说：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那么一搞，有些干部就不敢表示态度了。王力同志问：现在有多少干部表态了？你们应该发出个号召。

关锋同志说：干部只要站在革命一方面，就要欢迎，早站出来的要欢迎，晚站出来的也要欢迎，只要是真正站出来的。

王力同志说：“只要真正站过来的，就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

关锋同志问：现在工厂能生产吗？张金成是工人还是干部。代表作了回答。

王力同志问：那你们在这几个工厂的势力怎样？应该进行工作，这么个好机会，你们没有发出号召吗？大众日报要号召全体工人生产，对于破坏生产的要实行专政，对破坏生产制造事故背后捣鬼的家伙要实行专政，革命的工人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对革命工人要进行宣传，号召他们顶住，坚守岗位，抓紧岗位，抓紧生产，不要受蒙蔽，革命派要采取明确态度，号召他们起来造反。

代表谈了有关工人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某些人最近的活动情况。

王力同志说：人家轰轰烈烈的搞夺权，他们却开追悼会，抬着棺材游行，这样干法，那能叫闹革命？王力接着说：重要的问题还是夺权，联合会的某些人靠造谣过日子不行，不管你以前怎样革命，在关键的时刻，不革命是不行的。你们对这个事件采取了鲜明的态度，正确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些组织主要是头子的问题，在紧急关头，他们争权夺利，变了，这就不行，对广大群众则要与他们区别对待，但是犯错误一定要批评，不要什么人都

往公安局里送，这样做是对自己不相信，抓多了就起不了专政和镇压的作用了。代表们谈了他们(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工人联合会)在北京活动的情况。王力同志说：让他们在这里闹吧！夺权嘛！三结合嘛！还有军队嘛！什么告状不告状，没有用，还得靠当地斗争。

二、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问题：

代表汇报了反革命事件(指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冲击山东公安厅)以后，又谈到了大联合、大夺权的问题上，及最近夺权问题上与联合会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之间的矛盾。

王力同志说：拿了印算夺权了吗？

王力和关锋同志说：对待干部要很好学习主席思想和《红旗》第三期社论谈到这个问题，三结合问题，就有领导干部，你们省委内最坏的都是谁？

代表说：谭氏(谭启龙)的，白氏(白如冰)的都是破坏的，那个苏毅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很反对，在维坊厅会时还搞点子。

王力同志站起来说：真是刻骨仇恨，他比谭启龙还坏，许多坏主意都是他出的，他和山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关系怎么样？斗没斗他？

代表说：没有。

王力同志说：现在还很舒服！你看严重不严重。

关锋同志说：济南最近的坏事不能是谭启龙搞出的，还会是谁指挥的？

王力同志：名义是白如冰抓的，我看可能是苏毅然。

关锋同志：济南市的杨毅怎么样？

代表们把知道的说了。

关锋同志：听说他在三级干部会上，他与王效禹等三个同志，是反对谭启龙的。

代表们此时详细地谈了夺省委大权的问题。

王力同志问：常委会由那些单位组成？又问，向中央发报的电台在谁手里？

代表：在昨天(六日)把实权都夺过来了。

王力同志：能不能登报、广播，中央承认不承认你们的权力，关键在于这个常委会，你们要把具体名单报上来，要组成一个中央信得过的常委。对原来的干部，要分析，要排队，要正确对待。

关锋同志：要学会掌权，学会办事，不然怎么能掌权呢？说话要简明扼要，抓住关键和核心，有的一谈就是半个小时。

代表专谈了夺权和反扑的情况。

王力同志：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山大和联合会搞什么名堂，现在就是问你们的机构。接着问：省委、常委……有没有人？

王力同志说：机要人员还要用，因为有些工作学生不懂。

关锋同志说：象山师的董××、山大的高××，这样的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争取，以功补过，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的传统政策。

关问：省委、常委都怎么样？

代表：省委问题很严重，问题很多。

关锋：当然不少，要不，还夺权？

王力：三结合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工厂的产业工人，有代表性的领导干部。

关锋：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敌人，就不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了。

王力：一棍子都打倒就会打到自己的头上来。又说：你们对领导干部区别对待了，一般地就放心了，不要一概统统打倒，那不行。

关锋：要善于分析。

王力：区别情况，区别对待，贵州省提出了这个重要问题。一个贫农代表问到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王力：这个问题，你们已经成立了常委，可以研究解决，夺权了吗？你们就要解决。

关锋：这些具体问题，你们自己解决，我们不了解情况，不好答复。现在快到春耕季节，一切问题都要研究安排，还得吃饭嘛。又说：你们的情况知道了，就等电报，看看名单。又说：对科、处长以上干部都要排队，选几个标兵，看看干部怎么处理。

王力：这是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什么权都要夺过来，要不就是占了房子，抢了大印，也没有用。对于领导干部要区别对待，这样才能掌权。

关锋：高××就可以作为一个标准，如果高××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那打倒的就多啦！

王力：《红旗》第三期社论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的政策，这是很宽的。

关锋：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要很好地学习。

王力：这是很重要的政策，要善于研究政策。

王力、关锋同志：请你们代向今天没有见到的同志问好！

490. 王力在新华社讲话要点

(1967年2月7日)

领导夺权斗争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有三结合的领导。即革命群众的负责人，革命的领导干部，当地部队的负责人。这是判断和反映是否代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夺权，还是脱离群众的夺权的标准。

必须着重强调与革命干部的结合，这是当前夺权斗争的关键，这是毛主席一再强调的问题。这个政策关系到很多人。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作法正好符合敌人的需要。我们不能这样做。省市委的夺权不是这样三结合的，一概不承认。

克服革命造反派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这是否能把毛主席的路线坚持到底的关键。党中央要求要服从中央的领导，要跟无政府主义思潮决裂，这种思潮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严肃对待，决不能允许对于无产阶级司令部也怀疑，也打倒。

要接受巴黎公社的教训，要充分利用权力机构和专政工具。不能形成强有力的临时权力机构，就不能保证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它

一、去年六、七月的革命派在夺权的关键时刻不一定是革命派。在自己有了荣誉、地位之后，就会忘记阶级分析。同学们要甘当小学生。不要到别的单位当工作队，革命要靠自己，要相信内部群众。

二、不要搞资产阶级新闻作风。有些部队搞黄色新闻，这是转移斗争方向，不要这样做！

491. 李先念同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谈话纪要

(1967年2月7日上午，于国务院)

杜向光：我念一段语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主席语录233页）

总理联络员董枫同志找财政部接管委员会常委，传达了总理指示，我后来参加了。总理指示是：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总理要接见财政部的同志；三、财政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四、业务工作由杜向光请示李先念同志；五、吴波休息。按照这个精神，我个人意见：

造反派夺权问题：财政部业务权昨天说不能夺，根据当时形势，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夺的，夺得对的。因为党组瘫痪不能工作。这种把业务权交给造反派有什么不好？我坚决拥护造反派夺权，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我不理解总理指示，为什么不找造反派商量，要找我把业务抓起来，我不同意这种作法，实际上一月二十日夺权后，由司局到部业务都由革命造反派组织人抓，现在让他们把权交出来，这里有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

党组大部分不能工作了，司、局长大部分不能工作了，为什么一定要相信这些人。群众对此是有意见的。我也不理解。当时党组无能领导，接待工作时期，秘书也指挥不动了。革命造反派从对党，对人民负责出发采取这样的行动(指夺权)是对的。

现在革命造反派是占绝对优势的，我们过去工作推不动，现在革命造反派一抓就抓起来了。这一点李副总理是否了解。造反派和我个人都有这样的意见，李副总理应到财政部去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现在夺了权，又交出来是相信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支持不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问题，是脱离群众。我不理解总理的指示，不能执行这个指示。

先念同志：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

杜向光：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夺业务权的问题想听听李副总理的看法，对革命造反派是如何支持的？业务权和领导是不能分开的。为什么让交出？不能理解。司局长看来大多数不能用。

先念同志：你对主席的指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又如何理解？

杜向光：司局长现在都不好工作了。

先念同志：你是高级干部，对主席指示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如何理解？人民日报五日四版报导财政部造反派夺权的报导，昨天王力同志告诉我这篇文章是错误的，你知道不知道？

杜：我看过了，不知道王力同志的批评。

先念同志：吴波看过没有？杜：不清楚。

先念同志：财政的权不能夺。我事先也并不知道，是中央的决定。总理的指示，你不执行？你说要独立思考，不盲目执行。不对，你应该坚决执行，不应当怀疑。造反派绝大多数是好的，敢于革命敢于造反。这一点我不动摇，还是支持他们。但刘振玉不对，我两次请他他不来，我是以副总理名义请他，他说跟李先念无话可谈。即使对我有意见，可以当面谈，为什么不来。他们夺了权当时我是支持的。我告诉吴波转告请他来。他说要研究。第二次办公室打电话请他，他说跟李先念无话可谈，那我有什么办法。

现在责成你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把业务抓起来。既然业务权不能夺，应当抓起来，司局长要区别对待，要让他们积极工作。不能说大部分不能用。这些司局长经过批评或斗争后应该说大部分还是能用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都要用。对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要让他们积极协助司局长做好工作，他们有监督业务之权，可以对司局长加以监督。如果司局长是三反分子，不能用，但是这只是一小撮，现在通过两条路线进行工作。一条是向司局长宣布除三反分子外，要他们工作，考验他们是不是积极工作，是不是能站起来工作。一条是保护真正革命左派和群众的热情，拿毛泽东思想，真正的革命左派和群众的热情要保护。如果是真正的左派的话，要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要坚决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立即同司、局长一起把业务抓起来，当前的任务是把1967年的财政指标下达，不要求百分之百的准确。

杜：今天可以讨论，可以在三、五日拿出来。现在党组没有人管事，吴波、江东平休息，就我一个人。

先念同志：党组可以考虑恢复工作，运动由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是可以的，党组计论业务，造反司令部可以参加。

杜：党组没有人管事，姚进、王程远另行处理。当时接管委员会提出的四条你是支持的。

先念同志：支持过他们的革命精神，现在情况变了，总理有指示嘛，党组开会开不起来，你可以召集司局长开会，造反派可以参加，工作通过两条线，一条是司局长，一条是真正革命造反派协助。当前的工作，把 1967 年的下达，再则是抓收入和支出。

杜：指标可以下达，安排××亿左右，要向财办、小计委汇报一下。

杜还表示最后意见：

一、总理指示财政业务权不能夺过去，夺得对不对？

先念同志：过去支持过他们的革命精神，现在中央已有指示，情况变了，应当按总理指示办事。

杜：二、我现在是参与业务工作，你的意见首先应同革命造反司令部谈。

先念同志：请你传达给革命造反司令部。今天是你要见我的。

杜：三、我认为夺权夺得对，我不理解，在不理解精神之前，难以执行。革命造反派对李副总理有很大意见的，这样做，支持左派如何表现出来？

先念同志：革命造反派对我的意见，我知道。但请你(一)坚决贯彻执行总理指示；(二)向造反司令部转达；(三)向司局长进行传达。

杜：现在我的权已被夺了，没有权了，能不能召开会？

先念同志：总理指示了，你应该有权；你是副部长嘛！

杜：指标下达，坚决执行，夺权交权问题，我不理解前，总理未接见前，难以执行。我保留意见。

先念同志：你这是错误的。

492. 周恩来、谭震林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时的座谈纪要 (1967 年 2 月 8 日下午)

周总理：学习最近的毛主席的关于夺权的指示才行。《红旗》三期社论是毛主席亲笔改的，是毛主席的最新思想，尤其是第三段，主席改得最多。学毛著必须和当前实际斗争相结合才能活学活用(翻开《红旗》三期社论第三段)

这一段(指第三段)对于你们今天接见很重要，各方面都说到，你们夺权我们已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

今天的夺权，是 1949 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但情况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一英同志来谈一谈，你们要派人来监视，来记录。我们这样支持你们，你们这样不尊重我们，我很难过。你们对包厚昌、李士英什么态度？究竟是可以合作呢？还是带来见工人的呢？给不给中央权利呢？主席写这一段(指《红旗》三期社论的第三段)是有的放矢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批了三条意见，全国复员军人不能成立单独组织，全国有九百多万复员转业军人，99%都是好的，只有少数有问题的对我们不满意，我们应该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批示。我找他们开过会，说不要搞全国性单独组织，可以设联络点，联络、登记、询问，但是座谈以后他们还是要成立全国单独性组织。安亭事件后，我回答了许家屯，十一月十三日我很早就回答了工人可以单独成立造反派组织，也可以综合的即工农兵学的组织。以前发表的两论抓革命促生产，现在不适用了。原来想分期分批搞，革命洪流一冲击，现在不适用了。允许学生组织，为什么就不允许工人组织呢？现在真正实行宪法上组织自由了。这一点，许家屯他总是传达了。(当总理问到南京的复员转业军人的组织时，一工人回答：解散了。)解散了，应当称赞，还要说服人家。中央至今没批准过全国性的组织，临时工、合同工中央没批准过任何正式文件，但有人(劳动部)编造说全部转正，造成经济主义泛滥。61 年、60 年、62 年下放的工人、干部如果都回原单位工作，单哈尔滨就要多支出六亿，全国

就得多支出 100 亿以上。上海工人阶级觉悟高，首先反对经济主义，文汇报首先登出来的，主席一看到，就把我们叫去了，当晚就广播了，蓬蓬勃勃的夺权斗争展开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高潮。学生必须与工农兵结合。一九六五年毕业生要求无条件普遍回母校，陶铸就发了文件，说可以不转正，可以回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全要回去。应该在工厂、科技机关闹革命。而且本校也不欢迎这些人回去。这是不对的，使我们增加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中的不必要的麻烦。可能有人说我是保守派，我说，冲还是要冲，闯还是要闯，林彪同志提倡，首先要革命性、还要科学性、组织性，社论第三段就是对干部的科学的分析。总理讲了东北地区重要性，三面是修正主义，苏、朝、蒙修。你们要打回老家去，彻底闹革命，你们的老家不但包括哈尔滨，也包括长春、沈阳、大连。(我说，南京很紧张，这些地方文化革命搞得并不好。)东北也很紧张，是工农业生产基地，南方有上海就行了，南京是你家(指尤念祖)，他们(指南京造反派)是否要留你们？你到你们北京联络站去一下，他们会动员你们回去的。

建议不采用江苏人民公社的名称，用了发生政权问题。中央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国际上震动问题，首先造反派是政治上占优势，现在有些单位是人数上也占优势了。保守派在瓦解。造反派人数上占优势后，就会骄傲了，包办代替了，当然这只是苗头。希望你们警惕。

493. 陈伯达接见二医大红纵队院校和总后机关革命造反派部分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8 日 三座门)

伯达同志代表毛主席、林副主席向大家问好！并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很关心你们(会场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陈伯达同志讲：你们在这里待了好几天了，我们没来看你们，很抱歉。我希望大家回本单位去，在大街上不好，回本单位去、回学校去，有问题可以到那里商量。在这里吃不好睡不好，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安心。你们贴的大字报、标语我从这里过了几次了，我看了看。你们要准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要给改正的机会，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要回学校去，要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方针去做，我来转了几次了，我看了有些大字报后很难过，有些是黄色新闻，有些是低级趣味的，这不好。文化大革命是思想革命，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你们贴这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干嘛，我看了很难过，我叫别人把你们大字报贴掉了。

哪个同志有错误都可以尖锐的批评他。这些生活上的过程，不要搬到大街上来。贴到大街上来也弄不清楚，要给人家改正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的错误，当然要给改正的机会。你们在这里想一想，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我想了很多天了，考虑你们的作法，这样做是否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每天都在搞我们的新闻。

对一个人要全面看，要看整个历史，不能只看一点不及其余，这不符合辩证法，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听了我的话是否难过？不要紧，在这里呆几夜也是有好处的，不过适可而止，你们吃过饭就回去，好不好？(众答：同意！)你们不同意可以写大字报，可以给我提意见，可以批评，我也是可以批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我们自己都要改造，这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认为自己完全是对的，这样就危险了，我说错了欢迎批评，你们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有的可以解决，就是有片面性。

我建议你们吃完饭就回去，有问题慢慢商量，你们在这里呆久了不好，有的人已经病了。我今天不是来答复问题，我是来请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

众：首长对我们的关怀我们感谢，我们一定照办，但是徐副主席二月一日的讲话是不对的。

陈伯达同志说：徐副主席的讲话你们要辩论，有的人还要打倒。（众：我们没有要打倒）你们也不一定打倒邱会作同志，打倒了他就不能工作了。让邱会作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众：他跑不了，他是三反分子。

伯达同志：我说先作结论不对。

众：我们有材料。

伯达同志：你们的大字报我大体上知道了（这时伯达同志听到了广播车的广播）我也不赞成这喇叭车在到处响。

伯达同志继续讲：要帮助大家帮助别人，帮助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你们现在批评吧，我的话说完了，就欢迎你们批评、辩论。

众：邱会作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是否要批判？

伯达同志：你们可以继续写墙报、大字报，也可以写信送来。

众：我们批判他是否能到会？

伯达同志：他可以到会，也要[可]以不到会。他身体不好，你们不要动不动就下命令，这样不对。

众：邱会作的病是假的，他欺骗了军委，假造了病历。

伯达同志：你们过半年就知道他有病没有。我检查没有检查出病来，但我要算是有病的。你们有揪邱会作的权力，徐向前有保邱会作的权力。

众：徐向前的讲话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伯达同志：你们批评是可以的，我也是保徐向前和邱会作的，思想对就保对了，思想错就保错了。我不赞成用这个“揪”字，我力气不够，我不赞成你们用这个“揪”字。斗刘志坚我也不赞成揪，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不好。这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林彪同志早就讲了。就是要触及人们灵魂。我在街上看见一个汽车，上面站着一排戴高帽子的人，真难看，我不赞成，对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线要划清。犯错误不能当成反革命，当然也不能放过反革命，我们人民解放军是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还没有闹清，就揪，揪出来就戴高帽子，这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八条命令？（众：赞成。）赞成还要看行动，回去好好睡几天，研究研究军委命令，毛主席（的）批示很好，你们回去想一想。

众：徐副主席的讲话划框框定调子是不对的。

伯达同志：我没有看见徐向前的讲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过程我是知道的，可以原谅你们。

众：你不了解邱，为什么保邱？

伯达同志：我是从很多同志知道他的，他在总后工作还不错，看一个人要看行动、看实践，不要有片面性。

众：邱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他欺上瞒下。

伯达同志：我是保护你们，也保护邱会作，不是没有原则的保，我保他的同时，也就是保护你们，你们这样呆下去不好。这是文化大革命……，自我革命，我今天来看你们，我让一个学校把你们的大字报贴掉了。我不是发疯，我是提倡大字报的，你们要回去好好商量，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就不好了，那些大字报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都很关心你们，我代表向你们问好（会场再次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万寿无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期望，要很好地学习十六条，这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

众：徐向前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我们就不能批判？

伯达同志：我没有给你们定这个调子。

随后伯达同志带领大家高呼：

毛主席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494. 戚本禹与清华附中部分教师座谈纪要 (1967年2月8日)

戚：你们有多少教师？答：八十几。

戚：犯错误的有几个？(无人答)关起来的有多少？答：十一人。

戚：教师批斗了没有？

有人答：班主任基本上都被叫到班上去，回答同学问题。

有人说：还低了头。

有人说：还叫上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

有人说：教师中还有一人自杀。

戚：为什么？答：和黑帮一起挨了打。

戚：教师里有什么组织？有多少？答：有十几个战斗组。

戚：能决定方向的有多少？有人说：有井冈山等。

戚：现在开学，你们同意不同意？

答：我们同意开学。

戚：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初中上半天课搞半天革命行不行？江青同志说初中要上课。

有人说：同学认为教师不好怎么上？

戚：教师和学生就不能联合起来吗？

答：教师绝大部分出身不好，运动初期又压了红卫兵，以前又搞了资产阶级教育。

戚：教师队伍是否清理过？地富反坏分子要清除，不能当教师，但要与出身严格区分。

师生为什么对立？要作历史分析，你们过去教得不好，师生不平等。又压了红卫兵，他们斗了你们，不要有对立情绪，自己教的学生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你们要支持学生，支持学生中的左派，屁股要坐对，他们在困难时期，你们支持过吗？

答：几乎没有，个别老师说我们出过大字报支持过红卫兵。

戚：我看政治教师的觉悟不见得比学生高，是学生教你们，还是你们教学生，恐怕应该是学生教你们，因为……一部分学生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是错误的，发展下去会变成反动的，不要任何领导，不要秩序，要干什么就干什么，马列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原则区别，共产党最讲组织纪律。有的学生不讲这个，自由放纵下去很危险，要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组织，但要立无产阶级的纪律。小学春节后一定要开学，主要学语录，再学点算术、常识，组织红小兵，小学教师也可以自己创造，一边上课，一边改，不开学不行，很多小学教师不同意，但社会上家长有强烈要求。高中一切回来，不串连了，下乡下厂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初中开学，但还没有做出决定。

当权派斗了没有？当权派都是坏的吗？有没有造反派？答：没有。有群众反映学校的桌椅仪器设备，都被破坏得很严重，所有实验室被砸坏，有人拿汽枪打玻璃，一个钟头就打了三十多块，广播器材也被砸坏，自行车被砸坏很多……

戚：这都是哪些人干的？

部分同志回答：是原来红卫兵干的，×××破坏得最凶，但是干×××

戚：要保护国家财产么，这些都是工农的血汗，你们下去劳动几天，就知道了，创造一件东西不容易，我们的国家还是一穷二白，你们几个红卫兵组织可以搞一个保护学校的组织，保护国家财产，谁破坏的一定赔偿，自己不赔，找家长，干部。军委八条是毛主席批示的，首先给他教育，然后赔偿。你们教师过去是怎么教育学生的。教育过他们爱护公物没有？

初中开学主要是闹革命，主要是学习主席著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革命歌曲，学点

数理化，复习一下半天功课，半天革命，或者一天上课一天闹革命，一开始对运动作了个总结，搞点军训，整顿一下，反动路线的余毒和“联动”的影响要肃清，也可以上文化革命课，可以请工农兵来上课，还有文化革命的闯将，例如：蒯大富，聂元梓等。请不到他们就请他们的战友，这样的课你们欢迎吧？(有人说：有人还有绞死蒯大富呢！)不要搞一言堂，可以辩论么！你问他为什么要绞死么？生动活泼的课，同学是愿意上的。比如物理，你不同意牛顿三大定律，你可以提出××定律，你是什么派，我是牛顿派，咱们辩一辩，要创造无产阶级的教育法。教育上有几个革命，孔夫子搞了封建主义的，卢梭搞了资本主义的，中国戊戌变政，办学堂废科举，失败了被抓起来，清华是资产阶级的，是和封建教育的结果，无产阶级要搞无产阶级的教育方法，无产阶级的教育方法基本是在大风大浪中进行的，可以造反，可以辩论。毛主席有很多原则的指示，要依靠学生的自觉性，不要光老师讲，可以自修，可以辩论，不要一开学就恢复过去那一套，那就等于复辟，这样造反派井冈山蒯大富就不答应，搞无产阶级一套，同学是欢迎的。老师和同学一起下乡下厂，被斗了，要受委曲有好处，至少打掉过去的架子，解放了学生，有的打倒得对，有的打错了，批评一下就行了，被错打的老师要合适一下，小学生要求他掌握政策，掌握得多么好，不可能。我们还掌握不好呢？不要有那么多气，要看到他们的大方向，至于有的学生变坏了，参加了“联动”，夏天革命了，冬天不革命了，父母犯了错误了，就保爹保妈，站到反面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威信要靠自己去建立，不在于一进教室全站起来，那一套是假的，造反就没有了，其实过去你们没有威信的，不是文化大革命搞得你们没有威信，以学生为敌人，突然袭击，总觉得比别人高，好为人师，是要失败的，正确的意见老师要对学生的，上次有人给我提意见，好么，但是有两条不对，说我没有专车，说他老子的官比我大，这叫什么意见？我就是不要专车，不讲官大小，那一套要送进垃圾箱里去，讲那一套就要变成修正主义，他们有理论，老子当官自己是好汉，官大的管官小的，“联动”的袖章还要分级别。那是封建阶级的，是错误荒谬的，可笑的。你们有一种情绪不对，不能恢复那一套，要建立那个秩序是要落空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宁可让你们进教室挨斗，也不恢复进教室就是权威。以前那一套只能培养些奴隶，国家没有希望，出了修正主义无人造反，挨斗也不要紧，斗总要讲道理么，在平等基础上辩论，这就是学习。要恢复资产阶级的威信，宁可以不上课。不是给资产阶级教育翻案，要摸索无产阶级的教育道路，只要你革命，学生就对你好。不革命当然不行，现在学生与过去大变了，毛泽东思想水平提高了，语录读得很熟，他们背得出来，你们不一定背得出，上课课堂要考你们一下，背不下来不好看，老师不好当哩！学生是很可爱的，比你们纯洁淳朴，对毛主席的感情比你们深，你们一进教室第一句话就说做小学生，向他们学习，我看这样就不会斗你们的，可以问问学生有什么要求，如何教，以平等态度对待，是同志是故友，不是敌人突然袭击他们，治他们，这样一定能教好，一定能消除对立，上次许多小学教师要求中央文革下令给他们建立威信才上课，这不行，威信要靠自己建立。

问：领导班子如何建立？

戚：领导班子是个大问题，要靠自己解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夺权，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原干部中的造反派三结合组织夺权委员会，不搞校长主任等级森严的那一套，都是服务员，可以搞一个初中的教学小组。干部一概打倒是要犯错误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毛主席说95%是好的，大多数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也是好的，我们的革命就是靠大多数搞的，好的也不一样，有的很好，有的比较好，有的差点，有的好多人，但要选左派，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几派中选出勤务员，加上老师中、干部职工中比较好的，组成领导班子。

(对炊事员)炊事员天下也是你们的，也应该选一个人参加领导班子，你们权力大，吃饭问题你们管，不吃饭不行。北京市成立一个炊事员的什么委员会，首先提出八小时工作制，这我不赞成(清华附中炊事员讲：我们坚持没有参加)八小时工作制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只要是干革命，超过一点也行，要学习张思德，学习雷锋，你搞八小时工作制，吃饭就成问题，

这就是经济主义，当然作为领导要尽量照顾休息，但自己不应要求，毛主席根本没有什么八小时工作制，他睡得很少，老人家为了国家大事很辛苦，不能什么都按系统来组成，列宁反对按系统干革命，这是小团体主义。

495. 戚本禹与清华附中和部分中学革命造反派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2月8日)

同学们谈了一些“联动”的情况，说他们还有打人行为。

戚：他们在打你们，你们可以自卫嘛，不要那么傻。

同学们又谈“联动”有一些人造反的情况。

戚：你们同意改正错误，你们可以看一看行动。

同学们又谈“联动”反中央文革和所谓给中央文革提意见的问题。

戚：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可以的，我们每天都收到很多信，都是提意见的。有很多好的意见，不过“联动”不是给中央提意见，而是要打倒。给中央文革提意见是可以的，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中央文革要革命群众帮助工作嘛！“联动”不是给中央文革提意见，要打倒我们的第一副组长嘛！

同学讲“联动”写“新编武松打虎”骂革命造反派，写了对联“想当初又惊又喜睡死老母猪，看如今大吹大擂冒充打虎汉，横批：何许人也。”

戚：你问他打了什么虎，中国最大的虎是刘邓路线，他们打杀了吗？

他们不是喊刘××万岁吗！

同学谈到“出身论”，问戚看没看。

戚：太长了，没时间看，能影响中学运动方向的是哪些学校？

(底下同学说了些学校，又谈到“联动”中的同学造反问题。)

戚：欢迎他们归队。

同学们谈阶级路线问题。后来让戚本禹同志讲阶级路线。

戚：你们讲的很好，你们自己来讲吧，你们讲的这套我们讲不出来。

(同学又谈到联合。)

戚：怎么，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你们联合不起来，你们是不是也想当官，都想到合营啊，找比较大的，比较有影响的组织开个会，联合起来，小的组织也找不到了，算了。你们海淀的北大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可以现在就商量联合起来，我有组织的，我不是无政府主义……。

同学们说欢迎戚本禹到清华附中来蹲点。

戚：我很愿意。但不能蹲，以后常来。首先和你们中学接触是海淀区，当时你们写的一些东西，我们是挺支持的，但那时团中央力量大，胡克实的汇报，把你们说得很坏，毛主席支持你们了，名扬四海，但可惜的是，有些红卫兵夏天革命，冬天就不革命了，但是总有革命的，革命是分化的，就是现在的左派也会分化的。所以，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左派不是自封的，而是看你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左派也可能变成右派，因为左派当了官，提了几级就变了，发展到个人主义，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就要失败。提倡保持晚节，我们青年起码要保持早节，能否革命到底。保持早节不以你的衰老为转移，有的人在大风大浪中成长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有的人就经不住考验，在阶级斗争中能不能革命到底，保持晚节，每个人都要触及灵魂，都要改造自己，你们要起模范作用，首先要把学生集中学校里面来，不能不好扩大。第一个，一个怎么搞文化大革命。下厂下乡要分期分批，对学校的运动要作必要的总结，然后下去，中央最近有一些议论，初一二年级一般说来，政治辨别力较差，要上课，学点儿语录，毛主席著作。高中不一定是上课，集中到学校搞文化大革命，中央还没有确定，研究以后，最近几天就通知大家，你们可以先提倡议，下厂下乡

有组织下，先把学校里的总结一下再下去。掌权主要是掌政治上的领导权，学校里政治能起作用，让学校根据毛主席开辟的航道前进，革命学生，革命老师和革命的学生干部，我看干部中是会有造反派的，成立领导班子，把政治领导权掌握起来，就可以领导同学搞革命，恐怕要搞一段才能下厂下乡，现在“联动”把下厂下乡当作防空洞。让他们回来，弄坏东西的让他们赔，不赔可以找他们家长去，军委命令的第八条，干部要管好子女，毛主席说照办，我们一穷二白的国家，你们也要大革命，转变冷冷清清的局面，命运掌握在手里边，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把中学文化革命搞好，搞得热热闹闹的。

496. 江青讲话摘录 (原件无日期)

江青同志最近对电影界发表了谈话，摘录如下：在社会上，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火气不大，自己内部打起来火气很大，要注意背后有人挑唆。你们把当权派放到一边去了，肖望东、赵辛初、陈荒煤等一些人成天睡觉。他们坐山观虎斗。赵辛初搞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主席接见红卫兵是个阴谋。第一次美化刘、邓，第二次不如第一次。……这些人现在吃胖了。……对这些人要狠斗，让他们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八一厂的李文化，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结果被人家利用了，搞了个《早春二月》。崔嵬是北影的一霸，但总还有几个好片子吧。他到我这里来哭过两次。我说好好改造自己，还可以当教员嘛。国庆节影片中，林副主席身后老有吴德。(戚本禹插话：真恼火！)小苏(新影厂)拍了很多主席的片子，但没有编辑起来，因为主席不同意。……新影厂不能停产，要及时报导重大事件，经常出片。

497. 阎长贵与地质学院部分师生座谈纪要 (1967年2月8日下午)

参加人：李贵、王大宾以及各系同学、老师共三十多人及解放军军训负责同志。

阎长贵：各年级都有吗？(同学：不一定)是否各系都有(同学：有)你们都是老东方红战士，(同学答：基本上是)我们想来听听你们对朱成昭的错误有什么意见。我来你们学校两次了，第一次，你们东方红……(不清楚)第二次晚上找周永璋、蔡永平，后来又找朱成昭他们，在地质部联络站谈了一次。你们这里除了李贵，有没有在总部工作的？(答：王大宾是总部的)我们今天想来听听两方面同志们的意見。你们先谈一谈，谁先谈不要拘束。

朱成昭有什么错误，怎么看，怎么对待，有什么谈什么，或者你们大字报上写的什么就谈什么。

同学们发言：(内容略)。阎长贵：我很久没来过地质学院，只是朱成昭出了这事，我来地质学院，过去到地质部去过，前两次我这样说的，现在还这样说：地质东方红的方向是正确的，东方红的红旗是不能倒。上次我讲了几条意见，实际上只有两条，过去对朱成昭印象不错，现在听到一些反映，有些什么问题要调查，即使朱成昭的问题是反革命，东方红还要继续战斗下去，东方红与朱成昭要分开。

我觉得，你们是东方红老战士，对东方红有感情，说实话我对东方红也是有感情的，我佩服你们的许多革命行动，我过去说过你们很多话，东方红成立以来(基本队伍六月份就有)确确实实做了许多工作，反了斗了地质学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了斗了以邹家尤为的工作队，反了薄一波，四进地质部，从地质部揪出何长工反党分子，以后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了许多工作，你们东方红名声大，不仅在北京，在全国名声很大，每一个东方红战士，要珍视东方红的荣誉，发扬好的传统，继续战斗下去，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更高，革命需要我们这样做，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我们这样做。过去工作中，朱成昭做了一定的工作的，在前一段，是不是应当说做了一些工作，不要老子天下第一，只是做了

其中一份工作，要这样看，在前段是不是应当这样看，这是与大家一起做的，不是朱成昭一个人做的。也不是看法成昭、蒋良朴、杨明中几个人做的，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与全体东方红战士一起做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也通过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东方红方向是正确的，红旗不应倒，也不能倒，应把东方红办得更好。

对朱成昭问题究竟怎样看，我现在发言权还不大，不论那些意见还没听得很仔细，很完全。朱成昭在这一段犯有严重错误，以同志们反映和他自己检查，有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举几点：

1)对“联动”的看法，“联动”是一个反革命组织，绝大多数成员是受蒙蔽的，跟着走的，但以他的成立的历史背景和作用来看，是反动的，这一点不应怀疑。“联动”是东纠、西纠、海纠解散后，纠集成的，继承了西纠的东西，朱成昭不是用无产阶级观点来看待“联动”，是用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待这组织。在西纠问题上，你们受过他们镇压的，尝过他们的拳头和鞭子，对他们较痛恨，是当权派何长工矿旷伏兆，国务院的许明、孔原干的，他们镇压的。

地质东方红对西纠做了一些工作，争取了一部分内部的造反派，宣布解散纠察队，就出来“联动”，“联动”是很反动的，朱成昭的看法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

2)关于抓人问题。他看法是错误的，毛主席、中央文革向来不主张多抓人。12月16日晚宣布要实行专政措施，拘留。那间，连着几天开会，朱成昭去了。江青同志讲：不要走向反面，抓几个头头是可以的。开始讲的不要抓人太多，不要私设拘留所。恶意攻击毛主席林彪同志的送公安部，反对关锋、戚本禹的千万不能抓，我给杨羽中打过电话的，毛主席历来不主张多抓人的，你们东方红也抓过他们十几个人，也可能抓不准，不准就放回去，朱成昭把这问题挂在中央文革身上，是不太公平的。

3)运动群众问题，朱讲斗争对象不是揪出来，是中央文革抛出来的，这是错误的。陶铸、刘志坚、周荣鑫，中央文革点名前，就不知看了多少大字报，收到多少信揭发问题。12月19日在教育部，有陶铸的大字报，直到一月四日陈伯达公开点他的名。12月30日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时，陶铸还是那个态度，两面三刀，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做坏事，周荣鑫人家有很大反映，在接待站也有很多反映，刘志坚压制军队文化大革命。

这个看法是不对的，错误的。这是举例来说，朱成昭有错误，有些性质相当严重，别人反映后，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朱成昭采取态度不对，采取躲与逃的态度，伯达同志的指示是规劝性质，批评重一些，严一些有好处，提高自己的认识，朱成昭听了批评，不传达，让他个人注意这个问题，打个招呼，劝他，他不端正态度。他跑了几天。东方红战士很焦急，是可以理解的，他态度很不对，不端正的。后来做了一些工作，中间回来了一次又跑了。回到学校来了，说了自己想法，做了检查，现在大家对检查看法不一致。这个检查我没有好好看，昨天粗粗翻了一遍，这个人相当高傲、自负。从检查前半段来看态度不很端正，后半段来看，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二月四号检查与跑的态度相比是不是转变，我说，是不是说态度有转变，表示下一步继续检查作批判，比过去躲藏是有变化，可不可以这样说。这个检查很不象话，没加批判，这要靠大家帮助。

我有这样的想法与意见，不要说我定调子。

朱成昭在这段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批判。对朱成昭应抱着尽力争取挽救的态度，根据现有材料和检查情况可不可以说明矛盾性质仍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同志们能揭发更多问题或朱成昭再向前滑一步那就很难说了。朱成昭过去对不同意见的同志态度不好，反托派抓一小撮态度不诚恳，采取一棍子打死，对周永璋我不作全面评价，周与朱有矛盾，多大，我不清楚。在三司开除前一天晚上三点，我们打电话，不要采取开除的办法。现在对朱成昭也不要一棍子打死。根据现有情况，是不是批评朱成昭与批判邹家尤、何长工，校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应该有区别。这个区别，应当注意，朱成昭现在犯了错误，过去他还是和何长工斗的，对朱成昭批判，不要与何长工区别不大。那样是否不利于团结与争取。可不可

以用主席关于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指导，我们这次批评朱成昭、蒋良朴、杨羽中及有相同观点的同志是否按照主席思想去办，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要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一分宝贵的财富，这对于朱成昭个人与东方红组织都很有好处，如果朱成昭能很好检讨，接受教训，就会转变，如果不接受教训，产生不满，甚至仇恨那就要犯更大错误，跌更大跤子。现在的情况，我们要做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这个意见是个好意见，通过这事来总结经验教训，分析原因，克服错误，对大家有利，同意大家的意见，结合当前的形势来做工作，不要孤立起来作，不要把大家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搞这个问题上，影响了大的斗争，如果与大方向配合不紧，那也是不利的，也是批评不好的。

现在斗争非常紧张，大联合，大夺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权，现在进入这阶段，是进入紧要关头，恐怕最近几个月的工作是很紧张的，全国夺权的省有贵州、山西、黑龙江。城市有上海、青海，任务很重，这次夺权形式是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发展。北京大联合大夺权任务还很重。北京大学联合不起来，内仗很多，学校之间，相互意见很大，那个劲头甚至比斗黑帮还大，这样不好，讲联合、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不搞合二而一。夺权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朱成昭的观点。“夺权时机不成熟”我不同意，但是这是复杂的斗争，是严肃的政治任务，不能掉以轻心，不能把北京的缺点说成是时机不成熟，夺权很紧张，整风要和整个形势结合起来，要尽快的结束，抽出人去搞北京的大联合，大夺权，北京的任务很重，要和形势结合起来，要乘胜前进。

你们搞整风，不要忘记阶级敌人，不要忘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让他们舒服。养得肥肥胖胖的，没事干，那不行。要把黑帮管起来，让他们劳动，写检查，不要让他们坐山观虎斗。现在他们很高兴，看看你们斗争很厉害，所以这一点要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能让他们舒服，让黑帮两天写一个检查，他们是阶级敌人，这一点不要忽视。

地质部斗争你们参加了，你们要继续与地质部左派联合起来，采取措施。有些地方黑帮很舒服，你们学校里可能好一些，你们红旗举得较高，要注意这个问题。

在批判朱成昭时与整个社会上的形势不能分开，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紧紧抓住大联合、大夺权的大道理来指导我们的整风。什么叫整风，毛主席说：(语录第4页)来提高我们大家的马列主义水平，一整风就抓一小撮，抓托派。我听了广播就提意见。清华在反托派。其实他连什么是托派也不明白，托派就是反革命，是敌人。

整风要按毛主席思想去做，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总部人要一分为二，对朱成昭不要一棍子打死，严肃批评，尽力挽救。和总部的同志你们是一起过来的。对写大字报(指给中央文革)王大宾不同意采取这种方式对待中央文革，态度较坚决。可以做一些工作。还有李贵同志，还有许多同志，总部还可以做一些工作。日常工作要抓起来，不是讲他们没有缺点和错误，可以做工作。我们整风要很好的学习主席著作，主席的思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不是用感情代替党的政策，不能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要学习主席著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这是很好的材料，主席语录不够，还可以找几篇，好好学习，提高认识。还有第三司令部写的那篇文章很不错，《红旗》《解放军报》推荐，到处推荐，你们自己写的，应很好地学，孟繁华，你做得不错吧！言行一致嘛！

这篇文章确实不错，提出了几种倾向，提出了很重要问题，夺“私”的权，这个权不夺就要变质，你们自己学习学习吧！不要别人学得比我们好，近水楼台先得月，《红旗》《解放军报》的编者接，你们应很好学，作为整风的学习材料，这样可以使整风健康地发展。

我想东方红通过这次整风，通过对朱成昭的错误批评，东方红会更好地工作战斗，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更高。

不要躺在过去的功劳成绩上，过去的功劳成绩应当成为新的起点继续前进，大踏步前进。

我讲的个人看法，个人的意见，有道理就接受，有错误同志们可以批评，如果认为写大字报不适合，可以写信。最好希望按照主席思想，《红旗》杂志社论，三司写的文章去做！

对朱成昭的问题，我还没有完全掌握清楚，我根据现在的材料，这个看法，对朱成昭的

错误要严格地批判，挽救他。我不是定调子，是谈我个人意见，如果不满意，就按照你们自己的观点去做，我绝无把看法强加给同志们。如果贴大字报的话，这作为地质学院一张大字报，不必写大字报，不值得浪费纸张。讲错了，我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

对朱成昭的批评、批判有个想法，是不是右倾，可以批判。是否要开什么大会，大字报，有没有必要，你们可以找他座谈，帮助他，这样是不是有好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些。你们班(爆破的一个同学)可以开小会批评嘛。你们声势搞得很大，又说要挽救他，又写要“砸烂他的狗头”，名字倒过来。这样他很紧张，有些害怕。不必要，是不是可以找他谈。几个人找他谈谈可以嘛。这样是不是好一些！就这样大家提提有什么意见？

那样做对你们东方红没有什么好处，对北京市的运动也没有好处。总部的人都不能用了，那样好不好？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你们看怎样做对革命有利，对团结有利，对大夺权有利。

阎长贵同志问：你们学校的权夺了没有？(答：去年夺了，但不很彻底)时讲：不要夺了章就行，要做工作，成立最高机关，管理黑帮，对他们不要客气！他们是斗争的对象。

还有一个，各个组织之间，不要你封我的总部，我封你的什么，封什么报。这没有用，不能触及灵魂，不能解决思想问题。你们东方红报坚持大方向，继续办下去。第十期有问题，你们可以批判嘛，这一期(指十期)方向不对，有错误。(有人拿出蔡新平等同志的稿件说要出小报，要登载陈伯达同志给朱成昭的指示)。关于陈伯达同志的指示，那天已经讲了，不要传达，登出来不好，会造成很多的混乱，问题不清，也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伯达同志本来是不让公布的，这样对朱成昭改正错误不利。要从大局出发，从全局考虑。如果你们一定要坚持这样做，我也没办法，你们问伯达同志，伯达同志一定不同意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不对。如果请示伯达同志，有80%—90%不同意这样做。(有人说：到处都有抓住我们的战士斗了，打了)

阎长贵同志讲：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你们过去没有朱成昭的错误，还被斗，你们这样搞，斗你们的人就可能更多了。

可不可以不这样提法：“炮打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你们可以严厉地批评他，批判他，和搞何长工、邹家尤、联动、红战团应有区别。根据现在的情况，要很好地区别。(有人问朱成昭是否允许再检查)

阎长贵同志说：你们可以商量，总部几个同志可以商量。王大宾、李贵可以搞一个整风小组。

498. 陈毅在接见西安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8日)

有的人装公正，调和、折中，这不行，要决断。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不能和稀泥。不然右倾、保守还能克服？问题还要复杂。现在要提出解决的具体办法来。主要是解决如何大夺权、大接管，成立全省、全市性的真正的权力机构。……掌权的人是多一些好，还是少一些好？当然是多一些好。千斤担子只有人多一些，分担挑好一些。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生产问题。工业、农业、煤、电、水、副食品供应要靠你们。那些人(指保皇派)是不行的。能依靠多少，就依靠多少，掌权要靠大家。把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起来，共同掌权，分分担子。这是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生产的问题，不能再拖。……掌权，一个人、一个组织是不行的。掌权经验我们比你们多，犯错误也比你们多，对于犯错误的人，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甚至犯过路线错误的人，也允许他们改正。但不同于刘澜涛等人，他们是反毛主席的，他们反毛主席反了几十年。造反派处理问题，不能吵架，但也不能和稀泥。造反派的大联合，必然有几个组织为核心。毛主席就是全党全国的核心。这个核心是在群众中形成的。今天看到你们青年人的劲头，我很高兴的。联合总要有核心，组织也是一分为二的，总要有淘汰的。……

毛主席有个好的方法，很喜欢找一个人单独谈，这样很自由，很活泼。我们应允许讲错话。讲错了就改，就撤销。叫我讲一句话就算数，那就太不自由了。这恐怕也是一个掌权的经验。……中央将有一个原则性的表态。真正把大权掌握起来，你们就要忙的。每天都要讨论研究大问题。政治、经济、生产、文化革命都靠你们。这么多学校靠谁？还不是靠你们，就是大学也靠你们办。不能再派校长了。就是派去，两年也是要变的。

499. 戚本禹接见沈阳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的讲话 (1067年2月9日)

戚本禹：夺权要三结合，军队、群众、机关造反派。同时要团结老干部，对老干部不能都打倒，每个人都有毛病，老干部经过长期斗争考验，有斗争经验，要看大节，是拥护毛主席还是拥护刘邓路线。对老干部要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方针。特别是路线错误，很多人都犯了。他是领导，不执行行吗？当然，他不检查就要批判，但仍要挽救，我们对黑帮分子还要改造嘛！

对于军队问题。军队问题军队自己解决。要按中央指示办事。不要冲军队。有意见可以提，不要去冲击。

(这时，沈阳总部代表谈到沈阳军区以及辽宁军区的问题。)

对于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所以不谈具体意见。

(问劫夫)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什么时候写的？

李劫夫：是六二年末，六三年初。

戚本禹：《女民兵》什么时候写的？

李劫夫：具体哪年不太清楚了。是三八节出来的。

戚本禹：你们对劫夫同志有意见？

(答：可以，当面还要批判呢)

对劫夫同志我不太了解，你们最了解，但是我想保他一下，这不是我个人意见，我请示了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倾向这个意见。我不认识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以前只是在报上看了他的歌。我不懂音乐，也不会唱歌，小学音乐才六十分。但是好的歌曲我愿意听，好的革命歌曲能振奋自己。

这几年，音乐界阶级斗争很尖锐，从这几年来看，劫夫同志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是执行主席文艺方针的。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谈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体会，体会很真实。

特别印象深的是在困难时期，修正主义分子攻击我们，国内外敌人攻击我们时，我听了一个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反映了我们中国人民不怕困难。迎着困难前进的英雄气概，我打听是谁写的，说是劫夫。那时候文艺界乌烟瘴气，他的这首歌起了很好的作用。

六三年我去沈阳，过去我对历史很有兴趣，那次我去东陵，回来时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些女同学唱《女民兵》，我第一次听这个歌曲，问了一下谁写的，又是李劫夫，对他的印象就更深了。

其他的不说，就突出说这两件事。

去年，东北一个音协的张文彬，在医院里，他是搞音乐的，向他请教音乐界问题，他讲到东北音乐界，认为劫夫同志是好的。

根据这些，我对他的印象是不错的，他是老干部，参加革命很多年了。比我还早吧？！对过去是有贡献的，从他来看，他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

我们的意见供你们参考。你们的材料，我们回去也看一看，我们这些意见彼此交流一下。

你们是否从整个历史上看一下，看他的创作历史，看实践，重新审查一下，考虑考虑他

是不是三反分子，是不是四类，我看不是，而且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他有错误，可以检查，改正，和我们共同战斗。他最近还在写毛主席语录歌曲(100 条)。过去一定说过些错话，这是肯定的。你们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

文革小组也倾向这个意见，让他回去，一起和你们参加斗争，能过关就过关。假如你们认为他还是三反分子，也可以写材料来。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我们的意见。音乐界的人你们可以排排队，张权、李凌……。张权和他，谁是自己的人呢？劫夫同志还不是那样的。过去的不说，社会主义时期也创作了不少好的东西。劫夫不是给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主要看音乐实践，你们可以整个研究一下。他的曲子是豪放的，健康的，革命的，乐观的，鼓舞人们斗志的。

你们可以考虑他是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要帮助他，让他和你们一起战斗，给他革命的机会，给他战斗的机会。

你们都唱过劫夫的歌曲吧？

(答：唱过。)

好，才唱，坏的，就不唱了。

(对劫夫)

劫夫同志，不要强调这些，要严格要求自己，老干部，许多地方不如小将，要向小将们学习。本应该你率领小将前进，不但没这样，反而落在小将的后面，你的错误要检查。就压制群众这一条就该深刻检查。

(红色造反团的战士说：我们一定负责把首长的讲话转告我们总部，并且按照执行，我们一定按中央文革指示办事。)

我们澄清两个问题：

劫夫不是我们带来的。

我们对劫夫没有定性，我们有很多人在搞调查，我们是先揭发，后批判，再定性。现在没有定他是三反分子，有些人过激些是可以理解的。)

戚本禹：我非常赞同这一点。

(红色造反团战士：在《我们走在大路上》发表同时，他又批准一批毒草出笼。对张权十分宠爱，赠诗送画，写曲。我们认为是两面派。)

戚本禹：这是立场不坚定。因为我要保他，所以好的方面讲得多些，你们可以理解。

批评他不要戴高帽，不要“喷气式”，还要给他创作的机会。回沈阳要保证他的安全，不要拘留，不要抄家，要让他自由，你们能办到吗？

(红色造反团战士：一定按首长指示办事。)

戚本禹：不是三反分子这一点你们双方一致，都没定性，那就好。我要去开会，你们谈吧。

(戚本禹同志走后，红色造反团的战士和沈阳总部的代表同戚本禹的秘书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500. 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9 日)

接见时有三个工人总部的代表。

今天讲三个问题：

- 一、关于北京的大联合，更进一步的落实。
- 二、关于夺权问题，要彻底巩固所夺的权。
- 三、抓革命，促生产。

第一、大联合问题。

今天已是第八次会议了，但是成绩不大，打架的还很多，应该是团结在伟大领袖的身边，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搞好大联合。搞大联合以前，要有一个筹备委员会，建立一个筹备小组。

接着谢富治副总理就紧急倡议书对七个单位发表意见。

谢副总理说：这七个单位，我只知道首都革命造反派夺委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我就没有听说过，其他五个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夺权委员会的工作，不要松懈下去。你们工人总部应当好好清理。一般的保守派也不能担任领导，要把每一个司令部都整理好。你们要分工，哪一个工厂归谁，哪一个区归谁，要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不要互相拆台。我的意见是，工人搞工人的，学生搞学生的，农民搞农民的。然后大联合。前两天，我给五十多个大学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大家都愿意联合起来，搞一个工人的，搞一个学生的，但是他们的头面人物不愿意，要搞工农兵的。一、二、三司还没有联合。七号那天，他们吵了五、六个小时。后来愿意联合了，我们也没有意见。我的意见是工人、农民、学生各自组织起来，然后再联合。

第二、夺权的问题。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强调，夺权必须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基础单位最起码是两结合。例如革命职工群众组织代表和革命的技术人员代表结合。反对打倒一切，是当权派就打倒，这是违背马列主义的。夺权的第一步，要搞一个筹备委员会，搞一个筹备小组。由工人、学生、军人、农民和革命干部代表参加，名称暂时还不定。先开一个一百人左右的座谈会，成立一个二十人左右的筹备小组。座谈会的代表工人四十人，学生二十至二十五人，其他可由当地驻军、机关干部等代表参加。

筹备小组由工人代表七至十名，学生代表五名，其他由机关干部、驻军的代表。你们商量一下，这次筹备会，北京的主要工厂要有代表。筹备小组的成员要照顾三个工人总部。

第三、抓革命，促生产。

目前应以夺权委员会为主，要开会讨论农副业生产。要有两部分代表参加，第一部分是原来的县委书记、县长(比较好的)，一个县来一个。单纯地布置一下生产，顺便问一下夺权的情况怎么样。第二部分是城区单召开会议，讨论工商业生产。参加的单位也要有当权派(较好的)，明天，后天你们就可以开会。

关于以前赶走轰走的四类分子，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也有少数是错误的，错了就要纠正。有意不走的可以赶走。

501. 戚本禹对“批判陶铸联络站”的指示精神 (1967年2月9日)

王恩宇和吴传启向戚本禹汇报了批陶工作，回来后传达了戚本禹同志的指示：

刘、邓、陶反动路线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最近还没有低头认罪。刘少奇被斗后，不承认错误，不承认反对毛主席，只承认提出反动路线。斗争会上，王光美很坏，她对造反派摘刘的帽子很气愤，说不要摘帽子，一摘感冒生病就斗不成了，这里话中有话。陶铸至今也还有活动，前几天广播事业局开会时，还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是陶铸，声音很象陶铸。有材料证明，陶铸和反康生的逆流很有关系，与当前运动的阻力很有关系，许多左派组织犯错误和他也有关系。这些人影响还很大，有的地方对他们很崇拜，如安源专门挂刘少奇的像片而不挂毛主席的像；在延安，毛主席住过的和工作过的地方，有的已经成了猪圈，有的地方已经被破坏，但刘、邓住的地方，至今还保持好好的；同时还搞了个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主席的照片是和江青同志逗小孩，没有政治内容。任弼时同志的照片是打猎，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一起。而刘少奇、邓小平、朱德则是孜孜不倦地工作。在展览会上，毛主席的题词很少，而刘的题词很多。山东局面现在还打不开，说刘少奇是好的，报纸上没有点他的

名，不能搞，谁要搞就抓谁。朱德在部队中也有一股势力。但陶铸更有一股力量，通县的县委书记是陶铸的人。从这些情况看来，他们还没有低头认罪，离全国共诛之、共讨之还很远，离搞臭他们还很远，离夺他们的权就更远。但现在革命队伍中有些人却认为他们已经变成死狗了，没有什么搞头了。有些人很天真，搞了几下就把他们揪出来了，把几十年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不肃清他们的影响，最后夺他们的权阻力就很大，夺了权以后也不会巩固。因此，我们始终也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对刘、邓、陶的斗争，这是一个纲。一定要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否则后果是严重的。现在搞他们和大夺权矛盾不矛盾？不矛盾，是一致的。因为搞他们，归根结底是为夺权做准备，是彻底的夺权。与大联合矛盾不矛盾？也不矛盾，也是一致的。因为大联合只能是在批判刘、邓这个问题上的大联合。目前左派比较混乱，夺权有的搞法也不对头。如北航在《北京日报》的搞法不妥当，北航到《天津日报》去夺权，把那里的国旗扯下来，把自己的旗子挂上去，太天真了。

夺权应该从政治上夺权嘛！从政治上夺嘛！现在“造反公社”内部矛盾也很大，搞不到一块去。目前谢富治同志也在搞大联合，这点我们要坚决支持，但是不要忘记批判刘、邓、陶这个大方向，不要忘了这个纲。

502. 王力对新华社、三司的讲话 (1967年2月9日)

黑龙江省的夺权经验向全国广播，是主席决定的，各报要登在显著地位，要组织学习这个经验，这里面有毛主席的话，要特别强调三位一体联合夺权的经验。

中央认为，山东的夺权：(一)是真夺权；(二)军区的支持是得力的；(三)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些过左，领导干部参加新的权力机构的很少，左啦，要他们回去的，按此精神改进，过一段时间再来汇报。

山东红卫兵是革命的，最早举起了革命旗帜。但在夺权斗争中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过左了。

当前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红旗》杂志社论，把干部问题放在第三位，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应该放在第一位，这个问题我们要检讨，红卫兵也要检讨。

过去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贯彻不够。《红旗》杂志社论第三段，毛主席修改的最多，对干部一定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过去干部在那里工作，现在都打倒了，夺权后不是剩了空房子和几个印章了吗？

对干部一定要区别对待，在夺权同时一定要对干部进行排队，要区别对待。目前危害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处处是表现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完全错误的。对领导干部、中层干部一概打倒，这就会发展到打倒自己，这是很危险的，应该警惕对领导干部的政策。贯彻好的，区别对待得好，一般干部的问题就好办了。

一个省的第一书记问题很严重，拿到全国一比就不一定很严重。有的省一个好的领导干部也排不出来怎么能行呢？夺权单靠红卫兵和工人组织不行，一定要让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新的领导机构，毛主席说：“干部一定要立新功，立新劳”。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一点。

现在，中央决定准备把外出的学生全部撤回来(即原地)。中央各部，各报社，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经委，计委，要外单位不参加接管。北京目前打架最厉害的地方是北京日报，工人日报和公安局。在那里外单位的人都要撤回去。在谈到工人日报时，主席说“工人日报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了，那里的事，由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解决。”

503. 周恩来第一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1967年2月10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下午五点五十分至七点五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接见人：总理、萧华

被接见人：内蒙古党委、内蒙古军区、呼市三司、红卫军四方面各五名代表。

列席：刘华香（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

（会议开始，总理一一询问了内蒙古军区代表的姓名、成分、参军年限；问了内蒙古党委代表姓名、民族、在内蒙古工作年限；问呼市三司代表姓名、年龄……）

总理：谁叫高树华。（高树华站起来）

你是师范学院的教师？哪里毕业来的？

高树华：师范学院。

总理：你们三司有一个同学被打死，怎么不让检验尸体？

高树华：因为他们要抢尸，毁灭罪证。

总理：是谁要枪毙？

高树华：红卫军。

总理：怎么能抢尸体呢？为什么搞得这么对立？人是怎么打死的？

高树华：当时韩桐正在喊话，希望军区刘昌出来辩论。

总理：找刘昌辩论可以写封信嘛！用现在这个办法包围军区怎么能行呢？

高树华：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提着手枪跑出来，韩桐同志喊：同志们现在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时候了。接着这个军官便开了枪，时间是二月五日中午 12 点 15 分。

总理：韩桐是几年级学生？

高树华：四年级学生。

总理：那里人？

高树华：托县。

总理：那个盟？

高树华：乌盟。到附属医院的时间是 12 点半。

总理：当时人已经死了？

高树华：当时还没有死。

总理：伤口在什么部位？

高树华：从左边第五根肋骨下打进去的，把肺动脉打穿，子弹还留在死者体内。

郝广德：我们当时已经拍了照，到医院以后，红卫军、革命战士的人包围了医院大门，要抢尸体。抢救了五个多小时，到五点五十分，当时给北京协和医院打电话，协和医院说：停氧 20 分钟已无法抢救。军区广播说，解放军不会开枪打革命学生。是“818”打的。

肖华：打的时候你在场吗？

郝广德：打的时候我不在，抢救时在。

总理：是你们的学生吗？

高树华：是的。

总理：(对军区)开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黄厚：我不了解这个情况，姜部长知道这个事情。

姜文启：那天十二点打死人，到了下午三点才听说。后来有个老工人反映说，他看见放了两个炮竹，还冒了一股烟……

总理：放炮竹怎么能打死人？他自己能把自己打死吗？你们检查枪膛子弹没有？

姜文启：没有。

总理：你们没有检查枪膛子弹，怎么能断定不是你们打死的？你们这就输了一着嘛！如果我是个司令员，我马上就把人集合起来，检查枪膛子弹，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你们追查凶手了没有？

黄厚：没有查出。

总理：你们接到国务院、中央军委发的通知没有？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不开枪)

姜文启：见到了。

总理：见到了你们为什么还这样做呢？我们都是军人嘛！我是个老军人，后来退伍，现在因为工作需要，又穿上了军装。打死人很容易查清，一清点武器、弹药，就清楚了吗！

姜文启：我们当时没有验枪，这是我们的疏忽。

总理：静坐有多少人？

刘文研：当时我在现场(接着揭发了姜文启的谎言)。

黄厚：下午四点才广播枪打死人了。

总理：你当时在现场吗？

黄厚：不在。

总理：(问姜)你在现场吗？

姜文启：不在。

敖长锁(军区代表)：我当时在现场。在迫不得已时发了三条通告，这个通告是在十一点多宣布的，我没有看到打倒的现象，要打倒，一定要哄起来冲击，在下午三点多钟，才听到广播，因而军区没有检查枪支弹药。

总理：这个问题先停止到这里，派人进一步调查。

郝广德：必须查清，交出凶手。

总理：派谁都可以吗？

郝广德：只要总理派人去，我们就相信。

总理：中央派法医去检验，内务部去一个部长或副部长，带上个秘书和两名工作人员，乘飞机去。能不能夜航？(总理秘书立即打电话问能否夜航？回答说不能夜航。)那就明天拂晓起飞。

总理：你们(指三司)负责人是哪位呀？

郝广德：我，郝广德。

总理：飞机到了你们那边谁负责去机场接呀？

郝广德：薛贵元。

总理：军区谁去接呀？

黄厚：杨明先，训练部部长。

总理：由军区去个吉普车去接。公安厅夺权了吗？

郝广德：原来是造反派夺的权，现在保皇派反夺过去了。

张三林(红卫军代表)：左派不是自封的。

总理：到底谁夺权，谁是保皇派，还要看看啰！红卫军方面要不要派人参加呀！(指验

尸一事)

张三林：我们不参加，因为这件事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

总理：区党委要不要参加呀？

王铎：总理看，需要参加就参加，此事与我们没关系。

张三林：你们支持三司冲军区，怎么没关系？

总理：中央调查组、内蒙军区、呼市三司共同处理这件事，查清后将尸体火化，一定惩办凶手。

姜文启：韩桐的弟弟在军区后勤部工作，他要求看尸体。

郝广德：我们没有听到这个要求。

总理：死者的父、母、弟弟都可以参加验尸，把事实弄确实，如确实是枪伤，由政府负责抚恤。

这个问题双方都不要再扩大宣传了，到中南海来宣传很不象个样子，在北京在呼市都不要宣传了，查清后办案就是了。对待人民解放军要注意影响，不要丑化。你们(指三司代表)将来夺权还要靠解放军协助嘛！

(总理接着问了红卫军代表的姓名、职务)

总理：你们(指红卫军)这个组织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

张三林：我们是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组织，96%是工人、4%是干部。

总理：有转业军人吗？

张三林：有很少，个别的。

总理：你们谁负责的呀？

张三林：我负责。

总理：你们有多少人？

张三林：三万五千多人。

总理：光呼市吗？

张三林：光呼市。

总理：你们橡胶厂有多少人？

张三林：400多人。

总理：总指挥部谁负责呀？

张三林：暂时也是我负责。

总理：一共有多少人？

张三林：二十二万人，其中红卫军三万多人。

总理：这个数字有出入吧！

张三林：还有小学生。

总理：这不可能，呼市一共有多少人呀？

王铎：不连郊区农民，有三十多万。

总理：共三十多万人，你们就有二十二万，这样一算，平均一家要有两、三个人参加了。北京几百万人，能组织起来的最多有一百万。

张三林：我们统计数字有出入。

总理：不是数字有出入的问题，你们以少报多，这不够实事求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你们(指三司)有多少个组织？

郝广德：65个组织。

总理：学校几个？

郝广德：大专院校6个、中专16个。

总理：你们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

樊俊智：共有四万多人，主要是农民，有六千多转业军人。

刘文研：一开始，他们是全国荣复军，他们成立的是全国性的，我们有充分资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在去年十一月已经组织起来啦，有宣言，有纲领。他们的传单说是总理同意的，借着总理的名义，便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了，他们在农村，十三岁以上的都发展了。

樊俊智：我们是 12 月 30 日成立的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总理接见我们回去以后，就宣布第一个宣言作废。既然要摆，就摆一摆吧！不要说组织的名称，主要看组织的行动。我们没有牛鬼蛇神，咱们可以和三司比比，摆摆么！有理不在言高，山高遮不住太阳，我们现在全国连个点也没有，和别的组织没有联系。

总理：你们把转业军人组织在一起，这我去年十二月份有个讲话，已经讲了应该逐步取消。应该按照产业、职业、行业来组织革命组织，不能把人从各方面抽出来，单独组成全国、全省区性的组织，因为这样组织就成了一个政党了。我们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只有按照产业、职业、行业，一个厂子、一个系统组织在一起，才能统一起来。存在决定意识嘛。你们这个组织各行各业都有，应该逐步取消，我劝你们逐步取消。因为不按产业、职业、行业组织，容易被坏人利用。有些组织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下令取消的。有些组织，如：荣复转业军人、一九六五年大专院校毕业实习生、临时工、合同工、半工半读、学徒工、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下放干部、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等等，有的要回上海，要回来搞全国组织，我也不同意，结果这些人就流来流去，甚至流到部里，最后被我们查出来了，共有七、八种，查也查不清。有些已经查清了，如：“红旗军”，有个黄老，工农兵有两个头子，是大流氓，这些组织是被反动头子利用的。第一次查出“红色职工造反总部”，后来，又查出个“荣复军”，湖南长沙又查出了“红卫军”等等，不论那一派，都要注意不能跨越产业、职业、行业来组织，这容易被坏人利用。

刘文研：现在他们这个组织与包头、全国有联系，第二个宣言仍说以荣复转退军人为主，北京有个“黄老”，他们有个“潘老”，他们领导人白振玉、郑福田说是总理同意搞的。

樊俊智：白振玉不假，领导成员有四个，总理说不允许，12 月 28 日发的宣言，有这么一句话不假。工人、农民大部分都在我们组织里，我们最近准备清理组织。看一看我们工农兵成立后砸了哪个组织，有哪些牛鬼蛇神，三司砸了那些组织，在哪些牛鬼蛇神，我们跟全国连一个联络站也没有，我们也可以把三司的成员摆摆。

总理：不要谈这些了(总理点郭长俊的名)。

曹文生：郭长俊没来，我替他，我是学习调度员的，五九年石家庄毕业，我原是铁路职工红卫兵，铁路局有个红色造反团三千人，铁路系统共六千人，呼市五千人，呼铁一千，在家的九百二十人左右，最近夺权是我们夺权。

总理：人家不是已经夺了吗？

曹文生：他们是假夺权，那派局处领导人就有 46 人。

总理：是不是军队帮你们夺的？

曹文生：我们是八日早五点夺权，部队在那儿有一个警卫班，因为他们要抢枪支弹药，部队下午六点才去的。我们夺权后他们不上班，我们就发扬穷棒子精神，自己干，我们有准备，我们夺权的那一天生产任务完成的最好。

总理：局机关同意你们观点的有多少人？

曹文生：200 多人。

总理：是否发生过堵塞现象？

曹文生：暂时还没有。

总理：你们夺权是否有外援。

曹文生：有，因为我们是少数派，需要大联合支持，是无产阶级联合总部支援的。

总理：你们“无产者”有多少人？怎么组成的？

张启生：共有两万多人，机关干部两千，大中(专)院校学生一万二千，手工业工人四千，郊区农民三千。

总理：那你们就是极大的多数派了，你们几个组织有交叉，学生很多，你们的代表都是工人、干部，为什么没有学生，我建议你们找个学生代表，看看你们的学生属于哪一派？

郝广德：清华井冈山驻联络站的同志参与了这件事情，应该有代表参加。

总理：可以参加一个人(后决定宁奎喜参加)。高锦明同志放出来没有？你们(对区党委代表)还叫高锦明来吗？

郭以青：高锦明同志是我们首席代表，要叫他来。

姜文启：如果让高锦明来，王逸伦也应该来。

总理：你们几个方面有什么意见？

郭以青等：我们同意让高锦明同王逸伦一起来。

郝广德：我们也同意。

总理：那就明天一起来，都不要带秘书了，区党委派一个工作人员来就行了。

(三司代表递上“818”和军区红色造反团给总理的信，总理看了后问黄厚)你们那里还有造反派？怎么没有他们的代表？是不是怕他们？

黄厚：我们不怕。(最后决定让红色造反团一名代表——王建苹来)

张三林：我们也应该增加代表？

总理：不谈了，不谈了，如果需要增加代表，以后再考虑，先搞打死人的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

504. 陈毅与西安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 西安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十个代表的讲话 (1967年2月10日)

陕西军区几个负责人作“三结合”的负责人都不够格了。军委决定派一个人去作军区司令或政委，你们要信任他，这是军委派去的。让解放军保卫国防工厂，保护劳动人民的生命安全，支持你们。把军区胡炳云等几个人调到北京，接受批判受教育。你们造反派要把胡炳云个人犯错误和伟大的解放军分开。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手缔造的。他们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人民。

军事院校和连队的解放军要分开，因为在学校里也有造反派和保守派。

要加强部队，要加强他们，要把方向搞对，支持左派，否则就麻烦。新的军区负责人派到西安要正式通知你们，与你们合作。

造反派成立统一组织，辨别谁是造反派，防止你也去夺权，他也去夺权，防止“保”字派打起“造反”旗号，扰乱你们的阵营。

关于你们西安提出的三条要求，你们考虑交大同学能否接受，我看不大可能。你们若不善于大联合，将来掌权后会给自己造成混乱，你们得考虑后果。

中央要我解决西安问题，我总不能公公正正，不偏不倚。总之是为了大联合、大夺权。不要掌握权之后，为自己造成麻烦。没掌权你们可以写大字报、传单、标语。一掌权就没这种自由了，就和以前不同了。我们掌了几十年权，有经验。我们就不能随便到中南海外面去贴大字报。在和交大的关系上你们的态度是对的。你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的也并不完全对。应该既不抹杀分歧，也不断关系，但这并不是折中。你们负责人应该有这个态度。和交大的问题解决了，实现了大联合，成立了统一委员会，不是联合行动，而是要统一行动，搞个宣言，搞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搞得水平高一点，不要抄人家的话。你们造反派有两派，斗争这么长的时间，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如果你们的问题很好的解决了，这标志着你们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非常关心的。在解决造反派内部的分歧上，你们给全国树立个典型(范)，但这不是和稀泥。你们再考虑一下。不过不要用

公社这个名字。上海公社《人民日报》就没转载。因为这个如果转载了，可想全国很快就会搞起来。现在革命委员会或临时委员会最好。革命浪潮越来越高。你们创造新形势，改变和防止你去接管，他也去接管的混乱局面。几个主要造反组织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万不得已的办法，交大内部的事由他们去处理。革命群众自己会解决。我讲的话仅供参考。一九四九年建国时，我们请客，搞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民主党派有什么势力？他们没有工人、农民、学生群众，他们也没有枪了。但是毛主席还是团结他们。这是伟大的战略思想。交大还有一万人嘛，要再作努力。你们这一方面已经作了一定努力，但还不够，还有一段距离。在革命没有展开以前，要看谁先打开局面，一把火，烧红半边天。在夺权以后，就看谁善于团结人，团结中间派，只要不是顽固坚持的人就争取。领导核心必须是坚强的，这很重要。但领导机构可以搞政治协商，搞人民大会，人民大会代表三千多人，现在真正没问题的你们审查一下看还有几个？不多了，但不能说人民代表大会不好。因为他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办法，承认他们是左派，有什么决议，精神告诉他们。(同学：是不是承认它是左派组织，有一个组织人多，方向对，就让小的与他们联合。钢院组织多，他们说，联合起来以后再加进来。)三司过去在外面起了好作用，但也有一些起了不好的作用。你们是否把他们弄回来，整整风？(二司同学：杂牌军。三司同学：不同意是杂牌军。)今天不讨论三个司令部的问题。你们回去自己讨论。你们要照顾多数人的问题，也要照顾少数人的问题。不要随便扣帽子，不要吵架。真正是左派就不要吵架；真正的左派要站得高，看得远。内部问题，内部辩论，不要上报、出宣传车、刷大标语，当成敌人来对待。要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内部问题，出宣传车、上报、刷大标语，都不利大联合，妨碍团结。今天就讨论产生代表，筹备小组在二、三天内产生出来，再从中产生四、五个筹备小组成员来。

还有几项具体事情希望帮助解决。北京市的联络站有几个、上万个，特别是全国性的，中央一个也没有承认。你们都联合不起来，成立了全国性的能不能有代表性？几千上万个联络站怎么处理？(同学：赶回去！已向中央请示，要求中央发通知，都撤回去，中央也没答复。)你发通知软绵绵的，不起作用，也没有力量，大家不听你的。开始时，串连还起好作用的。现在都革命了，甚至都夺了权，你在那里，是好作用多，还是坏作用多？

还有个事情，春季来了，如果抓革命，不促生产，是不利的。资产阶级破坏生产，你们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特别是农业、蔬菜，没有菜吃，人家不给你造谣？还有工业生产，你们要做些宣传。再者治安，治安北京是比较好的。北京的秩序要由造反派来维持。过去赶出去十几万五类分子，多数是对的，少数是错的。现在错了的回来。赶对了的回来还成立了造反团，我们不允许他们造反。他们造谁的反？我们还要对他们专政。

(钢院东方红问：钢院组织六七十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批透，遗毒未除，联合不起来，从内部求联合不行，采用整风的办法也见效不大，应该怎么办？)这个情况你们自己解决，我解决不了，你们讨论，我向你们学习。(钢院东方红：我院及其他院里，有许多自由战士，下厂后，有的是边搞运动边劳动，有的是光劳动，调也调不动。调不回来怎么办？)中央最近在制定关于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是一个政策问题。

505. 谢富治与三司等革命组织座谈纪要 (1967年2月10日 人大会堂)

谢：三司来了没有？你们在外地建了那么多联络站，是否把他们调回来？

同学：我们准备发一个通告，已报请中央文革了，还没有批下来。

谢：你们发个东西我是支持的，你们在外建联络站，有的是按原来组织办的，有的不是按原来组织办的，刚下去或中央派去的特殊情况，真正是中央批准的，是极少数，这样的例外，这个问题我已向中央汇报了。

……你们那个批判有所进展了没有？

同学：有了进展。

谢：内部整顿怎么样？

同学：……

谢：你们来了多少人？三司来了十一个人。这么多(指三司工作人员)，来了以后还是向你们请教，向你们学习。我办事拖拉，没有象你们青年人敢想、敢说、敢干。今天我不念语录，先念黑龙江省夺权经验。……为什么要念这么一篇？这是一篇很好的经验，是党的一位负责人让登的，你们不要问谁叫登的，反正重要就是了。

同学：毛主席让登的。

谢：反正不要问，党的负责人让登的。下边由谁来谈一谈经验和社论？(让矿院东方红负责人谈)今天同学来，就是商量夺权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都是毛主席的所在地。夺权是很复杂的问题，怎么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怎样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夺过来，还要掌握好，这是一件大事，夺得干净，夺得彻底，并真正的掌握好，这是一个没有经验的事，要参考外地经验，主要靠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权已夺了好多。但有的是假夺权。怎么使这个过程缩短，真正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里，这是一个过程。北京的权还没有统一，你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革命左派，过去也曾讲到，要成立一个过渡式的统一组织。但是根据中央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要有三方面的代表，革命左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今天人民日报也报道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想搞一临时筹备委员会或叫筹备小组，过去也有些组织，今天两个人讲了，就发表一个声明，成立一个司令部，司令部真多，今天讲有些问题上就可以这样急，有些问题，就不要这样急，我们还想一个小型的会议……。从中再产生一个筹备小组。叫什么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名字不要紧。你们不是起了一个人民公社吗？上海起了一个人民公社，人民日报就没有发表，上海有个公社，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现在还是叫革命委员会，是不是叫人民公社，还有群众来讨论，那要由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确定。不管是什人民公社，或筹备委员会，叫什么，主要的还是筹备工作，做什么工作，名字不是实质问题。现在有许多同学在名字上做糊涂文章。苏联叫苏维埃，列宁以前叫苏维埃，斯大林时期也叫苏维埃，赫鲁晓夫及叛徒他们也叫苏维埃。造反派也叫造反派，保守派也起个保守派的名字，是否加上造反派的名字就是最革命的？不一定，名字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本质问题。学生是一个，有二十个学校的参加，有五十八所大学，从五十八所大学找出二十个来，北京有二十个左右代表，你们大家去分配，从二十名中再产生四、五名，最少是三名，最多五名，三名可能少一点，参加临时筹备小组，此外还有中学、工人、农民，工人是主要的，这个你们就不要管了，筹备小组统一北京的筹备工作，筹备会议，成立革命委员会等。今天来了也不是全部，你们产生二十个代表，在两、三天产生，此外，还有工人、农民、机关、军队。究竟是由各级产生呢？你们自己讨论决定呢？不然又说我包办代替了，我已搞了十多天了，还没搞出一个小组，你们一晚上就成立好几个总部，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我是受中央委托来的。

同学：山头主义，风头主义，小集团主义。

谢：我已开了很多会了，筹备了半个月了，还没有成立一个小组，我老是说，你们又要批评我，你们踏踏实实，先搞大专院校的合并。叫你们要搞三号人物，一号、二号人物不愿去。

工人统一起来比较困难，学校统一起来比较有基础，以系统分，几个学校联合起来，不要你搞一派，我搞一派，这样联合不起来。你学农的，或者与相接近的，如气象等，搞农林学，有色、黑色、机械的……，分成组，一个小组搞什么，一个搞什么，哪个工厂只能是一个，不能搞几股，你们看是否可以。

同学：同意，现在也正是这么搞着，五十八个学校，也只能搞五十八个组织。

谢：你们有那么多组织？(同学争论大联合问题)如果大学都联合不起来，怎么搞工人、

农民的联合？

同学：谈高校红卫兵联合问题，学生联合起来，再联合工人、农民。

谢：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夺权是考验我们左派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过去考验你们，看是不是造反，现在还有两天的考验联合的夺权，你是不是真心的革命造反派，就看你是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向什么人夺权，为谁夺权，特别是为谁夺权，我们不是为一个人，一个单位。夺权来了，只要你是革命派，我就可以交给你，我们这个单位，个人不在话下，如果为个人或小集团，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举的高？大家讨论。夺权与联合是联系着，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下，联合起来，不要让资产阶级钻我们的空子，这样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是不利的，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这样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左派，这样才不是小团体主义，这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为什么人民日报最近老登打倒个人主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就是目前大联合道路上的障碍，这就是“私”字，我个人也有。说句老实话，(可能)在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的左派，或者在夺权当中，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的不高。

同学：经讨论每个学校只吸收一个。

谢：你们在这方面，是不是采取妥协的办法，承认他们是左派，有什么决议、精神告诉你们。

同学：是不是承认他是左派组织，有一个组织人多，方向对，就象小的与他们联合，钢院组织多，他们说：联合以后再加进来。

谢：三司在外边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一些起不好作用的，你们是否把他。

二司同学：杂牌军

三司同学：不同意是杂牌军。

谢：今天不讨论三个司令部的问题，你们回去自己讨论，你们要照顾多数人的问题，也要照顾少数人的问题。不要随便加帽子，不要吵架，真正是左派，就不要吵架，真正的左派，要看得高，看的远，内部问题内部辩论，不要上报，出宣传车，刷大标语，当成敌人看待，要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内部问题，上报，出宣传车，刷大标语，都不利于大联合，妨碍团结。今天就讨论产生代表，筹备小组，在二、三天内产生出来，再从中产生四、五个筹备小组成员来。还有具体事情，希望帮助解决。北京的联络站有几个到上万个，特别是全国性的，中央一个也没有承认，你们都联合不起来，成立了全国性的能不能有代表性？几千上万个联络站怎么处理。

同学：赶回去，已向中央请示，要求中央发通知，都撤回去，中央没有答复。

谢：你发通知软绵绵的，不起作用，也没有力量，人家不听你的。开始时，串连还起好的作用，现在都革命了，甚至夺了权，你在那里好作用多，还是坏作用多？还有个事情，春节来了，如果抓革命不促生产，是不行的，资产阶级破坏生产，你们还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特别是农业，蔬菜，没有菜吃，人家不给你造谣？还有工业生产，你们要做些宣传。再者治安，治安，北京是比较好的，北京的秩序要有革命造反派来维护，过去赶出去十几万五类分子，多数是对的，少数是错的。现在，错了的回来，赶对了的回来还成立造反团，我们不允许他们造反，他们造谁的反，我们对他们还要专政。

钢院东方红问：钢院组织六、七十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批透，遗毒未除，联合不起来，打内战求联合不行，整风的办法也见效不大，应该怎么办？

谢：这个情况你们自己解决，你们讨论，我向你们学习。

钢院东方红：我院及其他院里，有许多自由战士，下厂后，有的边搞运动边劳动，有的是光劳动，调他调不动，调不回来怎么办？

谢：中央最近要制定关于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是一个政策问题。

506. 谢富治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年2月10日)

1. 各校到外地去的人(包括各校派到各地的联络站)都要回来整整风，整顿思想。
2. 首都的夺权到了关键时刻，它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但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组织。北京应搞一个工农兵学的筹备小组，中央文革支持，夺权要三结合。(即群众革命造反派以及执行毛主席路线的党政负责人、军队负责人)大专院校推选20名代表参加筹备小组，两、三天就搞出来。
3. 过去看你(指一个组织)革命不革命是看你的革命造反精神，而现在看你能不能为革命的大联合出力。

507.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等革命组织时讲话摘要 (1967年2月10日)

接见单位：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上海市第一医院星火燎原兵团、华东工学院红旗兵团、清华井冈山驻沪联络站、北大文革驻沪联络站、北京工农兵体院驻沪联络站。

关于目前大联合问题

张：北京叫“北京人民公社”，我们上海也叫“上海人民公社”。人民日报里有句话，不知道你们注意了吧！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的形式。这里有谁参加起草。(同济大学东方红回答：我们参加了。)

姚：只有大联合才有权力，一个组织讲话没有人听，三十个组织讲话就有人听。在当前正需要，这是我的感觉，不知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能不能通过斗争先弄成雏形。

关于红革会

姚：到街上去看一下，街上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几乎不见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中央指出斗争的大方向是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红革会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大方向错了。陈、曹的问题原本没有揭开，曹荻秋还不承认被打倒。红革会还破坏了大联合，在上海有两种大联合：左派之间大联合，而右派之间也在有意无意地凑到一起。现在有些牛鬼蛇神也纷纷出笼了，要有思想准备。对红革会的认识，以前对它负责人还是认识不清的，斗了我们六个小时(指元月二十八日在中苏友好大厦红革会等组织召开斗争张春桥、姚文元的会议——编者)也是一个好事，认识一个问题。

张：……关于成立新市委问题，是赵全国(原上海的头头)已被捕入狱，赵从全国到北京回来就反对我，不知是什么道理，我在北京时陈丕显一定打电话到中央要我回来，说市委支持不住了，是不是想把我推到第一线，设陷阱，我总觉得这里面有玩意。当前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的大标语，这是不正常的，真正革命的同志，应该掌握革命的大方向。

目前，我们仍要抓斗争的大方向，取得真正的大联合。否则联合了，没有思想基础，以后还会分裂的。我们党的历史，开始党代会十二人，现在呢？陈公博是个大汉奸，张国焘……，你们都是青年，要注意在大风大浪中锻炼。陈丕显参加革命时，还是红小兵，在那艰难困苦条件下，受得了，他们还想到今天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你们以后当权了，要注意。条件变了，不注意就会慢慢滑下去，现在分裂了，可能你们人少了，少没有关系。毛主席说：真正的革命左派总是少数。红军原来几十万人，后来只剩下几万人，到底什么时候强大的呢？长征以后强大……一月革命干了几十天，现在二月了，不知是谁个胜利了，……现在有的人说：“我这个组织好，即是科长以下的人组成。”把科长当成当权派统统拉来斗，这是非常错误的。

当前怎么搞，红革会是不是会作为斗争的一个内容。前一阶段有些打击面太广。对红革会要把某些负责人和红革会战士区别开。

张：矛盾会转化，有一点你们意识到了吧！本来是革命的也会走向反面。

姚：一个组织不敢展开辩论，处处用武力来压别个组织，会发展到啥个地步？……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非常害怕别人起来造他们的反……方向转移了，转移了矛头。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两个任务：（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大联合、大夺权。这两个都给红革会破坏了。毛主席提倡大联合，要给红革会的战士和负责人分开来。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红革会的战士，不斗争不行……我跟红革会接触了三次，有一次在中苏友好大厦把我们斗争了六个小时，还叫我们念：“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任何人都适用。

张：怀疑一切是错误的口号，是无政府状态的口号，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怀疑一切就是反马克思的口号。过去不批判，是因为当权派用这个口号来压群众。王任重、张平化就是用这个口号来压制群众的。希望同志们思考一下，怎么办？和红革会斗争只是一个方面。

学生到工人中间去，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上海人民公社早些成立好呢？还是晚些成立好？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性机关。

姚：大联合之所以有必要，集中起来有威力，有必要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上海人民公社”。

508. 访问中央文革接待站问答纪要 (1967年2月10日)

上访：中国科技大学革命造反第三兵团

接待：张云同

问：革命造反派夺权后，宣布所有的党员一律重新登记，这样做是否符合中央精神？

答：中央没有这个指示。这样做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党籍的处理，要放到运动后期，由党组织处理。

问：革命造反派夺权后，开除党员的党籍对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支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是否宣布开除党籍？

答：中央没有规定，党员的党籍问题，应放到运动后期，由党组织处理。现在开除不算数。中央文革指示要放在运动后期。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分子的党籍，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

问：夺权中宣布各级党组织一律作废，对不对？党的组织生活过不过？党费交不交？

答：中央没有废除党组织的指示，我们一定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废除党的组织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党的组织生活要过。党费要交。

问：对待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党籍是否开除？

答：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党籍应当先斗，然后送交公安机关处理。

509. 周恩来接见农口五个单位夺权的革命造反派代表会上的座谈纪要 (1967年2月11日晚 国务院会议厅)

被接见的单位：有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农政的机关接管委员会和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

会议开始，总理就问农垦部李朝山同志：“你们造反派多少人？叫什么名称？造反委员

会有多少人？保王震的还有多少人？他们还工作不？你们应叫他们工作。”李朝山同志都一一作了回答。当问到夺权情况时，总理问：“你们怎么夺法？哪天夺的？”李朝山同志回答：“我们是一月十七号夺的，有农垦部机关红卫兵、延安战斗兵团，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人大队等造反派组织参加。”总理又问：“业务是监督还是直接接管？部长怎么办？抓业务的革命生产委员会有多少人？组成人员怎么样？业务是否受了影响？”对这些问题农垦部代表也都作了回答。总理还问：“你们承认不承认谭震林同志的领导？”（答：承认。）“总得承认中央领导嘛！王震就是典型的不承认。”总理说：“王震，主席那样保他，谭震林、李先念副总理去保他，我还在后面，他还那样闹，总那样闹就要走到反面去了”。总理又说：“那次我提出让王震背靠背的检讨，叫他去休息，你们没有完全接受这一点，自己造成一些困难，现在你们胜利啦！我才给你们说这个话。在你们困难的时候我不说这句话。当时中央估计到要遇到这些困难，所以才建议你们采取这种办法，当然你们也受到了锻炼。不按主席的最高指示办就要造成困难的，这点你（指李朝山同志）是有责任的。”总理问：“陈漫远同志来了没有？”（陈漫远同志答：来啦！）

当农垦部谈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情况时。总理问：“现在北京还有多少人？”几个有接待任务的单位汇报人数以后，总理说：“中央已经规定吃饭要收钱，他们还不走？”（农垦部同志回答：不给开饭，他们就抢。有的同志谈到他们说安置工作中有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老根是谭震林同志，所以他们和机关中反谭震林的人结合到一起了。总理说：“安置工作中有什么修正主义路线！”

总理依次也同样问了水产部夺权派的组织情况和反夺权派的组织情况，当听到水产部汇报该部反夺权派红旗军、水产红旗、东风、东方红等组织伙同农大东方红、外语学院红旗、上海水产学院“红革会”等组织的不明真相的学生、军垦战士及全国水产系统革命造反总部（非法组织，已取缔）进行反夺权时，说：“夺权以本单位为主嘛！他们要包办代替？最好是本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外单位只能辅助嘛！”

接着总理问农业部的夺权斗争情况，总理问：“你们夺权了吗？”（答：夺权了！）“叫什么名称？”（答：叫农业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管理委员会）（临时），“管委会包括那些组织？”（答：有五个革命组织，延安战斗团、遵义战斗团、毛泽东思想游击纵队、红色职工造反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指挥部），总理又问了保守派组织的情况，然后说：“保守派是涣散的。”总理看了一下管委会的名单说：“你们管委会的特点是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有中层的革命干部，还有广大的革命群众，有点三结合的特点。”总理问：“你们批判斗争廖鲁言、蔡子伟、顾大川、吴振结束了没有？”（答：没有结束。他们保守派说我们是打死老虎）总理说：“他们说你们是打死老虎，那就把所有的干部都打光？那《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怎么理解？”

然后总理问气象局代表：“你们夺权了吗？”（答：夺了。）“什么时间夺的？”（答：一月十七号下午五点半。）“叫什么名称？”（答：叫中央气象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权力接管委员会）总理说：“唔！你们叫接管委员会，不叫管理委员会。”总理又问：“你们有几个委员？饶兴不在内？”（答：饶兴不在内。）总理说：“你们气象局有多少人？”（答：八百多人），“你们气象局的夺权派由几个组织组成？有多少人？”（答：有五个革命组织。红卫总团、红卫兵纵队、永红纵队、红六·七革命造反团、洪流战斗队，共二百余人），“有没有冲击？”（答：有，内部外部冲击都有）总理说：“你们是少数，这能很好地锻炼你们。”总理问：“你们对业务怎么搞的？”（答：接管委员会指定三人抓生产，并责成各级组织及有关领导在接管委员会监督下抓生产。）总理说：“你们是负责监督的，这样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总理又问：“饶兴来了没有？”（答：没有来，红旗揪住他不让他出来。）总理又说：“最近有下雪的可能吗？今年北方的旱象怎么样？我很关心，请你们注意一下好不好？他们（指权力接管委员会抓生产的班子）没有来，把这个精神跟大家传达一下。”

这时总理对谭震林同志说：“象今天这样的会开了没有？”谭震林同志回答：“没有开，

都个别谈了。”总理说：“为什么不可开个会呢？要开嘛！”总理翻阅记录后说：“农垦部夺权派占绝大多数，主要是外部冲击，水产部夺权派占优势，农业部也占优势，外面有些冲击……”(众说：气象局主要是‘红旗’和农大八·一八冲击。)总理说：“唔！冲中南海也是八·一八？占着人大会堂不走的也是他们吗？(众答：是，还有军垦战士造反团。)总理说：“军垦战士造反团还在北京吗？他们还自称革命派？”(众说：还有气象局的‘红旗’三次包围和冲中南海。农政的黄天祥也参加了，反正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所属的组织几乎都参加了。)

最后总理问到农办、农政代表：“你们夺权的是多少个组织？”(答：四个革命组织)“农办、农政有多少人？”(答：农办九十五人，农政一〇七人，行政科七十五人。)总理又问：“你们四个组织有多少人？”(答：有二百四十人左右，另外有两个保皇团共十三人。)总理说：“那你们占绝对优势了。”总理又问：“他们不做工作吗？”(答：我们分给他们工作，他们不做。他们还说给谭震林脸上贴金的事不干。)总理说：“那么仇恨呀！这是阶级斗争嘛！”(众说：他们说总理一月八号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只能做参考。农大东方红有人说中央不了解情况，所以他们到处向黑帮分子收集谭震林同志的材料)，总理说：“中央不了解情况，他了解？”(众说：周总理讲话之后，他们继续声称“打倒谭震林”“火烧谭震林，解放全农口”，“谭震林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说“砍合作社是谭震林搞的”，“后十条也是谭震林搞的”，他们的大方向是错的，他们是大杂烩的组织，他们不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批判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矛头指向谭震林同志。)总理问：“农大东方红是那个司的？(答：是三司的。)劳大东方红是那个司的？”(答：是三司的，“气专学校叫什么组织？”(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包括长征战斗队，鲁迅战斗队)“农机学院的叫什么名称？”(答：也叫东方红。)总理说：“他们是参加八机部夺权的？”(众答：是。)总理说：“农口，你们是站一边，他们站一边，”(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的代表答：他们是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他们是一砸、二抄、三抓人，搞白色恐怖。)“他们多少人？”(答：论各部、局的机关工作人员，他们没有我们多，若他们加上农大、劳大、气专学生，他们比我们多。)总理说：“外面受他们(指学生)的影响，你们宣传的不够嘛！你们对要做工作，否则有强大的反对力量。当然他们在也有好处，可以考验你们，看能否顶得住，”(农垦部的同志还汇报了最近有一个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的情况，几乎各省都有分团，号称有八十万人)总理说：“这是王震的口气！王震要当反面人物，也没办法。水产部、气象局都有。”(众说：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秦化龙、黄天祥是后台。)总理说：“秦化龙是农政主任，黄天祥是谁？”(众说：黄天祥是原农政宣传部长，是三反分子，是农口革命造反联络站负责成员之一，他是保秦化龙的，冲中南海是黄天祥现场指挥的，他是原团中央胡耀邦智囊团里的人，有大量的、非常尖端的三反言论。)总理点头说：“哦，我知道，我知道”，(众说：农大东方红把廖鲁言、张修竹、秦化龙等反党分子抓去，也把我们的革命同志抓去，但待遇不同。他们要这些反党分子提供攻谭震林同志的材料。)总理说：“他们都保起来罗！”(总理把各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逐个问了名字记下来。)

当总理问完到会各单位的情况后，向到会的代表作了如下指示：

你们农口面临夺权斗争，农口的确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了；的确也有反夺权的斗争。你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你们胜利了。……你们要坚守阵地，打赢这一仗。当前春耕生产到了，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今晚我就找你们来谈谈，要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你们要全力地抓。你们要很好总结一下夺权斗争的经验，你们是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地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农口的夺权斗争中更加尖锐化。尽管已经夺了权，但形势还没有完全决定下来，在一个单位数量上占优势，但是整个农口还不是这样。因此你们要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要很好地搞联合斗争。从内部来说你们比较容易搞三结合(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和革命群众)政府部门、业务部门，并不是每个部门问题都那么严重，都非夺权不可。从上月八、九号上海进行了夺权斗争，消息发表以后，全面开展了夺权斗争，中央就估计到可能有连锁反应。我们给各口打了招呼，不要

引起波动。我讲了话之后，你们采取了主动，他们说你们夺权不彻底，是“保”字的，是假夺权，那当然这是不正确的，你们要坚决站稳立场。他们有的是形左实右的，你们要揭发形左实右。你们要进一步研究如何作战，你们要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以后希望谭震林同志多与你们会面，要一步一步地抓，因为我没有很多时间。我们要承认农大、劳大、气专、农机学院里是有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到现在复杂化了，你们也不能没有形左实右的，保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们注意外部，也要注意内部。既要抓革命，促生产，也要好好搞斗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社论。现在学校不注意学习，喜欢向外跑，上街写大标语，开大会，一搞就几万人，准备的也不好，逼着我们上阵。把大字报变为简单的标语口号，运动搞了半年多了，不能老是这样浮动，要更好地学习，要提高斗争水平，要搞得更踏实些，你们农口要准备一下，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要有青年人参加搞，但光青年人也不成，青年人有干劲，闯劲好，但缺乏业务经验，总得三结合，搞个象样的向全国发呼吁书，真正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光写砸烂你的狗头，打的稀巴烂等口号就能行的。现在街上到处贴的这些标语，是和《红旗》杂志，中央文件不相称的，你们既然是革命派，你们要认真地学习，认真地工作，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起草个象样的呼吁书。(当有的代表提出农大学生开除了五个党员的党籍问题时，总理说：“非党员开除党员的党籍怎么成呢！”)总理接着说：“我不仅跟你们见面，还要跟他们见面。你们是夺权派，我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总理对谭震林同志说：“好！今天就谈到这里，你来谈谈。”

谭震林同志说：“按总理的指示办事。”

总理说：“不是指示，是建议。”

(这时江一真同志向总理汇报了农业部六个直属单位的夺权情况)

总理说：今年有大的跃进，你们先去摸一下。如果你们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你们就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为依据，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对的坚持，错的改正。对方好的东西也要吸收，对对方要帮助、争取，要注意团结。有很大数量的反对派在你们的对面，你们五个单位的革命组织，要给他们做工作。总之，中心是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季节性很强，一年之计在于春，过了季节就完了，不象工业。你们接管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抓生产的班子要认真研究一下，要抓大的，不要抓芝麻。

现在夺权与反夺权斗争，是阶级斗争，会有坏人插手。抓人、打人、把人关起来不见了，很妨碍工作，有的保护起来了，现在到了夺权的时候了，所谓黑材料还抢来抢去，还有什么抢头呢？我们北京是首都，是毛主席所在地，斗争方法要文明一些。多数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对敌军还优待俘虏，就是敌我矛盾，他回头了还是可以的，还给立功赎罪的机会，现在就是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形“左”实右。对这些你们是不赞成的。对王震我们警告他一次了，还要警告他一次，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任何人吃老本最后都是输的，我们承认他过去有功勋，但要一分为二，要立新的功勋。

好，今天就给你们谈这些吧！最后要求你们认真地搞好工作，希望你们再前进！感谢你们帮助我了解农口的情况。(鼓掌)

总理在临别时说：“今天和你们谈话是最短的一次，可能你们还是成熟一些。”

510. 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八个单位赴京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11日)

周总理接见时说，王任重的病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王任重回来休养一个时期再批判。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才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今天才把人交出来了。你看连我都不相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无政府主义。主席命令我亲自打电话，要找王任重，有一些人还不相信，这样自由主义就泛滥到边缘了。王任重是死了，主席找我，我怎么回答？为什么现在要发表古田会议决议呢？主席在四十多年前写的东西，今天一样还很亲切，四十年前是

我们那一代，四十年后是你们这一代。现在看你们重复四十多年前的错误，我心里很难过，你们只能比我们更好，如果你们比我们当初做得差一点，这就是我们犯罪。我这样说并不是保王任重。如果传出去，有人又给我贴大字报，说我保王任重，那我也不怕。我这里说的是心里话，这样下去怎么行！

在谈到西安的革命造反组织时，总理说，力量很强大。内部问题多，西安的群众基础好，内部斗争很激烈，你们政治上不仅占优势，人数上也占优势，组织上也占优势。现在夺权斗争落后了。有共性，也有个性，各有各的特点，不过后来居上嘛！你们不要泄气。

当谈到驻京办事处同志与交大同志争执时，总理说：看你们争来争去，在这些小事上争，争鸡毛蒜皮的事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总理接着说：巴黎公社的原则要正确运用，滥用就成了自由化了，选出干部要稳定一个时期，对干部要给一个锻炼的机会。领导干部要稳定一些，不要不称心就换。你们这样气鼓鼓能夺权吗？我们对西安寄予很大希望。如果你们这样，必须推迟联合，推迟夺权。

看来你们目前力量很强大，人数占绝对优势。存在决定意识嘛，必然出现分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人多必然有不同意见，问题也多，现在要开门整风，准备夺权，你们已达 90% 以上了，那就叫努力整风，准备夺权。你们的问题靠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教育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夺权也要靠自己。你们现在街上互相斗，我是不同意的。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的队伍真正的而不是假的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才有力量，才能推动省、市委领导同志出来亮相，推动军区左派出来支持你们，不然你们你争我抢，他们不好表态。不管怎么样，三结合总能实现，问题全在于你们自己，军队是有纪律性的。军区的问题我知道，干部中总有好的，在于你们发现。军区问题好改变，好办，哈尔滨说解放军支持保皇派，后来他们作了努力，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解放军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是军委主席嘛，不管怎么样，三结合必须实现。

511. 周恩来在首都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愤怒声讨 苏修法西斯暴行大会上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1 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

英雄的反修战士们，同学们，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

光荣的反修战士们，你们进行了英雄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现在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致以热烈的慰问！(口号：向英雄的反修战士致敬！向受伤的战友们致以亲切的慰问！)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打我们的学生，打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冲我们的大使馆，砸我们的窗和其他的东西，甚至还走上穷途末路的法西斯式的特务罪行！(苏修必须偿还血债！苏修反华决没有好下场！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这种罪行，决不表明他们掌握的真理，而这表示他们毫无道理，这决不表示他们的强大，而是表明他们的虚弱。(口号、打倒美帝！打倒苏修！苏修是美帝的头号帮凶！反帝必反修！)他们对我们文化大革命怕得要命，只能采取这种法西斯式的特务方法对我们，他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了。

苏修领导集团只是一小撮人，他们决不能代表广大的苏联人民，我们是严格区别苏修一小撮统治集团和广大的苏联人民的，是严格区别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中决定政策的一小撮人和下面普通的工作人员的。我们坚决反对苏联一小撮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我们和广大的苏联人民是友好的。(口号：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也是愿意和我们友好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终究是破坏不了的。(口号：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苏修！)我们同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生死斗争。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培育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坚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要揭示他们背叛马列主

义，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我们主张西方文件，把一切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进行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我们不要做他们的特务工作。

我们没有冲他们的大使馆，也没有必要冲他们的大使馆，我们也没有打他们的人，我们允许他们的外交人员进行正常的活动，只有当他们挑衅的时候，我们才给予必要的回击，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无产阶级的高姿态高风尚！（口号：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一切阶级斗争中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有理、有利、有节，在这场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斗争中我们是这样做的，这不表明我们的软弱，相反，正显示了我们坚定的立场，伟大的姿态，高度的自信，充足的道理，真理永远在我们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手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我们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方法，最有力揭露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一切阴谋诡计和严重挑衅，最有利于推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觉醒，最有利于中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这种斗争方法是伟大的马列主义的斗争方法，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斗争方法，我们要坚持这种斗争方法，我们要学习这种斗争方法，我们是要掌握这种斗争方法，我们要运用这种斗争方法！（口号：马列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已经走了上绝路，他们的命运已完了。

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进行到底！（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倒苏联修正主义！）口号：略。

512.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就上海夺权后名称问题上的指示

（1967年2月12日）（见《系年录》第六十五卷）

513. 傅崇碧、李震在北京卫戍司令部、公安部和首都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12日晚 北京政协礼堂）

傅崇碧：

各位同志，造反派的战友们：

你们辛苦了，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你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揪出了很多牛鬼蛇神，你们的革命精神好得很。谢副总理本打算参加会，因中央开会不能来。谢副总理向你们问好。

文化大革命已九个月了，你们作了很多事情，现在革命更加深入了，各地正在夺权，有些权夺的很好，真正夺到左派手里。有些就不好，有些单位一个晚上夺了七个部的权，光夺了印，这不算夺权。政法公社夺公安局的权二十多天了，他们作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缺点，甚至错误。根据各造反派的倡议，要解放军接管。现在中央批准了军队接管。

公安局是首都加强专政的工具，对于首都的安全，对于保卫毛主席有重要作用。很多工作要作，虽然政法公社夺了权，但没有很好行使权利。尤其有些分局，交通事故经常发生，社会秩序也很不理想。“红旗军”、“联动”等各种反动组织还在活动，有些牛、鬼、蛇、神又跑回北京来了。“红旗军”、“联动”很反动，我们卫戍区和公安部就是要搞这些家伙。他们很可恨，他们口头上“搞革命”，实际上搞反革命。他们住的地下室和蒋介石、美国兵住的差不多，纸烟盒、罐头盒到处都是，“联动”也是一样。敌人没有全消灭，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为了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命令，解放军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光靠解放军接管是不够的，主要的是依靠各左派组织的同志们协助，革命靠大家，光靠我们是不够的。

今天叫大家来和大家商量怎么搞好首都秩序，维持好社会安全，希望在座的同志们大力

支持，大力协助。

我们“革命军事管制委员会”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是心连心的，是亲密的战友。坚决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

由于我们工作生疏，可能会出现缺点、错误，欢迎大家提出意见。要求你们制止冲公安局、到公安局捣乱的现象。

首都秩序搞好，对世界上影响也很大。我们首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要像个中心的样子。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搞好。有几个问题希望大家注意：

1、左派在夺权中打架：如昨天铁道学院情报研究所等，高教部谭后兰和聂元梓的部队也干起来了。这样很不好，打内战是不好的。我们要枪口对外，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要向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的牛、鬼、蛇、神开火。我们绝不能打内战。左派要有高风格，不能打来打去，抓来抓去，你们抓的左派我们不好办，收也造反，不收也造反，弄得我们日子很不好过。我们决定以后凡是左派打架，(抓人)一律不收。你们抓的是真反革命，我们一定收。

最近好些人打着“三司”的旗号，“三司如牛毛”，好些人打你们的招牌，我和朱成昭打过交道，最近问过王大宾，他们说不知道。你们要爱护名誉，要整风。

你们要联合，我们坚决支持大联合。学生中的北航红旗、地院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等要首先大联合，工人也要联合，农民也要联合，将来就有工、农、兵、学、商的大联合，工作也主动。不会造成混乱，浪费力量。比如“八一”学校抓“联动”，一共才一百多个“联动”，一下子去了一万多人，“联动”没抓好，自己反而混战一场。互相之间不要乱打，这样一来坏人高兴。我们不要上这个当，左派要有左派的风度。

2、不要乱抓人，抓人要报告公安部，我们派人去抓，不要去很多人浪费人力，不管“联动”或其他反动组织也好。通县“机械学校”抓联络站的十多个人，我们不要，证据不足。“三司”抓来长沙的人，我们也不收。

3、不要搞“马路新闻”，各取所需，断章取义，你们当心，不要上当。左派之间不要互相攻击，互相出广播车，出大标语，出大字报，出传单。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要大出特出，油炸火烧。我们左派要创造大群[联合]的良好气氛。(补充：)最近在石景山，矿院东方红、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和政法公社发生冲突，他们指责我们偏向政法公社，我们不承认，这是左派打架。我们建议以上各单位全部撤出，我们组织专案小组调查这件事。

4、我们要协助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维持公安。其它工作还要和大家商量。

我就讲到这里，有错误大家批评。

李震：

刚才(卫戍区)傅崇碧司令员讲的很好，我们今天请各造反派的同志商量怎样搞好首都安全。

我们坚决拥护中央、国务院的命令。

首都安全很重要。除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外，还有公安机关，公安局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民警有两万多人，一个多师。有些工作解放军能代替，有些就不能代替。比如消防、交通就不能代替。这一点我们知道，彭、罗就更清楚。他们弄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搞阶级消灭论，说把北京搞成“玻璃板”，实际上“五类分子”七万人，散布阶级消灭论。他们对犯人有高级犯人和低级犯人(之分)，所谓“高级”犯人的伙食费高的 45 元，替犯人买鱼杆钓鱼，给犯人买古书、买黄色小说看，看电影让犯人坐前边，后面坐职工。他们对什么人恨？对什么人爱？他们在毛主席身边安窃听器，这是令人发指的。他们对公安工作很重视。

政法公社接管后确实作了很多工作，公安部内部斗争很复杂。他们有缺点、有错误。现在解放军接管很好。解放军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我们向解放军学习。

各机构都有军事代表，派出所也有军事代表，军管会有委员、副委员。要搞好三条：

1、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支持左派，保护左派，这是主席的一贯思想。当然你们要支持军管会。反革命怕军队，更怕群众，最怕红卫兵。轰走的五类分子到公安局报户口，我问他，谁把你赶走的。答：红卫兵。我说：那你去找红卫兵。他们胆颤心惊。

2、要建立首都的革命秩序。主要是打架的问题。过去是左派和保守派打架，你们送的人我们收，我们支持你们。现在是左派打架，很不好办，只好“和稀泥”。左派不要打内战，这样作使“亲者痛，仇者快”的，我们不能上当。对保守派也不能武斗，要文斗。

3、改造旧公安局主要靠公安局内部的左派。肃清彭、罗的影响。对民警有意见可以向军管会提出。不要私自处理民警、公安人员。军管会也可能有缺点错误，你们要同志式的提出，尽到同志的义务。

我就讲到这里。

514. 关锋谈路线斗争夺权问题 (1967年2月12日)

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一、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两条路线激烈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这些当权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是反动资产阶级混入党内的代理人，这一小撮人篡夺领导权要搞和平演变，他们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命运。不然又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革命就要失败，历史就要大倒退，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线，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经验教训，苏联搞了五十年，结果变成修正主义，毛主席以最大的决心，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保证不出修正主义，这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

举个例子来说，前北京市委就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修正主义窝子。主席指示批判吴晗，吴晗实质问题是罢官问题，但是彭真不执行，北京搞不起来。后来江青同志在上海组织起了一个班子，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但《北京日报》不转载，北京不来批判。当时全国报纸都在批判，唯独北京不搞。当时搞小册子全国都发，唯独北京不发。姚文元写了文章，主席批准了这篇文章，批判吴晗问题的实质是罢官问题，是攻击党、攻击毛主席。以后彭真把主席批语改了，彭真在二月搞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与毛主席对抗，这就说明前北京市委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与毛主席唱对台戏。陆定一在中宣部搞的是法西斯专政。他们代表资产阶级和国际上有联系。组织上招降纳叛，把坏人拉到中央。组织部有安子文，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占据了组织部、文化部、国家监委、工交很多重要部门，权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小将们从国民党报纸上翻出了他们的自首书，小将是有很大功勋的。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他们钻入党内窃居重要领导岗位，跑到我们心脏中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毛主席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把主要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另一条路线是以刘、邓为代表的反动路线，他们是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一贯唱对台戏，猖狂进攻，反对毛主席。特别是去年毛主席批转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刘、邓不仅不支持，他们还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人打成反革命，小将并没有缺点错误，是刘邓自己不革命，也不要别人革命，他们颠倒黑白，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搞资产阶级专政。就是与毛主席唱对台戏的，不是有人讲过吗？坐无产阶级的轿子不舒服，还要坐资产阶级的轿子。

刘、邓错误不是偶然的，由来已久。毛主席早就觉察。毛主席在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通知上说：“赫鲁晓夫的人物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当时大家以为是彭真，其实是指

刘少奇。这说明主席看得很高很远，早就有觉察，现在更清楚了，刘少奇就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2年刮单干风是刘少奇主张，分田到户也是他的主张，他是通过别人作报告，他是幕后指使者。如果不是毛主席掌舵，人民公社早就垮台了。农村四清问题主席起草了第一个十条，刘少奇又搞了第二个十条，那是个形“左”实右的，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后来又叫王光美在桃园搞试点，把王光美名扬全国。

林彪同志几次讲话要我们提高警惕。刘、邓在中央所做检查，按语中也指出：他们回避对毛主席的对抗。要与刘、邓划清界限，真正认识刘、邓错误路线，站稳立场。

二、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问题

主要谈谈《红旗》第三期社论。毛主席倡议要搞这篇社论。(关锋同志参加了起草)毛主席又作了修改。它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分五段，以后要对每段单独写文章，陆续发表。

第一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反抗，组织自己力量，搞假夺权。现在斗争很复杂，他们一伙人搞假夺权来欺骗群众，他们组织自己的一伙，把印一交，躲在一边玩花招、耍阴谋。假夺权，毛主席是不承认的，要真正把权夺到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人的手里。现在社会上地、富、反、坏、右都出笼了，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起搞反扑。例如光华木材厂警惕性不高，被反革命分子给烧了。两条路线斗争中反革命分子要搞破坏，应提高警惕。

第二段是讲大联合，在大联合、大团结的基础上才能搞大夺权。不联合就夺不到权。在革命队伍中，革命群众组织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被压迫时，他不起主要作用，但是夺权以后，胜利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就起主要作用了。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发表了孟繁华同志的文章。很重要。应该很好学习。《红旗》杂志有按语，要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首先要夺脑子中“私”字的权，要夺敌人的权，首先要思想革命化，没有思想革命化，夺权等于白夺。在革命组织中各种主义如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但集中到一点就是无政府主义。现在这是一种思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排斥一切……。凡是带“长”字的全要打倒，全是坏家伙。这个口号是极端反动的。十七年来，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伟大的成绩。如果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一小撮，凡是“长”字的都坏，那么我们伟大的成绩，就不可理解了。不管怎样，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内还是占统治地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就是不要领导，如他们提出：“我要如何办就如何办。”“我能做到的，我都要办。”

革命队伍互相打内战你挑我的错，我挑你的错，互相攻击，动不动就写大标语，动不动就开大喇叭宣传车上街，这也是无政府主义。我们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各学校革命左派要联合起来，否则夺不了权，要警惕有没有敌人在左派队伍中拉出去、打进来。“联动”中有高干子弟要教育，让他们悔过自新，但教育不能助长错误，对那些头头要实行专政。

第三段是干部政策，夺权夺得好的，中央承认的，全是革命干部在那儿起作用。夺的好有贵州、山西、上海，他们搞三结合，主要靠本单位革命力量。特别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社论中讲对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同志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要按这政策办事，我们对犯错误的人和干部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不是屡教不改，允许他们改正错误，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当前夺权要搞三结合，三位一体，要把夺权斗争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起来，镇压反革命，中央承认这个机构为最高权力机构，要树无产阶级的权威，搞军训的解放军要大力宣传。

北京还没有搞成临时的权力机构，北京是中央所在地，为什么搞不起来？可能是革命派受压制还不够厉害。同志们很着急，中央文革也很着急。有人问怎么办？不要紧，再等一个

时期总会有办法，大家要努力。

反革命分子出笼了，地富反坏也出来造反了，实际上他们是造无产阶级的反，造革命的反，他们出来造反是个大好事，我们来个大扫除，反革命组织要抓头头，群众是受欺骗蒙蔽的。现在谣言很多，马路新闻多，有些人把党内机密泄露出去，还有敌人造谣说毛主席说“不管什么当权派，先夺了权再说”。

三、解放军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问题

要解放军支援文化大革命，支持真正革命左派建立新的功勋，解放军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北京的大革命组织是有数的，中央文革是知道的。但有些小组组织如 9. 16 这些闹不清，解放军要主动调查，主动声明，要给我们时间去调查。要允许我们去调查，不能逼我们马上表态，你们有义务帮助我们调查。支持错了怎么办？要调查不能急于表态，先是准的问题，然后才是狠的问题。

现在打的是政治战争，革命群众有争吵的，要向他们宣传，让他们先检查自己。要解放军在政治思想上多做工作。革命群众中要多检查自己。要在革命组织中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潮，不能搞极端民主。左派之间现在还互相夺权，这种情况下要多做解释，不要互夺，要强调大联合，抓大方向。按《红旗》第三期社论办事。

最后还要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没有那么多，不然十几年怎么会有这么大地成绩呢？有人不想当干部，这个想法不对。有人讲：“可别当干部了，当了干部左派不斗你，右派斗你”，这个说法也不对。要分清两类矛盾，要调查清楚，要狠狠打击反革命。

515. 周恩来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13 日凌晨 国务院会议厅)

(注：()内为代表插话。)

周总理：你们夺权胜利啊！(还是第一步)

当然是第一步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是办事处的观点和你们一样吗？(和原造反团观点一样)

同你们的意见不一致？(矛盾很大)

没有说服他们？(他们不明真相，刚从外地串连回来。)

噢！不太清楚多少？(二十多人)

哈工大在北京就二十多个？(合在一起和上科委搞专案的就三十多人)

他们单独有个联络站，在什么地方？(北航)

北航不是原有个点吗？(在北航有两个点，前几天接管了他们的联络站。)

接管后他们上那里去了？过两天再来怎么办？(我们说服不让他们回来。)

哈工大造反团有多少人？(全校五千人，造反团就是一千多人。有的组织小组，现在大学造反团仍是少数，造反团学生参加的早，什么组织他们也不参加。)

造反团各校都有发展，独有工大没有发展，你们《新曙光》造反团要吸收这个教训，不要急于求数量，要求质量，你们叫红色造反团革命委员会，省上的叫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是这样区别？公安局革命委员会中，是局内部多，还是局外部多？(内部多)

公安厅有多少人？(三千多人)

市局有多少？(一千多人)

造反派有多少？(三千多人)

全市来说占多少？(组织上是少数，观点相同的人较多)

那就是政治上优势，组织上还是少数，运动初期这样好，如一下发展组织优势，内部问题就来了，首先碰到的是西安最多，南京一部，北京的学校，浙江一部分学生，呼喊浩特，

由政治优势走上组织上优势，内部争论就来了，你们要巩固少数，多数支持造反派参加具体工作的有多少人！（有一百多人）

那个学校多？哈工大（军工的多一些）

军工的张德诚，搞专案的，参加公安局了，夺权以后，坏人怎么处理？（抓了一些，共计一百五十多人，其它看清楚就放了。）

噢！弄清就放了，这是社会上的“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一·二七事件”“一·二五事件”内部的案子，你们监视了几个人？（老案子继续处理，主要力量搞新的。）

人怎么处理的？我是讲内部那些案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主要是政治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劳动锻炼）

这是讲一部分当权派，多数当权派还在工作，局长、副局长呢？（局长早已经没有了，）（四清后派去的副局长。）

是不是有个姓宋的，高岗的亲家，调到济南教育厅到济南去了，他的事情有人管吗？（有人，公安厅配合搞，全厅三百多人。占十分之一，同意的少数。）

现在同学中参加公安厅的有多少人？（二十多人，公安局接管的比公安厅接管的好。）

日常工作繁重，社会秩序还好呢？（工作正常，两套班子。）

交通、消防、监狱……都在工作？（都正常，刚开始时都有些啥都管，你讲话后好了）

总部联络站有多少人？（四个人）

只有四个人了，那就好，不要那么多嘛，现在有些大字报、材料也不那么完整，残缺不全，传的不那么正确，不能说解放军不支持，我给陈锡联同志打了个电话，正好“八·八”在围他，于是军区给“八·八”团表了态，做了工作，“八·八”就散了。看起来军区不是不支持，而是互相不通气，“战备军”他们那天是三白，白口罩，白手套，白布围头，看起来军区还是做了工作，表了态的，以前是互相不了解不联系。现在全国各地和解放军冲突的好多，大喇叭在街上喊，攻击解放军，这很不好，前天在三座门全军文革接待站那儿围了不少人，陈伯达同志刚劝走，第二天又来了，在那儿喊，我们最不赞成。呼和浩特、福州、广州，一直到长沙。（哈工大也有攻击解放军的）

还有开封，喇叭特别多，这是“八·八”搞来的，十月份搞科委，带来了宣传车，白纸，他们到处乱钻，你们在政治上对它们帮助还不够。

我建议你们哈尔滨造反团把主力调回来，搞全东北的。那么大的东北，矿山，煤矿，林区，石油，工业城市，还不够你们搞的？你想，“八·八”钻入大庆，搞的很乱，造反团没占优势，过去也有坏人钻入大庆，“八·八”团去煽动，后来还有“红旗军”他们钻入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注意。大庆关系很大，不能不采取军队来接管。但这是暂时的。东北的农业还没有过关，大豆还要出口，大连港口也很大，吨位最大的港口！这还不够你们锻炼的？

我看做艰苦的工作，还是到东北，伊春去，那儿是林区，东北搞不好，就没完成造反任务，我们很吹捧你们东北的，一定要造出红彤彤的天下来。当然在外边也有地位了。可以留下一两个人，都搬走也不好。东北当然也有很多大学。哈尔滨有传说：钢铁公司——鞍山，与市委很对立，钢铁学院我们也不赞成多去，闹得很对立。煤炭减产，钢铁本身还没减产，交通也有问题，机车出不了，病勤多了。农业——黑龙江农业季节晚一些，也该动手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和你们对立。你们那里学校工作比北京还落后，是不是你们照顾这些小弟弟小妹妹不够？（我们力量不够。）

都下厂下乡那怎么行。大寨每天都有四五千人，可把陈永贵同志搞苦了，光握手都握不过来。非握不可，还要签字，也没有经验。我坚守这一条。不签字。陈永贵问“主席不签字吗？”主席在天安门上，签字就几千人。要照相，跟他劳动，作报告。下工厂把你们高中组织起来。初中要开学了。（以前我们照顾中学工作不够，指导思想有错误，没有重视，怕背包袱，到我们总部造反的不少。）

北京有这个问题，八月搞的就是中学红卫兵，以后搞的太忙。我们照顾大局后对中学照顾又少了。不光责备我，也责备文革小组。

对“联动”教育不够，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可是主要责任，是他们家长的影响，“联动”去过哈尔滨没有？（没有）

你们回去专门找些女同学做中学生的工作，因为耐心，还要有政策性。教育帮助，又平等又帮助，岁数差不多，又不是一代，中学生成长也很重要，造成对立不好办。

下厂下乡一道去好些，一是教育，“联动”思想不会不传到哈尔滨的。你们干部子弟多些。北京高干子弟特别多。有些人工工作已调，儿女还在北京，我们有些缺欠，主要责任在他们自己。初中和他们谈了，他们多数支持开学。

你们要谈什么问题？（大家谈哈工大的情况，一月三十一日辩论会的情况，有人提出学习崔占成的硬骨头精神，总理摇摇头。）

崔占成的出身你们没宣布吗？（大家说：宣布了，他们承认就是捏造。）

捉崔占成时对工业交通系统造反团作宣传没有？（大家说作了一些，但很不够。）

崔占成逮捕后，工厂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工人情绪很高，斗争崔占成时工人好多人要控诉……。）

（代表念哈工大红四团“反到底”战斗队的二十二个《为什么》（(1)…工人有权吗……）

十七个委员里，有工人吗？（有三个）

只有三个，少一点，暂时性的嘛！（他们说没有工人）

那他们说假话了。（念到(4)为什么开除工交系统造反总部？）

根本不应开除嘛！（是崔占成自己宣布退出的。）（念到(6)为什么把《人民日报》社论排在第四版，自己的社论排在头版……）

什么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那天新华社电讯稿来得晚一些，并请示了戚本禹同志。……）

为什么他那么解释呢？（代表说到工人没有“八·八”团）

实际《八·八》混在其中了。工大校党委成份怎样？有老教授没有？（李昌统治工大十一年，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革委会四名工人同志都是什么态度？（和我们观点相同，我们准备以后逐步以工人代替学生）

对！本来可以扩大嘛！那也不一定要减少。增加也是可以的。人口多的城市，十七人恐怕不够。

工人本身，“新曙光”红色造反团要搞好。把底子打好。至少把刘录的错误影响肃清。崔占成不通过刘录，和工大关系不密切，工大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影响很大，学生还是革命的。工大五千人，先争取百分之二十不算多吧？同时，青年教师也要争取一部分。军工吸收“八·八”没有？（吸收一部分）

青年教师吸收没有？（原来就有）

你们自己内部问题搞了没有？（斗了）

承认错误了吗？（少数人已有认识）

是北京带去的，周涛父母是病故的，是中级干部，现在当然你们在外边有地位有名气了。上海有军工大十一个单位都签了名，因此到处设联络站分散了力量。为什么东北有些地方你们反倒没去设联络站。还要煽风点火，辽宁那么多工业城市，现在比较落后了，要跟上来，黑龙江矿山那么多，你们距离大庆那么近，十几万人地方那么大应该去，石油学院也没去。

哈军工也要进行整顿，总是由政治优势转入组织优势时各种问题都来了。团结多数不一定是组织多数。可以让他们成立另一部分革命组织，可以搞同盟。青年人要么就都一个组织，要么就分得很散，合起来没有对立面。“八·八”在时你们印了谭力夫讲话。他就揭发，后来发现他们也搞了，这样可以互相监督。运动初期一下子就肯定自己是左派，不要自封，有

贴大字报，文革小组讲了一下，街上贴了“×××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常考验，现在每天都要跟主席走。紧紧跟，紧紧学。犯了错误就改，还要紧跟。不然容易使自己失去警惕性。我是这样，你们青年人，更应该是这样。坚定的左派要经过长期锻炼的。

政治优势有个对立面好。我们不是告诉过你们。不要强行解散另一个青年组织，(不是反动组织)，我也没有这个权力。《八·八》是和红旗军有联系，自己设法解散了。不要忙于让他马上解散，我告诉军区了。给他们一讲；他们好多人都哭哭啼啼。我看军工、哈工大，如果他们不愿意和你们在一起，可以另成立一个组织，如果是革命的，可以成为同盟军，如果反对你们，敲敲警钟，不要强求让人家解散。如果进来了，不同意见也允许存在，允许提意见。进来一片歌颂声，就把你们麻痹了。

主要是和工农相结合的问题。首先，哈市造反派的声势还不够，发展不平衡。哈市工厂不少，产业工人也不少。不相称。目的不在于多，工人的积极分子，青年年老都可以吸收。第三，机关、公安局好些，省厅就差一些，机关就这样，造反劲头不够。保守的多数，因为他们是干部……一般职工(包括服务性行业)怎么样？比较好一些？(下边唱，上边好些)

文艺界？(文艺界总部不错)

郊区农村呢？(运动的情况)十七名委员有农民没有？

(有一个郊区的)

西安的组织发展的普遍些，工人、农民，他们的特点不仅政治优势，而且组织也优势。内部争论不休，见面互相打，比哈尔滨凶，北京也面临这么个形势。

工人还是要首先把自己这个组织加强，不要急于从形势上打垮对方组织为满足，要有一个坚强的核心力量。真理抓住了，即使是保守势力存在也好，有对立面，核心力量要下去，因不到百分之二十，力量太弱了。校内斗批改可以晚一点，中心问题是夺权，反夺权。可以组织批判刘录的行动。团结一批群众，巩固左派，向外发展，支持全市行动。到工厂锻炼把观望变成积极情绪。你们有困难是在外面的人多，这样很大保守力量对你们不利。军训可以搞，有一半就训练一半。其他回来再搞一次。和军区商量一下便于做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思想上提高了。加强核心。组织上锻炼一下。具体还得你们去做。我这是个建议，不要贴大字报，哪有那么多对症下药。只能做参考。不一定对，不要成为依靠。说对了当然好，说错了影响不好。(代表提出对保皇怎么办)

你们“新曙光”还是要发扬光大。他就会分化。让它存在，如果反对你们，当反面教员。如其它钻进来，不如在外面。他要钻进来也不要收。即使都是左派也还是有矛盾的。当然是内部矛盾。你们注意他们。可以下厂从下面瓦解他们。组织上建立起来，每个厂都要建立核心。不在人多。如果他们真要活动，军区要站出来说话了。和革命委员会闹对立就要走向反动。见诸于行动。只能把更多的人赶到对面。确实有活动不要怕。让他暴露。到那时军队说话，他就孤立了。军队做后盾，不要过早的使用军队。不要过早的使用法庭去抓人。回去和潘复生、汪家道说一声。希望他们都努力。这都是做参考的，不当指示，军区过早亮相没好处，让他们多暴露一些。当然太晚也不好。军工外地联络站都要撤回。(当地群众不让，军区有指示。军队院校在外地的联络站一律撤回。)

那当然不包括你们，有历史关系的留两个人就行了。根据情况，人家同意留的可以留一两个。主要是煽风点火。真正造反派起来了就撤。(下厂对口问题，有人说是轻政治，重业务。)

结合有好处，因为懂一些，不但可以抓革命而且可以促生产，不能都搞政治工作。还有半年，延长不延长还不一定。据形势可能延长。因为夺权斗争会有反复，别害怕。问题是党政干部亮相太少，你们回去帮潘复生搞一批《红旗》杂志三期社论所指的二类干部做具体工作。革命委员会是个权力机关，不能搞业务，你们要陷入业务就不能行使权力了。一定要帮助省委搞出一批来。(干部有对立情绪，谁上去就搞谁)不服气这是私字，要破私立公，功过

分明，检查两次就行了嘛！还老检查吗？干一段不成可以撤换嘛！（可以不可以到边境串连？）省革命委员会可以派人去，派确实是左派的人去，人不要太多，要懂政策，不要学小红卫兵乱冲。主席说：斗争要文明一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高风格。北京街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是“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法群众很难理解。还搞喷气式照相。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了，让外国记者搞去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八月初也没有那么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就叫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的事也拿出来了，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在政治上斗臭。（关于成立革命审判委员会问题）

现行犯可以审判。过去的案子，定性，判刑，开除党籍要到后期搞。

农村一斗就斗党支部书记，有错误就开除党籍，初期容易扩大，后期处理就慎重了，主席多次提出要教育农民。有错误就开除党籍，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典型先搞几个。三结合，领导群众审判。有两个好处，一个是立场鲜明，一个是传播快，杀一儆百，比机关判案好。群众判案总有个主管的，你们建议法院、检察、公安三位一体，一元化是应该的。三派鼎立是不对的。过去法院专学判案，是资产阶级残余法权，专政机关和群众结合是主席的一贯思想，民主集中，但死刑要上报。（烧档案问题）

最近要起草一个文件，任何党的处分，只能由党组织决定。

516. 戚本禹给聂元梓、蒯大富的电话记录 (1967年2月13日)

聂、蒯同志：

关于北京造反公社情况我不了解，他们的代表们曾找过我，因为抽不出时间，一直未能见到。我曾表示过，希望北京革命组织，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搞大联合，不要搞小团体主义。所传我们对造反公社的批评，如果指的这个意思，是有的。但是，这不是批评，而是一种愿望。另外，大联合组织，是否用北京公社的名义，希望你们商量一下。

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戚本禹

1967年2月13日

517. 戚本禹接见红代会筹备人员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13日)

按：接见时谢副总理亦在座。

戚本禹谈到红代会宣言时说：不要写以三司为核心，三司的战斗力很强，一司、二司联络站也做了不少工作，宣言上不要提以三司为核心，提不提都是核心，要求实，不要求名，一司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在谈到关于夺权问题时说：只提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不要提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手中夺权，这样提面太广。夺权的首要问题是毛泽东思想，要三结合，具体就是跟老干部结合的问题。对老干部要阶级分析，夺权好的单位都是有老干部参加，《红旗》三期社论有关老干部一段是毛主席写的，老干部有比较好的，象丁国钰、吴德、刘建勋、李清泉、高扬文是比较好的。路线错误往往会有大批干部犯错误，这点要谅解。

谈到当前形势时说：破坏大联合，破坏三结合，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新反扑。有些人变成极左派，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最后打倒自己，刘福元走向反面了，他是政法兵团

造反出去的。炮轰谢副总理。(谢副总理：可以轰，我还是要和他合作的。)

谈到斗争方式时说：现在不能打、抢、砸，要提倡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不要砸烂狗头、猪头，大街上的标语要有重点，分清主次。关于左派组织打架问题，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蒯大富打托派是错误的，不能往解放军脸上抹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这是犯罪行为，有人骂解放军是保皇军，是黄狗，这是国民党的口号。夺权没有解放军是不行的。你们互相打，没有一点自我检查，这是不好的，我很不高兴。互相打，敌人高兴，刘邓高兴，现在清华园等几个大据点发现了十七年来没有见过的传单。

最后谈到大联合问题时说：大学生要真正大联合起来再到工农中去，工人阶级要支持学生大联合，中央文革是支持学生大联合的。大多数党团员是好的，他们开始保，后来就怀疑就造反，这是合乎逻辑的。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高干子弟大多数是好的，要团结起来。

戚本禹谈了一下揪市委书记的问题，他说：揪市委书记要通过谢副总理。

谈到关于有人攻击聂元梓、蒯大富同志时说：中央还要树立少数派的威信。

518. 陈毅在接见外事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部分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14日)

陈毅副总理二月十四日晚十时半至十一时半在人大小礼堂接见了外事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部分组织的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当陈毅副总理谈到大联合、大夺权时，说：“外事系统各革命造反派如何联合好，把权夺好，这是当前总形势中的一个中心任务。如果联合得好，这个权就会夺得好。大联合，目前据我了解在北京、上海都是这样，各革命左派的分裂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看到报上介绍上海、黑龙江、山西、青岛、贵州等地的经验，过几天还会有新的。这些经验都是经过争论，通过内部斗争，形成大联合，有很高的水平，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审查，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可以告诉你们，除报上公布之外还有几个经验没公布，不成熟。”

“去年下半年，六、七、八、九、十、十一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发展到夺权阶段，工作组撤了后，还有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那时左派受镇压，虽然左派内部有分歧，但不大，没这么严重，左派是团结的。现在面临夺权了，有的夺了，有的还没夺，有的夺得不好。过去风雨同舟的同志发生了争吵。现在分裂，这不利夺权，不利于把权掌好，不利于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北京市发生了一个问题，现在监督者想把权扩大。比如……口理人事问题，罢官撤职，派大使，开除党员。对外权，外交部和外办只能搞监督权，不能包办代替业务，不能超过边缘。同志们要克服私心杂念。这个问题解决了，革命就前进一步。这个问题不解决，老顶牛；革命不能前进。这跟以前解决了工作组问题，革命就前进了，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决了少数多数的问题，革命就前进了，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决了少数多数的问题，革命就前进了一步(一样)。《红旗》第三期社论字里行间露出毛主席的手笔……”

当陈毅副总理谈到监督问题时说：“什么人去监督，历史怎么样，有没有经革命考验，需要调查清楚。不能什么人都来监督。搞一个制度，创造出经验，现在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当陈毅副总理谈到外事系统如何夺权时，说：“其他单位，你们也可以去了解访问。如文委是监督或是夺权，外文局怎么搞，经委怎么办？对外经委机密性很大，仅次于外交部，不能全面夺权，有的过一个时期，经验不成熟还可能取消监督权。这个问题正在研究。文化大革命现在进入一个很科学的细致的阶段。”

陈总最后说：“请大家对夺权问题好好研究。外事系统的权，不仅是个泄密问题，是关系到国家还能不能维持，外交斗争还能不能搞，这个问题，搞得不好，关系到国家的声誉，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你们必须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519. 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联系人的讲话 (1967年2月14日)

(在谈到胡耀邦定性问题时)

李富春插话：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定性吧！

(在谈到革命造反军团整风问题时)

李：形成个内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制度，你们是从群众中来，不怕批评，不怕犯错误。工作中犯点错误，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李富春同志最后指示说：

你们搞得还不错，胡耀邦的问题要彻底批判，胡耀邦不仅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十几年来，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刘邓路线的。包括青年出版刊物，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将来要系统批判。要找些文字材料，才能有理有据，如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胡耀邦的讲话报告。

共青团的前途中央没有定，一个方案是红卫兵代替共青团，一个方案是红卫兵加入共青团，青年团不只是学生，工人有青年团，农民有青年团，解放军里有青年团。他们不一定建立红卫兵，中央还没有下决心。看工厂运动的发展，看农村运动的发展，看解放军运动的发展。青年包括各方面，不只是学生。解放军根本没有红卫兵，这个问题没有定。现在不是斗、批、走，而是斗批改。你们可以向中央提出改的意见。红卫兵也好，青年团也好，不管怎样改，都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就要彻底批判胡耀邦。你们要发动中层干部，这不是一个发动，还要深入。不破不立，不彻底批判就不能立起来。下次开会不是开四中全会，四中全会不合时宜了。恐怕要开全国代表大会，把斗、批、改搞好再开。很多中央委员出了问题。查一查团中央委员有多少出问题了。要重新选举，重新开十大。或者开十大，或者开红卫兵代表大会。这样还要下去了解情况，要到团省、市委看看团的运动情况怎么样？团干部怎么样？要了解点情况，收集点问题。为了斗批改，特别是为了改。过去得依靠临时书记处，没有办法，现在要依靠你们军团了。在斗批改中，干部要区别对待。根据《红旗》第二期社论办事，在大方向革命的前提下讲党的政策和策略。你们已经注意了干部政策，是很好的，要区别对待，要文斗不要武斗。摆事实讲道理批判，系统提出改的意见。准备三个月到四个月，可能还不止，到今年暑假。三结合，一般应该，三结合，根据青年团的情况看，夺权领导班子三结合比较困难，业务班子可以三结合，你们进行监督，这样既能掌握领导权，又能在业务上使用一批领导干部。这样减少中层干部和我们的对立情绪。前书记处有些人，在你们监督下也可以作工作，可以搞监督小组。

黑材料处理问题，还是按照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规定来处理。党籍问题后期处理。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我同意。你们现在既能整风听取意见，又能注意政策，对你们是很大的进步。关于大联合问题，直属单位成立革命造反联络总部，两个办法，一个是以团中央军团为核心来联合直属单位，进行大联合，他们有问题，可以向你们请示处理；另一种办法，以你们军团为核心，直属单位派代表参加，有事同大家商量处理，组成常务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和直属单位商量一下搞总部代表会议，大事共商量，小事由代表会议处理。两种方法都可以，你们军团为核心，不把直属单位联合起来是不行的，你们要起这个核心作用。一个团中央机关不够，把大家联合起来，把你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一下。真正进行大联合，以造反军为核心。各搞各的，搞久了就搞不好了，小山头主义就出来了。中直机关造反总部可以加入，应该加入。是否成立中南海公社值得研究，公社的名字值得考虑。农业合作化搞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这样搞北京市也是公社，中国共产党是否要搞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也搞人民公社？大联合要，不必采取公社的名义。

对下级各地团委，第一是他们是造反派你们要支持，要了解情况，不要糊涂支持；第二，

团的工作应该继续进行，改组团中央书记处，并不等于取消团组织，这是两码事；机关、学校发生严重问题，要解散团支部，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们也不批，现在有的地方党支部解散了；第四，团的工作如何进行，要请示地方党委；第五，可以介绍团中央造反经验，给他们二胡的材料；第六，希望你们揭发团中央前书记处的错误。

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来，我有时间就见面，没有时间就留下意见。

520. 王力对北大、北师大、人大 50 名学生 (聘请为《红旗》杂志通讯员)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4 日晚)

王力：你们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形势？

学生：大联合、大夺权。

王力：你们是经过挑选的，至于同学们拥护到什么程度，拥护多久，还要看一看，在斗争中考验你们，左派组织不是没有变化的。左派组织的核心也不是没有变化的，不能光看招牌。有些招牌是不错的。从去年六月、七月、八月，甚至到了十二月份，不少的左派组织都是不错的。但在今年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变化很大，很剧烈。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很重要。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各省市的文化大革命可能看出一个眉目，比如说，目前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是不是看出一个眉目？我们希望再斗争三两个月看出一个眉目，但北京现在还看不出一个眉目来。这个夺权斗争有很重要的问题，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没有这样一个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行的。这个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可以让群众创造，但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三结合，这关系到……。

北京是不是真夺权！房子占了，大印拿了，但革命、生产这两付担子担起来没有？三结合，一个是真正无产阶级代表，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产生。另一个当地驻军人民解放军的代表，这个比较容易产生。第三个方面是真正的代表性的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他们行不行呢？不知同志们是不是想过，学生、红卫兵，是不是有他们的局限性？光工人也不行，他长期的在一个工厂，做一种工作，但他对北京的生产和革命……。所以他也有局限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大批优秀人物，将来国家的命运是要交给他们的，都要靠他们，整个国家交给他们还要有个过程，在目前叫蒯大富、聂元梓当北京市市长行不行？要有工业生产、农业的经验，特别要有打仗的经验。在当前，叫带“长”字的都靠边站不行，对于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路线去做。毛主席的这条路线和王明路线是对立的。王明对犯错误的干部是打倒、推倒，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同志们要注意《红旗》第三期社论的一句话：“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因此，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无政府主义。”主席今天说：“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三结合解决不了，就是不能夺权，夺了权是骗人的，有一个人去中宣部夺权，我们叫他退出去了。中宣部的权不能由外边的人随便接管，老早叫中央文革掌握了，剩下一个机关的权，中宣部的群众就是进行文化大革命，你去是夺人家文化大革命的权，那怎么好！（众笑）

有的权夺来夺去，倒没有真正的夺权，有的夺了，并不能很好的巩固，带“长”字的都叫靠边站。有一个单位（是中央的）都是年轻人，一个带“长”字的都没有，不能夺权。现在流传着对司局长稍微靠近一点就叫“保”字派的说法，不从阶级分析的观点出发，而从那一级出发，这样搞下去，我们要失败。所以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就要受挫折，就不能继续前进。

同志们！你们要接受点教训，有的同志在杭州、长沙、青岛、济南等地犯了错误，许多错误都是出在这里，凡是有一个干部参加夺权，就是保字派的，而不去识别这个干部是站在

毛主席路线这一边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实说，这些同学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的，反对革命的。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和关锋同志支持过他们，但在夺权的关键时刻，他犯了错误。我开始讲，不要光看招牌，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是个革命组织，所以我们支持过他。但是它在夺权的关键时刻变了。随着这个组织的改变和扩大，各式各样的人加入了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就有左中右，可是我们不少人认为加入这个左派组织就是左派了。那有那么多的左派！看不到变化是不对的，对于我们有阶级感情的人我们是想保的，比如对蒯大富，我们还是想保他。但我们对他的错误还是要批评的。在他闹风头主义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还是想看看再说。

对于军队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态度。相信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这支军队在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领导下，是一支坚强的人民的军队。军队支持地方可能支持错了，但斗争的锋芒千万不能指向军队，军队中个别人是有错误的，但如果因军队个别人的错误而把矛头指向军队，我们就要犯错误，就要上当。一定要想到有敌人，没有军队就没有一切。对军队中个别的坏人和军队要分开。一定要看到敌人，警惕敌人。听说福建要把斗争指向军队的韩先楚，这个不对头，要分析。韩是最早反对省委的，这些且不说，福建是前线，台湾在对面，为什么全忘了敌人？在这个时候，同志们很热心，你轰我，我轰你。把陶铸轰了之后，所有的副总理都要轰，甚至连文革小组也要轰，但是就没有发觉有敌人。究竟什么人在搞这个鬼，被打倒的当权派、四类分子在搞什么鬼？内战打的很起劲，就是看不见敌人。打内战我们并不怕，打来打去有好处，暴露了敌人，教育了自己。我们过去忙于“救火”，主席批我们，你们管这些干什么？叫他把房子烧了，窗子砸了，死了人，没有什么了不起。

同志们！你们下去要调查，要有阶级分析的观点，千万不要掉进里面去，同志们要站的高一些。

夺权的问题，报上原来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一句，主席指示后半句不要了。

各地夺权后的组织叫什么名称，我们还在研究，当然由群众创造，以后新的省(指夺权)一个一个经过中央研究批准再登报，登地方报纸。

中央考虑，各省市包括各个部、工厂、学校不叫人民公社。学校叫什么？十六条已经说了，工厂可叫革命委员会。临时夺权机构可以叫各式各样的名字。问题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在于哪个阶级掌权，我们革命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搞那么多花样，巴黎公社发生在九十六年之前，公社失败了，如果成功了，是不是能保持到现在？

521. 周恩来接见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谈夺权 (1967年2月15日)

主要靠你们回去商量，提点个人看法。你们提了五个办法，抓的是少数，罢的是少数，多数调、留、提。调的是有些错误，不能继续领导，调离领导岗位。留的是执行者，错误不大的。提的是少数。罢、留、提区别对待，主席对此很欣赏。主席看的前一个稿子，你们的文件二十七号送给我，我二十八号送给主席一份，他马上看了，他告诉我，你们区别对待是合乎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精神的，不要把所有的干部一棍子打死，不要把他们看得铁板一块。也有好的，不能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除了两面派、阴谋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对犯错误的干部，得允许改正错误，对他们区别对待，这一点主席很欣赏，当时林副主席也在场，也同意，这是我转达的第一点。

第二点，现在写上提出人民公社，巴黎公社，在我们中国就是人民公社，是否早了一点。巴黎公社精神，主要是直接选举，工农兵学商党政人民团体，达到95%以上的群众选举。现在还是革命造反派夺权。革命造反派在政治上是优势，但人数不超过半数，又不能等到人数

过半数时再夺权，因为来不及了。我看几个地方都是这样，政治上是优势，人数上不是多数。但因为中央有号召，条件成熟，客观形势已成，变成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连锁反应很快，左派不夺权，右派就夺权，保守派就夺权了。当然夺权会有反复，如果是右派，保守派夺了权的，我们还要反击他，我们还要夺回来。右派、保守派夺走了的，查清楚了，我们解放军要帮助夺回来，要抓他们的头子。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再解释一下，右派夺权的，经过一段看清楚后，还要夺回来。左派夺权后人数就会逐渐增多。浙江一下子夺了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党校，一下子左派占了百分之七、八十。我觉得值得注意。我问他们对省委如何看法，他说有两派斗争，举了十多个人，只有一两个算左派。这些人你们不知道，我们中央几个人知道。革命造反派一开始，政治上占优势，因为中央支持，数量上不一定占多数。夺权后，多数是要来的。要来，看怎么个来法，看你们怎么对待，不要猛扩大，要逐渐扩大。猛了容易把中间的、保守的吸收进来了，这样权容易被夺过去。这得有个相当时期的工作，现在不管叫什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夺权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的。领导权要掌握在坚定的左派手里，得经过一个时期，一段工作，真正成多数了，才能用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公社。现在还是左派夺权，左派掌权，好像掌权，好像四九年的军事管制一样。那次是军队打江山，这次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自下而上群众性的夺权。对原有的领导干部，要区别对待，对原党政领导，要加分化，总会找出几个人来的。

522. 谢富治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红代会的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2月15日 人大会堂南会议厅)

谢副总理一一点名后，说：好几天没见面了，向大家问好！今天来座谈座谈，有几件事要和同志们商量。北京市的大联合，一直在大联合，如何真正夺权？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在中央文革的领导下，将大联合大夺权搞好。现在已经从城市到农村，从工厂到农村、机关、学校都到夺权阶段。有的夺得好，有的只夺了一个印。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表面上已经打倒，实际上还没有打倒。有人很急，一下什么都搞好，我们采取不急的政策，慢慢地商量、协商、讨论。

今天第一件事要和同志们商量北京市三结合问题。北京市的夺权和其它各省市不一样，北京市已经夺了一次权。夺了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赵凡、陈克寒等的权，是在毛主席指导下夺的。李雪峰、吴德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与各省市不一样，各省市是第一次。今后如何提法，应好好商量。派到北京市的干部，也犯了些错误，商量一下，究竟那些干部可以参加三结合。看看怎么三结合法，看看那些人可以那些人不可以！

北京市反革命修正主义老底没有很好地挖，挖得不够。

有人问一、二、三司合并的情况：听说三司一部分人有意见。

谢副总理：第一，应尊重人家的意见，三司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贡献，要做好三司的工作，不能大单位压小单位。第二，红代会应该有清华。希望你们联合要成功，要联合好，我还要发言。全国性的组织在北京一概取消，这些是几个人凑起来的，没有代表性。你们要帮助中央一下，取消它，与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联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撤销在京联络站和各地联络站。他们在过去起过促进革命和造反的作用，现在各地都造了反，不需要了。甚至有的人观点变了，不能代表原单位了。北京在外地不要设联络站，外地在北京也不要设联络站。

三司是否要保留，你们自己处理，我不能包办。以后不要什么司令部了，可不要那么一套官僚机构，要改成行政组织。

怎么合？是按工农商学兵好一些，还是按工厂、学校……，按行业联合队伍严明些。

关于工人组织的问题，第一，停止发展，整顿内部，将久经考验的造反派提到领导岗位

上来，不要在一个工厂中分几派，将来合并。这样保守派无孔可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不让敌人有孔可钻，都站在毛主席一边，从大方向出发。不要为了扩充力量，什么人都要，要加强做基层工作。

三个工人总部(指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一机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如果有不纯，可以帮助清理整顿、整风，但决不能把三个总部搞垮，应当充实它、加强它、巩固它。总部也好，总站也好，都不要听下面的片面话就调人去砸。

这些问题你们回去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

北京不一定用“公社”这个名字。现在农村有公社、还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个公社。现在北京搞的倾向革命委员会。上面有人焦急，下面有些人焦急，是好心，但是准备工作要做到家，否则心不齐。现在要搞三结合权力机构。

大联合你们回去解决，大方向要联合，不要小联合。

全国性组织要解散，你们要做工作。

赶回去的地富反坏右，大部分是对的，一部分不对，现在回来不少，还要造反带砸。现在制定政策，首都治安要你们做工作。

傅崇碧司令员：有人拦车、绑架，这是犯法的，你们要帮助。要支持公安局的工作。北京是毛主席的所在地，是世界人民的中心，许多人在注意。“马路新闻”不要搞，不要太感兴趣。要学习报纸，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政策报纸上都有。

523. 周恩来第二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讲话纪要 (1967年2月16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二十二时二十五分至十七日一点四十五分。

地点：人大会堂。

接见人：总理、萧华、曾山同志。

被接见人：内蒙四方面代表 25 名，刘华香列席。

总理一开始询问了高锦明同志和王逸伦的情况，接着问军区文工团红色造反团的代表张淑琴同志。

总理：你是红色造反团的？

张淑琴：我们的代表是王建平(军区文工团员)，他们在监狱里，到现在死活都不知道，这群匪徒……

总理：不要这样说嘛！你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工团还有和你们对立的组织吗？

张淑琴：有。

总理：叫什么名字？

张淑琴：叫“尽朝晖”战斗队。

总理：什么“尽朝晖”？

张淑琴：芙蓉国里尽朝晖，主席诗词里的一句。(萧华同志念了一遍)

总理：啊！明白了，芙蓉国里尽朝晖。

张淑琴：还有叫“争朝夕”战斗队的。

总理：能叫“争朝夕”，不能叫“尽朝晖”战斗队，这有动词形容词的关系。你知道芙蓉国在什么地方吗？

张淑琴：在湖南。

总理：还是知识分子知道的多。“尽朝晖”有多少人？

张淑琴：20 多人，他们参加了军区联合行动总部，叫联动。

总理：你没有看看它是不是有联动的思想。

张淑琴：我们叫它联动，除军区 3% 的少数派以外，都参加了“联动”。这个组织的行动纲领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也就是对付三司。还有几句口号是：服从指挥，绝对保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

总理：这都是解放军的口号。

张淑琴：我们二十多人都被打过，有的已经被打死。他们用针扎，用脚踢，我被打成脑震荡。

总理：其它被捕的多少人？

张淑琴：现在下落不明的九人。据同情我们的人透露，这些人在里面被打的遍体鳞伤。

总理：清华“井冈山”的宁魁喜来了没有？

宁魁喜(北京清华井冈山驻呼联络站)：我来了。

总理：你就是宁左吗？你什么时候去的呼市。

宁魁喜：九月去过，到包头钢铁学校看了看，半个多月就回来了，一月十八日去的呼市。

总理：你们在哪里有个联络站？

宁魁喜：有一个联络站。

总理：多少人？

宁魁喜：开始 11 人，军区给我们造了不少谣，后来又去了 20 多人，现在有 40 多人。

总理：还有别的学校吗？

宁魁喜：还有清华附中的。

总理：(翻了翻面前放的内蒙古日报问三司代表)你们十日、十一日的内蒙古日报还有没有？

郝广德：邮局让他们夺了权，邮不出来。

总理：报纸我们扣了(手里拿着师院东纵出版的小报“东方红”)，我今天就要和你们谈谈这个问题，你们公开在报纸上点解放军。你们完全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

郝广德：我们骂的只是一小撮。

总理：这样也不行，主席和林副主席看了以后很不安。你们的脑子有点热了，你们想到没有，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你们能实行大民主吗？我知道你们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你们在给人民解放军脸上抹黑呀！(总理站起来，很激动)我今天是抑制着感情说这些话的，你们当中不少是左派，现在我还承认你们是左派，但是这件事你们错了，就是死了人也不能这样做呀！我们不知有多少人民解放军英勇地牺牲了，我们这样做了吗？他们可以忍受各种委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打伤了就说一句话：同学们啊，你们打错了，你们打了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保卫中南海就是这样，北京的卫戍部队，一句话没说。尽管红卫兵错了，我们也不说我们的红卫兵，更没有登过报。我们不能骂他们，不能说他们，要保护无产阶级的荣誉，近来到处出现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昆明冲过军区大院，进驻了军区大院内，使我们军区很难堪，杭州也是这样。大概，正是这样，你们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冲。现在冲军事机关成了风，这怎么能行呢？长沙冲了，贵州贵阳要缴解放军的械。我们说有坏人指挥，长沙不仅冲了，而且占了军区大楼，最后我们下令抓头子。是“红旗军”和“湘江风雷”合起来搞的。广州、南京是军事院校文工团冲的，沈阳也是这样，肖主任去解决的。不久又扩大了，他们要捉我们几十年转战南北的陈锡联同志，还抄了家。北京冲中南海，冲三座门，不仅抄了肖主任的家，还要找徐向前同志出来辩论。一直搞了五、六天，那怎么能行呢？这是我们绝不答应的。这样做，就是对解放军不信任。如果有一小撮坏人，可以报军委嘛，我和首都三司也讲过。

就没有想一想，我们这样搞大民主，只有毛主席才能下这样的决心。我就没有敢这样想过，也可能你们是先知先觉，我反正是后知后觉。过去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席卷全国，解放全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夺权斗争是个长期的斗争，主席说这是长期的问题。从 49 年以来，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三反五反的斗争，包括清匪反霸，57 年反右斗

争，62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矛盾、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63年出来的前十条。这次是有领导地自下而上的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次夺权靠什么？靠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靠社会主义道路，靠16条。没有这个前提，革命组织怎么成立呢？怎么斗争，怎么夺权呀！我去年九月给首都三司讲过，九月我们强调路线斗争，三个月后强调夺权斗争。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力量，还有物质力量，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解放军，无产阶级专政靠谁来保卫，有个“岿然不动”战斗队，没有解放军能岿然不动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为什么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呀？我们为什么能进行文化大革命呀，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伟大领袖，有人民群众，有人民解放军。当然，解放军的某一个人有错误，但不能给我们的解放军安上。八月初主席表扬过的清华附中那三位同学现在怎么样呀，(宁左：成了联动)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够，我们应该帮助。你说蒯大富没有错误？聂元梓没有错误？要帮助嘛！红卫兵的领导成了联动，我们很痛心，我们是有责任的。他们有过功劳，我有时间还想找这三个同学谈谈。主席看得远，抓住了红卫兵这个新事物，8月18日接见，我们饮水思源，还不是清华附中带动起来的吗？他们首先冲向社会，震动全北京城，我们感到措手不及，这是历史的发展嘛！那时打人的、抄家的、剃阴阳头的也有，但那是初期。国庆以后，我们重视大学，中学就抓得少了，就出现了些问题。组织纠察队违法乱纪，我们也有责任。谭力夫的讲话，不但保守派受影响，对造反派也有影响。是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的一个战斗队，首先大量印的谭力夫的讲话。陈伯达同志的那篇讲话后，才开始纠正。这个问题还要很快地作工作。现在联动发展到全国，不能光靠公安部门抓，另一方面坏人来钻空子，所以才有红旗军，战备军等。群众是好的，这是内部问题，我们绝不在报上登，即使登也只登头子，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什么叫革命组织？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服从16条。谁要遵守这些就是革命组织。除非后期死保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才说他们的方向错了，比如：北京的红旗军，哈尔滨的“八·八”团，我们把头子找来谈，指出：如果再前进一步就反动了，他们都哭了，回到哈军工第二天就解散了。现在，左派从政治上的优势已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你们双方都在争取群众，将来要由你们的行动证明的。解放军出来支持关系很大。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了五条，解放军一出来，左派就从政治上的优势变成组织上的优势，象西安交大造反派占98%，西安工大占80%，左派组织内部也包含着左、中、右，这就需要正[整]风，否则就容易被坏人利用。内部没有反对派是不行的，国民党宣传他们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毛主席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党外就是有党嘛，党内就是有派嘛！红卫兵做了我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老大难”的问题，红卫兵一下子就解决了，比如资本家的定息，今年就没有了，水到渠成嘛。可是有些事红卫兵认为一封就行了，那怎么行呢？比如民主党派、政协，实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就有资产阶级政党，让他们公开存在比转入地下活动好。党外无党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对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超过了斯大林，这是肯定的。斯大林后期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所以我们说他三七开。青年同志们很单纯，比如，砸烂×××的狗头，他又不是狗，你能砸烂他吗？还让“喷气式”的照片上了报，让外国人看到，很不好，你们无产阶级气魄不足，(萧华同志插话：现在不但有砸狗头的，还有砸猪头的。)这表明，斗争水平没有提高。我们很不安。拉萨、新疆甚至提到，叫解放军滚走，叫解放军掉转枪口。这说轻一点，是天真，重一点是走入歧途。韩桐同志牺牲了，我们派曾山同志去，电报写的很明白，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如果解放军有错误，你们可以提出来，中央可以解决。我们是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一旦敌人来了，首先冲锋陷阵的还是我们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我和解放军谈话几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和红卫兵则要好几个小时。青年人不能怪他们，让他们学习学习，只要你们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什么问题都会解决的，不能因为牺牲了一个同学，一些同学被捕，你们就这个样子。事情闹成这样子，双方都有责任。现在你们把问题激化起来，这样怎么能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文化大革命呀？怎样备

战备荒？这样无法夺权，三缺一嘛！

郝广德：因为他们围攻。

总理：你们那些围攻都对吗？北京围攻，你们三司开始也支持过(对清华)。西安砸了光学仪器厂，这里边主要有坏人。工人、学生我不相信会去砸，这些军事工厂不能让外面的人去串连，现在出现的现象已经超过十六条所许可的范围。军区有军区的责任，两方面的群众组织要好好想想。总之，没有毛主席的领导，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我们能这样吗？那样帝修反都会动起来。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才敢下这样的决心。今天任何人都不准动摇我们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誉。当然，军队中也可能有坏人，但我们应该相信党和毛主席能够自上而下解决的，不要直接采取行动。尽管你们有千条万条道理，中央给你们的这份电报(指国务院、军委召集内蒙各方面代表赴京的电报)是内部的，你们把它登在报上，这样一登，拿出国外一散发，外蒙古马上就有了。我看了这个以后，很后悔，说老实话，后面的一段是我加的。当然是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本来能够电话通知，主要想把你们尽快叫来。不料，你们给登了报，同学们，你们年轻，就这样不爱护我们解放军吗？这个问题我负责到底。你们登报这件事，我们是很不安的。我们已电话告诉军区，他们已停止宣传，地方还没停。

宁魁喜：他们也没有停止。

董玉华(三司)：今天下午三点，他们还在宣传，有 30 多辆军队宣传车，以给报社报喜为名，从新城游行到师院。当时师院同学说“欢迎解放军”，他们还宣传三司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我们韩桐同志的灵堂，我们已不接待人了。韩桐同志的家属，曾山同志验尸以后，我们派人送了回去，但遭到军区的围攻和软禁。

张三林(红卫军)：周总理，我们根据您的指示，再没有搞宣传。可是他们，在呼市大量印发传单，还搞了假录音，15 日他们召开了二万人的大会，宣布了伪造的中央三项决定(说完将近几天收集到的三司方面的传单交给了总理。)

宁魁喜：这两天他们继续夺权，夺权都是拳打脚踢。军事院校的学生，红卫军见了就打，他们专打戴眼镜的。

郝广德：保守派在军区配合下，夺了邮电局的权。

张三林：说我们昨天游行示威，这是污蔑。

陈基隆(红卫军)：你们的袖章原来是大专院校革命造反司令部，现在改成了革命造反司令部了。机关干部红卫兵属于你们观点的，戴的革命造反司令部袖章，我们单位属于你们观点的，挂的牌子就是三司令部东风红卫兵总部，属于三司令部指挥。

张启生(无产者)：这些传单都不利于我们的，请总理考虑。

陈永华(三司)：军区把我们(工学院井冈山)两名战士给逮捕了。

总理：他们叫什么名字？

陈永华：叫梁志超，任福喜。2月 4 日在军区门口逮捕的。

总理：都是你们派去的？

郝广德：有串连的，有派去的。

总理：可能你们联系时人家已经去了。

郝广德：不清楚。

总理：你当时在场吗？

陈永华：我当时参加静坐。

总理：这两个人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陈永华：还没有，我 15 号打电话，说还没有出来。

总理：师院还有没有？

郝广德：现在有没有弄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查证。三司在各盟市的联络站失踪了不少人。

总理：有几个人？

郝广德：正在查。

总理：你们三司在各盟市有多少人？

郝广德：不清楚。

总理：外地到呼市串连的人怎么样？

宁魁喜：截至 15 日 11 点，清华井冈山有三个人还没有下落，军事院校的一个人也没有放出来。

军区代表：昨天有 30 多人，军区给买好火车票，用汽车送往车站，一下汽车，全跑了。

张淑琴：今天二医大回来 11 人，打得太厉害，住了三〇二医院。有一个吊起来打，把手脸给打坏了。

宁魁喜：我们现在打电话不灵。

总理：现在正在夺权，不要说你，我这个总理说了也没算啰。

张淑琴：三军院校也要派代表来。

总理：我派人去调查，不能都来，(总理问三司方面)工人方面，以及别的组织和你们有联系的有那些？

郝广德：有工人的、农民的、职工的，共有八个组织。

总理：能不能叫他们一个组织来一个代表？

郝广德：他们强烈要求来。三军院校也要求来，(写了一个单子给总理)。

总理：联络员同志通知，让他们八个组织各来一名代表。

姜文启(军区)：我们来京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要解决，得找一找根本问题。内蒙地区现在究竟执行的是毛主席的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如果现在问区党委执行什么路线，对方也会提出军区执行什么路线。

姜文启：主要看看事态为什么形成的？

总理：你好象抓住了要害！好象我抓不住似的。如果象你那样，问题怎样解决？这不是用大帽子压我吗？得把事态先平息下来才行。你的意思无非是说后头有人指挥，指挥的就是区党委。你胆子小，我替你说，应该先把事态平息下来，以后再考虑下一步的问题。

曹文生：总理十日接见我们以后，指示不要把事态扩大。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的指示。我们发现有一张传单是我们下面财贸系统发的，我们马上进行了制止(说着将此传单交给总理)，但三司却变本加厉，造谣生事，他们来了二百多人，他们打着来京告状的旗号，来到北京以后，他们把我们的联络站封闭了，抢走了东西。我们建议在北京的人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总理：我劝你们首先不要对骂。联络员，你负责以我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方面，从十八号零点起停止对骂，宣传车、传单都停止，一切报纸都暂停几天，登中央消息，不然越骂越激动。这个问题要求你们负责。因为内蒙问题影响很大，不能搞亲痛仇快的事情。要停止互打，抓的人要放。如果 18 号再发生互打，我要查肇事者。双方暂时不要开游行示威大会，你们应该给我一个礼拜的功夫，从下礼拜起我们几个人分头做工作。内蒙报属于哪一派？

张三林：我们。

总理：你们可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不要登载攻击性的文章。

郝广德：他们军区尽搞武装游行和武装巡逻。

总理：要停止市内武装游行。

张三林：还有八大员，河西公司二十多个人，据说被“八一八”抓走了，还有六个人受伤的住了 253 医院。

郝广德：据说？应该实事求是。

总理：有可能。

张三林：另外，我们这里，有十七个人是三司伙同区党委批准签名以后抓起来的。

郭以青：没这回事。

徐成陶：看看这是什么(当即站起来，举起由高锦明、李质、孟琦签字的拘留证)。

总理：拿来我看看。(徐把拘留证送给总理)

张三林：这 17 个人现在在北京，要求在总理面前控诉。

总理：可以考虑来两三名代表。

郝广德：我们要求军区不要用汽车拉农民到城市来，影响备耕生产。军区控制了粮库油库，以后每天只供给我们 600 斤粮食，对我们吃粮食都加以限制，还夺了火葬场的权，控制了血库。还有抗大是个反革命组织，提出了二十二项中央文革，总理看怎么处理。

徐万陶：抗大的问题，内蒙党委已作了调查，抗大同学早就要求公布调查结果，但是内蒙党委至今不公布，内蒙党委必须回答。

高锦明：因为他们想利用这个调查材料攻击三司，所以我们没有公布。

郭以青：而且这个调查组是由他们观点的一个人调查的，调查以后给他们的人看了。

徐万陶：郭以青刚才说是他们的人调查的，那你们为什么不早提出，你们为什么不找“公正”的人去调查？12·12 事件(提出抗大是反革命组织)发生了这么长时间了，你们为什么至今才提出？调查结果不算数？

总理：有材料吗？(徐万陶：内蒙党委有。)

总理：拿来交给我(高锦明：现在没带着)。

张淑琴：我们要求释放军区的少数派，要求把王建平叫来，另外我们还要求来五名代表。

总理：对等？我还得研究研究。

张三林：抗大牵扯到乌兰夫的儿子力沙克，抗大也应该来人。解决抗大的问题，应该有抗大的受害者参加。

郝广德：力沙克是乌兰夫的儿子，已经打成黑帮。

总理：铁路局现在是不是军管？

曹文生：由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接管。

总理：现在还有没有军队？

曹文生：已经撤走了。

郝广德：还有军队撤到一楼了。

曹文生：那是军运处的。

总理：过去有吗？

曹文生：过去就有，那是负责转运的。

郝广德：现在到处都有军队，连火车上也有军队。

总理：那是我们派的。局势的发展，就看你们能不能执行我提出的四条。能不能执行四条，是听不听中央的话的问题。现在要首先共同维护解放军的荣誉，这是我们的最高利益。我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从明天起，分别派人和你们谈。

524. 周恩来接见财贸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 年 2 月 17 日 2 时至 5 时半 国务院小礼堂)

(会议开始前，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混进会场，经几次劝说，坚不退出。并挑动少数人无理取闹，围攻会议办事人员李副总理秘书郝志学同志。质问名单是谁提出的，谁交给让通知的。威胁说，不让杜向光参加，要全体退出。围攻一个多小时)。

总理讲话：今天，我请财贸各部委的造反派，还有各学院的造反派谈话。没请部长、副部长、司局长，我准备分别跟他们谈。我严守这个规定。因此，财政部杜向光同志，请你站起来！虽然你参加了造反派，但是我不同意你是代表造反派，因为代表造反派有很多人。你是个副部长，你到底是不是呢？你已经抵制了我一次命令了，请你走出去！(众：走！)那有这样子办法的！(众：出去！)不行，没有话讲！(众：出去！……)那么党中央的命令都不能接受啊！(众：滚出去！)你们大家听一听，用这样的办法来混乱哪！(众：走！走！走！)

么你不听最高指示？！(众：总理的命令)我奉主席命令来开这个会，你就这样做啊！？红卫兵，执行命令！(众：走！滚！)解放军，逮捕起来！(众：逮捕起来！带走！)这样子来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给他的命令也不服从(长时间鼓掌)。谢谢你们支持党中央的决定。

他是来夺取党中央的财政大权哪！有一些同志被蒙蔽了，你们要好好地觉悟啊！(众：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受蒙蔽的同志觉悟过来！打倒保皇派！)给他命令说，财政部不能夺权，财政大权只有监督，不能夺权。敖本立同志来了没有？(答：来了)请你过来，你帮助我来解释一下。我讲了嘛，业务只能监督嘛。是不是？你坐在这边，你要老老实实……，你要完全忠于党，是不是这样说的？(敖：是的。)既然监督业务，他还夺取财政大权，我能容许吗？我能够代表中央答应吗？你回答(敖：就杜向光来说……)。嗯，他来代表造反派(敖：他不行……)，他就抵抗我的命令嘛！李先念同志传达我的命令的嘛，财政大权不能夺嘛，你只能监督业务嘛，财政部监督业务是最大限度嘛，我们还在考虑当中嘛！

我第一步说，你监督业务可以。他说：“总理的命令我怀疑，不能执行。这是什么话！你们听听！这是哪天呢？2月7号。你想想吧，今天是十几了？天亮是十七了，已经十天。我忍了这么多天了。可是今天还来蒙混。这样对待党中央啊！(众：谁对抗中央，就砸烂谁的狗头！受蒙蔽的同志醒悟过来！)而且信任他。你们听听，怎么传达的这九条决定的。我经过联络员董执同志找财政部接管委员会常委，传达了总理指示。一、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总理要接见财政部的同志，就是要接见你们造反派喽！三、财政指标要在三、五天内下达。因为这个计划已在12月搞出来了，时间已经晚了，希望他们下达嘛；四、业务工作由杜向光同志请示李先念同志。信任他呀，他站在造反派方面，我们信任他，还不够信任哪！？五、吴波同志休息。因为吴波同志被斗的身体不能支持了，所以要他到国务院里头来休息(先念：我的秘书在这个地方，你今天来围攻。)对于杜向光，我们是这样照顾他的呀。他的回答是什么？我先念给你们听听。他说：“我个人意见造反派夺权问题，根据当时形势、中央精神、《红旗》社论、财政部的实际情况，财政部的造反派夺业务权是应该夺的，夺得对的！”你们听听。先念同志问他：“那末总理的指示你为什么不执行呢？”他说：“不理解，不能执行，难以盲目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命令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他可以说不能盲目执行！我们党内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但是要执行。你们看看党章嘛。他是一个副部长，当一个副总理代表中央和国务院，要他执行一个决定，执行财政部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这样一个决定，他竟敢拒不执行。现在各个部都是用监督业务的办法嘛。外交、公安、财政……，公安到现在还没有监督，我们不打算执行监督了，外交也到这个程度嘛，李先念兼财政部长嘛。我们信任他(指杜)，他竟然这样来对抗，玩弄这样的手腕，把这个决定挡住，使财政部的造反派犯错误，夺了全部的权，自己宣布吴波如何如何。我们不能承认哪！党中央没有批准嘛，党组也解散了，你们看看党的组织有可以由群众解散的？

财贸系统，我支持你们造反派的，我跟先念同志站在一起的嘛。敖本立同志，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说公道话嘛！(敖：总理是最支持我们财贸系统的，多次接见我们。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对不起，我们向总理道歉。)(先念：我的秘书在这里。你们围攻了没有？可见，吴波、姚依林你们都敢围攻的！)(有人揭发质问)(敖：今天是这样的，头一次，因为平常接见都是通过我们联委会，然后再告诉我们和造反派。今天不单是通知财政部，而且通过我们联委会，然后再告诉我们和造反派。今天不单是通知财政部，而且通知各个部，粮食部，都是把当权派和司局长级，有的过去是保守势力，旧文革主任……)这个他们通知错了，一打电话，我就说既不能出席，就叫他们退了嘛(先念：我和总理两个在中央开会)。我们不晓得这个事情，我们一知道马上就改了，所以我刚才没提这个事。他们没有征求我们意见，就通知了。那么，杜向光(转向敖)，你认识的嘛，他就混在里面的。你看，你就不检查了，你就不帮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了。我们这么信任你。杜向光他一直坐在那儿的嘛，很能闹事，(众：……)。行了，行了！不说了。有同志可能是受蒙蔽的，等回去再说罢。反正杜向光这

个问题你们听得清楚，这样的话，象不象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副部长对待总理的态度？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妨碍造反派监督业务嘛。历来我跟你们说要监督业务工作，是不是？(敖：这是大家都听见了的)是嘛，我几次座谈会这样说嘛。我没办法，只好把你们大家都请来了。财政部我知道的，第一个单位嘛，这么多人嘛，完全可能，你们欢迎他，就相信他！？你们以为杜向光会帮助你们把大权夺到手哇！这是弄错了。同志们！你们这样子造反，会走到邪路上去的！你这是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你们要走到邪路上。我劝你们好好的觉醒过来。财政大权能够这样子让你们夺？这是中央，不是地方啊！地方是受中央监督的。中央财政大权都给你们，预算权等等都归你们，那中央还有什么？人权、财权、军权、政权，就这几个呀，党权，更不用说。难道毛主席把党权交给你们大家？把政权交给你们大家？你们夺到中央来了嘛，这是中央的权嘛。还有外交权，这也是中央的权。那一个《红旗》社论讲到这条的？财政不是单纯一个部，它是代表中央实行财权的地方啊，就等于计划权，是计划实行的。就拿外事口子财贸口子说，我一直跟这两位副总理商量，拿你们做试点，想搞出一个点，健康地发展，给全国作个模范。我始终鼓励你们，就在那儿，开过一次大会，比这次人还多，我还讲了话。结果我自己弄得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这不光是我自己的脚了。你们看，让杜向光这样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你们这样上当啊！这权是不能夺的啊！夺权、政权、军权，军权是最大的了。党权里有人事权，政权里有外交权、计划权，还有财政权，这些都是大权，能够大权旁落吗？毛主席能够这样子授权给造反派？刚闹起来就这样子负责吗？我们如果这样做，是要犯罪的呀！事情弄糟了，我们要负责的。这也不能怪你们！就在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把杜向光保护着。还要受他蒙蔽，我不能不抓了。而且我也是讲道理的，几次三番请他出去，联络员请他出去，后来秘书请他出去，后来我知道了又请他一次，他还是不走，这总算仁至义尽了吧？！他上次跟李先念同志谈话，谈到最后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连会都不负责开。他说：“现在我们权已经被夺了，没有权了，不能召开党组会议了”。可是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头子。他是站在另一面来混水摸鱼，把大权夺在自己手里，这不是最典型的个人主义呀！这种人能信任哪？这要把党的事业，把我们人民的事业，把革命的事业搅乱嘛！财政部不但有一个杜向光，还有一个黑手王学明，也在那个地方要伸手的，不过他犯了罪，所以不敢公开站出来，在背后。你们年轻，你们犯错误是允许的，但是要觉醒，不要跟着继续下去，那就不利喽，对革命对运动不利喽。我们不会挫伤你们闯将的干劲的，但是到了错误的边缘啦！我们要提醒你们，不要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我首先说我自己，我太信任你们了，没有注意你们当中有人混水摸鱼。你看，前一次接见你们的时候，关于你们外贸系统的同志、财金学院的同志贴我的大字报的问题，我都说，这个不要紧的，你们把事情都说出来，把事情解释了就可以了。我说对我来说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要你站在友好的态度上，不是敌意，尽管大家有意见，我都替他们作了解释。我们几十年的共产党，跟毛主席走的呀，这种容量应该有的，不然怎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前进呢！但是你要犯这样的严重的错误，我就不能容忍了。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了，就要造成党的损失，国家的损失，人民的损失，革命的损失。今天先念同志和我为什么来晚了呢？我们开别的会议，今天还签了一个对毛里塔尼亚援助的协定，可是我们对外经委主任天天被斗……斗了一个多月，工作都没法做。这样的情况怎么能继续呀？！我让你们夺文化革命大权，监督业务。两条：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没有料到发生这些事情，我心里很难过，逼着我最后只好下命令要方毅同志休息。不然几千个项目放在那里没人管，革命和业务要结合到一起嘛！要政治挂帅嘛。财政也是问题呀，预算要稍微耽搁了，国家要受多大损失呀！我们渡过最困难的年月，三年灾荒，苏联撤退专家，加上我们自己工作上有些错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财政上把外债还光了，把内债也还得剩下很少一点了，今年 1967 年，68 年大概就还光了吧，难道这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也是修正主义路线？要看大的方面呀，同志们，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不能，完全不看全局，就听信一两个人背后给你们的材料，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材料。这样的材料你们就相信？你们这样，会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

乱的，在最困难的年月里，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自力更生。在外交战线的斗争上和反修的斗争上，我们的朋友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在财政战线上，我们还清了外债，内债很快要还清，赤字没有了，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相比呀？不管帝国主义、反动派、修字号三类国家，他们不是外债，就是内债，象美国这样，有多少内债呀！财政上有赤字，还有多少亿的各种形式的内债。我们变成这样一个国家，你说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为指导，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呀？不错，在一段时期中，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它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占统治地位。一个时候占了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批评了，毛主席的路线又胜利了。不看大的，不算总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样子斗法，这样子批法，你们能够不走到邪路上去？不要上这个大当！刘少奇，他在 1962 年就相信那个赤字，就是要另外搞一套。大概你们根据揭发的材料，已经知道了。吴波也揭了嘛，也揭了陈云那个思想了，但是那个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顶回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事情都做好了，没有经过 5 年，只用了三年功夫，到了 64 年就整个发展起来了。你们是管财政的，你们如果懂得业务，就知道嘛。外贸的发展，那是你们外贸的事了，外贸的确有许多政治不挂帅的地方，我们也常批评。吴波政治也是弱的，但是他在执行命令方面是坚决的。如果仅仅是一个桃园大队，那是碰着去了。当然，刘少奇让他报告。但那时四清工作，怎么能算是反党呢？不能这样断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先念：吴波的政治我向你们交代过多次，你们硬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什么道理？)批评是完全许可的，但是结论，党中央还没有做，你们不能做，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同意不同意，是中央的党权嘛，党的决定在中央嘛，我告诉你们，农林口就像王震同志这样子捣乱，你们大概也听说了，一直到最后揭露东西更多了，他就是反扑，最后，我们还在保他，一个人要看一生嘛。把老干部这样子行吗？《红旗》第 3 期出来以后，我没有跟你们见面了。大概你们也听先念同志讲了，要你们好好学习。你们看社论第三部分，那里面对所有犯错误同志的一段，从笔调可以看得出来，那是主席亲自加的。可以把我们三、四十年的老干部，统统一概打倒吗？统统靠边站呀，行吗？你们就能够接班哪！？(先念：姚依林同志在这里休息，你们商业学院下了通缉令)到底是中央作主，还是你们作主？你们下这样的通缉令！姚依林休息，是我下的命令。在主席那里，这些人都提到了的。我下的命令，要他回来，在国务院休息，就是在中南海休息。你们下通缉令，就是对我们通缉。在中央领导底下，这样做，我们怎样信任你们？怎样支持你们？你们还年轻，你们的闯劲、革命性，我们支持，我们千个万个支持。但是仅有革命性没有科学性，没有组织纪律性不行。这是中央的业务机构，更加不许。军队，主席说不能一冲，得有两冲。两冲就是既有勇，还有智，有勇有智才能打胜仗。做政府工作更是需要如此。过去是政治挂帅，或者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许多部门是有这个毛病。和你们交谈时我什么话都给你们讲的，能告诉你们的，都告诉你们。可是，你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呀，你要把党权都夺去，把政权夺去，把发号施令权夺去呀，那怎么行！没有界线了。同志呀，有好些事情总是从反面教育，对大家更深刻。如果没有杜向光的这一手，那要说清楚这个事情，不知道要费多少口舌。今天不需要多说，你们大家都支持，这里面有党性、阶级性的问题，同志们，这是个阶级斗争，这就叫阶级斗争。利用造反派的名义，混水摸鱼，鼓动财政部不明真相的同志来反党，要夺权中央的财政大权，结果你们几乎上了他的当。没有今天这一下，揭发他还得费事呢。他自己送来了，而且我先礼后兵，劝他退。他不走，逼出这一手。靠一个杜向光，就夺党的财政大权？这完全想错了嘛。同志们，我原来想预先经过李先念同志告诉杜向光，打一下招呼，让他说服大家，然后我再来见财政部的造反派，就好说一点了。可是现在看，要他这样的人来管这个事情，你说我们糊涂不糊涂。是不容易看清人哪。同志们，这样暴露也好，你们也被骗了，我们也算被骗了。因为先念同志不熟悉他这个副部长，我更不知道他怎么来的，现在正查他的档案。你们把原来的名单换了几个，另外有没有司局长来？(先念：有一个葛复时)你是不是司局长(葛：我是副局长)你为什么参加呀？没有你的名字嘛。(众：走！走！……)不要解释了，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嘛！(众：商业部还有一个司局长来了。)(先

念：有名单的。)哪一个？如果有名单，同意了就是另外的事了。葛复村，让他回家去，不要管了。当然，干部三结合我们是主张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成熟嘛，混水摸鱼的方法是不好的。现在是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从两条路线斗争进入到新的阶段。你们看了《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也可能听过我在人民大会堂劝各地同志回去时所作的广播演说，我在 1 月 22 日也讲了夺权斗争。实际上我们从上海夺权斗争开始，就进行这个准备了。我也给你们谈了，一月十九号就谈了。你们财贸大会什么时候开的？(答：1 月 18 日)我在那里讲话，支持你们的夺权斗争嘛！支持你们领导文化革命、监督业务嘛！是鼓舞你们的嘛。你们开大会，比外事口还早，他们到现在没开成。我完全是希望你们能够树立起来，先念同志也是积极支持。我们两人商量，给中央报告，想拿你们作试点，多次接见谈话，结果弄成这样的局面。不过现在事情也不坏，反正夺权斗争才仅仅一个月，上海开了个端，上海工人阶级带了头。我说，第一张大字报是北京大学，学生运动一向以北京为先，从“五四”、“一二九”、“反饥饿斗争”，一直到这一次文化大革命，都是北京大学带头。那么，到了夺权斗争这个阶段，就不是一张大字报所能解决的，就需要广大群众去发动了，上海工人起来带了头。

1 月 5 号《文汇报》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然后跟着有反经济主义的十条措施，这一次也是毛主席首先抓住的。主席比我们都看的快，《文汇报》，我们还没看到，主席首先看到，象聂元梓的大字报一样，把我们召集去说要支持。《人民日报》1 月 9 与登出来，以后，紧接着发表了一些东西。16 号在主席那儿的会议上决定，夺权斗争需要进行三结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解放军的代表，还要有革命领导干部。《红旗》三期社论(在《人民日报》1 月 31 号发表的)就说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说要有革命领导干部。革命领导干部，一种是一直站在革命路线方面的；一种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改了的，不仅如此，还有即使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还允许他将功折罪。这样的意见，我在一次铁路系统的会上也说过。我说，有些干部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还应该允许他将功折罪，撤职留用。我有四句话：“撤职留用、限期观察。(比如限三个月或更多的时间)将功折罪，以观后效”。这种人如果肯改的话，还是有希望的。主席的改的那句话，即如果不是反党的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还允许他改正错误，将功折罪，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党的惩前毖后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毛主席从遵义会议以后，领导全党以来三十九年的传统政策。我们跟着主席走嘛，清清楚楚嘛，我们也犯过错误，允许我们改正嘛，团结我们嘛，跟着他走的嘛。怎么这次革命运动能把一些老干部统统去掉呢？不可能设想的。如果我们这样做，是犯罪的。现在外边的一些标语口号，不都是中央同意的呀。你们不要以为中央都点了头的。过一阵我们要和红卫兵开会，要讲这个道理。那样的标语，那样的漫画，搞下去，是把我们的斗争降低，不是提高呀！这不像毛主席的学生呀。现在外报已经反映，北京的漫画，马上香港报纸就登了，就反映到修字号、帝字号的国家里去了，这是对我们党和国家抹黑。现在一直污辱到解放军身上了。我刚才跟解放军的同志谈，现在很多地方的军区被围攻被冲击，这是不允许的，我费了很大时间说服他们。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包含着那种亮相的，也包含犯错误改的)还有解放军的代表，这样三位一体“三结合”这样夺权的，才算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资产阶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权，才能这么说。而且应该更肯定的说，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们夺权的目标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毛主席不赞成加后面那句话，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不赞成这句话。前天我们党的会议确定不用这句话了。你们看以后的文件就没有了。不赞成这个扩大化。因此，不是每个省都有统统靠边站的。允许有一两个或者几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允许有的省一个也没有，也有可能犯了错误，改就是了，不负主要责任，负次要责任。至于我们中央各部就更不能用三结合夺权了，那怎么办呢？现在不是一部分在夺权吗？但是我们说明：凡是没经中央承认的，你们夺权是不算数的。我们是一个个的来审查。因为现在如果承认这个夺权，就是说所有中央各部负责的同志或者是一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这样就等于都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了，那还行哪！能给他们做这个结论吗！中央不能这样做。过去有的同志想扩大一点吧。包含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吧！这一扩大就很不利了，黑手就来了，杜向光就是这样。你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吴波算不上，至少是顽固分子吧，姚依林至少是顽固分子吧，这么一加就加上去了，这就造成了夺权的前提了。主席就是伟大英明，他不赞成，他觉得还只能是四清以来那个夺权的继续，就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其他的还得结合起来。比如杜向光，如果他不搞这一手，不插这个黑手，不违抗中央的命令，那你们同意他，我们也会同意他的呀。一个人总是事不由己，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权抓到手，不晓得这样就暴露了。如果他今天不来，我不能说得这样绝，还得留有余地，因为你们大家还不觉悟，不懂得嘛。(先念副总理：原来是明天叫他停职反省的)那也得跟你们商量呀。现在就不用商量了，他做的比我们准备处分的还重嘛，那还有什么话说。所以说明主席的英明伟大，他总比我们高明哪，他什么事情都看得远，就晓得你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把范围搞得更准确，不要稍为有些扩大。因为一扩大就便利了坏人，就会使年青的同志容易在方向上弄得动摇起来。你扩大了嘛，方向就不能很准确了，打击的目标就不能有的放矢了。用主要的力量打击主要的敌人，这是主席的战略思想嘛。扩大了就会乱打，乱打就会不团结多数了，就没有达到最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先念同志和杜向光吵了半天他都不同意，怎么达到主席的要求，最后达到团结群众和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不可能了，都靠边站，党组也解散，他不管。现在已经没有党组，他宣布党组取消。党组是先念同志的第一书记，这样忽视党的领导呀。先念那天忍下去了，报告了我。我们商量，原来打算一道开会的，后来还是分开来，先跟你们商量，这是我们一向的作法。先跟你商量，然后再跟领导干部商量。他明明知道他的地位，他不管，他今天一定要来。

路线掌握的要非常严格呀。我们应该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但同时又要每个步骤抓紧，这是我们抓得不紧啊！所以这个错误不责备你们。但你们也要懂得，中央不能说所有的部都是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所以，我们当时考虑的，从1月16号到现在不过是一个月嘛。因为晓得，主席估计到了，一定要连锁反应。就是说：这个夺权斗争展开了以后，本来是讲地方的，但是中央各部也连锁反应，都要夺权，因此我们当时就限制在极少数，也许几个部门。我记得当时我还举了广播局的例子，那是从下而上夺的，现在证明也不成功，也失败了。广播事业局现在还得三结合，由监督业务走到三结合：

中央各部搞什么三结合呢？这不是领导干部、群众，外边还派个解放军代表，那变成军管了。中央各部不需要采取军管。什么三结合呢？就是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比如司局长吧，还有你们在座的革命群众的代表。造反派一起来总是没有长字号的，现在当然可以逐步吸收了，个别吸收，我也说过这个话，因为造反派这个基础才能巩固呀。这样的三结合，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造反派，就是革命广大群众的代表，这样子三结合，这样三结合组成什么呢？我们现在设想(还可以讨论)，可以选出一个革命委员会来，监督整个部的文化革命和业务。将来实现这么一个监督机关，以群众的代表为基础，这是我们各部改革最后要实现的一个目的，不管你当权派有没有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小撮呀，或者没有，你就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是拥护主席革命路线的，也要实行，这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人管。我们这些领导人也是要有人管的，我们并不怕你们，希望你们管的。你们这半年管得我们好嘛。造了反，当然不是造了毛主席的反，是听了毛主席的话，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当然一造反就火烧，烧得多了一点，不应烧的，烧了也不要紧嘛！只要不打倒，打倒就靠边站了，或者比靠边站更严重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不是这样，确实跟这相反。毛主席那段话说得很对，如果我们现在把这样一个国家的大事都交给你们。我们连过问也过问了，有靠边站的思想。我们领导干部有的同志是有靠边站的思想了，做群众的尾巴。你们能承担得起吗？你们稍为冷静地想一想，政府这样多方面的大事，你们晓得，也不可能承担。把事情推给你们不过问，就等于故意的将你们军，捣你们乱，那你们

陷进在这里边就没法出来了，结果事情办不好，不等于看你们笑话吗？把大权统统交给你们，我们不管了，我们都靠边站，去休息去，那怎么对得住人民，对得住党，对得起毛主席，对得住革命呀！我们要犯罪的呀！

你们要在这个斗争中锻炼，你们一般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当然干部中四十多岁的也有。我在外交部就问到，一般的科员也有四十多岁的，你们那里也有吧？但大多是三十多岁左右的。这样把权交给你们，那毛主席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怎么能都学得到呢！我们如果看到你们这样做不出来纠正。那我们要犯罪的。我跟红卫兵说过，我给你们也要这样说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不会骗你们。到了这样的关头，我们要出来说话的。我和你们联络站的同志说过，凡是重大事情我还是愿意和你们接洽的，不是又接洽了吗？本来这个口子有先念同志负责，我可以少管一点，但你们看，这个命令就不灵嘛，不能不引起我警惕，不能不答应先念来过问这个事情。先念同志还是先谈了一段，打了一点底子。

各部门的夺权斗争采取监督业务，然后走向三结合，这要一个过程。要给部的领导干部一个机会，让他们当着大众，把政治态度说清楚，不算旧帐。让他们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讲清楚，有的检查，有的讲话，听一听，亮亮相，这样子彼此建立了信任，三结合就可以形成了，这样子成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就会起监督作用了。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了，以群众为基础，上有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三结合，也是一种试验，我在前两天首先推荐给外交系统了。今天晚上再推荐给你们来试点。

如果财政部的同志有觉悟的话，你们就应该好好的想想，造反派这一点也不对嘛，先念同志请你们来谈话，你们说对先念同志无话可谈。是哪位同志呀？(先念副总理：刘振玉)这也不对的，怎么能这样对待李先念同志呀，你怎么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党的负责同志呢？那位是谁？(答：程圣言)程圣言同志。那位呢？(答：刘振玉)(众：带头闹事的。后边那个闹得最厉害，还有东头那个。)那一位？(答：我叫高公富)高公富(众：这有那个女的)(答：宋桂兰)哟，宋桂兰同志，高公富、纪兆才、程圣言，(众：那个骂人、举手打人的)好！坐下，坐下。同志们，你们要好好冷静地想一想，特别是刘振玉同志，你这样态度完全是不对头的嘛！两次请你，你说跟李先念无话可谈。你们呀！我们这样子努力帮助你们，你采取这样敌视的态度，(先念：说是要把我打成黑帮、商业部要注意呀！还有商学院哪。)所以这件事你们走过头，就要走到相反的方面。我们愿意你们走到相反道路上吗？我们也不愿意造反派碰到这样一些失败呀！难道我们高兴吗？象杜向光，那是另外一种性质嘛，他自己伸黑手，想混水摸鱼。你们是部里的造反派嘛，是不是？我劝你们回去好好地开个会，痛切地检讨检讨，你们走到错误路上去了。吴波有错误。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嘛，(先念副总理：商业部的造反团、商学院的造反团、“八·八”队、财政部造反团，有方向性错误)你们这样做的结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了，到了边缘了，我们不来提醒你们，你们会滑下去，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犯了错误。要好好地冷静一下头脑。

三结合也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要分析，你们现在已经造了反，文化革命大权拿到了，监督业务超过分际了。第一步超过分际这部分要退出，只能监督业务。只能监督，不能遇事干涉，那样就无法做事了，在这方面外贸部自从我说了以后，情况还好一点。所以什么事情交谈过几次总好一点。粮食部也好一些，你们注意呀。你们管多了，你们负责任。出了乱子我们找你嘛。(先念：银行夏××来了没有？你们斗胡立教，不斗胡景云是什么道理？你们以为我讲的话都是没有根据的……)你要接管业务，管错了，我们再来找你们，我们心里不安嘛。我还是说，如果这样子，我们就犯罪，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党，对不住毛主席，党和主席这样信任我，叫我各方面的事情都要过问过问，我能看到不说吗？

财政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教育了大家，也教育财政部同志们本身。你们要好好地检查。党组的工作还得恢复。告诉你们，还是吴波，还是先念，他兼财政部长嘛。党委委托他管财政大权哪！上一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先念同志提出来过，不兼财政部长，几个同志都打算不兼了。主席说不行，一律得兼。这是对这些同志信任嘛。不能认为好像所

有的副总理都不可信任啦，能这么看吗？财政部党组得恢复(先念：商业部党组得恢复)你们对业务还只能监督。如果你们守这条线，那么首先你们自己整风，你们部内的造反派好好地自己整风，你们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杜向光、葛复村，杜向光财政部工作不能做了。葛复村嘛，也还不忙于让他参加你们造反派的领导。因为领导干部嘛，要我们给你们来排下队，站出来嘛。所以我们明天还找葛复村来的，但是今天他来是不对的，名单上没有他，是你们把他带进来的，我们的秘书根本不认识你们任何人，所以分辨不出来，进来以后才知道。你们这样作，就等于欺骗党嘛，我们对你们说的话，句句是真的呀！如果说错了，我承认错误。但是不能骗你们嘛！希望你们——你们也来了不少人，接近二十个人，你们好好回去整一下风，痛切地开个会检查检查。

同样的情形在别的部也一样。超过了监督业务，变成了领导业务，那不行。领导业务的还要退出来，现在只能监督业务。每个部党组都要恢复。商业部党组取消了，不行，还是姚依林。姚依林他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他已经检查多次了，身体也几乎倒下来，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你再继续这样通缉，你就是向党来通缉。我下的命令保护他，你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罕见了！你们简直超过了分际了！给你们这样大权，你们还要这样做，你要走到反面吗？商业部的，包含两部分，有商业部的造反派，有商学院的造反派，还有财金学院八·八队也参加了几个人，是不是？(敖：没有，只有几个人去那里……)没有吗？也算啊。你们要好好在一起检查，这样子要走到反面的。

无所谓恢复党组，本来党组我们就没有取消。你们不能推翻党组，取消也是另外一回事。各部我们都还没有松过这样的口。工交系统他们那种做法，我们没有承认的，我还要一个一个来管的。现在工交系统非常乱，我开了三次会，想先把情况稳定下来。有些部就不能稳定。铁道部搞得一塌糊涂，不断地打。我开了十次左右的会，不能解决，铁道工人多次要求我们实行军管，但是我们还想等一等，如果再继续下去，那就无法避免了，就是各个联络站去那里闹。这样就要走到它的反面。商业部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其他的部门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考虑。总之，党组或者党委，一定要行使职权，你们只能是监督，不能够领导，不能超过监督的范围。责任还是部长、司局长负。他们如果有错误，你们检举出来，确实错误，我们一定要纠正，要作负责的答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革命权还在你们手，运动你们可以领导嘛。至于怎么进行三结合，底下再说。总之是党组(或者叫党委)要恢复，监督业务不能超过分际。

再，各部门的造反派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监督业务，应该主要由他本身的造反派为主，比如说，商业部就是以商业部造反派为主，外贸部以外贸部造反派为主，粮食部以粮食部造反派为主，银行以银行造反派为主。至于有关的学校是否参加？根据情况。以本部门的造反派为主，有些部不能让外边的来参加。比如公安部，肯定是不能让外边的人去参加的。我们曾经一度允许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去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允许他们试验一下，结果效果不好，他们自己也承认。因为他就那么几百人，不可能管那一万多人。怎么办呢？只好包下来。长字号的，高级的都靠边站，不要了，就靠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出什么主意，他们只好照办。结果闯了一些乱子，这也不是由主观愿意决定的，他们还不想搞好？没经验哪！下面的人有的给他出坏主意，也有出好主意的，两者都有。好的主意当然好啰，坏主意呢。后来希望他们能够把公安局本身造反派的火点起来，把彭罗时代的那些黑手检举出来，把北京市公安局来一个彻底革命。寄予这样的希望，但是后来证明，这样的试验失败了，不得不实行接管，我们把失败的经验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在内部好好讨论。谢富治副总理是全心全意地注意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不行，内部造不起反来。因为外部代替了内部。外部进去一掌权，内部的造反派就造不起来了。结果把全部包下来了，不分青红皂白，都包下来了。结果不行了，只好实行军管。现在大家都赞成军管。你们不是也赞成的吗？天津公安局比这还要严重，天津是内部的坏人造反派、反动的造反派造革命派的反的，一小撮人在那个地方夺取了公安部门的大权。天津比北京秩序更差，岗楼上没有人啦，交通岗都没有了，这十几天，

人民真是好哪！没有办法，也只好派军队接管。天津人民那真是欢腾至极，天津公安局的假造反派也还挂个名字叫做政法公社，鱼目混珠。所以你们要防止啊，你们一旦有名了，人家到处想沾你们的光呢！你这个“八·八”队事情管多了，你就要防止本身的尾大不掉啰。北航是北京革命派有威信的嘛，很多地方就利用北航的名字，实际上不是北航，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不要骄傲。一旦出了名，就很小心翼翼。北京出名的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你们财金学院的“八·八”。都会要栽跤。所以，我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发展处于政治优势的时候，保守派分崩离析，感到自己落后了，要开门整风，甚至要接受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但是到革命造反派吸收得太多，变成组织优势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不但把革命的包含在里边了，保守的也包含在里边了，有左的，有中间的，有偏右的。这时内容就发生问题了，思想不那么一致了，行动不那么一致了，有些事情就管不了啦。同时，坏人就来钻空子了。所以凡是当着组织优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思想上要继续前进，才能不断革命，不至于落后。当然，这个问题要跟你们多次谈，你们要实践才能懂得，你们也会慢慢认识这个问题的。

部内的问题一定要以部内的造反派为主。(先念副总理：要把商业部、财办、财贸政治部的八·八队撤走)现在，如果说有些部内的造反派还不强的，外贸部不强，是吧？(答：外贸部很强)很强，好哇，这样就好(笑)。粮食部呢？部内有吧？(众：有一些学生在那儿……)是呀，即使同学们去了，要……。你们，比如财金学院、商学院、外贸学院，这三个学院，应该帮助部内的造反派，夺“私”的权，树“公”的权，这是清华的一篇文章。三司的确有一些思想水平好的年轻同志。最近又有一篇好的，《光明日报》今天转载的。就体现了主席关于干部的思想。这说明我们年轻小将的确有思想先进的。写作的水平也高。帮助各部的造反派起来以后，如果确实有几位，和那个部发生了感情，又愿意长期在那儿工作，大家又欢迎他，也可以留下去。因为他等于参加这个部的革命造反，不再离开了，这不是一样的吗？我跟调查部的同志谈起这个问题。国际关系学院有一部分人进去了，他们有两派意见。一种人就是想帮助调查部的造反派起来夺了权以后就走，这也是许可的，他说我不能久留，我将来还要回学校念书，我还学一两年，现在进去了，我出不来了，不好。我进去了，懂得了调查部的许多国家机密，不能让我走，他不愿意。我说这种人也很好，他懂得这个界限，要走，让他走。谢谢他，他帮助是与人为善嘛。第二种，决心留在那里就出来了。那也许可。只要是成分又好，政治表现又好，当然欢迎。所以对于财贸系统、外事系统，我还是保留我这个意见，即少数的人，对那个部参加文化大革命一个长时期，建立了思想感情，阶级感情，他也愿在那里献身，愿意在那里做下去，也不三心二意，那也可以欢迎。由双方造反派协商，那你就留在那里。但这就要固定，不要今天来一下子，明天又走了，后天又来一下子，那就使得我们不能建立一个稳定的革命秩序了。现在已经到了夺权的新阶段了，应该把这个讲了。革命的群众代表应该这样子。凡是各个部自己的造反派力量不强的，应该努力把它加强，这不在于数量，还是先取得一个政治优势。到了争取数量的时候，要吸收中层干部，才能把你工作能力提高。我们并不反对中层干部参加革命造反派。要诚心诚意帮助的人才行。我提倡过要逐步吸收，但部的业务系统还是不要把它打乱。

中层干部、领导干部里面会有些人要调开的。比如说，总是有坏一点的罢了官吧，比如，薄一波也等于是罢了官吧，虽然没有宣布。还有个别人要捉起来的，梁庸捉起来了，是个大叛徒嘛。这也是有的啊！罢了官的是有的，但不会多，会有一批调开，在这儿不适当了，调开。剩下多的就是留用一批。有各种留用，刚才说了。留用的就是留用，也有监督留用的，这是发生问题的；也有停职留用的；也有撤职留用的，吕正操是撤职留用，以观后效，看他能不能改，给他一个最后的机会。武竟天我们宣布了两个月。荣高棠就没有留用，罢了官了，当然罢官的最后结论还没有作。

干部要排队。谁排呢？在群众方面，应该让他表态、“亮相”；我们党、上级领导也来考查，双方结合，上下结合。怎么做法呢？不能象现在这样斗法，这样斗是无休止的，没有法

子进行业务。我刚才举个例子，就是方毅同志。这是我们党的好干部，曾经入过一次狱，最后出来，是国共合作了，他放了出来，没有什么手续，这是审查过的。在对外经委主任这个期间，工作很有成绩，机构最小，有很多专家在外边，帮助人家几千个项目，要不断签署合同。我刚才说了，今天签署援助合同，他没有到场，一问，才知道机关检查某人的错误。造反派勒令方毅必须到场。你看，这样一个大的援外合同的签字，对外经委主任不在场，那会给群众什么印象呢？这怎么行呢？我们宁肯推迟签字等着。许多国家都晓得他这个人，非洲人都熟悉他，越南、朝鲜都知道他，特别是越南，他在那里做过经济代表。怎么能这样对待这样一个同志，随便一棍子打下去呢？这不合主席的政策，还有，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我现在说一个例子，到现在我很难过，张霖之到底是怎么死的？硬是矿业学院把他关在一个地方四十多天。尽管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他和彭真、薄一波，特别是跟彭真也有一些关系，但是今天不能做结论。这个同志还有他的长处。煤炭工业部的造反派和矿业学院造反派斗住不放，四十多天我不晓得，他死了才突然晓得。所以我今天一听到段君毅，还有今天你们要回来的王磊(先念副总理：王磊现在已进医院了。)我们中央一听说，我就下命令，没有二句话可讲，一定要交出来。还有康世恩、段君毅还没有要来。(先念副总理：段君毅准备要回来。什么人给我报告，要开几万人的会斗争谢北一)象这些事情，都不跟我们商量，把我们中央领导完全放在一边。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那几句话，连主席自己也想不起来是那里说过的，后来才有同志说是“五四”运动那时，1919年《湘江评论》上主席的文章里说的。主席说，那是资产阶级爱国主义时代嘛，那时我们都是一批爱国主义者，有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呀，怎么能乱引用呢？那里边没阶级性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无产者说这话，资产阶级也可以说这话。主席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席是很严格的。你看他的诗词，第一篇是1925年的。主席做诗做词，何尝是从1925年开始的。但是他一篇也不拿出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主席在《沁园春》以前的诗。主席对待一个诗词都是如此严格，我们对待我们的领袖，不能够以常人来论，我们也应当拿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严格地跟着主席走呀。你乱用他的东西，你就是不合乎主席思想啊。我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你们哪。关于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子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不放出来，那怎么行！把业务耽误了，把身体也摧残了。老干部都这样对待，你们不感觉到，你们用敌对的态度对待他们，但我们就感觉非常深，我们不安，几十年的战友哪！

每一次主席跟各地方来的同志谈话，跟中央的同志、政治局的、国务院的、文革的同志谈话，总是先讲革命，后讲干部，总要讲一段干部的。要在运动中造成一个好的传统，主席的干部政策的传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传统。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照现在这样下去也是一种残酷的斗争，而且那种斗争的方法：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弯腰、喷气式飞机，照出像来展览在大街上，让外国报纸拿去登载。我们红卫兵的报纸，甚至省报都登出来了，许多中央同志看到很不安，很难过。(先念副总理：老实讲，我就流了泪，那样下去还得了！)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呀！当然要一分为二，也有坏的，但坏的是少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先念副总理：我看了陕西那个百丑图，那里边我认得好些人哩，那都是反党分子？)不仅是对老干部，就是对彭真也需要这样的方式，斗得要文明一点嘛。我们无产阶级，不要丑化我们自己嘛。对老干部，不能都是用敌视的眼光看待呀。那好，我想将来你当了政，管了事，将来下一代也这样看待你们，代代相传，把我们党造成什么作风。那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作风，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想到这个地方，我就睡不着，我就难过。但是我不会流泪，这种时候我是要挺起来说服大家的。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不说我要犯罪的。别的同志发言权比我低呀，他们有什么办法？你们要懂得我们老干部的心情哪，你们觉得现在可以统统抛开，你们为所欲为，行吗？主席首先不赞成这样做。我们不能放心哪，这是害你们的呀！

我们党内是有一套坏作风的啊！过去“左”倾路线统治的时间是很长的，后来彭、陆、

罗、杨他们又接上来。主席从遵义会议起到 1945 年七大时止，十年整风，把党的作风算渐渐地培养出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就在党校的整风中，彭真还插一手。主席在七大是指出来的，主席讲七大是团结会议。果然彭真这一个瘤子，二十年后爆发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在党内起很大坏的作用，许多高级干部受这个东西的坏影响，唯心主义多了，唯物主义就少了，形而上学的东西甚至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多了，毛泽东思想就少了。刘少奇引了许多孔孟的话，当然孔孟的话也有好的，可以借来旧词新解，但比起同时代一些比较朴素唯物主义者那就差得很。这一次把彭、陆、罗、杨揪出来，又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他们的世界观，这样子有利于在党内把主席的思想作风，大大地宣传发扬，在我们革命运动中大大地发展。

但是现在这个斗争方法确确实实是不利于向着宣传主席的方面走的，是不利于宣传毛主席思想的。我们觉得不能不出来说话了。我也摸了一个外交部的点，跟他们谈得比较深，今天跟你们谈得更深。我们的思想是要逐步发展的，要把党的干部作风通过你们传之后代的。我们寄希望于你们。但是照你们现在的作法，是不能传之于后代的。

你们总要把一个人斗臭，不是应当斗臭的，为什么要斗臭呢？要有个全盘估计嘛。一般地说，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个多月时间的错误，到底有多大，有的严重些，有的轻一些，有的还没有沾边，不能每一个人都有分哪。至于历史的问题，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那只能在专案上解决。否则，把每一个人 17 年来的讲话，都拿来计算计算，量一量，除非他不说话，不写文章。刘、邓二人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刘说的话多，邓就不大说，邓是事情愈少愈好，你找他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话少呀，找他的错话也找不到多少呢。做事情总得说话，开会讨论问题总得发言，不能每一件事都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呀。我们几个文件里都说了的，《十六条》说了，以后的文件也说了，就是说过些错话，做过些错事，写过些错东西，这要区别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区别于反动学术权威。应有区别。

这样，就比较快一点了。比如一个部开几次会，副总理到，我们分口子了，我不能每一个部都到，不可能。比如我们财经口子，我们开那么一个大会，先念同志也跟陈毅同志一样，讲一点自我批评，把他应当承担的责任讲一次，给他个机会。大家听了，然后再分部去开，让部长们讲讲，司局里开会叫司局长们讲讲，也不要每人都过，人人都有份。有些人没有管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嘛，他业务上有些错误就可以在平常的会议上解决嘛。部里开一两次会，司局分开来开会。这样子过了以后，就排排队，从监督业务，进入到三结合，上、中、下三结合，建立以群众代表为基础的革命委员会，就可以把夺权斗争走到一个正确道路上去。希望你们在财贸口子树立几个典型，你们几个学院应推动前进。业务现在限制于监督，然后走向于三结合的监察。这个我们还要抓典型，财经大会我还是来，文革小组我们都准备来参加一次，这个会由国务院来召集，先把你们各部的问题弄清楚一下子，这样子就可以了啊。这方面，还是你们带了头的，这次再打个头。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哪。(这时财贸联委会负责人敖东立起来对他同意杜向光、葛复村参加今天的会议等问题，做了检查，并表示了态度。还有外贸学院一女同志起来发言，均略)。

525. 李富春在接见工交系统红色造反联络站代表时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2 月 16 日、17 日)

目前形势发展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夺权。这个夺权，本应按照主席思想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要夺无产阶级当权派的权。但夺权的影响，连锁反应，都在夺权，没有区分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由于连锁反应的结果，都在夺权。夺权，特别是各部，不能千篇一律象上海、山西一样，夺党、政、文、财大权。各部的夺权，应区别对待。第一、是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第二、夺对业务实行监督权，因为业务

工作虽然过去的业务有修正主义错误，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从三年大跃进经过三年困难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几年是有提高、有进步，比较贯彻毛主席路线。这中间有刘、邓路线干扰、作怪，如托拉斯，只是强调集中。而不是毛主席所提出的分级管理，集中和分散相结合；不强调走群众路线，只强调行政的统一，这样也干扰了毛泽东思想，也危害了主席的红线。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常常受到刘、邓黑线破坏、干扰、危害。当毛主席亲自抓时就见效。如三年大跃进，三年困难后的八字方针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在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亲自出来掌舵，如毛主席提出的八条(按：指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所指的八条)，其中有五条都是经济建设的，如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等等。因此工交战线上，要一分为二，要看到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在关键时刻起主导作用；也看到刘、邓路线的影响。不一分为二，看不到毛主席的红线，就不符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

526. 谢富治接见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座谈纪要 (1967年2月17日)

谢副总理进来，看了新北大红旗兵团发表的传单后说：“为什么要发声明？这个作法……”(摇头)。又看了一张登有许多照片的传单后说：“这不是反动的吗？你还给他宣传，这是给敌人宣传，这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一定要严肃处理。我不管他是哪的联络站，都要取消他，你不处理，我就派人处理。

谢副总理一一点名后说：跟你们商量一件事情。春天到了，北京市三结合还没解决，又要搞座谈会，听听造反派同志们的意見。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在毛泽东思想红旗下，革命造反派要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实现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

对北京的形势，北京和其他地方不同。就是六月三日改组了北京市委，到现在已是七个月。又是第二次夺权，又是首都。夺权的事还要商量。今天要谈就是一件事。对市委书记要给他们一个检查改进的机会。给他们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条件。在检查错误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来判哪些人好些，哪些人差些，哪些人更好些，哪些人更差些。今天还是商量这件事。北京市哪些干部可以三结合，在给他们作工作，那里有错误那些检查，给他们自由，不要限制自由。(有的代表说：我们没有经验，要革命干部站出来)你们要给他们自由，不要老关在房子里。

各级要三结合才行，不然疏通不开是不行的。

(有人提出市委、市人委中的一些人，不听话不干工作。副司令员说，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三结合嘛。)

这是一个好办法，上海有一个。在三结合以前有过渡时期。你们讲的有道理，要创造条件。我问张春桥上海的情况，他说还是按产业系统搞好。不要分得太细，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等。

(夺权委员会的代表要成立一个春耕火线指挥部)谢副总理看了关于火线指挥部的建议后：这是好办法，这个办法不错。上边加以承认。要有干部，要有造反派的工人、农民、红卫兵，解放军也派人参加，成立一个指挥部，有十几个人，由刘建勋负责召集。只要是革命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的，那就可以合在一块。

市委的同志在不同的程度上自己犯了一些错误，要让他们开展工作，将来一定有一些人要参加三结合，不管怎样，要给检查的自由，工作的自由，不要老派两个人在后跟着，那样不行。

不要互相打架了，不要写互相攻击的传单了。不要随便抓人、骂人，不要骂狗头、狗崽子了。有错误可以揭发批判嘛！

生产任务一定要有人来抓，不管是什么方式。至于几派的工作问题，都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不要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自己要批评自己。要看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都要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都要在中央文革领导下，共同对付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要抓革命，促生产。

现在要防止打倒一切。有一种是左派，他们打倒一切是偏激。这种人工作好做。有一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觉得把别人都打倒了，自己就无所谓，还有那些地、富、反、坏、右也是提打倒一切，要注意。

检查时间不要那么长，四个小时就够了。

527. 矫玉山电话传达陈伯达的意见 (1967年2月17日)

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揪、再斗穆欣了。你们已经斗穆欣好多次了，有什么材料给我们写一个报告。

这是陈伯达同志的意见。

二月十七日

528. 关于联合夺权问题走访《人民日报》编辑部问答纪要 (1967年2月17日)

接待者：编辑部缪俊杰同志

问：怎样理解大联合、大夺权。

答：我们指的联合，是革命造反派的联合，是一个单位革命造反派的联合，如果夺权以前没有搞好联合，在夺权斗争中要搞好联合。不能一个组织搞山头主义以我为主排除别人。要联合起来，但对保守派组织不能联合，不搞协商会议。因此联合要在斗争中形成，在夺权中逐渐形成大联合。不能自己搞排除其他左派，保守派组织不接受，对其中的人可以分化争取他们。

问：如何看待群众基础呢？

答：要抓两个方面，第一，首先看你是否正确(指夺权)。第二，群众逐渐的拥护。有这么几种情况，有的单位左派组织明显也占了大多数，如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是否一定要人数的多数？不一定，但夺权后必须团结大多数，把大多数团结到自己这边来，不然团结不了大多数，夺权也没有用。可能夺权前不是多数，但夺权后必须团结大多数。革命派夺权的即使是少数，但也要多做工作，多团结群众，夺权不是夺印，夺办公室，而是夺人心，人心所向。保守派夺权，即使是多数也不行，有的当权派也把印交给占多数的保守派，这样也不行。夺了权的组织不要“私”字当头。夺权不是几小时的事，要有个巩固过程，要把群众夺过来。省市一级的夺权，必须有三结合，否则我们不承认。

问：你如何理解夺权斗争中的大方向？

答：首先要看夺权是否是夺权，这是关键。再看：你是否坚持毛主席指引的大方向。夺权组织内个别人退出去，也不影响大方向。群众发动的不够充分，时机还不很成熟，舆论造得不够，这是夺权斗争中的缺点、错误。有缺点不能说是方向错误，重要的是你执行不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如果夺权了，不执行政策，如：不反对经济主义，相反的推行经济主义，这才是方向错误。只要是左派组织夺权，方向就是对的。他们有错误必须改正，如果不改正，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但是借缺点来拆左派的台是不行的，就反击。成员中有真正坏分子，

也要清洗。

问：在夺权时，有的革命组织没有联合进来，应该怎么办？

答：夺了权的革命组织，应该“公”字当头，不能把革命左派关在外边，要把真正的革命左派联合起来，共同掌权。如果你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其它革命组织夺了权，没有联合你，自己的态度应该明朗，积极支持，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如果站在保守派一边，与保守派联合，就会滑到自己的反面。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如果仅仅因为革命派没有联合你，你就去跟保守派联合，这就说明你本来就不是革命左派。

问：“自下而上”夺权怎么理解？

答：所谓自下而上的夺权，就是群众起来，要求夺权，并且由群众实现。

最后缪同志谈到：目前存在着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北京有，外地也有，他们否认无产阶级权威，无限造反，无限夺权，建议我们好好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529.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967年2月18日凌晨 中南海小礼堂)

周恩来总理讲话

昨天同各部的造反派谈了一次，八个单位，加三个财贸院校以及粮食研究所。一般谈的还好。我们首先在财经战线上试点，提倡造反派实行联合，首先成立了北京的联络站。也曾想要联络站派些人到全国各地去，已经派了一些是我们同意的(啰)，去作些调查研究，了解一些财贸单位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我们也开过反对经济主义、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誓师大会。运动现在已经发展到夺权阶段，强调夺权问题，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开始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思想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林彪同志去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很清楚。这一场革命的任务，不是一个短时期，而是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才能解决的。我们夺取政权，又进行经济的、政治的革命，文化上思想上的革命，这个革命在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从来没有搞过的，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们建国十七年之后，亲自领导我们发动了这一场伟大的革命。全国几万万人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场革命中都有两重性，我们既要争取做一个革命的动力。但是，必不可免的还有另一方面，又要做革命的对象，要破旧立新。不能光站在指挥位置上去指挥别人。这场革命的广度、深度，都是不可比的，它要把一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统统冲洗掉。但这个革命有一项主要的任务，这就是从我们解放战争结束以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继续。尽管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夺取了全国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们是依靠农村包围城市，用我们的革命武装力量扫平蒋介石的军队，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用自上而下的办法，接管了全国政权，那里敌人的军队被扫平了，就在那里接管政权，不是每处都是人民自下而上发动起来自己去打江山。这样，革命的深度就不够，政权也不够巩固。尽管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同于国民党。有许多国民党反动政权人员我们都包下了，这种包下来的方式，在当时的好处就是和平解放，减少一些战争的损失，但许多旧社会的东西也都一起包下来了。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但武装斗争结束后的土改，大体上和平土改的性质多，激烈的阶级斗争，比战争时期缓和得多了。解放战争以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活动，比如：解放初期的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倾等等斗争，到一九六三年后，全面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是夺权斗争的继续，都是为了把占据领导地位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去。无论是从思想上清除，还是从组织上清除，但这些都是采取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重点都是由上而下地领导发动，唯有这一次是在过去历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础上，在国内外形势很有利的情况下，发动了自下而上的大民主运动，是有领导的，但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四大民主，把宪法上规定的几项权利真正的兑现了，的确把群众真正发动

起来了。正因为是高度集中的领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社会主义道路，按十六条办事，这些都是些大的原则，大的方向，实行四大民主，波及面广，各方面的触动很大，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目标广，来势猛，但各级领导在精神上一般的都没有准备，正象毛主席批评的很不理解，很不理解就很不认真了，很不得力了。彭、陆、罗、杨被揪出来了，来的很猛，一九六五年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个信号，到十二月罗瑞卿被揪出来了。林彪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着重提到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我们不仅要夺取政权，还要巩固、保卫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政权，防止我们的头糊里糊涂的丢掉了，这就给我们敲了警钟。就在这个会议后，去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群众马上就发动起来了。但就在这时，领导上却与此相反，出现了刘、邓路线，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维持旧的统治秩序，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完全相反，在五十多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向各学校、机关、企业派出工作组，各个单位几乎都去了，用工作组代表党，实行一条错误的路线。这条错误路线在全国带有普遍性，真是不胫而走，全都实行了，中央各部也自不待言了。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主席的领导，没有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用工作组这种方式来维持旧的统治，全国到处都跟着走。毛主席还健在，全国就无一例外地都执行了刘、邓路线，如果不纠正，继续下去，不就不知不觉地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了？一九六三年主席就曾经说过要防止党内一两个有威信的人带错了路，舒舒服服地变成了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主席又提出要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地方敢不敢造反这个问题。到一九六六年就果然出现了，真是不幸而言中，这是主席英明伟大的预见，试想如果彭、罗、陆、杨的阴谋成功，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头要落地。这是一种赫鲁晓夫式的，是政变的形式。另一种方式，就舒舒服服地走向修正主义。试想要是主席不在，你不就跟着错下去了吗？那时候就不单单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了，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都要变颜色的问题了。现在把问题揭发了，在党的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我们大家要为此而庆贺。这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问题，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认识，在过去半年里，我们同志们受到一点委屈，受到一些过分的批评，健康也受到一些损失，我们个人付出这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付出这一点代价，从而保证了我们党、我们国家不变颜色，使世界革命加速走向胜利，我们个人这点损失只不过是大海当中的一滴水而已，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月来，我总是以此来鼓励大家，同时也勉励我自己。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看到光明伟大的前途，认清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个人付出点代价是值得的，当然，我们对一些事也不是听之任之，有困难就要去努力克服，争取少走一些弯路，少受一些损失，这是我们作为领导的责任。但是，即使如此，也总要有一些损失和伤害。我们应当辩证地来看这个问题，要尽力减少一些损失和伤害，但要认识到这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革命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在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国里实行如此巨大的民主，是举世无双的，它非冲击一切不可，它的发展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是事先不可能完全预见到的。六月一日开始公布第一张大字报，全国马上都动员起来了，不论是大中学校、党政机关、科研单位都毫无例外地行动起来了。当然尽管工作组那样的压制，各单位都毫无例外地起来造反，也就是主席讲的一条真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能那个单位，只要有工作组的形式在那里压制、阻挡，就一定有反抗，这是一条规律，是毫无例外的。后来工作组一撤出，广大革命群众的巨大革命潜力就奔放出来，朝着革命的方向前进，就势不可挡。接着就出现了红卫兵，这在十六条中也是没有设想到的。新的事物它总是不会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来发展的。红卫兵这个新事物一经出现，主席就马上抓住，加以鼓励，加以提倡。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一接见，马上就迅猛发展，冲向各学校，又从学校冲向社会，从北京冲向全国，直到农村，全国大串连也就出现了，当时十一中全会刚刚开始传下去，红卫兵就到了，各省市委都没有准备，加上主席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时也开始传达下去，开始是不管你是那个司令部、任何地方都打，这种斗争局势的形成，带着普遍性，连锁反映。当时各个革命组织的思潮起伏不定，初期也分不出什么左、中、右，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反复过程，十月份我们

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分化和改组，形成了革命的左派力量，我们加以支持。十月、十一月两个月，我们除了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大串连以外，当时还面临着繁重的生产任务，开始，我们在九月指示中曾企图把运动暂时性的限制在十六条中已指出的大中城市、大中院校和党政机关中，但革命的洪流既然已经冲了出去，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按着它自己本身的规律前进了，这不是任何主观愿望可以限制得了的。当时在抓了三秋之后，曾设想将农村文化大革命纳入以四清为主分期分批地进行，但实际上这已经不可能了。工业方面，抓革命促生产起了点作用，但是要分期分批也已不可能了。尽管都有指示，但革命的群众运动仍然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前进，这就逼着我们在十二月九日，十二月十五日发出了两个十条，来代替九月有限制的文件，如果我们在九月份能够预见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不会把运动约束在一个临时性的措施上，而将十二月的文件早一点提出来，这说明，我们虽然都在主席身边，紧跟、紧学，但还是跟不上，仍然延误了时间，这也说明我们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但不理解，就是理解了，跟不上也不行。

再看财贸方面的情况，在运动中，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也不是我们原想像的那样坚决。这条反动路线既然在财贸各部门都起过作用，这就说明有它的思想基础，不在这个地方表现，就在别的地方表现出来，在财贸方面的表现就是经济主义。开始，是用抓生产来压革命，压不住了，就倒下来了，什么都答应，结果大大助长了经济主义的发展，这在去年第四季度更为明显。当时，全国许多问题都出来了，临时工、合同工问题，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题等等，全国出现了许多组织，如荣复转退军人组织，许多起行业，跨部门的组织，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象政党一样地出现了，六五年毕业生的问题也出现了，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组织，带有封建的行会性质。串连的发展，使许多人自由离开生产岗位，业务岗位，财政支出也增多了，红卫兵中也出现了一些浪费现象，以及化公为私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抓，也抓得晚了一些。反对经济主义的五条，到一月十一日才发出去，比上海工人阶级还落后，他们在一月五日，就以三十二个团体的名义发表了告上海市人民书和十条紧急措施。在政治方面，公安六条也在一月十三日才发表，实际上，问题早就出现了，破坏社会主义的秩序。我们的大民主，要冲垮的是一些旧的东西，革命的制度是要保卫和巩固的，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这方面，我们也抓得晚了一些，拿军队来说，发了总政的指示，现在看来，这个文件粗糙了些，它起了动员作用，但也有些副作用。几个月来，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军事工厂等，形势也是不可阻挡。但军事院校对军事指挥机关冲击也是没有预见。在北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在三座门，经常有很多人在吵闹，有些是不完全符合革命要求的，也是未能预见到。这些事都教育了我们，最近发表了军委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这些都说明一切问题，由于运动如此迅猛，我们抓问题，总是比客观存在要晚，这也说明了总要先出事实，再去总结经验，作出规定，否则，也只能是一般的号召书，要是先作出些规定，就会不切实际，要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但是既然地平线已经出现了事实，就要快抓，要有预见，我们紧跟主席，总是不够。现在运动是更加深入了，已经深入发展到工矿、企、事业、科研、农村，全面展开了阶级斗争，运动深入后，现在又发展到夺权斗争。自从上海发表告人民书之后，中央就紧紧抓住，在宣传、报告等中都讲了，但来势凶猛，也并未预计到，我们主动号召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预先告诉他们要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业务的监督权，尽管如此，各部夺权斗争中的偏向仍然产生，比如工交部门，就更猛，比较稳的是科研部门，损失少一些，开始，科委发展的慢一些，由上而下的分化，造反派从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当然，新的问题也就出来了，既然存在矛盾，不管用什么形式，它都是要出现的。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还有两类矛盾的交叉，各种矛盾又都在转化中，在这场夺权斗争中，要更进一步地来锻炼我们。我们许多同志，革命几十年了，武装斗争也二、三十年，现在在自己的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和保卫下，毛主席亲自领导着我们，让我们经过这样一场锻炼，这是我们莫大的幸福，这是我们所不可设想的，这是主席早有设想的，这就是领袖之所以为领袖，我们之所

以为我们。现在斗争更加激烈了，但是有前一段的经验，总是可以搞得更好一些。虽然在过去一个月里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但有了前一段的经验，就更好办些了。要总结经验，比如象一些没有业务的单位，就可以让它乱一下子，象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那一窝，一个大叛徒领导了二十多年，让他好好乱一下，把一些牛鬼蛇神都揪出来。象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监委和他们虽然不同一点，但领导人多数也是不好的嘛。还有工、青、妇群众团体，除了少数一点对外的国际业务活动之外，也是彻底闹革命，青年团比起红卫兵来，是大大地落后了，党校不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是宣传修正主义，就要彻底破，破了以后再立新的。象有些部门就不同了，如中央办公厅、中央联络部等，就要边抓革命，边抓工作。在政府部门中，如文化部烂了，除了文化出版工作之外，可以停一个时候。象教育部，是放假闹革命的，其余的部门既要抓革命，又要抓业务。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夺权，要将试点中已出现的偏向，热忱的帮助造反派去纠正，不能超过监督业务的要求，这方面，就要讲清夺什么权，在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否则就要使业务受损失，因为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是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我们说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党、政、财、文大权，那是讲的地方，中央各部都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即使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是各个部都如此，如果确实有，就可以提出来，经过中央批准撤换，就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是每个人都沾边的，执行了，责任也有轻有重。各部造反派自己夺权，也不向中央打个招呼，这怎么算合法？我最近向造反派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句话主席问是从那里来的，据湖南的造反派说是一九一九年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一句话。主席说，那时候还是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那时尽管已在十月革命之后，但共产主义思想是在一九二〇年之后才传播到我国，当然主席是首先接受它的，怎么可以把主席那时的讲话拿到今天来用呢？这句话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什么人都可以用的。主席是最严格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比如诗词，主席在湘江师范时就作了，但从不拿出来，据说肖三还能背出几首，他也不承认，选诗都那么严，选用主席语录就更应该严肃，我们用时要非常严格。主席说这话不能再传了。现在发现有的根本不是主席的东西，也说是主席的，连反革命分子邓拓的诗，也有人给加上主席的名字，真是岂有此理。

夺权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承认，不登报，不广播的都不算数。这话没有向造反派讲，你们要传达给他们。刚才来晚了三小时，就是因为江苏省夺权的问题，他们一月二十六日夺了权，要我们表态，我们研究了他们的情况，表示我们不能登报，不能广播。他们说中央不发表，我们新华日报发表，我说你们一定不听我们的劝告，要发表我们也不管，但要遵守两条：一是不准点名，因为点名的权力属于中央，那是定性质的问题；二是不能成立什么组织，因为你们没有左派大联合基础上的三结合，你公布了，别的组织也不会同意。最后他们只愿接受第一点，不接受第二点，这样我们就不能同意。这同样适合中央各部，只要中央不吭腔，就不能算夺权成立，如果那样，就会夺来夺去，中央各部如果把业务监督权变为领导权，我们就要考虑另外一种形式的夺权，北京公安局就是个例子，政法公社要夺权，我们让他们去试试，可能会因此使公安局内部发生分化，使内部的造反派壮大起来，但夺权二十天的实践证明，因为外部为主，同时他们将内部造反派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夺权后让长字号的全部靠边站，群众把一切都担起来，遇到外部有压力时，又一致对外，使内部分化不能发生，在执行任务当中也出了不少乱子，只好进行军事接管，这么作是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天津公安局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局内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实行假造反，结果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连交通警也撤了，但天津的广大人民群众很好，并未出什么大乱子，但这局面究竟不能长久，后来只好实行军事管制，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这件事又证明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心下得对，充分说明人民对党、对政府多么信任！

我们财贸部门大概不需要这样，因为昨天造反派都同意中央这个精神。财政部有一位副部长叫杜向光，他参加了造反派，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他明明知道国家财政大权不能夺，就是监督也是有限的，但他却要站在造反派方面来夺中央的财政大权，借口说吴波是黑帮，理由就是吴波同志参加了桃园大队的四清，这怎么行呢？参加桃园四清的人多了，那全都是黑帮了？（李副总理，他是要把吴波打成黑帮，当部长，吴雪之也是要把姚依林、王磊打成彭真分子，当部长）。我和刘少奇在政治局共事就二十多年，那也全是黑帮？要是年青人提出这个问题来，可以允许他们犯错误，但部里的造反派就不能允许，这是有意向党伸手，证明这个杜向光不简单，财政部夺权后，觉得吴波同志身体不好，应该休息一下，杜向光已亮相，我们还相信他，我和先念同志委托他去向造反派转告中央的指示，党组由他来暂时负责和造反派联系，他公然拒绝！对总理指示要保留，这是反党反领导的态度，后来让他回去好好想想，但仍不执行，并鼓励财政部造反派向我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召集造反派开会，名单上没有他，他也来了，三次请他出去，他都不干，一再违抗我的命令，刘振玉居然说：“我们造反派叫他来的，如叫他回去，我们都退出会场！”我是仁至义尽，先礼后兵，在群众情绪激愤的情况下，只好叫解放军当场将他逮捕起来。

我们已告诉商业部，姚依林不是黑帮，他不是彭真的人，彭真是找他谈过四次话，他都告诉我们了。最近姚依林身体不好，不能支持了，他们那样斗法，是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我们要他休息几天好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这件事，可是还要下通缉令，说什么窝藏不报告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这是造什么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通缉姚依林，就是通缉我了！（先念同志说：我要求造反派把昨天总理讲的话，原原本本地传达，不然要放录音，李尚平为什么不来？王田的平反不算数！总理召集会议不到，这是蔑视中央，蔑视总理！）昨天财政部造反派当场说要把那封信收回，但实际上并未收回，十七号已过了，今天是十八号，再给他们一天时间，如果不收回，信在我手里，我就印发给所有的造反派，要大家来批判，（先念同志说：一定要公开检讨！）造反派既然当众声明了，大家听到，也看到了，回去以后怎么又贪污了自己说过的话呢？这种作风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中央规定业务权只能监督，超过了限度，就要走到邪路上去了，如果我们随便承认了，就是犯罪，造反派应该比我们更好嘛！要培养、成长自己的好作风嘛！从我们的党创建那天起，毛主席就为我们建立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作风，我们要把这种好作风传给后世。也在建党的同时党内也同时存在着另一种不好的作风，它是和毛主席的思想作风相对立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这种坏的作风一定要把它排除掉，肃清掉，我们怎么能够看着他们学这种坏作风呢？蒙混，先定罪名再找事实，中央未批准就给戴上帽子，中央批准的军委八条所说的那些，都是不能允许的，部的造反派更加不能允许！现在有些地方，无休止的斗争，就是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说了的，那种无情的斗争，残酷打击的坏作风。这种现象如果不指出，放任这种歪风邪气，就会让青年去养成这种风气。如北京的东西城纠察队，在运动初期很好，有功劳，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进行教育，以后就打人，杀人，又转入地下活动，只好取缔。开始他们讲红五类黑五类，我们劝他们不要这么说，但不听。时间不到一年，其发展速度却超过十七年。对于这种不好的作风、不好的方式方法，要告诉青年，要告诉二、三十岁的干部，不要把它当成是对的，我们不说，就是犯罪啊！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今天有些人要斗薄一波、安子文，我就再三地警告他们，要讲文明，按主席的方法去做，不能有那些恶劣野蛮的作风，照出相来，画出画来，贴在大街上，敌人马上就会给转出去了，这样对党对国家是不利的。有骨气的共产党员，对于这种事情要拒绝！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对党对国家如何评价的问题。林彪同志去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天安门的讲话，已经说得很清楚，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丑化形象。青年人可以犯些错误，但我们要告诉他们，部里的造反派就不行了。否定这个人是可以的，但只有真触及灵魂的批判，对党对人民才是有益的。

中央每个部不是都必然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把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和创造、提出这条路线的人等同起来，况且各人所犯错误有轻有重的不同，也有根本

不沾边的，只要作一两次认真的检查就行了。有些人，一定要把每个人都算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才能夺权，怎么能有这样逻辑呢？开始造反派里没有领导干部，现在可以逐步吸收一些长字号的，对于犯错误的干部要区别对待，至于他在历史上是否有问题，可以调查研究，首先报告中央。当然大家所共知的一些事，也可以批判啰！一般地说，路线问题检查一下就行了，半年了，六个月之久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不是党要采取的方法，我们要出来说话，对于干部要区别对待。允许造反派夺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对业务的监督权。但这还不能更好的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还要进一步引导三结合，由部门的领导干部，中层干部，群众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监督这个部的工作，使我们一个部的党的业务领导工作有人监督。过去的监察组起不到这个作用，因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这次通过文化大革命运动，创造了三结合的办法，革命的领导干部，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参加，中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组成革命委员会，共同来监督这个部的工作，这样，这个部的工作就既有自上而下的领导，又有自下而上的监督，双方可以互相制约，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毛主席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了，我希望能再夺权中实现这一要求。这话我在外交部已经讲过了，也准备叫他们试一试，现在又在你们这里说了，要求你们实现这个要求。工交部门我也准备去说，还有政法、国防部门。科研部门已有了一个雏形。还有文教部门，这还没有排上我的工作日程，文教部门目前最乱，其中比较急的是卫生部门。现在希望财贸各部在试点上作出成绩。

各部部长、司局长，还要转告所有的处长、科长，都要振作起精神来，要敢于创立工作条件，勇于负责任，现在已经和造反派都说了，自然还需要先念同志一个部一个部地再做工作。各部自己也要做工作。要准备在二、三、四月里能够作出个眉目来。不能再晚了。否则生产任务在二季度赶不上来，自然各部发展不平衡的。要先进推后进。我们支持你们工作，也支持革命造反派，把革命搞起来，运动发展到现在，要转到更健康的水平上来了。毛主席现在整天思考各种典型。我们一定要紧跟主席，紧学主席，你们有困难可以提到财贸口。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业务监督我通过先念同志和各部取得联系，各部党委也要和监督小组联系，大事要干预过问。但是，两方面的任务不同，有些国家机密性的，监督小组就不能都知道，否则就和马路上的大字报一样，很多消息都是不胫而走，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从那里马上传到全世界。所以有些问题还必须区别对待，各部部长、副部长，都要负起责任来，下礼拜我们还要找一个机会，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对各部、各院校造反组织，以及各部门的处、科长们一起宣布一下。今天，在这里只说个大体，作为试讲，不够完全，或者再做些修改，但总的讲没有错。今天讲的这些，都可以向处、科长和造反派讲一讲，昨天基本上也都讲了。

今年二、三、四月，夺权要看出个眉目来，明年二、三、四月，要看出个结果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主席的设想。

干部有的提，有的要罢，要罢的也是百分之一、二、三，当然好的还是多数，就是撤职也可以留用，再观察一下。定期考察，以观后效。当然大多数还要继续留用了。当然也要提一批。总不能都是老人嘛！不然怎么能吸收新鲜血液呢？各部机构怎么缩小，那是明年二、三月的事，也许要更长一点时间，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斗争中学斗争，战争是大的风浪，文化大革命是和平时期最大的风浪，你们都是四十岁以上，五十岁的人也不少了，保持晚节的问题也提出来了，要保持晚节，就要到斗争的大风浪里去锻炼。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唯心主义的，过去有人向他提出过，他也没有改，毒害了不少人，这次批判。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加强我们的修养，毛泽东思想的修养，就是要在斗争中去修养，这一次就是最大的培养，能在主席健在时，得到这样的学习、锻炼，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如果你们大家有委屈，我向你们道歉，不要造反派向你们道歉。是我们领导的工作做的不够。希望大家振作起来，在斗争中锻炼提高。

李先念副总理讲话

你们当中吃了一顿批评的人不少，吃点批评，有好处，有个锻炼嘛！刚才总理讲了，文化大革命在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胜利一天一天大。你们受点批评。感到有点委屈，总理向你们道歉，我也向你们道歉。群众起来了，很好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青年同志对主席语录学得也比较多，也很熟悉，但就是有的时候用的不大恰当，这要原谅他们，有时把内部问题也引用处理敌我矛盾的语录，不恰当，但我们要保护他们的热情，我劝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主席的思想，我们要坚决依靠群众，信任群众，站在革命左派方面。但必须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方面，这是主席的原话。

真正的革命左派，必须是坚决按照以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致于犯大的错误，就是犯了也能马上改正。也应当允许他们犯些错误，要保护他们的革命干劲，但他们究竟年轻，经验少些，组织能力弱些，我们还有个带班交班的问题是嘛！真正的革命左派，我们一定要站到那一方面去，要善于和他们合作，保护他们的热情，不要泼冷水，他们犯了错误，要热情帮助他们改正，帮助他们进步，提高他们。我们无论如何要做到这一条。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是作得不够的，有时做了一点，开了不少左派的会，他们也不大听，有点不大相信人，说那么多黑帮，你李先念就不是呀！有人到现在还不死心，还要把我打成黑帮，说彭、罗、陆，杨是黑帮，你李先念不是才怪呢？他们有些人这么想，年青人，也不怪他们。我还不象你们，我没有本钱，什么罚站，弯腰！但大字报不少，有打倒的，有火烧的，也有来揪我的，揪我的也是财政部带的头，大概是我这个部长太坏了，该找个好一点。我给财政部司局长们开了一个会，中心意思就是要他们支持左派，可是他们说我们开一个黑会，开的是红会！什么是黑会呢？要他们去支持左派！这条方针是不变的，要支持真正的左派，对他们的错误，也要采取谅解的态度，有的人已经不行了，我们已经指出了。革命派，既要有革命性，也要有科学性和纪律性嘛！有人就不大实事求是，当然也要看对什么人？对年青人的要求就不能太高。但是干部讲话总要科学性一点吧！但有时讲起来也就不大科学了。煽动性的话就不好，此风不可长，这对青年有什么好处呢？为青年带出一个什么作风呢？没有好处嘛！当然，也不可能每句话都那么正确，要求也不能那么高，我们说话走火就多得很，把话讲错了。王田讲他是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的，姚依林，王×是错误路线，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应该实事求是嘛！曾老，你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我们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对左派要求不能那么高，青年干部嘛！犯点错误只要愿意改就好。你们受了点批评，不要有情绪，还是要鼓足干劲，对造反派说的话，昨天晚上回去后，有些单位没有全传达，要求他们全文传达，和今天跟你们讲的话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总理讲的很全面，是主席的思想。总理对我们花了很多的力量，开了很多会，可是造反派却不能原原本本的传达，这不好，如财政部吴波问题的性质就未传达。上次夺权总理接见回去传达说姚依林问题的性质未定，问题严重，还要大批大揭，是不是这样讲的？今天不是都讲清楚了吗？商业部通缉姚依林，说窝藏不报的以破坏文化大革命论处！这明明是通缉我们嘛！一定要收回，要做公开检查！

所有的党组织都要恢复工作。今天讲过了，党组开会可以请他们参加。陈洁同志，你的电话安起来没有？(陈答：没有)要他们安起来，已经交代了嘛，为什么还不安呢？大家工作要有勇气，要有干劲，要从大的方面去想，不搞修正主义，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千秋万代扎根，这是大事。对干部要求，严格是应该的，批评起来有些过分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党内斗争也有时脑袋一热就说过头话，一九五三年我批评薄一波就很尖锐，说过了头，毛主席批评我是大炮，批评的对吗？那话拿到一九六六年就对了。(有人提现在还不让开会，不叫两个人在一起谈话，不让看文件，二、四、六还要送大字报等)要你们大鸣大放十天也放不完，我知道你们的情绪，要看大方向，要看大局，不要看几个人的小局，斗争方法方式不对，总理批评的很严格，不过老是交代政策，恐怕群众也起不来了。要他们纠正错误也要有一个过程嘛！一点一点提高就改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杜向光的表现是对抗中央，过去未察觉，对他是信任的，二月二七日那一天见面，他开始就向我读一段语录，来势很猛啊！这时我才开始引起警惕，既然是个野心家，抵抗中央的指示，拒绝执行总理的命令，把造反派的方向搞错了，不对头，这种行为当然不能允许了。所以当场逮捕，要他隔离反省，检讨，再看看还有希望没有。杨树根同志来了没有？（杨说来了）明天派一个人去一下子，要他检讨！王学明贴了我十三张大字报，我都交给总理了，说什么我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有那么几条确有其事，但给夸大了，有几条就全是捕风捉影，我对何畏总是老保，这次他要不是对姚依林拿出四十八条，我还不死心哩！过去看错了。他为了保自己，反动得很。

大家要同真正的左派好好合作。

530. 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

（1967年2月18日下午 国务院会议厅）

按：接见时，李富春、聂荣臻也在座。

周总理讲话：

今天是和国防工业各部院、国防工业、国防工政造反派负责人谈话。凡是部外、院外、京外的单位，我们没有邀请他们参加。按规定，应当是本部、本院、京内的造反派。如果不是，那我问到你们时，你们声明一下。例如“全无敌”中有二位哈军工的造反派要来参加，我们不同意……。

周总理问：你们（二机部）现在对部的权还是监督吗？

二机部代表：业务监督，党委靠边站。

周总理：你们没有报过中央呀！也没有叫你们监督党委的领导权。同志们，你们简直是没有边了。你们造反精神很好。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只能叫某个人靠边站。革命不能革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到毛主席头上。要知道党委从哪里来的。

二机部代表：党委刁难我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周总理：故意刁难，你们就告状吗。领导革命，监督生产是同意的。你们不能头脑发热，我们允许你们夺权，你们是在我们号召下，但是，有限范围。中央各部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是有限的嘛。文化大革命由学校发展到机关，学校先搞，放假闹革命，又成立红卫兵，这两个特点，成绩就大了。机关有业余加上机关红卫兵组织有反复，红卫兵过了三十岁就不能参加，后来想改成革命组织，年龄不限制了，这就晚了一步。机关比学校晚了一步，这没有什么，可能更健康些。接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企业是分期分批，机关不能不受一些影响。等到十月以后，工厂、农村两个十条发表了，就有根据了。现在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夺权阶段，运动就来的快了。我们号召你们机关夺权，一般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这是再三声明的。业务属于国务院，中央各部党委直接属中央，即使你们造反团领导层成员是党员也只能领导群众组织，要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是赞成的，要夺党权就是夺毛主席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权，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想搞夺业务权试点，但不成功。成立了革命班子，业务班子，由于没有全面经验，容易根据一时决定，他们也不善于请示汇报，结果广播事业局出了几个问题。他们领导业务，把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完全排开了，就不行了。（举例：略）宣传大权属于中央，应由中央选派，由各方面代表监督业务，必须三结合。我们应该提拔一些新的青年积极分子，新的积极分子上来要有个熟练过程，否则不行。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

财政部有个副局长杜向光出来亮相参加了造反派，好啊，要他与造反派商量监督业务，

我通过李先念副总理把几点决定通知他，他拒绝接受，说我是造反派，国务院的指示要保留，毛主席的指示我也要保留。党章上规定保留是允许的，但不能不执行，这个党员连党章都忘了。第二，他说我们财政大权就是夺定了，拒绝召开党组会议研究今年预算，拒绝接受国务院指示，要夺中央财政大权。我们再叫他来，他也不来。好！我就召开财贸口造反派会议。

今天我给你们谈，明天或者后天，我要召集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来开会，除党中央已宣布的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我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我们有中央领导，不能拒绝中央领导、超越中央领导，你们宣布罢官，没经中央批准是不算数的。

财贸口造反派来了，发现这位副部长与一个副司长勾掉了二个人名字混进来了，于是我们联络员请他们出去，造反派说不行，如果要他们二人退出，我们就全部退出。与国务院如此对立。第二次李先念副总理来了，请他俩退出，造反派还是这样说。我想事不过三嘛，我来了，派了一个秘书叫他俩退出，他们还是不干。这样向我示威。他们还把印好的传单放在我面前，这是造反派惯用的手法，这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可以的，但也要按毛主席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他想利用造反派来伸手篡夺中央的财政大权。我把他对抗中央的情况告诉造反派，他就孤立了，造反派也不那么说了，我也来了个区别对待，副司长就一次混进会场，可不退出，副部长三次对抗要退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杜向光退出会场，我们把他逮捕，隔离反省。因为部长是我们任命的，群众是讲理的，真理绝大多数人是会懂的，但群众会一时受蒙蔽。你们掌握了文化大革命大权，在这关头，你们要注意，先给你们讲清楚。
×××同志(二机部代表)我说的这些话，一是对你一个人讲的，也是对大家讲的。

总理：图章也夺过来了，那就不是监督了，现在有些部长、司长、处长都靠边站了，主要是他们的责任，这些人想反正是豁出来了，不想干了，应付一下，放弃日常工作的领导。

现在把夺权意义给大家讲一下，借此把有些问题澄清一下。

全国解放以来，那是农村包围城市，解放军扫平天下，那是自上而下的任命，把国民党机关旧人员都包下来了，机关里侵入资产阶级影响，产生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49年夺权并没有结束，只是全国夺权的开始，剿匪反霸，三反五反，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57年反右又是一次清除，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1963年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前的运动是自上而下的发动，由自下而上运动相结合。以自上而下为主，四清也是这样。这次运动和历次运动不同，是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这次在最高领导下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五大(加大串连)基本上是四大，大串连不会经常搞，现在火已经点起来了，夺权斗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就不要大串连了。夺权必须讲清楚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必须做这样的分析，要看到十七年来还是毛主席的这条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否认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不错，有反动路线，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路线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影响很大，他们站在反动立场压迫群众，压制各种不同意见，有些地方围攻，围斗，有些地方拘留起来，这是十七年来性质最严重的。毛主席号召大家起来冲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冲击旧的影响、旧的制度。所以毛主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四大。十月份就把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了。又有补充规定，十二月份又出了两个十条，以后公安六条，军委八条，最近又有五项命令，这些都是为夺权作具体部署。如果说第一阶段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阶段，毛主席亲自抓了《文汇报》刊登上海11个团体的《告上海市人民书》，32个团体的《紧急通告》，跟着夺权斗争就开始了，当时估计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不一定那个单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会夺权，当时上海出现了接管风，这确是人民的要求，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只能因势利导。当时我们曾说过，除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也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书面的没有这样提。《红旗》三期

社论毛主席亲自看过改过，经过讨论，毛主席还是原来范围，否则各单位都是执行反动路线。各个单位也都容易安上，面就会扩大。造反派对这一类话，也不愿意传。

前些日子，三司写的《打倒“私”字，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夺私字权，比《红旗》三期还深刻。三司又写了一篇关于团结革命干部的文章，很好。我们推荐到《光明日报》上，也广播了。什么算顽固，界限也没有定，在社论第三段毛主席改过很多，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不是屡教不改的，也应该允许改正。如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出了，改就好嘛。有什么证明，不是 57 年的右派帽子就摘了不少吗？屡教不改，三次就不好了。对于杜向光我就采取了三次，他就决心与你对抗了，这点算礼尚往来。

毛主席说：“打仗必然退三舍”，我们允许他们改。你们会听我们宣布的。吕正操、武竞天，就是撤职留用，将功赎罪，限期观察，以观后效。听说铁道部造反派让他半天扫茅厕，半天检讨，就无法考察以观后效。给一定适当劳动很好，对改造思想有好处，不能老是劳动。缩小打击面，集中目标，打击主要敌人，这是毛主席一贯战略思想。夺权斗争对领导有改造任务。所以不反对每个部都夺权，这使各部都动起来，锻炼你们。但监督业务，不能成为妨碍业务。财政部连下达任务都不执行了。杜向光参加造反派，但这样的造反派我们不放心。你们国防工业更懂得了，监督业务，也必须十分谨慎。但据了解，各部监督都超过了范围。例如外交部，现在办文很快，但不深刻，不能分析，外交文件质量下降了，对国际影响很大。被动了。各单位夺权幅度也不同，彼此联系也不好办。我们打电话找各部部长就困难了。所以说监督业务要有分寸，不然业务就不灵了。

夺权要走向革命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处、科长)、革命群众代表相结合，互相制约，这是无产阶级的制约，民主集中制的运用，毛主席说过我们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监督办法，现在解决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面，监督一、二件事还可以，但是监督日常政治生活不行。机关中采取上、中、下三结合，就实行了监督，这样就必须使部、司、局长、科长一级干部，要使他们有职有权，但不是一概而论。一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执行错误，不是提出的人，要轻一些了，而执行的人越往下越轻，有的地方越往下越严，因为与群众有直接关系。一般的执行错误路线检查二、三次就够了，不要总是揪住不放，使干部和群众对立，就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当时我们长征时，经过草地，四方面军的头子张国焘，他反对毛主席领导，与中央闹别扭，建立第二中央，他还袭击我们，毛主席与兄弟单位不发生任何冲突，继续做工作，第二年，三个方面军就会合了。1937 年就批判张国焘，他搞分裂，陕北整风是，罗瑞卿对四方面军搞人人过关，一次检讨不够，总是检讨不深刻，把这些干部搞得灰溜溜的，毛主席和干部谈话，发现了马上就到抗大做报告，批评罗瑞卿的做法是错误的。毛主席还一再说，自己没有过问这方面的工作，张国焘路线以他为代表，就批判他一个人，其他同志受蒙蔽，只要改了就行了，一下子就解放了大批干部。主席去年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还在说这件事。这是主席的方针，只追首，不追从。后来张国焘逃跑时只有他一个人，连他的警卫员都不跟他去，这就是干部政策的伟大胜利，这段党史应该好好学习，执行的人检查，我们不能老说不够，不够，这就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抗日战争打过好几仗，所以整风后，全国团结，走向胜利，不是那么容易，这很值得注意。这次有二个月，我们对干部还这样下去，我们就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了，这样传下去，就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对干部批判有的地方还是这样，我看了很难过，不怪年青同志，我如果不把这件事告诉你们，你们再不断斗争，无休止检讨，这不行了，一个人检讨的确一下子不能深刻，一轰就不行了？隔一段时间，冷静了，检查又深刻了。现在斗争方式已经发展到如此：打人、挂牌、游街，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我们对溥仪没有用刑，把他改造了，把末代皇帝改造了，这是毛泽东时代的奇迹，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法呢？这是不好的作风，不能让年青人也这样做。三座们有的把照片、漫画贴在街上，马上传到香港，东京、莫斯科、传到全世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三座们贴的低级的大字报，我不愿意看，我们无产阶级斗争是光明正大，是政治

斗争，不能搞黄色低级的东西，街上标语是“砸烂×××狗头”什么狗头？人头嘛！当然啰！总得搞的轰轰烈烈，机关干部水平应该高一些嘛！

对干部要区别对待，贵州文件上就有五种。例如梁庸是叛徒，把他抓起来了。对另外一种如杜向光，暂时隔离反省，过了几天反省好，就不一定严格处分。有些临时采取一些措施，这是一类，这是极少数；第二要罢些官的，有的不能做事的，很少，有的撤职留用，考察一段时间；第三停职留用，在工作中考察，这一般是少数；第四监督留用；第五留用，这是多数。还要提一批，提到处科级、司局长甚至领导岗位，这是革命需要，还不少，把新生力量提上来，这是运动后期要实现的，在夺权斗争中也可以适当进行。抓极少数，罢极少数，调一些，留多数，提一批。这对于三结合，改造领导，改造业务有好处。这是设想，还未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这所以要说给你们听，一是使你们心里有数，想试试后再形成文件。这是监督业务所发生的问题。当然每个造反派可把你们对领导的意见提上来。领导参加造反问题，以群众为基础，逐步吸收“长”字号，不一定发展很多。这对造反派组织有好处。

造反派在政治上占优势，大方向是对的，当然不可避免犯些错误，保守派逐渐缩小，现在面临着造反派由政治上优势转为组织上占优势。到了组织优势就成为多数了，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你们内部问题就来了，就有左、中、右各种思潮。过去你们在外是积极的，他们是保守甚至偏右的，现在还包含到你们内部来了，有时就会出现右的。极左，形“左”实右的东西，要注意。

对你们部的各级领导可以提出意见，交上处理，在这以前，最好你们不开大会进行判决，这给党中央、国务院造成被动，现在你们不是一派，又是半党政(指领导文化大革命权)，最高权在中央、国务院你们这要承认。对于定性问题，对于党籍问题，要后期处理，现行反革命分子例外。

三机部代表请示总理几个问题。

一、部的夺权三结合怎么体现？

总理：部的领导三结合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

二、夺部的权以部内为主体怎么解释？

总理：以部内本单位造反派为主，而不是本系统。外面来的要回去闹革命，京外不能参加。在京的要是直属单位、工厂要考虑。(聂副总理插话：在京工厂参加了，那么天津工厂也要来参加了，部本是部内来夺权，三机部还有很多厂，这一个厂夺了那一部分不承认，再夺，那夺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你们考虑。

三、在京单位联合起来，到部内去点火，起了促进作用。

总理：对，起了促进作用，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共同夺部的权。为主的是部内造反派，成立象个革命委员会呀，北京直属单位由少数人参加，但不是学校。如机关造反派欢迎，学校如有个别人参加，那就要离开学校了。

531. 聂荣臻接见国防院校和国防科委八局同志的讲话

(1967年2月18日 京西宾馆)

……我想谈几个问题。

同志们到北京有相当时间了，你们是来造国防科委的反，对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起很大作用，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依靠科委群众和革命干部，他们是能把科委内的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当然院校师生起很大作用，这点感谢大家，以内因为主，加外部力量帮助，会搞得更好。你们回去以后，对科委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提出来，写信、写大字报，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回去，可以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各校的革命师生，欢迎大家给科委提意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同志们响应国务院和军委命令，回本单位闹革命，这是很好的行动，总理早就讲过。工人、学生大部分回去了，北京联络站三千多单位都要回去，回本地区、本单位，大家应该贯彻这个命令。希望你们动员北京以外的同志收兵回来，在外面，很长时间了。当前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夺权斗争的阶段，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第一是本地区、本单位，你们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线。

第三点，当前国内外的形势很好，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全世界产生了越来越深远的影响，从中国文化大革命看到真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命运，全世界人民把无限希望寄托在毛主席身上和毛泽东思想上。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世界革命最高的指导思想。全世界人民都在学习主席著作，和他们本国情况相结合，指导本国革命运动。现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很恐慌万状的，采取什么行动你们都清楚了。仇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思想，采取一切手段，对留学生采取法西斯手段，证明他们是恐慌和虚弱的，苏联修正主义又带头勾结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的反华高潮，这就是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在我国边境加紧活动，不断挑衅，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匪帮在东南沿海蠢蠢欲动，国内地富反坏右纷纷出笼，斗争很尖锐，很复杂，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们现在这样拼命反对我们，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做得好，做得对。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引起我们的警惕。人民解放军当前任务还是十分重要，十分繁重的，有战备任务，又要支持左派夺权，又要支援左派巩固夺权的胜利，因此本身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军以下不搞“四大”，军以上在××地区现在我们还没动，那些军区要搞，还要军委批准。整个形势战备任务，决定怎样地进行，如何进行，因此，有的地方进行，有的地方没有进行。解放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地指挥，同时必须保持严密、完整的指挥系统，不能有任何环节出现指挥脱节和瘫痪的现象，这是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有关的全局问题，解放军的指挥系统很有秩序，那就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如果指挥系统不灵，那文化大革命就不好搞。敌人是最希望我们军队中也出大乱子，地富反坏右主要矛头对准解放军，昨日人民日报登了福建前线的例子，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有代表性的，金门、马祖和台湾望得清清楚楚，地富反坏右利用这个时候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发表这一讲话，(指人民日报刊登韩先楚及魏金水的讲话——整理者)人民日报转载，是有代表性的，不是一般问题，这是带普遍性的现象，中央军委八条、七条都传达了没有？(答：都传达了)

第四点，最近中央、国务院、军委制订了很多文件，这些文件提出了很多十分重要的政策，这是总结前一段文化革命经验以后提出来的，有些是毛主席亲自修改、提出来的。有些人提出，有些中央文件是造假的，中央军委文件怎么会是造假的呢？这些文件并不会干扰文化大革命，相反，它推动和支持文化大革命，更有利更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完成，这是最高指示，同志们要认真学习，不折不扣地执行。

军委七条规定，第一条说，凡是我军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决捍卫、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最后还说军委要求全体同志认清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充分认识我军在这场斗争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坚决执行上述规定，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这些文件虽是军委发的，但这些精神对地方也是适用的。

毛主席二月二日(八条命令规定后)有这样一段批示：此命令所印八条，亦将影响地方干部、群众，使之走向正轨。

第五点，同志们回去，搞本单位、本地区斗批改。有几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1)确实学习掌握林副主席提出来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性和纪律性。革命性是第一位，但如有革命性，没有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革命也革不好，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干劲要和科学精神相结合，要有严密组织性纪律性。(大意)

所谓科学性，就是调查研究。

文化大革命进行八、九个月，现在有一个问题，如何分清敌我友。敌，我们打击的对象是什么？那就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一切当权派是不是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是科学的，不是马列主义的。过去有人提出，除主席、林副主席不能怀疑，其他的都可以怀疑，这是没有根据的。要夺权，要夺谁的权？一切当权派是不是都要打倒？真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这就是当前所提出来的“三结合”问题。

在一些单位里，有的夺了权是假的，虚伪的，摸了一下就走了，现在真正夺了权的有黑龙江，山西，上海，青岛，贵州等。因为里面还有革命的领导干部，和当地群众的负责人和部队领导组成“三结合”。

没有“三结合”，这个夺权就比较困难，这是夺权中的具体问题。在北京有这样问题，你夺了权，他还不承认你。要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过去的当权派，如果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与他结合，因为他在过去有相当工作经验和广大群众的信任。

我们打击的对象究竟对不对，林副主席讲过，作战时要集中力量，五个指头同时按跳蚤，不如一个手指有力量，不要分散力量。我与四川几个同学谈，他们成立什么解放大西南××组织，你们首先把四川解决了好不好，现在四川就难办，七千多万人，是个大后方，你们先把四川问题搞好，就很了不起啦。你们要注意打击方向和重点，不要把战线分得很散，结果一个地方也没有搞好。

(2)军事机关有他的重要性，任务繁重，不要冲击，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我还是要说一说。同学们，你们对解放军的认识，你们不是提出彭德怀、黄克诚、还有罗瑞卿、贺龙，但是军队还是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副主席指挥的，这支部队可以说在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部队，经过几十年毛主席亲自培养、领导指挥成长起来，取得胜利的，这样的无产阶级军队在世界上是找不出来的，革命性是世界上找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要相信这一点。任何对解放军的侮辱、冲击，都是不允许的。冲击当然就要妨碍工作，冲击是不对的！过去的学生运动，不管是反帝、反军阀都要受到扼杀，我们参加了“五四运动”，还有国民党机关枪扫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军队又是什么态度呢？军委命令，军队对群众的态度主要是很好解释党的政策，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些地富反坏右就利用这一点就说解放军可欺，是纸老虎，要搞解放军。全国有一段时间要搞解放军，我们同学也有受蒙蔽的。昨天报纸登了福建前线的消息，就是地富反坏右把矛头对着解放军，革命造反派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毛主席命令军队支持左派，保卫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还要冲呢？当然军队是有错误的，指出就可以立即改正，比如有支持错了，不支持他就好了，有很多地方说不清楚，真假包公不容易分出来，如果有支持错的，完全可以改，所以说军队所处的地位不同，支持迟了还要受责备，我看支持迟了一点不要紧，要弄清真正的左派。

有的组织知道你们是左派，但你们的同盟军搞错了，有的参加了“红旗军”，到湖南还支持什么“湘江风雷”的。古人说：“观其人要观其友”，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革命运动中找同盟者，同志们要注意，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政治上要划分界线，究竟同盟者对不对，所以军队发出命令支持左派不是简单的。

对冲击军事机关，违反八条命令是不能允许的，要纪律处分。防化兵部机关就是这样，抓了一些头头。他们煽动群众冲击，就抓了，这样的行动是必须采取的。对解放军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谁是左派。要是真正的革命群众，有意见提出来了，可以马上纠正。你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可以派代表，不要冲……，大家要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统帅下的军队是可以改正错误的，只要提出来。毛主席林副统帅对各军区的情况是很清楚的，是有数的。我是老兵了，虽然对一些地方不清楚，但我们对各军区还是清楚的。

(3)夺权问题。“三结合”一定要搞，最近中央讲了很多，现在北京不是主要搞大联合吗？没有大联合就夺不了权。不要左派自己还争。要争取团结干部，要争取团结革命领导干部，和那些犯过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但又愿意改正的干部，同他们一起夺权，一起掌权，认为

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非常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4)学校本身问题，不少学校都夺权，要注意可能会有反复。在这时一定要重视学习古田会议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团结大多数同学。对犯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的，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要学会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志们在青年时代，我们也都经过这一时代。我现在年纪大些，可能你们会说我是“和稀泥”，同学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不要一棍子打死。主席对这个问题是反复讲的，是主席一贯的思想，前几天还在跟我们讲。谈到要团结大多数。很多人说是“和稀泥”，特别是我们夺权了。你们当权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去斗争，去达到新的团结，不要用压制的政策，压总是压而不服，在人民内部，在同学中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同不同意见的同志共事。党的七大说了这些，在遵义会议以前，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统治下，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下，王明(现在莫斯科，为修正主义写文章，还骂毛主席)博古……等等，当时红区损失90%，但现在张闻天还是政治局委员，李立三犯过严重路线错误，也还是中央委员……不要怕党内有不同意见，有时有争论是有好处的。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还是这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所以一棍子打死就不好，总要留有余地，要给出路，否则人家就和你对立起来，可能同学们要说我是“和稀泥”，我还是要坚持这一点。这一点同学们还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我们夺了权，对保守派不能把人家当作反革命来搞，要教育团结他们，不要乱抓，搞得人家不敢回去，这不好。就是一批黑帮子女，还是要教育人家，不要“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们反对这个口号，但有些人的作法还是这样。老子英雄儿不一定是好汉，这没有遗传性。同样，老子坏蛋儿子不一定是混蛋，我们对地、富、反、坏、右还要改造他们呢！难道这些青年人还不能改造吗？一些高干子弟参加了“联动”，主席说：“干部要很好的教育子女，还是需要教育的，不要简单从事，最难的还是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现在我们一定要作好这一工作。”正象主席说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行动，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5)学校斗批改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很好讲，因为我没经验，要靠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来努力，我们十七年来，在教育方面，是包下来的，包括有国民党的，北洋军阀的……都包下来的，那时我们只好接下来，我们没有教员，不能不要。统统赶跑，学校、科学院都搞不起来，当时包下来慢慢改造的。我们文化大革命还把那整个一套接下来？我们新的建设不多，还没有自己多少无产阶级的，苏联十月革命给我们经验不多，要靠我们自己来创造，指导思想、方针就是毛主席一贯的充分发动群众，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要把我们国防工业院校，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学校以教学为主，也学工、学农、军训，也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这跟刘少奇半工半读不同，所以主席讲，学校还是以教学为主，不是一个一半。也学点工、农、也军训。办学校当然要以教学为主。

在夺权告一段落后，一边主要抓革命，也可以搞教改，这个工程很大，我们没有这个经验，要多安排点时间，很多同学提过这个意见。各学校留的教师很多，将来一些教师可以出去，到生产科研部门，搞三、五年再回来，跟同学们一起搞教改，这是一种方法。究竟那些课程可以少，那些可以不要，就清楚了，现在有的教师，老的从国民党下来的，新的都从学校毕业，都是从本本到本本，很陈旧了，没有接触实际。这一点你们可以回去同家里的同学商量，把参加实践的一些教师跟在校教师换一换，当然同学们不能靠换几个教师能解决问题的，要靠群众，群众运动，这是一个艰苦的工作。也不是短时期能完成的，已经夺了权的，可以一方面准备搞教改，没夺权的继续搞好夺权斗争。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校体制问题，暂时维持现状，许多学校都要求军队编制，这还要等后期，现在决定不了，中央、国务院要统一安排，再考虑。……就讲这几点意见。

(条子：保守派毕业生给不给毕业？)我同意毕业，和总理交换过意见，总理也同意。可以分配下去，应该分配下去。(其他条子略)

532. 叶群、江青在与总政所属单位座谈会上保萧华 (1967年2月18日)

十八日，叶群同志、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及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元帅、萧华同志与总政所属单位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叶群保了萧华同志。

叶群同志讲：萧华同志以前在关键时刻都是紧跟毛主席的，萧华同志是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并讲到，罗瑞卿整了七包(?)材料，罗瑞卿跳楼自杀时，把其它材料都烧光了，单把肖华同志的留下，转给彭真，彭真在被揭露出来以后，把几麻袋材料烧毁，也只留下关于萧华同志的材料。彭、罗、陆、杨都是很恨萧华同志的。在讲到罗荣桓时，叶群同志说：虽然他死了，但他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梁必业是罗荣桓的人，萧华同志是与他们做斗争的。还讲到，萧华同志过去搞了学习主席著作的经验，梁必业也不肯往下发，后林总很生气，才发下去。讲到萧华同志所犯错误时，叶群同志讲，萧华同志以前在大节上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在小节上有问题。并讲，萧华同志主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已经滑到了危险的边缘，尤其在刘志坚被揪出来以后，……萧华同志有错误可以批评，火烧，但要允许他改正错误。

江青同志也讲，对萧华同志要烧而不焦。并说(可能是主席讲的)关于萧华的材料一律不准外传。

叶群同志讲道，几个老帅每天只能工作二、三小时，都活不了几年了，大将中跟我们的身体都不好，身体好的又不跟我们，而上将又都在前线，选来选去只有萧华同志，并说，萧华不是降不降，而是应该升的问题。

萧华同志最后表态，表示要检讨，并不断革命。

533. 谢富治讲话 (1967年2月18日)

二月十八日谢副总理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夺权委员会和革命造反公社代表，会上谈话要点如下：

1.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停止发展。
2. 革命造反公社的造反派组织应帮助三总部(红色造反者联络站、革命造反者总部，一机部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进行工作。
3. 蒋大富、聂元梓同志应去夺权委员会，参加春耕工作(火线指挥部)。
4. 顺义县的问题很复杂，顺义县的公安局操纵在“红色造反者”手里，冲解放军，希望北航“红旗”驻顺义联络站注意。
5. 在谈到革命干部时说：北京革命干部比较多，比天津好得多。干部犯了错误，应该给他们自由，让他们出来，给他们创造机会，不要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工作，监督他们。……北京夺权不能夺二次权了。

534. 戚本禹与红代会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2月19日晚于人民大会堂)

出席座谈的首长：谢副总理、戚本禹、刘建勋等。

戚本禹谈话：

你们的宣言，各组织名单我都看过了（指红代会），宣言上不一定以三司为核心……我看要求实，不求名，三司过去做过好多好事情，但第二司令部联络站也做过一些好事情，我们要联合，要与军队、老干部联合，当然不是所有的干部，要进行阶级分析。……北京市的夺权也必须与干部结合。今天来的就很不错嘛！（接着戚本禹同志介绍了一下刘建勋的情况）这些老干部打过仗，搞过罢工，有经验，你们只是搞学生运动。……

三结合，一定要突出。在宣言上要好好写一写，有些人从左派队伍中跳出来，变成极“左”派。有人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是无政府主义的，运动初期发现有人提出这两个口号的不正常现象，本来想制止，姚文元同志已写好一篇文章，但为了不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因当时有些人利用这个口号压制群众），所以没发表。听说朱成昭也作了检查，作检查就可以嘛，不要一棒子打死嘛！现在斗争的水平要提高，不要总是砸、抢的，不要总是停留在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方法上，不要过多的写“砸烂×××的狗头”，使敌人看了好象我们革命派就这点能力似的，你们宣言上“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这当然可以了，因为他们反对毛主席嘛！听说北师大、清华等几个学校内部有分歧，你们要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除了极“左”派，走向反革命的除外，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协商解决。毛主席说全国学习解放军呢！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有人说：“解放军是个保皇军”，这是错误的，现在大街上标语、口号较乱，不能反映北京的运动情况。现在看你们搞大联合我很高兴。前一阶段你们左派之间打架，中央文革很不满意，你们打仗，刘、邓高兴，他们说：“什么蒯大富、聂元梓呀、谭厚兰等也都不怎么样”，主席不是说了吗，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你们（指红代会代表）吸收的组织是不是太少了，不要关门主义，要突破一个学校吸收一个组织的框框，只要是真正革命造反派，就要吸收进来。以后统一，不要排在门外。组织发展工作，可以一边开会，一边进行，组织人少的可以吸收成员，开代表会时不一定选代表，因为人少嘛。农大八·一八红卫兵是有相当战斗力的组织，他反谭震林，三司不是解散，是联合，原来的司令部就不要了。你们要树立个典型，过去是保守的，现在是造反的。（戚本禹同志举了南京一个例子）过去我就讲过一句话，不知你们注意没有，就是大多数党团员是好的，是拥护毛主席的，他们看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从保党委到观望，到造反，这是合乎逻辑的，蒯大富你保过没有？你保三天，那么就不允许别人保十天、二十天吗？现在学校打架少了。你们要只争朝夕，把这个红代会开好，矿院革命到底公社就不错吗？我现在肯定，人大“三红”我还正在调查，指导学校运动的将来可能有九条，现在已经在某些学校进行了讨论。……

535. 李富春对工交部门的指示 (1967年2月20日)

传达昨天及前天富春同志的指示：（过程：前天〈2月18日〉下午、昨天下午，两次分别汇报。李副总理要我们汇报了这几方面：

第一方面：夺权大联合的一般问题。

第二方面：汇报重点部的问题。

第三方面：汇报了斗薄的问题。

第四方面：汇报了联络站的工作。主要是插话中的指示。

李副总理：

根据汇报，主要有几个问题：（1）大联合；（2）三结合；（3）斗薄一波。

目前形势的发展，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夺权。这个夺权，本应按毛主席的思想，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要夺无产阶级当权派的权。但是，夺权的影响连锁反应，

没区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无产阶级当权派。所以连锁反应都在夺权。

夺权，特别各部不可千篇一律象上海、山西那样夺党、政、文、财各个大权，各部的夺权应区别对待。第一，是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第二，夺对业务实行监督权。(按：总理在此以前接见财贸系统代表时说：夺业务权是夺业务监督权)因为业务工作，虽然过去的业务有修正主义的错误，有资本主义的东西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但总的说从三年大跃进到三年困难之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几年是有提高是有进步的。比较能贯彻毛主席的路线。但这中间有刘、邓路线的干扰和作怪，如托拉斯，只是强调集中，而不是集中和分散相结合，不强调走群众路线，只强调行政统一，这样也干扰了毛泽东思想，也危害了毛主席的红线。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常常受到刘、邓的黑线的破坏、干扰、危害。当毛主席亲自抓时就见效。如三年大跃进，三年困难的八字方针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中的一系列的方针，在关键时刻都是毛主席亲自出来掌舵。例如，毛主席提出的八条(指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八条)其中五条都是经济建设，如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等等。因此，工交战线上要一分为二，要看到毛主席这条红线在关键时刻起的主导作用，也要看到刘、邓路线的影响。不一分为二看不到毛主席的红线，就不符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指示精神。

在夺权中必须采取大联合形式，现在看来要我们大家努力。以本部门本单位为主，加上外力。以自力更生为主加上外力。这还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如何培养本单位的力量，我们(指汇报的地质“东方红”同志们)要帮助他们。

三结合，就是《红旗》三期社论谈到，一个是革命领导干部；本部门的革命造反派；与本部门的外来单位，特别是学校。

(问：系统夺权怎么夺？)系统的应回本单位闹革命，自己家里没搞好，跑到北京来干什么？应自下而上的搞，地质学院帮助地质部，矿业学院帮助煤炭部，水电学院帮助水电部，需要这个支援力量。帮助他们锻炼为无产阶级造反派。夺权也是这个三结合。

我们是要培养接班人，你们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你们懂得整个部门的业务，如煤炭、冶金和机械，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要三结合，这样才能培养接班人，使老家伙能真心诚意地帮助你们学会这些本领，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你们要帮助老家伙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完全是外力夺权，如一个学校到一个部去夺权，一定夺不好。一是业务不会；二是实权夺不到手；三是弄不好整天搞业务。而保守派整天在笑话。你们在工交联络站搞大联合，三结合，夺权的问题上要作出贡献，要做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到了毛主席提出了夺权的新阶段必须学习政策。如何搞法？大联合、三结合夺权。同时要注意真正培养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要注意到一些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钻到我们队伍内部来进行破坏活动。化工部梁庸就是这样人物。停职以后他的黑手还在搞活动，中央只好要卫戍司令部把他隔离和监视起来，就是在这样支持左派。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对总理讲话就是不听，与先念同志对抗，一定要打倒吴波不可，取而代之。昨晚没办法，总理就把他扣留了。暴露他不是搞文化大革命，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是搞个人野心。你们到各部去，一定从两方面去学，一方面要看到培养真正左派；另一方面防止地富反坏右钻进我们的队伍里面来捣鬼。斗争越是激烈，斗争越是复杂，这些人也就越暴露。我向你们讲这些话，是讲给工交联络站听。你们认为是有用的话，那么就做政治教育工作，作宣传，向联络站宣传。(问：可否向各部传达？)向各部真正造反派传达可以。要真正造反派。

斗薄一波的问题，你们都把材料准备好。可以把薄交给你们斗，(问：中央首长几次都没有去。)可以去。准备工作要做。把发言稿准备好，我们可以帮你们看看。要找真心实意的斗薄一波的人……宁可晚几天，不要匆匆忙忙上阵。匆匆忙忙上阵打不狠，打不准。上次斗完薄一波后，他写日记，在日记里写着胡明(薄的老婆)死了。还称同志，你没有鬼为什么自杀？一个共产党员自杀本身就是叛党。你们工交联络站要起作用。大联合、三结合夺权。夺权，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监督生产的权。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带去的全国工矿企业要求接见的信，交给李副总理，没收信。说全国性组织不行，

不接见。)

(第一天汇报了三个部：化工、林业、一轻。第二天要求我们汇报一机、煤炭、水电、冶金。另单位汇报计委、经委情况。)

反映：汇报学校在部里打架的情况。

李副总理：你们为什么打架？是否可以重新联合？有无联合起来的基础？

反映：有的部夺权，常委九个、只有两个是本单位的。十一个中只有三个是本单位的。总之，本单位太少，很不相称，变成了外单位领导本单位。

李副总理：搞不好成了工作组了，同时得不到实权。

(说到冶金部各派打架的问题时)

李副总理：各方面派代表谈判，摆事实讲道理。搞文斗不搞武斗，不同意就砸，只依靠武力是不行的。有一股思潮，砸烂一切组织，重新排队，也是不对的。

(钢院谈到吕东非常嚣张时)

李副总理：左派学生中发生问题，他就高兴了。

536. 傅崇碧、丁国钰在抓革命促春耕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20日 北京工人体育馆)

傅崇碧：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

我代表卫戍区全体指战员向你们致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今天这个大会，中央的同志，谢副总理本来要来参加的，因为他要开会没来，让我告诉同志们，还问同志们好！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同志们开得很好，很是时机。现在春耕快到了，我们完全支持这个大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一场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在向着胜利的方向继续前进！同志们，我们在这段革命当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小撮人被揪出来了！但是，还有一小撮人，他们继续在那顽抗，我们要坚决与他们进行斗争！不把他们斗倒、斗臭，不取得全部胜利，我们决不收兵。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全国来讲形势好得很，从北京来讲也很好。北京，现在首先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大联合已经在进行了；广大的工人的大联合，也正在积极地组织，也很快地可以联合起来；农民也在大联合了。总而言之，工农兵学商就是要搞大联合。

同志们，我们要夺权，没有工农兵、党政干部实行三结合，这个夺权，我们夺不好的。所以我们有些地方，现在是夺权了，有些地方没有夺权，农村里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县里面叫夺印。你今天夺，我明天夺，那怎样成呢？我们要把这个权真正从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人手里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现在我们革命正在深入发展的时候，形势大好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分子，一小撮地、富、反、坏，一些坏人，他们不甘心死亡，继续跟我们进行斗争。当然，他们要跟我们斗争，胜利一定是我们，他们一定要失败的。我们在这个组织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跑来的，进行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破坏我们大生产。值得我们很好地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现在我们北京，遇到有些人犯罪，结果他嘴上讲革命，而实际上有些人进行破坏，进行捣乱。拦车呀！搞反动传单呀！反动标语呀！对国家财物进行破坏。我们北京曾经在六七月份的时候，被红卫兵赶走了一部分地、富、反、坏，有些人现在已经跑回来了，他们嘴上还要造反。这些人不是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的反，有那么一小撮人专门造无产阶级的反，他们千方百计地在那里阻碍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农村里也是一样，有些地富反坏借这个机(会)也在那里兴风作浪，破坏我们的生产，进行捣乱。所以从这一点看，阶级敌人对我们时时刻刻没有放松的。所以我们不要睡大觉，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人民解放军要和造反派、和左派坚决站在一块，对那

些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人，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破坏我们生产的人坚决实行专政。这些人，假如我们不向他们专政，让他们任意在那破坏，对我们的生产、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是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对这些人，要高度地提高警惕性。

另一方面，我们要真正把这些牛鬼蛇神，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斗倒、斗臭，那么就要我们各革命左派，要工、农、兵、学、商大家实行大联合。联合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现在我们北京，的确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个左派之间现在进行战斗、打架。农村里面有，城市里面也有。特别工人队伍里面，左派之间互相进行战斗，进行打架，这个事情很不好。我们不能打内战，我们的枪口一定要对准那些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那些反对我们毛主席，反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家伙。我们左派之间的问题，我们可以互相协商进行解决，不能打架。同志们，最近我们很多地方进行战斗，最近差不多每天我们左派队伍之间都有互相进行内战，互相自己打，左派之间互相进行战斗。这里面有一部分坏人在那里进行兴风作浪，挑拨。我们左派之间互相自己打，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就高兴。同志们，我们对那些主要是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的，对那些写反动标语的就是反革命，我们就要向他们实行专政，就要把他们抓起来。所以我们坚决和左派同志们站在一起，向这一小撮少数坏人实行专政。现在北京公安机关已经军事接管了，各个县公安机关已经军事接管了，希望我们各革命派大力地支持，大力地帮助。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会是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会。这样的大会很必要，很适时，假如我们不好好地把生产抓起来，我们首都这么多人没有菜吃，没有饭吃，那修正主义分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分子就高兴。他就看你们革命左派呀，你们闹嘛，干得怎么样子呀！饭也没有吃，菜也没有吃，他们就笑话我们。所以抓革命促生产完全是合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的。所以我们夺权委员会组织了一个摊子，叫生产指挥部，有各个左派、学生、工人。各个县将来也可以搞啰。我们军队也大力支持你们，各个县的也大力支持你们。所以我们的生产要很好地抓一下，不单是要把革命抓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也要把生产抓得好，争取今年来一个大丰收。这样既抓了革命也促了生产。使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使我们的生产也取得伟大的胜利。一定要与我们左派的同志大联合、大家共同努力，就要靠我们左派同志提高警惕，对那一小撮坏人实行专政。凡是破坏生产、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对我们副统帅林彪同志的那些反革命分子，我们左派同志就要与他们进行坚决斗争，这样我们生产和革命，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因为我还要去开会，我表示支持这样一个大会。我讲完了。

丁国钰：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农民同志们：

今天我来参加“抓革命促春耕”的誓师大会，感到非常高兴，我对这个大会表示最坚决的支持。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非常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正在进行全面地夺权斗争，并且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下，我们北京地区农村的广大贫下中农革命造反派、革命干部正在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春耕生产新高潮，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阶级敌人是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他们要各种阴谋诡计来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要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反扑。闹革命我们是闯将，搞生产我们是当然的主人。革命靠我们抓，生产靠我们干。现在农时紧迫，春耕在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农民群众和革命干部，乘胜前进，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

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我们各行各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和各个战线上的革命同志都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进一步地联合起来，掌好无产阶级专政的大权，掌握生产和经济的大权，在抓革命和促生产的斗争中，创造更大的成绩。

同志们，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曾经犯过错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我们有决心彻底改正错误，坚决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学习，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537. 谭震林接见农口革命造反派的讲话 (1967年2月21日晚 中南海小礼堂)

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

你们好。今天是农口各部门和各学校大联合大团结的会议。从这次会议开始，在农口各学校的协助下，农口各部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进行得更好，更彻底。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有缺点和错误，我应当向你们进行检讨，我准备在适当时机，向革命的同学、同学们进行检讨，由于我犯了一些错误，因此，使你们产生了不少误会，阶级敌人，反革命修正主义者、蜕化变质分子利用了这一点，对你们进行欺骗蒙蔽，使你们上了他们的圈套，因而在一段时间中犯了错误。

你们是革命左派，你们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始终坚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你们表现了冲天的革命干劲、闯劲，对农口各部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一事实，是否定不了的，谁都必须承认这一条，肯定这一点。象你们这样的革命组织，应该大发展。你们虽然在一段时间中有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你们自己认识了这一点，正在坚决改正这一点，发表了严正声明，并到农口各部门进行了沉痛的检讨，从这一实际行动上看，你们确实勇敢得很，你们确实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小将，我应该向你们学习。现在我向你们建议，不要再到农口各部门去检讨了，农口各部门的同志今天全到了会，他们已经向我表示，他们对你们这种革命精神非常感动，并且感觉到过去向你们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够、不及时，没能帮助你们消除误会、怀疑。这一点，他们也在作自我批评。

现在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消除，我们已经团结起来了，我们应当进一步团结起来。农口部门的同志们欢迎你们参与各部门的夺权斗争和掌好权的工作，欢迎你们参加各部门的文化大革命。我建议你们适当分工，参加各部门的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如何分工，如何参加请农口红色造反联络总站召集有关单位的会议，进行具体协商。

从今天的会议来看，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不是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我们是大民主，众言堂，不是一言堂。我相信今后大家也会是这样做的。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下，真正实现革命左派的大联合、大团结，逐步做到团结 95%以上的群众，团结 95%以上的干部。因此，建议你们，帮助教育那些在前一段思想认识没有跟上你们的同学，振作起来，同你们一道并肩前进。

我们应当忠实地执行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和检查每一个领导干部的言行，凡是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就拥护他，支持他，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批评他。对于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们就

向他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最后我再次感谢革命小将对我的批评和帮助。(完，口号从略)

538.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北京三个工人革命造反组织 及其它革命组织座谈纪要 (1967年2月21日 人大会堂小礼堂)

谢副总理首先介绍了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戚本禹，北京市委刘建勋、吴德、高扬文，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然后讲了座谈宗旨：今天和大家谈一谈北京市工人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问题。已经酝酿好多次了，学校的大联合，大专院校明天就要开大会了，但北京工人是最主要的方面，然后就是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军队……在大联合中产生权力机构，今天就是大家谈，主要厂矿三个总部怎么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力量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联合，工农兵大联合的主力，由临时代表会筹备临时机关，现在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大联合。

谈到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戚本禹同志说：造反公社是综合的，工人要回厂。

以下革命造反总部、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作了汇报：

谢副总理说：北京市要成立一个权力机构，工、农、兵、学、商多方面组织，大学红代会，中学也要产生，工人代表产生工人革命联合会，不是从你们革命造反公社产生，你们那儿搞个联合机构，这儿再搞一个，哪天才搞成？提到三结合要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按毛主席指示搞三方面权力机构，你们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也是个联合，小联合，其实你们就好好搞工人的联合，院校去搞他们的联合。

谈到清理组织，谢副总理说：一家调查有片面性，三家调查才全面。石景山钢厂对百货大楼的事情简直不着边，分系统就可以了解，先从上边和也有道理，谢副总理还驳斥了北京革命没有形成真正的革命派的说法，工人汇报有学生支持保守派。谢副总理说：大学联合起来，散兵就要收回去，联合起来没空子钻，迅速解决按系统联合，从下而上，从上而下，搞工、农、兵、学、商的联合。

有人说：夺权中调离一些保守派出机要岗位，他们说，我们违反十条。谢副总理说：根据不是那个讲法，调离岗位是指生产岗位，不给工作，谈到对保皇派的看法，有人说看他过去，就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他的将来。因此保守派不变。戚本禹同志讲：主席那是讲一个阶级。

最后，解放军报社记者张根成同志发言：由于工作的关系和工厂一些同志及各校下厂同志有些接触，了解了一些情况，然而不熟悉，认为决定北京市经济命脉的大厂、三个工人组织，北京公社成员组织一个核心，照顾到各方面，大厂另一方面各系统各行业，27个大厂加三个大组织成核心，最后讨论筹备小组，大家表示同意。

539. 戚本禹、关锋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21日)

戚本禹：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光明日报》社的同志们问好。(众呼口号)你们这儿真对立啊！喊口号都分成两派。

穆欣同志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家可以相信，中央文革小组对自己的成员，是讲原则的。

最近文革小组开会，在京的同志也有些议论，作了讨论。文革小组决定派我和关锋同志向大家表明态度。下面我讲一些意见，总的是对穆欣问题的看法，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过的；许多具体问题，只能代表我和关锋同志的意见，因为我们商量过。但总的对穆欣的问题怎么看，是经过我们小组讨论过的。

一、对穆欣同志的问题，应当实事求是，一分为二。总的来看，穆欣同志到《光明日报》以后，报纸不是比过去办得更坏，而是办得更好。（关锋同志：这是小组的意见。）《光明日报》几年来工作有成绩。报纸的方向，总的来说，几年来是代表无产阶级说话，还是代表资产阶级说话？这不仅关系穆欣一个人的问题，也关系到大家。你们辛辛苦苦办报纸，究竟为无产阶级办报纸，还是为资产阶级办报纸？是《北京日报》那样的资产阶级报纸呢，还是无产阶级的报纸？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希望大家排除各种其它因素，站在正确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

《光明日报》原来不是无产阶级报纸，是资产阶级报纸，而且是合法的资产阶级报纸，民主党派机关报。特别是在五七年右派进攻时，储安平、章伯钧利用这个阵地向党进行猖狂进攻，我们反击，把阵地夺过来，派穆欣同志来夺取这个阵地。这几年，是否又变成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喉舌，还是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喉舌？我们看，这几年总的方向是无产阶级的。我们认为这是《光明日报》全体同志的光荣。（热烈鼓掌）归功于全体同志，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但是，这里面也有穆欣同志的一份功劳。我们希望不要抹煞这一点。

为什么说《光明日报》的方向基本上是对的，是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见呢？在整个文化革命中，几年来，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光明日报》是站在比较前面的。你们可以排队嘛。（《北京日报》、《前线》、《北京晚报》……）《光明日报》有很多缺点、错误，特别是穆欣同志有许多缺点、错误。但是这几年斗争相当激烈，《光明日报》在斗争中是站在前面的，支持了左派，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几个大的斗争，如对“合二而一”的斗争；京剧现代戏的斗争，有缺点，有错误，但整个来说是好的；农民战争问题，翦伯赞、范文澜、蔡美彪坚持帝王将相，而关锋他们的文章（论农民战争），《人民日报》不登，甚至《红旗》杂志也不登，当时的副总编辑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登，《光明日报》、穆欣同志这儿登出来了，地位还很显著，这是很不简单的。

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斗争更激烈。穆欣同志站在哪一边？还是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的。他基本上还是站在左派一边的，当然不是那么坚定，有弱点。你们一个记者到我这儿来，听到我的观点，穆欣同志就派人找我写文章，送给我很多书，很多资料，积极参加战斗。不仅找了我，还找了关锋、林杰同志。我趁此机会向《光明日报》全体革命职工表示感谢。（热烈鼓掌）当时别的地方不登我们的文章，你们《光明日报》登。我水平不高，文章一改再改，《光明日报》排字工人不厌烦。我向《光明日报》的排字工人表示感谢。

《光明日报》在这些斗争中，没有迷失方向，站到毛主席一边，不可抹煞。考虑穆欣问题的性质时，应当正视这些问题。

穆欣同志自己呢？应当承认，他在文化革命中起了作用，亲自参加战斗。六一—六二年，有一个美化叛徒的反动思潮。他坚持原则，写了批判《桃花扇》的文章，还写了批判《赛金花》的文章，批判“国防文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是好的，是革命的，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容易的。

《光明日报》、穆欣同志和旧中宣部、旧统战部也是有斗争的。特别是旧统战部，一直是打击、排挤他的。旧中宣部还支持旧统战部打击他，这点是很清楚的。在打击最厉害的时候他找过我，找过关锋同志，要求我们帮助他，很困难，他当时情绪很低沉。你们说他走统战部黑线，无论如何说服不了我，如果是黑线，统战部应欢迎他，为什么打击他呢？

他在领导报社的工作中，还是比较注意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在全社革命职工支持下，对坏人坏事进行了斗争。

因此，我们认为，穆欣同志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

我们认为：穆欣的问题，不是反革命，不是修正主义，不是两面派。

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呢？第一、他没有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第二、没有反对毛主席；第三、没有反对林彪同志，也没有反对中央文革。

其次，穆欣同志是有缺点、错误的，有些错误还是比较严重的：

第一、政治上不够坚强，在有些原则问题上有动摇，在有些问题上没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在对旧中宣部的斗争中，是不坚强的。旧中宣部整他，他还傻乎乎地，传达旧中宣部的东西，不抵制，有时传达很带劲。

登了一些毒草。毒草可不可以登呢？毒草是可以登的，但思想上必须明确。登的时候，要准备除草。穆欣同志有时候不明确，稀里糊涂放出去了，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人家说是毒草，才知道是毒草。“合二而一”登出来了，关锋同志讲了话，他跟得很紧，马上组织文章批判。有的没有批判，有的不清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还登了夏菊花的文章，而且在头版头条。为这事，关锋同志批评了他，我也给他提意见，他接受了。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握政策有错误。批了一些不该批的人，点了一些不该点的名。打击面过宽，有的不准，应打击的未打击，不应打击的打击了。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当讲在报社也有反映。这里有穆欣同志的责任。有些做法起着压制群众的作用，军委指示没有及时传达，使运动冷冷清清。所有错误都与穆欣同志有关，应该好好认识错误，向群众检查。

第三、民主作风差，甚至对提过意见的人有打击报复行为。他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给他贴的大字报一张也没有，说明老虎屁股不大好摸。外面学生来，外面学生一冲，七层楼都是大字报，而且提得很高。你那么不民主、压，走向了反面。这个问题穆欣同志应自己检查，不应埋怨群众。刚才我看了他的检讨，怕群众，谁说他一个不字，心里就紧张。我亲自看到这一点。大字报有什么关系？革命的大字报，就是提错了也没什么。坏人贴大字报是个暴露。革命就会有反复，要准备牺牲。检查还不够深刻，还得检查。

对家庭缺乏教育。爱人张××，张××来了没有？（回答：来了。）我今天要批评你。你这个人有点不大象话，打了你的小孩，你可以骂他一顿，为什么斗争呢？你说是批评会，站凳子，怎么叫批评呢？斗小孩这是错误的，不能允许的。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认识错误。我问你，你说有错误，很抽象。不能允许！任何人不能这样做。没有叫你入党，我看对的，不够一个党员。你这个人还好吹嘘，你说穆欣长穆欣短的。这些事由我们来说嘛！你尽帮倒忙，很不高明。穆欣也有责任，在有些问题上，无原则地听从她的意见，耳朵比较软，这点应该检查。我们应当有原则的，合乎原则的话听，不合乎原则的话不能听。但也不能把张××的错误拉到穆欣身上，张××斗了小孩，不能讲穆欣斗了小孩。当然也有责任，对张××管教不严，没有进行批评和教育。（问穆欣）你批评过她没有？（答：批评过。）批评不够。（台下有人说：没有当众批评！）应该当众批评。

除此之外，生活上还有低级趣味。

主要的缺点、错误就在这三点。

那么，现在这场大争论怎么办呢？有几点意见。请同志们考虑：

第一、希望各战斗组实事求是地讨论一次穆欣问题的性质。究竟穆欣同志是什么性质？我不强迫大家接受我的意见，但希望考虑我们的意见。要多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我们也是调查研究了的。我们听了你们一个多月的意见，你们听我们一个钟头的意见，但是你们研究半天，对我们的意见不能接受，也可保留你们的意见。

伯达同志两次电话：第一次、我不保谁，不要先定性质；第二次、怕给群众泼冷水，说可以揭发批判，彻底揭发批判，但不要先定性质。定错了就不大好办。你们材料还没有，就要定性，不合适。你们的《大事记》就不好，写了电话上半段，下半段“不要定性”就没有了。而且伯达同志讲他的意见不要印，你们印了。

今天停止争论，各组回去讨论。

第二、希望你们能够给穆欣同志一个检讨自己缺点、错误的机会，保证他的工作条件。

“喷气式”是不对的，给他充分时间让他检查，让他充分把话讲完。同时，还要保证他的工作，他还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红旗》并没有撤他的职。

第三、要保护革命群众。革命群众即使讲错话，但他主观的意思还是好的，很多革命同志是从保卫党的利益出发，讲错了，革命群众无罪。不要这一派整那一派，说他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应有这个气魄。不能把矛头转向革命群众，任何人矛头转向斗争群众都要犯错误。这问题没有特权，穆欣转向群众不对，别人转向群众也不对。

如卢××，一边喊打倒，一边帮穆欣说话。他动机还是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也有点软弱，不喊“打倒”不行。

穆欣更不能乘机整群众，如果这样，我们就要干涉。

第四、建议你们改选文革和领导班子。按巴黎公社原则，改选革委会。你们《光明日报》领导班子不是资产阶级的。夺权，不发生象《北京日报》那样的，应该领导同群众相结合。领导班子要与伯达、王力、关锋同志商量、批准。(关锋：夺权还有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第五、建议张××同志调离工作。因为她有很多错误，但还不是敌人，不要歧视她。今天问了康老，康老也同意。至于调什么机关，还要研究，因为还要经过很多手续。她自己也不要觉得难堪，对她也有好处。事情就有个复杂性，你自己也会心情舒畅些。

第六、希望大家很好地认识《光明日报》的复杂性。刚才问：对穆欣可以不可以继续揭发？可以，只要是他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光明日报》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斗错的群众应当平反。但也的确有反党分子，还有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张××有错误检查。有些事情，你们比我清楚。对牛鬼蛇神，要同他们作斗争。你们应当提高警惕，防止敌人钻空子。比如有人搞康老，有没有？有的。住在这儿的学生组织也有这个问题。“尽朝晖”(中国剧协)就不好，为首的反革命已逮捕。但这些人只有一小撮，不多，不要打击面那么大，不要伤害群众。

对《兵团战报》，我们很重视。打了三次电话，你们不支持，这是错误的，你们应该检查。

关锋：

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我完全同意，他的讲话完全符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穆欣问题讨论的精神。

前几天，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一次穆欣同志的问题。组长陈伯达同志、副组长江青同志、顾问康生同志、王力同志和我们两位都参加了。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符合那个会的精神的，我完全同意。我补充几点。

一张条子说：根据大字报揭发材料，超过所有北京黑帮的材料，如穆欣无罪，其他黑帮分子都不能定案。这个条子，我们是不同意的。事情不是这样，穆欣同志不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同志，有缺点、错误，甚至某些错误是严重的。但有成绩，应一分为二。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我们赞成，但批评应是同志式的，不是敌人。他回来时，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同志对他讲：回去，是自己的错误，要检讨，不是自己的错误不要胡说八道。回来一个月，你们的材料《十大罪状》、《大事记》都看过了，那些材料，有很多没有经过查对，单就我知道的就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经过调查研究，得出正确结论不容易。

我想补充一点情况，从反右派以后，穆欣同志来了以后，由于上级党中央有些负责同志的领导，由于报社全体革命同志的努力，加上穆欣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光明日报》基本上是无产阶级的报纸。有没有错误呢？当然有错误。发表了一些坏文章，但也发表了好多好文章，对他们进行了批判，进行了斗争。这几年理论战线几个大斗争，如批判杨献珍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光明日报》做了工作。特别是六二年闹包产到户，在理论上就来了个反攻，反攻倒算。当时还是在《光明日报》发起了反击，虽然今天看来还没有力。当时我同穆欣同志不熟悉，发表了三篇文章与于世诚辩论。于世诚不是于思诚，是杨献珍的代言人，

杨献珍是资产阶级代言人。

批判“合二而一”，我是知道的。当时发这篇文章，报社没有意识到。但出来后，听到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后，很积极。特别是反映情况，比哪家报纸都积极。

六四年，农民战争问题，翦伯赞、范文澜、吴晗对我们发起围攻。当时《人民日报》在吴冷西、陈浚手里。《人民日报》转载我和林聿时的文章，先组织了大汉奸孙祚民的文章批判我们才转载的。当时能发表我们文章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哲学研究》；一个是《光明日报》。《史学专刊》掌握在翦伯赞、邓广铭手里。专刊发(?)文章，在整版上发表批判文章，批得翦伯赞哇哇叫，说：“《光明日报》打我的屁股。”当然不能全归功于穆欣，首先是党的领导，其次是大家的努力，但也有穆欣的功劳。

去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夺权了，这个夺权是不登报的。在六月一日以前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比较一下，哪一个好？

文化大革命以来，穆欣同志有错误，不坚定。但他是跟毛主席走的。正是“二月提纲”下来前后，我和戚本禹找他，当时我们是秘密串连，先还不敢相信，后来见他的《评赛金花》的文章，才跟他讲心里话。这篇文章被阎王殿扣压了一年多，中央负责同志支持发表。阎王殿压，穆欣同志对阎王殿没认识清楚，我也认识不清楚，你们认得出来？你们说他是阎王殿的“走狗”，我不同意。就拿当年春天，有一篇社论，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送许立群审。不能不送审呀！许立群不叫提。他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说怎么办？”他说：“你的意见对，我把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原话引上，再送审。”许立群才不得不同意。

同志们，当时我们正处于困难的时候，戚本禹、我和林杰写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陈伯达同志不在家，我是《红旗》的人，文章却要拿到《光明日报》来排。当时发表文章好难，卡着脖子不让发，穆欣很想发，但彭真、阎王殿不让发。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注明写于×月×日，我和林杰的文章就不能写，就被圈了去。

后来揭发彭真、阎王殿，我们写过材料，穆欣也写过。统战部整穆欣，到去年六月还整。不但整穆欣，还整我、林杰……说我们几个人组成了一个“泄密合作社”。穆欣同志可能对统战部的认识比对中宣部还清楚（因为统战部是顶头上司），统战部要把他挤掉。不是说穆欣同志没有缺点、错误，但看人要全面。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教导。

有人提到几篇文化大革命的社论水平低、有错误，我同意；但说与《十六条》唱对台戏，我不能同意。和《人民日报》、《红旗》比，不如他们，可能。因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

同志们看问题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下看，不能离开地点、时间，几年前对彭真就认识清楚了？对中宣部也只是感到蹩扭。“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要求穆欣当时那样认识清楚，不可能。以同志的观点要求他更坚定，认识问题更清楚，是可以的。

再一个条子说，直到现在，这里还未平反，希望指示。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和中央的补充规定，因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还是什么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真正的牛鬼蛇神不能平反。报社的情况不了解，由革命群众来平反。《红旗》也打了几个反党分子，不能平反。

我们希望同志们考虑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也希望考虑我们提供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意见，坐下来摆事实，讲道理。一发火，就听不进去了。

林彪同志提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三性缺一不可。要有革命性，但也要适当提倡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红旗》评论员文章是针对现阶段革命需要讲的。为什么去年六月不讲，因为那时反动路线不让革命群众起来。

有件事与我有关，有义务讲一讲，我用何明、庆云写的文章，穆欣送材料给中宣部。我

的文章有错误，彭真在去年二月要整我。根据我了解，他是送到保护左派的领导那里去了。中宣部要他送，他不敢不送，当时阎王殿还没有暴露。主席说：人的认识受到事物本质没有暴露局限。我们这些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并不那么完整。人的认识也受到客观矛盾未暴露的局限，说穆欣骂过关锋有什么关系，因为不了解嘛！

刚才戚本禹同志提的几个建议，我完全同意。有不同意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才能说服人。年青同志要考虑，材料是谁提供的，这边这么讲，那边那么讲，是怎么回事？要考虑。

在这里，对我们的革命同志，革命群众，无论讲了什么过头的话，都不能计较。如街上贴了“打倒穆欣”，我不赞成打倒，有错误，可以批评；反过来，穆欣也不要打倒他们。我们追求真理，不是争一口气，要争无产阶级的气。

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该夺权的地方，一定“三结合”夺过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治，应当夺权。《红旗》十二期社论已经讲了，对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打倒，对无产阶级当权派要支持。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可估计过多，否则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了。我们国家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十七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就是证明。希望同志们很好考虑，这不仅是《光明日报》，一概而论应该是这样，好了，我的话讲完了。

祝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踏步前进！

540.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22日)

周恩来：

同学们、战友们：

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的敬礼！我现在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致热烈地庆贺！(口号声、掌声)庆贺你们北京的大专院校的三个革命司令部，也就是第一司令部、第二司令部的造反派，第三司令部的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掌声)庆贺你们再一次的大联合，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团结起来的！

我相信你们这个联合是会日益巩固的，(掌声)我相信你们这个联合是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掌声)我相信拿你们这个联合去影响我们中等学校的革命小将们，他们也跟你们在同一个毛泽东思想伟大的红旗指引下来实行你们这样的大联合，我充分相信你们能把这个联合推动我们北京市的工人阶级的各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掌声)拿这样的大联合来实行北京市的全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这样的斗争才是最有力量的斗争，这样的斗争也才能实现我们期待着很久的北京的夺权斗争的联合胜利！

我们回想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是出在北京，这是北大的聂元梓等七位同志写的毛主席亲自把它发现和批准在我们的报纸上公布于世，公布于全世界的人民中间，(掌声)这就在世界放出了我们无产阶级第一声号炮！

这一次我们进入到新的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上海的工人阶级的带头，由他们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反对经济主义施行紧急措施来带头进入到上海的夺权斗争，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首先发现了，首先提议把它登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广播到全中国、全世界，又放出第二次号炮！(热烈掌声)

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北京市的革命的学生，首先是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当仁不让，应该首先的响应。所以这个大联合遵循了这样一个在我们在人大的大礼堂上举行了这个庄严的集会，也就说明了我们将要在北京象上海一样也要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夺权斗争！

我没有什么话更多的说了。我最后预祝你们胜利很快就要到来！并且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主席台上的我们中央的工作同志将要参加你们夺权斗争的胜利的大会。(掌声)我祝贺你们北京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的胜利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

今天的大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盛大的大会，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所在地的红卫兵的盛大的大会。这个大会所表现的就说明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胜利，一定会胜利，一定要胜利到底！谁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同他拼到底！我们准备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付出代价。

同志们：要一方面高呼我们的胜利，一方面要警惕敌人的反扑，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这样的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革命同志发动起来的革命。我们可以信赖、可以相信，过去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达到了最后的胜利。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领导我们，同样的经过一个曲折的道路，一定能够达到最后的胜利。不管有什么样的曲折，我们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风大浪中前进。胜利最后是我们的！胜利最后是属于毛泽东思想的。

我顺便说一下，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从毛主席发动以来，广大革命群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代表我们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胜利的方向也是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胜利的方向。所以我们取得胜利，夺取胜利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的革命洪流当中，在斗争方法上，可能有一些不可避免的缺点。敌人想利用这些群众运动当中，群众自发出现的一些斗争方法上的缺点。这些缺点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提倡的，也不是党中央提倡的，更不是毛主席提倡的，这些缺点是可以很快的纠正的，并且已经开始在纠正了。比如在大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口号，也不一定是在这里的同志提的啰。什么砸烂谁的狗头啦！还有一些斗争大会上出现有戴高帽子啦！罚跪啦！什么搞喷气式飞机啦！这样一些斗争方式啦！在座同志们可以证明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倡的呀！(众：不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群众没有很好的考虑不自觉的就这么搞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坏人把这样一种作法故意的扩大化啦！他们的目的是要丑化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说的敌人，包括国际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和国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蒋介石派来的特务，他们故意的夸大和扩大这些不适当的东西。我今天在这个第一个会上向同志们建议要注意这个斗争方式斗争方法。(掌声)什么砸烂谁的狗头啦！什么喷气式的飞机啦！什么戴高帽子啦！什么罚跪啦！这样一些斗争方式不要采用，还要注意不要什么都砸，破坏国家的物质，这样的一种斗争方式，“联动”就来利用到处来砸，破坏了好多学校、破坏了好多国家资财。尽管群众当中对于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还没有到家，还没有学好，包括我在内，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在群众当中产生了这样一种不适当的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这样一种斗争方法的，我想这样一些不适当的容易被敌人利用的斗争方式向同志们提一提，我相信一天之内就可以解决的。(掌声)因为大家都是一心一意为革命，一心一意为毛主席思想的胜利。(掌声)我们如果有缺点，没有什么不可以丢掉的。

最后，我还要说一下：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你们的，是属于大家的，是属于

全世界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掌声)还是要继续地鼓起勇气前进！鼓起更大的勇气前进！按照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指出的道路前进！

红卫兵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的话完了！

江青：

同学们，革命的战友们：

你们好啊！(好)我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掌声)

去年你们第一个司令部成立的时候，我出席过，祝贺你们；你们第二司令部成立的时候，我也曾经出席过，祝贺你们；第三个司令部成立的时候，是我不知道的时候，因此没有参加。

今天你们在革命的大风雨中大联合，我感到衷心的喜悦，来祝贺你们(掌声)。我没有更多的话讲，我只祝贺同志们胜利！

胜利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属于以无产阶级利益为代表的劳动人民的！胜利属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战士们！

康生：

同志们：

我正在这替你们做工作，正在看你们的大会的宣言呢，还没有看完，你们就把我拖到这个地方来了。我现在庆祝大家的大联合的胜利万岁！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志们，还是让我去看你们的宣言吧。

541. 李先念接见外贸部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2月22日下午 李先念办公室)

代表：(谈到运动初期受打击的人有三种，其中有一种打错了时)

李副总理：当时提出“四个横扫”面是宽了，我们要作检查，不过那些人扫一下也好，群众对他们有意见。

代表：(谈到造反派内部有阶级敌人混入时)

李副总理：(看了看公安六条)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啊！你们要阶级分析啊！

代表：(谈到部里夺权有点过火时)

李副总理：夺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让学生夺了一家伙。

代表：(谈到林海云同志时)

李副总理：林海云对老人(指叶季壮同志)是尊重的，他对叶季壮是有些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

叶季壮不大突出政治，我们对这个老人也是尊重的，他不太管政府，生活上喜欢吃一点，……中央同志认为叶季壮过去做了很多好事，还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也经常讲：叶季壮就是想吃点腊肉，办事还是认真的。现在年纪大了，也半身不遂了，当然他要是三反分子，就不管他年纪大不大了。在干部使用上叶季壮错误多得很，总理和我都批评过他，干部队伍，就委托给你们和党组一起整顿。对干部你们要做艰苦细致工作。

代表：(谈到红反团同志问题时)

李副总理：我准备见彭崎明他们的，后来宋树君他们说：你们不要见彭崎明了，我们一定联合，你们就把工作交给我们，我们保证做好。当时他们还拍了胸的。他们犯了两个政治错误。

代表：(谈到有些单位砸了党委、党支部时)

李副总理：你们拥护党中央，拥护毛主席，可是你们又把这些组织给砸了，在逻辑上说不通吧！砸了也不是什么错误。(代表反映是不是立即恢复起来)慢慢来，现在别忙恢复起来。

代表：(反映到一些单位听了总理指示后，在作检查，承认错误时)

李副总理：夺权时我思想也是糊涂的，后来中央开会讨论，难道都夺了吗？不行吧！十七、八岁就顶部长职位？！干不了。

你们不必承认错误，没得经验，就是要没得经验一个时期。

杜向光要是接受总理指示，回去开个党组会，就行了。财政、计委、建委、经委、外交等大权都是中央大权，怎么能夺呢？七夺八夺把中央的权也夺了。杜向光违抗中央。财政部造反派夺权，不能说是夺错了，只是出现了新的情况，如果把夺过了的权让给部长就行了，但是打电话给杜向光，他也不理。

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出现了连锁反应，先夺了再说，夺错了没有错误。夺过分的，让出来就是了，要说错了，我们错了。

运动的领导权是造反派的，业务上有监督权。现在想出三结合来了，三结合肯定好，这是个方向。将来要不要党组，跟党组关系如何，正在总结经验。地方上，有的是还未夺。不是因为杜向光的事吓怕了，没有那回事情的。杜向光是违抗命令，群众违抗命令就没抓他嘛！财政部其他部长不是被说成是三反分子，别人都垮了嘛！他还要通过打吴波，打到我李先念这里。当然我们有错误，要作检讨。杜向光是副部长，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有党性的，要讲科学性的，该讲的讲，不该讲的就不能讲。周总理也讲过，不能超过一定限度，超过限度就要违犯党纪。

杜向光坚决公开违抗中央命令，想利用造反派的力量把吴波打倒，我们国家那能允许这样的人呢？当然啦，吴波如果是三反分子，我们也毫不留情。吴波是有缺点的，但还不是三反分子。

代表：(谈到希望党组织成员迅速改变观点，并希望李副总理给党组成员做工作时)

李副总理：要党组改变观点，我赞成，我可以找他们谈。但是要想叫林海云起来打倒叶季壮，他是不会干的。党的原则是不允许的，现在这些话可以跟造反派讲了(指李副总理过去曾说过党组织成员所处地位不同，不能强迫他们揭发谁等)那时说早了，说晚一点就好，话放在什么时候说要考虑，今天就是完全合理的。说早了把同志们的脑子约束了。任何问题都有背景的，没有根据背景的分析，过去好多话都是错误。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你们青年一定比我们运用得好，你们年青脑子来得比我们快。

我有个想法和同志们商量，和彭崎明，红反团同志商量，以部为主，就是部的革命造反派。学校同学在那里做了很多工作，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做了很大工作，出了偏差应该原谅他们，他们是好同志，做起事偏急些，如贴周总理大字报，火烧周总理，说外贸部党组是修正主义党组。这些事情允许他们犯，犯了才能提高，彭崎明说是反革命我不同意，彭崎明也表现了革命的闯劲，别批评他。我准备和他们谈一下，以部为主，如何进一步以部为主，把全部席位留出来，撤回学校整风，搞左派大联合。你们一定要维护红反团，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彭崎明他们的革命的东西也要支持。

代表：(谈到出国大楼有两派，并有人开会声讨红反团时)

李副总理：有两派也不要怕，声讨不对嘛，对敌人才声讨。(下面谈到李副总理参加中山公园那次大会时的情况，因记录不详，从略。)

红反团、彭崎明他们两派搞僵了，我要做工作，你们也要做点工作。

代表：(谈到广交会问题时)

李副总理：这次广交会准备(有同志记：争取)开好，也准备开不好，开不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下面有的单位派别很多。

代表：(谈到全国工艺品联络总部问题时)

李副总理：总理也没有说服他们，让他们自己斗半年去吧，要把他们带到广交会去，叫他们找外国人谈谈，看看行得通还是行不通。

代表：(谈到×局准备让领导同志检查后，再把业务权交给这些领导同志时)

李副总理：两个办法，把权交给他们，再叫他们作检查，进行批判。你们自己考虑。对于干部少数人是要罢掉的，还要调离原单位，大部分是留用的，总之要搞出一个新气象。

希望外贸部的三结合先走一步，搞个试点。

江明这个人没有自首过，并没有被敌人逮捕，在白区工作时，情况一紧张，就走，这是允许的。不过有些蜕化，你们可以揭、可以批。

将来要搞点青年干部起来，各个局、公司总要搞点青年人起来，在大风大浪中，左派要锻炼一大批人出来，但还要一个时间。

学校你们要做点工作，使他们联合起来。

敌我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什么人造反，造那个的反，你们要提高警惕性的。真正的左派也不要那么多人，(插话：有些同志迫切要求加入怎么办？)你们要自己掌握。

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受压抑的是好同志。有一部分我是怀疑的，错了是错了，但完全错了也不见得。还有一种是打对了的，难道外贸部没有一个牛鬼蛇神？！

一个是完全搞错了的，一个不是完全搞错了的，他们本身有毛病，有错误，群众对他们是气愤的，他们有反党言论，品质很坏，群众为什么打他，总是有道理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有一种是打对了的，这些人不能平反，不该平的就是不能平，难道地、富、反、坏、右都平反啦！那我们还有什么立场啊！还有什么毛泽东思想啊！

我认为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彻底改组外贸部。

我想找左派谈谈，到底怎么三结合法，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经验。

对学校同学，你们要做好团结工作，可肯定他们的成绩，他们在外贸部是有成绩的，做了一些错事，允许犯错误嘛！风雷可真是风雷，天天打电话，他们打给我，另一派也打给我。彭崎明也很厉害，也会讲话，嘴巴哇啦哇啦的，我准备让他们学校的到我这里来吵，到我这里来斗。部里的左派要大联合，有了两派也不要紧，终究要一派的。

要搞三结合。从党组出来一批人与你们站在一块，但千万不要象杜向光那样站住。犯了错误要向群众作检讨，要支持你们，但支持你们不是为了打倒那一个，他们站出来后与一般干部组成革命委员会，至于这个委员会和党组是什么关系，你们别管它。

(当代表问到党组成员可不可参加造反派时)党组成员可以参加造反派。

卢绪章这个人并不是坏人，能够做些事情的，他的历史我已经检查了，还要查一查，有许多人过去叛变自首的我不知道，这个人(指卢绪章)是积极工作的，工作是有干劲的。

自首人很多，这些同志作了几十年了究竟还是个条件吧！如何对待这些同志，今后中央还要讨论。

他(指卢绪章)是个篓子哩，他能够背，这就是很好嘛！贾石还是有点干劲的人。

(又谈到国际贸易研究所问题，从略)

林海云讲话都是很简短的。他和你们造反派是有感情的，他到我这里几次谈到你们。

542. 陈毅接见外专局“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摘要 (1967年2月22日)

这批同志已经处分的暂时放在那不撤销，也别说对，也别说错，运动后期决定，要观察一个阶段，还要审查嘛！不审查怎么知道处理错了呢？……你们夺权以后处于领导地位了，先要说服他们，不要总实行压力，有的同志不是品质问题，他们想不通，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有些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处理了，严重的甚至可以逮捕，因为超过了人民内部矛盾界线了。你们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些人找你们的岔子，你们掌了权，防止在工作中出现一点问题，他们找毛病反夺权，对个别人先说服，必要时也要有点压力。

谈到有关不承认主义甚至不上班的问题。

你们要做他们的内部分化工作，他们不是还有一部分不承认你们夺权吗？不承认就叫他们不承认吧！你们的夺权我们是研究过的，中央国务院、外办是完全承认的，支持你们的，对不上班的同志要说服他们，告诉他们，我们夺权是国务院承认的，你们拿国家的薪水不干工作怎么行？这是不合法的，你们拿国家的钱是为专家服务的，又不是为造反团服务的，这是涉及国家荣誉问题，你们要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可以三而再，再而四地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他们绝大多数是会接受的，至于少数顽固坚持的那就好办了……。

谈到反夺权的问题。

夺权主要是讲问题，有的人一时搞不通，挑拨离间，想秋后算帐，这种反夺权是绝对不许可的，夺权在十二月连我也没想到，你们造反派没有分裂还算不错……。毛主席及时发现新生力量，最支持新生力量，我们承认这个新生力量，全中国都要支持这个新生力量上台，能结合的就结合，顽固的就不要了。要有共产主义风格不报复。他们(指当权派)，当权的时候，打击你们是不对的，外调是恶劣的作法，你们把他们停职留用使他们改过，坚持工作是对的，他们把你们打成“反革命”是外办派的工作组。我也要负责任，我过去管外办，压过你们，在大会上向你们道歉了，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道歉，你们要系统地好好地学习第三期《红旗》社论和最近要发表的第四期社论，要好好地研究，把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两篇文章很好地学习，把它系统化。他们被夺了权(指当权派)，他们还有私心杂念，你们要说服他们，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你们(指陈旭东)的包袱不要看到当权派下台了，放不下架子，不愿站在新生力量方面，以为是受青年人的气，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老长征干部(指陈旭东)要站出来，不要吃老本了，要立新功，要公开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革命。长征的目的是什么？爬雪山，过草地，经过少数民族区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搞出一个人民的新天下，今天全国普遍夺权，就是要立人民的新天下，你们监督留用的要做干部和纵队的思想工作，反夺权是坚决不许可的，反夺权不是革命行动，国务院、外办绝对不许可。

(提到我革命造反团内部准备整风问题。)

我同意你们内部整风，你们可以搞，不要怕搞垮自己，是搞不垮的。你们也可以先整一段风，有一个文件(指《红旗》社论第四期)快下来了，要更好地掌握党的政策，掌握了武器再斗、批，改就更有把握了。让当权派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动，你们先搞一段，内部整整风是有好处的。不行的可以撤换，不要自己保自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可以撤换嘛。

543. 陈伯达谈穆欣问题

(1967年2月23日)

我不保谁，一切人都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考验，包括你我。穆欣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定这个调子有没有把握？有没有证据？穆欣有问题，我们批评过他，对于他的工作我们批评过，批评得比较严肃。

我们认为这个人比较软弱，工作能力较差，对于行政工作可以做一些。他过去的事我不太清楚，但是总要从多年里看一个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间里，可能有很多错误、缺点，我没有调查，这是想当然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没有错误的人是很难找的。如

果他有缺点、错误，我们赞成批评他。不要定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调子，使他没有改正的机会，使他不能在《光明日报》工作。这些看法你们考虑考虑，要考虑多年的工作，《光明日报》多年来工作是比较不错的，他发表了不少好文章，这样一下子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群众怎么分别好人和坏人呢？

对于一个人，不要马上弄成反革命，有错误和反革命是两类矛盾。这是我的个人的意见，我的意见不强加于你们。你们对于给他的文件不要动，有些是秘密的，你们是不应当看的。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具体工作，对他不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主席关于整风和《古田会议决议》等文件，要好好看一下，要一边斗争一边学习。

《光明日报》金涛问：你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伯达同志答：(1)不要动他的文件，不要抄他的家，抄他家是不对的，要给他自由，恢复他的自由。(2)有错误可以批评。(3)不要抓住一点就把他打成反革命，正确与错误要作适当估计，象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不能笼统定调子。

问：群众揭了他好多“三反”问题。

答：不要轻信，不要没有虱子抓虱子。

问：以后报纸如何办？

答：让他做工作，不要把他的行政工作搞掉了。

问：我们可以不可以斗穆欣？

答：可以开批评会。

544. 江青、谢富治在中央文革召开的中学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24日)

对于“联动”这样的反动组织要做分化瓦解，孤立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对它的大多数要进行工作。提醒你们注意，他们的组织很严密，是有后台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一方面要做好精神准备，防止“联动”反扑，但不要排斥犯错误而又愿起来革命的人，你们要学会做这个工作，不能孤立自己。

在同一个会上，谢富治副总理指出：在中学，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同“联动”反动组织做坚决的斗争，把他们斗倒、斗臭。他们是一小撮，为何这样顽固呢？就是有它的后台。他代表一个反动的思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代表，目前他们歪曲《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替自己壮胆，准备反扑。

545. *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大革命广场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时的讲话 (1967年2月24日)(见《系年录》第六十七卷)

546. 三机部代表请示总理的几个问题 (1967年2月24日转抄)

一、部的夺权三结合怎么体现？

总理：部的三结合是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群众三结合。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

二、夺部的权，以部内为主体，怎样解释？

总理：以部内本部位造反派为主，而不是本系统。外面来的要回去闹革命，京外不能参加。在京的要是直属单位，工厂要考虑(聂副总理插话：在京工厂参加了，那么天津工厂也要参加了，部本是部内来夺权。三机部还有很多工厂，这一部分工厂夺了，那一部分不承认，

再夺：那夺到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你们考虑。

三、在京单位联合起来，到部内去点火起个促进作用。

总理：对！起了促进作用，以部内造反派为主，共同夺部的权。为主是指部内造反派，成立象个革命委员会呀！北京直属单位由少数人参加，但不是学校。如机关造反派欢迎，学校可有个别人参加，那就要离开学校了。

547. 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2月25日下午 人大会堂)

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有：

伯达、康生、叶剑英、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郑维山、傅崇碧、叶群

江青：

同志们好！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全体同志向同志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热烈鼓掌)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在过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创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正在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立新的功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永远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前进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的中流砥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鼓掌)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贯彻毛主席的革命的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一夺权斗争正在胜利地进行，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在这个大好的形势下，把对革命师生短期军政训练的任务交给了同志们，这是党和毛主席对同志们的最大的信任，(热烈鼓掌，呼口号)是同志们的最大的光荣。(鼓掌)毛主席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指示，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鼓掌)派军队干部、战士训练革命师生，是实现毛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的一个好办法。这样做，对加强革命师生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进一步走上正轨，对加强战备、保卫国防都有极大的好处。我们殷切希望同志们和大中学校革命师生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完成军政训练的任务。我们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鼓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革命军队，因为人民解放军是用毛泽东伟大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鼓掌)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军队，是具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人民子弟兵，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同志们，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走到那儿，就这样好传统、好作风带到那儿。

同志们，这次到大中学校去搞军政训练，要把人民解放军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给广大的革命师生。

同志们，这次政治训练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定要使广大的师生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进一步懂得什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使那些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和迫害的革命师生和那些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和蒙蔽的师生，都把斗争的目标集中到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身上，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身上。要

使广大师生正确地认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识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前的表现形态，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因为这个运动一直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在某些群众组织中出现了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极端民主化、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这不是主流。这些错误倾向集中起来说，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这次到大中学校去也必然接触到这个思潮，你们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还未定型的知识分子青少年，这个工作是艰巨的，同志们要有思想准备，同志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坚决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热情、耐心地指导广大革命师生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他们的优点，例如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可贵的，他们敢想、敢说、敢做。他们有些人是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的，他们敢于起来反抗，他们还很勇敢地跟一些反动组织，例如已被击溃的“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之流，例如目前还存在的“联动”这些反动组织，他们都进行过很勇敢的斗争。这些，同志们要充分地认识到要发扬他们勇敢的革命精神，同时，也要耐心地帮助他们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整顿思想作风，整顿组织，这样就能更好地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更顺利地完成大中院校的斗、批、改。在座的不少的同志参加了在几个大中学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试点工作。这次试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正如毛主席说的，“训练一下和不训练不大一样”，学校的政治空气大为高涨，广大的革命师生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更加深了。通过试点，你们已经取得了不少好经验，你们一定能够创造更多的好经验，你们一定能够依靠师生中的革命左派，团结广大群众，把这次军政训练搞得更好。你们这次去搞军政训练，参加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对同志们来说也是一个锻炼自己和提高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希望同志们在实际斗争中时时刻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虚心向学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我们相信，用毛泽东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胜利地完成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鼓掌)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热烈鼓掌)

陈伯达：
同志们，
我向同志们致敬！(鼓掌)
祝你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工作上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新的面貌。(鼓掌)

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就是代表我们文革小组的意见。(鼓掌)
同志们，我们是在毛主席的指导下工作的，是努力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我们是毛主席的小小的小学生，同时是群众的小小的小学生，(鼓掌)也是你们的小学生。(鼓掌)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要向你们学习。(鼓掌)学习你们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在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作风。(鼓掌)学习你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新经验。(鼓掌)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愿意在你们帮助下，受一次军政训练。(热烈鼓掌)

毛主席告诉我们，实践是真理的标准。你们在军政训练的工作中，一方面帮助革命师生，

另一方面也将向革命师生学习。(鼓掌)我想大家将进一步在军政训练工作中，善于分辨大是大非，分辨谁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谁是站在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而大大地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更好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鼓掌)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鼓掌)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万岁！(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热烈鼓掌)

叶剑英：

同志们，

我们都是军队干部，今天开会是为了要参加北京市的革命师生的几百个中学、几十个大学师生的军事政治训练。已经进行了一期了，时间不过是二十天。是毛主席看到了北京军区同北京卫戍区的二十天的革命师生的军政训练的总结，认为很好。所以，毛主席就把这个北京卫戍区的总结(大学中学的一起的总结)要通报全国，要全国的机关、学校每年都要按照这一次的办法来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军委已经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已经把指示的批语同北京卫戍区的二十天的训练的总结批发到全国去了。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这个开端是开得好的，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第一期已经过去了，同志们就要进行第二期军政训练的工作。第二期究竟怎么搞法，刚才江青同志、伯达同志对我们都有正确的同时也是明确的指示。这两位同志的讲话完全是代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历来的指示的，是给同志们一个更落实的讲话，我是完全拥护。希望我们军队的同志们坚决地到革命师生中去贯彻。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在座的同志有些是军以下的干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军以下是战斗单位，军、师、团、营、连是战略单位、战术单位、战斗的单位。随时准备着战斗，也是随时准备着保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我们祖国的国防，不受帝、修、反任何的干扰。因此，军以下(军、师、团、营、连)的干部只是进行正面教育。所谓正面教育，就是把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自从十一中全会以来中央历次的指示，《红旗》杂志上面历次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间所发表的文章以及主席、军委一次二次所发出的命令、指令，联系到各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有益于我们的部队干部的一些教材，正面的教材，同时也是附带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也是有益于我们的反面教材，以便教育我们的干部。虽然有些同志没有亲身参加到机关中间、学校中间、党政机关中间、各地机关中间，没有参加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没有直接批判他们这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直接批判他们怎样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可是，可以使用运动中间所出现的一些教材结合我们本身的思想，部队自己本身的情况，来进行我们正面教育。所以，正面教育也应该是说，一方面保卫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方面也保卫了我们自己的祖国国防，完成了自己方面的任务，也是保卫了军委所制订的(原讲话如此)，保卫了一些单位，完成了你们的任务，同时，在这个中间，也受了许多的历史上没有过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育。

另外一方面，是有的机关干部今天在座的自己亲身参加了在机关中间进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许多牛鬼蛇神，批判了许多错误的干部，自己亲自参加了斗争。这一批干部所积累的经验应该是更多了，自己体会主席、中央、文革同军委历次的一些指示，文件上发表的文章，对自己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同志应该体会得更深，理解得更深，理解得比我们还深。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亲身参加过斗争的同志们，应该比我们认识得还更彻底。这是一部分亲自参加过斗争的。

你们下去是要同广大革命师生在一块儿进行军训教育，而他们是什么呢？广大的师生是自己更加广泛的，全国各地区，党政各机关、党政军民各机关都有他们的战绩，他们的丰功伟绩。在中国人民方面来说，在全世界人民方面来说，是创造着一种历史上没有见过的大伟

绩吧。就是全国院校师生组成的红卫兵为代表的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思想、中央的指示、军委的指示来进行的坚决的革命的行动。所以，他们集中回到学校里来的时候，经过一些经验的总结啊，开门整风啊，他们不仅是带着北京的经验，还有带着比如远处边疆的经验，黄河流域、珠江流域的经验，各地方的经验，沿海边的经验，他们的经验更多。他们一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个战斗队一个战斗队到处都去了，所以他们的经验更丰富。因此，给我们一个认识，同志们参加到实践里面去，进行军政的训练首先是我们军事干部的首先要向他们革命师生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学他们进行八个月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得到的丰富的智慧。所以不是你们到革命师生里面去，就自己以老师自居，或者“你们是没有什么可学的，只是听我的”，当然同志们没有这个想法了。我们应该指出，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小将们学习，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间的经验，学习文化大革命中间的知识，学习他们怎样体会主席的思想，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这样，二十天的成绩中间有一大半是学生教给我们军事干部，革命师生们教育我们军事干部。还有一部分就是革命师生怎样子从我们解放军干部身上学会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年来把林副主席历来不断指示我们的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要突出政治，要搞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怎样在部队中落实，怎样运用这个东西。所以，经过这一次二十天的第一期的教育，革命师生都知道了解放军怎样学毛著，所以他们就可以从我们解放军中间学习怎样学习毛主席思想的，怎样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不是常讲嘛，身教重于言教吗？我们干部都知道这一句话嘛，你们到革命师生里边去，主要靠自己，以身作则，作出榜样，使革命师生看出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纪律锻炼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自己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林副主席指示的落实这些东西。所以就变成相互学习，共同提高，而首先要向他们学。这是江青同志、伯达同志给同志们作正确的指示之后，我就是作这么个补充。更重要的，是同志们要从革命师生中间认识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有些什么贡献。假使说我们中国这样的国度，十七年来的建设，在和平建设中间，在和平环境中间滋长了什么东西，那就是生长了一些危害的人物，滋长了一些走向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危险的思想，甚至有一些政策，这个政策已经被毛主席党中央批判过的了，如果我们不进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国就会被谁，比如说刘少奇、邓小平这一流的人物，很不知不觉地就会把我们的国家带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同苏联现在一样，尽管你是四十多年的，近五十年的列宁主义的故乡还是一样走向修正主义。象苏联这个国家，苏联人民要重新解放，那就要进行革命，要进行武装斗争，那就不知要死多少人。革命必然流血，革命必然伤人。有些人多少年来、十七年来养尊处优，已经腐化了，已经腐朽了，已经蜕化了，还有许多叛变了。这些如果不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狠狠把它挖一挖，把它挖出来，那我们是非常危险的。伤了一些人不可免的，革命就是革命，就是要死伤，战斗就是要死人就是伤人的，如果一个都不死，一个不伤，还算什么革命呢？这个少数人的死伤，就可以获得全国绝大多数人避免修正主义这场灾害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行径，同志们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不要听信谣言蜚语。

这个胜利同中央文革直接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的工作，日日夜夜的奔忙是不能够分离的。我们不是看见有些标语吗？(现在没有了，过去我们看到了)对中央文革不满，对中央文革有些反抗，是完全错误的。中央文革八个多月来的工作完全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工作的，它的成绩是伟大的。希望我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有一个坚定的认识。在毛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最后，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548. 陈伯达、康生、王力谈“三结合”等问题 (1967年2月25日晚)

二月二十五日晚，陈伯达、康生、王力等同志接见云南造反派时谈到以下几个问题：1. 大联合是大方向一致下的大联合，是在原则上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2. 造反不分先后，土改时就有贫农起来的较晚；3. 工厂是干部民兵三结合，还有唯心主义的合二而一杨献珍式的三结合，有的以三结合为名复辟资本主义，要好好读读去年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不要忘了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4. 在夺权斗争中打倒一切、排斥一切都是错误的，不是阶级分析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不能团结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5. 目前提出造反派内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是不对的，不符合中央精神，《长江日报》作的就不对。

549. 吴法宪对空军司令部革命造反队 和空直各革命造反组织及部分革命群众的讲话 (1967年2月25日)

同志们，战友们，首先向你们问好，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你们在过去建设空军的各项工作中和半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指示，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我代表空军党委向你们祝贺！(群众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形势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和领导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广大革命群众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创造了无产阶级制度下的大民主的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破旧立新的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保证我们国家不变颜色。这场文化大革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推动，为国际共产主义提供了新的经验，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高呼：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在最高统帅毛主席和他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的正确领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全国全军一派大好形势。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展开全面决战。

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遵照毛主席指示的“三结合”的方针，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的夺取，一个一个的巩固，例如：上海市、青岛市、山西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等，都是搞的好。最近听了山西刘格平、刘贯一、张日清等四位同志和几位革命小将的介绍，感到非常好，他们的经验很丰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阵线被打的七零八落，正全面崩溃。形势好得很。

遵照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军队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且在人力、物力方面给予支援。对左派坚决支持，对右派坚决打击，对保守派进行教育，分化瓦解，对现行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镇压。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气焰。

空军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很好。一月十三日，徐副主席、江青同志、杨成武同志、关锋

同志向空军院校、机关、工厂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给空军机关、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指明了斗争方向，解决了群众的认识问题。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七项规定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把空军文化大革命引上了轨道，有力推动了运动向前发展。空军部队一直保持着稳定，一直坚持紧张的战备和训练，警惕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一月十三日蒋介石匪帮想趁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出动空军进行捣乱，被我福建空军部队打下了一架 F—104。这完全是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林副主席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打下来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空军院校来串连的人员，在二月二十四日前也都按照军委的规定全部回去了。

空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将近半年。在这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接待红卫兵、训练红卫兵的工作。特别是协助北京卫戍区组织红卫兵接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搞的比较好，在完成这项任务中体现了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例如，在西郊机场接见的那一次，头一天晚上八点通知我们第二天接见，我们连夜准备，平整机场道路，架设线路，安接水管，工程量很大，但终于按时完成，保证了接见一百四十万人。这些工作，是依靠直属各部的同志做的，×××师、北京空军的同志、院校来京的革命师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共同做出了成绩。

半年来，同志们鸣放了很多意见，特别是从今年一月以来，掀起了一个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新高潮，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十分激烈。经过五十多天的搏斗，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革命群众真正做到了在斗争中学，斗争中用，活学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和许多革命群众都是从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擦亮了眼睛，明辨了是非，正确地掌握了斗争大方向，吸取了克服困难的力量，取得了胜利。你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始终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你们做的好，我们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2. 群众广泛的发动起来了，革命左派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由少数发展到今天的约占空直机关参加“四大”人员的四分之一。当然有的单位还要少一点。并且出现了空直机关左派大联合的局面。革命的领导干部也站出来了，和你们一起闹革命。广大的群众，也正在向你们靠拢。

3. 揪出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继揪出成钧、刘震、张廷发、何廷一、王静敏之后，各部门的革命群众又揭发了一些问题严重、有重大错误的人。例如司令部的邢永宁、尉剑畴、王少江；政治部的黄玉昆、王平水、夏屏西；高指的周彪、杨易风；雷达兵部的向黑樱等。虽然他们的性质还没有定，但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还要注意的是，至今还有一些单位没有乱。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讲，开始确实是很不理解。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要怕乱，乱了好，先乱才能阵线分明，才能有利于真正左派的团结，才能把运动搞好，希望你们继续揭发。如果这些单位还是铁板一块，内部搞不动的话，你们这些革命左派可以戳它一下，当然主要是靠内因，不过在一定的情况下，外因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还有一些坏人没有揭发出来，一定要揭发出来。我们相信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就一定能把运动搞彻底搞好。你们组织斗争三反分子，批判揭发都比我们搞的好。常委的同志们很称赞你们。很多同志为了揭发批判、组织好会议，不怕疲劳，连夜苦干，表现很好，你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

4. 你们比较彻底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刘志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批判了空军党委和空军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对我们是个挽救。对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现在批判得也不够，你们还要继续批判，要坚决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刘志坚反动路线的影响。对空军党委的错误，要继续批判。

空直机关文化大革命取得以上成绩，首先是空军机关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斗争的结果，也和空军院校来京的广大革命师生的努力分不开。但是，在这阶级斗争中，也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偏差，发生了一些违反命令、政策、规定的现象。一小撮人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利用，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干了一些坏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公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把矛头指向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和操纵下，提出了“怀疑一切，排斥一切，反对一切，打倒一切”的错误口号。有的甚至还勾结机关外部的人，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他们还说：凡是反上级的都是左派，不反上级的都是右派；级别越高，资格越老，越不革命；带“长”字的都要烧，烧焦了再看；打倒当权派；不打死老虎。有的甚至提出“除了毛主席可以信任外，其他人都是扯蛋”等等。这话非常反动，攻击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攻击了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攻击了毛泽东思想。(群众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他！)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提出带“长”字号的都要靠边站，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的是极端反动的。必须坚决揭露批判，彻底肃清。最近还发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到处写反动标语。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上当。

还有一些人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公然违反《十六条》，违反《八条命令》，非常欣赏搞武斗。但这些都是个别现象，是一小撮人搞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在幕后操纵搞的，对这些坏蛋必须坚决镇压。今后，必须坚决按照《十六条》和《八条命令》办事，按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办事，认真提倡文斗，反对武斗。

二、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大力支持革命左派。

军委七项规定第二条规定：“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

各级领导干部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导和军委的规定，站在真正的革命左派方面来，公开亮相。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

空军党委常委对空司革命造反队，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了解，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我们表示支持，最坚决的支持。尽管他们在斗争中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但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拥护毛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林副主席，拥护党中央，拥护中央军委，拥护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他们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他们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的矛头始终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行动是符合林副主席指示的三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对其他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也同样支持，因为今天主要是接见空司革命造反队，所以着重讲他们。

他们是在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月十三日前，他们是少数派，时时刻刻都在受围攻、辱骂，他们的联络组两次被封。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毫不动摇，做出了成绩，取得了胜利。真理是在你们手里，你们是不会孤立的，永远是不会孤立的！一时的孤立只不过是假象，暂时的。只要你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永远不会孤立！(群众高呼：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我们相信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是坚决跟毛主席走的，其他部的革命造反组织，你们现在还是少数，你们不要怕孤立，你们也是不会孤立的，永远不会孤立的！有些同志非常坚强，一个家属就可以把一、二百人辩倒，因为她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真理。我诚心诚意的向她们学习，学习她们的坚强意志。

空军党委常委认为，空军革命造反队是经过了考验的，我们坚决支持他们，站在他们一边。我们也坚决支持到会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左派。

除了空司革命造反队以外，空直各部(包括司令部)都出现了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空政“愚公移山”革命造反队和空政文工团革命造反队就是其中最突出的。空政“愚公移山”革命造反队也是从孤立到壮大，空军党委对“愚公移山”革命造反队表示坚决支持。对于其他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和革命群众我们也表示坚决支持！向你们学习！

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到群众里面去，同空直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一起，把空直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三、诚恳希望同志们对我们的缺点错误进行揭发批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每个人都要在这场革命中经受考验，都要在这个大革命的洪炉中改造世界观。毛主席林副主席再三教导我们老同志、老干部“不能吃老本”，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才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劳。我们一定要遵照这些教导，努力改正错误，认真改造自己，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坚信毛主席，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看作既是一分革命力量，也是革命的对象。

空军党委常委、空军文化革命小组在领导空军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特别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更严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没有跟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没有跟上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我们执行了刘志坚所推行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些东西。这方面错误，在机关文化大革命中存在，在院校文化大革命中就更为严重。原因主要是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差，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因此许多问题违反了毛泽东思想，背离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里，我向同志们认错，保证坚决改正。

我在空军工作十七年了，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都有许多错误缺点，有的非常严重。

半年来，机关的同志对我们，特别是对我进行了许多批评，贴了很多大字报，写了小字报，各种会上提了很多意见，揭发了许多问题。这对我们是非常好，非常有益的教育。我们诚恳地希望同志们在今后的运动中继续对我们的缺点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继续对我们进行“炮轰”“火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只有这样，才能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所以衷心地希望同志们对我们的错误缺点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揭发得越彻底越好，批判得越深刻越好。要把我们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统统烧掉，烧掉得越干净越好。

对我们在过去和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我们自己也将继续进行深刻检查。我们一定虚心地、认真地听取大家的批评和意见，下定决心，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发扬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精神，使领导干部时刻受到广大群众的监督。

四、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

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军委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纪律，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按照这些方针政策来统一我们的思想，统一我们的行动。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下来的许多命令、指示、规定都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修改制定的，每一个革命同志，都应该认真反复学习，坚决执行。

五、向同志们提几点要求

空直机关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今后斗争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一定要以最

大的努力，下最大的决心，把空直机关的斗批改搞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我们大家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刘少奇、邓小平、刘志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要彻底挖掉空直机关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他们的反，把他们斗倒，斗垮，斗臭，要乘胜追击，挖掉一切埋藏在我们内部的定时炸弹，扫掉牛鬼蛇神。

(二)要坚决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和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以及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使空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切实遵循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发展，革命的左派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林副主席的话，最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我们一定要维护最高统帅签发的命令的尊严，要坚决保证中央和中央军委这些政策、命令、指示、规定毫不走样的贯彻落实。

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号召，在坚决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要搞好战备，搞好工作。我们一定要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伟大号召，立即行动起来，以劳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援农村人民公社的春耕生产。

(三)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继续发展壮大真正的革命左派队伍，团结广大群众。革命的左派一定要紧密地联系群众，要注意团结大多数，一时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对于一切过去或者现在对你们还有怀疑，有误解的群众、要耐心进行工作，不能歧视、排斥。一定要顾大局，不能有私心。不要骄傲，有了缺点错误就改正，不断整风。要学习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老三篇”和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只要你们坚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向，群众就会逐渐了解你们，支持你们，左派队伍也就会逐渐壮大起来。

(四)加强左派队伍的思想建设。最主要的就是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整顿思想。几个月来的斗争证明，你们的斗争大方向是对的。但是，你们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纠正这些缺点错误。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思想革命，只要是破私立公，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一切阵地。因此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要触及灵魂。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克服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错误倾向，要防止和克服骄傲自满情绪。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的这个教导：“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五)我们希望一切革命的领导干部都切实地遵照毛主席关于“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坚决地依靠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地和革命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要认真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空直机关的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话的，革命左派要团结他们，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共同并肩战斗。对于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主要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教育他们，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对于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的，累教不改的，也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机关也出现了一批年轻小将，他们敢说、敢闯、敢干，革命精神很好，大方向总的是对的。但是，他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做了一些错事，有些同志甚至在关键时刻迷失了方向，对于这些同志，我们既要耐心地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又要很好地保护他们的革命积极性。绝不允许抓他们的小辫子，不要上敌人的当。同志们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法宪补充讲话

我听了司令部革命造反队和空政“愚公移山”革命造反队两位代表的讲话以后，我还要讲几句话。

我们向同志们学习。你们是真正的英雄。你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了好样子，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希望真正的革命左派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广大群众，经过运动，最后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这一点非常重要。

伟大的领袖还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我要求同志们坚决按照毛主席这个教导办事。

刚才余立金同志和其他常委都讲了，表示坚决站在你们一边。你们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党的政策。我们要无限忠实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即使粉身碎骨，也要跟着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从井冈山起，一直和毛主席站在一起，一贯最坚决的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最能体现和发挥毛泽东思想，最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林副主席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听林副主席的话，拥护林副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反对陈伯达、江青同志，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

刚才接到后勤革命造反派的同志提出的问题，要讲对空军总医院夺权的看法。总医院的革命派夺权，他们做的对，虽有不符合夺权规定的地方，但他们是夺权规定下发以前夺的权，我们要支持夺权的那一派，帮助他们纠正缺点，巩固胜利，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坚持错误的顽固分子，对于那些别有用心坚持捣乱的人，要进行坚决斗争。总医院夺权的革命派，要按照中央、军委关于夺权的规定和《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的精神加以改进。

还有第一高专的夺权，我们是支持的。对于空军其他驻北京的已经夺权的单位，我们还没有表态，为什么不表态？我们还要看一看，没看清楚的一律不表态，不然就会搞错。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和林副主席关于加强科学性的指示办事。

最后祝你们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更大的成绩。

550. 张春桥与华东局革命造反派座谈纪要 (1967年2月25日)

上一次来上海主要是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作。这次去北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工作，周总理问起华东局现在搞得怎么样了，我回答是目前一时期工作很忙，没有插手管。这次受总理的委托，我管一管，所以今天找你们谈一谈。

周总理说，华东局书记处的权不能夺，书记处是党中央派出的机构，要夺也只能夺华东局机关内部的权。就是要夺华东局权，也只能待六省一市全部建立革命委员会之后和华东局机关一起报请党中央指示后考虑。现在各省夺权没有通过华东局，上海夺权也没有通过华东

局。周总理要我管江苏、浙江。现在有些省的当权派被打倒了，李雪峰还没有打倒。中央“三结合”也刚刚开始，许多部门瘫痪了，目前煤矿煤的生产有些下降，西北阳泉煤矿的权还没有夺下来。全国经济形势一、二月可能有些下降，但权夺过来之后就会好转。农业还跟得上，问题不大。农民自听了中央的指示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小三线建设和上海协作等问题要抓起来。

机关的运动短了一些。目前要：(一)搞好机关文化大革命；(二)抓革命、促生产；(三)三结合夺权。对于干部要阶级分析，要相信大多数，有些干部的政治面貌是人是鬼，已是很清楚了。

(这时潘国平要走了)张对潘说：耿全章抓起来你知道不知道？潘说不知道。张说：我认为不要抓来抓去，要照顾工人热情。

六省一市的组织不要搞了，叫他们回去，各省都打倒不对。他们(指省委书记)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很大功劳，现在犯了错误要允许他们改正。潘复生一开始就站到造反派一边来。贵州情况也是如此。中央曾经排过对立面名单(指站到造反派一边来的干部)，但非常困难。彭真、薄一波在山西已有三十多年的老根，山西省的权现在夺下来了，但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

现在提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这是对外讲的。实际上这是反动的口号。“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是陶铸提出来的。在运动一开始，我们没有反对它，这是由于在运动开始时起了一定积极作用。在当初姚文元同志曾写过文章，但毛主席说：不要发表了。我们也反对湖北当初展开的“全面批判”这一口号。但运动发展到了现在，矛盾基本暴露了，如果再提出“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就离毛主席路线更远了。

毛主席说：你们对刘少奇怎么办？是不是要抓起来？我看以后我还要和他一起工作的。彭、罗、陆、杨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唱的调子愈来愈高了，毛主席建议不要开了。毛主席说我怎么能和他们四人(反党分子)一起开会呢？毛主席对犯路线错误的干部一直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要团结—批评—团结。如历史上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王明等都是这样。王明在七大、八大都选上中央委员会了，以后九大不会选了，因为王明逃到苏联去做特务活动去了。刘少奇看来九大中央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红旗13、14、15期社论，是一级一级加油的。要相信广大群众，过去很多人都怕，当毛主席上天安门时很多人怕群众。过去斗地主时有人怕了，说做得过火了。毛主席说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挂牌子、戴高帽子是我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提出的，当时是斗封建主义剥削者地主，这是完全应该的，但到解放区斗地主时也很少用了，现在斗的一些当权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都有功劳的，这是和过去斗地主时有区别的，以后不要挂牌子了，要照中央军委八条规定办事。

我们说事物是有正面的和反面的。当红卫兵一出现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他们无微不至地爱护和关心，但后来发现红卫兵中一部分人打人，为了这事中央文革小组调查了这事，开始发现打的都是一些坏人，都是地、富、反、坏、右，打过就算了。但后来发现坏人、好人都打了，这就不对了，中央不得不出来制止打人的。

现在外面说，有些省委书记失踪了，这是不对的。叶飞、江华、谭启龙都到北京去了，都是毛主席邀请他们去的，他们到北京去后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错误，一方面要学习学习，他们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都有大功劳的。

机关内各部委要实行“三结合”，要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农委、计委、财委、经委有业务工作要做好。内刊、理论班不要急于杀出去，以后理论工作还是需要的。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好的。知识分子弱点就是怕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对当权派斗争要大、中、小会相结合，大会是造声势，中小会是解决问题。

山东省、福建省夺权斗争快了。江苏、浙江还有些问题。我插手管一下。华东地区的反动路线主要是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三人负责，其他人都是执行者。去年十一中全会上毛

主席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批判了刘邓路线。这时魏文伯也写了一张刘少奇的大字报，说刘的检查极不深刻，还不如解放军的一个连指导员。会后我和魏谈话，你的大字报怎么能这样写，指导员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刘少奇是代表一种资产阶级思潮的，是在我党的代理人。魏文伯看来是很糊涂，但不是一般的糊涂。去年四月初批判彭真大会，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是毛主席批准的。在到北京去之前，我征求魏的意见，魏提出两条：(一)要狠狠批判彭真的“二月提纲”；(二)刘邓的人事关系很复杂，你要小心。在十一中全会上主席曾对各省委书记批评了一下，魏根据个人的印象，自己写了一些省委的材料，结果毛主席看了之后批评了一下，魏根据个人的印象，自己写了一些省委的材料，结果毛主席看了之后批评了他，省委书记不要人人过关。

魏文伯和韩哲一要有区别。我接触韩三次，在安亭事件中曹荻秋是反对的，但韩是同情我的，他主动去苏州解决问题。我在中央看过韩的材料，至今没有发现什么。韩和薄一波的关系可能很复杂的，薄是经委主任。薄的一批人主要和刘少奇有密切关系，他们都是北方局的。但韩不一样，做经济工作的一天到晚就是算帐，全国搞经济工作的人很少，余秋里就是如此。

贴我大字报不要讲人家反革命，但要看问题的实质。上海前一时期红革会是代表一种思潮的，他们要炮轰中央文革，这就走向事物的反面了。

平时刘邓见我们表面上很客气，但心里是恨死了我们，如他们再上台，我们就要人头落地。对陈丕显我们是做了一番工作的，在北京开会时，我曾对陈说：你要振作起来，站到红卫兵和毛主席一边来。江青同志和我曾愿意做陈丕显的参谋，但陈根本没有听进去。

陈伯达同志说，反动路线问题按内部矛盾处理，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给予出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

毛选第五、六卷在去年12月毛主席已经批准了，五、六卷的出版是由上海负责。照理在二月份是要搞5卷的，毛主席也同意搞出一篇给他看看，前一时期由于我工作忙没有抓。同志们要节约闹革命，特别是纸张，如果再浪费，下半年连报纸也困难了。

最近你们看到没有，本来提到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现在只提二反了，这样问题就狭多了。本来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现在后一条不提了，只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农村是搞迟了两个月，照理在秋收后应及时搞的，但没有抓紧，脱了两个月。在这以前陶铸搞了一个文件。

对于各地联络站，中央已有文件了。对于以前的联络站，做了一些好事，也做了一些坏事，如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希望撤回去，就地闹革命。对于保皇派，这个名字在上海能听到，在北京是不提了，用保守派比较好。对于保守派在运动初期中民愤很大的骨干分子，特别做了盯梢、抄黑名单、保皇材料、保黑党委的人，应该给予批评、批判。但不要打击面太广，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相信大多数的原则。保守派中大多数是受蒙蔽的，骨干分子是极少数。

对于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应该怎样对待？《红旗》社论第四期中有段是毛主席加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有人提出可能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滑过去，我认为不要紧，也不要怕。许多年来，刘邓滑过去了许多次，但这次终于暴露出来了，这是一次总爆发。

你们很关心主席最近在做些什么工作，毛主席最近在考虑批和改的工作。去年12月毛主席和我们谈了，在批判时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邓小平多年来的讲话，对他们要进行全国性的大批判。

551. 周恩来接见《中国建设》杂志社革命生产委员会全体同志的讲话 (1967年2月26日凌晨 国务院会议厅)

周总理除对《中建》杂志的编辑方针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外，总理还对外文局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重要指示。如下。

总理非常关心外文局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他详细了解了外文局所属的单位，出版多少杂志，每个杂志多少文版；有几个战斗组织，每个组织多少人等，总理十分关心我局的夺权斗争，总理边听我们汇报，边作了重要指示。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目前局内两种意见的争论。总理说：“只要不是保守派就联合嘛，组织一个‘三结合’的组织。有符合局长条件的也可以提两个嘛。”总理还问到：“你们造反派组织，没有吸收领导干部参加吗？”

我们回答：我们认为“长”字号的多数偏于保守。所以一般没有争取他们参加。总理说，那是思想上的保守的保字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两回事，他们不是派工作组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对上边都要火烧一烧，炮轰一轰，没有考虑用多大的口径的口炮，面宽了一些，还是要用阶级分析，真正的革命的“长”字号，也可以参加造反组织。

我们提到外文局能不能夺权？我们夺得对不对？总理说，当时连锁反应。党中央，中央各部不能夺权。中央各部夺权主要指的是监督业务。但中央只有几个部管住了，如外交部。国家科委不同，张本同志本来就是领导干部，是自上而下地扩大队伍。

接见时在场的有外办的同志。他们反映，他们内部起来夺权了。总理说，夺运动权早就说了，外办的权不能夺。要夺权，我们就把它的大权收回中央，你们就没事干了。

我们问总理，外文局夺权报了国务院，怎么还没有批，罗俊我们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罢了他的官。

总理说：官总是要罢一些的，你们当然可以这样了，夺权的单位很多，中央还得一个一个地解决，批了就起连锁反应，在需要夺权的单位，要以本单位为主。到底哪几个单位需要夺呢？不能现在批，现在事情很忙。

现在许多同志都没过关，外办的我还得管。有的单位还挖旧帐。总理又说，不用阶级立场来分析，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不对的。我讲这几句话，是说你们对局级、中层干部要好好审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凶的，不负直接责任的，那些是需要留的，那些是需要保的，那些是要罢的，你们心中要有数，让群众展开讨论。过去那种不让干部检查，只提问题，就无法亮相，没有给他们机会，如他们愿意亮相，应该给他们机会，一次不行，两次，不然业务不能领导，革命也不能深入。斗争还要深入，进行斗批改。

说到对待干部问题时，总理说，当然，每个单位要换一些人，运动总要罢一些，调一些，撤一些，留一些，提升一些。总理又提到现在夺权不是权力机关，是监督。广播事业局夺了权，三个月了，本来想要它做典型，又没有搞好。新华社也不行，现在由王唯真在主持。电台每天要广播，新华社每天要出消息，杂志可以脱期，但也不能太长，长了人家就不订了，我们总想解剖个麻雀。

关于局文革筹委会。总理说，原来设想领导抓业务，文革抓运动，后来红卫兵起来冲击了文革。以后，各革命组织起来后，文革就不灵了，有的自行消亡，有的宣布解散。你们的文革很特殊啊，多数部，文革起了作用的有，没起作用的也有，到批判反动路线时，各革命组织产生时，文革就不起作用了。到了造反派占优势时，文革就更不起作用了。造反派要夺权，就是要夺文化革命大权。文革的发展受到冲击，到两条路线斗争时就转入了分化，凡是“长”字号都是保守，执行反动路线的都不要。如果不作阶级分析，就不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办事，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批判时亮相不够，以后就成了对立面。到了夺权时就靠边了。但是我还是提议对业务要监督。其实，地质部、化工部……早就打破了，超越了这界限。现在组成“三结合”，实行对业务监督，改组业务组织。每个部都有不称职的人。外文局总可以找出一个两个局级干部，与下面业务单位（指业务办公室、行政办公室等）进行结合。外文局可以试试。这次夺权斗争也有一定困难。

当我们提出，有些同志认为解散文革是违反十六条时，总理说：十六条早就被突破了，红卫兵组织，革命造反组织，“四大”变成“五大”（加大串连），就是突破了十六条。对筹委会，大家可以协商嘛，学校早就没有文革了。

总理同意让文革筹委会常委可以参加协商，建议“三结合”机构——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委员会，监督业务，领导运动。然后，文革筹委会解散。

我们问总理，如果有的同志不承认这次夺权，坚持推倒重来怎么办？

总理回答说：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实、加强，也可以改组嘛！红旗战斗兵团可以吸收进来。

关于外文局名问题。我们向总理报告，外文局已改名为“毛泽东思想外文书刊公社”。总理说，“公社”这个名字中央已发通知不用了。上海也去信了，他们已经开了会，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了。

总理说，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对革命实行领导，对业务实行监督，我是这样想的。

当我们提到撤消总编室，可否建立“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时，总理说，对主席思想应该是尊严的，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不能什么地方都用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如果那样就泛了。原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前面也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主席划掉了。

总理指示，我们外文局最好能在二三月把组织问题解决。要由领导干部、中层干部和闯将，有气魄的闯将组成，要以闯将为基础。

总理希望国家机关在三月底前基本就绪，从第二季度起，建立正常的革命秩序，我们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

总理一再强调要尽速建立“三结合”的临时领导机构，先解决组织问题。

总理指示郝德青同志（接见时郝在场）帮助我局建立“三结合”的领导机构，取得联系，把情况上报总理。

关于新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组的关系。总理说，这个问题，机关和地方不同，和省市不同。省市地方是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成立核心党组。当然由党员组成，成为权力机构，如贵州……。机关不能有权力机构，是监督机构。地方是政权，机关不同，机关如果是权力机构，那不成了独立王国？

中国建设杂志社的革命生产委员会也是监督机构。

党组垮了，是否现在要组织起来？总理同意由革命群众提出意见，党组中哪些罢免，哪些照用，报中央审批。

关于监督机构和党组的关系，总理说，现在还没有成熟的经验，运动在发展。设想可否由革命委员会和“三结合”监督机构共同推选出适当人组成。你们还可以创造嘛。（这段意思未完全听清。）

总理说，我本想到外文局谈一谈，但到现在外文局的组织问题还没解决，到三月中上旬，如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就好些。

我们一致要求总理关心我局的运动。

总理说，我倒希望你们外文局搞出个头绪，有情况告诉郝德青同志转告我，有机会我就到你们机关去。我们一致表示欢迎总理来外文局。

最后同总理告别时，我们请总理代问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总理说：谢谢大家的问候。

552. 李富春在听取大庆地区部分革命造反派代表汇报时的讲话 (1967年2月26日下午 李富春办公室)

李副总理：你们汇报的情况，我还得与总理汇报一下。下面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大庆地区是比较慢的，压力比较重的，所以发展比较突然、比较

快。从去年十二月开始到现在，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有几个问题，供同志们商量。

第一个问题，大庆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样进行？究竟是革命的职工和革命家属为主体呢，还是以学生为主体。刚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同志说到这个问题，我看应该以大庆的革命职工、革命家属和大庆的革命干部为主体，究竟以谁为主，这个问题你们回去讨论。

第二个问题，左派组织如何组织、如何形成、如何联合，是自下至上从基层搞起，还是从上至下搞几个总部来运动群众，如炼油厂、总机厂那样成立一个左派组织，或以一个地区形成一个左派组织以后再联合起来，还是先形成多少个总部。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是从下至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形成左派，还是从上至下运动群众，形成左派。目前左派组织还没有形成，现在在场的二十几个代表，我计算了一下你们只代表四千多人，你们大庆有××万多职工，加上家属××万人。其他的人怎么组织起来，不是搞山头主义、本位主义，而是以左派为核心去团结其他的，没有觉悟的、没有发动起来的如受蒙蔽的、处于中间状态的群众。

第三个问题，左派组织如何大联合，大庆方圆有××平方公里，有的比较集中，有的比较分散，有的是工厂，有的是村落式，左派如何联合，采取什么方法来联合。

第四个问题，要搞夺权，必须根据中央的精神和《红旗》杂志的社论，要搞大联合，要搞三结合，对干部必须要有个基本估计，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要反对的，打倒的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职工是这样，对职工家属也是这样，对待干部也是这样。过去我们有的地方，只知道斗顶头上司，斗队长、指导员，没有用阶级分析，这些队长、指导员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听你们讲，大庆地区对干部打击面非常宽了，如果我们不采取正确的政策，不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就无法搞三结合，干部也无法亮相，这个办法不行，所以我们要做工作，对干部要做分析。对大庆我不太了解情况，真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只是工委及各指挥部里一部分人，基层干部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好的。大庆是不是红旗？为什么80%的标兵都打倒了，象王进喜这个人你们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分析他，张洪池、家属的薛桂芳也要用一分为二的去看他们。对干部要分析。要区别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问题的和不可救药的，这样才能搞好三结合。

第五个问题，已经夺了权的单位，能巩固下来可以争取大多数，可以搞三结合，条件不具备的，慢点不要紧，先把群众发动起来，夺权也不迟，不要赶形势，赶任务，不要搞夹生饭。

第六个问题，住在大庆的学校的问题，指大庆本身的，象东北石油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十三个半工半读学校，是不是以不同形式采取对口的形式，如第八工读学生和炼厂，第一工读学生和钻井结合，而不是他们半工半读自己成立一个总指挥部，单独坐阵，同你们结合以后，要教育这些学生多读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语录，多学习中央文件，学习社论，至少要读毛主席语录，坚持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半工半读学校怎么搞法，是正式成立半工半读的学校，还是索性成为学校，过一年或一年半以后成为正式工人，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高中毕业的学生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愿意考东油的去考东油，愿意当工人的就当工人。你们大庆的半工半读学生以前实际上是以工为主，以后和目前半工半读学生以学为主还是以工为主，还是索性当工人，这些问题你们讨论。

第七个问题，外地来的学生怎么办，按中央五条规定，外地学生要全部撤走。是全撤，还是留对你们有用处的，留那一个，不留那一个。帮助你们组织左派，比如哈尔滨的军事工程学院来的造反团，北师大井冈山情况不同，是不是撤呢？还是留一部分帮助你们组织左派队伍，你们讨论一下。

第八个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都谈了，有好多具体问题提出来了，有基本建设方面的，劳动力方面的，材料方面的，运输方面的……我帮助你们一块解决。

第九个问题，每个革命的职工、家属、学生，不但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要不断的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破私立公，我们不但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还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不要认为我们都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世界观，虽然我们都是工人阶级，但是我们每个人还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要学毛著，用毛泽东思想自我教育，自我斗争，自我革命。我们要闹革命，会要少开点，抽时间学毛著，学社论，一定要坐下来，否则就要迷失斗争方向。

你们今天在夺权问题上，反映了两派的意见：一派要夺，一派不要夺，大庆的各个地区具体情况不同。有的条件成熟的可以夺，条件不成熟的不急于夺。

以上是我个人的意见，对不对供同志们讨论，提出意见，你们的生产搞得不错。这么大的运动，没有多大问题，这是响应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大庆还是一面红旗，还是毛主席提出的工业学大庆，大庆的道路是自力更生，多快好省的道路，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应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大庆广大革命职工艰苦创业的精神，归功于大庆的积极努力。大庆这面红旗标志什么，标志着毛主席说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大庆的总方向，大庆在六四年以前的总方向是对头的，六四年以后总方向也是对头的，六四年以前的毛病、错误少一些，六四年以后错误多一些，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滋长了浮夸风，以任务压群众，不民主的作风。不论六四年以前，六四年以后，大庆人，大庆职工，家属还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了艰苦创业的作风，我提出的九个问题供同志们讨论。

你们可能着急回大庆，这种心情我们理解，但你们不讨论，不提出意见来，光靠总理作指示，这不是让总理划框框吗？将来到了大庆又要写总理的大字报。

你们二十几个人首先是思想达到统一，以你们二十几个人为核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就能把大庆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把生产搞得更好，你们意见一致，团结一致，力量虽小可以扩大，任何革命力量都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世界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领导的革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就这样了。

553. 李先念接见外贸学院东方红公社“财贸红色造反团”战士谈话记录 (1967年2月26日下午 中南海财贸会议厅)

(外贸学院东方红公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驻外贸部“财贸红色造反团”战士根据中央指示，准备大部分撤出外贸部。为了总结12月5日进外贸部以来到现在的经验和教训，并请示下一步工作，李先念同志接见了我们，同时还有外贸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一位同志。)

李先念副总理：你们要走了，部里的造反派来了嘛？应该欢送你们。还留人嘛？十二个多了吧？我听说部里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说让你们都走，一个也不要留，这个大字报不好，我批评，应该欢送嘛。我的意见是不留或留几个。你们想谈什么情况呢？党组同志不让你们走，很好嘛，跟你们有感情了，你们还叫他们举牌子。你们看了今天《人民日报》登的上海的大字报吗？非常好！你们谈谈吧。

(红反团战士讲：从三、四期社论发表后，开始了夺权斗争，革命到了转折阶段，我们这时跟的不紧，对大联合和反对“私”字学习的不够，犯了很多错误。)

你们有什么错误呢？没什么错误，就是火烧总理，另外给党组定的高了一点儿，就这两个错误。(我们说：我们只顾往前冲，有时脱离了群众。)就你们自己前边跑，脱离群众？谁说“国内斗争要服从国际斗争？”说苏修调兵，蒋介石登陆等等，没有那么多事情，说要打仗，我就没听说。

你们允许我再找×××谈一次吧？我保证不会破坏你们。不要提的过高。跳高，本来只能跳一米四，非要让他跳一米七，过不去嘛。你们骂人家托派了吧，你们不懂得什么叫托派，硬给人家扣。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托派。(我们说：个别人讲过，不对。现在改过。)

(红反团战士讲：几个月来，我们有不少错误。第一，对干部问题；第二，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我们不爱听不同意见。这个作风不好，内部有不同意见是策略派，外部有不同意见是保守派。)

李副总理插话：这个总结不错嘛。

(我们接着讲第三，我们相信群众不够，认为干部就是不如学生，其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依靠群众不够。如斗争雷任民，只靠大字报选，没有做更多的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因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不够，组织群众也不够。今天我们和党组几个同志座谈时，我们说有时我们是火车头，没有车皮，只顾自己跑，到了地方还是一个火车头，费了燃料，没有作用。第四，我们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不够。第五，对中央首长精神吃得不透，上边精神没吃透，下边群众也没吃透，悬在中间。)

这些错误，挖思想根源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缺乏科学性，我们打算好好学习“老三篇”、主席关于整风的文件，然后到工农中去改造自己。)

李副总理：我给你们讲过嘛，两个夺权，一个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个夺“私”字的权。好，你们这个讲话很好！

广交会的不要撤了。

(红反团战士讲：外事联络处情况，一个“争朝夕”出身好，都是年青人，外语水平低。另一个“星火燎原”出身有反动的官僚，有高级翻译。我们认为：所谓“打手”不一定都是保皇派，“被压制的”，不一定都是造反派，要用阶级分析观点去看。)

李副总理：对，对。你们现在这个水平很高，比我还强。不是所有“被压迫”的都是左派，我就不赞成，你们现在认识很好，有些人就是接近牛鬼蛇神。你们反映这个重要情况，党组不能表态吗？林海云、宫呈祥不能讲话嘛？(我们说：林海云同意我们的观点。)我赞成你们给我写个材料，我不公开你们的，好不好？(我们说：不怕公开。)

(我们说“风雷”17号在学校实际上开的是批判会。“认真队”、“星火燎原”许多队很成问题，“风雷”这样搞，容易陷进去。上海“新外贸公社”是几个坏分子搞起来的。几个打我们同学的跑到部里来搜集我们的材料，我们要逮起他们来。)

不要逮起，轰走吧。

我这个人接近群众最少。刘秉权，他们跟你们相处的好吗？(好)留下几个，欢迎他们啊！

我讲几句，一会要走。我赞成你们留下几个，好吧？刘秉权你们赞成吧？留下十个，算上广交会的三个，一共十个，联系情况。

我说几句吧，你们要走了，我和你们打交道八个月了吧？文化大革命搞了八个月，九个月了，胜利很大。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要夺权，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要夺权就必须大联合，真正的革命左派大联合。跟阶级敌人决战，跟反动派决战，必须大联合。我没有多讲的，现在新阶段文化革命并没有结束。这是毛主席领导的，我们不了解必要性，须要性，这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中央文革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掌握了这个大方向。这是一点意见。

第二点，你们在外贸部做了很多的工作，应该有很高的估价，成绩很大，林部长对你们是满意的，你们可以说，放了一把社会主义之火，把外贸部的运动搞起来了。你们是火车头，不是没有车皮，就是在一节车厢上有问题，你们工作成绩相当大，方向是对的。我很满意你们的工作了，所以你们现在响应中央的号召回去，我代表机关造反团欢送你们，不知你们是不是需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给你们亮相，不知他们要不要我参加。

错误吗，你们检查的很好。我自己也有很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了人，路线是和刘邓一样的。你们说我组织上和刘邓有联系，说我是“黑帮”。我就不干了。武文燕给打成“反党分子”，胡宗山是“三家村村长”，我要向你们道歉。既然允许我们犯这么大的错误，为什么不许你们犯错误呢？我看不公道吧，而且你们是年青人，我们是老头子。我们主观上是要跟毛主席的，但毛主席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跟还跟不上，跟不上就要犯错误，

犯错误指出来就改嘛。

你们火攻总理，我说是个政治事情，你们还糊里糊涂的。当然说你们是“反革命”，“反革命行为”我就不同意了，那有这么多反革命呢？这么多年青人都是反革命？我建议以后不要再提这事了。今天就有人犯了错误，商学院的大字报你们看了吗？说：“财贸系统八个部、三个院校造反派的大方向都是正确的”，我看不一定，财政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吗？商学院还不觉悟。(念商学院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我送给总理看了，这张大字报很怪。是“北京商学院红反军永不垮战斗队”，我就不相信。说“财贸系统夺权是和平过渡”，你们外贸系统夺权是“和平过渡”吗？我们商量过，文化大革命中搞出的部长十几个，这个成绩不小，是群众的热情搞出来的，收获还是大的。总理批评过商院、财政部。(接着念大字报中的一段，大意是说总理批评后造反派被压迫，有些造反派组织被解散。)煽动性语言啊！商业部把党组一律解散，没有一个，一律撤职。(继续念，“我们断言，各部造反派大方向始终是对的”。)这个断言不一定对，当然你们方向是对的。这张大字报，24号贴在财政部那个地方，这张大字报不对。同志们，不要揪这个大字报。如果他不贴大字报，我不跟你们讲，他既然贴到大街上，我才跟你们讲。你们贴了总理的大字报，我说不是反革命行为，你们是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的，就这么一点嘛。“修正主义党组”，“修正主义分子”不对，提的高了，我说了你们就改了嘛，很听话，所以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就那么一点。我们犯了路线性错误，你们犯了政治性错误。而且我们责任大。今天你们和党组谈话，我说要把造反派当做自己身上的一块肉，要爱护他，这个问题很大，什么叫革命接班人，他们要锻炼。戴了高帽子没什么了不起，如果刘邓路线统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只有跟着走，那就变修，不跟着走就杀头，那时你要戴高帽子还找不着脑袋哩。当然我不提倡戴高帽子。林总讲过，武斗不能触及灵魂。这是群众的热情，但是有的地方阶级敌人利用了群众的热情。要培养接班人，现在常开追悼会，老干部死了，要接班。你们成绩很大，成绩是主要的，自己做了检查，很好，我的心情很舒畅。我看留十个吧。将来广交会要去一部分吧？

现在要为干部说话了，各地确实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情况。要向干部讲话了，坏的总是一小撮，你这个部一小撮，他那个部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撮了。确实干部里有一些坏的，彭、罗、陆、杨，包括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代表者，只是一小撮，还有大量的好的。就是好的，也要经过考验，不然舒舒服服和平演变就滑下去了。说我这个人，同志们烧我一下子，我很欢迎。有很多事情我不懂，很少到群众中去，对这个学生的感情不理解，我也不是个学生。

社论要学，三期社论、四期社论，人民日报社论。我们党经过几次斗争，跟陈独秀的斗争，跟瞿秋白的斗争，跟王明、李立三的斗争。打过北洋军阀，跟蒋介石打了十年，又打过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朝鲜战争，还搞过十几年建设。因此，虽然有些干部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但是好的多。三、四期社论，既向同志们讲话，也向干部讲话，要分清敌我，不然要犯大错误。

因此要学三、四期社论，今天我还介绍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好，“我们鲁迅兵团何处置”，同志们要好好学习。回去后，我看中央的意思就是搞斗、批、改。要搞斗、批、改，先要大联合，这个联合的大旗你们没举好。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可能是人家不合作，主观上都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听不进不同意见，你们有没有呢？(有)，所以要责己严，责人宽，当时我说找×××，你们说自己做，你们拍了胸的，我看你们是不信任我，我现在要找你们算帐了。要学习毛主席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你们要团结反对过自己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要不是顽固坚持、屡教不改的，也要团结。要善于做自我批评，你们要掌握联合的大旗。

这是对你们讲，另外对干部讲。四期社论出了，可能有人要压你们，说你们“方向错了”，当时你们搞我搞的那么凶。压你们，我看那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三、十四期社论出了，四期社论出了，还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当然对于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就要专政，专政就是这样，这不是压制民主，把杜向光撤职就是压制民主？象商学院讲的这样，我看不能这样讲还有刘振玉处长。我看干部要保护你们，保护你们的热情，你们自己要保持自己的热情。象××这样的扭送公安部叫压制民主？(不是！他本来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今天你们反映了这个情况，有人压你们，因为财政部也反映了，说他们“压制民主”。顶多再把我打成“反革命”，武文燕，我看你还得打一次，压你一次还没把你压瘦。我们七、八月是很蠢的，一个小姑娘反工作队，就用几十人去围攻。所以你们是对的，我要告诉党组，开干部会支持你们，这就是亮相。不是要林海云造叶季壮的反，李强造林海云的反。

原来我想开个各造反派的座谈会，让你们骂娘，当然不一定骂我，互相骂起来。××这个人好凶啊，在总理面前就叫起来，啊！你们怎么怎么……，当然你们也不让步，现在很忙，可能开不了座谈会。我想找××一回，劝他们，我看这个联合你们搞还不行，一开会就吵起架来。你们可以找你们信任的，参加你们的会，你们什么时候开会告诉我，我派人去听一听。都要自我批评，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人家承认了错误，不能抓住不放，本来没有辫子，还要抓住。因此你们回去整风，他们也要整风吧？整时告诉我，外贸部去人，我们派人去。我听到有的学院把人斗争、关几天、打成托派、比工作队还厉害，我看这个领导不改变就垮台，回去搞斗、批、改，大联合也是个锻炼。

李金保你知道当时也有别人要贴总理大字报吗？没有贴，以为我不知道嘛，只不过你们干劲足，到天安门啦就贴上了，你们做了检查了，他们溜了，中央还准备让他们表态的。(“风雷”说自己是响当当的左派)做为一个组织讲，你们应该承认他是造反派，不一定是坚定的，你们就是很坚定的？我看不一定。他们不承认你们是左派，那就没有基础了，就不好谈了，我看要承认的，过去都是一起造了反，成立后方向指向你们，可以提出警告。你们要摆事实，开座谈会，不要开辩论会，叫“交心会”。反正这个复杂，联合的大旗你们要举起来。

广交会，你们监督，可以发通告，让各部支持你们。你们就搞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搞联络，不要去统治人家，统治人家就不服。

回去搞大联合，我看得两个月的过程，这两个月毛泽东思想会有个大提高，你们如果把外贸学院联合起来，我看毛泽东思想就毕业了，这里边活思想很多，当然要斗争中联合，一边斗争一边联合，我看要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以后干部就要多干了，你们留几个，留十个，广交会的。(我们学校过去的“八·一八”同学组织“孺子牛”，改造思想被人砸了)，让他成立嘛，他又不是敌人，有结社的自由，让他成立嘛。(我们说我们组织里团结过去“八·一八”的同志，只要他改过就行，他们说这是“开门主义”)他是关门主义，一口关、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好，今天谈得很多了，很好，就这样吧。

(接着财贸联委会和红反团的驻沪联络站同志向李先念副总理汇报了上海的情况，我们的同志处境很困难，李先念同志答应帮助解决。并答应与中央文革联系，请戚本禹协助我们办报)。

554. 陈伯达接见原三司部分代表的讲话 (1967年2月27日 政协礼堂)

谢谢你们，给我们上上课。谢谢你们，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过去我们到北京的各个学校去，都是说我们是当小学生的，是拜你们做先生的，是当群众的学生的，这是对待群众的基本态度。那个时候我们是这个态度，现在还是这个态度，我们永远是毛主席的小学生，永远是群众的小学生，小小的学生。

你们到外地去，戚本禹同志记得我也曾讲过，如果出去，要接近群众，当群众的小学生。你们现在是不是当指挥官了？当指挥官还是要当学生，才能当好指挥官。下去要学习，不断

地学习，把自己当成小小的勤务员，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单位，我们要永远保持这个态度。你们要好好读一读毛主席写的《关于农村调查序言和跋》这两篇文章，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也是每个革命学生应有的态度。你们到各地去，当然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这几个月来，我们看了很多材料，也可能不一定是准确的，我心里就不平安，你们是不是去当小学生的，还是一下子就当教员了？当钦差大臣了？我心里是不平安的。因为你们是从北京去的，我们是在北京工作的。我们是北京的工作人员，假如你们出去，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抱小学生的态度，我就感到我们会犯错误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可能是两种情况，刚下去有很多是正确的，但也包含有错误，应分两阶段，刚下去是起了积极作用，但呆得太久了变成了包袱，所有的联络站都是你们的包袱，现在你们好象舍不得联络站，回来还想回去，我想你们应该执行中央决议，统统都撤回来。在那很有意思，交了朋友，不管是一个两个，总是有几个吧，是会留恋的。我想你们还是回到北京。正确的东西少了，错误的东西多了，积极的因素过去了，现在正起消极作用，再呆下去没有什么好处，你们学校要军训训练，要把头脑冷静一下，现在大家的脑子热轰轰的，还想准备路费，想让我们帮你们解决，我们每个人的薪水都给你们也无法解决。已经回来的，就不要再回去了，还在那里的希望他回来，不一定坐飞机吧，坐火车也可以嘛！有些人是坐飞机回来的。一张飞机票够多少人坐火车。我这样讲你们可能要生气了，发脾气了，说我们不支持你们了。发脾气就让你们发一个时期吧！过后你们想想，我们的劝告还是好的。

现在有的地方，有冲军区的问题。去年冬天，你们冲国防部的我们当时说过你们，你们这种作法是错误的，这就应作为借鉴嘛。那时同学们很好，听了我们意见就撤了，承认冲国防部是错误的，我们很欣赏你们的这种态度。不过，过后你们就忘了，跑到别的地方又去冲，这是冲不得的，万万冲不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解放军保卫下进行的。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直接领导的。这个军队当中你们可能找到有问题的，但你们应看到大方向，不应只看到芝麻，没看到西瓜。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好军队，现在全世界也没有的好军队。这是因为，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这是经过了几十年的历史考验了的。现在的事实也同样证明，没有人民解放军保卫我们，我们不能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大道理，根本的理。你们到地方去，忘记了北京的教训，忘记了我们的解放军是神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能冲的，你们就冲了，(当然不是在座的所有同学)，这是很大的错误，你们如有意见，可以提。不能讲是不是你们觉得还是不对？我的话不对，有意见，可反映，象今天这样我们去研究，看看对不对，可能有的是对的，有许多是不对的，有的可以引起注意，这样不更好吗？你们这么一冲，犯了大错误，但我也不赞成挂牌，游行请罪，不必要，如果冲了，知道错了，就行了。不要让错误压得喘不过气来，知道错误，就了解了，以后不再犯了。

联络站问题，我说过，都要撤。留在那儿干什么？过去说过不能包办代替，工作组不能包办代替，后来有人说我们中央文革包办代替，我们中央文革没有这个意思，中央也没给我们这个指示，也没有让我们这样做。今天说的这些话，与你们商量，经过你们同意。有的人还舍不得那里，还想回去，还要我们给你们车费。你们要坐下来学习学习文件，这成绩缺点你们要总结，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总结你们的经验，要坐下来，脑子冷静一下，才能思考问题，你们现在脑子热烘烘的怎么能作好总结呢？脑子冷下来，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联系你们的成绩、缺点、错误来总结，这对将来你们的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工作有好处。昨天报上登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等两篇文章，你们要好好学一学，昨天各报都登了。现在有些重要文章也没时间看了，总想到各处去冲，去夺权，也不知道对不对，这样做对你们是很危险的！你们这些联络站，什么三司问题，还纠缠这些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打旗号？三司是你们制造出来的，但现在已成了你们的包袱了，你们要解放自己，把三司丢掉对你们是个大解放，留着三司的名字产生很多苦恼，丢

掉了变成快乐了，又要保持名字，对外联络站又要不撤，因此对红代会有意见。有意见是可以的，但应承认北京红代会是个进步，是一步步进步的。不会一下子跳上去的，你们要把红代会看得很理想，主观上是好的，客观上不一定象你们想的那样，要一步一步地前进。北京的红代会是一步步地前进的。有缺点有毛病可以不断改进嘛！是不是你们一方面说拥护红代会，另一方面又说三司合并了，牌子没有了。应有无产阶级的气概，丢掉它。这样才能大联合，才可能同人合作，别人也才能同你合作。有人说：“一二司打击我们。”打击有好处。现在不要骂什么油炸、火烧……还有什么百丑图、群丑图，这都被香港……被坏人利用了，值得我们警惕，问题是我们做法被敌人利用，就值得警惕。

555. 江青在广播事业局的讲话 (1967年2月27日)

(陈伯达、戚本禹、王力、关锋同志也在座)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很好。(众：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的文化大革命，干得好！做得对！我是向你们取经来了。刚才，又在另外一个房间听了一个不同意见，知道这里闹得热火朝天的，反的也听了，正的也听了，现在我就感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越斗越深刻了。还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身体很好！(众：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好，同志们，由于我们晚上还有一个活动，不可能对你们的意见一一听完，刚才我初步了解了一些情况，就是好的做法，我们也知道了，过去我们曾派了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姚文元同志来过，以后又派王力同志来过，我们还是关心你们的，刚才伯达是在别的地方，可是我一打电话请，就请来了。我今天就是来取经，取在一个火头上，哈哈，我看你们这个火头现在有点要消了，我只想说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的对待内部矛盾的问题。(众：对！鼓掌)刚才我听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听来听去，还是属于你们的内部的矛盾(众：对！)不是敌我矛盾，(众：对！)可是，那个做法上，你们采取的有的过头了，(众：对！)这样，当然就不利于团结了，另外，本来是好心好意提意见，但方法不妥当，那么，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众：对！)因此我建议啊，同志们采取个别谈话或者少数人座谈，把思想打通，然后摆到大会上谈，那就开一个团结大会，(众：对！)现在据我了解，你们这天开了两个不大有利于团结的大会，(众：对！)就是因为准备得不好，方法也用得不好，所以我建议你们读几篇文章，真正好好掌握毛泽东思想，(众：对！)《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还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四篇东西，现在你们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就能解决你们的问题，(鼓掌)那是宝库哇，我最近又重新翻了几篇文章，我觉得对我完全是新鲜的，难道对你们不是新鲜的吗？(众：对！)你们现在单单读语录不行，你们的程度也是应该能够系统的读一些毛主席的著作，(鼓掌)到毛主席的著作里这一座大宝库里取得武器，来解决我们内部的一些思想问题，一些作风问题，一些不好的工作方法问题，否则就会自己制造混乱了，比如你们昨天开了一个什么会，丁莱夫之流就钻了我们的空子，是哇，你们还不知道，对不对？(众：对！鼓掌)而今天你们开会，又不许别人发言，人家上来说我想个不同意见，你们就轰人家，这也不对吧，(鼓掌)那你们要说了，啊，江青同志你怎么来了就批评我们了？(鼓掌)刚才那个女同志，啊，我忘了她的名字了(众：李娟)对！李娟，进去的时候哭着，流着眼泪，讲着讲就笑了，平静下来了，我相信她是个好同志，啊，对不对？(众：对！)她很勇敢提出了不同意见，可是你们轰她，这就不对。(鼓掌)你们把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坚决的忠实的执行者，丁莱夫之流丢到一边不斗，专门自己斗自己，这个对不对呐？(众：不对！)为什么让丁莱夫趟在那里睡大觉？我都对他有气，(鼓掌)你们觉得已经斗臭他斗垮了呢？应该出题目，天天叫他交代，他对些资产阶级当权派什么关系啊？叫他交代，这是敌人，他不是我们的人，(鼓掌)这是你们的斗争目标，你们并没有搞深搞透，也没有斗倒斗臭斗垮，现在呐，结果把你们自己的矛盾，

那当然，不怕，我们不怕把自己的矛盾摆出来，但是怎么摆，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然后统一起来，联合行动，向敌人开火，因此我建议同志们读这几篇著作，就是说，读《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几篇文章，多了也不行，先读这几篇文章，同时，个别谈心，大中小会结合，打通思想，我呐，就讲讲自己的缺点，看重讲我的缺点，我着重讲你的优点，你呐，就着重讲的你缺点，而多讲我的优点，这样一来，不就容易团结了吗？（鼓掌）当然我讲的不是和稀泥，在大是大非、大的原则问题上，那是不能够这样的，那是只有斗争，当然，那种斗争也要讲策略，原则问题是不能出卖的，不能降低的，内部问题，属于思想方法问题，思想意识问题，工作方法问题，态度问题，都可以用我们党一贯的最锐利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鼓掌）对自己人要和，对敌人要狠。（众：对！鼓掌）现在我觉得你们把敌人丢到一边，让他睡大觉休养，就不大狠，而对自己人只看到缺点，就不大和，因此就影响你们的团结，对不对？（众：对！）我看要狠，对敌人。对自己人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自我批评，批评别人也要讲大道理，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这样我们自己的队伍才不分裂，才对斗争有利，否则对斗争不利，还会给敌人笑话咱们，还可以钻空子，反过来夺你们的权啊，提高警惕啊！（众：对！鼓掌）丁莱夫他们以及他们的后台是不会睡大觉的，同志们！这一点要有足够的认识。（众：鼓掌）

现在你们开门整风，这是很好的，但是要研究方法，啊，读毛主席这几篇著名的著作，带着问题，活学活用。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我听说今天你们封了自己红卫兵的门，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不妥当的。但是对去封门的人，如果再用那个方法来对他，我看这也不好，就是叫他好好自我批评，给他提意见，他现在还属于内部矛盾，他的方法不对头，去封门，砸了热水瓶，啊，这个不妥当，可是你们对他也砸他的热水瓶，封他们的门，那就造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不能干那样事情，对不对？（众：对！）我今天呐，也没有更多的意见了，以后呐，再来倾听同志的意见。

本来，我今天是想来看看你们怎么斗丁莱夫的，而你们说你们自己解决了，我现在看你们自己还没解决好，让他睡大觉，做休养员，而你们自己倒斗啊，斗啊，倒要斗得分裂了，我看这不妥当，要改变这个做法。

人要自我改造，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如果没有每个人的自我改造，那末这是很危险的。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光明面与阴暗面，也就是说个人与集体如何摆，没有个人也就没有集体，但是如果把个人放在集体之上啊，那你就错了，那势必要出现问题的。现在呐，就是有些人不善于分清自己头脑里这个阴暗面（我说的阴暗面一般指个人主义），不善于对自己这个阴暗面斗争，又怕别人触及他这个个人主义。（众：对！）而把自己的光明面、优点呐，又夸张，说得不得了，那么就不能正确对自己，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对别人，这就不利于团结，不能前进。就会停顿了！所以你们自己的整风应该着重于每一个人思想的自我改造，以善意的态度帮助自己的同志来改造，这样我们的队伍就更坚强，更有韧性，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运动搞深搞透，把敌人斗倒，斗臭，斗垮。我想请伯达同志给同志们讲几句。好不好？（众：好！热烈鼓掌）

陈伯达：

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同志们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主持会议的同志说：同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一起来的还有关锋同志、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

江青同志说：同志们！我们马上就有事情，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几位今天就不给同志们讲了，我们就告别了。

556. 陈伯达谈唐平铸问题

(1967年2月27日晚)

二月二十七日晚，陈伯达、王力、关锋三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给人民日报临时监督小组三条指示：

1. 已查明唐平铸同志对于《解放军报》一月中旬发生的问题没有责任。
2. 唐平铸同志的缺点和错误，根据已揭发的材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的问题，不能采取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
3. 唐平铸同志现在可以在《人民日报》参加编辑工作。

557. 谢富治、傅崇碧接见首都职工革命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7年2月28日 人民大会堂)

傅崇碧同志：同志们，现在我们搞大联合要按十六条办事，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中央军委八条也适用于地方。过去学生打，现在大联合了，不打了。现在是我们工人打架，每天最少七、八起，少的几百人、多的几千人、最大的有几万人。通县打仗二万多人互相打。这样打仗不好，对我们不利，妨碍团结，对大联合不利。你打我，我打你，我们工人之间互相打架，这样搞怎么成呢？怎么搞大联合呢？你们工人打仗哪些人高兴呢？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阶级敌人高兴，他们坐山观虎斗，他们是希望你们彼此之间打架的。

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四大工人组织，工人里面也有不纯分子。工人组织大的有几十万人，也有几十个人搞一个兵团，几个人搞一个兵团，一个人搞一个支队，手下没兵，光杆司令，二、三个人也搞一个组织。

最近北京工人组织中武斗相当严重，不仅打伤了人，而且损坏了国家财产，有好多电话、屋子、广播器材被砸坏。中央号召我们节约闹革命，我们开了汽车打架，浪费汽油。有的打仗阻碍了交通，影响很不好。这样怎么去搞团结，怎么去搞大联合？中央文革谢副总理都是很关心这些问题的，要把破坏国家财产这股风打下去。我们之间有分歧，可以展开辩论。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这样最能解决问题，打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我们工人是革命的主力军，不要打内战，应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摆事实讲道理。不能你骂我，我骂你，互相打。有些人，有些单位，说那个人支持他，实际上那个也没支持他。今后不管哪方面打架，不管你有理无理都是不对的。打架就是无理，哪一方面打架都是错误的。有的打架是由坏人挑动的。老是打架，公安局、卫戍区一去就说是抹稀泥，连调解人也受围攻。这很不好，要停下来，公家的东西，车子如果用去打内战就不许调。我们要把精力集中起来对付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付一小撮坏人，以后凡是调车去打内战的，都不给调，不给签字。有人把公安局、卫戍区的车子开跑了。车子查出来，人还没查出来。运输公司不能把国家的汽油拿来乱用。

几个总部队伍搞得太大了，兵多了，指挥不了，组织不严密，内部不纯。我们以前搞革命时，开始也是很乱，队伍庞大、很杂，指挥不灵。以后进行了整顿，变得严密才好指挥了。现在各工人组织应该停止发展，有的组织拼命发展，这个不要，那个又发展了。首都正搞大联合，北京公安局军管会希望革命组织大力协助，对敌人要实行坚决的镇压，对内部不应打架。今天跟同志们打个招呼。以后打人打的凶的我们就要干涉了。公安局军管会要干涉这些事情。有些工厂是保密工厂，是机密单位，你们外部去夺什么权？夺权靠他们自己。里面有

机密机床，机密图纸，外单位去夺权就没有坏人吗？

谢富治同志：所有革命组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个权非夺不可。夺权我们没有经验，可以创造。现在党中央毛主席开会总结了前段夺权的经验。第一点，夺权要实行三结合，不三结合，是夺不好的，不三结合，夺了权也巩固不了。第二点，夺权要搞大联合，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个部门都要实行大联合。不大联合，你夺过去，我夺过来，成了抢权了。第三点，夺权必须是革命造反派，真正左派夺权，不能是保皇派夺权，不能搞假夺权。第四点，夺权必须依靠本单位、本企业、本部门，由本单位、本部门左派自己夺权。必要时外部与其有直接关系的单位可以配合，加以协助。现在工人跑到生产队去夺权，有的还到军队去夺权，这怎么行呢？这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石景山跑到王府井去夺权，百货大楼跑到石景山去夺权就不行了。这是毫无关系的。工人只能在工厂，不能离开工厂到别的地方去，否则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离开这四条去夺权就不行了。符合这四条，就能成功，不符合这四条就无效。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夺权统统无效。

傅崇碧同志：工人组织中有打人的，搞喷气式的，私设公堂的，现在农村也有捆绑工人审讯的。昌平搞得很厉害，我们要作调查，这样作不成。这是违法的，宪法有规定嘛！人身安全要有保证。被打的人又调人来打，你打了我的人，我打了你的人，告到公安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军管也很不好办。工厂打了架，抓了人要公安局一定收，不收你们也要造反，说专政工具不实行专政。收了，另一派又来造反，又说压制群众，很不好办。抓人不乱抓，有坏人向军管会报告，经过调查研究，证据确实，很反动，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再抓。

你们贴了很多大字报，支持军管会，拥护公安局和公安部的决定，千革命组织都协助作了很多工作，感谢同志们。平谷县罗乃宽总站的人到哪里去夺党、政、财权，什么权都一起夺，贫下中农很有意见，起来反对。

谢富治同志：北京大企业大工厂还没有联合好，不要到区县去设联络站，不要去搞了。你们工人组织只管工人，不要去发展农民，机关的人不要管学校、医院。你们就管工人行不行？（众答：行）造反派还是不要跨出行业，不容易了解情况，容易被敌人钻空子。组织容易涣散。这个问题你们讨论一下。

傅崇碧同志：谢副总理的意见很好，你们工人以后不要去通县、平谷搞联络站了，你支持这派，他支持那派，互相斗起来，农民不搞生产了，你们还吃不吃饭？不吃饭是不行的，饿肚子是不行的。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一搞就发生冲突，贫下中农很多来控告这个问题，意见很大。

谢富治同志：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发展起来的，是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领导下的世界上最好的军队。是革命化、战斗化、毛泽东思想挂帅的一支军队，是拥护爱护这支军队，还是反对这支军队，这是区别革命左派的重要标准。特别是毛主席亲自颁布八条指示以后，还公开冲击军队，这个“左派”就要打问号了。这是个原则问题。主席号召学习解放军，有人还去冲解放军。过去不了解，冲击军队过去没有规定或受了蒙蔽那就算了。特别是公布八条以后，现在还那么闹，那就是对解放军持什么态度，对毛主席颁布的八条持什么态度的大问题了。这是个考验，这是个原则问题，是立场问题。反对解放军，冲解放军能够是左派吗？至于解放军个别人有缺点有错误可以提意见，可以批评，可以向中央文革反映，但不能去冲，去公开反击解放军。现在能实行大民主，就是有解放军保护，你还去反击解放军，是什么左派呢？公开贴大标语，印传单，上报攻击解放军，这是什么左派呢？特别是军委八条公布以后，还公开冲击解放军，是原则问题。昨天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康老对三司同志讲的很严肃。

傅崇碧同志：解放军坚决站在左派一边，对敌人实行专政，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对解放军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是欢迎的。现在有些全国性组织要取缔。在全国性

组织很多，在市委大楼有几十个，在市总工会也有几十个。我们工人同志应协助大力宣传取缔这些组织。这些组织到处搞电话，抢占公房，抢汽车，搞油印机，要经费。有的专门夜里活动，这样对北京社会治安很不利。有的组织一天要换几次袖章，有的到处乱搞马路新闻。我们仍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好好学习社论、报纸、政策等，不要对马路新闻很感兴趣。要分析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多文件、社论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应当好好学习(下面工人发言提问题，第二通用机械厂谈到该厂××组织到处乱砸，损坏很多公物，抢走秘密图纸等情况。)

谢富治同志：你如果说的这些是真话，那么有些破坏文化大革命行为，这是不是造反派？(众：不是)对于破坏我们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行动，我们坚决反对，不管什么人，他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败坏造反派的名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反对，要抵制。(通县九分站代表说到后字 249 炮校支持保皇派问题时)谢富治同志说：不对，不要把解放军和军事院校军工厂混为一谈，所有的军事院校和军事工厂不能代表解放军，我们所指的解放军只指正规的有组织的部队，我们才说的不能反对解放军，是不包括他们的。

(地质部北京探矿厂代表谈四期社论发表后，干部站出来支持保皇派组织，这样的能不能三结合？)谢富治同志：干部站在保皇派一边，反对造反派，肯定不能三结合。但在现在有的是互相说是保皇派，你说我是保皇派，我说你是保皇派，谁符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谁就是造反派。一切站在革命利益一边，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就是造反派。在工厂原来的造反派，现在也会走向反面。有的和保字号结合了，有的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有的甚至和敌人结合了。有的和地、富、反、坏、右相联系，不要以为自己总是左派，会走向反面的。原来大多数部分造反派现在成了多数派，脱离群众，乱来也会变化。一个工厂三、四派都说对方是错误的，要看广大群众对你承认不承认，这里就有个新问题，看这派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是以革命利益为重，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是不是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天天是今天砸这一家，昨天砸那一家，这也是革命派吗？在组织中混进地、富、反、坏、右，有和地、富、反、坏、右联系的人，又不抓革命，促生产，那是什么造反派呢？真正的造反派造反要造得有理，有理就有了真理，毛泽东思想，就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有了道理，是革命的就有了群众，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就用不着打架了，造反派另一个标准是看你是抓革命促生产。不抓生产，尽破坏，到处砸，就不能算革命左派。

(工人代表：现在一发生问题就互相调人，这样一来人不好指挥，就易发生武斗。)

谢富治同志：分站、分部有个任务专门调人，不要调人打架，造反有理嘛！有理就不用打架，有理何必打架呢？打架是没有理的表现。

(工人代表：一调就几千人、几万人，两个方面就打起来了。)

谢富治同志：汽车公司以后发生武斗不许调人。(首都汽车公司代表：汽车公司的权掌在保皇派手里，哪里发生武斗，他就调车。)谢：汽车公司要实行军事管制，一律不许调车。(工人代表谈到档案问题和捍卫团变种时)谢：抢档案是错误的，不管你是什么派，砸东西、抢档案都是不行的。……参加捍卫团的也允许他革命，但是参加捍卫团的必须改变观点，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干革命的事，不许打架，打架是错误的……四十多个单位的委员会，组织一个十至十五人的调查团，去调查，做公开的调查。如果这个组织是保皇组织，又砸档案室、生产办公室，就取消它。)

(工人代表提到联络站时)

谢富治同志：所有联络站、总部也好，分部也好，最好都老老实实回到工厂去，如果脱离工厂，脱离劳动时间长了，就不行了。联络站可以设在工厂里嘛！不能脱离生产。

(工人代表反映：有的地方夺权后，把权交给地、富、反、坏、右手中。)

谢富治同志：把政权交给了地、富、反、坏、右，就犯了方向性错误。

(工人代表：围攻军代表，围攻解放军，左派组织应不应干涉？)

谢富治同志：围攻军代表，围攻解放军，左派要出来反对。军代表，解放军有错误，可

以向上级和全军文革反映告状，不能围攻。

北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和中央文革、周总理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我们现在的斗争，处在决战阶段，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阶段，是首都的革命关键时刻。我们工人阶级要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工人阶级在北京是主力军，拥有一百万以上的工人。这个时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节节败退，但还未把他们彻底摧毁。要特别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完全摧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整个阵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从各个方面进行反扑，我们首都革命造反派一定要提高警惕性，我们要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首先把夺权这仗打好，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不是别的。当前革命的大联合，最大的阻碍，一方面来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来自保守势力的破坏；另一方面来自革命派内部私心杂念，就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所谈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等等，就是个人主义，归根结底是个“私”字。同志们，有的造反派成了当权派，有的占了优势，成了多数派。现在个别人就是不懂得，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实质是革修正主义的命，革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的命，革修正主义复辟的命。现在少数左派学习了修正主义这一套，脱离了主席思想，脱离了群众，搞修正主义的东西，那就会走向反面，这是很危险的，群众会起来揭发，你们要提高警惕。为什么联合不起来？主要是毛泽东思想掌握的还不够，没有很好学习主席思想，破私立公。要静下来好好学毛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文件，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大家一切为了公，在大联合、大夺权中，反对私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破私立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中央文革的指示办事，一切为革命的利益办事，不是为小团体，不是为个人。这条是非常重要的。一切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不是一切为革命利益而是为小团体主义，甚至为了个人利益，那事物肯定要走向反面。为什么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就是因为他们不按毛主席思想办事，不按人民的利益办事，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就是因为他们搞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如果我们现在还未革命成功，就也搞起来，那群众就一定要起来革你们的命的。这点可重要，如果不去掉私字，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革命就不会前进。

看来，同志们都反对打架。打架就不对，打架是形“左”实右的。也许你们说我上的纲太高。有理为什么打架呢？大家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大联合的红旗，讲联合、讲团结，反对分裂。有的地方提出了几大，革命派里要大乱特乱、大分化、在动荡、大改组，中央文革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革命派内部不能乱，内部要团结，我们自己也要联合，要团结，要乱敌人。北京一月份生产下降 20%，要抓革命促生产，工厂里工人不回来生产，还叫什么革命派？不上班，跑到外面去打架，光搞“革命”，生产搞的很坏，那你搞什么革命？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关心生产的，那种又不关心生产，又主张武斗，到处乱砸，反对解放军的“造反派”，那是打个问号。

当然，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生产来压革命是错误的，但也不能光革命不抓生产，不然，也是错误的。现在农业情况是很严重的，工业生产一月份也是严重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关心生产，不能破坏生产，刚才同志们提出了整顿组织，我同意。组织发展要停止，要清理，应尽量按系统联合，不要跨系统搞，不能搞许多组织。现在取缔了全国性组织，有人不听中央的话，听说在变相的搞。组织太多、太杂，就会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保守势力，甚至会被地、富、反、坏、右利用。如果一个组织包罗万象，那就不能控制，容易让反革命利用，我们革命派要提高警惕。北京市总有几千几百个组织，有的组织也混进坏人，革命派要提高警惕。

今天召集同志们来，就是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

主义当权派做斗争，向地、富、反、坏、右做斗争，向保守势做工作，作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实行大联合、大团结，要抓革命促生产，停止武斗。互相打，方向就错了。我们要把矛头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准地、富、反、坏、右，不能把矛头对准群众，矛头对准群众那方向就错了。群众之间可以辩论，讲道理，但不能搞武斗，不要互相攻击。

街上传单的东西不要搞互相攻击，不要搞喷气式，不搞群丑图或画漫画。这些东西，我们毛主席从来是反对的，不提倡的，中央文革向来反对的，不提倡的。现在谣言很多，谣言也上报了，香港外国报纸对这些就大登特登。不要供给敌人这些材料，有些谣言还引起了外交的纠纷(例如：朝鲜政变问题等)不能搞这些东西，这样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荣誉，帮助了修正主义。

现在首长讲话到处贴，各取所需，这种风气不能提倡。我们的讲话，有人再贴出来，我们就取消他的开会权。

558. 谢富治指示 (1967年2月底3月初)

(一)谢副总理说有的小报办得生动活泼，但有的小报刊登了许多谣言。有的造谣特别离奇。有的画了一些百丑图在外面张贴，外国人照相，影响不好，以后希望注意！

(二)中央首长讲话不要贴大字报，也不要写传单，一律不准出去传。一旦查出，取消开会权利。

559. 周恩来接见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和西安交大同学时的讲话 (1967年3月1日)

一、关于造反派内部分歧问题。要抓整风、整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

二、“打”、“砸”、“抢”的问题。西安提出“打”、“砸”、“抢”是反动的。全国各校又提出“抓”“揪”“抄”，你们眼里有没有党中央、毛主席？(总理谈到此时很气愤，并一个个提名指出，问：“怎么办？”大家回答：“应受法律制裁”。)

三、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总理传达了二月十七日，毛主席对“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同意。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

“大联合夺权”。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原文如此)，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如×××司令员既是军区的政委，又是一省的常委)他当然要保省委了，这就不能说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

四、有关“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今后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有人说：“我们厂休日游行，不影响生产”。我就不相信不影响生产。对待是否“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和爱护国家财产这是真革命、假革命的标志。

五、对待解放军问题。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只要大方向正确，解放军坚决支持，如果只剩下一个人，也坚决支持。如果大方向不正确，那怕有十万、八万人，也是不支持的，要反对他们的。是否尊重解放军这也是真假革命的标志。

六、对待领导干部问题。对待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赎罪的机会，要充分创造条件，给他们检查、揭发，让群众鉴定，是亮相的还是罢官的。斗争的矛头绝不能针对犯了错误的造反派。

七、其它：

1. 今后不提地区性口号，总的大方向口号只有中央提出，要强调地区性口号是错误的。
2. 毛主席在一九二〇年《湘江评论》上提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这句话是对当时形势提的。今后我们不要再提了。
3. “捍卫军”、“红卫军”(指复退、残废军人组织)都要取消。
4. “大联合”要一个系统联合，先是一个系统联合，然后再工、农、兵联合，因此在联合中不要跨行、跨业，已经跨了要纠正。

560. 周恩来接见工交各部造反派的讲话 (1967年3月1日 国务院会议室)

接见时在座的还有富春、先念、秋里、谷牧等同志。

参加单位：铁道、煤炭、石油、水电、一机、化工、冶金七个部。

总理：看过名单，发现了错误，就是没叫各部负责人来，补充了通知各部负责人来，不然不好讨论工作。(约10分钟后各部部长均到会)自前次接见后已有一个月了，现在说话好说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二月份是文件发得最多的一个月。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以及《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社论很重要，业务监督怎么搞，你们更清楚了。今天可以心平气和的谈了吧！(总理看了名单)今天倒过来谈，铁道部一直未搞好，我要检讨，由铁道部先谈。情况怎样，你们谈一谈。

铁道部同志汇报：在总理亲自主持下，成立了十四人的业务监督小组，各业务局的工作归了口，由于全体职工的努力，运输装车情况大有好转，其中根据总理指示，派了七十多名同学下去帮助工作，起了好作用。

总理：现在他们要回校，怎么办？

铁：可以撤回。

总理：对吕正操改变监督办法没有，是否还是半天打扫厕所，半天检查。

铁：六个部长分了工，准备明天晚上开个工作会解决一些问题。

总理：司局长、处科长多少人恢复了工作？

铁：靠边站的多。

总理：过去开斗争会多，不是检讨会，让他们准备好，正式检查一次，再议议。不行再检查。

总理：有眼不识泰山，铁道部盖了一大片办公楼，我最近去才知道。是哪一年长出来的。可能是盖北京站剩下的材料盖的大楼吧！

铁：59年盖起来的，是建北京站的副产品。

总理：我去钓鱼台、京西宾馆等地点，路过铁道时就想起吕正操、万里，我和他们说过要建过路栈桥，他们就是不搞。当年北洋军阀在永外搞了一个栈桥，这个当然和我们建设性质不一样啰，铁道部花这么多钱，就是不搞这个。

总理：铁道部机关大联合怎么搞的？

铁：部党委已经瘫痪，司局长以上干部说了话不大算数了。

总理：是不负责任还是说了不算数。

铁：下边不大听话。

总理：干部要排个队吗，总要有罢，有提，慢慢来嘛。

铁：找武竟天的人很多，要排号，外单位和同学找他的人很多。

总理：武竟天被捕的事，让他写出来，谁来看谁看！不要把他关在小房子里。

铁：谈到组织发展情况。

总理：要学习《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经验。成立组织按科室系统，明天(已是今天了)介绍贵阳纺织厂按车间、小组来组织建立战斗队组织，按车间划分战斗队组，

这样不会搞乱，有利于生产，这样开会不影响生产。

铁：“东方红”发展到党校了。

总理：那风马牛不相及，不要跨行业，不要搞封建行会，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建议你们做工作。

“东方红”：正在撤，联络站全撤，一个不留，向总理请罪。

总理：请罪干什么，实事求是，有什么错误，改什么错误。动员联络站的都回去，外地在京的回去，北京在外的回来，整风以后再研究，特许派联络站问题，现在一起都回来，不然在外多少日不回来，自己也弄不清，铁道部大楼还很乱。

(唐山和北京铁道学院学生在会上争论)

总理：两个学院争论以后再谈。

现在不许乱揪人，揪了我就要回来，业务工作已经耽误了，前段放手让你们闹革命，给你们一些权力，不能超过了。

铁：现在指挥系统不灵的有成都、西安、昆明局，找不到局长，我们准备派人下去做工作。

总理：乱的话，急需的先军管一下，革命造反派起来了，三结合搞好了，再取消军管。

铁：乘务员要补充七千人。

总理：出勤率怎样？

铁：低。

总理：是否发个命令，叫外出的回原单位。

(总理对先念同志说：下个命令，外出的一律回原单位)

铁：恢复部党委问题，很有困难，建议派 5—7 名解放军干部和原党委中好一些的组成临时党委，下设二个小组，一个搞文化革命，一个搞业务。

总理：你们革命造反派没有联合起来。

铁：观点不一致。

总理：在革命的大原则下还有什么观点不一致！内部观点不一致就是成见太深，发了这么多文件，还不能把你们的观点接近，大方向一致，求同存异吗，求大同存小异。

先念插话：我知道，把一些小事扩大了，象地球这么大。

总理：给你们文化大革命领导权，你们掌不起来，你们不敢接，怪事！外单位包办代替太久了。学校进来煽风点火起了很大作用，机关业务忙，你们学校外力大，所以铁道部革命造反派起来的慢。现在要培养起来。是否你们外单位包办代替太久了，有的娃娃抱的太久了就不会走，有的不抱两年就会走了。你们包办太久了，太大了，又以你们为主，这样就象大树一样，树下的草就长不起来了。

铁：最近有砸保险柜泄密问题。

总理：砸的风现在还不刹住！这风一定要停止。这是为了保卫国家机密，这是最高利益，回去要打个招呼。砸、抢、抄、揪、打应该停止，有什么事情通过正常途径查清，不应该在 1967 年文化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新阶段再发生，这样作太幼稚了。什么砸烂狗头的口号，就比较低，应该把斗争水平提高，现在基本上是提高了。

铁：军代表未派来以前，建议保留业务监督小组，有人反映监督小组负责人不民主，提出在监督小组内成立三人核心组。

总理：两个意见，业务监督小组，部内革命造反派成长起来后，扩大部分监督小组成员，外单位成员减少。14 人业务监督小组有成绩，可以留一下。需要夺权单位，以本单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主，必须时可以外单位参加。核心组也是一个办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发动群众，要发扬民主。过去部里领导人搞一言堂，一长制，新的负责人，新的民主作风不够不行。当然集中也是要的，现在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能成立核心组，我们也赞成。铁道部军管问题，主要由谷牧同志负责，必要时我也过问一下。铁道部三结合未形成，部机

关造反派生长很慢，情况还是好的。主要是毛主席的威望，毛泽东思想的威力，职工群众的支持和关心生产，成绩是主要的。二个主要部长瘫痪了，一月份的情况已扭转了。

总理：再谈煤炭部。煤炭部的事，我过问太少。矿院把张霖之揪去 40 多天，那样搞法我很难过。张霖之如果确是自杀，那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总理问矿院在座的两名同学：为什么四十多天没有让张霖之回家，应让他回家，回国务院嘛！这等于拘留，今天看见钟子云，但看不到张霖之，不管煤炭部如何黑暗，这件事我是失职，我很难过。张霖之已经化了灰，为什么要留四十多天，死啦连一个报告也没有给我们。

矿院一同学：我留在煤炭部，对矿院揪张霖之情况不知道，回去让总部写报告给总理。

矿院另一同学：张霖之只斗过一次，陪斗过一次。2月 22 日晚，一夜上厕所五次，最后一次在厕所上吊了。

总理：这种风气不能再提倡。这等于拘留，失掉人身自由 40 多天嘛。想一想，不仅对一个负责干部，就是对一个同学也不能这样嘛。我们党员、革命公民不要养成这种风气，这种拘留方式是违法的。他是中央委员嘛！开党代表大会，首先要质问我，对中央委员这样，我是失职嘛！

煤炭部同志：一月十六日十六个组织夺权，一月二十一日又发生第二次夺权，部机关井冈山只有四、五十人参加。成立临时掌权委员会。张霖之死部机关不知道，一月份到二月初煤炭产量逐渐下降。总理要我们召开电话会议，由于用什么名义召开电话会议，争论不休，争论两周还未召开。

总理：煤炭部机关来了几个人。

煤：来了三个人。

总理点了名后说：为什么电话会议两个星期开不成，你是科长，你懂生产，为什么不主持召开，刚才怎么没有说，不敢说？

煤：解释争论的问题。

总理：扼要说，我今天解决生产问题，你们能进行业务监督吗？有没有长字号的，三结合条件有没有？

煤：昨晚在部机关礼堂开大会，部机关保字号的联合矿院把我们会砸了。

总理：矿院同学要撤回去了。

矿院：当时他们运动起不来。

总理：运动起不来，把几个部长垄断起来，就能起来了吗？

先念同志：你们学校把几个部长扣这么长时间，你们权力真不小啦！

总理：当然是说的这件事情，你们的造反精神还是好的。

矿院：张霖之在矿院只斗了两次，……

总理：这个不多说了，我提个意见，矿院都回去整风，就这个建议我总是先商量的。你们最后不同意，我要下命令的。

煤：钟子云回来，我们要他抓生产。矿院写大字报，说我们反对毛主席，要砸烂我们的狗头。

总理：回来当然抓生产啰，现在就商量这一个问题。部里的同志回去开一次会，给部长、司局长二级议一下，可以三结合的提个名单，我们看一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提议矿院都回去整风，煤科院这不是学校，再研究一下，外地的当然要回去。第三点，部内二十三个组织 580 人，十六个外单位参加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也不过十六个人，主要是你们，部内正常秩序可以恢复嘛。部级、司局级可恢复工作，国务院要你们保证他们不被揪，不许再揪人，任何机关、学校任何人要揪，你们打电话给我，我派联络员去。

矿院：我们执行总理指示，……

总理：提醒你，你们矿院“东方红”在部里停留那么长时间，最后与多数对立变成少数，只有二个组织一百多人支持你们。任何一个部门革命造反派总是发展的，你们变成少数总有

点原因，值得整风时想一想。

总理：第三个谈石油部

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一月十六日夺权。原部党委一周一次研究生产已经一个月了。三个部长一直管生产，生产上升，保证部长有八小时工作，有各司局革命造反派的努力……

石油部同志：部机关革命造反组织刚成立，大庆公社给我们的支持……

总理：过去你们那种斗法，问过没有完，没有给人检查的机会，使人无法亮相，要改变这种方式。××部对部长斗一顿，甚至还打。春桥同志来说，上海也这样，一方面是领导问题，另外也要做群众工作。检讨首先要检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段。有沾边的，有没有沾边的；有执行多的，有执行少的，说人人沾边也不科学，你们情况已经比较清楚，应允许给一个机会，让他们站出来作检查，也不过就是两个月，当然也有以后继续搞的，不是人人都过关，所以长字号的不应都靠边站，对于干部要有阶级分析，要区别对待，要一分为二，应容许他们改正，准备一段，写好后检查一下，一次不行，再检查一次。去年八月薄、陶传达……，可能传达成为人人过关，长字号的靠边站，这都缺乏阶级分析。不能说部长、司局长都犯一样错误。在中央刘、邓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订者，要负主要责任，要区别对待，各部、各司局也有多有少，不是每个部都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铁道部的吕正操比较肯定，但也没有最后定性，不是人人都要出来亮相。

个别人有历史问题，如薄一波、梁庸庸有历史问题，要作专门问题追下去。张霖之与彭真关系密切，确实有严重的心脏病，从外地休养回来，一下火车就被揪走了，使我们都未见过他。他确实和彭真接触多，共过事，但不一定是黑帮，要调查嘛。有的部有黑帮，有的部就没有，调查工作学校的闯劲大，机关要学习。先说一下，今天说了矿院，不要回去灰溜溜的。院校的冲劲很好，对各部的革命造反精神有帮助。今天说了矿院，矿院就要离开煤炭部回去整风，煤炭部应感谢他们，欢送他们，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薄一波等人的集体自首这件事，要不是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调查一大堆历史材料，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们写了个启事，但是启事的内容没有看过，现在看到他们的启事，确实是反共的启事。小将们建立了功勋，调查应肯定，但是不要造成把个人弄清过关，不要没有重点，干部情况这次不能都搞得一清二楚。解放前有些青年离开学校就到延安，对他们历史就不需费事进行调查。有几十万干部嘛，都是什么样的，以后还有机会进行审查，要造成新风气。到你们管事的时候应当更健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子子孙孙到共产主义社会，把革命进行到底！培养好作风，好思想，好习惯。

石油部问题就简单一些，大庆是一面红旗，要好好帮助。

今天就谈三个部。

还要好好学习《红旗》杂志第三、四期社论，2月28日登出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用人民公社了。毛主席考虑了，上海叫公社，北京也叫，各省都叫，中央各部也叫，风传全国，各个部都叫铁道公社，煤炭公社……。国务院也保不住叫中华人民公社了，现在是社会主义，那么一叫这样就进入到共产主义了。毛主席再三考虑，上海以工人阶级为主，一说就通了。北京学生比较集中，如果一说又要讨论几天，但是学生是打先锋的……《当前上海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要很好地学一学。

各部的夺权，业务监督，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成为监督监察的机构，过去是想不到的，做得好三月份就可以实现。做好以后，那时部机关的机构改革就好进行了。

(接见未完，待续)。

561. 周恩来接见工交口七个部革命造反派谈话 (1967年3月2日 国务院会议室)

参加接见的负责同志还有：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同志。

参加单位：水电部、冶金部、化工部、一机部、煤炭部、铁道部、石油部(七个部的部长也都去了。)

总理：先由水电部谈吧。

岳兵：总理，先向你汇报一下水电部夺权情况。1月17日，为了防止经济主义，打退部党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部机关井冈山战斗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4个在京单位，进行了监督夺权，成立了水利电力部革命造反监督委员会。夺权后当时认为存在问题：

- (1) 没有很好发动部机关革命群众；
- (2) 联合不广泛，没有体现大联合；
- (3) 认为夺权不彻底，没有进行全面夺权。

总理：就是铁道部，初步认为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只是业务监督嘛。

岳兵：2月10日进行了全面夺权，从一月底开始筹备工作，当时重点注意了和外单位的大联合，经过10多天的准备，区联合27个单位，其中，在京单位14个(其中联合了3个工厂，2个总局、4个科研设计单位，5个学校。)成立了水利电力部革命造反委员会。委员会的核心是勤务组，由9个单位11人组成，其中部机关3人，下设作战组(9个单位9人组成，其中部机关1人)。

总理：作战组干什么？

岳兵：揭发、斗争以刘澜波、钱正英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生产组由5个单位6人组成，其中部机关2人，联络接待组，由7个单位组成，宣传组6个单位组成。

总理：宣传组搞那些工作？

岳兵：负责广播站，办水电战报，配合揭发斗争刘、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刷大字报，贴标语，造舆论。公安小组4个单位4人组成。

总理：现在水电部还住了多少人？

民兵：还有400多人。

总理：400多人中发现反动组织没有？

岳兵：发现了反动组织，有西南的红色造反军，就是上次(1月26日)给您看反动袖章的那个组织。

总理：反革命组织逮住了没有？西南红色造反军头子逮住了没有？

岳兵：3个头子逮住了一个，送到公安局啦。这个头头也是反动组织“红旗军”的负责人。一共逮了9个人。(再继续汇报)办公室由3个单位4个人组成。进行了全面夺权，解散了部党委和政治部。接管了保卫处，夺了党、政、财、文大权。

总理：委员会29人中有长字号的没有？

岳兵：没有。

总理：没有长字号，夺权后20多天，怎么抓生产工作的？

岳兵：有生产组和勤务组指定的勤务员抓生产的。夺权后通过实践发现夺权存在的问题。没体现以部机关为主，29个代表部机关只有3人，勤务员11人中只有3人。发动部机关群众不够。没有体现三结合，当时只注意了部外大联合。还有刘、钱的反动路线很隐蔽，控制很严，司局长一个揭发的也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澜波说过，如果水电部成了黑帮部，你们这些人都成了什么人了？我们造反派对三结合没有认识，在夺权以前，没有注意对司局长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根据水电部的特殊情况，刘、钱的反动路线很隐蔽，控制很严，司局长起来揭发的很少。到1月份为止，除反动路线以外，部党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从2月份开始才出现揭刘澜波、钱正英老问题的大字报，司局长没有亮相，不知道和谁结合。

总理：你们不给他机会，他怎么亮相？

程企唐：最近我们对部长、司局长召开了几次亮相会给了他们机会。

岳兵：我们看了总理 2 月 17 日讲话和《红旗》第四期社论，觉得夺权过了头，采取了措施。勤务组由部机关 3 人增加到 9 人，其中有 1 名处级干部。2 月 19 日决定撤消生产组，改为监督业务，由勤务组抽出两人负责。

总理：怎么两个人，太少了吧！

程企唐：准备增加 5 人。

岳兵：2 月 23 日起草了第 2 号通令，发动群众讨论，修正第 1 号通令错误，2 月 25 日发出正式通知书，明确了水利电力部文化大革命领导权归水电部革命造反派，由水电部革命造反委员会行使职权，业务实行监督，改正了解散部党委和政治部的错误。

下面汇报一下各司局长的夺权情况，水电部的夺权是在各司局夺权基础上进行的。16 个业务司局，全面夺权的 9 个，7 个司局是业务监督，56 名司局长中，10 名司局长可以签发文件。

总理：是不是 10 个司局(指人讲的)

程企唐：7 个司局。(指司局讲的)

总理：其他司局怎么签发？

岳兵：夺权小组或夺权委员会签发。

总理：部级文件由谁签发？

岳兵：由生产组和指定的勤务员签发。

总理：你们夺权送报告来没有？

岳兵：送了，有第一号通令。

总理：通令我们不管。

岳兵：还有正式的第一号通知文件，还有给毛主席的致敬信。后来我们去国务院报喜。

总理：国务院收了没有？

岳兵：收了。

总理：答复了没有？

岳兵：送完后没有答复。

总理：没有办法答复。

岳兵：有 4 个司局处级干部参加了夺权小组，司局夺权存在问题，没有三结合，夺权夺过了头。看到总理、富春同志 2 月 17 日讲话、《红旗》第四期社论，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动各司局讨论，及时进行改正，有 13 个司局改了，还有 3 个司局正在讨论。

总理：你们部级还没有人，你们也不排个队！

岳兵：我们下一步打算，第一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矛头就是对准以刘澜波、钱正英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揭发、斗争。

总理：这个斗争会怎么开法？

岳兵：开群众斗争会，以前没有斗他，刚准备斗他，你们把他叫走了。

总理：斗争问题没有完，要允许他们把材料看一看，允许答辩。

程企唐：以前没有斗他嘛！今天刘澜波、钱正英在场，他们根本没有好好作检查，你们(指刘、钱)说说，你们检查过一次没有？你们可以出来对质嘛！

总理：我们现在是和你们商量问题嘛！今天会不会是斗争会。我问斗争会是怎么开法。

岳兵：先搞反动路线，然后检查十几年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

总理：如果两个阶段都检查，如果各部都这样作，那不就等于重新审干了吗？是否把整个历史都来搞？

岳兵：水电部情况特殊。以刘澜波、钱正英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水电部搞得很厉害，到 2 月份才开始揭，以前很少有揭发刘、钱老问题的大字报。

先念同志：你们怎么先给戴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

总理：十一中全会以后，开过群众会议没有？

岳兵：开过，他们没有进行过一次很好的检查。

总理：他参加会没有？

岳兵：参加了会。

总理：回答了问题没有？

岳兵：没有很好回答问题。

总理：你先不要说没有很好回答，首先是说回答了没有。

岳兵：回答了一部分问题，群众很不满意。

总理：你说话总要带个副词。不要说什么很好回答，部分问题，不要带上个副词。如果说今天这个会议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也不能说没有开，会还是开了。事情不能都满意，客观一些，实事求是。《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写得很客观。

岳兵：刘澜波、钱正英确实没有进行一次正式检查，部党委的李代耕检查了一半，很不象样，大家把他轰下去了，群众很不满意。这件事情，刘澜波、钱正英可以在这里对证。

总理：你们对立情绪怎么这么大。你们能不能对他们提出一些问题，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冷静的想一想，检查，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时间？

岳兵：给他们检查时间可以，前天斗争钱正英，叫她检查，她不检查，我们给她两天时间写检查。

总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你们读过没有？

岳兵：看过两遍，没有学好。

总理：要好好学习，包括我在内，至少学三遍也不多。《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是集体写的，是好文章。希望你们好好整风，各部門的造反派对我们说得这么甜，对另一方面就那么苦，苦乐不均，这不是毛泽东思想。昨天我说了学院，我相信他们能整好风，会拿出很好的东西。今天我倒要说说机关內的造反派，也要好好学习，不然怎么搞好三结合，搞好生产。既斗争又团结，把业务搞好，允许他们冷静检查，给他们思考的时间。我们是无产阶级民主，不是派別斗争，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毛主席说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给以人家改过自新的机会，与人为善。检讨主要放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个别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般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轻有重，应该检讨。主要检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发觉个别有历史問題的，可以调查，不要普遍审干，人人过关是不对的。

中央各部是执行了反动路线，司局轻些，责任一层层轻，越往下越与被打击的同志关系更直接。要求每个司局长、处科长都揭发部首長，揭了就是好的，就可以过关，不揭发就是不好的，就不能过关。把揭发变成亮相，但是有的司局长不一定沾边，就不一定知道。这样就不利于三结合，不利于抓革命促生产。现在要对部机关造反派说几句话，总有些人可以不检查的，有的人本来就很好，用不着检查嘛。有的人可表表态承认错误就行了。不要搞材料挂帅，我向你们推荐《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篇文章，建议你们好好学习，这篇文章写得真好，主席看了高兴得很，小将们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这是主席推荐的文章，这篇文章把古田会议的经验用到今天，运用熟练，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到这么高的水平，我们真高兴。你们是当权的，只是半权，不可能把权都拿。南京大学来了二个同学和我说，现在懂得了，夺了权，不知道如何掌权。夺权容易，掌权难，有那么多问题要找他，要化肥，有农业机械，他们管不了，非三结合不行，他们要向毛主席请罪。他们说得很诚恳。

我说，不要请罪，有错误不要紧嘛，错误也是错误，不是严重的，经过一次以后就好办了，夺不能乱夺，中央各部只能搞监督，不能把部长都放在一边，要搞三结合。我看你们有一个困难没有解决，如果你们对部长把口径放宽一些，群众就会攻你们，说你们右倾了，群众就不拥护你们，说你们弄错了。你们要实事求是，否则这种领导是不巩固的。

我差一岁就七十岁了，参加革命四十七年，也犯了许多错误，我总觉得自己不够，犯了错误就承认。知错必改。在斗争中学习，林彪同志对干部三个要求，第一就是革命性，斗志

不能衰，紧学毛主席著作，紧学紧改紧跟，跟到断气为止。如果能留一点东西，能供你们参考(漏记了)。既要实行三结合，把业务抓起来。我对你们充满热情和希望，希望你们能接过来，我垂帘面壁，趁主席健在，我们鞠躬尽瘁，想把你们培养成接班人。我们日以继夜的把希望放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不放在你们年轻人身上，还能放在我们这些老年人身上吗？今天你们还不能全部担起来，我们不能挑剔你们，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担子压在你们身上，业务的担子也压在你们身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你们身上，必须三结合。我没有给那个部长有辩词，希望你们考虑考虑。二月份有那么多文件帮助你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

岳兵：第二解决三结合问题，在斗争中逐步进行三结合，通过进一步揭发以刘澜波、钱正英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司局、部长出来亮相，在揭发斗争中逐步和他们结合，我们不是为了结合而结合。水电部情况特殊，到一月份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二月份开始揭，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总理：搞了半年还说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这等于否定了半年的战绩，也否定了你们自己。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红卫兵上街，矿院去煤炭部点火，阶级斗争的盖子就揭开了嘛。这就是说还得大搞，如果说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你们这些造反派怎么出来的，你们跳出来，盖子就揭开了嘛！如果说盖子还未揭开，你们造反派就自己否定自己。非要揭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出一批黑帮才叫揭开盖子，那有这种逻辑？昨天我听了就觉得不对头，(可能指铁道部石油部)今天你们又说你们把半年的成绩又否定了。

总理又问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你们能说石油部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石油学院：石油部的反动路线盖子揭开了。

总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阶级斗争嘛，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你怎么能说水电部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把你们井冈山战斗团置于何地，难道你们是搞阶级调和？

岳：水电部反动路线盖子揭开了，有些司局盖子揭开了，还没有全面揭开。

总理：阶级斗争我们这一辈子搞不完，你们这一辈子也搞不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了，还有阶级斗争残余。你们跳出来造反，就是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啦。非要打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部都要有，那把中央置于何地，难道毛主席领导的影响就没有了吗？毛主席的影响还是很大嘛。你们的思想方法、分析方法不对头，也不符合形式逻辑嘛！

岳：第三造反派火线整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前一段我们造反派犯了不少错误，出了不少缺点，我们认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对中央文件、总理、江青同志讲话、社论没有好好学习，没有吃透精神，特别是夺权以后，事情特别多，陷入事务主义圈子，没有时间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

总理：是嘛！你们让长字号都靠边站了。势必陷入事务主义。所有长字号的非要有揭发材料不行，才算过关，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了解情况不会乱说。

岳：最后向总理请示几个问题。

第一，部党委工作要不要监督？

总理：当然要监督，党委恢复没有恢复？

岳：从2月25日已经恢复，我们已经和党委成员李代耕打过招呼了，叫他们进行正常工作。

总理：党委还有那几个成员？

程：王英先、杜星垣、程明____、……。

总理：党委包括刘澜波、钱正英在内嘛，中央没有撤职嘛。

岳：造反委员会监督党委工作，能不能列席党委的会议，我们的看法还未统一，我们认为至少应该让造反委员会的党员列席党委会，当然不一定所有的会都参加。

总理：可以嘛。大庆公社，你们怎么办的？

石油学院：有的不是党员也列席党委会。

总理对先念同志说：暂时可以这样作。确实是个问题，三结合没有搞起来，也无法监督党委。

岳：今后与外单位如何联合，在京的学院等单位能否参加革命造反委员会？

总理：2月21日通知说了，以本单位为主，若必要外单位可以留下，看你们是不是需要，同时看外单位是否愿意。

岳：我们认为在京单位愿意留在机关，部机关群众也同意，对文化大革命有利。如北京水电学院和科研单位来部造反较早，有群众基础，可以留下吗？

总理：（点头）。

岳：水利电力部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权限范围多大，是领导水电系统，还是水电部机关，我们初步认为仅限于领导部机关文化大革命，但在实际工作中碰到一些问题，如东北电管局要罢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官，我们介绍给部党委处理，他们还要我们表态。

总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上讲了，不要以罢官为目的，罢官不罢官，你们不管是对的。（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岳：党支部的权能不能夺？谁来夺？部党委属于中央领导，不能夺党权。司局的党支部是个基层组织，能不能夺？

总理：首先排个队，那些人可以出来工作。

岳：有的司局党支部书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部党委已经作了处理。

总理：烂掉是否作了结论？

岳兵：部党委已经批了。

总理：部党委批得对不对？

岳兵：部党委批得对。

总理：怪了，党委这个事批对了，但本身又有问题。

岳兵：刘澜波、钱正英是黑帮，党委不一定都坏了。

总理：这个分析方法对。

先念同志：支部可以改选。

总理：改选、补选可以，党支部本身还存在嘛。支部书记不好，支部不应当没有，5人有2个人不好，还有3个人。

总理：程企唐同志你是那个学校、那年毕业的。

程：1963年北京电力学院毕业。

总理：岳兵同志你呢？

岳兵：1964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

总理：你们都是革命派，中央的文件和报纸都要多看一些，多学习一些，前途是你们的，如果你们努力的话，如果你们紧跟毛主席的话。

程：汇报一下生产业务问题，去年10月份以后当权派就很少抓生产，在这期间又犯了很多错误，发了很多错误的文件和指示，搞了很多经济主义，原来的业务安排和指导思想也有问题，因此留下了一个烂摊子，问题已成了堆，矛盾重重，当权派腰杆子挺不起来，处处被动状态。

总理：你们说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他们腰杆子是挺不起来。

程：他们说话下面也不听，指挥不灵，渠道也不通，下面有些问题上来也不敢顶。电力生产基本维持正常的，主要原因是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威力，电力生产队伍比较整齐，广大电业职工的努力，同时电力生产反应比较灵敏，牵涉面比较广，但缺煤问题严重，影响发电。

总理：那些地方缺煤？

程：华东、东北、西北……

基本建设问题多，必须迅速解决……

计划的安排和指导思想都有问题，在水利电力建设方面，很多地方都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总理：你们说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这个大帽子压在头上，他们就解放不了，你们还要把《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学一学，要不要再给你们念一遍？不能说都是修正主义的，就象三门峡有很多问题是你们批的，没有经验吗，不能都说是苏修的影响，我们没有经验，同志，不能总而言之，统而言之，都说成修正主义的。新安江是我国自己设计的，也还有些问题，例如木材过坝和鱼的问题也出了毛病。革命相信你们，你们从学校毕业二、三年，业务还不能全担起来，现在把水利电力业务全交给你们，你们也要犯错误，我们不能责怪你们，责任还是我们的。同志，还得积累经验，我欣赏你们的热情，你们革命性很高，但是还有科学性、纪律性，总得把三结合搞起来。才能抓起业务。《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谈的很透。你们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业务要进行监督，全交给你们还不行，要紧跟中央精神，要说明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是不对的，帽子一戴，腰杆子一定不硬。

程：三线建设，战备电源等具体问题，下面有很多问题都找上来了。

总理：下面来找，你们叫勤务员也好，服务员也好，反正是负责人，你们要顶住，下面要说你们右倾。现在正是要纳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轨，不是纳入资产阶级的正轨，要整理出新秩序。清华井冈山报反托派不对，社会上反右倾也不对，既不是托派，也不是右倾，你们不要怕右，你们并没有右倾错误。

程：在建设上也反映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如高井电站……。浪费很大，在有些项目安排上，不根据实际情况，不走群众路线，而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

总理：有的错误还是难免的。

程：只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走群众路线错误就少些。

总理：那对，要走群众路线。

程：在水利方面，抗旱、渡汛矛盾已经暴露。……

总理：渡汛还有那些问题？

程：昭平台、官厅闸门……

总理：河北还有什么问题？

程：子牙新河。

总理：(点头)

程：还有很多接待工作压在我们身上，在前一阶段当权派搞了一些错误的东西，经济主义的事情现在都找上来了，有些错误的我们顶了。例如上海电校学生分配问题……。

总理：你们作得对。

程：移民问题矛盾很大，很多问题都找上来。例如丹江口移民问题，张体学很不负责，单方面撕毁协议。我们表示了意见，保证丹江按期发电，协议不能单方面撕毁，移民工作积极进行，移民问题由湖北、河南双方协议，他们要找国务院，我们不同意，矛盾不要上交。

总理：两省解决，矛盾不上交，原则是对的，我们也谢谢你们。但是矛盾还没有解决，问题还会反上来的，地方上吵来吵去，老百姓吃亏。水利上有些问题，不到现场不好解决。水利必须全面规划，去现场规划，宁肯时间长一点，不能孤立解决。从三门峡到岳城水库都还存在问题，不是对上不利，就是对下不利；不是上游吃亏，就是下游吃亏；还有左邻右舍问题，问题很复杂，不能一概怪当权派，这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当权派。你们当权时也会犯错误，我们希望我们不犯错误，也希望你们不犯错误，要少犯错误，不可能不犯错误。同志，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无产阶级当政，也可能犯错误。只要不变质，不复辟，至于错误，一万年也会犯的，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没有矛盾也就没有社会，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同志，不能把一切错误都归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一分为二，那些是修正主义，那些是缺乏经验。我再三推荐《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这是毛主席批了，推荐的，我今天晚上回去还要看一遍。

富春、先念同志：响应总理的号召。

总理：你们，我们都要勉为主席的学生，要身体力行。做主席的学生，不容易。

程：汇报三线建设和战备工程问题……西南有个电厂进洞工程，张彬不走群众路线，没有调查研究，就拍板……

总理：不要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当权派，走资本主义道路，你这个例子，我同样可以举出一些。岳城上游建了不少小水库来不了水，岳城水库干了，去年幸亏下了一些雨……水利规划不止是一个洞子，方面很多，这还不是属于经验吗？这还是存心？你要一分为二，那些属于修正主义的，那些属于缺乏经验的。我们大家都愿作主席的好学生，要做到，还不那么容易。这样信口开河，夸夸其谈，就会犯错误。

程：战备工作和三线建设已作了些工作了，现在已有一个工作组到东北去了，由当权派负责，由革命造反派监督……三线建设还让张彬去搞……。

总理：张彬搞错了，你还让他去？

程：业务监督嘛，他作得对的就支持，作错了就改正，热情地帮助。

总理：我再重复一下，作对了就支持，作错了就帮助改正。我再给你加上一条，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从他们错误中吸取教训。谦虚一点好不好，要接受毛主席教导，谦虚谨慎，毛主席的青年要谦虚谨慎嘛。

程：汇报了监督原则和范围。

总理：你们写出几条，我们看看。

程：汇报从全面夺权到怎么搞业务监督方面问题。

总理：业务监督有几个人。

程：我和史提。

总理：史提来了没有。

(史提站起来说：来了)

总理：业务监督只有2人这么少呀，要增加一些。希望你们排个队，部级司局级到底怎么使用，把你们的意见提出来，我们才好讨论。快点“三结合”。春汛快到了，水电部赶快把工作抓起来。

(水电部汇报情况，到此结束)

总理：冶金部谈吧！

冶金部：(汇报了夺权情况)，吕东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们夺了权，钢院还要退出革命造反委员会，他说我们右倾了。

总理：还右倾呀！不对嘛。他们学了《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还这样。

冶金部：(汇报对夺权的认识过程)

总理：我同意你们的说法，认识是有过程，《实践论》上已经回答了，要经常学习主席的这个思想。

冶金部：(汇报了接待工作)顶住了经济主义。

总理：夺权后，各部革命造反派把接待工作抓起来了，这很了不起，这一点，你们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冶金部：汇报存在问题。

总理：夺“私”字权的文章也是红卫兵小将们写的，写得好。青年人敢写，当然也是根据主席和要林副主席破私立公的思想发挥出来的。

治：政治部在运动中起来得慢，……

总理：工交系统政治部工作都比较落后，还有外事、农林、财贸、宣教政治部都没搞好；农林更差，形式主义的，64年搞起来的，经验不够：很值得警惕。去年10、11、12月份为了材料问题浪费了很多时间，费了很多事。如果当时我召开十万人大会，把这个精神讲一个小时，事情就好办了。你们也要好好学习《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不要材料挂帅，不要把许多人的精力放在材料上。搞材料，抢材料，许多精力浪费在那里，其实只要把观点摆

清楚了，就可以了。要发动群众，搞人民战争。写这篇文章就超脱了。

你们不要把一迭一迭材料送给我。老实讲，我也没有时间去看。给中央文革的，也没有时间看。抓住重要问题，把观点摆出来，写个条子就够了。当然材料问题上有成绩，南开大学八·一八整理的材料对党是有帮助的。搞材料应该节约一点，抓大的。

治：总理说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业务监督权，我们没有很好领会。有人说我们夺业务领导权犯了方向错误。

总理：这不对，承认错误太多不对，这还是经验问题。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还是业务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从上海夺权后，我们估计到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事情是逐步认识和发展的，经验还是要经过反复的，事情还得经过摸索。经验不经过反复也是不行的。

治：私字权没有夺好，整风没有整好，今后要作好三结合，第一对司局长排队；第二、给他们亮相机会；第三、让群众鸣放如何三结合。准备三月上旬把三结合搞好。

总理：搞三结合，成立革命委员会还早一点吧！

治：部级、司局级已初步排队，但了解还不够。

总理：各部改为革命委员会不要太快了。各部实行部的三结合要以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为基础，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的领导干部三结合。在这里讲一下，各部实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要慎重一些，要和中央各口先打招呼，批准了之后，才能公布。你们革命造反派自己搞革命造反委员会是可以的。革命委员会拿出来要象个样子，现在还没有典型，你们要创个样板。

治：我们要开门整风，把战斗团搞成革命化战斗化的队伍……

总理：点头。

治：我们要加强毛主席著作学习……

总理：你们还要带动你们 700 多以外的人一起学习。

治：不分大小团体，对革命组织，都要实行大联合……

总理：你们这个思想好，不能老是少数，组织总是这样发展的，先从思想发展，到组织上的发展，革命思想领先总是少数的，要争取多数，把队伍带起来，从政治优势转到组织联合优势，这时组织就扩大了，中间偏左的就进来了，必然要带来一些思想，就有对立面了。组织扩大了，先进思想在组织内部又是少数，通过斗争团结，代表先进思想的少数，又成为多数，由少数成为多数，一次次地提高，在不断斗争中前进，允许内部有不同意见，组织之间的联合，在外部也要有对立面，也允许外部有不同意见。内部有对立面，外部也要有对立面。有资产阶级思想存在，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是两个阶级思想的反映，这是正常现象。思想有共鸣之处，但不允许有宗派阴谋活动，彭真搞阴谋活动就是反党嘛。

治：汇报如何团结政治部的革命组织。

总理：形成组织的要团结；没有形成组织的，也要团结；只要是革命的，大方向一致，都要团结。

你们这样说很好，既然七百多人，要容许有不同意见。只要是革命的，大方向对，就大联合，当然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还要进行革命的三结合。煤炭部“东方红”组织人数较多，煤炭部里还有两个组织一百多人，只要他们是革命的，就要团结他们。要向冶金部学习。同学们一旦了解到正确的道路，就会很坚决地做。对立的观点，有时在内部，有时在外部，团结多数，不等于迁就落后思想，要不断提高，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毛主席是全世界的火炬，是全世界人民的红太阳。

治：总理二月十七日在财贸口的讲话是否适用于工交口？先念同志领导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工交口是薄一波领导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

先念同志：财贸口也有薄一波的人。

治：吕东是紧跟薄一波的人。

总理：薄一波是，不等于各部是，不能说他是，和他工作过的人都是。刘、邓是，我们也是？今天不谈个人问题了。

治：汇报生产中的问题……

总理：由秋里同志抓一下冶金部的工作。

治：汇报大企业夺权情况……，要求实行军管。

总理：大企业统统军管也不好，夺权也是个考验，你们的心情我懂得，你们担心完不成任务，这心情我理解。夺了权你们懂得了一些问题，你们管了一半的权就好，就懂得了，不实践没法子认识的。经历了一番，好处就在此，一夺权就有了经验。

治：汇报鞍钢夺权和生产问题。

总理：鞍钢吵成那样，生产还不错，可见大部分同志还是可以信赖的。

治：冶金系统在京单位在部里设个联络站行不行？

总理：可以，由部机关抽3人，学校1人，科研单位1人，共5—6人。有一个房间，一个电话，1—2人值班，保证房里有人就行。我的值班室5个人嘛。大字报有份量的可以抄一下，现在小报很多，有些大字报和报屁股的消息不能登上去，报屁股的消息最不可靠，一大堆人名，什么砸烂狗头，人头嘛。军管也登出去了，我们的话不胜更正。小报把消息都走漏出去了。

先念同志：日本共同社把总理讲话都登了。

总理：无产阶级的报纸，报屁股是资产阶级的。邓拓搞《北京晚报》，陶铸搞的《羊城晚报》，也没有搞成现在这样子(指报屁股)。的确我们头脑中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一张报纸上就可以一分为二，小报问题要注意一下。

治：《冶金报》还办不办？

总理：《冶金报》停下吧，不要忙着办了，现在还忙不过来。

总理：化工部谈吧。

化工部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非常复杂，三次夺权，三起三落，二月中旬已逮捕了梁膺庸。现在初步形成三结合，准备夺权。(并汇报了生产情况)。

总理：你们是不是一步走，一下子三结合夺权。

化：政治部保字号的多。

总理：政治部不政治。政治还是有的，不是无产阶级政治……

化工部：(汇报关于化工部机关泄密的问题)

总理：检举的人做得对，反对砸、抢、打的风气，要保护国家机密。

化工部：现在革命领导干部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在揭发批判梁膺庸时，他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夺权的过程中，私字出来了，互相闹矛盾。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还要组织革命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总理：你们这样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样做得很好。讲得很好，这样就很有力量。你们批评得很对！你们年轻人就应当批评老干部。只要是内部矛盾，可以敞开批评。老干部几十年党龄了，还有私心杂念。你们批评得好，这样就触及灵魂了。这比戴高帽子、打他，还要好。你们这样做，我也受到了教育，在座的也受到了教育。我们有些老干部就是不争气，私心杂念很重。

化工部：广大群众要求给高扬同志平反，并参加三结合……。

总理：高扬就是要平反嘛！他不是三反分子。高扬有错误，但是打重了，搞出来的早。

谷牧同志：给薄一波钻了空子。

总理：把一个人的一句话一个活动都记下来，集中起来，勾划出一个人物来，那就有问题了。你们年轻人也会说些错话，写些错文章，过了二十年再如此对待你们，以后又是如此。谁不有些错误，说错了话，那以后别人谁还敢讲话？如果这样，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吗？怎么能形成主席提出的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

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说错了话，作错了些事，不能都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你们对领导干部批判严一点，你们敢想、敢干，我们赞成，我们高兴。我们党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这是主席伟大创举。到现阶段，对有些事情要作出分析，要冷静一点。

562. 周恩来接见西安革命造反派讲话^① (1967年3月2日)

首长说：你们看了上海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的文章吗？是一篇了不起的文章，主席也看了，推荐给大家，如果你们西安地区那样整风，就不会那么“打、砸、抢”了！首长又说：西安的“打砸抢”不象样子！你们看他们工人是这样说的：打的是工人兄弟，砸的是国家财产，抢的是人民的东西。就是这样，砸的是国家的财产，抢的是人民的东西，“打砸抢”打的是谁？陕报军管后是加印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没有印自己的吧？以后报纸上要宣传反对“打砸抢”。要强调这一口号！我上次和一些人说：你们（指大专院校指挥部一方）说也反对“打砸抢”，为什么不发表声明？这是自己心虚不承认错误，结果在冲锋区还贴个标语“‘革命的’打砸抢万岁！”革命有什么“打砸抢”？还有革命的“打砸抢”？打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我们打敌人，打蒋介石越狠越好，现在打阶级兄弟、打同学，怎么能“打砸抢”万岁？对俘虏也不行，只要交了枪，优待俘虏不分官兵。现在这么多的国民党军官还在我们这里，最大的头子就是溥仪，那是宣统皇帝，现在五六十岁以下的都没有碰到的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你们军队的几位同志都是五六十岁以下的，他们是共和国时期了，那也是假共和国。你们从西安来的代表甚至连北洋军阀都没有见过。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四十年了，你们只二十几、三十几岁，那北洋军阀我们也有，国民党大头子杜聿明、卫立煌死了，张治中，东北战场的廖耀湘，北京和平解放的傅作义，天津的陈长捷都是在这里，我们都没有打死他，也没有打伤嘛！你们要学习解放军。

我们军队还出个告示，坚决反对“打砸抢”，再加上个揪人，或抓人，这么多天了，联络员同志给你们发了许多中央的通知，这些文件是我们讨论的，有些还修改过，我贴到屋里，每天还要看一看，恐怕那条……。工作组情况特别严重的，要把材料交给原单位批判，检讨了那么多天了，不能揪来揪去，坚决反对“打砸抢抓”，你说他是反革命，你就送军区嘛！

（在谈到对干部区别对待时）首长说：你们那么批判刘澜涛的报纸，那批人都跪到在那儿，确实不好，丑化，你们也得有个区分。我们看了不好看，北京更不象话，搞群丑图，这里边也要区别对待，再这样过几天我们就要封报了，以前错了就算了。我们无产阶级应比资产阶级文明一些，你们西安登的已经登到几个外国报纸上去了，修字号的让我们看……你们破旧立新，破四旧，你们的四旧就是不少，旧的看惯了，都是从舞台上看来的。江青同志导演的戏就没有这些场面，这种场面不要太多，这才好！旧戏就是用脸谱，把人们的思想定型化了，看了曹操就骂，对曹操从帝王来说还是一分为二，当然还是剥削阶级。所以，以前舞台形象都很恶劣，对劳动人民毒打，我们很难过。我们也搞他们，一时快意，有点阶级仇恨，旧的影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我们应该文明，把他们改造过来。今天我们开了一个中央各部的一个会，有人争论不休，有个女同志提出要分清两类矛盾，作了一个很感人的讲话，我说打、跪能否触及灵魂？这样说理全场都感动！昨天康老也讲了，画人、照片不要再搞，还有喷气式，这不是无产阶级方式，我们说相信无产阶级能改造他们，改造不行，还有专政，专政不行，消灭他，那是极少数。这是无产阶级的心胸、气魄，要反动分子投降过来，改造他。

首长还说：抄家了不行！反对“打砸抢抄揪抓”。南开大学“八·一八”“八·三一”把以前叛徒自首启事的东西都查出来了，这是有功的，我们以前都不知道，但这是由专案小组

^①本书编者按：此讲话疑为3月1日接见之不同记录。

来搞的。你们全国大中学校的学生来审查我们所有干部，你们有这个能力吗？毛主席教导的红线贯穿了四十五年，特别是后三十二年，所有的干部也都要连根审查。不要人人过关。就是西北局连一个好的也没有？彭真领导下的北京市委也要一分为二，也有干部是好的。否则就不是两面派，是一面派了。

(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时)首长说：现在春耕这样忙，组织动员开会影响生产，这不对，现在派军队在搞春耕。任何农民组织只要妨碍春耕都要劝阻。春耕迟了很不利。对农村的工作以谁积极参加春耕为标准。我们甚至设想，在春耕中要夺权的大队也要暂停夺权，不是一切大队都要夺权，有的只要个人批评一下就行了，春耕忙时，大部分都要参加春耕，康老不是提议要取消喇叭车吗？我很同意，以前中南海四周喇叭吵得凶，叫又听不清楚，影响思考问题。我们劝北京的学生不要多搞万人大会，效率很低，只是喊口号，现在已经命令工人体育馆、体育场不再借给开斗争大会，在运动初期动员时需要的，现在不需要了，要钻到深的方面去。

563. 李先念接见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风雷战斗兵团等革命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2日)

同志们：

你们无论是红反团或是风雷都做了很好的工作。煽了革命之风，点了社会主义之火，学生干劲足，闯劲大，这是机关干部比不了的；机关干部就不如学生显得那么勇敢，他们要工作，你们专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敢闯，劲头足，敏感。你们不管哪一派，进驻外贸部都做了很好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推动了外贸部的运动。(彭崎明插话：我们不进驻外贸部，人家也能把运动搞好)，夺权，需要夺的就夺，不需要夺的就不夺。一月份夺权中，产生了好些问题，但责任不在同学，而在我们，一月革命后产生了连锁反应，许多不该夺的权也夺了，这是群众热烈响应中央的号召，夺过分了退回去就行了。应该理解原谅。我要保护你们的革命干劲，不给你们泼冷水。你们说他们有缺点，你们也有缺点嘛！(众答：我们也有。)现在是六十年代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各种思潮都要表现出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很剧烈，现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已战胜了刘邓的反动路线，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这是全国七亿人民的大事，也是世界上三十五亿人民的大事。毛泽东思想要管世界。你们在这场大革命中做了很多工作，很好工作，也犯了许多错误，否则为什么要炮轰李先念，火烧李先念呢？你们炮轰是有道理的，我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压制了群众革命，我应该承认错误，应该向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赔礼道歉，八、九月份，你们骂我和稀泥，同学骂得对，当时我的思想没有跟上形势。

现在斗争的方法要提高到新的水平。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历来都讲文斗，不讲武斗；但有一时期武斗成风，如戴高帽游街、剃头，这种斗法不好。不过，这也不要紧，这是群众热爱毛主席的表现，群众一听这些人是牛鬼蛇神，是三反分子就要让他游街、剃头，这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因此，犯错误，过火的地方要原谅他们。但这中间也有坏人利用了，我不是请你们。全国有没有？有！如湖南的“湘江风雷”，北京的“联动”。这些娃娃们是好的，就是被坏人利用了走上邪路。这虽不好，但是要比刘邓路线占优势好，如果刘邓路线当权跟着走当然没问题，我们如不跟着走就要杀头。那时，你想给他们戴高帽子，就找不到脑袋，想给他游街，就找不到人。现在形势好得多了，你们看北京的形势不是好了？你们应该看到大方向，应该鼓足干劲。我不是提倡这个办法，武斗是脱离群众的。你们做了许多工作，要继续努力。

(二)大联合、大夺权、三结合的方向。

李蜀龙、宋树君、郎燕玉、郝武群在我面前没有说过你们是托派、右派、右倾保守势力。

(众：他们天天说！)我没听说。(众：他们不敢对你说)上次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抓托派，他们说：只是一个团员写了一个标语。抓托派是不对的，康生同志二月二十六日零点 16 分在人大会堂东会议室接见云南省代表时说：(念康生同志的讲话)“抓什么托派呀！反右倾机会主义不对，抓托派更不对！”我同意康老说的。(念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戚本禹同志说：“有人说，造反派内部必须大乱，这个口号是反动的”。(众：打内战万岁不是反动的口号吗？)(李副总理又念王力同志的讲话)，王力同志讲：“联合不仅要看到自己，而且还要看到敌人；联合是革命派的大联合呢？还是合二而一的大联合？我们要革命派的大联合，不要和稀泥的大联合。”

(三)你们辩论的方法我不大赞成。

你们双方所使用的语言我都不赞成。我要不讲，我们老头子要犯错误的。我们的斗争经验、组织经验、政治经验比你们丰富，我们不足之处是闯劲不够，(下面插话说：有人说我们是安子文的党员)怎么能这样说呢？怎么能否定毛主席的作用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党员，怎么能说是安子文的党员呢？中国人民推翻三大敌人，获得今天的胜利，这难道是错误路线的结果吗？虽然有错误路线干扰，但主席的路线一直是占上风的，怎么能把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所建造的西南铁路说成是刘邓错误路线的结果。有人说与彭真有关系就是彭真的党羽，彭真是常务书记，那时他召开会议，你不去行吗？

现在有一种思潮，认为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盖子还没有揭开，理由是：(1)第一书记没有被打倒，党组没有打倒；(2)党组成员不互相揭发。高级干部，我是政治局委员，有纪律，有党性，不能象你们那样。“八·八”战斗队搞陈云，要我帮忙，我说我帮不了忙，我是政治局委员，这样做要违犯党纪的。你们现在彼此上纲，彼此受不了，这样怎么能联合呢，要坚持原则，大联合要有原则，不要把问题提高了，有些话说起来吓人，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三反分子，什么托派，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说，你们说的都不算数。要革命的大联合，斗争的方法完全可以合情合理的。不要把问题提高到不恰当的程度，使人受不了。化工部造反派的水平最高。摆事实，讲道理，摆那样多事实，讲那样多道理。水平很高。李富春，余秋里和我们都认为他们是真正的左派。

现在左派队伍中的几个坏主义，就是“私”字当头，要克服这些主义要有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克服得了的。我参加革命四十多年，还有个人主义，否则怎么还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左派组织中的“私”字，个人主义要克服需要一个过程，青年思想起伏大，你们要主动想办法，与他们联合。我本来准备让你们到我这里来吵二、三天，打死一个人也没有关系，但我确实没有时间，原来我想找凤雷、红教联谈谈，红反团说：“不要了，包在我们身上，我们保证回去搞好联合。”一个多月了，搞得怎样？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越闹越严重。

我一个人管你们双方管不了。我给你们找一个联络员，(众答：行！)在外贸部找，(众答：行！)林海云怎么样？(众答：信得过！)事情要慢慢来，不要太性急，(众说：慢慢来我们受不了，我们受压制！)受点压制有什么不好！太顺利了不好。我这个人就受了二年压制，以后打仗就勇敢多了。压压锻炼人的意志。(众问：外贸学院是否要解散)，谁说的，(众答：红反团说是您说的)。我可没说过。

564. 戚本禹谈北京市的干部 (1967 年 3 月初)

北京市的老干部有的是好的，比较好的；有的是坏的，如雍文涛。市委的吴德、刘建勋、丁国钰、高扬文、李清泉是比较好的。今天来的几个同志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可以工作的。他们有经验，打过仗，搞过罢工，我们没有搞过，搞过学生运动，这还不够。今后揪他们要经过谢副总理批准，这是中央委托他做的。

565. 戚本禹在人民大学的讲话 (1967年3月3日凌晨)

谢谢同志们，人民大学的问题，我们作了些调查研究，但是有些问题比较复杂，我们找了几个记者谈了好几次，我与你们学校两派谈了好几次，刚才还在谈，所以让大家等了好久，很抱歉。有些问题较复杂，我们的记者来了后也分成两派，同志们……(这句不清)，把我的脑袋也转昏了。

但是在复杂的问题面前，我们有一个很锐利的武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武器，我们大家可以掌握这个武器，来解剖来分析人民大学的复杂的现象了。这些矛盾和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毛主席在毛选的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我友。我们拿毛主席的这个观点，这个武器，来分析人民大学的问题，我们人民大学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人民大学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革命的同志呢？人大三红是不是敌人呢？新人大公社是不是敌人呢？他们的多数同志，三红的绝大多数同志，作为广大群众来说，这个革命组织，这两个组织，是不是都是敌人呢？他们都是同志，你们大家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三红不是敌人，新人大公社的大多数同志也不是敌人，都是革命群众，敌人是谁，你们的敌人是谁？同志们，你讲的都对，我看人民大学来说，第一个敌人是孙泱，你们说打倒，但是没有打倒，你们团结不起来，打不倒孙泱。第二个是谁？第二个是郭影秋，第三个是谁呢？是胡锡奎。胡锡奎你们也没打倒，胡锡奎的叛变自首是天津的八·一八搞出来的。你们自己没有调查出来。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八·一八调查出来的。你们如果有这么大的积极性，喊口号这么大的力量，这个问题，那恐怕比八·一八调查得早的多了。天津南开大学的八·一八、八·一三？南开大学的，我记不得了，你们去看看材料，是八·一八还是八·一三，那么除这三个人以外，这是你们的大方向，除了这三个人外，还有没有？还有。你们自己可以，你们这里有四千人，究竟有没有四十人哪，三十人哪，有没有二十个人，恐怕还是有的，不止这三个。

你们自己可以讨论。反正这个人民大学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敌斗争，应该说这儿的阶级斗争揭开了，如果说没揭开，那是不对。但是下面讲的话可能你们不愿意听了(愿意)，揭开的很不彻底，斗争还不深入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里面，你们知道这个决定的。我们搞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一斗、二批、三改)斗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这是我们的主要斗争锋芒，是我们运动的重点，但是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你们的重点搞得怎么样？(不好)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好好思索的，很好地考虑的。对敌斗争搞了好几个月，你们的这点也搞了好几个月，但是内战也打了好几个月，所谓内战，就是你们革命学生群众内部的，这个群众内部的斗争，是不是完全取消，不能取消，他取消不了的，因为他有矛盾。但是你们这个打法，合不合毛泽东思想？(不合)恐怕不太符合。但是重点丢在一边，专门一天到晚打，你说他是反革命，他说你是反革命。反动路线，都是执行反动路线的，都不行，坏得很，坏得都不得了，那是一小撮坏蛋，那么你，你说好人是谁？谁是革命的力量？这个红卫兵也是这样坏那个红卫兵也是那样坏，是不是，你们这么搞谁高兴。我看那么孙泱就很高兴。郭影秋恐怕也很高兴了，孙泱自己还有什么同你们的战斗队给他一个讲话，我很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记者带个记录，我全部看了，我看这个记录可以发表，你们大家从这里想一想，你们不觉得吗？孙泱是几号，六月十三号，孙泱六月十三号的罢官是个大阴谋，孙泱是个什么人物？是蓝衣社的特务，钻到共产党内部里边来，与陆定一黑帮、严慰冰反革命分子有密切的联系。长期给反对毛主席路线的人服务的，在这里，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你们革命的，这样一个人。你们现在看，你们进行什么斗争，进行的斗争，水平高不高？(不高)他们居然对你们的战斗队十分猖狂，说他有权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你们没资格问他的问题，为什么他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说你们没打倒孙泱，郭影秋也没打倒，郭影秋也没有很好地承认自己的罪行，但郭影秋的问题是什么性质，

那是以后的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性质，你们反他是对的，是正确的。而保他是错误的。那胡锡奎的问题更是进行不深入，我希望你们，同志们，你们各党各派，用毛主席的思想武器，分清敌、我、友。用这个武器，重新考虑一下，人民大学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来提高自己，来胜利前进。

我建议同志们考虑这么几个问题，你们各党各派开门整风，如果一时搞不了，先关门一下也可以，或几天关门也可以，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要学习上海《鲁迅兵团往那里去》那篇文章，以这篇文章为纲，这篇文章《鲁迅兵团往哪里去》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型，用这个典型来提高自己，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整风期间，十天的时间，开展整风，人大三红，新人大公社，开展整风。新人大公社开展整风，在整风期间，你们互相对立的几个组织，对待自己，要首先看到自己的错误、缺点，对待别人，要肯定人家的成绩，要看到人家的长处。因为你们两派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红卫兵和“联动”的矛盾，是红卫兵内部矛盾，象对待“联动”这个组织，那不是整风问题，“联动”拥护刘邓，喊：刘邓万岁，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反对毛主席的，象这样的组织是反动的组织。象人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人大红旗、人大三红都不是反革命组织。当然，象人大红旗，人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有相当一些人，过去在反郭影秋的时候，他们保了郭影秋，那时有八·一八赤卫这样的组织不能笼统说是革命组织，那是保守组织，那么他们后来造反了，造反了，他们表示愿望革命，过去保了，保错了，现在要来革命，允许他们革命，造反不分先后，允许他们造反，那么造反了，不要说人家是什么变种啊，八·一八的变种啊，保皇派，这就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我们组成自己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不利于大联合，那么这样的组织有些人，大江东去，泥沙俱下。当然会有些人的确是他原来是保皇的，现在还要保皇，他不过改换了一个组织，有的，但是这样的人是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在整风当中，确实有极少数，那么在整风里可以在内部展开批评，纯洁自己的队伍。纯洁队伍也不应该说你是混进来的，就马上把你开除。可以留在里面察看，察看。但是革命的组织应该和他们划清界限，不要划不清界限，那么这里总的来说，要允许人家革命，不要不让人家革命，不允许他造反。我们不要当赵太爷，《阿 Q 正传》里有个赵太爷，毛主席曾用这个故事告诫我们，我们说我们不要作赵太爷，那么赵太爷就不允许阿 Q 革命，阿 Q 是允许有缺点的，头上还有疮疤，他要革命你还要允许他，不要不允许他革命，就是杀头，那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郭影秋可以犯的。你们新上任的领导也可能犯，他不是郭影秋，他也可以犯，那么我们红卫兵如果不好好革命的话，也会沾染他们的影响，甚至也会犯路线错误。鲁迅兵团讲了这个问题，你们可以看一看，当然我不认为现在的三红是什么反动路线，我不认为……(录音不清)我总的看法就是希望要允许人家革命。那么反过来说，那么三红是不是就变成反革命组织了？不是。三红还是革命组织，他是有革命造反传统的，他反郭影秋是最积极的嘛！是不是，反对孙泱他也是参加战斗的嘛。他也写了大字报嘛！他那派同志嘛，后来，他搞了个阴谋，把孙泱的问题搁下来，就转移你们的斗争视线，迷惑了你们。结果你们就把孙泱的问题放下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就放下了，你们还在搞材料，还在搞，但是没把他放在重点来搞。这是你们第一位敌人，我刚才说的嘛。郭影秋问题搞完了，就马上应转向这个问题嘛，没有嘛，没有，相反的是，三红有很大的错误，要搞康老嘛，刚才有同志要鼓掌，有的同志制止，他制止是对的，他们有错误，我们应该帮助他，是跌倒了爬起来，不要给他鼓掌，有错误还给他鼓掌，干什么呢？这错误是很大的，因为康生同志，他很早就跟彭真这些黑帮做斗争的，是坚决……(不清)失方向，但他犯了错误是不是把这个革命组织取消了呢？说他不是革命组织了呢？我看那不妥当，这个我亲自问过康老，问过他的意见，他说他不赞成把反对过自己的组织打成反革命，他不愿意做的你们不要去做，那么给他应该怎样估价呢？是革命组织应该怎样估价呢？又有缺点错误。我刚才开始曾经说或三七开或者四六开，他们三红说是三七开，那就三七开吧，好不好，他们主要错误是这个错误。另外还有宗派主义。还有他们的各组织不纯，这个组织不纯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新人大有些组织我看也不纯，那些

人也不纯，我不愿意在这里一个一个地讲。因为一个组织那能那么纯，但主要是看他的大方向，他的组织是不纯的，这是要他们注意，三红要注意这个问题，他贴康老的大字报。这个问题就跟他的组织不纯有关系。但是不要以为他组织不纯，有错误就把他一棍子打死，他是个新生事物，他那里领导也不是很坚强。这是他们在整风里面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的领导是会坚强起来的。但是就是这样，他还是个革命组织，是有功绩的，在人大中是有功绩的，有贡献的，应该肯定这一点。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割断历史看问题，那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光孤立地看见他反对康老这一点，是有问题的，他贴了八张大字报，还有大标语，新人大也贴三张大字报，四张大字，还没有查清楚，有三张四张，大概三四张。问题新人大这里也有错误。但是新人大的错误要比三红错误小的多。什么原因呢？因为三红总部发表个文件，而新人大，他那几个组织没有发这个文件。好象是错误人人有份，三红有错误，新人大也有错误，但是这些错误都允许人家改的，改正这些错误，当然他们也请罪了。应该说三红在认识错误还是很不够的，但是他是会认识够的，他们会改正错误的，人家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如果人家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把人家打死的话，那么你这个新人大公社也可以一棍子打死，为什么呢？因为你也贴了大字报，是不是？你要打死他，你自己不也一棍子打死了吗？允许他们改，他们认识不清，认识不够，批评他们，帮助他们。我刚才说了他们攻击康老是与这个组织不纯有关系。应从这儿吸取教训，清理自己的队伍，但是清理，我不赞成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都开除了。很坏的人那是要开除的，有些一般的错误留在红卫兵里察看，留队察看嘛，我看可以。你们也订几条纪律，什么错误要开除，什么错误要察看，什么错误要警告，是不是？有什么错误一下子就不行了，要想点办法，你们总部是不是想点办法，所以三红这个问题应该历史地来看，一方面要严肃地批判他的政治错误，一方面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同时应看到这个组织整个来说，在攻击康老以前的大方向是对的。有人说他执行了陶铸的路线，我说这说法是不对的，是过分的，陶铸的问题不能要求他们很早就看得那么清楚。我们自己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哪个认识都有个过程，你们认识得那么清楚我才不相信呢？当然，上次有个铁杆保皇叫吴莲嘉给我讲了个真实思想，她说我当时是主张揪陶铸的，我揪陶铸是为了反对三红的。她说他有这个不纯的动机，有这个错误的动机，三红说他是歪打正着，那么她打对了，你还……她并不认识到，象后来的认识，但是也反了，那么这是一些人的，象多数人是认识不清的，恐怕也没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不能要求他们。可以这样说，对陶铸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受了些影响，犯了些错误。但是不是执行陶铸路线，我这个意见对三红的看法，对新人大公社的看法，这些意见都是我自己的意见，仅供你讨论时参考。总的说来是希望你们内部开展整风。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开门的话就开门整风。学习主席的文件，学主席著作，学习中央文革，学习“鲁迅兵团”整风的榜样，先搞他一个礼拜，十天的整风；经过整风，你们两个主要的革命组织，因为新人大公社我没一个一个看，时间有关系，材料很多，我觉得人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还有人大红旗这些组织，我们看过，研究过，研究过他们是不是保皇组织，保守组织。我觉得他们造反以来，他们当然有错误，也有宗派情绪，还有些人想把三红一棒子打死，那么这个组织整个来说，这个组织他们整个活动力还不是什么保皇的活动，我们认为这些组织还是革命组织。但是这些组织，他们以前参加过的组织象“八·一八”“赤卫队”我不认为是革命的，他们造反出来，出来造反，另行成立组织，这些组织从他们工作来看，还不能认为和过去组织一样是造反组织、革命组织，人大三红你们可以和他们并肩作战。我希望你们经过整风，你们这些主要组织都能联合起来，如果上面联合不起来，你们底下自己联合，你们就学习贵阳棉纺厂的办法。贵阳棉纺厂上面联合不起来，他们底下车间联合起来，车间几个主要革命组织自己联合起来。要是如果他们总部不联合的话，我们不听你的命令，我们自己听自己的命令，听毛主席的命令。我提倡你们在系里面，班里面先搞联合，经过整风，先搞联合，如果总部能联合就联合，不能联合你们底下就联合，只有联合起来，你们才有力量。联合起来，还会有矛盾的。联合起来就没有矛盾了？还会有争吵的。但这个争吵，这个矛盾，要严格按着毛主席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方针，按照十六条的方针来解决，不能把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解决，要有团结的愿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联合还会有斗争，因为这个联合是在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联合，因此有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还会有斗争，这些斗争只要不是敌我矛盾，那就应以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用同志式的态度来解决。这样可以把自己的力量捏成一个拳头来对付敌人。捏成拳头，才能对付敌人，这样怎么能对付敌人呢？我看郭影秋和孙泱这些人却捏成一个拳头的，可是你们原来没有认识清楚，是散着，一个拳头散着，怎么能打倒敌人？所以孙泱敢于同你们那样嚣张，敢于跟你们说：“你们没有资格弄清这个问题。”“我有权力不回答你们这个问题。”甚至说中央文革小组对他有了解。是的，我们对他是有了解的，我们了解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鼓掌）但他说的这个了解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拿中央文革小组有了解来压你们，你们懂得他的意思吗？（下面：懂！）你们看看那个记录吧，可以公布出来！同志们，人家没有睡觉，而我们却把他们放在一边，打内战，内战是需要经常打打的，但这样打我不赞成，不符合毛主席的方针，不符合十六条，就是不符合党中央的方针，这是又一条建议了，你们内部整风。第二条，你们搞联合，联合搞不起来，你们底下搞联合，那么实在底下联合也搞不起来怎么办呢？那么我希望你们一点：就是你们同心一致对外，在对外斗争当中，对孙泱、胡锡奎、郭影秋的斗争中你们要枪口一致。我刚才说了，实在联合不起来，你们不能勉强吧，也不能强迫这个事情嘛！强拧的瓜不甜嘛！你们自己不联合，我们又不能强迫嘛！你们就同心不协力，协力不同心，不是同心，刚才说错了，力量要在一起，不一定同心嘛！因为联合不起来，当然不能同心了，不能同心就协力，我刚才说错了，配合，互相配合进行战斗，尽管你有你的想法，他有他的想法，那么，把这个力量要集中起来，但最好是联合，联合不起来，那么你们就协同作战。你们开联合会议，象今天我召集的那个你们各个方面有八个人那样的代表的联席会议，来协同作战，来商量作战方案。你们的作战任务多得很，全校有这么三个代表人物，各个系里还有，斗争任务是很艰巨的。在这个重大的斗争面前，你们协作起来，实在联合不了，你们就协作，这是第二个建议：联合。

第三个建议，就是：你们这个共同对敌，刚才我说了，就是整风以后，你们学校的主要斗争锋芒，应该对准你们学校里的这三个代表人物，这三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人物，各系里面有系里的斗争任务，全校有全校的斗争任务，把这个任务进行到底。那么这个斗争的面呢？要小。不要学刘邓的办法，那个刘邓路线呀，他有一个很大的流毒，就是他要打倒一切，否定一切，凡是教员，凡是什么系主任，系级以上的干部，都要打倒，都要搞到一起劳动，这不是毛主席的方针。毛主席从来就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那只是一小撮，你象那历史系恐怕就是胡华以及赞成积极和他一起搞活动的一小撮，而不是历史系所有的那些讲师，那些人什么都要打倒的，不是的，他们有的是革命同志，多数是革命同志，有的是朋友，是可以搞统一战线的，那个少数人才是要打倒的，极少数人，才是要打倒的，不要把斗争面搞得很大，因为没有那么多敌人，哪这么多敌人呢？只是一小撮嘛！这点我希望，在对敌斗争中，要注意这两个问题，是搞一小撮，是搞一大片，这是刘邓路线与毛主席路线的根本区别，你们如果把不应做为敌人的人斗争了，当然，如果人家斗错了，被斗的人不应该计较这些，如果我们把许多不是敌人的人搞到敌人那儿去，那不是壮大敌人的力量了吗？我们要搞一小撮，多数人是好的，比较好的，就是你们学校有一个时期也受了刘邓路线的影响，就是党团员都是不好的，这个观点也是根本错误的，绝大多数党团员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一小撮，少数人。这个问题，我记得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也是在这个时候，我见过一批学生，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说他们班党团员都是不好的，我说我坚定地相信，大多数党团员是好的。他说这不行，现在他们没站出来。我说，我相信他们终究会站起来的。你们人大情况我不很清楚，但是我相信你们这里的大多数党团员也是能够站起来的。打倒一切党团员，甚至说多数都是不好的，这不是毛主席的观点，这是刘、邓路线的观点，所以有的积极分子，有些党团员，过去犯了错误，犯了保的错误，保了一下子谁，这是不对的，但

是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而且我们应当看到，他开始做为一个党团员，他过去受了一些他们错误的影响，有些人开初一段保了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他们这样做是有一定原因的，他们改正错误，你就要欢迎，赵桂林是不是党员？是个党员吧？我看他给党委写过一封信，党支部书记嘛，承认错误，但他造反你们怎么不允许他呢？他在武汉就是造反的嘛！造了反以后，你又把他描画得一塌糊涂，象个逃兵一样的。在武汉造反他还是有缺点错误的，但他是造了反的，还是造反派嘛！怎么不允许人家革命呢？象赵桂林这样的学员，只要不坚持错误，他现在还有些错误，有宗派情绪，只要能够改正错误，就相信他还是可以做一个好党员的。你们其他党团员有错误，再大就大不过赵桂林了，也许有人比赵桂林还大的，把他做为一个标兵。他写了一封信，很多人还没有写信呢，怎么能变得那么坏了呢？你们党团员也应该挺起腰杆来，参加战斗，不要感到灰溜溜的，错误的是刘、邓路线，不是你们。你们有自己的错误，但你们的错误跟他们的错误是有原则的不同的，大家不要忘记，铁锅是铁做的，老百姓讲话，锅是铁做的，你去问哪个农民，他们都知道这个，锅是铁做的，这就是农民的一个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就是要从发展过程来看问题。人总是有认识过程的嘛。你比如刘、邓路线来说，你们也许有少数是很敏锐的，但是多数人过去对刘、邓路线是不是对刘、邓路线认识得那么清楚呢？我看不见得吧？《论共产党员修养》是不是有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来读呢？长期以来，恐怕是这样的。对刘、邓路线，对那个郭影秋、那个孙泱，你就认识得那么清楚吗？你们三红的积极分子，是不是过去也认识得那么清楚？你有过认识过程，你也允许别人有个认识过程。你认识早一点，他认识晚一点，但只要他不坚持错误，改正自己，你们就应该欢迎。就象《文汇报》社论里讲的，造反不分先后，这个口号提得非常好！不要把斗争锋芒指向广大党团员，指向一般的党团员，指向一般的教员；而是指向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敌人，指向一小撮反动权威，象胡华，而不要指向一般的学生，一般的干部，一般的教员。我举一个例子，你们这有个肖前，这个人来了没有？没有来是吗？这个人我认识他，他认识关锋，大概是。我不认识他，记不太清楚了，印象淡薄了，我听说他也是什么黑帮，我过去多少看过他一些文章，也听过有些同志给我讲过什么讲话中念到过这个人，我很奇怪，这个人怎么变成黑帮了呢？恐怕这样的黑帮你们在运动里还有不少吧？我想这样的黑帮你们就应当解放了嘛！同志们，我不是给你们翻案，给你们解放黑帮，我解放的是不是黑帮的黑帮！黑帮是不能解放的，黑帮就是右派了，用“右派”这个名词了，肖前怎么是右派呢？我看他不象右派。也许你们有材料，你们拿材料来说服我，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我们一个记者带回来许多材料中，揭孙泱的大字报选编里边有个（二），那里边就有他的名字，这个人是黑帮，怎么还揭发孙泱呢？他比较早的揭发孙泱，比较早的揭发孙泱的打成了黑帮。我看要么孙泱不是个黑帮，要么就是他不是黑帮。但是不是所有的开始写大字报的人都是好的？没有一个坏的？但那终究是少数，开始就参加战斗的，多数是好的，总是比较好的同志，这个肖前应该归于这个多数里边的。象这样的黑帮，你们还有没有啊？（有！）有啊！不是黑帮的黑帮，我看你们应该有勇气把他们解放出来！黑帮那么多的话，右派那么多的话，那右派就高兴了，右派说我不孤单啊！这么多人哪！他一小撮怎么不孤单呢？那么一小撮，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怎么不孤单呢？你把不是他的人搞到他那儿去了，这些问题倒是你们人大三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人大红旗，你们倒是应该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是黑帮，没有打倒，象孙泱这样的，那这点还好，我今天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不是要搞三结合吗？你们那一派要和他结合呢？我就是带有点不是那么诚恳的，我问一下，结果还好，你们两派都说我们不想和他结合，这点我还比较满意，所以我认为还都是革命组织，都不想和他结合，怎么能说他不是革命组织呢？所以我觉得很可爱嘛！都不想和黑帮结合，都不想和孙泱结合。你们黑帮没打倒，孙泱呆在那里还很嚣张。不是黑帮的很多人你们给搞成黑帮，不但没有解放，这些事情都不管，专门打内战，打了好几个月，所以我说你们应该整风了。整风也是打内战，但这个内战是按着毛主席的方针来打的，不是按照相当一些同志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来打的。打内战有的打法是按照小资产阶级方针

来打，还是按无产阶级方针来打，是不同的。你们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有泛滥，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你们给别人戴了那么多帽子，你们自己也应该拣几顶戴一戴，这样才能有一定的进步，那个鲁迅兵团，人家就戴了几顶帽子，但不是戴帽子的问题了，要有正确的认识了。你光戴帽子，你不认识了也不行。不要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不要把矛头对准一般的学生，一般的教员，一般党团员。要对准那两个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权威。这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这是我们运动的重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干什么事情，重点是干这件事情。主要矛盾就是这个，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你们学校的各种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象那个牵牛鼻子嘛，牵牛尾巴，牵牛腿，这个牛是不动的，拉着牛鼻子，它就乖乖地跟你走了。这叫解决主要矛盾，你们现在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斗争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权威，而不是其他，这个矛盾解决了，把这个矛盾突出了，其他矛盾就好解决了，矛盾是不能调和的，我不是在这里面搞调和，不抹稀泥，说他们好，你们也好，但是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来解决其他矛盾。毛主席说主要矛盾，还有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有两个方面，有一个主导方面，主要方面。主要方面是哪一方面？同志们，你们搞哲学的不是有很多学生老师吗？你们解决一下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你们不是有这么多哲学家吗？你们这个答不出来？主要矛盾方面就是敌我矛盾，是我们自己。用什么方法来解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呢？就是整风嘛！是不是你们自己呀？(是！)不是孙泱这方面，我看，在这个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你们自己，你们自己不能捏成一个拳头。我希望你们用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整，我说人民大学的问题，我们那几个记者，我们《红旗》杂志社，不是来几个记者吗？来调查一下，他们觉得有很大的收获，他们觉得很棘手，他说这个东西，他一面调查，一面学习主席著作，他们觉得有很大收获，他们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考察的，他们觉得收获很多，提高很大，我自己也在解决你们的矛盾中提高了很多，我希望你们大家也在解决你们人民大学的矛盾中来提高自己。这里的矛盾很复杂，还有很多渗透性，敌我矛盾还有很多渗透性，你们这两派内部都有渗透，什么渗透呢？就是别人在利用你们的小资产阶级情绪来煽动你们，这点我们那个记者也有不高明的地方，他来了半天，我问孙泱问题究竟怎样呢？他们两派都没有了解，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赶紧回去了解吧。所以他就赶紧回去了解了。一了解，好，问题很多，大吃一惊！我看孙泱对你们有点渗透，在斗争中要么针对这一小撮来解决。这是我的第三个建议，要共同对敌，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掌握的紧啦！斗争大方向要紧紧掌握，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你们前一段掌握的不紧，甚至出了些偏差吧！这斗争大方向本来是很清楚的，毛主席给我们指的很清楚，可你们老是摇摇晃晃，这个方向，这个主要矛盾抓不住，一切各种矛盾都复杂化了，人民大学的问题变成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最复杂的问题。什么道理？就是没有掌握这个大方向，离开了毛主席给我们领的航道。

就这三点建议。第一点希望你们开展整风运动，第二点希望你们团结联合，第三点希望你们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就是要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也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我听说你们这里，我看了很多材料，还有什么打、砸、抢、抓四种现象。人民大学打架最多，一会儿出事一会儿出事，最近两天我们那个班子出了两次，听说你们两次打架，还不止两次了，多得很。在斗争方法，如果说再有条建议的话，斗争方法要注意。打、砸、抢、抓，这不是革命的斗争方法，这是流氓的方法！如果我们的红卫兵战士学习这套流氓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各种矛盾，那是可耻的！你们赞成不赞成这个方法？(不赞成)可是你们都在搞！相当一些人，不是所有的人。相当一部分同志都在搞这种方法，学校的玻璃打得一塌糊涂，桌椅板凳都给破坏了。今后再破坏国家财产的，要赔偿！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这点财产是很不容易的！你们都是工农子弟，很多人大多数人你们要知道劳动的艰苦，创造这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这么多东西这么破坏不感到心疼，你们天大的理由，你破坏国家财产你一点理由都没有！我说你们应该去劳动劳动！将来你们学校的运动搞完如果去劳动，你们知道劳动是非常辛苦，

创造一点儿东西很不容易。我在长辛店工厂做了一年工，给我最大的教育是我要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劳动人民利益工作。他们是很辛苦的。你们抬一抬铁看，死沉死沉的。把那铁抬到钢炉旁边去炼钢，这是很辛苦的，采伐工人从森林里把木头采伐出来，放在底下来，经过多少过程，做一个桌子板凳，非常不容易的，你们却那样破坏，很不应该的。任何人都没有这个理由的！你说什么都没有这个理由的！你到南方去，南方的稻田地是农民在劳动，底下水那么热那么烫，上面太阳晒，非常辛苦的，真是一颗米粒都是不容易的，历尽辛苦的。工人农民给我们创造这么一个学校的，我们就这样破坏，这点你们在整风中要检查！自己要检查，不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解放军的好作风，不是革命的好作风！南泥湾的作风是这样的吗？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无政府主义，当然打、砸、抢、抄，也不完全都是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疯狂性的，也还有个阶级敌人破坏，我就想会有阶级敌人进行破坏的。那么多学校，不仅是你们人大了，破坏得那么厉害，我想是会有阶级敌人在里边活动，还有一小撮地、富、反、坏、右，还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执行者在里边搞的，利用你们的无政府主义。他们自己破坏不多，还利用你们无政府主义的疯狂性，还打人，都是同学，你们被打的人我一个个看了，一个一个了解了，绝大多数都是同学嘛！随便抓人，随便打人，随便砸东西，随便抢东西，都是不对的。人大的革命同志经过整风以后要建立革命的秩序！所以干这些事情都是少数人，你们大多数都是不同意的，以后谁干的要追查，谁再要破坏国家财产就抓起来！这是斗争方法。一个斗争方法要注意的，那么就是对敌人的斗争方法。毛主席也经常教导我们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文化革命小组一开始看见北京市大学里面出现的这种武斗现象，我们就给中央提过建议，反对这种现象。打人抓人那还有武斗现象，我们一开始就反对的。而林彪同志在很早九月十五号就讲过这个问题。八月底开始成风了，九月就讲这个问题了，要坚持文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你们记得吧！但是就是有些人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林彪同志的话，不听文化革命小组的话，就是要搞武斗。我们对敌人都是不主张武斗的，为什么要搞武斗呢？对敌人斗争以后也要提高，比如我们以后对孙泱的斗争，也是要靠理论嘛！批判他，不是要搞什么戴高帽子，什么剪头发，你们这里大概还没有剪头发，剪了？不对嘛！剪头发干什么呢？特别是女同志你给她剪头发干什么呢？就是对阶级敌人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他们罪该万死枪毙嘛！判决嘛！不需要那种方式。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要戴高帽子，弯腰弯得九十度，干什么呢？可以不要这种方法，你们要用高水平的斗争方法，来斗怕他，也不必打他，不要站凳子，你们自己讨论高水平的斗争方法，我看可以创造出来的，这是斗争方法，我看也要作一个问题来提。在阶级斗争中，在解决你们内部矛盾的斗争中要注意斗争方法，第四个建议，大概就是这个建议了。

最后有一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一下，也希望大家去宣传，就是要注意保卫党的和国家的机密问题，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曾经说过，有些人当时在聂元梓大字报前后都有这个论调“内外有别”“注意保密”，用这个来压制革命，因此犯了很多错误，保密有阶级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保密，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保密，不能用保密作借口来压制革命，这点不对，到现在也不对，但是经过这次运动以后，出现这一种现象，就是好多国家机密，随便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随便把一些内部的东西拿出来搞出去，那就是不对的。同志们要严重注意这个问题。我看到一个材料，关于罗瑞卿叛党的一些内部材料，有一个单位把它印了，印成一本，一毛钱一本。印度大使馆用三毛钱买了三本。这些机密都是敌人用几千块钱几万块钱都买不到的，一毛钱就买去了。我问这些同志们还有没有点国家的观念？！民族的观念？！这些事情不要说我们做一个革命的红卫兵了，做一个比较正直的中国人民，不要是什么党派，就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中国人民他也不会干这种事情！但是我们这儿确拿一毛钱把它卖出去了！几千块钱几万块钱买不到的东西，一毛钱卖出去了！现在印东西发展到什么东西都可以印出去，你们这个地方印刷要控制起来！不要随便印东西！要经过你们革命派来审查的。哪些东西印，哪些东西不印。还有的很不严肃的现象，把我们党的领袖的诗词和内部讲话随便

地印出去，有的还是假造的，就印出去，还出了很厚很厚的集子，毛主席的集子，没有发表的文章讲话就出版了。

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他的东西没有经过他本人审查，怎么能随便印呢？没有经过他本人看过你怎么能印呢？这个做法很不好，很不严肃。很多不是毛主席写的诗词，却搞成毛主席写的诗词，大量印刷，你们人大也有份，也有你们人大印的。还有随便制造流言，谣言，谣言满天飞，什么“越南发生政变了”，什么“朝鲜发生政变”，这都是阶级敌人散布的东西，我们也到处散布，散布出去以后，弄了很多麻烦，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一种自由主义思潮，没有纪律，毛主席和我们说：你们要保守国家机密，不要给修正主义利用。但我们同志把这个指示丢在脑后，根本不管，根本不理这套，自己干自己的，不顾党的纪律，这种现象不能允许。一切革命同志，一切红卫兵同志都要注意保守国家机密，保守党的机密，今天因为时间晚了，我就讲这些了，我的意见有很多是不对的，同志们可以批评，可以写信批评我。意见对的，希望你们参考，在今后斗争当中注意，完了。

有一个条子问你们的三结合问题怎么办？我们讲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什么大都结合，不是结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三结合。你们学校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很好地深入地进行。我想在斗争里对有些人再进行考查，然后确定，再结合。

566. 陈伯达、康生谈萧华 (1967年3月3日晚)

三月三日晚，中央军委办公室在人大会堂召开总政部门干部会。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叶剑英、聂荣臻、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叶群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萧华同志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作了诚恳的沉痛的检查。

陈伯达同志讲话指出：萧华同志从一个红小鬼到现在总政主任，一直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自培养下，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四十来年的斗争中，一直站在毛主席一边。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坚持毛主席路线，反对彭德怀、王明的路线，在东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支持林副主席，反对彭真。解放后，历次运动都起了积极作用。在反对饶漱石、高岗、彭德怀、黄克诚等斗争中，都站在第一线，尤其在与彭、罗、陆、杨的斗争中，是很坚定的。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也是坚定站在毛主席一边的。由于长期有病，直到八月十日才回来，在一段时间内犯了些错误。但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康生同志说：萧华同志在与罗瑞卿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在去年四月和五月都与彭真作过坚决斗争。五月十六日中央发的通知，肖华同志坚决要把彭真的名从红纸上去掉。

567. 周恩来在军委召开的总政机关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3日)

同志们：好久没有见了(鼓掌)。我应该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问你们好！(热烈鼓掌，口号)

同志们！我同意刚才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对萧华同志的错误检讨的估计，确实萧华同志刚才的检讨是诚恳的，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们要求，领导同志作检讨，应该实事求是，合乎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自己今天所认识到的错误，给大家很诚恳的说出来。不仅是而且首先教育自己“鞭策自己”，同时，也可以帮助大家弄清、认识清楚一个问题。刚才萧华同志所检查的错误，只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运动中一小段时间的错误，可是为什么一小段时间错误，竟会引起这样轩然大波？几乎影响到我们解放军的许多方面，许多地方。对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作政治工作的同志，好好的深刻的想一

想。因为我们作的政治工作，一个领导同志在一小段时间内犯了一个错误，为什么要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据我看恐怕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有很多的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个错误的真相，自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听了一点传说，起来参加这个斗争，这个批判，这个揭露，有时候受一种说法蒙蔽，误听了一种传说，这样子参加进来的。

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把这个问题，就是对萧华同志刚才检讨的这个错误，看得很大，用放大镜子看，没有用全面看一个领导同志的整个历史。而确实有很多的同志，并不知道肖华同志三十多年来，近四十年了，所走过的漫长的一条革命历史的过程，这样子因小掉大的，只看眼前的一点，没有看到全部的历史。据我想恐怕这样的同志还不少，听说这样的人是很多的。

还有第三方面，可以说是最主要的方面，是有那么很少数的人别有用心，故意要利用这个问题，挑起一个大波浪，来把我们的解放军，首先把我们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抹黑，你看看，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都是这个样子么，那政治工作就受影响了么。这样就影响解放军。这样，这一小撮的人，实际上就把这一个错误挑起来，实际上是反对解放军，反对我们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加以分析。而这种人最少数，是极少数，现在大(多)数人心里是透亮的。

现在，我们分析的时候，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发现这后一种人，这就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亲自发起、指挥、指导的。亲手制定十六条，亲自批准宣布聂元梓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号召全国，首先是青年学生，以后工人、农民。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对于各方面说，都是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不仅我们跟毛主席走的人，广大的劳动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是跟着这样一个毛主席指示的革命潮流往前进的。就是那些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外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或者暗藏的一些特务、反革命分子，甚至于制定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没有料到这次运动有这样大的威力。可是运动已经起来了。在学校中，首先是中学的红卫兵，冲向了社会，从北京冲向了全国，从城市冲到了农村。这样一起来以后，我们跟随毛主席的人，全世界革命的人民，是高兴得很，而反对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怕得很。在这个当中，中国的革命群众可以敢这么做，毛主席所以能这么领导起来，当然因为有我们伟大的，英明的，有远见的领袖在。同时也是因为有我们的几万万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当中还有一个力量，就是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烈鼓掌)没有这个力量的保护，不可能设想我国能发动这样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那一个敢于这样开展“四大”、“五大”一直到大串连。所以，凡是敌视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他一定要来破坏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敌人懂得，反对的方面懂得，怎样来集(中)目标，打击我们最有保证的人民解放军。这些人就企图抓住人民解放军的一点小小黑点点，一些人的个别错误，或者一段时间的错误，把它夸大，这样，这个事就出现了。

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个高潮正蓬勃地高涨的时候，十月十一日正是两条路线斗争激烈的时候，红卫兵向全国大串连，正是有无穷威力的时候，毛主席、林副主席决定，我们解放军内的军事院校，文艺团体、体院、工厂，都可以出来进行串连的时候，这个时候制造那么一个事件，就是说，要在我们伟大领袖和副帅接见了红卫兵以后，开一系列的群众大会，激励我们的军队的年青人，没有多少经验的青年同志们，激励他们把斗争的矛头转错方向。就在那两次群众大会以后，斗争的矛头就转向国防部的大楼嘛，三座门嘛，三个总部嘛，各个军兵种嘛。然后转向各大军区嘛，省军区嘛。到现在的统计，差不多将近二十个单位，都是我们部队内部，把自己矛头对着自己的，你们想一想，如果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那么解放军自己都忙不过来了，那怎么能够抽出领导的力量，来保卫我们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呢？所以十一月以后，十一月、十二月、一月，这个时候最紧急的时期。那个时候，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看到这样一个形势，所以站出来，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些老同志，尽管他们说错了一些话，那也要保护。就在这当中，有的人利用我们同志们内部的自己批评，加以歪曲，发造谣的传单，飞向全国。就这样把萧华同志这个问题影响到各军种、兵种、三个总部，以至到全国各大军区，这不是一种偶然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我接触过很多部队的同志，来问我类似的问题，我看出了这个问题，这里头有原因，是有人在后头挑拨。我看现在大家冷静下来了，特别我们政治部的同志，应该更加冷静下来，你们会慢慢懂得，将来还会更多的懂得，这就是有人要把我们解放军搞乱。当然正如康生同志刚才说的，这是不可能的，这种阴谋是不能得逞的。(热烈鼓掌)

正在这个时候，不仅中央文革站出来说话，而且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林彪同志，马上抓住这个问题，颁发了几个决定。一月二十三号的决定，是用中央、国务院、军委、文革小组的名义颁发的，是指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要站出来支持各地方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鼓掌)，一月二十八日发布军委八条命令，接着又有七项规定也是军委的(鼓掌)。又接着二月十六号关于夺权的四项指示(鼓掌)。这四个文件，还加一个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那十二条决定。这五个文件一发表，对我们全军来说，清楚了。我只举一个例子，闹得最凶的地方之一新疆，那个地方不仅有军区，也同样有院校，有文艺团体，有工厂，有医院，而且有一百五十万人的一个生产建设兵团，也闹起来了。而新疆自治区党委、军区、生产兵团负责人都在北京，我们远隔万里，但只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军委命令一到，我们强大的军队，人民都一致拥护。(热烈鼓掌呼口号)你们想一想，这是我们主席崇高的威信，我们林副主席英明果断的领导，问题解决了。所以这样的五个文件对全国来说，对全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包含你们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来说，使一场风波平息下来了。今天不是大家欢欣鼓舞对萧华同志的检讨，给予热烈的鼓掌声了嘛？如果在两个月前是什么样子？就是因为一小部分人在那里挑拨，现在给我们识破了。他们就是要把我们解放军队伍搞乱，这样来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破坏我们伟大领袖的威信，但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得逞的。因为我们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对我们的领袖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仰，相信只要主席一出来说话，中央文件一发表，军委文件一发表，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值得提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对这些文件是作了很大贡献的。(鼓掌)

既然是一小撮人的挑动，不能成事，那么我谈第二个原因。错误究竟是错误，我们并不因为有人挑拨，我们就文过饰非，那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三十多年的老战士，萧华同志不会这样子，所以他今天站出来，诚恳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就是他刚才说的，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没有把无产阶级世界观巩固起来，在这个中间产生了动摇。当然这是一个时候的错误，从他整个历史来看，刚才说了，是光荣的。但这种错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如刚才康生同志所说的，我们大家都是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斗争中学斗争，史无前例，没有经验，要靠摸索前进，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比如说拿十月、十一月两次体育场的接见来说，我也是不自觉的，一个电话一打，我也跑去参加了一下，恐怕在座的同志也看到，我巡视一番就走了。你没有弄清什么会议，你为什么出席？不像今天的会议作了这么多的准备。可见人的疏忽常常是难免的。当然我巡视一番就离场而走，也没有讲话，没有犯直接错误。但你总是间接支持了。如果年青的小将们贴我一张大字报，说你为什么要跑去？那没有道理呀！他可以问我，我也是准备他问我的。如果他问我，我就说我这是个疏忽。可是你们这样一个负责人，你不应该这样疏忽嘛，应该很认真嘛。他说这句话，就可以问倒我，我还得向他们承认错误。(笑声鼓掌)这说明人是容易不经心的时候被人家挑动的，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不要因为自己老了有经验，老马识途，老马有时也会不识途的，走错路的。萧华同志这个错误，当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我是拿这个作比喻，人人都要引起警惕。

萧华同志是个红小鬼，参加红军的兴国老(江西话：兴国老表)，到现在是三十七、八年了，一个人总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我跟萧华同志认识拿在座的同志说，跟聂荣臻同志差不多，

当他很年青的时候当青年干事就认识他，一直到他成长，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的培养教育下，由青年干事一级一级的上来的，内战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作过贡献。在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反对反党集团斗争是积极的，特别是最后，反对彭、罗、陆、杨，反对刘邓反动路线，这些斗争是同志们记得很清楚的。萧华同志，如果说缺点的话，他很热情，会有时轻率一些。热情的方面我可以作证明嘛！不管他写的长征组诗，有的革命的文学家有所批评，革命的音乐学家觉得不够味，但是，拿我这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的长征组歌，我几乎能背能唱，而且我唱起来，不仅是欣赏而已，我是有感情，回忆到长征，歌颂我们伟大领袖，入云南的那一段，今天在座恐怕有同志会给我作证明，“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句，那是得意之笔。萧华同志，在入云南那一首诗里，是把它描画出来了，这是要有真情实感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尽管他不是诗人，他在养病当中，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就这一点，是有充沛的革命感情的。(热烈鼓掌)大概因为前几个月萧华同志这一件事出来，连长征组歌有些人都不唱了，我还是唱的。因为这是代表一个时代。当然人都是有缺点的，萧华同志应该从这次教训中更虚心，更多地学习，要勤勤恳恳地做毛主席的好学生，跟着林副主席学。因为萧华同志有很多有利条件，刚才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应该学得更好，这是我们大家期望他的。因为他今天领导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而我们全国的劳动人民都学解放军。如果政治工作象过去这两个月都瘫痪下去，我们大家都不安。所以萧华同志这一次检讨，我们在座的同志，总政治部的同志，我们应该兴奋起来，大家负起责任来，要把作为我们全军生命线的政治工作做的更好，更出色。(热烈鼓掌)

第三个原因，我想这种人就更多了，因为是受蒙蔽，激于一时的义愤，出于一时的好心，觉得我是在闹革命，要把一切旧东西砸烂。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砸”字也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不是真的提倡去砸呀！打呀！抢呀！现在“三个字”的口号，可是不佳，叫做打、砸、抢，还有三个字叫抄、抓、揪。我看这六个字，我们都不要提倡，还是西安工人说得很对，他说：你打，打的是阶级兄弟、革命同学，你砸，砸的是国家财产，你抢，抢的是人民的东西。(鼓掌)现在居然有一种人，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我看西安的革命工人同志回答得最好，就是要反对打、砸、抢。

随便抄家也不行呀，肖华同志的家，就那么一股妖风，把他抄了么！抄总政治部主任的家，可以不经过我们军委任何常委的同志知道，连阻拦也阻拦不住。

还有，揪人的事，把人揪去十多天，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前天我同我们国务院各院的造反派谈，有些副部长，揪去四十多天，我就不知道他在那里，找都找不到。军委的八项命令规定，这是不许可的，所以激于义愤是一回事，但激于义愤不能超过范围。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要怎么搞就怎么搞，完全不要领导，这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民主。毛主席说得很清楚，有民主，还有集中，有自由，还有纪律，毛主席语录上讲得很清楚，这里就不重复了。那些受蒙蔽的，出于好意的同志，是可以谅解的，而且，他们大都是年青的同志，象院校的同学，文艺团体的一些青年人，医院的医生、护士、工勤人员，工厂的工人，他们不明白全部的真相，激于一时的义愤，受了一时的宣传，但是，对他们是可以解释得通的。陈伯达同志就做出了一个例子。三座门被包围了六、七天，硬是不走，伯达同志，单人匹马一个人去了，一讲就通了，有些人不是不可以说服的。许多看不得的大字报，也就是说不是高水平的，象资产阶级贴的海报那样水平的大字报，陈伯达同志要求大家帮助，把它盖掉，很快就盖掉了。最近还有一些不应该出的漫画，什么群丑图啦，罚跪啦，这样的照片，登在小报上，马上就传到了世界各国，丑化了我们的党和国家。这也是不应该，不允许的。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思想革命是高姿态的，是向前进的，有些人要把我们拖向后退，我们就是要向这些人讲话，特别是那些青年的小将们，既不明真相，只凭着一时的热情，我们应该向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去责备他们。如果要责备，就责备我们老一辈，因为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够，解释不够。你们是做政治工作的，应该要求通过你们去向他们做解释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说服工作。(鼓掌)

这样，我们把这三个原因作了分析，那么，我们解放军，毕竟还是解放军，我们政治工作者，毕竟还是政治工作者，我们能够继续担当起面临着的全面的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夺权斗争的阶段的任务。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一点小的波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并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么一次教训，对于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对于你们大家，对于我个人，都很有益处。把任何一件事情作为教训来看，作为经验总结来看，就会成为一种动力，推动我们前进。这样我们就会把工作比以前做得更好，证明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确实是有无穷威力的。确实是我们伟大领袖亲自缔造的，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伟大的、英勇的军队。(热烈鼓掌、呼口号)

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是我们伟大领袖在古田会议所指出的，是军队的灵魂，是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检讨会以合，会使我们全军的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做得比以前更好更加有力量。

568.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时的谈话记录整理 (1967年3月3日凌晨 人大会堂西会议室)

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穆欣

一、关于如何对待人民解放军

康生：南京有冲军区的没有？(代表：八一医院发生过)你们要和他们(指八一医院)斗争，要反对，到处贴他们的大字报。

当前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是一个标志。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部队，是林副主席在那里亲自领导的。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有力工具。要夺好权、掌好权、主要靠你们，但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解放军。一定要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依靠解放军。不管什么理由，在当前情况下，冲击解放军就是反革命行为。要坚决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这是主席批准的，主席签字的。

军队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是正确的，但不能支持一派、打击另一派，要支持所有的革命派……不然的话，就会卷入他们的宗派斗争中去了。

二、关于“亮相”

康生：“亮相”好象是说化了妆出来唱戏，下了妆后还是原样，这不叫“亮相”。要有革命行动，要真正出来革命才行。

态度要鲜明。提倡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必须鲜明，不能折中。“亮相”不是为了保乌纱帽。

关锋：“亮相”就是公开站出来揭发问题。

王力：“亮相”必须有鲜明的旗帜，真正站出来和群众一道揭发他们是怎样搞阴谋的，怎样镇压群众的，并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然后跟群众一起闹革命。“亮相”这个词是可以借用的，但要作科学的解释，不能作庸俗的理解。领导干部要到群众中去“亮相”才能算数，才能看得出来(是真是假)。

三、关于“三结合”

康生：根据《红旗》四期社论，对老干部要全面的看，要从他们的整个历史，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来全面的分析。在一定时期，对他们加以保护是一回事，把他们作为革命领导干部，搞“三结合”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三结合”是指革命的“三结合”，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三结合”。

叫江渭清来北京，是要开导他，承认错误，很好的检查。中央并未对他说“三结合”。

伯达：你们可以考虑一下，那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可以作为“三结合”的核心人物，这要从实际行动中考察。只要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差一点(指能力)也可以。那么多干部总会

有的。大致上是不错的，旗帜是鲜明的，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就可以。有的是要争取团结他们，但不能作为“三结合”的核心。

关锋：请他们挂帅，作领导核心，跟争取团结他们是两回事。

四、关于江苏省委

王力：江苏省委干了些什么事，要充分揭发。对于江渭清，单凭江苏饭店“一三”事件，就应该打倒。江苏省委已经搞到顶点了，够严重的了，应该彻底揭露江苏省委，合二而一不能解决问题。江渭清好？还是高哨平好（代表：没有多大区别……江渭清更坏。）你们要冷静考虑，不要感情用事。根本的界限是看他站在那一边。

关锋：李世英、陈光，你们不起来揭发江渭清、彭冲在过去干的那些坏事，凭什么搞“三结合”？！

康生：我有两句话。一句是杜方平说：“至今还看不见省委有什么革命裂痕（裂痕是指路线上、原则上的分歧）”。另一句是张建山说的：“直到现在还看不到省委有什么革命行动”。（王力：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央文革还是敌对的！）建议你们省委听听他们的意见，拿这两句话，很好地检查自己的行动。

以江渭清为首的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事？反对了什么？……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挺身而出，坚定的站在主席一边，反对刘、邓路线，和革命同志一起将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革命的组织“打”你们，不是为了把你们打成右派，而是要打成左派。自己要争作“三结合”的对象，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的成员。我们对这些同志寄予希望，但自己也要创造条件。李世英、包厚昌参加了生产委员会，你们不要以为有人支持，就有资本了，已经“亮相”了。参加生产委员会，并不等于在原则上（和错误路线）分裂。希望省委挺身而出。旗帜鲜明。

五、关于宣传工作

康生：你们要把宣传工作好好检查一下，从你们的报纸上看，你们的宣传工作不太好。……“马路新闻”不要相信。……你们在北京住了这么多天，好的东西要学，不好的东西不要带回去，比如有个“百丑图”你们不要搞那个，那是自己给自己抹黑。本来他们是一小撮分散的，被群众包围着的，你们把他们集中到了一起，本来他们没有组织起来，你们却把他们组织起来了。结果群众一看，呵，这么多！而且很快传到香港登了报，两三天就又到了莫斯科。大高帽子、挂黑牌子……，你们要说服群众，不要这么搞。毛主席说造反有理嘛！这么干说明你们没理可说了。还有“砸烂×××的狗头”，陈伯达同志说要把这个“砸”字砸碎。骂人不等于战斗。比如说：“×××混蛋”，这能增加他们攻击我们的资本。我们的讲话，你们不要出大字报，不要登报纸。

关锋：报纸必须成为无产阶级的报纸，不能成为一个集团的，不能成为“集体所有制”。

六、关于几个口号

康生：昆明提出“左派内部必须大乱”，西安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你们那里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所有这些，都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为中心提出来的。中央的精神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目前的大方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口号，内部互相打，放松了敌人，这才是真的形“左”实右，要坚决反对！

“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哪里有革命的？是反革命的行动。（王力：是流氓、土匪的行为！）

一九四九年我们解放上海、南京时，工人还组织起来护厂，而现在都要砸？！

关锋：“江苏的天下是‘红总’的天下”的口号，是宗派主义的口号。江苏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天下，是江苏人民的天下。

七、关于“私心杂念”、“内部整风”

康生：你们到北京来，总理接见了几次，不要回去就写大字报说总理接见了我们几次，

用来压对方。这样做是借人抬高自己，实际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

主席著作、中央文件、人民日报和《红旗》社论以及报纸上的好文章，要好好地学。我看你们学的不够，天天闹闹嚷嚷。你们主动检查自己好，人家报纸上有错误，你们报纸上有没有？人家有那些缺点，我们有没有？人家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看自己有没有？你看人家夺权委员会中有几个成员不大好，可不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组织内部纯不纯，是否也有不大好的？共产党内还有彭、陆、罗、杨，我们不相信一个群众组织内就没有。敌人不但在外部反对我们，也会钻进我们的内部来反对我们。思想上的整风很重要，组织上的纯洁性也很重要。我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破私立公，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反对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同时我们脑子里也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也有敌人，也必须反对它。

八、关于反动、保守组织

康生：赤卫队要充分揭露，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坏人总是一小撮，多数人是可以争取的。

关锋：要把群众和核心领导人分开，多数人是可以争取、团结、教育的。

569. 李富春给全总四个组织的信

(1967年3月3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旗公社、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国际红旗”公社、革命的同志们：

看了你们二月二十八日的信和《红旗》第一期，我和康生同志有下列意见向你们建议：

(一)刘宁一同志，中央认为不是“三反分子”。因此，你们的《红旗》第一期材料不能公开散发。

(二)你们不能把马纯古等人所谓揭露刘宁一同志的材料，作为你们的材料，来揭露刘宁一。

(三)希望你们好好学习《红旗》杂志四期社论，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等重要文章，来提高政策水平。

(四)你们的报刊不要用《红旗》的名义，以免与中央的《红旗》杂志混淆起来。等待你们把文件学完后再找你们。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敬礼！

富春 三月三日

570. 李先念给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的信

(1967年3月3日)

吴波同志：

要不断工作，既要做造反派的工作，也要做没有参加造反派同志的工作，解除误会。并且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和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团结起来。

对革命群众，对革命干部，不管说了多少过头的话，决不能打击报复。谁有这个念头，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对革命干部，虽然犯了一些错误，只要愿意改正，要求同志们欢迎他们，同时要他们挺身而出抓工作，这也是对革命干部的考验。

对一些出身不好的革命同志，要看他们一贯政治思想表现，要鼓励他们放下包袱投入到阶级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我们党对革命队伍从来是重视人们的阶级成份、阶级出身的，

同时也反对“唯成分论”。

那天反映说：我在讲话中，没有讲没有参加造反派的同志中也有左派的问题。这个批评完全对。主席说：只要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因此，说明群众的水平比我们高，我接受这个批评。

一切革命造反派不能解散，应当巩固和壮大，并且建议他们掌握大方向，即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逐步实行三结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两个红卫兵会师了，好得很，应当大力支持，并且要求他们永远高举毛泽东伟大红旗，永远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学习，再学习。

先念

三月三日

571. 李富春在煤炭系统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3日)

煤炭工业战线上的革命造反派战友们、同志们：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正在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无产阶级夺权斗争的旗帜，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革命的形势好得很。

煤炭工业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同全国一样，形势好得很。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正在逐步联合起来，向煤炭系统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大决战，把他们所盘踞的阵地一个一个地夺回来，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中，必然取得新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缴械投降。他们必然会使出种种花招，作垂死的挣扎。

从去年下半年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煤炭系统广大革命职工，热烈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生产任务一直完成得比较好。一九六六年全年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今年一月份以来，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破坏，大刮反支革命经济主义黑风，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职工成批离开生产岗位，把矛盾逐级上交，造成今年煤炭生产下降的情况。……

由于煤炭生产情况不好，目前已经影响工农业生产和民用煤的供应。这种情况如不迅速扭转，将给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带来不利的影响。

煤炭生产下降，是当前煤炭工业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的反映。广大的革命职工和无产阶级造反派是关心生产的，是不愿使生产下降的。煤炭生产不好，完全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捣的鬼，是阶级敌人的破坏。为了击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经济主义阴谋诡计，打退他们破坏生产、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新反扑，广大的煤炭工业战线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要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当前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一切革命的同志，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联合，就不可能胜利地完成夺权斗争，就是收回了一些权也还会丧失。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对敌斗争中，在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经济主义中，必须实现大联合，这是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从他们手里夺权的重要条件。要实现大联合，就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队伍，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克服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以及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是资产

阶级世界观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是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主要障碍。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必须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扫除这些障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丢掉一切私心杂念，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一切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才能把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二、按照革命的“三结合”的原则，尽快建立和健全临时权力机构。

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当地驻军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的“三结合”的方针。中央指出，工矿企业的三结合，就要建立一个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有权威的革命领导班子，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和在夺权以后掌握好无产阶级大权，把各项工作抓起来。

建立革命“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必须足够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经过半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同全国其他地方各部门一样，证明煤炭工业系统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钻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是一小撮。犯有错误的干部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党和革命群众教育下，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是可以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的。因此，一定要首先分清敌我，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一定要首先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怀疑一切，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坚决打倒，而对于无产阶级当权派，则应当坚决支持。当革命领导干部起来，同群众一道，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时候，革命群众应当欢迎和支持他们。对犯有错误的干部，也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他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允许他们革命，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对他们，我们一定要实行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

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必须挺身而出，和革命造反派永远站在一起，抓革命促生产。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不要背包袱，更不能因群众批评了自己或者斗争了自己，而有委屈和不满的情绪，就不敢负责，甚至躺倒不干，如果那样就错上加错。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到群众中间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一方面要欢迎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充分认识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认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支持群众的革命精神，反对抓革命群众的小辫子，反对任何打击报复革命群众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努力改正错误，改造自己，积极领导生产，将功补过。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更应在斗争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革自己的命，同时应该在生产工作中，加倍地努力工作，将功赎罪。

我们必须根据《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的精神，正确处理干部问题。吸收革命的领导干部，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把广大的革命群众和各个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有集中领导的，有统一指挥的革命队伍。这样，就可以把革命和生产真正抓起来，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实现革命和生产双胜利。

三、要热烈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狠抓革命，狠促生产。

煤炭是工业的食粮，是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千方百计地增加煤炭的生产，是关系到完成今年国家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我们煤炭系统的全体革命职工，一定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充分认识到增加煤炭生产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不仅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

而且要做促生产的模范和骨干。那些受蒙蔽或受挑唆而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们，希望你们迅速回到生产岗位上来，与革命造反派一起，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造反派职工，对他们应该热情欢迎，不应有所歧视。所有的革命职工，都必须坚守生产岗位，坚持八小时工作时间，遵守劳动纪律，努力完成生产定额，保证多出勤，出满勤，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煤炭生产计划而奋斗。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同志们：过去你们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相信今后也一定会为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成绩。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你们，发扬煤矿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坚决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充分发动群众，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和生产这两副重担都挑起来，用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粉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生产的一切阴谋诡计，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一切革命职工，一切革命干部，广大的革命群众，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下团结起来，狠抓革命，狠促生产，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历史任务，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的煤炭生产任务而在英勇奋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572. 李先念接见《前进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3月3日 中南海)

你们前进报的运动搞得很好嘛！你们搞联合很好，要注意不和牛鬼蛇神联合，不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合。有些人有错误，说了些错误话，甚至说了几句反党的话，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他们检讨就算了。对于反革命的反扑，你们不要让步，让步就不得了。(有人插话：现在报社有一股风，要给××、××这些人平反。)这些人扫一下也没有什么，又没有给他戴反革命帽子，没有打成反革命，平什么反？这些人中甚至就有反革命嘛！对这些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扫一扫，没有什么错。对××这样的人，贴他们几张大字报完全应该。当然，是不是定为反革命，可以研究。

你们对于马路新闻要注意，不要都相信。公安部门工作不依靠广大群众肯定要失败的。地、富、反、坏、右，只要公安部门掌握的就算，不掌握就不算，那还要广大群众干什么？那还不是把群众当成阿斗。

(有人插话：报社有人说刘邓和彭罗陆杨不一样，彭罗陆杨是搞阴谋，刘邓是好心办坏事。)彭罗陆杨是黑帮，是敌我矛盾。对刘邓是有区别的。但刘邓是镇压群众的，不能说他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讲这样话的人不好，应当批评他。

临时党委只剩你们两个(指吴泰如和韩玉福两位同志，吴参加了接见。整理者注)两个人就两个嘛，有没有新生力量？(吴答：有。)如果没有，党委恢复慢一点有什么了不起！

我看《前进报》的同志做了很多好事情，你们的运动很有成绩。批评你们有右倾的人，也可能是(以下几字未记清楚)，当然你们不要批评他们，要保护他们的热情。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伟大的革命，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举。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之迫

切的，非常之必要的。发动了千百万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进攻，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我们身边，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次斗争，清算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邓小平参加的路线错误，他们经常干扰主席路线。把他们的路线批倒批臭，没有了市场，使主席路线真正取得胜利，挖出了修正主义的根子，才使我们的国家可能不走资本主义，不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只有毛主席敢于这样做，敢于这样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了出来。群众无限热爱党中央、毛主席。

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涌现了大批小将，在工人中间，农民中间，知识分子中间，都出现了一批革命接班人，当然，他们在政治上成熟还有个过程，但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大批地涌现出来。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还犯了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七月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八、九月界限还划得不清楚。同志们、同学们批评我是完全对的。最近，《红旗》发表了三、四期社论，恰如其时，如果发表早了，也不是火候。主席、中央文革，每一个火候都掌握得很好。最近，在斗争方法和对待干部方面是出现了一定的缺点的，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啦，似乎凡是干部都有问题。这样，就不能解释主席思想在党内的一条红线。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思想是始终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不然，怎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怎么解释建国后的伟大成绩？也不能解释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正确。广大干部是拥护毛主席，跟着毛主席走的。有些人是跟得不好，我就是跟得不好的一个。主席一点，觉悟了，赶快跟着跑。我过去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中央文革的同志跟主席是跟得好的。一个时期，怀疑一切是不可避免的。斗争方法过火，戴高帽子游街，挂牌子，喷气式飞机，哪个是中央文革提倡的？一开始就反对，要文斗，不要武斗，十六条上就写着，从来没有提倡过。是群众斗争热情，不能泼他们的冷水，要慢慢诱导，也有阶级敌人利用了群众的热情，故意整当权派，什么“湘江风雷”等等，斗人最凶。这方面《前进报》是好的。真正的左派是说理的。

有几股风向我吹来，说金保宇这个人很右，是策略派，就是因为你们不戴高帽，不搞喷气式，这个批评不对。但不要责备人家。当然人家的干劲可能比你们大。“孙大圣队”大闹天宫，我看他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总结经验教训就好，不然就提不高。他们有革命干劲，革命闯劲，我对“八·八”队是支持的。

我问受批评的干部，你们有怨气吗？有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敌人希望你们有怨气，牛鬼蛇神希望你们有怨气，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希望你们有怨气。有怨气，就和群众对立嘛！真正的左派，我们是坚决支持的，哪怕说了多么激烈的话。如果被敌人利用了，就揪敌人，不能怪群众。泼群众的冷水，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要孤立敌人，不要对抗群众。有的干部对《红旗》三、四期社论中对他有利的话拼命讲，这不对。我建议，你们造反派要学社论中干部大多数都是好的这一段；当权派要学保护群众的热情这一段。群众的大方向是对的。

现在有几个问题。总理在工交口的会上说过。一个是，有的部老喊盖子没有揭开。总理批评说，如果没揭开，你这个左派是怎么出现的？出来，就揭开了。说这个话不科学，他的意思就是部长没打成黑帮，党组没有彻底打垮。也可能，有的地方还揭得不透。二是，说司局长、知情人，相互不揭发，司局长不揭部长。总理说，要实事求是，有问题就揭嘛！应该揭，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缺点也要揭，但不是就要打成反党分子嘛！这种说法是没有阶级分析的嘛！以前我讲，司局长要揭部长，也要让他独立思考。同学们批判我这两句话，我讲早了，十一月，现在讲就对了。第三，总理说亮相，叫干部作个检讨，过关，支持你们，就算是亮相了。你们那个亮相，要求太高了嘛！实际是不把主要领导干部打成黑帮没得可亮。

比如吴泰如，那天我说没有保吴泰如的意思，今天我就要讲这句话。总理保我，我保吴泰如。吴泰如刚刚去，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跟你们的感情没有融洽起来，责任在我，也应该批评我。他作了检讨，支持你们，你们相互帮助，相互商量嘛！《前进报》的左

派，每行动一步我都打听一下，是符合政策的，主席思想是学得好的，千万不要骄傲。上海《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篇文章是主席推荐的，我学了两遍。你们作家不少，也可以写嘛！毛主席说贵阳棉纺厂按行政联合的办法很好。

你们的工作成绩很好，我也赞成你们第一步先这样做(指第一步“三结合”计划)。先结合吴泰如、韩玉福、崔岐。韩玉福怕群众，《前进报》的群众有什么可怕的？又不戴高帽子，又不游街。这个人我见过两次，有点耿直味道，说话爽快，大概不会耍阴谋的。

常芝青的问题，康老和我谈过，我们和中央文革有个看法，这个同志错误比较多，你们批评他，斗争他，完全没有错，我支持你们。

他的错误，一段是过去的错误，传达陆定一、吴冷西旧中宣部的黑指示，他添油加醋，有发挥，自己也写了些坏东西，报上也登了些坏文章，如“生意经”。应该批评他。这个同志过去曾表示过不同意吴晗的意见。他也和我讲过，为什么去年四月以前不能在《大公报》展开批判吴晗？他有很严重的错误，因此，你们批判他，做得对，我支持你们。第二部份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当群众起来要揭发批判他时，他怕群众，压制群众，并且怀疑是吴泰如他们挑起来的，这就错了。我在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就知道犯错误了，就好些了，知道执行错误路线了，可是常芝青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还那样搞，在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九日还召开黑会，你们批评斗争得对，我是支持你们的。就是有一条，你们把他当成敌我矛盾。康老让我和你们商量，是不是还可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恐怕还不是三反分子。当时中宣部的指示，他不得不传达，不传达不行嘛！你们是不是按照惩前毖后这段语录对待常芝青，让他老老实实检讨错误，不要认为是整错了他，他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你们请罪。如果他不是老老实实检查，如果他认为你们错了，那就不是现在的性质了，矛盾性质就会改变。刚才我来迟，就是给康老打电话。他的错误是严重的，你们对他的批斗，没有过火的地方。你们对他要做一点工作，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他了，我还是从阿尔巴尼亚回来的时候批评了他。今天我不是做结论，我们的观点摆出来了，和你们商量，你们去讨论。我不是作结论。

我们的部长、司局长想在这个时候捞一根稻草，对造反派挖苦讽刺，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今天我是同你们商量，不要急于做结论，即使你们同意我们的结论，也还要看他的态度。关键是看他的态度，一看二帮。我们也要向他做工作，让他向革命群众请罪，真正触及灵魂，对群众不能对立，这是最起码的条件。这个问题向你们左派提出，工作要慢慢做，做细致，不然群众受不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接受。受不了，也不要紧，也不犯错误。受不了，可以回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今天不仅要保吴泰如，还要保常芝青。

(有人汇报，出版部的几个问题，怎么办？)

改还要等一个时候，你们还有批黑帮呢！搞清楚了没有？那批人不是好人。现在还是先搞革命。常芝青问题，不性急，你们造反总部商量吧。两方面做工作，我们想找他谈一次。吴泰如也可以和他接触。

现在有些人屁股是尖的，就是坐不住，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

财政部的造反派是好的，成绩很大。财经学院“八·八”战斗队在那里是起了好作用的。夺权歪了，是王学明起了坏作用，是王学明导演的。把王学明的信全搜出来了。王学明是个阴谋家，他想一系列的打，从财政部打头打我，一直打到总理头上。杜向光是想投一下机，如果检讨得好，也可以过去。

573. 王力对新华社的指示 (1967年3月3日)

一、宣传正确对待干部问题，不要只是注意团结，忽视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没有亮相的，有错误的，没有检查的求团结没有好处。

二、凡是闹小团体的，不管经验多么好，不组织他们写文章。

三、加强“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导，要把夺权后生产建议方面的成就充分反映出来，要写工人的劳动热情，思想革命化和干劲，也要写崭新的生产面貌，注意第一季度完成计划的单位，要进行报导，春耕生产的报导要压倒一切，要抓好。

四、夺权地区要充分报导，不一定要那么好，看出是个经验就可报导，不要那么严格。没有夺权的地区，一般不报导。

五、“三结合”的经验，要报导得更充分，更细致些，特别是团结大多数的经验。

六、在报导中不提建立新政权，只提临时权力机构；不提巩固新政权，也不要提全面大夺权。

七、各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派出的记者，不介入革命组织的辩论，不能支持一方打击一方，这样作的立即撤回。

八、革命组织内部整风，不作全面报导，开门整风不报导。

574.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代会所属单位小报负责人、各印刷厂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4日)

一、最近北京出版的东西很多，有些出了许多错误，有关罗瑞卿的问题，把军队内部的问题让敌人知道了。外国特务有大量金钱买有关这方面的小册子。日本的情报工作人员受到了表扬。

二、什么“百丑图”、“群丑图”……他们本来一小撮，却被画成浩浩荡荡队伍，这替谁宣传？有的甚至把坐喷气式飞机也画出来，……毛主席不主张这些，……这不能打倒敌人。

三、关于我们讲话，许多被歪曲了。最近外国报导了我一段讲话，什么“刘邓路线统治了十七年”，其实我说我们和刘邓路线斗争了十七年。凡是我亲笔写的东西可相信。许多谣言真不象话，我们靠真理吃饭。你们(在座的)是学习新华社还是学习路透社？(谢富治副总理：有人说我讲过大联合行不通……什么天津夺权有问题，……我根本就未去过天津。)

四、主席著作和主席诗词不能随便印(未发表的)，有些诗词根本不是主席写的。关于首长讲话，你们可以按大意写成文章，就说上级有这个意见，这就不会出问题了。

五、各大专院校的小报出版和纸张供应，由红代会聂元梓、谭厚兰组织一个小组，审查后交谢副总理批准，再交有关部门执行。

六、各小报要选派政治灵敏度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真正左派担任主编。如宣传不好要起坏作用。这是个严肃问题。

七、穆欣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四类。

575. 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代会核心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 (1967年3月4日晚 政协礼堂)

中央近来研究了一个文件，关于大学的文化革命，中央想叫回学校搞，中央对于申请留在哪个单位的都没有准许，下面的联络站大都是三司，北航，新北大等，起了很好的作用，点了火。但也有支持错了的，矛头指错了的，上了当。

我们想叫红代会研究一个文件，把一、二、三司撤销，把外地的联络站全部撤回。搞个简单点给我看看。在外联络站起了很好作用。现在保守势力都在向左派靠拢，因此现在斗争更复杂，更尖锐。那些保守力量要反击。青年人不好好调查，几个学校支持一个，使左派力量不能发展壮大，特别是较大的工矿，几个组织在那吵得一塌糊涂。现在大家都回来了，如今后真的要去，整好风后再派出，那时派只能派一次，代表红代会。红代会要促进工人团结，促进国防工业革命，学校的大联合可以促进工人方面的大联合。

红代会要把这个组织真正抓起来，不但上面要统一，下面也要统一起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统一起来，从大处着眼要把红卫兵的权力集中到红代会来，形成权力机构。红代会是一面旗帜，要有名有实，不要搞空架子，你们要踏踏实实把它搞好，不要搞倒了，要是搞倒了，可有你们的好看的。建议红代会搬到原来的团市委、学联或其它单位去，不要在学校里，你们的核心组，九个常委由聂元梓当组长，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当副组长，不要老闹矛盾。

576. 戚本禹在接见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时的讲话 (1967年3月4日晚11:25 政协礼堂)

谢富治：刚才戚本禹同志讲了全国的，关系很重大，我讲北京的工厂、机关、农村的情况，下去的同志，过去做了很多好事，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点革命之火，支持左派，都起了伟大的作用。但现在的斗争比较复杂，每个工厂、农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面上打倒了，实际上并没有击败，那些保守派也钻到革命队伍里面去了，现在斗争比以前复杂多了，如果不很好调查研究，各都支持一派，使左派力量不能壮大发展，这就被那些保守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空子。红代会成立就要解决这件事，特别是较大的厂矿如京西煤矿、北钢打得一塌糊涂，现在所有学生都回来，今后真的需要，整好风再回去，这要通过红代会，派只能派一个学校去一个工厂，不要一个工厂去几派，这样可促进工人团结，各方面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团结，搞学生的大联合，能促进工人、农民各方面的大联合。把红代会这个组织真正抓起来，不但上面统一，下面也要统一，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也要统一起来，大家从大局着眼，才能统一起来。把整个红卫兵权力集中到红代会常设机构来。你们看报纸上都发表了，是有名有实还是有名无实。现在可以搬到一个专门办公的地方，不一定在学校里，现在谁也不敢砸了。(戚：有军队保护)

戚本禹：你们(红代会)应当有个组长，聂元梓组长，韩、蒯、谭副组长，你们四个等于小小的常委。

谢富治：学生的工作是第一位的工作。

戚本禹：北京日报，学生都撤回去，准备找个总编、副总编，光上班学习，有个负责，维持几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发个声明，从第几期开始就是革委会的机关报了，那时可以找些顾问么！如北航、北大、师大……等，《文汇报》办的是第一流的，敢于说话，如“造反不分先后”很符合毛泽东思想，很理解毛泽东思想，两派是不能搞一个联合的，坏人只是少数，就是保守派，坏人也是少数，你们根据实际情况，一分为二，对前一段不要一棍子打死。教育部、工人日报都撤。你们研究教育改革了吗？下半年总得开学吧！不能总停下去，怎么开？什么教材，考虑过没有？是否还是老样子开？上次叫谭厚兰研究，研究了没有？你们今后要关心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向，这是第一位的。不注意各阶级斗争动向，就要迷失方向。目前有许多动向，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蒋南翔还有人给翻案，人大孙泱也根本没斗倒。群众之间打仗，打了好几次，你们就象江青同志批评的那样：“吃了一口桃子，就丢了。”没有批倒，这些坏家伙他们根本不老实。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毛主席讲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我很重要。革命派要捏成一个拳头才能打敌人，内部矛盾要用“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办法来解决，人大一个同学差点打昏了。放弃了资产阶级当权派不管，是不对的。从上到下，上你们可以想，下到地富的坏右来夺无产阶级的权，在农村地富反坏右把党团员、积极分子打下去，不要一叫夺权就好，夺权不一定是好的。我们讲全面的阶级斗争，可不是全面的夺权，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要夺权么！你夺谢副总理的权，那谁上台？你夺《红旗》杂志的权、陈伯达的权，那谁上台？你夺军队林彪的权，叫谁上台，还给罗瑞卿吗？我们讲的夺权是无产阶级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有的地方就是地富反坏右和四不清干部把权夺了。从上到下有这么一股资本主义逆流，但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只是一小撮。这些家伙，毛主席早就把他们的命给算定了：“捣乱，失败，再捣

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写一些标语，很紧张，象：“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不必这么写么！蒯大富给人分析形势，什么上山打游击，有点太严重了。这没什么不起，手指一捅，就破了。得要注意动向，不然要迷失方向，没有敌情观念，把同志当敌人打、这不是反动路线吗？群众斗群众，这是什么路线？刚才谢副总理讲的，回到学校来，按系、按班组织起来，按军训编制组织起来，有的要搞整风，整得好的，要搞大联合，要搞革命三结合。我们讲革命的三结合，有人认为三结合，连孙泱、蒋南翔也可以结合，这不叫三结合，这叫搞复辟。我们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如学校中的党团员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坏的只是极少数。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是刘少奇的路线，土改时他整了很多好干部，四清桃园又搞神秘化，搞秘密工作，搞什么扎根串连，弄到一个国民党军官身上。打倒一切干部是他们的路线，在清华就是系一级以上的干部，统统当做黑帮劳改。黑帮就是那么一小撮一点点，毛主席与刘少奇的路线的区别就是一小撮与一大片。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不是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一贯反共才是反动权威。那些吃喝玩乐，有问题。但这成不了反动权威。没有多少时间了，学校总不能再推一、二年。许多敌人没打倒，光喊口号，戴高帽子就倒了？人大要把孙泱批倒，使他低头认罪，事实弄清楚，定案。还有反动权威那些材料，你们要批判，批判反动权威很不容易，主席十分重视。批的任务很大。陆定一的教育路线，没有人好好批判。刘邓路线也没有怎么批。斗争不能简单化，批的任务十分艰巨呀！这戴高帽子就能行了？一个斗，一个批，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批了没有？斗、批、改吗？改到底怎么办？搞了半年文化大革命还回到原来那样上课，那就是失败，那就是走回头路。你们都要按照毛主席过去好多指示，好好研究一下：研究一些改革的办法。谢副总理讲还是回到学校里来，是很有道理的。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你们要吃桃子，实际上桃子已经摘下来了，再不吃就要烂了，要吃。斗、批、改很有意思，这桃子很好吃。外线作战要收一下。下乡、下厂还有任务，要有组织地下去，具体工作周景芳可多做一些。(周景芳：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一个较老的党员，谢副总理亲自写信找)。还有一个叫杨远的同志，你们一起工作，有什么问题多找他们商量。斗、批、改是十六条规定的任务。办报工作人员必须服从核心小组的领导，就是错了也要执行。自己有意见可以向上级申诉。工作人员不听核心组意见，核心组有权撤换工作人员。核心组意见不统一，一定要按民主集中制办事，少数服从多数。即使多数意见是错误的，也要必须执行。如果真错了，干了几次群众就会发现，就会纠正过来，那时正确的意见就成了多数了，不这样，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谢富治：核心小组，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红代会上，决不能把红代会变成一个协商会，这是一个革命的组织，是一个代表大会。同学们是来商量问题的，不要扣帽子，不要一下子把问题提得很高，讲话要有点回旋余地，比如别人做了点事，就说是大搞沙文主义，这开个玩笑还可以，不要乱扣帽子。我们骂苏修才是大搞沙文主义。现在不是搞小组织的时候，要搞大联合，要一个系、一个班地搞大联合。

戚本禹：要大联合，不能那样百分之百的纯，但是头头、领导权，可要掌握在真正革命左派手里。(有人谈：一个学校有许多小组织还都是个革命的群众组织，都要参加红代会怎么办？)先叫他们本校自己联合，联合成一个大组织，再参加红代会。不要搞那么多小组织。

谢富治：今后学校支援各工厂、农村，统统要经过红代会，不能各校自己去打架了。

戚本禹：红代会是北京的一面旗帜呀！

谢富治：红代会是全国的一面旗帜，你们的宣言，我们的最高统帅都看过的。可一定要搞好，威信要树立起来，完成伟大任务，过去没有三结合，现在总结，认识提高了，再实行三结合么！当时有历史条件限制。

577. 周恩来、康生、王力、关锋、穆欣等

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赴京控告团谈话记录

(1967年3月5日晚10:12—3月6日凌晨1:27在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被接见的有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三十三人，控告团二十六人。

周总理一进来后就对着康老说：“张建山样子有点象蒯大富。是个苏北人样子，他是苏北人。”康老说：“我认识他。”接着总理问道：“代表全来啦？还有些人没到吗？回去了？啊，葛忠龙回去了？”控告团有人说：“丁曰泗也回了。”总理笑笑说：“双方都回去人了。”

周总理讲话：今天没有更多的话要讲了，康生同志已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过了，伯达同志也代表中央讲过了，我们也分别谈过。你们江苏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时间耽搁长了一些。我们商量了一下，有一个共同认识。江苏本来一月份的形势正在开展中，但有一个最大的弱点是省委领导人没有站出来检讨、揭发，一直没有站出来过，这是对夺权斗争很不利的方面。另一个方面，军队得到通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推动革命三结合的时间比较晚，正式文件一月二十三日才出来。本来参加工作组的军队同志同情受压制的造反派，由于当时不介入，只能在外面同情。最直接的问题是造反派本身，首先表现在学生、工人形成几个派别，主要是两个，本来是一道的，八月份在一起斗争的所以叫“八·二七”，从南大开始影响到其他学校，南大比较早，从斗争匡亚明开始。全国起来斗争最早的是北京、西安、南京。三大嘛，北大、南大、交大三个大学最早，我们常谈起这三个大学。第二，半年多，一月三日有个斗争，在这以前，十一月份受上海影响，工人起来了，中央就叫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去帮助解决安亭事件，取得了经验，工人可以建立革命组织，矛头对准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成立组织是许可的，宪法有这个自由，原则上同意了上海，也得同意全国的。因此南京也起来了，我们也就同意了。接着江苏省委犯了比上海市委更严重的错误，办了官办的赤卫队进行对抗。在一·三事件中交了锋。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也跟上海一样，要到北京来请愿，保守派请愿实际上后面是有人支持的。我们打了许多电话方制止了他们来京请愿。后来他们用军用汽车运回南京，造成了江苏饭店的一场冲突。革命造反派取得了胜利。本来是学生起来的最早，十一月，工人运动和革命组织发展起来了。一月份又有一次保守派挑起的战斗，革命工人和学生一起取得了胜利。形势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月底造成了一个分裂的形势，严格说来应该是排斥南京“八·二七”的夺权派负主要责任。文凤来、张建山他们也认为不应该排斥。最关键的是已夺了权，新华日报也在这派手里，。一月三十日开三十万人大会以前，南京“八·二七”写了声明承认夺权，但说有严重错误，应做人民内部矛盾讨论，态度很好；这是一个关键。如果当天新华日报登了，第二天南京“八·二七”还带五万多人参加这个大会，照顾团结，推动夺权斗争前进，可是夺权这方面拒绝了登这个声明，在三十日大会上，夺权派还找了一个反对南京“八·二七”的中学生上去发言，批评了“八·二七”，好象他们是站过来了。他们那个声明很好，第二天还指责他们，这种态度越来越错，发展趋势走向错误。夺了权后，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不是逐步纠正错误，而是错上加错。关键的问题是二十九日声明和三十万人大会。确实在公安机关设起临时监牢，挂起牌子来，行使权力。另一派就受到压制。当然武斗发生在双方。但口号是压制对方的，“谁反对‘一·二六’夺权谁就是反革命”，说“‘一·二六’好得很，一直到十八日还有长篇文章。这是错上加错。这都是举几个大的来说。南京打、砸、抢的事情发生了，夺权后一个多月，打、砸、抢、抓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这不仅不是一个三结合的联合夺权，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而是一派夺权。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夺权，三结合没有搞，无产阶级革命派先走一步，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也是可以的。但是一派夺权，这样权力机关就不能支持了，要另外考虑一个办法。这不仅是我这样说，连夺权的人张建山由南京赶回来他也承认，回去看了十天，深刻认识到许多问题都来问他，如再不改就要犯罪，许多厅局来问他，无法知道怎么办。我听这话很感动，是诚实的话，这个态度是好的。不仅要三结合，就是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力量才大。根据双方

的态度和联合的情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之前，我们觉得应该采取临时措施，实行实质上的军事管制，来实施权力，但不对外宣布，象边疆一样将来可以出个通告。现在我们在生产上已经采取这个办法，开了农业会议，二十六——二十八日省军区开会，由军分区、县武装部把省、地、县抓起来，找了一些人参加会议，委托军区，抓革命、促生产都要抓。至于用什么组织形式，我们还要叫军区来谈，将来军区向你们宣布。临时权力机构由军区行使，已经肯定了，由中央决定的，已向毛主席报告了。现在一般军事管制，但不在报纸上宣布，出个布告，回去要把道理说清楚，只有军事机构行使权力，才能有利于推动大联合，推动省委、省人委的干部站出来检讨，向群众表态。表态得怎么样，要以群众同意不同意为尺度。你们不是问过底吗？底是毛主席，毛主席的底是群众，任何人都要在群众中受考验。当然，主要责任要江渭清负责，既要和江渭清划清界限，又要说清自己的责任。将来，这个军事管制机构帮助你们过关。能不能过得去啊？另外，要抓生产工作，主要由军区掌握，也要动员他们参加生产工作，将功补过，立功赎罪。在这样情况下，才能把广大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现在形势发展，队伍一扩大，有些地方发展多了，它本身的比例很大，可能这个组织主要方面是左派，但中间偏右的人也进来了，在工人、学生、机关中都有这种情况，自己要有一个整顿，首先在本身要有一个真正的大联合，这也是要经过军事管制帮助推动，如南大、南工比较大的学校，还有其他学校可以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开门整风。工厂、机关也可以由军队帮助军事、政治训练。以政治训练为主，学习毛主席著作，时间占得多一些。也是选一两个工厂在生产业余时间搞一下，树立典型。主席最近批了一个在北京军训试验文件，工厂怎样搞还要研究。这也是整顿思想、整顿政治、整顿组织。革命的组织能够做到大联合了，省市某些干部又被群众通过了，真正参加了三结合。不过这是少数，军队作了准备了，革命的三结合就水到渠成了。既然有了一个月的曲折，建立革命委员会时间拖得长一些，但也不是二次夺权的问题，是为真正实行无产阶级大联合、为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做准备。具体说，军事管制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要有两个班子，生产不仅抓农业，工业、财贸一起抓。等与大军区商量好了再宣布。总之要抓好生产。南京有这个条件，有大军区、省军区，还有野战部队，都可以帮助，有紧急任务可以调动。如东北几派斗争，离开生产岗位争论不休。要按照贵阳纺织厂的办法来搞，按行政单位来搞。生产时间不能争论，业务时间放在一个系统去搞。现在是跨系统，调出来开会，被调的组就停工一部分，这就要乱了。必须按报上登的贵阳的办法，那样办，许多地方已开始这样做，这样做生产搞得快。将来部队来宣传推广。江苏力量多，大中城市多，野战部队也不少，很可以抓好。交通也要抓，铁路公路河运成网。江苏还要供应上海。必须按这样系统来调整。尽管有两派，有红工、有“八·二七”，也可以协商，按生产系统、科室系统来组织。如果有一个规定，你们可以遵守的，对生产也有利，对工人阶级有利，对整个国家有利。不管那一派，应以厂里本身的造反派为主，必要的外力为辅，按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发的八条除第七条外都可以用，还是个五点说明。工人运动从十一月以来有四个月了，可以自己为主，可以离开保姆了，南京各厂革命派力量培养起来了。具体地讲几个问题：（一）首先，除军队外，公安机构、专政机构要镇反，管制坏人，以保护革命秩序、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安系统不能成为一派的公安机关，要由军事接管，外边力量退出，内部造反力量在军事管制下培养起来。和北京一样不属哪一派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就得到镇压，把革命秩序搞得更好，消防工作也有人做。当然，可能公安有两派，要为人民服务，不能有派系观点，在服从革命整体利益下不能服从那一派，服从整体，服从军事管制，服从命令，不许怠工，不许消极，在为人民服务方面，即使观点不同，还要坚守革命岗位。（二）第二个问题是报纸问题，报纸应该是党报。造反派夺权以后，很长时间变成了一派的，有些口号是错误的，有时还是很错误的，不符合革命要求。本来可以协商，现在看来很难，所以采取军事接管，外部的力量退出。里面如有力量，可以客观地报道革命的主张，就办下去，否则就停它一个时候，转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上海报上的报道材料。一直到十八日还登“一·二六”好得很的文章。十七日晚上的谈话，戴国

强就把谈话打电话传回去了。既是造反派，就要求大同，存小异。我的谈话供你们研究的，你们捅出去就很不好了。康老的话也捅了，根本不是事实。说高啸平是政治扒手是中央点头的，没有这回事。(康生：这样的做法很不好的。简单讲，不是革命造反派的做法，这是造谣的，这是一种骗人的扒手做法。)看来报纸还是接管好，宁可停一下子，把中央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传下去，要好好学习。无线电广播采取同样的办法。邮电部门也是这样，否则要有压制的行为。这一派的就行，那一派的就压。只有反革命的反动的才可以扣压。一般的中间的也不能扣压，要一视同仁。军事工厂方面很长时间两派斗争。军事管制用那种形式还在研究，根据具体情况来定。有的派个军代表，有的用武装保护一下，不叫外面串连，看情况。目前南京马路上出现的各种不恰当的互相谩骂的标语，就要处理。再有如群丑图的漫画(拿出一张斗江渭清的画)，不要这样的东西。十六日那次会上曾邦元不同意戴高帽子有道理的，是对的。从那次起就闹分裂。一月十六日、二十二日开了两次会，当然是一小撮当权派，何必丑化，要触及灵魂，不必表面丑化，这样不能触及灵魂。你们来京后家里还翻印了一个图送来，很漂亮的纸赶印的，还制版，哪来的纸，很漂亮的纸，浪费了。(关锋：当权了，就这么搞啊！)(康生：把权交给你们，国家非灭亡不可，你们当权，这样做行吗？)山西工人提出一个很好的建议，反对打、砸、抢，难道看着人民财产受损失吗？砸的是国家财富，抢的是人民财产。这些只有极少数的是黑帮。(康生：帝国主义、香港、《真理报》马上会翻印，这些国民党、苏修赞成的，这叫大方向正确吗？上面还有毛主席的一首诗，这是对毛主席的侮辱。王力：这些人性质未定，本来是分散的，你们把它集中一起，到底长了谁的志气，要摆事实，讲道理，将来还提供翻案证据。康生：这样做是侮辱反对文化大革命。一个革命者看了怎么能过得去呢？国家交给你们，将成什么样子。)你们不叫不同意意见，这就走到形“左”实右。(康生：把百丑图拿起来这是自发的吗？那有自发的是这样的？)当然对方也搞了一些漫画。(康生：这已超过了北京，北京还没有掌权，掌了权也要超过你们，要出画册了。)当然不是一派的事，对方也有，这是最典型的。回去好好整风，在学校里进行军训，政治为主整风。把南京一个月以来的气氛……应很好的冷静地想一下。我们不赞成抄家，抄家要得到革命组织的批准(王力：江苏省还没有裂痕，戴了这样帽子能三结合吗？)(关锋：我们从来都不同意戴高帽子，这是打击自己，孤立自己。)听说在北京还贴了一些。(康生：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怎能三结合，这是儿戏。)(关锋：你们——指反对派，搞的这张漫画也很不好嘛！以后都不要这样搞了。)你们回去整风，不管学校、机关、工厂都要整风。现在有两派，主要检查自己，不要抓住对方一点就攻，那就不好。要学主席那样谦虚谨慎，回去自我批评多一些，另一方即使犯的错误多一点，但还是有优点的，开始有闯劲的，局面是闯开了。林副主席讲了三个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首先是革命性，没有这一点，革命局面是打不开的。全国学校中，中学闯得最早，组织了红卫兵也影响到南京。文化革命到全面夺权阶段，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光有闯劲不行，要有科学性。当然不能抹煞以前的成绩啰。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如不讲自己的错误，势必小同也找不到。张建山的话懂得目前的困难，这是好的。同学们都是知识分子，尽管有工人、贫农家庭出身好的，但毕竟是知识分子。从家门到学校，究竟社会经验极少，未参加过战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别参加生产，但不是长期参加劳动锻炼，一下子掌权差得很，不三结合是不行的。现在机关造反派起来了，要给干部过关。主要的目标是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轻有重，不要人人过关，不能打倒一切，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十二期到今年第四期的社论要好好地学，这样才能把工厂生产、机关业务搞起来。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工厂是会好好搞起来的，时间不会很长，只要认真抓，四月底就会看出来的。不但由军事管制组织，领导起来，一抓起来就会看出起色，为大联合、三结合准备条件。认真地抓两头，很好地整风，把语录学好，不但要学习老三篇，还要学习《古田会议决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还有一点，机关两派建立机构太庞大，应该缩小，绝大多数同学回学校去，留下少数人作联络员，方能把工作搞好。旧机关已瘫痪，又增加新

机关，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管那一派夺权都没有办法。张建山回去十天，已取得了这个经验，文风来也讲不知夺权后怎么搞法好。要自我批评，才能把扣子解得开。总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纲领上，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掌握大方向，团结大多数，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不是复辟的三结合，不是复旧。学校如此，工厂如此，机关如此，特别是省、市机关更要如此。对犯严重错误的干部，在劳动、工作上考察他们，另分配工作。

下面请康老讲讲。

康生同志讲话：我完全赞成总理讲话，希望同志们冷静考虑。我再补充几点：

第一个问题，自从“一·二六”夺权以后，南京的革命群众团体辩论“一·二六”夺权大方向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把这个问题搞得那么尖锐化，凡认为“一·二六”夺权不好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应该镇压，直到来北京还辩论这样的问题，我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鉴别方向正确不正确，第一条，把敌我关系搞清楚，毛主席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看一看，按这个标准看，方向对不对，“一·二六”夺权派把南大“八·二七”的曾邦元说成是反革命，到底“八·二七”的曾邦元是反革命还是朋友，这一点冷静想一想，就容易看清。我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是地富反坏。我们的敌人是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我们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难道说，在南京红总面前，敌人是“八·二七”吗？敌人是曾邦元吗？看来这个时期把真正的敌人放松了，而把自己朋友当作敌人来反对。我讲这个问题，不仅“红总”这方面，夺权派这方面，就是“八·二七”方面，同样要检查这个问题。这对控告团方面也是一个批评，他们这个时期忙于宗派斗争，放松了敌人。很值得我们警惕。不要从宗派小集团、小圈圈的利益出发，首先要真正分清敌人、朋友，这是首要的问题。你们两派斗争时，给敌人有可乘之机，赤卫队最近活跃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会不利用你们的分歧，不会不去挑动、制造你们分裂的。第二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检查夺权以后一个月实践怎么样，这是很重要的标准，不要用空空洞洞的口号吓唬人，人们不仅看一条标语，一张报纸，一张传单，而看实践。刚才总理谈了一些，看看方向对不对？（关锋：合乎不合乎中央政策。）大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合乎不合乎？大动荡、大改组、大分化合乎不合乎？革命派内部未联合好就搞夺权，合乎不合乎？自己检查一下，对不对。不能以势压人。掌握了权力，强迫人家承认，看起来蛮行的，实际上虚弱得很。第一看一看敌我关系，第二看一看实践，这样就容易把问题看清楚了。三月二日我们接见了你们，你们就到南京去说，我们肯定“一·二六”夺权大方向是对的。没有，肯定没有！现在不可能肯定。我再重复一遍，没有肯定。同志们很容易看清楚，什么叫军事接管，就是没有肯定你们的“一·二六”夺权，把权移交给解放军。当然解放军决不是排斥你们，还要依靠你们，还是要三结合，实行大联合的。还有谣传高啸平是政治扒手，中央点了头。没有。我不熟悉高啸平，不了解高啸平，不认识高啸平。高啸平可能有缺点、错误，但他还是共产党员嘛，现在，他还是起来革命嘛，他反对江渭清嘛，不能把高啸平和江渭清平列起来。我曾同曾邦元讲过，高啸平缺点错误也不能掩盖起来，不能以宗派主义情绪来对待问题，来对待同志，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对待同志。

第二个问题，你们两派，不管那一派都要以正确态度对待解放军。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军队，是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是胜利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保证。解放军的声誉，不但在中国，在世界也是很高的。全世界没有超过解放军这样声誉高的军队，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军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保证我们国家不准修正主义篡夺党权政权，保证我们国家不准资本主义复辟，保证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变颜色，这几年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下取得光辉成绩，党曾经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学习解放军。在当前情况下，反对还是拥护解放军成为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很好地执行军委的八条命令。这是毛主席下的命令。

不能用任何的方式反对、侮辱、冲击解放军。如军队因某个人某一部门某件事情未看准犯了错误，要善意帮助他，不能反对他。现在杜方平同志站在文凤来一方面，“八·二七”方面也不能在这方面做什么动作。杜方平同志过去在南大工作组是革命左派，梁、杜、吴做了许多工作(过去文凤来同志就向我反映过)，好好团结，好好合作。“八·二七”要特别注意，不能因此对解放军不满。南京问题的解决，看来是解放军的帮助有重大作用，很重大的作用，促进你们团结，促进你们革命化，在抓革命促生产反对敌人等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有重大意义。这一点，两派都同意，那天张建山听到军队帮助，特别高兴。相信、拥护、支持、帮助解放军是解决南京问题的关键。解放军同志在左派之间不能站在这一方面反对那一派，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立场上，不能凭宗派主义印象去工作，要做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林副主席指示的模范。

第三个问题，同志们回去把南京的打人、砸机关、抓人等立即停止，不管哪一派，实行军事管制时，必须首先注意这一条。让它发展，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生产上都受很大损害，要坚决反对。你们有没有人说过：“只要承认大方向，就保证你的人身自由”，有没有说过？(“八·二七”同志答：说过，是唐康说的。)最近控告团一同志回到南京，就被抓起来罚跪五小时，这不仅侮辱了“八·二七”，侮辱了你们，也侮辱了我们，那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关锋：要很好学习最近人民日报介绍的团结大多数的经验。)这算什么大方向正确。对敌人才能专政。这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人民？(关锋：你们两派，那派撇开那派，都是掌不好权的。)另外我们看到“八·二七”这方面的(翻开了南工的《红色造反者报》)，说“砸烂文氏黑店”，这也是很不好，很错误的。“好个屁”自己称自己是“屁派”，真糟糕！(曾邦元：屁派是别人加给我们的。文凤来：是他们自己提的，说：“明天的天下是屁派的天下。”还说“屁派万岁！”总理拿起我代表团递上的对方所写的谩骂我们的标语口号，说：你看这一本子，都是这样的口号。)不要管先后了，宗派主义不分先后。(关：拿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气概来。)“文氏黑店”，这不仅是对文凤来的人身攻击，这对群众也是攻击，这么多群众支持夺权是支持“文氏黑店”吗？当然这张报纸不是全不好，如另有一个标题是“迎头痛击抢、砸风”，不过上面标题“砸烂文氏黑店”，下面提“迎头痛击抢、砸风”，这不是“迎头痛击”，是“迎屁股痛击”了。有位同志说，红总抓了许多人，砸了人家总部，你们也砸了人家吗？(曾邦元答：我们砸了三个。总理、王力：还要多一些，不止三个。)可能不止三个，会多一些吧。总之，要立即停止。现在首都三司在南京联络站没有了吧！以后不能再用三司的名字招摇撞骗了。(首都三司驻宁联络站海峰同志作了回答，并说准备回南京作检查。康：问人民大学吴贞顺，你们回不回去了？南京“八·二七”有的说，不要你们去了。有个女同志说：“要去检查，不能溜跑。”)在这里也是检查嘛，现在的事情多得很！你们找这个事干什么？特别是工厂，要保护工厂，保护机器，保护生产，坚守岗位，按工业十条规定办理。尤其担心的是淮南煤矿，产量是一直下降(王力：淮南不是江苏的)，哦，是江苏南京旁边的一个什么矿(答：梅山铁矿)，现在还集工生产，要好好保护。双方都要彻底整顿宣传工作，首先不要宣传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是大联合。中央提倡大联合，你们提倡革命派内部大分化、大改组、大动荡、这怎么大联合呢？这是个政治方面问题。你们还有广播电台，《新华日报》，要彻底洗清那些东西。不要搞反面宣传(拿起群丑图说)，这是出中国丑，出文化大革命的丑，出自己的丑，这不是革命。建议你们回去后，先不要开会，搞个联合行动，把南京街上那些互相攻击的标语漫画都盖掉(拿出一张丑化文凤来的漫画)。你们这个漫画也很不好嘛！(总理：他们是油印的。关锋：不要再相互把标语收集起来往上交了，自己去刷掉，夺权的也好，反夺权的也好，都要这样。总理：回去搞个良好的开端，把标语都盖掉。)一切不正确的斗争方式都收起来。《新华日报》是党报，不能成为一个派的报，要实行军管。电台也是这样。

第四个问题，要好好学习，整风，两方面都要好好学习。开始可以关门整风，慢慢的可以开门整风。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彻底实行自我批评。不要读了文件光攻人家，首先要攻自

己。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反夺权派也有权可夺，首先要把私字权夺掉，首先检查自己行动、思想、言论，合不合乎毛泽东思想，合不合乎《红旗》杂志社论精神。自我批评不会损害、降低自己的威望，确实能提高自己的威望。什么形式，怎么搞，根据你们情况研究决定。总理提出军政训练，很需要，工厂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五，清理组织，不管那派，力量都不小，都有不纯，不纯分子混进来了，阶级敌人想办法破坏我们，不仅在外面，还会钻到内部来。

最后一条，省委、省人委的同志，厅局长同志们，要真正觉悟起来，检讨自己的错误，彻底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派方面，用实际行动取得群众信任，好好地把生产、业务抓起来。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的犯错误了，允许改过，允许立功，给他检查机会，补过机会，立功机会。但是这些干部同志们应当诚诚恳恳，不要玩两面手段，蒙混过关，这实际上不是蒙混别人，是蒙混了你自己。

南京的工作，江苏的工作，中央曾经关照过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毛主席已关照他们，要上海的同志用上海的经验帮助浙江、江苏，还想找军区同志到北京来商量，与张春桥、姚文元接上关系，学习他们的经验，接受他们的帮助，共同使省里的工作健康地发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得更好，更彻底。在这里已经待了很久了，回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要忘记敌人。敌人没有睡觉，被斗的人不是死老虎，敌情观念要特别注意，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

关锋：两个团回去传达，是不是宗派主义这是一个考验，不要说“我们胜利了，他们失败了”。

康生：要讲原则。宗派情绪，象鸦片烟瘾，一下子很难改掉。

总理：刚才在会上就流露出宗派情绪，如果把自己人当敌人，大方向就错了。过去掌权的说“谁反对‘一·二六’夺权就是反革命”，现在你们又有人说“谁不反对‘一·二六’夺权谁就是反革命”，这样一搞，大家都变成反革命了。(康：真正的反革命在旁边发笑，打倒一切，结果就是打倒自己。)今天这样一说，实行军事管制，是为了推动你们大联合，过去夺权派要负更多责任，而另一方面头脑不要发热了，今后南京“八·二七”要负更多责任。不要各取所需，不要去砸了，什么“文氏夺权委员会”也不要砸了。要联合起来，把不正确的口号去掉。今后南京“八·二七”要负更多的责任，不要走向自己的反面。现在你们应该警惕，我提醒你们这一点，他们是改正错误，你们要防止错误，你们不注意，错误犯的更凶。抢的东西能送回的都还给人家。宣传车，我主张少搞一点，应投入生产。双方整风。双方对吵，两个大喇叭对着吵。再吵，军队要干涉你们了。所以，要请军区的同志来北京谈一谈。刚才说的那天座谈情况传出去，戴国强说没传，也许他们反映情况有出入，总是你们派传出去的。同样，二日的接见情况也传出去了。要有自我批评精神，领导同志要自觉，有些人就不自觉。与上海联系很重要，但要把真实材料送去，要实事求是，才能得到上海的帮助。这样把上海、江苏、浙江都联系起来，把革命生产都搞好。(当时控告团有人说以往几次接见不要传达了，以这次为准)今天谈的是带结论性的，去传达，你们自己认识，自己消化，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

在几个同志表态时，首长插话：

当杜方平同志汇报时，周总理说：“你一开始支持夺权是对的，那文革也是支持的，后来他们走错了，你没有制止。”曾邦元二十九日不也是支持的吗？肯定大方向正确，但有严重错误，后来慢慢转化嘛，事态是发展变化的。康生同志说：要说支持文凤来，首先是我，“在围攻文凤来时，梁、杜、吴的态度怎么样？”邢文举答：“在梁、杜、吴三同志中，在这个问题上发现、认识最早的是杜方平同志。”康生同志说：“那不错。”关锋：“杜方平同志是个好同志。”康生：“群众对梁、杜、吴的反映是好的。”总理：“斗争很复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康生：“文凤来也要发展变化，不能吃老本。”又说：“右派坚决要反对，但左派之间不能只支持那一派。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是一个左派，一个右派，就是要支持左派，反对

右派。”关锋：“互相都不要要债了。”康生：“你们的运动，没有梁、杜、吴的支持，没有军区的支持，就没有今天。”当杜方平同志讲：“我的指导思想是支持一派，团结另一派，不是支持一派，打击一派，虽然对南京“八·二七”有团结的愿望，但过早表示了态度，事情发展就难以控制了，我没有能力把他们拉在一起，没有完成任务。”这时，康生同志说：“你功很大，功大过小。”

当文凤来讲到回去怎么做时，关锋同志说：“具体做的时候，不要匆忙，要与张春桥商量一下，不要一下子传到群众中去。另外的一派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采取合作的态度。”

文凤来同志表态之后说：据我所知，我们代表团从未向家里(南京)的同志说：“‘一·二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已经肯定了，高啸平是政治扒手，中央已经点头了”的话。我们往家里传达的原始记录和当时的长途电话录音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我们完全可以立即递交中央审查(我们三月二日晚上曾当面请示过，陈伯达和康生同志是同意把那次接见的内容往回传达的。)康生同志接着说：“你们没有往回传达就好了，就算了，不要再交中央审查了。”

当张建山同志表态，提到有人说江渭清是我们的后台时，康生同志说：“不要随便提揪出后台，这个不好。北京地质学院的左派，人家说后台是林杰，林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是我，另一派又说我是谭力夫的后台。实际上我一个台也没有。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不要随便提，看事实嘛！”当讲到学生中的宗派斗争影响到社会上宗派斗争时，总理说：“南大、南工的同学收回来整风嘛！”

当张福厚同志代表工人表态后，提出晨光厂赤卫军活动情况时，总理说：对赤卫军，你们回去要进行调查，团结教育争取广大群众，孤立少数头头。

康生同志问体委王范问题时说：“从北京经验看出，体院同志特别要整风，长期以来荣高棠的影响很坏，另外常常出国，沾染资本主义习气，所以要特别重视整风。有的学校就成了打手。王范是叛徒，荣高棠也是叛徒。叛徒当了权更要注意。王范，我最了解，原是上海的巡捕(即洋警察)，后来同情革命，坐了牢，抗日胜利后，释放，到延安学习，后在保卫处工作，作风还勤劳朴素，解放后我在上海碰到他时，完全变了，所以这个人走到叛党的道路不是偶然的。”

当听到南京准备开江渭清等的揭发批判会时，康生同志说：“揭发会，不要搞武斗，要改变斗争方法。”

代表团递了几个条子，提出几个问题，周总理作了如下回答：

一、(代表团一同志递上一张条子说：“我们坚决要打倒江渭清，反对和江渭清结合，而某一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在首长面前提出要和江渭清结合，同时反而在南京放风说和我代表团和江渭清勾勾搭搭。”“当我们提出打倒江渭清时，×××提出来不同意并责问群众，你们凭什么打倒江渭清？”我们在江渭清问题上和×××是有原则上的分歧。)

总理回答：关于江渭清不要以为不在南京就不能揭，可以继续揭，可以背靠背，更好地揭，不能直接调查的可以通过军区、中央查，重点放在机关造反派。

二、(当代表团一同志递上一张条子说：“‘一·三’事件我们坚决认为是赤卫队挑起的，而某一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却认为是红总挑起的。”)

总理回答：“关于‘一·三’事件，不管红总方面、革命学生方面有任何缺点，都不能否定，不能动摇，这是革命的事件，必须肯定的。我跟你们分别的、合起来都谈过，不能因为有缺点，就有别的看法，这是革命的胜利，从那次以后赤卫队就瓦解了。”

总理：关于长江大桥的事情已经知道了，也看了图，已派人去调查。

总理：到上海找张春桥联系问题，由中央直接通知，你们联合去也好，分别去也好。军事管制机构也要和上海联系。

当首长们起身要退席时，关锋同志对我代表团坐在前面的同志说：“你们要满怀信心地回去，满怀信心地工作，为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而努力。”

578. 李先念对人民银行总行造反总部的讲话(摘要)

(1967年3月5日 国务院)

你们总行没有夺回大权嘛，你们做的是对的，这是周总理讲了话，帮了你们的忙。你们对胡立教批评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呢？批评的对。胡景____恐怕还不是个死老虎，胡景沄的问题我看还满复杂。三大案件同他关系很大，过去陈希愈在他下边，大概1956年我们认为陈希愈比胡景沄好一些，就把陈希愈调动胡景沄之上，胡景沄就大不满意。胡景沄的老婆李如萍向中央写了一封信，同胡景沄是有关系的。胡景沄过去被敌人抓去，怎么出来的，问题很严重，林海云已经谈过一次了。胡景沄与薄一波的关系很密切，总行党组会开了三十多次，批评胡景沄，后来胡立教害怕了，怕人家说他转移目标，因为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胡立教认为是大家批判他的时候。上次我说过“你们批评胡立教，不批评胡景沄”这个批评是不对的，过去我不太了解情况，因为开了几次会你们只是反映胡立教的问题，我就说出了那句话。你们批评胡立教是应该的，完全应当的，还批评得不够。有错误就需要别人帮助帮助嘛！你们银行搞得是好的，是没有错误的，对胡景沄的问题，你们还应该做细致的工作，你们知道的比我知道的多。信用社上访，胡景沄起了不好的作用，有人受了他的蒙蔽。银行前段运动是健康的，我们完全支持你们。至于斗争的方法，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中央文件讲得很清楚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还是搞的好，没有武斗，当时有些单位产生了武斗，一是群众的热情，二是有些地方就利用了群众的这种热情，如“联动”、“红旗军”等，群众是热爱毛主席、党中央，但有些人就利用了。你们银行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时我们也没有经验，现在明确了，夺权只是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单位，还可以夺监督权，你们总行并没有把党政财文大权都夺过来，也未解散党组，我看是总理帮了你们的忙(指总理一月二十五日对财贸口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对胡景沄，在三大案件上，我早就怀疑他了，怀疑他与薄一波的关系，他被敌人逮捕过，我过去根本不知道。还有成立农业银行的一些做法，我根本就说不通他，他想搞第二财政部，这个人的野心挺大，他还要改组党组，这件事我不知道，胡立教也不知道，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他在银行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反毛泽东思想，对他还要揭，还要批。

你们批评胡立教是对的，至于喊错了口号，也不是大问题。批评胡立教从大方向上是对的，胡立教同我们这些人应当承认错误，你们年轻，要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要鼓励你们的革命精神，过去我说你们光批胡立教不批胡景沄是冲口而出。你们银行搞的不错，胡立教说你们挺懂政策。你们大方向是对的，不要怕，至于工作中有缺点，就承认缺点，要诚实。我们这些老年人说话是婉转的，造反派就不同了，你们对自己的缺点要求是很严的，提得很高，你们不批评便罢，一批评就提得很高。现在开门整风，群众向你们提意见，你们都要听，有些群众对你们可能有股情绪，如过去为什么把我关在门外等，你们要估计到他们会把问题提得很高。你们整风，现在有中央文件，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使毛泽东思想在脑子里扎根。有些人向你们提意见，有些话可能说过分了，甚至夸大一点不及其余，你们造反派要受得了，弄清是非，不能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第一是受得了，第二是作解释工作。只要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就要团结他。造反派是很实事求是的，找出自己的缺点，但是有人就给夸大，有些人有怨气，有了怨气就对立起来了，这是个严重问题。应该心情舒畅、接受意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批评，正确对待自己。林副主席说，要把自己当做革命的动力，又当做革命的对象，有错误就去掉，就整风，如果搞得不好，就会闹成对立。有些战斗队过火的批评你们，你们要受得了，我提这点意见，你们考虑。

胡立教对我讲，你们对揭三大案件的积极分子应该重视他们，团结他们，注意同他们合作。三大案件十几年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解决了。不是陈希愈等人没有错误，但不能一下子就开除党籍，对他们的平反问题要到运动后期处理。

关于平反的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中间，由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错了一批人，

要平反，对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众贴了大字报，自杀本身就是叛变行为，不能平反，你们要慎重考虑。有些人本来就有问题，有些就是牛鬼蛇神，就不能平反，这个意见你们可考虑，你们同党组商量一下。

大联合，你们看来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应该按司局组织造反组织，上边有一个总的组织，我也没有经验，大联合必须是革命的大联合，绝对不能和稀泥，也不是大杂烩的联合，不要心急，要走群众路线。康老对西南代表的讲话说，大联合不是大杂烩，不是光联合没有原则，是在革命基础上的大联合，不是凑合在一起的大联合。造反不分先后，对刚开始造反的你们可以搞一些外围组织。

三结合不一定要快。康老说，我们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合二而一的三结合。要记住，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要很好的学习去年《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要记住，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记住了这一点什么都有了。周总理说，不能老是说我们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现在还是这种提法就把打击面放宽了，如果阶级斗争盖子没揭开，就不能形成革命的左派队伍。说什么因为党组成员之间没有互相揭发，就是阶级斗争的盖子没有揭开，这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如果知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揭发，就是错误的。还有领导干部亮相，就是站在你们这一边，旗帜鲜明，不要两面派，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让他们作检讨，检讨不深刻，你们就批判。主要是看态度鲜明不鲜明。三结合是个方向，能防止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领导权。

“左派内部必须大乱”是反动的口号，现在提出“反对右倾”是错误的，“打倒一切”，“排斥一切”是不对的，是无政府主义的。

不要听到“保”字就害怕，要做阶级分析，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要保，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就要反。

“反对上层路线”，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说法，要看到无产阶级的上层路线，还是资产阶级的上层路线。如向周总理汇报工作，这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上层路线。不要怕接近领导，要做工作，做团结争取工作，但是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有错误就诚心诚意的帮助他们，对战斗队的同志也是诚心诚意的帮助，要抓活思想。

我说“光斗胡立教不斗胡景沄”是冲口而出，向总行造反派道歉，那几句说得重了一些，是不应该的，夏长文有些紧张了。

斗争方法，中央文革一直主张文斗，不要武斗。你们总行没有武斗，武斗是群众的过激情绪，今后不要武斗。大街上“砸烂狗头”，周总理说是人头那能是狗头，如果是狗头就好办了，还有烧纸人等等做法，都是不好的。骂人的话不要，要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嘛，要学习《红旗》杂志的做法，他们就没有不好听的话。什么戴高帽子、弯腰、游街、喷气式、画百丑图等等，这样做很不好，被敌人利用了，百丑图中的有些人还不一定是黑帮。就是斗争一个反党分子，也要摆事实讲道理，让他老是站着不起什么作用。还有“打、砸、抢万岁”的组织要解散，砸工厂的要抓起来。541厂的造反大队是个不好的组织，是保了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八·八”战斗队到银行的作用，要足够的估价他们，他们煽了革命之风，是好的，起了积极作用。外贸学院到外贸部，商学院到商业部，财金学院差不多各单位都去了，手伸得长了些，但要估价他们的成绩，也要批评他们，他们去了三十多个工厂，不能过分责备他们，他们去破四旧，立四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起了先锋作用，他们敢想、敢说、敢干，是有很大的功绩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们过去是不很理解的，通过文化大革命，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这是最危险的敌人。全国人民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个巨大的成绩。否定一切是错误的，过去我们打败了蒋介石，建设了十七年。那能是刘邓路线的成绩？这是毛主席的红线取得的伟大成绩。只有战胜了错误路线，才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党团员的大多数是好的。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就

会不知不觉的舒舒服服的走向修正主义，因为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越来越严重，就会修了，那时要有千万人落头，到那时可能想戴高帽子还找不着头了呢。要想得开，戴了点高帽子也值得，千万不要有怨气。

哪能不准许青年干部犯错误呢？我们就犯过很大错误。在运动初期，我没有支持少数左派，认为他们过激，喜欢多数派。十月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又落后一步。为什么不允许青年人犯错误？每个问题谁能都那么正确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主席发动的，成绩是伟大的。通过这次运动会锻炼出一大批青年干部，要把权都交给青年干部还要有个过程，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培养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来要求自己，要为人民服务，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培养起一批青年干部，这是希望，这是前途，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事情好好商量。

“八·八”队是老左派，我是支持他们的，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他们谈嘛，北京市的财贸单位我现在不管，到底那个是左派组织我还没有搞清楚。街上的传单我还不知道，有那么大的风，说“八·八”队解散了，可以辟谣，他们这是拆“‘八·八’队的台，因为“八·八”队支持了财贸尖兵。“八·八”队的工作做得很多，有成绩，但是他们揽得太多了，现在已经收回去整风了。

司局的三结合，是司局长亮相，承认错误，要旗帜鲜明，站在你们造反派一边，群众提提意见就可以结合。机关的三结合同地方的三结合不同，你们的三结合是不是象革委会性质的，现在还不敢讲，你们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将来可能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是革命群众的监督机关，党组来领导，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报纸上说需要夺权的单位实行三结合，中央各部是不需要夺权的单位，但是各部都已经夺了，将来还是掌握文化革命的领导权，监督业务，党组工作要恢复，要体现党的领导，政治部的工作是不是也要恢复，有错误让他们检讨，让他们帮助你们做工作。你们的党支部没有解散吧？今后党组亮了相，你们有什么事情就找党组商量，党组开会，你们派人参加，现在党组不活动，是怕说他们搞阴谋。下级行、处，还分好多派，也无法开会，这是不要避免的，要有个过程，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还是抓生产的。

胡立教检查之前，你们可以先看看他的稿子，先帮助一下，小会提提意见，大会检查一下，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

对调查胡立教的材料，可以交给他本人，同他当面谈，他如果打击报复，你们找我，这些材料可能有，也可能有些夸大。

579. 戚本禹接见地院“东方红”部分同学讲话 (1967年3月5日凌晨)

首先让我们介绍了参加市委夺权委员会工作的朱金堂同志。

戚本禹问大家：你们地院“东方红”的大旗倒了没有？(同学答：没有！有的答：要垮了！)。杨雨中给你们传达过没有，江青同志说过地质“东方红”的红旗不能倒，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师大井冈山”，江青同志说红旗不能倒，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丰功伟绩嘛！在北京和全国是有影响的，你们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学说：我们认为朱的错误和李洪山有本质的区别，他是有错误。)戚：是有严重错误。(同学：他们一开始就要砸烂朱成昭的狗头。并且扬言还要在全国展开批判，这实质是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戚：周永璋来了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来？(有人答：少一个不更好吗？)这是什么意思？周永璋、蔡新平以后不要叫他们托派了。你们有多少人？(殷：我们只有四个人，现在他们把许多东西强加在我们头上。)问：你们经常给《红旗》杂志社送材料的是谁？(林嘉康，是我们“丛中笑”，我们二个人指吴清远)

孟繁华来了没有？他不是写了篇很有名文章。孟繁华不也能当领导？孟繁华你可以协助

王大宾工作嘛！王大宾是一个好同志。(同学插话：孟现在三司)孟可以回来参加“东方红”的领导。你们还有那些同志可以组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同学提：黄瑞华，田春林，朱德瑜，伏庆是)他们原来是核心组吗？(是)那黄瑞华你们可以出来吗？(他现在靠边站)怎么能靠边站！应当靠前面站，站在最前面。你们计划整风到什么时候？(不知整到那天)被朱成昭这个问题纠缠住了。朱成昭，我刚才建议他闭门思过，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我们党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当然他坚持自己的错误不放，那就滑到茅坑里去了。蒋良补、杨雨中，他们两个人检查得好也可以选一个当领导嘛！孟繁华你应当和广大“东方红”战士站在一起，去实践你的理论，要把“东方红”搞好！不要搞垮！(蔡：王大宾，李贵，孟繁华我们同意，其余的同志我认为要经过大家的讨论。)戚：“东方红”核心组织应当站出来领导嘛！

(整风从12月开始，特别是朱成昭问题出来之后，我们和他接触很少，我们对二进地质部的看法是有成绩，有错误，现在要进行总结。)

戚：你们有什么分歧？(殷：策略上分歧)二进地质部的成绩是巨大的嘛！我建议，你们何长工没打倒，以前的事情，即使有缺点、错误也不要讨论，这样有好处。二进，三进地质部是对的，在整风中应当多讨论当前的，你们抓一小撮没有？把同志叫成托派是错误的！

(蔡：我们怀疑朱成昭是个野心家，他把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打下去了。)

戚：听说周永璋在组织什么第四司令部，和三司对抗，有没有这回事？

(蔡：没有，他们拿不出一点可靠的证据，那是很早以前，曾和聂元梓和刘富元搞北京公社)戚：我掌握一些材料，他和刘富元搞得很紧。(蔡：周良璋是和刘富元比较密切，但是我们一直是和刘富元作斗争的。)

戚：当初三司开除周永璋的作法是错误的，但是后来他们作法也是错误的，请你转告周永璋，如果要组织第四司令部，是极端错误的，王大宾来了没有？他应当回到官道公社去。(有人插话：他本来是我们学院的老师)他现在工作在那里？户口在那里？(官道公社)那就应当回本单位去嘛！学生串连都回去了，农村的当然也得回去，你们也不要给他加什么投机分子的帽子。(蔡：朱的思想为刘、邓、陶服务的，要整风又整不下去，我们要求在尽快的时间内将整风结束。投入战斗，干部问题是不正常的，主要有宗派主义在作怪，把斗争矛头指向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同志，这是为刘、邓、陶服务的)(朱：我们和他们在整风上分歧是，我们认为整风是一个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而他们认为是炮轰总部，是夺权！)他们要夺权，如果只夺你的权可以嘛！你的权就是要夺嘛！如果要夺王大宾，李贵等同志的权那是错误的！

以后谁要再走就要让他走，走一个少一个，走十个才少五双。阎长贵的讲话还是好的，我希望你是搞团结，而不是搞分裂，在这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战的关头，谁搞分裂，谁犯错误，搞小分裂犯大错误，搞大分裂犯罪！

下面我给大家谈两个问题：

一、你们要紧紧跟着毛主席、要相信毛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永远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你们总部个别领导人在短时间内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生了怀疑，发生了动摇。我们不能紧跟任何人，要紧跟毛主席，要永远紧跟毛主席，要相信我们的伟大舵手能够领导我们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两种革命家，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在关键时刻他就动摇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不动摇，不怕挫折。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只要碰到一点小小的风浪就大喊大叫起来，他们没有见过大风大浪。不知你们地质“东方红”有没有这种人。见了一点问题就象天要塌下来了，惶惶不可终日。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解放战争的时候，胡宗南重点进攻陕北、山东，那是一个转折点，决战的时候，那位自称“刘克思”的人，内心惶惶了，当敌人刚进瓦窑堡，他就要叫赶快走，有的人在毛主席还没走以前，他就先走了。毛主席非常沉着，当时江青同志，骑着马跟着毛主席打游击，在山上和敌人兜圈子，有时主席刚刚离开四个钟头，敌人就到了，而敌人刚刚离开两个钟头，又回去找遗失的东西。粟裕在山东牵制敌军，事后刘邓大军(主要是

刘伯承同志)南下，直插大别山，敌人就全面崩溃了。就象下棋一样。当时宋子文一看大局已去，就跑到美国去了。这个时候，不光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要动摇了，也要大喊大叫。你们学习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主席从来对群众运动是满腔热情，正确地看待群众的缺点。巴黎公社诞生之前，马克思认为时机不成熟，当巴黎公社诞生后，马克思不是指责，而是满腔热情地歌颂她、支持她，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没有指责不听自己的话，而是积极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列宁吸收了这些经验，在十月革命之前写出了《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著作。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的缺点，毛主席最先看到，最先指出，但是他并没有指责群众，当时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俄国有个普列汉诺夫，是在 1905 年革命以前，是支持武装革命的，但失败以后，他就指责武装革命是错误的，这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要学习毛主席鲜明的阶级观点，强烈的阶级感情，在毛选的第一篇，就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有些人对待敌人可以温情主义，敌我不分，而对曾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千方百计想把他搞臭，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态度，你打游击，对革命的同志打游击，你有意见可以提嘛，这枪口究竟是对谁？可以写信嘛！我们不是不听，把并肩作战的同志搞臭，对喊“刘少奇万岁”的人却很感兴趣，为他们喊冤叫屈。当然反过来，对犯错误的同志又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今天，茅坑边沿的当然应当帮助他，如果他转化为敌人，就不能温情主义。今天是我们的战士，明天他跑过去了，就要调转枪口向他开枪。对于动摇的，不能把他推过去，如果他真要跑过去，就开枪。阶级斗争就是复杂的，大家可以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主席对敌人毫无温情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说我们独裁，我们就是要独裁。对自己的战友，你看那些电报，都是满腔热情，我们只有紧跟毛主席。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冰天雪地里的梅花，象她那样立场坚定。冰雪对花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但她顶住了。我们要能顶住冷空气的侵袭，不致因你弟弟给你吹点冷空气就动摇了，女朋友，再有些其他的人，再给你灌点就耳朵软了，不要吃了迷魂药不知家在哪里。不管你吹多少冷空气，多大压力，多少冰雪都要顶住，你吹你的冷风，我开我的花。在整风中应以毛主席为榜样，向毛主席学习，紧跟毛主席。

二、学校的运动怎么搞？

首先让整风继续下去，把整风搞好，我不赞成用很长的时间来整风，你们用了这样长的时间来整风还没有整好，这和整风的方法有关。在整风方法上，你们不合乎毛泽东思想，是用“宗派主义整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整小团体主义，以“私”字整“私”字，而不是用“公”字整“私”字。我建议在整风中要学习文件，学习主席著作，学习最近人民日报发表的《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好文章。

现在你们自己有几派，你们可以自己组织自己的人整风。当然，如果蔡新平要求也可以大家一起整风。整风中首先应当严格检查自己的错误，这是今天我所不满意的。“东方红”的同志要听蔡新平的意见，那怕是有 5% 的正确。我们应当高价收买批评。要学战国吕不韦那样，把九千两黄金挂在城门上，只要你能给我改一个字。你们象这样下去，自己压制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自己将来也会走上刘邓路线上去。朱成昭就是这样，刚愎自用，总以为自己高明，比中央文革还高明，比江青同志也高明，当然也还有个限度，没有说他自己比毛主席还高明。正是那所谓的“高明”，其实并不高明。

你们整风我建议你们用一个礼拜，或占十天的时间，用二天的时间学习文件，三、四天提意见，自我检查，人大比你们闹得更厉害，打得头破血流，你们还没有被传染，还比较文质彬彬。你们要搞三结合，搞革命的三结合，建立全院性的领导机构，然后再搞院内的斗、批、改，毛主席的一贯精神是坏人总是一小撮，刘邓才是扩大打击面。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打倒的，必须讲事实，摆道理、以理服人，把人说服，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你们学生不能老是放假闹革命，恐怕过三个月后还要复课闹革命。资产阶

级的东西要打倒，无产阶级的东西要建立，你们有什么打算没有，怎么个改法？改了然后就可以下厂下乡。(这时有的同学提出不要整风小组时)戚本禹同志说：你们“东方红”核心小组自己决定，我预祝大家整风能够成功！

580. 李先念接见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公社“八·八”战斗队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3月6日 国务院小会议厅)

地点：国务院小会议厅

人员：李先念副总理、胡立教同志、吴波同志、董枫同志等。

“八·八”队代表30人。

中央文革接待站两同志列席了会议。

开始李副总理先说：今天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先讲吧！

“八·八”队王兴涛同志说：

1. 根据我们学院的情况，三结合问题怎么搞？
2. 对财政部问题的看法？
3. 对下一步运动的安排和看法？

我院的夺权基本上是按三结合精神办的，夺权委员会是临时机构，以后要逐步建立校文革、文化革命小组。

我院的干部，有的在运动中已亮相，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革命路线一边的不少，已被吸收为“八·八”队员。院党委一级的自运动以来，还没有亮相站到革命派一边的。

现在有人认为，把党委一级的领导干部找出来几个，亮亮相，检查一下就可以结合了。我们认为，应该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以后，把真正革命的领导干部再逐步地加入到领导核心里来。三结合是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结合。我们“八·八”队也逐步地这样做，下一步是如何把工作做的更好，如何不断的加强和充实。

运动开展以来，同学外出串连多，院党委中的问题还没有揭深揭透，谁好谁坏还不能完全定下来，下一段院内的斗、批、改还要搞，他们还可以进一步亮相，如果党委中有站过来的，就可以逐步吸收参加领导核心，目前还不能就简单的抽调几个委员参加到领导核心里来。

我们目前对早已站出来的革命干部进行结合，再经过群众鉴定再逐步团结95%以上的干部(包括犯过错误的)，带领大家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在院内搞一段斗、批、改后，逐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把站出来的革命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吸收到领导机构中来。对一般犯错误的干部，让他们出来亮相，认识错误，与一小撮反动分子划清界限。欢迎他们起来革命，揭发问题。对于在劳动监督的人，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分子，也要给予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

我院在三结合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做的还很不够，我们对北京的十几所高等院校作了调查，他们也都在摸索，刚刚开始，也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我们下一步还要继续努力地作三结合方面的工作，不断摸索经验，充实、提高和巩固。

下一运动怎么搞？我们认为我们院内斗批改还需要进一步搞下去，因为从十月份以来，开始了大串连，下工厂、下农村搞运动的时间比较多，学院内搞的比较少，院内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揭开，搞搞院内的斗批改，为下一步教育制度的改革打下基础。

下一步我们估计大规模的去工厂、农村的可能性不大了，搞一段斗、批、改以后，八、九月份会不会复课？

李副总理说：你们谈吧！我主要是听你们的意见，我也没有什么意见。(谈到军训问题我们对李副总理表示感谢时)李副总理说：那次我和叶剑英同志见了面，我写了个条子，说“八·八”要集中进行整风，你们派些军队去帮助他们。

秦子敏同学接着谈：我们进行军训有三个矛盾。同学们贴了许多大字报：

1. 军训和三结合的矛盾。
2. 军训和整风的矛盾，就是军训和炮轰总部的矛盾。
3. 军训和下厂、下乡的矛盾。有的同学提出要下厂、下乡到火线去整风。

第三个矛盾在解放军冯政委作了动员报告以后，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在三结合问题上也有各种不同的反映。有的人(包括“八·八”队员和一些非“八·八”队员)认为以前搞的面太宽了，劳动监督队里还有十几个人，有的是不该斗争的斗争了，对“八·八”队的大方向有些怀疑。有的人挨了批、挨了斗以后，不服气，好象要躺在床上，要让群众请他出来和他结合。干部中也有人对“八·八”队的大方向产生怀疑。这是一种思潮。我个人认识，在三结合问题上，有人想抓革命群众的小辫子，否定革命大方向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学了四期社论以后，会产生右倾，这更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就是要紧跟党中央、紧跟毛主席，一定要掌握好党的方针政策，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现在同志们都在考虑学校中怎么进行三结合？对北京其它高校作了调查，他们也都是正在摸索。工矿企业、农村、机关单位的三结合都有明确的指示。究竟学校中怎么搞，我们也正在逐步摸索。

过去，学院中的问题大部分是同学揭的，许多一般干部早也站出来了，和同学一起揭发了不少问题，但中层干部站出来的不多，院党委中就更少了，真正知道内情的人还没有站出来，学院内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真正彻底的揭开。我们对三结合工作也很重视，但究竟怎么走，还没有多少成熟办法。

关于炮轰总部的问题。有人提出炮轰老百姓是错误的，应该集中力量炮轰总部。有人认为，整风运动是全面的学习马列主义的运动，应该人人自觉革命，首先打倒自己头脑里的私字，总部也要炮轰，二者并不矛盾。开始有人叫总部表态，在解放军冯政委作军训动员报告时，总部也谈了这个问题，表了态，欢迎大家炮轰总部，欢迎大家随时轰。

我们还准备向“八·八”队所下去的各单位发通知，欢迎他们对我们“八·八”队提意见。

还有人说，把解放军请来抹稀泥是个大阴谋吗。

蔡效飞同学说：最近北京市刮起了一股小台风，利用总理和李副总理 2 月 17 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说：“八·八”队大方向错了，混蛋敖本立已被停职检查了。影响较大。

李副总理：那些人讲的？

同学答：财贸造反团等。

李副总理：什么时候讲的？

同学答：就是在上月 17 日你接见以后。

李副总理：我根本没讲“八·八队”嘛？只是指财政部那一点嘛！

现在不能讲话了，他们就是要乱传。例如前些日子我谈了个平反问题，就引起好几处打电话找我。我说过，打错了的要平反。工作队打错了要平反。有的人确实有错误，但还不够四类，不够牛鬼蛇神。有的真正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平反。

第一，确实打错了的干部应该赔礼道歉。

第二，有的有错误打过分了的，过分的有好多就平好多，不要打成牛鬼蛇神。

第三，有的确实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牛鬼蛇神，如果给平了反，那站到

什么立场上去了，没有错就不要平嘛！

我觉得这三条是对的，各机关、各学校好好去分析，打错了的就平，过分了的过分多少就平多少，确实打对了，就不能平反。所以我现在不敢讲话，知识分子会记录，发传单。上次我讲的是在财政部那一点错了，夺权我是支持的嘛！我并没有说“八·八”队。

《红旗》二期社论就指出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的经验传来，发生了连锁反应。以前不怪同学。但后来总理有指示，1月5日派董枫去财政部说，财政大权不能夺，只能监督，七号也告诉了杜向光。

以前的事情是不能怪同学们的，“八·八”队在运动中作了许多丰功伟绩的工作。在八、九月份，我没有支持你们，这一点我犯了错误，后来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就逐步支持你们。

那天银行的造反派对我讲，说有人说“八·八”队解散了，敖本立被停职反省。我听了以后说，“给‘八·八’队辟谣”。问他们是谁写的？一问才知道是反对财贸尖兵的那一派。我告诉了银行的造反派，要为“八·八”队辟谣。大联合要归口，左派嘛！应为“八·八”队辩护嘛！“八·八”队什么时候解散啦！敖本立什么时候停职反省啦！

(同学讲：本身就矛盾，既然“八·八”队解散了，还谈得上敖本立停职反省？)对，就讲不通嘛！

同学问：有人说财政部的夺权是反革命夺权？

李副总理说：不能那么说。他们违反总理的指示，总理的命令不听嘛！

七号我找杜向光谈话，派董枫也去了，说财政大权不能夺。有什么情况向我反映是可以的，我两次请他来他不来，我都不见怪，你夺权我支持你，请你来谈谈工作该怎么搞法，他们态度非常强硬，说与李先念无话可谈。老实说，也伤了我的感情，部长的权你夺了，我还是个副总理嘛，请你来，你不来。

(董枫同志说：第二次去财政部，我已透露了，中央决定了几个单位的业务权不能夺。)

李副总理接着说：对“八·八”队我是肯定了成绩的，不能怨同学，“八·八”队的同学作了很大的功绩，对你们有些批评你们也知道了，作为经验教训应肯定你们的成绩，成绩是主流嘛！财政部有王学明在那里导演指挥嘛！左派我是支持的，现在按行政单位、按部门联合，当时，我的话可能落后了一些形势。

“八·八”战斗队的李炳炎我在上次接见时已讲清了，你们没有错误，有财政部煽了革命之风、点了社会主义之火。包括商学院、外贸学院，在当时的情况下，能驻到机关工厂，做了许多丰功伟绩的工作，这是主流，这是根本的方向。你们下去了30多个工厂、单位，可能有支持错了的，这是不可避免的，看不清楚，这是工作上的错误嘛！

3501 工厂到我们门口告状，我根本不表态，在门口等了六、七天要总理接见，要我接见，我和总理商量，不能接见，晓得是怎么回事。

总之，先要看到主流，再看缺点，尽管有几个支持错了，“八·八”队这个组织还是革命的，我说过了，你们在财政部有丰功伟绩嘛！

(田广平同学谈了财政部杜向光、刘振玉的一些问题)

吴波同志说：我是有错误的干部，并且错误很严重，在财政部十七年也犯了很多错误，应该揭、应该批、应该烧，过头了一点也没有关系，帮助我过社会主义关，这是感谢造反派的。

我到财院去虽然口头上承认了错误，但还未向全院同学作检查，最近身体不好，希望给些时间，也希望“八·八”队的同志帮助帮助，再交换些意见以便能检查得更好。

“八·八”队在我们财政部煽了革命之风，点了革命之火，发动群众，建立革命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功绩很大，我们在机关已向群众说，“八·八”队的功劳很大，应肯定，绝不能否定。在财政部有缺点，有错误，由他们自己去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干涉。

我们机关造反派前段的大方向也是正确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机关战斗队没有责任，

责任在司令部中几个人和后台老板王学明，我们也怕影响造反派的情绪。一开始就注意了这个问题，怕总理一批评后背上包袱，机关战斗队不能解散，而且还要加强，巩固和发展，总结经验教训。司令部中少数人是什么问题需要弄清楚，先念同志也去讲了，我们机关的造反派群众还好，也有一些群众有压力，我们还在不断的作工作。

刚才田广平同志讲的问题，前一段我确实是保王学明，现在看来是保错了，他的问题早已发现，他和我和李副总理是闹矛盾的，财政部是两架马车，那个人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我一直是主张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处长以上的党内解决，并告诉了先念同志。

后来发现王学明破坏军婚，派人去调查当时还未回来，所以王学明的问题就限制在小范围，结果被“锣未残”战斗组从曾直那里知道了，使我们很被动，于是决定，群众既然都知道了，我们先在十七级以上范围内打个招呼，后来到福建调查回来的情况又证实了，并且比原来掌握王学明的材料还多。当时便由文革向群众公布了，问题严重，但当时还是保他，认为他是三十多年的老党员，要处分是不是可以不开除党籍，留党查看，或撤职降级。如果送法院就要开除党籍。现在看来是保错了。

(李副总理插话说：吴波快点讲，让同学们讲。)

王学明这次由总理批评后，群众揭出三封信，现在群众和我都有怀疑，以前斗我时司令部和王学明是一致的，但他们的问题我们没有定性(指刘振玉等)，一种可能是胜利了，头脑发热了，过了头，另一种是私心杂念，别有用心。

现在正在作司令部垮台了以后的组织联合问题，下一步还要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机关和学校里我们还没有还帐(指要作检查)，另外再解决王学明、杜向光的问题，搞清造反司令部的问题。

机关认为出了杜向光的问题后，杜向光被逮捕隔离反省，放下这事就转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转不过弯，认为现在揭，许多事实没有澄清，调子有的也高了，要实事求是的批，还得一个时间，所以要先把杜向光的问题搞清，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的斗争大方向还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能含糊，否则就会犯错误，斗争的锋芒是指向王学明、杜向光，其次是搞清司令部的问题。仅仅是把斗争王学明、杜向光放前了一点，主要斗争对象是王学明、杜向光，要狠狠地批，把司令部的问题搞清，刘振玉的问题让群众再揭一揭。

(田广平同学插话说：刘振玉可能是好人犯错误，还有人怀疑陈宝生，认为刘振玉是出头露面的，陈宝生是很神秘的)。

吴波同志接着说：田广平同志说，刘振玉可能是好人犯错误，我们没肯定他是坏人，让群众揭一揭，一个可能是好人犯错误，一个可能是别有用心。

(敖本立同学说：看财政部的问题也不能把一个人一棍子打死，否则又会犯错误，财政部前段有点一边倒，有些胜利冲昏头脑。)

吴波同志说：这个问题已经打过招呼，不定性质。

李副总理说：一边倒也不一定是好事，有的一边倒就倒霉了，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边就好了。

(胡立教同志插话：杨大量在天安门前截了我一次车。)

李副总理：有人说我请杨大量在我家吃过饭，那来的这回事？过去有一次，他们几十个人在我这里开会，完了以后比较晚了，每人买了两个大馒头、一块酱菜，一手拿着一样吃的，又不是一两个人，有五、六十个人，机关干部一大块，那有这样请吃饭的？说这种话的都是品质不好(意指想显示自己)。对红色游击队我当时不知道，政治上迟钝，写了大标语(指那些反动标语)，部党组没有及时表态是个政治错误。

(敖本立同学：李副总理对刘振玉有什么看法！)

李副总理：我还不表态，犯错误的我保了许多嘛，就讲的早了。

(田广平同学：请李副总理谈谈对下段运动的看法！)

李副总理：

现在的大方向一个是大联合，大夺权；一个是三结合，整个斗争的矛头还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影响，既要抓好革命，又要搞好生产，特别是搞好农业生产，全国人民要吃饭，中央同志们都重视了。

在财金学院没有多派，就是一派“八·八”。“八·八”现在1000多人了，关于三结合，让我表示财院干部问题，我表不出来怎么办？我只能讲个原则。

有几种情绪，在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有个别人、个别同志抓造反派的小辫子是错误的。我们以前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很多同志在犯错误后向我写信请罪，承认错误，严格讲起来，我们执行了反动路线，我们是犯错误的。我们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发动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论从经济革命、整风反右等他都看得最远。当前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危险的敌人，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在我们身边，经过这场运动，红卫兵小将把他们揪出来了，红卫兵小将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当然也可能犯一些错误，我们都犯错误你们怎能不犯呢？责任在我们身上，讲句粗话，做错了事嘛！

群众运动到了一定时期，中央讲了话，不能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次挖掉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算了刘、邓反动路线。许多干部犯了不少错误，要象林副主席讲的那样，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动力，也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红卫兵作了丰功伟绩，干部不能埋怨革命群众，什么人喜欢我们埋怨革命群众呢？刘邓喜欢我们埋怨革命群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喜欢我们埋怨革命群众。

我看财金学院双方作点工作，同学要作干部工作，你们看到哪些干部可以结合的，可以讲些毛泽东思想嘛！有些地方两派拉干部，搞无原则的三结合。三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不是和稀泥的三结合，同学们要去作点干部工作，有的干部埋怨，不敢站出来，财政部吴波和胡立教也要作点干部工作，宣传其伟大意义，争取他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站出来，和你们站到一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以谈谈话，开开座谈会，交交心，你们作工作比我们本领大，至于和哪个干部结合，还要经过斗争。

有个部有这么个论点，说我们部的盖子还没有揭开。

我说不能那么讲，那么你们左派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没揭开，九个月了，那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你们左派怎么产生？不要那么机械理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部里有，有的单位全部烂掉，有的单位有一两个，有的单位可能没有。

第二点就是互相揭发。总理讲了，应当互相揭发的。如果他是个三反分子，如果不揭就根本没有个是非。例如财政部的王学明应该揭，应该批。

让干部亮相，给他个机会承认错误，站到你们造反派这一边，要作干部的工作，黑帮、三反分子那是另外一个作法，我讲的是犯了错误，经过批评揭发还可以站出来革命人的工作。

财金学院的院党委，我只认识个陈如龙，其他人都不了解。大联合、三结合是个大方向，联合起来还是为了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决干部问题。

你们现在军训了，我帮了个小忙，那天我告诉了叶剑英同志，让派些军队帮助你们整风，我不晓得军队行动这么快，要把军训搞好，搞好大联合、三结合。

关于“八·八”队的估价问题。

现在有些批评，从你们来讲应听取，从外面来讲，过分了。

总的来讲，“八·八”队的大方向是对的，批判了我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经过长期斗争的左派，我是肯定你们的成绩的。对“八·八”队我也是要批评的，是与人为善的批评。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法，如下边的谣言，“‘八·八’队解散，敖本立被停职反省”，都是错误的。

那一点我是指的财政部的问题。现在得先讲“八·八”队的成绩是对的，你们也应该听取批评，关于批评我和敖本立和你们总部提过这事。一个是外面的批评，他说“八·八”队解散，而“八·八”队并没有解散，他说敖本立已被停职反省，实际上并没有停职反省。相反造谣的人日子更不好过。应当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说老实话，这是共产党人应持的态度。那天我和总行一个造反派说，你们要为“八·八”队辟谣，“八·八”队并没有解散。

以前，我对敖本立讲过，不要铺的面太宽了，做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从无产阶级角度出发，不讲我心里过不去。

我还曾经说过，退出商业部吧！不要闹矛盾了，还有个商学院嘛！他们在商业部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找了30多个工厂，我想让你们收掉财政部、商业部、前进报社、财贸政治部的人。我说“八·八”队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左派组织，所以我也提一些批评。

有的地方犯错误比你们“八·八”队犯的多了，但大方向还是对的。一搞斗争就戴高帽子、挂牌子等等，群众是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中央一概是不主张这样作的。这都是歪曲，全国有个别的地方被坏人利用。

我们犯错误不能怪同志们犯错误，同志们年轻，斗争经验不丰富，运动中的主流是敢想、敢闯、敢革命，我们走路还得走一走，看一看，紧跟毛主席，有时也走错了。

炮轰总部，为什么要提这个口号？开门整风嘛！整风是最科学的名词，整风比炮轰科学一些，整风是整思想整作风，摆事实、讲道理。但也不能都讲得那么准嘛！应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我们支持你们，我们支持是一个方面，主要看财金学院的群众支持不支持你们，如果有什么错误就作检讨，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最大的、最可靠的。要讲事实，但也不要把错误夸大。不能靠我们，靠总理，主要靠群众支持。他们有意见你们就应该以科学的态度作检查，有什么责任，总部应担当起来，下面犯了缺点和错误，总部也担当一点嘛！

去年六、七月间，主要责任在我，不在工作队，但打了反革命，我一个也不知道，但是在我的思想影响下工作队干的，所以主要责任应该我负。

所以，如果在那个工厂、那个单位支持错了，我们应当多担当一点错误，严格的讲，我也有责任。正确的话，群众就信任你嘛！各分队的错误我们也有责任嘛！主要地不要靠上边。总理是支持你们的，总理接见“八·八”队，在北京市的学院中也是不算少的了。

第二个方面也要传下面分队的同志，也不要用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总部有缺点，有错误也不要提的那么高嘛！你们都是左派嘛！有时提的过高使人不能接受。要提高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要传给群众，要炮轰就开炮嘛！我们叫整风，你们叫炮轰。现在有的大字报也太庸俗了，什么“砸烂狗头”“混蛋”啦，“滚蛋”啦等，当然在去年的时候批评这一条不太好，好几次讲话都谈过这件事。

一方面如果总部有缺点有错误毫不保留。另一方面群众也要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真正帮助总部改正错误，不能采取拆台的方法。你拆人家的台，人家也可能拆你的台。

我看整风、军训、三结合可以结合上，不会发生很大的矛盾。时间上可能要发生一点矛盾啦！

我没有什意见，第一点就是大联合、三结合、做干部工作。

第二点就是整风，争取外面的意见。

你们也要准备让人家把话说透，每个人也要把话说完，当然不可能恰恰都说得合适。总部要和同学在批评中间团结起来！你们准备把劳改队解散，很好嘛！

你们做干部工作，我们也要做干部工作。财政部的问题，是个左派做了不少工作。田广平讲了，想利用王学明，这就错了，听话要听革命群众的话，要听革命干部的话。你们上揭陈云，下揪吴波，中间一夹就揪到李先念了！

财政部的问题同学没有责任，总理接见后，我接见了同学一次，(驻财政部联络站同学)

我说你们工作很好，“财政部的群众要揪你，我要保。”他们在那鼓足了干劲干革命工作，李炳炎可以作为经验教训。我还到财政部讲了一次话。

我和胡立教要找财金学院的干部开个会，斗了戴个高帽子算什么，如果让资本主义复辟了，要杀头的，那时想戴高帽子还没个脑袋呢？要想开些嘛！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象我和胡立教这样的人，犯了错误，烧烧也没有什么！过分一点也没什么，干革命那能文质彬彬？

你们要忠心耿耿地把军训搞好，把三结合搞好。

(李全根同学说：以前搞运动都是自下而上的搞，希望上面也能交交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

李副总理：小李子这个意见很好，你们同意不同意？(回答同意)如果同意，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些人帮助你们，有些干部现在有一股子怨气，这股气是反动的。干部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各帐各算嘛！胡立教、吴波，你们两个党组开开会，分析分析干部，再和“八·八”总部商量。开次会，要从本质上分析问题，不要从辫子上分析问题。

过去“八一八”那些人，同学之间不要老斗争，即使其中一些极少数顽固的批一批就行了。

总的一条，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党的方针政策。“八·八”队怎么能垮呢？有人说在整风中，左派可以大乱一下，这是反动的口号。

现在有的还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托派”，“反上层路线”。上层路线这你得看是那个司令部的路线，无产阶级司令官为什么不可以密切联系呢！

还有什么“大砸大抢万岁”！这都是极端反动的口号。

希望你们搞好，我也准备要到你们学校去的，现在整训，有解放军，可以帮你们的忙。

在财政部你们作了很多的工作。伟大的革命出了一批年轻的小将，这批小将经过长期的锻炼要作国家的主人，过去有些人提点意见就记仇，似乎神圣不可侵犯。你们是文化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闯将，要作些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关于召开批判陈云的大会，总理还没有批。

(同学让李副总理谈谈对陈云的看法和批判陈云联络站今后怎么搞)。

陈云是错的，是反对毛主席的，有人让我帮忙，可能帮忙不大，我只能讲到这里，讲过分了党纪不允许。

董枫，你把这个意见报告总理，我们会答复你们的。下一步运动的动向中央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我估计从现在发展的这个形势看来，大批同学下厂下乡的可能性较少。

581. 李富春接见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

——四红旗战斗队革命造反团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6日 国务院)

三月六日李富春总理在国务院接见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四红旗战斗队革命造反团代表并作重要指示，摘要如下：

目前全国的形势是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文化革命的新形势，我们大家有共同的思想，一举一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有

共同纲领有指导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处处按十六条办事，有共同的斗争目标，如何反对统战部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共同的战斗任务斗批改，使中央统战部合乎毛泽东思想，使统战部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统战部过去执行李维汉、徐冰的修正主义路线，清理、改正。

这一共同的思想，共同纲领，共同的斗争目标，共同的战斗任务，共同的斗争方法，拿这些来衡量自己是否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派。

这两个月你们迷失了方向，丢了大方向打内战，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摆在一边，没有去斗，没有去批，对统战部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也没有系统揭发，文化大革命采取的措施，对干部的政策，没有按照毛泽东思想，三、四期社论办事，没有按十六条办事，不是大联合而是大分裂。不是以部为主，而是借外力，独立称王，互相攻击，各人抓各人的小辫子，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采取砸打抢抓，总的来说三方面都迷失了大方向，只有造反团提出了整风三方面，我要求你们好好整风。如果是革命左派那就是我讲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用十六条武装自己斗批改。

第一自己整风，第二开门整风，第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大联合，第四干部排队，实行三结合。整风中间要整理自己的队伍，要系统批判统战部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不仅要大联合而且要三结合，而且必须有三结合，不仅要有革命干部，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的领导干部，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认真拿出时间学好中央文件，一月份中央文件社论最多，要认真看一看，要认真想一想，认真研究研究，对照对照，自己哪些走对了，哪些走错了，你们再不听话就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整风中间破私立公，互相批评中本着对己严，对人宽，这都是毛泽东思想。从今天起谁也不准借用外力，谁也不准武斗，每个团体的负责人丢掉私字。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都是私字。

干部亮相不是拥护哪一边，而是首先要检查自己，作自我批评，检查自己领导不好，领导不对，领导错了。通过大家商量看哪些干部能站出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监督业务的权，这是中央统战部的革命新秩序。

(×××同志说：我部现住的“红色联络站”不利于干部内部之间的团结和大联合，而且加深同志间的对立情绪)李副总理说，我刚才讲了，以本单位为主，不要依靠外力。“红色联络站”要撤出去。

(××说：整风是不是把过去分歧都拿出来)要向前看，主要看今后。李维汉、徐冰、刘述周，你们三个组织写了材料，大方向是一致的吧，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主要是今后如何作，多作自我批评这样才有团结基础。

统战部的处长有两种情况，他们长期压李维汉，徐冰的领导下做了些工作，秀才班子，有业务能力，只要自己起来革命，就应当是欢迎态度，有的确实中毒相当深的于刚，乔连生要彻底脱裤子啊！彻底自我批评吧！向他们进行工作吧！

首先得整风。搞大联合，在运动中，大革命中也是锻炼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及时总结、及时纠正，不断提高就好了。

582. 刘西尧在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全厂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3月7日)

印刷厂承担印刷毛主席著作的政治任务，总理很是关心。以前我没有来印刷厂，其他联络员来了，今天来了，看起来你们“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搞得很好，生产也搞得很好。去年是超额完成了，今年一季度可以高质量和超产吗？(众：可以)在印刷技术研究所、电子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协助下我厂按装了电子刻板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国的工人、

农民、科学技术人员、革命干部及解放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有这样志气、气魄，不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屈服。他们想在技术上卡我们是卡不住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在短短的时期内完成了任务，再次证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我今天来是听听看看的，没有打算讲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志们要我来讲，不来讲也不好，现在就接触到的问题随便讲讲。

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目前已到新的阶段，二、三、四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是毛主席对世界革命作出的新的重大贡献，使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是社会主义建设决定性的大事，全世界革命人民都为毛泽东思想新的胜利而欢呼，每个革命同志都应该在思想上认清这一点，怎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实行大民主，怎样保证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复辟。解放以来一系列的夺权到文化大革命的夺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把权夺回来，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权掌握在我们手中，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的事。如果没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颜色，要是变了颜色怎能对得起先烈和全世界革命人民？

今天也接触到个别同志，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很不理解。他们认为自己受了些委屈，甚至气病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嘛！想到世界革命受到些委曲，就是牺牲了生命还能算得些什么！那个同志当过兵，他没有作过战，也不了解解放军为了一个战役的胜利，自己人也可能打伤自己人，这种牺牲也难免有的，但是我并不提倡这种牺牲。全世界人民欢呼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是中国的事情，而且是全世界的事情。阿尔巴尼亚霍查同志就提倡大字报，红卫兵已到坦桑尼亚，而我们有的同志还不理解，而且是很不理解。不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自己掉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哩。我们领导干部如果不投入进去，不进行大批判，大检查，怎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过去很多人看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不知道是株大毒草。彭、陆、罗、杨大黑帮如不揪出来怎么能行？我们还会孤立。毛主席决心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就要学好毛主席著作。通过运动培养出大批新生力量，大批接班人。现在这些人到今天还不理解，那就非常危险了。我们首先要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很好的理解，把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到自己的问题上来。有的人不理解，有的人不是真理解，有的人一碰到个人问题就不理解，理解要出自内心的理解，不打倒“私”字不可能理解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深远意义。

从去年 5 月 16 日到现在快有十个月了，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是非常丰富的，我个人总感到跟不上形势。总是落后于形势，我们只有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在非常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只有不断提高，才能跟上形势。

《红旗》杂志一些文章指示中，有些是毛主席亲自修改的，如《红旗》三、四期社论。我们要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报纸上的社论和《红旗》十二期的社论，使思想跟上形势，使水平不断提高，现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提高思想性(条子：有人说必要时要用武斗。刘西尧同志看了之后说)有人贴出大字报必要时要武斗，这是不行的，只能文斗不能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摆事实，讲道理是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是毒草是错误，思想提高了才能嗅觉出来了，如不提高就不能嗅觉出来。

奴隶主义，有的就是从私心杂念出发的，怕得罪上司；有的是认识问题，认识不到就没有把握，就不敢斗争，只有打倒“私”字才能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社论指出要分清敌我。毛主席著作第一卷第一章就指出要分清敌我。今天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党

中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健康地发展。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不可粗心大意。”刚才你们不是念了吗？今天有了提高，但不能用今天的水平对过去的缺点错误加以指责和攻击，《红旗》四期社论指出，不能抓革命小将的小辫子，打击革命小将，指责他们。这么大的运动，缺点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提倡打、砸、抢、抄、揪、画漫画，如百丑图是丑化了党和国家，中央是反对这样做的，革命小将过去做了是没有认识到，也可能有坏人从中煽动，但也是少数的。如果与革命小将算帐，你怎么给我戴高帽，你打了我，我也得打你一下，要他们赔礼道歉，这样做就不对了，以后不要这样做，一定要把主席的教导全面贯彻，对 16 条也要如此。有些同志在 16 条中只抓一、二条，有些同志说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为啥不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怎轰起我来了呢？革命小将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哄堂大笑)。运动一开始，放手发动炮轰了两下子又有什么呢，如房子是钢梁的，轰开钢梁还在嘛，总之这是考验嘛。对干部来说烧一下总是好的，小将们轰了之后更清楚，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这也是锻炼，对小将也是一个锻炼，轰几次以后才能瞄准。就是要培养革命造反精神，不能满足现状。生物所有的青工为经济问题写血书，老工人说他们是甜水里长的还不满足，我们是苦水里长的……。老工人是旧社会过来的，对旧社会体会最深，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生活好了，但是也容易产生保守思想，满足于现状了。我们要一分为二，但是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我厂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的反动论调，众：哄堂大笑)。毛泽东思想是真理，是不断发展的，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

现在有人争论说造反团的大方向是不是正确的，我不想分析这个问题，你们大家去分析，要以历史来评价运动，从 5 月 16 日起要看主流，不要抓枝节来否定主流。过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的从“私”字出发，有的抓了枝节没有看清大方向，对造反团的大方向要看主流，不能抓枝节。当然肯定有缺点错误，如果大方向对，修正错误就行了。毛主席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发现错误立即改正。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小将，还有老将中将啰(全场笑声)，发现错误认真改正，有这样精神就是好的，只要发现不符合主席思想就改正，这样的同志总会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如果有了错误不改，讳疾忌医，尽管错误不大，发展下去也是很危险的。坚持错误，矛盾会转化的。打倒“私”字，在革命同志面前都有一个“私”字，三司的文章很好，是毛主席推荐的，不夺“私”字的权，即使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的派的权，这个权也不巩固。如继续发展会蜕化变质的。看了革命造反团整风计划，打倒“私”字才能大联合，不打倒“私”字就不能大联合。

有人说造反派夺权后不民主，造反派要注意。但是我看有的人也不民主，十几个人要占文革委员会的一半席位这也是不民主。凡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坚决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来，拥护 16 条的就应联合起来。如果是一致的有什么不可以联合团结呢？假如还不能联合，把意见摊出来，看到底是什么问题？谁都是拥护毛主席、党中央，我说可以联合，如果脑筋中存着“私”字那就不行了。既然真心诚意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因为戴了帽子，就不团结了，为何不互相之间来检查，来总结经验。恐怕还是“私”字，我不是说这个同志怎么样。不要老记着谁拉了我一下，这是“私”字挂帅，丢开“私”字一心为革命，有什么问题不可丢开呢？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全局，什么事情都能想开。摆在革命造反派面前的大任务是打倒“私”字，与“私”字斗一辈子，现在要更好地注意。革命派过去受压抑，现在夺了权更要注意，所有的革命同志都要注意。问问自己为什么？凡是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到底为“公”为“私”问一下自己。这样做，才能保证不犯错误。只有打倒了“私”字，才能证实是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如果不能打倒“私”字，说明是没有学习好。不打倒“私”字不可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不可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可能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材料问题不要纠缠了。院夺权委员会研究一下烧掉就行，死材料是活人整理的，问题在于思想上是不是彻底批臭批垮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不批臭批倒，人还在，心不死嘛，将来还会搞出新的材料来的，关键是思想问题。

“平反”，根据 16 条和中央指示办理，凡运动中因对当权派贴了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同志，一定要平反。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对象不能平，四清运动的成果不能平。但你过去说了错话，不该打成反革命，但错话不能说没有，也不能抹杀，抹掉了那对你有什么好处。过去的错误要承认，要实事求是，要有阶级分析。

现在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同时要夺“私”字，巩固大联合。中央提出“三结合”，以一个大单位来讲的，科学院马上“三结合”是没有办法的，要看具体情况。领导干部和中层干部按《红旗》社论区别对待，要遵照毛主席指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办。这是第二个问题。最后，要认真“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你们厂担负的政治任务必须做到高质量高产量，并且力争超额完成。尽管同志们有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观点，但不能影响到生产上去。现在出现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毛主席在关于《纠正党内的几种错误思想》中所说的小团体主义等都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在科学院，你们厂也不例外，不能因为不同的观点而影响生产。不同意见是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讲道理嘛！民主集中既有民主又有集中。不能什么事我都不赞成，你还要相信群众大多数，说出来不承认说是群众说的，一个人二个人也是群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前提下，不要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笑话，不要给坚持反动路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看笑话，他们最高兴看笑话。

造反派夺权后应该主动让大家提意见，对人民充分发扬民主，对敌人专政，不同意见要用民主方法解决。在“抓革命，促生产”上应该统一。一要革命你们大家都说赞成，二要促生产大家也说赞成，既然赞成不要分歧，应大联合。不同的意见千万年还会有，通过矛盾的斗争才能推动社会发展。(注：刘西尧同志是总理在科学院的联络员)

583. 李先念接见商业部机关红色造反团、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1967 年 3 月 7 日 国务院小会议厅)

李副总理：我来向你们检讨来了，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你们来了多少人？

众答：二十五人。

李副总理：(拿起被接见的人名单)，那位是边维雋同志？

边答：是我。

李副总理：许润生同志，噢！见过面。

郑康宁同志是那个？搞什么工作？处长。

张良真同志搞什么工作？

哪位是孙永明同志？

孙答：我是司机。

李副总理：给谁开车？

孙答：给牛萌冠。

李副总理：牛萌冠怎么样？

孙答：有病没有上班。

李副总理：那位是朴文山同志？你是朝鲜族吧？

朴答：不是，可能祖先是。

(李副总理很亲切关怀地把被接见的二十五个同志一一问了姓名和做什么工作。)

李副总理：边维雋同志是红反团的，朴文山同志是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的，你们联合起

来了吧？

边：我们交换了几次意见，联合起来了。

李副总理：那好！你们有什么问题谈谈。

边：我们商量了一下，请副总理指示。

李副总理：什么指示？

边：我们造反派内部中心搞整风，二月十七日总理、副总理对我们提出批评。

李副总理：那次批评你们，因为财政部的问题，批评重啦，有点气，道道歉吧！你们已经检讨啦，还是有错误的，老检讨干吗？不能说没有错误。

边：上次总理、先念同志给了我们很多指示和批评，我们坚决贯彻，回去就检讨。并组织全体红反团战士对红反团筹委提出批评。有的筹委的错误，也用大字报进行了检讨。主要围绕通缉令问题，我们最近还要向全体战士做一次检讨。

李副总理：不必了，要那些检讨干什么！

边：我们整风围绕四个主义，一、极端民主化；二、非组织观点；三、无政府主义；四、小团体主义。强制学文件，两个造反派内部都在整风，进度差不多。整风中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入，我们还要研究。从商业部当前看主要搞大联合，红反团、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交换了四次意见。三个问题上意见一致：一、根据总理的指示和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需要，商业部大联合是当务之急；二、商业部组织比较多，两个较大的造反组织是红反团、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红反团 500 多人，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 100 多人，还有许多司局兄弟组织近 50 个，400 来人。

李副总理：有多少人都组织起来了？

边：除两个大组织以外，还有大约近 50 个组织，400 来人。如果不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不好进行，一斗、二批、三改不好进行，革命的新秩序也不好恢复。因此迫切需要把大联合搞起来，首先我们两个大组织先联合起来，最近几天全部对大联合进行大讨论、大辩论，商业部如何大联合，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上面红反团、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红卫兵联合起来，通过协商推荐的办法组织临时筹委会(先念：可以吧！)司、局也这样组织起来(先念：直接选举看来不行吧！恐怕一二个月也不行吧！)成立筹委会或小组，先组织起来，任务有三条：一、领导文化大革命；二、监督业务；三、大联合。组织筹委会后，立即着手筹备自下而上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现在三个组织已写了一个联合声明，讨论修改后给先念同志报来，最近全部职工对大联合都很关心，正在讨论，但还存在一些问题：1. 革命组织取消不取消，红反团、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及支、分队如何？群众意见有两种：第一，暂时保留一个时期；第二，筹委会成立后总部取消，各司局支队、分队也取消，看来我们倾向的意见，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未成立之前，暂不取消；第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再取消较稳妥。2. 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到底革命派怎样划分？我们思想不明确。(先念：是呀！)现在出现两种情况，有的群众没参加组织的，要求积极参加两个大组织，不批准他们就自己组织起来了。如果都联合起来了，这不就成了过去的文革了，没有区别了，对这个问题我们思想上不清楚。我们当前工作主要抓两大项，一是整风，二是大联合。还有几个问题提出来请示：一、商业部下一步运动如何搞？二、大联合筹委会成立后，筹委与党组、政治部是什么关系？上边谁来领导？三、运动期间群众对姚依林、王磊同志揭发很多问题，材料如何处理？我们准备整理起来，转给他们做检讨参考。(先念：当然要检讨)材料未经过核对，核对不核对？我们不明确。(先念：你们自己考虑。)四、商学院红反军参加不参加商业部筹委会？讨论中有两种意见：一是参加，有的同志说先念、依林同志讲过欢迎他们参加。一是不参加，认为中央有规定，必须特许批准才可以。红反军的意见，即使参加就是参加一个人。五、先念同志对我们造反组织的工作有什么意见请批评。上次(二月十七日)先念同志说，我们犯了方向性错误，同志们有不同看法，今天我们向你提出来。

李副总理：朴文山同志有意见吗？

朴文山：边维雋同志讲的几条意见，是我们研究过的，请先念同志做指示。还有一点，姚依林同志在合作总社讲话，对我们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的看法，是错误的，上次(二十七日)找他，他表示赔礼道歉，不符合事实。这次谈话我们写了个座谈纪要要发表，已送给他，今天七天了还没有答复，要尽快答复。

李副总理：(念姚依林在合作总社的讲话材料)有当过日本特务的吗？

朴文山：没有！2月27日找姚依林同志谈，他说不熟悉这个队伍的情况，讲了错话，我们要求记录赶快公布出来，澄清事实。

李副总理：他(指姚依林)夫人刚打来电话又晕倒了，高血压吧！休息两天。好，还有那个意见。

许润生：请先念副总理指示。

王崇臻：机关红卫兵去年有个文件，中央机关不搞红卫兵，搞起来的不发展，现在中央有没有新的精神？(先念：没新精神)大联合后，各个组织都要解散，红卫兵要不要解散？中央怎么指示，我们怎么办。但同志们有两种意见，一是要解散，二是红卫兵是毛主席支持的，不同于其他组织，是出身好的青年人组成的。

李副总理：群众有这个热情，强迫解散也不好嘛，既然这样，留一个时候吧！机关今后怎么样？我看不一定是，有民兵吗？

李尚平：先念同志精力好，时间来得及的话，给我们讲讲形势吧？

李副总理：看报纸嘛！报纸都讲了嘛！有人说国内阶级斗争要服从国际阶级斗争，我没听见有这样的说法。文化大革命到这个时候搞了八九个月了，总要转入正轨吧！当然过去也不是不正轨。要相信群众嘛！文化大革命是主席亲自发动，亲自指挥的，从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主席亲自批示发表后，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啦，但是刘、邓反动路线扼杀了这张大字报，主席路线很短时间内没贯彻，而却反对这个路线，派了工作队，压制了学生，机关也如此，压制革命干部，压制了革命群众。主席回到北京后，发现了这个问题，开了十一中全会，纠正了这个错误，开始反对了刘、邓的反动错误路线。主席一张大字报，字虽然写的不多，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伟大的国际意义，重新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中央文革始终坚持主席路线，做了很好的参谋部。文化大革命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现在夺权时期，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记住这是党内一小撮人。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成绩、伟大胜利。最大的胜利是清算了刘、邓反动路线，过去我们也是不理解的。把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一步在党内的确定，可能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在我们党内的出现，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好的多了。这个民主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领导下的民主。第二个伟大成就，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被挖出来了。这是最危险的敌人，三反分子，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彭、罗、陆、杨这样一些人物吧；第三点，革命同志有很多缺点错误，通过运动克服资本主义的东西，个人主义的东西，私字的东西，确立主席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同时，在广大群众之间，普遍深入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人民进一步热爱毛主席，对反动路线的仇视，对敌人的仇视，不仅有国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有些问题十一中全会，《红旗》社论，主席讲话，林总讲话，中央文革同志讲话都讲了，要好好学习，共同学习。我，我们呢，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想跟上毛主席跟上了没有，我犯了错误，犯了不少错误。有很多东西我不理解，现在还有不理解的，你们都理解了，我也不相信。派工作队，总的执行反动路线，反动路线是有市场的，是个习惯势力。这样大的民主，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起来批评，领导就压制。这样大民主没想到，就在六、七月份，把人家打成反革命，真右派、假左派，虽然没有做结论，但同志们的精神上有很大压力呀！我自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是没有的，对何畏我是老保的，我说大字报轰是可以的，不要说是三反分子啰，现在办公室还老批评我。把人家打成反革命，责任是我，因为我是五办主任嘛！兼财贸党委书记嘛！要责任多一些。机关发生多数派、少数派的问题，主要是学校，商学院、

财经学院。对少数派没有支持，就是和稀泥，搞两派团结，只说以十六条为纲，团结起来，少数派就批评领导，批评的对嘛，有造反精神嘛，是革命派嘛，应该把他们支持起来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没跟上，总认为批两次算啦。确实这样，大字报轰，不这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不臭，批不倒，批不垮。一直发展下来，到现在夺权，我犯了路线错误，我发现了，出国前，我写了个东西，我相信主席，没有相信群众。犯了错误，不要扭扭捏捏。一个司令部不能说在学校里说了反动路线错误，在机关里讲没有，这个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机关里打成反革命也有嘛！我犯了错误，向打错了的人赔礼道歉。不能向打对的人道歉。这就是原则啰，立场啰，打错了的，不管是干部也好，学生也好，坚决平反；打对了的，是牛鬼蛇神，不能平反。我们造反派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让坏人钻空子。有这么一类人，你说他是牛鬼蛇神，并不是，你说他是革命的吧，也不是那么革命，群众意见很多，在上下左右一起扫，党内外一起扫，他大字报特别多，红卫兵起来了，群众就给他们挂了牌子。他们有错误，但不是牛鬼蛇神，要实事求是。这些人怎么办？要平过分的那一部分，革命要注意这个问题。你说他完全是对的，那就脱离了群众，他确实有错误。我这个意见对不对，我们犯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

对几个学校，成绩要估计足，他们做了很多工作，红反军呀，“八·八”战斗队呀，他们煽革命之风，点起社会主义之火，成绩是主要的。听到说朴文山你们与“八·八”关系多点，边维雋你们与红反军关系多点。他们是个力量，敢想、敢说、敢闯，比机关干部来得快些，我们要支持他们的这个行动，不要批评他们这个行动，他们做了很大的有益工作，有些缺点他们自己去做检讨。商学院有张大字报，我指出过，怕他们犯错误，你们大概知道吧。我不是否定他们的成绩，否定他们是左派。你们也是这样，主流是好的。党组是有错误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自己也有错误。夺权中，不能说你们有方向性错误，当时(2月17日)有点气，讲的是一小撮，你们是一大撮嘛。过去了，不批评你们了，你们做了检查了，党组解散，部长都撤了，脑子一热嘛。姚依林在中南海，以后董枫告诉你们吗！你们发通缉令，中央机关吗。(许润生插话：我们要事先知道总理叫他来也不会发)。事情过去了。你们把通缉令摆在我面前，我火了。(许润生插话：你一火，把我们吓一大跳。)你们做了经验教训嘛，我们也是个教训。你们给姚依林戴高帽子没有？(众答：没有。低过头。)这些办法不妥当，中央不提倡，主席不同意的。斗争是群众热情，群众有激愤，现在好了。有些是群众热情，有的是被坏人利用了群众的热情，如湘江风雷、红旗军。

干部是有怨气的，要做工作。商业部党组就有怨气，为什么要发那么一个公告？这是不正常现象。我批评了他们，要他们向你们做检讨。你们有了个错误通电，我看了，应该由你们造反派自己去纠正，当然，那个通电是不好，叫我批，就不批。财政部，粮食部有个电报我打个电话叫他们改一下。今天财贸党委召集党组开会，有些过激，戴了帽子，有怨气，和群众对立情绪，这对谁有利？对帝国主义有利，对刘、邓路线有利，对修正主义有利，他们希望我们有怨气，刘、邓希望我们有怨气。不只我们做工作，你们也要向干部做工作，既要批评他们，只要他们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要和他们开座谈会，帮助他们，和他们交心、谈话，做他们的工作。这是突出政治的时候，要毛泽东思想挂帅嘛！双方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所有的人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所有的人都要突出政治，所有的人都要四个第一，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他们(部长们)说，有什么怨气呢？如果刘邓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国家就修了，那时你抱什么态度？要么就跟他们走，那就修了，要么就反对，反对就要杀头，杀了头想戴高帽子找不到脑袋，游街还找不到人啦。要想开嘛，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嘛！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嘛！所以党组应该向你们做检讨，做自我批评。

红反军、红反团、革命到底战斗队、“八·八”，做了很多工作，很好，这是主流，在一段时间中犯了错误，主要是红反军红反团。(朴文山插话：我们也有错误)我知道，你们(指朴

文山)斗争方法上有问题。你们应该接受教训，应该提高嘛？青年人嘛，接班人嘛，都是青年干部。

第二点，我支持你们，凡是正确的我支持你们，我认为不对的知道了就提出来，交换意见嘛！有一个时期我提出来你们不听，你们对我有怀疑，我知道，我认为我还得讲，不听也要讲，看到你们青年人犯错误不讲，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我看到不对的要讲，也有时我可能批评错了。

第三，你们开门整风，整风好，我赞成你们。整风不是老是检查，要提高，要听取批评，要提高思想，要学习《九评》里的五条，接班人五条嘛：第一条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团结群众嘛，不仅团结意见相同的人，这容易，一拍即合嘛，要善于团结反对过你们的人而证明是他错的人。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为人民服务，团结大多数人，要批评自我批评，要破私立公，不要犯个人主义，要为大多数人服务，责人宽点，责己严些，当然是有原则的，要坚持原则修正错误嘛，主席讲了很多嘛；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嘛，要治病救人嘛。一提整风，我又担心啦，因为两个自我批评，两个批评，一个是造反团下边对上边的批评，一个是非造反团的群众批评。批评要恰如其分，很难做到，在某些方面，你们压制了人家，现在既然要人家提意见，就会把问题提的乌高八高，说什么你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反革命行为，形左实右，什么反动行为，同志们注意，过火的批评到头来总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下边对上边的批评，炮轰总部，我说为什么要炮轰呢？整风还不过瘾，只有炮轰才过瘾，为什么提的那么怕人？什么炮轰、油炸、火烧，叫整风就完了嘛，整风不能一棍子打死，原则要坚持。我是支持“八·八”战斗队的，什么“八·八”解散啦，头头反省啦，这是北京红色造反职工发的传单吧！我说要辟谣，这样不好吧！“八·八”做了很多工作，我认为红色造反职工是一棍子把“八·八”打死，昨天，我也告诉“八·八”，你们不要怕嘛，我对敖本立讲，承认错误嘛，把工作做的扎扎实嘛，打也打不死，有缺点改嘛。把缺点改了就够了嘛。外面批评你们，下边也批评你们，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实事求是，是错误就承认。但也有一种整风，不叫整风，只许人家说他的好话，那不叫整风，那叫整火。要有个好的作风嘛，既有个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嘛！

关于大联合的问题，我看你们自己去创造。我提不出什么意见。联合就是部本身先搞一个临时筹备机构，直接选举现在看来还不行，我赞成你们协商一个名单，十三个不够可以十五个人嘛，联合起来嘛，监督业务嘛，领导运动嘛，筹备三结合嘛！

红反军不来，还是叫他们参加个把人好，朴文山你们怎么样？商学院和商业部是两个单位，不能看成是一个单位，他们在你们那里干起来了，有了感情，现在不要人家好不好？我提个意见，你们去协商嘛！主要是你们自己，按五条讲是回校的，外贸我批准了一个人参加部里筹委会，他们作了很多工作嘛！现在搞大联合，有人贴大字报轰人家，我看这不好。

贴总理大字报是错误的，国内外有影响……不能说是指贴总理大字报的一个同志反革命，这家伙糊里糊涂的。大联合把“私”字去掉就能搞起来，“私”字不去掉，永远搞不好。搞起来，红反团、革命造反到底战斗队的组织还保持不保持？现在有一个贵阳经验，一个青岛经验，恐怕最后还是青岛经验。我看强扭的瓜不好，总要等瓜熟了再搞。组织最终是要取消的，但不要心急。我倾向上边先联合起来，但我不能做决定，这是比较好的经验，现在百花齐放嘛！

什么叫革命派？革命派总要旗帜鲜明嘛！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明朗，行动坚决嘛！是站在那一边？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在刘邓一边？还是折中？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吧！有的一听“保”就怕的要死，要看你保谁嘛！是保毛主席路线还是保刘邓路线？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无产阶级当权派？保资产阶级当权派就错了，保无产阶级当权派就对啦。云南同志讲不能走上层路线，上层有两个嘛！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刘邓嘛！一个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一个是刘邓的司令部嘛！是不是革命派要看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是口头上还是在

行动上。

干部不是在亮相吗？一条是自我批评，诚诚恳恳地，犯了错误嘛，实事求是地检查；一条是要真正站在革命造反派这一边，不是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第三，自己知道的一些问题要揭发出来，是什么性质的就是什么性质的。不能采取以前斗争的办法，那样，连检讨的机会都没有啦！我听说你们拿起话筒时：讲！讲！讲！那样脑子转不过来，思想斗争是很痛苦的呀！

总理在接见工交口的时候，有人说，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总理讲，不能那样说吧，运动已经进行了八九个月了，你的左派是怎么起来的，如果没有揭开，你们早就被镇压下去啦。

下一步运动怎么搞，部党组搞业务，你们监督，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组检查你们批判。司局里边，不一定人人过关，还要靠你们与党组去协商。

临时筹委与党组的关系，我们还没有研究。按道理应当体现党的领导，党组还没有向你们检讨，我建议可以让政治部做些工作，你们与党组商量嘛！

姚、王的材料，你们可以交给他们，他们讲清那些事实。上海一篇文章《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很好，我读了三遍，有个时期材料挂帅嘛！一个人十七年来做工作，你把他的材料，什么时间说的这句话，把头尾一去，那还得了吗！每篇讲话针对性是很大的，当时历史条件，时间、环境(不清)，讲错了话不少，把材料交给他，叫他交待，看那些材料确实，核实审查一下嘛！你们的大方向是对的，有一段时期犯了些错误，过去了，算了。有些缺点和一些毛病是允许的。

(上面谈到的关于姚、王材料问题)

讲到王田。那天我也发了火了，说王田平反不算数。你们可以讨论嘛，他说他一贯正确，好象就是他代表正确路线，他说姚依林和吴德作了政治买卖，不能那样讲嘛！后来他写来了信，态度还是很好的。

还得向李尚平同志道歉。上次，我说“好啊，藐视中央，藐视总理”。后来一了解，党组没有知道。我道歉。刘考如到上海去了。

边维雋：“回来了，在上海三万人开大会斗他，他态度还是好的。”

李副总理：“告诉他，不要再呕气了，去年五月二十七日×××来了，找我汇报东北之行，说三个人不听他的话，有几个人是他提出调的，王磊他们同意的，那时文化革命还没有开始嘛，我说，干部不听你的话，你要去作工作嘛。干部不听话，一个是干部不好，一个是你不好嘛，你要做工作嘛，我就知道这件事。我从阿尔巴尼亚回来，党组说刘考如搞错了，我说搞错了就平反。那次×××谈了东北之行，又谈了几个干部不听说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要向你们解释，和吴习之的问题，这个问题斗了多少年，他和总理闹别扭，当面顶总理，总理批评了，当时也把我批评了，批得对！那一年是商品多少问题，他多了就减价，少了涨价。有一次，我打电话到天津，请姚依林、王磊回来帮我改进工作，和吴在理论上有争论，在文化革命中他跳出来了，这是从上揪出来了，当时我不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次红反军和我交心，说你揪吴习之给我们压力太大了，噢，这我才理解。但说揪吴习之是反动路线我就不同意，彭、陆、罗、杨就是从上面揪的嘛。还是作官当老爷，没听群众意见，我向同志们交心，那时有个老框框就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什么不能到群众中去呢？应上下结合嘛！

有人骂我保，老实讲我还真有点保皇派，总觉得没到时候，老是那么老框框嘛，圈圈嘛，有些问题我不是作了结论的，你们比我高明。

大联合、三结合，这是个方向问题，斗、批、改。有些问题只是提供你们考虑，有些问题希望你们多和党组商量一下，少犯错误，与人为善嘛，但并不是说不揭他们的问题。应该团结，批评、团结嘛，逐步做到团结干部的大多数，团结群众的大多数，我看还有个过程就是了。商学院、财院同学总是鼓了你们的劲嘛，是合乎毛泽东思想的嘛。学生们年青，对红

反军，“八·八”队要看到他们的成绩，要鼓劲，三结合你们在搞，成熟了，告诉我一声。

许润生：请先念同志对我们指示，我们贯彻执行。

李副总理：不要说指示，我们是意见嘛(开玩笑的说)你们作错了，贴我大字报，我可不负责任。

许润生：我们在内部传达一下今天先念副总理的讲话可以吗？

李副总理：可以嘛！

许润生：我们今天来一是请示汇报工作，二是交心。我们过去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向上汇报少，请示少。对姚依林不信任，对先念同志有怀疑，老实说，我们对先念同志还是有意见的，在红反团 11·19 成立以后，12·9 给先念同志写过信，请先念同志接见我们，后来又请王磊同志传达过两次，你就没接见我们。

李副总理：这个意见好，我接受。

许润生：对党组扩大会议群众意见很大，在那个情况下，把吴习之揪出来，开始确实把群众压了下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晚，就是因为党组扩大会议压下去了，先念同志在党组会上第一句话，就是商业部不太平，此外二月十七号总理、先念副总理接见以后，对我们压力已经不小了。先念同志又把我们的检讨让写大字报公布，批评我们是对的，后来我们做了检查，又让写大字报，让群众讨论，这时我们压力更大了。

李副总理：意见提的好。吴习之的问题，对群众有压力，确实不理解群众的心情。二月十七日发脾气向你们道歉(朴文山：二月十七日晚上很紧张)我发了火，打了两次电话，这个人(指杜向光)就是违抗总理的命令。造吴波的反我都不知道，他要来谈业务，我说好。他先讲语录，我说好，叫小将来做记录。

许润生提的几条意见，我都接受。党组应向你们交心，你们也要向党组交心。凡是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们都支持，我们错了你们提出来，你们错了我们提出来，培养一种民主作风嘛，希望你们搞好。外贸造反派找来，老是抓人家小辫子不放，一天一个电话叫我接见，我不见他，他是左派，我一见他，他们骂人更凶啦……他们说你接见××不接见我拆我的台，我说你相信我不相信我，我接见××你把我打成三反分子。我希望你们搞好，希望你们联合起来！(对边维雋、李尚平、郑康宁同志)你们是干部嘛！(又问朴文山同志)你们还有分歧吗？(朴文山：开始有，通过整风少了。)你们两家先合起来！不要吵了嘛！吵下去有什么味道！

“三结合”要逐步搞，水不到渠不成嘛！

李尚平：像今晚这样，先念同志找了我们来，互相交换思想，对我们教育，帮助很大。这样，最能解决思想问题。希望今后能经常交换思想，交换意见。

上次总理和先念同志接见我们时，批评了我们，对我们教育很大(先念同志插话：过分了)，回去就作检讨，大家很认真，我们进行整风，学习毛著。我也给总理、先念同志写了信，作了检讨。我一定要帮助年青人把三结合、大联合搞好，要不还会犯错误的。总理批评的很好，很及时。

关于我个人，一方面感到干部责任重大，一定要按中央精神办事；另一方面，理解先念同志讲了几句气话。但是作为副总理来讲，把气话提得那么高，就“藐视总理，对抗中央”影响是不好的。我现在成了全国闻名的人。先念同志讲话后，孩子们就打来电话，问我为什么对抗中央，今天上海广告美工人员要揪我到上海检讨。(先念同志插话：那不能揪嘛！中央有指示。过去的工作怎么能揪？！我的话说错了，你们可以用大字报贴在院子里。)上次我请姚依林同志转告先念同志，说先念同志不了解情况就把问题提得那么高，感到先念同志对我的态度是不友好的。(我向你道歉嘛)现在先念同志向我表示检讨，我把这句话收回！

朴文山：先念同志对我们期望很大，我们回去要好好工作。希望先念同志经常接见我们，给些指示，免得我们在政策上犯错误，我们压力是很大的，斗争任务很艰巨，又有那么多群众，希望今后多给些指示。

丁文祥：二月十八号总理接见司局长干部时，先念同志说姚依林到中南海休息，事先已

经和你们打过招呼，为什么还要揪？我们说不知道，没有和我们打过招呼，结果，部里反应很大。先念同志指的是十五号晚上，董枫同志传达总理的三点指示，还是别的什么？

李副总理：那天晚上(指二月十二日晚—记录者注)你们的人都在门外(指国务院北门)，董枫传达了总理的三条，就是指的一次。

584. 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王力、关锋
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与革命造反派的谈话
(1967年3月8日)

中央文革的同志于3月8日凌晨来到八一学校参观了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派总部举办的“联动”罪行展览，上述同志与造反派谈话整理如下：

我们首先向康生同志汇报了三月五日一小撮家长破坏我总部举办的家长座谈会情况，首长非常气愤。

康生同志说：“你们根据军委八条写一篇文章。”

谢富治同志说：“登人民日报”。

我们说：“我们要求家长按照军委命令八条认真教育子女，有人说这是我们压家长。”

康生同志连连点头。

在展览室内，我们汇报我校不能开学的原因以及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中央的情况。

康生同志说：“个别情况应严格区别。”

在参观场路上，又问到开学问题。

康生同志说：“这个学校要彻底解散，重新招生。”“这儿那能没有军队？这儿是老窝？”

谢富治同志说：“要解决一下问题，这个学校要驻军队。”

康生同志说：“下通知，让他们都来嘛！”

康生同志又气愤地说：“都来，都来，用兵围起来，把大门关起来，一个一个地整，一个一个地检讨，一个一个地审查，整完统统滚蛋！”

康生同志在参观路上看到一个大门上写着过去的当权派的题词：“培养新一代”。康生同志不满地说：“培养那个阶级的新一代呀！”

在参观完被“联动”破坏的不象样子的标本教室后，康生同志气愤地说：“土匪、匪，完全是土匪！”康生同志气愤地问：“谁是校长？！”

我们汇报了情况并说：“学生说校长是二百五干部(即傻瓜)。”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同志哈哈大笑。我们向中央文革反映我们的展览，家长等都不看。康生说：“要看！”去参观“大观园”时，康生说：“这里比颐和园还好嘛！”我们向康生同志建议：“红代会举办“联动”展览会址应该设在八一学校！”康生同志说：“这里挺好嘛，一看就知道“联动”，修正主义是怎么分裂出来的！”这时关锋同志说：“高干子女再也不能集中在一起了”。“干部子弟学校不能办了。”康生、伯达同志连连点头。参观路上，总同志向首长汇报说：“我们要解散这样的学校，让学生到工农子女中去，参加一段劳动。”康生、伯达同志连连点头说“这倒是个好办法。”走到水塔附近，伯达同志讲：“这个地方当个疗养院还不错。”我们反映说：“参观展览的工农兵群众也说这里可以做疗养院。”我们汇报了“联动”分子现在还在活动，还在展览会门前点火，伯达同志讲：“还这样啊？！”谢富治同志问：“查出来没有？”他还说：“这里就是培养“联动”的社会基础。”最后康生同志说：“明天让干部(指《红旗》杂志社干部)统统都来，把会调开，座谈会不开了，明天参观时可以谈更详细一些。”

康生、伯达、谢富治等首长离校时大家一起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585. 康生对全总四个组织主办的《红旗》第一期
《揪出反革命两面派刘宁一》一文的批语
(1967年3月8日)**

康生同志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红旗公社、全总机关“国际红旗”公社等四个组织主办的《红旗》第一期上发表的《揪出反革命两面派刘宁一》(康生同志在该标题前面打了个大问号)一文的批语：

刘宁一同志不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他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把刘宁一同志诬蔑为反革命分子，并且到处散发，这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刘宁一同志不是“三和一少”路线的制定者，相反，宁一同志是首先揭露和反对“三和一少”的人。此报诬蔑宁一同志是“三和一少路线的制定者和忠实执行者”，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替真正制定“三和一少”的人打掩护。

此报盗用《红旗》党刊主席的题字，作此报的报头，制造混乱，鱼目混珠。我将这些意见写给了富春同志，富春同志已经写信给全总写这篇文章的四个组织。信的内容可问富春同志。

康生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

**586. 王力接见广播事业局整风小组、战斗团总部、
广播学院“北京公社”几个同志的谈话
(1967年3月8日晚 人大会堂)**

王力同志：二·一八事件是很严重的，出了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整风内容，应当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通过整风使广播局建立起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总部个别人犯了严重的错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但是这个革命的组织嘛！就是这个组织很大，很杂，不纯是需要整顿的。

整风小组汇报了整风学习情况。

王力同志：你们学了些什么？……你们那几篇还不够，还有贵阳第一棉纺厂的经验，是毛主席批的，《文汇报》三月六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也是毛主席批的一篇文章。《搞臭风头主义》这篇文章与广播局很相似，不老老实实的搞内部问题，在外头混，好出个风头。(王力念《文汇报》社论)……

整风小组谈到三结合问题时，王力同志说：现在还不是那么太忙。现在主要是进行整风学习问题，战斗团和全局革命同志进行整风的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问题。

王力同志叫王自强、刘扬体、曹仁义到大会堂。

王力同志讲：一直没有时间找你们，今天有点空，李敦白、李娟、康树集也是第一次谈话，没有时间处理广播事业局的问题。你们的检查(指王自强、刘扬体、曹仁义)我看过了，检讨得还好，不必那么沉痛。战斗团一定要整风。要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

要开门整风，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全局统一的革命组织，建立一个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战斗团过去作了许多工作，当然帐不能记在个人身上，……现在建立三结合还不利，应进行整风。现在各大部口不一定都建立整风小组。有的已经建立起来可以和联络员结合起来。总部有些联络员犯了错误，下面的联络员有的有责任，有的是没有责任的，有的责任不大。

要提倡战斗团开门整风，我号召全局革命同志进行整风，只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都要着重自我批评，对总部的批评是欢迎的，也是可以的。适可而止行不行？还那么批评下去不行。要学习主席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贵阳的经验》、《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文汇报三月六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你们（指王自强、刘扬体、曹仁义）要好好学习这些文章，对你们的情况更切合些。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一边战斗，一边整风。要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

12·31 夺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建立一个能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还没有完成，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但后来又倒退下去了。不能忘记这个任务，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为整风创造了条件。你们不能超越界限，要掌握原则，中央指示很清楚，是个别人的，不是整个组织的，不能把整个组织搞得灰溜溜的，更不能把这个组织说成反革命组织，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反击！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种提法也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口号。打、砸、抢这个口号也是错误的，这个口号和中央提的口号是违背的，如果采取这样行动是非法的。过去你们也搞了小砸，不提倡这个做法，要彻底砸烂旧机器是指的政权要彻底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你们总部的几个人，经过考验，我们有一些人，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世界观还有许多毛病，夺权后暴露出来了，经不起考验，我们本来对广播局的估计太乐观了，过去确实是那样认识的，一个是联络站，一个是宣传小组，不是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宣传搞得也很好，事实教育了我们，并不那么简单，很小很小的风浪，一些同志就经不起考验了，你们没有经过风浪，应从中得到教训，大风大浪前头还有，要看到整个斗争的全局，我们好象对同志们讲过，二、三、四月是决战的关键时刻，是指省市一级的，全国还要更长的一些时间，要等明年四月才能看出一些结果。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决战，我们应当紧紧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一步也不能离开，紧紧站在中央文革小组一边，一步也不能离开，离开了你们给谁广播，发出的是谁的声音。这方面没有任何价钱可讲，有意见也可以讲，但对中央文革小组必须绝对服从，谁不服从就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谁不广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声音，谁就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动摇就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尤其不能在负责岗位上工作，不能含糊，不能含糊，不能听别人的话，不允许有坏人插手，不允许有黑手，这一点不能含糊，他们代表什么路线，是什么人谁也不知道。这是阶级的决战，你要是真不听的话，请走路，闹，就派军队，电台不能含糊，军队就是专政，枪杆子只能由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指挥，无产阶级最重要的支柱就是军队，电台不允许有问题。特别是不许电台对中央有任何的独立性，这一点同志们我刚才讲的是斗争的全局。现在处在两个阶级斗争的紧张的时候，看来现在中央文革小组还不到垮台的时候，人家敌人是希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垮台的，那么一些小小的风波，你们就不那么正确，采取错误的做法和行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失败的可能，有胜利的可能，我们希望胜利，争取胜利，我们有这个信心。如果有风吹草动，你们屁股坐到那里去了，还没有风吹草动，真有了，同志们是否还认为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可信赖的。市台是小问题，是小事情。中央台争权是大问题，中央台夺权掌权是大问题，我老早就告诉了傅崇碧（市台的同志）搞不好就派军队，几个钟头几分钟就解决了，你们是中央台，是毛主席的电台，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电台。你们当成小事，当成儿戏，问题就大了，是最大最大的问题，是天大的事。中央台掌权后不意识自己的地位，毫无觉悟，你们热衷于到外面去搞什么造反公社，大会发倡议书，全红总，这些东西比起电台掌握在谁手里是很小很小的问题，这么大的电台你们不认真抓，谁掌权你们不管。掌权后不能搞风头主义，宗派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存在于思想上。

你们好用请罪这个词，不要什么请罪，你们的错误很大，大在你们是中央台，处于这个重要的岗位上，又是当权的，口头上说说没用，要真正的触及灵魂，别的地方炮打中央文革性质还不那么严重，这个问题发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你们又是当权的，要认真地触及触

及灵魂。你们认为夺权斗争就那么顺利吗？我们提出干部问题、三结合问题，受到广大群众拥护和欢迎就那么顺利吗？阶级敌人就那么安稳？敌人会利用我们的口号搞复辟的！从上到下都有这种活动！你们炮轰是小小的炮打而已，人家最恨中央文革小组。二·一八电台问题我们重视了，去了两封信，但在中央文革还排不上什么位置，不把它当回事儿，可这与反中央文革的逆流时间差不多，配合在一起。当然我们是分开看的，不认为是你们搞的，你们要提高警惕啊！我们是不怕炮轰的，一些学生倒很敏感，我们没讲什么话，他们就摸到了政治气候。我们希望电台能和中央文革共患难，真正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和我们站在一起。刘邓上台要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的，就要人头落地的，要顶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不能随刘邓上台就倒过去，马列主义可以播，修正主义可以播，马列主义就不那么高明，这还是什么马列主义？

谈到整风。王力同志说：整风是个教育，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风的方法是要自我批评，犯了错误就改，不要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你们要分清，你们总部的人就通通那么好，我不那么相信。通过整风，要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秩序。大乱、分化，都是错误的。过去乱得乱梅益、丁莱夫。现在要建立新秩序，乱谁？你们应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门整风、学习。号召全局的革命同志都要整风。战斗团外是革命的组织也要整风。在整风的基础上，研究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建立全局统一的战斗组织。要反对风头主义、反对占山头。要学习三月六日《文汇报》社论，要研究革命的三结合，要准备革命的三结合。马上搞三结合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王力同志对三个犯错误的同志说：你们三个人都那么坏，我不相信！你们那个总部都那么好，我不相信。这个组织这么大，都好吗？我不大相信，要整顿，要向前看，12·31 夺权后的工作要及时搞好，要继续搞好三结合。要派军队代表，这是毛主席提出的，群众革命代表是主体，有革命的领导干部参加，才能组成。领导干部没有群众通过，我们不能作媒。领导干部要与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应与群众站在一起，批评自己，改正错误。

今晚八点半发表《红旗》五期社论。你们要把坏事变成好事，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整风，要向前看。必须把 31 日夺权没搞好的，没完成的继续搞好。这个整风过程，就是酝酿革命派团结，酝酿革命的三结合的过程。对革命派是整风，对立场还未过来的，先是过来，过来后也是整风。

整风要联系到整个掌权以后思想和作法。掌权以后有变化，好多思想毛病都暴露了。有两个夺权问题，第一个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自己以为是夺了，实际差得很远。第二个权，夺“私”字的权，没有认真去夺。

对敌斗争问题，可以穿插的搞，集中的搞。首要分子要有专人小组，研究他们的材料，要打得准，把他们捏死！集中力量搞。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二是把一切干部都打倒。我们要把矛头集中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斗争目标就明确了，三结合才能搞好，夺权才能搞好。三结合不能草率，要采取严肃的态度，不能一风吹，否则就会翻案，就会有复辟，这样就是推翻了十一中全会。

战斗团要整顿，总部要调整一下，你们注意不要有山头主义，要自下而上的按单位，按部门，按系统推选真正的代表，建立战斗性的组织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你们（指王自强等同志）的思想真通了，你们要做工作，要对有对抗情绪的同志做工作，你们要检讨，你们要个人检讨个人的，不要集体检讨，搞集体检讨就不是整风了。对你们当然要一看二帮，要看行动，不要诅咒发誓，要从夺权后，思想上、作风上、政策上检查、提高自己。不要开什么大会，大会有什么用处？多开小组会，大会整风在必要时也可以，不要提大揭发，大批判，大审查，还是提整风好！战斗团整风就是这么个精神，这么个问题，这么个方针。

学校整风是不是以自我批评为主，主席号召大联合，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权，这是革命的新阶段，老实说现在应反的是极“左”的倾向，现在有人提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是错误的，总部的错误是严重的。可以变好事，12·31夺权，两个权都没有夺好，第一个权没有夺好，第二个权没有认真去夺。发展到2·18事情，不是偶然的，对他们的错误要严肃对待，性质还是内部问题，要用整风方法，分清是非，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掌握运动的同志也走到运动的反面，这样不能严肃对待，广播局这么大的单位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个任务没有很好的完成，要解决下列问题：

一、用什么形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

二、怎么样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要解决三结合，就要认真对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让他们翻案，要继续认真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干部一概打倒这个错误不是革命群众的，而是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的一方面，这样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干部就解放了。在提到当权派这个字眼的时候，王力同志说：笼统地提当权派是不对的，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

谈到关于三结合派军事代表的时候，王力同志说：主席指示县以上的机关都要派军事代表，县以下要派民兵代表，包括机关财贸、大、中、小学也要派军事代表。谈到权力机构时，王力同志说：权力机构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

战斗团这么大，很不严密，他们(指三个犯错误的同志)没有政治警惕性，对待“全红总”也是这样。

587. 李先念传达周恩来三月七日指示 (1967年3月9日)

三月九日晚8时，李先念副总理在中南海召集卫生部机关红色造反团、红旗战斗团、革命造反队联合总部、东方红公社代表以及孙正、钱信忠、黄树则、罗冬祥(防疫司副司长)等传达了周总理三月七日关于防治××问题的指示。

周总理指示全文如下：

请富春、先念同志立即找卫生部孙正、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四同志和红色造反团、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和东方红公社三个革命造反组织谈一谈，看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最好建立一个防治××办公室，以钱、崔二人和三个造反派出一人，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用全力以赴，不要再以其它工作干扰他们，如有困难，立即解决，并在工作中考验他们。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588. 周恩来单独接见呼市三司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3月9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九日十六时五十分至十八时三十分

地点：国务院秘书厅会议厅

参加者：总理联络员赵刚、朱文明，总理秘书张作文

代表：郝广德、刘文研、张淑琴、刘树立、金世魁、宁奎喜(中间才去)(总理步入会议厅
分别同代表握手)

总理：你们和军区关系没有搞好，那怎么能行呢？他们打电话说，你们还散发传单，继续闹对立，你们组织内部有没有人在挑动啊？

郝广德：我们查了，没有什么挑动，我们从十八日以后停止了一切宣传。

总理：你们学生都回学校整风不好吗？

郝广德：我们正在整风。我们总部被砸了，没有地方呆了。

总理：什么时候砸的？

郝广德：三月七日夜间一点。

总理：谁砸的？

郝广德：红卫军。

总理：有多少人？

郝广德：三万来人。

总理：打伤人了没有？

郝广德：抓走了八名，打了很多。

总理：谁带头？

郝广德：红卫军、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同时还包围了师范学院，有二十多辆军用汽车，十多辆军用摩托。

总理：包围师院什么理由？

郝广德：军区说我们藏了军区人，下通缉令抓陈树健。

总理：你们有没有？

郝广德：没有，保证没有(把军区给师院东纵的信及师院东纵回信交给总理看)

总理：(看完后)敖特根……这不是抓了四个吗？

郝广德：那是从工学院抓走的！

总理：陈树健是干什么的？

张淑琴：《红色战士》报的编辑。

总理：军区的事，你们不要管，你们保护他们，对他们没有好处，反而害了他们。回去检查一下就算了。

(张淑琴把军区通缉令递给总理阅)

郝广德：他们包围师院时，有剧烈爆炸声，外面有探照灯，人员匍匐前进，喊冲啊，冲……。

总理：这是精神战嘛！师院有多少人？

郝广德：有一千多。

总理：下乡、下厂的学生都要回学校整风。清华的来了没有？

众：没有。

总理：清华在呼市三司的同学回来了没有？

郝广德：回来了，被抓的还没有回来。

总理：押在什么地方？

张淑琴：在军区。

总理：谁？

郝广德：陈鼎。

总理：不是已经放了吗？

郝广德：军区还没有放，他家长写的信，你见到了没有？

总理：没有。(又问秘书。答：没有。)首都三司在呼市的其他人还有吗？

郝广德：等陈鼎的还有两名。

总理：陈鼎是怎么抓的？

郝广德：因为他路过静坐的地方，说他是头头。

总理：他多大岁数？

郝广德：十六岁。

总理：中学生？

郝广德：是清华附中的。

总理：你们三司总部在总工会？党委给你们拨过款，拨过汽车？

郝广德：在总工会。拨过。和一司、二司一样，拨过一辆汽车，一辆摩托。(郝广德把逮捕医学院六名“现行反革命”公告递给总理看)

总理：那三十三人什么时间被抓的？(郝广德详细汇报了抓人经过及被捕人名单)

总理：什么理由？

郝广德：他们说三司是反革命组织。他们正在开整风会。被抓的人，有的是抢救韩桐同志的医生。戴上手铐，有的五花大绑，把衣服撕烂。田光同志是转业军人，身体有病，现在有生命危险。

刘树立：抢救韩桐同志的汽车司机小高，他们也要抓。

总理：一共抓了多少人？学生多少？工人多少？(查看被捕人员名单)(刘树立汇报了被捕总数)

总理：学生多，还是工人多？

郝广德：大部分是学生。

总理：十八号以前抓的吗？

刘树立：大部分是十八号以后抓的。

总理：押在什么地方？

刘树立：工人押在呼钢，有的押在军区、公安局。

总理：(记被捕人所在单位、分学校、厂矿、机关)抓人理由就是说三司是反革命吗？

刘树立：还有其它借口。

总理：工人抓了多少？(刘树立汇报了呼钢、机床厂抓人情况)

总理：你们铁路上还有什么事？

金世魁：二月八日反夺权抓了我们二十多名同志，还有十二名同志至今未放，其中：有副局长邢骏、政治部主任张泽民。

总理：为什么抓的？

金世魁：就是因为邢骏在炮打司令部时给党委成员贴了一张大字报。

总理：这两名同情你们吗？

金世魁：对。

总理：现在押在什么地方？

金世魁：据说在军区。

总理：以前没上班的现在上班了没有？

金世魁：二月八日反夺权以后，我们有五百多人不能上班，经我们作思想工作，有八十多名调度生产人员上班，现在有四百多名同志仍分组集训。

总理：现在有一半人没上班，机务运输怎么办？业务能正常进行吗？(问联络员说：问一下徐彬，呼市的运输情况到底怎么样？)(对张淑琴)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消息没有？

张淑琴：把以前在这的十六名同志都抓走了，五花大绑。有个女同志喊毛主席万岁，他们就用手帕把嘴堵上。

总理：你怎么知道的？

郝广德：有我们代表亲眼看见了。他们还说奉军委和总理指示抓的。

总理：(生气地)我怎么能指示抓人呢！

张淑琴：(把通缉令交给总理看)现在工资和粮票都不给我了。

(宁奎喜五点十分进入会议厅)

总理：陈鼎还没放？

宁奎喜：没有。

总理：谁叫你们静坐的？

郝广德：没有人(详细汇报 1·22、1·25 事件)

宁奎喜：(作补充)

总理：刘昌不出来作检查，你们可以写信么！不要登报么！你们一登报不就对立了么！

郝广德：我们登报错了，我们应该作检查。我们登报是 2 月 4 日后才登的。

总理：他们说你们以前就登过报！

郝广德：没有。

总理：(对秘书)《内蒙古日报》收集全了没有？(秘书把报纸拿来，总理翻看几张)你们有什么材料？

郝广德：我们有。(送上军区等散发的传单和反夺权后出的《内蒙古日报》)他们在 1 月 27 日就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了。(掏出 36 个组织的传单)

总理：(详细看一遍)你们骂过肖华吗？

郝广德：没有。骂肖华的那张传单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卫兵中央委员会”散发的。

总理：你们骂过军区是罗瑞卿的部队？乌兰夫的部队、黄狗子？

郝广德：我们没有。可能有个别人骂过，其他都是造谣。

总理：有一些根据，你们两家对骂么，当然要扩大事实了。高锦明是你们的后台吗？

众：不是。

宁奎喜：说高锦明、李质是我们的后台，我们连样子都没有见过。

总理：你们为什么跑步进入军区？

郝广德：(介绍 2·5 事件经过和二医大在招待所被围情况)

总理：你们清华的到军区宣传了？

宁奎喜：去了。我们没进军区，在外边宣传了。

总理：你们对军区乱叫，哎，那怎么能行呢？看你们把这事件闹的，越来越复杂，二医大到处捅，捅完就走了，把负担加在别人身上。

郝广德：二医大被围攻，我们去援助。

总理：你们红卫兵就管得宽，什么都管。军区的事么，问题越搞越复杂，跟军区对立，使你们处于不利地位。

宁奎喜：(站起来)总理，我提个问题，“全红总”在内蒙很猖狂，要集合 50 万人到北京，怎么办？

总理：能有 50 万？

宁奎喜：他们电报那样说的。

刘文研：“国际红卫军内蒙支队”、“中国红旗军第四纵队”、“联动”，这些在呼市都没有取缔。

总理：有材料吗？这些头目都是谁？

郝广德：正在整理材料(递上关于工农兵委员会材料一袋)。

总理：这些材料很有用嘛！(封完材料袋)你们学生回学校，工人回工厂，军区的回军区，

进行整风，属于联合性的组织，暂停一切活动。

众：我们完全同意。

张淑琴：总理，我们的人都被捕，怎么办？

总理：还是放出来教育么！不要捕。

郝广德：总理，现在有人给乌兰夫翻案。

总理：那怎么翻得了！(带上纪录步入另一间房子)(郝广德：他们还老是夺权)夺来夺去，你让他们夺去吧。

郝广德：呼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军分区副参谋长马伯岩同志被军区逮捕，他是军队系统的干部，在运动初期派到地方的。(总理纪录)

张淑琴：就剩我一个人怎么办？

总理：我让你当代表住到这儿，你懂吗？

郝广德：全区各盟市现在都很紧张，各军区说总理指示五天内适用，只适用于呼市，不适用于各盟市。(总理作纪录)(总理对整个谈话都亲自作了详细纪录)

(注：在本次接见的同时，总理也单独接见了红卫军方面代表，本集未收入。)

589. 戚本禹、谢富治接见北京日报社革命群众的讲话 (1967年3月9日)

戚本禹同志说：

同志们！我代表谢富治副总理和我自己向大家问好！(鼓掌)北京日报的问题，争论很久了。同志们寄了很多材料，我们都看了。谢副总理看了材料，刚才开了个小会，听了你们双方的意见，有两个问题，现在一个问题是中国日报革命的问题，一个是出报的问题，两个大问题。

革命的问题呢，听了大家意见后，我们觉得，大家意见当中有这么几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一个是，双方都提出要整风，有整风的要求。现在已经在整风，是不是这样？(答：是！)那么我们支持这个整风的意见。因为现在要解决北京日报的问题，首先，要把中国日报的队伍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没有这个武器中国日报是办不好的，也办不下去的，所以我们支持这个意见，就是要整风。要有这么一段时间，报纸全体革命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中央的文件，学习《鲁迅兵团向何处去》那篇文章，坐下来整风，互相听取意见，争论的双方，整风的时候，可以参加对方的开会、对方的会议，来听取对方的意见，要有团结的愿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达到团结，达到新团结。这个情况过去中国日报是不正常的，一部分人叫另一方：一小撮，这方叫那方：编辑老爷，我们觉得不正常。你们两派之间没有一小撮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老爷的问题。编辑都能叫老爷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说是老爷，那么一般的革命同志不能称他是老爷。你们有一派，就是现在的办报的这一派，就叫革命造反是吧？(插话：叫东方红。)不是东方红，东方红是办报那一派的。革命造反委员会是吧？说他们是编辑老爷，因为他们编辑多一些，以编辑为主，我们看不能这么叫，因为这个编辑和工人是一个阶级的，我讲是革命的编辑。不是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那些人，只要是革命的，是我们的同志，那么他做编辑或做工人，这是一种分工，形式分工，不能把这些编辑呀！革命，有革命的分工的，你站在岗位的不同，那么都叫他老爷，老爷是一种剥削阶级，我们叫资产阶级，那个剥削阶级那些管新闻的我们才叫老爷。那么首先把另外一派叫作老爷，你们怎能团结呢？你怎么能跟老爷团结呢？所以，我们觉得对办报这一派，把不主张参加办报这一派叫做老爷，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的。这是无原则的。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一派人叫他们一小撮，什么悬崖勒马一小撮，等等之类的。我刚才看到一些宣传品，也不是正常，也很正常，尽

管他们有这样的缺点或那样的错误，但是呢，作为革命同志，应该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用毛泽东思想来给他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说服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总而言之，就把他叫一小撮或一小撮为代表，什么，什么的，这样也是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用这样一种话，那可以争得面红耳赤，那么好几个月也争不出个结果来，因为大家都沒有团结愿望，矛盾很大，那怎么能团结呢？所以，我们觉得在整风期间，就得有团结的愿望，有了团结的愿望，才能很好地根据主席思想，根据主席告诉我们的原则来解决报社、解决革命同志间的内部分歧问题。谢富治同志看了一些材料，看了你们两派争论的材料，他从你们两派争论的材料中得出一个结论来，他看的并不多，但是，能得出一个结论来，说你们两派呀，那一派也离不开那一派，什么道理呢？好象那一派工人多，这派编辑多，他说(指谢副总理)办报我沒办过报。但是他总觉得办报的问题，编辑总得和工人结合吧！你如果两派分裂，以工人为主的这一方和以编辑为主的一方，两派搞分裂，我看这个不好，就不好办了，是吧？就办不下去了。他看了你们的材料以后，得出这么个结论来，我听了以后就笑了，我认为：谢副总理没有办过报，但是他很懂得怎样办好报。你们说是不是啊？(答：是！)你们两派那一派也少不了那一派，这个编辑和工人都是一个阶级，都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代表着无产阶级。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是一小撮坏人，那是另一个阶级。那么做为我们革命同志来说，作为一个编辑跟工人阶级是一个阶级，不要制造分裂，不要在一个阶级里制造分裂，因为工人跟编辑在职业上的分工，很容易造成分裂，我们的同志应该慢慢地使编辑同志和工人同志很好地合作，很好地结合，而不应该在当中搞分裂。你们这两派不能够很好地团结起来，那么这个报纸是办不下去的。大家知道，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马上不久就要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那么你这个作为新的权力机构的机关得有个机关报，如果你们这个两派工人，两派同志，一个以工人为主的组织，一个以编辑为主的组织，不能很好团结起来，那么你们能够办好报纸吗？怎么能够办好代表北京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说话呢？如果到那个时候你们还争执不休，问题解决不了，那就没有办法了，那么我们只好另外办个报纸了，另外找个青年报或前进报啊，反正另外找地方了，这是一个问题，考虑过这个问题的。所以你们提的这个意见很好，首先你们两派，听说你们四十多个组织是吧？谈谈笑话吧！比春秋战国东周列国还多，总是两派，希望两派不管有多少个组织，开展整风，要“公”字当头，不要“私”字当头，不要搞小团体主义，不要搞风头主义，而要搞统统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是我们支持你们的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呢，你们今天讲到联合，大家都讲到联合，两派都讲到联合，听说你们最近这几天休战了，是不是啊？最近这几天休战吧，这不在可休战，而在于你们政治思想啊！解决了，在原则问题得到统一的认识，真正搞联合，这个联合首先有共同思想基础，一个是毛主席思想，毛主席的原则，那么如果不能在原则上统一起来的话，那么你这个停战，它也停不下去的。你们刚才不是说停战了吗？可以停下来。今天我听到你们两派代表讲话，那个战斗气氛还是相当浓厚。所以那个停战我是赞成的，谢副总理说了，他赞成你们的作法。因为我们看了你们过去的材料，整天两派在那里哇喇哇喇吵得不可开交，并不解决问题，所以停下来，学习学习文件，整风，经过整风思想取得一致，这样搞联合，这个办法好一些。所以今天谢副总理支持、赞成这种做法，没有革命大联合，光是两大派这不行的。当然，我们讲了，矛盾是永远存在的，北京日报联合以后，还会有矛盾，将来还会有些人，要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个社会势力的，还会有新的代表人物的，北京日报还会有的，当时，你不能老是这么两派，这样下去的话，那办不下去的。联合以后还会有新的矛盾，但是首先要有这个联合，因为你们这两派的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内部矛盾，不联合起来，什么工作也作不下去，你们现在已经经过一番试验了嘛！是吧！就是没大联合的，没有联合，你们做了试验了嘛！做了试验以后，你们的报纸都卖不出去嘛！印了报纸以后，下了班以后，你们自己拿出去卖嘛！就这么个局面嘛，这么个局面能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那不能担负嘛！是不是，过去北京日报发行量多少？(答：二十万)是吧？你不能马上发二十万吧！你能发十万分吧，我看你

们怎么卖法，你们一派就有一百多人，有的八十多人，一派才一百五十多人，不管多少人，你编了报，完了又卖不出去，恐怕这是个大问题。所以不联合起来，报纸是不能办的，而且不联合起来，革命也不能搞。你们首先内部分成两大派，互相之间对立的很厉害，有些地方要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存在这种情绪，革命怎么搞下去，我们支持这个联合的意见，这是符合毛主席思想，毛主席不断地发出指示，搞大联合，上次你们看的《贵州日报》先登的，《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转载的那篇贵州省的联合，革命大联合的新型式那篇文章，那就是我们中央所支持、所推荐的。他就是那个工厂呀！由全厂搞联合不起来，车间先搞联合，联合后，你上边不联合，他底下就不听，工人就自己搞联合，中央很赞成这个做法，后来就在全国广播了。我看你们北京日报也应该是这样干，北京日报不是也有几个部吗？现在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了，如果你们两大派搞不到一起的话，底下还有群众，底下各个小单位的群众要搞联合，如果上边不联合，下边群众联合，上边就不行了，你们一个单位一个部，可以自己搞联合，在整风的基础上搞联合，这是第二个意见。

第三个意见，今天也谈到了，就是要搞斗批改，因为你们两派都反映了你们斗批改并没有很好进行。谢富治同志分析一下，你们最积极的是打内战，其次是搞反动路线，就是新调来的那些同志。新调来那些人是执行了一段反动路线，这个大家也是已经想得到的，斗黑帮、斗右派呢！就是范瑾那些人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说这个事情已经很久没有搞了，情况不知是不是这样呀？谢富治同志分析的，你们是最积极打内战，其次是搞反动路线，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很好地批判。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它的主要矛头，主要的运动锋芒是搞什么的，就是搞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这个任务，北京日报革命群众还没很好地完成这个历史使命，是不是这样的，同志们？（答：是！）是这样的！拟议今天这两派都是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支持这个意见，要斗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批判那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北京日报的不仅仅是北京日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北京日报所承担的任务，不能单单是这个嘛，邓拓的问题，彭真的问题，都跟你们北京日报有关的嘛！我第一次到北京日报看大字报的时候，那时候劲头儿还挺大，好象现在大字报也没了，人们很少谈论这些问题了，其实这里边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完成。

谢副总理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问你们斗得怎么样，现在有这么大批呀！就黑帮呀！靠边站！也没有斗，那里边也还弄不清楚是不是右派呀？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没定下来，凡是定下来定不下来的，都给归在一起，这就是个问题嘛！究竟那些是，那些不是也还没有弄清楚，这就是斗争任务没有很好的完成嘛！听说是靠边站了黑帮斗了，说有几十人？（答：有五十五人）是不是有这么多呀，我跟谢副总理都怀疑是不是有这么多啊？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十六条指出只是一小撮。不是那么多的，只是一小撮，一点点的。你们北京日报可能多一些，多一些也没有几十人。我们有这个怀疑，要求同志们注意一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方针，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刘邓路线方针有个区别之一，就是刘、邓路线他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他派工作队到了一个地方就不管你是什么当权派，凡是当权派就得靠边站，这个最典型。我们在石钢看到墙壁上挂着一个大本子，我们好奇，拿来看了一下，一看很大的字写着：“当权派名册”，当时我翻了一下，这个就是支部书记，那个就是小组长，这个斗了几次，那个准备什么时候斗，就把当权派都要斗，小组长都是当权派，我们大吃一惊，居然有这样事情，回来以后，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就研究了这个问题，写了《红旗》十二期社论，就是说对当权派要有个阶级分析，说我们大多数当权派是无产阶级当权派，只有那么一小撮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能把当权派都靠边站，中层以上的干部都靠边站，甚至于把那些小组长都当成当权派，都要靠边站，那是刘、邓路线的产物，他们是打倒一切，否定一切，不是还有一个人说过嘛，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外都可以怀疑，都可以烧，这个你们都很清楚谁说的，那么这些，不是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路线是搞一小撮，就那么一小撮。因为他们人数不是很多的，他们陷入人民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就那么一小

撮，如果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混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是很高兴吗？你看，他就很高兴嘛！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人呢，他没有那么多人就是一小撮。说这个问题，一小撮有多少，是不是有这么多？是不是有五十多？会议研究一下整风联合的基础上，搞大联合以后，会用上他们的，我们听说这里的新调来的一些同志，新调到北京日报的一些同志啊，也都靠边站，是十几个人，有两个有问题调回去了，只有一个人参加了造反委员会，还有十五个人还在靠边站，我问一下这里面究竟有那些人是刘邓路线的或是彭罗陆杨的人，同志们也答不出来。我和谢副总理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们觉得这些同志，如果没有错误，不是在过去原工作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仅仅是到你们报社犯了一些错误，执行了反动路线，那么对这些同志，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动不动就靠边站。又无论如何，这些同志要比报社一些长期市委受错误影响的，受他们错误路线影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路线影响的那些当权派，总比他们好一些嘛。我这不是说那些受错误影响的北京日报社中层干部就不能革命，还允许他们革命，摆脱影响，划清界限，那同样是可以革命的，那么这些同志，总比他们要好一些嘛，为什么不叫革命，叫靠边站？所以，我和谢副总理请他们来，来了没有？（答：来了。）哪些同志呀？我看你们也该挺起腰杆来，跟这里的革命同志一起闹革命嘛！党给你们很光荣的任务嘛，派你们来的嘛。当然你们应该检查啦，你们很多人不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执行刘邓路线。这也不能完全怪你们，当然你们应该作自我检查，那么检查以后就跟同志们一起战斗，一起革命嘛，不要把自己搞得灰溜溜的，不敢说话，不敢工作，要继续挺起腰杆同他们一起闹革命。那么，对于他们当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那种人和为首的，要批判，你们这个任务，也没很好完成，说是没批判几天就给揪跑了，是不是这样，揪走了吗？一个什么领导人？（答：吴象）粤，翟向东，哪个错误多？（答：翟向东）给揪走了吧？如果揪走了，如果没有很好批判，恐怕还要批判，而且你们要接火，同报社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接火，要把他们的问题跟整个彭、罗、陆、杨的问题，跟整个刘邓路线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批判，进行斗批改，如果孤立地讲他们的问题，那么斗批改就不能搞深入，这个斗批改的问题，经过大联合，会很好安排的。我们要有计划地很好进行。这是第三个意见。

第四个意见，你们今天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三结合，今天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旗》第五期社论，全面地阐述了毛主席的关于三结合的思想。你们这里经过整风，经过大联合，首先落实到三结合这个问题。要搞三结合，你们这里新派来的，过去的当权派已站起来的、比较好的、革命的可以结合。我记得你们这里有一批同志很早就给中央写信，揭发北京日报的问题。这些同志就可以结合进来，还有革命群众这是主体，革命的编辑，革命的记者，革命的工人，要跟他们结合，他们派出代表来结合，搞个领导班子。

更重要的，我们特别强调，在一切三结合的地方要有军代表（民兵代表），军民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结合在一起，这样的结合，才叫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领导班子。首先是革命群众，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有军代表（民兵代表）组成领导班子。没有这样一个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生产搞不成，革命搞不成。经过整风，在整风的基础上，在整风的过程中，把原则问题总是弄清楚，是非分清楚，你们打了很久内战了，积累了很多是非，有很多原则问题，有些是很大的原则问题。这些问题要搞清楚，错了的承认，错了的就检查嘛！不然怎么能够整好风呢！在这个基础上，搞大联合，搞三结合。搞斗批改。要听取人家意见嘛，不要老虎屁股不能摸嘛，这是我们对报社革命问题的意见，这四个意见都是同志们来信和今天会上提出来的，我们支持这四个意见，建议大家很好考虑这些意见，把报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主要问题，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即《北京日报》怎么出？怎么办？我们刚才和谢富治同志开了个小会，商量了一下，还有周景芳同志，（鼓掌）他是谢副总理和我从学部调来的。他是一个很老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是左派。他在筹备革命委员会。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根据中央革命的三结合的精神，首先我们决定北京日报要派军代

表，实行军事接管。(众：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军代表大概在十二日之前派来(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军代表来了以后，驻报社的工人、学生都要退出报社(鼓掌)，什么道理呢？不是说我们不欢迎这些工人、学生，我们欢迎他们的。(鼓掌)原因是这样的，北京市原来那个“夺权委员会”(接管北京市的那个夺权委员会)它的夺权还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它不是经过革命三结合形式出现的，所以我们根据中央精神，现在正在筹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原来这个夺权，不是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过多方面协商、经过革命三结合而产生的，北京日报也是这个情况，现在有的组织参加了，有的组织没参加，所以严格地说，这个接管是未经中央承认的。当然我是赞成对他们的工作要“一分为二”，有它成绩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这个夺权以后，有很多错误，也做出了成绩，这些问题应该怎样总结？你们在整风中要自己解决。但是军代表来了以后，这些工人的组织和学生组织撤出去，撤出以后，是不是不办报呢？还是象过去那样办呢？不应该象过去那样办了。他们撤出以后，你们就应该和革命群众相结合了，今后你们应和革命同志相结合，应该依靠群众，听取群众意见，走群众路线来办报。我们还要请工人、学生、红代会，请工人联合会的做你们的顾问，请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做你们的顾问，请学部的，中央有关各部的，还有北京市的各个革命组织来给你们做顾问。办报要走群众路线，要真正代表北京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必须跟他们结合，而且要和群众结合得更好，更广泛。军管以后，军代表来以前，报纸办不办？有的说停，有的说办，各有各的理由，如机器维修，我看在军代表来以前办不办，还是你们大家来商量。这个问题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好象办不下去就是我这派胜利，不办下去的话，就是你这派胜利。不要用宗派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而是考虑是停下好呢？还是办好？各有各的好处的，如北京还有一些消息要报导，中央的社论要出，每个省都要发电讯的，但是北京也有中央报纸。你们可以权衡一下，还有两天功夫，是不是办？如果那一派坚持要办，我看编辑这一派可以做一些让步，而且协助他们办好报，搞一个临时班子，如果你们一致不办，那就不办，我和谢副总理没有成熟意见，我们承认你们的现状，已经出了，怎么办，出的不好有错误，怎样解决，你们大家研究一下，两边各出代表，要解决出报问题。

军代表来了以后，还是要办报，如果能办还是办下去，为什么呢？军代表来了以后，为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做筹备工作，作舆论准备，有很多工人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大会的报导，还有些群众拥护的需要报导，讲他的必要性，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鸣锣开道。鸣锣开道的事，不需要办报也行，有一个报纸也好，你们研究，谢副总理倾向于有这么一个东西好，那怕出不了两张，出一张，半版，因为有一些东西要报导，怎样做好，军代表来了以后，具体商量。军代表来了以后继续出版需要有一个声明，从什么时候开始军代表接管报纸，和左派一起办这个报纸，报纸是干什么的，为革命委员会促进全市大联合作准备，总要把旗帜打出去，也需要东西。两派预先作些准备，把米面准备好，他来了加把火就可以吃了，来了以后准备就难办了。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就要发通令，把《北京日报》以机关报出现，当然，这要看你们联合得怎么样了，如果两派还团结不起来，那就要想别的办法。是呀，我们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还是两大派，工人和编辑不能合作，那怎么办呢？就只好请红卫兵想办法，我们还是有力量。我相信你们通过整风还是可以联合的。是不是这样呀？(答：是！)作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机关报，那么还是要发宣言的，纲领性的东西，搞点文件哪。向《文汇报》学习嘛！听说你们有雄心壮志超过《文汇报》，我看还是先向《文汇报》学习，我们学习《文汇报》的革命精神嘛！《文汇报》在文化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嘛！你们都好好看看，他们是怎样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说话的，是符合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的讲话的，旗帜鲜明。出报问题我们大体上就是这些意见，先搞整风，搞大联合，再搞三结合，然后准备出报，你们对干部要进行审查，哪些干部做这些工作？哪些干部做那些工作？队伍怎么组织？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革命、生产怎么抓？很多的工作要抓。我们的意见，大体就是这样几个意见，意见不一定都对，有错误就可以批评，可以讨论，可以做出自己决定，只是

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没有很好研究，也没有向中央文革向中央做请示，我们来了以后临时商量，当然总的原则今天下午和伯达、康生同志他们两人讲过的，有些意见商量了一下，供同志们讨论你们的革命和出报问题参考。

谢富治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完全同意刚才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子，由一个年轻人讲，他也比我的好。我没什么话可讲了，我们下边还要开一个会，还在那里等着呢，十二点开会，现在已经超过了。

我想报纸这个工作，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它需要起着重要的作用，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是报社的革命派，都是很重视这个武器，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重视它，资产阶级他也是抓这个东西。我看这点同志们都是很清楚的。

我们现在北京的革命，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很快就要实现了，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派需要充分运用这个武器。运用这个武器，首先是宣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宣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宣传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所制定的一切革命路线。

人民的军队来支持这场革命，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旧的北京市委和报社一小撮人，他是搞资产阶级那一套，搞修正主义那一套，不宣传毛主席思想、不宣传革命。这次伟大的运动，就是要革他们的命，包括夺他们的权，这个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又一个胜利，但是，还有相当的任务没有完成。刚才戚本禹同志谈到你们北京日报，一方面有要革命的任务，一方面还要继续办报。既然旧北京市委那一小撮人，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宣传革命，搞资产阶级那一套，过去报纸就是这样。北京日报从现在起，这个报纸的所有革命干部、革命职工，首都的报纸应该是最听毛主席的话，从思想上、从政治上到组织上，到各方面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最忠于宣传毛泽东思想，你们都是革命派，跟毛主席思想要跟到底，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各个方面能够最听毛主席的话，最能够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最能够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来办事，最能够按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这是来考验那派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几个月了，北京九个月。刚才戚本禹同志谈的这些问题，支持革命同志的意见，也是经过一些同志的商量，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反映毛主席最近一个时期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指示，要把这项革命坚决地进行到底嘛！要继续地批判，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从思想上批判，挖他的思想。要整风，革命派要整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因为我们搞了八、九个月的运动，需要提高嘛，工作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多方面要提高。看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提高嘛！要挖去私字，要整风。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要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你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号召我们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毛主席的号召，中央文革小组一号召，你们听不听？

要搞大联合嘛！团结嘛！那么这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听不听毛主席的话？我说这个北京市那一小撮，他们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要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根本问题，革命还是不革命，听不听毛主席的话，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嘛！一句话，就是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嘛！就是反对毛主席嘛！所以我们要革他们的命嘛！夺他们的权嘛！我们现在要办一个《北京日报》，我们要办一张最听毛主席话的报纸。他每天的报纸，每一个人的思想，每一个人的本质，每一个人的作风，每一个人的一切，他的报纸上的反映，他的报纸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主要是他的报纸是反映毛泽东思想，是最听毛主席话的，那么是不是从现在起，刚才戚本禹同志讲了好几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从大方向来讲，

都是毛主席号召的，可是每一个具体事情，每一个具体作法，那么我们这些可讲错好多话，很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是大方向，要继续批判一小撮资产阶级当权派呀，要继续跟他们斗争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呀！要整风嘛！要去掉“私”字呀，要搞大联合呀，革命大联合呀，革命大团结呀，要搞革命的三结合呀，要把报纸办成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报纸呀，这些东西都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的，同志们，我们这些人过去就是没有，就拿我个人来讲，每一件事情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主观上是这样子的，客观上就要违背毛主席指示，所以就犯错误。我们要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问题，都听毛主席的话，都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那么我们的事情总是可以办得好的。我们的报纸可以办得好的，我看相信同志们，经过这大半年的文化大革命，也经过这样、那样反复的各方面的斗争，我们现在总结经验。要提高！总结经验，要提高到毛主席的思想水平，这样我们肯定按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思想，按照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又进行共同的对敌人的斗争，从现在起，每一个人都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相信刚才戚本禹同志所提出来的，经过一个过渡，中间实行军事上的管制，那个接管还是要搞革命的，还生产，将来慢慢还是要搞三结合的，依靠我们多数同志慢慢来，一定会把这个报纸办好的，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好的。刚才主要是戚本禹同志讲的。我来了，不能不讲话的，我就随便讲两句。这是按照科室按照工厂各个部门呀，怎样联合。大体是按照贵阳的经验那个办法搞联合，三四十个摊摊，今后不要管他了！(鼓掌)一个车间、一个部、一个工厂，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都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原则的基础上，都在共同对敌的基础上，办好报纸的原则下，共同在北京市革命路线，主要是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这样来搞联合，不是象这样许多小山头，那个东西联合是很困难的。(有一句话听不清)我们支持你们那种联合，好不好，我的话完了。(群众呼口号)

590. 谢富治参观“联动”展览时的讲话 (1967年3月9日)

谢副总理于三月九日凌晨五时到“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参观一开始，讲解员给谢富治副总理介绍“联动”罪行，谢副总理关怀他们：“你是那个学校的？”讲解员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谢副总理说“是学生？”“老师”，谢副总理笑了。当讲解员说他们用炮竹打造反派时，谢副总理说：“冲公安部时放的可多呢？”

当有人给谢富治副总理介绍有的“联动”分子有几个证件时问道：“有没有坐班房？”当我们介绍到“联动”分子改头换面成立新组织时，谢副总理说：“反毛泽东思想嘛！”

当谢富治副总理看到破坏的乐器时气愤的说：“小法西斯。”并说：“这个展览非常好，有的人不想听(也不知道)“联动”是反动组织，让他们看一看。”接着问：“展览谁主办的？”

“是八一学校毛泽东思想联合造反总部”，“你们办的对！这件事情办得好啊！你们能不能把各单位的集中到一块办一个？”我们回答：“红代会”“联劝”展览准备在这儿办，谢副总理频频点头说：“那好，那好，那好，这儿的实物多啊。”

我们向谢副总理谈到昨天周总理来时，谢副总理说：“总理昨天约我来，我因为忙没有来，总理回去和我说你管‘联动’，你不去看看？”

谢副总理多次关心地问：“你们学校多少学生？多少中学生？多少‘联动’？回家的有多少？‘联动’的总部在这儿吗？”我们都一一做了回答。当谢副总理看到展出的摩托车、自行车说：“那么多摩托车啊？这些东西是不是集中起来？”我们向谢副总理说：“这个学校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学校”。谢副总理斩钉截铁说：“培养修正主义一定要砸烂！”谢副总理看见那些剩食、猫皮时说：“还吃猫啊！”我们向谢副总理说到那天抄“联动”的情况，谢副总理说：“那天不是抄了吗？抓了多少？”我们回答：“三十三个，有二十二个是本校的”，谢副总理说：“二十二个那么多啊！”我们介绍说：“他们满不在乎”，谢副总理说：“现在不

怕，杀他个脑袋就怕了！”

在去卫生所的路上，我们向他说有人要砸我总部。他说：“砸？有多少抓多少，统统抓起来。”我们又介绍昨天冲解放军，要见中央首长的情况。谢副总理说：“冲，为什么不抓起来。”在标本室参观时，谢副总理又生气地说：“土匪，土匪，完全是土匪，国民党”。

(参观后，谢副总理又看了他们写的标语，做了指示：今后不要提高干子弟，要提整一小撮有反动思想的……或者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或叫什么子弟。)

这时，首都红卫兵的同学介绍了人大附中一个“联动”分子的话，他说：“真卑鄙，真恶毒”。

谢副总理快走到门口时说：“你们要做思想工作，分化瓦解他们，把他们中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死顽固的要孤立起来，孤立最少数的一小撮。”

我们想约谢副总理谈谈，他说：“以后我还来，还来！”“我跟红代会讲一讲在这儿办！”又问“这儿方便吗？”“我给红代会打个招呼！”

(我们向李震同志汇报开家长会时情况，李震同志说：“让本人和家长都暴露暴露好嘛！现在家长不是跳出来了吗？”我们又说：“家长说学生参加‘联动’由教师负责。”他说：“倒打一耙啊”)。

谢副总理、傅崇碧、李震同志于晨零时才离开我校。

591. 李先念接见孙、钱、黄及部机关各派的谈话 (1967年3月9日)

李：你们分几派？

潘：有几个小组织没来，(指革联观点的)

李：我对你们运动不想讲什么，只想谈一点，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真正左派联合，不是和稀泥的。三结合必须是革命的、有原则的、不是和稀泥的三结合。对你们运动情况，今天不想听任何意见。

(李先念同志谈总理的指示：略)

(信上还有李富春同志的批示：今只谈防治问题)

李：药进口，请外贸部解决。

钱：现在揪得厉害，北医“八·一八”把我弄到上海去十几天，后来医大又揪我十几天，北医又揪我十几天，医大也把我揪到天津去几天。

李：马上开始工作，总理说这些人全力以赴，不要其他工作来干扰他们，在工作中考验他们。你们各个组织支持吗？

众：支持。

李问孙正：你支持不支持？

孙：支持。

钱：现在批陶大小会(共十几次)都要我去(只有一次没要我去)。

李：中央有好多条，要给检讨的机会，不要限制自由。

潘：十三号开了个会(指革联)，要他们(指当权派)抓生产，可是钱信忠和孙正策划假夺权，把生产耽误了。

米智学说明了一·一七夺权的真象。

钱、崔在李副总理面前互相说对方造谣，争吵不休。

李：你们今天讲的这些我都不听，我也不管。

(警卫员会后对红反团的同志说：你们老爷也会造谣。)

东方红郭义：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原来各司局抓业务，现在各派已各自为政，你搞的我不承认，我搞的你不承认，是否今后以卫生部名义，不以组织名义。

李：对嘛！不要你说我假夺权，我说你新反扑。

郭：(进一步说)那孙正搞的革命委员会不应该承认。

李：你们这个我不管，我也不说，哪些地方需要医疗队国务院就派医疗队。

孙：明天要我检讨，今天才通知我，我来不及，甚至说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应该给我准备时间。

李：是给时间准备吧！一天写一个检查都来不及吧！

孙：总理的指示我们全部执行，我有错误一定好好检查，但要给我准备的时间。今天他们(指革联、东方红)谈了许多文化革命中的问题，我不是用一句话、两句话能澄清，以后再谈。

崔：防疫问题，是否由防疫司、药政局、医政司、财务司参加？(崔的目的是想把这些执行机构拉入领导业务的机构中去)

钱：我坚决执行总理的指示，我和崔两人轮流去检查，共抓生产。

潘：今天总理指示三个组织来，可是孙正拉了四个组织来，欺骗中央。(李副总理根本不理潘，因为孙正在会前已将四个组织来人通知了国务院，上面同意后国务院门口才进得去。)

李：文化革命中的问题你们回去吵，这些我都不管。

东方红：现在抓业务有两套班子。

李：抓业务，我只承认钱、崔的班子。

红反团：我们只夺文革领导权，对业务进行监督。

李：对的吧！

黄：我有许多困难，孙正、钱信忠没上班。

李：行了，你们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回去吵吧！

李先念同志拿了帽子就离开会议室。

592. *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9日—10日)

(见《系年录》第七十卷)

593.*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0日)(见《系年录》第七十卷)

594. 李先念接见卫生部机关各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3月10日)

李先念：同志们，想找你们谈一件事。昨天谈办公室的问题，今天是谈卫生部的问题。我是不管卫生部的事情的。总理临时要我和同志们谈一下。告诉你们一件事情，由这件事情看出夺权委员会在夺权中、夺权后的矛头有点不对头，特别是在这几天，借揭保健工作之名来丑化我们的党。我们得到一封信，会场上的事揭得比这还多。我不想念这封信，对部长同志这封信念了。在揭保健工作中间，对保健人员施加压力，说保健人员是铁杆保皇派，造反精神不够，死老虎敢打，活老虎不敢打。主要指红色造反团同志。不是保健制度不能揭，不能批评，不好的应该批评，我们批评过。而现在是从中央负责同志生活上搜集资料，借揭保健之名，丑化党，使保健人员受到压抑。这两点来讲，你们不是顾大局，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点，抓革命促生产搞得不好，直到总理出来干涉。昨天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寄托在办公室上面把工作搞好。要求各个革命造反派支持，大家都表示态度很好。

另外一点，摸了点情况。三期社论发表好久了，四期也发表好久了，五期也发表了，中央有了一系列的规定。看来红色造反团夺权不是以内部为主。不能按系统，北京医院是卫生

部的一个单位，反帝医院是一个单位，十四个组织联合一起夺权的，而部里的群众没有联合起来。当然，开始夺权，一月开始的，各部不明确，我们的部也有是外边夺的，后来改变过来了。脱离卫生部的群众。三结合是可以的，要大多数的干部赞成你们的办法。(注按卫生部的稿：卫生部大多数干部不赞成你们的办法。)红色造反团的同志夺权中间，特别是夺权以后，自己考虑一下好不好？特别是最近发生事情的矛头指得不对，因此总理要我转达。

卫生部文化革命如何搞法，要靠卫生部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但是揭保健工作的搞法，这样的会议必须制止，这对文化革命运动，对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破四旧立四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斗批改，没好处。揭的材料可能歪曲、夸大，可能不是斗。特别点了林彪同志，这是不能容忍的。点林彪同志健康的作法，他是我们的副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不能容忍。

点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对于批判他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好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把他们搞臭，彻底把那些黑帮搞臭，主要从政治上，而这些问题不宜讲。(按卫生部稿：不是从政治上去搞，而去搞这些问题，我们是不理解的。)

二月二十三日，红反团负责人李一谋在文教政治部见了孙正，孙说：“总理接见了我，总理说：‘我支持你，你一定要把黄树则、崔义田打倒’。总理说：“我根本没见过孙正”。刚才我问孙正同志，他讲没有接见李一谋，在政治部从未接见过任何人，(问孙：是不是这样？孙答：没接见过李一谋，根本没有见过北京医院的这个人。)

刚才对了一下，会上也是揭的这些。还开上广播车到同仁医院广播。中央负责同志的身体情况、住地，是秘密不应该讲的。都公布出来了，不好嘛！因此，请各个革命造反派不要开这样的会。至于你们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你们自己去搞。我们相信红反团也好，东方红也好，革联也好，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是热爱毛主席的，热爱党中央的，仇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仇恨彭、罗、陆、杨，仇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是破四旧立四新的。我完全相信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以中央的指示，一系列的政策，中央文革的规定，经过中央同意的一系列政策，是可以做到大联合的，是可以与革命干部、中层干部、真正革命左派的代表联合，但不是和稀泥的无原则的。也不是和稀泥的无原则的三结合。

今天就传达总理的意见，不是原话。这些意见可能其中有不对的地方，但有一条，要把这个会议停下来，这对文化革命不利，对党不利，这个现象要制止。

请告诉各革命组织，我们相信群众是有智慧的。张孟旭同志是负责文办的，是吗？(张：现在只我自己了，孙正到卫生部了。)你可以联系一下嘛！

我说的就这么多了。

钱信忠：今天会议的记录(上午的)给先念同志请示了，是否以批准的方案，按行政系统发，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可能召开一个会议)。

潘学田：我们革命造反派应把矛头对准林彪同志的人揪出来。

李先念：我只有一封信。

黄树则：那是在北京医院谈到派医生的时候……

郭义：部里的大字报上也揭了不少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提出应该查一查)。

李先念：刘少奇、邓小平、贺龙，老实说，我不是和他们有任何个人的感情，应该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但这些不能触及灵魂。这件事情我看矛头不对，不是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我总感觉有点不痛快。(按卫生部稿：总理有点不痛快)他们这样搞法与群丑图有什么区别？(按卫生部稿：你们知道群丑图吗？)这个群丑图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江青同志、伯达同志老早就批评了，严格的制止了。这不是丑化党、丑化自己吗？

北京医院去传达吧！(卫生部稿：北京医院谁回去传达？)

崔义田：我们两人去(指黄树则)。

孙：我和黄树则去。
李：可以吗？
郭：革命造反派代表去。
李：把记录整理出来，免得各人说各人的，整出来，不完整的向完整一点。
孙：其他单位传达不传达？
徐毅：应该传达给大家。
李：保健制度是可以批评的，我们也批评过。
钱：主席也批评过。
李：主席批评过，也改了一些嘛！
崔：是十四个单位参加的。
李：广播车到街上广播，到同仁医院去广播。
阎介正：我们拒绝参加这样的会，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我们革命造反派拒绝参加。
米：你们是不是造反派值得考虑……，我们提过多次辩论，你们不敢辩。
潘：你们抢走了金库，群众大部分领不到工资，哪有条件辩论。现在谁要阴谋，放暗箭，谁是后台，我们应该警惕。
黄、崔：今天在北京医院范围传达。
李：怎么传达，你们商量。
徐：应该传达下去。
李：照记录，口头传达。我讲的话送总理批一下，因为大家很敏感嘛！我这些话不要贴大字报，总理看了后送给你们。先口头传达一下吧！不然为什么这个会不开了(指今天的会)！办公室的事找你(指钱信忠)和崔义田，你们两人意见不一致吗？我看出来了。
崔：以后有事，我们办公室是否直接给你打电话？
李：可以直接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注：孙正，卫生部新任党委书记。 崔义田、黄树则，卫生部副部长。

595. *周恩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2日)

(见《系年录》第七十一卷)

596. 谢富治接见部分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3月12日 人大会堂)

对于学生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主要看他们现在符合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跟不跟中央文革，符合不符合十六条，你们应该向解放军学习。

以后不要(笼统)提老红卫兵，不然就会上敌人的当，对“老”红卫兵要做阶级分析，也不要笼统地称高干子弟，高干子弟中坏的应该叫做有反动思想的高干子弟，以示区别。如果我们的孩子是“联动”，也要抓起来，“联动”是红卫兵的叛徒。

不要把老红卫兵搞起来，不要再搞那一套(指过去的组织形式)。有联动思想的人，他们用老红卫兵的名义搞起来统统是反动的，要解散它的组织，他们丢开造反派，丢开革命派，拣老红卫兵是一种错误的行动。不能恢复他们的组织，这样做是违犯毛主席的，违犯中央文革，统一开个会，统统不能恢复，只能解散，解放军帮助一家伙。

真正承认错误的就争取，让他们参加造反派，所有斗争方法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孤立他们中的一小撮顽固分子。要孤立先要瓦解，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

解放军要把“联动”统统搞垮。要区别对待，不要把中间派赶到那一小撮一边去。所有

的解放军要支持造反派，要帮助造反派掌握斗争的策略，教育造反派，孤立一小撮。

不能成立和造反派对立的组织。老红卫兵要改正错误，造反派应批评他们。老红卫兵拉起来再另搞一摊是错误的，不要上敌人的当。

将来召开工代会，农代会，要以左派为主的联合才能有力的斗争。

解放军搞个把月大联合，在毛泽东思想、在革命路线、在对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批改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主要矛头应对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批改。矛头对准反动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伟大革命基础上联合起来，在这个前提下搞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毛主席提倡的，决不是搞和稀泥，搞合二而一的联合，必须经过斗争。

解放军军训后要留下几个，一直帮助搞完大联合再走，好吧！（好！解放军同志答应了）一定要支持解放军，这是立场问题。

工人、农民二十日内可以联合召开会议，你们看看什么时候召开？！

解放军一个月要把“联动”思想瓦解，行不行？不能发展什么老红卫兵组织，要发动支持造反派，瓦解有“联动”思想的人。（解放军插话说：凡是原来干过坏事的老红卫兵检讨后要拉起队伍的，我们没承认。）对！！！

原来的教员、干部统统成了黑帮，这是工作组搞的，小朋友受影响，教师不大好。这不难为你们，是刘、邓路线。要好好起来批判。对他们要一个考验，那个能用、那个留用，那个监督留用，那个停职留用……要从他们目前的检讨“亮相”和过去犯过错误的情况来识别和挑选他们，不能急，一下子都拉过来，要考验考验。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师。（读主席的“三·七”指示）马克思的话在这引用你们明白了什么意思么？我说是对下一段话讲的，是对犯错误的老师讲的，要帮助改造他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这引用马克思的话。学校里不搞联合，就不能整顿，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就是把所有“联动”的思潮，及其在今天“联动”以新形式出现的组织统统整垮。

（有人谈到“三·七”在六中许多“联动”分子想搞坏一事，这些“联动”分子打着红卫兵旗号）。

谢副总理讲：有多少人？（解放军答：有四百，如果解放军不在，可能发生武斗，解放军要捉他们，他们翻墙逃跑了。后来捉了几个人）把他们名字都记下来了，要一个一个审查他们是哪个学校的，每个学校去了多少人？把头头要逮捕起来还要坐班房。

陈士渠是个将军，这个人很好，大义灭亲。最近抓了他自己的四儿子陈仁康和三个小头目。陈仁康最近在海军大院被逮捕。他和几个写“打倒北航红旗”“打倒三司”“王八蛋”“联动万岁”等，被陈士渠将军看到了，他回去查了儿子的抽屉，有几个“文件”，他们搞了个平津纵队和红旗纵队，又有一支最强的太平路纵队，还有什么夜晚活动纵队。设宣传部、政治部、人事部，在一年内将拉起五百人，目前争取一百人。这是他们的计划。现在“联动”分子狡猾。他们以为十八岁以上的才能抓，所以四个人三个人都是十二、三岁，还是小学生。我们才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干反革命活动就要逮捕，坐班房。

让那些要革命的老红卫兵的人退出，解散，让他们加入造反派，不要排斥他们。（有人讲：到今天还有联动的打人）。

谢副总理气愤地说：谁再打人统统地抓起来，解放军给这些人点颜色看看，要树立真正造反派，粉碎敌人的反扑。

597. 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12日)

张春桥同志最近抓川沙县、黄埔区基层夺权，会上先由川沙县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

张：组织机构问题，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再拖上两三个月，群众非造他们的反不可。

区和县夺权后，不要急于先改造机构，建立新的机构，因为过去的机构已经瘫痪了两三个月，建立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群众又不熟悉，还是把原来的搞好。所谓打碎国家机器，是要把里面的坏人除掉，组成三结合的班子。

文化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但现在大学已落后了，社会在扩大夺权，大学还没有斗批，怎样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应从大局考虑，学生还是要回学校去。

这些组织（指革命委员会里的各小组）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庞大的机构，把事拿到局里去做，把原来的机器开动起来，把它加以改造，努力建立三结合，不要新设立科，把原有的加以改造。这样是不是恢复到旧市委，旧人委？只要实行了三结合，那就不是的。如果不实行三结合，那就有可能。必须要把事情更快地办起来。这样是否没有群众基础呢？工人阶级当权，不是把革命委员会都变成工人，根本的是要看它是执行什么路线。当然，要把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吸收进来；同时要不断地提拔一批新干部。考虑干部首先要从革命不革命，是否忠于毛主席来看。当然，也不排斥这一点，一些局吸收了一些工人成立了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只能议论一番，商量一下大事，到执行时还是各个部门去执行。要有分工，现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状况请大家考虑一下，里面真正的劳模一个也没有，农民代表也没有。到底要多少委员？大家讨论一下。我倾向于多一点，委员会下面设常委，处理日常工作。各个群众组织要加强组织纪律，代表要考虑把队伍带好。有些事情外面很快就知道了，上次传达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外国通讯社都报导了。更重要的要把队伍带好。例如工总司，上百万的人，这个队伍怎么样？怎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政权组织与群众组织是有区别的，有些事情不应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出面。革命委员会发言要负法律责任，现在有人谈到摘桃子问题，毛主席是指两个阶级而言，不是指个人，个人有什么桃子可争？搞革命要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这个桃子应落在无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落在个人手里。如果落在个人手里，就把这场斗争的意义看错了。不要自以为为了不起，如没有毛主席的指示，权能夺过来吗？有一天《人民日报》四版的都是上海的消息，我看了有点担心。人民公社改名如果不是毛主席指示，早就被砸烂了。我们这个权是党、群众、毛主席夺的，不要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最近上海的同志骄傲劲不得了，老子天下第一，其实至多是第二，毛主席第一。要是内部的人互相干起来，用不着阶级敌人出动就非垮不可。最近有的人头脑中“我”字大大膨胀了，毛主席和党、群众都没有了，敌人也没有了。我们要总结，要整顿思想，这样才能一致按毛主席思想办事。有的人想个人多，不把革命放在第一位，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前头。要开门整风，不整不行，关门整风也行，总之是要整的。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组织一整就打架，一开口就是“大毒草”、“大阴谋”、“捞稻草”，这是对敌人讲的，对同志那来的大阴谋？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和，这当然不是和稀泥，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全市性的组织要不要解决？这个问题决议草案上已经讲了，根据这个精神办事。我认为各组织首先要了解自己组织的情况。有些组织既有革命派，又有保守派，还有反革命，司令员要回连队，摸出经验来，把自己单位的大联合搞好，这样才能有发言权。都回去，下去干，把自己的工厂、学校的大联合解决了。市一级组织要保留的话，无论如何不要妨碍下边的大联合；如妨碍、干涉的话，主张把这个总部推翻。市一级的组织对下边的联合都要支持，不管以什么名义联合。

姚文元同志：文化革命到了非常重要的时刻，面前的任务是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整个形势很好。但从全国来看，市一级的夺权还不多，有些地方夺权了，但没有实现三结合；有的地方阶级阵线不鲜明。上海夺了权，还存在着把革命进行到底，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把毛泽东思想扎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解决组织机构问题，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有一个事项要讲讲：前天，浙江有人来开座谈会，说听到谣言，“文化革命要急刹车”，这种说法完全错了，现在华盛顿、东京也在这样造谣，他们站在反动立场上不可能理解文化大革命；我们一

定要进行到底。现在有不少涣散军心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争权夺利，要一扫而光。革命在进一步深化发展，而不是停顿。今年主席概括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学生回到学校去夺阵地闹革命，是非常重要的阵地。这个阵地夺下来，对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都有重要意义。学生总是要和工农相结合的，到斗批改还是要出来的。革命在前进深入，对过渡时期产生的种种现象应用革命的眼光去看待。(张：现在有这样的说法，“把学生赶走，先赶走学生，再赶走工人”，这样还了得？这样革命委员会要下台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大家想一想，建筑工人造房子是不是自己住？还是交给群众住嘛！无产阶级要有这样的风格，为阶级、为群众、为人民争权，不是为个人争权，否则就不配称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团体主义是忘记了人民，忘掉了阶级利益和斗争大方向。夺权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改变了形式，阶级敌人还是想复辟，刘邓陈曹都想复辟。头脑里要有敌情观念。整风一定要整得好，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同志的缺点要指出，要允许革命，不要用抓、砸、开除的办法。一个组织不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否则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各个机构要迅速地把工作抓起来，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注意依靠群众、抓典型、抓政策，把上下线赶快连起来。

598.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1967年3月13日 政协礼堂)

接见首长：关锋、戚本禹

王相喜：(叙述自己在二月二十三日前后的见闻)

戚本禹：你们谁见过刘贤权？

张金莱、王滨友：谈判的最后一次他们推出了刘贤权。

(王相喜述说“孤儿事件”“民和事件”……)

冯国良：叙述“六·三社论”“民和”“孤儿”“胡天申”……

戚：“民和事件”就是那二十三麻袋材料？……

关锋：《新青海日报》刊登过。

金莱：名字是“风展红旗过大关”。

相喜：……

戚：“八·一八”把矛头对准谁？

冯：王昭、韩洪滨、牛人、韩明……

相喜：……杨守礼。

戚：杨是“八·一八”开除的？

喜：对。(详细叙述“二·三”有关情况)

戚：(对关锋)捍卫队都说不是事实。

喜：二月十四军区要接管报社……抓《青海日报》的歪理……

戚：我们见了。

喜：……我骂捍卫队，有人硬讲我骂解放军……我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不允许我喊，说我是“反革命”……我的耳朵都打流血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公安厅(戚点头)……(又边听边点头)他们说我是冒牌三司，我读了全称，他们说他哪里是三司的？(戚、关锋一笑)……群众说，人家外地红卫兵来西宁革命，有缺点也不能把人家打成这样。……

戚：群众？

喜：……那个医院帮助我。

戚：那个医院同情你们？

喜：……二月二十三……我的衣服被抢了，我现在的衣服都是别人的，……我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说我嚣张……那天十分冷，下雪，……两个无辜群众被抓，他

们脱了皮大衣铺在地上叫我躺……(戚插问：哪里的？)……(戚：二月二十四你已经不在报社了？)我还没讲完。……南滩监狱抓了八千多人……(关：八千多？)大院都满了……；我可以保证八·一八没枪也没开枪……(关：你在报社吗？)我们四十多个同学都在里面，我可以作证……“火车头”……咱们同学起先以为朝天放枪，后来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七十多个，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了，又倒下了。(戚：为什么上？)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要保卫报社……我们的刘凤池也被打伤。

金莱：(对关锋)刘凤池你认得吧？(关点头)当时你接见我们了，(关又点头)(关对戚：广播学院的)

喜：……他们讲这是林总来电……(戚：付之冷笑)

金莱：您看。(送上一份)

关锋：你们还有什么传单没有？

喜：……

滨友：××同志已经表了态？！

喜：把巩恩环同志定为“反革命”，巩最先为“六·三”社论平反。

冯国良：……章科伦、巩恩环等同学帮助组织了“八·一八”……

喜：……林总的……

喜：贫下中农红卫军。

滨友：他们中有地富反坏……

金莱：我们调查过有材料。

喜：……监狱的生活是很苦的，……一个老头讲：你到北京告诉毛主席(戚：那个老头是谁？)……夜间两碗稀饭……许多同学坚持不了……(我们在牢房里，那晚上军队去的特别多，传说白色恐怖加深了，狱里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亮了……我们就是死了，也有人能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清华许宝生和我校的一个带了八天手铐，还带背拷……他们讲，你们不是坐牢，是集中审查……

戚：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会事？！

喜：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

众：(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喜：……“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吟，“火车头”拿小锤一锤一个打死了……

戚：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据就没看见死人。

众：我们都在现场。

戚：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

关：当时你们提引“红旗”的文章是不合适的……

金莱：我们诚恳地接受您的批评，“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不应当把矛盾公开化。(关交四份分刊)

戚：(翻阅)战士来信是真的吗？

喜、金：没错，我们有许多。张凯民被逮捕了。

喜：一个殷科长……

冯国良：我和王仲山在一起，为工作忙得不得了，眼睛都肿了。

戚：他没有搞妇女？！(就是那个……一对关锋)

喜：……

王振宇：军区还放出风……

戚：(拿出一迭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答：造谣？)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王相喜：抓我们人的时候，捍卫队有人捎枪，我们同学亲眼见，这一点他们逃避不掉。

振宇：……

关锋：你们知道刘贤权这个同志怎样？

众：……

关：大街上已贴了罢刘的官？

戚：你们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喜、众：我们认为他是好人，刘在三干会上揭王昭最厉害。

喜：二十三日军区内还开会，据了解开枪问题还不能一致。

戚：(问那里的组织)

关：“革命派内部打内战”口号是错误的。

戚：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

金美云：“二·二三”事件和王昭有关系。(详谈)(关重视)

戚：你讲的“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有关系根据是什么？

金：王先赞讲的。(他是公安厅工作人员)

戚：王从哪里来的话。

关：王先赞讲的。(李、孔、胡、陈代海进来)

陈代海：(详述二·二三事件)(关、戚异常重视)

戚：谁先开的枪？

陈：军区先开的。

戚：报社有没有枪？

陈：没有。

戚：没有迫击炮？(没有！)没有机关枪？(没有！)没有手榴弹？(没有！)

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

戚：程××不在青海吗？

陈：……

关：青海日报社中有没有这回事，报社内不同意“八·一八”的人打死，烧死，有没有？

陈：没有。

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陈：没有！我厂捍卫队还讲：“江青同志两次到西宁。”

戚：关锋同志提的问题你能确切回答。

陈：没有，他们扬言叫我们去看尸体，至今未带去。

戚：你们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个观点(一回事)。你们打了人家没有？

关：进来报社的有无年纪大的流氓？

戚：坏人。

陈：我们厂的没有。(陈曾下厂劳动)

冯国良：他们现在在北京还抓人。

戚：(十分气愤)北京不许抓，中央有通告。

金莱：他们是秘密抓人。

戚：(对金莱做手势，示意保护起来)

关锋：最后我说两句，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听，作调查研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同学们是理解的。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三次强调)相信他们的英明，只要是革命的就要坚持，真理可以战胜一切，

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能在复杂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着重讲一点。今天在这儿谈，同学们回去以后不要讲青海的问题，我们相信革命的同志会遵守革命的纪律。我们会想一想对那个阶级有利。

戚：不要印传单，你们也可以听听反面意见。

戚：你们的要求我们转告伯达同志。

关：我们回去研究。

599. 王力对回国留学生的讲话 (1967年3月13日下午 友谊宾馆)

同志们，留学生同志们：

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从斗争前线回来的留学生同学表示欢迎，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全场欢呼口号：坚决和中央文革站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同志们离开国内很久了，文化大革命有八个月没有参加了，我来见你们主要向同志们介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刚才耽误了一些时间，是因为同学们在这里向我提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关于留学生同学回国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法，很多问题都是我新听到的，不好回答。同学们提了很多问题，给谁管？那个单位发？回来后没人管。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怎样搞法？这些问题我想不在这儿谈，已交换过意见，这里不讲了。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的，是人类历史上一切大革命中最高级的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主席所提出来的最新的命题，最新的原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革命。

这次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最近从一月开始的新的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天才地概括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革命这样一个原理。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还要革命呢？革谁的命？为什么还要革命？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内部，有一部分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也就是要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错误的。部分改善是可以的，彻底改善是不对的。是不是说要把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都要搞掉，都要彻底改革？那么就要走上资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必须承认，这十七年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承认，最近这几年，我们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占统治地位。否认这一点，不承认这个根本事实，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那就根本否认了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十七年来的成就，这是不对的。但是必须看到，我们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十七年中，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我们党内，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全国解放之前，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全国胜利后，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立后，是不是说资产阶级就没有了呢？阶级斗争就不存在了呢？资产阶级就消灭了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就没有了呢？这个问题是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贯穿在我们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抓住了这一个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紧地抓住了两条道路斗争的纲，从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立的第一天起，一直发展下去，这十七年来，毛主席紧紧抓住这条纲来进行革命，来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斗争，建立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可是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刘少

奇和邓小平，他们是什么思想？什么方针？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他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那就是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不是逐步消灭资本主义而是要发展资本主义，所以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他就主张要欢迎资本家剥削。他的理由是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阶级是欢迎资本家剥削的。他公然反对合作化，他的合作化有条件。是什么条件呢？他说：“每一个农民要发展到三匹马、一张犁才能搞合作化。”也就是主张发展富农经济。对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们也是不赞成的。反映到我们党内，在我们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农村合作化完成以后，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猖狂进攻。反右派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些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主张在中国建立、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人，他们有很多观点同右派的观点一致的。在反右派后，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他们实际上不赞成，而总路线本身也是同他们进行斗争的产物。他们提出“反冒进”。这条社会主义总路线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后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压制我们……(未听清)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缺点，这个时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抓住这些问题，向我们党，向社会主义制度，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这就是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时他们从各方面全面地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走资本主义道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猖狂的进攻。这就是“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统一战线上的投降主义，文艺战线上的自由化，国际政策上的“三和一少”。这些都是在党内以刘少奇、邓小平带头提的，这是一个系统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针对他们的进攻：毛主席重申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时讲了三个问题：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矛盾)，打退了他们的进攻。一九五六年，苏联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毛主席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总结了苏联的经验，总结了国际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特别是一九四三(?)年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一九四二年(?)特别提出这样一个敌我矛盾，使大家注意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时没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但要特别注意，提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同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矛盾要变成敌我矛盾。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这时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这就是四清，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是在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刘少奇提出形“左”实右，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毛主席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同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产物。刘少奇提人海战术，包办代替，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冷冷清清。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不是解决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那一个社会都可以用。封建社会也可以用，那时候有清官也有贪官。又说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交叉”，这也是脱离了阶级来讲的，没有上纲。斗争的矛头指向谁？二十三条中毛主席提：重点是整那些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提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结果把所有的干部一律打倒。排斥一切，否定一切，不是从阶级分析的观点。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结果，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大量宣传王光美在桃园大队蹲点的经验，向全国做报告，只有王光美算蹲点，别人都不算蹲点，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那么全部中央委员全部都要打倒？他说毛主席的调查研究过时了，公开攻击毛主席，放录音，到处讲，提形“左”实右。

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导的四清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四清运动加上京剧改革和其他文艺改革。江青同志的京剧改革攻开了反动堡垒，建立了新的文化艺术榜样。十七年来贯穿着两个阶级

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次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间开始的。那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要批判吴晗，这就是说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在北京，当时以刘邓为领导的中央机关和彭真把持的市委不执行，所以在上海找了姚文元等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吴晗，特别是揭露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北京各报都不登，拒绝转载。于是在上海印了小册子，北京不要，也不准发行，同志们，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众答：是资产阶级专政）对，这是资产阶级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统治。以后在群众的压力下，北京报纸不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他们转移目标，力图把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斗争转移到资产阶级的纯学术的讨论，讨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清官问题，历史剧问题，就是不许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的措施，登峰造极，到了顶点，就是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是一九六六年二月搞的。这个汇报提纲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直接对抗的纲领。他们斗争的矛头指向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不许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的“平等”“自由”“博爱”，不许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政治斗争，不许批判揭露这些家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他们实际行动也是这样干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开红灯，文章不许发表，对资产阶级反动文章开绿灯，自由放行。差不多在这反动汇报提纲提出的一时候，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上海搞了文艺座谈会的纪要。彭真在刘邓的支持下，却针锋相对，用非法手段，把他的提纲作为党中央正式文件散发全国。他们得意忘形，彻底地暴露无遗了他们的修正主义反党反毛主席的面貌。首先是彭真，其次是刘邓。所以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主席就发表了文章，揭露了彭真的问题。毛主席主持了党中央会议，揭露了彭真的问题，在这之前揭露了罗瑞卿，以后又揭发了陆定一和杨尚昆，到五月十六日发了一个通知，叫《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通知》，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的重要段落是毛主席亲笔写的。也就是在这个文件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彻底揭露文艺界、教育界、财贸军政部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要进行这一点，必定要批判那些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轻信这些人物，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用这些人来进行文化大革命，而过去这些人是在党内做实际工作的，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转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那时指彭、罗、陆、杨）有些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还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要充分注意这一点。同志们，现在清楚了吧？（全场热烈鼓掌，高呼口号：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五月通知”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文件，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党中央发出了通知，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开始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底，这段时间是文化大革命舆论准备时期。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开始，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七位同志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这是战斗动员令，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信号。

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一发表，毛主席的号召符合全国广大人民的要求，全国掀起了向反动学术权威、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进攻的高潮，反动堡垒一个一个地被攻破，声势非常大，非常快，非常好的革命形势，这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看来是非常好，可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他们却吓破了胆，觉得不得了，他们被大字报吓坏了，就下命令，不许群众上街，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等等。在毛主席讲了不要匆忙派工作组的指示后，他们却匆匆忙忙派了大批工作组去各学校、工厂、机关，去镇压群众，去包办代替。他们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他们从来不作阶级分析的，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他们眼里没

有阶级敌人，因此在他们这条路线错误指导下派出工作组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对立，去压制、镇压群众。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斗争锋芒集中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权威等一小撮人，而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却把斗争矛头转移。现在总结起来，这些工作组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谁要起来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意见，对所谓党委提意见、贴大字报，就要打成反革命，刘少奇直接掌握清华大学，就把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在清华大学掌握的还有薄一波、王光美。打成反革命的不仅蒯大富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上千人要检查交代，上百人被打成反革命。第二件，他们为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把所有的干部一概打倒，都靠边站，统统打成黑帮。清华大学就是这样，已经查明，这是他们干的，不能怪学生，刘少奇一贯形“左”实右，在土改时，刘少奇、彭真直接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就是这样，叫搬石头，把所有干部统统搬开。刚才说在四清运动中他的形“左”实右，把所有干部统统打倒，叫四清四不清的矛盾。而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除了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把所有干部一概打倒。他是乘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以中央名义干的。北京大学第九期简报中说的北大“六·一八”事件是因为工作组不准斗黑帮引起的，那天革命群众起来自发进行斗争，斗时有个别过火行动，但被斗的人都是坏蛋。工作组长张承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刘很快批转这个报告，要全国各地效仿办理。当时六月十八日以后，这一段相当普遍地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谁敢给工作组、党委贴大字报就要被打成反革命。西安交通大学更早了。六月六日的事件是交大李世英(革命学生领袖)被打成反革命，这时候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写社论“假左派、真右派、真反革命”，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抵制了。同志们要注意，从六月六日起人民日报就夺权了，陈伯达代表文化革命小组接管了《人民日报》，六、七月间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掌握《人民日报》，刘邓路线的主张受到抵制，这条路线从上到下全遭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抵制。六、七月间，毛主席不在北京，刘邓在北京当家。在五十多天期间，刘邓路线占主导地位，他们颠倒是非，压制革命群众。毛主席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到七月下旬，毛主席亲自决定撤销工作组，后来决定召开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和公报，改组了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确定了接班人，由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做毛主席的接班人(全场热烈鼓掌)。

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在陈伯达的工作会议报告中引用了，同学们大概已看到了。毛主席在大字报上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写得何等好呀！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志们也可以重读一下，可以读《红旗》上重登的那篇。“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陈伯达只引到这里，后面一句话没有引，这句话是：“联系到 1962 年的右倾和 1964 年的形‘左’实右，岂不是令人深省吗？”

十六条公布后，毛主席写了大字报，还有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当时没有发表，传出去了。他热烈支持红卫兵。因为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之下，当时在个别学校，红卫兵被看成是反革命。当时红卫兵写了两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第二篇《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两篇写得好得很。但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统治地位时，认为红卫兵是反革命的，这两篇文章，毛主席在七月三十一日看到，就批给大家看，八月一日写了信，热烈支持红卫兵革命的文章，这封信没有发出去，但传出去了。红卫兵的文章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迅速开展红卫兵的运动起了决定的作用。

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接着在十月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对没有觉悟的干部做工作，在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把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加以区别，

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是轻还是重，是坚持还是改正。所以在八、九、十月间，在中央全会上纠正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路线在全国广大范围展开了斗争，从十月开始，群众中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刘邓路线的运动。《红旗》十三期社论，十月一日林彪同志的讲话提出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红旗》十一期社论阐明了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实质。为什么要斗争，以及怎样进行斗争的方针。《红旗》过去发表过不少好文章，但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从十三期社论以后，得到革命群众的拥护，群众开始敲锣打鼓地去报喜，以后每一期社论发表都有报喜的。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提出平反问题。十月六日在北京十万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周总理作了讲话，以后毛主席提倡革命大串连。加上十一中全会提供的武器，从十一月份开始，全国展开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斗争是否结束了？刘邓现在在党内不占重要地位，组织上改组了，也通过决议，是否两条路线斗争就不继续，停止了？不是这样。十一中全会后，有些人表面上接受、拥护，工作会议他也赞成，但还搞他那一套。所以八、九、十三个月，革命群众运动以更大规模发展起来，这是主流。另一方面，十一中全会后，这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搞了很多花样，把我们提的口号接过去，你说工作组不好，他就撤退，你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好，他就组织保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你说红卫兵好，他就组织自己的红卫兵。他们持他们有权有钱，发红布做袖章，发经费，发大衣和被子，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薄一波自己就要当红卫兵的政委呢！他们组织群众斗群众，组织武斗。十一中全会后更严重，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机关干部斗学生，组织家属小孩—红小兵—斗学生，抵制推广革命路线，坚持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大字报提到这是什么问题？《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一发表，有很多人反对，这不是刘邓，刘邓已没有发言权了，其中就有一位叫陶铸嘛！（笑声）他就不赞成，他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到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十三期社论一方面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另一方面，那些坚持反动路线的人坚决反对。陶铸说，这样提太“仓促”了。其实，毛主席八月份就提出了。这不是两个字的争论，他是不许批评工作组，不给打成反革命的同学认真平反。他只说：“蒯大富，你不是反革命”，这怎么行！这不是蒯大富一、二个人的问题，北师大的谭厚兰、地质学院朱成昭（现在不怎么好），都被打成反革命。《红旗》社论以前，我们听了他们的意见，几乎在所有著名学校中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坚定的革命同志并没有平反，他们的地位根本没有改变。采取这样的斗争形式支持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一直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是批判他们，不是严肃对待他们，而是马虎过去，实际上是支持他们，也是害了他们。当然，那些人自己也有责任，为什么自己不觉悟，不站在正确立场上去？为什么害怕得要死？陈伯达报告中说：“怕的出奇”，丑态百出，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派那个样子。为什么不严肃对待他们？这是因为陶铸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要继续搞而且有所发展。特别是在十一月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特点是工人起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大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到工人、农民。六、七月以来，工人运动（忽起忽落），直到去年十一月，工人运动才充分发动起来了。十一月初，上海最早起来的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打击的造反派只有几千人，经过两个月时间，发展到一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产业大军，只要站到真理方面，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坚定地站到这一方面，人数看起来很少，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展的过程证明真理在他们那里。工人运动蓬蓬勃勃，到处都要起来造反。工人起来，同学不一样，学生只是接触到学校领导和教育方针方面，以后到社会上破四旧……但真正决定城市和国家经济命脉的不是学生，而是工人，经济命脉掌握在工人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学生起来看作是违反他们的意愿的，要进行镇压，而工人、农民起来，他就要完蛋，就最后要被埋葬，所以就千方百计要压制工人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的。陶铸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个代表，他自己说要把工人运动“压下去”，这是他的口号，那时

工人要平反要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不许可、反对。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有的工人要到北京告状，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不许工人组织起来闹革命，工人上了火车，铁道部不让开，堵塞了一百多列火车，这是全国最大的事件。当时中央文革打电报去解决的，火车一定要保证畅通。张春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到工人中去听取意见，支持工人建立革命组织，当时受到上海市人委一些人的激烈攻击和反对，他们组织了几十万赤卫队员来保护自己。这样，(使得)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经过一个月斗争，革命派胜利了，保守派失败了、瓦解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旗帜下，上海一百万产业工人组织起来了，这是一件大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上海如此，全国范围内也是如此，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少数到多数，从被镇压到闹革命，斗争高潮是一九六七年一月，同志们二月份才回来，又没有赶上。革命从小到大发展了，他们就利用掌的权，在去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底，乱开支票，要搞乱文化大革命。这些人喊“文化大革命万岁！”不要相信，他们心里喊的是“刘少奇万岁！”，他们唯恐文化大革命胜利，就是要破坏，从开支票到反革命经济主义，到今年一月是个顶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铁路停车，港口停顿，不收购猪肉，以致上海买不到猪肉而有些地方却减价出售，渔船不打鱼等等，他们利用手中的权来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是发展的必然结果。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必然要夺权，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着的党、政、财、文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系列的政策、战略都是毛主席亲自决策的。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支持，对反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的支持，对夺权斗争的支持，都是毛主席亲自指导、决定了的，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人民解放军要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定，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的支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的态度，也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一定要介入，一定要坚定明确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些报纸上一系列社论已讲了，这里不多讲。

革命的“三结合”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红旗》杂志三、四、五期都讲这个问题。正确对待干部，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系统提出了干部政策，很完整。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组织形式问题，贵阳解决了，贵州棉纱厂的经验，是毛主席提倡的。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了关于两个夺权的问题。要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里“私”字的权，夺自己头脑里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权。这个问题首先由《首都红卫兵》报上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一位同学的文章提出的，毛主席看到了，立刻加以提倡，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重要的问题。以后报上又发表了鲁迅兵团的两篇文章。

在一月至二月中，党中央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政策，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批阅的，经过毛主席审阅通过的。所以有了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发表一系列的理论性文章和文件，这就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上了正轨，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年二、三、四月能有眉目，各省市同中央各部的一些重要工厂和学校能在这三个月搞出个眉目。现在三月已过了一半，所以同志们要努力啊！但教育部至今还没有眉目，你们也有责任。同志们要补文化大革命的课，但补课的概念不是倒退回去。当前我们面前有没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当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没有新的表现形式呢？不会没有，我们提出的口号，他们接过去的，有夺权斗争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决战，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那么老实？一心一意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会这样老实的，不要那么幻想。这样紧张的斗争，每前进一步，必须要斗争。毛主席讲“三结合”，有人马上接过去了。毛主席讲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三结合”，可是另一些人要搞不革命的“三结合”，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三结合”，还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呢！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过程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些主张反革命复辟的人都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派一棍子打死！打倒！权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他们一点不着急，很舒服。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得不那么好，不那么高明，要经过锻

炼提高，他们就不能容忍，恨之入骨。毛主席讲，必须要正确对待干部。有的人接过去了，要保他的资本主义反动路线，不作阶级分析，不分左、中、右，不讲原则，不讲是非。我们要讲团结，一定要在原则基础上团结，对干部一定要作阶级分析。现在有人跳出来要代表全体老干部。那有这种事！实际上他代表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真、刘澜涛、薄一波都是叛徒。安子文是国民党分子，是共产党的叛徒，他否认参加共产党并发表他的反共声明。他们不能代表全体老干部，说他们革命几十年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所谓打着老干部旗号的就有敌人和叛徒，也有在敌人面前无愧为无产阶级英雄，但在敌人糖衣炮弹面前被打中了。他们受不起糖衣炮弹的侵袭，变为资产阶级，变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看看我们的拥护毛主席路线的老干部，显然他们所谓全体老干部是代表前两种人，他们把全部仇恨集中在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有的人上了他们的当，中了他们的毒。只有必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刘邓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才能参加“三结合”的领导。而且他们要到群众中去。毛主席一开始就反复教导我们，到群众中去。我们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的只是一小撮。是有一股逆流，一股反攻倒算的空气。另外“三结合”搞反革命复辟的，必须把他打退，在这个原则上不能后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界限如果没有，就谈不到“三结合”，这是第一个问题。

在我们队伍里有各式各样的思潮，不要相信金字招牌；如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三司有了名，到处打起旗号。都是造反队的旗号。在革命组织队伍里不能认为统统都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的，一定要看到我们庞大的队伍在发展壮大，反映了中国这个社会是大量小资产阶级结成，在我们队伍里必然要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各种思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一定要斗争到底。必须注意我们队伍里反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潮，我们一定要善于引导，一定要以毛主席思想来引导，不能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来引导。这些思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利用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利用它，这种思潮在二、三月间集中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在夺权斗争中进一步暴露了，泛滥起来了，提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口号。毛主席党中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一个重要的口号，无产阶级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可是代表无政府主义的人讲冲击，提出了另一种口号，说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打内战打到底”，这些都是错误的口号。还有“打、砸、抢万岁”，这是一个反动口号。在西安就把一个国防尖端的重要工厂砸了。有的是“反托派”的口号，我批评了。有的地方反右倾机会主义，也是错误的，现在主要的倾向是无政府主义。发生这样一些问题，在夺权中就要争夺权利，互相砸社会主义国家的财富，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现在要夺脑子里“私”字的权，要不断改造改造思想，要进行整风。上海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提倡的方法很好。

关于整风的问题，毛主席指示要特别着重于自己检查自己的缺点，不要互相攻击，这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两个方面：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分清是非，但个人要着重自我批评。最近又提倡了贵阳棉纺厂的以行政部门、单位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毛主席的指示引导我们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现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领导都是通过报纸、杂志，要很好地学习，作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还有党中央发表的一系列的文件，都要学习。这个运动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经常有毛主席的指示通过报纸、杂志指导全国，我们要好好学习，来正确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定要搞好。

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切同志必须树立起这样一个决心：“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目前的斗争很多，需要同志们在伟大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真正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今天的介绍就讲到这里。

600. 陈毅接见对外经委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14日 中南海接见厅)

陈毅同志首先听取了红色造反联络站和革命造反兵团代表的汇报(汇报内容略)。在听汇报时，有以下插话：

(听到红联站代表就二月十七日的报告，当面向陈毅同志作检查时)我马上回答这个问题。听了你们的检查，态度很好，我很满意。我很感谢你们，你们的报告中有几点抓得很对。我向你们检查，我在机场的态度不是很好。关于方毅同志，本来总理对我讲过。我在机场对二十几个造反派的人发态度不好。本来要是到你们那里去，和你们开个座谈会，谈一谈就好了。我在机场一讲，给你们泼了一盆冷水，给你们一种压力。压就不行。不对，就批评嘛！我感到很高兴。“虚心征求意见，诚恳接受批评”，这句话抓得对。我刚刚检查(整理者注：指一月二十四日在人大常委会的检查)，又依势压人，我们造反派是压不倒的。

(红联站代表：我们造反派也有点老虎屁股摸不得。)我也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别看我是副总理，也要以理服人。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在这一点，你们攻我一下对，方式可当面谈，不要采取那么尖锐的方式。这种敢于批评的精神要保持。

(红联站代表谈到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发言后方毅同志的表态时)这个表态不好，应该是支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是因为他思想上还没有转过来嘛。

(红联站代表谈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个任何”，即：任何人，可以任何方式，揭任何人的任何问题时)这完全是打倒一切，混战一场。我那时要到你们那里去，也会犯错误的。

(红联站代表谈到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总理点火时)这是对群众很大鼓舞。

(红联站代表：……方毅同志是个好同志，但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刚才批判的……)那是很公正的。那个会上的表态是个大错误。

(红联站代表谈到对方毅同志要历史地看时)对方毅同志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红联站代表谈到方毅同志的检查，要事先在群众中做些酝酿……)有把握再开，没把握推迟两天。你们想法很好，要很快把方毅解放。检查能够顺利通过，但是要有把握。前一段，我也发了一些指示，谢怀德、杨润贵同志做了些具体事，我不知道。

(红联站代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时)恐怕抓生产，这是个最重要的问题。

(红联站、造反兵团代表双方都进行了检查)你们双方的态度都不错。

(造反兵团代表谈到方毅同志检查时)你们看，方毅同志能够过关吗？批判他是要严格的，要有帮助，这是很严格的态度，这是对的。

* * *

听完汇报后，陈毅同志作了如下讲话：

今天请两方面的代表同志来，也代表对外经委干部的大多数，代表革命群众的意见。给我上了一次很好的课。

听了你们的汇报，我很高兴，你们的造反精神很好，自我批评精神同样好，这是正确的。你们都检查了自己，把我说服了。从前，执行了反动路线，在外事口的流毒你们肃清了。向你们学习，与主席和林总一起，肃清反动路线，贯彻以主席为代表的红线。依靠你们，可以把外事口的工作做好。听取你们的汇报，吸取你们的教训和经验。以后，经常到你们那里去，那怕很晚也要去。

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夺权以后也是正确的。也暴露了你们一些缺点，作了自我批评，这是次要的。夺权是正确的，业务监督是正确的，对干部批判也是正确的。有些过头，是次要的，主流是好的。

鼓励你们开门整风，自我批评，把运动搞的更彻底。同意你们的安排，明天请方毅同志做检查，把他解放出来，在业务上抓外经工作，接受你们的监督，不包办，不干涉。文化大

革命，你们为主体，征求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业务，支持他们搞业务，使他们做好业务。业务工作，你们不熟悉，做不好，会出乱子。你们要学习主席著作，要把他们卷到一起来学，监督他们少犯错误。领导文化大革命权属于你们，处理干部，征求他们同意，这并不是丧失你们的权，因为你们不了解干部全面情况。大字报、黑材料的处理，很复杂。要请他们做顾问，因为他们掌握干部情况。他们要切实掌握业务权，接受你们监督。

把方毅同志解放出来，对外经委就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问题一解决，方毅放手抓业务，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大搞了，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业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文化大革命也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的新水平，就不是开大会压了，要摆事实，讲道理，真正的搞思想，搞灵魂。就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要经群众讨论，征求他本人同意，不能压服，完全是说服，群众同意，他同意，然后从宽处理。

过去错了？不错。过去是对的。开始的局面，斗争方式过火过左，一揭起来就上纲，这是必要的，必然的。群众运动以后不能这样搞了，斗争方式要改过来，不能搞夹生饭。思想工作要做深。

方毅明天检查，要过关，我有时间要出席。方毅检查后，出国回来，还可以交换意见。以后监督还要有，不会回到六五年以前那样，人民代表大会开了两个礼拜，通过了计划，监督工作没做好。监督制度要定下来，永远监督下去，老干部、部长、副总理，也要放在群众监督之下。所有干部都要放在群众监督之下，这个监督制度是肯定的。

对外经委有条件搞好三结合、大联合，搞好了，可以搞个经验。其他部经验还不够成熟。外交部，我们鼓励他们，他们没有做好，他们分歧太大，造反派内部也有分歧，你们相互间的距离较近。

监督不要搞监督官。可以搞五至七人，不要脱离生产，人多了，没事，不能比主任高级，整天划圈。那样，不官僚化，也得官僚化。不称职的，可以换；那样就不是官了，可以回原单位去。换可以培养人，可以学习业务，培养新干部。中级干部一处处长、科长、科员，也可以参加监督，工人、司机、印刷工人，也可以监督，住上三个月可以回去嘛。但要能够保守国家机密，永远保持革命造反派的精神。

革命的监督权，是文化大革命的创举，是毛主席著作新的一篇。苏修就是没有搞监督，没有搞文化大革命。监督不是官，而是在原单位工作，几年就出现一批新干部。文化革命委员会也要经常换。监督也是要开门，不称职的换下来，一变成领导人了，就很难下去。象我们这样，上午、下午、晚上安排的满满的。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二十小时。对外经委运动今天才了解，这很不够。

做监督工作，不能脱离原单位，监督他们学好主席著作，监督他们经常到群众中去。

今后整改，是否还要搞那么多处，就不要开大会了。党组、文革要很好地研究。你们有个好处，机关不大，某种程度上还要增加人才成。

当前任务是：安排好方毅过关；搞好监督；领导好文化大革命。

监督，两方面都要参加。其他方面也参加，代表面越广越好。

对方毅同志，我同意总理的估价：方毅同志是个好干部，在国共合作条件下，要出来的，没什么手续，给了三十元钱做衣服穿，就参加工作了。受了很多苦刑，没有自首，历史是清白的，经过审查的。外经工作很有成绩，我跟他比较熟，一起工作了三十多年，在淮南做区党委工作时就认识，朴素正派，老老实实，不拉拉扯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突出政治不够，业务挂帅，这是一般性错误，是好干部，比较好的干部。把他解放出来，让他过关，出国，搞好文化大革命，放手抓业务。

你们大方向是正确的，夺权前后都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两方面协商，大联合，这是我们的期望，不干涉内政，也要与其他革命组织联合。可以用青岛方式，也可以用贵阳方式，由你们创造。

联合之后，要与党组合作，这样便于监督。要批那个干部，做好准备，一两次就过关。要有思想性，思想上要求要严，处理要宽，让他们重新做人，在这点可以学会领导艺术。在这方面，可找方毅，也可以找我，我们有好的经验，也有坏的经验，在这方面，我们是犯过错误，只有毛主席没有犯过错误。

我们不侵犯他们的民主权利，大量事实摆出，只有一条路可走。毛主席说，犯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先把帽子戴上，搞得很紧张，他就乱说，不能触及灵魂，不能解决问题。承认了也是假的，将来要翻案。

要做到真的上纲，上文化大革命的纲，要上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线。

毛主席、林副主席相信你们，把这么一大批干部交给你们处理，这样大的任务，错了也不行。你们有责任，漏了也不行。错了，漏了，都对不起主席。我们要帮助你们，不能看着你们犯错误。

监督问题要创造，你们要在群众监督下，代表群众，又监督司局长，你们有希望搞出个成熟例子。原想在外交部搞。今天你们相互整风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大联合不要勉强，思想统一后，自然联合，还要配合，可以保持各自的组织，可以合作，搞好三结合。

业务是很重要的，你们援外减低了，货交不出来了就不好。援外搞好，才能体现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你们做好了是对文化大革命更大更好的宣传。×××总统就喊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好得很。

要靠你们去推动其他各部。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把业务停下来。方毅同志过了关，业务搞起来，中层动起来，纳入正轨。我同意把抓革命促生产两项工作抓起来。我同意你们二、四、六下午搞运动(整理者注：红联站代表曾插话，目前业务很重，尤其成套公司业务有些积压，想把公司运动时间减少些，譬如一、三、五或二、四、六下午搞运动……)会议不要多，而在质量高。方毅同志过了关，组成监督小组，要把名单交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把权交给谁了，我们知道找谁了，工作有秩序。过去你们顾不上，我们也顾不上，那不是什么错误，现在三结合就要逐渐上轨道。

红联站代表：希望你做一次形势报告，谈谈抓革命促生产。

陈总：现在我在准备，国际形势好久没讲了。

红联站代表：搞大联合，是要形成统一组织，是否一个都不漏？

陈总：大联合有两种形式：你们有两大组织，委这一级文化革命领导委员会，十七至二十一人，可以你们多少人，他们(指兵团)多少人，其他(组织)多少人，领导干部多少人。委这一级政治上要可靠，不一定党团员，不一定哪派包，这也是个联合。监委也是这样，可以搞五至七人，人多不太好。比如红联站三人，兵团二人，其他两人，并且随时可以换。

另外一种形式，所有组织都合并。这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要征求群众的意见。各公司、局也可以用这种形式。最基层的没经验，处级要不要可以考虑。现在委的局面清楚了，先把委这一级搞起来，搞一个委员会，二十多人，再搞一个常委，五至七人。党委和监委不脱离原单位生产。这样委员会一两个礼拜开一次会就行了。要以你们两派做核心，你们是受压抑最大，组织成立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们先起来。要有各方面的代表，中间派的一些观点可以参考。都是造反派容易偏左，都是缓和派容易偏右。你们这就是接班人，一、二十年以后就要接班。我们是亲密同志，要和你们讲，你们中间也会有淘汰的，你们要学习，学习最重要，你们要学习主席著作。伯达、江青同志的讲话是很重要的。

对外经委你们要搞好，援外的工作搞好，可以接班，把文化大革命工作搞好，就提高一步。业务工作，过去就是方、汪几个人在管，监督搞好，就成了群众机关了，我们由衷地高兴。我们国家是有前途的，是光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看到这些。

一般不用保字号，这很难听。就是犯过路线错误，被贴过大字报的，也要欢迎他们革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是三部分：两头小、中间大，有中间的，有稳健的，有激进的。年老

的保守，年青的就是要积极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过去运动冷冷清清，外面包着一层皮，很多问题包在一起，里面什么问题都有。这下文化大革命一来，揭发开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不相信那么平静，有秩序。毛主席英明果断，看得远，这是主席思想的正确。

别有用心的人，牛鬼蛇神，不要主观去追求这个东西，否则就要犯大错误。要他们自己暴露，他们也可以自己教育自己。

对其中杀人、放火的现行反革命要抓起来。

邢路的一些言论是严重的(整理者注：兵团的代表汇报中曾提到过邢路的一些错误言论)，要帮助他，让他自己很好地交代。

文化大革命搞了八个月，并没有出什么大乱子，没有内战、大的反革命案件，这是主席的正确估价，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也出现了一些反革命组织—“联动”、“红旗军”。头头一抓，底下就散了，群众就觉悟了。(完)

601. 王力与北大《动态报》编者谈形势 (1967年3月16日 人民日报社)

从上到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是一股逆流值得注意，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研究一下第五期《红旗》社论，不能把这种东西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就放到第五期《红旗》社论提的那样就可以了。在三结合，两个阶级决战的时刻，应该注意，毛主席党中央每提到一个重要口号，阶级敌人总会接过去，他把“三结合”也会接过去，他也可以搞不革命的三结合，现在反对资产阶级新的复辟活动，主要是在决战时候，(问：是否主要是三结合？)同意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还是半途而废？是无产阶级夺权还是反过来呢？搞复辟的三结合，假夺权，把矛头针对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比较集中的表现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建立三结合。斗争是什么结果？是无产阶级大联合的夺权还是翻过来？你们都要注意这个问题。他们要搞那一套，要复辟，就必然把矛头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干部问题，要正确对待干部。《红旗》第五期社论提出来，排斥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张，也有一些同志不清楚，肃清其余毒你们要发挥一点。《要爱护革命小将》写的不够，不好。干部问题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着重批评他们包办代替的工作组把给工作组提意见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现在看来是一个方面。还有第二个表现，就是把所有的干部统统打成黑帮，清华大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所以团结干部，特别是清华的同学要注意，刘少奇由王光美、薄一波、叶林是他们打的，别的地方甚至把一般的党团员打成右派。团结干部首先必须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间来进行，事实上打倒干部的旗子是他们(刘邓)打的，在别的学校也是这样。必须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对干部问题也要着重批判他们。对干部，群众打倒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混淆阶级界限，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笼统的提打倒当权派呀，中层干部呀，带“长”字的，这没有阶级分析，要用阶级的路线的，站在那一边原则的区分来辨别他是左中右，这一问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与刘邓一直是有斗争的，他们的主张是不对的，错误的，到刘邓路线揭发后，同继承刘邓路线的人一直是有斗争的，同脑子里有刘邓路线余毒的同志一直是有斗争的。对待干部的问题毛主席的一贯的干部政策是：二十三条毛主席就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干部政策，十六条完全适用，是做阶级分析，对干部要分析，同志们要把毛主席干部政策旗子拿起来，毛主席革命路线采取的政策，刘邓路线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刘邓反动路线有一贯的思想。毛主席批判他们四清中形“左”实右，在四清运动中不是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是说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没有阶级分析，封建社会也有贪官，他们是只要有四不清的干部都要整。对毛主席提出的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四清我们还没有体会。以前，刘少奇、彭真搞晋察冀，当时搞干部和群众的矛盾，

干部和石头一样搬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也要烧，这是错误的，他应该是领导骨干嘛，应该是他们领导来烧，这种思想是刘邓的余毒。对这个问题的批判就要抓住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这条纲。这个问题《红旗》社论的那一段是毛主席提出的。就是两种形式：一概打倒，不能把这个罪加到群众头上。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潮。

军队的问题也要讲一讲。是不大好写。成都、福州、宜宾我知道。是不是还有一些不让回来的？在解放军的问题上，有些同志是有错误的。还是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对三司联络站陈伯达同志是讲了话的。要掌握一条，有意见(对军区)要提，可以提，可是要采取适当的途径。这个问题可以研究，我们也正在研究。(问：三结合是否都要搞)一个问题是要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与 1949 年原则上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军管是在已经有了十七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了，已经有了广大的群众，广泛的群众运动，有了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现在实行军管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支持群众的左派，准备建立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保障无产阶级大民主，保障四大，保障社会秩序。更好地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促进开门整风。不区别是要犯错误，那不对！军管这个问题，不实行的要实行，官僚的可以以后撤消，作为过渡，军队支持左派群众，主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支持，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不但要有总路线，还有具体的政策，这样不会犯刘邓工作队的毛病，这是无产阶级的，同志们要相信这一点，军队保证在毛主席、林副主席掌握的。也有犯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误，不要公开对抗，不然好人坏人就分不出来了。不能轻易把群众组织说成是反革命，有一部分不好就是一部分作了坏事，绝大部分都是好的，是好人，这一条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忘记了就要犯错误。

(福州的情况)具体的不了解，你们要总结一下识别左派、中间派、保守派，这个不好登报，可以给军队参考，帮助他们识别。

我们出去的人，不做阶级分析，容易莽莽闯闯，以前刘邓搞了群众的黑材料，现在去了不问他们的情况，就一头扎到他们那里，跟头头们转。不是有好几个联络站请罪嘛，我们不同意用请罪，动不动就挂牌子。青岛、山西、长沙、福州……是不是可以把不让回来的人统统开个单子给我，中央已经有命令了嘛，统统应该回来嘛，只要不是凶杀、放火。

昨天是合肥，北航在新华社的一个同学，他说安徽夺权的这派很好。昨天我同安徽代表谈话以后，他承认，他一个月在“八·二七”组织里，没跳出“八·二七”来研究。对安徽正在研究，反正很复杂。我们问了几个问题，他们代表团不能回答。问他们在夺权以前红卫军主要成员是陈明远，有什么理由说他们要抢权，有什么证据？为什么 11 日安徽三天血案立刻就写了呼吁书的 16 个干部组织发展了二千七到七千多的干部组织，与那个组织有联系一概要分化打倒，究竟是什么理由？从这个时候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一个多月斗争的锋芒集中的对这个组织，斗争锋芒是对准于得水，死在监牢里(一只手搓草帘子，二十天)，为什么脖子上没有印子，为什么舌头未伸出来，面容正常。为什么镇压该组织的决定还有李葆华开会参加？这十六个干部中可能有不好的，是否都不好？是否比现在还未站出来的还不好？结合不能根据官儿大小。我只举个例子说，北航“红旗”同志觉得都很不错，这些问题我们没法回答，为什么三天血案的直接指挥者王光宇(安庆)还结合，这样搞下去，李葆华是否可以结合？这样的结合是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是否李葆华是对了？原来学生是不是对？反对毛主席路线这样的刻骨仇恨是不是对？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作结论。夺权斗争是很复杂的，不能轻易作结论。中央很慎重，一个一个研究，既然翻过来，也没什么。四川已经是这样的情况，我接到很多信。宜宾地委北航“红旗”同志早反映过情况，现在还认为四个人是反革命，我认为这四个人的案子完全是颠倒黑白，完全是李井泉他们一手制造的，是李井泉 1962 年到宜宾给右派和拥护彭德怀的人翻案，(地委)第二书记刘结庭坚决抵制，李井泉就陷害他们，把他们开除党籍坐了两年牢，他们没有屈服，这个案子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我们查了全部的档案材料，比较清楚的，现在把支持这些干部的人(这个案子打了一百几十个干部)都在镇压，这个矛头完全错了。他们派三个人来抓刘结庭等三人，带着

逮捕证，我和关锋同志通过公安部把抓人的人抓起来。把宜宾方面军打成反革命是不对的，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个问题我们要处理。至于他那里还有什么复杂情况我们不知道，这个案子他们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1、不要看他猖狂一时。(河南)最近搞刘建勋的少了。河南我们还未研究，以后再研究。河南来，怕要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才行，他们认为左的右的都要来。我们要考虑搞一条，在北京不要抓人。反正不要紧，一个省一个省的要到北京来研究。夺权要经过文革小组参加研究，毛主席批准才能定下来。

不要去贴李富春同志的大字报。

(有人问毕业生分配问题)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考虑，同学自己去考虑嘛。

(北京石油学院有人回家)这不好，应该让他们回来。不参加组织，自由战士这个名字不大好听。(对学校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分析一下，区别对待，团结。

(有人怕犯错误)这就不犯错误了吗？

毛主席的意见：大学、中学、工人开代表会，毛主席的意见是开中学红代会，然后再开工代会。然后再联合，这样好一些。

(中学是否实现班级大联合)这是一种提倡，要根据具体情况，是否是时机，要看具体情况。通过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起作用，要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现在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旗帜不鲜明就不能联合。要根据不同学校的情况，具体安排。

《人民日报》准备系统研究一下，听听汇报，唐平铸的问题我们很久都不知道，后来以后搞了很久，我们才知道是×××搞的。

社外监督小组是必要的，留多少人在人民日报工作还可以商量。本来我们建议评论和文化革命工作是否可以合并。社外的同志主要参加这一方面的工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社内的是不是可以不搞了，建立起临时的权力机构。逐步要有革命的三结合机构。临时有几个人作为核心建立短小精悍的班子。《人民日报》也无所谓，三结合，就是要有权力机构。政治部机构的同志怎样？王若水、李希凡两个要做为标兵，从全国来看，把他们打成三反分子，全国还有什么人？

①、不要社外监督组的名义。

②、评论组与文革报导组合并，留下的同志数量不要多，这样适当。

定下来这几个月不换，比较固定(三、四、五月)是关键时刻，是关键时刻。集中到评论报导部，当前任务是搞好报纸。不在报纸的同志要建立一联系，发展一点。留下来的同志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服从《人民日报》权力机构的领导。统一指挥工作，内部按民主集中制选举领导同志。

军训报导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主席未批示。现在还不能见报，主席没批是有他的考虑的。对唐平铸要么就那么坏，要么就那么好，要立几个标兵，唐平铸也是一个标兵，唐平铸过去建立政治部不对，取消政治部不报告也不对。

总是要过的好一点，不要太泄气儿，六月以前是吴冷西办的，他就办的那么好？六月以后，陈伯达同志搞的。七月八日陶铸插了几下。唐平铸有动摇，陶铸的话也听，文革小组的也不是不听，说他完全听陶铸的也不符合事实。在公开揭陶铸以前唐平铸同志与陶铸疏远了。他与陶铸有裂痕，而且他上了陶铸一个大当，以后对陶铸就有了一定的认识，不久就写了揭露陶铸的材料。但是这个同志并不那么坚定，听毛主席的话并不那么坚定。但他揭露陶铸比报社内其他同志早。后来你们就把他打倒了，出来一个冒雨吉，也没有打我们的招呼，临时夺权。这一段比前一段还是比唐平铸同志的时候还是要好。所以不必那么灰溜溜嘛！大家都做了一点工作嘛！反正不能是恢复原状，要用革命的态度来对待三结合，精神是这样，形势不一定。笼统的打碎机器主要是贯彻革命的精神，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实质是保证这张纸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是哪一个阶级的工具，哪一条路线的工具。工作还要做，要做到，包括你们自己，我也搞不清楚，你们对唐平铸究竟是什么看法。你们又送材料又提

建议就要研究你们的态度。有五至七人组成领导核心。可以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你们要研究中央、主席提倡的，订一个宣传报导计划，一体周知，充分讨论，一体周知。

夺权斗争嘛。二、三、四月能各省市、重要学校、重要厂矿、中央重要的部都看出一些眉目来，搞革命的三结合，需要夺权的地方要夺权。看来四月份解决不了，再延长一个月。大串连看来不适合时宜，阶级斗争形势，三结合发展需要，看来不要搞……，一系列政策定下来，运动进入正规，而且要来北京的学生都来了。看来就不要搞了，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大学开学应该你们回答嘛。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应该继续下去。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问到李先念、余秋里、谭震林)我不大清楚。李先念当前是谁反哪？(医大红旗……)这对不对？

谭震林 2·17 的讲话(不许传达、印发、执行)。外边不要公开，公开了还以为我们搞的，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搞的。

602. 戚本禹接见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代表讲话 (1967年3月16日)

我有个感觉，你们应当让潘复生同志挂帅。他是省委书记中较好的。十一中全会，我们在一个小组。他坚定支持左派，当时为左派说话的没有几个。象曹荻秋对左派就怕得要命，发牢骚。而潘复生同志与刘邓路线斗争比较坚决。潘复生这样的人都不能当班长，不能挂帅，其他省怎么办？汪家道也有较多的斗争经验，可以作副班长嘛。看干部不要看他是干什么的，要看他代表那个阶级，代表什么路线。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就一视同仁嘛！革命委员会是集体领导，潘复生的意见正确就按照他的干。不能认为当班长就不是阿斗，其他委员就是阿斗，那么群众就更是阿斗了，这种说法不正确。当班长是为人民服务的。谁来当班长谁来弹钢琴呢？必须是有领导经验的。让潘复生来作班长，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嘛！你们可以提议给中央，然后作个决定。论权威，你们在群众组织中是有威信的，但从全面看来，特别是在干部和军队中，你们的威信不如潘复生、汪家道的。他们要向你们学习，但是你们要向他们学习的恐怕就更多些了。

603. 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及国防工办所属各部院所校造反派 及党委委员时的讲话 (1967年3月17日)

主席指示：

林彪、恩来：军队不仅要支援农业还要支援工业。(指各有关单位派军队代表成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

一月革命我们提出了夺权斗争，夺谁的权，当时我们估计会出现连锁反应，一开始报上提出要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手里夺权，后来主席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划掉了，只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为了缩小打击面，扩大改过自新将功赎罪的面，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就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吕正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只要他改的话，我们还要用他。实际上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和人民的矛盾就会发生变化，他也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要求你们对当权派要排队，你们没有做，至今总结不出一个经验，夺权和批判要分开(指有的人应当被夺权，有的只要批判，不要夺权)，国防工办要夺文化大革命的权，业务上的监督权，各单位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来揭发。

我们也没有经验，主席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来指导我们，现在还总结不出来经验，各部

经验也不同。

“九一六”已走到自己的反面的边缘了(“九一六”、“九一五”是七机部的两个群众组织),这样新的“九一五”就要产生。

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防生产受到了影响,“九一五”、“九一六”谁对,现在我还不准备表态。

国防工业口的干部,有有错误的,有有严重错误的,甚至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是中央研究过和允许的,一个月来看出这样做是不行的,报主席,主席指示要实行军事管制。本来说二、三、四月份后要看出个眉目,最近主席说还得延长,得二、三、四、五月份后才成。(和李富春、聂、叶及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商讨)军管派军管小组三人组成。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不变,业务由军管小组负责。要开大会,揪人要请示军管小组,军管小组报中央。造反派对业务可以批评,但不能监督。最近失密很严重。你们那么大的组织千分之一的不纯,总是会有的。象二机部提出一些要害部门就不能让你们管,你们要进行整风,当然失密外报上是不会登的。我们可以有别的渠道可以得知。你们只能批评,思想上批评,各部门在军管小组和上级党委领导下搞,不能将业务分开。

不同派别应当开门整风,大方向一致就要联合。(当时在会上的代表争论起来。)

对领导干部排个队,给他们一个检查的机会。但不要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这是刘邓提出的,他们派工作组,工作组一到校,就将所有的支部书记都靠边站了,打倒一切。刘在二十三条前也是否定了一切,至今这个问题还未解决。(指还有市场)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国务院各部,没有纠正这种偏向,一到夺权,许多干部靠边站了。这种思想(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人人都有,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林彪同志指出:你们要破私立公,革命小将发挥了提出了要夺自己头脑中的“私”字。我让外交部给外交部干部排个队,但至今排不出。这就与打倒一切有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应当向上,不应向下推。现在有些干部有错误,要做检查,给他们一个星期让他们准备,造反派开门整风,等军管小组来后,再让他们做检查,将来要研究出来办法,具体还要做规定。

国防科委各院、各部、各所及科学院、新技术局,局属各单位中,国防科委军事接管,如果接,要搞一计划,正在研究。

国防科委、各院、各部是中央定的。不是罗贺搞的。是他们有其他企图,有他们的私货,他们将研究所合并到工厂,厂所合一(以厂代所)是为了使我们的科研技术不能向尖端发展。中央发现后就制止了。

科学十四年规划中,赶上和超过先进水平,超过是主席加的,科研有他们自己的任务,这也是主席提的。

现在中央决定,把和国防有关的任务集中到国防科委,当然要为公,不能为私,如果为私,就会象罗那样搞到自己手上去了。当然这些问题主要责任在罗,不在别人(指部院里的干部)。当然你们如果有材料却是另一回事了。不要纠缠在过去的历史问题上面,要向前进。

科学院新技术局,局的单位拿过来,这样有利于统一安排,集中使用,分工合作……。

总理设想(并和其他几位商量)科委和科学院合成一个单位,搞一个统一的机构,挂两个牌子,科学院对外,如地震问题,可以搞一个地震局,这还未报主席,还要和他们商量一下,这样就将三方面分清了。这样科技人材就可以统一使用了。

学校重复得很多,距开课大致还有五个月,很紧。不搞大串连了。国防工办各部军事管制,院所军事接管,(长期的)院所接管问题要研究。不能将过去对的也否定了。要历史的看问题,“九一五”、“九一六”要开门整风。禁止打、砸、抢、……抄。要有根据,将来要出一通知,对待长字号的要一分为二,不能搞人人过关。人人过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再抓人了,王铮(四机部部长)前些日子我让他住中南海,保护起来,现在让他出来,今后你们再抓,我就不管了。由卫戍司令部管(对卫戍司令示意)。

造反派要互相信任，现在不要争权夺的对不对了。过去讲业务监督。现在改过来，连监督都没有了。林彪同志说：朝令夕改。“九一六”走到自己反面的边缘。我已警告过了。对他们还是要帮助。因为还有许多群众。但很不纯。我们领导要负责，“九一五”也要整风。要看你们谁搞得。军管是过渡，不是长期的，是为了促进，文革还可以领导文化大革命。

这一步解决国防科委，下一步解决科委和科学院的。你们谁对，我不表态。十七年来我们都在搞路线斗争，夺权，这次发动了群众，搞得最彻底。这样大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难免要犯错误，只要大方向对头，错的改了就行了。不要纠缠在过去的问题上了，要向前进。不允许再抄材料了。国防工办也派军代表。

604. 康生接见安徽夺权代表时的指示 (1967年3月17日凌晨)

一、向同志们宣布，从现在起任何地方，任何省份，任何地、县要到北京来捕人，一定要经中央公安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在北京擅自捕人，你们已经没有经过一定手续在北京捕人的，过去就不管了，以后不经过公安部、中央文革批准擅自捕人的要依法惩办。

二、取消对陈明远的通缉令，如果他有错误，有罪过可以向中央报告，但你们自己不能擅自下通缉令，过去下的通缉令应当取消。

三、在合肥的现在夺权的一派的同志要求你们通知家里，通知合肥，不准再乱捕人，允许大家辩论，不许对持不同意见的实行镇压逮捕，已逮捕的一般应当立即释放。

四、任何一方不准武斗，赞成1·26(夺权)也好，反对1·26也好，不准武斗，不准挑动武打，不准用标语、报纸挑动武斗。

五、中央在调查安徽的问题，希望你们不管哪一派，不能随便去制造谣言，不然中央解决你们的问题将更慢、更迟缓。15日你们就打伤了几十个人，中央正在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夺了权的一方更应该允许不同的意见么(关：可以到北京来谈么)在北京能谈，在合肥就不能谈么？不能开会解决么？是帮助中央解决你们问题还是制造困难呢？因此希望同志们冷静地从大的方向解决问题，不要宗派主义，不要违抗中央精神，不要违反毛泽东思想，要解决你们的问题，团结起来，把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搞得更好。把葆华一小撮的问题揭开，掌握中央政策。

夺权正确的有两种夺权，一种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种是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这一点谁都要做，要修正错误。

605. 周恩来、谢富治在军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3月17日)

周恩来讲话摘要

军队不能看到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驻沈阳的解放军派出宣传队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收到了很好的成效。这说明解放军一抓就灵。毛主席根据这些情况，考虑到军队不仅要管农业，而且要管工业。江苏无锡市一月份工业生产下降百分之六点五，二月份解放军去抓了以后，生产不仅上升还超过了百分之二六点六。这个情况说明，只要向工人宣传毛泽东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就取得了重大成就。

解放军进工厂后，首先要抓群众组织。驻无锡的解放军入厂后对反动组织进行瓦解，对革命组织进行帮助，按贵阳经验搞归口大联合，这样做很好。这种归口大联合的形式，上班工作，下班辩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斗批改。机关、财贸系统都要这样做。办法是：先宣传毛泽东思想，后整顿组织，然后搞军训。

抓工厂里的革命和生产，野战军是有这个力量的，现在要把这个工作抓起来，不要等到“三结合”搞好了才抓。现在，你们进厂后，可以初步成立个“三结合”的班子，以军队为主。暂时派不出军队的厂矿，可以由几个革命组织协商组成一个“三结合”班子。

目前，全国除了十五个省市外，其它的省市都宣布了军事管制。这次军事管制，和解放初期是不同的。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是横扫一切，现在的军事管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军事管制，我们还没有经验，要在实践当中去摸索。为什么省市要实行军事管制呢？因为省市领导没有过关，所以要军队管一下。现在，军队责任重大。在林副主席领导下，你们可以抓好农业、工业的，你们有这个力量，还有海军、空军嘛！现在，沈阳部队，×(不清)军又有了经验，这就有办法了。今天是八日，大家回去后五天再来北京，先讨论农业，后讨论工业，搞出个文件来。

军事管制要扩大。在夺权的单位，要派军队代表，县以下派民兵代表，现在派不出来的，将来再补派。现在，全国的工作加在军队身上，军队不光在文化革命中起作用，在将来还要起作用，因为社会存在矛盾，总要有人去解决。这个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你们的任务重，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当之无愧。

最后，送大家四句话：

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下功夫，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是最重要的事，但主席著作那么多，不可能一下全学完，因此就要采取急用先学。你们不仅要组织工人学老三篇，在工作中遇到难处理的矛盾，就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二、坚持三八作风，四个第一。在工作中一定要贯彻两个三八。一个是三句话八个字，一个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会工人两个歌，《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四个第一，关键要抓好活思想。

三、坚持群众路线，先作学生后作先生。在这方面，解放军要下苦功夫，进工厂后要注意这个问题。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共产党员的基本功，就是“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八个字。有人说，工厂本来都是工人，还有什么好调查分析呢？不！工人中有出身好，思想好，但也有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人，还有混进来的人。对这些人，我们首先要调查研究，然后进行阶级分析，所以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不要一进门就哇哩哇啦，这样就要犯错误。

四、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这话是毛主席在“七大”讲的，解放军光荣、伟大是毛主席缔造的，是林副主席领导的。现在，解放军担子重，但不要急躁和骄傲。在文化革命中，不少老同志犯错误，就是因为急躁和骄傲。

谢富治讲话摘要

搞军事管制，是毛主席号召的，进厂布告十二条，是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后，周总理找毛主席定稿的。

北京有一千多个工厂，这次实行军事管制的有一百多个，这一百多个工厂是关键性的工厂，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在这些工厂里，现在有三种情况：(一)左派夺了权，但力量小；(二)左派夺了权，但没有联合起来，内部斗争激烈，影响生产；(三)还不知道是什么人夺了权。对第一种情况，我们要支持左派，壮大他们的力量，发挥他们的作用；对第二种情况，我们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解决内部矛盾，帮助他们联合起来；对第三种情况，我们要发动群众，帮助群众把权夺过来。

你们进厂后，最大的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做到军队到哪里，毛泽东思想就宣传到那里。现在军队威信高，所以工厂就要军队去。你们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现在就要拿到工厂里去用。第二个任务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要以毛主席思想为武器，解决人们存在的各种思想问题。第三个任务，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闹革命，搞好工厂里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

目前，北京有股逆流，他们利用《红旗》四、五期社论，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和“三结合”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否定不了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问题。产生这股逆流的原因，主要是有些人只看到枝节问题，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一定要打退这股逆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同志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边，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当前工厂的保守势力又活跃起来，这和社会上的那股逆流是有关系的，我们要帮助这些人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到工厂要支持革命左派，但大家都说自己是左派，怎么办？所以要到群众中去调查，要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你们到一个工厂首先会碰到的最大的麻烦的事。谁是左派？识别错了，屁股也要坐错，但也没有关系，发现后就坐过来。在工厂里有些人成份好，但革命精神不足，有些人成份不好，但有革命精神。对这些人我们要分析，凡是领导成员有问题，发动群众罢掉就行，但不要否定整个组织，不要轻易做结论，有些工厂左派组织有矛盾，我们要做工作，保守组织的群众，我们也要做工作。进工厂后，可能发生各派组织都来找我们，要求支持，这是最大的问题，搞不好，就要支持错了。对这个问题不要轻易表态，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就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他们自己进行整风。当前的思潮，风头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这些都是私字，这风一刮谁左派就都搞不清了。你们进工厂，有毛主席批准的布告，要表明支持左派。

现在的军事管制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军事管制，不是一般的军事管制，因为大多数人是革命的，这就不能用一九四九年的军事管制代替今天的军事管制，今天的军事管制是要实行大民主，一九四九年就不行嘛！现在要放手发动群众，否则要失败。军事管制要有领导地进行。刘、邓路线时期派的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我们今天实行军事管制，是不能和那时的工作组相提并论，这是两回事。我们实行军事管制，是发动群众，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行政系统联合，要逐级做，先发展左派力量，这一条不要为保守势力所利用。“三结合”的方针，要慢慢去搞，有的厂要搞几个月，有的厂要搞半年，总之，要真正的“三结合”。

加强保卫工作，处理坏人要发动群众，要充分地暴露这些人，不要随便去搞，不要随便去抓人。

最后，向大家提几点要求：

一、要宣传毛泽东思想。二、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革命，壮大左派力量。三、抓革命，促生产。北京二月份工业生产下降百分之××。你们进厂后，抓革命是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是抓革命促生产。不抓就不是真正的革命派。四、建立秩序。革命有理，造反有理，打架无理。打、砸、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建立革命秩序，但不要妨碍革命和大民主。不要束缚群众手脚。五、“三结合”按行政系统，先以车间为单位联合起来，但不要合二而一，或合几而一，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对犯错误的干部，只要他检讨了，又确实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联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选派领导干部。这件事，要有个筹备过程，时间可能三至五个月。现在，通过筹建班子，慢慢搞“三结合”。

布告一出，影响很大，你们如果犯错误，就不是一百多个工厂的问题了，而是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因此，你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把工厂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606. 陈毅的八点指示 (1967年3月17日)

1. 二外红卫兵到对外文委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
2. 按3月13日四单位会议纪要办事，立即成立个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有权领导文化大革命，并进行业务监督。
3. 委、司干部暂不参加，待条件成熟时再搞三结合。
4. 同意两大战斗组织不单独派代表参加临时权力机构。

5. 临时权力机构成立后，即领导全委战斗组织整风，整风后再搞大联合、三结合，逐步完善、充实，成为真正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
6. 贵阳经验很好，但要经过长期工作。各战斗组织不要强制解散，到能够实行按部门联合时，再根据自愿原则取消战斗组。
7. 二外同学可按规定离校，交权不开大会。
8. 必须照顾大局，有关方面都要履行今晚的协议，在整风前单位不互相攻击。

607. 周恩来对反修的指示 (原件无日期)

为了反击苏修殴打我留学生和使馆工作人员，向苏联修正主义者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斗争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采取集中力量，打击苏修领导集团的策略，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严格区分苏联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以及苏联与其他国家的界限。我们主要是和苏联作政治斗争，不在细节问题上与其纠缠，不搞小动作，以避免苏修挑拨离间，破坏我国反修斗争。提出以下几个处理意见：

1. 对苏修驻我国使馆示威，应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并向群众反复交待政策，确实做到不冲使馆，不砸使馆建筑物，不向使馆内投物品，不打使馆工作人员。
2. 对于各国使馆人员(包括苏修人)步行外出，不予阻挠，不包围；如遇苏修及其他成员向我挑衅，可相应予以回击，但不打人，不纠缠，不扣留，如果发生重大事件，应立即上报处理。
3. 对各驻华使馆车辆外出，不阻挠，不砸，不在上面贴标语，不揪人，不向汽车里的人唾吐沫，一般不在使馆墙上贴大字报。
4. 对外国人照相，不要干涉。
5. 为外国人服务的商店，饭馆，旅店等，应照常营业，不为难。
6. 对苏修及其他国家来的飞机、火车、轮船，不要贴标语，不要进入，不要贴大字报，不搞示威、喊口号。我们广大职工人员，应以礼相待，并利用机会作些政治宣传工作。
7. 对所谓“援越过境物资人员”按规定处理，不要阻挠，不搞示威，在装运物资上及列车上不要贴标语。

608.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3月18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早三点二十分至六点三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

接见人：总理、康生、萧华、李天佑、王力、关锋、戚本禹、徐立清等负责同志。

被接见人：内蒙古军区：吴涛、萧应棠、刘昌、黄厚。内蒙古党委：高锦明、李树德、李质、郭以青、张鲁、王铎、王逸伦、呼市三司代表郝广德等五人，红卫军代表张三林等五人(总理、康老等中央负责同志进入会议室坐好后，即问郝广德同志最近回呼亲自看到的情况。郝广德同志哭诉红卫军等同军区某些人结合起来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情况。当汇报到军区派兵在北京抓军区造反派的同志时)

康老：在那里逮捕的？(答：在北京)逮捕的什么人？(答：内蒙古军区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乔万宝、郝广德同志介绍了军区派人在北京政法干校和三机部招待所抓捕人的情况)那一部分解放军？查一下。

萧华：一个管理局长，带他老婆来北京，军区说失踪两个多月了，也派人抓走。

总理：你们派多少兵来北京？（萧应棠：一个班）经那里批准的？（萧应棠、黄厚：报军委了）你们派一个班进来，我们不知道，就是北京卫戍区同意就行吗？卫戍区是保卫毛主席的呀（告秘书：请卫戍区傅崇碧同志来）！跑来一些人，劝说回去是可以的，怎么能抓？把人家夫妻两口子在西单大街上抓走？

康老：怎么能在毛主席、党中央所在地派兵抓人？（查问了傅崇碧同志内蒙古军区派兵来京抓人的情况）

总理：你们派武装来北京街上捕人，这也是特殊的哩！这件事情，是在发生之后我们才知道的呀！

康老：你们把部队拿出来对付群众？

总理：你们一方面在家亮了政治态度；一方面在北京商谈，这样，还谈什么？你们（问刘昌）是怎么处理不要对群众组织（如对“818”）宣布是什么性质的组织的问题的？（刘昌：我们没有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818”代表杨民众同志：不光宣布了，还抓起来不少人，打了不少人。）

戚本禹：在总理面前你都不讲事实，你怎么对待总理？（刘昌：你不要吓唬人！我听总理的）

关锋：你们胆子太大了！真是胆大妄为。你们把我们的记者都抓起来。你们知道不知道《红旗》《解放军报》记者是中央文革派的？如果他们有问题，该枪毙回来枪毙，可是你们就扣押了起来。直到肖主任打了电话才放了回来！

康老：（念刘华香的电话记录）“十八号的大会暂时不开，什么时候开？以后再研究。”总理告诉你们不要开了，你们说什么时候开以后再研究。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总理的电话。倒是你们眼里有没有中央？你们眼里有没有毛主席？你们完全目无中央。

关于省市自治区一级夺权问题，总理都得请示主席。你们说你们研究。师范学院不准围攻，也告诉你们了，有问题中央解决，你们不听。你们究竟愿不愿意中央来解决问题？还是你们自己解决问题。总理的电话，你们是怎么回答的？不让你们开会，你们还说“什么时候开再研究！”不回答中央的要求。三司有无错误？有错误。

王力：还不一定，就从他（指刘昌）今天的态度看，你倒是军阀？还是解放军？到底是那个错误严重，就像你们所说的也好。他们（指三司）不敢反对中央。《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刊物，你们竟敢扣押《红旗》的记者。你知道《解放军报》是谁领导的？（刘昌：解放军呗！）是林副主席，我们毛主席是最高统帅，你们把解放军报记者也扣了起来，把笔记本没收，至今不还！

总理：（问黄厚）有没有这件事；你们为什么不报告？这件事我今天才听说。把那两个记者请来。

戚本禹：倒是你大？还是中央大？是你大？还是我们毛主席大？是你大？还是萧主任大？萧主任打了电话才放了两个记者！

萧华：是派武装押送回来的。

徐立清：叶总办公室打过电话，我也给他们谈过。

王力：对我们都是这样，何况对群众？你们按主席思想、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传统冷静地想一想。

总理：十八号你们要开会，十七号报告，还有飞机，这是先斩后奏，不让我们解决问题。“818”可能打人，组织可能不纯，但是几千人的组织怎么能宣布为反革命？军事管制河西公司是你们要求的。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不能不担心内蒙古军区站在什么立场？不让你们包围师范学院，你们不听。用这种方法是把三司瓦解不了的！

萧华：他们是独立王国，无组织无纪律。

关锋：他们是“中央”。

康老：夺权得中央、毛主席批准才行的。三司可能有错误（总理：他们已经作了检讨），

但比起你们所犯的错误究竟那个大？他们不敢反中央。你们冷静地想一想，按照毛主席思想、党的原则、军队的光荣传统衡量一下，在具体问题上可能各有多少错误，但比起你们这种思想来，究竟怎么样？总理给你们讲的，究竟算数不算数？

总理：不算数。你们表面上似乎听中央的话，实际上你们不听。我们办事都得请示毛主席、林副主席，但你们不是这样。你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担心内蒙古军区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们把那么多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同群众搞得那样对立。内蒙地处边防，背靠苏、蒙修正主义，我们怎能不担心？吴涛同志，你是第一副政委，你应该两方面负责，派你去呼市看一下，你敢不敢？（吴涛：总理决定了我可以回去）中央文革也去人，联络员也去一个。

康老：你们要开大会，是要把你们的意见强加于中央。你们要飞机，还要登报？你们眼里有无中央？总理在北京亲自主持解决问题，你们就要按你们的意见办？你们都是老干部、负责干部，我们对你们就要严格要求，一定要按毛主席思想办事嘛。

总理：由于学生在军区门口静坐，发生了问题，调你们来商谈解决问题，找你们几方面谈。二月十七号定了四条，你们是同意了的。但一个月来你们并没有按这四条办事。找你们来商谈，是要把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搞大联合，夺权，但这一段你们不是按中央意见办事。

第一、你们竟然在军区门口把《红旗》和《解放军报》记者扣起来。四大自由嘛，记者没有这个自由？肖主任打了电话，你们还要押送回来。扣留了笔记本，在黄厚手上一个月不报告。记者报导如不符合实际，你们可向上反映嘛，怎么能扣留？这件事就是对抗中央，没遵守军委的命令。在军区门口发生学生静坐以前，刘华香就请示过要调兵的。（徐立清同志：叶总办公室曾告过他们不要调兵。）

第二、刘华香开完会，本来想要留他商谈解决问题的，他不打招呼就走了。他回去后一个来月，办事是不合乎中央意图的，越走越远。

第三、河西公司的事，提醒过你们，不让你们宣布“818”是反革命组织，表面上你们听中央命令，但你们在下面宣布，这是要两面派么。

第四、宣布人家好多组织为反革命，怎么能这样压制？即使是保守的组织，也要教育提高，怎么能压制？完全不是对待群众组织应抱的态度。这是刘、邓路线（康老：这是反毛主席思想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五、你们派部队来北京，就是你们要指挥中央，你们目无中央。北京卫戍区是保护中央、保护毛主席的。你们派兵来大街上抓人，是要为所欲为。

第六、还有这样的传单（指军区印的陈鼎写的材料），还加上了按语。清华附中的一个十六岁的小孩子，即使是他写的，也要劝说他不要写。你们还加上了按语，印发传单？如果是你们写的，这样做不是破坏解放军信誉吗？这怎么能这样对待红卫兵？何况对红卫兵，你们对中央文革的记者都那样对待，这是对抗中央！

第七、你们包围了师范学院，据这位同学（指郝广德）讲已经三天了。一个群众组织，怎么能那样对待？这是你们有指挥的，要把一个群众组织搞垮嘛。对这个问题，打电话你们没有回答，还要中央去调查！这一个月来你们进攻，不照中央的意图办事。清华附中同学的信，如调查属实是你们强迫写的话，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欺骗中央。

第八、开大会夺权，说是搞呼市的庆祝，实际上是夺区党委的权。权星垣、康修民实际上是让你们掌握的群众组织抓起来了。对区党委书记，你们军区政治部就定了性？你们比中央在先把名字点了，不夺权也等于夺权了，你们有这么大的权吗？七、八号夺权（指呼市）根本没有报来，十五号登报，明天要开大会，还要批准登报，都不是商议，是给我们下命令，统统是先斩后奏，你们犯了多大错误！

这一系列的事情，我们不能再忍了。这些你们都没请示过中央。你们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不对？（郝广德：他们把十八号开会的事在广播电台广播了）噢！报纸、广播怎能有同中央

不同的声音？你们掌握了报纸、广播，就登、就广播？广播问题的四点指示不生效了？（郝广德、高树华：他们把二十二问中央文革、在京参预反中央文革活动的“抗大”，在报纸上、广播上称为“左派”，要大家学习）这是反动的！你们（问《红旗》、《解放军》报记者）认为“抗大”是什么组织？（记者答：“抗大”炮轰中央文革，是反动组织！）

王力：这同他（指刘昌）思想一样，他也炮轰中央文革嘛！

总理：你们（问记者）的笔记本让他们没收几本？（记者答：一个三本，一个五本）把中央文革派的记者的笔记本都没收了！带来一个月不报不交（黄厚：这是我们的缺点）！什么缺点，这是反抗中央！

你们（问记者）有勇气再去呼市一趟吗？（记者答：有）好，吴涛同志带队。联络员也去一个（萧华、徐立清同志：军委文革也去一个）。

把你们抓的人都放出来（念了权、康、雷及三个秘书的名单）。

总理、王力：你（向吴涛）去了要按党的原则，实事求是办事。

总理：这是对你的一次考验。坐飞机去可住在机场，调查方便。可找几方面的人谈，到现场去看，先到师范学院去看。

几派的人正在这里商谈解决问题，怎么能把一派压的垮了？你们这样做，我们怎么能信任你们。军区领导人你们面临很大的危险！你（问吴涛）是第一副政委吗？萧主任说了，我们信任你，立即恢复第一副政委职务。

王力：你们到呼市后，愿意到那里就到那里，愿意找谁谈就找谁谈！

总理：这说明你们（指军区）的立场问题，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你们说群众大会不开了，还是要开向中央示威？是真不开了，还是搞什么？这都要看一看。对区党委的六位同志要立即恢复自由！

萧华：萧应棠你马上打电话，要保证中央调查团的安全，出了问题要由你负责。

总理：今天会上谈的不能向外传，四方面各负其责。

戚本禹：今天是内部调查会，内容严格不能向外传，一定要维护人民解放军的声誉，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王力：问题到了今天，不能不严肃指出，但要用适当方式宣布。你们认识了，改正还来得及。

总理：你们回到京西宾馆好好讨论检讨。回头，萧主任、李副总长还找你们谈。

康老：一般的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承认错误，而后再区分性质；把头子和群众分开来。

总理：李副总长你去一下呼市，不能多呆，可呆三、两天。

609. 李天佑^①与内蒙师院“东纵”代表的谈话纪要 (1967年3月18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十九时

地点：呼市新城宾馆

接见人：李天佑副总长、吴涛政委、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红旗》杂志记者于顺昌、《解放军报》记者宋学孔、总理联络员赵刚及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的同志。

被接见人：师院“东纵”董玉华、郭是海、董文、戈志盛、杨永俊。

李天佑：我们是受总理和中央文革委托来解决问题的。师院这里问题很紧张，我们到呼和浩特，特别是到内蒙师院来解决问题。听说你们被围困四天了，不能吃不能喝，总理很着急。总理和康生同志把我们叫去，开了一夜的会，今天早晨没有休息就坐飞机来了。我们到

^①李天佑，中央派赴内蒙调查团团长。

这儿，首先到“八一八”门口站了一会，就直接到你们师院。结果进了一楼就进不了二楼了。我们一看你们院里院外都是人，有几万人，一看就知道气氛不对。十六条下来了，八条命令也下来了，不许武斗。可是你们这里武斗仍然很厉害，双方对立情绪很大。当然了，这不能怨那一方，双方都有责任。我和军区的同志说了，要保证你们的安全。当然了，要按政策办事。过去你们在军区问题上有错误。有错误作个检查就是了嘛！不会算旧帐。我相信军区不会把你们当反革命看待，我也相信其它组织也不会的。把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要犯很大错误。所以你们之间要消除这种不必要的误会和隔阂，不要这样对骂。我们要采取紧急措施来解决问题。要你们自己解放自己，打开辕门，自己解放自己。

吴涛：李副总长要你们自己解放自己。

李天佑：你们有没有这种勇气？

众：有

杨永俊：(向李副总长详细汇报了双方执行总理四点指示的情况)

赵刚：你们院里有多少人？

董玉华：两千。

赵刚：才两千人？

众：还有其它造反派的战友。都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被砸了，家也被抄了，回不去，住在这里和我们一块战斗。

李天佑：你们打开大门嘛！我派一排人去徒步保护你们，保证你们的安全。看有没有人敢再去冲你们。你们要解放自己，打开辕门。我明天去检查，看你们开放不开放。外单位的人，也要动员他们回去闹革命。

吴涛：那谁也不能抓人、打人。

李天佑：各群众组织不要再那么对立，对骂，武斗。在共同原则的基础上，找到共同的语言，在大方向一致的基础上，求同存异。你们青年一代，比我们那时闹革命条件好多了。你们要更进一步。今晚你们就打开辕门。(回头对作战部长说)告警卫营，再去师院人就撵，要保证你们的安全。你们要有这种胆量。我们来就是支持你们的。当然，这种支持是政治上的支持，政治上的关怀，我们带来总理四点指示，不许抓人，不许打人，以前下的通令、通缉令都统统作废，不管是谁下的。我昨天晚上接见四个军事院校的学生，我要他们开门整风，总结经验。你们呢？为了进一步提高，也要开门整风。

杨永俊：我们今天下午看你们进院了，想接你们。有人看见里面有吴涛。我们以前听说吴涛被军区打成三反分子，不敢接他。

董玉华：我们怕军区搞阴谋。我们把吴涛接上来，他们就有借口了，可能冲上我们楼梯。

李天佑：吴涛不是三反分子，周总理、中央文革叫吴涛同志到你们这里来的。

中央文革同志：总理昨天晚上亲自点名叫吴涛同志来的，这是对他的信任。

郭是海：李副总长，周总理和中央文革派人来解放我们，这样关怀我们，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代表一千二百名“东方红”战士托你向毛主席问好。我们一定誓死保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运动初就被打成反革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我们的，现在我们造军区刘昌的反，又被打成反革命了。他们叫我们“历史反革命……”

李天佑：如果把你们打成反革命，那是最大的错误。群众有错误，可以批评改正嘛！

董玉华：在军区问题上我们有错误。我们还用对待内蒙党委的作法对待军区的错误，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没有很好地跟上形势。特别是我们在报纸上点了刘昌的名，这是我们对毛主席犯下的罪过。但是，我们是有错无罪的。

杨永俊：军区内部也是有斗争的。看他们究竟是支持那一派。这次全国性的大反复，是资本主义复辟性质的。内蒙军区确实是支持了保皇派，王良太就大肆造谣。

众：我们就是有错无罪。

作战部长：这次李副总长来就是支持大家的，给大家解围，按十六条闹革命。刚才给大

家念了总理的四点指示，以前下的通令、通缉令一律作废。现在总理正在研究你们的问题，最后一定会得到很好处理的。在总理没作决定之前，找出一个好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给他们(指“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指出了四条，你们也要那样去作。

刚才李副总长的讲话作为内部讲话，不要广播，不要印传单。因为这是开诚布公谈的，传单搞出去就会把问题复杂化。刚才据他们说你们已经广播了，说中央支持你们，李天佑支持你们。他们对我们说：“三司说来，李副总理说三司是革命组织，抗大是反革命组织，要对他们专政。”

众：没有的事儿，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李副总长来。

作战部副部长：对抗大也不要采取那个作法，特别要按十六条办事。还说内大搞夺权，你们去人包围了他们。不管夺权、反夺权，都不要包围、反包围。这个情况反映得不一定对啰，不管有没有，都要注意。有了就改，没有就注意。特别要对下边作好这个工作。

李天佑：我有一个建议。一会儿我要马上打电话给北京汇报。今天总理打来两次电话了，问我。我们还有一个要求，去你们的楼上，看一看你们的同学，对同学们在精神上是个鼓舞和慰问。我和总理约定晚十点汇报，十点以前去怎么样？

众：我们全市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这是我们最迫切希望的。

李：好吧！咱们吃饭去吧。

众：我们还有些事情。

郭是海：区党委领导干部权星垣、康修民、雷代夫被他们抓走毒打，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李天佑：我和“无产者”他们谈过了，已经解决了。

郭是海：我们的战友还被关在狱中。

李天佑：还有？

众：还有很多呢！

李天佑：把名单提出来，明天我们派人去看。

杨永俊：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支持三司而被捕的(符合公安六条的除外)，一律都应该放。

郭是海：扣发工资的，冻结财经的，怎么办？

李天佑：这是错误的，我们跟他们(无产者)讲了，扣的工资要发，出去的人要欢迎他们回去。

众：回去还抓，还打。

于顺昌：先不要着急回去，过几天也行。(李天佑点头)

郭是海：你让他发工资，他不发怎么办？

李天佑：我要特别告诉自治区党委权星垣他们，给发。

郭是海：权星垣说话没人听，不管事。

众：他们(权、康)有职无权。

李天佑：他们解放了，有职有权嘛。

戈志盛、董文：我们的交通工具全被他们抢走了。

李天佑：这些具体问题，以后再解决。

郭是海：工学院“井冈山”，是我们最好的战友，他们要求接见。

李天佑：我们明天派人去看一看。

郭是海：我们要把双方执行李副总长的指示的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

李天佑：好。

董玉华：我们坚决执行，绝不以对方态度为转移。

赵刚：你们这种态度很好。

当晚李副总长，吴涛政委同调查团全体成员，机场军代表杨××乘车到了师院，并上了

二楼。李副总长进院时又重申：你们要把辕门打开，跟平常一样，用不用给你们派一个排来保护？

杨永俊：我们一定马上把工事拆除，看明天的情况吧！

临走之前，李副总长说：时间来不及了，我要马上向总理汇报，请你们代向没接见的同志问好！

610. 周恩来在参观八一学校“联动”罪行展览时与革命造反派的谈话 (1967年3月18日凌晨)

总理详细认真地参观了“联动”罪行展览十分气愤，参观展览完后造反派向总理汇报了学校情况。我们首先十分气愤地向总理汇报了我们三月五日为砸烂高干子弟集中住宿制而召开的家长座谈会的情况，当我们谈到有的家长说：“不给我的孩子安排好吃住，我一年不转学，两年不转学……”的时候，总理连连摇头说：“这就是当官做老爷嘛！”当谈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家长挑动其它家长反对造反派时，总理问：“是穿军衣还是穿便衣的？叫什么名字？”(我们汇报了情况，总理秘书宋刚同志记下了他们的名字)总理说：“我倒想和她谈谈，看看她是怎么想的。”有的同志讲这次家长会象苏修开会一样，乱叫乱嚷，最后一哄而散，这时总理笑着点头。总理问：“参加家长会的家长有多少人？有女同志吗？你们有多少人？有学生吗？”我们如实地汇报了情况，总理说：“你们和他们辩论嘛。”我们说：“我们思想上没有做充分准备，把家长的政治觉悟估计太高了。”总理频频点头。

我总部郑玉富同志向总理谈到自己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及摧残挨学生打的情况，总理亲切地和他握手，郑玉富说：“学生说他们是革命小将主力军”，总理摇头说：“这算什么主力军呢？”

我们又汇报了“联动”高干子弟破坏我校学生宿舍的情况，总理点头说：“我已经知道了，并且问到底谁是“联动”的头目，我们说“田耕、刘历运”，总理问：他们的家长是谁？”

我们向总理汇报了育英学校的情况，说一派主张开学，一派反对开学。主张开学派给谢富治同志写了报告，谢富治把报告给师大复课闹革命联络站处理，师大同志进行了调查研究说：“我们不是实用主义，不能只是复课就支持。”总理频频点头。

在参观的路上我们向总理汇报了我们办学的打算，第一(原稿漏)的学校不能开学，第二，要办主席提倡的亦工亦农的学校。总理点头表示同意，有的同志向总理说：“有人说我们不开学是对抗党中央，”总理摇头说：“不能那样笼统地讲。”

总理从卫生所回来的路上向革命造反总部的一些同志说：“你们是教师吗？”这些同志回答：“是”。总理说：“这样的学生那能教好？”我们说：“有人要我们开学！”总理说：“这怎么能开学？！”

总理参观了将近两个小时，在离开八一学校之前和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的同志们一一握手说：“感谢你们使我受到教育，使我上了生动的一课。”上车之前总理亲切鼓励大家说：“你们继续努力！”革命造反派总部的同志激动地与总理握手，纷纷要求转达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问候，转达对林副主席的问候，对江青同志的问候，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最后总理和革命造反的同志一起高呼：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611. 杨成武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19日下午)

同志们，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指示召开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这次会议非常重要，要解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

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会议开的很好，是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训练班。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富春同志、徐副主席和肖主任已经作了指示，聂、叶副主席也要作指示，林副主席还要作重要的指示。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还要接见到会的同志，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

我本来没有准备讲什么问题的，后来林副主席和叶副主席指示，要我讲一讲。我准备讲一讲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彻底肃清他们对我军恶劣影响的问题。同时，对我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斗争的新阶段中，如何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问题，也讲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毛主席经常用“树欲静而风不止”来警戒我们，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去年和今年同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志两次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就可能渗透到上层建筑中来，渗透到政权中来，形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精辟地指出，一切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政治的斗争，是政权的斗争，是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结成一伙来夺权，要夺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实际上，刘、邓就是他们的后台。如果没有刘、邓的支持，他们是不敢这样嚣张，这样疯狂的。

我们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绝不能低估，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那就会千百万人的人头落地，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改变颜色，世界革命的胜利就会推迟不知多少年。

他们都有一套假象，很能迷惑人。他们的反动思想，有一定的市场，替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的大有人在。把他们揪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必须彻底地剥光他们的画皮，彻底地清算他们的罪行，彻底地肃清他们的恶劣影响。

去年以来，各军种、兵种、各军区和总部连续发生了反党分子跳出来夺权的事件。如空军的，工程兵的，通信兵的，还有二炮的，沈阳军区的，总参谋部的，总政治部的，等等。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军内的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很尖锐的。我们总参谋部，就有王尚荣、雷英夫，疯狂地跳出来，要夺权。工程兵有谭友林，二炮有宋烈，空军有成钧、刘震等人。沈阳军区也有。这样事件，不是孤立的，是有后台的。对这些事件稍微分析一下，就知道后台是什么人，不说自明。所以必须提高警惕，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

罗瑞卿是他们的急先锋，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急先锋。

罗瑞卿的罪恶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在毛主席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明目张胆地向党伸手，疯狂地篡军反党，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主要表现在：1. 封锁林副主席；2. 造谣、诬蔑、诽谤林副主席，挑拨林副主席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3. 向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出难题，百般折磨林副主席；4. 公开向党伸手，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

罗瑞卿的问题，林副主席早就察觉了。林副主席为了挽救他，几年来，正式地对他进行过六次批评、教育。他不但不听，反而变本加厉。林副主席要他通气，非常严肃地、语重心长地教育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一百年不来我这里，也没有关系。你是总参谋长，我既然担任国防部长，一点情况不了解怎么办？耽误了工作我要负责的。而罗瑞卿仍然实行封锁。就连大比武这件大事情，他都不报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和军委。这个大比武，是在南京决定的，毛主席不知道，林副主席不知道，军委不知道。叶副主席是主管训练工作的，也不知道。是他擅自决定的。许多重大的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去请示、报告，而且不准别人去请示、报告，谁去林副主席那里报告了，他就训斥、打击谁。今天在座的李作鹏同志就是挨了打的一个。他就告诉李作鹏同志，你以后不许到林总那里去。一九六五年五月初，我和罗瑞卿到上海去，林副主席又当面批评了他，又一次说他不通气，要他通气，并且当面给他规

定了五条，那五条可具体哩！可是罗还是顽固不改。

罗对林副主席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阴险得很。他让×××转告林副主席并亲自向林副主席说：“我这次让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了骨灰，也都是忠实于林总的。”这是上午讲的，但就在当天下午，他坐飞机到了广州，就同陶铸大肆造谣、诽谤、诬蔑林副主席。

一九六四年罗瑞卿的反党野心恶性发作。擅自决定大比武，妄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篡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制造毛主席批评四个第一的谣言，企图贬低四个第一的伟大意义。打击林副主席，挑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关系，罗竟敢当面向林副主席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说：“……还管什么事？……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了屋子后，还在走廊里大叫“不要挡道！”这些都是在一九六四年干出来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罗瑞卿反对林副主席的活动就更疯狂了，公开地跳出来，反对林副主席，逼林副主席交权、“让贤”。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晚上，我和罗瑞卿一起在民族文化宫看了戏。我一回到家，他就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去，我以为是有情况还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去了以后，他就大骂林副主席，他把同陶铸造的谣也同我讲了。疯狂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他说什么如果突出政治是对的话，那我罗瑞卿不就犯了方向错误、犯了路线错误吗？大骂去检查×××师工作的同志，骂的很难听啊！他把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前前后后篡改了八次。到了二月十四日、五日，罗就要×××向××同志提出要林副主席接受四条。

这四条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在五月份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又接连发生两件事。一是罗利用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参加这次会议全体同志的机会，搞了一个大阴谋，带头并煽动各军区的同志向中央提出大量增加部队的定额。这个定额，提出最多要增加×××万，逼林副主席表态。第二个是要合并军区，要把××个军区并成×个单位。第二个是要取消兵种，把兵种作为总参谋部的业务部门。这些事情事先并没有报告、请示林副主席和军委常委，完全是向中央和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企图打击林副主席，挑起各军区对中央和林副主席的不满。这是一件事。二是罗瑞卿要用个人名义在军委××会议上作结论。林副主席知道以后非常严肃地说：××问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作结论，只有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结论。当天晚上，林副主席口述了一个指示，由他的秘书传给了军委××会议搞秘书工作的李静同志和我，也传给了罗瑞卿，并要把他的指示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宣布。林副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想把罗瑞卿反党活动的盖子揭开。罗瑞卿紧张了，半夜跑到林副主席那里，假装检讨，保证再不犯了。林副主席再一次给他悔改的机会，打电话给我，要我不要传了，收回，看一看，将来他能改就好。林副主席还是想把他挽救过来。

可是以后，在军队六级以上干部的任免和调整级别等问题上，罗又公然反对林副主席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四月份，林副主席当面交待我，要我回来向军委办公会议和总参、总政传达，六级以上干部（那时是中将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部长的任免要先报告军委各位副主席，得到同意之后，再报中央批准。结果呢，罗不执行。一九六五年五月中将以上的干部调整级别的报告，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我举个例子，肖向荣是副兵团，定为正兵团，五级，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罗盗用了军委的名义向中央报告，是邓小平批的，林副主席批评他的时候，他竟然狂妄地说：“问题是在于做得对不对，不在于请示不请示。”你看他多狂妄。他专门搞突然袭击。听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的时候，他就去袭击，不先请示林副主席可不可以去。他突然坐飞机去，折磨林副主席。有那么好几次。

在总参政治部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的座谈会上，他的讲话是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指示的。他以后又到广州、南宁、昆明，一路上在部队中大量散布折中主义的谬论，系统地反对突出政治。

特别是林副主席看到罗瑞卿有一系列的造谣污蔑反对毛主席的罪恶行径。

罗多次造谣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

罗瑞卿对毛主席实行封锁。

罗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多年以来，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帮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是一个包括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宣传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对蒋匪帮的一切作战行动，必须由中央决定。林副主席说：“打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第一次动作，不是小问题，都是战略问题，只有最高统帅才能下决心。”因为这个问题同外交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各国的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政治统帅军事。林副统帅讲得清清楚楚，这个第一枪、第一炮，一个班，一个排的动作，过去了以后，你打几十万枪，几十万炮，几十万人的行动，都是比较小的事情。罗对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非常清楚，但他却私自向福州军区布置说，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打击敌人”，“可以边打边报告。”他就这么干。直到福州军区请示总参部怎样执行了罗的指示的时候，才发现他这个错误。中央军委纠正了他这个错误。

罗在民兵工作三落实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对台戏。毛主席自一九六二年以来对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前后作过四次重要指示，一再强调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可是罗竟多次说，首先是政治落实，不是组织落实，公开地“教训”毛主席，指责毛主席没有把三落实的关系搞清楚。

罗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一九六〇年毛主席指示要从主力军里面调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既不传达，也不贯彻执行，竟拖了五年之久。到了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又两次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严肃地批评了罗。罗瑞卿这才被迫布置，但他还是非常抵触，一面推卸责任，一面叫大家执行毛主席指示还可以打折扣。所以来地方武装的建立，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直到上海会议后，才纠正了这个事情。

罗拼命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他反对林副主席提出的“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他说：“最高，还有次高吗？最活，还有次活吗？”他反对给民兵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任务。他反对向外国人宣传林副主席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四句话。

林副主席已经看透了罗瑞卿已不可挽救了，加上当时又发现了杨尚昆的问题。这个时候，林副主席才向毛主席报告处理罗的问题，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上海会议，揭罗的盖子。

毛主席对罗的问题早有察觉。毛主席几次在谈到罗的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位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是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个人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

毛主席把罗瑞卿看透了。

罗之所以要把林副主席当作敌人对待，是因为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最好的学生，在全军、全党、全国和全世界有高度的威望，又是他的直接老上级，是他实现个人野心的最大障碍。他要实现个人野心，就非攻击林副主席不可，他要想把林副主席攻倒。如果他能够把林副主席攻倒，不仅军队大权可以落入他们手中，而且为他们篡党篡国做了准备。

先看看彭真在中央召开的揭发批判罗的工作小组会议上如何包庇罗。这个问题我再讲一讲。前天肖主任也讲了。归纳起来，他搞了四大阴谋。

一是六条清规戒律。1. 只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2. 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连别人，

特别是不许牵连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3. 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给罗抓辫子；4. 工作小组成员发言要慎重，不要讲结论性的意见，发言稿要经过工作小组审查。实际上，就是要经过彭真和邓小平审查；5. 发言的材料中要把可以证明许多关键问题的叶群等同志的名字都去掉。这样，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都无法写上了；6. 不要大家引用罗虐待公务员段光富同志的材料。

二是五个不准。1. 不准写罗对四个第一的污蔑；2. 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肖向荣、×××、梁必业等的人关系；3. 不准写罗向地方伸手的问题；4. 不准写罗恶毒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具体事例；5. 不准写罗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充当了地富反坏的代理人。

三是三枝毒箭。第一枝箭是把林彪同志和军队推到反对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地位。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要在报告里面写上一条，地方上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有错误的，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成绩是很大的。他采取这样一个打法。林副主席讲，军队的文艺工作方针同样是错误的。林副主席识破了他的阴谋。第二枝毒箭是以写一段林彪同志对罗进行过耐心教育为名，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就是说：他企图污蔑林彪同志对罗瑞卿没有进行耐心的教育。第三枝毒箭是以实事求是为名，恶毒地攻击会议对罗揭发和批判过头了。

四是五个追查。他气势汹汹地连续五次向我进行追查。1. 追查工作小组关于罗的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是什么人起草的，什么人修改的；2. 追查谁说文件温度不够；3. 追查谁向林彪同志报告的；4. 追查工作小组传达林彪同志的意见，到底是不是林彪同志的意见；5. 追问我们对林彪同志的意见有什么意见。

林彪副主席及时识破彭真的阴谋诡计，使他在关键问题上包庇罗的阴谋无法得逞。

彭真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这件事情可能今天在坐的同志不一定那么清楚。因为彭真过去吹牛，说他是一贯正确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他创造的，他是领头的。今天我们要把他这个画皮剥开。我讲的都是有文字为证的。

彭真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忠实执行王明路线的。

一九三八年三月彭真就把彭德怀在临汾会议传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部搬到晋察冀。他反复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说：“国共两党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任务。”他甚至大肆美化国民党的反共特务组织，恶毒地攻击我党对国民党的批评。他还提出要在“国民革命军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军队，统一作战计划和军事指挥”，“在恢复地区的一切政治制度，仍须保持旧有形式”等等，这些材料多得很。彭真所传播的这一条彻头彻尾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曾使晋察冀局部地区的工作在短时间内产生了束手束脚的倾向。由于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这些地区的工作很快得到了扭转。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彭真参加了这次会议（聂荣臻同志未参加，留在敌后）。彭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份，第二次到晋察冀。这次本来是来传达中央六中全会决议的。可是他在晋察冀分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竟然公开歪曲中央的决议，仍然推行王明路线。

他连续鼓吹：“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不仅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他宣传：“蒋介石是国民党中最有政治眼光的人”，我们“要竭诚地拥护蒋和国民政府。”要竭诚拥护，一般的拥护还不行。

他大肆宣扬国民党的军队是“英勇善战的中央军。”他胡说什么“改变红军，为的使其成为统一战线的军队。”就是说，军队的独立自主性不要了，交给国民党，交给蒋介石了。

他荒谬地提出了我们党在“调节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立场与原则是：1. 公平合理；2. 互助、互爱、互让；3. 减少磨擦、分歧；4. 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他还宣扬阶级调和，鼓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互助，地主与农民之间互助。”请同志们看看他是一个什么货色，他是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他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王明讲互

助、互让，他还加了一个互爱。

彭真，手伸得特别长。他两次到晋察冀工作前后合起来只有两年时间。抗战八年，他只占四分之一。但他却盗用了晋察冀工作成绩的果实。他到了延安以后，大吹牛皮，写了洋洋几万言的《关于晋察冀政策问题》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没有一句讲到军事斗争。在敌后抗日战争，离开军事斗争还讲什么呢？他到延安后，经常越过晋察冀分局，越过晋察冀军区，对冀中，对冀东等地的工作横加干涉，继续推行王明路线。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过去几年的工作就有了明确的指示，电报都在。我摘了一段，是这样讲的：“六年来，分局的同志以及晋察冀的全体干部、党员和在边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创造和坚持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执行了中央的路线和所给予的任务，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对晋察冀的工作作了全面的估价。可是一九四四年八、九月晋察冀分局召开的高干会，在彭真的指使下，不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指示。不仅我们根本不知道，唐延杰同志那时是参谋长，他也不知道。中央一九四四年一月的指示，到了八、九月，高干会开了十几天都不传达。而且在这个会议上，还用极不正常的手法打击聂荣臻同志和以聂荣臻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整训部队、壮大部队的指示。中央在一九四四年七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国内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而他们还在那里拼命反对“轻敌速胜论”，拼命搞“精兵简政”。那个“精兵简政”可真是“彻底”啊！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才留了二十几个人。军区司令部也没有剩下多少人。唐延杰同志当参谋长没有事情干，到冀东检查工作去了。后勤部(那时叫供给部)还有八个人，卫生部还有七个人。结果抗日战争一到反攻的时候，完全措手不及，什么准备也没有，完全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所以晋察冀地区一直到解放战争初期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翻过身来，要兵没有兵，要人没有人。大权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呢？今天明白了。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清楚的嘛，本来一个纵队三个旅，很好，三三制嘛，合乎林副主席的要求嘛，他就是给你砍掉一个旅。哪一个纵队没有砍掉一个旅呀？你们过去大概不清楚这个事情，今天就清楚了嘛，就是他们干的。他们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彭真在东北实行的也是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正如伯达同志讲的，他实行的是国民党的路线，是美帝国主义的路线，是保护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他是反对以林彪同志为代表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解放后，彭真在北京市十几年，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彭真近几年来极力插手军队工作，同罗瑞卿勾结得特别紧。这是他反党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去年，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二月提纲。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反党纲领。

下面讲讲刘、邓的问题。

刘少奇在历史上是老犯机会主义错误的。解放战争初期，他就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对当时的对敌斗争起了极坏的作用。每一个纵队砍掉一个旅，是同他的错误分不开的，当时晋察冀边区就吃了他的大亏。晋察冀的不少同志提起这件事就有气。在当时敌我斗争那样严重的情况下，他不是加强战备，而是搞“精兵裁军”，这是完全违背毛主席思想的。以后有土地会议形“左”而实右，村村点火，家家冒烟，扫地出门，“搬石头”。进城以后，同天津的资本家的谈话，以后接着反对合作化，刮单干风，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大吹王光美，到处做报告。一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他都是反对毛主席的，和毛主席唱反调的，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大毒草，是欺人之谈，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批判。他自以为了不起，和毛主席平起平坐的呀！每年国庆报纸上登照片都是登两个。他的照片和毛主席的一般大。替他抬轿子，吹喇叭的有的是。

再看看邓小平。

邓小平更是百般包庇啰，在上海会议第一次会议上他就讲：“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

来，不是来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材料够不够。对的不对的，有出入的都可以提。林彪同志很重视这个问题，向主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不三不四地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在小组会上公开说：“关于罗伸手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说没有，×××已死，死无对证。”他是不相信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他是相信罗瑞卿的。他别有用心地用“死无对证”来否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及其他同志提出的铁证。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又向刘伯承同志、叶剑英同志讲罗的伸手问题，是“死无对证”。

这些事情今天在座的同志可能不清楚，所以要讲一讲。画皮不剥开不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上海会议后罗瑞卿回北京以前，有一天下午，总理和邓小平去同罗瑞卿谈话。邓小平带着他的老婆一起去看罗瑞卿的老婆。她一上楼梯就大哭特哭，痛哭流涕，哭啊，哭得一塌糊涂。把警卫员、副官都弄得莫名其妙，问是怎么一回事。她上楼后，房子都没有走对，警卫员给了她手巾擦完了眼泪，就钻到罗瑞卿老婆的房子里，关着门又大哭特哭。你们看一看嘛，这是什么感情，他们是有他们的阶级感情的。(萧华同志：郝治平的家庭是个恶霸地主，邓小平的老婆是宣威火腿总经理的女儿)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观人先观其友。罗瑞卿回到北京后，一直到他跳楼自杀(未遂，因为他跳冰棍，如果他不是跳冰棍，脑袋冲下来就摔死了，他那是吓唬人的，不是真的想死)，整整三个月，不仅不检讨错误，而且还狡辩。现在很清楚了，这是因为邓小平、彭真这些人在支持他。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中央召开工作小组会议批判罗瑞卿，邓小平在这个会议开场的时候(因为他是三人小组的组长嘛，三人小组里一个邓小平，一个彭真，还有叶副主席)，当看罗瑞卿的面，说了这么一段话：“罗总觉得冤枉，有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实际上他是告诉罗不要承认错误，我支持你。他是领导小组的组长，可是会议开始两三天后，他就借故到西北去了，留下他的打手彭真跟叶剑英同志捣乱。以后连彭真也跑到成都活动去了。直到会议结束前一天，在总理的催促下，他们才回来，回来以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又作了一个结论性的讲话，他对罗瑞卿跳楼自杀十分惋惜。他说：“他为什么自杀呢？如果你罗瑞卿认为你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坚持呢？还有揭发的事情，你不同意可以保留嘛！彭德怀实际上已经作了结论，他写了几万言书，企图翻案，现在还分配工作。允许保留，党中央有这一条，你罗瑞卿为什么要自杀呢？”

会议过程中，彭真包庇罗的捣乱活动，据说都是和邓小平商量过的。罗瑞卿的公务员段光富同志揭发的材料好得很，揭发了罗不少见不得人的脏东西，但是邓小平和彭真坚决不同意印发。

这里我还要讲一件事，去年的二月份，就有人从千里之外给罗瑞卿送桔子，用飞机送来。空军的同志报告我，问给不给他？我讲给他，要懂得这个不是物质桔子，是政治桔子。千里之外送桔子来，是支持他反党嘛！现在这个人很清楚了，就是西南的×××夫妇。他们对罗瑞卿真是关怀备至，大力支持！

邓小平是反对毛主席的。过去有的人不了解，说他是一贯正确的。这张画皮要剥开。他是长期封锁毛主席的。毛主席早就批评他搞独立王国。

邓极力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在去年二月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以实带虚”，反对政治挂帅。他还说什么地方学习解放军，要充分注意企业特点，说军队就是停止一个月，专门搞政治工作也不要紧。这是什么话，他是诬蔑解放军，说解放军没有事情干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他的这些话，是在上海会议以后说的，性质就更严重了！更恶毒了！

邓小平认为自己有两大功劳。一是他认为淮海战役有了不起的功劳。这个问题要戳穿。谁都知道，淮海战役从头到尾，整个的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在前线工作的有刘伯承同志等许多人，有广大群众的努力，怎么能说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呢？他自认为“你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从南京打到成都”，“你有辽沈战役，我有淮海战役”，自以为了不起。他把大家的

功劳都归到他的帐上。他在《毛泽东选集》里面，特别注了一条，他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书记。这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其他的人都不算帐。另一个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修斗争中，以反修“英雄”自居。这也要戳穿。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伯达同志同我讲的，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篇文章，邓先在北京搞了一个班子，写了若干条，当时彭真他们大加赞扬，认为了不起，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认为不行。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在伯达同志主持下又重写，是在杭州写的。当邓知道毛主席亲自领导重写时他还打电话问彭真：用杭州的稿子还是用北京的稿子。他是不赞成用杭州的稿子的，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毛主席最后决定用杭州的稿子。这就是公开公布的《二十五条》。这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写的。他吹牛《二十五条》是他搞的。

邓小平当红七军政委时犯的错误，肖主任讲了。

刘少奇、邓小平的这些事情，我在中央的会议上，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的面讲过的。今天在这里和同志们也讲一下。

毛主席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抓了一些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是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群众大革命运动的洪流冲刷了我们的黑暗面，揭发批判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并创造了新方式，自下而上的夺权。毛主席支持这种夺权。现在广大革命群众正在以“万里东风扫残云”之势，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全面夺权的决战。形势好得很，是一片大好形势。我们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还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是资产阶级首先向我们宣战，我们也要向他们宣战。

我们都非常幸福地参加了、经历了这一场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近一年来的惊涛骇浪般的阶级斗争，对我们震动很大，真正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我们在这不到一年的斗争实践中所受到的教育，比过去几十年受的教育还大得多，深刻得多。

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意义和取得的伟大成果作了精辟的阐述。林副主席说，还是一场不拿枪的全国性的大内战，决不能轻视不拿枪的敌人。他们可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拿枪的敌人可以转化为拿枪的敌人。不拿枪的战斗可以转化为拿枪的战斗。如果转化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避免拿枪的战争，避免历史的大曲折、大反复、大破坏，避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大损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很大的，对我们避免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命运，作用很大。这不仅是保证我国人民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重大措施，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示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军队必须坚决彻底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更好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决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军委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光荣伟大的任务。

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当代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党的代表，是群众的代表，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是群众的领袖，是群众的灵魂，毛主席和群众是一个整体，好像一个人的头和身体一样不可分的。”林副主席又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林副主席对伟大的毛主

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高度的颂扬，说出了我们心里话。表达了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最最真实地反映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所起的最杰出的舵手的伟大作用。

林副主席教育我们，对毛主席必须坚信无疑，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林副主席说，站在那一边，这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标准的头等重要的问题，它统帅一切，统治一切，不是平等的。站错了立场，一切都错了，全盘都错了。如果立场错了，本事越大越反动，越是人民的敌人，不如一条牲口。

林副主席以实际行动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是我们的典范。他四十年如一日，最忠实、最坚决、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总是最坚定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同各种“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捍卫了毛泽东思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对毛泽东思想精辟的阐明，创造性的运用，有非常高的水平。林副主席大力号召全军全党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并使这一运动不断发展，不断深化，不断提高，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使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中大普及，以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这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取得共产主义事业彻底胜利的最可靠、最根本的保证。这是林副主席最大最突出的功勋。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最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理论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经过长期的考验观察，决定林副主席为毛主席的接班人，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众望所归，当之无愧。

林副主席对如何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作了许多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指示，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破私立公，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忠实地积极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把全军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最大最首要的支援。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世界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我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这就是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保卫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组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一定要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切指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指示我们要担负起支左、支农、支工和军管、军训的任务。这是毛主席对我军最大的信任，最大的重托，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最大的鞭策。

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接到最高指示以后，闻讯而动，坚决贯彻执行，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农村、厂矿、学校，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旗帜鲜明，方针明确，立场坚定，毫不含糊，坚决完成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工作。

在支持革命左派群众夺权斗争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坚决支持了革命左派，对保证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在支援农业和工业方面，全军已派出了大批干部、战士，深入县、市、公社、厂矿和学校，广泛地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宣传党中央各项重大政策，同广大的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师生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块闹革命，一块劳动。这本身就是真正贯彻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的战略方针。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经同广大群众见面，立即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大提高，生产状况大改变。这样的例子很多。

在实施军事管制和保护重要目标方面，已军管和保护了不少的单位，对这些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进行和正常工作、生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非常英明、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毛主席教导我们：“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严密组织，全力以赴，把支左、支农、支工等项工作搞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我国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怕得要命。他们除在政治、外交上大肆对我进行诬蔑攻击，加紧反华活动以外，在军事上也在制造紧张局势，妄图对我们进行破坏和捣乱。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战场上，越陷越深，为摆脱它进退维谷的困境，在苏修的积极配合下，妄图以炸迫和，想炸出一个和平谈判。不断扩大战争，逐步的升级，现在越南战场的美国军队有四十三万，伪军六十二万，南朝鲜、澳大利亚等帮凶军大约五万多，总数(美军、伪军、帮凶军)约一百一十万。飞机有一千三百多架，其中包括伪军飞机四百五十多架，还有美国第七舰队的配合。最近美国的主要动向是：正在开关岛会议，调整、加强在越南的指挥人员，和加强在越南的侵略力量；启用了在泰国的机场，美舰对于越南沿海地区的炮击逐步向北推移；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不断扩大。

最近美机、美舰侵入我国领空、领海进行军事挑衅的增多了。这个问题要注意。特别是在北部湾地区，美机入侵更加频繁。

蒋匪帮也正在积极地加强战备活动。蒋匪帮很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有机可乘，因此使用一些部队，对我东南沿海进行窜犯袭击是可能的，尤其是使用小部队从空中或海上对我进行袭扰的情况，随时可能出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估计和很好的准备。

苏修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掀起了新的反华高潮，在军事上也进行了一些配合的活动，加紧边境紧张局势。另外他们还组织“还乡团”，妄图内外勾结搞颠覆活动。对这些问题，我边防军区特别是边防部队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戒备。

对当前工作提点意见：

1. 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场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触及每一个人灵魂的运动，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们党、国家永不变色的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一定要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对我军的恶劣影响，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大立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这是我们最大最根本的战备。

全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部署，军委和全军文革小组已有安排。我军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等任务，就是最实际最生动的阶级教育，是最好的政治课，可以使我军更好地经风雨，见世面，受教育，受锻炼，学会做群众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更好地和工农相结合，当好群众的学生，虚心地向工农群众学习，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大地促进我军思想革命化和组织革命化，增强部队战斗力。部队的军事训练，各军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排。总参不另作安排。

1. 加强海、边防斗争和防空作战(略)
3. (略)
4. (略)

同志们，今年我们的任务十分繁重，责任非常重大。各级党委必须树立全局观念。抓住重点，统筹安排，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地贯彻毛主席、党中央所制定的一切方针政策。必须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继续开展四好运动，大抓狠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战胜一切困难，圆满地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赋予我们的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伟大光荣的任务，立下新的功劳，作出新的贡献！

612.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

（见《系年录》第七十三卷）

613. 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20日）

毛主席接见张春桥时说：二、三四月份是决战时期。怎样理解决战时期的深刻含义？

文化大革命已搞了十个月，去年六月发表了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轰轰烈烈，运动本身就是思想革命，十六条讲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前7个月是思想准备，树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揭露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同志的号召，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优势渐渐转入组织优势，保守势力逐步缩小，在斗争中造反派的旗帜举得更高了，不仅从思想上作了准备，而且从组织上作了准备，这是第一阶段。当前进入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期，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主席抓住了上海文汇报和上海革命群众的两个文件，一月革命风暴是从上海刮起的，开始了第二个阶段—夺权斗争。夺权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反扑，不仅限于经济主义要反扑，夺权有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挑衅，要全面进行阶级斗争，党号召，毛主席号召我们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月风暴并不说一切机关地区、企业都夺权，那样就不是一分为二了，没有阶级分析了，如《红旗》杂志所说的，夺权是夺应该夺的权。一月风暴有连锁反应。党中央已经预料到了，号召夺权必然会引起连锁反应，我们有精神准备。当时，设想在今年二、三、四月可能看出眉目来。现在，可能拖长，二、三、四、五月。所谓决战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战，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决战，不是解决一切问题，主席讲明年二、三月看出结果。

因为这个夺权是史无前例，是由上面发动，下面动员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有无产阶级专政，有解放军保卫，没有历史经验可循，对形势只能作一般的估计，主要当时说二、三、四月有个眉目，真正完成还是要看明年二、三月，一年才能看出来，不是由时间的长短来决定的。

要看主席指的方向，时间的长短有偶然性，看工作作得好，时间就短一点，工作差一点，时间就长一些。

准备夺权的有七个省市，北京就是个夺权单位，红代会准备夺权，主席知道了，只有学生开代表会，为什么工人、贫下中农不开代表会？中学生也常常批评我们，中学生也要开代表会，三方都要看，何必急呢？三方开了，合起来，建立委员会，这就比较全面一点。

抓革命、促生产也是主席的号召，去年生产搞得较好，农业是很大丰收，不仅是粮食，还有油料、糖料等。工业快过第一季度了，必须抓紧，生产必须抓，如果生产停顿了必须用军事接管来解决。但不同于解放初，现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夺权的基础是好的。这次夺权除了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要一分为二，一九四九年是由农村到城市，但这没有形成群众性的自觉的行动，这次群众自觉起来行动，条件不够，可以通过军管来促成三结合的领导机构，这是过渡的办法。

全国准备夺权的有七个，还有七个还不明朗，十个军事接管，五个夺权，共二十九个，这是全国的情形。到五月份时间就差不多了。

陶铸的说法，怀疑一切，实际上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孤立起来了。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世界人民的领袖。林副主席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其他的人要看他的大方向，允许说错话，可以贴大字报，但必须是善意的，要用主席的干部政策对待干部，只能用同志式的帮助，批评，这是完全允许的，还有一种不是善意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红旗》四期是反形“左”实右的，第五期社论是反右的，这两个社论回答了两个问题。在两条路线上展开斗争。在群众来说，不要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看待干部，进行排队，另一种是对领导干部说要统统一下子保下来，这是不对的，应该实事求是。干部的情况要看历史的发展，改了就可以重新胜任，有的历史上无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新错误就不能再保了，再保就不行。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照毛主席讲，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屡教不改的，就可以教育。

二、主席关于军训的批示问题：要全院训练，不要对保守派不搞军训。不是造反派的，不要歧视他们，而应该教育他们，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不仅要解放，还要(……不清)全世界进入了那个形势，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小了。

三、现在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为什么不提新反扑？矛头应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保守派从政治上教育他们。进入夺权斗争，革命派中发生了问题，私心杂念也有了，有的不该夺的，也夺了，甚至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合起来搞假夺权，有的夺了权，排斥另一派，压制另一派……这是夺权中出现的问题，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在学校里是另一种形式，过去否定一切不好，现在一些当权派、小当权派、负责干部出来压制群众，恢复旧的秩序。我们要建立新秩序，打烂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他要恢复旧的，从广义上讲，就是复辟。在机关、学校、企业都出现，夺权是从上而下的(指单位)，这次复辟逆流也是从上而下的。

思想也有新陈代谢，还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不但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且要推广到全世界，我们要敢于做去思想上灰尘的工作。

先念同志问题，以后要在财贸口子作检讨的，陈云同志的问题是过去的事。文化革命他没参加。他的问题是中央常委间的问题。这个人的思想是右的，但不属于文化革命范围。例如，过去陈云同志家里有人要去抢材料，陈伯达同志亲自去保护，把材料运到中南海去了。打、砸、抢是不允许的。

“联动”的思想很嚣张，现在还在活动，这倒是个大问题。你们有弟妹，干部有子女。“联动”不但思想嚣张，还有物质基础。“联动”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文化大革命。当然弄出问题也不大，只不过是一小撮，不过要重视，北京反“联动”思想还不够猛，力量不大，这样会培养法西斯，什么“革命的打、砸、抢万岁！”打、抢、砸还有革命的？

这一次搞出了一批叛徒，红卫兵有功劳的，瞿秋白是叛徒，写过求饶信。安子文的组织路线、反动的学术权威要当靶子批判。

先念同志三月十日的讲话基本上是对的。内容我们讨论过，中央文革看过，有人说我是对的，先念同志是错的，这是挑拨我和先念同志的关系。火烧李先念的问题，问我，我当然不赞成啦，不同意李副总理大字报上街。

团结 95%，现在还早呢！革命派联合必须彻底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主席一边，按十六条办事，大方向一致的，把几个观点不同可以联合。

焦点在骆风问题，据说李先念也点过骆风的名。

614. 谢富治接见政法公社 20 名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3月20日下午 人大会堂)

首先，谢副总理和大家一一握手，问徐贵春为什么没有来，当听说徐贵春得了急性肝炎，谢副总理说：“代我问他好。”

在陈荣金汇报工作过程中，谢副总理说：“搞谭震林你们应该参加嘛！”

当谈到我院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考察识别干部，着手进行革命的三结合时，谢富总理指示说：“先找一些比较可靠的人，帮你们做一些行政工作，不叫三结合，叫监督。在我们监督下，一边检查，一边考验，在检讨中，在工作中考验。这样你们可以减少许多事务工作。”

当代表们请谢副总理讲一下形势与任务时，谢副总理说：听到你们在整风，这是按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按最近几期报纸，《红旗》社论来整风，这是我们伟大领袖号召的，做的对，我完全赞成。听了你们的汇报，觉得这件事很好。现在告一段落，将来还要不断地整。

目前，形势是大好形势。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搞了九个月，就是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从一个战斗到另一个战斗，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每一个战斗，每个胜利都有反复。

目前是决战时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资产阶级要政权，我们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也要政权，一月以后就开始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这是你死我活的，最尖锐的。权在资产阶级手里，就可以压制群众，就可以复辟，我们把权夺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手里，就可以巩固革命，发展革命，不出修正主义。在北京市公安局夺过一次权，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你们工作中没有经验，有错误，但不能说大方向错了。

夺权斗争，有少数左派夺权没有经验，没有团结多数。这次(解放军)接管 106 个工厂，很多是这些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一个是没有搞三结合。还有工作作风。

目前夺权是最激烈，最尖锐的。目前从下至上，从上至下，工厂、机关夺权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相当激烈，有的假夺权，有的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抓住文化大革命一个指头的毛病。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挥下，在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指挥下，在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指挥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完全做的对，做的好。全世界人民都叫好，全中国人民都叫好，只有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叫“糟得很”。“好得很”和“糟得很”，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夺权问题上反映出来的。他们否认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意义，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不出现资本主义复辟。这意义大得很。这些人，不看这个意义，只看戴高帽子，打、砸、抢，企图反攻倒算！有一股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逆流，工厂、机关、农村都有。

小将们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最高参谋部—中央文革一边。谁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以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关锋等同志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就坚决作斗争。谁反对统帅、副统帅，谁就是反革命嘛！谁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就要坚决和他斗争到底！是大方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要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中央文革。

林副主席从井冈山起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副主席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这总结的多好。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是资产阶级政客，要是他接了班，就要人头落地。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统帅、副统帅不能反对的，这是大方向。谁反对，谁就是反革命。大方向不能错。现在有这股逆流，你们应该参加反击这股逆流，开大会，批判某些人，你们要参加，但是不能因为批判中央领导中的一个人，两个人而怀疑一切。几个人程度不同。大字报，谭震林最多，其实是余秋里，还有其他什么人。

工厂的保守派，机关的保守派反攻，清华大学的蒋南翔翘屁股，人民大学郭影秋也要翘屁股，这是一股逆流。说什么左派夺权夺错了，什么都错了，要反击这股逆流，但不能乱反，要看准。这股逆流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脸上抹黑，散布流言蜚语，保守派起来往革命派脸上抹黑，把矛头对准革命派，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对准文化大革命，对准毛主席，我们就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大方向不能犯错误。

对你们提两个尖锐的问题：一个是天津小站问题。

你们去了二十几个人，搞了两个月，那天我在政协礼堂碰见你们一个从小站回来的，我批评了他一回，小站问题你们是犯了错误的。

小站是搞四清的，是伯达同志在那里搞四清，你们派下去的人不是支持贫下中农、搞过四清的干部，而是支持下台干部，甚至个别地富反坏右，什么“巴黎公社”还夺了权。中央不是讲要保卫四清成果吗！不是按照前十条，二十三条办的吗？不要说是伯达同志搞的，就是普通干部搞的，要是按主席路线办的，也不能反对的，大方向错了嘛！

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西营翟子地，结果支持革命派（原大队四不清干部）。“巴黎公社”与贫下中农造反团对立，说什么“四清是一条黑线，不搞清我们十几个人就不走”。在这些学生支持下，“巴黎公社”夺了公社的权，斗争了公社书记王凤春。政法公社在批判王凤春时说：“你们保卫陈伯达，还保卫毛主席吗？”你们这样搞行啊？搞了70天，明明是调查陈伯达同志材料。（同学要谢副总理念长征队员名字）

不要念！大方向就是错了嘛！明明不是与你们有关的，你们跑到那里去搞什么！上次批评不尖锐，今天批评就要尖锐一些。你们大方向就是错了嘛！你们是保卫四清成果还是废除四清成果，要向那里贫下中农检讨，向中央文革检讨，刘富元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你们干什么。

背后有什么人指使没有？如果没人指使，检讨了就算了！有人指使就要揪出来！你们一定要向那里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向伯达同志检查错误！（同学说：我们去的目的是热爱伯达同志的）

你们支持下台的干部就错了嘛！支持下台干部，否定那里四清，是犯了方向错误。向那里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道歉，向伯达同志道歉，只要按前十条，二十三条办事，就要保卫四清成果！如果没经验检讨就算了，但是如果上阶级敌人当，就要揭露他！

第二件事：关于政法兵团，听说你们把政法兵团每个战士都要整，有人跑到山西，报告的材料，你们自从两家分伙以后，要你们团结，要你们彼此做工作，一直到刘富元天天到我前面后面骂我，我还是要你们团结刘富元。一直到撤出市局，开红代会，我说要团结刘富元政法兵团。

你们青年同志度量不大，刘富元原来也是少数派。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支持过你们，后来分裂，你们互相你把他打倒，他把你打倒。有人说：我是刘富元的后台老板（同学们说：这是政法红卫兵说的）后来我没见他，是在他抢三司大印，抢大印后，我没有见他，抢大印方向错了嘛，没有见他，也没有批评他。

你要反对毛主席搞林副主席，那是反革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是严重问题，要斗争到底！我们这些人是可以批判的。取消、反对谢富治就是什么坏人，这一条要取消，他反对谢富治，有什么缺点错误，他们可以检讨，但是谢富治可以反，单反对谢富治，你们为什么要打倒他呢？你们就犯政治错误，我要是革命的，他打不倒！（同学说：他们反对中央文革）

谢副总理说：“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不成。”

谢副总理又说：“你们度量不大不行。这个事情我跟你们有分歧，戚本禹同志跟我说过：“他们对付政法兵团，每个人都要整，你要找他们谈一谈。”（代表说：这是政法兵团造谣，我们没有整他们）

谢副总理说：“你们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团结他们，这是人家跑到山西报告我的。”

我声明一点，反对我的人，你们不能反对，尤其不能把人家打成这个那个，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那不一样。但是反对我的人，你们不要反对人家，整成反革命，那就犯了方向错误。

谢副总理下午四点有会，离开会场，会议由李震副部长主持。

李副部长：你们现在是多数，是当权派，怎么对待在野的。政法兵团和你们有路线分歧，采取什么方法批评他。批评你们是尖锐的，但是支持你们的，不指出来不成。

你们现在是多数派，怎样对待少数派，当权派怎样对待在野派，多数很容易形成群众压力，少数对你们是摆事实，讲道理，可是多数时很容易。变成多数时容易变成以力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谢部长一再讲团结，可是，不是无原则团结，主席再三讲是两条路线斗争，可是七大、八大，主席还要选王明，你们跟刘富元要团结，不戴反革命帽子怎么样！你们对刘富元团结，批评就是斗争。（陈荣金说：他们反对中央文革），你们就坚决反对，可是反对谢副总理，你们不要管他。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后还会新反扑的。

刘富元这个问题达不成协议，那么这样好不好，他们反对谢副总理，你们不要管他。（大家不同意）

李副部长：那么，把谢副总理意见原原本本传达给大家。

615. 谢富治对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1967年3月20日晚)

昨天我们开了个农代会，质量很高，首长都去了，你们要帮助他们作些宣传工作。工代会二十二日开，现在闹得很厉害，如果不进行推迟一下。听说目前有些学校斗争保守派很激烈。有些学校说我说过红卫兵要解散，我哪里讲过这些话？老红卫兵也有好的，不能一概而论，有“联动”性质的组织都要取消，现在大学红代会开过了，中学的红代会就要开，不能解散红卫兵，高干子弟也要分析，大部分是好的，红卫兵不能解散。解放军要支持学生中的左派，要把持有保守思想的组织解散，中学近来比较紧张，海淀区的中学，北航附中的保守势力近来比较嚣张。现在有阶级敌人搞反夺权，进行反扑，这也就是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扑，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当谁要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时，我们站出来要保护（毛主席、林副主席），要反击他们。你们前些日子的游行搞得很好。今天给你们打个招呼：太大的游行要少搞，敌人容易钻空子。目前有人想利用三结合钻空子。打倒一切是他们（刘、邓）搞的。四八年刘少奇提出搬石头，五四年又把干部都打成四类，戴高帽子也是刘、邓搞的。八·二四斗小黑帮是王任重一手搞的，我们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斗争的大方向是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保守派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他们大部分已经回校，不要无情打击，要善于工作，善于帮助，不要歧视他们，他们保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但只要改正就欢迎，早革命的好，晚革命的也要欢迎。反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就要专政。反我可以，但一贯反也要处理。首犯不能扩大化，反革命也不能扩大化，“联动”的处理就是这样。斗这些人不要开大会，一千人的我就不同意，开几十个人的会就可以了。今后要注意斗争方向，有事多请示中央文革。政策是党的生命，刘、邓现在就是从我们的错误中捞稻草，我们就是不给他们这根稻草。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学校要派些同学到中学中做义务劳动（指帮助他们，不是指手划脚）。“联动”要搞臭。一个大学要帮助一个中学，“联动”还十分猖狂。十六日他们开文娱晚会，还放鞭炮，要充分利用军训。搞一个临时性的权力机构。听说清华的蒋介石（蒋南翔）要反攻大陆，（假三结合）搞三结合要具备条件，不够条件暂不搞，没有基础就不要勉强。

关于刘建勋，河南有一个四清工作团是反他的，他们有造反的，来了一年多，他们要再呆下去，就不给他们饭吃。现在内蒙、邢台、四川夺权反过来（指大局），其他还有一些地方

还不清楚，听说外省有的人来抓人，这不行，主要经过公安部、中央文革。解放军有缺点错误可以提，但不要贴大字报、游行示威，河南四清工作团的大部分是当权派，估计有坏人，我们不支持，也不欢迎他们，再不走，不给饭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中央文革的意见。

616. 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工作人员、学生、群众组织的讲话 (1967年3月20日)

徐景贤：自从二月五日我们夺权以后，大家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工作，作出很多的成绩，干得很好，在这里我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参加我们工作的有革命的学生，各群众组织(38个造反组织)，还有各地的革命学生。因此，今天的盛大集会也是欢迎他们。大家老早就很迫切希望和要求见到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今天有春桥同志在百忙中抽空来和大家见面，下面张春桥同志给大家讲话。

张春桥：刚才听说大家都在革命委员会工作，在同一个机关里没有见过我，那就很糟糕了！看来，这也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我们很官僚主义！实在对不起。每天给我们的信很多，要求见我们的人很多，如果坐半天在那里看也看不完呢？刚才交大“反到底”给我一个条子，说从安亭事件答应接见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做到，……(这时有人在搞录音)春桥有些生气说：何必录音，搞得很紧张，又这么现代化，这个习惯不太好，大家随便谈谈嘛！一次我和华东局的一些同志随便谈谈，一下子传单就传到北京。这一次传达毛主席的声音，也传到北京，其实看了里面很多东西不是我讲的，这不大好。现在我们掌握政权了，在我们内部还得内外有别嘛！

还是回头来讲。我们大家在一块工作，可以说，很熟悉了。我们回到上海二个半月没有做什么事情，主要听了一些汇报，见的人也很少，许多工作主要靠在座的同志和上海革命的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和革命的干部做的。比如火车站通车这件事就是这样嘛，我们又不会开车，火车的通行还不是铁路的工人和同济“东方红”战士干出来的！我们顶多提了点意见，而且有时还是错误的呢！大家的工作集中起来成绩就是很大的了。

现在上海的形势很好，全国的形势也很好，我觉得一天时间有时过得很快，也过得很慢，我从北京还来又要一个月了，想一想许多工作都还没有头绪和眉目，这样想又觉得时间很慢，急的很。不过总的时间是过的很快的。现在上海的天下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天下，谁敢说不是！这几天我们又在搞领导干部的造反，上海的旧市委书记处除我一个分裂出来以外老是铁板一块，怎么会是如此，我就是不相信，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嘛。现在总算是开始分裂了，大局是好的，但是阻力有来自上面的和下面的，以及自己头脑里的。上面的就是刘邓路线，刘邓实权已经没有了，但能不能说完全打倒了呢？还不能这样说。刘邓路线在全国批判还很差，上海就更差。过去开大会也提提，根本不彻底，比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流毒20—30年，而且很深，62年还再版了一次，影响极坏，到现在还没有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中央文革人少事多，有时连一篇《红旗》社论也很困难，这就希望在座的同志去搞了，刘邓只是二个代表，代表一小撮人，陶铸也是一个，是继刘邓下台又上来的。是不是这三个人？当然有，上海不是就是陈、曹，刘少奇作报告还有些“理论”，曹荻秋没有什么理论。我们如果不把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那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没有彻底完成。因为社会主义内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也肯定存在，资产阶级也肯定会反扑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一片大好形势，又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还有阶级敌人。这是个大方向。现在大家马上杀回学校去闹革命，就有斗争方向的问题。我们的矛头还要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现在不管是工人运动也好学生运动也好，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工人运动的兴趣转移到对

另一个群众组织上去，有的拼命把人家打成反革命。学校里也是这样，同学和同学之间争论得非常厉害，不是把矛头对准陈、曹，这样学生斗学生的现象还会存在。有的同学认为陈、曹倒了，没事就是打内战，提出“内战到底就是胜利”，有的人还说有根据哩，主席也讲过的呢？不行。对人家动不动就说是“反革命”、是老保，你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人家一讲话就是“老保翻天”，你要老老实实向毛主席请罪，人家不讲话，又说人家是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和稀泥，这怎么可以！讲也不行不讲也不行。这种情况是不是斗争的大方向？比如南京的1·26夺权，当然是一个大组织，可是搞小团体主义不搞大联合，把人家组织，不少是左派组织，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夺权？还有浙江也是如此，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但没有如此严重的情况。没有过什么命令把一些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包括“红革会”在内，应该考虑到他们有那么多战士，他们大部分是革命的，搞了就会使他们背上很大的包袱。

大家一定要明确革命大联合的必要性，不要小团体主义。大家要想到面前还有美帝国主义敌人在那里，都觉得斗争需要我们联合起来，不认为需要当然联合不起来，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感到工人、学生活动中间大方向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不能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其实这个口号也是陶铸当时在北京搞的，他说：“除了毛主席，林彪以外其他都可以怀疑、炮打”。上海“红革会”的头头是犯了很大错误的，他们方向错了。不是说我和姚文元不能批评，我们有什么批评不得，还可以炮轰的，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关键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在于上海当时处于革命大联合的时刻，他们破坏了大联合，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我们希望大家回到学校后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大方向。大方向看准了，各个组织之间的问题就能正确处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比如浙江两个大组织都是中央接见过的，吵得很，一抓大方向说服了也解决了。不能说“就是我最革命，别的都不革命”，这样势必走向反面，走向历史的反面。现在我们革命刚刚开了一个头，都在学习，特别是青年一代世界观正在改造。下去以后听说中学生里搞得很凶，有的人人过关，这怎么能行？一个中学生怎么能不犯错误，不犯错误才见鬼哩！大学生也应该犯错误。列宁曾经说过：上帝赋予青年犯错误。犯了错误，检讨一、二次就行了，那能老检讨。要让大家去实践，让人家有思考时间，不能象对敌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同学，如：“你说，你说……”（作状，大家大笑）。

大家回去，大学也好，中学也好，应该靠自己安排。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的，而且离开学校很久，学校的问题靠你们自己解决，这样创造性就来了，但是大方向一定不能丢。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主席一贯的方针，不要怕犯错误，不要认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回去犯了错误怎么办？不要紧嘛！主席最好的学生也难免犯错误的。大家回去一定要贯彻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红卫兵问题也不大，过去有市红革会这个大的组织，现在没有了，大家就更有活动的自由，更能实行由班级自下而上的大联合。

这几天大家都在问，市一级的机构还要不要，实行自下而上的大联合可以不去考虑它嘛！在上海我倒想可以保留几个大的组织，这倒不是为了大家打内战，因为上海有特殊性，与外面联系很大。比如美帝打了我们的人，支援越南，北京集会，上海也少不了，就可以由群众团体发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市一级机构有保留的必要。如果从大联合角度我也主张撤销，不过不撤销也行的，只要这个组织实行大联合的方针，可以的嘛。我有一次到工厂里和一个组织谈起对和其他革命组织的大联合的看法，他回答说一不提倡，二不支持，三不承认。这不行，这还不是陈、曹的路线了！要知道群众会前进的，我们不能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如果如此，不管你过去有多大的功劳仍然被打倒。有人说，毛主席党中央支持我们的，这也没有用，刘少奇，毛主席过去不支持？没有毛主席他的威信会那么高？毛主席还公开宣布刘少奇做接班人，但现在他站到历史的对立面，站到群众的对立面就是被打倒！

同学要回去，拉拉扯扯谈了这么一些，就是一个意见，一定要紧紧抓住斗争的大方向，要实现大联合，打击一小撮，最大限度孤立敌人，这样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的任务。

姚文元：大家要我讲话，没有什么话好讲，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发言权。

大家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刚才春桥都讲了。这一段应该说是难忘的！从一月革命开始，上海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干部都和我们战斗在一起，大家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工作做的最少最差。虽然是难忘的，但是革命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大家还记得吧！1949年刚刚解放时，解放军刚进城，那时我还在地下，春桥同志是接管员，我们当时和这次一月革命胜利一样多高兴呀！但革命仍然继续前进。我清楚记得当时的一些老战友，现在有的跟毛主席继续前进，有的在十字路口彷徨动摇，有的变质了！走的无非是两条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的第一个希望就是大家回到学校后要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永远忠于革命事业。我们能永远战斗在一个战壕里，继续把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不是教育干部要保持晚节吗？对我们青年一代是不是还有一个早节！应该说，在一个革命高潮时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不难的，但是革命到了转折时，到了关键时刻才能考验人，这也是对人的最好锻炼。我希望我们共同战斗下去！

真理是不怕火烧的，我希望第二个就是大家回头好好学习十六条。现在去看有很多地方是写得很好！现在里头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和社论，但是十六条这是一个总纲，我们要坚持的就是这条路线。现在说的许多问题其实十六条都定了，如群众路线，党的阶级路线，干部政策等等。这里边第二节“主流和曲折”也说的非常好，都是主席的思想(读了“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这一段)阶级斗争以前有过几次反复，对我们来说确实吸收很大教训，增长了阶级斗争经验。以后运动会不会反复？十六条说：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这就是肯定有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应该这样去想。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会甘心于死亡的，他们还会伺机反扑的。但在看到敌人反扑时也不要将前途看成漆黑一团，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们是不堪一击的。在胜利时看到困难，困难时看到光明，这两个方面都不能忘记。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按毛主席的路线走到底！这一段时候有一点自己教育很深刻，就是我们毛主席始终支持群众中的新生事物，红卫兵也是毛主席首先发现给予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国广播，点起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从那以后毛主席还支持很多。从上海来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都是他老人家支持的。如《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月九日《紧急通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直至最近(3月6日)文汇报的反对风头主义的社论也是毛主席批准在人民日报以显要的地位刊载！大家返校闹革命会遇到许多问题，大家还要敢于革命，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要敢于提出革命的倡议，要敢于把运动推向前进。因为世界是决不会停止的，世界是充满矛盾的世界，事物就是在矛盾中发展的，因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我们的革命要发展，只有依靠毛泽东思想掌握群众，所以第三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继续发扬敢于革命、善于革命的革命首创精神，树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威。无产阶级的权威就是把千百万群众的意志集中起来。红卫兵的发展就是如此，从学校发展到社会，从一个城市发展到全国。

现在大家杀回去是去闹革命，不是别的，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键的时刻，大家杀回去就是要把你们的革命基地建立好，真正做到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没有了，那时大家还可以杀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春桥：我补充一点，现在大家回去很好，上一次在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上我讲过：最近红卫兵的劲头好似没有过去大了，有的还觉得灰溜溜，这不行。要杀回学校好好整顿再杀出来！我说的是大家现在杀回去好好整顿一下思想、整顿一下组织，将来士气更大，人数更多，还可以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杀出来，而且一定要高水平。因此，我的话是鼓励大家杀回

去的，回到学校去。想不到同学的劲头很高，听到以后第二天就上南京路破四旧，把小脚管给剪了，人家有意见的跟他辩论，大概他辩论输了，问他谁叫剪的，这个学生说是张春桥叫我剪的！（大笑），我怎么会叫剪呢？现在谣言很多，我也无须辟谣。

有些学校根本还没有建立一个权威的组织，怎么能杀出来？现在还是回去好好整顿，将来出去是不是我们再商量一下。其实，我们是早有建议和打算，是不是能在五月一日开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五四”召开“红卫兵代表会”，红五月嘛开门红，不过最近工作忙，也没有很好地搞，总的困难是不少的。

617. 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 和财贸各部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21日 国务院小礼堂)

周恩来：

同志们，很对不住大家，昨天晚上大家呆了半夜，昨晚搞了两个座谈会，搞了一个是黑龙江的，一个是安徽的，搞到五点就不行了。财贸系统座谈会是最多的了，你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还要找我，现在怎么谈法？你先谈还是我先谈。看来财金学院“八·八”队的大字报提了一些问题，我来解答，你们同意不同意？当然有些不是属于我答复的，财金学院“八·八”队，有一个批判分队的“从来急”纵队，“匕首纵队”追穷寇分队，转抄了一些东西，是三月十七日的东西，时间比较晚了一点，问你们的意见，是我问你们问题呢？还是你们提问题我解答（群众说：请总理讲）好！我讲，你们事情比我知道得多，有些问题，你们比我知道得多，我找谁去问问题呢？这二十五个问题，如果可以答复，要我讲，我讲也好，对形势有好处，这样也可以节省时间，街上有大字报，小报。

一、毛主席为什么在接见张春桥同志时说，今年三、四月是决战时期，我们如何理解其深刻的含义？

主义讲话登报了吗？没看见有，大概是传出来的。有这么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十个月嘛，去年这个时期，毛主席亲自批转聂元梓的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轰轰烈烈的群众大运动，去年到年底已经七个多月，你们都熟悉嘛，运动本身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的目的，十六条规定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前七个月是思想准备，思想动员，树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露了以刘邓为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对立面搞得更清楚了。经过十一中全会，十六条，红卫兵运动，大串连，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到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了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中左派的旗子举得更高，保守势力缩小了，革命派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不但做了思想准备，而且做了组织准备，这是第一阶段。再前进，进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突出，夺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这是上海工人阶级起了领导作用。所以毛主席抓住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的十一个团体声明和三十二个团体的紧急通告，和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以工人阶级领先，一月革命风暴，从上海发起，这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经济主义进行反扑，不仅经济主义方面，还有其他方面进行反扑，进一步夺权斗争，夺权是必然的，这是反动阶级向我们挑衅，全面的阶级斗争嘛。党号召我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所引起的这个夺权斗争，并不是说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单位、机关、团体都要夺权，这样就不是一分为二，这就没有阶级分析了。夺权是夺应该夺权的地区，企业单位，机关，团体的权。但是这必然会有连锁反应，一些不该夺也连锁反应了，这些一月份给你们座谈了，二月份也讲了连锁反应，所以势必带来反应，必须要有精神准备，当时设想夺权斗争在二、三、四月份可能看出一些眉目，这是毛主席说的。现在看来，可能时间还要拖长了，到二、三、四、五月份。所谓决战，从某种意义上

说，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就是决战，不是一切都解决了，所以主席讲，明年二月三月四月看出结果。夺权首先是地方，全国有二十八个省市，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直辖市天津，变成了二十九省市，还有专区、县、公社。一般地说，顾不过来，有些地区搞了，最近中共中央发了通知，大队、生产队春耕大忙，不进行夺权，二三四月不能普遍夺权。中央机关里夺权斗争已经进行两个月了，现在眉目还未看清楚。企、事业单位更慢了一些，为什么这样？因为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最高统帅提倡的由下而上的发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夺权没有历史经验可学，自己摸索。对形势只能作一般的估计，北京革命群众的报纸，我不确切信，我只讲我自己的看法。主席讲主要二、三、四月份看出眉目来(记录不清楚)现在只是估计，时间晚一点，早一点，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搞内战，但内战以前已经有了，四五年日本投降，四六年就进攻，大规模是四六年七月到四九年六月，三年半不到的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四七年主席在陕北时估计的时间还要长一些，时间来得快一些，主要看主席的方向、方针，预言对了。中心是今年看清眉目，明年看出来结果来，这是带偶然性的，工作得好，快一点，做得不好，就慢一点。同志们很着急，何必着急？急不行！现在同志们提出问题，觉得三、四月是决战，现在在房子里坐不住了，写给我信，今天是三月二十一日，等不及了，还有四、五月嘛，何必急呢？不是两个月过去就没有日子了。“三结合”，应该夺权的地方都得“三结合”。我从一月份就讲“三结合”，首先在财贸口讲，在外事口讲，直到现在还没树立起一个典型，不能责怪谁，不是这里出毛病，就是那里出毛病，没有经验，我们两个月也在摸索，不断总结，不是这两个月过去了，决战的日子就没有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我现在给你们讲一讲，现在已经实行“三结合”有临时权力机构的，有上海、贵州、山西、黑龙江、山东五个单位，五个单位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就这样，拿黑龙江讲，革命委员会，昨天晚上(二十号)谈之前还没有正式成立，一个夺权组长不是领导干部，一个组长是哈尔滨师大的学生，两个副组长，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而不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一个十、七、八人的领导小组，虽然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已经站出来了，军区负责人支持革命造反派负责夺权，原来夺权只请他们作顾问，我解释了，才参加“三结合”做委员，直到这时才通，因为革命的学生说，如果让他们做组长，我们就变成阿斗，怕做阿斗，就不要诸葛亮了。当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诸葛亮，问题在你需要不需要，不在形式。关于“三结合”，《红旗》杂志第三、第四、第五期社论都讲过这个问题，革命的领导干部可以成为“三结合”的核心，骨干力量，革命群众为基础，解放军代表为柱石，这样一讲就讲通了，经验和教训大家认识到，五个单位夺权，黑龙江比较早，还是这样反复缺乏经验，问题是方向对不对？是前进，不是后退。目前夺权有十个省市，北京也是准备夺权的单位之一。召开大专院校红代会，就准备夺权。在主席那里汇报，主席说为什么光开大专院校红代会，不开工人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中学生红代会，革命干部代表会呢？过去中学生批评我们只注意大专院校的工作，不注意中学生的工作，三个代表会最近准备召开，开农代会、工代会、中学生红代会，既然开了都是革命造反派大会，三个代表会先分别开，然后再合起来开全体会，成立革命委员会，再开个群众大会祝贺。上海来得快，工人提倡议，后来边开会，上海各农村，不叫上海公社，怕全国都照抄。国家名称也得改变，改变中华人民公社。这没有必要，后来改成革命委员会了。天津也筹备，也在开各种会议，筹备中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两(记录不清楚)噢！这里我讲错了，七个准备夺权的省市，十个条件不成熟，先准备军事管制。不成熟，左派组织代表没产生，好多派争执不下。过去是对当权派斗争，主要是对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向上。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相比之下，保守势力弱小，造反派力量强起来了，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到今年一、二月份夺权，革命组织内部发生的争论，不易形成左派大联合，这时革命的领导干部没有出来亮相，另一方面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同反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判毫不留情地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

清界限，彻底地毫不留情地亮相，取得群众同意……。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三结合”条件不成熟。在当地工作需要抓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卫生，财贸。春天来了，瘟疫多了，这样就发生需要过多的办法。需要军管，但这种军事管制，必须说明，跟初解放时的军事管制完全是两种性质。那时是共产党领导，打下了天下，把国民党赶出海，由上而下一排除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抛开外，一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学校都包下来。新的机构实质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基础上，人事制度也包下来了。四九年不能说是彻底的夺权。因此，继续了十七年夺权斗争，十七年由下而上不断地进行夺权斗争，如农村清匪反霸，城市的三反五反，五七年的反右政治斗争，六二年党内批判，提倡阶级斗争，六三年春起，进行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都是夺权斗争，一般的来说，都是自上而下领导发动的，只有六六年五一六月份，“四大”才是最高领导毛主席发动的，这是真正由下而上彻底地群众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群众几万万人起来要把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过来。去年的七个月，就作这样的准备，今年一月上海革命群众进行了夺权。夺权如果说的是决战，这就是决战。这样的运动条件，不成熟不能急。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主席的号召，去年生产是好的，农业工业都超额完成计划，粮食、棉花、油料作物、经济作物都超额完成了计划，今年就应该继续增产，……，工农业，第一季度过了，必须赶上，但是夺权斗争还没有抓起来，如果一个地区的工作瘫痪了，过渡的办法就是军管，但是不同四九年、五〇年军管。这是自己专政条件下，在毛主席领导下，在解放军保卫的基础上，只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其他的还要一分为二。一九四九年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群众运动本身没有形成，虽然也是敲锣打鼓，但那是群众的热情，而不是行动。这次运动是城市群众自己起来行动，这样夺权，条件不够先等一下，军管促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建立临时权力机构，地方省市、专区、县都可以这样。条件成熟的有七个省市，还有七个省市情况不明朗，五个省市已经夺权了，十个准备军管和已经军管了，这是全国的情形。不管怎么样，三、四月份准备，五月份再试验，差不多了，这是对全国地区来说的。机关来说财贸口，本身或下属企业单位，个别企业单位，刚才说了条件不成熟，二月份夺权，不管党委是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我还不能下结论，财贸口停职已经有多少？(先念同志插话：十六个财贸口，八个单位，《健康报》不算，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外贸部，银行，供销合作总社，《健康报》，工商管理局)，(群众：不是《健康报》，是《前进报》)啊！是《前进报》。这样八个单位，报社不算还有七个单位，十六个停职了反省，数量不小，当然不只此，可能还有，上次希望大家排队，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拿出财贸口来说，我首先要求“三结合”第一点没有经验，二月份只能说两句话，算也夺权，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虽然造反派占优势，开大会，我们支持了，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已在造反派手里，文革已不起作用，但保守派已屈服，夺权形势已经造成，经过三个月的斗争已经实现了，从政治上转到组织上的优势，应该算夺权，这早已肯定。第二，业务怎么办？一月中，我建议大家监督业务，中央各部直属中央，是中央的权，有许多机关是机密单位，如外交部，财政部，公安专政等更是中央的，外贸部一部分银行、金库大权都不该夺，除去让大家监督业务。一月中试验可以，现在还可以监督，二月中出了毛病，外交出了毛病。(记录不清)

中央调查过，泄密很多，对外经委，对外援助项目，不该公开的公开了，再不限制要超过。财贸口表现在财政部，是不能容忍的。上次有许多预算机密，预算分配，做什么事，实际上都极端机密的，监督的都看了。这些东西在党中央只能政治局常委同志才能看，政治局委员也不看，不要说中央委员。建国初期，对党外人士当时(记录不清)……党外人士张文升给泄密了，后来经国家最高会议开除出去。财政部××泄的密，不好在这里说了，国防尖端不要算了，……。可以在预算中看出来，我们没料到监督组都看了，原因是主管的长字号都靠边站，阻不住了，青年没重视，犯了这样的错误。外交也有，银行也有，(李先念同志插话：武汉银行。)极端机要的材料要弄走，弄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什么不抓呢？十七日不能

再等了，如果不是杜向光他闯进来，他来抵抗，现在造反派的信，还在手里，让他们去反省检讨，还没有回答我。财政部杜向光和造反派走到那样极端，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党和国家不能容忍的。今天我还要讲，已经晚几天了，再晚了就要违背最高指示。许多同志不清楚后果，如不过问，过错太大了，不过问，我就辜负党和国家的委托，就要犯罪，我过问晚了几天，因为忙开会了。因为这些事情超过了监督范围，为什么我对杜向光管得那样严呢？因为他是副部长，他知道嘛，财政预算要出去，他拒绝召开党组会议，就不能容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警惕，那次取得造反派的支持，财政部当时超过了监督范围，今后对外贸口应规定个范围，整风中提出要求，自己整风提出办法来，夺权斗争的基础嘛！你们要联合起来，事情发生后，财政部革命造反司令部垮台了，但战斗组还存在呢！事先我不知道，先念同志也知道晚了，后来方知道。司令部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可以搞联合机构，希望革命组织还是要联合起来，尽管战斗组在各行政单位，上面还是要搞联合组织。两种联合，一个是司、局里有几个战斗组，大方向一致，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观点一致，局内就可以联合起来，还可以监督业务，形成部内联合，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另一种形式，司里有小，上边有大的也可以设临时的监督机构，不妨多试点几次。那种合适，战斗组不要交叉。便于业务工作，业务时间搞革命，忙大家都忙，不能因为观点不同在工作中吵架，行动系统可以联合，大部分可以联合，总是要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搞起来。三月份已有十天，要把各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二、三月中整风差不多了，不能再迟了。这些首先请大家实现。至于外边是否来推动呢？这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去年是可以的。学校先走一步，财经学院，商业学院，粮食科学院。去年我们支持的财经学院起了主要作用，当然外贸学院、商业学院也不落后。今年已到夺权阶段，夺权应本部为主，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有通知，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都应以本机关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主进入夺权斗争，外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必要时可以协助，不可包办代替。党中央各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财政部，各地银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不许由外单位人接管。已经进入各机关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本单位的造反派已经起来了嘛！毛主席在井冈山发起革命，任何运动都是波浪式的发展，不可能是一直高潮，一直高潮从来也没有，立三路线讲革命一直是高潮，这是错误的，运动总有高有低，二、三月份整风低了些，现在又起来了嘛！各部大联合要搞成，财政部也要搞成。是不是要外单位帮助，由本单位造反派自己决定。比如，财政部是否需要，自己决定。但不能进入联络站了，一般来说，自己学校联合起来。

二、各级领导干部排队，希望大家提意见，要一分为二，各单位领导干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能说每个单位企业都有，那是不符合方针的。我们讲夺权是需要夺权的地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团体，也有不需要夺的，包括机关即使需要夺权，也不是所有的权都夺。要夺，只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比如，财政部有三个停职嘛！银行两位嘛！粮食部两位嘛，财办两位嘛，当然，停职是否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通通都是，要一分为二，经过检讨以后，结论再定。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也不是没有犯错误的人，错误有轻有重，有多、有少，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间，有长有短，情节有不同，有轻有重，改的有早有晚，责任上边比下边的重。首先，要区别有没有夺权的机关，是否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有多少需要夺权的，一定有不需要夺权的。第三，不需要夺权的，也不是不犯错误的，错误有轻有重，有多有少，也有没有的，没沾上边的。第四，责任一般上边比下边重，所以，矛头向上不向下，几个区别是阶级分析吗，是站在资产阶级当权派一边，还是站在无产阶级当权派一边，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还是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犯了路线性、方向性错误的同志是否站回来了，要阶级分析，对各级领导干部应分析，各部党组自己也排排队，看两个排队是否相符合吗，可能有相合的，也有不相合的，角度不同的，由下而上，由上而

下，再拿到中央来提，我们可以比较，这是从群众中来，然后再到群众中去讨论。首先要求犯错误的干部一定要划清界限，深刻检查，为他们准备时间，严肃批判，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各部进行排队的不多，时间在争论中过去了，要看眉目忽视了，我这里再次呼吁你们，认真地做。除停职的外，能说话的部级领导干部，部级开会检讨就行。也可以要学校参加。如商业部可以要商学院参加，司局长一般司局范围里检查，也有个别的部级会上检查，不需要人人过关，人人过关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刘邓主张的，他们派工作组把校党委、总支、支部都否定了。去年七、八月份我到清华去调查，从党委、总支、到辅导员都否定了，都靠边站了，是否都是黑帮？北大也如此，调查许多学校也都如此。否定一切精神在中央十一中全会后，国务院各口传达十六条特别是工交口更厉害，部级首长都靠边站了。这种思想影响了红卫兵的思想。影响后起的革命造反派，所以到路线斗争都靠边站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陶铸曾经说，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外，其他人都可以怀疑。这样，实际上是把毛主席、林副统帅、林彪同志孤立了，中央文革小组也可以怀疑就是从刘邓那里来的。当然，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一切发展都合乎马列主义，有的超过马列主义，副帅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对其他同志看他做得对不对，即使有错误，也要善意批评。怀疑包括信任不信任，说错了，可以批评，善意的，同志式的贴大字报也可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这种思想不是善意的。干部排队要一分为二，两条路线斗争，《红旗》杂志第四、五期社论是反右和反对形“左”实右的，否定一切就是形“左”实右。什么都结合，恢复原状，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右。二月二十九号，三月初，同时间两条路线展开了，对群众要说服，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一分为二，根据毛泽东思想，用阶级观点看待干部。另外领导干部不能囫囵吞枣，一切都包过来，有区别嘛！实事求是，通通保不对。财贸口停职反省的十六个，绝大多数是群众提出来的，而且还有。大家可以揭，对干部要看全面历史，还要看发展，例如二月中有的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改得好，发展了，重新恢复信任，错误也许是偶然的。有的同志历史可……现在犯新错误，比过去更严重，难道还保吗？对每一个人，都要一分为二。对领导干部也要实事求是，过去对，不能今后都对。按主席思想，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立功赎罪，将功补过，将功赎罪。干部排队很重要。各个方面都要排，革命群众组织，部党组，排后交换意见。看是大致上一致，一个部十几个左右。三级干部会开完后，问题解决了，工作就更安心，不是开完会就放心，还要看发展。处理可以监督留用，撤职留用，有的要调走。有的完全罢官，提一批。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为基础，中级干部的代表，部级的领导干部，组织革命委员会，监督业务，这样监督更容易一点，哪些工作是事务性的，可以不管，哪些是机要东西，可以不监督，避免造成大大小小的错误。有的单位是不能监督业务，如国防工业部，但可以监督政治。政治各组，中央各部门情况比较复杂，要搞典型。将来各部门，另一种设想是如军管。六个国防机构已经军管，前几天在这里宣布三结合，解放军代表，革命的领导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不监督业务，政治生活可以监督。工交、财贸系统、农业口、外事一部分，是否实行军管？军事各部还是搞三结合，这两种态度都要摸一摸。你们能够负起责任，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形成，干部检讨很快，做好，可以搞三结合，何必还军管过渡呢？有些部门可以看看，财经各部门，今天我与先念同志商量，不能决定，相信你们能够做好。但时间过了两个月了，你们应该做得快些，事情并不难。总之，希望中央各部、各机关把这些事情搞好，紧接着抓业务，促业务，现在已到第二季度了，市场供应，外贸供应，财政税收，农作物收购，夏季要到，比第一季度任务大，财贸口不能拖得很久。今天林彪同志在一个地方说，抓革命促生产，从政治统帅业务来说，革命重于业务，从时间上来说，抓业务的时间应大于革命的时间，业务部门一天八小时，革命三小时。但是有时还要加班加点，当然业务重，还要政治挂帅，不能离开政治，但时间要多。

(二)毛主席为什么在三月七日关于军训的指示中指出，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教导？这句话是有的。主席在军训通告上说的，大专院

校军训，不仅是造反派训练，非造反派也要训练，这是对于学校的训练。对保的厉害的，也不能歧视他们，要帮助他们嘛，过去我们常说，比、学、赶、帮、超，学校也一样，串连很久了，回去共同过组织生活，学校里造反派在运动里领先了，在学校中也要一块参加军训，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使三性统一起来。一定要懂得，你们自己是左派，造反派有的还是少数，或者是较多数，要教导他们嘛。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社会上还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仅要解放他们，还要改造他们。从全面来说，工人阶级还是少数，半无产阶级还是多数，还有资产阶级、封建主义。都要改造，只有改造了他们，资产阶级才能打倒，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就缩小了。在我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世界都这样，进入共产主义就保障得多啦！在这种意义上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三)这次为什么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而不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看提什么内容，比如说，很多地方，反动路线搞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当政的。上海市人委那时没被夺权，黑帮统治。黑龙江省当时潘复生同志的权还很小呢！他们就搞反抗，向我们挑衅，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挑衅，所以上海口号是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二月份，一方面提出对待干部排队，要一分为二嘛！不要否定一切。《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讲了，从另一方面一切都保，肯定一切，也不对。否定一切是形“左”实右，这是由上而下来的，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比如财政部例子可以说，掌了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到中央来了。他要夺中央大权，这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作法，夺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了。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些都是一股逆流。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有各种形式，各地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方面出现了复辟逆流，我们应该进行批判。原来矛头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向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对保守派用政治斗争影响他们，教育群众很好。夺权以后，革命派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私心杂念起来了，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有的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合在一起搞假夺权。也有的自己夺了权后，排斥另一派革命派，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群众。夺权斗争出现了些：有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是新发现的问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一些部门，机关，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在学校中，是另一种形式，过去否定一切什么都不好，当权派，小当权派，一律靠边站。现在，当权派，小当权派又都出来压制群众，这可以叫反扑，复辟，他们要出来，他还想当权，恢复旧的统治，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打翻打烂一切便于滋长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凡是复辟也好，反扑也好，就是要恢复旧的东西，恢复旧的思想，从广义上来说，就是复辟。为什么这次提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呢？因为夺权斗争由上而下的进行，所以提由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

(四)关于问到戚本禹的讲话，我没有问过他，我不能回答。这问题，我没摸，不能回答，我只看到大字报快报，有待调查。(中间有些问题，总理没有解答)

(五)至(七)……

(八)中央为什么要把学生调回学校整训？为什么“红代会”召开以后，中央又急于要召开工代会、农代会和中学生红代会，还要成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这与当前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和三、四月份的大决战有什么联系？学生军训，中央把学生调回学校，中央有通知，何必问哪？上次有的学校，要求先念同志派军队支持军训，因为主席批了北大、清华试点，还有北航、矿院、地质学院，还有中学生。(群众：有两个中学：二中，延安中学。)试点经验主席已经批了，训练以后情况就不同了。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不仅大专院校要训练，中学也要搞，小学高年级、工矿企业、机关也可以办。但是不能同时办，因为解放军目前任务很重，要搞军管、军训还要支援工农业生产，支援左派工作，相当忙，解放军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三八作风，四个第

一，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可能在文化上不如你们大家，院校的知识分子，但是政治上受过训练，三性是很强的，要向他们学习。毛主席、林副主席期待这种精神。工矿企业单位还没开始，我们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军训是一个好办法，但不是唯一的，还要有多种办法。希望大家不要轻视，军训并不妨碍整风和社会活动，就看时间，看你们怎么样安排。

(九)《红旗》第五期社论中为什么强调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当然不能半途而废。我讲了，今年三、四月看出眉目，明年三、四、五月看初步结果，也可能会更长一些时间，连批改都搞，各地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一样，明年三、四、五月才结果。是否今后就永保太平了，不能那么讲，那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进行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能永久是革命派的选举，还要搞革命委员会。临时的权力机构要变正式的权力机构，将来还要回到人民代表大会，机关现在搞监督机构，将来仍难免产生停制，如搞到明年，运动轰轰烈烈的，但总要有间隙，过了一年后思想上又有灰尘，又可能出问题，那就还要搞，形成好的制度。大民主的传统，不仅我国，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颜色，还要影响全世界。这样，对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有保障得多了。想到前途，去掉灰尘的事，应敢于作了。

(十)为什么全国财贸系统的群众迟迟发动不起来，运动阻力很大，这阻力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我回答不起来。我曾经提议过，让财经学院去作调查，在全国去建立联络站。财经学院“八·八”队派了许多同学到各地去了，到下月五号就到期了，我跟中央说了，要守信用。当然去到各地不是一样都欢迎，有的就不欢迎。有的同学到上海，跟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领导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闹对立，不知怎么搞的，我们已经派人去调查，(先念同志插话：财经学院派去上海的不是这样)噢！可能误会。三司出去的也有一些地方犯了错误，回来整风，不能说所有的事情都作对了，我告诉那些地方不要过多的责怪他们，有时我们说话还有失言的地方嘛！革命靠自己，解放靠自己，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一样，不要仅仅相信自己，派人去帮助是对的，说地方运动搞不起来，这种提法是不对的，不能那么说。运动发展不平衡嘛！各地有先有后。我们要相信那些地方一定会搞起来的。

(十一)制定财贸系统三个系统一起来，上下左右一起来的策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群众的罪魁祸首是谁？有些历史上的问题，我不很清楚，有些让先念同志回答，先念同志还要作检查的。

(十二)这个问题总理没解答。

(十三)关于陈云批判问题。对中央常委陈云同志的批判，这次文化大革命他没有参加，过去的，我所知道的，财贸上没批判，只是吴波同志写了一个材料。(问吴波：写了吗？)(吴回答：写了)(先念插话，姚依林也写了)，吴波只能写他所知道的，中央的他不知道。中央常委内部的问题，由中央决定，我不能回答，不能把中央常委内的事说出来，你们可以结合本单位领导进行批判。如财政部，商业部，银行，粮食部，供销总社等七个单位，不能所有的领导都接触，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拿出批判陈云材料，我不能回答。你们问阻力，我不好回答，陈云这个人思想是右的，这许多人可能知道，有的人去陈云家抄文件，不是财经学院的。(群众说：哲学科学部)当时我打电话都不灵，陈伯达同志就亲自出马，去保护中央文件，把文件拿到中南海了。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随便抄家，打、砸、抢、揪、抓是不允许的。关于这个，中央最近有指示，我们在文件上批判了。

(十四)为什么粮食部等单位在中央军委指示下达几天，烧毁黑材料？中央批转军委指示，十二点指示，两个文件批转以后，不许烧文件，如果再烧，你们揭发出来，告诉我，一定要在后期处理。我总的回答你们，对各部，财贸系统等批判，你们有权力批判嘛！批判一

些著作，中央不限制，批判后再定案。也可能批判文章就定性了，但有些不能强调别人接受，那些是一个人的意见，人家也可以驳斥，大民主嘛！大辩论，大鸣大放。

(十五)略……

(十六)(十七)(十八)没回答。

引到许多别的同志的谈话，我没听到，我不回答。

(十九)略……

(二十)为什么财贸各部的头头们竟敢步调一致，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攻倒算(指二月十七日以后)？财贸各部上次讲完以后，头头们竟敢步调一致，明目张胆地进行反攻倒算，我听到的并不都是一样吧！这个由各部造反派去作结论，你们对干部要排队，哪些不好，各单位造反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决，不要抽象地提问题。财贸系统联络站到底保留不保留，后来我提意见搞联络站是两个，一个财贸系统联络站，一个外事系统联络站，外事系统联络站已经撤销了(群众说，已经撤消了)。财贸系统联络站起了很大作用，历史任务是不是完成了，你们自己决定。外事系统的主动撤销了，财贸的，你们自己讨论一次。学生要回到学校斗批改，过问社会的事件要通过红代会，红代会也没有决定设联络站，他们出来也是暂时的。

你们提出了四点建议。(先念讲，一是撤销，二是不撤销，三是搞一些调查研究，四是办报。总理秘书说，他们要搞监督，监督无法监督了。总理秘书说，他们要变成工会，工会，总工会现在已经垮台了吗！)等一阵再说。至于联络站问题，我们进一步联系，不便回答。同学们可以回学校，是事实，中央决定的。各部是否留一些人，自己决定，如果一定要我回答，中央已有决定，按中央文件答复，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商学院同学问：李先念财贸八条(指牛鬼蛇神界限)是你定的，还是姚依林定的？(先念：是政治部的姚依林定的。)问：你看过没有？精神知道吗？(先念：已经收回了。没有必要问了。)

问：商业部党组恢复活动后(二月十八日)发的通知你知道吗？

先念：这个东西是错误的，我没有看过，放在桌子上没看，这是党组的错误，我已批评过党组。

问：姚依林表态。

姚依林：先念同志没看过，这个事情他知道。

工商管理局问：请总理明确，许涤新到底算统战部的还是工商管理局的？

总理：许涤新不在统战部吗？

工商局：运动中统战部搞的很厉害，他跑到了工商局。

总理：那你们工商局不成了防空洞了吗？许涤新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我看你们可以批一批。

工商局：我们人太少了。

总理：你们不说没事干吗？可批一批。财经学院不是说冷冷清清吗？可以去帮一帮忙。许涤新是我一个老朋友，很可以批判，这个人是老教条，是修正主义教条，研究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学，他的东西我有一大堆。他写一本给我一本，最近他们夫妻还给我写了一封信，我还没看呢。

工商局：他老婆包庇他(又问了一些关于许涤新历史上的问题)

总理：财经学院和前进报帮助他们批深。这个人是教条主义，但他比薛暮桥轻一点。薛暮桥的东西一看就使人发困，干巴巴的。许的文章我还喜欢看。你们写一本批判许涤新的书，我倒愿意看一看。

同学：先念保了许涤新，最近把业务权交给许涤新。

先念：没有，我让他们交给黄建南了。

同学：交给许涤新和黄建南，杨树根说那是传达先念的指示。

先念：我记不清了。

总理：一般地对干部批评，还是要抓文化革命的问题，问题比较简单。我再补充一个区别，第五个区别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如果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严重就追一下一小撮的历史是可以。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查出一批叛徒，这是小将们的功劳，这是很大的收获，我们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历史上犯了左倾、右倾的错误，这是一般的，也搞了一批叛徒，这是严重的。去年我在政治局会议说过，瞿秋白临死前写了《多余的话》，这是李秀成一样的东西，是叛徒的自白书。最近又发现他枪毙前给反动当局写了一封求饶信。他是个叛徒，对这些人应重新做评价。我也是受戚本禹同志的启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发现了李秀成的问题，年轻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笑声)刘少奇组织路线没按主席思想办事，是刘邓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在组织部搞了二十多年。陆定一是搞宣传的，他们在表面上搞得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不改是不行的。从此我们对叛徒问题就严格了。对干部问题，也许我讲的五个条件还不够，你们可以补充。叛徒要搞专案，反动学术权威要搞批判。有人说我矛头对下，我什么地方说的？

同学：总理说矛头对上。

总理：我记不清楚了。内外有别，我开始时同意了，主要怕大字报上街被外国人看见。就这样他们报告送去，我压了几天，后来，外办催几次我才批，那是五、六月份，后来，很快就改了，现在我看有些还要内外有别，但不能妨碍群众运动。

商学院：商业部党组恢复活动以后，就到处追查政治责任，我们对姚依林很有意见。

总理：姚依林我倒是有点意见。你们有什么错误？就是那个通缉令不好，当面谈谈算了。

同学：我们要炮轰姚依林，到商业部去闹一闹。

总理：我同意炮轰。

同学：我们要炮轰炮打。

总理：(笑着说)：炮轰炮打是一回事嘛！到商业部去闹一闹也好，但要一分为二，业务时间不能闹，不要影响业务，一星期留两三天闹一下可以，业务时间外搞文化大革命。

粮科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是什么性质？

总理：这是学院式的问题，这些问题斗争中自己会解决。

李尚平：(商业部造反派，司长)总理在二月十七日讲话对我们的批评完全正确，给我们指出了方向，但先念同志在会上说了一些气话。你是国家副总理，应该对革命负责，不该对革命说气话，你讲了气话，我们造反派回去后，受了很大压力，希望先念同志今后不要对革命说气话。

总理：这个意见很好嘛！

先念：我已经道歉。

同学：我向总理转达一个问题。医大“红旗”希望总理接见他们。李先念在卫生部三月十日讲话稿是否送总理看了？

总理：看了。我那天托先念同志办一件事，卫生部的会开的方向不对头，经过调查确有其实，但我不愿意出面，就交给先念同志去办。我也知道先念同志有个财贸口子就够受了，这件事本来准备交给谢富治同志去办，因为他抓北京市工作很忙，还想找汪东兴同志去，汪东兴同志说卫生系统有部长，党委书记，我去不太好，只好找先念同志去，外边的大字报写我是对的，先念同志是错的。我看了很难过，我要分担责任。我讲的话你没有听见，你怎么知道我是对的，先念是错的呢？这不是挑拨吗？不能这样写嘛！先念同志有记录，我看了，基本上是好的，我准备还看一遍，他是基本上传达了我们几个人所研究的，中央是知道的，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也谈过，他们方向是不对的。我一看到这些大字报就很不安，这件事在这个会上提出来了，我说一下就算了，不要外传，一传就走调了。我准备接见回答他们。

同学：在这次中央会议上，……

总理：你这个问题超过你们会议的范围。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我能回答的一定回答，不能讲的就不讲。

问：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可否翻印？

总理：中央已经印刷出来的可以翻印，如伯达同志的讲话，林彪同志去年五月在政治局会上的讲话，发下来没有？（群众：没有）发到基层了，正式文本可以翻印，非正式文本不要翻印。过去北京市有好几千个联络站，整天向外地打电话，有的起了一点作用，有的就起了坏作用。现在传出去主席诗词很多，就不是主席写的嘛！（问：《前进报》是否可以复刊？）

总理：你们提出复刊的理由送先念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讨论。现在外边印小报，哪来的纸？二分钱一张，好多是道林纸，用那么好的道林纸印群丑图，这是丑化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嘛！当然这些东西是坏的，但也不应这么搞嘛！这要追究一下责任。

同学：我们炮轰李先念的大标语是否可以上街？

总理有点生气：我不能回答，你们叫我怎么回答呢？你如果非要问我，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但我们不能限制你们，现在大民主嘛！现在街上的许多大标语，不都是我同意的。他是我的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你们的问题我不能回答，我是中央常委嘛！你们提问题经常使我为难，你们要考虑我所处的地位。我们已经半年多了，得有个起码的信任。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你们要揪刘少奇出来斗，当时也不是我一个人保，我对他有什么好感？你们要考虑我的地位嘛！

同学：时间不早了。

总理笑了笑说：我看还有什么帐没还，今后贴我的大字报，正面反面我都不主张，一贴又好象我有什么问题似的，能够回答的我都回答，不能回答的我不回答。财贸口要召开大会，李先念同志做检讨，我要参加，早就答应了。我不去就不应该嘛！今后一些小事，就不要找我了。

（同学们强烈要求让总理休息，在掌声中总理、李副总理离开会场。）

618. 谢富治在工代会准备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21日)

今天大家的意见很好，同志们谁谈我都爱听，过去听大家意见太少，今天多听一点情况，我是小学生，是向你们学习的。

通过今天的会证明首都革命造反派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学习了很多毛主席著作，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毛主席说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从一月、二月、三月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按毛主席思想办事，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这个斗争已经进入了非常尖锐、非常激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保权，就要进行反夺权，假夺权。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所以从工厂、学校、机关，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看到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坚决站到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司令部的参谋部中央文革一边，向顽固执行刘邓路线的反革命逆流猛烈开火，他们在哪个地方，哪个单位要实行反扑，就要用毛主席的文件给予坚决地回击。

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我们革命造反派不要麻痹，内部事不要争论，要联合起来。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坚决同那些资本主义，刘邓路线坚决斗争。在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党的话，最听中央文革的话，进行开门整风。但决不允许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此机会进行反攻，不准向革命派回击，不准抓住十

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进行新反扑，不准用伟大领袖提出“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和正确对待“三结合”问题进行反攻倒算。有些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没有很好实行“三结合”大联合，因为那时还没有经验，党中央还没提出来嘛！决不能否认他们的大方向，攻击是不应当的。没结合的还要搞结合，没联合的还要搞联合，但不准……，要加强团结，有缺点没整风是两码事，改正就好。但你们借机会反攻是不行的。但他们成不了大事。有毛主席正确领导，有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能够团结起来。工厂里要团结革命左派力量，要改正错误，但不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地富反坏右、保守派反攻，要他们老老实实。没有“三结合”大联合，就难进行斗批改。注意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指导进行斗争。当前夺权和反夺权斗争，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生产任务也重，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只要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一定是最关心生产的。革命是激烈的，但我也要搞好生产，搞不好生产，也会影响革命。北京一、二月份生产不好，上海比我们好，夺权早些，北京革命派要严格搞好生产，赶快扭转局势，扭转生产不好的局面，扭转缺勤的局面，使他们关心生产。今天有一百多个工厂参加，都是很重要的工厂，首先要搞好革命，促好生产，到三、四月份要扭转生产局面，同时要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运动前一阶段影响一点是可以的，长期下去就不行，只要是革命派，就要搞好生产，京西矿务局是比较关键的，特别是交通运输，交通堵了，影响国际名声。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革命，要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要关心生产，但革命造反派，特别是领导人，你们关心不关心生产，是个考验，希望你们革命造反派领导人，努力学习，经常讨论形势和生产，千方百计把你厂的革命和生产搞好，如果搞不好，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找岔子，说我们离开生产，说我们不行，甚至说我们破坏生产，要击败他们，不要上右派破坏生产的当。“抓革命，促生产”，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山西的生产搞得很好，应当向他们学习，革命搞得好，往往是生产搞得好。

工人大联合的问题：工人大联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要革命的大联合，是左派的大联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是革命派本身的要求，也是生产的要求，只要搞好大联合，才能使革命派更加有基础，更深入，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落实，落实要落实在小组、工段、车间里面，才不至于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空子，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进行反夺权，但通过革命造反派的斗争，以革命造反派为核心，争取中间派，瓦解保守派，而进行革命的大联合，要吸取其他地方的经验，要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就要团结多数，不能把革命造反派联合到保守派里面去，把造反派搞掉了是不行的，他们要想把造反派“吃”掉了，我们是不答应的。

“三结合”要逐渐形成，要有条件的，(1)工人是基础，要搞革命派大联合，没有这个基础，你结合张三，他结合李四，他就要揪张三，你要揪李四，结果他倒骄傲起来了。否则是没条件的联合。革命的大联合，是革命的三结合最重要的条件之一。(2)革命的干部，没检查的检查，没检讨的检讨，应该批判就接受批判，最后要群众通过。但必须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有错误改正了，群众通过了，所以有早有晚，干部是第二条件，条件是人创造的，有的条件还不成熟，先搞过渡性的生产班子，这是对他们的试验和考验，先搞生产，有革命的干部，成立一个生产班子，这不叫三结合。有些厂军管了，有军事代表，是来搞“三结合”的，来促进革命的三结合的，促进大联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哺育和缔造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解放军是可靠的团结力量，对解放军要积极、热烈拥护，坚决支持，解放军是帮助我们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革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支持革命左派的。工厂有的反映，解放军有缺点有错误，但整个解放军是好的。全国学解放军这个口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现在还没有改嘛，有解放军支持，但是北京 1700 多厂不能都派，绝大部分没派，没有那么多解放军，还得靠自己。今天主要是协商问题，有

些困难，明天开会有一万多人，有 1700 多个工业基层单位，200 多个单位，使每个厂都派代表参加，这本身有困难，不了解情况，有的机构都不行了，有的厂，党、政、工、生产的权都夺了，怎么办呢？代表会议总以左派代表为主，少数中间派，因中间派在生产中起很大作用，不要右派。2000 多个单位互不了解，没办法找红代会左派帮忙是一条线，还有一条线是解放军，解放军宣传队，军代表，还有一条……是原来革命组织的了解情况，包括“四清”工作队造反队。另外主要靠中央文革对工厂平时的了解，还靠原来的造反派了解各方面都谈一起，有些作法有问题，里面你打我，我打你，有些地方是工人，有些地方不会是工人。我们希望到会的都是革命造反派，少数中间派，右派不要。估计大多数会做到，少数办不到的，那什么时候才能都办到，你再延期五天、十天还有困难，主要是领导成员、就是 47 个单位，以后还可以多，多数厂办到了就行了，少数办不到再改，就是 47 个委员 22 个常委，6 个核心是否都是真正的造反派，主要大会还看主流，看大会文件，比如决议、呼吁书致敬电是否代表革命造反派，是代表革命造反派的就行了。

大专红代会大会召开了，起了很好的作用。贫下中农的农代会召开了，也起很好的作用。工人呢？全国看北京，你们各总部不撤销，成立一个总的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开好这次会而努力，要开好这次会，还要大办宣传，开好这次会就是支持了全国的造反派。中央很重视这次大会，这次会议主席叫开的，每人都要为开好这次大会贡献力量。发票有点问题，以后再改嘛！我们也很困难，大家要一致努力，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好好的开。

我也是最听毛主席的话，革命造反派的领导人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话，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工人、好战士。北京市 100 万工人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起带头作用。

要搞好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恢复生产秩序，造反派负责人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林副主席的话，搞好革命的新秩序，内部不要吵闹，甚至不准打架，不许武斗，要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向顽固执行刘邓路线，没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斗争。当前一股反攻倒算斗争，我们一定要用抓革命促生产来反击他们，把 100 万工人团结起来，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同一小撮顽固的执行刘邓路线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一定要开好明天的会，中央和中央文革都非常关心，前几次开会中央都出席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明天会开不好，就给造反派丢脸，今天主要是向在座的同志学习，有一个要求：不要大字报，你不管讲不讲，他们都写。

……我个人毛主席思想水平不高，但我坚决热爱毛主席，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林副主席一边，站在中央文革一边。

天津贴我的大字报，说我讲的“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搞不好”，我这个人水平不高，但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我没准备，没写成提纲，讲的不那么好，要求同志千万不要贴大字报。

619. 萧华作政治工作报告 (1967 年 3 月 21 日 人民大会堂)

李曼村、谢镗忠、徐立清、袁子钦到场，总政直属单位参加。

一、加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 广泛地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辉煌战果和深远意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防止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我党永不变色的伟大政治运动，是触及人们的灵魂，破四旧，立四新的思想大革命。一句话，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改造人的运动。

我们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所以这对我们的军队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必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保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领导，敌人复辟必然要注意到军队，我们必须更加革命化，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最好的军队建设，是最好的战备工作。

中央、省委一级揪出了 60 多个，南京揪出了副政委是个叛变自首分子。我们就是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挖出隐藏很深的牛鬼蛇神，主席八次接见了 1200 万群众，领袖和群众打成一片。

红卫兵的功勋不能抹煞的。千百万的青少年有可能培养成接班人。这次运动比过去的历次革命都来得更加深刻及更加汹涌澎湃。(列举许多事例)越往后就越会看到他们的成果和深远影响。另外世界人民和世界上的敌人也都有反映。人民都说好得很，敌人都说糟得很。

我们要向社会广泛的接触，抓活思想，用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立场要站稳，不要只看支流，表面现象，要看到主流和本质。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要只看到眼前，不看到长远。

2. 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深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

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写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揭开了党中央阶级斗争的盖子。去年是刘邓的总暴露，其实从 57 年以后就开始了。从党内党外向我们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毛主席说：“我们也要全面的反击他们，我们就运用大民主的方法，我们要抓住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对刘邓的问题毛主席早就警告过我们，第一次在 62 年(或 64 年)说过：“北京，中央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我们不理解，觉得把彭真挖出来就差不多了。毛主席就是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把党内的定时炸弹挖出来啦！在十一中全会上，揭开了刘邓的盖子。在许多重要历史关头，危险局面，都是毛主席亲临指挥，转危为安(举了历史上的例子)。与陈独秀斗争，第一个就是毛主席，井冈山第一面红旗是毛主席打的。当时有不少人是悲观的；在建军问题上第一个提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的是毛主席，古田会议决议就是纠正各种错误建军思想；1935~1936 年党内产生了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彭德怀是最坚决执行的一个(举了一个例子，彭德怀攻打长沙)。毛主席第一个反对了打大城市，撤回到江西根据地，毛主席成功地领导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以后王明路线剥夺了他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派他到长冈乡去调查；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使 6 个根据地只剩下来一个，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了二万五千人。毛主席在长征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与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的历史的转折点，挽救了我党我军，就是因为确立了毛主席，毛主席路线的领导。长征途中又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分裂主义、逃跑主义作斗争，再一次挽救了我党我军，完成了北上抗日的任务。到陕北后又与彭德怀作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大围攻。毛主席是主张打出去，到陕西去补充红军，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全国就是这样唯一的一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毛主席在革命紧急关头，都是最沉着、最坚定、最勇敢、最正确。(举了一个例子，渡大渡河时，亲自在第一线指挥。)长征时的胜利，把根据地的扩大奠定了抗日的胜利。抗日中又战胜了第二次王明投降主义路线，使得我们军队发展到 80 万，发展了大片敌后根据地。延安的整风运动，彻底地肃清了王明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贯彻了主席的路线，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在敌人进攻延安，全国望延安，主席也最坚定、最勇敢，亲临指挥，而刘少奇跑了。主席这么做，对当时各根据地影响很大。建国以后，四次路线斗争。和高饶的，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彭、陆、罗、杨和刘邓的斗争。

抗美援朝问题。那时我们的部队打到西藏、海南岛，没有休息。刚解放，全国还不稳定。有些人是主张不出兵的。毛主席经过对国际形势的英明分析，做出了果断的决定，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国际主义贡献。在战争中是毛主席指挥部署的，没有彭德怀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是毛主席亲自指挥反击的，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取得

完全胜利。

自力更生问题。苏联专家撤走，从反面帮了我们的忙，他们是有功，我们要给他们一枚勋章，一吨铁。我们修了好多铁路，长江大桥不上一座，原子弹爆炸，新式武器，好多工厂。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在革命紧急关头，危险局面，亲临指挥，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是活着的列宁，活着的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是世界革命，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

今天对主席路线的态度是鉴别真革命或反革命的试金石。

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典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重要关头，总是最坚定地站在主席一边。从井冈山起，林就站在主席一边。在东北反对了彭真路线。彭真路线实际上是刘少奇路线。东北的解放对全国的解放有决定性的意义。解放以后几次斗争中有杰出的贡献。尤其在传播毛主席思想方面，不仅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是有贡献的。在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提出了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现在已找不到了，正在找)，62年在人大会堂7000人会议上的讲话。说明林副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理解分析水平最高。特别是对政治思想工作讲话，起了极为重大的指导作用。还有一些没有公布的内部讲话，以后要印发全党全国。林经过几十年的考验，证明是毛主席亲自培养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中央已确立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反对毛主席的人必定要反对林彪同志。在文化革命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恶毒地攻击林彪同志，这说明敌人恨他又怕他。我们军队同志不要上当，要警惕。我们要用毛主席路线、林副主席的榜样来教育全军同志，又要用反面教材来教育。

就是要揭发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他们的错误是长期的，一贯的。尤其要结合文化革命的实践来批判。要剥开刘邓的画皮。比如说：刘邓是不是一贯正确的，刘邓是不是反修英雄，《修养》是不是好书。刘少奇二十多年来一直是反毛主席的。抗日战争快结束时，主席敢于胜利，然后走社会主义道路。刘不敢胜利，而且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47年土地会议典型的形“左”实行。49年天津王光美家的谈话，讲不是剥削多了，而是剥削少了，你们剥削，他们还是愿意的。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少了。50年在××地他说，中国不是发展社会主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素质。在东北提出单干。毛主席在根据地提出互助组，他反对。51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合作化是错误的。每户三马一驴以后才能搞互助组。59年大提阶级熄灭论，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64年提出毛主席调查研究过时了。他提出不是按照他的蹲点(即王光美蹲点)去做，就不能当中央委员。通过蹲点问题来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通过蹲点问题否定调查研究。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就是他提出的。他提出我们十七年来整个是漆黑一片，毛主席早就提出蹲点问题，是阶级分析，两条路线的蹲点，也就是进行调查研究。刘少奇也提出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二十三条开始的那一条是毛主席批评刘少奇的。62年在人大会堂7000人会上的讲话，刘的和林彪的截然不同。

邓小平一贯犯错误。在红七军他是政委，打仗是他领的，在危急关头一个人开小差，丢下一封给警卫员的信，跑到上海去了，说是调查一个反革命事件。后来政治学院莫文华他自己打印了十几封材料，罗瑞卿告发了，邓把莫打成反党分子，他怎么反党呢(十一中全会上平反了)。邓小平长征时是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后来是政治部副主任，在延安还不是中央委员，这个人爬的很快。从来没有在第一线。实际上有两个司令部，有两个统帅，副统帅。刘少奇说中央没有斯大林，有两个主席，庐山会议，军委扩大会议，邓没有揭发彭德怀，包庇彭德怀。在反彭罗陆杨时，在上海小组会上，我和他在一个小组，别人都发言，就是他不发言。十一中全会后才清楚，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学习毛著不要形式化、庸俗化，就是他的话。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印了1000多万份，军队用了以后，然后送到地方上，那时候发语录是走私的。林彪同志提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关于64年喊两个主席万岁的事，有人加在我头上，是造谣，可耻。那时我在医院休养，这种人没有共产党员起码的道德。批判吴晗

时，邓小平的警卫员曾反映过，全党都在批判吴晗，而总书记把他请来打桥牌。可是立场到哪儿去了。另外，战功问题，战功是谁的，谁的战役是主席亲自指挥的，每一步署都是主席亲自打电报去的。可是他自己夸大，加在自己头上。是不是反修的英雄？在国际斗争中的发言稿都是中央、主席拟了稿，发出去的，他们念了一下。揭露这些画皮，《修养》这本书，不仅害了中国人，而且也害了外国人。毛主席说“是欺人之谈。”这本书蒋介石也可以拿去用，敌人也很易接受。刘少奇谈的是超阶级的个人修养，是抽象的烙印。以后要写专门文章来批判。我们军队在军内组织专门文章来批判，把他影响彻底肃清。思想意识修养这是刘少奇的，本身都不通。主席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208页有一段话：“刘少奇同志讲过……大笑”，这段话把它删掉。

揭开他们的画皮。在军内要进一步批判走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军事路线，这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事上的反映。又讲了批判刘志坚主要开小会，能触及灵魂，然后开大会。

两条路线斗争并没有结束，要提高警惕。

3. 大学毛泽东思想，把学习毛著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关键要解决两个问题：

(1)端正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阶级感情，带着阶级感情学，就能记得牢，用得好，学得好。要带着阶级观点学。

(2)狠学老三篇，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改造每一个人的世界观的革命。根本是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是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头脑里也有阶级斗争。造反也要造自己的反，关键在三个字“亮、斗、改”。凡亮私字不怕丑，凡斗私字不怕痛。

部队学毛著的经验：

(1)进行工作、执行任务，开会都要学毛著，作为指导思想，统一思想。

(2)在平常学习教育中要用毛著为基本教材。

(3)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现在是战士好于连长，连长好于团长，越往上学得越差。林总学得是最好的。

(4)军以上单位要办。

(5)天天读。读书为了改造思想，搞好工作。不能读语录打架。

(6)抓住某一个重点，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地学(举了艺术学院为例)。“星火燎原”大方向是好的，最近冲了军区，犯了错误，是个犯方向问题。他们正在整风，给我写了一封信来，很有自我批评精神，整风提得很好，文艺团体可以上他们那学习。

(7)学习毛著交流会(组织)效果很好。(即组织讲用会。)

(8)按照当前工作重点、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办主席语录版。

(9)对文化低的同志，边学文化，进行辅导。

(10)培养积极分子和学毛著的先进单位。下半年要召开全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1)通过报刊、文艺宣传毛泽东思想，要用领袖一生伟大实践来教育大家，回忆录还写得不够。

二、当好工作队，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

三、继续抓好四好运动，继续抓好活思想。

搞好思想革命是搞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今年的关键是抓好活思想。不搞好会出乱子，大力宣传好人好事，改进教育方法，狠抓基层建设、连队工作。

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贯彻干部的三个标准。

去东北夺权，揪出了后台，是北京军区。有人说我去东北定调子，制造白色恐怖，这怎么可能呢？在斗争中提高阶级斗争知识，反复是有好处的。牛鬼蛇神暴露了，正是阶级斗争的残酷、尖锐性。总的来看，干部队伍基本上是好的、纯洁的。老干部(长征的只有五千人。)抗日时期只有两万人。整个干部队伍出现一个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有的革命胜利后蜕化变质，要清理混进来的一小撮，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干部要紧跟毛主席，紧跟革命形势，

不能吃老本，我们就是吃了吃老本的亏。

谈了陈士渠的儿子是“联动”的，到东海舰队贴反动标语，回来后陈亲自把儿子送到公安局，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打了个报告，主席、林副主席评价很高。“联动”的各单位组织出来了。董老对孙子的态度是鲜明的。要做到机关革命化，组织上更加革命化，的确有一小撮坏分子，把他们孤立起来。同时要精简机构。军队院校冲击军事机关是因为个别教员不纯。通过文化革命加强组织革命化。批判刘志坚，用大字报，面对面，触灵魂，再搞一次大会就差不多了。谢、李、袁等同志他们正在考虑向大家作检查交待，改造世界观嘛！

李是宣传部的，谢是文化部的，文艺团体派代表。

620. 周恩来接见邮电部、交通部、铁道部代表的座谈记要 (1967年3月22日 中南海会议室)

整理者按：周总理接见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群众组织代表，共有六十多人，李富春、

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各部的党委，除停职反省以外的都参加了，开

始时各部汇报了情况，总理在各部谈情况时讲：

一、关于广播车，现在有很多广播车，不去搞积压物资，而去搞广播车，总理建议我们写一个倡议，以后不要用广播车了，宣传我们可以步行。(当同学问到：专门进行广播的车是否可以用来广播？)总理说：我还是建议你们取消的好，整天围着中南海跑，我想仔细听一下，也听不清楚。

二、铁道部感到吕正操、武竞天这样的人不老实。周总理：你们掌握了政权以后，也要掌握一些这些人的材料，提高自己的斗争方法。

三、黑材料问题，黑材料在一些单位两派相争，如果有这种情况就应该封存起来，不应该有一派直接去管起来，另一派去抢，这样不好。

最后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如下：

总理：这次请大家来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经过路线斗争，夺权斗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特别是铁道部接夺早，院校起了推动作用，都有很大成绩。不管邮电、交通都是学校革命小将先搞起来的。机关起来比较晚，这是有其他原因的。红卫兵串连都是学校掀起来的，一下子冲到全国、机关。以后是外地工人来串连。徒步串连头一个就是大连海运学院征红卫队，我们接见了，怎么讲我们不重视呢？还登了报发了社论！孙大光把这个加在中央文革的头上是反动的。(问先念同志孙的女儿抓起来了吗？先念同志答：已经抓起来了。)这是受老子的影响。

邮电部起来较晚，北京邮电学院进去也较晚，刚才北邮也作了自我批评。铁道部也是学生先进去的，起了好作用，应该肯定外单位的帮助作用，外单位对铁道、交通、邮电都是有功的，这点应该肯定。铁道部比较复杂，尽管有争吵，也有缺点，主要成绩应该肯定。

第一阶段，机关落后于学校，甚至还不如工厂，他们高高在上，首先遇到了刘、邓反动路线，是路线斗争思想革命阶段。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个单位压得厉害，那里受压过重，那里造反就快。如北航“红旗”28天锻炼出来了，地质“东方红”受压迫、清华“井冈山”刘、王、叶搞典型，压力大，起来得快，推动力量就大。学校也有快有慢，急风暴雨的起来快，温风细雨的就慢一点，机关也是这样。铁道部压力大，起来得也快一些，邮电部缓一些，交通部是中间。

现在进入了夺权阶段。十月一日林副统帅号召批判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就分出了谁是造反派。九月份三个司令部一起成立，十月后阵线就清楚了。当时三司人少，后来一

个月发展起来了，是个造反派，三司走在前面，是左派。十月六日三司誓师大会我们支持了，二司北航“红旗”造了反，一司也分化了，再加中央文革和我们都起来支持，路线斗争的结局必须引导到夺权斗争。第二阶段是第一阶级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第一阶段的开始，那么上海夺权公告是第二阶段的开始。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学生是突击队，夺权是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的，工人阶级起来了，十月十日有十万人，从安亭事件到一月革命就发展到一百万人，十一个团体发表了声明，三十二个团体发出了反对经济主义的呼吁，毛主席抓住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夺权斗争席卷全国。这样就考验我们造反派能否担负起这个任务，能否成为夺权的核心力量。首先号召大联合，不要单独夺权，单独夺权不好，把其他革命造反派排斥在外就不对了，工人中有这问题，学生中也有，学生年青，缺乏经验和劳动锻炼，所以学生必须和工农结合，单是学生在夺权斗争中容易形成派别。为什么一月末二月初强调政治军事训练，讲组织纪律性？去年十一月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就指出：军训会使运动更快发展。林彪同志提出有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革命性更重要，革命没有敢闯敢干，怎么冲得开？青年学生敢想敢干。但只有革命性不够，还要讲政策，夺权时还要有科学性。去年发了《十六条》、工农业的十条、军委平反的通知、中央的补充规定五个主要文件，当时讲话多，主要是林彪同志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特别是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林彪同志的讲话，都是政策性的。今年夺权斗争，中央发的文件就更多了，总共二十件以上。社会都是配合着的，去年《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和今年的三、四、五期，都是配合政策的，都是夺权斗争中必须的。现在还有些东西没有搞出来，根据事实的发展写出的文件不是主观主义的空想。夺权斗争中的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更要加强。掌握了政权，要监督业务，就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所以首先要学古田会议的决议，调查研究的文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老三篇。

进入夺权斗争，又出现了新情况，大家问我怎么理解这个逆流？四、五期社论加在一起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革命的三结合，这是地方创造出来的，干部亮相彻底批判路线错误。林彪同志说：“一个人既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动力，又要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干部挺身而出，出来亮相，贵州树立了这个典型，主要是靠革命群众带动，解放军支持，亮相的干部出来结合，三个缺一不可，有了革命的三结合是攻不垮的。初期光有群众代表，力量不集中，没有经验，容易发生派别斗争，夺了权也难掌权，所以要解放军支持，解放军力量集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元月三个文件都是支持左派的，这样就有基础。如无领导干部，就没有经验，因为军队对业务不了解，工人阶级是主力，解放军是支柱，革命干部有经验，这样三结合可成为核心力量，是可靠的。广大群众要搞好三结合，就要正确对待干部，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不是小将提出来的，是刘邓路线提的。蒋南翔是追随彭真的，叶林带了五百人的工作组，让支部书记、十七级以上的通通靠边站了，罚他们劳动。一些学校也是如此。主席写出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传出去了，红卫兵不清楚，未加区别，把司令部都打了一番，特别是工交部门，把部局长都轰了一下，一切“长”字号都靠边站，这样就使造反派受了这个影响，怕干部沾上了就右、保，因此《红旗》四期社论就提出对干部一分为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少数一小撮，有的单位还没有，夺权也要一分为二。所以加一个“需要夺权的单位”。各级领导要出来亮相，检讨批判才能看清楚。随后又出现了肯定一切，没有一小撮，这不对了。有的人甚至在十一中全会后，还组织自己的赤卫队、红卫军等，还镇压学生，这就错上加错了。如安徽合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流血事件的反动路线更凶了，这说明还存在着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红旗》四、五期社论是有针对性的，四期社论是对革命群众组织说的，不要打倒一切，不要犯形“左”实右的错误。五期社论是讲的干部亮相要一分为二，也不能肯定一切，把原来的领导原封不动都保护起来，那就是右的，就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群众容易犯形“左”实右的错误，干部容易犯右的错误。但不等于群众组织没有犯右的、干部没有犯形“左”实右的。

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上海夺权广播到现在有七十多天了。一月十七、十八日在人民大

会堂开了两天会，有学生和机关造反派，说了这个新生事物，号召大家参加夺权斗争，这个斗争没有经验，是不是每个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看当时看出不是每个部都要夺，但连锁反应必然发生，那时候有人说是否普遍接管了，不是的。群众的积极因素，我们不能阻止，堵不住，而应因势利导，所以十八日说过要因势利导，即使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群众要夺，也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权夺过来，对业务实行监督。这是明确了的。

机关三结合怎么办，黑龙江、山西经验出来后曾研究过，一种是以群众为基础，结合中层干部和领导干部，但必需在领导干部亮相以后。另一种是派部队来，和地方一样。二月中旬我们曾经想把内部的三结合搞起来，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但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象样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地方夺权中央承认的也只有五个地方，北京、天津也快成熟了，但还是少数，全国二十八个省市只占四分之一。时间已过两个多月了，机关夺权也经过一些曲折。在财贸口有人问我三、四月是个决战。主席讲，今年二、三、四月夺权可以看出一些眉目来，明年二、三、四月份或更多一点时间可以看出结果来。基本意思是这样。夺权是两个阶级的决战，两条道路斗争的决战。现在看来四月不行了，得五月。机关除中央外，还有省、市，地方还有专区，县、社，农村只能在农闲时间进行。机关、企事业、学校、农村，要统统搞出个结果要到明年，这是对形势的估计。

机关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还没有条件，三个部都不成熟，铁、交、邮刚由部外转入部内，铁道部三十三个组织观点不一致，两大派还要谈判协商。交通部也有两派，还有其他，邮电部也有对立面。革命派大联合都没有搞好，三结合问题还没有亮相，我们不责备那一位。运动是波浪式前进，不可能直线上升。中国的立三路线是一直高涨，一九二八年李立三去莫斯科，斯大林画了一个波浪式，主席 1928 年在井冈山也是讲波浪式。运动总要有起伏，现在稍有不热闹，就说冷冷清清，这说法不对，在毛主席领导下有什么冷冷清清呢？现在街上平静了些，不能象去年红卫兵来北京串连那样搞法。今年春暖后的大串连取消了，铁道部可以不用准备了，外地串连的也得回来了。看来总有正反面的经验吧！既然在初期起了作用，应采取欢送的态度，不要情绪不对头，应当谢谢人家，人家帮助你们了！这样才对头。运动要有起伏，也不是风平浪静的，首先学习主席著作，一般整风十五天到二十天，还少了一些，最好是整风军训在一起。天天贴标语也太简单化了，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斗争水平，开门整风是最好的办法。邮电部两派争论那么厉害，你们都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你们互相攻击，在中央开会对骂起来，那还行！还是个党员呢！那还行！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我忍不住了，要批评你们。应当有自我批评精神，依靠群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夺权斗争中第一个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这是一次真正彻底地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主要武装斗争，搞了二十八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打天下，工农联盟取得了全国解放，我们由上而下的接管了，那时也叫军事接管，除了大头头跑到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盘接管下来了。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后，接收的人员就包含有国民党、三青团员等，办“革大”有很多旧人员进来了。把国民党政府机关打碎了，成立了国务院，那一套办法有不少是受影响的。至于企、事业包下来就更多了，学校更是原封不动的接过来了，北大就是，清华只去了头头，其他人还在。军队大学也是接过来的，如上海军医二大等。铁、交、邮也是包了下来，你们船上更多，把国民党的，封建的都接受下来了。好处是城市没有受到破坏，不好的方面也带来副作用，和平解放，许多都包下来了。土改也是一样，和平土改较多，地主、富农卖了地，把土地转给了长工，摇身就变了。

解放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夺权斗争，如清匪反霸，城市的三反五反，五七年的反右，六二年的批判右倾。主席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已十多年了，解放初就提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但六二年已相隔十三年了，还出现了国际上的“三和一少”，国内的“三自一包”。因此十中全会主席又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六二年开始四清，这一系列都是夺权斗争，这一切夺权的特点都是自上而下的，就不彻底，温床还在，过了一阵又生长了，下台的人以

后又钻进来了，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由下而上，不接触思想，革命就不彻底，主席总结了这些经验，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发现。有反面教员，苏联为什么出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些历史的教训没有很好总结，没有找内因，推之于外国。一切事物发展都是靠内因，毛主席就是抓住不放，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要充分的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95%，相信干部的95%，还有一个可靠的就是人民解放军，林副统帅就是经过北伐等四个战争锻炼出来的，是可信赖的。有这三个可以信赖的力量，因此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就敢于发动群众，搞群众运动。中国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光有南斯拉夫主义的经验还不够，苏联的教训使我们更加重视。

毛主席是从17年中摸到经验，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思想宝库里的东西。从去年五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在这以前有个准备阶段，四清、文艺批判、京剧改革等进而到文化大革命。首先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作了舆论准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上早和晚是偶然的。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学生运动总是先从北京开始的，这有着它的光荣革命传统，过去从康、梁改良运动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反饥饿都出自北京，学生就是先进，学生运动都带有必然性。这个地方是首都，修正主义反党集团在这里又压得太凶。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是先作了舆论准备的，然后就是思想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到夺权斗争，这是四九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这是和头脑的敌人斗。这次深刻得多广泛得多，由下而上，这是几亿人，世界上没有过的。所以这个斗争很复杂，几个月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只要大方向主流对了，一些错误缺点，不要过多的去责备革命组织。没有经验嘛，通过整风解决问题。大联合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完的。红代会开了，但不一定都解决了，还要作一系列的工作，中学联合的会还没有开，中学生落后了，要赶上来，学生回去要整风。到外地去串连，是北京中学先形成的，出现了一些逆流。如纠察队，开始起了好的作用，维持了秩序，以后就走偏了方向，走到了反面，最后打死人，乃至私设公堂。一批高干子弟有优越感，特殊化，对批判起反感，现在“联动”的思潮还存在，对其它城市也有影响，八一学校就是一个典型，多数学生是“联动”思想。造反派学生和老师办了一个展览，“联动”还有人去砸。这说明哪里工作没做到家哪里就有逆流。运动如此广泛，不会没有逆流，如大江大河存在逆流，海水也是如此，所以在运动中出现逆流并不奇怪。主流中也会出现缺点错误，这是支流，做为经验教训。犯点错误是可以教育自己，从反面得到教训。逆流就是相反的，反对以毛主席正确路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为资本主义复辟服务的，在夺权斗争中必然出现。经济主义不仅在上海有，全国都有，经济主义是去年十月底就有了，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不甘心下台，就要收买引诱一部分人保他的驾，各地都用拉拢、腐蚀的办法破坏生产，这是一种新反扑。

一个党证明是伟大的，就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毛主席的思想是从群众中来的，相信绝大多数干部。主席教导，一个革命家不可能一点缺点没有，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群众经验集中起来，不断提高，系统化，形成理论、纲领、方针、计划。所以主席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不是偶然的。不学毛著怎么革命？要把主席思想学到。任何一个年轻的组织，首先要自我批评，只要大方向一致就可以联合。

大方向是什么？首先是要以毛主席思想为基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具体点说，首先要接受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一切群众运动都是在主席思想领导下的运动，没有毛主席下这个决心，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运动。通过文件来领导的。第二，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按主席指示办事，十六条、两个十条（指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业十条、农业十条），好好学政策。一句话，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在这个基础上联合起来。当然大方向不仅指这些，还有两条道路斗争矛头指向谁？要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指向所有的干部，更不应指向群众，不能指向解放军，这是个方向性的问题。应该信赖解放军，矛头不能对准解放军。当然他们一些领导人可能犯错误，中央不

错，解放军组织纪律性强，一切行动听指挥，林彪同志一声命令下，都可以改嘛。这些都是大方向问题。

地方夺权也得中央批准，否则就成闹独立性了。中央机关，有些部门即使有一小撮也不能夺，也只能要求中央撤换。其它中央各部只能业务监督，三结合后监督业务。(按五机部稿三结合后才能实行全面领导)。革委会也得摸索经验，业务还得由上而下。企业事业单位，国防的不实行夺权，如果有问题应建议撤换，要加以具体分析。

再回到交通部门来说，交通系统大联合既然不成熟，观点有的激进，有的缓进，大方向相同，就应该求大同存小异，这是允许的，不要天天争吵不休，妨碍业务就不行了。铁道部三月份发生的事故就是这样多，齐齐哈尔铁路局派别很多，三月八日军管，十八日写来报告，总结事故多的原因：一、纪律涣散，不听指挥，×××人不上班，××台机车开不出去，调车、板道员随便不上班；二、派别多，一个局有二百多个组织(注：五机部稿为一个地区有两万多个组织)，经常争论，影响生产，昂昂溪车站就是……，三、有人强调破框框，随意破坏规章制度，应该作业的也不作，比如应该拧轧的也不拧了，上月把一列国际列车进错站，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碰撞，如果发生碰撞，国际影响有多大！苏修就是要找这个借口。这个不怪造反的，造反中的小缺点，这为什么不可能克服呢？争论不休，年轻人多些，不要头脑热。对敌对分子要那样，对内不要那样。四、领导干部怕字当头，都靠边站了，股长以上×××人都罢官，新上任的不懂业务，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

现在已经到二月二十二日了，还是做得不好，只有交通部还推选了于眉抓生产，其它的都没有。铁道部的业务监督小组的权限已经超过了，这样下去不利，因此，主席决定军管。说了这些画龙点睛，铁、交、邮三部实行军管，最后我宣布：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齐齐哈尔铁路局机务段三月十二日(注：按五机部的稿为三月十八日)的报告上批示说：

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接管，以便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一切秩序好的铁路局，也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吸取好的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需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是不对的。此事请你们研究。

经我们研究，铁路、交通、邮电要实行全面军管。主要物资设备、援外、国防、航空先军管。一月底，我的意见民航局归军队管。那样集中，但到真正实行军管时，有部分人拒绝不干，闹了几天，军事院校和工厂还是说服了，最初闹的人多，一天天闹的人就少了，闹了四五天没闹头了，最后不闹了。现在是三月份了，不能再耽搁了。原来二月份又等了一个月，刚才大家鼓掌，可能是不会有意见。总之不能再推迟，无论如何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先搞大的，邮政先搞省会、直辖市、大的港口，至于地方还可根据需要，实行军事管制。派军管小组或委员会，由谷牧同志负责。军管的目的是过渡的办法，还是要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大方向是一致的，要求大同存小异，不要争论不休，应该开门整风，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解决。通过军管会推动你们的联合，采取什么形式，可以因地制宜。司、局没有军代表可以搞两结合，有处、科级参加也行，监督业务，大的过问，具体可以不问。也可以实行全部的联合，两种形式都可以，不管怎么，都是要把政治水平提高，要破私立公，有的放矢，每个人都例外。

革命的“三结合”，关键在于对领导干部的一分为二，亮相过关。三月份要提出一个名单来，要一分为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一小撮，有五个区别：

第一，有没有一小撮，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不能说国务院每个部都有；

第二，调查研究后，如果没有，但有犯其它什么错误的，如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注：按五机部稿为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第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重还是轻，是多还是少，自己执行或没执行；

第四，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应当是上重下轻，矛头向上，部比局重；

第五，重点放在这次运动还是历史。重点应放在去年六月到现在这一段，至于历史问题，不能所有人都进行专案调查，只有重点调查历史，如吕正操、武竞天值得查一查。少数追一

追，不要人人过关，处科长以上的几百人，都审查那还得了。这样才能把业务马上抓起来，各级干部都能站出来。要求党组本身认真排一次队，文化大革命已经十个月了，双方不敢得罪，精神面貌还不能改变，还能算什么共产党员？下周交出名单，我以前谈过处理问题。

- 一、犯少量路线错误的留用；
- 二、经过检查亮相，过了关后，监督留用或停职留用；
- 三、准备撤职、降级或者调离工作岗位；
- 四、有否值得提升的，联合以后再谈，再看两个月，这不要忙。

这样就把业务系统恢复起来，但恢复不是复辟。不能通通都留或原封不动，不搞革命的三结合也是资本主义复辟。司局内可搞两结合，部内是搞文革委员会还是监督，希望在交通部门树立一个榜样。交通、邮电接见了一次太少了。财贸系统，我也和他们谈了，如果是搞原班人马不变，原秩序也不变，那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我的解释就是这样。反过来下面夺了权不给中央打个招呼那不行。财政部有个副部长就站在造反派一边来抵抗中央的命令，那也是极错误的，但允许改，毛主席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造反派更允许改嘛！

明天你们还是照常上班，原来的业务监督小组应当商量好负起责任来，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干到底。干部排队统统报到国务院来，请××同志分配一下，联络员要各部都联络一下，摸典型，长字号的都要排队。

总理最后问：大家还有什么事没有？

陈少友：总理，我想提一个问题，有人不承认革委会，提出来解散革委会，实行军管了，我们怎么办？

总理：你们要谦虚一些嘛！遇事要和他们商量商量。

叶汇：革命委员会，我们不承认。一开始，他们搞的所谓“革命生产委员会”，后来又改革革命委员会，他们根本就没有监督生产(总理插话：邢顺荣不是签字了吗？！)签了字，可他们根本没有监督生产，以后是不是重新组织？

总理：那就不用了，维持现状嘛！

叶汇：以后还是让他们去领导他们二百多人好啦，我们不承认。

总理这时生气地说：你非要逼我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今天我讲了这么多的话，你就不理解这个精神，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也没有，那怎么能行呢！我就有意见了，我就要发脾气了。

王振球：总理，我们斗争孙大光，已经写了两次报告给总理，要求(注：此注漏字似应停止或撤销)他在党内外一切职务，叫他老实检查交代。

总理：你们的报告，我都收到了，我正在研究。

铁道部有位同志问：外面大街上贴出了炮轰余秋里，打倒余秋里，炮轰谷牧的大标语，是怎么回事？请总理澄清。

总理说：群众写大字报嘛，我怎么好下命令叫群众不要写呢？

问：有人说余秋里是刘邓司令部的人，也有人说他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搞不清楚。

总理：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够带他到这里来开会吗？(注：按五机部和邮电学院“东方红”稿，不仅指余一人，是指富春、先念、秋里，谷牧同志四人。)(全场鼓掌)

621.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1967年3月21日—22日凌晨 政协礼堂)

地点：政协礼堂

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

王力：宣布一条，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讲。

陈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点多钟戒严了，11点左右……

萧：两点左右，楼有多高？

陈：有五层多高……有爆炸声不是手榴弹就是……我们也不敢看了，过了一会儿，××就都进来了。……我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讲：昨天你还和我辩论，“捍卫队”就打你。

戚：“捍卫队”打人？

陈：打，××也有人打人……

张惠英：我在报社，哪里都可以去。事后他们对我讲，这些死人都是从帐篷里拉出来的。

戚：你多大？爸爸干什么？（答：……）报社有没有枪？

张：没有。我有证件哪儿都可以去。

萧华：报社楼上有没有枪？

金莱：我在报社，楼上我都去过，没看见枪。

戚：二十三日你们谁在楼上？

王建义：我在。……没看见有枪。

戚：小桥死人最多？

陈存秀：我在小桥。……军区的喇叭先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

戚：军队的车宣布的？

陈：……有人叫我把头低下，我就听到前面有枪从北向南打。

萧华：谁先开的枪？

陈：军队由北向南打。

王力：步枪？机关枪？

陈：步枪。（萧、王、关看图）

关：第一枪喇叭没打坏？

陈：11点停止广播。他们叫我们11点停止广播，否则一切后果由“八·一八”负责。

王力：他们11点10分开枪，

陈：……有四五排手挽手……（萧分外注意、戚微笑、关吸烟安祥视萧）

关：四五排？工人、学生？

陈：工人们都手挽手站着。……（突然咽住不讲）

关：讲吧。

……（无声）

那些人怎么死的？

陈：……两点左右从宾馆打来两颗信号弹，两个教练弹，天空有炸开飞的纸机，听到的全是机枪声。

关：不是报社里先开的枪？

相喜：我们的同志在里面。

陈：工人们一排排的倒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我们被抓，下午四点“捍卫队”来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脸肿，剩下的人，我们学“语录”，唱想念毛主席……后把我们红卫兵放了……

于桂梅：……那天形势紧张，我们有精神准备，因为知道11点要采取行动。

萧华：那个宾馆住了队伍？

滨友：里面有机关枪、探照灯，可以打到小桥。

关：为什么能打到？

王力：那个地方高？

萧华：几挺机枪？

滨友：两挺吧，不详。

戚：有照片。(送上王力、萧同来看)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那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关：这是二十四日了！

于：我们刚一进厂，捍卫队就喊“站住”，我们没进，到兰州，想汇报中央。

萧华：(向小陈)你们那天广播了什么？

陈：《首都红卫兵报》“通令”。

萧华：没别的？

陈：没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萧看)

关：(问帐篷里的情况)(康才、伯达进厅，热烈鼓掌)(戚将麦克风头转向伯达，伯达又风趣地把麦克风头转向戚)

相喜：(重复 13 日汇报……康十分注意听)(伯达翻阅《青海日报》)

王：……我挨了一拳。

戚：谁打的？

王：不知道……我清醒过来以后，有四人背枪的×××……他们打我，给我一张纸，我写了个强烈抗议，他们上来个人打了我个耳光，打完了以后提出了我，这是 19 日。23 日就发生了事(重复十四日事)(李平安、孙祥梅入场)。在我们牢一个人受了伤，脸上挨了枪子儿，头被砸烂。我们的男、女同学都被绑起来。有的同学被打的厉害。我们听了第四期社论之后非常难过……给我们同学带上镣铐。每天给两张纸，一张写交代，一张写揭发……。放风的时间一天就五分钟，阴森森的。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现场也没回来。击倒了一个邮电管理局的同志，从腹部穿过。(康生、伯达一直注意听着)又击中刘凤池……有七十多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约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们没有看到“八·一八”有枪。他们讲“八·一八”有枪，又拿不出来。一个×××又讲没枪。三月一下午五点钟，他们把我们从监狱里押了出来，送到了党校，进行“整训学习”。(实际上，当时党校是一个监狱外的监狱，首都三司和外地红卫兵并没有获得解放)当我们四十四个刚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同学，被押到党校，强迫我们去礼堂开会，听“卫戍区司令部首长”报告，我们刚进会场，一个“卫戍区司令部首长”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说：“南滩监狱里来的”!! 当他听我们的口气不对时，他讲：你们不是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你们的同学和老师。你们是“集中审查”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借那里(指南滩监狱)的房子用。……(除康老外，众首长皆笑)我们大的二十二岁、三岁，最小的十五岁。(康老笑问张惠英多大？)

戚：他(指张)在报社，你谈谈吧？

张：……没想到我们是反革命。(众首长皆笑)我们听到是炮声，同学们讲是枪声。(众首长又笑)

萧华：你听过枪声吗？

张：连串的没听过。……三司的宣传车讲我们要坚守岗位。三司的念语录、演节目，许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们问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两点左右枪声特别密。我们都吓醒了，……刺刀对准了我们，叫我们举手，我们不举，他们讲你们这样顽固，用枪托打我们……他们念名字许仲仁……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们互相检举，我们都不说话，他们就让进来的“捍卫队”、“火车头”认本单位的人，认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头目，抓小头目，再抓广播员打……一个工人受了重伤，医院不给包，这个工人活活地打死了……跪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厕所他们不叫，我就跑，骂我小顽固，(康老冷笑)我出来以后，他们就打。……我带你院里参观，朝里院说：“好，你们“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烧死，脑袋都打掉。”这时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不叫别人看，只叫“捍卫队”看，对我讲：“你看这个小女孩，脑袋都被砸烂了……”他们说：“你们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们“八·一八”！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从帐篷里搜出来的，已经烧死好多天了。”……有些帐篷我经常去，根本就没有见过死人，他后来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学讲了，同学们都不相信。一个×人上来就打，揪掉了我的头发，边打边骂，还抢我的纪念章，我装在口袋里不给，旁边一个人讲：“纪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写条传与伯达，伯达传与戚、关……关换人，关、戚交换意见，伯达过去了。)……他们不光有枪，还有圆盘的枪，(康老点头)……我们上了车……。

萧华：(向张)与你讲话的人(说“八·一八”打死解放军的人)从哪儿进来的？

王相喜：(答肖)……在火车上抓我们在车上的同志……他们讲打死了战士，用棺材游行，上面写着“×××烈士”，士兵们的脚趾头都受了伤。“火车头”真“勇敢”(重复14日情况)……一个子弹打伤了脖子的同志，本没死，被剪刀绞断了咽喉死了。

萧华：没开枪解放军怎么伤呢？

王相喜：(解释)

伯达：你们的同学回来没有？(答：没有。)应回来反映情况。

萧华：打了电话，昨天……。

康老：你们有数没有？

众：交了。(指同学名单)

戚：(对康)给他(指肖)了。

萧华：(对金莱)我打了电话了。

戚：你们在场的人在报社看到枪了没有？

众：没有。……我们里面挤着睡。

戚：里面睡了两千多人。

康老：里面是哪个工厂的工人？

众：(对小张)你去帐篷里去看烧死的人有几个？

张：四个。

萧华：死人像几天了？什么样子？比如脸……

张：和别的死人的样子一样。

萧华：是烧死的吗？

张：×人讲是烧的。

贾：我们参观时，他们讲是硫酸烧死的……

(戚对肖笑)一个××讲抄去四挺机枪、子弹是在地道里，我们要看，他讲地道口还有没找到呢？……血还是鲜红的。

萧华：有枪眼没有？

贾：他们不叫去，划了一道白线，说是现场。

萧：是现场？

小张：我看时，他们从帐篷里找出来的，不是现场。

萧：你们参观尸体有多远？
小张：……
萧：几个烧死的？
小张：四个。
萧：(对贾)烧死几个？
贾：我见烧死的有一个，胸口有一滩血，其它都是打死的。(戚拿出一迭照片给参观过的人看)
戚：是不是你们参观过的？
小张：我看不出来。
(康老点几个有关的学院)
众：……
康老：(指了一下王相喜，问各学校的同学)(对农机三人)你们二十三日在现场，你们看到有枪没有？
三人：我们 14 日进去没看到。
康老：工人换班，有没有可能带进枪去？
众：没有。
王相喜：……(伯达出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几个×××同意开枪动武。
康老：是那个×××师。
众：×××部队。(肖对康耳语)
吕：我们怕××栽赃，我们进去时连小刀全不让带。……
相喜：根本没逮捕证，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抓。
(金莱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讯”，问：真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问肖主任。给肖华查
(金莱向穆欣答：林总那个是假的，兰州那个查一查，看是否青军欺骗兰军)
王建义：……
康老：……
王建义：我们厂的“老捍”，有人穿着军衣，领章一样不差，有四个人我们认识他，其它厂也可能有，我们厂的四个人我认的准。报社中的帐篷，我负责搭了一部分，每天我们都去帐篷里看一看，有没有烤火烧坏了的，所以我保证里面没烧死人，联络点我也去，保证没有枪。
康老：他们有一种说法：……报社里有许多人原是“八·一八”，后不赞成“八·一八”，报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是否在这 13 个人中有没有要出而被打死的？
众：没有，造谣。
王相义：……
(金莱问穆欣，难道烧死的还有血迹吗？穆对金莱耳语：他们军区做了许多假象，核对一下，可以驳倒他们)
相喜：……“八·一八”在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上非常好，当我们拖住报社里“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时，他们全有意见。(康频频点头)
王建议：解放军吃饼干时我们送水，他们问，你们那么多人怎么烧水？我讲就是我们不喝水，也要让解放军喝水。(当时他们的连长不在)他们讲你们好，不过我们是执行命令。
康老：你们怎么辩论“六·三”社论？这与我有关。
众：我们认为好，现在他们要翻案。
金莱：《青海日报》有个人要找您辩论。
康老：要把我抓走。(笑)陈逸怎样？在北京？
金莱：他在青海没有生命安全，现在要抓他。
康老：他现在在那儿？

答：在地院。

康老：怎么在地院

金莱：“民和”事件整理材料，老冯是地院“东方红”的，他谈一谈。

冯(谈黑材料)

康老：是不是要烧？

冯：都要烧，据说已经烧掉了两车。

康老：陈逸那时就来了？

冯：……

金莱：赵永夫态度恶劣。(述谈判情况，去兰州情况)

康老：(问一些现象)轧死一个女工怎么回事？

(关、戚在一边谈笑自若，肖聚精神会神)

康老：不是硬冲的！噢，噢……(康老关心二·三事件。谈得有些乱)

胡长生：(述二·三事件)

滨友：(介绍刘贤权，送上“简报”，关锋同志交给康老)

康老：杨植霖怎么样？

胡长生：(介绍杨)杨后来支持“八·一八”。(康点头)

康老：高克亭怎么样？

滨友：“八·一八”叫他写材料写了不少……

胡：他被“八·一八”游过街，也被“捍卫队”游过街，他支持“八·一八”。

康老：怎么对高游街？

胡：他搞经济主义，“八·一八”游了他一回。

滨友：李芳远也支持“八·一八”，原来他轰王昭，最近听说和军区发生冲突有点问题。

康老：韩明呢？

陈武军：……

康生：军队除了赵永夫以外，你们认为谁还不好？

滨友：××……

胡长生：一月三十日晚，××和刘贤权接见外地红卫兵时讲：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意刘司令员，时隔不久，完全颠倒过来，大骂刘。

滨友：冯国良、相喜：电讯从二月二十三日断绝。

冯：2月23日我感觉……因为没电话了。

金莱：(递给萧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没收的红卫兵财物，请示肖指示青海军区归还，萧阅后向金莱点头)

滨友：军区内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百般折磨(戚：你对萧主任讲)

萧：多少人？(答：十一人)。

康生：你们有几个中学生？(举手)这么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声)你是广东的。

吴：对。

康生：怎么串连串青海去的？

戚：青海好玩？……(场内十分活跃，……)

康生：“八·一八”发展组织街道上不纯？

胡长生：……“八·一八”组织大部分是纯的。

戚：有个王仲山搞有许多女人吗？

胡：有个人经常跟着他，但决没有这样的事。

戚：不是一个人！

康生：你们有人伪装解放军把枪运走了？

众：(十分气愤)根本没有！(金莱对穆欣：造谣造到这种程度了！穆欣笑)(康老把麦克风转向萧)

金莱：《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版头条最后一段怎么办？

王力：恐怕要更正。

关：今天讲的大家出去不要说，什么那个同志参加了，……

康生：我们正在调查，你们不要给我们制造困难，你们一说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结果你们倒霉。你们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无理才急。在调查时间不要乱说，不要打电话，发信。

众：他们抓人！

康生：在北京不许抓人！要抓必须通过公安部、卫戍司令部，还有中央文革，这一点可以讲。

王力：今天就到这儿吧！(鼓掌欢送众首长)

622. 周恩来接见石油部大庆革命造反派等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23日凌晨 国务院会议室)

参加单位：大庆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等29人，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东方红”总部政治部革命造反团，北石“大庆公社”等。

中央首长：周总理，李富春，余秋里

石油部：孙晓风，张定一，周文龙，吴星峰，唐克，康世恩

总理：现在一点半了，文件(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草案》)等了半个月，今天主席批出来了。最近中央给厂矿企业的信，改了一下。最近十六号××军区转。(总理看着文件)采油、生产都好，部分原料缺乏，运输……昨天在这里谈了铁路运输军管了……(总理看着大庆代表名单，一一问哪那一年去的)

总理问：王进喜同志，你什么时候去的？(答：我也是60年去的)你们军工有在大庆的吗？(答：我们3月14日全部撤出了。)“八·八”的有吗？你们没有发现“八·八”的去捣乱吗？(答：没有)

总理问：北京石油学院原来建校的同学呢？(答：都回去了。)那建校的那一摊放下了，你们准备怎么办？(“大庆公社”代表：不知道怎么办，要请总理指示。)总理(笑)：我问你，你怎么问我呢？

(“大庆公社”另一代表：如果今年下半年迁校大庆，那基建劳动，搬家任务很重，是否先到641厂和××输气管线、××炼油厂去劳动与调查，听取意见，研究改的方案。还有今年招生问题。)

总理：斗批改要同时进行，还有军训。……(当谈到街上出现“打倒……”时)

总理：我今天下午跟×××谈了。太绝对化了，我向来就是反对绝对化的。两种意见我都不同意：一批就要打倒；保就不批，这都不是毛泽东思想。街上许多口号我都不同意。反对周恩来就打倒，还有什么罪责难逃啦。对我的缺点，就可以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今天就告诉×××，叫他转告×××……)

总理：你们也可以联合“北京公社”搞学校斗批改，不同意见也可以发表嘛！（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总理，这里有北京公社请转达的不同意见”。把一份材料交给总理）。

总理：部长有错误，可以批判，然后再定性质，业务工作一定要抓。铁道部吕正操、武竞天两个人问题很严重，我们还是撤职留用。要正确对待干部，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对各级犯错误的干部，包括司局长、处长、科长，应根据党的干部政策，也就是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按情节轻重，分别对待。王进喜同志在大庆会战有功，也有错误。批判从严，处理要从宽，这是毛主席思想。《红旗》三、四期社论讲了，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是犯了错误就是三反分子。毛主席不同意。现在毛主席不提三反分子，这是主席谦虚。反毛泽东思想里面，不仅有立场问题，而且还有世界观的问题，有思想认识问题。一教不改，二教不改，三教改了，也不是屡教不改嘛！这是一句话，三教改了，还允许将功赎罪。要根据党的干部政策，区别对待；不要凡是领导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靠边站，一概打倒。所有的都靠边站，这是不对的。这话是对群众讲的。另外，不管有什么情况，也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结合，这也不对。这话是对干部讲的。一概复职，一概结合，这是肯定一切，这也不是辩证的，这是一种复辟的思想。现在讲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复辟是指一律复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表现在经济主义。夺权斗争中有资本主义复辟。过去否定一切不对，现在肯定一切也不对。大庆工委不能一律复职。有这一条吗？要加上这一条。上次发到厂矿的没有这一条。

不能全部复官，军代表你们看呢？（军代表：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噢！去不久。我看肯定不能统统复职。每个部都有一部分停职反省的，大庆也有，不能统统复职，恢复原职。但是还有一种，我们准备通过军管，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然后再推进革命的三结合。有军代表，革命群众代表，领导干部，建立新的秩序，防止修正主义复辟。如果搞了十个月，还恢复原班人马，那就复辟了。都复职，不建立革命的三结合，这是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不能没有停职的或撤职的，也不能说每一个单位都要搞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敲警钟，是一股逆流嘛，不是到处都是。

昨天有人问：余秋里、谷牧是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说：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怎么带他们来见你们呢。不是说不能批判。那一边要打倒，有些口号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的观点是清楚的。有些口号都是绝对化。我和中央文革、毛主席都交换过意见。给我贴大字报，只要是善意的，有些过头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蒯大富也贴过我的大字报嘛！当时我是代表中央去解放他们的。这次红代会上，他向我道歉，我说不用道歉，这没有什么。不打不相识嘛！不过我没有“打”过他，我是和他打过交道。如果是恶意的，可以不去管他，我们提倡大民主，我们就不怕，问的问题我不能全部回答，我讲的话也有不全的地方，我的话用录音机录下来，再放也总是能找出几句有错误的。做事就免不了犯错误，我要不断紧跟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要勤做勤学，做与学中不断犯错误，只要勤改，紧跟毛主席，紧改错误，这样才能前进，不然要掉队，党中央的同志是互勉的，而不是互短的，他们的短应该检讨的就检讨。

大庆是一面红旗，元月八日的讲话精神，现在看来“大庆公社”是理解的。大庆的大会战是党决定的，1960年苏联撤走了专家。毛主席从上井冈山起就大讲自力更生，四十年了，60年是逼着我们的。抗战时，给我们发法币，40年何应钦停了我们几十万饷。主席说：这就好了，我们自力更生，搞了南泥湾。49年后苏联有些贷款，几十亿卢布，主要是用在抗美援朝上，也有内债啰。有贷款自力更生就差了。在60年有了教训，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协定。大庆会战石油以几百万吨到去年的×××万吨，这是伟大的成绩，上次大会已经肯定了。第一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学了两论。第二是革命群众。第三是技术专家，还有土专家。第四全国支援，全国厂矿协作。第五，领导也有一份。五个指头，一个小指头也算一个。领导不起作用，这是赫鲁晓夫思想。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斯大林毫无作用吗？辽沈战

役是林彪同志指挥的，许世友打济南就有他的成绩。当然，会战是集体领导的，会战指挥部余秋里，康世恩都在吧？！（大庆代表回答：都在！）要历史地看问题，发展地看问题，这两年，64年，65年有些骄傲。有没有？（大庆代表回答：有）王进喜有没有？（王：有！有！！）那一次会上（元月四日或五日李人俊参加）我们谈大庆这个问题，近几年来骄傲，铺张浪费，康世恩痛苦地流了泪，但他不象我们那样畅快，后来群众批判了一下，好了一些。

秋里到计委去毛主席点的，骄傲有辜负于主席。但是这是发展中的错误，是可以改的。深深地认识，狠狠的改，对青年是有帮助的。

大庆公社是最早几个人？现在多少？（大庆公社代表：×千人了）大了，这就要警惕骄傲。（大庆公社代表：现在分成两派，内部在余秋里问题上分成两派）有个对立面“北京公社”这是好事。这是一面镜子，可以照照镜子，看到自己那里有缺点，有问题，对方看到缺点可以帮助。对“北京公社”要看作阶级兄弟，要商磋，要帮助，犯错误要爱护帮助，犯了错误要批判。

对领导的错误要揭发，但不要先定性。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不是毛泽东思想。不要我说一句话，就影响街上的标语，这很不好。有两条，一是调查研究，有事实。二是评论，讲道理，阶级分析。包括康世恩同志和唐克同志，唐克这个名字好记。给他们检查的机会，自我批评。改了就是好同志。但也不能肯定一切，也是有缺点的。（大庆代表：现在师大“井冈山”说：大庆是余秋里的野心，长期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制造军火，白色恐怖，空投特务，把大庆说得一塌糊涂，我们大庆工人不答应）大庆是好的，有骄傲情绪我承认。62年我去大庆，感到你们很艰苦。66年我陪谢胡同志去看，有些铺张，比起新疆建设兵团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啰！张宗汉到大庆学习一下，讲得很好，回去没有干。（大庆代表：师大“井冈山学大庆”战斗队说我们不学毛选，工人不读报。）这个文件，很慎重的，我不是掉以轻心的。文件第一条是说大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中央六个常委都看了，军委几位副主席也看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也看了，主席亲自批的，白纸上黑字清清楚楚的。这句话关系到大庆全部政治生命问题。

（“大庆公社”代表：听说师大有内部消息，余秋里同志在二月会议黑东西）总理：他们也没有参加中央会议，怎么知道？

“大庆公社”代表：有人要打倒，我们要保，保不是保他的错误。

总理：你们不要用这个保字，别人不爱听。

“大庆公社”代表：听说王力对蒯××讲过。

总理：我今天跟蒯××谈话，他还问这事，可见他对这件事是无所知道，你们不要乱猜。

“大庆公社”代表：他们明天要开万人大会，要不要冲？（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代表：我们要摆这个问题）

总理：好了，先谈大庆的吧！

在谈到半工半读问题时，总理说：半工半读本来是好事，大概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大庆代表反映：好多学生领到钱回家去了！）唉！拿了几百块钱，这样是搞经济主义，这是反扑。如果不回来给他们一个期限行不行？以后劳动要计分，半工半读应当以学为主，学为了工作，时间上不要太长，愿意变学徒工的话，只要生产需要可以变。你是什么时间去的？（一月去的！）噢！（我种了十个月的地）每月有没有零用钱？（只有吃饭钱）在厂矿附设的半工半读当然以读为主，如以劳为主，那就是学徒工了。（问：×千人转为工人，那定额怎么办？）需要就增加名额好啰。

谈到大庆有些学生的安排时，总理说：高中生有三个出路：可以参加工作，参加农业生产，以后石油学院搬去以后，招生可以先招他们，首先要收一部分，满足他们的要求，大庆石油学院的房子可以借用，大庆再不许增加“黑人头”（指未落户口的家属），后两年想大搞，凡是一骄傲，不谨慎，就摔跤，摔了跤再起来，就更扎实了。

（问：发给工读生的几百元钱，要不要收回？）

总理：这样具体的问题我不好回答，你不要考我这些问题了。我回答了要犯错误的。(3点03分总理有事离开会场，3点08分回到会场)

总理：我文件虽然搞出来了，有好的建议还可以提出来。中央看了，中央军委看了，省革命委员会看了，文件不应当看成死东西，应看成中央的方针，就是要把大庆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骄傲、铺张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说因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没有缺点了，“两论”要勤学。“老三篇”要学好用好。不进则退，这还要强调。即使大庆说过了头，也要先当作善意的。毛主席讲军管后(×月×日宣布)也要整风，整风就要检查自己。《决定》是你们带回去，再宣读嘛！

大庆派了××军队去，是中央军委很关心的地方，现在是接管党、政大权，支持真正的革命派。军管是暂时性的，最后还要以群众为基础的三结合。总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执行决定要防止几种倾向，肯定一切，否定一切……

正确的领导要支持，干部要一分为二，对犯错误的干部要检讨、亮相。一方面群众敢于批评，领导敢于揭发错误，解放军是三结合的支持、来推进。总要帮助干部，推动一些过关，一部分过关，一小部分撤职，有部分人有降职留用，撤职，停职留用，铁道部撤职留用，以观后效。留用一批，提拔一批，这要放在后面，放在“三结合”以后。群众公认，工作中考验。换一批，调一批，留的比较多，领导班子不要头重脚轻，层次不要太多。好传统要恢复，不要丢掉了。

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实现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大方向：首先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话，第二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三学党的文件，学十六条，工农结合，学去年的双十条(指文化革命工业十条，农业十条)。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搞臭，顽固执行反动路线的要严厉批判。矛头向上，向前大庆工委。上面责任重，下面责任轻。发现肯定一切，有资本主义复辟苗头，那就要批判，但不要看成全国都是，那又是没有阶级分析了。大联合，求大同，存小异，小的差别是允许存在的。群众要有四大，求大同，大方向，存小异，观点可以不同。要实现联合，逐步联合，按系统，在上面再联合也可以。一个系统，一个部门搞组织联合。不然开会也方便。“三结合”后要有新的革命秩序，夺权，要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大庆的职工要挑起生产革命两副重担。十条里有，这里再加一句。今天“工代会”的演说，伯达同志给我加上的“劳动纪律”几个字。

军管以后，我们意思不是恢复原状，防止复辟。权力机构如何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过来？领导班子总要有改变，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掉，去劳动，去改造，新的权力机构不再劳动了，如果光这样，人的思想不就又变了。经常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就占领了。如果不这样，思想又会生锈。这次文化大革命带来两个成果，思想革命，组织革命。一是夺了权，一是“三结合”的权力委员会来监督日常的政治生活。过去是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次。都是些大原则，日常的事没人管。如何监督基本单位各级领导班子的政治思想和生产呢？苏联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近十年的经验中是搞监察委员。去几个监察委员到大庆去能解决吗？当然不行。只有本单位的群众实行由下而上的监督，现在是劳动人民一齐动员。

大庆代表：师大“井冈山”污蔑大庆道路。

总理：国家机密，外交东西，香港天天登，北京什么东西都贴出去，不要都信他，不然，觉都睡不着了。外国记者又以为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了，实际上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照常领导。我们三个相信。相信群众，95%以上的群众。地、富、反、坏、右只占5%，还有改造好的。七亿人口，5%，3，500万。我们动员1，200万红卫兵来北京，地，富，反，坏，右能来北京吗？3500万在欧洲那不得了，是个中等国家了。第二要相信解放军，那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彪指挥的××万，国防，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五项任务。当然我们不是说没有一个坏

的。彭德怀、罗瑞卿就是坏的。第三，干部多数是可以信赖的。最后可以看出来。原来定二、三、四月，现在看来要推后到四、五月了。主席说今年三、四月看出个眉目来，明年三、四月看结果。那时可团结 95% 干部。先团结群众，再团结干部。到后期，不好的干部又是少数。街上出标语，这么写，那么写，有对，有不对，有半对半不对……日本记者从标语上统计，统计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过几天又搞不清楚了。

外面大字报有真有假，有半真半假，有真多少……外国记者觉得也不那么灵了。所以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以上三个相信要归功于毛泽东思想，我们最高领袖毛主席思想是党 45 年历史经验，现在还在发展，文化革命就是发展，应该充满信心，所以形势还是大好。几万万人，自上而下，什么错误都敢提出来，这是好的。

北京石油学院如果现在能提出改革意见方案一种、二种，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毛主席接见外国朋友时说，现在运动逐步走上革命的正轨了。那时上百万人来北京硬是不走，一夺权，把大家吸引走了。毛主席一抓就灵了。

大庆代表：建议把主席“五·七”指示写到《决定》中去。

总理：那个同学提得很好，把五月七日的最高指示加进去。劳动模范统统靠边站，过了点，要一分为二。我们的伟大领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毛主席代表了群众的智慧。没有广大群众的斗争，毛泽东思想怎能有这样广泛深入的影响。主席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的，脱离群众，没有前途的，反毛泽东思想欺人之谈。哪有静的修养呢？有人把书烧了，也不必烧，留一两本批判，书里讲的是孔夫子、孟夫子，就是封建东西，没有毛泽东思想。我们没有做工作，没有批判，这是我们的错误。

(大庆代表谈到劳动力问题时)

总理：大庆的劳动力应从本身解决，家属准备春耕生产，听说还不错。你们有信心吗？
(有：大庆代表齐声回答。)有红旗手，还有铁姑娘。……

现在有多少人？(××万了！)家属还有多少没有来？成年人的家属都来了吧？(答：还有一小部分没有来！)

此时有一小伙子说：我们的家属还没解决！

总理：小伙子的对象就在大庆找吧！晚婚嘛！

只要队伍(指“军管”)上去一抓就灵，铁路上事故多，出勤问题全线军管就解决了，抓起来还是灵的。还有什么要支援你们的，请秋里同志、国务院业务小组支持你们。

大庆油田还有什么问题？

大庆代表：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问好。我们有决心抓好革命，促生产。有几个问题：

(1)对大庆展览的评价问题。

(2)大庆展览办不办下去？

总理：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加进去，那才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展览。薄一波这个人出尔反尔，你们要把薄一波的黑话揭出来，康世恩有没有顾虑？

康世恩：我接触不多，是工交政治部陶鲁笳搞的。

总理：有人说：薄一波是死老虎了，这话不通。反动路线就不要批判了吗？揭出东西还不多，就不批判了吗？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要进行到共产主义。一国先进，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来不可能。斯大林没有讲清楚，毛主席预见到了。革命要不断搞，一直搞到共产主义。

大庆代表：全国有 30 多个大庆展览馆的复制品，怎么办？

总理：噢！调查一下。(大庆展览职工问题怎么办？)我去，他们一定要向我诉苦了。

大庆代表：院校到大庆串连后泄密问题。与××省的关系问题。

总理：你看香港报纸，对领导人都在猜，看了你睡觉也不能睡了。

现在有××军管区。会战是好事嘛！把会战也否定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是主席思想嘛！(谈到把森林给地方上时)

总理：林业不愿交，农垦也不愿交出，以后都要交给地方。

总理：非党员怎么能开除党员呢？这不合乎原则，一定要重新审查。还有把档案烧掉的。有个外国朋友给毛主席送来一张大字报，主席很欣赏。打，砸，抢，抄。王进喜家也给抄了吗？（王进喜：给抄了。）劳动得来的嘛！还有几件外国人送的吧？有人写革命打，砸，抢，万岁！这是形“左”实右。外国朋友看了觉得不对，打砸抢是左倾幼稚病，××学院也有这种事，非党员把党员开除，把档案烧掉，这也是形“左”实右。××学院有个学生，我认识他。（大庆××提出：劳动定额不够，怎么办？）

总理：劳动定额不够，你们生产班子去讨论吧！你们大庆比鞍钢节约大了，从这里看大庆不是一面红旗，我也不服。

（谈到院校串连时）

总理：军管会管起来，不叫他们来串连，叫他们搞整风。

原来我说春暖后可以批判×××。现在医院说他身体实在不行。最好你们先把材料整理来，然后看他能否作书面回答。否则把他搞去，一下子就完蛋了。

到暑假还有五个月，可以斗，批，改，文化部、教育部现在还没有抓起来。准备派个小组去。现在在抓卫生部。在全国一盘棋，都是为人民服务。

石油部的问题今天不谈了，下次找你们吧！

总理：“大庆公社”在石油部闹革命起了积极作用，我是肯定的。

第一、……（石油部机关联合总部代表打断总理讲话，说：三月份以前，对“大庆公社”我们还是完全肯定的，但是……）

总理：好了！好了！我不愿意参加你们的争论！今天不争了。石油部问题下次开会再解决。你们“大庆公社”还要来人。

（总理起立，向到会同志招手告别）并说：我对大庆有阶级感情的。

（全场热烈鼓掌，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623. 周恩来、谢富治关于先念、秋里、谷牧等同志的谈话 (1967年3月23日)

总理在工代会后对蒯大富的个别谈话。

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批判不得，要么就打倒，否定一切不好，肯定一切也不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也不是不可以批。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可批，一批就打倒，都不对。打倒余秋里为时太早，我看没有什么新材料，批评肯定有。余秋里和谭震林的性质不一样。不要以为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就不能批评，说明你们红代会领导人政治上还不成熟。《红旗》第四、五期社论是两条路线的作战。对群众和群众的干部，否定一切是不对的。对干部来说，肯定一切是错误的。不要形“左”实右的，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原封不动的搬上去就叫复辟。对于谭震林同志还要揭露批判，他的性质以后再定。毛主席对刘少奇看了20年，等了20年才写出第一张大字报。对谭震林批评要深刻，他才能服。不能光贴大标语搞声势。你们光贴大标语造声势，要是小学生才可以，大学生就水平不高了。老搞一些轰动，所以外国评论政局不稳。轰动不能触及灵魂。《红旗》第四期社论中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不是屡教不改……后一段是毛主席加的。我想都没有想到，主席真是宽宏。工厂学毛选，不能占用生产的八个小时。在外地调查，必须通过谢副总理批准。让余秋里和谷牧在大会上检查才能触及灵魂。六五年毕业生要回去，不要在学校里搞斗、批、改，对斗、批、改有什么意见可以留下来嘛。毕业的问题，两个月以后中央才能出一个文件，毕业分配自己报，大家评。

624. 谢富治对蒯大富的讲话

(原件无日期)

听说你们红代会有些单位说：“炮轰余秋里是一小撮”这不对。他也可以批评嘛！回来对他们讲讲(指“大庆公社”)不要这样搞。

抓反革命不要抓得太多，对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放手搞。对于保守派组织的学生要谨慎。你们红代会不要随便提些问题，也不要随便表态，大问题一定要请示中央。有人趁整风、三结合对革命进行攻击，没有什么了不起！蒯大富把形势估计得太严重了，形势还是大好的，但也不要麻痹大意。

625. 周恩来接见卫生部“红色造反团”、“红旗”战斗团、“革联”总部、“东方红公社”四个组织代表和部领导干部时的讲话
(1967年3月24日晨)

出席的还有：李先念副总理、汪东兴同志。

北京医院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等七位同志。

总理：孙正同志，你是那里人？

孙正：山东。

总理：什么时候参军的，多大年岁了？

孙正：1937年参军的，今年49岁了。

总理：49岁，很年轻嘛！

总理：钱信忠同志，你是那里人？

钱信忠：江苏宝山。

总理：宝山是上海嘛！崔义田同志你是那里人？

崔义田：辽宁××县。

总理：米志学，那里人？

米志学(“红团”代表)：山西河津。

总理：“红团”有多少人？

米志学：现在“红团”有124人。

总理：部里有多少人？

王树歧(“红团”代表)：拿工资的398人

总理：孙正同志，文教政治部有多少人？

孙正：22个，原来有6个，从工程兵调来2个，广州调来14个。

总理：喔！那14位是你带来的？你兼主任，副主任是谁？

孙正：我是副主任，主任是雍文涛。

总理：这里的问题，原来没机会管，陆定一是一霸，陶铸来管我没有过问过。今天算头一次过问一下。我想请先念同志管一管，那管就麻烦了。今天办个交待嘛，请他参加一次，以后不再给麻烦了。

张孟旭同志是文办副主任？

孙正：是的，我也兼文办副主任。

总理：张孟旭不兼文教政治部的事？22人连你(指孙)在内。

孙正：不连我在内。

总理：喔！22个人有什么造反派没有？

孙正：有好几个战斗组。

总理：22个人还有几个战斗组，够分散的！

总理：米志学，你是“红团”负责人？

米志学：是负责人之一。

总理：王树岐是那个岐？是岐山的岐吗？

王树岐：是岐山的岐。

总理：卫生部部有多少个单位？

黄树则：有 13 个司局。

总理：“红旗战斗团”杨咸艺，你们有多少人？

杨咸艺：（“红旗”代表）：有 18 个人。

总理：你是负责人吗？

杨咸艺：是负责人之一。

总理：范爱芹（“红旗”代表）：湖北人。

总理：那一年从哪里调来的。

范爱芹：65 年从武汉卫生局调来的。

总理：“革联”总部有多少人？

潘学田：（“革联”代表）：有 143 人。

总理：你是负责人？

潘学田：负责人之一。

总理：你过去和现在都是崔义田的秘书。

潘学田：我是 64 年毕业的，组织上分配我给崔义田当秘书，文化革命以后就没干什么了。

总理：造反了吗？

潘学田：我造反了。

米志学：没有造反，到现在还坐在一条板凳上。

总理：不能争嘛，要争我就不开了。给我这么多材料，我怎么看，说老实话，我可以不看。让我秘书看，我只有 5 个秘书。我的秘书也没时间看，只能摘录些重点。

总理：科委是科学技术委员会吗？

刘维栋（“革联”代表）：是医学科学委员会。

总理：徐毅同志教育司的，“东方红”有多少人？

徐毅：有 63 人。

总理：郭仪同志是防疫司的，防脑炎的工作怎样？

郭仪（“东方红”代表）：现在脑炎流行……

总理：我知道，我问防疫情况怎样？（脑炎情况略）

总理：你们哪两个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红旗战斗团”参加了吗？

杨咸艺：那时“红旗战斗团”还没有成立。

米志学：是“红团”和直属单位一共五千多人。

总理：部里有多少人，这个数字不相称嘛，不能算那些单位。

米志学：医大等几个学校，按中央指示已经撤出了。

总理：多少个单位一起夺权的？多少人？

米志学：14 个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共 5500 人。

总理：本部一个单位，13 个是外头的，哪一天夺的。

米志学：一·一七。

总理：大致差不多。哪天成立革委会？

米志学：2 月 28 日。

总理：夺权委员会多少人？部里是谁？

米志学：14 个人，部里是袁宗信，工业卫生局的科员。

总理：你们那个夺权，部里只一人？

米志学：那时不明确要以部里为主，后来明确了，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 21 人，部里 14 人。

总理：怎么三结合的？革命群众代表多少？

米志学：革命群众代表 9 个。

总理：都是“红团”124 人中选的，占 9 个。

总理：领导干部几个？怎么分的？

米志学：领导干部 5 个，部一级的 1 个，司局级的 4 个。

郭仪：他们仅有一个司局长，已经退出来了。

总理：革命群众代表中有几个科处长？

米志学：两个处长、两个科长。

总理：部外的 7 个，是不是群众组织代表？

米志学：是革命造反派代表。

总理：你们这个三结合跟哪个领导商量过？

米志学：打了报告了。

总理：没批嘛，孙正同志，你报告了吗？

孙正：没有，那个时候不知道要报告。

总理：夺权问题我讲了好几次了。

孙正：我不大清楚。

总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声嘛！就住在我的对面，问一下还不容易？这样的事我这个总理还不知道。

米志学：我们后来还打了报告。

总理：没批嘛，你们又没催。

孙正：打了报告没有批。

总理：事后报的吧！

米志学：事前报的。

总理：事前报的没经批嘛！

夺权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初期还提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那个时候我们是支持的，并且指出是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

米志学：您在财贸口 2 月 17 日讲话后，我们就把业务权交回去了，印章也交回去了。

孙正：当时不应该先报告。

总理：孙正同志，不能这样讲，你是高级干部，先念同志也讲过，开始没有经验，各部都不明确。你是高级干部，军一级吧？（孙正：是，我是 47 军政委），你就因为跟陶铸一段，陶铸垮了以后，你来过一次要找我，我想开不得头。给中央提过几次，找不到人管。不能再管了，请先念同志抓，只能解决一件一件事情。先念同志要管财贸口，抓不了那么多。卫生部门又是意识形态的，又是物质基础的。有上层建筑，有经济基础，很具体，想抓一个人管，不能成功。

首先，自我批评，陶铸垮了以后抓慢了一点，快三个月了，分出还未定，只好管起来。

革命委员会，三结合，本来得承认以后才算，你们没商量，各个准备搞，都要给中央报告。我们 29 个省、市、自治区，每个地方有要成立，筹备都要到中央谈谈。不止谈一次，没那个部不谈的。教育部、文化部这么乱，还打个电话来。

这是头一次见孙正，有人说我见过孙正，说了什么话，我大吃一惊。

不能怪你们，孙正同志有责任，你是做政治工作的，党委任你，你不向党汇报。要打个电话嘛，总可以找到一个人，还可以找伯达、富春同志嘛，副总理很多嘛！找秘书也行，还有个值班室。中央各部一个都没有搞“三结合”，这么大的事情，还应向主席报告。

你们犯一点错误是允许的。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下，在党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专

政下，在解放军的捍卫下，开展自下而上的夺权，是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领袖下这么大的决心，最高领袖号召广大群众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三个月中犯点错误是免不了的。29个省市，我们打回去好几个嘛，你们这个结合条件不成熟，部内结合太少了，只124人在卫生部只占 $\frac{1}{4}$ 多一点。即使你们是革命派，总还有组织可以联合“三结合”，首先一个条件革命派大联合。当时不明确，内外单位没分清，但是也说过。如果使部内其他组织占劣势，必然带来不好后果。初期没有经验不责备。毛主席教导，犯错误是允许的。遇到新鲜事物，要敢于负责。第一次一个半月不到，第二次部内为主，有点变化。但是，“三结合”是临时权力机构，不是简单的，需要商量。对基本群众没经验，不能责怪。方向往“三结合”走，但这个事做得不够成熟。首先部本身的革命造反派不发生争论，四个革命派来讲有 $\frac{3}{4}$ 的人，还有革命派吗？不能只此一家。大方向对，前提对就行了，观点总有不同。不同的观点初期是允许的，即使将来团结在一起了，政治、组织还没占优势，允许合作。只要大方向一致，前提一致。大前提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把党的政策文件作为指导方针。领导、道路、方针要明确。四个组织，不是那个反对那个，只是那个激进一点。“东方红”，你们反对吗？

徐毅：我们不反对！

总理：不能反对，这是大前提。

大方向，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这个方向是不能违背的，群众斗群众，方向就不对了。

卫生部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或是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两个兼有，这个问题要你们群众自己回答，我们不能替五位部长下结论。孙正同志当党委书记，那天是陶铸提的，中央同意的。常委批的。卫生部的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正两个问题未弄清。从九月到现在，刘邓直接领导不过二个月，八月后，陶铸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地方来得更厉害。八、九、十、十一、十二有五个月，时间更长，对文教口不能没有影响。七个月的反动路线，在三个月一下肃清，站起来亮相，我不敢下结论，要90%的群众回答。

徐毅：他们结合时，孙正同志未检查过，二月二十四日“红团”到处贴孙正同志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的大标语，过了几天才贴一个大字报表态，只提到在某些方面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总理：我是一般地说。

更好的革命组织，大前提、大方向应该一致，求同存异，求大同，存小异，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下求同存异。那个组织更合格一点，要在斗争中实践中考验，不能由我们恩赐，不能由你们自封，最后要群众批准才行。卫生部要这样走向革命派的大联合。两派有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讨论，不要打、砸、抢，孙正同志有过吗？打的有没有？

孙正：双方都有过。

郭仪：有，他们夺权以后就打了我们几个人。

米志学：你们砸了我们两次，还把我绑到中央文革。

总理：黄树则一个最机密的笔记本子被抢走了。

米志学：那个抢的？（问黄树则）

黄树则：医大“红旗公社”的，还有一个北京医院的引路，十七号夜十二点到我家里去了。

总理：“三结合”以后还搞这个，早就不准搞这个了。这个笔记本，就是把李先念同志讲话记上了，非要不可，把精神说一下就行了。顶多找黄树则问一问。不仅黄树则，还有孙正嘛，他不是同你们结合了吗，问问他就知道了嘛？何必抢他的啦！确实是医大抢的吗？

黄树则：六个人，二个医大的，带红胳膊箍的。本子没被抢走。

总理：他管保健的，有些东西不能看，他抱在怀里被抢走了。这个行为完全违反中央

的决定，很多机密，这里不能宣布。还有国际的影响。

先念同志讲了，我们并不是说保健工作不能批评，保健制度是可以批评的，我们也批评过。也有很多改进，的确如此，主席两次批评。交给杨尚昆办的他不办，64年我直接找崔义田、黄树则才改革了。废除了很多，一致要求彻底改革，我们还会为老爷式的保健制度辩护？北京医院说我很少钱的药也自己付钱，不要宣传，我的工资比人高，可以付款，我不许宣布。那种提法并不好，应该享受的还是应该享受。那样的东西抢走了。中央批评了很多打、砸、抢，这个事我知道，黄树则报告了。这是不允许的。当然医大是青年人，已经退出了，是吗？你们一道战斗的（指“红团”），去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有错误。

革命组织一定要互相考察，首先我劝你们开门整风，四个革命组织加在一起300多人（崔、黄：将近400人）（徐毅：没有，360）四分之三超过了，80%了。我不能说那个组织没有保守分子。不合成员条件的怎么办？我积极建议开门整风，不管大的小的十几人都可以整风。把中央发的军事训练的通知，特别是政治训练部分好好学习。学习毛主席著作。机关基本群众，年轻的党龄不长或没加入的要很好学习“农村调查”这个基本功。还有《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古田会议的决议》、《反对自由主义》等哲学著作和“老三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林总的报告，伯达同志的一个报告，今年的指示文件更多，接近30个，《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和今年的三、四、五期（李先念副总理说，还有《鲁迅兵团向何处去》），这是造反派小将们写的文章，破私立公，夺私字的权。整风，首先自我批评，然后影响别人，把别人长处拿过来。那个组织整风好，就走向好的方面，否则组织会起变化的。我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北京医院。北京医院是一个大的，几个小的，大的照顾小的。首先开门整风，按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卫生部是又精神，又物质，不象文化教育部可以停，卫生部不行。两个多月没管，就有人写信说，你就是不管卫生部。提得好。今天准备不讲的，后来还是讲。

北京医院军管的事，推迟了三天。

革命组织的联合，先做思想工作，组织工作，按行政单位划分战斗组织。“红团”是否按行政编的。

米志学：基本上是按司局，人太少的合起来。

徐毅：“红团”业务人员少。

米志学：我们的工人多，有40多个工人。

总理：这样好办事，可以抓革命、促生产，革命、生产结合。联合有两种形式，可以司局联合编战斗组，也可以内部联合，逐步走向大联合。

整风以后，会有保守一点的，怎么办，取决于群众。

革命委员会存在，不要忙于解散。不能拿多数压少数，不能要人家解散。发扬民主，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即使是反动的如“联动”、“西纠”只是解散组织，人不都逮捕。

“红旗军”、“战略军”，头头是反动的，基层组织分化，割断关系。负责联系的人加以拘留教育。不能自己为多数，少数就取消，不然，今天你掌权，反过来他又掌权，不是大联合，达不到95%以上，有的组织一个一个的瓦解，这是小团体主义。思想动态经常有左中右。革命组织是先进的，要拿思想团结人，不是组织吞掉。这样才能保持革命思想先进地位，使你更先进，不然就停止了，停止了就后退了，开门整风，达到组织上的联合，要做很多工作。

二、正确对待各级领导干部。四清社论指出，用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光轰不能解决问题，轰只能造声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没有改的可以轰一下，其它的不主张，戴高帽子，弯腰都否定了，你们大概也不搞了，军委八条下来了，二月二十一日中央转发了五条，要用说理批判斗争。

对干部要排队，排队要一分为二，不能所有的干部都说成是犯了严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是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派工作组，学校把政治辅导员都靠边站，打成黑帮。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口还没有肃清，陶铸到处吹嘘怀疑

一切，在中央常委他都说过，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不能怀疑，其它都可以怀疑。这不是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孤立起来了吗？孙正同志，你听到过吗？（孙：听到过），你反驳过吗？（孙：没表过态），这样很多干部都怀疑，连解放军都怀疑，这是不科学的，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不是一分为二的。你们（指派到北京医学院军管的解放军同志）三位都被怀疑这怎么行，你们是军委派来的，应该信任，这是前提。这个影响在文教部门肃清了没有？（“东方红”代表：没有，孙正是保陶的）应该很好批判。四期社论有了，这是对广大群众说的。另方面又不能肯定一切，总会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对领导干部要很好地排一排。

1、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部就是没有，如果有要集中目标批判。
2、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全国没有一个单位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3、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重、有轻、有多、有少、有没有。不是所有各级干部都有，有的人他没沾边，如管业务去了，生病了，未参加运动，就可不负这个责任，应该有个区别。

4、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应该上重下轻，层层减轻，不应该层层加重，中央领导人要重，当然各部也有重的，各省的还有比六、七月还凶的，（“东方红”代表：卫生部也是这个情况）各部门也有，陶铸管了五个月，可能加深，但仅限在这个范围内，不能层层加重，下面群众对直接领导反得厉害，应该看到是谁提出的，谁制造的，有的是上面让他做的。

5、以现阶段为主，去年五月十六号以后，历史问题不搞人人过关，不全面审干，卫生部科处都算上有多少人（“红团”代表：一百三十七人）占 30%，这个数目太大了，如果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容易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追查历史，这是少数，还有涉及专案的，如叛徒。这次文化大革命收获很大，查出了一些叛徒，这是小将的功劳。

既不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连停职反省的都复职，一律复职，要一分为二，革命群众不要否定一切，对领导来说不能一概否定，一律结合，这样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复辟。

什么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呢？我的理解是：

- 1、夺权了，三结合了，把犯严重错误的，甚至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都结合。
- 2、革命的三结合变成了三凑合，或原来的旧秩序，这样不等于运动半途而废了吗？

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要防止和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现在夺权斗争必须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这只是一小股支流还是长江巨浪一泻千里，万马奔腾？不要到处找。目前主要是反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否定一定的问题要说服群众，群众是容易说服的，领导干部稍有私心杂念就容易助长复辟。

四个组织要好好排个队，排队的名单经过孙正同志交国务院。同时党委自己也排排队，如果人少了不好排，还有司局长科处长嘛！

领导干部自我批评亮相，群众同意以后才能结合。部一级的还要抓业务，部内的检讨大会，一个月可以搞几次，看是否可以检讨亮相过关。大家联合起来贴大字报亮相，如果错误少的可以，譬如山东省是这样搞的，200 多厅局级干部登报亮相支持造反派，声势大。但是，每个人具体情况不同，一个一个的排，好一点，一个派搞，容易引起打击面过大。总理接着说：卫生部搞了三结合。

“东方红”代表：是假三结合，只有一个司局长，其他都是孙正带来的。

“红团”代表：司局长出来亮相都亮到他们那边去了，有 90% 司局长参加战斗组，矛头一直指向我们，请示总理，这样做对不对？

总理：矛头指向群众不对。

“革联”代表刘维栋：现在有人贴大标语说李先念 3 月 10 日讲话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员令。

“红旗”、“红团”代表：没有这事。

总理：一、你们应该开门整风；二、干部排队，把排队的单子交来看看，能不能出来亮相，看你们的思想动态怎么样？这个我们不能多等，只能等到三十一号，这个事卫生部搞，不能动员外面几千人，要以部内为主；三、革委会怎么办？部外的七个人回去整风。北京医学院上次讲话传达以后，多少学校去大喇叭广播。医大也好，北医也好，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医学科学院，你们有多少个学校（钱答：三个）学院的还是劝他们回去搞斗批改，搞大喇叭不好。北京医学院只好停止串连，实行军管，宣布北京医院军事接管，订了个十四条，是中央军委通过的，今天，找卫生部来不能只找部党委，部党委不完全掌权，可以让大家都来。

郭仪：卫生部有这样两个组织，我们还有一个革命造反委员会筹委会。

总理问：喔，还有个筹委会！筹会有多少人了？

郭仪：司局级五个，科处级五个，一般群众六个，一共十六个。

总理：两边情况差不多，两个都未承认，批准要由中央讨论，现在两个都不承认，四个组织按我说的要整风，干部首先要亮相。三结合是否干部这么多，不一定，两个比重都大了一点，以后再说，主要是监督业务。

对那些干部的处理，各级领导干部总要留一批，留多一点，撤一批，有的监督留用考验，有的停职留用，光停职反省不做事不好。一边停止业务，一边还要做工作，撤职也可以有留用的，如吕正操，看他们有没有改正错误的诚心，还可以降级留用，换一批完全撤职的调出去，再从外地调一批来，是少数。提一批，但要摆在运动后期。现在各革命造反派组织还不统一，等三结合后，由革命委员会审定。

现在你们怎么办？文革大权两方对峙，自己管自己，中间的怎么办？（众：中间的很少）

总理：有一条，双方开门整风，不许打架，如果有打、砸、抢、抄、揪、抓，部党委有责任撤出。当然，发现了首先要劝告，这是不允许的。

开门整风至少两周，搞长了不行，停止谩骂，互骂也不好，“砸烂狗头”没意思，人头嘛，什么狗头，也砸不烂。现在这样的情况，一说反对就打倒，一说好就保。有这样的标语，谁反对周某某，就打倒谁，这样提不好，反对嘛有两种，善意的要接受，恶意的置之不理。那样太简单，太绝对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有没有错误的，有错误就可以批评，不能有批必倒，有保就不批。譬如外边省委有个有病来北京休养的，保了一下就不批了，并不是保他，就不让批，不能思想绝对化。先念同志传达的时候，四个造反派都在，这个讲话没什么，稿子我看了是对的嘛，不能说是大毒草。如矛头不对头，那个会就是有点不对头嘛！

米志学：召开揭发保健工作的问题是因为主席批评过北京医院，我们当时开会的主要目的是想揭开保健工作中修正主义的盖子，可是先念总理在3月10日讲话中说这是借揭保健工作之名，来丑化我们党，这样就给我们造反派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运动出现了新的反复，有的造反派组织几乎垮了。

总理：就是说的丑化党，你们说先念同志批评错了，我看批评得不够，那个百丑图有坏人有好人，这么做，对党不利，生活问题说得还有完？孙正同志参加了吗？我们了解了一下，你们是知道的（总理办公室一同志说：九号上午医院讲了以后，给文教政治部打的电话，乔××说知道这个会有发言稿，不涉及保健工作问题。孙正：我没看过稿子）

总理：你们政治部看过，谁说你看过（孙正：先念同志说我看过了。）

李先念副总理：我个别同他讲的。

总理：你是政治部的，要负责，还有到医院去广播的。

米志学：那次广播有三个内容，一个是给卫生系统革命造反派一封公开信；二、揭发反革命分子严慰冰；三、揭发刘邓修正主义的东西。

总理：这就不好嘛！你们始终没有懂得这一点，不是对这些人，不是丑化了他们，是丑化了党，这是低级的方式嘛，封建社会的嘛！“联动”是反动的，在哈尔滨有两个人把一个女同志按在地下揪着头发照了一张相，江青同志看了以后，气极了，用这些方式不对头嘛！

把青年引到那个方向去了，青年就喜欢听这些。毛主席说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要夺私字的权，要有无产阶级的气魄。(米志学：我们已经理解总理的意思，接受总理的批评。)这样不行，不然我就不管了，现在香港头条消息，日本头条消息。从政治上批判。这个会把青年引到邪路上去。

刘维栋：我们送来了一个稿子，这个里面更恶毒，把中央首长称为党政军的首脑某某夫人。

徐毅：昨天青岛送来了的“送瘟神”，上面有这里揭的这些问题。

刘维栋：借揭保健之名，丑化党。

王树歧：这样提不对，从大家的主导思想来说，还是批判崔义田、黄树则的错误，十四个造反派绝不是有意丑化党。

总理：不能说先念讲的是大毒草，我看了很难过！这样说我也也有责任嘛！好汉做事好汉当。孙正同志，先念同志传达过了，你这个做政治工作的要教育十四个单位，你看今天还是这个情绪(孙正：开这个会，我是知道的，但没看稿子)。

总理：不愿看反面意见就不好，不能说你结合的组织，就是革命的，反对你的组织，就是不革命的，你对我的想法，不知怎么想的，我不做结论。李副总理的那个讲话，我读了好几遍。刚才还看了一下，说得很有条理嘛！只是多了一点。

孙正：我已经在几千人的会上三次表示过总理的批评很对，愿意接受总理的批评，深刻检查。

徐毅：孙正在北京医院的大会上去辟谣。

总理：是不是为见到我的那个事。

黄树则：那次把传达的会议，变成了澄清事实的会。

总理：今天只讲几点要求，先念同志传达的，是我的意见，中央也知道。

崔义田：我们党委怎么开会。

总理：党委解散了吗？

孙正：是元旦陶铸宣布的。

崔义田：陶铸四号揪出来的，孙正一月十一号在几百人的会议上讲的。

黄树则：十一号中华医学会的大会上讲说临时党委只有接受批判的义务，没有行使职权的权力，我和崔义田还提出过，党委应该开会行使义务。

孙正：陶铸宣布的，临时党委靠边站。

崔义田：十五号你怎么讲的。

总理：你(指孙正)是二十三号写的信，二十三号以前，你还承认陶铸说的是对的啰！开会也不好，不开也不好。

孙正：我写了报告，我有这么个困难。

总理：你们现在三结合没有报告，临时党委撤销这还是陶铸的一个新材料，我们不知道。你看现在这个党委怎么办？没有党委，你这个书记就不存在啰！从四号到二十三号差不多二十天了，你怎么办的？

孙正：他们夺了我的权。

总理：夺权也没向中央报告。

刘维栋：是签字交权。

总理：你们对这个不郑重，青年嘛，没经验，做领导工作的应该负责任。(潘学田送一张纸条给总理)

总理：这倒象是陶铸思想，广东省委赵紫阳就是让权的嘛。

米志学：印是我们抢的，要他签字就是要他投降。

总理：我们讲了夺权只夺文化革命的权，业务监督要求四号请示了主席，中央各部只能监督业务。我向外事口建议过，财贸口也讲过一次，监督业务。听说姚依林的党委是自己解

散的，这是严重的错误，你们两人签字，你们两人要负政治责任，与广东省委一样了，卫生部一个部长，一个党委书记，两个人就送印了。

米志学：是我们抢的。

总理：你们抢可以，他们交就不行。中央各部的权是中央的，把党委党组的权让出去，这就不对。你这个思想就是一月一号的思想，党要靠边站，我们就没听到说过。

钱信忠：一月一号陶铸宣布的，党委名存实亡靠边站，成立一个生产班子。

总理：那时还没提倡夺权，陶铸他从怀疑一切走向否定一切。赵紫阳有这个思想。孙正就相信陶铸的那个指示。

孙正：陶铸讲话口口声声是中央决定的。

郭仪：孙正口口声声是陶铸指示的，孙正还拉贺彪去开他们那个夺权庆祝会。

王树岐：那不能说是孙正拉他去，是我揪他去的。

总理：北京医院的事不能继续下去，现在不能解决那个业务问题，业务负担很重，还有国际义务。北京医院实行军管，军委讨论订了一个十四条。下面介绍这几位同志去(姓名从略)。军管是积极的方针，三结合、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一分为二，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你们的革命委员会不取消，北京医院的军管会，中央委托王××同志负责联系。

潘学田：我们“革联”，“东方红”请求，孙正犯了严重错误，煽动群众攻击周总理，我们给他写了很多大字报，文教政治部送不进去。

总理：你们喊口号，不让他去嘛！

潘学田：不是那么回事，那是不让他到脑炎办公室去，他要别人给他汇报脑炎的情况，我们革命群众就不给他汇报。

总理：以后不要用这种办法，要文斗不要武斗。

潘学田：文教政治部不让进。

孙正：那是保卫科规定的，不管那派都不让进去。

徐毅：医大红旗、红团的就可以进去。

范爱芹：(红旗战斗团)谁说能进去，我们今天来就不让进去。

总理：大字报用送的办法解决。

王树岐：向总理汇报两个问题。首先，总理的批评和指示，是对我们造反派的关怀，对我们教育是很大的。例如，对于揭开保健工作会议，我们虽然已经作了检查，但对总理的指示精神领会是不深刻的，我们愿意再进一步检查。但是，我们愿意提出：李先念副总理 3 月 10 日的讲话，基本上是好的，因为有些有出入，医大“红旗”同学贴大标语要求和李先念副总理辩论，例如，说以借揭发保健工作为名丑化党，从我们主观上从未这样想。另外，象李宜谋和孙正同志谈话，攻击林彪同志等问题，经调查并没有这些事。

总理：林彪同志那个问题，不是你们这一派揭的，是另一派揭的。

王树岐：但这个问题提出以后，对参加会的十四个造反派确实压力很大，有些组织有了分化。据说：阜外医院“红旗”退出了 100 多人，有的单位核心只剩下几个人，内部出现恐怖气氛：处长、副司长还要保护现场，说医大贴的标语是反动标语，并打电话给公安部要抓人，北医“八·一八”某些人说，“北医长征”是一股反革命逆流，原办公厅主任，中央监委驻部监察组成员谭治二十一日下午说：什么他妈的造反派，我看都是反革命派。有些组织一夜在大街上贴 700 多条标语说我们攻击周总理。贺彪同志爱人竟说：“现在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撮了”，“末日到了”，崔义田同志爱人过去一张大字报不写，现在也要杀个回马枪，矛头指向群众。崔义田是一个高级干部，竟说出我恨“红团”每一个人。(崔义田：我没说过。米志学：你说了，有记录可查，我们让你检查，你拒绝检查，而且签了字)，钱信忠在 11 日发表了“郑重声明”，公开攻击我们夺权前后矛头指向党中央，指向群众，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其次，想说一下，卫生部的当前主要斗争。我们认为，当前出现一种奇怪现象，对打倒孙正很努力，但十七年来卫生部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得不狠。孙正同志来部，到陶铸垮台共四个月，为什么把他重点突出呢？这是个政治阴谋，这种作法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孙正同志就是领导干部，他特别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支持造反派大方向是正确的。卫生部的运动比其他单位要迟，因为派出的工作组九月份才陆续回来，我们这里出现的情况甚至是其他单位7—8月的情况，卫生部竟有这样的怪事，司局级干部成立战斗组，把矛头指向群众，这是不允许的。

米志学：这些部长们他们运动以来一直就把矛头往上引，往外引，往下引，过去是指向文办和革命造反派……就是不把火往自己身上引，他们对新来的几个解放军转业干部恨的要死，恨不得把他们打成三反分子。人民勤务员等司局长、处长组成的战斗组就是干这个事，他们这些阴谋，我们早就揭穿了。

总理：有些人不是十七年都在，主席指的那些事，是老爷卫生部，还有别的事，应该引起我们的愤慨。

米志学：从运动开始，这些部长就要阴谋，把矛头向外引，向下引，现在又把矛头向文教政治部引，向革命组织上引。孙正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是支持造反派的。

徐毅：开门整风，明天搞，以孙正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孙正还没有很好检查，就和他结合了，“红团”十六号满街贴标语，说李先念副总理三月十日讲话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纲领。

“红旗”、“红团”：我们没有写过这样的标语。

徐毅：你们弄得满城风雨，满街都是，我们为了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我们才贴了。否定李副总理的讲话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刘、邓、陶、孙、钱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批判，城市老爷部就不可能砸垮，根据最近指示精神，应该集中批判孙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红团”他们不批判孙正，反而在二十四日贴出孙正是革命的领导干部的大标语，我们与“红团”的关系，通过开门整风进行辩论。

米志学：我们已经批孙正批两个月了。

杨咸艺：向总理汇报一个问题，毛主席多次批评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工农兵服务，批评以后，并没有多大变化，对于造成城市老爷部推行陆定一修正主义路线主要负责任的是谁？难道是刚从部队调来的孙正同志和几个解放军吗？不是，对城市老爷要负责任的是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他们。

卫生部的运动一直是很不正常的，斗争一直是尖锐复杂的，过去这些部长们和司局长同机关红卫兵坐在一条板凳上，一致对外，对上、对下，就是不搞自己。钱信忠于8月26日带领300多人去西苑医院镇压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总理可能已经看到报告。现在他们同一些司局长们仍然没有改变，还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对上、对下、对群众、对造反派，千方百计保自己，千方百计要赶走孙正同志和解放军来的几个同志，公开喊打倒！要他们滚蛋！什么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什么帽子都戴了。这是为什么？孙正同志固然有错误，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同钱信忠前一阶段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起来，钱信忠严重得多，有人为什么不揭发、不批判呢？老抓住孙正同志呢？

总理：我看你们不是开门整风。只揭孙正的问题别的不揭是不应该的。十七年不是都是问题，城市老爷卫生部问题主要是指不面向农村，这个问题以前也解决了一些。只是这次是最彻底的，以前不是不革命的，不如这一次强，比较说的。要求你们不要争，不要继续吵下去。

杨咸艺：我们保证，回去按总理指示办事。

刘维栋：向总理汇报一下卫生部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陶铸到了中央以后，在卫生部保钱，钱信忠急急忙忙转移斗争的矛头，通过邓小平的爱人，要求邓小平保他，邓小平指示陶铸作了臭名远扬的六·二五保钱报告，定出了什么是左派，假左派真右派的调子，制造了“六·二八”、“八·二六”等事件，孙正来卫生部以后，在八·二六调查问题上保了钱信忠，

在调查报告上写钱信忠不是有计划地去镇压西苑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起了挑动群众斗争的作用。九月底孙正又召开百人座谈会既保陶、又保钱。

总理：我点钱、崔抓流脑办公室，业务要抓，不妨碍批判。流脑办公室成立以后，四个组织都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一天都不能迟缓。

刘维栋：11·3事件发生了两派思想，一种认为孙正要负主要责任。一种钱信忠要负主要责任。“红团”与“革团”的分歧是一个反孙，一个不反孙。“革团”怎么成立的？王忠信他代表孙正作了一个“训政”式的讲话，“革团”对这个讲话进行了批判，革团在声明上有一条造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就激怒了孙正，孙正就把原23人的造反团被迫减少到几个人，一个同志被查了祖宗三代，这个同志都安排好了准备坐牢（“红旗”：没有这回事），“革联”一成立就抓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孙正策划了1月17日假夺权，就展开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夺权以后，对我们进行打、砸、抢种种迫害，我们和“红团”的分歧，孙正的反动路线应不应该批，我们认为批了孙正的反动路线以后，才能实现斗批改，孙正又保钱信忠，又镇压革命群众。

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分这么清？为什么不同时批？

刘维栋：戳穿一个阴谋，3月7日总理批的三个革命造反组织一谈，8日因故改期到9日，孙正为了争取这个席位，在一个中午就炮制出一个组织，就是这个“红旗”战斗团，晚上孙正就欺骗总理，多了两个人参加接见。

杨咸艺、范爱芹：你这是造谣，当面欺骗总理，侮辱革命群众组织。

总理：就是刚成立的也可以参加嘛！

孙正：我向总理汇报一下，我是去年8月调来的，9月参与卫生部文化革命运动，在文教口的几个月中，犯了很多错误，执行了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感到很惭愧，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总理请罪。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这个军级干部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识别出陶铸，执行了陶铸的黑指示，对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是很痛心的。我的处境很困难，我并不是向总理诉苦，陶铸让我兼卫生部党委书记，是9月27日，他说是中央决定的。

总理：是他提的，中央同意的。

孙正：11月29日中央办公厅批文改组部党委（汪东兴同志：有这个文件）。长时间来，党委要活动，造反派不同意，说是陶铸为了保钱。不活动，又是失职，1月17日是交权我接受，但1月11日夺权决不是我策划的，有人造谣说我和钱信忠预谋交权，决无此事，如有，我愿接受任何处分。十四个组织我是支持的，我认为这十四个造反派大方向正确的，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但不意味着别的组织都不对。二月十七日总理讲话各部要恢复党委的活动，我2月23日给总理写了报告，还催问过，请示总理，临时党委怎么办？

总理：临时党委就这么几个人？

孙正：有钱信忠、崔义田、贺彪、黄树则、王忠信，还有张智、秦燃、于汇川，这三个是文教政治部调去的。

总理：这三个都在卫生部？

孙正：任命了，陶铸问题出来后，不敢公布。

总理：一月三日就宣布了党委靠边站，我们不知道。

孙正：请总理决定，恢复不恢复。

总理：十一月的通知没取消嘛！

孙正：另一点，我是文教政治部副主任，兼卫生部党委书记。

总理：教育部不找你们。

孙正：不找，找文办。文化部找我，昨天康生同志批来要我们审查出国人员。我有错误，欢迎造反派批判我，打不打倒，我不管，该打倒的就打倒。今天有个误会，“革联”、“东方红”昨天要开会批判我，我十二点给他们打电话说康生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下午开会请假，

下午二点，晚上六点他们到我家去揪我。

总理：我们不是说不要揪嘛！

潘学田：我们不是揪他，下午开会群众都集合好了，我打电话，他不接，我才去找他。

孙正：下午六点还去揪我，我参加他们的会不少，他们在少数人会上还体罚过我，现在这条胳膊还痛。张智、秦燃同志都挨过压。

总理：打人就不好嘛！体罚是禁止的，如在三月份还这样，就得采取另外措施了。

钱信忠：你参加几次批陶会？我每次都参加了。

孙正：大小会参加不少，我在职责上明确了就好办，我去一次流脑办公室，“革联”、“东方红”骂了我半小时。还有崔义田也说，我没有请示总理以前，没有必要向你汇报。找他要材料，他给了我一个普通的流脑小册子，不给我谈具体情况，我是个党委书记，去过问，赶我走，不去问一下，将来又会追问你。

总理：脑膜炎的事不追你，当时考虑你还有别的工作，抓文化革命，还有文教政治部。刚到卫生部不久，所以就指定钱、崔抓这个办公室。革命委员会是怎样监督业务的。

米志学：我们没法监督，那些司局长都站在他们那一边，把矛头指向我们，阻力很大，无法实行监督。

孙正：部长们研究二次三线工作，钱信忠不通知我，我不管，以后追究责任，管又管不上，不告诉我。

总理：没停止活动以前，党委会在那里开？

孙正：到处打游击，那时部里来访人员很多，部里没有办公室。在文教政治部，京西宾馆开了几次。

总理讲话十分重要，我要好好领会贯彻，上次回去传达，两方面各取所需，震动很大，建议搞个文字精神，有个根据。

总理：我讲了这么多话，那能都搞成文字材料。

黄树则：我上次是如实传达的。孙正同志也讲我传达的基本精神是符合的。

孙正：我不是说黄树则，而是各派各取所需，大家注意一下，不要歪曲。

总理：不如实传达，还称什么造反派！

孙正：我个人的问题要向革命造反派检查，总理的批评很多问题我都接受，有的不是有意的。夺权在一月风暴下认为是大势所趋。

总理：事实的时间长一些就会弄清。赵紫阳说他是假夺权，这个事慢慢的可以弄清楚。

钱信忠：开两次会的问题，一个工人非要造我们的反，我们几个商量成立一个班子，不是开会，以后最好你到卫生部上班，找你不好找，我们有些事处理不了。

总理：你们俩人签字，是因为陶铸宣布靠边站了，自己有点脱掉责任，是吗？

钱信忠：抓业务的问题，脑炎没问题了。其它问题商量有困难，当务之急是明确生产班子。

总理：北医“八·一八”是不是你们一边的，是不是造反派？

米志学：北医“八·一八”是造反派，大方向是正确的，在夺权问题上他们搞风头主义，小集团主义，分裂主义。

总理：你不要一开口就说别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这样不好，这是宗派情绪。他们是几司的？(米答：是一司的)他们是红代会的吧？(米：是)

总理：是嘛！红代会就是造反派，不管那一派都要自我批评，不这样就要走弯路。回去好好想一想，你们只传达自己的，不要广泛传达。你们能保证吗？(齐答：保证)好好学习，谈谈，讨论，把卫生部夺权搞好，你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老爷卫生部，要把子弹准备多一点，当然要只争朝夕。

钱信忠：业务班子的问题。

总理：脑炎办公室包括各种防疫，脑炎最紧急的。

钱信忠：现在准备派两个医疗队下去，有北京医院的。

总理：第一步要搞整风，抓革命促生产，然后抽人出去，内部问题不搞好，派下去在外边还会吵架。

钱信忠：还有别的任务，很重，没有一个生产班子，陶铸要我们四个人抓业务，孙正管运动。实际上这一段我们也没抓好。先念同志传达后才抓好了，生产班子要明确，我们一方面检查错误，一方面与群众在一块把卫生部的业务抓起来，这个问题没解决。

总理：临时党委十一月文件下去了，没取消嘛！无所谓恢复，陶铸的我们不知道，从党中央立场看，我们没把你取消，临时党委要开会，抓革命促业务。他们同意不同意，同他们商量(指革命组织)。(对群众讲)人家去不要喊什么混蛋，要嚷在批判会上嚷，这也是一种低级的，没什么意思，卫生部嘴上不卫生。中央有通知不许骂混蛋之类的。骂一顿精神不卫生，红卫兵初期是允许的，不教育就走向邪路上去，违法乱纪，甚至走上反动道路上去。卫生部精神上要卫生一点嘛！文明一点嘛！资产阶级讲文明是假文明，我们是真的文明。林彪同志讲打骂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

他们开会你们不要揪，你们开会要有准备，业务时间开。内部开。不要一下子就十四个单位开，初期造声势可以，现在到了深入的阶段。希望卫生部的几个革命派学习整风。

临时党委维持原来的，抓革命促业务，你们分工，你们互相对立厉害，靠自己解决，这对你们也是个考验。

张凯不参加党委，你分工管什么？

张凯：管干部工作，管医疗器械局，《健康报》。

总理：《健康报》不用管了，光闹革命，现在不出报了。

张凯：现在出了个《全无敌报》。

总理：《健康报》有多少人？

张凯：有 110 人。

总理：这么多人！是不是自己印东西？

张凯：可以排字。

总理：你们大字报彼此乱贴，据健康报造反总部说“东方红”，“革联”脑膜炎问题也用大字报公布。请示中央办公厅不让贴还不撕掉。

刘维栋：医学科学院把一个中央文件在大会上念，泄露了脑炎数字很多机密。

总理：“东方红”，“革联”公布了吗？

米志学：公布了，我们要撕下来，他们不让撕。

徐毅：我们没有公布，没有泄露秘密，脑膜炎办公室不算秘密。

总理：有底稿吗？

徐毅：有，我们可以送给总理审查。

张凯：中医学徒的问题，写了个报告，不知总理看了没有？请示一下总理。

总理：这样的具体问题，我这里那能解决。健康报提出“革联”，“东方红”贴出去了，有原文吗？

米志学：郭仪你送给总理。(郭仪将材料送上)

李先念：没有几个字。

总理：那没有几个字，不少吗！本来李先念同志的讲话，准备批下去，林总那一段不要。孙正同志那一段也不要，省得抓这个说孙正怎样，怎样。又有说孙正看见过李宜谋，这个事交解放军同志调查一下。本来想少管一个部，少麻烦些，不管不行，为了党的事业，不能怕麻烦。先念同志这个事有什么争辩的？你们还争辩不争辩？(米：不争辩了)。对我就支持，对先念同志说他歪曲，你们怎么知道，又没看到。林总那个问题弄清了，不是你们造反团。我没有见过孙正，他证明了，我没说过那句话，孙正也没见过李宜谋。(此时“革联”代表送上一份材料)总理看了后说，我对这类事不感兴趣。标语盖上了，(可能指“红四野”盖上

“东方红”的标语)没有什么。

(总理看李先念 3 月 10 日讲话)这两段勾掉了，重印，只限到会的人，不能拿到街上写大字报。

我替他负责，这是我委托他办的。十三个组织，你们(指“红团”)告诉他们，北医“八·一八”，“东方红”，“革联”告诉他们，要求见的问题，有功夫见。现在没功夫。

(散会时)

钱信忠：脑炎办公室隔天一个简报。

孙正：党委怎么办？

总理：每个星期写个报告。我派一个联络员同党委联络。

626. 谢富治在公安部的讲话

(1967 年 3 月 24 日下午)

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现在还有严重斗争，以至于发展到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他们就不服，还要抓这个权，这就是反扑，这是斗争非常激烈的阶段，是一种反夺权，特别是二、三月份表现非常厉害。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胜利，一个一个地夺，有的没有经验，没有三结合，但只要是无产阶级左派夺权，大方向是正确的，以后我们还要搞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有的是保守派夺权，现在中央一个省一个省安排，第一是上海，然后是黑龙江、贵州、山西等。有的省三结合不成熟，军事管制，象广东、河北正在安排。军管一方面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方面保证四大，并且在运动中考验干部，包括那些犯了错误的干部，一直到三结合成熟。军事管制不能代替大联合。军管有三种，保守派夺权的要寻找左派；左派夺权的要帮助他们；两派斗争厉害的要军管。

无产阶级革命派文化大革命中打击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它打个稀烂，并且在两条道路斗争中建立了功勋，但有些小缺点，有的本来就不是小将的错误，毛主席提出不能打倒一切，有些资产阶级反动人就反攻倒算，从上到下，机关有，工厂有，学校也有。这是一种逆流，是反攻倒算的逆流，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是阶级斗争。他们一有机会就要起来，就要秋后算帐，还没有到秋后，春天就要算了，他们说小将打击面太广了，打了老干部加到中央文革身上。真正打倒一切的是刘邓路线；刘少奇这个大修正主义者，他在四七年、四八年在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叫“搬石头”，是毛主席纠正的。63—64 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的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老婆、亲信到学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帮，斗争方法带高帽子是他们搞的，发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其中还有公安人员，小孩子五花大绑，拳打脚踢，后来才打人成风了，多次听总理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反对嘛！这是北京市委瞒住中央文革搞的。还有一件事你们知道不知道？不要党组，每一个人都要烧，也没有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司局长以上都要烧，没有阶级分析，为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当时中央文革反对，我们公安部没有传达，经委工交口传达了。小将们也有小缺点，有人乘整风、三结合反攻倒算，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拉来结合，还有犯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还没有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的人拉来结合，这样就成了复辟三结合。有的人可给工作做，但结合不行。有种人两面派，言行不一，这就要考验。当然团结干部大多数是一贯的，不能因为一小撮反扑就动摇，现在有人攻击左派，因为小将们夺权时没有三结合，他们说你们没有三结合，没有大联合，你们大方向错了，有缺点你们可以批评，那时还没有三结合嘛！后来我们伟大的毛主席立刻总结了三结合，如果没有小将们的夺权，怎能总结到“三结合”呢？不能否认左派的成功，现在保守派攻左派很厉害，尤其是前些时镇压了一些反动组织，这些组织头头是坏的，我们公安部处理问题要严肃，不要打击左派而增长保皇派的志气。现在外地有乱抓人的现象，你提我的人，我提你的人，

我们如果是错了，就帮了保皇派，不能听一面之词，是军区的也要听中央文革的，如成都军区抓了三个，有两个是右派头子。

我们相信党就是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我们相信群众就是相信左派。

北京“全红总”是反动组织，头头坏，下面是好的。

反动逆流现在有，将来可能还有。你不把刘邓批臭，他们有了时机总要出头，因此我们一定要掌握大方向。刘邓影响很深，不批臭就可能死灰复燃。我们要永远站在毛主席一边，中央文革一边。我们的代价还不大，毛主席、林副主席说我们的代价还很小，无非影响了一些生产，没死几个人(远远比不上一场战争)，那些生产没有关系，我们会努力赶上。我们伟大的革命正在节节胜利，在这时候有人要抵抗没关系，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公安部还要搞一次批判，批判彭、罗的影响，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

整风中我们要按毛泽东思想去做，大方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不去做。

一、要多读毛主席著作，养成习惯。二、不能搞掉革命造反精神，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去掉，可不能去掉锐气。三、要抓革命促生产。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保守派千方百计破坏生产，我们要揭穿他们。

627.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及 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纪要

(1967年3月23日晚—24日凌晨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萧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

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代表，地院“东方红”代表，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成员，外地赴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代表。(总理依被接见名单逐个点名，在点名过程中，戚本禹同志和曹轶欧小声说：“机枪对这些小孩子打，真不象话”)

总理：张惠英。

张：我。

总理：你多大？(张答)

总理：黄建强。

黄：我。

总理：多大？

黄：十五。

总理：你更小。(顺次点名，问姓名、单位、年龄)

总理：李春荣。

李：我。

总理：高个子，山东的。

江青：(指康老)两个山东的高个子。(众笑)(依次点名)

总理：都是北航的。

戚本禹：都是“反革命”。(总理点名时，诸首长评论同学的高矮)

总理：张苗苗。

张：我。

康老：多大？

张：十五。

戚本禹：(对众首长)她名字叫苗苗。

总理：北京占多数。

总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刘贤权同志来了嘛？张江霖同志来了嘛？(刘、张回答)

总理：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

总理：刘贤权同志多大了？

刘：五十二。

总理：张江霖同志多大了？

张：五十一。

总理：刘贤权你哪儿人？

刘：江西吉安。

总理：张江霖哪儿的？

张：四川。

江青：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诉说，今天我们都来了，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来听你们意见，你们讲吧，青海的同志讲，不要重复。

总理：你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对张惠英)你讲讲吧！(张惠英开始叙述“二·二三”事件见闻，在讲到被赶到报社大院里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一千八百多人。

总理：报社原有多少人？

从：二百人左右。(张惠英继续叙述，在讲到关于烧死人的问题时)

总理：是不是烧死的？(张回答：我也没见过烧死的人什么样。烧的腿一面烂了，另一面还挺好的……总理边听边点头)(当张讲到持枪者威胁：“你再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时，康老冷笑)(当张叙述到“八·一八”被迫跪了一大片人时)

总理：有多少人？(张回答：并继续叙述暴徒毒打“八·一八”革命派情况)(杨成武同志进来)

总理：你们的同学有死了的没有？(张指陈存秀说)他弟弟被打死了！

总理：你弟弟叫什么？

陈存秀：陈存宣。

总理：你们哪一位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补充一下。(于桂梅同学补充，当她谈到守卫报社时)

总理：有多少人？

于：有两千人。(康老对总理作解释)

总理：你们都在里面，很拥挤。(杨植霖同志于二十一日三十分进入厅内)(于继续叙述，当她谈到“八·一八”‘革命派被迫用绳子捆绑下跪时’)

戚本禹：(对江青)他们竟敢不执行八条！(于继续叙述，当说到“八·一八”革命派被押解到省委时)

总理：省委？

于：由省委干部审问，审问的全是平时造反精神最强的。……我们在雪地上冻了一夜，

有的工人几天也没吃，我们看到省委干部审问，这完全是反扑，过去被斗的，起来斗造反的。保皇派斗争造反派，一些中……都不敢讲话了。一些当权派纷纷倒向保皇派。那几天在大街上抓人、打人是很严重的。

总理：事后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于继续叙述，讲到北桥头死人时)

总理：桥头在报社外面？

关锋：那儿死人最多。

张江霖：在报社西北角。(于继续叙述)

总理：你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于继续叙述)

总理：保卫报社的有多少人？(回答)

总理：二十多所学校，有多少人死了？

××：不清楚，消息都封锁了。

总理：你们都什么时候离开的？

××：二十四日。陈代海：我是三月六日离开的。

总理：有人抓到军队监狱里没有？(王相喜叙述情况，说明监狱很大)

总理：那么大？国民党留下的，还是我们修的？(张江霖、王相喜分别回答)

总理：在哪儿？

康老：(对周总理)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王继续叙述，讲到军人宣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前途光明”的内容时，戚本禹同志冷笑。当王讲到外地同学被关押到党校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四十几个人。……

总理：什么地方？(王继续叙述校内状况)

总理：外地同学有被打死的？(王继续叙述，说到《火车头》用锤子击伤员时)

总理：你知道的一死一伤……(王叙述到和军区赵永夫××等发生争执时)

总理：你们和军区谈判的情况怎么样？(张金莱详细叙述谈判经过)(杨成武同志小声对曹轶欧同志说：“赵永夫在搞鬼！”)

总理：军队哪天武装游行？(王滨友、胡长生详述武装游行)

总理：多少辆军车？(指二·三军队游行)(回答：二百五十多辆)

康老：二百五十多辆？！(胡长生谈到有公安厅车子时)

总理：公安厅几个车？(回答)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们几号来的？(回答：三月九日)

总理：你知道 15 号搜枪的事？(张回答，在谈到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支持了右派，打击了左派时，总理不住点头)(当张谈到王文英在谈判时被赶回来时)

康老：赵永夫去了。(当时叙述到事态继续发展，要发生流血事件时，总理点头)(张继续叙述，在谈到自己被轰时)

总理：刚才他(指金莱)讲的，“……(当张叙述到“我也成了反革命”时，总理笑)(当张叙述几次谈判时)(戚本禹同志对身边张苗苗说：他也是按林总“指示”办事的。十号他把刘贤权推出当“替死鬼”了。)(众笑)

总理：刘贤权同志你是怎样被斗的？(刘贤权叙述，在谈到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支持“八·一八”时)

总理：赵永夫同意了？(刘继续叙述，说明赵是同意的，但刘对赵有警惕，并说：我看捍卫队一方进军区造我的反，揪我，斗我也算是冲击军区吧！)(首长们和同学大笑)

总理：赵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员吗？(刘回答，并继续叙述)

总理：军区有电报给军委吗？(刘继续讲，在讲到“八·一八”为主体的三十八个组织和人数时)(江青同志向关锋同志表示赞许刘对情况的了解和熟悉)(当刘谈到军区机关的“紧急倡议”时)

肖华：是不是事先写好，印好的传单？(刘答不知道)看来是事先写好的！印好的！(刘回答。刘在谈到军区机关成立所谓“三个团”时)

周总理：成立了三个团？(刘帮继叙述，谈到二月十日军区开会决定刘贤权接见“八·一八”和三司代表时)(总理问刘过程中，杨成武同志对曹轶欧同志说：“刘贤权是从东北四野调去的……赵永夫有问题，历史上有问题”)。

总理：开会谁来主持？(刘继续叙述，在谈到首都三司拒绝和刘谈，并说出自己的想法：“赵永夫不是说三司再三找我吗？”时，众首长大笑)(当刘谈到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接电说林总支持，准备检查时，诸首长皆笑。刘继续谈，并说明是叶剑英调刘、张来京，后受青海军区监视情况)

戚本禹：总理呀！关锋同志那天见他，等了两个多小时。(肖华作了插括)(刘贤权说明：“许多重大问题赵永夫都自己作主而且态度很硬”时)

总理：同志们！今天不再继续开了，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全了解了，北京三司同志派两个代表再讲一讲，青海也派代表谈。除了这里讲以外，不要再向外讲了。

戚本禹：他们还是守纪律的。

总理：你们回来的同志住在一起，外地(指青海)的也是，住在一起。问题很快会解决了。你们一定会遵守革命的纪律。“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杨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们的。这个问题快要处理了。

628. *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讲话 (1967年3月25日)

(见《系年录》第七十五卷)

629.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及 原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和外地赴青红卫兵纪要 (1967年3月24日—25日凌晨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穆欣、

萧华

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原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全体人员、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首都及外地赴青红卫兵。(因去晚了，前边有一段话没听到)

青海方面人员：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书记高克亭。

其他人员：赵永夫(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昭(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张晓川(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洪(×××副师长)。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嘛？……你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

赵：没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

康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我代表军区。

总理：你们没有得到了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理：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永夫：(支支吾吾)

周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沉默)

总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都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大家研究的……

总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

赵：(沉默)

总理：赵永夫，你刚才没说清楚，刘贤权同志二十多天都没有自由，你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赵：刘贤权同志不敢工作，不敢负责任，有情绪。军区党委王文英负责，他在场。

总理：(声色严厉)军区谁负责？

赵：(诡辩)王文英副政委……

总理：你没有责任吗？你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你报了军委和兰州军区吗？(十分严厉)

赵：报了，批没批不清楚。

总理：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实说！

赵：(支吾)我不清楚报没报。

总理：军区的指挥权让给指挥部了！你是军区副司令员嘛！那就把军区的指挥权让给联合指挥部了？

赵：不是让给不让给，已研究好了，我给常委汇报了。(支吾)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还是代表个人？

赵：代表军区。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了？！那文化大革命你就是代表了？

赵：我是军区代表。

总理：十六号电报兰州军区没回电就这样干了？谁派刘斯起到兰州军区去的，你不知

道？林副主席给你的电话呢？二月二十三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质问)指挥部谁指挥？

赵：×××指挥。

杨成武：(质问)

总理：×××部队张洪回答。

康老：(严厉)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生气，重令)谁下的命令。

张洪：……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去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支吾)

康老：你什么都不知道！

萧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总理、杨成武、康老同声追问赵永夫)

赵：(不正面回答，乱扯)

总理：你别谈了，别占时间。(问××师师长)你和赵永夫谁指挥谁？

××：不归他指挥。

总理：那天你们行动谁指挥的？

××：……我们派了两个排。

总理：谁派的？

××：共同研究的。

总理：你是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当时×××、×××……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〇五张晓川)谁调的车？

张晓川：赵永夫。

总理：你的任务是青藏公路，为什么调车？总共有多少辆车？占多大比例？

张晓川：有××辆，接到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命令……(啰嗦地从头说起)

总理：你把话说简要一点。

康老：组织指挥部是你先找赵永夫，找××师陈立英，怎么不讲这个问题呢？

张：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众讽刺地大笑)

康老：(不满的)我讲的是游行，那是组织指挥部。

张：……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二月十八日。(总理：不对)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

组织了。

张：(重复，啰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月三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赵副司令员，师长。×××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理：你对“八·一八”有什么看法？

张晓川：没调查之前，从整个来说，我对“八·一八”看法是印象较好，冲劲较大，但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看法不一样。

总理：差别在那儿？

张：组织不纯。

康老：……有个别坏分子，就不是革命组织了？

张：大方向不对，对准贫下中农。

总理：谁见到了？

张：北小街……“四不要”，党团员不要。为四清翻案。

康老：有文件吗？你听谁说的，还是看见的？

张：调查的。

康老：谁调查的？

张：各兄弟部队。赵永夫的兄弟部队，张洪的兄弟部队。

康老：哪个兄弟部队？

张：刚才讲的。

康老：赵永夫的，是吧？

总理：你对青海日报有什么看法？

张：部队反映比较大，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在元月二十九日夺权，军队支持问题，实际上是送权，杨植霖同志几次开会，决定送给“八·一八”。那次报道不真实，开会一万一千多人，报导十几万人。我们认为没有按主席指示办报，《青海日报》变成“八·一八”战报。

关锋：不登捍卫队的就是“八·一八”战报？

总理：出了多少天报？

张：(支吾)三十二天。

关锋：三十四天！三十四天报都看了？

张：都看了，要背背不出来。

关锋：三十四天报纸，他有没有传达中央精神？你们讲，不登《人民日报》社论、《红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四天报纸我们都看到了，社论都登了。他们还自己出了文章反对经济主义。只有一天迟了一天。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总理：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老、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啰嗦，文不对题回答)

康老：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语无伦次)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讽刺地大笑)但没搜出来。
周总理：现场上怎样？
赵：有弹壳。(众首长怒，王力、戚本禹拍桌子)
王力、戚本禹：(怒问)没枪，怎么汇报有枪？
赵：没搜出枪。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马浩：你说我们三司四人是机枪手)
赵：据一些人的口供。(又一同学说：他们是逼打成招的！并举了一例子)
总理：(十分生气)没枪你说有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赵：宾馆上有枪眼。
总理：制高点上有几个方面的枪支交叉的，你回答！
杨成武：制高点都被你们控制了。
赵：以后布置我就知道了，我们看到从人民浴池打到宾馆的。
总理：打死那么多群众。
叶群：(气得流泪了)放枪，对革命群众那么残酷，还造谣，伪造林总来电。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造假枪！
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总理拍桌子，叶群、关锋等同志站了起来！)
叶群：(严厉地责问)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伯达：你是造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
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
戚：当面造谣！
杨成武：(万分愤怒)没打嘛(指电话)，你为什么说打？
总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死伤二百六。
总理：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没有。
总理：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副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看？
叶群：(愤怒)你没有人性！你玷污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没有你这样的！真正的革命战士都哭了，你惨无人道！
总理：对！你只拣到一些弹壳。(赵想推给兰州军区)
总理：你欺骗了兰州军区。他们也是根据你们的调查材料，也没有看到枪。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不知道？
总理：到现在你还认为是对的吗？回答这个问题！
赵：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通过常委共同研究，统一认识的。
刘贤权：我不同意。
周总理：刘司令员就不同意。
赵：他不同意。据说是有的。(众气愤)
总理：别说了。面对这么多群众，你还有点儿共产党的气味吗？
赵：(沉默)
康生：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赵不答)

总理：你是哪儿人？
赵：河北正定，参加了游击队。
戚：谁的游击队？那一年？
赵：三七年。
总理：你怎么到的江西？(赵谈历史)
总理：你什么出身？哪个庄子？还有人吗？
赵：贫农。李家庄。还有父亲……
康老：母亲呢？
赵：母亲早死了。
康生：你小时读过书吗？
赵：没有。
康老：怎么识的字？
赵：参军以后认的。
康生：参军以前干什么？
赵：务农。
康老：还干过什么？
赵：当过二年国民党的兵。
康生：所以我问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戚：挤到了边才说。
康生：谁的军队？
赵：教导纵队。
总理：哪两年？
赵：三三年到三六年。
总理：三三年到三六年在什么地方？
赵：在南京。
总理：怎么跑南京去了？
赵：当地招兵。
康生：什么人招的？
赵：不知道。
康老：招到哪儿去了？
赵：检查身体后到了保定。
康生：你不是务农吗？怎么当兵？
赵：生活困难。
康老：多大岁数了？
赵：51岁。
康生：在南京受过训没有？
赵：受过训，教导纵队。
康生：加入国民党没有？
赵：加入了。
康生：在哪儿？
赵：在南京。
总理：你的教导纵队和我们打过仗没有？
赵：没有。
康老：受训多久？
赵：两年多。

总理：三六年？你哪一团队？

赵：（支吾）只有两个团，大概是一团。

总理：哪一连？

赵：记不清了！

周总理：哪个团？哪个连？（赵，答不出）

康老：原来你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啊，教导纵队。

赵：哪一连我记不清了，团以下是营、连。（康老直笑：你是军人怎么流这么多汗？）

康老：下文呢？36年以后呢？

赵：回家了。

康老：为什么回家？

赵：没钱给我。

总理：我问你，在西宁你捉了多少人？

赵：报社数字我不清楚，报社有两千多，后来大部分都放了。

总理：你几号离开的？

赵：24号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到了这儿了。

总理：你们用了南滩监狱吗？

赵：不清楚。

总理：他们都是从南滩监狱出来的。

张洪：用了，在南滩。我以前去过，我们搞警卫，关的什么人我不清楚。

赵：可能……

总理：你知道“二·二三”后同学、工友共关了多少人？

张洪：不知道。

赵：统计是一千七、八百人。（众怒）

周总理：十七、八天了，你的××师作警卫，关了多少人数都不清，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张洪：……到最后。

赵：总理请允许我讲。

总理：讲什么？

赵：军区。

总理：你不是来搞“三结合”吗？你在北京讲过。

赵：没有。

关锋：那天康老、伯达都听了，有录音，有记录。

康老：那天晚上你谈话有记录。“三结合”对象是谁？你认为那个好？

赵：我没说谁是，没这样讲。

康老：有记录，你怎么讲的？

伯达：你讲了一个人。

赵：王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没讲什么。

康老：你这个人一点不说老实话。

戚本禹：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儿脸皮都不要？一点儿脸皮都不要。死不要脸！你讲王昭这个人好，有干劲、有魄力，群众拥护，说过没有？

赵：我说了。但是……

总理：王昭在吗？王昭你说，你原来认识不认识赵永夫？

王：不认识。

总理：你什么时候摔伤的，到哪儿去了？

王昭：在陆军第四医院，一月十二日离开西宁，以后到了洛阳。

总理：怎么到了洛阳？
王昭：到洛阳不用开刀。
总理：谁跟你去的？
王昭：一个秘书，姓宋。
总理：哪天到洛阳？
王：二月十三日。
总理：不对。
王：一月十三日。
总理：在西安呆多久？
王：二月六日离西安，二月七日到北京。
总理：写信(给我们)是几号？
王：三月十九日。
总理：你是个省委书记，中间这么长时间，中央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
王：家里和谁也联系不上。
总理：怎么不向中央报到？
康老：为何不向中央报告？我们还以为你在西宁呢？！一个多月，到处找不到，为何一点不向中央讲？
王：我养病……
康老：你一点儿也不说真话。
王：打电话说中央允许我休养二个月。
康老：什么时候？给谁打的？
王：给办公厅。
康老：办公厅就允许你了？
王：后来三月十九日和中央取得联系。(众笑)
康老：(笑)后来？后来才联系？！
总理：你老婆在北京干什么？
王：在北京市委市监委，休息了好几年了。
总理：光拿工资，不做事？
康老：包庇嘛！(王昭旁一人：你不是说中央准你两个月假嘛？)
康老：“八·一八”红卫兵找你不在？
周总理：这么说你很早就和“八·一八”作对了。
王：开始时是，以后我不介入了。双方都不介入。(旁边的人：你昨天还讲“八·一八”要杀你！)
周总理：在西宁时，公安、政法都归你管吗？
王：××师管公安。
周总理：××师以前归你管吧？！
刘贤权：军区都归他管。
总理：谁参加了联合指挥部？
王：公安厅厅长郑孝先、×××。
刘贤权：赵永夫也参加了。
周总理：(对王)赵永夫参加你就不讲了，有王仲芳吗？
刘贤权：他停职反省。
伯达：青海这么大的流血事件你不知道？
王：三月六日我才知道。
周总理：你同杨植霖同志分歧在哪儿？

王：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总理：你是反“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

王昭：我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

康生：你仅仅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你就为这一点反对他们？

王：组织不纯，作法上有点不讲政策，到后来才知道是反革命组织，……我讲“八·一八”要改正错误我才支持。

康生：也就是说你不支持？（旁边两同志讲：你昨天还讲有三个人不支持！）

王：宋林、杨西林。

赵：我要讲清楚。

总理：你的报告很清楚了。

赵：（强行要讲）请总理允许我讲两句。

康生：你不要讲了。

伯达：你是造无产阶级反的头子，你是造共产党反的头子！

赵：……

周总理：不听你的了，青海两位工友同志来了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王建义：我就把报社的情况谈一谈，我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公路局的负责人。（重複二十三日发言）我可以用我的头保证。帐篷里没有一个死人，我到处走，没有枪。

周总理：青海来的同学哪一位要讲一讲？

李涤环：……坐牢后期，我们和解放军熟了，他说“解放军当时也流了泪”，我说“我也流了泪”。那位解放军说：“他们流泪和你们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有小孩要进报社，解放军不让进去，因为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

康生：清华大学许宝生来了没有。

许宝生：到。

康生：听说他……

许：（叙述自己的遭遇）……一个×××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他哭诉了抓后被斗情况）

总理：你知道不知道，还有多少外地同学被关在监狱里？

许：×××、×××（王建义补充了他们在公路局看见“捍卫队”穿解放军衣服的事）

总理：杨植霖同志讲一讲。

杨：我有许多错误，继续检查。过去支持“八·一八”，他们说“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林总来电了，我是带着向毛主席请罪的心情来的。……讲“八·一八”有三挺轻机枪，“二·二三”以后，送我们两个干部讲，林副主席专门给赵永夫打电话，鼓励他，表扬他……。据他们说，抓了三千多人。

总理：不止，刚才同学讲有一万多。

杨：我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三司同学：那一天我们也参加了）

总理：谁主持大会斗你？

杨：有个常委韩明站出来了，公开站出来批判我，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主要内容是“八·一八”……。自由很难保证，生命也很难保证……小孩拿石头打……，口号不喊打倒王昭，第二个喊打倒高克亭。

总理：高克亭同志来了没有？

高：来了！

总理：哪儿的人？

高：陕北！

杨：现在人心惶惶……下一步怎么办？

总理：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坚决革命下去嘛！

叶群：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

总理：广播学院黄泽泉同学有什么情况要讲？

黄：赵永夫说“八·一八”先开枪，解放军还击，这是欺骗中央……。

×××：……一个女孩身上中了三枪，×××问谁打的，她说的是×××打的。那个人讲，你是“八·一八”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讲×××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讲，我看见是×××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底下陆续有人发言)。

康生：刘凤池同学来了没有？

刘：来了！

康生：你是怎样受伤的？(刘讲述自己受伤经过)

总理：我问一下，张晓川！

张：有。

总理：你哪儿人？何时参军？

张：河北涿县，38年参加地方武装，十三旅。

总理：你何时到青海？

张：到青海一年多。65年11月由北京后勤学院去的。

总理：解放后在那儿工作？多大岁数？

张：在冀东，四十七岁。

总理：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到二月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的手段。

(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一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对受欺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人带走！

(解放军上去揪掉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解下去。王昭在门口哀叫：“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在场同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总理和各位首长和同志们亲切握手退出会场)

(总理当时宣布决定时，被接见人员无比兴奋、激动，专注于听，所以记的不完整。请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关于青海问题的七条为准。整理者注)

630. 戚本禹第五次接见外地红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代表的讲话

(1967年3月25日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因记录不完整，又来不及核对，有些不是原话，但意思基本不错。)

戚本禹：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昨天你们提出来要回青海，给总理提出来了，总理同意。(来了多少？……)

戚本禹：你们有些同志身体有病或其他原因，不一定全部回去，你们组织商量一下，自愿的原则，有没有不回的？

众：没有。

戚本禹：都要求回去！？

同学：有的表现不好的，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不应回去。(鼓掌)但一般写了检查可不同。

戚本禹：什么炮打中央文革？是谁？

同学：××大学的。……

戚本禹：过去打，现在不打，就可以允许他改嘛！触及灵魂嘛！

众：那不能够。

戚本禹：几个？

众：三个，还有××学院二个。

戚本禹：看他以前犯错误，现在表现怎么样？如果表现好，与群众站在一起，允许他们革命，大家讨论一下，至于其他同志写点什么，可不算数，可要回来烧掉，你们找刘贤权说一下。因为他们假借林彪同志的名义，是受蒙蔽的，烧掉算了，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允许他们改错。

同学：有的人……

戚：听说有一个人，××大学的，他说开了枪……包括他在内，允许改正错误，可以原谅，当然不能向他们学习。怎样？

众：讨论一下。

同学：有一个××学院的学生，把责任全推给别人。……他们不配再回青海。

戚：大家讨论，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

同学：在青海我们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我们应该有毛泽东思想，如××大学的××等……他们发表文章攻击三司。还有××学院的××、×××，哭哭啼啼，他们为保自己，说电台是谁搞来的……进行政治陷害，所以不同意他们回青海。

戚：你们要有点分析态度，说是反革命暴乱，谁又是叛徒了，这不好。“检查”都写了吧！×××写了吧？

王：没写，我说的是×××写了，他是看了林总电报才写的，……我说一种人……

戚：这种人是否要他检查一下？

众：不同意他们回去。

戚：要你们讨论。这种人与赵永夫是有区别的。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对这种人我们不欢迎他，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回西宁。

戚：不愿回不要勉强，自愿原则，可报名，名单给我看一下。你们回来有没有要回家休息的？

众：没有。

戚：可回家看看，料理生活，搞两天学习。什么时候走？

众：越快越好。

戚：你们要学习。我来决定，放假一天，学习两天。你们是否回过家？

众：没有。

戚：还是回家，说二十八号出发。(有人递条子，戚看。意思是二十八号没车)

戚：可不写条子，没有造反精神，说一下就行，是不是因为被镇压过。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谁，谁说错了话，当面要提出来。我喜欢有造反劲头的人。你们要回去这问题，提到伯达、康老、总理，讨论很久才决定。你们没有透露消息吧！我有点怀疑。

戚：没有。

戚：因为有好多布置，要等中央宣布，贴出布告。……没参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同学，可选出十人去青海，由红代会负责，不是每个到过青海的都去，那太多了。

哈军工同学：选出十个是北京的，其他……我们哈军工是……

戚：那由哈尔滨决定。如需要可由刘贤权写信给哈尔滨，我这里不能决定。你们是作为北京红代会派到青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没有三司了，应作为红代会派去的，中学的跟中学红代会挂钩；大学跟大学红代会挂钩，要有联系。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要求与刘贤权座谈一次。……

戚：因为他马上坐飞机回去，不能……你们可回青海，……(北京七中一同学提到荆起)

戚：荆起是不是“联动”？

××：不是“联动”也不是“西纠”。……

戚：是也不要紧……

戚：陈逸来了吗？

陈：来了。

戚：还在青海日报工作？你的文章写的不错嘛！文章写的好嘛！要努力办好《青海日报》。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如果跟刘邓走，脑袋早就没了。

陈：(表态)

戚：程光远来了吗？

众：被抓起来了。

戚：不要紧，很快会放出来。他还在青海日报工作！

戚：还有什么问题，同志们！

××：“捍卫队”、“火车头”、“贫下中农红卫军”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急先锋，打人最残暴。“捍卫队”等是否是反革命组织？

众：不要这样说。

戚：他们意见对，不能随便宣布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个多数人的组织要宣布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批准。把昨天的决定再念一念：

(秘书念：根据以上情况，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小组在 3 月 24 日作如下决定……)

戚：关于你们去青海，我问伯达同志有什么指示，他写了三句话，我来念给你们听：

1. 做青海人民的小学生；
2. 做青海人民的勤务员；
3. 做青海人民的好儿女。

在去青海前，你们要学些文件：

- (1)《农村调查序言》八：如何做小学生。
- (2)《学习与时局》，防止骄傲自满。
- (3)《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 (4)《整顿党的作风》
- (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你们自己再选些文章，还有中央文件、社论等，还有清华大学搞的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我给你们每人发一本。还有北京市斗争的发展，出现许多问题，也有许多发展。

好不好，下边讨论回青海怎么办？采取什么方针？应注意什么东西？你们还可以讨论，听你们的想法，现在十点半，可以讲一个小时。

你们不是都要求回去吗，回去怎么办？有什么想法？你们自己要抓活思想，怎么打这一仗，大家讨论。(同学们发言)

戚：首先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戚本禹同志说完看毛主席像)。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所以首先宣传这，不是那一个人，当然你们也有功勋，但首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毛主席对调查方法，对调查关键问题都作了具体指示，要首先向青海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老人家亲自批，林彪同志非常关心，总理亲自处理，他给你们已谈过两次，他还有许多要处理的事，还要看材料，总理看的比我还仔细，青海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要给他们宣传，我想他们是忘不了的。你们不是想念毛主席吗？毛主席也想念你们。是军委命令使你们(指被青海扣押的外地同学)回来的。(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赵永夫是罪魁祸首。

(同学们继续发言。讲到回去如何恢复“八·一八”等革命组织时，戚本禹同志插话：要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一面战斗，一面整风。)戚本禹同志插话：要做小学生、勤务员、好儿子，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就包办代替。(当同学发言中提到青海人民非常信任外地红卫兵，许多事情都说要“请示”外地红卫兵时)

戚：人家“请示”，是你们的光荣，还是你们的缺点？

众：缺点。(同学继续发言)

戚：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军队。(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是不是大家谈到这里。

众：“八·一八”谈点。(有的同学提出军队问题如何搞的问题)

戚：还是要军队自己搞。彭、罗、陆、杨在青海是有社会基础的，王昭是罗瑞卿、彭真、刘澜涛的人。这个事件的细节还要调查，可以配合军队搞，如报社死人问题，你们要翻他的案，他也要翻你的案，阶级敌人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有些问题，内部矛盾很突出，要放到后期去处理，不要取得一点胜利，就打内战，……这说明你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要“反托派”，内部问题要调节，首先把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枪口要对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问题要有意识的放到后期搞。

你们研究一下……我说不清，水平不高，也不好说，不愿意说。王昭没斗倒，你们就打内战，不要轻易戴帽子。有些问题我不愿意说，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宗派主义思想。(同学继续发言，谈到抓革命促生产时，戚本禹同志说，很好)

戚：是不是到这儿。我说些不好听的话，下次见面不要犯错误回来。主席说，经得起失败考验，经得起胜利考验。你们不知道有好多造反派，去年夏天是造反派，到冬天就是右派了。还有的造反派是名牌的，在夺权中成为保皇的工具。如果你们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用资产阶级的就必然犯错误。列宁说，聪明人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我担心你们，当然犯错误也不要紧，可以总结。好的革命者不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用刘邓的那一套，认为别人压迫了你们，你们也就那样。要做胜利准备，也要做错误准备，首先要做错误准备。你们是不是“五一”回来？

众：不行，回不来。

戚：不要包办代替，要依靠青海群众，相信青海群众。你们还有任务，回来要斗批改，有的还要上学。

你们是特许处理的，中央给了指示，是特许，不要再特了，你们安排一下时间，如果“五一”不成，就再拖点。你们做一个月二个月打算。回来再欢迎你们一次，再听一次汇报。不犯错误的根本保障，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处理每件事情紧紧跟着主席思想，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无论对军队、群众、敌人、保守派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我们不是群众的老爹，群众是父母，不要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是诸葛亮，是我们造的反。“我”太多了，必然犯错误。你们是群众的小学生，是群众的儿女。×××出来时不是给你衣服吗，这还不是儿女。打枪时，工人掩护你们，你们要调查，写出来。不要把自己看的了不起。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不要看你们能讲，群众讲的不如你们流利，真正的好，不是讲的好。青海军区的调查员讲的流利，给我讲。看讲的什么，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英雄要用他们的实践证明，所以对群众不要包办代替，要做学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群众的英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俄国的民粹派认为群众是零，自己是一，没有一就成就不了一百，一千……。对群众要尊敬，满腔热情，眼睛向下，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对自己要一分为二，特别是胜利时，要用优点克服缺点，要在严酷中经受锻炼，如果把锻炼当成了包袱，就把锻炼得来的东西失掉了。……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向对立面转化，要有组织性、纪律性，特别是这时，很重要。中央的决定，如果认为刘贤权不如我们，就不服从领导，如说六·三社论我们比他看出来的早。如果不服从他的领导，破坏中央决定的就会是你们。

(对革命组织“八·一八”说)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八·一八”要一分为二，一边整顿，一边斗争，也不要有关门主义，搞的纯了又纯，是革命群众组织嘛。

要警惕坏人挑动，特别是你们自己里边的坏人，敌人也会打进你们里的，挑动你们转移斗争大方向。(谈到军队)，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军队中还有坏人，会处理的。你们自己不要去揪××什么的，因为赵永夫在北京已被扣起来，就去揪别人。哪些人是赵永夫一派的，都要处理。如何处置，到一定时候就会处置。要向解放军学习。……特别是对待执行任务的十三个连，要处理好。我们共产党人不记私仇。是反革命利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感情，当然他们是有责任的，他们会检查，但你们要原谅他们，责任不在他们，解放军很多是好的，要看到这一点。

怎样对待保守派，也要按照毛主席思想去办，对他们愤怒是正义的、革命的。但由于激动就容易偏激，在处理保守派时就会发生不符合政策的情况，这要防止。对待“捍卫队”、“总部”，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不要报复，要提高他们的觉悟，争取他们，团结

他们。这是考验你们了，也要说服“八·一八”。对受欺骗受蒙蔽的概不追究。对待群众组织……不要去考虑：马上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他们那里边有坏人，把坏人孤立起来。争取进步的，团结中间的，孤立顽固的。你们只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他们就会垮台的。他们中也有进步的，要鼓励他们内部造反，说他们是保字号组织较好。要讲究斗争方式，坚决执行军委八条，不戴高帽子，你们回去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

对待敌人，坚决斗争。如果将来把赵永夫拉到青海去，如何斗，你们可以提出意见，如何斗，是游街？可与领导研究。

对“捍卫队”的坏分子不能同群众一样，对他们实行专政，但要按照法律，按照军事管制程序，不要乱抓人，打人，除现行的当时抓外，一般的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查，依法处理。

对待他们要用正面教育政策，你们才能扩大队伍。青海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模范，像山西那样。因为暴露充分，有条件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据地。如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可能刚胜就丢掉了。要戒骄戒躁！！！

631. 江青在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967年3月25日)

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

你们好！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热烈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这次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是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团结的大会，是总结经验，肯定成绩，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的大会。

北京的中学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当红卫兵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就以最大的革命热情支持了这一新生事物。这是毛主席对革命小将们的最大关怀，也是革命小将们的最大光荣。要珍惜这个光荣，要爱护这个光荣。

革命的红卫兵战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你们发扬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精神，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大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你们运用毛主席的阶级分析观点，批判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对反动组织“联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你们坚决地抵制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积极地执行和宣传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革命的红卫兵，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创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我们希望，革命的红卫兵要戒骄戒躁，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当前中学红卫兵小将们的任务，就是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回到本校，复课闹革命。一边上课，一边搞革命。依靠中学的广大的革命师生，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进行斗、批、改，把中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红卫兵战友们，为了完成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必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展整风学习，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现在北京大多数中学正在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没有进行的，不久也要进行。我们希望你们虚心地向解放军学习，热情地同他们合作。在军事、政治训练中要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克服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

战斗化的革命队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伟大革命运动。只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团结广大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必须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要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红卫兵战友们，你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对待教师和干部，对他们要进行阶级分析。那种对教师和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反对，一概打倒的作法，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作法就是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几个人的主张。中学的教师和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要打倒的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一小部分混到教师职工队伍里的不肯改造的地、富、坏、右分子。对于革命的教师和干部，应该支持他们。对于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必须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使他们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

对于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而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学，应该耐心地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团结他们一道复课闹革命。不应该歧视他们，排斥他们，更不应该对他们进行斗争，要和他们一道进行整风学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回到正确道路上来。这样就可以把极少数坚持反动思想的，专搞打、砸、抢的坏分子孤立起来，把他们暴露在广大群众的光天化日之下，对个别情节严重的犯罪分子，可以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红卫兵战友们，要实现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发展壮大我们的左派队伍，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毛主席和我们党从来都是既反对忽视阶级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的。只有坚持毛主席的阶级路线，逐步地团结学生、教师和干部的大多数，才能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一小部分混到教师职工队伍里的不肯改造的地、富、反、坏、右分子。

我们必须注意斗争方法，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要严格执行党中央转批的军委八条命令。要文斗，不要武斗。

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我们号召你们回校复课闹革命，是不是说你们不要关心社会上的斗争、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了呢？不是的。你们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是和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不开的。希望你们，身在学校，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说到这，我不能不以非常兴奋的心情告诉大家，目前，不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不论文化大革命形势，还是工业农业生产形势，都是一片大好形势。当然，一切剥削阶级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都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斗争是曲折的，有反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总的形势是大好的。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你们应该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以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精神，把本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同学们，战友们，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希望你们永远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努力改造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让我们高呼：

革命的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632. 周恩来在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967年3月25日)

同学们，红卫兵战友们，好久不见了！

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我们红卫兵战士们问好！热烈祝贺你们大会的成功！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的敬礼！

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的讲话。

伟大的红卫兵运动从北京的中学兴起后立即得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热情支持，迅速地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去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了你们后，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带着冲天的闯劲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到处串连，煽起社会主义的风，点起文化革命的火。你们剥削阶级的四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把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余打了个落花流水，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你们响应毛主席关于徒步长征的号召，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教育自己。你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自己队伍中一小部分人的反动血统论的思想，同反动组织“联动”的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小部分人所做所为是绝对抹煞不了红卫兵的丰功伟绩的！你们批判了和打击了这种反动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的组织更加健康、壮大起来了。

毛主席和党中央向你们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我们高兴地看到，你们已经积极地行动起来。希望你们一面上课，一面努力整风，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主要是自己教育自己，同时也希望你们虚心地向大专院校革命的哥哥们姐姐们学习，向革命的工人和农民们学习，向我们亲爱的解放军同志们学习。

我在去年国庆以前，我同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们曾经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很遗憾，以后由于忙于同大专院校、机关和外地的同志们联系，同你们的接触就减少了。今天看到了你们的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济济一堂，思想水平、斗争水平比过去更加提高了，感到非常高兴！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祖国的前途无限光明，世界的前途也无限光明。希望你们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吧！

革命的红卫兵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633. 聂荣臻接见国防科委系统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代表讲话

(1967年3月25日 京西宾馆礼堂)

接见首长：聂荣臻、叶剑英副主席。萧华、杨成武、彭绍辉等。

叶剑英：同志们，请你们来，传达一下林副主席的指示，是主席同意了的。就是关于国防科学研究院军管和调整改组的问题，六个部的好几个院和科学院部分单位实行接管，先进军队进行管制，对调整改组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如何把各院系统搞合理，促进国防科研生产的发展，尖端常规都要大力发展，生产使用，人员都要合理的安排。国防科研解放以来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中间有波折，主要是贺、罗他们这些人把我国这个部门搞得有点混乱，否

则我们会进展更快，今天聂荣臻同志谈些意见，供大家讨论，经过军管，体制改革以后，更加强大力加强我国国防科研工作，聂副主席提出这个意见，林副主席说再不能拖延了，要逐步落实。大家明了，可充分讨论，意见可向军委、科委反映。下面聂副主席报告(鼓掌)。

聂荣臻：同志们，今天到会的有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种兵种，各国防科学研究院、所……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我想和同志们谈几个问题，有的涉及国家机密，不要写大字报和传单。可以在各单位传达。

三月十一号，我们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写了：关于军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体制的报告。三月十七日总理讲了话，是根据主席指示精神讲的，宣布了二到七机部军事管制，各个院及科学院新技术局由国防科委接管，实行军事管制。一方面抓革命、促生产，同时进一步调整改组国防科委体系。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都同意了。三月二十一日主席批示“照办”。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国防科研的极大关怀，(呼口号)是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伟大的光荣的任务，(呼口号)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我国国防科研工作搞好，为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今天我讲三个问题，第一是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第二是关于调整改组问题，第三是军管和改组中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关于军事管制问题。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一月份以来，抓革命、促生产，无产阶级革命派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向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总反击，是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领导下，击败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乘胜前进。

国防科研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大量问题。国防科研虽然受了罗瑞卿的恶劣影响，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国防科研战线职工努力的结果。罗瑞卿在国防科研部门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错误是批判刘邓路线的一部分。

各单位、各部门文化大革命正深入发展，斗争正深入进行，国防科研部门，几个院是国防机要部门，文化大革命要搞深搞透搞彻底。要促进国防科研生产，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国防科研战线广大革命职工，掌握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在国防科研战线出现新的跃进。

斗争很艰巨，要团结绝大多数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斗批改的任务也很繁忙。现在国防科研部门处于领导瘫痪，科研停顿，协作配合中断，三线建设受到影响，泄密很严重。抢黑材料、砸保密柜，有的流到外面去了，望同志们深思。要扭转这个局面，不能等闲视之，斗争很尖锐，时间很紧迫，不能松懈警惕性。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苏修美帝惊慌，他们互相勾结猖狂反华，蒋介石也蠢蠢欲动，最近“关岛会议”是策划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要有准备，才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要抓革命、促生产，恢复国防科研工作，把我们工作做得更好。

军事管制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措施。主席指示解放军要支持左派，最近主席先后指示解放军要支工、支农、军训、支左和军管。不少同志提出这个要求，人民解放军要响应人民的要求，对国防科研更不能坐视，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团结中间派，反对右派，对反革命要坚决镇压，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经中央国务院批准，对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四机部十院、五机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六机部七院、七机部和科学院有关国防科研单位由国防科委实行接管。第一步是实行军事管制，这不同于解放时的军管，这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军管，军管小组依靠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抓革命、促生产。解放军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支工支农军训支左军管是新任务，没有经验，只要高举毛

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相信，就一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军委正抽人进行训练。

第二，是关于调整改组问题：在正常恢复国防科研生产，深入进行斗批改的同时，进行科研体制的调整改组。这个问题不是凭空提出来的，国防科研战线，回顾十多年来经验教训，特别是近几年的问题，同志们提出很多尖锐的意见和强烈的要求。解放十七年来，在我国、在军内，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前期是彭、黄，后期是罗、贺，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建军路线。两条路线反映到国防科委也是很尖锐的，一条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树雄心、立大志，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一条路线，前期以彭德怀、黄克诚为代表，我们把他们反掉了，在林副主席领导下，国防科研有很大的发展，后来罗瑞卿又跳了出来，薄一波也伸出黑手。刘邓彭贺就是他们的后台。罗瑞卿反对自力更生，竭力推行仿苏，苏联在技术上材料上等各个关键上卡我们，常规也是过时后的给我们，我国自己新建的国防科学生产部门很薄弱，处于不能自给自足。毛主席早在四九年就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林副主席也提出“要走自己的路，靠买是不行的。”毛主席、林副主席给我们提出了前进的方向。59年毛主席提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60年制订出12年科研发展规划，55年成立二机部，56年建立五院，开始搞国防新技术，搞尖端。当时很困难，全是白手起家。彭、黄克诚说：“你甩你的原子弹，我吃我的山药蛋。”要人不给人，要钱不给钱。58年主席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时，苏修封锁越来越明显，主席又提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群众起来了，种下了科研发展的种子。这几年出了很多成果，都是那时种下的种子。国防科研部门成立了院、所。要不要尖端，要不要为国防服务，彭、黄、刘是刮阴风、泼冷水，不相信自己，死抱苏修，为国防、为军队也不明显。我们之间是有斗争的，有时斗争是很激烈的。

薄一波与彭、黄唱一个调子。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听薄一波的报告就没有国防二字。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支持国防科研的。

60—64年，庐山会议揭露粉碎了彭、黄反革命集团，成立了以林副主席为首的新军委，国防科研有很大发展。这时苏修撕毁了中苏协议，这是大好事，毛主席说应当给赫鲁晓夫一个特大的勋章。说明我们要走自力更生的路，这也是逼上梁山，放手自己干，这是大好事。毛主席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提出：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不管什么机，不管什么弹，我们都要搞出。

林副主席对军委作了一系列指示，指示军委要抓国防科研，“二弹为主，导弹第一，狠抓电子工业”。

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61年成立了6、7、10院，充实了×机部，×院的人多。为了真正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防科研体系，我们抓了四项工作：

- (1)抓基础条件；
- (2)抓尖端；
- (3)为常规发展搞技术储备、预先研究；

很多单位20%—30%的人员搞新课题，搞预先研究，也由三部为探索新课题作好准备。

- (4)抓技术院校工作。

改进教学，充实条件，开辟新专业，培养了干部。中国科学院也办了不少专业训练班，为国防科研部门，高等学院，培养了很多人材。

这四个重点是有成效的，为国防是明显的，进展是比较快的。

但是就在基础尖端等工作成绩很大，取得初步成效，国防科研将有更大发展的时候，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发展起来了。

60年，苏修美帝联合反华，卡中国。

61年，国家困难时期，刘邓屈从苏修压力，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刮下马风，有力量就是不让搞，买东西也不给。这时贺龙、罗瑞卿也跳出来反对。

刘邓只听贺龙、罗瑞卿的话，不安排，不听我们的意见。

薄一波也出来说：“什么新型材料，我不懂。贺龙62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要中央从新考虑“二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罗瑞卿与贺龙一唱一和，大叫：“能安排的就要安排，不能安排就坚决不安排，国防工业生产耽误了，工办负责任。”反过来又攻国防科委是从资料到资料，从理论到理论，一事无成。进行大杀大砍。

我们是肩负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顶着风浪，迎着逆流前进，我们有意见要向邓小平反映，邓小平就说：“有什么可汇报的。”要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关怀和支持国防科研，还不知原子弹什么时候出来，还不知国防科委要受到多大摧残。

虽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了刘邓路线的干扰，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但在毛主席领导下，国防科研战线广大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国防科研发展还是很快的，为今后出更大的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4—66年，国防科研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在部院合并问题上，罗瑞卿大搞个人野心，三月十七日总理已经讲了，罗瑞卿在部院合并搞个人野心。部院合并，跟大家讲清楚，是中央同意的批准了的。并提出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国防科学研究，我们认为国防科研归工办领导也不是不可以的，科委可以多抓一些方针政策。科委一些同志不高兴，有意见，周总理也提示我们要在新的条件下，为国防科研作出更大的贡献。当时我个人很担心，希望国防科研得到重视，工作要搞得更好，我吩咐了各院若找我们，我们可尽最大努力去办。

罗瑞卿利用部院合并，搞个人野心，刘邓彭贺就是他们的后台，他到处骂，到处伸手。他还知道中国科学院是干什么的，就要把科学院变成九机部，好扩大自己的权势。张劲夫在这个问题上耍了两面派，他没有报告中央，也没有告诉我，我听出来了，制止了他。

65年8月，罗、贺进一步搞厂所合并，不报告中央，在底下大力推行，千方百计想搞国防科研部门。有的研究院、所已不象个研究部门，有的被拆得七零八落，厂所合并把已经形成的科研拳头瓦解了。我写信给总理，总理勒令厂所不要合并，有的人不听，还在底下搞，我也没有办法，只有让他们搞。这次文化大革命，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了，揭露了大量事实。不少同志写信给我，找我谈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让大家去分析，去认识，去作结论。我也不划框框，现在和大家谈清楚，大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可以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

庆分公司是总理指示停止厂所合并后，合并的，提供了很多好的材料，三机部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很积极。有些材料，我可以选念一些。

一位七级工说：“科研和生产不同，生产是定型的，科研是设计，搞创造、变化，放在车间不行，搞得很乱，我们合并后，那个乱劲，拍成电影，五角钱一张票，也挤不动。”

还有一位工人说：“又抓生产，又抓科研，科研又不能搞大量生产，生产一紧，科研就挤掉了。说让步，是每月让、每年让、打乱仗。”

一位技术科长说：“科研、生产是两码事，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管理，合并后，就削弱了科研力量。”

五机部党委有个报告，总结了合并两年来的体会，认为合并是矛盾的，是违背毛主席思想的，科研、生产矛盾更激化了。

总之，不是归谁管不归谁管的问题，不是穿军装不穿军装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部院、厂所合并后：

1. 削弱了党的领导，削弱了政治思想工作，削弱了发扬我军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光荣传统。

2. 篡改了为国防、为部队、为战争服务的方针。罗瑞卿提出：“科研人员到生产第一线去。”

部队急需的，没有，不安排，却相反，生产什么，叫部队用什么。

3. 对科学实验是采取消极主义的态度。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伟大论断的，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4. 取消发展武装装备的自力更生的道路，罗瑞卿就大砍预先研究。

罗瑞卿的破坏，对国防科研确有很大损失和影响。广大革命职工是限制和反对的，他们埋头苦干，成绩很大，若没有罗、贺的破坏，成绩一定还大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被揪出来了，批判肃清罗瑞卿的影响，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林副主席指示，要求我们很好的总结十年来国防科学的经验，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性的大总结，包括正面的、反面的，广大革命群众是亲身实践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273 页第一段）”我们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解决国防科研领导体制的问题。

根据中央批示，将几个院、科学院部分单位，由科委接管，结合斗批改，进行调整改组。

1. 把国防科研单位进行调整改组，填补空白，加强薄弱环节，建立各新的研究院。
 2. 保证各院研制器材、生产的需要，建立一批工厂、车间，必要时也可以抽调部分工厂、车间划归各研究院、所。经过文化大革命，破私立公，我相信，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3. 加强充实国防工业部门的研制力量。
 4. 有的接管单位，如三线建设，涉及面很广，要与工办研究解决。
 5. 健全各兵种、军种的科研机构，长期以来，技术论证是薄弱环节，今后要大力加强。
- 今后，国防科研系统要：

1. 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军委的领导下，要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政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兴三八作风，建设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非常战斗化的国防科研队伍。
2. 要使科研生产从军队、从作战、从使用出发，使国防科研为战争、为使用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军事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3. 组成集中指挥的国防科研的领导机关，大力加强协同。
4. 国防科研、国防工业，任务有不同，分工很明确，对国防工办，抓好军工生产对战时动员有好处，很必要。国防科研在平时又是国防工业战争的一个重要部门。调整后，国防科研与国防工业、民用工业在元件、基础、技术各方面的大力配合，组成新的国防科研体制，为我国，为世界人民服务。

集中统一，分工协作，是苏修美帝不可能有的，我国有条件，我们要打破框框，走自己的路。我们有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可以直接聆听毛主席的指示，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气魄，有力量，有条件干出外国人不敢设想的事业。我们有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勤劳勇敢的六亿人民，应当对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要建立适应我国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国防科研体制，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不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和期望。

第三，接管及调整改组中的几个问题：

1. 抓革命、促生产

军管的第一条是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支援革命派。

军事管制实际上是政治管制。

要把解放军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带到研究所，抓好这一条，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军管人员不可忘记抓革命，要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革命带生产。用生产压革命，就要犯方向的错误，就会使革命受到挫折，生产也是搞不好的。要支持左派，选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干部。林总指示：“千万不要成为拿枪杆子的刘邓工作队。”搞革命，生产耽误了

一些，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破除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人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改变，这是主要的、根本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基础，是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国防科研的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任务很繁重，都要抓好。林副主席指示，革命要放在首位，但时间上生产要多一些，革命生产两不误，军管人员去不但要解决内部问题，而且要解决对外协作配合问题。要充分发挥群众组织和业务机关的作用。

2. 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是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基础。凡大方向一致的，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如何实现？就是要开门整风。如果不整好风，不放下包袱，就不能轻装前进。敢不敢开门整风，敢不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能不能听取不同意见，是能不能团结广大革命群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林总提出我们每个人“既要是革命的动力，又要是革命的对象。”要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反对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等。宗派主义要警惕，一个组织开始有些成绩，如果有了宗派主义，不加以克服，就会走向垮台，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才能不断前进。

3. 干部问题：

对老干部看法，一定要有阶级分析，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在阶级斗争中是有分化的，有些人蜕化变质，但不会通通是坏的，也不会通通都是好的。要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挖出来斗倒、斗臭。对无产阶级当权派要帮助和支持，对那些犯了错误，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给他们将功赎罪的机会。

对一般的技术干部，要按照十六条中第十二条所说。（“见《十六条》”第十二条）

4. 正确处理改组中的矛盾，统盘考虑，工作量很大，要处理好矛盾。在改组中，要从大局出发，反对本位主义，要善于调查研究，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完成毛主席、林副主席交给我们调整改组建立新的国防科研体制的光荣任务。

研究人员要有主人翁的态度，个人服从集体，有人到工业部门去，有人到科研部门去，不管到那儿，都是为人民服务，都要愉快接受。通过文化大革命，同志们思想上有很大的提高，一定可以处理好这个关系。到军内的，不能离开国防工业、民用工业的协作配合。应当充分重视中国科学院探索性研究，这方面要加强，方向要更明确。

处理这些问题，如果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从全局出发，不从整体出发，就会犯错误。

国防科研成果对国防科研、民用工业也会有很大的促进和带动。

5. 建立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班子：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的中心又是领导班子的问题。是当前首要的任务，解决不好，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搞彻底。

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是选择干部的标准。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指出：（见语录 239 页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240 页）经常不断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

林副主席也提出选拔干部的标准：(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2)突出政治；(3)要有革命干劲。

我们就要按毛主席、林副主席提出的干部标准来选拔领导班子，这是调整改组中的头等大事。

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干部手中，使我国国防科研永远在毛主席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奋勇前进。

军管调整改组的任务很重要。但千重要，万重要，毛泽东思想最重要。千条万条毛泽东

思想第一条。这是革命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是防修反修的需要。它大于一切，重于一切，先于一切。我们要把毛著学习推向一个新高潮。破“私”立“公”，改进工作和思想方法，破除一切框框，自力更生走自己的道路，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非常革命化的国防科技队伍。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我们要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实现思想革命化，国防科学研究将会有一个新的飞跃发展，以更快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全中国全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叶剑英：

聂副主席在长篇报告中，对国防科研军管调整改组的问题，作了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对国防科研部门的军管、调整、改组及今后国防科研发展有很大的意义。下去之后，要组织讨论，并提出意见。文件修改后，要发给大家。现在传达就用你们自己的记录，意见可书面反映到科委、军委。

其他各同志有没有意见？没有，现在散会。

634. 李富春对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军团联系人的讲话 (1967年3月25日下午 中南海会议室)

出席人：高明、魏章玲、宗兰香、于玉华、周松柏。(当谈到军团调查团报情况时)

李富春同志插话：昨天团报打电话来，要见我，我说我要先见军团。(当谈到团报去年八·一四夺权时)

李富春同志笑着插话：那时中央还没有提出夺权问题呢！富春同志秘书插话：那时革命派还没有大联合，怎么夺权？(当谈到胡耀邦的“申述”时)

李富春同志插话：这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表现。(当谈到青年社把聂元梓、蒯大富的讲话抄送到团中央机关时)

李富春同志插话：走小道不走大道，《红旗》杂志社论不好好学，听马路新闻。(当我们问到共青团的前途时)

李富春同志说：前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党中央决定改组团中央书记处，而不是决定取消共青团。原来是想是否让红卫兵参加或代替，中央的方案还没有定。还要请示党中央和毛主席，把你们的意见带上去。机关、工厂、农村还是团的活动多，解放军也还是团的活动多，工农兵团的活动多，就是学校里红卫兵活动多。小学校里是红小兵，其他地方是否都是红小兵，还要考虑。青年团和红卫兵的关系，少先队和红小兵的关系，这些问题要请示党中央和主席。

“五四”怎么搞法，一个是红代会来搞，一个是改造的三结合的共青团来搞，两家合起来搞，到底怎么搞，还要请示党中央和主席再定。

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团的支部还在那儿活动的，还没垮的，各级团组织还没垮的，应该活动，应该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起到团的作用，应该开展团的活动。

我们问：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怎样解释？

李富春同志说：

我的理解是这样，当我们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时(从去年《红旗》十三期社论，实际上从林总去年十月一日讲话起)，提出了反对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从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到今年一月，各个地方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进一步组织群众斗群众，而不是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2)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御用的保皇的组织来打击革命派，什么“工农红旗军”，“赤卫军”，一直到我们湖南的“湘江风雷”都是这样的组织。(3)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用贿赂收买政策，发工资，放假，探亲假，怂恿工人上北京告状等形式，把他周围的工人分散，免得斗他。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中央各个部门都接待了一、二万人。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就搞新反扑。就是在这个时期，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这个新反扑被我们打下去了。从一月、二月、三月这个时期，从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的夺权斗争起，明里暗里来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主要表现在《红旗》四期社论发表，党的干部政策提出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执行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出来搞假夺权，出来搞假三结合，恢复原来的班子，实现复辟。对干部政策来说，我们既反对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每个干部都是好的”，那就错了。复辟的逆流实际上是肯定一切的逆流，似乎所有的老干部都好了，而没有看到十七年来，很多老干部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是蜕化变质的，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清楚有些老干部过去是自首的，实际上是叛变，所以把老干部一分为二很重要，不能否定一切，也不能肯定一切。有问题的老干部中，一类蜕化变质的，一类是自首出狱的，还有一类是长期养病，无所作为，没有干劲的。这三类干部要分清楚。这三类干部的蜕化变质的，正如主席所讲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人，他在民族民主革命时，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打倒封建主义，打倒蒋介石，他是赞成的，土改分土地，他也赞成的，一到触动资产阶级，真正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发生问题，就要犯错误。十一中全会公报讲，六二年至六四年，主席九次掌舵有九次伟大的措施，扭转了局面，这还只是六二年至六四年。从七大开始，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以刘邓为代表的特别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常常犯错误。一九四六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不要搞战争了，可以和蒋介石合作了。四九年天津干部会议的讲话，就提出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五二年反合作社，五六年反冒进，六二年对三面红旗吹冷风，结果发生三和一少，三自一包，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每一次错误都是主席出来纠正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但是刘邓的反动路线时常出来干扰，来破坏主席的这条红线。十七年来，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是主流，同时还要看到刘邓反动路线的经常干扰和破坏这条红线，而每一次都是主席出来纠正的。所以从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主席提出来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后，我们有一些同志容易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中，受资产阶级影响。六二年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贯穿着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总是想尽各种方法搞复辟，不甘心他们的灭亡，无产阶级就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扑，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四九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三座大山推翻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了，当时说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向我们进行了反扑，我们采取的办法，是经过多少次党内党外的斗争。四九年五〇年剿匪清霸，五〇年五一年土改，五二年三反五反，五三年五四年高饶事件，高饶反党联盟，党内斗争，五七年反右斗争，反章罗联盟的轮流坐庄，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五九年，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党内斗争，这是反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斗争。六二年反三和一少和三自一包。六五年底到六六年五月，反党内彭罗陆杨。去年八月，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动路线的制订者—刘邓。六六年前，这些党

内党外的斗争都是反对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斗争，都是四九年后不断的夺权斗争。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都是党中央领导的从上至下的斗争，要根本铲除修正主义的根子，单是从上至下的搞还不行，一个一个地搞不行，所以主席根据我们党的革命斗争经验，根据苏联出修正主义的经验，要真正彻底根除修正主义，真正培养革命接班人，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使我们党永不变质，主席英明伟大，高瞻远瞩，有伟大的魄力，敢于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所以这是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搞过，因为他们那时还没有夺权，列宁没有来得及搞就死了，斯大林后期根本没有搞。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从下到上，要扫除中国的黑暗面，这个本身就是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

你们这些青年要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过程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学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对任何事物要用阶级观点作具体分析。我们每个人，包括你们年轻人，也包括我们这些人，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的思想，不断地思想革命化。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由来。所谓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情况，向你们谈这些。

形势好得很，不管你反扑也好，逆流也好，都要被打退，击破，无产阶级总是要取得胜利的。你们当接班人，不是接位子的班，部长、副总理好接，主要是接毛泽东思想的班，没有毛泽东思想，你坐的那个位子也是靠不住的。要根据党中央的文件，二月份党中央文件最多，比去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发的文件还多，有二十多件。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空前未有的，在不断地摸索经验，不断地前进。我们已开始提倡革命化，大家要革命了，大家敢想敢闯敢干了，但是在干革命的过程中，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不但要有革命性，还要讲科学性，要按照党的政策和策略，背语录你们也会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要组织纪律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风头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那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无产阶级最讲究组织纪律性。无产阶级既要有民主，又要集中，林彪同志提出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是因为革命搞到这个时期，敢想敢闯还不够，还要讲究政策和策略，才能集中力量，真正打垮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们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时，我一定要去讲话。有些问题你们回去要研究一下。《红旗》杂志五期社论指出，三结合要在革命群众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团中央机关本身没有问题了，但是团中央直属单位还有问题，对直属单位，你们还要帮忙，还要做工作，对革命组织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多做点工作，大联合起来，这一点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直属单位的内政，也是你们的内政，你们不要“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别的单位可以不管，直属单位一定要管，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做工作，把革命组织大联合起来，没有大联合，团中央的三结合不巩固，假如有的直属单位搞独立，不服从领导，你怎么办，你们就会成了孤家寡人了，我奉劝你们要做一些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搞大联合。这是一点意见。

第二个意见，三结合的名单可以适当地扩大一点，每个直属单位参加一人，由直属单位的革命群众自己选，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都可以。机关中层干部也可以参加，部长处长一、二个或二、三个，二十多人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不算多，可设常委会。解放军顶多派个把人，(我们提出要越多越好)我再去请示，能派三个就三个，能派两个就是两个。

你们可以先搞三结合，要留名额给直属单位。职权范围，我同意你们多数人的意见(即：主要是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日常工作，对全团只起联系作用，调查研究共青团的改造等工作，但不负责领导。)暂时这样定，革命发展了，根据情况，再由中央决定。

团中央机关参加三结合的三个人(指惠庶昌、王照华、王道义)我不发表意见，你们怎么办就怎么办，三结合名单提出后，要打个报告给中央，中央批准，因为你们是中央直属机关，各省市单位都要经中央批准，团中央也不例外。

干部亮相检查，各种形式都可以，但必须得到群众的通过。成立时，开个成立大会，我

来出席，直属单位现在能参加三结合的就参加，不能参加的就留个名额，你们先成立机关的。这样能促进直属单位的大联合。

要把干部排个队，把书记和部长排个队，看看都是什么性质。由革命造反军团负责把前书记处书记和部长副校长排个队，开个名单。

解放军派一个到两个，直属单位不派了，他们搞民兵代表。

(当富春同志看到我们带去的第十二期革命造反简报时)李富春同志说：你们的简报办得不错，以前的我怎么一份都没有收到？(我们回答：每期简报我们都给富春同志送三份，收不到的原因，我们回去马上查。)

635. 周恩来接见新疆代表团时座谈记录

(1967年3月26日下午 中南海)

被接见单位：新疆无产阶级革命派“红工司革命工人、革命干部”代表，兵团代表，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

(总理穿一身灰色的衣服快步走入会议厅，大家站起来，总理和代表一一握手)

总理：你们现在就十一位了？(指新疆自治区代表，总理点了名)其他外地同学都回来了吗？

北京同学：新疆军区把我们赶回来了，下令3月10日离开新疆，有隐瞒、窝藏的受纪律处分，把我们当反革命了。

总理：12月19日以后，去新疆的人最多，这一次四百名是23日到的，过去的四百名(同学们：是去保王恩茂的)现在你们整他们了吧！(对北航的同学讲)你们去了以后正碰上1月26日事件(同学：对的)，你们刚去第一件事是碰到夺权，第二是石河子问题，第三是军区2月11日事件问题，复杂性就在这了。(总理看见同学桌上摆的东西)什么东西？(同学们递给总理军区政治部的造谣传单和一些大标语的照片)你们这些传单很重要，我全要看。这些标语一看就是坏人写的，很显然是反动的。(同学们把照有“王恩茂万岁”的相片给总理看看传单和一些大标语的照片)你们这些传单很重要，我全要看。传单应追，又通过印刷厂，不是一个搞的，即使不是军区搞的，应把问题追查清楚。(同学们又递上了两张传单，要秘书仔细查一下，当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指示的造谣传单时讲)(同志们又递上了军管后的报纸，总理看过后又要过去的报纸对照一下看)王恩茂住在北京很舒服，还要保护做什么？

我问你们，你们是革命派夺权，自治区党委有一些坏人，对武光、吕剑人、祁果怎么看？(大家讲了武光的问题……)

总理：武光参加石河子事件你们知道吗？(送上材料)

代表：根据我们调查，看不出石河子事件和武光有什么联系。

总理：噢！(接着看材料)听说武光去石河子两次。(交上清华顾立德写的武光在石河子活动时间表，陈志写的时间表。)(总理详细的看了时间表。)24日上午去的？代表说：武光是首都三司叫到石河子去的。

总理：武光不是去过石河子两次？(同学：我们知道就一次，21日武光根本没有去，是三干会讲的，这有19—26的时间表)

总理：你们整的材料是客观的，我粗看你们的材料也可以抓住把了，武光说：“有的解放军支持保守派”，兵团医学院在石河子问题是站在那一派？(答：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那就更复杂了，武光支持了那儿的造反派，讲这话是有企图的，是说了一些煽风点火的话。(北航红旗：根据当时情况看，武光在石河子不支持造反派是犯罪的……)(兵团“八野”是保守派组织)

总理：“八野”夺“汽二团”坏人权是对的。(兵团同学：“汽二团”夺权是造反派先夺权……)

总理：你们对石河子“汽二团”夺权问题也要推翻，那一下子全要推翻，让我站在中央地位怎么讲话，那就要进行全面重新调查。关于“八野”回去这样大吹大擂，我是反对的，这样是错误的，上一次我就讲应该解散，他们说已解散了，我一直追这个问题，这么搞还行！我叫张希钦发通令要解散。

三干会停止专搞武光是不对的，我们的意思祁果、武光、吕剑人他们反对军区召开三干会，可以在开完后批评一下。

代表：夺权指挥部和军区和武、吕、祁开会，武光说：是否由夺权指挥部和军区联合主持，夺权指挥部是最高权力机构……。

总理：我抓住你的这句话，武光这样说是有煽动的。可以看出他没有努力去调解放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军区主持召开三干会，我们二十三日在京西宾馆传达主席的指示，(代表：武光事先是不知道的)，不会不知道的。

代表：凡参加了三干会的全是三结合对象，又恢复了原状。

总理：你一讲我就了解这个人了，这显然是挑拨，你们不要替他辩护，我要你们和他分开。

武光、祁果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争论，现在还在进行，错误有多少，我不能说。

总理：“我不同意这个话。这样的话就错了，关于武光一个书记讲那个话是不对的，应做工作，不能挑拨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26日武光从石河子回到王金波那里去没有？你们有办法证明没有。

北航“红旗”同学：谈了武光去王金波处的前后经过。

总理：三干会你们谁参加，情况怎样？

同学：三干会上只说郭鹏……

总理：当时还给你们采访自由了(总理十分关心生产会议讨论的事，就记下来了，解放军报社记者李××)

同学：现在没有了。

总理：还有一个问题，2月11日事件。

北京同学：我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的同学是“罪魁祸首”，写了二条通令……(总理哈哈大笑)。

总理：你们二司和北京三司去的是革命派，这是我一向肯定的，现在也是这样的。你们夺权在初期没有三结合，初期没有三结合，初期没有经验，有些幼稚的行动，中央从来没有责备过你们，从来没有说你们的大方向错了。但提倡推广要慎重，上海第一个夺权，就一个名字就推到二月底才报导。因为没有三结合也掌不了权，主席一直抓夺权，有的一挑就夺。南京是如此，合肥是如此，要报导就要慎重了，夺权是不是肯定下来，中央各部里三结合的典型，也是一直没定下来，因为没有三结合就掌不了权。(代表：我们夺权是听说王金波要夺权，所以我们先夺了)你们总爱受人挑吗？青年的革命组织夺权，我们从来没有批评，但夺权后的作法有些行动偏了就要说一下，提起注意。区党委内部的人正在斗争。武光、祁果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争论，现在还在进行，错误有多大我还不能说。

你们要分开，不要牵引他们上去，回去把两方面争论的都公布出来，你们客观地来看，不要与他们连在一起，一牵连进去，你们就容易上当。

还有“1月26日事件”。“12月19日事件”和“1月26日事件”完成是两回事，是根本不同性质的。对“12月19日事件”我们的看法完全不变，责任完全在自治区党委、兵团党委上。(总理念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给12月19日六条电文最后一条)现在自治区党委和兵团党委也承认错误。1月26日事件打了枪，打了枪是反革命事件，如果因为石河子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也说“12月19日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当然你们不这样看，保守派才这

样看，其他还有一些糊涂人，甚至……，是不是武光去挑动了兵医？关于石河子事件，你们回去好好弄清楚。

军区 2 月 11 日事件，1 月 23 日军队支持左派，28 日中央八条出来了，军区内部人这样搞是不对的(同学说：中央八条发了，军区内的人给何家产戴高帽，把何家产斗了一顿，当然不对，但发起这件事是一些军区内的记录，等办的人，当时谁通知大家的弄不清了，可是逮捕的人和“2 月 11 日事件”不符。)军区事件你们是偶然参加了，支持了造反派，要说错就是个别的，你说矛头指错了，承认错误就行了，你们革命派嘛！再追就不对了，这件事要分开，不要再追究，不影响你们的革命性，不影响你们的大方向，你们要划清界限，客观调查可以进行。不要牵进去。如果划不清就可能犯错误，你们二司这样一个左派组织，应该赶紧回去了。“八一野战军”这样气盛，我追了几次要解散，回去还这样搞，走过了头，他们自己负责，你们不要根据这个压对方，犯错误，你们二司左派，造反派，你们的报告我都看了，一、二月中央发了许多通知，把运动引上正规上来。你们二司半年来有些左，一下子就可以纠正过来，讲一些政策不够，批评我们没有公开的，就是内部批评的，北京也有这样，这是难免的，这是一些左派组织，外部公开批评就是形“左”实右，保守派应该很好整风，站到毛主席一边来，我们不是不允许他们革命，也有些人借此反攻倒算，如果是这样肯定是错误，他们把革命说成不革命，不革命当革命的，这是不行的。我看了你们的材料，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错了。北京“联动”到乌市去，和八一中学“红造部”联合起来，这事要追，你们有没有他们的纲领，你们把材料给我搞来。(同学：他们把反动对联“基本如此”改成“绝对如此”，大量翻印《四问中央文革》。)

你们告诉我的吴鑑群我一直在追，他是那个州的？(同学：昌吉)杨春萼以后可以把他叫来，(代表讲最近收到的吴鑑群材料的恐吓信)就这封信就够了，就是反攻倒算。(当念到信中“王恩茂是好书记”时，周总理耸了耸肩，风趣地笑了)，王恩茂还是没骗你们(代表团 3 月 5 日问过王恩茂，王说吴鑑群没有政治问题。)你们 3 月 5 日和他谈话已掌握了吴鑑群的材料，他不知道，还是比较老实说了，(周总理笑了)没有一手不算精明(代表：吴鑑群历史问题，王恩茂应该知道，州地委书记跟王恩茂最紧的是吴鑑群，他是王恩茂的红人，黄克诚，张士富跟得很紧，2 月 4 日小报上也登了吴鑑群的材料，王恩茂应该知道的。)

(伊黎同志回报了抓人、打人情况，交上了材料，总理当时详细观阅。)(总理对秘书说：给张希钦要个电话(6118)。我说你们应该回去，回去后才能搞清楚，你们的二司的地位，他们 3 月 12 日开了一个十万人的大会，不让你们参加是错误的，你们 19 日开了一个三万人大会，开得很好嘛！他们很惊慌，我说不要怕嘛！开大会是他们先开的，你们完全可以开。(同学：讲了军区禁止开大会的通电)王恩茂我说先不定性，回去他检查，你们揭发，根据他的检查和你们的揭发，最后才能定性，你们也不要定性，你们要定性我也不赞成，总要先检查揭发，最后同志定性(8120 电话来了，总理打电话)新疆的事都是王恩茂捏造出来的，亦不一定，有的他不知道，有的新疆直接打电话来了，我顶回去了。

总理打完电话回来说：你们的消息真灵通了，他们的政治委员张希钦还不知道，你们花了三万元电话费，大家花了，一笔勾销了，这是毛主席的自由，毛主席领导的时代你们是多么幸福啊！不管怎样放人，伤的人赶快治疗，你们既然是左派，开头造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区党委的问题，今后还要保持造反派，沿这条路走下去。你们回去了，王恩茂是要找你们的，我给了他十天时间写检查，在北京写总是写不好(这时大家说，检查是王恩茂女儿代写的)写的亦不怎么样吗！回去抓住要害，你们造反派要比一、三司他们看得高，看得远，一、三司是保守派，以前是保守派，不如你们，你们不要挖苦他们，你们最后也要搞红代会，我看时间最短要二个月工作。你们回去首先抓张希钦谈，什么黑二司！要批判，后大联合，但要在大方向一致下，不能和稀泥，有了各学校的初步联合，你们和北京三司交了朋友，可以通消息，搞革命的大联合。清华“井冈山”有八千多人。内部也有左、中、右，可以争论，有对立好嘛，学校里几个也可以，只要是革命的。你们带头影响推动工

人的大联合，机关的还有没有在呀！机关也用这样形式，一下子马上全面到本区也不可能，只要是革命的，不革命的不行，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在这点上赛。军事管制的目的是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首先要革命的三结合，政治上有代表性，但是革命的有一点保守的也要接管嘛。再有，你们要高姿态地促进大联合，最重要是对革命群众的态度，你们回去要把北京的新风气带回去，要批判打、砸、抢这种坏作风，北京也在批判。

黑材料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是黑材料搞到一起烧了。如果有机密文件，打开和军区双方代表查看，是机密的交回去，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同学讲：他们把机密文件夹在黑材料中，政治陷害，石河子一交机密文件，他们就大抓起来了。）

总理：抓进去的人，都要放出来。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对革命群众态度问题。

第二对各级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老鸦一片黑。第一，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新疆这么大，一定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有个别是修正主义分子。第二，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时间很长，有的后执行，有的沾了边，没管文化大革命的事，这就要区别对待，执行的有重，有轻，有多，有少。第三，错误矛头向上，向自治区。州委其次，分别利害，去年5月16日到现在，到底负多少责任，也要联系过去，其他是历史问题，有的是叛徒，这两种是少数的，要搞专案调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多数的，一般只检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其它不能都搞。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叛徒，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果都专案搞就变成一次审干，这样时间就很长了。把武光问题送给康生同志，他管这个事情。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排斥一切，打倒一切，这两个倾向，是两条路线斗争，这根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是受影响的。我10月底去清华，从支部书记、政治辅导员通通靠边站，工作组否定一切，说他们都是黑帮，是蒋南翔分子。那有那么多黑帮，那么多蒋南翔分子，当然蒋除了和彭真有关系外，在清华也有宗派的。这是工作组留下的，不能怪群众革命组织。群众受影响现在也好了，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这是形“左”实右的。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一讲三结合，一切干部都出来了，都要结合，都要上台，对干部分四批，（1）要撤掉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不改，这是少数的。（2）留下一批，比撤的要多的，只要他低头认罪，有一定工作能力，就可留用。有各种留法：撤职留用，监督留用，停职留用，一般留用。（3）调一批，调进调出。（4）要提一批。各机关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经审查同意的要提一批，这方面希望比较大。对干部要有分析，这是正确的。排斥一切，肯定一切，谁都结合，恢复旧秩序，革命白废了，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领导次序要改变，要有人监督，要三结合，可以建立一个专门的权力机构。三结合要有群众监督，在临时权力机构中，群众代表占多数，是基础，革命干部是领导核心，是骨干，解放军是支柱。

军事管制是一个过渡形式，边疆可能时间长一些，将来就要三结合，大联合，你们过去夺权方向是对的，但管不了，这个夺权指挥部你们要不要，由你们自己去处理，我不干涉，我相信你们会处理好的。主要是搞三结合，大联合，我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杀了“回马枪”搞经济主义，大庆就是搞经济主义的。八千多个半工半读实际上是全天劳动，是学徒工，这次算了一下，领导上同意认帐，给他们政治上认错是对的，但经济主义不要过忙，好要他们算一下，每个人发了几百元，都出来了，结果工作全落于老人身上，过去红旗手，劳动模范，老人忙于工作，参加革命时间就少了，成了保守的，年青的外出串连革命，但上了经济主义的当，红旗手，老人忙于工作，也是干革命的嘛！谁造成的？是工委。经济主义是逆流。到夺权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是主要的斗争目标。造反派内部有争论，这个好解决，多学习学习破私立公。干部不易想通，想不通过检查亮相就结合，这就是要注意了，还是原班人马，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私心杂念多，要很好分析，有些造反派的作法也不恰当，安徽就是这样。（同志们汇报了自治区抓人的情况）总理很气愤地说，通通放，除了杀人的、放火的、现行的，全放出来。（代表：造谣说我们抄家从王恩茂家抄

出原子弹图，泄了出去)(停一会)，总理说：可能有吧！他是第一书记，我们可能发过，(又停了一会)总理做了一个手势说，就是发射冒烟的图，这对我们大家说这种图我们也有，学校上课还有这种挂图。说完大家都笑了，总理也笑了。

支左问题是容易犯错误的，最大的是捕人要放，你们都是造反派嘛！闹了半年多了，同学们作错事，可以座谈解决嘛！抓错了要放，要承认错误，支持错了是有的，把保守派当左派，把左派当保守派，有问题要协商，要高姿态。

王恩茂不定性，还是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叫他找你们谈话，也叫他找机关干部造反派谈话。

众：机关干部都垮了，现在军管单位都要把造反派组织解散，不能串连。

总理：不能解散，可以去串连。

众：有人说，我们过去造反错了。

总理：(很快并肯定地说)造反没造错！地方上的电报大楼、广播电台、业务单位不去，其他地方可以串连，象传达室、饭厅、宿舍，不搞大型串连。军管单位没有“三结合”，原来造反派掌权，吸收他们参加两个班子，文化革命领导班子，业务监督班子，现在都在摸索，没经验。

众：军管后，把造反派的权拿下，交给保守派。他们有个逻辑，解放军支持保守派，我们反对保守派，就是矛头指向解放军。

总理：那就不行。关键在于干部，要警惕，要避免复辟，解放军调查不够，支持的不对，犯了错误，特别提请新疆军区注意，要帮助你们，你们要采取主动，否则不利于三结合，推迟一点(时间)不要紧。会给资本主义复辟的机会，关键在于王恩茂的检查，大事情要他说清楚，你们收集他的材料够细了，要他说三天三夜说不完，要检查主要的。宣传上新疆是特别的。如宣传大肆吹嘘王恩茂的那么大张传单，这是资产阶级作风，你们也要帮助王恩茂，同时你们回去也要搞整风，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嘛！把政治生活丰富起来，兵团同志回去要困难一些，四大还有，但不如过去方便了，是解放军系统嘛，八一野战军写了公告命令他们解散，你们回去看看，我提了好几次了，他们不散是不对的。兵团的“联总”要解散，兵团武装都要搞纠察队。

众：兵团“联总”还成立了纠察队。

总理：(很生气和惊奇地说)又成立了？！搞这个东西！

众：这个纠察队还到火车站去了。

总理：这要解放军去嘛，他们去干嘛！？

众：乌鲁木齐好多是兵团商店，都不让我们在那墙上贴标语。

总理：兵团商店要缩小，我们批评他们了，兵团再不能搞这一套，兵团问题复杂。兵团不能再搞这一套了，要斗争，要作很大的艰苦工作，回去告诉王恩茂，张希钦这样做不对。

商店是兵团的，但自治区太多了，张仲瀚的手伸得长。他们为什么要去火车站？兵团比地方要复杂，对立也很厉害，不能再打，成分也有问题。

“支持左派”很容易错，我们讲了，十几年没有做群众工作，左右搞错是可能的，你们不要揪住不放。和解放军协作要高姿态。

王恩茂的问题，回去先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透，别的问题，如反修言论，再追，看是不是够定性。(送上五七年反右指示，总理看了摇头，又看了出版日期 1957 年 6 月)总理说：这肯定看了主席内部讲话了，外面也可能正式出版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只能承认错误了。

众：例如六通湾煤矿，造反派夺权之后，生产搞得很好，超额完成，军管后，交给保守派，生产下降。

总理：写了一个材料交给我。

众：我们已经交了这样的两个材料。

众：军管后派下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整理造反派的材料，翻造反派的档案。

总理：(生气地说)还是这样。

众：八一农学院保守组织宣布“红旗”、“伏虎”是反革命组织。我们问他谁说的？保守组织说：“军区说的”。我们叫他把军区命令拿来。

总理：就是嘛！主要斗争。

众：我们不敢斗，一斗就是矛头指向解放军。

总理：你们带着新的精神去斗。军训，不要把各个组织解散，那还能解散？

众：他们也讲，通过军训要把我们搞垮。

总理：那不行(总理看着一张纸上的几件事说)上面几件事都可以解决。……(总理又说了一件事，大家鼓掌。)

636. 陈伯达、戚本禹在计委看大字报时的讲话

(1967年3月26日)

三月二十六日晚上时三十分左右到八时十分，陈伯达、戚本禹等五同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看大字报，“革命造反公社”负责同志竺慧娟等同志热烈欢迎首长，“革会”某些人也在场。

一进楼门，陈伯达同志说：“怎么冷冷清清的？”，戚本禹同志说：“就是冷冷清清吗！”“造反公社”同志向首长问好。戚本禹同志说：“见过”。向陈伯达介绍说：“这是计委革命造反派。”(指“革命造反公社”。)

“造反公社”向首长汇报计委情况。王兴奋(“革会”)向戚本禹同志介绍说：“我叫王兴奋”。公社同志说：“他们是保字号的！”王兴奋发火说：“他们要打倒余秋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戚本禹同志没有理睬。陈伯达同志说：“不能这样讲，炮打一个人怎么叫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呢？”接着又问：“前天的会(三月二十四日由“革会”、“大庆公社”等组织召开的彻底粉碎刘、邓、陶、薄资本主义复辟大会)是谁开的？”“造反公社”同志说：“是‘革会’蒙蔽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召开的。”其他同志插话：“在会上有人喊，誓死保卫余秋里！薄一波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这时“革会”有人说这是造谣。“造反公社”同志说：“你们不要急嘛，有理讲吗？”戚本禹同志说：“他们竟喊出这样的口号。”陈伯达同志说：“我是计委的副主任，我没有来，是官僚主义，你们可以贴大字报，可以打倒我嘛。”戚本禹同志说：“他们连余秋里都不敢打倒，怎么还敢打倒你呢？”“造反公社”同志说：“‘大庆公社’每天来三、四卡车人，对我们有压力”。陈伯达同志说：“计委运动由计委群众自己解决嘛。为什么他们要来”。

他们走到六楼，戚本禹同志问：“骆凤大字报多还是薛暮桥的多？”“造反公社”同志说：“骆凤的多。”伯达和戚本禹看了一会儿就走了，临上车时戚本禹说：“提打倒余秋里不行，那就打倒陈伯达吧！”

637. 姚文元作整风报告

(1967年3月26日 上海)

全市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战友们！

现在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正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建议，边战斗，边整风，用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来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促进我们思想上、组织上的革命化，无产阶级化。今天我们开一个会，目的就是要再促进一下，使我们的已经开展的整风运动做得更好。今天我谈这些意见，完全是一个同志和战友的意见，这样，我们就可以敞开谈。

下面我想讲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要进行整风?

为什么要整风?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要革命,要战胜革命的敌人,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当前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我们决议草案里规定的四项任务,正在逐步地胜利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从上到下,在需要夺权的地方,都正在胜利地开展。抓革命、促生产,也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各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复杂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林彪同志也经常提醒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革命在前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在思想上、组织上,都需要跟着前进,解决新形势下产生的新矛盾。只有把这些矛盾解决了,我们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两个方面都去夺取新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掌握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要不断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加强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要不断地去掉我们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错误的东西。我们这支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只有不断用毛主席思想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完成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艰巨、复杂、光荣的任务。

同志们想一想:“赤卫队”会不会整风?“红卫军”头头会不会整风?还有那些什么“住房困难造反司令部”、“支农回沪造反司令部”会不会整风?还有什么“联动”,“国际打狗队”等等反革命组织会不会搞整风?不会,反革命组织,经济主义的组织,小团体主义、自私自利的组织,他们都决不会搞整风。因为他们的头头尽干坏事,见不得人,你瞒我,我骗你,有的组织专搞地下活动,他们如果一搞开门整风,立刻就要垮台,坏人就要暴露出来。想把革命停下来、开倒车的人,也不会搞整风。只有毛主席教育下的共产党,只有我们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才不怕整风。我们敢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听说有人说:我们起来造反,白天黑夜的干,又不是为了自己,为什么现在还要开门整风呢?我们说,正是因为我们要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为自己,所以搞整风。这决不是什么“包袱”,相反,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特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永远前进的动力。

整风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是毛主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贡献。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目的、方法,有一套完备的理论,这一套完备的理论,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象刚刚大家学了好多语录所说明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有大量精辟、深刻的指示,这些语录都非常重要,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在整风过程中再三地学。

毛主席提倡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而又为革命服务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一定要肃清这本书的流毒。这本书讲的什么“修养”,就不是从革命需要出发,而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但是,讲来讲去,离不开“个人利益”,教人怎样往上爬,怎样捞名誉地位,做伪君子,完全是地主资产阶级那一套,就是不讲革命。刘少奇这本书讲的“修养”,是以“我”为中心,而不是以革命为中心。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讲共产党员应当怎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怎么对付蒋介石,怎么革命,而大讲特讲腐朽的孔孟之道,用地主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大反毛泽东思想。这不是大毒草是什么呢?这本书说明: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就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这本书里的反动影响,我们以后还要进行深入的批判。要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要用毛主席的关于整风、关于建党的思想来肃清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的无

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同刘少奇这套资产阶级反动理论完全针锋相对的。毛主席关于整风运动的著名文章《整顿党的作风》，首先就是讲革命。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毛主席的思想非常鲜明：为了打倒敌人，兵要精，武器要好，所以要去掉一切阻碍革命、阻碍我们打倒阶级敌人的错误思想、错误作风。大家前几天看了《鲁迅兵团向何处去？》那篇文章，这是在整风当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的范例。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提出了当前革命组织中阻碍革命前进的几种主要错误思想，运用毛主席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透彻的批评。是为了革命而整风，不是离开革命需要去整风。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各个革命组织，都应这样办。

可不可以这样说：“开门整风”包括了两重意思？一是我们革命组织虚心倾听广大群众的批评，革命组织负责人虚心倾听广大战士的批评，革命同志之间相互交心，敞开思想，不是彼此“关门”“保密”；二是我们的整风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紧紧为革命的需要服务，不是光为把我这个小团体整好，而是为了要把革命搞好，为了去解决那些广大革命群众都迫切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组织问题，把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工作大大推进一步。是为革命而整风，不是孤立的关起门来为整风而整风。现在有一些单位，整风中间没有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开门整风，应该紧紧抓住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矛盾，用整风来推动工作，推动革命，打败敌人。

从全市来看，整风要达到这样三个目的：

一、提高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更深刻地认识什么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思想，以及为了贯彻毛主席这条正确路线而规定的各项政策(如干部政策，抓革命、促生产的政策等等)。什么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各种表现。上次春桥同志讲过，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还不够，今后还需要继续的深刻的批判。通过整风，使我们能深刻地认识刘少奇、邓小平那一套反动东西究竟是什么，能识别和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阶级敌人的任何新反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本单位斗、批、改搞到底。

二、大大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克服违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各种错误思想。使我们真正能夺好权，用好权。今天报纸上不是有一条消息吗？江南造船厂船坞吊运车间的造反派，他们就是通过开门整风，促进了大联合和“三结合”的，这是一个好经验。

三、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大大推动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使我们在阶级斗争、生产工作以及学校的复课闹革命这些方面都能大踏步地前进。

简单地说，这次整风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能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再简单，一句话，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来干革命。

总之，大家一定要认识，我们这次整风，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革命的，不是保守的；是前进的，不是后退的；是有破有立，破资产阶级思想，立毛泽东思想，肯定成绩，纠正错误，总结经验，不是否定一切。这次整风，一定要整得我们大家充满蓬蓬勃勃的革命朝气，勇敢前进，而不是把人整得垂头丧气，灰溜溜的。各单位要根据这个精神，分别不同情况，确定自己整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几个“怕”字

现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都热烈的欢迎整风，正在整风的不少单位已经在开门整风中取得良好的成绩。但也有少数同志，特别是有些负责人，对整风，特别是开门整风，还有很多顾虑，还有这样那样的“怕”。这一些“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应该去掉。

怕点什么呢？

(1) “怕保守派进攻”“怕右派势力反扑”。我们一整风，保守派就进攻了，右派势力反扑了，怎么办？对这一个问题，我们要从毛主席教导出发：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怕也没有用，只能因势利导，夺权胜利。不管整风也好，不整风也好，怕也好，不怕也好，那些还不死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右派势力的坏人，那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总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开门整风是对革命群众“开门”，绝不是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开门”。但是，如果坏人借整风机会想整垮革命派，要“破门而出”，要跳出来，攻击革命群众，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就让他来较量一下吧！准备着再来一场大论战吧！暴露了是好事，与其暗地里活动，不如公开说出来。已经有人跳出来较量了，只落得一个惨败。还有的同志说，有的“赤卫队”头头要跑出来了，不死心，要搞反扑，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要反扑，最好公开站出来反扑，戴上袖章也可以，亮出来，再针锋相对地大斗一场，大辩论一番。老实说：革命群众是懂得怎样对付你们的！经过一次反复，增加一次锻炼，有什么不好，我们已经有过好多次这样的经验了。所以，我们要有反复的精神准备，不要怕。

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要轻易将提意见的群众都当成是“保皇势力反扑”。有的人，开始“保”过，后来觉悟了，他善意向革命造反派思想作风提意见，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我们就要听。不要一动就扣上“捞稻草”的帽子。有一个厂的造反大队开门整风，群众刚提了一点意见，马上贴出大幅标语：“谁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一来，座谈会成了哑巴会，结果这个组织又贴出第二条标语：“谁不向革命造反派提意见，谁就是反对革命派！”结果，群众更不讲话了。还有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组织开门整风，大家都有些缺点，都怕对方揪自己的小辫子，怎么办呢？彼此都在对方办公室门上贴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这样整风怎么整得好呢？当然，这仅是个别的现象，我们提出来，说明我们有些同志还有怕。不要怕！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毛主席在估计形势的时候，任何时候都坚定不移地看到这一点。坏人总是极少数。我们真的牢固地掌握了毛主席的这个思想，就不会怕了。

(2) “怕当少数派，没有依靠了，再挨整没有靠山”。有的人怕通过整风，实现了按部门的大联合，自己回到车间、班级，变成少数，别人整自己没地方说话。有这样思想顾虑的同志还不少，阻碍了贯彻毛主席的“三·七”指示。我们认为这个怕是不必要的。第一，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力支持，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这是我们最强大的靠山。第二，现在上海市已经夺了权，有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把党、政、财、文的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是用来支持全市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一切革命同志的支柱，怎么会没有依靠？第三，离开原来的革命组织回到部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扩大革命力量，不是削弱革命力量，是加强革命组织，不是取消革命组织。现在有一种误解，以为整顿组织就是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不要了，都解散了，这是一种误解。现在我们提到的整顿组织，是把革命组织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归口，加以整顿、提高，还是要的嘛！红卫兵还是要的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还是要的嘛！不过这是组织形式改变一下。加以整顿、提高之后，大大加强革命派的战斗力，怎么会“没有依靠”呢？这种误解是不对的。怕当少数派，这个怕字去掉它。

当然，现在因为全市运动发展不平衡，也可能回到部门之后，保守势力比较厉害，甚至还有坏蛋在掌权。在某个部门里，革命力量暂时还联合不起来，或者联合起来了暂时还不占优势。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呢？可能的。但是，有这种情况出现，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荣任务。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开始不就是少数吗？我们起来造反的时候，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的时候，不就是少数吗？我们是通过斗争，团结群众，使自己从少数变成多数。我们

为什么能够从少数变成多数呢？因为我们贯彻了毛主席的路线，因为广大群众是要革命的。还是前面讲的那个道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包括工人、学生、干部等等是要革命的。毛主席说：“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同志们，我们都要争取做毛主席所谈的这样的好同志。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什么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还是少数，正说明革命形势的发展还不平衡，还有些空白点，还有些弱点，需要我们革命力量到那里去，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当坚决去，开辟新局面。学校里不就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些中学，还有一些大学，也有一些工厂，有这样的情况。那里革命力量按班级、车间来看还是弱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开辟新局面，使自己少数变为多数。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来就不怕当少数的，这是我们造反派的精神，这个“怕”字应该去掉。

(3)有极少数同志“怕丢掉个人手中的权力，怕失掉地位”。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

我们是无产阶级夺权，是为阶级夺权，是为劳动人民夺权。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把权夺过来，这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是针锋相对，不能退让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权，一定要夺过来，夺过来之后，决不能让资产阶级夺回去。但是，我们决不是为个人争权。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手里的权是那里来的？是党和人民给我们的。是革命给我们的。大家回想一下这半年多来的战斗经历，我们因为要革命，所以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向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革命造反派的战士选我们当领导，给予信任。所以，只有继续革命，才能继续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

有的同志开始造反的时候没有包袱，什么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被打成“反革命”都不怕，杀头、坐牢都不怕，现在怎么怕整风呢？就因为胜利了，有了权，掌管了一部分工作，背上了思想包袱，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同志们，无产阶级是没有包袱的，最近毛主席再一次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马克思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也就是说只有整个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剥削阶级消灭了，阶级消灭了，三大差别消灭了，无产阶级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我们要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话，就应该树立这样的观点。我们要争的无产阶级的权，劳动人民的权还多得很，将来应该全世界的权都归无产阶级，都归劳动人民，都归革命派来掌握。国际歌中不是这样唱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有了一点权力就满足了，就前怕狼后怕虎，只想“保”自己的权，就不敢再革命了，就不能再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更大的解放而奋斗了。如果不丢掉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不为革命造反派服务了，不为劳动人民服务了，走向了反面，即使你个人手里的权没有丢，无产阶级的权却丢掉了。因为你已经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去掌握了。所以，这种怕，虽然是少数同志，我们也希望坚决的去掉。

(4)“怕一搞整风，内部分裂，组织涣散”。有的革命组织因为运动开始以来，从来没有整过风，本来内部就存在很多矛盾，负责人之间相互意见很多，平常没有放到桌面上来，怕一整风，闹翻了，各干各的，不好收场。

我们的整风，是为了用毛泽东思想统一我们的认识，提高我们的认识。整风的结果，应该是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就是说，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但是，怎么能才能统一意志呢？大家不讲话，当面不讲，背后乱讲，搞自由主义，能够有统一意志吗？没有的！要有统一的意志，就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发扬无产阶级民主。没有这一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革命组织的内部，总是有矛盾，否认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就是欺骗自己。一种矛盾解决了，另一种矛盾又会产生，及时地、正确地解决矛盾，我们的同志就会进步，革命就会前进，革命组织就会巩固；如果回避矛盾，就会使自己陷入被动。大家意见分歧，心里想的不一样，

做的不一样，怎么能够有统一的意志呢？只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不同意见说出来，把合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把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去掉，纠正，才能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才可能有统一行动，使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真正团结起来，最后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在已经建立大联合的地方，也有矛盾，也要通过讨论，整风，巩固革命的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如果“怕”揭露矛盾，让矛盾积累在那里，那一旦爆发，反而不可收拾。

(5)“怕被别有用心的人揪住缺点尽量夸大，揪住不放，把自己整得灰溜溜的”。有的同志有这种顾虑，现在要整风，人家假使揪住不放怎么办呢？这要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对别人提意见的同志，要认识整风的积极意义，不要把整风当作整人，也不要借整风的机会算总帐。首先要看大方向，要看主流，要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要从革命利益出发，不要从个人恩怨出发；另一方面，要允许批评，也要允许反批评，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也要挺得住。所以，这种顾虑也可以打消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革命同志，大多数的群众是能够分清是非的，还是毛主席讲的，相信大多数这样一个根本观点。

这些“怕”字，都因为“私”字作怪。我们一个人，一个革命战士，要无私才能无畏，一个人无私无畏，就得到了自由，你没有私，就不怕，你就能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你就得到了自由。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我们在造反的时候经常用，现在我们还要用这句话。我们向敌人开火的时候，向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拼死斗争的时候，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在整风的时候，也要用这句话。毛主席这里讲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是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战士，他没有私心杂念，心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凡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利益的，就坚持到底，凡是不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就无所畏惧的去掉。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整风中敢字当头，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改正错误，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有这样那样怕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不过对于整风的目的意义还认识得不太清楚，思想上还有一些私心杂念，所以怕。当然，也有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坏人怕整风。毛主席说过，怕整风的人，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有某些错误的好人；“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如果所有的革命同志都是敢字当头不怕整风，混进革命组织的极少数坏人就躲不下去了，就会被揭发出来了。

(三)革命斗争的大方向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说，但需要提醒。因为有一部分同志开始忘记了斗争的大方向。

有人问：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很明确，还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斗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跟一小撮代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反映到革命队伍内部，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们的斗争矛头应当对着谁？这个问题整风中首先要弄清楚，这也是我们革命大联合的基础。我们斗争矛头应当对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及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应当对准全国的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上海陈、曹之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当对准地、富、反、坏、右反革命复辟活动，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应当对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势力，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子。这是十六条及党的各项文件都规定了的。就是说，我们的方针应该依靠革命的左派，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我们从运动以来的一条基本路线。不管在学校，在工厂，在夺权以前或以后，都是这样。夺权以后，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以后，还要继续把本单位的斗、批、改搞到底，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方面的影晌，对于刘少奇等人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我们要展开广泛的批判，有些就在报纸上批判，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文艺上(文艺上就是陆定一、周扬那一套)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工作搞好。应当看到：这个批判任务，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

了！

我们面前有两类矛盾：一类是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一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同阶级敌人的矛盾。阶级斗争反映到革命组织内部来。我们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是为了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不是破坏这个大联合；是为了加强对敌斗争，而不是为了削弱对敌斗争；是为了彻底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打倒敌人，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放着那些阶级敌人不管。忘了这个大方向，把斗争矛头主要对准自己的同志，而不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战胜敌人，那就完全搞错了。有的地方，把主要精力，甚至于全部精力用在革命组织之间“打内战”，甚至混淆两类矛盾，把别的事情都不管，那就把方向搞错了。

现在有好些地方，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很多。有一些是原则上的矛盾，这是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有很多不是原则上的矛盾。有的相互攻击，只想整垮别的组织，甚至要在红卫兵当中搞什么“上揪下扫”，人人过关，放着牛鬼蛇神不斗。有的地方甚至让牛鬼蛇神在那里养得胖胖的，但是把运动初期犯过一些错误的青年同志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这样做是危险的。有的地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跳出来说，要“自己解放自己”。你要什么“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口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还有的地方，坏人也跑出来反攻倒算。发生这类情况的地方，革命组织首先要端正斗争的大方向，把精力集中到对敌斗争上来，打退阶级敌人的进攻，在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同这个问题相联系的，是前一时期，有人提出现在上海还要第二次“大乱”，还要“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大联合”的号召唱对台戏。这个口号不但上海有，在别的地方也有。它同样是抛弃了斗争的大方向。实际上就公走到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道路上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感到高兴。我们有一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一条路线下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同违反这一条路线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所以我们说现在大方向问题在一部分单位是存在的。

当然，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革命队伍内部某些人，如果坚持错误，就会发展到革命的反面去，甚至在阶级斗争的转折关头同敌人站到一起去，向无产阶级进攻。我们进行整风，也是为了帮助这少数同志掌握斗争的方向，能够再沿着毛主席的路线前进。

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句话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看到在全国范围内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从北京到全国有的地区，都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我们要提高警惕。有的地方，白色恐怖又来了。镇压革命，抓革命群众。斗争是会有反复的。北京的红卫兵最近举行了几次反逆流的大会，打退了那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从他们红卫兵报上揭露的材料来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人物还不死心，他们还要进行垂死的挣扎，一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一面企图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扶上台，把革命群众镇压下去，搞反革命复辟。同志们，从电视里不是看到陈丕显那副顽抗的样子吗？那么他还在幻想什么？他还在梦想什么？他无非是在想有朝一日再来一个反革命复辟。陈丕显不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代表人物。全国也有这样的人物。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已经经过了多次反复，再增加一次反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十六条早就指出：“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北京的这一股攻击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就被那里的革命人民坚决粉碎了吗？我们上海是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夺了权的地方，上海的工人阶级、红卫兵战士，也应该针对这一股反革命逆流迎头痛击！正象我们历次表示过决心一样，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的工人阶级，上海的红卫兵，上海的革命造反派，

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永远支持全国革命造反派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谁敢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叫他垮台！

我们应当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当前的形势，充分看到运动的主流，正确认识运动的曲折，麻痹大意是危险的，只看到黑暗的一面，看不到当前运动的主流和大好形势也是错误的。应该看到：上海文化大革命总的形势是大好的，但斗争还很尖锐，只要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搞好整风，坚持群众路线，整顿思想，整顿队伍，掌握正确的方向，我们就一定能够使上海的大好形势继续发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何新反扑，夺取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

我们希望各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整风当中，首先能够明确大方向。假使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各个单位的工作，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都会大踏步地前进。

(四)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树立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反对小团体主义，发展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们：“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风头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这是最近中央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毛主席给我们发出的号召，我们一定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

同志们！按部门、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斗争的需要，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是夺权斗争的需要。只有我们深刻地树立起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才能懂得为什么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才能认识什么叫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是错误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也是错误的。”革命的大联合，首先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斗争目标。不是无原则的联合，也不是为联合而联合。我们革命造反派，广大的革命人民都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已经有些很好的经验，就是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通过斗争，通过整风，通过学习。通过共同对敌斗争，团结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开门整风，大家在毛主席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通过学习，明确了斗争的大方向，在批判、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基础上，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有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认识，但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出的方向，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

我们有的同志，忘掉了还有敌人，忘掉了资本主义势力还千方百计的想复辟，忘掉了我们还有革命的严重的任务，还要反复辟，还要搞斗、批、改。忘掉了这一些，就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了，心里想的范围很小，只有我这个团体怎样、怎样。林彪同志曾经说：要去掉局限性。个人主义是一种局限性，小团体主义也是一种局限性，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才能去掉这种局限性。因为无产阶级目标远大，要到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能看到斗争的全局，去掉局限性。

任何一个正确的口号，都可能被曲解。革命的大联合刚提出不久，有的人就说成“要解散一切革命组织”，“这是要把所有的革命造反组织都取消，和群众合并”等等。引起了一些思想混乱。我们说革命的大联合，是组织形式上的改变和整顿，不是不要革命组织。经过整顿以后，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革命的红卫兵，不但不能削弱，而要大大加强政治上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战斗性。很明显，现在有一些地方实现了大联合不是造反派还存在吗？有的是误解，有的是一些人在挑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想搞大联合，就挑动“你不要搞了，搞了以后什么组织都没有了”。我们要识破。革命的大联合，决不是取消主义，不是“合二而一”，不是把革命派和保守派合并起来。

在中央指出的种种错误倾向当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危害性，我们在一月革命过程中有

了深刻的认识。《文汇报》有一篇反“风头主义”社论，写得不错，据说也有人讲它是大毒草，那可不是大毒草呀！其他的倾向也讲了不少。目前成为大联合比较普遍的思想障碍的，是小团体主义。所以今天着重要讲一讲小团体主义的问题。

要破小团体主义，就一定要树立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要树立这个思想，就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

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闹革命？我们为什么要成立各种革命造反的组织？这是因为我们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我不是指那些经济主义的组织，不是那种“一九六五年司令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司令部’”，我是指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我们是因为受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压迫，要起来斗争，要起来反抗，要起来夺权。那个时候，在上海市陈丕显、曹荻秋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掌握着党、政、财、文的大权，使我们不可能从上到下来组织自己统一的阶级队伍，怎么可能呢？权在他们手里！那个时候我们革命造反派只能一个一个的突破，阵地一个一个的占领，这个组织，那个组织，学校、工厂、机关，有一些组织形式完全是根据当时斗争的发展确立起来的。只能一个组织、一个组织的成立，要统一成立，自上而下的成立，只有“赤卫队”之类的御用组织，那是一个晚上就有五十万袖章发出来了。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只靠我们一个团体的胜利，是不能免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的，你一个厂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能够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了吗？工人阶级就能永远不受压迫了吗？不，决不是这样。无产阶级只有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主席最近在“三·七”指示中又一次的教导我们。在中国，不但靠一个小团体不行，光靠你一个厂、一个校、一个区、一个市也不行，只有我们全国都彻底挖掉了修正主义的根子，只有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紧紧掌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手里，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个方面确立毛主席的路线，批判刘、邓路线，批判修正主义，使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当中，一步一步地取得更大的胜利，一直到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彻底消灭。这还不够，还要在全世界消灭了帝国主义，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剥削阶级，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有这个远大的理想，应该有这样一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毛主席讲的。现在，我们全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是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有力的支柱，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条件，为了巩固自己的胜利，就可能、就需要把自己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需要按单位、按部门、按产业这样子来归口。所以，所谓革命的大联合的问题，就是一个进一步组织阶级队伍的问题。应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珍贵的权利，是我们用艰苦奋斗，甚至用流血斗争争得来的权利。过去的革命造反派，怎么可能这样归口组织自己的强大的阶级队伍呢？现在有了这个权利，就应该认真地掌握起来。

有的同志想：有了一个小团体，可以保护我，我可以不再“挨整”了。这是一种天真的幼稚的想法。不消灭资产阶级，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罢了一个修正主义者，不是还可以产生第二个修正主义者吗？我们这一场无产阶级大革命，不是“罢官革命”，也不是小团体革命，而是无产阶级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的一场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我们要从阶级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刚开始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志，可能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那也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是因为被打成“反革命”，有的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是，革命发展到今天，如果，我们不想作一个保守派，我们要再革命下去，当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一定要树立为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斗争的观点，坚决反对小团体主义。

小团体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里举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讨论，举得对不对请大家批评。

(1)在夺权的时候，不想搞革命的大联合，只想用一个团体掌权，只想“我”这个团体掌权，来代替甚至是排斥革命的大联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是想怎么发展“我”这个团体的势力，尽量扩大“我”这个团体手里面的权力，而不是想到怎样去搞革命的大联合，共同对敌。这样做的结果，革命的大联合也搞不成，把革命的力量抵消了。你说没有权吗？也夺了，你说夺了吧？又不能真正掌好权，用好权，对于无产阶级很不利。或者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内战了，忘记了还有一个外战，使夺权、使搞好革命都受到严重的妨碍。甚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几个造反派内部斗得很厉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坐山观虎斗，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在哈哈笑。不是现在有这样的情况吗？一个革命造反组织，下面有几派，每一个派在一个厂里有几条线，结果这个厂里面的工作一天到晚闹矛盾，几个组织上面都有头头，要抓革命，促生产也搞不好。据说有这样一个局：两个造反派有半个月的时间尽打“内战”，就是相互贴大字报，相互辩论，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抓工作，什么都不搞了。据说上海电影界有三个团体，搞了三部电影纪录片，名字都叫“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为什么不能够联合起来搞一个好的？反映一下上海一月革命的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历史功勋呢？为什么不能这样，一定要搞小团体呢？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到组织组去登记的有六百六十二个组织，其中全市性的组织二百二十六个，除了解散的以外，全市性的组织还有一百九十二个。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搞革命的大联合，这么多组织，都往基层里布置工作，基层里吃得消吗？怎么抓革命、促生产呀？

现在革命的大联合势力不可挡，已经有很多很好的单位了。今天报上不是登了江南造船厂一个车间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了吗？上海也有一批厂嘛，象爱民糖果厂，他们厂里就已经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控江中学的红卫兵，经过了军政训练，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复旦大学的红卫兵，也通过了学习整风，通过斗争，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据说，南市区公安局，几个革命造反组织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也成立了统一的革命造反组织。昨天报纸上，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发表了声明，支持下面的革命大联合，这个很好。据说杨浦区前一个时期，百分之八十的工厂有两个到三个造反队，每一个造反队都同上面挂钩，统一不起来，不晓得是不是这样？既然大家都是革命造反派，真正都是要干革命的，为什么不能通过开门整风，联合起来呢？我想是可以的。还是财贸系统，也有两个组织，据说闹了很久，不能达到革命的大联合，希望你们能够通过这一次整风，真正能够解决大方向的问题，真正能够在毛主席的路线上联合起来，那样对于财贸系统的工作不就是可以大大的推进一步吗？不就可以考虑筹备财贸系统的职工代表大会吗？大家都不要光想自己一个小团体的利益，考虑一下全市的革命造反派，怎么组织起来，联合起来，更好的革命，更好的战斗。

据说有一个厂里面有这么一个口号，他下面车间里有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厂部的组织就表示：“不支持、不承认、不提倡。”这个“三不”主义是不对的。这个是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志们回想一下，过去陈丕显、曹荻秋这些坏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待革命组织不就是不承认，不支持嘛？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怎么能采取这种态度呢？不能够！

还有个别这样的情况。有的革命造反派为了自己这一派单独掌权，为了保持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任意把别的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就是你反对我就是反革命，甚至用武斗、扣押等等非法的手段，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夺权以后用这种办法来压制群众，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先讲清楚。

(2)大联合我赞成，甚至举手赞成，但是大联合要“以我为主”，只能是你并到我里面来。有的同志很爱惜自己这个团体的名字，大家在“杀”出来的时候，共过患难，共过战斗，对自己组织的名称有感情，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还是要记住毛主席的话，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不在于名称，而在于实质。“人民公社”这个名字不都可以改吗？这个名字是我们最热爱的名字，主席讲改，就立刻照办了。

对自己组织的感情如果发展成为一定要吃掉别的组织，只能人家并进来，那就错误了。每一个革命组织都有自己的理由，可以不搞大联合，或者是“以我为主”，革命早的说：“我

是老造反”，所以要“以我为主”。那么革命比较晚的呢？说你老造反犯错误比较多，我新造反犯错误比较少，要“以我为主”。人数多的讲我是主要的力量，要“以我为主”，人数少的说你那个人数多的是大杂烩，要“以我为主”。那样的搞法就不会有什么革命的大联合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呢？毛主席有这么一段话：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毛主席说：“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毛泽东思想真是说中了我们的要害，打开了我们思想上的窍门，我们不应当只看局部而应当看全局，一个厂的全局、一个局的全局、一个系统的全局，如果在局部看来有些困难，在全局看来是可行的，是需要的，是必须的，我们就应该服从全局。我们应该从全国、全市以及本单位的全机关、全校、全厂的全局来考虑这个问题。希望在解决这个思想问题的时候，反复地学习毛主席的这一段话，不需要我来多说了。

控江中学的红卫兵在讨论实现大联合以谁为主的时候，也是有过争论的，他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狠斗“私”字之后，认识到“以我为主”是搞不成大联合的，结果他们经过辩论提出了三条原则，根据这三条原则实现按班级的大联合：第一、组织不论大小，人数不论多少，看谁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第二、权，一定要掌握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第三、各个革命组织坚决打倒小团体主义，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下，革命不分先后，各革命组织一律平等。他们提出了这三条原则，结果把很多分歧解决了，实现了大联合。我觉得这三条很好，可以供同志们讨论、辩论时参考。

(3)争功，就是把革命的功劳只归于自己这一个组织，甚至于只归于自己一个人，忘掉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忘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知识分子、革命的群众，艰苦劳动，日夜奋战。我们讲过多次，春桥同志跟我做的事情最少了，我们没有上码头，我们没有到火车站，在一月革命当中，我们的贡献最少，真正的贡献是那些广大的革命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是他们有贡献，工作是他们做的。我们应该懂得我们不能为自己去争功。要说“摘桃子”，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摘桃子，不是个人摘桃子。还有些同志他们有了荣誉地位之后，只想保持自己团体的现状，不愿意团结更多的人，好象更多的人一团结，我这个桃子就被他摘去了。不愿意继续革命，不愿意随着政治任务的改变，改变自己的组织形式，结果思想上出现了一种保守的倾向。

同志们，革命是要前进的，时间是不等人的，任何人就是过去有功劳，也只能说明过去，不能保证未来。革命和保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革命派如果继续革命，继续前进，那这革命性就会越来越强；因为革命了一段，背上包袱，不想再革命了，就会不自觉地站到保守的立场上去。我们一定要做不断革命派，不要做半途而止的革命派。

革命的大联合，自上而下、按部门、按单位、按系统、按产业的大联合，当然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上海跟青岛、贵阳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这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大家的创造性。有的同志说，在按部门、按系统大联合成立之前，有一些市一级革命组织怎么办，我们说，市一级的革命组织如果积极支持搞下面的大联合，成为一种促进力量，就不会成为一种障碍；你如果反对大家搞大联合，那人家就要起来反对你。所以关键问题就是看采取什么态度。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应当促使我们团结广大的革命群众。有一些人过去受过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那主要是受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坏主意欺骗、蒙蔽，现在他们要起来了，要革命，我们要不要他们？我们应该是要他们，不是要排斥他们，我们团结的人应该越来越多，这样我们革命事业才越来越兴旺。

我们希望经过整风，去掉了小团体主义，能够大大推动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有若干厂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是不是可以考虑按产业(如冶金、纺织、化工、电机、仪表……)，召开革命造反派职工代表会议，这个职工代表会议，可以讨论当前形势和任务，可以选出出席全

市工代会的代表，选出自己的委员会，也可以选出参加局里面“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一些主要的产业大联合形成之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全市的职工代表大会，这将是一个隆重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大会。工总司的各级领导人，希望你们能下厂去，积极促进这个大联合。比如大学，我们是这样设想，假使有一半的大学，或者一半以上的大学，红卫兵真正的实行了革命的大联合，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筹备召开上海的红代会。也可以串连，学校里面、学校之间的大串连以后还是要的，可以相互推动。我们曾经对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红卫兵组织建议过，比如说，“五一”“五四”能不能开全市的工代会、红代会。能不能在这前后也能够开贫下中农的代表会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全上海的工农学的革命的阶级队伍，进一步组织起来。这能不能实现，不决定于我们，而决定于大家的努力。自然也不必赶时间，我们不是为赶时间而工作的，时间来不及迟一些也可以。

当然，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的造反组织以后，矛盾和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一点现在就不要忘记。还会有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有正确与错误的斗争。一切无产阶级的革命左派，在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之后，都要继续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而斗争。看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但能够说，因为共产党有两条路线斗争，而且这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就不需要成立共产党了吗？当然不是这样。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共产党以来，中国革命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关键是在于领导权，有了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领导核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就能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起来。集中到哪里，集中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团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下，这样革命就可以不断发展。我们就能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下团结更多的群众，组成一支强大的阶级队伍。

上面我讲了这么多道理，无非是希望一点，希望我们真正能够去搞革命的大联合，把各式各样的思想障碍在这一次整风当中去掉。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同志对这个问题能够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的。

值得注意的，最近有的单位不但没有搞什么大联合，反而冒出了一批新的组织，甚至于跨部门的组织。不是决议已规定了不要搞跨部门的组织吗？他们想干什么，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想利用搞革命大联合的机会，篡夺领导权。有一个厂，近半个月之内就冒出了二十二个组织。看来，在有一些地方，随着革命大联合的发展，可能有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我们决不允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四清下台干部反攻倒算，混水摸鱼。我看见了一张传单：这张传单署名是什么“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总联络站”。“红三司”从来没有个总联络站嘛，怎么工人里面有个总联络站呢？是否他们自己挂上这个牌号？明确规定不要成立工人学生的混合组织，为什么打出这个番号呢？这一张传单里说什么过去搞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他们执行“党纪国法”，受到了“种种的政治迫害，压得我们气都喘不过来”，现在要“杀”出来了，你们这一种杀出来要造谁的反呢？过去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阻碍起来造反的时候，你们强调“党纪国法”，现在我们搞大联合的时候，你们又要强调什么要“喘过气来”，反扑过来，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值得我们想一想。但是，在这种形势面前是不是说明不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呢？相反，正是说明我们更需要加紧革命的大联合，如果我们革命造反派、无产阶级革命派真的实现了大联合，那么这一种所谓的“总联络站”，这一种在大联合浪潮里面冒出来的值得怀疑的组织，究竟是什么东西，就暴露出来了，我们革命派都联合起来了，那些别有用心的、针对革命造反派的组织，就会迅速垮台。

(五)坚持群众路线，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反对“打倒一切”，也反对“肯定一切”。

我们要继续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坚决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我们的一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实行“三结合”过程中，继续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真正革命的“三结合”，还是包办代替的“三结合”，区别就在于是否真正实行群众路线。

我们讲革命的“三结合”是为了要成立一个毛主席所说的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这样一个机关，这样一个领导班子。这是一个做工作的过程，是一个斗争的过程，也是一个团结——批评——团结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于革命群众来说是一个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提高认识的过程，对于革命的干部来说是一个在斗争当中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自我革命的过程。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表态”。现在有很多经验说明，凡是在“三结合”的过程当中继续走群众路线的，那么这一个机构成立以来就有威信，就能够得到群众的信任，大家就比较满意。假使不是走群众路线，走另外一条路线，那么成立起来的机构就没有威信，就不能搞好工作。所以我们在搞“三结合”的时候，关键的一条，应该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一个问题也希望各单位自己考虑一下，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

下面两种思想都是违背群众路线的，都是违背革命的“三结合”的。

(1)由于“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思想没有肃清，对革命的“三结合”抱消极的态度，对于干部起来造反总是不放心，消极等待，不愿意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还有的同志认为我没有“三结合”，生产、工作也搞得不错嘛！为什么还要搞“三结合”呢？对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不是积极地创造条件去实现，而是消极地等待，甚至于拖延。

“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是革命造反派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提出来的，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大家回忆一下，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这一张大字报里面，揭开了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这一张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字报，在批判刘少奇的时候，就讲过他在搞四清的时候执行的是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路线。所谓形“左”而实右就是“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毛主席当时就批判过，站起来蚂蚁一个也看不见，蹲下去满地都是蚂蚁。毛主席批判了这种思想，产生了二十三条。还有陶铸也讲过，陶铸不是说过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之外“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打倒”，不是有一份传单很流行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来就是同这条路线相对立的，要算帐，应该算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帐上，不能算在造反派的帐上。

毛主席提出的革命的“三结合”，正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能够掌好权，用好权。因为只有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才能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机构，把胜利的果实巩固下来。如果我们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革命成果就要受到威胁，就会丧失革命的成果，甚至于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再夺过去。对于干部，我们一定要按照主席和中央的教导，相信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犯了错误，犯了路线错误，除了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外，其他的人，除了他们自己应有的责任，还应该看到市委陈、曹他们所使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扣压中央指示，害了很多干部。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向群众检讨，做群众的小学生，将功补过。只要这样做，我们就要像中央最近给我们的信里所说的，“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应该看到经过这些日子批判、学习，大多数的干部觉悟已经有了不同程度提高，不要看死了。

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团结了大多数的干部，就能够使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孤立，完全孤立，就可以把他们彻底打倒。最近在电视里你们不是看到，一些领导干部，面对面起来揭露陈丕显、曹荻秋和其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不是就使得他们丑恶面目更加暴露、更加孤立吗？这样做，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更加巩固，我们的胜利果实也就更有保障。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排斥一切干部，甚至于干部起来造反的时候还是排斥他，那就恰恰适合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心愿。因为他们就希望所有的干部都抱成一团，不起来造反，不是一分为二，甚至于把矛头对准起来造反的革命干部。

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就能把当前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生产，更好地抓起来(上海这个地方生产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生产的妄想彻底破产。因为昨天专门开过会，今天不谈了。

我们对干部，第一看错误的性质，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严重呢还是不严重，同时还要看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就是说他是不是愿意检查愿意改，包括对第一把手在里面。因为总不可能所有的第一把手(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统统都坏掉了。在这里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要根据政策，不要用感情代替政策，对于犯了错误而真正能够坚决改正的同志，要允许革命，要欢迎革命，不要不许革命。如果他是犯了一般的错误，能够同错误路线彻底决裂，检查自己的错误，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那么过去的错误就能够成为今后做好工作的决心。毛主席“三·七”指示当中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坚决执行。

各级革命委员会究竟是不是能够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主要在于能不能够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离开了这一条路线，就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反对这一条路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领导。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正是执行这条路线的组织保证。我们应当从这里出发，去考虑如何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机构的问题，把毛主席这一条路线继续的坚决贯彻下去。

(2)另外一种错误思想，就是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而是采取阶级投降主义的态度。一听说要搞“三结合”，就忘掉革命两个字，放弃革命的原则，抛弃群众路线，以实现“三结合”为幌子、为借口，把坏人拉到领导岗位上来，甚至于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拉到领导岗位上来，搞假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种倾向，我们也是要坚决反对的。

有的地方不是搞群众路线，而是抢干部结合，大家抢，几个派别相互抢，有的地方搞包办代替。不通过群众，搞“拉郎配”。凡是这样做的地方，效果都很坏。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可能建立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领导机关。

据说有一个医院，几个革命造反组织，他们不搞大联合，而大家都要想自己去搞“三结合”。怎么办呢？就去抢干部。不管干部大小，态度好坏，一律结合。有的说：“管他什么干部，先把干部抢到手，以后结合的时候可以派用场，现在不抢啊，以后要结合就没有人啦。”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嘛！怎么能够采取这种态度呢？

还有的同志想“快”，就专门找一些平时不大管工作的，干劲不足的，所以犯错误不大的干部来结合，专门找这一些人，而不是找真正革命的干部。甚至有的地方找运动一开始就被斗而靠边、因此后来没有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搞“三结合”。这样的“三结合”，有什么代表性？有什么革命性？有什么权威性？

这还是属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认识上的问题。有的地方(少数地方)，坏人上台，牛鬼蛇神篡夺了领导，地、富、反、坏、右搞白色恐怖，革命派被镇压，这是一种假夺权。有的地方坏人没有上台，但在背后牵线，挑动那些青年去夺权，夺了权以后就镇压革命派，这些单位的青年同志你们要提高警惕啊！我们决不允许权落在坏人手里，凡是被坏人假夺权的地方要坚决搞反夺权，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手里来，要搞反夺权，把权夺过来。

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三结合”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抹杀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攻击革命造反派。

决不允许利用“三结合”，把一切恢复到老样子，该打倒的一小撮坏人(就是那些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要坚决揭露，坚决打倒。

上面这两种倾向，在整风当中主要解决那一种，由各单位自己判断。因为情况很复杂，运动发展很不平衡。我们希望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能够逐步地，但是尽快地把各级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建立起来，一切领导班子，都要有军队或民兵代表参加。

(六)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

加强三性，一定要从学习毛泽东思想出发，要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出发。分清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要破私立公。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不要以为我们革命性已经

很够了，就是一个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的问题了。不是的。我们前一时期曾经谈到，有一些红卫兵的战士因为在大风浪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革命精神好象不大足了。无产阶级的五敢精神，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的精神，永远要发扬。我们这次会议不是也念《语录》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种革命的决心永远要保持。我们面前还有严重的斗争，要准备打退几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要有革命到底的革命意志。这一句话也不能曲解，决不是为了个人小团体利益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如果为了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去争取胜利，那就变成坚持错误了。我们一定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保持我们的革命性，发扬我们的革命性，一切消极的思想，停止不前的思想，犯了一般的错误而抬不起头的情绪都要消除。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路线，掌握毛泽东思想，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投入新的斗争，继续大大地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首创精神。路是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走出来的，革命的世界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斗出来的、创出来的。

在夺权以后如何继续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这是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再革命下去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共产党人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把权夺过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前夕，毛主席就警告过，有的人在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好汉，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面前可能要打败仗，后来果然如毛主席这个话说的那样。今天我们夺权，也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就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一月革命的英雄们、战士们，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我说这个话是把我自己放在里面，虽然我在一月革命当中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艰苦奋斗，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被捧场、被胜利、被讨好、被权力、特别不要被物质享受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我们永远不管怎么忙，永远要学好毛主席著作，永远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要接受那些一九四九年有一些人进城的时候是革命者，后来就蜕化变质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教训。

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大家知道，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在批判彭真《二月提纲》时就说过：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是加强无产阶级的科学性。主要是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问题。要学习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如果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什么科学性也说不上，调查研究也做不好。对于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阶级分析。这不是个人问题，要进行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一定要跌跟斗。现在有的人不是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是好好用毛主席著作来对照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中央有很多新的指示，不是一句一句地认真钻研，用毛泽东思想去做调查研究，甚至于凭道听途说的马路新闻吃饭，凭这个去判断风向，这就是一种反科学的态度。前一个时期不是有的人就靠道听途说的新闻去投机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跌了大跟斗，就是因为缺少无产阶级的科学性。我们希望各革命组织之间不要搞情报，不要用相互打到别的组织内部去搞情报的办法，不要搞这个东西。要进行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原则斗争。同志之间要学会商量问题的作风，遇到不同的意见，我们要商量、要辩论。辩论我是赞成的。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天天听到一个学校里，一会儿这一派上去辩论，一会儿那一派上去辩论。要辩论，不要用打、用砸、用抢等办法来解决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这股歪风要坚决刹住。毛泽东思想是一定要胜利的。我们搞文化大革命，一切武器当中最锐利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是战无不胜的，一定要掌握起这个武器来。办一切事情都要从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立场出发。不要搞投机。

加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这里面最主要的一条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要坚决地、迅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对于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领导、错误意见，我们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今后还是这样。反对奴隶主义，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这本来是要我们去反对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不要盲从。这个口号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反对奴隶主义，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奴隶，不要做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奴隶。但是有的人后来歪曲了反对奴隶主义，解释成怀疑一切，这样就发展到无政府主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甚至于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就变成反动的东西了。我们要巩固劳动纪

律，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秩序，坚决反对无故缺勤脱产等等妨碍生产的现象。有的工厂里脱产缺勤率太多，这个现象一定要改正。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我们希望中小学的同学要回校去进行学习、整风，不要不愿意回去、老是在外面游逛。要加强保密观念，现在有些同志头脑里保密观念很少了。现在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千方百计在窃取我们的机密。我们还有个保密观念，反对泄密的现象，必要的保密制度就是要坚持。各革命组织当中要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建立民主集中制，既反对没有民主，也反对极端民主化。

这里顺带说一个整顿组织的问题。不是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吗？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里，除了指出要按单位、按产业、按系统、按部门建设我们的阶级队伍外，还提出了两个意见，一个意见是：有一些违反中央指示的组织要主动解散。我们希望这一些组织，能自觉地回到本部门去，参加本部门的革命的大联合。还有一条就是这样说的，“在整顿组织的过程中，必须纯洁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把混进来的坏人清洗出去。”事实说明某一些革命组织当中因为相互不了解，确实混进了少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这些坏人混进了革命组织，盗用革命组织的名义干了坏事。这些人我们应当通过整风把他们揭露出来，清洗出去。当然我们这里要有区别，一个组织里面有了坏人，假使他不在领导地位的话，就不等于这个组织是坏的。如果他是一个组织的领导层里面有了坏人，那么一定要把他同广大的战士严格地区别开来。对于这些混进革命组织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清洗出去之后(这是极少数人)，我们的革命组织就能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有力地去战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阴谋诡计。

(七)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讲这样四句话。同志们，我们刚刚《语录》已经念过了，这一次整风一定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毛主席的方针，一定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从提高政治觉悟着手，从学习毛泽东思想着手，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

首先我们要学好关于当前形势和任务决议中规定的毛主席六篇著作，以及中央有关指示，和《红旗》杂志有关的社论。比如最近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在学校里传达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指示。我们特别要学好《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篇文章，其他文章也是一样，这是一篇万古长青的伟大著作。如果把这一篇著作的精神掌握好了，来建设我们的队伍，我们就可以象当年毛主席把军队建设成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无不胜的人民解放军一样，我们今天也能够拿这个建军的武器来建设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使我们真正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整风才有武器，才有标准，所以一定要好好地学。

我们要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意见，在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也需要开一些小会，深入地辩论某些思想问题。有的还需要个别谈话。现在我们个别谈话，已经很少很少了。解开一些思想疙瘩，有时还需要个别谈话的。一个单位各个革命造反派之间，如果大家都争论不休，而又找不出什么原则分歧来，那么各个革命组织就应该以自我批评为主，大家首先检查自己。要多看到别的同志的优点，要看到自己的缺点，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大方向上取得一致，促进革命的大联合。

我们要象“鲁迅兵团东方红造反队”的小将那样，对于错误的思想要作透彻的批判。什么“材料挂帅”啦，“单纯军事观点”啦，“罢官革命”啦，“贪图享受”啦，批判得很透彻。对待错误思想要批判得透，但是对于同志，一定要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所谓惩前毖后，就是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要反对自由主义。同时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揭发错误，批判错误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不是像《水浒传》里的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管你是什么人统统砍，我们不采取那种办法。我们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正如毛主席教导的：“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要摆事实讲道理。一般的不要去翻老账。不要由远到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翻起，一直翻下来。这样辩到那一天啊！还是着重解决当前的问题。对待革命

的同志，我们要坦白、诚恳、严肃，有话当面讲，不搞背后活动。要注意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在开展批评的时候要注意大的方面。拿我们现在来讲大的方面是什么呢？斗争的大方向是什么？我们掌握得对不对呀？革命的“三结合”、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究竟怎么样呀？这些就是大的方面。毛主席说，批评要注意大的方面，即政治上、组织上的重大问题，不要只注意小的方面，使人变成谨小慎微的君子。人人变得什么事也不敢干了，那还行吗？你要干革命，总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要力求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坚决改，这个就是好同志。

要边战斗边整风，不是停下战斗。这里对于战斗也要解释一下，据说有的学校叫边战斗、边整风，战斗就是打内战，就是革命组织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这个意思。边战斗边整风，就是指当前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是说不要脱离当前的工作。这里工厂和学校不同，因为工厂要坚持生产，中学和大学不同，工厂、学校又和机关不同，根据这些不同的情况，在时间上要作适当的安排，要分别不同的情况。

在方法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一切争论的问题，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一分为二。毛主席指出：我们在分析问题、分析错误的时候，“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使大家都能接受经验教训。毛主席还说，在一般的时候不要太着重于个人的责任。不要搞什么人人过关。比如小团体主义，我们在分析的时候要看当时成立这样那样革命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又要看到在当前的形势下，跨行业、跨部门的小团体和工作不适应。在看到这一些不适应的时候，要看到客观上怎么障碍了我们的工作，也要看到我们主观上存在一些什么思想障碍，这样子分析就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接受教训，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在学校里对一般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在大风大浪当中，在这个阶段或者那个阶段，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应当从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着手，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认识为什么会犯错误。这样我们就能够提高觉悟，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而不是相互揪住不放。这样，那些什么“联动”之类反革命组织就彻底孤立了，他要挑拨离间就不能实现了。

总之，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毫不含糊，一定旗帜鲜明，对于同志要采取耐心帮助的态度，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要好好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好多文章都说了这个问题，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最伟大的榜样。

同志们，最后我想说一点，我们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反对风头主义，但是我们一定要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上海对全国负有很大的责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造反派，都要懂得。我们在一月革命当中曾经有过光辉的贡献。但是我们决不能以此为满足，如果我们满足起来，不继续前进，我们就会落后，如果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我们就能够为党、为人民、为毛主席作出更大的成绩。我们一定要发扬一月革命的光辉传统，一定要百倍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上，大大地前进一步；在组织阶级队伍上，大大地向前一步；在抓革命、促生产上，大大地前进一步。一句话，在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肃清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搞好斗、批、改上大大地前进一步。放眼看全国，我们一定要用新的成绩来回答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一定要把上海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铁打江山的一个红色堡垒，在任何逆流歪风中都巍然屹立，上海，一定要永远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638. 张春桥在整风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3月26日 上海)

刚才姚文元同志已经做了系统的讲话，他的讲话我们两个是商量过的，他的讲话写了稿子，这个稿子我们两个共同修改了五次，那么我今天就没有准备稿子啦，因为说好了，他的讲话算我们两个的。刚才在这儿坐着嘛，条子很多，还提了一些问题，我想还需要补充一点。从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间，同志们可以看到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存在着不少问题。那么出现这些问题，我们是有责任的，首先当然我有责任。因为有些事情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紧，不深入，工作不深入，有些情况不大了解，或了解不准确，有些问题，我们感觉到了，但是，是在小范围谈的，找了很多谈过话，开了会，但是因为我们的话没有直接和全市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派的同志一块商量，一块谈，有些话传来传去，就不晓得传成什么样子啦！有的就传得就是完全相反啦！有的是我们根本没有讲过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一一地来讲，也不需要讲，总而言之我们有责任，这一方面的事情没有做好。就是我们话讲了，或者我们的意见还对，那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为有许多事是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些人我帮他很多了，一再谈一再谈，但是无效，包括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那我们谈过很多次话，毫无效果。我们革命派的同志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我们发表的这一些意见，如姚文元同志讲的，有一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也有一些意见可能不完全妥当，也可能是错误的，同志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因为是整风嘛，整风就要敞开思想，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说出来，对我们的意见不同意，也可以提出批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我们两个人还有个共同的希望，我们还比较希望尖锐的批评，因为模棱两可的话，我们平常不大说，我们批评人也批评得尖锐的，我们也希望别人对我们如果是批评的话也是尖锐的。我们每天收到很多信，一天几百封信，从来信中间给我们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提了各种问题，我们当然不可能都答复，对我们都很有帮助。有的同志要求我们谈话，这个愿望我们到现在实在是无法满足，我们希望同志们不管给我们写信也好，或者谈也好，对我们可以提意见，也可以批评，这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是正常的，这个不会混淆起来，就是不要在上海造成这样一种空气，好象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能批评的，那就糟糕啦！批评我们，决不等于炮打中央文革，也决不等于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善意的批评是两回事。

在批评中间，毛主席所讲的，有两种，一种是敌对的，一种是人民内部的。这个人民群众也可以分得开，我们可以分得开，对同志的批评我们欢迎，对敌人的攻击，那我们当然有对付的方法。这是我想首先说的。

第二想说一下整风。我们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们的观察，我们的这些意见对不对，观察的正确不正确，刚才讲了。我们整风的时候，首先主要的是要靠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毛主席著作作为主要的学习文件。我们的讲话，只能作为辅助的，不是有的地方说吗，我们是市长，有毛泽东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学一学，错误的思想，我们说得对不对，那还要同志们来判断。同志们自己也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以毛主席著作为主。姚文元同志讲话里已说了，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有些人是靠马路新闻过日子的，听到个风声，看到街上有张大字报，或者是北京传来的什么××首长讲话，他们也写。这个是不妥当的，要上当的。我们有我们的经验，中央同志讲话，好多大字报，我们都看过了，一看就知道，有的记录和原意根本不对头，不能靠那个。我们在这儿，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对同志们有所帮助，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知道中央的意见，我们一定给同志们讲，但这个也要区别开，那一些是毛主席的意见，那一些是我们的意见，这还是要区别开。至于大家在整风里边学习，还是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说有的同志要我讲的需要补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一些问题，一个是有同志要我讲讲形势，因为说是最近比较闭塞。这些马路新闻少了，街上大字报也少了。北京的同学又大部分回去了，消息不灵通了。我们现在形势究竟好不好。我们说形势是大好的，我们看形势的时候，就应该遵照毛主席历来的教导，要看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因为现在当然还有一种逆流，逆流也是一种支流吧，我们要看全国的形势，看全世界的形势。世界形势现在第一个大形势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只是决定今天的世界的形势，而且是

决定全世界在今后多少年的形势，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那我们现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总的来看都是很好的，好不好，要看比较，我们可以和一年前比较一下，不要再和一年多了，因为昨天我们突然想到了，这个月的 29 号，再过三天，就是毛主席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个口号的一天，现在正是一周年，去年这个时候，主席到了上海(……)杨尚昆那时候住在上海，陆定一是三月八号还在上海，去年三月八号在这里，在我们上海的，彭真是二月在上海的，那时还是这些阎王飞来飞去很活跃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形势，全国那时在干什么呢？还是在贯彻执行彭真《二月提纲》，就是《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一个修正主义的提纲，彭真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这样一个形势。也就是去年的三月底，这个时候，毛主席就提出了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阎王，那时具体指的彭真，陆定一，小鬼是指的革命的青年，那时还是讲学校、文化界，因为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是在准备阶段，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一主席所提出的任务，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这一年，那天毛主席提出来要解散中宣部，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陆定一的中宣部已经解散了，陶铸的中宣部已解散了，已经换了两个了。要解散北京市委还有个解散那个时候的文化小组，五人小组，这三个任务都解决了，只有一个现在还没有解决，就是要把国家机关精简。他给我们谈话，但是集中起来就是那么几句话：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精简机构。同志们想一想啊，这一年变化多大啊，不但是彭真、陆定一，这些人打倒了，再向下发展嘛，把刘、邓的问题也揭开了，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今天，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月革命，开始了夺权，现在凡是夺了权的，而且经中央批准的，就是报上登的几个：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这都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这些地方夺权以后的形势，虽然斗争很激烈，但都能够站得住了。山西的形势大概是这样；所有的专署地委级和市委级，比如大同市、阳泉市这些地方都夺下来了，县绝大部分夺下来了，还没有完全夺下来。贵州现在是这样，贵阳那里很好嘛，当然专署还没有完全夺下来，有些县没有夺下来，整个的形势有斗争，不要想没有斗争了，斗争都存在，但是形势都很好，别的地方也是这样，我们上海的形势同志们都看得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在大发展，比一月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是强大了呢，还是减弱了呢？当然比一月革命的时候，上海的形势好得多了嘛，有一个同学写信给我，他到外地去，到另一个地方去，他说到了别的地方，那个地方还是没有夺权的地方啰，就感觉到在上海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在这里过得挺舒服的，一天心情很愉快，到了另一个地方心情就感觉到不同了。我们希望我们上海永远是这样，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每一个跟着毛主席走的人，在上海都能心情很舒畅，过得很快乐的。当然我们快乐总有人不快乐嘛，你说上海一千万人都快乐啊，那就糟糕啰，一定有人不快乐的，陈丕显现在快乐吗？当然不快乐啰，曹荻秋也不能快乐啰，还有一些人，他们总是不快乐的，如果他们快乐了，那我们大概今天这个会就开不成了，那就是说是在座的如果你要坚持革命的话，那大概就要打成反革命。这是已经夺了权的，夺了权得到中央同意的，这些单位都是形势很好的，还有一些呢，是条件逐渐成熟，夺权的条件逐渐成熟，或者过去夺了权，夺得不太好，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或者还没有实行三结合，是单方面夺权，是一部分单位夺权，有的地方没有夺权，现在条件逐渐成熟了，同志们从报纸上可以看见北京的条件，那就逐渐成熟了嘛。北京大家可看到嘛，只要你们把报纸仔细看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三结合的条件已经在报纸上可以看出来了，只是哪一天成立革命委员会了，因为革命领导干部的名单，后面已经有好几个了：吴德、刘建勋、高阳文、丁国珏，还有什么李清泉，市委书记处已经有五个人站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书记处跟上海书记处不一样，他是叫作北京新市委，北京新市委就是把彭真的市委推翻了，成立的新市委，新市委又犯了错误，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军队的名单也已经有了。群众团体嘛，现在红代会开了，工代会开了，贫下中农代表会也开了，主要的群众组织已经选派了代表参加市委革命委员会。所以他们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据我们知道天津的条件也比较成熟了，所以条件成熟的单位逐渐地增加，当然也有比较多的曲折的地方，困难更大的地方，譬如我们最近的江浙两省现有条件都不成

熟，所以全国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大的方面来看都是好的。革命形势这样，生产的形势呢？也是好的，但我们比较担心的是究竟今年怎么样？我们现在看呢，全国的生产形势根据我们从各方面看到的材料，总的方面很好，譬如最使得人担心的煤矿的产量下降，因为那一阵经济风刮得好多煤矿大批工人都不在井下，都上来了，上来了到处串连，那个煤炭生产就受了影响，从一月份开始下降，二月份继续下降，那几天我们是相当担心，因为上海咱们这个地方又不出煤又不出铁，如果要是煤不来呀上海的威胁就大了，从最近得到的材料都开始好转，三月下半月以后譬如说山西大同煤矿就同我们上海关系很大，因为他是全国最大煤矿之一啰！阳泉煤矿从夺权以后产量就回升了，所以一切问题还是革命问题还是政权问题，权不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那你就没有办法，那个产量非要下降不可，这样夺权，条件成熟了夺权，生产就恢复，所以千万不要听那个话，好象生产下降是文化大革命搞的，恰恰相反，产量的下降证明必须搞文化大革命，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的，这个责任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上海的局面，谁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继续管下去呀，如果我们一月不发生夺权，那现在上海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经济形势开始好转这是和革命形势的发展直接联系着的，这是主流方面。我们看到主流是这一方面，但是有逆流，有支流，支流就是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有问题，随着斗争的发展，这个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些东西发展，但这一个也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流，这也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谁如果夸大了这一方面的情况来整我们，那就证明他立场错了。主流方面还是好的，这是讲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对立面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们呢？他们当然是不甘心下台的，同志们大概注意到了为什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职工代表会议讲话里提出了那么几个绝对不许呢？周恩来同志说阶级斗争还在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希望亲爱的职工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坚持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坚决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复辟逆流，下面就讲了四个绝不许，绝不许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绝不许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绝不许四清运动中那些下了台的分子反攻倒算，绝不许地、富、反、坏、右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分子乱说乱动，我们要坚决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确实斗争还是非常激烈、非常尖锐，因为这一场斗争是生死斗争，这究竟是无产阶级在中国胜利，还是资产阶级在中国胜利？究竟是社会主义道路胜利，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究竟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还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胜利？这是关系着中国的命运、关系世界命运的问题，两个阶级都是下了决心的，我们下了决心，以毛主席为代表，代表我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全国的革命的群众下了这个决心，一定要把这一仗打胜，一定要战胜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呢？他们难道说甘心失败吗？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吗？当然也不是，不会，决不会！刘邓没有死心，象陶铸那样的人也没有死心，那也还有群众面前没有充分暴露的人，因为资产阶级他总要找出代表人物，他们会起来搞复辟搞反扑，他们不投降，那么就用各种方法来搞复辟搞反扑，就是说有的地方打算利用大联合还可以搞复辟么，在大联合中间把领导权拿过去，名义上还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或者是造反派，实际上变了。没有经过批判斗争，没有经过检讨，群众也根本没通过，那里或者全体群众接受，这里要有一个三结合，这当然是少数的，也有的地方，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整风，或者利用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工作里面犯了错误，就大整，抓人抓得很多，随便地宣布一个组织是反革命，这实际上是搞了白色恐怖，这样的情况下边，是姚文元同志刚才讲的话，要我们时刻警惕，是需要警惕，因为上海的形势特别好，我们就应该警惕。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不要只是关心一下小团体，也不要关心一个厂，要关心我们全市的工作，我们要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我们应该有这个决心看到上海的革命派肩上的担子很重，上海的同志我们对全国人民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我们是有义务的，不能推卸的义务，一定要把上海搞好，我们现在的局面决不允许什么人来破坏，一定这个地方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什么反扑什么复辟在这个地方不能得逞。不

但是这样，我们也可以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当然中央已经通知了停止大串连，各地方夺权嘛，我们也相信各个地方的革命派他们虽然遇到了困难，我们相信他们有力量能够转变这种局面，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经过整风更加强大了，只要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支持那个地方，我们立刻可以去。当然现在没有这个要求，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把上海搞好，我们一月革命搞得早么！而且毛主席给了我们那样多的支持，我们还不应该搞好！全国的产业工人，数量最大的最集中的是在上海，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难道不能够担负起这样的责任来吗？应该和可以的，我们过去做的工作有成绩，现在我们应该做得更有成绩，现在全国的革命和生产形势都是好的，但是有逆流，有人在那里想复辟，这也是我们预料中的事，你要革命，革命就有反革命，你要夺权就有反夺权，这才合乎辩证法。这没有什么奇怪，包括在上海我们都欢迎有些人出来要夺权就夺权，要打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你就打倒好了！有些人“赤卫队”的头头，改头换面搞组织，我说你有胆量最好是不要改头换面，你把旗子拿出来，戴着袖章出来，(鼓掌)我们进行光明磊落的正义斗争。你把你的胆量拿出来，到全市人民面前辩论，电视台可以让你发表电视演说。(鼓掌)陈丕显不是也是讲话了，为什么不可以给你？可以！我们相信上海的革命群众，会懂得如何答复你们的。我们上海一月革命以来，工作太顺利了！曲折太少了，这个不过瘾。(鼓掌)你们如果出来给大家一个机会，让我们战士多打几仗，使得我们锻炼得更强一点，我们非常感谢(鼓掌)。曲折只能锻炼我们，有复辟活动只能使得我们反对复辟的斗争搞得更彻底，使上海的革命更彻底，使得上海的资产阶级消灭得更干净一些！(鼓掌)这就是形势。

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姚文元同志讲了，坚持革命的大方向，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发表一点意见，同时答复几个问题。

我们的任务很重的，我们不仅要对上海人民应当承担责任，我们要对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承担责任，不管担子多么重，我们决心下了一定要担负起来。那么靠什么呢？靠群众，靠上海的几百万革命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实行大联合。我们由于有一小部分同志，好同志，但是这一个时期，的确里边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多了，眼界就狭窄了，看不到我们的任务是多么重，看不到我们对全国全世界的责任，看不到我们还有敌人，有人还要搞复辟，不想这些事了，而结果死想着自己的小团体，那就忘记了我们今天的任务这么重。我们靠什么人呢？我们的革命队伍究竟是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参加革命的人多一点好呢，还是少一点好呢？我们究竟是要组织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军，还是就这么几个小团体，这些事情想没想到？因为想的这些东西少了，有时候而不是讲任何时候，有的时候在处理有些问题的时候就迷失了方向，就不去担心大方向，有认为大方向搞错了，那个事情就是一个好同志也苦恼得很！我们现在还不是讲那些坏人，这样迷失了方向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一切都颠倒了，方向一搞错，一切事情就颠倒了。我这个坐火车到北京，几十年前第一次到北京就迷失了方向，一到浦口我的方向全部错了，明明要上海到北京去，一过浦口铁路向北走嘛！我总觉得向南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一到天津我就迷失方向，就东西颠倒过来了，南北全部错误了，心里知道那里南那里北，你的感觉就不对！这都颠倒了，东西南北都弄错了，这不是坐火车，不管是你迷失方向不迷失方向，车子总把你带回上海来。革命就不是这样了，同志，革命坐在车子上，那个车子要转向的，要摔倒的，而且会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把敌人当同志看。把资产阶级思想当作无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思想当作资产阶级思想，那就是非全弄颠倒，那就糟糕了，刚才听了念了几个信，都是宣传停止内战的。这个单位实在是内战就是不停，而双方争论得有的看不出来原则分歧在哪里，有的互相把对方打成“反革命”。你是反革命，发传单，另外一个组织他是反革命，哪里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反革命总是很少的人，还有大批的。这是个老保，那个是老保，这个是保皇组织，那是保皇组织，哪有那么多保皇的。革命的群众总是多数嘛！当然觉悟有不同，有的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是在那个问题上有错误，有的单位那个地方开会是难开的，我们了解过，因为什么呢？一批是保皇派不能发言，另外一批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不能发言，还有新的

炮打中央文革的人，这样一个学校里边都没有正确的了。那么你保过皇也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好，你炮打中央文革也好，这里边总有区别嘛！有一个程度。性质严重不严重，程度深还是浅，还有一个人家改了没有，是头头还是一般群众，头头改了没有。对犯严重错误的人、领导干部，我们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什么一般的工人同志，一般的学生就不应该采取这个方针呢？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领导干部最最大嘛！因为领导干部，他领导的嘛！全国的责任是刘、邓，上海的主要负责的是陈、曹。真正把大方向纠正过来，对于革命群众内部的问题，当然革命群众里边有坏人，而且常常是发生在武斗事件上。如果同志们出去看一看，这个地方不说十个有十个，总有七、八个是有坏人挑动。我们革命委员会从成立以来，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没有挑动过武斗。什么人在挑动呢？在工人与工人之间非要武斗不行，工人同志能接受这个意见吗？总是有人在挑动的，有人利用的，看来想搞他自己小团体的利益，有人想达到他自己的个人的某种目的。象头几天，心里气愤，突然间到中国福利会去，那里的群众告诉他说，这里是外国同志住的，不让人进去。偏偏要进去，到那里把人家钥匙拿走，把抽屉打开，究竟是干什么？不对，这我不相信是革命群众。在那里要搞辩论，这里有鬼。所以，什么武斗、内战、里面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分析。当然也有两方面都是小团体主义，两方面都有错误的观点而武斗了。那我们也希望不武斗。说过多少次不要砸，你砸他干什么呢？电话机是国家财产，它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难道说陈丕显用过的电话机，我们就不能再用了？我们可以用，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砸了有什么好处？好，造反派有理，就把它砸了，这究竟谁吃亏呢？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吃亏。电话机、广播电台、凳子，什么都砸掉。你砸掉了，把房屋统统烧掉了，烧得光光的，资产阶级还是照样要复辟，他再盖一个比你的还漂亮，不触及灵魂，不作政治斗争，用这种方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各个革命派之间的问题只能够协商解决。就是对反革命组织都应该是用正当的方法来进行斗争。因为政权在我们手里，你砸也砸不掉，解决不了问题。若不解决大方向的问题，不用毛泽东来统一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就不可能联合起来，也不可能搞三结合；而没有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的政权是巩固不了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那就是看我们双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究竟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如果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把尽可能多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那资产阶级就不可能复辟。如果我们不团结，而是排斥，那当然我们这边是不利的。搞三结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三结合搞得好，我们革命的力量就组织得更加好了，就能发挥无穷的力量。不搞三结合，不搞革命的三结合，那我们的工作是有困难。当然了，有的干部翘尾巴说：“你看，搞来搞去还是对我结合吧！”我在这里帮助他，你如果是好同志，就不该说这种话；你如果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请你走开，不要你。(鼓掌、呼口号)我们要的是革命的三结合。我们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有原则的，凡是愿意革命的，我们都应想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但是你说你在那里还要摆个架子，好象离开你不行啦，放心吧！离开你我们照样革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没有什么本事，他也不会开火车，不会开轮船，坐汽车还要别人开，有什么了不起！(鼓掌)但是我们这个话是要说给那里那些在那儿摆架子的人听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我们对于所有的要革命的同志我们都要想一切办法尽最大的耐心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现在，根据我接触的情况来看，有些同志经过半年的斗争，而搞的有些昏头转向了，不知道怎么办，有些同志不知道怎么办。过去有些人谈话还满好的呢！过去谈话还蛮好的，还能谈，现在我看到有些同志，我就觉得有些同志变得木头了，什么意思也说不清楚了。他该检查，不知道怎么检讨了。我这里讲的是一些好同志，他们不是反对主席的方针，也不是摆架子，更不是反攻倒算，不是，而是不知道怎么办，而再加上我们一些同志对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就不敢去和他们谈话，就不敢下定决心，去和这个人结合。因此，只好去找一些错误还不大，办事也不能办的人。那样的人，当然啰！对任何人都要给予出路，给以适当的工作，可是他来三结合，还是不能解决咱们的问题。老实说，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他真的肯改，真的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

我看三结合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人还好一点，为什么？他有经验。他对群众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比我理解得还深刻，因为他自己有实践经验，在这个条件下他把别人打成反革命，在这个学校里面，这个学校怎么整的，如果他真正决心改，他以后就不能这样干，这个同志可能变成很好的同志。所以不要把这些人看死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帮助他们，这个不叫资产阶级复辟。这个不叫复辟，那种匆匆忙忙，也不要检讨，连承认错误都没有，就把他和上来了，那个有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复辟的味道，那个要警惕，要看我们现在这个搞法，我们搞得相当细致了，象陈琳瑚同志、王少庸同志，他们先先后后开了多少次会，面对面地同陈、曹进行斗争的啊！而且不是在一个小房间里吵架，而是在电视广播里面，在全市人民面前表示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这样的同志，我们就应该信任他们。有一种思想很糟糕，他们误解，以为“三结合”这三个原则……(录音坏了)那倒不见得。比如说他原来是当局长的，三结合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当局长，那就要看了。如果他确实原来的错误不很严重，检查得又好，他的能力和各方面都是恰当的，那当然也可以。有的就不一定，可以先做些思想工作。现在听说有的单位所以没有三结合，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们就建议是不是过渡一下，他们不一定马上就恢复原来的工作，将来谁作第一把手，那再看嘛！不要把事情搞得那么死。对干部不是一个办法处理，在这当中，有的是要罢官的，但是还有个别的极坏的甚至还要抓起来的，那不是一般的罢官；还有那些留在原来的单位上，用刚才那个说法就是要搬回原处了；有的要调动一下，现在不一定要调动，将来可以调动。比如说有一个县委书记在这个县里当县委书记，困难了，就是检查的好也有一些困难。双方都有一些困难，群众对他也有一点难办了，这样的人还是个革命同志，不过调到另外一个县还可以。有这样的事，革命嘛，在哪儿都一样革命，可以调动一下。有的需要提拔，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很好，需要提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并不是三结合就是按照原来那个班子，恢复原状，那不行。我们现在仅仅是这一点结构，我们现在主张不要大动，动多了不好，等到将来再动，等到斗、批、改的时候再动，这一段已经走了一些弯路，机构变来变去，结果秩序越来越乱。我们意见现在各个局，局的机构最好能够早一点实现三结合，把这个机器开动起来，使局、公司、厂这个指挥线不断。有个同志问，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厂里三结合了，但是公司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三结合，市革命委员会不是有个规定吗？说要经过批准。我们说这样好不好，如果一个车间先三结合了，你就先干着嘛，只要群众批准了，这个事就不大，就怕我们批准了，群众不批准。群众只要批准了，我们革命委员会意见就不会多了。如果是厂里没有三结合，局也没有，公司先三结合了，那怎么办？我们说你们也可以先工作起来，如果说你不批准我们没法工作，我看这话靠不住，你这三结合群众路线不够，群众路线够了，群众为什么不批准呢？群众批准了，你们可以工作啦。所以不要等，不管是厂也好，公司也好，局也好，县也好，包括区以下都是这样。能够大联合自己搞起来就搞，三结合能搞起来就好，不一定要等他批，但是我们还保留一个批准权。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批准权呢？我们不是为了妨碍群众运动，不是为了把革命同志的手脚都捆起来，不是的，同志们，我们是为了防止假夺权。(口号)我们规定了这一条是为了防止假夺权。你们那个地方人家搞了个假的，群众没办法，推翻不了他，他如果势力很大，我们市革命委员会就掌握了一个否决权，到那个时候不承认，自上而下地支持群众。我们是为了这个，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放手去工作，不要受到什么约束。凡是革命的行动都会得到党的支持，应该相信这一点。相反的，我们现在希望全市的同志们的要发挥首创精神，不要照抄照搬。现在搞大联合、三结合都是照抄照搬，这个不好，因为各工厂、各单位情况不一样，不要抄那些，不要什么都照抄照搬嘛！连开个大会都照抄照搬。因为市里开会，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发了个宣言，发了个第一号通令，还有一个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川沙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也是照样告全县人民书，第一号通令，给毛主席的致敬电，都是一样。后来我们到黄浦去开会，拿文件审查，一看也是这三项。后来我们给黄浦区的同志建议，你们革命一下好不好，不要什么一号通令，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上海市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了个

一号通令，二号通令也没有，你何必学那个形式。所以不要学那个形式，因为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嘛！下一次你只要一个通告就可以，不要通告也可以，发个通知也可以，按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也不要说因为黄浦区是某一个人做第一把手，我这里也照样找一个。那个条件都不一样，你看人家是副局长也来三结合，我这里就不敢找个正局长。那怎么行呢？各个单位要很好地发挥创造性，来考虑自己的问题。我在这里顺便提两个问题让同志们考虑。现在我们手边的材料很少，到处问到底有没有一些单位不需要夺权，到底有没有？现在不需要你们回答，请你们回去想一想。现在好象是到处都要夺权，而实际上上海革命委员会那一个决议草案里写的是，要各个革命组织讨论一下，究竟哪些单位需要夺权。文章里还是讲吗？凡是需要夺权的地方如何如何。如果那个地方当权的同志或者多数同志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一定要夺权啊！我看就不需要。不夺权是不是也要发动群众啊？需要建立一些监督领导的机构，那倒需要。用什么形式，去发展创造。这是一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的。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各个部委、各个局、各个县、各个区、各个工厂、各个学校等等这些单位，究竟有没有第一把手不需要打倒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市城开了一个电视大会，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的罪行。现在各个单位都在照搬。一个局就把局长和党委书记两个人狠斗了一下，象这样，一个单位是不是都是打两个？那就恐怕不适当了吧？刚才姚文元同志讲话中念了几段话，我们对任何事情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要分析你们那里的情况。也可能你们那个地方第一把手是好的，第二把手是坏的，也可能第一、第二把手都是好的，第三把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可能是相反，第三把手是好的，第一把手最坏。情况怎么会是一样呢？要分析。(录音脱落)搞革命要有勇气。如果他确实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要有这个勇气不是啊呀，我说了，会不会被说成是保皇派(录音脱落)。

第三个问题，我们也不必那么匆忙。各个大学、中学的红卫兵能够多数的学校已经能够统一了，他们选出代表来开全市的红卫兵代表大会。如果中学先联合起来了，那中学先开也可以，不必定得那么死。大学的红卫兵如果先联合起来了，也可以，将来再开全市性的嘛！如果时间差不多，那就等一等，开全市性的红卫兵代表大会，来选举全市的领导机构，这样比较合适。在这种情形下，现有的第一级机构，有的已经宣布撤销了，我们觉得也可以。有些机构自己觉得还是保留好，我们也不勉强他们撤销，因为有关群众团体的事，我们不好作决定。最近大家看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议草案吗？他们为什么说那段话呢？我是说过的(录音不清)

还有一些组织，你要搞大联合，你的上级不答应，怎么办？我就在这个地方对工交系统的工人讲过，不理他，自己干。我说过个话，因为不能妨碍群众的革命行动嘛？我们不管做那一级的领导工作，同志们要记得，永远跟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不要站在对立面，要同革命的群众一块前进！群众总是要前进，人类总是要前进，而我们呢？也是要不保守。所以毛主席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群众当然是要起来革命的，什么样的理由也不能压制群众。现在这个问题的分歧不太大了，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还有人要压制，那你就自己革命嘛！革命不要人批准，从来不要人批准。本来二司成立，根本用不着曹荻秋批准。要他批准干什么？不应该叫他批准。只要是革命，就不要人家批准，可以造反，大家可以发挥创造性。从各个方面来看到新的形势，这是大联合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讲讲生产。这个问题没有多少话好说，因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革命。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里面大联合，三结合问题，大联合，三结合不解决，我们生产上不去，现在已经妨碍生产。好多单位就是在那里打内战，把生产打糟了。有些科研单位还说什么中共中央的信不适用科研单位。我不晓得你算哪一派。你算是革命职工，革命干部，总有你的份吧！科研单位据说还没有坚持工作时间，一天到晚还在那里辩来辩去，把工作完全抛掉了。有的科研部门几个月没有干工作了，这是不适当的。同志们，你们要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科研发展得快一点，我们现在是同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争，争时间，抢速度，看我们能不能把它压倒。(录音断)

在业余时间闹革命，这是中央的方针。如果坚持不改，累教不改，那怎么办？那就不应该再发工资嘛，这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你不劳动，为什么拿工资啊，现在崇明农场还是宝山的一些农场，还有一批人在市内逛，不回去。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就是要在市里分配工作，我今天再重复一次，上次我讲过，你死了心吧！你不回那里去，市里决不会分配工作的。

还有现在短途运输非常紧张，海港很多仓库的运载量都很大，有些运不出来，船上的东西运不下来。为什么，因为车子不够。车子到那里去了呢？今天到会的同志想一想吧！我们占用的非生产的车子太多了，有些单位，凡是从生产单位要来的，统统退回原单位，为生产服务。有些不应该坐小汽车或吉普车的，好多机构都有车子。我们建议大家把车子送回去。你从那里来的，送到那里去。我们也建议公安局交通处把全市的汽车牌照都检查一次，重新搞。在街上如果发现了不是属于你们单位的车子，一律扣留。这样，对我们生产有好处，对我们革命的同志有好处。

还有一个问题，军队的同志现在参加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根据的指示，(脱落)我们解放军同志到各个单位，希望各个单位的革命同志们表示欢迎。第二要向解放军学习，这是向解放军学习的很好的机会；同时也要把本单位的情况如实地向解放军讲，不要隐瞒，不要歪曲，也不要夸大。但是，应该说上海单位太多了，工厂有八千个单位。学生是二百万。把我们警备部队和野战军统统分掉也分不过来，因为你一个地方不能去一个人，我们跟三军的同志商量，也跟南京地区的同志商量，先只能够来参加要害部门，最紧急的部门，比如交通部门，运输部门，这是关系到全市的，其余的地方就看了，不可能都去，所以上海的同志还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包括军训。军事训练也不能等着解放军来再军训，而且解放军也只能帮助你们一个短时间，不能老住在你们那里，所以基本上说以自力更生为主。你那里总还有民兵，基本民兵嘛，还有复员军人嘛！自己为什么不能搞军训呀！可以搞的。而且军训和政治训练配合作用，所以我们希望同志们去发挥创造性，自力更生，自己来想办法来帮助大家。(口号)今天到会的军队同志，我也是穿军装的，我想给军队的同志来说几句话，因为军队的同志有的在上海住了很久，有的不是，有的虽然在上海住了，但是现在与要到的大单位并不熟悉，同时军队……(此处录音脱落约十分钟)领导之下，或者他们自发的，怎么不管它了，反正是斗了他们。斗了他们嘛，后来就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这些青年都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好，那么那一批牛鬼蛇神或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就自己站出来说自己解放自己。我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那批青年同志关进牛棚。我说就是不正常的现象，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问题，我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你们自己想一想。我建议把牛棚撤消，不要搞牛棚，让那些青年出来说话，让他们有错误自己检讨，关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呢？关在牛棚里他又不变成牛，还是个人，他们的思想问题根本解决不了，而且可能把好人关在里面。我建议文艺界的同志，如果别的单位有牛棚，我赞成你们不要搞牛棚，不要关起来，有道理辩论嘛！我们跟陈丕显、曹荻秋辩就辩嘛，有什么好怕，真理在我们手里，不要用这种办法。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问题。我上一次传达，24号传达的时候讲过，毛主席说过，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一种暂时的，没有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党，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党，我们的革命是没有法前进的。有些人说现在不要党了，看到党员就骂。我说，这种人至少感情上有点问题。有的就说：“你们这个党就是刘邓的党”，那里是？我们党中央的主席是毛主席嘛，我们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关于青年团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中央没有最后决定。讨论过，无非是几种想法：一种是保留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改造青年团，一种是用红卫兵代表青年团。究竟用哪一个方针中央没有定。当然，现在的团员还是团员，现在的党员还是党员，那些群众大会上开除党籍一律无效，群众大会怎么能开除共产党的党籍啊？有的强迫叫某一个组织把某一个党员开除啦，那当然无效。有的非

党员接管党支部，而且封自己是支部书记，这当然是无效的。有的新发展了非党员，自己封自己是党员，又发展新党员了，这个当然都不能承认的。我们认为上海市委是垮了，它的权革命委员会夺了，新的市委还没有建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向中央请示过，问过毛主席，这种情况之下，党的问题怎么办？毛主席的意见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因为你们现在抽不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问题向同志们说一下。同时我们想说：希望所有党员，不要忘记是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不愧于我们这个称号，就是我们一个人，也应该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已经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共产党员应该在里面起模范作用，用这样一种标准要求自己，那末等到党中央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指示以后，我们再详细地讨论这个事情，现在只能这样说：应该做模范，应该象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象一个共青团员的样子来工作。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党员同志和团员同志，你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是党员是团员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那就快点改，如同我们对别的人一样，还是有错误就改，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最后，我想说几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上海(脱)……成为执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模范，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成为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我觉得这个话对我们上海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所有的革命群众，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的红卫兵，所有的解放军战士，指战员，所有的干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来成为这样的模范，使我们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期望，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使得上海成为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堡垒，成为资产阶级没有容身之地的最好的城市，是我们毛主席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是我们全国的模范。

我今天就讲这些，完了。

639. 陈伯达、戚本禹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3月27日下午)

周培源同志也在座。

陈伯达：你们可以考虑周培源同志当校长。周培源同志还不错吗！当然我不能独断专行，你们可以考虑，总比陆平好一些。陆平什么也不懂。我是个土包子，乡下人，没有什么知识，也不懂。

(问一问同学)：你学什么的？

答：学语言的。学中国语言的。

陈伯达：中国人还学什么中国语言，这些功课，我看可以取消。

戚本禹：不学古代汉语，古文看不懂。

陈伯达：是否单要一个中文系，各系都在学文学，中国大文豪鲁迅、郭沫若，都不是大学中文系毕业，都是学医的，可是他们都成了大文豪。中国的大作家金敬迈(《欧阳海之歌》一书作者)也没有进过中文系吗？

(问一同学)叫什么名字？

答：叫×××。

陈伯达：你的名字是新改的吗？名字无所谓，何必都改了，大家都改了，都一样，“捍卫”这字眼在全国名声很不好。

下半年就要上课了，文化革命时间很长了，关于教育制度要搞一个大革命，我这个人是个老百姓，是个文盲，没知识，不过我感到教育制度清朝末年变来的，形成的，后来又接苏修一套东西。从教育制度，内容看来是资产阶级的。

社会主义时代，共产主义时代教育制度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应有高一级教育制度，

来适应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向共产主义制度，我们一定要大破大立，搞文化革命是“破”，现在考虑如何“立”？时间已经不太长了(指离开课时间)，怎么办？应该按主席教导工作。问题、办法，应从群众中来，教育不能按现在制度搞下去，这是不适应于社会主义，更不适应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创造一个新教育制度。你们都是我的先生，要“破”老制度，“立”新制度，建立新的教育方法，时间教材，和大家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过去古代“教”“学”是一个字，正如“买”“卖”是一个字“卖”一样，到原始社会末才分开了。古时，一个字时，包含一个重要哲学意义，“教”学相长，互教互学，应该先当群众的学生，才当群众的先生。

现在教育制度，方法，是硬灌式，填鸭式，应是启发式学生，教育打成一片，学生独立自主，有时请教先生，教改要从这一观点出发，也就是从毛泽东思想研究教育方法。开始不太完善，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起来。现在大学制是从欧美搬来的，原来大学也以学生自己奋斗为主，教师辅导。很多人在年青时有所作为，牛顿的学问是在乡下搞出来的，也就二十多岁，后来当官去了。你们不要小看二十几岁的教授。(看完交上名单，很了草)我可以教楷书，(没有这个专业——戚本禹插话)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长，有错误。我刚才废话连篇，你们可以批判我，批判我的太少了。

戚本禹：现在提到“炮打某××，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除毛主席林副主席外，任何人不可随便与无产阶级司令部联系起来。

陈伯达：可以炮打我嘛！

戚本禹：伯达同志除外。(有人提到伯达、戚本禹同志去计委看大字报，炮打某××是否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陈伯达：我是计委副主任，官僚主义，可以炮轰打倒，要勇于批评，改正，养成自由交换意见的习惯，年青人更要有勇气。(有人提到：理、文科年限太长，文科招生方法要改革，有人说：文科不要了，理科也不要了)

陈伯达：理科还应要的，文科要不要可以考虑。

戚本禹：文理科还是要的，问题是搞法。(有人提议掀起一个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高潮)

陈伯达：好！很好！所有应批判的都要批判，你们可以办一刊物，《教学批判》，不定期，《光明日报》《红旗》可以刊载这方面文章，要看到这是一个创举。苏联教育制度是继承沙皇那套，我们那套是从苏联抄来的，他们强调分数，其实很多人在学校里分数不错，考第一名，但到了社会上并没有什么用处，相反，有些人分不一定高，但也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有人说：列宁小时候上学都得五分，列宁那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之所以是列宁不因他小时候上学得五分，列宁可以不得五分，但也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恩格斯没有进过大学，但他写的《自然辩证法》就不错吗？……他的基本方法，基本方向是对头的。

还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研究，课程，时间(指年限)怎样教怎样学，象现在这样先生讲，学生听，不用这办法用什么办法听？十六条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应该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这是不是普遍意义？是否适用于教学？我认为有普遍意义，在教学中这原则也适用。大学可以自己教育自己，中学如何？小学有无这种可能？你们眼光要放亮一点，看远一点，看问题不要只局限在自己学校，大学，要考虑中、小学。

文科要不要？如果要文科比理科短一些，郭沫若是大文豪，他年轻时写很多诗。他曾问我懂不懂甲骨文，郭沫若说这很简单，他本来也不懂，流亡到日本七搞八搞就起来了。他是个大文豪，历史学家，他本人没进过文科大学，他七搞八搞就搞了一大套。

金敬迈也没有进过大学。我这个人也是所学非所用，学的和用的不一样。

以前上大学为作官，我老乡严复，原在外国学自然科学，可能学海军，回来当一年干事。他有点名气是他翻译了几本书，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他本人是个反革命派，但他翻的书在中国起了一些好作用，他回国后学做官的本领，学八股文当了秀才和举人，因为李鸿章不

信任他，他也未做上大官。

你们要把中小学联合起来考虑，中学，小学都是六年受不了，对老百姓一点贡献也没有，半辈子吃老百姓饭。一毕业没工作就拿薪水，这不合乎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会主义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大学毕业生是废料，蠢才，现在大学中和满州人进学校一样，带一帮服务人员是否可以改掉。

(同学回答：服务工作，已经自己干了)

很好，这是一个革命。古时候有一条“洒扫庭除”(理科同学说：从七岁上学，小学、中学、大学各六年，不生病，不休学得二十五岁毕业，研究生三年二十八岁毕业)

戚本禹：二十岁就毕业。

陈伯达：小学是否三年就可以。

戚本禹：三年不行得四年。

陈伯达：关于学制，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包括中、小学，可以全盘考虑办一刊物，《教学批判》把中小学包括进去。资本主义制度是比封建主义制度进步了，但有些是退步了，过去我读私塾那时自学是主要的，也参加劳动。洋学堂不同了，老百姓对洋学堂很讨厌，有派头了，说话也是另一副腔调。上课制度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主义社会有些进步，但也有明显的退步，讲派头，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者。(历史系同学谈到历史问题)我看历史系一点也没有用。历史系要不要，要考虑。

戚本禹：要还是要，人不要那么多。(谈到此时)对！应该政治上批，你们历史系应该系统地批判刘邓路线，刘少奇从抗日战争以来就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开始反对毛主席了。写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陈伯达：(谈上课方法时)各门功课由学生自己选题，做准备，可找一个人做正报告，找两个人做副报告，这样自己给自己上课，大家都当教员。有问题大家辩论，教员起辅导作用。(有人提可以用四大武器)好嘛！可以结合小组，大家可辩论，这样思想可以活跃了，教员人数也不要这么多。只起辅导作用。

学生准备报告稿子事先不要给教员看，毒草也可以，不受教员束缚。教员也要听，教员做辅导工作、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每个人可以独立思考，学制也可以缩短，六年教学可以缩成两年。总而言之，我们要考虑，从根本上推翻现在教学制度。可以用“四大”。教员不够，可以到工厂串连，这样学校可以活起来，而不是死水一潭。象哥伯尼把“太阳绕着地球转”颠倒过来一样。教学上也要颠倒过来，过去学生围着先生转，现在先生围着学生转。

老师要看到自己是学生(戚本禹插话：学生可以批判先生，先生可以批判学生。)(有人提教员不愿干，有“斗批走”“斗批散”的意思)先生和学生可以互相辩论，不要有太多顾虑。

戚本禹：你们可以办刊物，发表各种意见，还可以广播。

陈伯达：广播不要。

戚本禹：不是广播车。

陈伯达：那还可以。文科不一定要教材，可以列几本参考书，改变硬灌式，要互教互学，理科是否可以这样做？(答：可以)你们可以试验试验。

(讲到辩论时)可以辩论，但不要武斗。每个人都可以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

(有人建议把政治课改为主席著作讲用会，政治老师当辅导员)可以。

戚本禹：一定要打破老师统治学生的现象。(有人问教员威信如何树立)看你是否能正确引导，教员不能当工作组，不能当张承先工作组，可以当联络员。

陈伯达：很多课重复的要删掉。大中小学联起来考虑。小学学了的中学不学，中学学了的大学不学。大中小学都要考虑，不要搞宗派主义，不考虑由中、小学，大学改革不能落实。(哲学系一同学说：入大学还未上课，搞四清，搞文化革命觉得收获很大，也可以毕业了)没学就毕业了。

戚本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哲学系要很好地批判一下，到现在还没有一篇很

好的文章。

陈伯达：要学会做批判工作。各种学问是在批判中成立的，冯定、冯友兰可以作为批判对象。马克思主义就是批判。马克思、毛主席每篇文章都是批判的，我们的观点在批判中树立起来，冯友兰、冯定等在你们这里很有好处，给你们树立批判对象，可以好好议论一下，你们可以拟出一个章程，搞出一个计划来，便于实行。计划可以冲破，教员不要这么多，和同学关系要密切，要住在一起。(有人提到教员有家，和学生住在一起有困难)吃饭在一起吗？(不在一起)应在一起，象在工厂一样，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们学校伙食如何？(答：吃米面)可以吃小米，窝窝头。教育、劳动、实际要联系起来，做些工作，实验一下。

周培源：北大 52 年院系调整时抄了苏联一套，学校太大了。

陈伯达：学校太大了，太大了不好。今后要缩小三大，大城市、大学校、大工厂，太大了不好管理。

周培源：学校培养目标，要与社会需要对口。

陈伯达：学生可以教育自己。到工厂去做报告，听意见，到社会做调查。(谈到大学学制太长问题)

周培源：陆平搞六年制办“大学”是骗人的，与主席“少而精”相违背的。(有人说：医科大学更长，八年。)

陈伯达：真糟糕！你们可以搞一编辑组，办《教学批判》，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把斗、批、改提到日程上来，各种意见都要听，只要说得有道理。

戚本禹：你们要搞出一套方案。

陈伯达：北大有义务搞出一套方案，可以与清华一起讨论，这也是一个大革命，教育也要大革命。出一刊物，不定期，周刊或三天一次，要把意见转达清楚。要允许不同意见，不同方案。这不是出风头，你们有这义务。方案要从群众中来，先验方法(有人说希望陈伯达同志谈谈形势问题。)

自己教育自己，我们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请教，要自己去思考，就不能包办代替。教改中两条路线斗争很激烈，要打破旧框框，建立新制度，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不会那么顺利的。

资本主义制度统治我们很长时间，过去上大学是想当官，现在不是做官，而是做人民勤务员，这是多么大的差别。解放以后，大学毕业生有优越感，凌驾人民之上，有些人起好作用，有些人没起好作用，拿薪水老百姓有意见。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时间长，薪水高这不合理。

我今天来不带任何成见，有成见就是破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的新教育制度，让大家探索试验，把方案打出来，不断修改，前进，完善。大学组织形式你们可以讨论。(有人说：把我校毕业生请回来参加改革)不必要请回来，可以向他们请教，不要离开工作岗位到大城市来。

陈伯达：(问×××)你是研究黑格尔的吗？黑格尔的观点不是专门写出来的，而是讲话中搞出来的。

戚本禹：辟谣……

陈伯达：你们不要搞马路新闻，这对外国间谍有好处，都是主人翁吗！要有责任感，把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不要依靠马路新闻，要做科学的阶级分析。你不清楚，就不要在大街上写大字报。

戚本禹同志讲了一个很好的意见，炮轰一个人不能简单地说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

640. 谢富治对北京市委、市人委工作人员的讲话

(1967 年 3 月 27 日 中山公园音乐堂)

今天我要讲的，吴德同志都讲了。

大家都知道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酝酿时间很长了，江青同志也开了各种各样的代表大会。刚才市委机关讲了，革命委员会是一个新的机构。市委的同志还没有最后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大家都知道市委和市人委的，旧领导人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要彻底批判，肃清他的影响，这个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主要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领导影响要彻底肃清。当然，还需要时间。市委和市人委的领导人员已经作了大量工作，还要用专门时间作这项工作。

第二个任务是肃清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肃清他们的影响。希望同志们彻底的，有系统的带着大量的材料作这两件工作。这些(东西)都是反革命的，反对毛主席的，要彻底揭露，以问题为中心，集中一些材料。市委和市人委的革命同志组成了革命组织，把很多材料都搞出来了，要收集嘛！编成一本一本的嘛！拿出来批判嘛！关于刘邓问题，如果你们找不到材料，你们就可以把造反派的几万张大字报、小字报拿出了解嘛！把他们的影响彻底揭露肃清。

这两方面的任务很重，但彻底的批判，彻底的揭露还不够，用你们自己的话，就是要彻底的砸烂。

毛泽东思想照耀着全世界，世界革命人民向往着北京，毛主席是世界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全世界人民都要听他的话，照他的指示办事。旧市委和机关就是不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都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旧市委就是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就这一点，就应该彻底打倒，彻底肃清他们的影响，彻底肃清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影响，就大大树立毛泽东思想。

同志们，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取得了一个一个的伟大胜利，一个堡垒一个堡垒的夺取。

现在这场斗争到了关键时刻，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该夺权的地方要夺权。资产阶级当权派要保权，要搞假夺权，反夺权，这是最尖锐的阶级斗争阶段。

无产阶级在工业战线上和其他战线上夺权取得了很大胜利。……

造反派的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打倒一切，反对一切，是刘少奇搞的，是 48 年刘少奇搞了，毛主席给纠正了。63 年 64 年四清，刘少奇对农村四清干部和工厂基层干部采取了一切干部都打倒。毛主席制定了 23 条给纠正了。文化革命初期，干部都靠边站，就是他干的嘛！毛主席从来就反对的，中央文革小组从来就反对的。在工人体育场十来万人开大会，几个娃娃在台上打起来了，实际上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我就没参加，主席不同意，是王任重搞的，王任重是个坏人。刘邓就把错误加在造反派身上，加在中央文革身上，颠倒是非。

毛主席强调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三结合，不是从现在开始的，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开始了，要搞真正的大联合，真正的三结合。出来逆流不要麻痹，首先在自己队伍中肃清两种影响。这个工作一定要作，但是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办，一定要按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谋部中央文革的领导去作，按照党的政策去作。我们一定要照毛主席的思想办事，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不配做普通干部。我们在北京嘛！如果在北京工作，不读毛主席的书，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不配作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干部。

所以这次要把旧市委的影响彻底肃清，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肃清，就可以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的觉悟就提高，每个人都受到锻炼。我们毛泽东思想学的还不够，还是个小学生。希望同志们每天抽时间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纸，《红旗》上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导。

旧的东西，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刘邓都要彻底的批判。每天要规定时间，有组织、有纪律学习、开会、批判。革命组织间没有必要纠缠的东西就不要缠了，对准旧市委、刘邓。群众有原则的分歧要批判，但是要按毛泽东思想。大的原则上、政策上、方法上要按照毛泽东思想，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希望你们经过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个问题，一个问

题，大大的提高，拿出一定时间来搞。

今天没什么准备，同志们要我讲讲，不对的可以批判。

641. 王力、关锋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3月27日 钓鱼台)

王力：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近要批判“清宫秘史”，特别是刘少奇的东西，已成立领导小组准备系统批判。批判刘少奇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抓这个就不对了。新闻界要批判吴冷西、胡乔木，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当前夺权斗争，要很好宣传，反复宣传。如《红旗》三期社论发表后，每一部分都要写文章宣传，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反复宣传。(陈伯达同志插话：真理不怕重复，只要用新的事实，新的语言来写，就不会重复。)主席讲：“今年一月，斗争达到了顶点”。

要宣传军队支左(左派)、支工(工业)、支农(农业)、支接管(包括军事代表)。军政训练不宣传。

主席说目前全国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

革命派在占优势的情况下，可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实行大联合，但要注意保守势力把革命派吃掉，不要用解散革命派的方法去实现大联合。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4月2日开会(按：现因故延期一周)，这是一件大事，非常重要，是毛主席亲自关怀这件事的。北京市的特点：由主席指示先开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这样大联合就有了基础，思想容易一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是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筹备。

过去跨行业的联合不能否定它，有一定的贡献。今后要以大企业为主实行大联合较好，天津正按北京的经验搞。

关锋：报纸要抓四个方面：社论；评论员文章；编者按；头条。

宣传要结合政策，要结合实际，要根据毛泽东思想。脑子里不要有一鸣惊人的想法，要老老实实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宣传要点：

一、全国运动是大片光明，夺权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有些人善于把我们的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攻击我们。对于左派少的地方，要作艰苦工作。宣传对坏人不起作用，但对孤立、揭露坏人有作用。

二、反复宣传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指示。

三、当前宣传中心：1. 大联合、整风。要防止坏人整小将。2. 正确的对待干部。执行干部政策就是一个斗争过程。防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花招，反扑，混进革命队伍，打击首先站出来的革命干部。3. 宣传革命的“三结合”，反对合二而一，搞折中。4. 宣传夺权和掌权，特别是掌权后的效果。5. 宣传“抓革命、促生产”，应该把革命放在首位。抓革命促生产不是并列的。6. 宣传军队支左。7. 宣传军队支工。8. 宣传军队支农。9. 批判反动路线。当前主要是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反动路线，也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如果不批判就直接阻碍了革命的“三结合”。10. 批判刘邓。现在运动发展到更深入更高阶级，单靠红卫兵小报是不够的，要把全国的报纸都调动起来。11. 宣传打退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宣传要有分寸，是一股逆流不是主流，所以要有分寸。

王效禹的文章是主席修改的，所以看法和提法要以王效禹的文章为口径较为合适。

642. 王效禹在全省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67年3月27日)

同志们：昨天晚上陈雷同志告诉我，说咱们这里开了三个会议，就是今天就要结束了，

要我和同志们见一面。这个话嘛，可能是我听错了。今天来一问，有的会是才开，叫我来讲一下。我没有准备，我就问了一下会议的情况，今天参加会议的人很多，想法也都不大一样，有的是造反的同志，有的是站出来的同志，也有的是想站还没有站出来的。所以考虑到，有些问题比较难讲，既然来了，同志们提出来，我还是讲两句。我想就当前咱省的形势，以及最近我下去一趟，到了几个单位，了解的一些情况和发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和同志们讲一讲我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对不对，我们大家来研究。

同志们非常关心当前省里的运动到底怎么样？好几天以来，有不少同志提出来，要求把形势问题讲一讲。在这方面我掌握的材料不多，也不好多讲，只是把一些情况和同志们说一说。就目前看，在我们省里讲，运动形势是很好的，是一片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自从一月份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打起大联合的旗帜以来，也就是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总的形势在全国都是很好的。大联合和夺权斗争席卷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我们山东也是一样，在全国大好形势的推动、影响下，二月份就夺了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的前省委、省人委一切大权。从那时起，在全省的夺权斗争也迅速地、全面地展开了。目前是这样的，地委、市委需要夺权的已经都夺了，还有一个市夺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夺过来。县里需要夺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夺过来了。前两天得到的材料，已经有九十多个县夺了权，进展很快。这两天情况不了解，估计这两天又有进展，预计到四月份我们全省的夺权斗争就能基本结束，取得夺权斗争的全面胜利。关于夺权以后的情况，当前发展是这样的，凡是夺了权的，绝大部分都组织了比较强的革命的“三结合”班子，大联合的形势也是很好的，“抓革命、促生产”，在大好的革命形势推动下，我省的生产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不管工业生产，也不管农业生产，比去年同一个时期都要好的多，当然在个别地区和单位，由于斗争时间比较长，秩序恢复的比较慢一些，稍差一点。但总的形势还是好的，特别是从夺权以后，革命群众组织大大地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群众的热情很高，不管是在农村里边，也不管是在城市里边，从这一方面来看，这一个形势发展是很快很快的。这是我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从二月三日省里夺权到现在，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取得了这样伟大的胜利，这首先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了我们直接地、大力地支持。没有这个支持，我们就没有这个胜利，再就是解放军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从省里夺权开始，解放军就挺身而出，坚决地、大力地支持了省里的夺权，和我们一起夺权，一起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省里夺权以后，反扑打下去了，解放军又积极响应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工厂，数量是相当大的，公社是这样，最少有军队的四个干部，每个工厂也有军队的干部。这样从上到下，部队一下子展开了，左派在部队直接支持下，夺权很快地全面发动和展开了。就这样，在个把月的时间，全省的夺权形势突飞猛进，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大胜利。可见解放军出动支持左派夺权斗争，对我们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山东的夺权来讲，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能不能把权夺过来？恐怕这个问题值得考虑。我看没有解放军的支持，要夺来是很困难的，就是夺过来，能不能巩固得住？看来还是巩固不住的。当时的夺权，开头夺权的单位，都遇到了几个大的反复。这个反复，如果没有解放军的支持，很可能夺过来，夺过去，形成一种拉锯的局面。如果真是那样一种形势的话，对于我们下一步革命的发展，对于完成斗批改的任务，对于春季生产和全年生产，都将造成很大的损失。而解放军一出动，局面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所以就省里来讲，再没有出现那样的局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打下去以后，局势就稳定下来了，省革命委员会就能拿出一定的力量，在解放军的直接参加和大力支持下，抓了生产，抓了农业、工业、财贸方面的工作，抓了机关工作，抽了一定时间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要不然，现在农业生产还不(能)一定安排下去，如果农业生产安排不下去，我省的整个国民经济就要受到损失。现在看，生产还是不错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掌了权以后，生产搞不好，不能把“抓革命、促生产”这个精神贯彻下

去，对今后的掌权恐怕也是个问题。革命放在第一位，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把革命发动起来，不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搞不好。可是革命以后呢，我们生产抓不下去，生产搞不好，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是很难巩固的。夺权以后省里能够腾出力量和时间，把生产抓一抓，安排一下，这也是解放军的支援，是解放军的功勋(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革命群众团体就没有多大作用了，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没有多大作用了。不是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如果光解放军接过来，没有群众也不行，革命的群众，革命的群众团体，革命的群众运动，批判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发展了，壮大了，成为夺权斗争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夺权也不好夺的。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如果没有斗争，左派、右派分不清楚，你怎么支持法？所以说群众运动是个基础。再就是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站出来的革命的领导干部，革命的“三结合”班子组织不成，生产也是不好安排的，下一步革命也不好搞。不过这方面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

今天我要讲的，主要是要大家了解，山东的夺权这么快，形势这么好，抓得那么迅速，夺权夺的比较准(当然个别单位也可能有的不好，但那只是很少数的)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的结果，是解放军大力支持的结果。部队直接参加了夺权斗争，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形势很好，这是基本的，是主流。主席还经常教导我们，在形势好的时候，应当看一看我们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黑暗面？这样，我们在工作中头脑就更清醒了。我想从这里讲几个问题。

头一个讲的，这也是应当首先肯定的，总的形势很好，而且是越来越好，局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一方面，就是最近，听到不少同志反映，在大好形势下，有一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新的反扑。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当时我们认为，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来讲是会有的，特别是在目前，我们是刚刚夺权以后嘛，不会那样平静下来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产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社会总是在斗争中向前发展的，斗争有是有，但有到什么程度？思想上是没有数的。特别是当前还有两种反映，一方面反映很厉害，很严重，另一方面反映说是问题不大，不是什么逆流。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下，我们省革委会常委会的几个同志，就下去走了几趟，到了几个单位，作了一番调查了解，说我们看到的，这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如果不警惕，不重视这个问题，不狠狠地把它打下去，怕就会象《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最后一段所讲的，虽然我们夺了权，但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有中途夭折、半途而废的危险。我们看了几个单位，是有这样一个危险的。

下面我就把从这几个单位所看到的情况，和同志们讲一讲，我们到了这么几个单位：一个学校、一个工厂、一个医院、一个百货公司，另外革命委员会还组织了一部分同志专门调查了三个工厂和一个区(市里的一个区)，下去搞了几天。他们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他们反映的问题，今天不想在这里讲了。主要把我亲自看到的第一手材料向同志说一说。

先说学校的情况。我们去的这个学校，有个红卫兵小将的组织，原来在革命斗争中掌握大方向斗争最坚决最积极，现在被打下去了，被解散了。他们的两个领头的被公安机关拘留了，那里原来的保守派又活跃起来了。这样，运动就被打下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复辟了。这是在学校，这种情况，恐怕在别的学校里也不是没有的。

再说工厂。我们去的这个工厂，不那么明显，群众组织没有动，群众组织还在，还有些活动，但是形势呢？也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自从“三结合”以来，干部站出来结合上，大概是结合了四个领导干部，他们组织了一个叫“联合委员会——夺权委员会”。就是这个委员会，总的来掌握厂里的工作。在这以后，革命群众团体就逐渐地不起作用了。这个委员会把原来的五十多个干部，全部组织起来，吸收到委员会里边来了，然后按照委员

会的意志，又把这些干部派到各个车间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他们的所谓“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离开现在的造反组织在那里“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这个厂的两个造反团体，本来是委员会的创建者。但是现在他们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一些工作的做法，他们也不知道，车间里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常态，恢复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样子。就是说，干部都上去了。一切都是老样子，这实质上也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下去了，不过方式不同，是“和平演变”罢了。我们去了以后，把这个情况了解了一下，和他们研究一下，准备重新组织斗争。这是工厂的情况。(呼口号：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还到了一个百货公司，就是济南市百货公司。这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就更明显了，以原来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带头，把以前的所谓保皇派原封不动地组织起来了，把造反派的组织全部打下去了——只剩下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很“顽固”，我们去的时候，已经连续围攻了她两天，围攻她也不投降，一直自己坚持，并写出了张大字报。公司的当权派们和“保”字号的组织说她写的是反面的大字报，我们说是正面的大字报。整个百货公司大院和楼上楼下，只有这一张正面的大字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对我们几个人都不熟悉，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叫党委副书记向我们汇报了一下工作，他汇报得有声有色，汇报到最后，他和我们讲“现在右派团体都被打下去了，就是还有个不投降，一直到现在还不投降”，以后我们就找那个“不投降”的也就是那个写所谓“反面大字报”的谈了谈，这个同志是部队同志的家属，她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了一下，这个公司就是这么一个局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当权派和“保”字号的组织为什么那么活跃呢？造反派都感到有些什么压力呢？我们了解了一下，大体上有这么几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个是，说造反派的组织不纯，成份不纯，说里面有些坏人；第二个，是说革命造反派开展斗争的时候戴了帽子，打了人，破坏了十六条；再一个呢，就是说革命造反派的组织里面不要党团员，或者是说(有的是这样提的)“他们矛头是指向了党团员，斗争党团员”。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始终是错误的”，是“右派组织”，是“应该彻底打垮的”，应该搞个新的“左派”组织，让新“左派”组织上台。我们说这个结论完全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有些看法我下面再讲。先就济南市百货公司的事实来讲一下，我们调查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说：“不要党团员”，事实怎样呢？就是那个“不投降”的同志所在的造反队，在开始建立组织时是五个人，其中党员四人，团员一人。他们那个单位一共有十四个党员，后来参加她那个造反队的就有十一个，只有三个党员造反组织没有吸收。这三个没要，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恐怕那三个是属于当权派的，我们没有查清楚，也不需要调查了。这已经把他们提出的问题否定了。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事实上百分之百的党员都参加造反组织，恐怕是不容易的事情。所谓“成份不纯”呢？是他们在查黑材料的时候(查黑材料是八个人，是群众选举的)，其中有一个是国民党员，这个国民党员是什么样的国民党员呢？今年已经四十多岁，我们解放以后他就参加了工作，是一般国民党员，从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他就交待了。就是八个人当中有这么一个国民党员，这就是他们说的成分不纯。所谓“武斗”呢？当时他们斗争的时候，斗争了他们公司的武装部长。在省里夺权以后，他们这个组织是积极拥护省里夺权的，是维护解放军的，那个时候山大主义兵不是围攻解放军吗？他们为了和山大主义兵斗争，曾经混战过几天几夜。在这个时候，他这个团体的牌子有一天晚上被倒过来了。以后，他们听说是武装部长给搞的，所以斗了他，罚了站，斗得激烈一些。我们问过，“是不是动武了？”说是“没有动武。”这就是他们说的“武斗”。大家看一看，他们指责造反派的一些比较突出和明显的理由，都是根本不存在的嘛！其他单位，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是有的。当然从革命造反派组织来说，武斗是有的，成分不纯也是有的，确实是有的人成分比较复杂，斗争的面也比较广。但是事情都是属于过去的，应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了解了以上这些单位的情况，我想到了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对待革命群众组织的态

度问题；另一个是对待站出来的干部问题；再一个是，对待原来的所谓“保守派”的问题。综合起来讲，这是关系到“三结合”、大联合的几个问题。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如果弄不清楚，你那个“三结合”、大联合就会出问题。我想讲一讲，我们对待这些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首先讲对待革命群众组织的态度问题。《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不是讲过吗，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如果对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采取错误的态度，那就是对运动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否认了群众就是否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是不是革命造反组织里面成分不纯？我为什么从这里来讲呢？因为当前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我们应当怎么看待和处理成分不纯的问题？这也是个大方向问题，处理得是好是坏，关系到立场问题，关系到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关系到是发动群众运动还是压制群众运动的问题。有的同志讲到，“我们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对待这个问题”，完全正确。我们就得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研究和处理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就糊涂了，就看不清楚了。但是，用阶级分析，从那里着手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阶级分析仅仅是从成份上来看，这个“阶级分析”最后的落脚点，就容易落到唯成份论上去。我们认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首先应该抓住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条纲，这一个根本的问题。抓住这条纲来分析，问题就好解决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两条路线分得很清楚。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总的形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全国占了统治地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两条路线代表着两种思潮、两种感情、两种立场，是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着资产阶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代表着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干部、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代表着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条路线，是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

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在若干地方经过了若干反复。开头，有的地方革命的同志一度占着少数，后来逐渐地发展，由少数变成了多数，原来代表着反动路线的一方面，开头占着多数，经过斗争由多数变成了少数，破产了。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本身就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从立场上，从观点上，从感情上，从思潮上，都是这样。凡是革命造反派，他都是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的，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毛泽东思想有深厚的阶级感情。毛主席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到那里。他们不怕围攻，不怕高压，也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为了捍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确实表现了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斗争下去，斗争到底。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感情，对主席的话听不进去，主席的指示不执行，对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人，处处打击，处处组织围攻，恨之入骨。这是可卑的资产阶级感情。这是两个阶级、两种阶级感情的斗争。在这样一个斗争里，我们判断一个人，就不能仅仅从这一个人原来的出身成份着眼，否则就成了唯成分论。我们应当看到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方向对不对，是拥护毛主席这条路线，还是反对毛主席这条路线。如果他是一直拥护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我们就应当肯定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革命的。经过若干次波折，十六条以前，毛主席一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他们就受到打击，他们就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斗争；十六条以后，仍然受到围攻，受到打击，他们也仍然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展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揭开以后，他们仍然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还是受到围攻，受到打击，一直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产，才转变成为多数，掌握了大权。这样的组织，应该说是革命的左派组织。左派组织就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贯彻主席指

示的，执行主席路线的嘛！

那末，这样的组织成分纯不纯？所谓“纯”，不能绝对化的理解，每一个组织很难说成分就那么纯，它总会有某些不纯的成分。尤其是这一次的斗争，有这么个特点：一开头，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用“党的纪律”和“内外有别”的办法，把党团员们控制起来，所以开头总是党团员起来的慢。后来，又用了一个“红五类”的办法。同志们认真地想一想，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这三种办法，把党员控制起来，把团员控制起来，把“红五类”控制起来，那不就是把社会上那些成分好的完全控制起来了吗？当时的斗争，不都是那个局面吗？控制得很严格。因此，那时党团员起来造反的就比较少，而群众起来造反的就比较多，越是党团员觉悟得越慢。这就必然形成造反队伍里面党员少，团员少，甚至有一定成分不纯的状况。“红五类”被当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控制起来了，那其它成分不就明显了吗？即使不是这个样子，作为一个群众组织、群众团体来讲，也难免有个把成分不纯的。因此，去年毛主席有个指示说：既要有成分论，又不要唯成分论，最后要看重在表现。你既然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个路线上来，那他就代表着无产阶级，代表着无产阶级革命派。反过来说，不论你的成分多好，是个“红五类”，是共产党员，是共青团员，可是如果你坚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站到毛主席的路线方面来，你的矛头是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的，指向了执行毛主席路线的革命群众，你怎么能说是“代表无产阶级”？你怎么能说是“代表革命”？你这个思潮，这个立场，这个观点，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即使你本身成分是工人，是贫农，你也不能算一个革命派。叫保字派也行，叫保守派也行，总起来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即使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不和毛主席一道，不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怎么还算一个共产党员呢？怎么能代表无产阶级呢？所以，我们说，不管你成分多么好，不管你是党员还是团员，只要你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阶级大搏斗中，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不是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你的大方向就是错误的。应该这样肯定，这叫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样的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我讲的是那些为首的，带头的，并不是说所有的人。有的人是受蒙蔽的，对这个斗争的历史情况分不清楚。如果我们仅仅拿着各人原来的成分好坏来处理问题，那就又回到原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了。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要不然，一看那个造反派组织党团员少，成份不好，就去解决成份问题，你就把党团员多的“团结起来”，重新建立组织，矛头对着革命造反组织，打垮他们，解散他们，那不正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这是完成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吗？这就是打击革命。从以上几个单位看，都存在着这么几个问题。当然，这个做法的根子，仍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搞鬼。

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成分不纯的问题呢？我们说，一个革命组织，成分是要纯的。但是，这个“纯”，应该作为这个组织的内部问题，由他们自己去处理。夺权以后，革命组织不是进行整风吗？通过整风，大家提高了觉悟，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如果确实有坏人，革命群众一定能够经过整顿组织，整顿纪律，把他们清理出去。不能因为一个革命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把这个组织的大方向否定了，就把它打垮了。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同样犯了方向性的、路线性的错误，就支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过去一段的斗争，有些地方也确实出现过斗争面广一些的情况，这里面成分不纯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如果不去分析，就说是阶级报复，那也是错误的。如果说这是阶级报复，个别人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应该具体分析。总的作为阶级报复来讲，回顾起来，恐怕打击革命造反组织，打击革命造反派，围攻这些人，这才叫阶级报复。每一个时期的斗争任务不同，我们应该有阶级分析。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当时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高于一切，团结一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凡是坚决抗日的，就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过：“一切赞成、

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在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斗争的目标，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重点，所谓“大方向”就是指的这个。你如果跟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受他们蒙蔽，给他们做“御林军”，给他们保镖，那你就完全把矛头指向了正确路线，怎么能代表无产阶级呢？怎么能代表毛主席路线呢？那是执行了一条反动路线！有的革命组织尽管成分有点不纯，但是他们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斗争矛头、斗争方向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斗争的。这个问题弄清楚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再去进行阶级分析，这才能最现实地分清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也才算得全面地阶级分析的观点。

另外，对待成分问题，我们还要历史地、全面地看。有些人历史上确实有些问题，或者成分不太好，但是几十年来确实有些变化，叛变了自己的阶级，站到革命方面来了。你还在那个地方追他的成分，那就有问题了，特别在这个情况下，很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空子，他们抓着这个成分问题，把矛头指向革命派，打击革命派。举这么几个例子：××工厂有个革命造反派很好，是这个造反组织的骨干、积极分子，外边就风言风语地说这个人有问题，成分不纯。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查了一下这个人非常好，没有什么问题，他历史也很清楚，但是他老婆的姨夫有问题。如果这样的联系法，我们在座的人，恐怕都很难说没有问题吧！你这样去搞社会关系、历史问题，敌人就很容易钻空子，他们扩大事态，无中生有，制造混乱，我们就很容易上当。另外，这个组织中，还有两个人是地主出身，他们都将近五十岁了，都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我们说，你是看他的几十年以前地主出身呢？还是看他的共产党员？如果看地主出身，这个人历史上曾属于地主阶级。但既然已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共产党员，而且现在仍然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人的主导方面，承认他背叛了自己原来的阶级，背叛了自己原来的立场，已经改变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了，你不应当再去算他几十年前地主出身的帐。社会上的地主，如果确实改造好了，还可以摘帽子嘛，何况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地主出身的人。革命几十年，现在又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你还去抓他那个地主成分，那不是唯成分论吗？那就是不符合毛主席讲的“重在表现”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历史地分析问题。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去上敌人的当。如果不警惕，我们就会犯严重错误，就会把革命压下去。

对待革命队伍应抱什么态度，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作的分析，就是我们的最高典范。毛主席对当时的农民协会评价很高。主席说：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变得很好”了。恐怕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也还是有点问题。要不然就不能叫做“都变得很好”了。还有百分之十五，意思是没有改造好，还有些不良习惯。但是对这百分之十五的态度，应该是在整顿纪律的原则下，叫他们自己处理。就农民协会的情况看，那里的组织成分也有点不纯，不然主席不会讲这个话。有的人把这叫做“痞子运动”，主席讲是“革命先锋”，因为他们代表了大方向。为什么说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就是这一条。我们讲他是革命的，代表了大方向，这是主席的想法。革命的同志不应当跟着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信口开河，也叫“痞子运动”，我们革命的同志，对待革命的团体，应该站到革命的立场上，站到群众运动的立场上来看待这问题，处理这个问题，才能够处理得正确。我们走的这些单位，就不是采取这样的态度对待问题，而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攻击的态度，打垮的态度，抓着革命组织成分不纯，抓着他们在运动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说有武斗，把大方向给否定了。把这个组织给整垮了。可以说这是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我们应该警惕，坚决把它打下去，因为不打退这股逆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夭折。这是对待革命群众团体的态度问题。

另一方面，是对待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的态度。我们去的几个组织里面，他们没有采取我们上面所说的态度，而是采取错误的态度。对于我们的干部队伍，主席是早已肯定了的，绝大部分是好的，这一点不能动摇，如果动摇了这一点，我们就要犯错误的。不错，在前段

运动中，对干部在不少人的思想上一度产生了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倾向。但是，中央指出来以后，很快就纠正了，有的正在纠正中。由于纠正了，因此，不少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已经站出来革命，和革命的群众站到一边。就拿省里来说吧，据早些时候统计，处长以上站出来的就有五百多人，可能现在更多了。从地委来的材料看，组织“三结合”的班子，干部也是占相当数量，这是好事，说明我们在纠正过去那种倾向中，作了工作，有了成绩。对待站出来的干部，我们总的态度是：凡是站出来的，不管早站晚站，我们都欢迎。有人有这样的说法：“你在夺权以前怎么不站出来，夺权以后才站出来？”我们说这个问法是不对的。夺权以后站出来比不站出来好，今天站出来比今天不站出来好。革命嘛，你一个人革不了命。就拿现在的革命的“三结合”，没有群众组织是革不了命的。但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你也革不了命。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就缺少革命的经验，他们总是干了十几年、几十年革命的领导干部，在组织能力上，工作经验上，还是相当成熟的嘛！若是他今天不站，明天站出来我们也还是要欢迎的。站出来晚，总比不站出来好。革命的同志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这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不能对原领导干部抱有成见的看法，有成见是不对的，革命大家革嘛！如果仅仅按照我们自己的性子，因为斗过你，我们就不结合你，我就不希望你站出来，这是违背主席思想的。不管错误怎么严重，只要是乐意改，我们就欢迎。不管错误再严重，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而又累教不改的，我们就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在这方面，如果我们不按毛主席教导的精神去办，我们就同样要犯严重错误。这方面有些地方做得很好。

以上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想讲一讲。我们有些革命领导干部，尽管过去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受欺骗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们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的轻有的重，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受了蒙蔽，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该清算清算，从中接受教训。从这点出发，革命的同志们对你的批判也好，斗争也好，轻一点，重一点，你都应该积极接受教训，不应在这方面抱有成见，不然站出来也会犯错误的。我们想一下，那个时候革命的同志，对准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你没有和他们站到一条线上，尽管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你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不是这些同志们对你开展斗争，斗你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不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上风，同志们想一想，那一个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不垮，占了上风，坚持下去，那个地方恐怕就要变颜色。这是很危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搞革命是搞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很明显，如果不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冲一下，有些地区就要变成修正主义，那你也不是跟着修正主义了吗？在这个地方冲一下子，打一下子，有什么坏处！这笔帐不要记到心里去，记到心里去没有什么好处。那个“秋后算帐”派，他是准备起来算帐的。我说，你算帐有什么好处呢？不算则已，算也对你没有什么好结果。我们都是革命，不要算这个帐。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志讲，你如果真正要算帐的话，算帐的权力在我们手里，应当先算一算：为什么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你把我们那么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先和你算这个帐。运动嘛，就很难免打击的面宽了一些，打击轻了一些，重了一些。这是群众运动。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央和主席历次指示，和林彪同志历次指示：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群众起来以后，群众运动不是绣花。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趁着“三结合”的时候，站出来算这笔帐，必然要犯严重错误，这就叫做恢复原来的立场。我们说，今天干部站出来是很容易的。你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就是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和群众一道闹革命，而不是站出来站到群众头上，不到群众中去，或者站出来和群众算帐。我说的这几个地方差不多都是借着“三结合”的机会，站出来和群众算帐的。算什么帐呢？就是抓着这几个问题：你的成份不纯，你斗我是阶级报复，不是实行主席的阶级路线，你斗了党团员等等。这个问题很好解释，不是斗党团员的问题。十六条很清楚，是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是党员吧？是朝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嘛！不是朝着党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有的领导干部可能讲我是党员，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你斗了我。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经过运动考验之后才能肯定的。为什么考验之后才能肯定呢？因为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你是无产阶级当权派为什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你就是要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嘛！为什么相反，你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采取敌对态度？我们说，你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么能说你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呢？尽管你也许是受蒙蔽，但不管怎么说，你必须要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一道闹革命。这样群众会原谅你的。事实也是这样，凡是这样做了的，群众是非常欢迎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得到革命的“三结合”，才能组织好革命的“三结合”的班子。如果有些干部，这些连亮相都没有亮，而且还想和革命群众“算帐”，你也说：“我站出来啦！”“我们‘三结合’吧。”结合了以后把革命的群众踢出去，或者打下去，你坐天下，那你这个结合叫什么结合呢？我们说结合是革命的“三结合”，别忘了“革命的”三个字。革命群众欢迎我们站出来，是欢迎我们革命，不是欢迎我们站出来倒算，如果我们站出来倒算，那就不算是“三结合”，就无所谓叫站出来。只有站出来革命，才能组织起一个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核心，大家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站到毛主席路线这一方面来。若离开这个条件，就谈不上什么“三结合”。这是从革命的领导干部方面讲的。对待犯错误的干部的态度应该是这样，一定要本着主席讲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还有的干部提出这样的问题，一个单位好几个群众组织，我站在哪方面？这个问题也(更)很简单，你不是站在那个组织的问题，而是要看看如何站到革命这一方面，如何站到主席讲的这一方面。比如说最近主席指示大联合，这是主席讲的当前的大方向。如果这些都是革命的组织，你不管站到哪一方面，都应帮助他们打破妨碍大联合的一切障碍，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如果你站到一边去压抑另一边，那你就又犯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有的说这很困难，不了解情况。这一点也不难，有几个组织你就都到那里边去走一走，听一听，听听他们的呼声，听听他们的意见，哪一个是合乎主席的要求，哪一个就是革命的。哪一个虽然是革命的，但毛病多一些，你就帮助哪一个，共同使他们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走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走到主席指出的大方向上来，在这个基础上搞成革命的“三结合”。我们下去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干部站，站到真正革命的方面比较少，往往站在保守派的一边，这不叫站出来。为什么不叫站出来呢？因为过去你们就是一块的，现在还是一块，你怎么能叫站出来？本来过去他们就保你，和你站在一条战线上，站在一个立场上，你站出来还是和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还是原班人马，把矛头又指向了革命群众，这能叫站出来吗？所谓站出来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出来，你这并没有离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怎么叫站出来？你这站出来可以说是反攻倒算，根本立场没有改变，根本态度没有改变，没有离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样情况下，你这个问题就不能解决了。不管你讲得多么动听，发了多少好的声明，你的立场没有转变过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曾遇见过那么个人，第一天造反派夺权，他发表了声明；慷慨激昂，一万个拥护，十万个拥护，一百万个拥护。但到市里夺权，他一看情况不对，接着回去以后，不是一个拥护，而是一万个反对，又回到老地方去了。你这样群众就不好信任你了，你自己的立场没有定下来。我们说，站出来是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站出来，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具体的代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应该到革命群众中去，把革命的旗帜打起来，一道革命一道造反。有一回，我和一个负责同志讲过这样一段话，我说你实在感到难的话，你什么时候看到你的楼上群众给你贴了“叛徒”的大字报就好啦。就是要当“叛徒”，当什么叛徒？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叛徒。不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叛徒，你就不容易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从近处讲，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受了蒙蔽；从远处讲，不是一年了，是十几年了，老长时间了，我们是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这是个习惯势力，不坚决地下决心把它打垮，很容易回到老路上去。转过来的干部，应该从这方面下定决心。

作为革命群众来讲，对待干部也要有个正确态度，对群众组织也要有正确态度。这是对干部方面。这几个单位，他们前期在这方面的态度不对，他们没有领会这个精神。那时，由

于对“三结合”思想上不大明确，大联合思想上也不大明确，就感觉他们组织里边没有结合干部，就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就急于向干部叩头，赶快起来结合，这个时候，就把干部拉上了。其实干部转变了没有？思想转变了没有？立场转变了没有？谁也说不准。没有经过斗争的考验，就把干部结合上了。结合上以后，就一下子翻过来了，这就不是革命的“三结合”，而是“合二而一”。因此，结合的干部必须叫革命的群众去考查检验，是确实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的我们就欢迎，就结合，这才是革命的“三结合”。这个“三结合”里边，也还有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当权派借着“三结合”的问题来打击革命的群众团体，说“你们没有搞‘三结合’，你们犯了大方向的错误，因此我就应该站出来和你们结合，不结合就不行”。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搞反攻倒算。我们走的这几个单位，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过去讲过“三结合”是在十一月三十一日提出来的，中央报纸上登的。有的单位左派夺权夺得早，那时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认识，所以夺了权以后没有“三结合”。在这个情况下，问题是补救这个缺点，逐渐地把干部解放出来，吸收到“三结合”领导班子里去，加强“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但不应该指责他们，夺了权没有“三结合”是大方向错了，这种指责是不对的，在这方面，确实有些人借此起来搞反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是对待干部的一些问题。

另一个是，在当前一些比较复杂的单位中过去受蒙蔽的同志，或者说就是过去的保守派，现在已经恢复起来，对这一方面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对这一些人来讲，过去受了蒙蔽，是有错误，但是经过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少人觉悟过来了，不少人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这是应该首先欢迎的。现在有些人还是在那里坚持，没有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而且矛头指向了革命派。对这些是要进行斗争的，不斗争不行，不斗争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对待这些同志来讲，总的还是本着教育他、团结他，提高他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把他们团结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因现在的形势不同了，两条路线分得很清楚。仍然在坚持自己的反动路线，坚持下去对自己就不利了。同时，也应该相信，绝大多数被蒙蔽的群众，只要讲清道理，他们是要革命的，不应该把群众也看成是保皇派。如果他们有了觉悟，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那就要和他们联合起来。但是如果还不觉悟，他把矛头还是指向革命群众，处处钻空子进行斗争，在这个情况下应该和他斗争，但是我说的这个斗争，是摆事实，讲道理，不是武斗。直到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可以联合起来，搞大联合。我们的运动，最后经过斗争，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不然你就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拿过去山东来讲，山大主义兵是犯这个错误，他们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保皇派，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都叫保皇派，那就造成自我孤立。我们说，就是保皇派，也仅仅是他们幕后操纵的人，这是打击的对象。对群众来讲，一概采取教育、团结、改造，启发他们的觉悟，应该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跟毛主席走的，他们乐意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即使是受蒙蔽较深的人，只要经过教育，也会回过头来，不应该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一概打击的态度。如果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就不能搞大联合，也就不能够在运动后期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起来。但是，有的单位现在这两种情况都有，仍然对这些人加以排斥，不是采取团结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不能在他们没有改正自己的错误之前，就和他联合起来，那样就不叫革命的大联合了，实际上成了大杂烩了。经过斗争之后，改正了他的错误，联合起来。但对这部分人也应该讲清楚，你们过去错了嘛，大方向错了，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这不是一般的错误嘛。虽然带头带错了，在他们幕后操纵下搞错了，你们受了蒙蔽，但是不能说路没有走错。现在你再起来，仍然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革命的团体，那你就是没有改正错误。还是过去的错误又恢复了。今天你起来很好，欢迎你，但是，必须改正过去的错误。和革命的组织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我们才有联合的条件，联合的基础，要不然就没有联合的条件，没有联合的基础。

对待这样的团体，现在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刚才我讲过的这种态度，这样处理会处理

的好。最近工学院在这方面处理比较好。他们经过斗争之后，个别的幕后操纵的这部分人揪出来之后，绝大部分人都团结起来了，联合起来了。有的就搞的不好，还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就不容易搞好，相反就会使自己造成孤立，受到打击。也有的没有经过斗争就采取“合二而一”的办法联合在一起的，这样受到的影响就更大。对这些人的态度，我们也必须是有分析、有区别地对待。总是对他们的领导者、操纵者应该进行打击，但是对绝大多数群众应该争取团结，要相信他们会革命的。只有这样才能把联合搞好。这样搞起来，就符合于我们所说的大联合，不要忘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忘了这(样)个东西搞大联合，就叫大杂烩。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个性质必须肯定住，如果把这个性质丢了，你这个大联合就无所谓大联合了，你这个“三结合”就无所谓“三结合”了。这些方面都有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两条路线斗争之后，形成的大联合、“三结合”，才是真正革命的“三结合”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偏到一方面，容易出现“合二而一”，那就很快复辟了；偏倒那一方面，就关门，就不容易和人家联合起来，造成自己孤立。对干部、对革命群众、对过去受错误路线蒙蔽的所谓群众组织，都应该采取一分为二，采取全面的观点来看。不过下去走了这一趟，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不同看法，不同的处理方法，因此，出现的结果也不同。所以有的单位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或者叫做逆流，就是在这些问题上出现了错误。但是，这是根本立场问题，不是某一个具体工作上的问题。

当前总的形势很好。但是主要的危险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逆流，打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对群众的革命组织有的解散，有的压下去，有的遭到围攻，有些地方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情况。当权派重新上台，原来保守派组织也原封不动上台，重新把权夺过去，对这一股逆流如果不打下去，如果有的单位叫它复辟了，那么这个单位就仍然恢复原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占了上风。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对革命群众组织的态度，同时联系到对待干部的态度和过去那些犯了错误的组织的态度。

开始我就讲了对解放军的态度，但是，后面我还要讲一讲对解放军的问题。对待解放军我们不许有任何什么怀疑。对解放军抵触是要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该警惕一个问题，自从解放军介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支持左派以来，有不少人挑动革命群众组织与解放军的关系，值得我们警惕！他们的目的是在于挑起革命群众和解放军之间的冲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最拿手的好戏就是在幕后挑动。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挑动工人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工人，挑动干部斗学生。现在解放军出来以后，他们又采取挑拨解放军与革命团体的关系，如果不注意，我们就很容易上他的当。

第五期《红旗》杂志社论里边，对解放军的态度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在某一种具体情况下，解放军同志到那里不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些人一下子就把他们需要讲的话，要搞得的材料送到解放军那个地方，制造混乱，军队的同志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他们最注意调查研究，我们也必须把话讲清楚，把情况向解放军同志反映明白，把实际情况多向解放军同志讲一讲，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他们一直是坚决支持左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是不管怎样挑动，只要我们警惕了的话，恐怕他们的狐狸尾巴很快就暴露出来。我们如果不警惕，我们就要上当，就会走到对解放军抵触的地步。如果革命的群众组织与解放军有了抵触，他们的文章就好做了，他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他们最怕革命组织，革命群众与解放军结合起来，革命组织和解放军结合起来，那么力量就大了，他就没有翻身的那一天了！所以在这方面，解放军介入以后，有些人从中挑拨。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清醒一些，警惕这个问题，不要上他们的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革命的“三结合”和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搞好，能够把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在当前不管他搞什么鬼，不管逆流多么厉害，我看在山东来讲，很快就会打下去，没有什么了不起。

目前虽然济南市发现这个逆流，我想只要大家提高警惕，很快就能打下去，影响不了我们的大好形势。从另一方面看也好，为什么也好呢？这一下子谁是什么样的面目，真革命，

假革命，一下子就很清楚了，有些地方就很清楚的，我刚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当你夺了权的时候，一万个拥护，十万个拥护，当看他那个单位的形势一变，马上就变了，不是一万个拥护，马上就站到他那个保皇派一边，不拥护了，撤销自己的声明。这样一看以后，你真革命，假革命不就很清楚了吗！

经过这一次反复，对革命派也是一次锻炼，也是对反动派的一次考验，一次暴露。这没有什么坏处。济南当前这么一个逆流，我们准备很快就把它打下去，起不了多少作用。

关于“三结合”和大联合，好几天前有的同志就让我讲一讲，从理论上讲，从道理上讲，报纸上都讲了，《红旗》杂志社论都讲了，好多负责同志都讲了，我再讲也没有什么讲了，我就拿这几天出去走了一趟，回来研究的这些问题和同志们讲一讲意思。我今天，就讲这些问题吧，完了。

**643. 周恩来、李富春接见工业系统 21 个单位造反派、
各部委党组(委)成员的讲话
(1967 年 3 月 28 日晚 国务院小礼堂)**

接见单位：水电、煤炭、冶金、地质、纺织、一机、八机、一轻、化工、建工、物资、林业、劳动部、计委、经委、建委等工业系统 21 个部委。

接见人员：各部委各群众组织代表、各部委党组(委)成员及党员副部长。

总理：今天工业系统二十一个单位造反派 179 人参加，各部委、党组、党委成员等 127 人，共 306 人，比例 60%；40%。交通部门我和李富春、秋里同志已接见了。上次是一月二十六日接见你们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有些事情要谈谈，今天听我的了。我讲一点意见：

上次讲夺权斗争。现在进入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快三个月了，当时没想要对各级领导干部排个队，也有大联合，三结合的想法。斗争在中央各部发展是不平衡的。从上海夺权到现在三个月了，在北京也有 50 多天了，在国务院各部还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经验向大家介绍，还在摸索中。因为这是史无前例的，由我们最高统帅亲自领导，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

这次夺权斗争也可以说是 1949 年夺权斗争的继续，但这次比较彻底。1949 年是军队打天下，从上而下地军事管制，从国民党的上层中把一小撮抛出去以外，其它都是接收过来了。党的机构是我们的，政府机构重新组成，企业、学校全部包了下来，包括政府部门也用了一些人，虽然不是原封不动，但政府机关总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钻进来的或者是蜕化变质的。从 1949 年后不断地进行这样地斗争；农村中的清匪反霸，把恶霸打击了一批，但不等于没有坏人了，总还有一批地、富、反、坏分子。第二是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中搞的，先搞党内而后才搞党外；到现在已近十五年了，总有一些打入党内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重新生长，也有钻进来的。57 年反右，划了几十万右派，有的已摘了帽子，又有一批重新钻进来占据领导岗位。62 年反右倾：国外是三和一少，国内是三自一包，这都是修正主义，影响当时的状态，是党内一股右倾思想，是一股逆流，通过毛主席在十中全会进一步阐明阶级斗争学说，本来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后来进一步阐明就进一步提起了阶级斗争这个纲。63 年搞四清运动搞了三年，首先农村而后企业，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下去，当然也出现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问题。而后的文艺改革破了一些。64 年戏剧、舞蹈、音乐等方面进行了改革，舞台上出现了为工农服务的艺术。这一系列的斗争都是夺权斗争，在党内的领导机关或在一些部门都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好了

思想准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广大的革命群众的夺权斗争，是史无前例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十月革命没有这样广泛，这次运动的特点是在我党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军队保护下的群众性的夺权斗争。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这段斗争更复杂，更广泛地触及到人们灵魂深处。主要是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是普遍夺权。从广义上说是夺“私”字的权，建立“公”字的权，这是革命小将提出来的，这在人们头脑中带有普遍意义，这包括革命造反派。正象林彪同志说的“既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动力，又要不断地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

斗争形势复杂。从地区来说，到现在为止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由革命群众代表，解放军代表，站出来亮相的，群众同意的革命领导干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中央承认的只有五个单位：上海、黑龙江、山西、贵州、山东五省市。现在要出的是北京，天津。经过快三个月了，地区只有5—7个，其它条件还未都成熟。每个省市都要经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跟他们谈，情况熟悉了，谈通了，条件也成熟了，才同意夺权。中央各部，自从一月份我们号召各部夺权以来，不管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好，没有也好，至少你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文化革命的领导权，把本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过来。实际上过去有的已领导文化大革命了，现在夺权就使之合法化了。业务实行监督。

大联合有的实现了，有的没实现，从一月份到现在已两个月了，是不是大联合后，实现三结合，有两种：革命的高级领导干部，革命的中层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三结合还未建立一个典型。有的单位准备进行，有的单位还没有进行。当时没有想到即使有的单位夺权的比较好，领导的好，也要和地方一样，由革命群众代表，革命的领导干部，解放军代表，象《红旗》五期社论说的那样作。国务院各部现在还没找到一个典型。前一段跟卫生部的同志谈了。卫生部同志说“已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了”。但检查的结果还不够革命的三结合。

两个月的经验摸索的多了，就可以谈谈了。机关还没有一个典型，但可以树立，厂矿企业我们接触的面窄些，只知道北京的，上海的就摸的不透，报上介绍了贵阳的经验，还不够，现在正在调查，北京还没树立一个典型，但要争取树立。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有个估计，“在今年二、三、四、五月看出个眉目来，明年二、三、四、五月看出个结果来，也可能长一些。”有人问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全国29个省市（天津是新划为直辖市的，不属河北省了，原28个省市，加上天津是29个）实现三结合或军管过渡的办法，实现三结合成立临时的权力机构，这是地方。在中央各部门、党中央各部门来说，大多数是可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不管需要还是不需要夺权，夺的好不好，最后总要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在中央主要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也要基本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就是看出个眉目的意思。明年二、三、四、五月看出个结果来是指文化大革命要继续进行，把革命的三结合推广到县、社、大队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需要夺权的要建立，不需要夺权的也要建立。还有些尾要收，所以时间可能还要长些。

学校也要夺权，恐怕时间还要长些，因为前段学生出去串连才回来，大学乘车串连，中学徒步串连，还要搞斗、批、改，可能要到暑假。今后一年多还是很紧张的。总的形势很好，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才能下这么大的决心。运动始终是按毛主席预定的方向前进，按预定的步骤、设想进行，当然每一步还是发动群众摸索经验前进的。总之形势是大好的。这对敌人来说，文化大革命搞的好，确实可把修正主义的根子挖掉，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的保证增加了，至少一、两代不出修正主义的保险系数增加了。当然不是一劳永逸，还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新的几代当权后，还要不断的搞，防止新的修正主义出现。并不是这一次就完了，到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时，两条路线斗争不能解决。我们现在是完成现阶段任务。这就是主席对阶级斗争的看法。

当然机关还没有典型，但造反派在摸索经验，可以树立。运动在毛主席领导下，总会不断前进，但要估计到运动是有曲折、有反复的，这是自然现象，运动不可能风平浪静，总得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问题在于要善于总结经验，继续前进。总之我们一切为之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实现真正的革命的三结合，而不是三凑合，总得在这方面前进一步才好。有三种形式：

一、革命造反派夺权夺的好，有领导能力的，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使保守派改变了认识，改变了立场，真正转到了毛主席路线一边。由政治上的优势发展到组织上的优势，这样就可成为三结合的基础了，同时对各级领导干部要一分为二的排队，有的已站出来了，错误不严重，批判后可以工作；有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要根据错误来定性；有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重的，有轻的，有多，有少的，要加以区别，群众要帮助他们过关、亮相，总有一批可以站出来的。革命的领导干部经过群众同意，可以作为结合对象。再由军事代表去就可以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是比较顺利的，如果有的部门，有这样的条件你们革命造反派提出来，我们经过调查，干部排个队，我们可以派军事代表去实现三结合。

二、有些地方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仅犯路线错误，不一定需要夺权的，领导能够工作，这种情况也还要搞三结合，推动真正的革命派联合起来，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帮助保守派改变认识，立场转到毛主席路线上来。帮助干部转过来，改正错误。再派军事代表实现三结合。

(总理讲话中漏掉了一种，但下面讲了)

不管哪一种都要采取。至于工业系统二十一个单位哪一种多，你们自己去讨论，我们不作解答。究竟是属于哪一类，是加上军代表就可以。第二种是要帮的。第三种是不需要夺权的加军事代表就可以了。《红旗》第三期社论已谈了，现在按《红旗》五期社论办事，要派军代表，这样和地方就接近了。哪种合适，你们自己议一下，我们来和你们共同商量，一个部或几个部在一起谈，就不一定是我出面了，富春同志可以谈。

三结合要首先实行大联合。如果长时期不能大联合，长期对立，就要军管。一个革的，一个保的比较好办，解放军支持革命派，帮助保守派改变立场，这样可使你们由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问题是造反派各有缺点，相互之间长时期对立，影响生产，归根还是影响革命。仅仅是观点不同，不是大方向不同，迟迟不能联合，就军管，推动你们。

如果你们是组织上占优势，这一点有了，就是教育少数保守的怎样站到毛主席路线这边来。这样力量更大些，这样问题就不难办了，因为组织已占优势，仅仅是帮助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了。对干部要一分为二，我们曾经希望排个队，但总不能实现，现在要定个期限，7至10天拿出来，掌权的和不掌权的组织都可排出个名单，能联合一起排更好，不能一起提，分开排也可以，这样把两条路线斗争推向前进。使主席估计的在今年二、三、四、五月看出个眉目能得以实现。

不管哪一种形式都要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加上军事代表。三结合要加速进行，这不能再推迟了。革命要抓好，业务也要抓好。因为有这个情况，有几个问题回答你们：

1、军管、军事代表是过渡办法。这和解放初期军管不同，解放初期是军队到各地去接管，解散国民党党部，建立人民政府，从北方到南方，从农村到城市，从军队到地方，是带委任去的，由上而下的派出。经过抗战后期整风、解放战争的锻炼的干部，这是新的当权派，久了，有的就变了。这次不同，是我们已掌握了政权、党权，企业、事业、机关、学校、农村的权都在我们手里，无产阶级专政有解放军保护。十七年来的斗争都是自上而下，没除根。好象拔草一样，没锄根，“春风吹又生”。这次由下而上就要达到一个目的，建立新的临时权力机构，现在是临时的，将来是正式的。这个机构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这样才能保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又有资产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搞和平共处，那就要和平演变了。这次要斩草除根一个时期，以后出了再锄。这段运动还有个副产品，开始没意识到，就是发掘出一批叛徒，是由于党内刘、邓的反动路线，特别是刘少奇建党的思想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二十年没把叛党的踢出去，这次红卫兵冲向社会，拿到一些材料，

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了一大批叛徒，这是一大收获。可使党的机构，当权派中把这部分人清除出去。一旦有事这些人总是先往修正主义那边跑。

在中央各部门要把这个工作(指三结合)加快，军管、派军事代表就是为了加快这个工作。这和解放初期不同，尽管解放初还是敲锣打鼓，扭秧歌欢迎解放军，但他们是被动的。这次不同。这次是群众要求夺权，自己解放自己。

机关运动主要是学生的革命造反派推动了我们，不管他们有什么缺点，我们应欢迎他们。第一张大字报、红卫兵诞生、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连、徒步串连，都是他们首创。机关造反派比起他们总是在后面。现在机关造反派能掌权了，所有革命的闯劲，不能不受大中院校一千多万红卫兵串连的影响。现在有的机关造反派说“学校比机关还保守”，不管如何，他们是先驱，应感谢他们，走时要欢送他们，还要保持联系，不能赶走，还有的说“早就该走”，这不好。

中心问题是三结合，实现三结合的权力机构，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监督业务。目前领导文化大革命，当然以后还要发展。

2、如果需要军管或军事代表来帮助，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帮助作政治思想工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走群众路线，支持革命造反派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斗争中发现有没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就夺他的权！

我们也要和他们结合作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把他们看成是管我们的。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施加压力，对破坏生产的破坏者限制，对革命造反派，是支持的，我们要热情欢迎他们。

3、如果实行军管，就是领导还未建立起来瘫痪了，造反派夺权还不能掌权。军管后也要抓两个班子，一是革命班子，主要依靠造反派，军事管制委员会，加一点力量就行了。另外成立一个业务班子，由已亮相的干部参加，也可以选一些造反派代表参加。革命与生产，革命是主导，革命领导一切，还是以革命造反派为主导。至于部外的造反派，吸不吸收，你们自己考虑，我们不干涉。至于学校，看具体情况，一般回校参加斗、批、改，或社会上斗批改。

4、军管、军事代表来后，帮助造反派整风，机关整风比学校可短一些，总要开门整风。整风好处，可使几派达到大联合的目的。迟迟不能联合就是没有很好的整风。开门整风首先批评自己，革命造反派要互相接近，按行政系统归口，每个单位(指司局)可以联合，上面(指部)也可以联合。比如一个部有个“东方红”，还有个“井冈山”，司局可以联合起来，上面部里也可以联合，成立一个总的组织，这样脱产的人也少了，可分别参加领导运动和监督生产的。如果上面统一组织取消了，全放到下面去，等于涣散战斗组织，对文化大革命不利，整风不是涣散组织，而是统一起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求大同，存小异。

5、怎样对待干部？要进行阶级分析，要一分为二，各级领导干部(部、司局、处、科)总有些好的，就是部级也不可能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部、中央都是如此，不会清一色。除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的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区别对待，有的严重，有的轻，有的多，有的少。也还有自觉，不自觉的。处、科、司局级干部统统有责任就是铁板一块，有的就是没沾边，有的在病中，有的不在家，有的还反对，这就更好了，是革命派。另外执行反动路线，下级要比上级轻，矛头向上不应向下，执行的比提出的要轻。

还有对待干部，一般讲，他的错误总是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一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检讨后过关就可以了。至于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要查历史。还要有专案的，有叛变行为的。总不能普遍审干，这不是重点，这次是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个别审查。

即使对犯错误的干部也要帮助。主席说，在《红旗》社论中也讲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

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就是说即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愿意改正，还允许他改，将功折罪，以观后效。对这样的就要给他机会检讨，当然对干部要求严一些是对的，检查以后，发现了还可以搞。但是斗争到了第二阶段，不象第一阶段，不赞成揪来揪去，不赞成打、砸、抢，给他时间作检讨，约好时间叫他检查，回来还搞业务，总是要争取多数干部，目的使多数干部改正错误。对一小撮严重的要长期考察。

至于处理，四种方法：

(1)留一批，这种数目多一些，但留又不同。

一般留用——有些小毛病。

监督留用——有业务能力，毛病不少。

停职留用——象吕正操、武竞天接近于反党性质，但表示愿意改正。在实践中考验他改不改。

(2)撤一批——撤一批不能工作的，这是少数。

(3)调一批——调一批来，也调一批出去。

(4)提一批——这要摆在三结合以后搞，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考验，那个好提上来。

总之将来各级领导干部，数目不能多于现在的数目，层次重的可以改，不一定到运动后期，现在能改的就改，外交部对处的科组就合并调整，人就可少些了。

对干部要通过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是好的领导干部进行结合，但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在群众中发生的，排斥一切干部，打倒一切干部，这实际是来自刘、邓，派工作组就是排斥一切干部，对一些学校的政治辅导员、支部书记全部靠边站，北大的都是陆平的人，清华都是蒋南翔的人，这就影响了红卫兵。特别是工交口，薄一波号召对各部长、司局长都烧一烧，当然他是副总理，烧不到他了，造成了排斥一切的思想，不是群众中生长的，是刘邓的影响，这工作好作，向群众说清就行了。第二种，当前比较严重的，就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成为结合的对象。要恢复原状，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思想，从《红旗》四期社论后，就冒了这个苗头。不仅如此，还想恢复旧秩序，恢复原来的统治，照旧当部长，副部长、司局、处长，这是不许可的，那十个月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空了吗？毛主席的领导哪里去了？这种思潮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一股逆流，这是主要危险，机关、农村、学校都有，结合要结合革命的领导干部，不是所有的都作结合对象，但是可以作工作。

6、军管也好，军代表也好，去的目的是推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从政治上优势发展到组织上优势，如果是保守派认识到缺点和错误，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还是革命组织，可以实现联合。联合的目的就是建立革命的三结合，打乱旧秩序，建立真正的革命派为基础，有革命领导干部参加，有军事代表，成立有革命性，有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的机构，名称一般叫革命委员会。目的是要实现这样一个夺权斗争，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排出去，把叛徒排出去。如吕正操、武竞天不能结合，只是留用人员。

7、有些机关不需要夺权或已初步夺权，夺的也不错，也联合了，就是没有三结合，就派军事代表推动一下，依靠群众，帮助审查干部，建立三结合的机构。

8、不论军管、军事代表到各单位都要走群众路线，不能支持一个左派，反对另一个左派，这就不好了，如果支持保守派，反对造反派就更不好了，这是有经验的。军事代表快要到机关中去了，你们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帮助军事代表走群众路线，他们就可吸收各方面正确意见，帮助领导干部检讨错误，这样就能建立新秩序，不能恢复旧秩序，如果那样，革命就徒劳了。

9、军管：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领导，它和军事代表不同，军代表不能领导一切，而是帮助搞三结合，监督业务。军事管制委员会就领导一切，革命造反派仍有建议权、批评权。比如说一个司局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司局造反派组织起来监督业务，只要不是机密，不要过分削弱群众组织的权，把权集中统统到军管会，相反地要依靠革命群众组织行使权力。

10、现在摆到议事日程中的，是向机关派军事代表问题。我们正在和部队商量，抽调干部。他们自己先学习作准备，过去派到工厂去没有思想准备，难免犯错误。军管，不要象工作组那样，压制群众，而是要信任群众，发动群众，帮助尽快建立临时权力机构。

两个月来你们作了不少工作，造反派逐步联合起来。现在确实两条：

一、是你们属于哪一类，先由你们自己讨论，也可能还有四种、五种类型，你们考虑，各造反派，一个星期给我们回答。如有几派，可以联合报，也可以分别报，四月五日前一定回答我们。另一方面，各部党组成员有的工作，有的站开了，有的在检讨，有的检讨过了。中央没有免职的，没罢官的，你们回去也提出党委的意见，加上中央的意见来决定。

二、各级领导干部排队：请各部造反派，如有两派分别报，哪些要检讨，哪些不要检讨，哪些一时还过不了关，我们也可用他们作一些工作，比如余秋里、谷牧同志，我们叫他们到国务院作工作，但不影响作检讨，批判可以，太大的会只能表个态，要揭深问题要在本部门搞，现在有个倾向，我和别的部门说过，好象要批判非打倒不可，不打倒就不批，这太绝对化了，不要一批就打倒，这等于先定性了，总要看看他的检讨，反过来不需要打倒的就不批，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就不能批评，这是不对的。我们能不犯错误？善意的反对是可以的，我今天开会就很累，开了一天会，现在勉强在这里讲，刚才嘴还在讲，脑子已经休息了，三类问题就没讲清；十个问题有个提纲还讲的好一些，所以你批评我没讲清，我马上就承认，刚才在打瞌睡怎么能讲好呢？还有哪些错误？欢迎批评。

总之，不能一批非打倒，不倒就不批。要提高政治水平、斗争水平，要让干部进行检讨，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要排一个队，解放一批干部，站到业务岗位上去。

现在是革命派掌权，要使军事代表帮助你们从政治优势转为组织优势，逐步做到毛主席指示的团结两个 95%，团结 95% 的干部不要那么忙，要排个队，十天之内要排出，党委也要排个队提出个名单。提自己不好提，可以排司局长，现在各部揪来揪去的现象也很少，来京上访的也不多了。

总之我的意见，找你们来谈，就是把夺权斗争进一步展开，抓革命促生产，实现真正三结合。

地方夺权有五至七个估计十个左右，可以建立革命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半数以上实行军管，剩下的几个省四月下旬，最迟不过五月份解决。新疆、陕西、青海、内蒙、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西藏、贵州、云南、宁夏二十五省市四月份完成。四川、甘肃、江西、湖北四省五月份可以解决。

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谷牧还在搞业务，中央没几个人搞业务。

我们要把革命造反派的劲头鼓起来，实现真正革命的大联合，由政治优势转到组织优势，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在四月份、五月份派军管，军事代表帮助你们。

凡是夺权好的，军管好的，生产就好，昨天接触了一个棉花会议，差的是四川、陕西、湖北，河北也不好，去年河北就不好，昨天又发生了地震，中心在沧州，天津是南北向振动的，各部要注意防震问题。

就讲到这里吧！有人问农林口问题，我没摸清，正在调查，我不回答。其他问题由富春同志回答。

(总理开会先离开会场)

李富春：

1、各部党委、各造反派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我谈，业务分别由计委、经委管。

2、经委的问题：批判薄、陶要继续进行，要彻底批深批透，薄、陶都还不是死老虎。

几派可以同时批，也可以分别批，将来总是要联合起来。

3、各部委、各造反派回去，要共同对笔记统一进行传达，不要各讲各的。

4、一星期内，四月五日前提出是哪一类？(指结合方式三类)各造反派分别提，共同提

都可以，党委党组也提，便于中央决定军管还是派军代表。

5、干部排队在十天内，四月八日前排出，各造反派共同提，分别提都可以，三结合初步名单同时交出，送总理也好，送给我也好，各部党委、党组，亦可提自己的看法，供中央参考，各级领导干部包括科长、司局长、党组、党委成员。

6、关于中央各部夺权，文化革命的权可以夺亦应夺，业务监督权，业务监督范围中央不久派军代表同时就可提出，一轻部夺权夺过了头，宣布党委靠边站，支部停止活动，开除党籍，这些问题还是党的系统解决问题。

7、劳动部同志提出：“我们夺权夺过火了一些，但司局长逼我们检讨”。富春同志说：“那不行，这不成了革命有罪，造反无理了”。

8、以后各部有问题我个别谈。

9、谷牧、秋里在建委、计委口开会批判，各有关部派 30—50 人参加，由余秋里、谷牧检查，我和总理出席。

644. 中央首长接见安徽各代表的讲话 (1967 年 3 月 28 日 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周总理：今天开会经过几次会议，双方观点都摆出来了，现在宣布中央的决定。也与安徽军区代表谈了，现在康生同志宣布党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办法解释一下。

康生：关于安徽问题，中央和中央文革和安徽的同志进行了多次接触，对 1·26 夺权赞成和有意见的代表都找回北京来了，把安徽军区的同志也找来了，把南京军区军管委员会钱钧同志也找来了，根据多方面的意见，经中央详细研究、讨论，并报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作出决定，现传达：

今年三月间，中央召集了安徽军区负责同志，安徽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代表和持有不同意见的各左派群众组织的代表，省市机关的干部，举行了多次座谈，并分别作了多次个别谈话，因此中央对安徽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在未作出决定之前，中央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向各方面作调查研究，中央不只听一方面而且听多方面的，赞成 1·26 夺权的，反对 1·26 夺权的，甚至被通缉的，这一点希望同志们注意和学习主席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方法。中央把各种意见的代表人物，都叫到北京来座谈、调查，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是单一方，希望同志们今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不能单听一方面的，无论什么组织，大联合也好，三结合也好，今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也好，帮助地方解决夺权斗争也好，这种方法必须掌握，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调查研究，中央不会仓促作出决定的。安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系到三千万人民的问题，关系到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部分。

第一 (略) 对 1·26 夺权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好得很，大方向是正确的，甚至讲反 1·26 就是反革命，谁反对 1·26 夺权就要镇压。另一种认为 1·26 夺权是假夺权。中央考虑各方面的意见，没认为这种夺权是假夺权，也没有认为这种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如北京夺权夺了几次，中央未作出结论，也没有说那一方是正确的，说反对 1·26 夺权是反革命有问题，说 1·26 夺权好得很也有问题，这两种意见中央文革都未提，只是指出了存在问题，没有实现三结合，没有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夺权是非常仓促的，开始认为省委的权不能夺，据讲是受山西消息的影响，另外还听到了不真实的情况，说程明远篡党篡军，军区也来不及看你们的文件，很匆忙。因此，必然大联合彼此商讨来不及，据反映八·二七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这种匆忙中间就将应该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联合。为什么说矛头没有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我们夺权不是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吗？夺李葆华的权吗？夺权后矛头指向何处？对并肩作战的革

命组织实行镇压，而不是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组织，将其领导人逮捕了、通缉了，这些组织被解散了，这是大错误，在夺权后对革命组织进行镇压，这个矛头不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自己的战友，于得水同志已死了，该联合的没联合，而去镇压，没有集中力量去联合所有的革命组织，夺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权，当然是夺党委的权，但夺权的打击对象是同八·二七并肩作战的红卫军，省暨合肥市机关职工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在夺权前，夺权后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这一点从同志们告诉我们的，你们结合的干部(省委)不是真正的三结合，不要说任质斌、张祚萌、黄岩、王光宇，就是王中也是长期养病，过去也不是真正彻底揭发李葆华的，而且有些问题上自己也有责任，什么五条、七条，弄到现在五条也没有了，这怎么叫革命的三结合呢？指挥部的个别领导同志，在夺权前和夺权后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主要是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把不赞成自己意见的人搞成反革命，压制了左派团体和革命干部，实际上情况是这样，中央文件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我们应当说明这一点，安徽夺权没有报告中央，未经中央批准。

我们要来汇报，中央还没有安排，因为你们的材料我们没有来得及研究，你们自己来了。我们对1·26夺权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李胜利同志汇报，曹在凡同志补充，当时你们的问题只有一个问题，是要中央承认，没有其他问题，使我们感到问题不大，但又觉得不放心。因此我们提议多来几个同志，多反映几点情况，把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找来谈一下。应当说，第一次觉得有问题，思想是倾向于承认你们的。我们认为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又觉得不放心，开始没有说你们的大方向是完全对的，但是觉得问题不大，后来经过继续调查，所谓没有问题，实际存在很多问题，这一点是指挥部的同志没有如实地向我们反映，后来通过记者及不赞成夺权的同志的反映和揭露，觉得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就是文件上写的，当权前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安徽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的个别领导人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压制了有不同意见的左派群众组织和革命干部。问题揭露后，总指挥部代表李文安、李胜利同志也觉得1·26夺权没有成功，存在着问题，我们也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南京军区也向我们建议安徽一时大联合、三结合不易解决，也建议实行军管。在三月二十一日，他们向中央提出军管，并且提出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同志为首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这个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安徽军区司令员严光同志、政委宗文同志、廖成美同志、杨广立、王文模同志、钟国楚同志、蒋开元同志、李士槐同志，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军管会的名单，中央赞成实行军管，并且以钱钧同志为首。

第二(略)为什么要专门提出打击以李葆华为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安徽流传中央要保李葆华的说法，这样就影响了一部分群众，影响了夺权斗争中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第二条要提出这一点。

第三(略)

第四(略)我们认为现在的军代表是不够称职的，到那里镇压了革命群众组织，这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军事管制的目的。所以立即接管公安厅、公安局，重新选派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得力干部做军代表，支持和依靠真正的革命派，彻底揭露这两个机关的阴暗面，切实进行整顿。要坚决纠正乱冲击、乱逮捕的错误作法。必须说明一点，有一个坏分子，有一个反革命，他也不同意1·26夺权，也对1·26夺权有意见，假如这些人是真正的反革命，那怎么办呢？文件上讲得很清楚：“因为对1·26夺权持有不同意见被逮捕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要严防坏人利用专政工具镇压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真正反革命，那是反革命的问题，要和赞成和反对1·26夺权分开。不能因为反对1·26夺权，因而就逮捕，就打成“反革命”。

第五(略)这是因为报纸是党报，不能成为那一派的报纸，不能宣传1·26夺权是正确的，反对1·26夺权是错误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不看是不是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是不是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用赞成和反对 1·26 夺权为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这里必须说明一个问题，不是说报纸能够出版也不出版，而是说不能正常出版的情况下，可出新华电讯稿。

第六 (略) 本来八·二七是革命组织，长久是不发生问题的，工人联合委员会是革命组织，也是长久不发生问题的，他们是长期与李葆华作斗争的左派革命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是支持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防止另一派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或个别领导人犯了错误，因而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组织，所以要重申这个问题，使不赞成 1·26 夺权的明确这个问题。这两个组织过去是，现在也是革命组织，不能因为个别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们，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因为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人同一司、三司等组织不赞成 1·26 夺权，因而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反动组织，因此肯定从他们现在情况看来，他们也是革命组织，当然还有许多组织，比如夺权时二十多个组织，不能够一一都写上。因此，八·二七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这些都是革命组织。这些组织不是都没有缺点的，都要进行自我整风，着重进行自我批评，但是有原则上的不同意见……。

第七 (略)

第八 (略) 为什么要单独写这一条？我们认为八·二七也好，工人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也好，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因为没有支持早站出来的革命干部，因为我们知道，要真正斗倒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干部起了很大作用。安徽的有利条件是机关干部起来较早，比其他任何几个省都有利，原因是李葆华在三六事件对革命学生实行血腥镇压，使机关干部觉悟起来了。这些人受压制，这是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损失。同志们要注意，地县也好，要注意夺权中要支持机关干部起来革命，特别要支持早站出来的革命干部。

第九 (略)

中央决定一共九条，另外说明一个问题，刘秀山同志的问题，没有写进来，因为主要是谈夺权问题。刘秀山问题应该调查，你们供给材料，但与夺权无直接关系，不在这里布置了，这不是说不要调查这个问题了。

周总理：刚才康生同志他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九条决定，在座的各方代表还有什么意见要谈。(发言……略)

“我们希望你们的态度是真诚的，问题不在于请罪，凡是你们要承认，在军管会成立之前，军区代行职责，不要再有打、砸、抄、抓，不准武斗。军分区要向军分区、基地传达，你们要向家里布置，打电话回去，首先停止武斗，通过全省、各个线的有线广播说服他们。首先要打电话回去，看谁执行的真诚，准备、军队、军区、军分区非常谨慎，要劝说、说服，不要动武器，这样情况就会好的，要作说服工作，如果双方是真诚的，不要说得太多，看实际行动，看谁的主席思想红旗举得最高，人民内部矛盾要通过斗争、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认识要从行动上证明，如果不是这样，就暴露了他们，一大批人军区要说服，很可能被包围，甚至会冲军区，好人冲一下，他们会走的，坏人冲一下就暴露了，经过说服最后剩一、二个或三、四个人，人们就认识了，要改变过去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拨离间的状态，如果你们觉悟了，认识到上了当，不觉悟就要走到错误道路上去，严重的错误允许你们改正。希望你们同志回家后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在中央九条的指导下，允许改正错误，真正揭露以李葆华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谈到有人提出要三司同志回安徽)，三司同学不回去了，你们回去见诸于行动，相信你们有这个能力，在座的各方代表都有，不需要北京的同学再回去参加(关锋：你们要有信心嘛！)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挂帅，团结起来，军管会帮助一步还要过渡到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相信你们会搞好的。”

645. 王力、穆欣与唐平铸的谈话

(1967年3月28日)

一、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人民日报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共十九个人，五个领导干部，两个工人，其他为青年。“遵义红旗”占优势。

二、中央文革要求立刻抓人民日报吴冷西的斗争。吴冷西是新闻界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世界上有影响。斗吴冷西要说理，不准武斗，不要戴高帽子。吴冷西目前在北京卫戍司令部。王力说不要去揪他，要把准备情况上报，要斗倒，要把修正主义新闻路线批透。

三、人民日报要成立政治部，管思想工作。

四、关于报纸的批判，今天已经发表了戚本禹同志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文章。这部影片在北京只有两部，是刘少奇、陆定一有计划搞的。把卖国主义说成爱国主义，一字之差。这个批判从今天开始，要彻底批判，这个批判是去年十二月份毛主席提出来的。

主席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的不够，揭露的不够，批判的不够。”目前新闻工作要转入批判。宣传工作会议的方针是交流经验，统一口径(批判)。批判分三类：

不点名批判：刘、邓、陶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刘少奇为主，刘少奇又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重点，这本书流毒全国、全世界，影响很坏，必须清除。

点姓、不点名、点职务：如报纸上的王××，胡××，蒋××。

点名、点姓：如夏衍，吴冷西。

全国各省市也按这三个口径来批判。(陈伯达插话：胡乔木的新闻观点要批判，他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要批判。)

646.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单独接见内蒙古党委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3月30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晚九时四十分至次日凌晨一时。

地点：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出席接见的有：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及中央文革、总理办公室、国务院秘书厅工作人员。

被接见人：自治区党委代表中支持三司的有：高锦明、权星垣、王再天、李树德、康修民、李质、郭以青、张鲁；支持红卫军的有王逸伦、王铎。(接见开始，总理一一问了区党委代表姓名、民族等，接着总理问最近呼市情况，由二十九日刚从呼市返京的李质、张鲁同志作了汇报。当汇报到“无产者”、“军代表”采取集训、写自白书等办法对待革命群众时)

康老：仅公安厅、公安局就集训 109 人。

王力、关锋：什么集训，就是集中营，思想犯训练班，学的国民党反省院那一套。(区党委代表小组的同志汇报到××二师尤××说，中央调查团有八个右派时)

总理：调查团一共有九个人怎么有八个右派？

(汇报到呼市街上三司开始贴出“打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标语，军区曾派人照相，说是“反动标语”时，)

康老：连提拥护毛主席、林副主席都说是反动宣传。在三月九日军区给中央的电报上就是这样说的。

(汇报到近日来呼市大放王逸伦攻击高锦明同志的录音时，总理要去，并看了王逸伦三月六日攻击高锦明同志的传单，即“录音稿”。)

康老：你(指王逸伦)的讲话毫无检讨，顽固坚持刘、邓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问题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呼市这一时期发生那么多打人、抓人事件，你怎么看法？你表示过什么态度？向谁表示过态度？高锦明、权星垣同志的问题我们不做结论，你们辩论去，有他们的帐在。我就问你对群众的态度问题。(王逸伦答：我不赞成；向家里打过电话；向军区、“无产者”都谈过。答话时口口声声康生同志、康生同志。)

伯达：“无产者”实际代表有产者。

江青：现在是我们在问你！我看你一口一个康生同志，是质问的口气，很不尊重康老，很嚣张！(王逸伦：我怎么嚣张？)

江青：是你嚣张！

王力：你很嚣张！我看呼市资本主义复辟这一套，就是你指挥着干的，可恶！

康老：王逸伦，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在你的讲话里对路线问题怎么不表示态度呢？学生冲军区是错误的，三司已经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但对柳青打死韩桐你怎么看？表示过态度没有？把解放军报社记者押起来你认为对不对？你和军区谁谈过这件事？军区派武装来北京，来毛主席住的地方捉人你认为对不对？你光相信军区的话，你相信不相信总理的话？你认为包围师范学院对不对？你为什么在十八日早晨总理接见时不表示态度？

(王逸伦作了回答。当区党委的同志揭他的一些问题，王一再说“造谣”时，)

江青：人家提出问题，你就说“造谣”二字。有的是三对面都对清楚了的，你怎么装糊涂！

总理：是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又是乌兰夫的人。乌兰夫保过你。

康老：是乌兰夫的暗藏分子。(汇报到近日间仍然有的单位打人、抓人时，王逸伦说三司近来有活动，是三司挑起的。)

王力：你还让他们永远不活动吗？(汇报提到王逸伦的二儿子在二中是打人凶手，被革命群众曾送公安局拘留，王逸伦的大儿子是三司的发起人时)

康老：你(指王逸伦)支持“无产者”看来是有血缘关系的。

康老、王力：内蒙古都象你这样的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里能贯彻？(当王逸伦提到过去对各群众组织都是同等待遇，没有偏向时)

康老：那你对“抗大兵团”也是同等待遇的了！

总理：你不是说在二月六日以前你和区党委一致的吗？区党委支持三司分明了以后你怎么样？(王逸伦讲到三司砸、抢、打时，)

康老：那么“无产者”他们就那样好吗？

王力、关锋：近来“无产者”这么样的乱砸、乱打、乱抓时，你表示过什么态度？

总理：在你的这么长的报告里，对此根本没说一句话。是不是因为你和他们“三结合”了？你这个报告是不是“三结合”的纲领？

总理：(问王铎)你怎么到北京一个多月后又倒过去？你的信上为什么对军区的错误一句未提？(王铎答：我的认识有改变。)

康老：他投降了。

总理：是搞投机。(王铎叙述他改变观点的三个理由：对学生冲军区的问题；对三司的看法；对高锦明的问题。当他谈到学生冲军区，高、权、李质等同志没有坚定地做学生工作

时)

康老：你去作过工作没有？(王铎答：我当时做别的群众的工作，以后也去作过工作。)总理：你是要同他们“三结合”了。

伯达：你作工作，你代表什么阶级去作工作？你俩是代表地、富、资产阶级，戴了顶“无产者”的帽子。(当王铎谈到他坚决执行主席革命路线时)

江青：那个主席？是我们的毛主席还是你们那个刘主席？

伯达：你们那个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其他都谈不上。

康老：在全国，向群众打第一枪的是内蒙×区！你们知道不知道？(王铎：不知道。)

总理：你怎么不知道？你的信是三月十五号写的嘛！你去做工作没有？你是要同他们搞“三结合”的了。

康老：象王逸伦你们这样的人要是成为“三结合”的对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内蒙古就失败了。(当区党委的同志谈到“无产者”现在正四面出击，声言要同三司搞“大联合”时)

伯达：(指二王)你们要搞什么大联合？我们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你们搞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大联合”。

总理：原来想听听你们有什么检讨，你们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不改变，怎么能检讨？

康老：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内蒙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吗？今天你们两个的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

总理：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反扑，是没有乌兰夫的乌兰夫复辟。

康老：你们一点群众感情，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是没落的阶级，还谈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从当权派中把你们这些人清除出去，是很危险的；不清除出去，中国那有社会主义？那有共产主义前途？

伯达、康老：你们俩是没落的、死亡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王逸伦不承认内蒙现在情况仍处于恐怖状态时，康老让中央文革张同志介绍调查团十八号去呼市宣布了中央对军区的批评后，遭到了军区一些军官和林蔚然等围攻情况时)

康老：这么一个大事实你硬不承认。你们看看这些，这都是你们支持的。你们是支持白色恐怖，这完全是反动统治，你们两个就是代表。

王力：是法西斯统治！

康老：高锦明、权星垣同志有错误，有他们的帐。我问你们：军区政治部宣布高锦明、权星垣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同意不？你(指王铎)的信上提了没有？(王铎：我不同意，我给军区谈过)

康老：我问你的信上提了没有？你们回答问题，一不讲中央，二不讲群众，你们对中央究竟是什么态度？你们怎么对待中央？

总理：原来还想你们有点自我批评，但一点也没有，看来得见见群众。你(指王逸伦)不是说你们支持三司吗？要看看三司的同志们怎么说。

康老：王逸伦你那年入党？(王答：三二年)在那里入党？(王答：在北京)谁介绍的？(王答了介绍人名，一个死了，一个早就下落。)在那个组织生活？有那个人可以证明？(王答：在内蒙特委，那时的人都已死了)还活着的同志没有吗？(王答：在上海住党训班时管事的一个赵大姐还在)你被捕过没有？(王答：没有)(高锦明同志插问：你到苏联路过蒙古不是被扣过吗？)(王答：那是被扣留审查，是社会主义国家。)(到苏联后谁审查的？(王答：我写过材料，好象记得是孔原审查的。)孔原？怎么审查的？(王答：我不清楚了。)你不清楚？那时凡是去苏联的中共党员都要逐步面对面的审查，但是你没有经过审查。我听说你到过莫斯科，我就负责审查工作，但是我没审查过你。你住什么学校？送到那个学校，都是要经过我审查，经过中共代表团审查的，你和刘仁等在河套干什么我清楚。你是不是苏联情报机关送去的？你是有经验的了。怪不得你这样顽固。

总理：你(指王逸伦)的党籍问题说清说不清？(王逸伦：我认为说的清楚)

康老：王逸伦，我问你那一年从苏联回国的？(王答：三八年从新疆回国，三九年四月到延安的。)谁送你回国的？(王答：一个中国同志，名字忘了。孔原那时还在莫斯科。)孔原那时还在莫斯科？(王答：噢，那是三五年。)

康老：这就是说，在莫斯科时，我们没有承认你是中共党员。(王逸伦：训练班承认是党员，一个叫墨尔曼的女同志，她是管训练班工作的。)

康老：那是一个外国人嘛。我问的是中国人。(王答：我见过康生同志，我还到过莫斯科郊区。)

康老：你还到郊区去过？(王答：不是人多的那个地方。)

康老：那就不是我们的地方了！

总理：你到延安后在乌兰夫办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过没有？(王答：没有，那是王铎。)

总理：今天就谈到这里。(转向区党委其他同志)这里支持三司观点的还有那些有代表性的同志？(区党委几个同志谈了些，提出家里有些同志还需要来)

总理：你们回去提个名单。同三司的同志商量一下。

647.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总后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3月30日)

周恩来同志说：

同志们！

很久没有到你们这里来了。我想这个会是很难得的机会，跟我们全军总后勤部的负责同志见面，我想，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向你们问好！

因为今天是你们的部长邱会作同志身体的健康在开始恢复的时候，回来工作，我们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风浪中，任何人，都是如同我们林彪同志所指示的，在这场大风浪中，要学会斗争。当然，我们的矛头是对准我们党政领导机关和其它的单位中间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是要彻底批判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执行过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那些人，这样子来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坚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进行这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那么，因此我们解放军也不例外。

所以在解放军中进行这个斗争的当中，我们每个解放军指战员同志们，都要如同林副主席所指示的，我们既要参加这个斗争，成为革命的一份子，同时又要把自己做为革命的对象，就是要去掉我们思想中，头脑中的一些私字，私心杂念吧。如果说我们要夺权，抓那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同时也要把我们头脑中私字的权夺掉，建立公的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小将提出来的，毛主席特别把它选出来登在我们的人民日报上，你们都读过。实际上大风浪中，有时我们这些负责同志，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就是说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司令部的人，也免不了要经过一些风浪。这也是考验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你们的部长，我们战友邱会作同志，是经住了这次考验的。

另外，很显然照刚才最高指示上讲了，要识别干部嘛，不仅要看干部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而且要看整个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中，我们要区别两类矛盾嘛！究竟是敌我矛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执行了一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或者是其它的严重错误，要区别这个矛盾嘛。同时，要看我们干部的整个历史，不要看一个时候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革命的小将，青年们，他们有闯劲，在中央和中央军委十月五号紧急通知的号召下，起来在解放军内部来闹革命，特别是军事院校，后勤工厂，医院，以至文艺队伍，实行大串

连，这是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办的。既然允许他们串连，允许他们提出批评，允许他们到北京来，除了接受我们领袖，伟大领袖接见以外，我们的副帅林彪同志接见以外，自然他们也要到我们解放军各个地方看看。后勤所管的军事学院、医院、工厂、文艺部队，他也要到后勤大院来看一看嘛。所以你们这里住满了人，就闹了一场大的风波，这是一场革命的风波。年青的人嘛，他要闯一闯，看一看，烧一烧，贴满了大字报，贴满了标语，当然在斗争中也有些激烈的行动啰！现在看起来，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一些呢，也确实是年青人斗争的初期的发展，不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这些问题，应当欢迎他们这种闯劲。这样子，当然你们后勤大院最高的负责同志——邱会作同志，他就要首先变成了一个斗争的目标了。在这点上，你既然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在这个地方，他就要有事情，就要闹革命。我刚才听说，集中了差不多将近两万，接待了一万七八千人嘛，最高的时候，他就要闹啊！我虽然没来过，闹的时候不在，我也差不多经常听到消息。这些小将们他也不清楚整个历史，也没有辨别两类矛盾，有的就做的有些过了。但是呢，我们负责的人、指导全军的人，应该站出来给他们解释。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中央文革、我个人也参加过。但是，那个时候，在高潮的时候，你尽管那么解释，他觉得他不信，不大信，必须经过一场风波，考验了，以后事实被证明，慢慢信服了。年青的人需要自己亲身参加这个斗争，自己来证明认识这个真理，比别人去教育有好处。现在，许多院校回去了，医院的也回去了，文艺部队也回去了，工厂的也回去了。他们自己整风，就会把两类矛盾，一个人，一个领导整个全面地来观察，他们就会得出应该得出的结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把这个冷静地看一看，这种代价需要付出。因为这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工作干部的考验。毛主席号召每个人要独立思考嘛，在斗争中是站在哪一边？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是挺身而出，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首先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向小将们讲清道理，帮助他们，还是不管是非，就那末随便地煽风点火？那末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煽风点火的，比如说，煽社会主义之风嘛，点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这是必要的，也是对的，但是，也不要有些时候去煽阴风，点阴火，那就不可了。这都是考验，这场斗争考验每一个人。当然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而且要把它进行到底。现在正是处在一个全面阶级斗争和夺权斗争的新阶段，这一斗争同样地在后勤部门、军队的后勤部门。因为包括的有院校、有医院、有工厂、也有文艺部队，尽管我们今年发表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夺权的规定等等，加了一些界限，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但是，斗争发展还是要前进，我们不能阻挡。斗争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要求我们总后系统的后勤部门工作人员要继续学习，继续参加这个斗争。我相信，邱会作同志健康开始恢复，重新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他有了经验嘛！

在这个地方，我简单回述一下子，我曾经说过，邱会作同志是个老同志，经过长征的，很小的时候就参加我们的红军，我还在江西的时候就跟他相识，差不多到现在来说三十六、七年了。长征的时候认识，特别到了陕北，那时红军被迫地离开了老根据地，转战北上，集聚在陕北。那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线作战，我在后方主持后方的工作，那个时候邱会作同志也就参加后方工作、后勤工作，我们差不多每天几乎要见面的，计划为前方筹运供应的事情，渡黄河东征的事情，转战到西边，所以那一阵子共事最密了，觉得他是一个很能够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轻的，那时青年有为，是个有希望的同志，跟着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这个看法到现在来说，已经超过了三十年了，觉得我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没有看错。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先在后勤，然后又做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解放战争，转到东北，然后南下，又做政治工作，最后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的时候，他又来做总后的工作。接近四十年了，可以说，他是一个坚定的红军战士，老战士。这是他整个历史的主流嘛，好的方面嘛！但是是不是没有缺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所以，毛主席的学生，林副主席的战友，不可能在我们一生不犯错误，我就是一个嘛，也犯过

多次错误嘛！但是有决心，有了错误，敢于正视错误，而且决心改正错误。不但是中年嘛，现在到了老年嘛，还是这样想嘛。跟主席怎么跟得紧呢？首先你要做嘛！主席号召通过实践来证明，你对于主席的思想怎么掌握，所以林彪同志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要去做，在实践中来证明，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有错，是改了，还是没改，对，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搞得更好。首先要紧做，要紧学，用学结合，学用结合嘛！在用字中下功夫，林彪同志所提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读语录，读毛选，读林彪同志许多的指示，我们党中央的许多文件、政策、方针，最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红旗》杂志的社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许多好的文章都应该经常地学嘛！但是一定要跟做联系起来，紧做紧学，如果有错误呢，要緊改。我们一般的战士，从年轻，到壮年，到老年，不可能不犯错误，总希望少犯一点错误，犯小错误，少犯大错误，有了错误就得改，紧改，最后一个，这样才能说得上紧跟。不是说紧跟毛主席吗？按照林彪同志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紧跟啰，你首先要做，要学，有时要改，这才能说得上紧跟。我相信我们后勤的战士，要学会这个精神，希望学会这个精神。同时，也希望邱会作同志现在又来领导我们后勤工作，一定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长期的工作，远的不说了，就是我们解放以后和平十七年，后勤工作可以说，有三个时期，初期是刚开国，首先就遇到抗美援朝，那个时候，我虽然做政府工作几乎也是大部分时间用在抗美援朝上，特别在后勤支援方面管得多。那个时候，一道共事的就是杨立三同志，恐怕是你们第一任的后勤部长，那就是解放后啰，这位老战友那是病故了，他对后勤工作的那一段时期，在抗美援朝上说是尽了很大力。今天在座的还有跟他同事的嘛。这是我相当熟的那个三年多。后来，彭德怀回来了，他管国防部、军委，那时任何人都不能过问的啰。主席的话他都不听嘛，所以我们就没接触了。先是黄克诚，后是洪学智，那时就是开口向政府要款子，要钱，要东西就是了。那是一个长时期。第四任恐怕就是邱会作同志。林彪同志主持军委，那么我们的关系又密切了，协作了，要需要部队支援的，可以说，只要党啊，政府啊一要求，总是支援的，你们做后勤工作，都会感觉到嘛，都会想到的嘛，支援了许多，所以这点，应该说他是一个称职的，而且做得出色的后勤部长。所以，在工作上也有个比较嘛。因为鉴定一个同志的全面工作，也还得跟别的比较，跟好的比较，跟坏的比较。对立面有个黄克诚，洪学智。那么一样好的，但是他超过杨立三同志，因为他时间长，杨立三同志时间短，成绩也超过他，因为现在管的方面大，而现在管的不仅仅是我们解放军嘛，我们解放军现在扩大的，已经包括许多工程部队都进来了。而现在目前在夺权的阶段，我们伟大领袖给我们解放军的伟大任务，要我们支援革命的左派，支持农业，支持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等，实行军管，实行军训，不仅对大中学校实行军训，小学的高年级，乃至工厂企业事业单位，最后乃至机关都要实行。这个五大任务，非常的繁重，光荣，既光荣而又繁重，在这个上头，后勤就要起更大的作用了。所以想到这儿，我们相信，邱会作同志恢复他的工作以后，经过这次锻炼，经过青年们这一代，受了一点点委屈，这算什么呢。我们想一想，我们要把后一代，在大民主中，四大，五大当中，锻炼出来，敢于提意见，敢于说话，敢于独立思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受一切旧的东西束缚，有创造性地发展，所以我相信，这样的伟大的前途，我们伟大领袖下了这样的决心，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还继续下去，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后代是有希望的，那我们就应该很勇敢地站在青年的前头，帮助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带着他们前进。这样的精神，我希望我们后勤工作也要这样子，比比过去一个时期，后勤工作在邱会作同志领导下，学主席的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是高的嘛！去年主席的五七指示，给林彪同志的回信，就是因为后勤提出来的报告得到称赞的嘛，得到推广的嘛！现在的五大任务，确确实实是要使我们的军队从各方面去接触人民，更进一步地跟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工作，对于我们解放军来说是光荣的，对后勤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现在可以说，应该是我们后勤工作的新的一章的开始。我的话完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好！我借这个机会，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邱会作同志我是不太熟悉的，大概见过几次面。但是早一晌我看过他写的自我批评，也听过他在这次运动中的一些态度，我对他那个书面检讨，我觉得是诚恳的，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此外，当他在群众面前，当群众运动在一个高潮的时候，出现了某一些偏激的时候，在这样关头的时候，最容易考验一个人了，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在这方面我听到邱会作同志是有良好的表现的，是值得我学习的，我相信也值得同志们学习。这是第一。他不承认他是三反分子，遭到了变相的体刑的斗争，这时他不是对抗的态度，他对群众采取了爱护的态度，这点我们不知道的，我听到很感动的。他觉得很不安，群众为他在那儿挨饥受冻，他自己非常不安，他不能够休息，这样，后来主席派人要群众散去，他才安心休息。那么，在这样一个运动中间，有很多不同态度的人，我想邱会作同志这种态度既不是对抗，也不是委屈，而是爱护群众，而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彪同志。这样的态度是不是值得我们学习呢，同志们？(热烈鼓掌)我只想把这一点我知道的告诉你们，我也没有更多的话说。

陈伯达同志的讲话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志向同志们问好！

我完全拥护刚才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邱会作同志他不怕群众，站出来跟群众在一起，并且作了多次检讨。我觉得这样的态度是很好的。希望邱会作同志，出来做工作。象刚才周恩来同志所讲的，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邱会作会工作得更好，我们希望他工作得更好。

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648. 李先念的讲话

(1967年3月30日)

(当我们汇报了胡××的问题以后)

以后我考虑最大的问题是人权(用人)，要走群众路线，以前我们这里不管人权，重视不够，毛主席一再讲政策方针，路线，用人的问题，这次你们的功劳不小，贡献很大，批判了反动路线，树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揪出了胡××叛徒，取得了伟大成绩。你们左派作得很正确，批评尖锐，批评我们应该，你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现在看来，我17号讲话很多是错误的，就是要烧。就是(我的)立场没有站好，商业部(红反军造反团)烧我，批评完全正确。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东西不理解，总理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要不断总结经验。你们批评我们完全应该。我们要虚心地诚恳地接受批评。

银行这次确实要很好清理一下，×××单位也很复杂。

过去重视对青年人的工作不多，人数是一个大问题，青年人要把业务工作抓起来(也不难学嘛，几个月就会)，你(胡立教)要支持他们，派人出国要跟造反派商量。

这几年经济工作成绩是很大的，主要还是毛主席的思想挂帅。

革命的三结合，最大的是人数，用人的问题。银行要好好整顿一下，你们的任务很重，要提拔一批青年人工作，以前在这方面的批评很对。

业务工作你们要注意。

黄中汉：火烧李先念的问题。

胡立教：个别单位。

李副总理：怎么不可以，完全可以烧。

黄中汉：李副总理四次怀疑大方向。

李副总理：总而言之，谈了不少错话。

黄中汉：胡立教在总理 17 号接见对敖本立说总行造反部三天以后就要垮。

李副总理：二月份是个立场问题，错话说了不少，今天你们说的好，批评得很对。

今天你们当面批评的很好，同志式的批评，我们都有错误。二月份有些问题是个立场问题，立场未站到造反派一边来，而且对造反的精神也不太理解。后来我看出来了，就接见了一些造反派的同志们。你们批评得很好。我看二月份立场没有站过来，我接受(你们)的批评，胡立×也要接受这个批评。我们要很好深思，胡立教要很好想想这个批评。这次对干部是个大审查，大检查，大批判。我们的立场观点都要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和造反派一边来。……

三大条件是个策略问题，我对每一步是有警惕的，我跟胡立×讲每一步都要安子文说话，要拿住他的把柄，当时李富春同志也这样说过。

现在我们要兢兢业业，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接受批评，改正错误。与同志们一起批判反动路线，与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银行大联合还是搞的比较好的，没有啥问题呢。(我们说是稳定的)

三结合首先要批判反动路线，你们对干部也要排队，党组的队你们不太好排啰！

我谈过好几次，我们要接受批评，不要有怨气，我讲了好几次千万不要有怨气，你犯了错误要接受批评。造反派是可以商量问题的。你犯了错误吗？

我们要大胆地承认错误，我准备检查，(黄中汉，你越快越好)。

(最后，我们要求来总行，或派秘书看大字报)答：要秘书来。

649. 周恩来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3 月 31 日 国务院小礼堂)

一、毛主席为什么在接见张春桥同志时说，今年三、四月是决战时期，我们如何理解其深刻含义？

主席讲话登报了吗？没看见有，大概是传出来的，有这么回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十个月嘛，去年这个时期，毛主席亲自批转聂元梓的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全国轰轰烈烈的群众大运动，去年到年底已经七个多月，你们都熟悉么。运动本身就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的目的，十六条规定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前七个月是思想准备，思想动员，树立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揭露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对立面搞得更清楚了，经过十一中全会，十六条，红卫兵运动，大串连，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北京到全国，从城市到乡村。十月一日，林彪同志讲了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中左派的旗帜举得更高，保守势力缩小了。革命派从政治优势，发展到组织优势，不但做了思想准备，而且做了组织准备。这是第一阶段。再前进，进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突出，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上海工人阶级起了领导作用。所以毛主席抓住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的十一个团体声明和三十二个团体的紧急通告，和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以工人阶级领先，一月革命风暴，从上海发起，这是第二阶段。夺权斗争开始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经济主义进行反扑。不仅经济主义方面，还有其他方面进行反扑。进一步夺权斗争，夺权是必然的，这是反动阶级向我们进行全面的阶级斗争么。党号召我们，毛主席号召我们夺权，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一月革命风暴所引起的这个夺权斗争，并不是说一些地区、一些企业单位、机关、团体都要夺权，这样就不是一分为二，这就没有阶级分析了。夺权是夺应该夺权的地区，企业单位，机关，团体的权，但是这必然会有连锁

反应。这些一月份给你们座谈了，二月份也讲了连锁反应，所以势必带来连锁反应，必须要有精神准备。当时设想夺权斗争在二、三、四月份可能看出一些眉目，这是毛主席说的。现在看来，可能时间还要拖长了，到二、三、四、五月份。所谓决战，从某种意义上说，跟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就是决战，不是一切都解决了。所以主席讲，明年二月三月四月看出结果。夺权首先是地方，全国有二十八个省市、现在又增加一个直辖市天津，变成了二十九个省市，还有专区、县、公社，一般地说，顾不过来，有些地区搞了，最近中共中央发了通知，大队、生产队春耕大忙，不进行夺权。二、三、四月不能普遍铺开夺权。中央机关里夺权斗争已经进行两个月了，现在眉目还未看清楚。企、事业单位更慢了一些，为什么这样？因为是史无前例的运动，最高统帅提倡的由下而上的发动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卫下，夺权没有历史经验可学，自己摸索。对形势只能作一般的估计，北京革命群众的报纸，我不确切信。我只讲我自己的看法。主席讲主要二、三、四月份看出眉目来(记录不清楚)现在只是估计，时间晚一点，早一点，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搞内战，但内战以前已经有了。四五年日本投降，四六年就进攻，大规模是四六年七月到四九年六月，三年半不到的时间就解放了全中国。四七年主席在陕北时估计的时间还要长一些，时间来得快一些，主要看主席的方向、方针、预言对了，中心是今年看清眉目，明年看出结果来。这是带偶然性的，工作得好，快一点，做得不好，就慢一点。同志们很着急，何必着急，急不行。

二、这次为什么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而不是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这看提什么内容，比如说，很多地方，反动路线搞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权、当政的。上海市人委那时没被夺权，黑帮统治，黑龙江省当时潘复生同志的权还很小呢！他们就搞反抗，向我们挑衅，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挑衅，所以上海口号是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二月份，一方面提出对待干部排队，要一分为二嘛，不要否定一切，《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讲了。从另一方面一切都要肯定，也不对。否定一切是形“左”实右，这是由上而下来的，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比如财政部例子可以说，掌了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到中央来了。他要夺中央大权，这是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作法。夺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了，夺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些都是一股逆流，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有各种形式，各地都可以找到这种例子，各个方面出现了复辟逆流，我们应该进行批判。原来矛头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头向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对保守派用政治斗争影响他们，教育群众很好。夺了权以后，革命派内部，发生了一些问题，私心杂念起来了。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有的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联合在一起搞假夺权。也有的自己夺了权后，排斥另一派革命派，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群众。夺权斗争中出现的这些，有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的是新发现了的问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一些部门、机关都可以发现这种情况。在学校中，是另一种形式，过去否定一切，什么都不好，当权派、小当权派一律靠边站。现在，当权派，小当权派又都出来压制群众，这可以叫反扑、复辟。他们要出来，他还想当权，恢复旧的统治。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打翻打烂一切便于滋长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凡是复辟也好、反扑也好，就是要恢复旧的东西，恢复旧的思想。从广义上来说，就是复辟。为什么这次提是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呢？因为夺权斗争是由上而下的进行，所以提由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

三、《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中为什么强调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当然不能半途而废。我讲了，今年三、四月份看出眉目，明年三、四、五月看初步结果，也可能更长一些时间，斗批改都搞，各地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一

样，明年三、四、五月才有结果。是否今后就永远太平了，不能那样讲，那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发动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进行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不能永久是革命派的选举，还要搞革命委员会，临时的权力机构，要变正式的权力机构，将来还要回到人民代表大会。机关现在搞监督机构，将来还要回到人民代表大会。机关现在搞监督机构，将来仍难免产生停滞，如搞到明年，运动轰轰烈烈的，但总要有间隙。过了一年后思想上又有灰尘，又可能出问题，那就还要搞，形成好的制度。大民主的统治，不仅我国，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使我党永远不变颜色，还要影响全世界。这样，对全世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就保障得多了。想到前途，去掉灰尘的事，应敢于作了。

650.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王力、张春桥、关锋、戚本禹、萧华、杨成武、曹耿等接见福建省赴京代表团和三司、北大、科大“11·23”等南下赴榕回校同学时的讲话
(1967年3月31日 人民大会堂)

总理：收到你们一封信，你们很急，一直没有排上队，一方面想多些同志来谈谈，昨晚到了几位同志，所以今天见了大家，先请廖海光同志谈谈筹备情况。

廖海光：根据山西、贵州经验，准备夺权。当时最突出的是干部问题，一致同意的是金水、黄亚光、刘家生。经过调查，范式人等同志过去有的受过叶飞打击，与叶飞斗争是坚决的(像叶松、高盘九、任洪萍、王禹)。当时革命群众对他们有怀疑，因为运动初期还很不理解，对红卫兵运动有抵触，和稀泥，与叶飞斗争不坚决，经过摆开来说，是解决了。群众组织经过运动，福州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出了毛病。有的冲了一下军区，比较好的是“2·29”以及小的单位。群众基础在“1·26”以后这一段，只剩下“2·29”，后来工人，机关，一部分学校又起来和一部分同志合起来，力量这还不够雄厚，特别是福州，经陈伯达同志建议又来了九位同志，现在检查起来，我们的做法有问题，对1·26问题处理上，现在看来“1·26”冲击军区当然不好，不应该冲，当时学毛著积极分子会时，当时部队未开展四大，冲是不对的，当时冲了以后，特别是陈伯达同志指示以后，很多群众团体表示要请罪。

伯达：那个电报不可能关系到请罪的问题，为什么请罪呢？“1·26”找你们谈话，不要把群众找你们谈话都看作坏事，是件好事嘛！

廖海光：当时还消毒……

伯达：消什么毒哪？

廖海光：这样问题就大，就发生了批判斗争。

总理：有勒令解散的吗？那几个？

廖海光：我们勒令解散12个红卫军，交通系统革命造反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没有解散。

伯达：有没有提黑组织？传单中有说过这话，为什么要提黑组织？不能叫黑组织，领导上要表示态度嘛。

廖海光：领导上没提过黑组织，也表示过不行，随便把一个组织打成黑组织，当时还有师院“红联师”，他们群众提出了解散这个组织，福建军区表示支持。这样就出了毛病，打击面过宽，下面再谈，当时，地富反坏右出来活动要打击，但掌握不好，在下两面……

伯达：不是开了很多声讨会，当场抓人示众？

廖海光：姜观问题开了一次会。

伯达：不要开这样的大会。

王力：福建从1·26以后抓了多少人？

同学：17.8抓了300多人，泉州有逮捕证的是74人，福建中医学院400多人抓了11

个，扣留了 14 个，3 月 26 日召开声讨大会，大会上取缔了革命职工造反团……，会上宣布以前造反派掌握权是篡政。联合总部仅参加 2·7 大会也被解散。当时 2·11 大会宣布二十多个组织为黑组织，不许打旗号参加，我们 2·11 请罪了，要求参加大会。

伯达：为什么要请罪？

王力：不要请罪嘛，军区应出来讲话。

康生：同志们到中央开会，第一召集了各方面意见的同志来开会，可能有的同志，特别是军区同志不习惯了，这恰恰是毛泽东思想。

王力：你们认为是左派，右派，反革命的，抓到监狱里来的都要来。

康老：你们要学习这种方法，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到中央来。在我们这个会上，各种意见都可以讲，各种问题都可以批评，不存在打击、反对解放军的问题，都可以畅所欲言，第三条在外面不要传播。

同学：2·11 开大会，宣布二十几个组织不能参加。

总理：你们把二十几个组织对一下。

廖：红卫兵小将犯错误了，我们采用不原谅的态度，这是不行的，以后国家怎么办？冲击军区当然不是好事，本来中央给我们很大支持，但我们处理不当。本来应保卫革命锐气，保卫革命小将，革命小将有小错就严追……

伯达：把抓的人都放掉，把关的人全放出来！(很气愤)

王力：还要写检讨，有什么检讨可写的。左派犯错误嘛！

廖：犯了这个大错，对保卫革命小将这一点思想认识不足，混淆了两类矛盾。

总理：左和右，革命和反革命，合法和犯法的界限要划清啰！

同学：汇报玻璃厂的情况。

康老：玻璃厂的方元官来了没有？答：没有。

康老：方元官抓起来了没有？……(同学读到了伯达给韩光楚同志电报问题)

仙游：南下同学说军区扣留了 12 个同学，2·13—2·22 开三次全县大会，到 3 月 5 日已捆起来游街武斗、挂牌子。“你们三司是右派组织”，“三司红旗永不倒！”在福州是反动口号，还揪到农村去斗，在庙里每天关有一百多人，六点左右，抓了 12 人出去打，他们要我们受“阶级教育”，部队发通令，部队执行任务抓右派时，任何人不得阻碍，要让群众来收拾右派。

总理：抓人这件事军区有关吧？朱跃华(朱是福建军区司令员)

朱：(站起来)到！

康老：抓人怎么会没有呢？是你们知道不告诉我们！

总理：这种情况下不制止是很危险的。你们马上发电报。今天晚上就发。

廖：前几天已经发了。

总理：发了？那你把命令交给我，满足我的要求，按那四点：(1)取缔通缉令，(2)取消取缔黑组织，(3)停止抓人，抓了要释放，(4)写了检查的要全部交还本人。马上打电报给全省所有的县。(杨成武：还有江西的)1·26 被打成右派的统统放出来，写检查书的停止，检查一律交还本人烧掉，这一些都是工作组搞的，我们不要搞。

叶群：主席教导“言者无罪”，这是主席思想，请罪是不对的。福州军区应该引起严重注意。

康老：错误是掩盖不住的，越掩盖，越严重。你们现在是掩盖错误，必须悬崖勒马，改正错误。

廖：是！(汽车学校“福建前线红卫兵”发言：讲话同学被搜身的。)

王力：搜身是封建制度，不搜身是小民主，现在不但大民主不给，连小民主也不谈了。

叶群：搜身是包身工制度。(沈义德发言)……

王力：现在福建都在抓姜观之流，不要用这个口号。

康老：一个参谋就能宣布一个组织解散？！

(福州七个代表谈到：“东海兵战要武”战斗队，回家坐车过年，平常不参加文化大革命，睡懒觉，打扑克，划船等)。

周总理笑问：那是“东海兵”吧！答：全是！而这些人现在是左派，因为他们没有喊“1·26”好得很！总理：“哦”！

谈到有的干部不愿到造反派中亮相，而只到“东海兵”那儿时，

总理大笑：那也好嘛！混在一起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此时三司同学递上了“1·26”《福建日报》上刊登福建军区政治部写的八篇文章。

周总理看了看很生气，敲着报对朱说：这是你们政治部写的，把“1·26”做为标准，人家说你是有证据的。(总理念了一段报)讲你们28日来的，26日还写这样的文章。

王力：白纸写黑字！

总理：好！现在“8·29”谈谈！

柯纠耿：1·26以来两个月心里很痛苦。一方面坚信毛主席亲手缔造的解放军，另一方面看到原造反派不能和我们一起战斗，被打下去了。我们一再把这些意见反馈给军区，军区一直站在保守派一边，军区处理“1·26”问题粗暴、简单化。军区屁股没有坐在造反派一边，对事态没有制止。只剩下一个光秃秃“8·29”有什么用？发现问题跟军区提都没有得到支持，晋江专区问题特别严重，希望引起注意。我们在福州有很高的威信，我们群众基础很单薄，造反派不起来，我们就没有群众基础。例如师院联合应以“追穷寇”为核心力量，却以“红联师”为依靠来组织联合。当时我把责任全归罪三司，认为他们害的。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是当前一个大问题，现在对老臣态度是不对头的，老臣被搞进城犯了缺点错误，但应看到他们支持了革命的红卫兵，暴露了这次运动是十七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产物。可是军区做的是简单粗暴，解散回家，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做法不妥当。军区对老臣问题有原则性的错误的。

三司：念语录(接班人五条最后一条)

科大：柯的发言文过饰非，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军区身上，新北大“干到底”也是这样，屁股坐在“东海兵”一边。柯苏、张莉莉，都是这样热衷于组织革委会，听不进去我们的意见，在福州文化大革命中很多问题，柯处理不对的。

工业：肃清“1·26”遗毒有必要，有好处，比如有益学毛选，现在有一个铁打的毛选学习时间，再一个解放军威信空前提高。什么都是部队说了算的……。

康老：你刚才讲话被敌人利用，敌人抬高的是谁，解放军威信提高了？解放军说错了话算数，做错了提高了，到处抓人也提高了！“1·26”遗毒出现了这么多件事？这算肃清“1·26”遗毒的。

总理：今天不能再继续了，也不可能多方面全听。军区可能有意见，这有几个人要来，可能要隔二、三天，这时期可以准备材料。造反派被压制的，可以多写材料来。刚才四点再加二点。

(1)在“1·26”事件及“2·7”事件上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要把他们统统立即取消，如周振祥，刚才(递条)有两次提到周振祥，不同意见允许嘛。

(廖：他现在没有具体工作，本来把他调到其他单位去。)

他不是福大工作组嘛！不同意调离，应该让在原单位工作嘛！不同意见可以发表嘛！不要歧视。(同学，还有军区文革办公室张宝炎)不仅军区的，任何机关都要这样。

由大军区通知省、县，江西，福建军区。

(2)彼此之间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抄，俘虏还不搜腰包呢，何况同志。

651. 周恩来、康生、江青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7年3月31日)

有的同志说：他们人用枪押着我们的同志。

江青同志说：他们带的枪没收！

有的同志说：他们抓了我们好多人。

康生同志说：谁抓人把谁抓起来！

有的同志谈到所谓二·一七中央军委给成都革命工人造反团和川大东方红八·二六的信。

康生同志说：二·一七号所谓的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是不晓得，我们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叶群同志说：为了证实这个信，我刚才坐车到林彪同志那儿去了，这个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根本是造谣。林彪同志说：他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他也根本不会写出这个信！我也亲自问过林彪同志办公室的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见到过这封信，这封信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会议结束后，总理与康生同志讲话：

总理：四川问题不是一个晚上能解决的，但是既然抓起来了，就要解决。北京的一些同学要打回去，当然需要你们去战斗，中央正在考虑，当然是我们陪着你们去啰！下面有几件事说一下。（从略）

明天不要都来了，我们分头去解决，一个个地解决，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就要追到底。

康生同志说：有这么几点请同志们注意。

1. 是抓了人的，请同志们交上名单，凡交上名单的，我们会立刻办，立刻打电话，要他们放人，并且要禁止继续捕人。

2. 我们不允许四川的任何人到北京来抓人，请同志们注意一下，如果有人来抓，你们要坚决拒绝。我们说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准，一定不准抓，即使是公安部批准的也不行。

3. 大家对接待站的意见，我们要转告。（王力同志插话：以后开这样的会也叫他们来，受受教育。总理问：是那个接待站，是不是国务院那个接待站？）

4. 所有你们听说的，看到的所谓中央军委给四川的什么信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四川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统统是谣言，同志们要帮助辟谣。

5. 请同志们注意，特别是三司联络站的同志们注意。毛主席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建立的，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一支人民军队，有了这支军队，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顺利地进行。我们的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的缺点是支流，不是主流。军队里头有坏人，但我们要相信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同志讲话中不要讲“黑军队”、“黑军区”，我们的部队绝大多数是好的。

同志们不要到外面去谈这个问题，到外面去谈四川军队的问题。（总理插话：更不要写大字报）不能在《红卫兵报》、《井冈山报》上登载这样的消息报导，昨天清华《井冈山报》打电话请示我们，他们问有关军队的问题能不能登？我们回答：是不可以的！如果这样做，对我们解决四川问题是阻碍的。今天谈的，也不要打电话、写信回去，打电话、写信也谈不清楚，也不要乱出去传。

652. 谢富治的讲话 (1967年3月31日 在北京市委)

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挖总根子，要做重点批判，现在还不做普遍深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挖得不够，要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造者就是总根子，写文章要一针见血，不要回避要害问题，林彪同志说，军队要印发批判刘邓的材料，过去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主席观察了二十年，现在要消毒，现

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总根子在刘少奇。要挖制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子，要全面批判，总根子为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插，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权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根子，是黑司令。现在文章要提一些新问题，水分不要太多。毛主席对《修养》的结论有三句话：骗人的欺人之谈，总而言之，是不要政权，不要修养。

二、保护左派。不许资产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左派整风之机搞复辟。整风的目的是要保护左派，提高左派。不许用任何借口打击造反派。

三、三结合，大联合问题，不允许利用三结合、大联合打击左派，三结合大联合要有一个过程。现在要反对两种倾向：一是继续反对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二是反对利用三结合来打击左派。这种倾向不是以革命造反派为核心的三结合，是要把革命派整垮，尤其要注意。三结合、大联合，要以革命派为核心，要通过斗争发现革命领导干部，没有斗争，怎么知道他是革命的呢？革命的三结合需要革命的检验和批准？要有一个过程。

四、不要群众斗群众。尤其是不许保守派斗争造反派，现在利用造反派的一些缺点，把相当一部分造反派斗争，这是一种反革命复辟，革命派之间群众斗群众是不对的。不要随便宣布对方是反革命和戴帽子，不要搞对方人人过关，人人检查，保守派只要承认错误就行了，只要个别头头进行批判，反对新形势下的群众斗群众。

有一种在某种势力支持下保守派斗争造反派也是反革命复辟。

653.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谢富治、萧华、杨成武、李天佑、叶群等接见宜宾地区代表讲话 (1967年4月1日 人民大会堂)

总理：现在开会，今天就根据前几天主席的指示，我们找你们来关于宜宾问题，叫党政负责人、群众代表都来，四川军区，成都的都来这里，刘结挺同志控诉，来检查四川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北京到四川各地串连的同学回来反映了许多问题，到北京告状的反映许多问题，宜宾，万县，古灵，成都，重庆，看来不单是宜宾了，原来也不认为单是宜宾，成都有个镇反报告也牵连到各地区，先要解决一下宜宾的问题，先请刘结挺同志讲一下。(刘结挺开始控诉……接待我们时说：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

康生：谁讲的？

总理：几号讲的？(刘结挺：中央办公厅的人讲的，九月十二日，说什么小平同志非常关心这件事，他们要我们赶快离开北京，不然事会闹大……)

康生：电话讲的吗？(刘结挺：是直接接见讲的，二十七个被接见的人揭发了这件事，就被军分区抓了……)

康生：二十七个人中间一个揭露了这件事，被军分区抓到监狱，叫什么名字？(对结挺：叫高玉文。)

总理：办公厅接见的人叫什么名字，你们不晓得？(刘结挺：我们没参加。)你们没参加，接见了他们。(刘结挺：对，接见了他们。)高玉文是谁抓的？(众：王富德。高玉文还在关着。)王富德同志，高玉文还抓着呢？(王富德：高玉文是地方组织抓的，我还不知道呢。)你马上去叫把他放了，叫到北京来。(……郭林川没有来)郭林川在那里？(众：在宜宾。)

康生：怎么没找到？让王富德同志找他来，把他送来，保证他的安全。(众：王富德要抓他……)

总理：(问王学明)你说在什么公社？(答：郭林川在××公社)(王富德：接到电话，我们找了，没找到。)甘渭汉同志，今天晚上你要保证高玉文同志，郭林川同志，保证送到北京来。(……)

(谈到用飞机散传单，抓人一事)

王力：(对陈伯达同志)飞机一来，下面就抓。

伯达：甘渭汉同志，散传单是谁批准的？(甘渭汉：叶副主席。)

康生：飞机散发也是吗？(甘渭汉：飞机散发没有说。)

(会议争论很激烈)

总理：同志们冷静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把问题讲清楚，他们原来那样对你们，你们不要那样对待他们，摆事实，讲道理！

甘渭汉同志，电报讲，在监狱的请负责放出来，在外地的请负责找来，以上人员，请甘渭汉同志在成都召集，北京3月30日派飞机来接，可你们，把底下这些人还看管着，当犯人，到了北京还这样。

杨成武：打电话给他们，昨天才知道，说这些人是犯人，不发出入证，他们是中央请来的客人。打电报时也打了电话，你们根本问题是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

(众：还有四个没有来……)

总理：哪四个？是哪儿的？李良在哪里？(众：李良和郭林川在一起……)甘渭汉同志，给你四个名字，加上高玉文，(众：刘结挺的女儿也被抓了。)几个？(众：三个)有人照顾吗？(众：刘结挺的家被抄了二十多次。)甘渭汉同志，要把这五个同志找回来，三个孩子，告诉他们送回家。(汪宗清：三个孩子没有抓。)你军管了嘛！你去查，限你二天。

(王茂聚控诉)

康生：牟海秀在这里吗？你晓得宜宾抓了多少人？(牟海秀：我不晓得。)你不晓得，你在中央面前声明你一点不晓得？记下来。沈学理你对抓人的情况晓得不晓得？(沈学理：我3月5日才放出来……)你到处作报告，你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抓了人没有？(沈学理：我在中央面前声明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是抓反革命。)好，记下来。

总理：讲你放出来以后嘛，出来四十多天了嘛，(沈学理：宣布了几个反革命组织，方面军，反修战斗团，前哨，觉醒，现在地委没有工作。)不知道抓了多少人，是嘛？记下来！(……)(有人说：四川有人讲，李井泉还是李政委，牟海秀还是政委。)

康生：现在还是“他们的政委”嘛！(……)

(谈到军分区到京抓张西挺一事)

王力：军分区派的公安部的三个干部，来抓张西挺，他们以为刘结挺不在这里，我和关锋同志通知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后来我们了解这三个干部原来是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的，是带功立罪的，就放了他们，让肖华同志办公室通知宜宾专区。

(1)刘、张、王、郭不是反革命。(2)抓人怎么样，后回去就找到了。(温国良：到公安局，就不让我们出来。)总政下了通知嘛！军阀，十足军阀！(……)

(王富德：我没有派人，在中央面前敢负责，没派人，我抓工农业生产去了。)(争论激烈)

(王富德：我们都可以说话嘛，元月25日方面军跑到我们那里要我们派军队，军队根据文件只能军管。1月28日把一万多人包围军分区，把我拉出来打了一顿，打坏了，养了一个多月，有医生证明，后来省里让我管生产，我就抓生产去了。)

王力：你讲话要讲事实。

(王富德：在中央面前我不敢讲假话，抓人我不晓得。)

(汪宗清：抓人的事是这样的，开始我不知道，在军区开会时，甘渭汉同我有三个人去北京抓人才知道。)

总理：谁派去的？

(汪宗清：军管小组，参谋李勤然，他是市武装部，政治部、主任，他是组长。)他自己

决定的？没有上面命令？

(汪宗清：没有。)(……)

(谈到 2 月 17 日和荣复军。)

总理：这个问题和军分区和荣复军没关系？

(王富德：我们不同意成立荣复军。)

总理：有没有关系？

(王富德：我们对他们做正面教育……我们没关系。)

总理：又没关系了？！(……)

总理：今天结束这个会，这个会还要继续开。军分区，地委的要申明他们的意见，控诉地委的同志也要回去，一个一个问题弄清，你们激动心情我们理解，你们回去，今晚，明天上午开个小组会，哪个同志谈哪个问题，不要谈细节，中央文革，中央常委事情很多，要集中，不要分散。

1 月 28 日，2 月 10 日到京抓人，刘、王、张、郭问题都清楚了，以前他们也有材料，毫无疑问要平反，不光是这个问题，还有四川全面开展斗争，三个省份的问题，刘结挺、张西挺、王聚茂三位同志把问题集中一下，四川要镇反这个问题，集中在那。

康生：我们得到消息，甘渭汉同志说 19 日去的飞机，我们听说 18 日去的飞机，要搞清楚，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飞机散发所谓中央这封信，是有人假造的，散发这封信以后据说 20 分钟开始大逮捕。

韦杰，在不在？散发传单的事你晓得不晓得？(韦杰：军区决定的。)万县开枪打死人，你们报告没有？(韦杰：当时没报告，大约五、六天后报告的。)五、六天是不是？还没有报告，什么形式报告的？什么名誉发出的？(韦杰：电报式，以军区名义。)

王力：打死多少人？(韦杰：五个。)一直到现在还没报名单。

关锋：是否是五个？就是五个？

总理：你们打了报告，镇反的报告，说还不够，还要继续，离座谈情况差太远了，今天就停止，因为刘结挺提出，从宜宾情况到全省在我们看，拿宜宾来说，先镇压革命群众、革命组织，2月底到三月集中揭发大的事件。万县、左灵、自贡、成都、重庆，通告包括地方很广了，要化一点时间，不是一、二天解决的。

第一件事：成都军区要负全责，赶快把这个事停止，梁新忠同志监督，马上打电话去，今后如这样文化大革命事情，不能抓，要放出来，也不要马上就放，不然会不知下落了，你们一个一个军分区打电话，军管电话给你们，一个个军分区传达到武装部，对革命群众不能再歧视了，对真正反革命组织要区别头头和群众，明后天要发通知。

第二，请在座的解决这个事，是局部问题，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看大形势，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搞文化革命要相信什么力量呢？第一相信群众，第二相信解放军，第三要相信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搞革命的三结合嘛！

解放军起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柱石，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解放军的个人犯严重错误是个责任，我们要个信群众会听主席、林副统帅的命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过去的情况揭发就可以解决，不要对解放军抱情绪。

未解决以前，回招待所，北京的回校，只能在本单位讲，在这里可以谈，把问题谈清楚，在外面要谈，对联络员，记者可以谈，更不要在报上，《井冈山报》、《红卫兵报》上登，也不要写大字报。军区打电话，你们不要打，四川很紧张，你们打了，大字报就出来了，这样复杂紧张了。全国七千万人的一个省，李井泉是我们揭发的，对党内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彻底解决。

康生：请同志们注意，我有几点说明：

1. 有一同学说：成都有传说林副主席曾到成都，坐镇成都指导镇反，这完全是污蔑、

造谣。

2. 二月十七日所谓中央军委的信，毛主席、林副主席完全不知道，林副主席昨天才看到，林副主席是完全反对这封信的。

3. 听了这个情况，林副主席很生气，亲自拟了几个命令寄报中央，坚决禁止开枪杀人，坚决禁止乱抓人，坚决禁止任意宣布某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发下去，这是中央林副主席对解放军的最大支持，最大关怀。

总理：会就到这儿。

高呼：毛主席万岁！

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654. 李先念接见供销合作总社代表时的讲话

(1967年4月2日下午 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会议室)

被接见者：总社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总部代表李永红、李尧天、张如海、总社党组代表王念基

(一)汇报情况时李先念副总理的讲话

先念同志进会议室后，和代表们一一握手。

先念同志首先说：“你们写的王卓如的材料，我看了。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下。那时，(指一九三二年在反省院写反动文章之时)他入党了吗？”

代表答：入了。一九二七年就加入了共青团，党龄从那时算起。

先念同志说：你们谁先说说？

李永红同志代表总部就机关运动的下述五个问题向先念同志作了汇报

一、关于总社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按行政部门实现大联合的情况。当李永红同志汇报到总社机关按行政部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肯定的，但是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很严重，因而提出了“边战斗、边整顿”的口号时，先念同志指示说：“在大联合中，左派要占优势，不能和稀泥，搞调和主义，不能搞大杂烩。一定要是以左派为核心的，左派占优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已经联合起来，边战斗、边整顿，好！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

二、关于领导干部亮相和排队的问题。当李永红同志分析了总社机关领导干部的现状后，说到“目前，总的的趋势是领导干部向革命派靠拢”时，先念同志说：“这好！”当李永红同志汇报到“我们准备开门来排领导干部的队，发动群众来排，不仅发动本局群众，还要发动外局群众，准备张榜公布”时，先念同志表示同意说：“对！”当李永红同志谈到党组成员的情况，特别谈到史立德的问题时，先念同志说：“过去听说：(他出狱时的誓词上)没有‘反共’这两个字，现在知道是有的。他给造反派谈了吗？”答：“昨天谈了，写了份书面材料”。先念同志继续说：“以前，他写了份东西给财贸党委，我转给康生同志了。”张如海同志说：“史立德将他的问题告诉了姚依林，姚依林当史立德的面答应告诉我们造反派，叫成立专案组，可是已一个多月了，姚依林始终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呢？”先念同志说：“姚依林告诉我了。史立德写了封信，我已转给康生同志了。他过去是向党交待过的，但没有交待‘反共’两字。”

三、关于党组问题。李永红同志汇报了党组成员的情况，当汇报到“总社党组现在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时，先念同志说：“我已经知道了，运动你们领导，他们搞业务”。

四、关于“火烧、炮轰李先念”的问题。李永红同志说：“李先念同志你有错误！”先念

同志说：“对的！有错误”。李永红同志说：“有些错误是严重的！”先念同志说：“对的！”李永红同志说：“我们要揭发、批判。”先念同志说：“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派工作组，错误多了，应该揭发、批判，欢迎你们揭发、批判”。

五、关于四月份工作安排问题。当李永红同志汇报到四月份要进一步揭发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时，先念同志说：“这次报上提得是很响的，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写得好！”

接着党组成员王念基同志汇报情况，主要是检查错误，当谈到陈明问题时，先念同志对总部代表说：“我批评了他们，那时我也有错误”，并问“陈明是什么人？”张如海同志介绍了陈明的情况，先念同志指出：“提出(陈明复职)的本身就是压制民主”。“为什么要急于给他平反，恢复工作？”当王念基同志谈到“革命造反团”时，先念同志说：“他们的大方向一直是正确的，包括商学院，“八八”战斗队，他们一直是正确的，我二月十七日的批评是错误的。”在王念基同志谈到王卓如的问题时，先念同志说：“事情也是发展的。”“王卓如有历史问题压着。我找你们和他一起来，讲支持左派的问题，是有意识让你也来，那时对王卓如已经有怀疑了。”“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意义之一，把这些(叛党)问题弄清楚了。”当王念基同志谈了党组的情况后说：“党组有同志提出可否吸收一、两个局长参加党组？”先念同志说：“现在为时过早吧！”

(二)汇报情况后李先念副总理的讲话

你们监督史立德搞业务，按总理说的，监督留用，停职留用，撤职留用，把他的材料送给你们。王卓如是搞不下去了。我们讨论这办法，报告总理，请总理批一下，也可能不批，他很忙。你们看怎么办？军事代表的办法，我也是提过这个意见。还得有个时间，先搞个临时党组，运动由你们来领导，临时党组抓业务，接受检查、批评，支持革命派。我们昨天几个人谈了一下，暂由王念基同志负责。看看你们是否同意？惠庆棋可以吧！还有梁耀，他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批判，还有叶树德。史立德还可以在党组听会，把他监督起来就是了。这样的意见可以不可以。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都可以，王卓如就不参加党组了，接受大家的揭发，批评，还要让他做点工作(李尧天同志说：做业务)，监督起来用，看造反派意见。

(李永红同志代表总部表示同意先念同志的这个意见)再请示一下总理。派军代表问题，我已经报告上去了。有两派，争执不下的，派军管。(这时，张如海同志提到“革命造反团”不解散，还有她的任务的问题)组织解散问题不能性急，水到渠成。要群众讲，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真正破私立公，相信群众会解决这个问题。(张如海同志针对先念同志的这个说法进一步说明说：革命造反团的继续存在是有她的历史任务的，是为了看一看总部，并不是“私”字。)大联合是要合乎原则的大联合。

党组，由王念基同志先代表起来。我们请示总理。(王念基：群众提出要王卓如停职反省)不停职，照样揭发、批判、斗争，并不妨碍揭发、批判、斗争。就确定由王念基同志代负责一下。以后五办开会，找王念基。你们党组的问题，我早已意识到了，上几次开会，找王卓如，也找王念基。我们主动搞，不好。这个问题明确一下，王念基为负责人。

其他问题，我没有意见，这是你们应有的权利(指工作安排)。大联合是有原则的大联合，这是康老的话，报上也讲了。我看你们的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是不是有缺点，你们自己解决，已经整了风了，还有什么问题，不断地自己整风，作自我批评。

革命的“三结合”，总理报告中讲过，我没有布置过。我们的干部在这次伟大的运动中(要审查)，群众，革命造反派同志，先提出意见，比我们主动提出要好。你们要主动做干部工作。二月十七日的讲话是错的，“红反团”，商学院的方向并没有错。夺权，他们也不知道夺什么权，只是讲了需要夺权的单位。主席讲了，会有连锁反应。造反派的夺权大方向是对的。因此，不能认为商业部的方向是错的。二月十九日、二十日我不在家，回来后听了情况，觉得不对，接连接见造反派，接见部长五次，讲坚决支持造反派。那个时期，我立场不明确，不是不明确立场是错了！“红反军”、“红反团”对我有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的错误也影

响其他部门。同志们要炮轰、火烧我，为什么不可以？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有时对了，有时又错了。(李永红：有的炮轰，有点打倒的意思)那也没有关系，不要绝对化，你们善意的批评，我诚诚恳恳地接受，真正帮助我们触动灵魂，不是善意的批评也不要紧。我犯了那么多错误，小将为什么不可以犯点错误。对我炮轰火烧都没有关系，这更触动我认识错误，触动灵魂，没有什么关系。

你们熟悉机关的情况，你们也要充分走群众路线。“结合”一个同志是要经过批评、斗争的，要真正做到血肉相连，不是口头上说几句，与左派真正血肉相连。不懂得这一条，就违背毛泽东思想。刚才王念基讲只是口头上支持，不是真支持。那不得了！(李尧天、梁耀说，与王卓如同舟共济)，要同左派同舟共济，怎么能同资产阶级同舟共济。同舟共济要看什么阶级立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三心两意。

“三结合”还要充分走群众路线。你们结合还没有开始，有的单位结合起来了，大多数同志同意，还有同志不同意，造反派对干部排个队，干部要多做自我批评。二月二十日，我的立场也未站好。同志们要炮轰、火烧，我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我认识错误，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有帮助。这么大的民主运动，我们过去就是框框条条。(王念基：我们对旧秩序很理解，很熟悉，很喜欢)党内外有别，是有点别，现在的问题，是对群众的批评是欢迎还是抵触，如果是抵触，正好中了刘邓反动路线的计。小将有革命闯劲，不能给泼冷水，要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

对你们的工作没有意见，有意见，电话告诉你们。对刘邓要大大搞一下，刘少奇是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戚本禹的文章相当好。有些事我知道，《清宫秘史》去年八、九月份批评时才知道，详细的也不清楚。昨天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有说服力，非常好。最后一段讲的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对待富农经济，抗战前夕号召人家叛变等等。过去我们知道一点点，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整个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整个反主席思想！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把党内的路线问题彻底解决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辉煌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伟大的国际意义。

我们的干部，想开了，若是刘邓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我们跟着走，国家就变颜色，成了修正主义，法西斯主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要么反对，就要杀头。当然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现在有人怨气，怨什么呢？要是杀了头，什么戴帽子、游街，都不行了，要戴高帽子，找不到脑袋。这么大的问题，这么大的胜利，我们确实犯了错误，受点批评，要我们站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是七亿人真正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样想一想，这样的批评完全是必要的。那么，戴帽子，是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那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华那篇文章是很好的。(王念基：一九四八年时“搬石头”，把干部都搬了)都是刘少奇在土地会议后搞的。这次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胜利还在进行。

同志们今天来，给你们解决一下党组的问题。写个报告给总理。史立德的问题，他写了个东西给我。这样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过去的组织部，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组织部。你们可以(将史立德的问题)查一下。业务还要让他抓，将功赎罪。这找他谈过一次业务。

夺权是两个阶级的决战，在这当中有点阻碍完全是可以预料到的。(王念基：“八八”队的同学要先念同志召集三次会的记录，我们整理了，如实反映一下。)那是二月二十日以后吧！那是支持左派，批评党组，对商业部党组批评的更严厉，可以给他们看，不要有抵触情绪。最近不想开更多的会了，运动造反派领导。我最近帮富春搞点业务，富春同志搞得多一点。今天上午讨论市场问题吧！(王念基：是的，我和史立德来参加了。)

(张如海同志这时批评李先念同志对待总社党组问题上犯有一保程宏毅，二保王卓如，三保史立德等严重错误，对待总社革命造反派旗帜不鲜明，支持不力等)张如海批评好，我也知道，有错误，你们批评对，三月八日你们为党组大字报有争论，当天晚上就会开，批评

了党组，大字报贴晚了。

你们大联合还积极做工作，李尧天是新红色造反团的？（答：是）大家要做工作，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大联合。（先念同志的秘书说：他们有同志给我来电话，说有的有历史问题，怎么办？）整风就是整顿思想，整顿组织，整顿作风，真正属于公安六条中讲的，就整顿组织。政治工作是不好作，你们要充分走群众路线。

（张如海同志问：你还检讨不检讨？）检讨，怎么不检讨！稿子送去审查，还不够。

党组就这么定了。王念基临时负责，王卓如不参加党组，再请示总理，但负责人肯定不行了。

（张如海：王念基同志说：军事代表请快一点派来！）据我知道，半个月内不行，还要训练一下，他们强调服从命令多，要把大民主和纪律性统一起来。你们的党组是不行了，造反派老批评我旗帜不鲜明。有的单位老是两派争论不休（李永红：我们基本上不打内战了）有的部还在打，个别部打得还挺尖锐的，针锋相对。比起工交口来，好些。

史立德我还要请示一下，但是一条，要他抓工作。（张如海：先念同志，咱们落实一下：你的意见就是王卓如不能参加党组了！）是的，由王念基暂时负责。有人提的吸收一、二个局长参加党组的问题以后考虑，再发展一下。“三结合”，现在要郑重了，我过去讲过错误的，说“三结合”，结错了个把不要紧。现在要郑重了。

（张如海同志批评王念基同志有私心杂念，不敢大胆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王念基：“那时，我是一心想维护王卓如。”李尧天：“他还给王卓如通风报信。”王念基：“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叶树德给我讲了，我回去对王卓如讲了，他当时表情很紧张，他说：这事太丑了，我要他彻底检查。”张如海：“你给他通了风，报了信，他的检查又怎样？”王念基：“不行！不行！”

先念同志最后说，同意你们把王卓如的问题进一步弄清，史立德的信也可以公布下，给我有二十多天了。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655. 戚本禹讲话 (1967年4月2日 中央音乐学院)

参加者：中央音乐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红岩兵团”、“北京公社”、中央乐团“井冈山”、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中国歌舞剧院“红旗”、文化部“机关联络站”等。

戚：（问乐团井冈山）《沙家浜》不错，为什么不演？据说演阿庆嫂不跟你们合作。

罗（文明）因为两派有冲突，我们是夺权派，他们不承认。

戚：他们不承认也可以去唱歌嘛，可以参加演出，应该公演。

黄（旭东）：观点不同不等于不能一块上课。（音院“战革会”）

戚：对！你们是和“毛泽东思想战斗一团”一码事的吧！《沙家浜》是谁作曲？

罗：是四、五个人，主要是罗忠镕，是专业作曲的。

戚：他是哪派？

罗：倾向我们，运动初期把他揪出来，说他搞了一批裴多菲俱乐部。

戚：他搞了改革，不错。为什么揪他？他什么出身？

罗：解放前是国民党音乐学院毕业的，是上海地下党的，解放后退党了。

戚：解放后表现如何？

罗：解放后写歌词发牢骚，对现实不满。

戚：是这样吗？五个人中看几个是好的？

罗：三个是倾向我们这派的，两个是倾向他们的。

戚：我不懂洋音乐，他洋音乐改得不错，这是个方向，为什么要给他揪出来？为什么这五个人都有问题？

罗：这五个人有四个人在运动中被压抑了。

戚：把他们五个人的名单给我写一下。“红岩”谁负责？(答：方昕)什么出身？(答：革干。)爸爸在哪儿？(答：在农业科学院。)是哪一派？(答：倾向“红色造反总部”。)“红旗”不错。(我是支持造反派的，我和他辩论。)

戚：你们这儿学钢琴的很多，学钢琴的目的是想当什么，当钢琴家，刘诗昆那样的得奖？还是给工人、农民弹琴？

“红岩”：刘诗昆是以前的“红专标兵”。

戚：这种标兵应该打倒。

“红岩”：对！我们坚决打倒。

戚：有一次我问过刘诗昆，听了你的东西是起来革命，还是消沉？是对社会主义有利，还是对资本主义有利？那些东西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

王：文化部夺权您了解吗？什么叫方向路线错误？“红岩”说我们1·19文化部夺权是方向路线错误。

戚：我对文化部夺权没否定，也没肯定。听说你们昨天武斗了，你们谁挨打？

(除忠元介绍在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挑起武斗的事)

戚：劫夫有语录歌，你们可以搜集起来，弹一弹，唱一唱，把所有的劫夫的语录歌连起来，录上音，送到我们那儿听听。

高：您可以看我们的演出。

戚：没有时间，你们有没有录音？可以借给我听听。

(继续介绍戏剧学院武斗过程。后“红岩”薛光宇发言略)

戚：不说这个了，你们两派的分歧是什么？

陈(忠元)(音院“战革会”)在去年十二月反黑风开始就有分歧。

戚：你们这儿分几派？

方(昕)：“红岩兵团”，“战斗团”，“北京公社”。北京的文艺界也分成两大派。

戚：你们为什么夺权(指“战革会”等夺文化部的权)？

战革会：主要是打击肖望东的经济主义。

方：1·19后文艺界分成两派，一直到现在。目前除了1·19以外，还在砸三旧方面存在分歧，现在不彻底砸三旧，别有用心的就要篡权，所以要掀起一个砸三旧的高潮，而他们(指“战革会”)认为现在不要砸三旧，说砸三旧是形“左”实右。(“战革会”：不是不要砸三旧，而是如何砸。)他们认为现在应该是大联合、大夺权。文艺界十七年没有执行革命路线，对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问题是真正的考验，前一段不一定所有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的都是造反派。(“战革会”：我们也是这么看的)

戚：三旧也是包括肖望东、赵辛初，他们也是旧的。(“战革会”、“红岩”：对！)你们这不是一致的吗？(黄旭东：不一致，我们斗肖，他们来冲会场，不让我们斗。)

戚：陈伯达讲了，不要讲这个“砸”字，说批判、打倒。

方：现在要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艺界掀起的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就是因为没有斗倒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赵飒在二月份贴出一个思想汇报，前一阶段还整一个普通党员的黑材料。(张建华：“红岩”赵飒还哼着《红灯记》的一段说：“要忍耐”。)戚：够不够三反分子？(答：够了，已经上报了)那你们批判他也没错。

方：(略)

戚：叶向真和彭宁是否差不多？

方：是！他们现在又勾结起来了，郭志鸿前天还说正在考虑和彭宁重新合作，他们与肖望东关系密切，陶铸封他左派，说有了他们就放心了。

戚：这倒不要紧，我以前也封给他们左派，彭宁过去我也认为他是左派，后来我发现他和肖望东勾勾搭搭，我在大会上批评了他。允许大家看法有改变，不要揪住不放，是否是左

派，不能做结论，有的同志过去造反，后来有变化，或者是两面派，以前我也和叶向真在一起，现在怎样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学表演的，政治上也是表演，第一幕演左派，第二幕演保守派，说不定第三幕是右派，整个表演过程中才能作出结论，也可能是第一次好，第二次不好，第三次又好了，要允许人家改正自己的观点。

方：到 1·18 以前，我们还是一个组织，到 1·19 夺权，文艺界很多人反对，说他们是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改良主义。(战革会：现在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夺权。)对！我们现在还这么看。11·5 那天晚上“战斗团”的一撮人把印抢走了。(“战革会”：方昕还带人去抢印。)

戚：你们(指“战革会”)夺了什么权？

方：他们坐小汽车。

陈：他们把小汽车藏到附中去了，还搞了一辆广播车。

戚：听说叶向真坐小汽车，我批评过她，她接受了。(方昕：略)

戚：简单点，主要讲观点，我一会还有一个会。

方：他们夺权后还把我们打成托派。

戚：行了，你们是不是有大联合的诚意？(“战革会”、“红岩”：有。)

陈：我们早就提出了要归口大联合，可是“红岩”说我们是阴谋。

戚：我看文化部两派都不要参与了，文化部的夺权还在研究，情况怎样还在调查，文化部好些单位自己去夺权，对文化部的夺权我现在还不认为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恐怕也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不管 1·14, 1·19 的问题了。文化部是国家机关，要三结合，你们现在都不要参加，都回来。(陈忠元：我们已撤回来了，“红岩”还去了一个小分队进驻文化部)你们这派(指“红岩”)也回来，其它事都不管了，很明显，去年夏天，有很多红卫兵是革命的，但到了冬天就成了“联动”，人是有变化的。现在文化部主要问题是一个电影问题，一个出版问题，一个对外联络，还有一个文博管理。电影问题我们委托劳式俊去搞，由他搞个领导班子，去了解电影界情况。艺术界问题正在了解，你们不要去了，也掌不了什么权，无非是搞个图章。应该肯定他们卡经济主义的事，这是对的。经济主义是他们向我反映的，对你们还要了解，还要考察，错误再大，这件事(按：卡经济主义)是做对的，中央是肯定的。为什么呢？我看到有很多人排队领钱，这件事要肯定，要一分为二，全部否定不好，至于别的事，我还要调查。我收到很多反映你们不好的，也有好的，我还要调查。现在夺了权也没什么，就回来吧！“联络站”(指文化部机关战斗组织联络站)应多做团结工作，不要分裂。当时你们反对“镇恶浪”这点是对的。

中戏“红旗”：砸“镇恶浪”、反经济主义，我们首先搞的，是我们十二号下午三点钟贴的封条，为这种事我还被游街。

戚：如果是你们封的，那也是对的。他们也反对(经济主义)，这也是对的。

中戏“红旗”：我们是十二号封的。

戚：我去的时候是十四号，那时候还在排队领钱。

中戏“红旗”：戚本禹同志您不了解情况。

文化部“联络站”：12 号是他们贴的封条，但没有真正卡住经济主义，在 15 号李琪还在批给“全艺造”五千元钱，18 号杨岩还批了条子。

戚：多少钱？

联络站：250 元，19 日夺权后把经济主义煞住了。

戚：他们封的也好，你们封得也对，你们谁也不要否认谁，不要考虑如何打架，要考虑如何联合起来。(热烈鼓掌)都鼓掌，恐怕不一定都欢迎。有联合的愿望吗？(黄旭东：我们早就联合了)你们有几件事是不是一致的？批判刘少奇(答：一致)批判邓小平(一致)批判陶铸(一致)批判肖望东(一致)(“战革会”：但是我们斗萧望东，他们冲会场，还挑起武斗。)

戚：武斗恐怕有坏人挑动，主要矛盾恐怕在这里，都想抓斗萧望东的旗帜。都有些私心

杂念。看你们这种情绪，恐怕是不太欢迎他们来斗。（“战革会”王振山：我们是欢迎他们来斗的，第一次我们给了他们 60 张票，被他们退了回来，他们不想参加我们的斗萧大会，还来冲我们的会场，我们斗了四次，他们冲了三次。）

戚：我想你们斗肖是一致的，会赞成的，你们斗肖时可能有点排斥他们。斗赵飒是不是一致？（答：一致）对叶向真、刘诗昆的问题可能不一致，各有各的看法。刘诗昆、叶向真的问题我不作结论，但不要因为这个把一派打倒。（“战革会”鼓掌）不要因为我的话对那一派有利就鼓掌，应该考虑如何排除各种因素，团结起来。刘诗昆、叶向真是什么人，是哪一派的，我现在在考察。戏剧学院有两派，要允许人家有个认识过程，有一个认识我的同志说，他的女儿在那里挨斗。我当然不支持，斗群众我是不赞成的，我还要去调查，即使这派同志看错了，也没什么，责任不在群众，而在他本人。如果对这两个人看不清楚，就要打倒一派，这不对。如果把他们打倒，那首先要把我打倒，因为我对一个问题也有认识过程。你们可以考察我，我也可以考察你们。不要因为给我写大字报而说是反对中央文革，我们不应该打倒一个奴隶主义，又提倡另一个奴隶主义。不能反对毛主席、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同志，如果反对他们，我们就要反对他，可依法处理，反对我们这些人，坚决不能把他当成反革命处理。

陈忠元：他们搞了一本刘诗昆罪行录，我们让他们公布，说要到关键时刻再公布。

戚：你们（指“红岩”）不要垄断材料，你们（指“战革会”）对刘诗昆也要调查一下。

东忠元：对，我们也在调查。

戚：为什么你们内部老打内战？

陈忠元：他们要在“战革会”中揪出赵燕侠式的人物。

戚：有这种人物也应该揪出来，这种人是三旧的代表。“北京公社”是反动组织吗？你们有错误没有？（“北社”的张云田、赵薇发言）……群众组织不要提什么反动路线。（注：当时很乱）

戚：好了，我认为他们不是反动组织，还允许他们革命。

方昕：我们认为逆流来自赵飒，他们说逆流来自“北社”。

于光（“战革会”）：我们认为逆流来自肖望东和文化部的政治部。

方：你们没贴一张陶铸、肖望东的大字报。

“战革会”：我们贴了很多大字报，你们不要当面造谣。

戚：好了，我一会儿还要开会，提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你们整风了吗？（“战革会”：我们整风了。“红岩”：你们是假整风。“战革会”：你们还不敢整风呢！）整风了也不一定整好，考虑一下，你们三个组织都要整顿，讨论一下形势，在这个形势面前，你们这个组织应该怎么办，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来对付。四月一日开始是个新的转折点，如果不能适应，再这么下去，就要垮台。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背而驰，就不能前进。你们旗帜不鲜明，举得不高，应考虑采取什么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才能跟上形势，枝节问题可以争论三天三夜，越争下去越不行，每个组织可以考虑采取什么方针来迎接目前的形势，音乐学院向何处去？你们现在所做的是否符合毛主席的整个战略部署？你们能符合这个大战役，这个战斗部署的话，就能起大作用，如果不能配合这个战役，搞了一些别的东西，你们就不能迎合形势，就脱离了整个斗争，越争论越不能适应要求。怎样迎合新的形势，任务是什么？如何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时，采取正确的战斗部署，希望你们考虑，你们能不能联合起来。

高貴义：我们希望马上联合起来。

戚：马上联合恐怕也不行，先讨论形势，各自发言，看谁符合毛泽东思想，看谁的旗帜举得高，谁就能发展壮大，搞个人主义，一时样子很厉害，最后还是不行！

656.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接见四川地区革命群众代表讲话 (1967 年 4 月 3 日 人民大会堂西厅)

中央首长：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杨成武、肖华、叶群等。

周总理：现在开大会，今天先由军分区、地委讲一下，讲完再讲。严重的可以插一两句，要尽快一点。

军分区那个同志讲：(汪宗清讲……)，(王府德讲……)，(沈学理讲……)

王力：(对姚文元)沈学理，革命干部三结合的对象呢？

周总理：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简短一点。

王力：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省委的材料都看了。

周总理：你好一点嘛，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讲的。

康生：你讲一下现在的情况，你总知道些嘛，你要亮相嘛。

姚文元：你是三结合对象嘛(冷笑)(对沈学理发言)

王力：三结合第一对象是他(冷笑)

杨成武：不亮相怎么结合？

姚文元：你在这里也可以亮相嘛(说着就笑起进里面去了)。

王力：你可以亮相嘛，对于李井泉这个黑帮你可以亮相嘛？

周总理：你讲些什么，你对四川省委，李井泉有什么意见，你说嘛，没有说的就算了。

牟海秀：……

周总理：过去的事简单一点，过去的案子我们都看了……

康生：你对李井泉有什么看法(牟海秀：接触的少……)

张春桥：你对他现在怎么看(牟海秀：根本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王志敏：……

王力：冲军区的问题我插一句。毛主席在最近一两天有一个指示：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进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区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请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下看得太严重了。

康生：(对王志敏)你讲了半天，而且要认罪，而且犯了严重错误，你犯了什么错误，你没有讲，要具体点，犯什么错误，抽象化。(王……)

王力：四川有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把毛主席批示再说一下(重复读一遍)

康生：我补充说明一下，这是中央向各地发的中央解决安徽问题，中央的批语是毛主席批的，是中央批的第二条。第二条是不得整群众，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反正是因为冲军分区或者对军区有不同的意见，或者对各地区、各单位，夺权有不同意见，而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逮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下面是毛主席批示就是刚才王力念的(念一遍)。(郑光华讲……)

康生：同志，你讲一讲 2 月 17 日以后，16 日以后，19 日中间到外地捉人，实行白色恐怖，你 32111 什么态度？

康生：你简单讲一讲，32111 参加抓人没有参加抓人，参加打人没有参加打人？

周总理：抓人 2 月 19 日以后参加了，打人呢？

(郑光华：抓人参加了，打人不清楚。)

周总理：参加抓人，抓了多少？

王力：2 月 19 日以后你不是在宜宾吗？军分区、公安局和 32111 抓了 5 人，你在那儿嘛。(郑光华：我不清楚)估计一下。

周总理：你不要讲了，(谢永福同志，高玉文同志讲话)(……)

周总理：省委的同志还有什么讲的，韦杰同志还有讲的吗？你讲几句。(韦杰……)(储彬同志讲)

周总理：你写给我有多少人？军队内部的，你代表他们来了，你休养一下，以后写出来，

以后还要提意见。韦杰同志你快结束吧！你要回答第一个问题。你在 1 月 29 日同时报总参、军委，同时派了一个团(是二个营)到宜宾军分区，说对劳改犯坚决镇压，实际上是先派后报，镇压革命群众，你根本忘记了，军人还不懂？宜宾的情况清楚了，先请陈伯达同志讲话。

陈伯达：我代表中央文革讲几句话，这次会议是毛主席指示召开的，毛主席看到了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送给他的宜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宜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猖狂的反扑，残酷斗争革命群众，这样的一份材料他指示应该加以处理，找各方面的代表来北京谈。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问题大体上是清楚了。

王府德、汪学清、牟海秀、沈学理，这些人的发言显然是不老实的，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一切牛鬼蛇神都暴露的，逃脱不了的。经过多年的斗争，刘结挺同志的案子，他和张西挺同志冤屈终于揭发出来了，提出了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将是揭开整个四川省阶级斗争的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将是揭开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重要序幕，我们认为同志们继续斗争，把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四川，插遍全西南，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有充分信心，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胜利必然属于毛泽东思想，属于无产阶级，属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一伙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是必败无疑的。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现在请杨总长，杨成武同志讲话。

杨成武：革命造反派的大干将们，你们讲了很多了，原成都军队的司令员，贺××60年死的，当时成都军分区没有司令员，当时林彪副主席提出从广州军分区福建军分区调一个拥护毛主席的好同志当司令员，当时受到李井泉和后台这个人坚决反对，邓小平也反对，另找一个司令员，就是黄新廷，成都军区，所谓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个情况，材料反映很多，活动也很多。我们看了很多材料，有从北京到成都串连的，有成都到北京串连的，过去邓小平、彭真这些人都到四川去活动，刘邓、彭真、罗瑞卿都到那里去串连活动，中央把它们盖子揭开的，刚才有的同志批评军区是很需要的，刚才说调到宜宾一个团(是二个营)飞机散发传单，都不报，空军司令不同意。

康生：同志们，我简单讲几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宜宾问题有关方面的人到北京，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说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宜宾问题是多么关心，同时，我们林副主席还研究了青海问题，以及其它军区的问题，也包括四川成都军区以及宜宾军分区的问题。我们大家一致坚持这个看法，毛主席 1 月 21 日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的事，毛主席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依靠解放军，第三要相信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此不管解放军某些少数人犯错误，或者是青海的赵××那样混入解放军的坏分子，无理制造镇压革命群众事件，但总是极少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可以信任的。

在这些问题中间，林副主席研究了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问题，认为中间有的做得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林副主席建议，支左问题提到中央讨论，毛主席批准，不久文件要发到各地。

我们的解放军能掌握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支持左派的伟大任务取得了胜利。

当然，支持左派问题犯了错误是可以理解的，容易改正的。希望解放军、广大群众理解，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有重大作用。

宜宾地区是典型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以毛主席为代

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从刘结挺的报告看到这个斗争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是从七人大会后，62年开始的，说早一点是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反党开始的，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尖锐。也反映四川斗争怎样复杂曲折，摆在前面很明显，我们不能说刘张没有缺点、问题，可是看到一个事实，坚决反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刘少奇，反对邓小平的被打成反革命，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当然军分区、地委讲了几句，重点要我们派工作组、调查组到宜宾调查，意见是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加上不痛不痒的话，四、五个人一致提出这个问题，调查我们过去调查过，现在还在作调查，但是有一点要承认，宜宾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还要调查什么？军分区没有讲，地委也没有讲，省委一句话也不提。

我们希望军分区、地委、省委，首先要解决什么问题，首先要解决大方向问题，到底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明显，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白色恐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清楚，今天不用再调查，可以做结论。

当然革命组织有没有错误，你们自己也要作检查，对解放军，骂解放军，你们不能因为他们犯错误，你们就这样，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把广大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关于刘结挺、张西挺他们的问题，开除党籍是经原中央监委讨论了，由邓小平、彭真、杨尚昆讨论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中央要恢复他们的党籍，并且要成文件，开除党籍时没有文件传达到县委，在宜宾要传达到全体党员。

这是可以看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显然一时可以使一些同志受迫害，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获得彻底胜利，从宜宾可以看出。

周总理：谢副总理讲一讲，解放四川才能解放大西南，讲一讲嘛。告诉同志们、全军增加他一个职务，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

周总理：同志们，结束关于宜宾问题三天的会，当然，不是很全面的结束，要从宜宾突破到整个四川，先把四月一日中央文件念给大家。

(念文件)

周总理：四川问题军委还要根据林副主席的提议，宣布十条命令，从对的，错的经验中得出东西，加以总结。解放军中一部分人犯了错误，群众也有错误，比如：冲军区什么，把负责人拉出来弯腰跪着，这是不对的，对坏分子也不这样。比如说：八条命令中央2月21日附了五条，转发了。即使对三反分子也不搞体罚，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同志早就说过，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所以冲军区把领导人拉出来跪，低头认罪，甚至戴高帽，挂黑牌，讲解解放军是“保皇兵”，黑司令是军区，不对！这中央文件给你们，要好好宣传，学习。你们大方向是对的，要改正错误，有错就自我批评，造反派要自我批评，保守派要认清立场错了，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还有根据中央那五条，许多事成都军区要及时处理，不能再捕一个人了，不能再取缔一个群众组织了，违背的，被抓的人要保证健康，成都军区要保证，新的司令员已介绍过一次梁兴初同志，请他监督办好，放出来，健康不好就更不好了。捕人的事确实数目很大，单在成都抓二万多人，宜宾也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不是讲前门进后门出嘛！空军学校就抓了好多人，这是不允许的，现在有的人说有问题，还再三要迫害的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坚持斗争是好的。

这个口头通知可以在当地同志中宣读，以后有文件……。今天会就到这里。

657.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接见大专院校 和中等学校革命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3日 人大会堂)

周总理、陈伯达、谢富治、江青、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了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部分革命派代表，作了重要指示。

江青：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嘛，不是支持右派嘛，左派组织都让解放军解散了还支持谁？这样不支持右派也支持了中间派，各学校内如果有许许多多的组织，当然联合不起来，但有几个大的左派组织，那就不能解散，要依靠发展他们。军训的同志要明确地表示支持左派，现在事实证明，把左派搞掉了，首先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解散了怎么支持左派呢？

(康生看了李钟奇三月二十七日对部分学校老红卫兵(“联动”)讲话后非常气愤)

康生：如果整理的讲话记录是准确的，不是有人造谣的话，李钟奇三月二十七日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在这个讲话中不谈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谈两条路线斗争，不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邓反动路线的斗争，完全是“联动”观点。什么“你们在座的都是高干子弟，干部子弟(除了爸爸妈妈都有问题的)你们的爸爸妈妈在红军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设时期有很大贡献，你们要支持他们的精神”。通篇是在摆他们父母的功，完全是“联动”的，什么竟说出“联动”犯错误的根源是想不通，你站到那个立场上？开玩笑。你们(指造反派)要带头干，不管谁说你们，你们不要怕，解放军要多看造反派的长处，可是李钟奇却说“造反派能革命一天，老红卫兵就不要瞧不起人家。”这是什么话。

李钟奇同志你如果认为这讲话是假的，就应该公开登报辟谣，哪句话哪句话没有讲，要不然这讲话是你讲的。这个讲话是“联动”的代表作，现在“联动”又活动起来了(指颐和园和八宝山)为什么他们老不解散？就是党内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他们，(李钟奇、傅崇碧不同意，起身辩解。)

江青、伯达：不要辩护了，叫你们支持左派。

康生、总理：你却支持“联动”，什么立场啊，好好听听大家的意见。

江青：我这几天正在担忧，好多天不见你们了，最近和谢富治同志谈过一次还是不放心，才今天来找你，果然今天这种鬼事发生了，我们在这一时期没有了解中学情况是有责任的，没有开会，也没听取大家的意见，记者汇报了一些，有点感觉，但由于忙于别的事情，拖下来，没有准确地听你们的意见，北京卫戍区在基本问题上是跟中央文革的，但有些事情不理解，这是可以克服的，更大责任在中央文革，但是中央文革没有让他们支持“联动”，左派队伍和首都兵团、红旗兵团不能垮，垮了“联动”就起来了，北京卫戍区在许多地方是和中央文革配合的，但有许多作法是不妥当的，卫戍区的同志要虚心听取小将的意见，要提出问题改进工作，要把左派组织恢复起来，壮大起来，大联合哪能不以左派为核心呢？

谢富治：后来发生许多事情，我告诉了卫戍区，没抓紧，我有很大错误，就是没有及时检查。中央文革没责任，我有错误。

江青：关于复课闹革命，你不复课，他不到学校，怎么革命，不到学校怎么斗批改，大家都到家里去，运动怎么搞？

谢富治：要把“联动”搞垮，必要时军训停下来为左派服务。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这样干不行，这怎么叫支持左派？“联动”这样嚣张，不象话了。(指左派)都不要解散。

周总理：大学、中学红代会各出两人，中央文革出一人，解决这个问题。(指解散组织)否则我就亲自出马了。

左派红卫兵哪有选举的？！(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哈哈大笑)

东城某部军训首长说：首先是班级大联合……

周总理：什么首先是班级大联合？首先是革命的大联合，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文元：搞目前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和以后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不一样，

前者是临时的权力机构，后者是群众性的常设组织，前者不能用巴黎公社选举方法产生，后者才能用巴黎公社选举方法产生，搞临时“三结合”，要由群众中产生的左派和革命干部、解放军结合。

陈伯达：(总结)我来说几句，征得李钟奇、傅崇碧同志同意，第一条，军训不能干涉，不能阻碍学生群众文化革命运动，大联合绝不能同解散等同起来，班级实现大联合，必须是逐步的，要有条件的，这就是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要逐步形成，太急了不行，联合只能自愿，不能强迫，搞联合更不能强迫解散革命群众组织，这是第一条。军训中搞三结合，大联合必须由左派为主体，(江青补充，必须由左派领导，左派在有些地方是弱小的，单薄的，必须让他们领导，才能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抗战时期，我们的力量不是也很小吗？但是必须由我们来领导。)(康生插话：学校里必须由左派掌权，然后运用权力搞全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镇压打、砸、抢分子)第二条，学习毛主席著作，哪一篇都可以学，不能只限制在一个范围内，有人读《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有什么不好呢？我看很好嘛，高兴读多少就读多少，军训时间不可再多，主席一贯不主张太多，一般三小时，最多不超过四小时，以利准备斗批改。第三条，在军训时间应该定期总结经验，可以从几个方面，从军队方面来总结，从学生方面来总结。

江青：最近中央决定播送林彪同志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今天在座的同志的问题，林副统帅都能够满意的答复。

658. 李富春接见团中央革命造反军团、《中国青年报》部分组织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4月3日 中南海小会议室)

参加人：团中央“革命造反军团”代表魏章玲、赵毓忱、周甘牛、曹小兵、鲁恩亮。

中国青年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丁钢、舒野、张伯树、谈成义、刘贵中。

中国青年报文革筹委会和“革命造反兵团”代表魏淑侠、徐余、田洪浩、杨甫绵、邱文仲、华韬、曹世忠。

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二人，清华“井冈山”代表一人。

富春同志：今天座谈嘛！枝节问题不谈，谈大的问题。向小将们学习。主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团报的兵团问题。团中央机关“革命造反团”在大的问题上的看法，青年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对兵团的看法。在大的问题上谈一谈，枝节问题不必谈。第二个问题，谈谈团中央机关和直属机关如何进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团中央“革命造反军团”有他们自己的看法，报社“兵团”有自己的看法，“星火燎原”总部也有自己的看法，三方面可以座谈。今天还有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参加，也可以发表意见。谈两个问题好不好？

(学习最高指示)

学习了最高指示，要摆事实，讲道理，听完别人的话再发言，平心静气来讨论，别人说话时不要插话，有充分时间，有充分理由说明问题。(“兵团”代表杨甫绵马上发言，要谈对团中央机关“三结合”辩论的意见。魏章玲建议按富春同志意见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再解决第二个问题。上星期六“兵团”代表单独汇报了三个小时，建议今天让“星火燎原”同志先讲)。

富春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见，先让“星火燎原”同志讲。

(舒野代表“星火燎原”发言之后)

富春同志：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第一，为什么说，从组织上“兵团”不是造反派？第二，刘庆芳这些人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还搞不清楚。“星火燎原”同志怎么看？

(舒野回答后)

富春同志：你们八、九月份是一起战斗的，十月份分开的。

(丁钢控诉时说到：你们斗了我，给我戴了高帽子游街，我对你们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不怪你们，你们是上了人家的当。我们还是阶级弟兄……)

富春同志：你的态度好。

(当丁钢谈到：你们给富春同志贴大字报“炮轰李富春”都行，不是反革命。我给你们筹委会提点意见，贴点大字报，就成了反革命？！)

富春同志：贴我的大字报没有问题。

(当丁钢谈到：报社有人说要树立魏淑侠的绝对权威……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们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当印刷厂工人刘贵中谈到“他们说我躺在床上吃老本”时)

富春同志：象我们这样的老干部才是吃老本，你们群众吃什么老本呢？！(当刘贵中谈到我准备斗、批、走时)

富春同志：你应该斗批改，不应该斗批走。(刘贵中说：我是说，有了斗批走的精神，才敢跟他们斗。)富春同志说：还是斗批改。要有斗批改的精神，才能不斗批走。(周甘牛发言后)

富春同志：造反兵团要解释事实，要有自我批评精神。

(当杨甫绵指责团中央机关目前不是搞革命的“三结合”，而是搞不革命的“三凑合”时)

富春同志：团中央现在还没有实现“三结合”嘛！

(杨甫绵谈到团中央“三结合”辩论时说：领导干部亮相，应当是检查自己错误，而不是互相吹捧，甚至毛遂自荐)

富春同志：这是王道义讲的，毛遂自荐也可以。

(曹世忠问“军团”代表“胡耀邦抛出个‘申诉’，你们为什么不斗他”时)富春同志：团中央的简报一、二、三期是揭发胡耀邦的。(华韬认为，团报“保”字号组织在“军团”的扶植下，又死灰复燃了。)富春同志：你说“星火燎原”是“保”字号组织，“保”在什么地方？(华韬同志没有回答)(丁钢提议把团报两派的争论，拿到群众中去辩论)富春同志：同意丁钢同志的建议，到群众中去辩论。(“军团”与“星火燎原”代表鼓掌)。最后，富春同志说，保不保，造反不造反，不是上面封的，要靠自己的行动。

今晚时间不早了，回去继续辩论。真理在自己手里，不怕辩论，真理愈辩愈明，同时可以教育大家，提高自己。主张辩论，双方轮流主持。三天五天都可以，我派人去参加。(大家鼓掌)我有官僚主义，以前对团报情况不了解，听了三次费了很大力，今天才听到一点眉目，看来问题是很复杂的，要由你们去辩论，我派人去参加。

要辩论，大家要冷静，摆事实、讲道理，象刚才那十分钟，你插一句，我插一句，这样辩论不成功。你们不是军事接管单位，就是军管，也要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保证更好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放手进行“四大”。

犯了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都只能用整风的方法解决，整思想、整作风、整组织、整方法，而不是我要把你挤倒，你要把我挤倒。

辩论中，大家要抓住当前形势。中央《人民日报》社论对清华调查的报告，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把这个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提高到新阶段，更深入、更系统了。你们的眼光要看到全国，看到全局，看到全国的整个文化革命的大

好形势，看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绝对胜利。在新阶段中，更要站稳立场，发动群众系统地来批判反动路线，系统地批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来说，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邓、陶，中央各部或多或少还有。二胡就是团中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方面团中央机关对胡耀邦进行了系统地批判，但是还不够，要深入。对胡克实批了，还不系统。你们团报刘庆芳、孙轶青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是修正主义分子？能不能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能不能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如果是，你们要把矛头指向他们。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经辩论后，把矛头针对他们，向他们开火。对他们我还不清楚，你们比我清楚，究竟是保还是革，不向这些人开火，看不出来。不斗他们，你们两派斗来斗去，放过了他们，文化大革命就要夭折。

两派辩论，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你批我，我批你，还不够，还要自我批评。然后能不能合起来，把矛头指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指向严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矛头指向他们，才能看出谁革谁保。在全国新形势下，要适应。经辩论搞清是非，该批判的批，该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看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付批判刘庆芳、余世光。

你们任务很艰巨，首先用整风的方法来辩论，弄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把刘、余(秘书插话：孙轶青)问题搞清楚，才能与全国形势与新阶段相适应。

你们谁保谁革，不光在辩论中看，还要在斗争中看。我不能作结论，相信你们和你们代表的群众会作结论。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谁执行十六条，谁真正批判反动路线，谁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就是革命的。

辩论的主要问题，你们很清楚。时间问题由你们定，第一次先由造反兵团主持，欢迎红代会、“军团”同志参加。主持会议要大公无私，来不得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要耐心，今天我比你们耐心，耐心听取不同意见，听反对意见，这是毛主席的教导嘛！

就这样好吧，你们辩论后，把矛头指向孙轶青、刘庆芳、余世光，走向运动的轨道。不要怕，坚持真理，也要有点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系统地批判，才能教育群众，提高自己，真金不怕火烧。自己要认为大方向是正确的就不怕有缺点有错误，大胆欢迎揭露批评，青年人犯错误是难免的，犯了就改，青年人犯了错误可以原谅，老年人犯错误就不能原谅。

有些问题我不作结论，依靠你们，依靠群众，自己作结论，我要多听听情况，再作点调查，我才有发言权，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发言权。

关于团中央机关“三结合”问题，也不怕不同意见，允许不同意见，我们在考虑，现在还未成熟嘛，成熟了，也要报中央，中央还要批准。

希望你们辩论，不是吵架式的，真正摆事实，讲道理，吵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有宗派情绪，也不能解决问题。

什么时间辩论，怎么辩论，回去商量一下，迟几天也不要紧，你们先试一试。什么时间辩论，打电话来，我派人去。

659. 谢富治在卫戍区召开的军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4月3日)

北京市抽了大批干部，在傅崇碧同志领导下，工作做得比较好。当然这是新工作，还要碰到新问题。在毛主席英明领导及中央文革领导下，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政权问题是根本问题。资本主义复辟他也要政权。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夺权阶段，争夺政权斗争很激烈，出现了假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搞合二而一的新花招。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依靠人民、革命的干部、解放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基础上，在毛主席领导下，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解放军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

是革命化的队伍，是可靠的专政工具，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紧张的夺权斗争中担负着重要任务，支左、支工、支农，无论在那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执行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表现的非常复杂尖锐。支工、支农，总的看来是好的。但也有许多经验教训，支左支右了，主要教训就在这里。支工、支农单纯些，但和支左有联系，最困难。有的地方支右了，有的还不是简单的支右，而是打击了左派，进行了镇压，有的支右对左派损害不大，有的损害很大，特别情况下镇压了左派，使左派力量很快消弱，把左派头头抓起来了，其中包括北大、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他们是有名的左派，抓了他们那就是犯罪行为，那就帮助了刘邓反动路线。支左出了问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认识问题，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是左派，主观上是支左，结果是支了右，这种情况是比较的，改过来问题不大。这要很好进行调查研究。第二种是立场问题，他从主观上就是要支右。思想上倾向右，这点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讲话中讲过，有的人受老婆、孩子观点的影响，有的人是常委，是地委或兼地委书记，他们的孩子是那个地方的保守派，或者老婆是那里的当权派之一。这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根本问题是要看在思想上是否站在毛主席一边，还是站到刘邓路线一边，这是根本问题。要是站到刘邓的反动路线一边，对革命群众大部分是采取镇压的办法，都属于立场问题，否则那就不会镇压群众。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党就是相信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相信群众就是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支左，支右了，多数是属于认识问题，少数个别的属于立场问题。

有些我们是受修正主义影响，党团员多的，干部多的守法，往往比较保守。阶级路线最大的是方向问题，这是阶级路线，如果脱离了文化大革命不讲大方向，光看个人的阶级出身不行。在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初期勇敢分子多，现在首先出来的是贫雇农。革命派也有点勇敢分子，有毛病可以改造，整个组织是造反的嘛，下面新生力量起来了嘛，单纯从某个时期斗争方向看，不从大方向看，就要犯错误。甚至有的从冲解放军来看，冲了的就是右派，有的没冲就成了左派。这要看是左派冲，还是右派冲，中南海冲了七八次，几万人也没说什么派，为什么解放军不可以冲啊！他冲他还是信任你们的，知道你们不开枪。所以不能看冲了解放军就是右派，不冲就是左派。毛主席讲过，左派冲我们欢迎，右派冲就是暴露。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斗还是保，这是最根本的。

如何发现左派，要调查研究，看不准时间要长点，要慎重，调查后要表态，要在厂内调查，厂外也要调查，这很重要，要向中央文革调查，要查历史，要走各派的群众路线，厂外调查很重要，要到大学到中学，主要是大学，他们到过工厂，可找他们座谈，当然他们也有支持几派的，一个学校有的支持左派，也有的支持保守派，意见也有分歧，要多到几个学校去调查，看他们根据是什么？有的调查几个月也作不了结论，如“915”，“616”现在还难下结论，这也是少数，是特殊情况。没有毛主席思想挂帅，是做不好调查的，包产到户，也是作了调查的。结果跟着富裕中农跑了。识别左派后，就要支持左派，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帮助他们。要帮助克服缺点，壮大队伍，有的好几派都是左派，这要让他们合作。有左派，有保守派，要壮大左派队伍。对保守派也不要一下子打倒，不能砸烂，要他们向左派靠拢，向左派看齐。没有上级批准不能宣布是反动组织，对反动组织是瓦解，不能采取简单方法打倒，不能有我就没你，有你没我。革命派主要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使保守派向左派发展。

在左派没有占优势时，不要搞大联合，这样就把左派给吃掉了。搞大联合，如一千人的工厂，左派达七百人至八百人，或领导上占优势，这一条很重要。支持左派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支持，不要简单作决定，要调查，要多请示，要交换意见，不好决定的要多请示，多报告，一下子看不准，时间要长些，看清楚了要早表态，这样做对左派有好处，队伍会很快的壮大起来。

这次军管与四九年不同，不能恢复旧秩序，造反精神不要管掉了，要搞好四大，怎样才真正抓了革命，促了生产，怎样放手发动群众，同志们讨论一下。三结合要充分准备，不能

搞复辟的三结合，和平的三结合，调和的三结合。要等左派占了优势，干部要先经过生产班子的考验，看他们是不是站在毛主席一边，是不是真正改了毛病，三结合要稳一点，不要急搞，先搞些典型。

660.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 三十多所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代表讲话 (1967年4月4日晚在人大会堂)

周总理说：军训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是方式、方法问题，有包办代替的现象，在大联合问题上有缺点，有急躁情绪。

有人说：军训的问题是：

1. 解放军去了后，没很好支持左派，一些左派组织被解散了。
2. 学习毛主席著作，离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3. 打击“联动”，分化瓦解“联动”的工作不够。

4. 卫戍区司令部副司令李钟奇曾召开参加“联动”学生座谈会，动员他们回到革命立场上，但是说话有很多错误，使“联动”分子猖狂起来了。

蒯大富讲：中学生对复课闹革命不理解，我也不理解。

江青同志说：不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斗批改怎么搞？

总理：军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联动”实行分化瓦解工作，解放军一个任务是支持左派，要把“联动”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搞垮。

康生：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解散了就不是支左，而是支持中间派甚至右派了。

总理：中学红代会推选出一两个人，大学红代会抽两个人，一定要把“联动”搞垮，在北京“联动”都搞不垮还行？再不抓，我就去抓。

江青：支持“联动”是立场问题。“联动”是个反革命组织。大联合首先是革命派的大联合。(江青批评李钟奇)，在和参加“联动”分子讲话时，讲的片面。他(李)说：你们(指联动分子)的父母是为革命作了工作的，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你们回到毛主席方面，这是缺乏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不讲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大讲其父母立下汗马功劳，这是不对的。

康生：李钟奇说：“恨铁不成钢”是没有阶级斗争观念。

江青：出了这些问题，中央文革也有一定责任，没有常开这样的座谈会，卫戍区还是好的，是紧跟毛主席的。有些问题是属于认识问题，不要造成对立。军队有立场问题，也是可以改正的，有责任，中央文革也有责任。没有及时和大家交换意见。我们早就说过，不能解散左派组织，红色造反者联络站第九分站，是不好的，领导人有问题。

有单位提出炮轰周总理要抓起来。

总理说：不要抓，炮轰我不要抓，看怎么个炮轰法。

卫戍区司令部人说：卫戍司令部也可以轰。

有人说：王力同志在广播事业局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

王力：我没那么讲。

军区某政委检讨有错误，主席著作学得不好……

陈伯达：江青同志表示欢迎。

伯达：军训不能干涉，妨碍文化大革命，不能包办代替。大联合不能解散左派组织。班级的联合要逐步做，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性急。联合是自愿的，不能强迫，更不能强迫解散，只要不是反革命组织就不要解散。

总理：要保持左派的优势。

江青：保持左派的领导权。左派是少数，更应该有领导权，要保护左派。

伯达：学习毛著，学那一篇不要受限制，那一篇都可以学。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很好。但有人利用学这篇压制群众。军训时间不要太多，有的七小时甚至八小时。建议每天三小时，最多不超过四小时。

江青：主席从来不主张时间长，军训要总结经验。“联动”问题是刘邓路线在中学中的流毒，大学中也有。林彪同志最近有个讲话，准备在大学、中学的红卫兵中放录音。现在正在复制录音，可以解决问题。

江青：

要学毛著，集中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这本书出版三十年了。要结合 22 年(从 45 年到现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来批判，要专心专意地系统地批判，这是头等大事，这也是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过程。他们搞了后十条，毛主席就搞二十三条。要从各个不同角度来批判，而方向还是一致的。我想再谈点小意见供同学们参考：我个人考虑，重点批判应是刘邓路线，这样才能上纲。不要说远了，说远了刘少奇两次被捕。就从 45 年开始，就从各战线上都有他的一条路线，同时也都有毛主席路线与他作战，因此才能有这样的胜利，才有这样辉煌的战迹。

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出现了批判的高潮，深入地批判要你们多做文章，各战线上都有，其他方面是否要批判，你们比我们知道得多。你们可能提得更多。因为人多，要把斗争锋芒集中，重点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的不要超过这个主要的。农大说的是特殊情况，驻农口各部学生若从农口退出，农口左派要垮，这样对左派不利，你们要打开缺口。

对谭震林我们决不保他的错误，你们要打开局面。我们不知道他有很恶劣的东西，保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了解得怎么样，我们是保大局不是保他的错误，农大“东方红”不应退出来(周总理插话：还有农业机械化学院在农口，八机部发生武斗，赵靖远是碰死的，法医检查确实是碰死的。陈正人有责任，关心不够，不要武斗。)对敌人也不要武斗，要说理，摆事实讲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把左派壮大起来，使他们左派不被冲垮。

外面人被扣不要太着急，坐几天牢也是锻炼。总理写条，会解决的，只要不搞死。(总理插话：军委明天要发十条命令)这对你们是锻炼，今后会更好些，是坏事，坐牢了，但可以变为好事。

重点问题是刘邓路线，要深入地细致地批判，这样才能比较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每个时期主席都有文章纠正其错误路线，这样会有兴趣，刘邓路线农口不少，左派垮了就不好了，对保守派要通过批判瓦解他们，争取大多数，我建议你们讨论一下。

周恩来：

最近政府各部中，农口管得更少，为什么别的系统都没有结合，而农口我只谈了一次就结合了，那么容易我有怀疑。(康老：农口贺致平都结合了。)1月 7 日农大、农机到中南海，以前好多次谈话，从来没谈到这个问题。那天中南海五个部门都围起来了。参杂着农垦，新疆来的我劝告他们，让他们到人民大会堂去了，到人民大会堂后我讲了话，江青同志也讲了话。后来还有三四百人不走。戚本禹同志又在政协礼堂讲了话，事实证明可以劝得通，农口又开了，农口夺权在 1 月 17—18 日左右在三礼堂开了两次会。市委七次夺权都没夺下来，经验不足是吧。从上海一月风暴到今天，五个省已夺了权，今天北京等待谢副总理搞夺权，需要一个过程，北京搞夺权已两个月了。摸了经验是先搞各代表会，工代会是象红代会那样搞的，中学红代会是选出来的，不会十全十美，机关造反派代表会议没有开，农村贫下中农代表会开了。成立各派革命造反派代表会应争取革命群众起来搞。夺权斗争这么费劲，中央各部，大多数是学生冲击起来的，那时“三结合”我没批准，也没反对。实际上干部并没有真正亮相，……中央各部不是铁板一块(江青插话：哪儿有革命的，就有反革命的)中央各部可能起连锁反映，权不能下放。本来想快点，到四月。现在看来要到五月了，才有眉目，明年 2 、3、4 月才有结果。

有些部门主席批准军事接管，还没抓好，我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对照主席革命路线彻底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线。各时期对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讲一讲形势，你们可以结合学校情况批一批吧。各个角度都可提出问题来。不要先打倒，应当批吧，批的结果再看是否打倒，这对每个人的思想上也是个肃清剂，把刘邓路线所沾染的东西清除掉。批判刘邓路线，对照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而且应当上纲，集中力量合理分工，统一布置一下，天天忙乱不行！（江青插话：现在是忙的忙，闲的闲）开始有 1、2、3% 就不错了，先进思想是逐渐扩大的。

外面被捕了人的问题，你们把确实的地点、消息上报，中央文革小组给你们办，不要急。中央五点指示、中央十条命令不能再扣，不准损害健康，多等几天也有好处，可多锻炼几天。

你们要到外地去，原则上不让去，需要的地方批准去，与红代会商量一下。（江青插话：联动问题，不要把他看得太大，人就那么多。他们清明去八宝山，你们不要去，他们小丑跳梁。建议你们不要去吧。还是搞光明磊落的政治斗争。（陈伯达插话：可以派少数人去观察。）我们不要纪念，这是封建的。你们不要去吧。由卫戍区、公安部门派一些人去看看。

康生：

关于语录本 204 页，思想意识修养是刘少奇的语言，不通！思想意识是两种不同概念，意识是人脑子对客观的反映，包括感性和理性认识。思想这是对社会的反映，知觉包括理性认识也包括思想。但不等于两个概念可以混合，主席著作从来没出现问题。编时用这个语言，现在改为“纠正错误思想”。语录本 208 页中从“刘少奇（大笑）”请示主席同意去掉，新版会改的。不是修养吗？越养越修。

陈伯达：

刚才江青同志说批判刘邓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相当长时间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潮在工作上、在各个方面有影响有作用，同样在教学方面，在学校斗批改有影响有作用，不批刘邓路线，斗批改也搞不好。江青讲话讲得好，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批判的学说，毛泽东思想也是革命批判的学说，是在革命斗争中批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现在文化革命中使我们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为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文化革命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四旧，中心代表就是刘邓，在批判中，我们可以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对照毛泽东思想，刘邓路线，你们创造对照例子，搞成文章，搞成系统的批判。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批判它，不断提高自己，批判它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不断提高自己，把斗批改和这个问题联系起来，现在已开个头了，戚本禹文章起了很大作用。街上大字报说得好得很。如果按刘邓去做那么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主席在重庆时，他搞红色买办，红色是虚，买办是实。土改中他搞得都是带根本性的错误，土改不彻底的，和平土改也是他的发明创造，天津有个富农在土改时只分了他的田，没分他的房子，他有 24 间房，出租了二十间。这样，这个富农还可以不劳动，还可以腐蚀干部。

刘少奇反对合作化，他认为，一个农民有三匹马，一具犁，一头驴才有合作化的基础，不然就不行。刘在天津说：欢迎剥削。他到天津没给毛主席打招呼。七届一中全会（五七年）批一个地方搞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与他的路线有关。

刘少奇说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现在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的，他提出红色买办。按他的办法中国走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的，只会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也可能成为独立的国家，要无产阶级来领导就需要堵塞这条路，这是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摊牌了。这方面有很丰富的材料。

到农村去可发现和平土改到现在还有影响。实际上你们说农口复辟，跟他不是没有关系的。

斗争跟批判不能分开，要团结大多数。

661.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关锋接见农大“东方红”谈话摘要 (1967年4月4日)

(农大“东方红”向总理汇报农口的问题)

农大“东方红”: 总理, 你不是说农林口还没摸清楚, 正在调查吗? 现在调查清楚了吗?

总理: 清楚了, 刚才我和农大同学说了, 过几天我要接见农口的。

农大“东方红”: 农口各部保守派要利用二月二十日中央文件把我们赶出来, 不给我们饭吃。

总理: 有那几个部?

农大“东方红”? 农政、农办、农垦部。

总理: 农业部呢?

农大“东方红”: 也是的, 现在农办都打昏了人送到医院, 他们利用了二月二十日文件压我们。

总理: (你们)可以例外嘛!

(农大“东方红”又问关锋)

农大“东方红”: 农口保字号传出来谭震林当选中央常委, 他的检查中央通过了。

关锋: 没有, 谁说的?

农大“东方红”: 是农口的保守派。

关锋: 是谣言, 是造谣。

农大“东方红”: 刚才我们给您写过条子, 谭震林把造反派抓到监狱后, 没放出来, 给群众压力很大。

关锋: 我看见你们的条。

农大“东方红”: 农垦部的没放出来。

关锋: 你们要注意农口阶级斗争很复杂, 反谭会混有坏人的。

(农大负责人冯兴汪汇报了农大及农口情况后)

总理看了农业部送来的材料, 说: “很好。”

江青: 农口主要左派组织是那些?

(冯兴汪回答后)

江青: 现在运动中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从1945年开始, 那时和平民主新阶段, 刘少奇从那时开始就提出一整套与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 通过斗争,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胜利, 要批判东西很多, 特别是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 批判刘少奇出现新高潮, 最近还要出一篇更有力的文章进一步深入下去。你们处于第一线, 了解情况比我们多, 材料这样多, 你们应集中锋芒, 火力, 批倒批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刚才农大“东方红”反映情况很重要, 你们农大“东方红”同学要坚定不移支持农口革命左派, 别人赶你们走, 你们不要走。要坚持。可以组织短小精悍小分队去支持左派, 其他各口也可以去支持。前段我们曾经出面保了谭震林, 但并不是保他的错。他现在把农口搞成这样, 你们不应该退出来, 应该跟上去。我和总理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恶劣东西, 以前对他的东西掌握不多, 现在斗争正在深入, 你们现在不能撤走。农大“东方红”要担负主要责任, 听说农机、劳大、师大有人在农口, 很好。我劝你们不要搞武斗, 要摆事实, 讲道理, 说服别人,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你们力量不够, 其他单位要轮流支援。总之不能使农口各部左派力量垮下去, 因为他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听说抓去了几个人没什么了不起, 坐几天监狱, 受点锻炼, 目前你们有人在外被抓, 你们不要着急, 最近中央军委要发布十条命令, 现在农口是特殊问题。左派垮了就不好了。农口关系很大, 是关系到全国农村问题, 所以你们一定要很好地支持农口革命左派。

陈伯达: 我同意这个意见, 希望你们很好地支持农口革命左派。

总理：刚才江青同志讲了，农大“东方红”汇报了情况，请大家注意。以前我没有很好地注意。二月中旬各口搞三结合夺权，当时我很怀疑，为什么农林口那么容易？过去很落后，夺权却走在别人前面，问题很复杂。后来我想农大“东方红”一月七日去冲中南海为什么搞得那么紧张，把五个门围起来，我感到有点问题，但当时几个问题混杂在一起，所以把你们叫到人大会堂批评了你们。从你们坐着不走，我感到问题很严重，所以来戚本禹在政协礼堂接见了你们，但过了不久，我召集农口各单位开会，有农大参加没有？（答：没有）他们说他们夺权了，当时我想从各方面摸索经验，对他们的夺权我并没有表示批准，也没有表示反对，既然他们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并且干部亮相也不好，所以我并没明确表示态度。最近我准备找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起谈，在会上要把造反派的气鼓起来，一定要使权落到革命派手中，农林口很好地弄了一下有好处，今后我们上下结合，共同把农林口搞清楚。

总理：要亲自抓农林口问题，农业部可能军事接管。

662. 中央首长接见红代会代表座谈纪要 (1967年4月4日 人大礼堂)

首长：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姚文元、傅崇碧、丁国钰等。

红代会：二十几个学校代表参加

陈伯达：有没有什么新闻？

众答：炮轰陈毅、叶剑英。

关锋：北航“红旗”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

戚本禹：北航“红旗”为什么轰，你们不是外事单位吧。

有人说：街上有打倒傅崇碧、李钟奇的大标语。康老的讲话也上街了。

戚本禹：北京卫戍区是好部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嘛。傅崇碧是跟毛主席走的，为什么要打倒呢？想办法弥补一下子嘛。

康生：是个好同志嘛。

李冬明：军训有群众路线差的，同左派有矛盾……

戚本禹：你负什么责任？大字报上街了，很早就说过不准上街，再这样我们就守口如瓶。

傅崇碧是个好同志嘛，你看看，他来电话客气，是说贴李钟奇的了。

李冬明：我们通过联络站制止。

韩爱晶：可以理解。

戚本禹：不可以理解。

关锋：解放军是王牌，还能随便便地行动啊？（总理进）

戚本禹：总理，有打倒傅崇碧的。

总理：那还行？这个蒯司令，不行啊！

关锋：不要把大好形势搞坏了。

蒯大富：他们把康老的话印发了。

康老：啊，那要搞我了，哈哈！我讲话不要老贴大字报，我不敢讲话了。

陈伯达：大字报上街，马上新德里、华盛顿，全世界上报了。（看北航《红旗》报）要顾全大局，不要感情用事，对国家要有责任感，你们登的有外国几千元，几万元买不到的。

戚本禹：伯达同志，陈毅的事我们不要管好吗？

陈伯达：批评一个人可以的，牵扯到解放军、国家大事不要弄，不要动不动把我们的话贴到街上去。我看了外国通讯报道还要回忆；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刚才戚本禹批评我了。

戚本禹：为老子遮羞嘛。

陈伯达：不是。国家机密（指着报纸）。傅崇碧司令大字报贴上吧，他是和我们中央一起

研究事的，什么上报纸，要审查，要有责任编辑。

大学同志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北航，陈毅是你们口的吗？为什么炮轰陈毅？讲一讲吧。

(江青同志到)

陈伯达：他们贴了傅崇碧的大字报。

江青：不好哇，贴贴吧！主要我们负责嘛。还是不听话，出去贴了。

(指李冬明)

戚本禹：他没有贴，他是稳健派。

江青：他们还是可以理解的，把它贴掉，不要吵架。

李冬明：下午丁国钰说，李钟奇不要上街，他们不听。

戚本禹：包括李钟奇的，要贴掉。

陈伯达、康生：对呀！

江青：李冬民不要去了，他们吵架麻烦了。

谢富治：大学帮助贴，以免他们吵架。

江青：农大昨天打架了。

总理：为什么？说一说。

.....

财经：今天提出炮轰李先念，从总部到下面分成了两派，我们听了要搞军训，和李先念说了，他找叶剑英，叶剑英派了几百人来了，一班两人……叶剑英派来的支持保守派。我们开李先念的会，他们开别的会，抢时间、抢会场，说我们冲击了军训。

总理：你这不能推到李先念身上，这是你们要求的，军训工作不好不能怨人家。我说炮轰不要紧，……炮轰我几炮也不要紧。

财经：我们怀疑李先念同叶剑英有联系。

总理：这不合逻辑，轰我是支持的。

聂元梓：我认为集中时间解决问题，省首长时间，是否大家集中谈下概况，从路线斗争上谈。

58 所学校可以分类：一、左派掌握控制住的……；二、左派力量基本控制，有对立面一时不能解决的……；三、两组织对立矛盾较尖锐，两种性质，左派同保守派，左派之间，因此顾不上对外斗争；四、阵线不清，左派未形成，较乱……。

怎样把刘邓路线更批深批透，形成群众性的，把他们都调动起来。现在有许多活思想，不安心在本单位，要走。应该全面系统地批判反动路线，政治上同时在思想上也要触灵魂，在这个群众基础上，大学的教育革命也要着手。有的同学对斗批不感兴趣，对改感兴趣，对批刘邓等少了。这几天搞了声势动员，好一些了。怎样把积极性引导下去，搞深搞透，这是个问题。现在有提出“斗批散”“斗批走”的，留不住了。

关锋：走到那儿？

聂元梓：工厂农村吗。他们忘了走到那儿都要斗批改。总之，怎样形成批刘邓，斗批改，教育革命的高潮。

关心国家大事(形势)。红卫兵如何关心国家大事，除在校闹革命外，关心全国各地革命应起什么作用呢？如前一段谭震林复辟等，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如何行动才对，这都有活思想，就想走哇！在北京有不少不需要花精力的都牵扯进去了。

是否从这方面谈一谈，共同需要解决的问题。

韩爱晶：说的不要太具体。

聂元梓：毕业生活思想很多。文科的也不少，要散的，总之是高年级的毕业生，文科活思想多。

批判刘邓上街热情高，但坐不下来。

发言：要回去，到外边、郊区，到外省去支援。

江青：坐下来批也是苦差事吗！

发言：希望中央对毛主席著作学习指示一下(伯达点头)，希望中央对教改做指示，我们要调查。……

江青：等现成的呀！调查还是必要的。

发言：(医大)我们这些八年尖子，和李先念辩论，说我们是反革命，和孙正搞三结合不对，开他们的会不让开(指对立面)。

周总理：孙正自封，没报中央，我所以没批准，与你们无关系，不要听他们的。我告诉他们是这么讲的：三结合不承认，夺权是对的。孙正等没报中央，我是不同意，特别钱信忠，叫军管北京医院这是个关键。

清华：戚本禹同志讲过，全国性冲击也过去了，可看起来全国、北京还是要有的，比较大和小规模冲击，要求拉回王光美斗一家伙，斗批改没有统一办法和计划。有人总辩论阶级路线问题，是否有人指使。是否阴谋要在十六条上加上出身二字。

农大“东方红”：谭震林的爪牙还在掌权，造反派有点翻不动。

刘长信(体院)：我院三结合搞了，有军队同志当参谋。现在按系科活动，兵团支部建在班上。整风的中后期学了“三七”指示，振动很大，自己搞军训，已经或正在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长信提出问题)怎样能在批判刘邓的反动干部路线同批《修养》结合起来，是个大矛盾。

体委情况很复杂，庄则栋陪练总理是否知道？不知总理最近有否安排比赛？

总理：不，不，没有，没有比赛。

刘长信：有很多比赛，比往年这时期比赛还多，荣高棠倒台后，黄中对各种比赛和业务活动是非常关心的。

是不是陈毅的问题，说是陈毅打电话告诉黄中要庄陪练的。

周总理：不要这么讲吗？怎么都是这个逻辑(指对叶剑英问题)，陈毅什么小事都向我请示，没有什么比赛。

刘长信：是有的。(接着江青对着总理耳朵说了几句)

周总理：那也好，我是不要有的，尽量不要有，具体问题我再调查，很快找你们谈。

刘长信：他们这么多比赛怎能行呢？怎能搞文化大革命呢？

江青：叫他们来嘛！

刘长信：据说他们在讨论吃1.7元和1.8元的问题。

总理：有这回事，有吃这么多的吗？

刘长信：还是物质第一的问题。我说你们这么吃，小心点食堂。

(江青笑了)(把乒乓班材料递上)

蒯大富：北京的大学1—2类较多，3—4类也渐成熟，希望中央领导以后安排大学的工作多从1—2考虑。社会动态影响很大。总要总部表态。

江青：大体上普遍学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吗？包括评论员文章。

蒯大富：有不少人用各种名义总想出去，怎么办？请中央考虑，给我们个计划统筹安排，大家也能安下心来。希望中央给我们个社论指导，怎能安下心来，怎么批判《修养》。安不下心来是个严重问题，能发动20%就不错，发动50%—70%太好了。要发动各院校、全国把刘邓搞臭了，希中央用报纸继续引导。

江青：《修养》是不是每人都读了读啊？

戚本禹：批判，有些人写的不错，改名字就可以送各报。

蒯大富：普遍的都承认广大干部是好的，做起就不成。

王力：在批判斗争中看干部就可以嘛！否则同学们也搞不清楚。

江青：学毛主席著作可以批判《修养》，从和平时期到文化大革命系统批判也就是系统

学习毛主席著作，各系统都要批判，各种专业大学嘛！

张春桥：很多方面，工业也是嘛！

江青：方向一致角度不同嘛！

邮电学院：斗批改条件成熟，组织占学校人数 80% 左右，我们这儿有个培养局长的系。

总理、江青：真修呀！

作战组：在外人员被扣的长达 1.5 月回不来，请帮忙吧。(总理叫他把地址、人员记下来)，“联动”有个 1016。

周总理：哪些学校为基础，哪些人？

作战组：有几个头头。

江青：北航的，刘克夫很厉害，他的几个儿子。关于大学“联动”要深入调查一下。

作战组：能否给我们作个形势报告。

江青：今天我们宣布纪律，不要上报啊，广播。

康生：最后一次考验。

江青：重点是反动路线，45 年日本投降开始都有他的路线同主席作战，两次入狱你们搞过啊！目前是个批判高潮，戚本禹文章之后，可能还要有什么文章，×××提的很好，从各条战线上系统批判，作战组可商量一下，从各个角度看，你们有比我们知道多的。斗争的锋芒是反动路线，其它的可考虑。农口，如果他们走了就垮就不要走。我们那时候保是从另一个角度，现在他还在活动。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包括总理不知道。他们要把左派压下去不行。我个人意见，农大“东方红”，还有师大“井冈山”哪，不用撤了。不要武斗。红代会考虑轮流支援。对于敌人不要太急，会解决的。只要不搞死，坐几天牢是个锻炼，坏事又是好事。有人不一定就能快回来，急有什么用。

周总理：军委准备下十条命令，搞不死。

江青：你们汇报了，我们要酝酿酝酿。重点是批反动路线。批，就是学习主席著作，每时期主席都有校正的文章。这样，同学有兴趣了。

周总理：政府各部我对农业抓的少，有个感觉，财贸口我搞过“三结合”，那么难，农口就怎么那么简单。7 号(1 月)请愿，搞得很紧张，大会堂四个门，最多五个门都围了。大会不提，这个小会提一下。1 月 17—18 日我们讲过，部里夺文化革命权，业务监督。市委夺权我们也等嘛！我们先开了造反派代表会，大学好些，造反派基础好，工代会也是，中学差一些。美中有不足，不会十全十美。争取 95% 群众和干部，文化革命后期才能实现。中央各部更费劲，他们造反比较后，发现有些反复，农口就是刚三结合，我看了看，现在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准备最近把农口两派都找来，鼓造反派的劲。

江青：没有铁板一块，那儿有不革命、反革命，那儿就有革命。

周总理：部有些不能放，一般监督业务可以的。外交也是嘛！中央准备快些。主席说看出个眉目，原认为四月，要到五月了。明年四至五月看结果。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要很好对照主席的，各个方面都有。可叫他们(指戚本禹等)给介绍一下，各大学院，综合和专业的都可以批嘛！因为批判必然要涉及些中央的人，可以嘛！不过不要先倒，要先批，所以批我一下也可以嘛！对每个人都是，对有刘邓沾染的肃清一下也可以，最高的是对照主席红线批判。要统一部署，分工合作，要分工。 $1/3$ 忙起来就不错，开始 $1/10$ ——几分之一嘛！慢慢长大，先进总是少数嘛！

有外面被捕的，通过红代会，交文革办公室，我给办。写信，总要送我们办公室的。中央八条下去就解决了，呆一呆也锻炼一下。外边重点可去些地方，要少，不可大片，不要喧宾夺主。

江青：“联动”不要看的太大，清明他们要去八宝山，你们不要出动，我们准备嘛！不要去了，他们总是跳梁小丑嘛！

陈伯达：卫戍、公安可派少数人看看嘛！

江青：那里不全是先烈，有叛徒的。

康生：关于批刘少奇问题，语录上有刘少奇的名字已经修改了，208页下倒数第五行起（从“刘少奇——大笑”）划掉。这个是请示过主席同意的，新出的可以改，现在的可以在本上改一改。

陈伯达：刚才江青谈到批判反动路线。刘邓路线是很长时间的，他们代表资产阶级思潮，在各方面都有影响。工厂里，同样学校里也是。不批判刘邓路线，斗批改搞不了。马克思说过，他的学说是革命的、批判的，毛主席的思想也是批判的，在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要学会批判，在批判中提高自己。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批判。资产阶级中心代表人物刘邓。批判中两个对照，同一时期刘邓同毛主席比较，系统批判、对照，你们有贡献。批判刘邓路线能更提高毛泽东思想，学校斗批改是和它联系的。戚本禹文章开头了，戚本禹文章是批判刘邓路线，特别是批判刘的，按他的方向中国革命不能胜利，他提出过当红色买办，当时主席在重庆，有红色买办，有买办无红色。红色其名，买办其实。在土改中、四清中他都是原则错误的，土改不彻底，有“和平土改”，是他的东西。四清中还有这个问题，“和平土改”是刘少奇的路线，这样他反对合作社，就不奇怪了，许多奇怪东西以后可以看到。他说：“每个农夫要三个马一个犁才能搞变革，搞合作社，不然是错误的。”

周总理：刚开过十一中全会。对照党的历史就看出来了。

陈伯达：他反对，51年他批判一个地方搞合作社，后来大砍合作社，都和他的路线有关系的。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农民不同意。只能走社会主义。毛主席说过，按他（刘）的说法，只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不会向别的。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堵死这个路。毛主席写过《两个中国之命运》，就是说两种道路，有很丰富的材料。农村现在还有和平土改的余毒。什么农口，这些东西和他的路线都有关系。要批判，不批判也不能团结大多数。完了！

康生：今晚最后一次考验，不要贴大字报。

663. 陈伯达针对当前情况作四点重要指示 (1967年4月4日)

四月四日晚上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王力、关锋、谢富治等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各军训单位中革命造反派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周总理都做了最重要的讲话。到会的代表反映了许多问题，陈伯达同志针对目前情况做了四点重要指示。

(1)军训不能干涉，不能妨碍学生的群众文化革命运动，不要包办替行。

(2)大联合不能同解散红卫兵组织等同起来。班级的联合要经过一个过程在适当的条件下逐步实现。太急了是搞不成的，也是搞不好的。只能是自愿的联合而不能是压迫的，更不能强迫解散革命左派群众组织，联合只是以左派为领导的，以左派为主的，要支左，保证左派的优势。

(3)学习毛著不要受限制，愿读多少就读多少，愿读那篇就读那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中指定的当然要读，军训时间不能太长，建议每天三小时，加起来最多不超过四小时，以利于准备斗批改。

(4)建议对军训定期总结交流经验，军队、学校、文革小组三方面总结。

江青同志的讲话中提到了最近林彪同志有一个讲话已录了音，这个讲话能解决你们今天反映的问题，革命小将和革命老将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今后要在部队中和红卫兵组织中放录音。

664. 李先念接见商业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

(1967年4月4日上午 国务院小会议厅东厅)

参加人：“联合”筹委10人，“红反团”筹委3人，“造反到底”筹委3人，红卫兵团委3人，卢化仁，邵福祥，兰垂华，段拱理，共二十三人。

先念：李尚平同志来了吧？

尚平：来了(先念点名先认识了一下)

先念：今天怎么谈法？同学也要来，是不是？

许：驻商业部四个学校要来，北航“红旗”也要来。

先念：人不少了吧？

边维雋：有四十多人，还要陆续来。

先念问董枫同志：他们(学生)跟你联系过没有？(董枫：联系过了)。

许润生：三月七日接见快一个月了，我们有几个问题不太明白，请示一下先念同志。

第一个问题：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特别是戚本禹同志的文章的发表，希望先念同志进一步说明。

第二个问题：姚依林的材料已交李副总理，听听你对姚依林问题的看法，总理说商业部要闹一闹嘛！

第三个问题：二月十七、八号以后，商业部出现一股逆流，而且影响到整个商业系统，听听你的意见。

第四个问题：商业部，运动搞了九个多月了，群众发动的比较充分，也有些反复，运动要搞深搞透，除打人民战争外，要发动司局长站出来。要求先念同志发动党组成员、司局长出来揭发姚依林的问题，希望先念同志旗帜鲜明出来工作，出来揭发姚依林问题。

第五个问题：关于吴雪之问题，是党组揪出来的，不清楚，我们要求党组拿出材料来，他们说公布的外，没有别的了，请先念同志给我们说清楚。过去只一句话阴谋家。

先念：这些问题没准备，没有研究。我想重新讲讲我们的错误，我狠狠想了一下，那天(三月七日)我还没讲透，没讲完整，今天也不一定能讲完整。

董枫同志去带回来几个问题，一个是“联委”问题；一个是干部排队问题；当前运动问题；运动与工作时间问题；对外调问题。现在同志们提出这么多问题，啊！

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当然好得很，把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刘少奇、邓小平之类，把他们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人民中间彻底揭露出来，也在我们面前揭露出来，也使我们恨起来，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文章是从《清宫秘史》提出来的，主席观点是非常明确的，“有人说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抵制。所以要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垮、斗倒非常重要。这些人在党内是有地位的，包括刘邓在内，如果不斗倒、斗垮、斗臭，在人民中间、干部中间还会有幻想，认为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实际上是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现在同志们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刘邓的路线究竟是什么路线？完完全全与主席相对抗。是反对毛主席的，是反党的。这几天游行示威，这是开始啰，是真正从思想上、政治上把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垮，批臭。要很好学习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好多同志也写了一些好文章。发谭厚兰、蒯大富、聂元梓。真正的革命干部，要站到革命一边，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同志们讲，我们在运动中犯了错误，在运动前，比如讲，我看了姚依林的材料，有些事我要负责的，有些事我要负主要责任，比如党内党外一齐扫，上下左右一齐扫，不管谁提出的，我是点了头的，我负的责任大。四揭是一回事。九月份要把危险分子送走，那时北京有个保卫工作指示，这个事没向同志们解释。这与文化大革命无关。

二月十七日以后，总理接见造反派，我对商院“红反军”、商业部“红反团”在夺权斗争上的批评是不恰当的，是错误的。究竟为什么错？我看这是立场，是立场错了。最近我想了一下，同志们对我有意见，我想这个问题不是别的，是立场问题，所以有的同志要火烧、炮轰李先念，我看有好处，能真正触及灵魂(手拿中央文件一边看一边说)中央有文件，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嘛！强调群众请罪是错误的。

九个月的革命，我还是个立场问题，没有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还是做官当老爷，对造反派的估价总认为同志们偏激(当然我并不是说同志们不讲三性)。这样大的运动中间，尽管同志们有点偏激，你要是站稳立场，做一个毛主席比较好的学生的话，一定会理解群众的革命热情，有一点偏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革命不是绘画绣花嘛！在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理解，批评了你们，责备了你们。

有一方面，当时夺权斗争中间，有一个时期对夺权是不明确的，夺什么人的权，该夺什么人的权，不该夺什么人的权，并没有明确起来，直到一月二十五日才比较明确。当时党组解散、靠边站，应该谅解，不应批评这是方向错误，而且一提出来同志们改过来了。如果甘当小学生，争取商量同意，这问题就解决了。这才是正确态度，我对商院“红反军”，对商业部“红反团”的批评，我应负这个责任。

商业部发了一个通告，这个我也负责任的，那几天事情很多，他们说要发个通告，内容我不知道，送给我没看，办公室就退给他们。过了两天就有反映。并且对商业部的运动提出批评，你们对“红反团”的看法就不对头！我不是包揽责任，这个通告责任主要是党组姚依林，我主要是没加及时查纠制止，同志们批评我，这完全是对的。对姚依林的看法我也有改变，当然不一定就是三反分子，材料没看完，那本太厚了，我支持同志们！要揭深揭露，提出什么性质问题就算什么性质，老干部犯错误，包括我，自己是有私字，同志们要火烧我，炮轰我，我是表示欢迎的态度，特别二月十七日以后又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什么不能火烧，炮打？！

善意的批评我们，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真正把我们烧到毛主席这边来。对商院“红反军”、对“红反团”的批评，再当面说一遍，我错了。你们当然有错误，但是一商量就解决了，允许我们犯错误，为什么不许小将犯错误呢？那能揪小辫子就整，这是很不好的，这是完全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和毛主席思想背道而驰的。

姚依林的问题，同志们要大胆的揭，揭到底，什么性质的问题，揭出来看！通告是逆流嘛！

不仅你们揭，司局长也要起来揭发。我看了段士奇的一篇，同志们不要有顾虑，应该揭发，应该批判。

我和总理商量过，姚依林的问题是要揭的，要批的，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当然上级领导也有些根据材料，也要有个判断，应该动员司局长揭，应该起来揭发，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触及灵魂？

关于吴雪之问题。揪吴雪之也是从党组的老框框出来的。揪了吴雪之但不了解对群众有多么大的压力，至于什么材料，我们还没有整理。我们有一个概念：长期以来，在商品一多一少的时候，他的价值规律就来了，计划价格的思想是没有的，口里讲计划价格，实际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一点长期争论。一九六五年春，牛萌冠上任不久主持厅局长会议，吵了好几天，他(吴)向我提出要压缩生产，当时形势很好，产品很多嘛！要我向计委建议，压缩生产，把生产减少一些。第二条，不仅压缩生产，还要降价。有些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姚依林、王磊都在天津搞四清，我打电话叫他们回来解决。还有些问题，一九五四年出口棉花，他和

总理顶，当时棉花可能出口多了一点，已经和外国签了合同(……以下没听清，没有记全)。揪吴雪之时，当时部党组闹对立，有分裂，这样说决不是改变吴雪之的性质，这些事你们应该提供些材料，帮助揭吴雪之的问题。

卢化仁：吴雪之问题是什么性质？

李先念：我们认为还是三反分子。

卢化仁：总理讲，16个部长结论还没下。

李先念：还没有定，这是个初步认识，将来再作结论。

赵灵皋：对吴雪之，群众没有揭出什么东西，你只跟党组揭发就定性，为什么群众对姚依林揭发那么多东西你不能定性？

李先念：总理讲(吴雪之)是个黑手。我刚才讲的是个初步的认识。

卢化仁：是先把事实揭出来再定，还是先定了再揭。

李先念：总是要材料事实来证明。吴雪之问题是初步的意见。

孙永明：从揭发的材料看，姚依林问题比吴雪之严重得多，为什么不能给姚依林定性？

李先念：你们今天要我定姚依林的性？我还不能定。

邵福祥：群众对吴雪之为什么恨不起来，是因为手里没有材料。

李先念：我们可以提供些材料，……。我们通知党组、司局长要揭发姚依林，你们可以作作工作。

众：作了不少工作，陈洁在司局长会上还抵触，顽固，不老实。

李先念：我看过了简报了。

赵灵皋：商业部起不来，司局长有个活思想：怕抓扒手。什么叫扒手？揭发问题就是扒手吗？

李先念：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站出来揭发问题，是扒手吗？……(关于吴雪之)当时是九月份，我们认为他动机不纯！有些细节可以解释，……。

段拱理：那次会(指揪吴雪之的那次党组会)是你主持的，现在司局长还是这样，起不来，和你这次开会会有关系，你应该到商业部清除这种影响。

王宗涛：说党组成员不写大字报，为什么？

李先念：老框框，现在是认识提高了。

卢化仁：先念说王磊不写大字报是对的，这要肃清。

李先念：这话我讲过。

刘传兴：在群众刚要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姚依林在司局长和文革成员里散布说：毛主席讲过：你们不要轻易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来他又收回这句话。主席是这样讲的吗？

李先念：主席在讲辩证法的时候，说你首先不要干反党社会主义的事，如果干了，不承认也不行。

邵福祥：平反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现在党组搞了个平反办公室，他们平反算数，群众平了不算？

李先念：有这个问题？运动领导权给了你们，平反问题应给你们，这个问题可作个决定，平反可以交给筹委。

边维雋：这个工作要党组作，他们搞的。

赵灵皋：这个工作他们作，我们监督。

温丰：具体工作党组做，要经过我们同意。同意不同意？

先念：同意。

蒋成敖：我们写了一封信(附去了红管会给上海张春桥同志的信)给先念同志和姚依林，姚写了批示，公布讨论，挑动造反组织之间的矛盾。(先念：这是错误)姚依林在联合之后，又提出以谁为主的问题，破坏了基层的联合。

先念：总的方向是大联合，好好搞，当然以造反派为主，这不成问题。大联合不是和稀泥、折中主义，是有原则的，要真正的大联合。下边联合的不好，可能和姚依林的问题有关系，但是群众之间就没有不同意见？按十六条办事，运动中群众之间有不同意见，争论是正常的现象。

段拱理：二月十七日以后，保守势力给“红反团”扣了不少大帽子，什么反党分子呀！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呀等等。

先念：对“红反团”的估计错了，认为里边偏激的人太多了，是否有包庇坏人，这个估计完全错误的。

赵灵皋：我不同意先念同志的说法，不是这样的，不是估计的问题，我认为是资本主义逆流。

先念：我们错了。

卢化仁：你至少有偏听偏信的毛病(先念：你说的对)，谁向你们反映的？

先念：当然是听部党组的啰，不是一个人，党组好几个人向我说过“红反团”里边偏激的人太多。我决不把党组的责任揽过来。

卢化仁：先念对造反派大会压小会收，这对支持造反派是不利的。王田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了，是整个部的问题。王田给你的信是被迫的。姚依林说你(王田)收回你的话，我们就给你平反。这是在做政治交易。

王宗涛：党组通告说，司局长一律恢复工作，这是肯定一切，是谁决定的？

先念：党组搞的，我没看。

赵灵皋：姚依林说内容和先念说了，你看了。

先念：没有。那天事情很多，解决别的部门问题，他没有和我说内容，我也没有看。

蒋存敖：商业部有人说李先念不倒，姚依林就不倒，姚依林不倒，司局长就倒不了。党组现在还是铁板一块。明天下午开大会，希望你能出席大会。前一阶段运动夭折，出了个吴雪之，就出现了你好我好，这对运动不利。

先念：这个问题我不能答复，但要做司局长工作。

查仲生：对王田的平反问题，糖烟酒公司群众对这个问题写过一份材料，给你看了没有？你的看法怎样？

先念：我看看再说。

邵福祥谈到二月十八日先念说李尚平同志藐视中央问题。

先念：当然我对她有成见的，我向李尚平道过歉。

众：你为什么点了李尚平、王田的名，党组成员不出来澄清？

先念：那我就不知道了。

李鸣：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先念：我知道了，到群众中去)那么请先念同志到商业部去，二月十七日后，党组的问题是资本主义逆流，先念同志怎么个看法？

先念：总之有个反复，社会上从上到下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暂时不答复，但有个反复就是了。大会压、小会收，以前错了，我就向造反派承认了，收回来。

段拱理：(1)现在排队困难，不亮相，不表态，不揭发还放风，怎么排？(2)先念对商业部情况是不了解的。商业部有两个不彻底：第一是主持的党组会，炮打司令部不彻底；第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彻底，一度起来了，司局长也准备揭了，可是怕，二月十七日搞了一下，都收回去了。(先念：现在让他们彻底好不好？)(3)当搞到党组头上了，怕！出来想个鬼主意，商业部有抓扒手之风。党组一贯有怨气，这不是不理解，而是立场问题。

先念：是有怨气。

孙永明：现在有股风，光是强调科学性、纪律性，就不敢动。

先念：应强调革命性嘛！

众：二次夭折和先念同志有关，希望你到商业部去点火。

卢化仁：真正支持造反派，应在大会上表示支持。

先念：排队是总理要求，但也要根据运动的发展，要亮相嘛！要揭发和承认错误嘛！按总理的讲话，要留一批，提一批，撤一批，罢一批，调一批。商业部的运动可以大大的揭一下嘛！要猛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嘛！运动时间这样安排(上午工作，下午运动)可以嘛！

边维雋：有的单位反映业务时间少了些。

众：党组成员不参加运动，不知是干什么去了。

先念：我同意你们的暂时半天运动，半天工作。我向总理讲一下，商业部是个大部，业务工作，市场要很好地安排一下。计委有个汇报，我提了一些意见，把文化大革命搞到底，把市场搞好。他们党组开会，只能讨论业务问题，你们应该去参加，你们要大胆参加，要把业务监督起来，了解情况，提些意见。要抓革命，揭发姚依林的问题啰！揭发党组问题啰！但也要把业务抓好。

同志们提的问题很好，那个问题都和我有关系，不冤枉，我承认错误，我没有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和主席思想不相符合的，批评是完全正确，完全对。具体的有哪一句话，有的我可能记不清了，主要讲主导思想。

孙永明：要想把运动搞透，姚依林应停职反省。他仍站在反动立场上，如商业部再这样下去运动不会搞彻底。

先念：不停职反省妨碍批判吗？

众：当然妨碍。姚依林品质不好，是资产阶级政客，两面三刀，玩弄权术。有的同志说，就是要打倒资产阶级政客。

先念：我汇报一下总理。

邵福祥：党组的通告和补充电报，是打着总理的旗号，把责任推给总理。

兰垂华：二月十七日以后，姚依林的性质转化了。

孙永明：为了把运动搞彻底，把拌脚石搬掉。

群众：现在你是要姚依林一人，还是要广大革命群众问题。

先念：当然啰，不然怎么叫群众运动？

群众：根据党组的汇报，印象当然是不好的啰！

李尚平：讲几点意见，(1)先念同志应向李富春同志学习，他态度比你明朗。(2)你确实有错误，主观、客观都有，主观上立场不对；客观上是越听姚依林反映情况，就越不支持造反派，越多听越不容易改正错误。(3)造反派对你确实有意见，准备批判，不管是火烧李先念，还是炮打李先念，都是帮助。先念带几个人(指马定邦、吴波)采取这种方法，揪吴雪之，是不相信群众，是压制群众；二月十七日又犯了类似的错误，点了不少名，有的没有点名，王卓如就没有点对。到底自己点名对呢？还是交给群众讨论。不能老犯这样错误。对姚依林问题你应明确表示态度。

先念：你的意见很好，我支持，炮打姚依林。

李尚平：每次接见都检讨。不要老是道歉，应该真正作检查。

朴文山：(1)对姚依林问题，先念表态不明朗，应该走到商业部去，明天开大会，希望你去发言，应该在大会上向全体革命造反派表态。要在行动上支持，不要在口头上。从揭发出来的问题看，对姚依林要坚决打倒的，先念要到商业部去讲几句话，运动几次夭折和先念同志有直接关系的。姚依林是商业部资本主义逆流的急先锋，不仅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且挑拨造反派之间的关系，矛盾性质起了变化，希望先念同志出席大会，讲几句话，不仅在口头上，在行动上还要积极支持。

许润生：我们代表商业部一千四百名同志强烈要求你去。

先念：能不能去不能答复，今天不决定这个问题好不好？

冯宣浩：陈伯达同志和戚本禹同志最近到计委去，说怎么这么冷冷清清？一个保守派说，炮打余秋里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陈伯达说，我是计委副主任，很久没到计委来，怎么

我的一张大字报也没有，你们可以贴我的大字报，可以打倒嘛！先念你应该向陈伯达同志学习，到商业部煽风、点火、亮相。

先念：该打倒的，一定打倒。

许润生：先念去商业部两次，都是镇压群众运动，这次应该去，用实际行动支持运动，支持群众。

(1)要先念能和姚依林划清界限(先念：对)。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你犯了一些错误，除主观外，客观上就是听了姚依林的意见。姚依林是两面三刀的资产阶级政客。对姚依林的问题态度要明朗，旗帜要鲜明。

(2)用实际行动表明，对自己的错误，对姚依林的问题有认识，对群众要支持。(先念：好)

卢化仁：吴雪之如果是牛鬼蛇神，坚决打倒，如果不是敌我矛盾可不可以翻案？

先念：当然可以嘛！今天就这样吧！看边维雋有什么意见？

边维雋：明天大会要求你参加。

先念：我们支持你们彻底揭发姚依林的问题。对我的意见你们提的对。姚依林也应该在大风大浪中锻炼吧，今天就这样吧！

665. 陈毅接见对外文委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4日)

(在二外红卫兵文委夺权小组未离文委以前，就要求陈总接见一次，陈总答应以后安排，此小组撤回又电话催过几次，直至昨日陈总才接见。这次接见主要由我们反映在文委夺权期间的工作情况，以及对文委党组的一些看法，话余也涉及有关的一些问题。)

同学说到火烧陈总的大字报已上街了，问陈总有什么看法。陈总说：在接见外国代表的时候，外国朋友也问了，我说贴大字报是好事。大字报本身是革命的，是群众的积极性嘛！至于内容准确与否是另一回事。

谈到对外使馆文化大革命一事，陈总说：他们听错了，领会错了。这个问题跟总理商量过，六月份是不是大致可以告一段落，六月份完不了，就搞到七月份，七月份完不了，就搞到九月份，十月份，以批深批透为准，现在外国有人造我们的谣，说中国要改变政策了，说大使都整掉了，不能出国了，所以大使还是要派出去，大部分大使问题不大，可以出国。谈到监督机构问题，第一个要监督领导干部学毛选，要他们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监督他们走群众路线，如果光叫你们去批文件，划圈有什么意思。

当同学问到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是否有夭折危险时，陈总表示：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夭折的危险，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说的党不是外交部党委，而是党中央毛主席。外交部十七年来基本上是执行了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刘、邓插了一手。

同学问到陈毅儿子是否“联动”分子，他说我儿子没有参加“联动”，根本没有陈小鲁、陈小英。我二儿子在哈军工，现在是造反派，大儿子在七机部，也不知道那一派的，是个技术员，老三在八中，还有一个在外语学校，是女孩子，都没有参加“联动”，这可以调查。他还说“联动”是个很反动的组织，我看这方面的材料。我是坚决主张取缔这个组织的，(以下举例)这个组织是有后台的，我是坚决主张将后台揪出来的，但肯定说，后台不是我，我没有跟任何“联动”分子接触过。

陈总在谈话中还说到斗争是有反复的，这个很好，我的问题也和文化大革命一样要有反复，但是我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相信党会作出正确的结论，我这个人是什么人，是需要火烧的，文化革命就是伟大，不允许任何坏人蒙混过关。

谈到二外红卫兵在文委夺权时说，夺权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说夺权大方向错了，我不承认，我现在还是认为正确的。同学们还问到陈总是否打过电报，阻止归国留学生到列宁墓前念语录一事，他说这个不符合事实，第一批留学生回来，打了莫斯科主动去列宁墓前献花圈念语录，遭到苏修的毒打，当时我们不知道，没有参与，事后才知道，我们向中央作了汇报，支持了他们。

第二批归国留学生经过莫斯科，要不要到列宁墓前去，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及周总理制定了九条。没有第三批，后来苏修害怕了，结果把列宁墓关了，借口说内部修理，我们的同志要去也去不了。这表示苏修的软弱。

二外同学最后要求我院提前搞军训。

陈总表示向中央转达。

666.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有关宣传报导的会议上的一次传达和讲话摘要 (1967年4月5日)

毛主席看了即将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起草的宣言，表示不满意，说：文章什么都说到了，但没有棱角，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也为了斗争。这个宣言你们要上台，他们要下台，这个宣言要写得有气概，因为这是震动世界的事情。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文件要有气概，比巴黎公社还要郑重，要参考《共产党宣言》写，理论上要有新的东西。这个宣言有历史意义，将来莫斯科革命也要学习它。新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要成立？宣言中没有讲出道理，好比钝刀子割肉，要点彭真的名，要把批判刘邓引向一个新高潮，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这样一次，要做点好文章。(以下几句来不及记)

关锋同志说：刘少奇在1949——1952年的错误要批判，但重点要放在1952年以后，这时候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总路线，斗争的焦点表现得很集中了，要把宣传重点放到1958年以后。

唐平铸同志传达了以上内容以后，接着说：最近转载了《文汇报》社论，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这篇社论毛主席看后，马上批给中央文革，要《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转载，转载后，学生们都来质问，一天最多的有五、六百人来。为什么《文汇报》社论特别重要？因为提出了方向问题，当前重要的问题是搞大联合，如果搞“拆台”风，则就不能大联合，不能三结合。当前大联合为何搞不下去？主要阻力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通过对刘邓陶的批判，达到大联合。目前有些学校(特别是中学)保守组织和造反组织间的斗争特别激烈，北京学校内部搞得很激烈，如“新北大”和地质“东方红”，闹成了武斗和打群架，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对此事提出严厉批评，新北大提出的象“打倒谢富治”等等的口号是十分错误的。祁士元去搞接待，学生们《对文汇》报4月9日社论提出反对意见，祁士元竟说：我们可以向上反映。而不是理直气壮地坚持社论的看法。王力同志批评了祁士元，说：听说祁士元不赞成《文汇报》社论，这是不对的，是无组织，无纪律，是公开对抗。文章的方向是对的，我们就是要在大批判中推动大联合，不要扭住小是小非。(对红卫兵)你们应当好好地学习这篇文章，讨论三天。

唐平铸同志接着说：最近组织了一些同志专门搞调查。中央文革抓得很紧，每天都把稿子送给王力、关锋同志审阅。最近国际新闻有起色。报社专门成立了“刘邓批判小组”。报社里总的气氛还是好的，但是工作还很被动，对上面的指导思想吃的不透，没有很认真的研究讨论。社论写出来往往不能抓住问题，指导思想不是很明确的。发动群众做得不够，很多工作没有很好落实，还不善于象其它报社那样利用社会力量。王力同志要我们检查“打击一

大片，保护一小撮”，至今还未很好搞出来。

陈伯达同志昨天下午三时召集会议。决定要写出一系列大文章对刘少奇进行批判，要力求有力量、有分析、质量高、水平高。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象《九评》那样)发表，这样更加“官方”。听说刘少奇看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后，很不以为然，认为只是代表个人意见，其中引用的一些话，有出入，云云。今后要写一系列官方文章。现在初步准备了二十四个内容(有些已定题了，有些只是内容，题目另定)：

1. 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此文王力同志搞)
2. 中国向何处去？(此文陈伯达同志组织人写)
3.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此文《红旗》杂志负责搞)
4. 在农业集体化道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社负责)
5.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人民日报》社负责)
6. 总路线万岁(未定)
7. 大跃进万岁(未定)
8. 人民公社万岁(未定)
9. 揭穿刘少奇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未定)
10. 批判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未定)
11. 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未定)
12. 批判刘少奇的假共产主义(未定)
13. 评《修养》(未定)
14. 要无产阶级专政，不要资产阶级“修养”(《人民日报》负责)
15. 驳斥“剥削有功”(未定)
16. 从“清宫秘史”到“海瑞罢官”(姚文元同志负责)
17. 打倒奴隶主义，严格遵守无产阶级纪律(未定)
18. 党的建设问题(未定)
19. 军事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解放军报》负责搞)
20. 统一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光明日报》负责搞)
21. 新闻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负责搞)
22. 外事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未定)
23. 教育战线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未定)
24. 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未定)

要很好学习毛主席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要搜集刘少奇的材料，在报纸上发表刘少奇的材料。要作典型调查，组织专门班子写。当前要狠抓对当前运动指导的宣传。

- (1)狠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 (2)继续宣传大联合
- (3)在大批判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 (4)支持左派(讲一讲军队支持左派问题)
- (5)还要写一些爱护解放军的社论。

在做到以上几点的同时，要同时做以下几点工作：

- (1) 点名批判彭真
- (2) 加强对于四川问题的宣传。点名批判李井泉。
- (3) 安徽要揭发李葆华，我们配合作典型报告二三个。
- (4) 通过学部和新华社的材料，揭发陶铸。
- (5) 通过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写一篇社论，同时批判 1962 年《人民日报》在周扬黑帮控制下写的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社论。

唐平铸同志继续说：文艺副刊也要配合批判刘邓。国际宣传方面，组织反修的重点文章。继

续搞好短评、时势讲话、工农兵论天下事等专栏。今天上午王力同志看了国际宣传一栏，感到消息面太窄了，没有很多新闻。要改进国际新闻的标题。首先要把社论搞好，同时狠抓调查报告。记者要相对固定，重要是报导夺了权的省市，要作到各个省市都有本报记者。围绕记者组织通讯员小组，要搞好头条。关锋同志说：头条是表示当前运动中的方向问题，要加强对群众来稿的整编工作，报纸上的文章和照片考虑留有记者名字，否则出了错误无法追查，毫无责任心，现在电台的播音员也不留名字，出了错误是谁也找不到。

667. 李先念在商业部彻底揭发姚依林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4月5日在三里河俱乐部)

主持会议：许润生同志。

李先念同志二点五十五分进入会场，大家表示欢迎。

同志们，首先我表示态度，这个会开的好。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过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中，我们执行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时，主席纠正了这条路线，反对了刘、邓反动路线，进一步清算了一二十年(原文如此)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条是刘、邓反动路线。戚本禹文章好得很，运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十一中全会时，我们还不觉悟，继续执行了反动路线，应当向同志们，向毛主席请罪。所以财贸口同志们要火烧李先念，炮轰李先念，假如不改变，为什么不可以打倒。在二月十七日总理接见造反派同志时，我的讲话犯了很大错误。一月夺权，主席讲有连锁反应，究竟夺什么，不清楚，所以商院“红反军”、“红反团”夺过了些。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上，如果我们体会主席思想的话，点出来就行了，我当时的立场是错误的，十七日讲话是不对的，应当承认错误。我说方向错了，这句话是很错误的，这种怨气不是简单的，是无产阶级立场，还是资产阶级立场的问题。第二天接见司局长点李尚平、王田名字，说污蔑党中央，这是错误的。紧接着商业部党组发了一个通告，我应负责任，他们送给我，我二十二日很忙，没有看退回去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体会毛主席思想，根本的问题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口头上讲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际上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到一定情况，就和群众对立起来，如果不转变，矛盾就会转化，就可以打倒。开这样的会批判以姚依林为首的党组，我衷心支持你们，支持商业部同志、商业院同志揭发商业部党组问题，希望党组司局长，揭露姚依林问题，揭露党组问题，揭露我的问题，才使我们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使我们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反动路线划清界限，使我们更恨刘、邓、陶，使我们更加热爱我们党，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揭露批判我们，对犯错误同志有好处，我衷心支持这个会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负责同志叫我参加这个大会，我们愿意来，你们提出要姚依林停职反省，我表示同情，但是同志们要给我时间，请示中央、中央文革批准，我个人决定不了这个问题。我支持你们这个会议，支持你们揭发姚依林的问题，揭发我的错误。王田同志平反，我曾说放到运动后期处理，部里认为什么时候合适，我是同意的。关于姚依林和彭真的关系，总理对造反派已经讲过了。我今天来是支持你们揭发姚依林的问题，话不能讲的很多。最后，呼一个口号：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许润生念条子：(一)先念同志，你听姚依林的话，哪次不犯错误？听造反派的话，哪次犯了错误？(二)好多条子要求姚依林停职反省，要求罢姚依林的官，撤姚依林的职。(三)你动员司局长起来揭发，司局长不敢起来，怕你抓扒手)

同志提很多条子，来不及解答，在这么大的运动中，这么大的民主，同志们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对司局长起来揭发怕抓扒手问题，违背毛泽东思想，抓扒手的没有好下场。我建议党组成员起来大胆揭发。

(李先念同志三点三十三分离开会场)

668. 周恩来接见计、经、建三委群众组织代表讲话纪要 (1967年4月6日 国务院会议厅)

参加接见的：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

总理：首先要讲一个问题：按照主席思想办事。找各派谈话，各派的权利是平等，尽管他们保守一些，也要让他们讲话。我们支持左派，但不可能都是左派。两个月前，主席批过《河南日报》一个文件，《河南日报》攻击解放军，军区要接管。主席说，放一放，让他们再暴露暴露。还要他们找各派都谈一谈。两个月了，我打了几次电话，到现在他们还没有答复(总理要秘书去拿主席的批示原文)。(问竺慧娟)你们计委能不能都变成左派？(方慧英：要看他们的态度)我问竺慧娟。(竺答：当然不可能。)我头脑里有时也有“杂质”要挤出去，竺慧娟，你这么年轻，有没有？(竺答：有)这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时候都有右的东西，我思想中都有嘛！要通过实践，在实践中衡量对不对。实践的考验，也就是阶级斗争的考验，哪些说对了，哪些做对了。一个机关这么大，总是有左、中、右的。当然啰！我们支持左派。左派要取得领导地位，争取大多数，帮助保守的，批判右的。左派在前进中，思想也要前进，也要跟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这样。到一定时候，有的又走到前头，又要争取大多数。一个部有保守派，有好处嘛！是一面镜子，有个镜子对照对照，可以防止“左”的和右的倾向，这样更利于前进。我们的人是社会主义的人，当仁不让，为社会主义作事，不为个人作事，为人民服务嘛！造字，很有意思，二人为仁，三人为群。请他们四位听听大家意见，当面听听有好处，你们可以回去传，传的有多有少，有增有减，这就不同了。我们的讲话，有废话，有错话，你们不传，要进行剪裁。让他们听听也可以帮助你们做工作。请保守的同志也来听听，我们要作宣传，要帮助他们，启发他们嘛！(问：计委王兴奋)你们是不是保守一点？(王自吹：我一直是造反派。赵明盛：他们就是保守的。)要大家保薄一波？(经委“井冈山”公社代表易昌惠：薄一波每一年印的时候，发送的名单就有谷牧)你们是哪里的？

易昌惠：我们是经委的。

总理：谁是多数？

易昌惠：我们是多数。

总理：你们哪个组织人最多？

易：“井冈山公社”一百二十人、“卫东公社”最大。

李恩先：“卫东”最大，一百九十四人。

总理：李恩先是那一个？李：我(站起)

总理：你是“卫东”造反头头吗？

李：是。

总理：(一个一个认识李培传，唐惕等同志……)

总理：你们揪薄一波谁先去的？

易：李恩先去的。(经委“遵义”公社代表任九弟插：我们去的人最多。李：你别吃老本了，要看现在的发展。经委“东方红”公社代表肖宗英：你有什么老本，你老本新本都没有)

总理：怎么薄一波在保定被学生“劫”走了。

李恩先：薄一波是我去揪的。不是“劫”走，而是抢走的。当时，我们发起揪薄一波，跟同学串连，他们不去，到二十九号，我们要走了，中午，他们临时确定去五个人。当时，我们认为同学是革命行动，同意他们去，联合去广州。到了广州以后，我们和省委、军区协商，谁也不准单独活动，结果，他们背后搞鬼，偷偷向家里打了电报，告诉李明哲，李明哲带了一百多人，到保定车站，车一停，他们冲上列车，来势很凶。广州军区保卫部栾科长也很为难，找我商量怎么办。当时，他们一百多人，我们二十多人，为了避免武斗和列车停车

过久，给国家造成过多的损失。他们带着三司的介绍信，因此，决定下火车换坐汽车回北京。薄一波到北京以后，到了地质学院。我们给卫戍区打了电话，当晚十点，把薄一波交给卫戍区。李明哲把功劳记到他头上，实际上是我们经委把薄一波揪回来的。按总理指示，交给卫戍区的。

总理：(哈哈大笑)噢！是你们揪回来的！

富春：是他们。

任九弟：我们去的人最多，你们“红旗”就不去么！

经委“井冈山”公社代表李培传：我们去揪薄一波他们说是扭转运动大方向；我们揪回来，就是斗；他们放在那边不斗，说是“死老虎”。庄静说要打顶头上司，打大大小小薄一波的口号是谷牧提出来的，庄静他们就是按这调子走的，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任九弟：我们这边受打击的人最多，庄静被薄一波打成反党分子的，现在还没有平反。

易昌惠等：早就平反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平反！

任九弟：现在还受排挤。刚刚讲话的易昌惠，前文革的副主任，犯了右倾错误，被群众轰下来的嘛！为什么薄一波斗不起来？他们提出要打倒余秋里和谷牧，才能斗倒薄一波。。

李培传：你们说薄一波是“死老虎”不用斗，余秋里、谷牧就是障碍嘛！

总理：为什么你们老说余秋里、谷牧是障碍？我就没有想通。

计委革委会赵明盛：我们就认为是余秋里、谷牧阻碍斗争薄一波。

经委、建委造反同志：同意。

任九弟：一切实权都在他们手里。广播、汽车、食堂都在他们手里。

李恩先：根本不是事实。广播他们有一套，今天他们就坐汽车来的。食堂没有给他们饭吃吗？

任九弟：他们挑动炊事员斗我们。

总理：你们哪一派人多？

易：我们多。我们三百六十个。

庄静(经委“东方红”公社代表)：我们二百六十多，势均力敌。

李恩先：你那里有二百六十多？

庄：我们连政治部。

强焕文：我们“吉田”兵团一百零四人。

李：你有这么多人吗？

易：连当权派都算进去了。

总理：你到底多少人？

强：我们现在是七十四人。

总理：到底七十四还是一百零四。

方慧英、竺慧娟：根本没有这回事，捏造。

总理：革命大联合，总是要联合的。

赵明盛：目前联合不起来。斗薄一波的阻力来自余秋里、谷牧。

建委：同意这个意见。

计委詹卓：我们也是什么没有。

总理：你们现在是领导嘛，夺了权。他们保守一点，也给他们用嘛！

庄静：我是二月十二日(不是事实，去年十二月份她就不劳动了)解除劳动的。薄一波把我打成反党分子的，关于斗薄一波的问题，是我们争论的中心问题。当时我们委里，刚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现在，有的局，如工交学委办公室，办公厅，到现在还没有批判，那个时候，很多同志，都要批判反动路线。总理已经讲了要把薄一波送回来，中央也说……

总理：中央决定让薄一波一月份回来，但我们并没有说让你们揪或不让揪。你们去揪，打了报告，我们同意了。这是两回事。

庄静：去揪，是革命行动，我们“东方红”也去了。当时我们这边反对去揪的队多一些，他们那边也有。“井冈山”的革命造反纵队就反对嘛，薄一波一揪回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斗薄的班子。富春同志指示四个当权派组织。

总理：当权派也可以斗，有这个权利，他们可以揭发。哪四个当权派？

易：李人林、叶林、柴树藩、吴亮平。

富春：我同李人林讲过。

庄静：这次斗薄的会，被“延安”、“红旗”破坏了。

易等人：被当权派破坏的。

总理：你就没有刚才那个女同志讲得好。快，有条理，都装进我脑子里。你讲得不好，听不出什么意思。

庄静：我们是没有他们会讲话。

总理：你们回去辩论吧！我不给你们当裁判。

庄静：当时，我们提出只揪出了薄一波，陶鲁笳没有定性，李开信也没有定性。陶鲁笳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戚本禹同志来经委点火时说，同薄一波穿一条裤子。工交党委、生产局、研究室都是为薄一波服务的，他们是薄一波的知情人，有薄一波的爪牙。

总理：矛头要向上，擒贼先擒王。

庄静：薄一波要斗，薄一波爪牙也要揪。

唐惕：他们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总理：有区别，矛头向上更清楚。

庄静：斗薄，我们组织了四十三个队。“卫东”，只有五个队，给总理打了报告斗薄，总理批了，他们什么准备工作也没有作。

总理：对，是我批了。

易：第一次斗薄，我们准备十五篇稿子，你交了几篇？是你们材料挂帅，不是我们材料挂帅。

林葳：我是工交政治部“起风雷”战斗队。我们同“古田”兵团在观点立场是不同的。向总理汇报一个重要情况，工交政治部盖子没有揭开。阻力来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人林、吴亮平。李人林是大叛徒，两次被俘，叛变自首；在炮司执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是急先锋。1965年9月开始，同他进行斗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进行围攻。一直到现在采取孤立打击排斥。

“古田”兵团大多数同志是受李人林蒙蔽的。李人林保自己，实际也保薄、陶。挑动群众斗群众。最近还派五个人到总理办公室当联络员，有的人过去同薄、陶在一起的，有的是四人小组成员，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今没有贴过薄、陶的大字报，大会小会没有揭发过，也没有在群众中进行检查交待。这些人，根本不是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刘邓路线，根本没有资格给总理当助手，做工作。实质上是没有李人林的李人林。

总理：报过材料没有？

林：十二月十七号报过，报给富春和总理的。富春同志很关心，派人去调查，找了工交政治部的刘鉴同志，但是刘鉴没有如实反映情况，欺骗了富春同志。总理很忙，我不在这儿讲了，另外报材料来。

总理：他们意见不统一，都不要调嘛！都不要，叫他们回去！怎么搞的？

易：这也是谷牧搞的。

林：谷牧找他们开过会。

方：我们以工交各部干部为主的。

总理：你们的革命精神我赞成，你们民主作风够呛！我们党内生活，怎样民主应当学一学。(拿出一个文件，说，这个文件，主席和林彪同志都同意了，还再开个会，大家商量)

总理：别的我不清楚，余秋里是薄一波首先要打击的，敢揭发薄一波的是谷牧同志。(众

说：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他是用我们经委大字报汇编当揭发材料的）。无产阶级政治家要有风度，有人贴打倒周某人说是反革命，我还替他们辩护，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如果大前提不正确，确实是反动组织，就要中央批，要瓦解，当然一个组织不会都是反动的，头头是反动的。象保守的组织，大方向如是革命的，要允许存在。政治领导是一回事，政治生活又是一回事，保守组织，让他们印刷、广播，平等相待。我要是造反派，食堂的事我就不管。

唐惕：薄一波有很多文件没有取出来。

总理：你们要文件，我有一个意见，不要烦琐哲学。这么多文件，而且有些东西是对的，如果他(指薄)每件都错了，主席早就发现了。薄一波的大问题，如托拉斯决议。托拉斯是刘少奇的，他执行最坚决。对薛暮桥，找出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来就行。经委现在不管业务，但四、五、六、七月总要搞出一个头绪来。三个委联合起来批薄，我参加。

王兴奋：他们把我们打成反革命组织。

总理：军委命令，主席批准，在中央碰头时谈了。第二条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加以取缔，对于犯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帮助。

众插：它自己要垮，谁也没有把它打成反革命组织。

总理：计、经、建委，既然有多种组织，就要允许它们存在。就应当把它组织好嘛，创造民主气氛，实行大民主。你们是经济司令部参谋部，要把薄一波的经济思想、经济政策和方针批深批透。要学习主席著作。用毛主席思想去肃清它。

刘少奇主持常委十几年了。从一九五三年到六六年，十三年了，就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文件，有些是对的，有些是错的。过去，常委是刘少奇主持的，主持十四年。书记处是邓小平主持十年，自然有很多文件不符合主席思想，时间长了，还不走到邪路上去！但，说所有的都不对，也不是，总有一个主流。主流还是毛主席的红线。否则，革命怎么能革到现在。要不然怎么能发动亿万人民起来，搞四大民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逆流在一定时期要挡道，但总的是好的。不能说逆流是主流。工作组五十天压制了群众，制造了白色恐怖，但还是一个时期，当然有的还有了继续。总的还是聂元梓一张大字报起了作用，不然怎么会开展文化大革命？群众相信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还得记上群众的功劳。因此，要先辨别主流和逆流，主流是主要的，否则怎么能把逆流压下去。必须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对准方向，擒贼先擒王，要在主要的方针、政策、思想方面进行批判，找出代表人物。就是要以刘、邓为代表，他们主持常委的经常工作。主席是政治局的主席，是常委的主席，有时不在家，就由他们决定；有时在家，具体的事情也没有过问。所以有些事，是刘、邓过问的，有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主席亲自看过、改过的东西就好，刘、邓搞的，有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社教前十条就好，主席亲自写的和改的，强调阶级斗争，强调了两条道路斗争。一九六三年搞了后十条，是形“左”实右的。一九六五年主席又搞了《二十三条》，纠正了形“左”实右。我的政府工作报告，有些是主席改的。现在我要讲的话，就说那些是主席讲的。五月十六日发出的关于批判彭陆罗杨的通知，大家都知道，应该读过。聂元梓大字报，毛主席亲自批的。十一中全会的公报，十六条，是主席亲自过目的。十月五日军委的紧急指示，主要是对的，个别有错误，是钟期光改的，军队不介入是刘志坚加进去的。十一月十六日的军委补充通知，十二条的双十条，是主席审定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是主席肯定的，备战、备荒、为人民。一九六五年计划调高了，给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打下了物质基础。这是小计委成立以来的主要成绩。一九六〇年苏修撤专家，我们提出自力更生，一九六一年提出八字方针，五年调整，三年完成，后两年发展。一九六五年，“三五”年计划就有了纲，六五年计划调高了，六六年计划实现得很好，各种指标都提前完成了，成绩还是主要的嘛！过去经济战线有陈云思想，有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思想，前有陈云，后有薄一波。为什么还有这么大成绩？主要还是主席思想这条路线起作用。计划留有余地。什么事，只要请示主席，主席过问过，就能办得好，就有成绩，就成绩提高。小计委的人选选得不好，成员不当，找组织部找不到人，从计、经委

挑人，原班人马，没有新气象。找了贾庭三、林乎加，出了问题，停职反省。余秋里是主席提出的，当时你总不能说点错了。当时反对的是邓小平、贺龙，我是同意的！两年作出一点成绩。一九六四年后，强调政治挂帅，突出政治，薄一波就搞投机，开了一次政治工作座谈会，我们林副统帅看他还想突出点政治，写封信鼓励他，他还用，过了三个月，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急了，就在《工交战线》发表，加了他的名字。《人民日报》发表信的时候，已经感到薄一波不行，但还没有给他定性，还想挽救他。那个地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成绩就大。成绩的取得，我们总是说，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二、广大职工的积极努力；三、各方面的协作支援；四、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五、领导。我过去讲大庆就是这样讲的。反对余秋里的是邓小平、贺龙，薄一波是在后面反对。一九六五年煤炭生产计划，薄一波反对，我说，好，给你三天时间，提出意见。三天以后给主席汇报。我给主席汇报了，以后主席主持讨论计划，先念说他拥护，后来他也拥护，主席问他，你也拥护，是真拥护吗？弄得他脸也红了。他也晓得是我报告的。此后，他写信给主席，主席就没有时间，就没有理过他。薄一波是言而无信，两面三刀。凡是主席给他一封信，谈一次话，他就捞到政治资本，到处宣扬。一九六四年北戴河会议，主席找他谈过一次，他回来到处炫耀，先告诉彭真，后告诉安子文，把各部部长找来大肆吹嘘，那时，我正病了，我没有去，他回来找我，给我谈得洋洋得意。你们把六四年那一本找出来，可能是写得最多的。薄一波他要抓计划、建设、经济大权，到处伸手，是个大野心家，两面三刀，是大叛徒。他是紧跟刘邓的，刘少奇在延安就很欣赏彭真、薄一波，这两人党籍都有问题，当时老区的人，不认识他们。薄是死跟刘少奇。你们三个委，联合起来批判薄一波，我很愿意去听。三个委联合起来，邀请各部一部分人旁听，联系刘、邓，批判薄一波，我要看看你们认识水平怎么样，要毛泽东思想挂帅。至于余秋里，搞大庆，搞计划，有成绩，骄傲了，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不隐瞒他的错误，他也很沉痛，至今身体不好。你们要批判他，要帮助他，开小型的会，不要搞得太大。今天几十个人开会，把我开得很紧张。在外交系统，我召集二百个人的会，我能开得很好，让我们摆事实，讲道理，听了三个钟点。

你们这样，七嘴八舌，实在不好，不象综合委员会，象中学里的红卫兵，水平要高一点！象你们这样，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当然，你们的造反精神很好，我不怪你们，你们都把话说给我听，但要有民主作风，各派都要发言。余秋里，他有他的帐，但不能把什么都放在余秋里身上，石油部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他。我另外找石油部和“大庆公社”单独谈。我要他们排个队，造反派起来了，他们也不否认“大庆公社”对他们有帮助。建委谷牧，建委是主席主张分开的。谷牧和薄一波长期在一起，工作很困难。你有意见要提出来，反对他就得闹翻。中央当时还要团结他、争取他。薄就是摇摆不定。一九五六年带头反冒进的是刘少奇，还有陈云、薄一波，我也有责任。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薄一波就没有很好检讨。刘少奇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一九五六年第一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的，刘少奇同意的送给主席看，主席没有看，刘少奇就拿来发表了。八大会议决议是非常错误的，报告中问题很大，完全反对毛泽东思想。主席没有看，就在会上宣布。挽救也挽救不回来了。邓小平的党章报告，说阶级要消灭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朱德同意苏修二十大纲领，邓小平看来好一些，说要回来请示，这点他还是对的。后来我们发表了两论。以后我到苏联去开会，赞扬两论好，同赫鲁晓夫吵了一架。尽管反修，但他们在国内还是宣扬反对个人崇拜，当时主席的方针还是团结刘邓，全党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两论我们对斯大林是三七开。人的思想总是逐步提高的。一九六三年的社教运动，考验了刘少奇，搞了个形“左”实右的后十条。到《二十三条》，对他失去了信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反对。从七大开始，每次斗争，都感到刘少奇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看他二十年了，到十一中全会，就决定了，刘少奇不能挽回了，他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难道你能说主席包庇刘少奇吗？问题是要逐步认识的。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后，强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政治挂帅，就看出林彪同志思想水平高，认识水平高，就

认识到林彪同志是正确的，能紧跟主席思想的。一九六五年大家逐步认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最好接班人。一九六六年就解决了，水到渠成，心服口服。对刘、邓的问题，也是逐步认识的。《清宫秘史》一九五〇年就要批判，拖了十七年，今天才拿出来批判。现在，提出批判《清宫秘史》，是从抗日战争开始，批判《修养》，就要联系到抗日战争以前。对薄一波问题的认识，也是逐步的。对薄一波，一九六五年就认识了，在一九六六年刘、邓以后，十月工作会议定了他的性，点了他的名。在这以前，还要团结他，不能闹别扭，还是迁就，加上谷牧思想性不强。政治不强，就要出差错。象主席、林副主席这样的人，我们党内有几个？你们都工作十年以上，要提高自己，懂得党的生活。我不是替谷牧辩护。他在建委是有帐的。他与薄一波是有距离的，有过斗争的。我赞成批判从严，要继续揭发批判余秋里、谷牧，但要重点批判刘邓在经济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薄一波从财经会议，就批判了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口服心不服，就在这个地方，搞了他两个月(李先念：我也是开了炮的)。过去我问他怎么样？他就打哈哈。陈云就更远了。五三年他就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高饶事件以后，薄一波认为他是对的。高饶垮台，不能说他对了！实际上否认财金会议。说路线错误，则是不恰当的。可以把我亲自写的报告，拿出来看看。这个报告，我写好后，也给陈云看过，邓小平也改了一下，最后主席定稿，话缓和多了，都拒不接受，反而骄傲起来。这个人就是不认错的。他在工交口，搞了十一年，什么东西都是七上八下。管煤炭，一会儿紧，一会儿松，一会儿拉张霖之，一会儿打张霖之。薄对张亦打亦拉，一会儿打张霖之，一会儿捧张霖之。邓小平、彭真宠张霖之的，不加任何批评，薄一波是打张霖之，一打一拉，弄得张霖之晕头转向，后来犯了大错误，搞成这样的结局，实际害了张霖之。我是总理，他是副总理，我跟他合作都不容易。一个薄一波，一个陆定一，一个罗瑞卿，都是不容易合作的，都很跋扈。(富春：我都没有法和他合作。)你更不在他的话下。

今天的谈话，我承认你们有造反精神，但是不那么民主。余秋里、谷牧这两个同志，要回去检查，你们先把揭发材料给他们，让他们看看。再把书面检查写得好些。如果有希望，能挽救，还是要挽救的。还要让他们改正，让他们工作。现在抓经济业务的，就我们五个人。谭震林要改得好，还可以让他工作，撤了职，还可以工作嘛！你们来接替，我也赞成，但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还需要一个锻炼过程，还接不上这个班。现在什么业务都要找我和富春。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嘛！有些事情就要他们两个人办一下嘛！经委来的五个人，有问题，可以回去。(注：五个人是谷牧、李人林派到总理办公室做联络工作的)

薄一波要系统地批判，要揪出他的死党。你们说死党，有谷牧，我不这样看。但有些事，是同薄一波有关系的，我同意。所以你们把这两位(余、谷)同志深揭深挖，我赞成。但要给予时间和精神的准备。现在，我还要把他们留在国务院。你们今天讲得老半天，七嘴八舌，搞得我挺紧张，我就受不了。他们回去了，你们对他们谈话，肯定不会比对我好，可以说，肯定不会比对我好。当然，你们的造反精神好，我不见怪。

计委、建委要成立两个班子抓业务。经委，你们的条件比较好嘛！光搞运动。七百多人，不能长期不干工作吧！(经委易：我们希望把薄一波尽早斗垮斗臭，希望总理批准我们斗薄一波的报告。尽早地接受党分配给我们的一切任务)。你们不能搞得很久，最多只能四、五、六、七月，不能七百多人老不工作。

三结合，你们掌权的造反派要提出名单，保守派未当权，可在外边提意见。不承认保守派就叫反对派，当然是内部的。现在还有××问题。三委要成立生产班子。三委都派军事代表，军事代表要支持左派，壮大左派，教育保守派。业务，你们要提意见，进行监督。但有问题，还要报上来，由上边决定。

文化大革命，还要继续闹。要闹得有条理。逆流要打退，不能原班人马，不能恢复原状，不能复辟，砸碎老一套。革命性要有，除了革命性，要加一些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林总提出三性，要紧密结合起来。计划、建设、科学性很强，因为这样，两委叫他们去，革命你们闹，我们只有几个人工作，这两个同志每周去几次，先商量一个时间。今天就谈到这里。

派军事代表的问题，怎么联系，怎么办？将来由富春同志同你们谈。派军事代表去，他们还要学习。解放军，现在他们任务很重，支农、支工、支左、军训和军事接管，五大任务，还要备战，他们去了，你们要帮助。

希望下次接见你们的时候，你们的水平提高一点，我对你们的认识也提高一点才好。我今后只能一个月见你们一次。

易：我们给总理打了一个报告，要斗薄一波。

总理：要我去作动员报告？还是你们请示报告？我没有听懂你们的意思。

易：请示报告。在四号、五号下午斗薄一波，请总理批准。

总理：过了时间嘛！

易：我们一切准备工作都作好了，明天、后天都可以。

总理：那好吧！后天，八号。

庄静、强焕文：我们过去联合好了，联合在一起的。

易：这一次是我们三个委七个单位打的报告。

总理：那你们掌权派去组织吧！

庄：我们还没有夺权。

总理：那怎么办？你们两派。

唐惕：我们三委革命造反派都联合起来了。

易：计委“革命造反公社”竺慧娟主持。

庄、强：我们同意。

总理：你们三个委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斗薄一波，时间四月八号，让他们参加，给他们发言。

三委造反派：我们欢迎。

富春：你们要大公无私。

669. 周恩来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第四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4月6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二十时三十二分至七日二时十二分。

地点：人大会堂一楼西侧北会议厅。

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江青、萧华、张春桥、王力、戚本禹、叶群、徐立清、李天佑以及各大军区负责人共25人。

被接见人：高锦明、权星垣、李质、张鲁、吴涛、刘华香、黄厚、王良太、杨德松、尤亚民、华民。

“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代表共五十八人。“红卫军”代表九人。(王铎、王逸伦没让参加)

二十点三十二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并

高呼“毛主席万岁！”

总理：同志们，现在开会。以前的代表都讲过了。今天由新来的同志讲。军队也来了几位。每件事一、两个代表讲讲就够了，已经讲过的就不用重复了。我们听新的，不用占得时间挺长。哪个开始呀？从军区开始吧！

王建平：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总理：冷静点，不要激动。

王建平详述“一·二五”事件(略)

总理：你们打过黄厚吗？

王建平：没有。

总理：有推推搡搡的现象吗？

张淑琴：那是二月三日晚上。(王建平继续讲她和张淑琴被打、被斗经过)。

总理：你被剃了光头？

王建平：没有。那是军区造谣。

总理：是你们说的嘛！

张淑琴：当时，就剩下我一个人有自由，在北京，听军区内部传出来的。他们随便打人、抓人，剃光头还算什么，我就相信了。

总理：你们那三四位同志放出来没有？

王建平：分批放了，他们三月二十日还抓人，韩文达还是从南京逮捕回来的。

于喜渊(军区通讯总站副教导员)：揭露军区个别领导人预谋枪杀韩桐事件；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指示；向战士灌输三司是反革命等罪恶事实，并揭露了柳青(军训部副部长)枪杀韩桐同志的过程。

侯凤英(于喜渊的爱人)：(哭诉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一家人迫害的经过。她又谈了冒死传递韩桐事件三封信的情况)军区有些人说，中央来的代表团有八个右派，李天佑是大右派；我们内蒙军区就是党，光听中央就是奴隶主义。王逸伦是左派书记等。(总理、康生、王力、戚本禹，春桥大笑，并说：王逸伦是左派书记？戚本禹摇头。)

总理：锡盟代表许名扬同志。(许名扬站起来)你是什么报的记者？

许名扬：锡林郭勒日报！一个小学生说乌兰夫是黑帮，盟委的一个书记用枪对准小孩说：“再说枪毙你！”贴“打倒刘少奇”大字报的学生也被捕了。

于乐泉(昭盟代表、十七岁的学生)：叙述自己被斗、被打、被捕入狱的情况。

陈振中(巴盟代表)：揭露巴盟和乌达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

陈树键：揭露军区某些领导人对内部革命派的迫害。

总理：你在军队工作几年？

陈树键：六五年十月到内蒙军区。下连队当了一年兵，然后到战士报。一月二十三日正式参加运动，二月三日被打成反革命。

刘钧(军区管理局局长，长征干部)：揭露柳青开枪杀韩桐同志，以及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和在北京被逮捕经过等。他又说到自己被地方同志掩护来北京反映情况，军区某些领导人说他是逃跑投敌(中央首长全笑了，并议论纷纷。康老说：这是什么话呀！)

萧华山：(“八一八”代表)：略。

总理：你是前天来的？

萧华山：我是月底来的。

总理：抓你们的人放了吗？

萧华山：共逮捕 125 名，现在有两名未放，其他在四月三日放了。他们还说：“派调查

团是总理派的，左中右都有，谁知道周总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总理大笑，全场都笑了。)

总理：你们多少人？

萧华山：二千人左右。河西公司军事接管以后，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要采取“政治攻势”，要分化。

总理：分化，中央讲的是对反革命组织，不是指“八一八”嘛！

张鸿喜(公安厅)：揭露了公安厅反夺权，以及公安厅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情况，并揭发××二师宣传科科长，厅军事代表赵金宝说：北京商谈是“重庆谈判”。

总理：你们讲，站起来回答。(杨德松、尤亚民、华民三人都站了起来)你们把中央解决问题说成“重庆谈判”，你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国民党啊？(这时杨德松坐下了)

康老：(生气的站起来)那个(指杨)你叫什么？(大家回答：杨德松)你就是那个师长，总理让你回答问题，怎么坐下啦？什么态度！(杨德松站起来说，“还是造谣。”众纷纷说：我们那里也有这样说法。张鸿喜说：“你抵赖”。杨说：不是抵赖。郝文德说：王良太部署的。张鸿喜进一步揭露谈的时间、地点、当场人。)

总理：从你们口里说出来的嘛！公安厅是谁管的？

华民：我们。

总理：工学院还有你们多少人？

华民：四十四人。

总理：怎么还不撤？

华民：其他是派去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总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怎么住到学校去宣传啊！(总理接着念了铁路的一份材料。中心意思是“你谈你的，我夺我的。”其中有一句“中央文革干涉了我们”。)

江青：我们中央文革什么时候干涉了你们，我们派了两个记者还被你们捆起来！

总理：“你谈完了，我也夺完了”(放下材料又说)实际上也是如此，你们还宣传、抄家……你们回去好好考虑向中央交代。

侯凤英：王良太说：“你有你的少数，我有我的多数，多数没有了，还有警卫营”。

总理：这是什么口吻！

李雨楼：他们在审判我们时也说，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

马伯岩：(呼市军分区副参谋长、呼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揭露公安局资本主义复辟情况。

伊盟代表：三月五日，刘昌还去伊盟活动。(康老摆手让华民等三人坐下)

李雨楼：揭露“红卫军”、内蒙监狱保守派等在×区某些人指使下，迫害革命造反派的罪行。

总理：监狱还押多少人(指造反派)？

众：一百多人。(有答二百多人)

周权(医学院学生)：揭露自己在监狱里所受的迫害。

王海波(军区家属)：揭露迫害家属罪行。

黄宝玉(农牧学院)：我校军代表也宣传现在支持的没错，如果错了，丢下枪回家也不支持“三司”。

包头代表：军代表说包头夺权是向军委备过案，中央点了头的，谁再“反夺权”谁就是反革命。

总理：我们不知道，你们(指军区的同志)回答吧！

包头代表：军区有些人说李天佑来了刮了一股妖风(首长都笑了！李天佑没听到，张春桥后转身子告诉他，李天佑又大笑)当谈到夺权下半旗时

总理：在那里、在那里？(当时全场气氛沉重)

包头代表：内蒙二机厂。

张鸿喜：杨××在澡堂说中央代表团有八个右派。都是谁！

众怒：指出名字来！站起来！
总理：我们还是摆事实，讲道理。
杨德松：这是造谣。
众：你抵赖！
杨德松：不是抵赖！
张鸿喜：我就是在雪地被划地为牢，站了二十三个小时的。
化志：是不是让我讲？
总理：你回答嘛！
华民：为他们支持“红革联”在公安厅夺权问题上辩护，并说没有宣布他们(指公安厅革命造反派组织)为反革命组织，只是说保守派。
霍道余(华建)：我见到公安厅院里大字报中写的反革命组织(华民继续辩护)。
总理：你说简单一点。
华民：是(后来检查说有错误)。
叶永凯(呼钢)：画地为牢我当时在场！
段建勋(二毛)：所谓抓解放军的问题，不是那回事！
华民：没有给反对派(指造反派)贴大字报。
总理：(没听清，以为他说反动派)反动派就是“三司”吗？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刚才已经让准备了，卫生系统的说吧！
郑建德：(内蒙医院)控诉内蒙医院反夺权后对“三司”观点的病人和医务人员的迫害。其中谈了有意不给一位兰尾炎病患者治疗，致使穿孔。
总理：结果怎样？
郑建德：没死。我们医院军代表名字还保密(全场笑了)。
霍道余：我们那里也说是军事秘密(都笑了)。
康老：名字还保密？！
侯凤英：我去医院看病，有伤只好说为家务事两口子打架打的。只能说是爱人打的才能看病，不敢说××军打的。
总理：不仅仅是为了看病，你还维护了解放军的荣誉，宁肯说是爱人打的。今天只一方面讲，“无产者”递了一个条子要发言，谁呀？连个名字都没有。(一下站起来两个)(指张三林)你是不是过去说过吗？
何贵(“红卫军”)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我被押。
总理：高锦明同志，有这事吗？
高锦明：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的，一个被拘留，一个逮捕，后来放了。
张继功(铁一中)：他讲的不是那么回事，是他横冲直撞进会场，打了人。
何贵：请问你们总理，我要打人一拳坐十年劳改，踢人一脚判二十年徒刑(指手划脚)。
康老：一句话，你打人没打人吧？
总理：(看高锦明写的一封纠正信)这件事已经解决了，不是平反了嘛！
何贵：全区广播大会上宣布的。
总理：工资都发了，已经解决了。我们不是断案的。在座的被打的比你们厉害的多，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也不能一个一个解决。纠缠了大家很多时间，不继续说了。今天不能解决问题，今天不继续谈了。我们又听了第二三批同志谈，还准备访问你们，节省一些时间，会后由联络员赵刚、记者找你们，也可提出材料。“三司”的也好，不是“三司”的也好，把情况书面写来。
第二件事，内蒙×区开始有一点认识，有了点检讨，顺着这条路要继续认识，深刻检讨，吴涛同志带头。还有独×师、独×团，现在你们只在呼市，在各盟也有，而是带全区性的，要很好地检查。如十八号(3月18号)那天我约定放人，不要再捕人了，过去捕的要放，河西

“八一八”的也要释放。我说了有二十天了还有没放的。其它地方还有。你们一方面继续检讨，深刻认识错误，回到住处，马上打电话回去，都放出来。

有伤的好好治疗。你们支持一方，把另一方压下去宣布解散是错误的。你们应一方面深刻检讨，一方面很好的解决问题，但没有很好解决。回去的要给工作，工资要照发。时间到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先解决这部分问题。就从这一点你们就是有想法的，看出一条线。中央在谈判，你们下面夺权，你们说中央是“重庆谈判”，这是反动思想，把中央放到哪里？把你们置于何地？要深刻的检查出来。

你们继续错误地支持一派夺权，把一派压下去，你们说夺了权，中央就承认，根本不可能。你们在全国放了第一枪，打死了革命群众，已经查清了！怎么能说中央同意呢？你们回到住地，要好好检讨，把责任负起来，要和各单位讲清。

打仗的人要法办，当然把这事登在报上也是不妥当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是可以信赖的。毛主席最近说：我们敢于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有三个信任：一信任群众，二信任解放军，三信任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高度保持解放军荣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只要传达下去，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位女同志，侯凤英同志，很懂得保护解放军的荣誉，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在这个会场上可以这样讲，不在这个会场上就不要这样讲，平心静气把道理讲清楚。

解放军个别坏人是有的，开枪的人是犯法了，这是个别分子。解放军有个别坏人，但处理解放军的问题是内部的事情，不能对外宣传。

在这里是允许你们激烈批评的，对外不要宣传，不要在内蒙以外的无关的人传达，不要宣传，不要打电话，不要出宣传车，不要广播，不要出传单，否则一搞，传到香港、外蒙、美国、日本都知道了，这是敌人喜欢的，让敌人高兴。革命组织的同志，要遵守纪律。

事情起来了，要慢慢解决。内蒙有民族团结问题，反修问题，有四千里长的反修前线，更应该注意。被打的同志是受了不该受的待遇，是为革命嘛！正义伸张就行了。今天就这样吧！

(郝广德提出经济封锁，被扣押人的问题)

总理：我马上下命令解决。

郝广德：哲盟、通辽出现“畏罪自杀”。

总理：以后再谈，否则会就开不完了。军代表(指学校的)要完全撤出来，学校不要去嘛！推迟一下。(对吴涛)现在军区什么事都管了吧？继续管吧！现在散会。

670. 周恩来及其他首长接见天津驻军首长、革命领导干部及全体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7日 人大会堂西大厅)

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接见的有李雪峰同志、北京军区首长郑维三副司令员。被接见有萧政委、郑三生，革命的领导干部有解学恭、胡昭衡、赵曙光、江枫，五个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49 人，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冈山”等为特约代表。

10:05 分中央首长进入会场，会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首先周总理向郑维三说：“郑维三同志，是你讲还是萧思明同志讲”。

周总理接着说：十多天，我想弄清情况，有很多事情要办，有四川、内蒙要办，不是故意卡你们。有的比你们来得晚也接见了，他们的问题比较大，天津的问题算什么，我先声明一下。

萧思明同志说：“天津驻军于 1 月 2 日按主席的指示正式介入天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作了一些工作，由于我们的同志学习不够，出现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

1. 在促进革命派大联合方面，虽然开了五个代表大会，由于时间仓促，还有一些革命组织没吸收进来，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少量几个保守组织也进来了。

2. 在几个代表会期间，我们跟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了协商，从全局看，表面看来是民主的，实际上不民主，这样，应该选的代表没吸收进来，如 3 月 23 日筹备小组的选举，结果使原来想吸收进来的没有吸收进来，职工代表会和中学代表会也反映了这个问题，总怕把观点强加于群众，违背十六条，没作细致的工作，想选的没选上。

3. 对张淮三一手炮制的七个野战兵团，处理慢了一些，态度是明朗的，反复讨论了几次，请示了上级。这么庞大的组织处理要慎重，在上级没有批示时，作他们基层工作，分化瓦解。这样作不能解决问题，又请示，发表了公告，态度明朗，采取了措施，发表了声明，没有点名，实际上是提这些组织，最近才点名。虽然作了点工作，希望对军队提出批评。

郑维三同志说：天津的同志到北京已十几天了，十几天与同志接触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开会接见，我个人来讲应很好接触，表示抱歉。军队在天津作了许多工作，但也出现了一些缺点，我作为北京军区负责人，我应担负更大的责任。

对天津大联合的帮助很少，北京的大联合是总理、中央文革直接指导的。按北京大联合经验指导天津大联合，如果天津出现缺点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2 月 6 日我到天津搞工作，按中央和总理指示去天津，听郑三生同志、肖思明同志讲了野战兵团的问题，野战兵团是保守组织，我没有及时详细报告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直到野战兵团来京才报到中央军委。1 号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亲自抓，直到同志们这次来，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当面汇报给总理，才把这个问题处理下来，处理慢责任在我。天津驻军态度明朗。周总理接见我们，对天津有很多指示，我们要尽快照办。我相信在中央指示后，在今后大联合中，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的关怀下，工作会搞得更好。接着总理又把中央首长一一介绍给代表，以后有代表们随便发言，发言时，有工矿企业的李勇，还有劳二半“八一八”王德明，反修锦纶厂的张成明，还有工农“八二五”的帅关仁发表了反面意见。（“八·二五”、劳二半等汇报情况从略）反修锦纶厂汇报很长时间，总理打断他的话说：江青同志要讲话。

江青同志说：战友们，我对天津情况了解的不够，但对天津造反派印象很深刻。在去年，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迫害你的时候，你们两次徒步到北京，半路上，北京派车把你们接来的，值得我学习。我 3 月 28 日听了一次汇报，这方面的问题听了一些省分和个别专区的汇报以及群众组织的辩论，事物总是要有比较的，多方面比较一下，我对 3 月 28 日 66 军负责同志肖思明同志的汇报的印象很深刻的。人民解放军作群众工作满腔热忱，爱护革命左派，这个印象也是很深刻的，当时我的印象是 66 军作了大量工作，对没有团结进来的革命左派组织满腔热忱、爱护就是不知怎么作好，有老好人的心情，这样好的军队，有的地方就不是这样，抓人很多，天津抓人很少，比北京少，有的地方抓几千，几万，甚至有惨案，这就不必细谈了。这么一比较，我觉得天津军队是较好的。我希望也算作建议吧，大联合外的左派组织也要想一想他们的苦衷。另一方面，对张淮三操纵的野战兵团的处理，不是他们故意搞晚的，因为涉及到十多万人的群众组织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给中央报告了，他们的报告送来好多，给军委又给总理，又给中央文革。另外本来应该选进委员会的没有选上，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他们今晚还说是有错误的，我觉得应向没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说明这个情况，我有这个责任。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大多数是好的，支左不是那么容易

的，如果我们一下子接近群众，有时也会出现错误的，但是知错必改，犯错误的左派组织要帮助他。把我了解的情况讲出来，是不是没有参加进来的左派组织，心里应该平一些。我不认识他们(肖思明、郑三生)，但是，今天我觉得有必要替他们说话，我不是保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我希望在这个座谈会上，通过辩论来解决。天津驻军是好的，军队不多，全市下去一万四千人做工作，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有的人可能说，江青同志今天和稀泥了，不是这样，我不是和稀泥，我觉得我应该这样说，我就要退席了，我就讲这些供同志们参考。(掌声雷动)

接着反修锦纶厂张村民又讲，总理打断他们的讲话，说：同志，是不是可以集中一点谈，你们 25 个单位的材料，我们印发你们的材料，赠给我们一些。

当反修锦纶厂说到天大“八·一三”炮打康生时。

康生同志说：我说几句，有几个学校受高级党校个别的少数的人，彭真、林枫影响下，有些时间收集我的材料，贴我的大字报，成立全国委员会，调查我，其中有的受了蒙蔽，这里面北京的也有，清华的也有，体院的也有，人大的也有，天大“八·一三”也有(“八·一三”也受蒙蔽)，以后问题揭穿了，是高级党校“红战团”个别头头搞的，其他是受蒙蔽。我屡次声明受蒙蔽的，觉悟了，改正了就完了，不要争论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讲过，戚本禹同志在人大也讲过，对其他几个单位不要把这件事作为攻击他们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向我们请罪，我不赞成这样作，一时受蒙蔽的常有，列宁曾说过：上帝允许别人犯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比上帝强得多，为什么不允许别人犯错误呢？(热烈掌声)

有人说：“八·一三”炮打张春桥，“八·一三”代表说，我们是坚决支持张春桥同志的，张春桥同志可以做鉴定嘛。张春桥同志当即说：“我做鉴定，我与“八·一三”的关系很好。”

周总理的几段插话：“天津冲击警备区的抓人了吗？没有抓这不就很好吗？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们都还没有责备他们嘛。”有人提到红代会，红代会有多少保守组织的时候，周总理说：“北京 80% 参加了红代会，也有一部分保守的，你们是 58%(指天津)，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后来还说对天工“八·二五”帅关仁和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个姓张)说：“你们赶明天好好地谈一谈吧，‘卫东’和南大‘八·一八’也好好地谈一谈吧，都各有各的长处，应在一起互相谈一谈。戚本禹同志插话说：“南大‘八·一八’是有功勋的。”其他首长都点了头。咱们的代表要发言驳反李雪峰派造的谣。周总理说：“这样好吗？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接见你们，我们就不一次表示出态度了，你们在一起好好谈谈，好好想想，我们今天有别的紧要事情，后天再接见你们好吗？”(热烈鼓掌)

671. 陈伯达、康生与内蒙古农民代表谈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7 日 中南海)

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下午三时至五时三十分，伯达、康生同志在联络员赵刚、朱文明陪同下，在中南海与内蒙古农民东方红公社代表周文孝同志作了如下谈话：

康生：你叫周文孝？昨天本来你想发言，总理没叫发言，你很好，很守制度。如发言就恐怕把会场打乱，昨天的会议主要是让军区认错，本来要想解决，但你也没有发言，很好。总理让我们今天和你个别谈话，你要谈的详细一点。

周文孝：我是代表郊区农民“造反公社”的。

康老：郊区共有多少人？

周文孝：原有十七万，经过六三年划出去的，留下十三万多了。

康老：他们那个组织叫什么名称？

周文孝：“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红卫军”。

伯达：他们人共有多少人？

周文孝：农村共有四万多。

伯达：你们人现在有多少？

周文孝：原来有四千多，现在有六千多。

伯达：啊！你们人正在“三司”的白色恐怖中，为啥还增加了？

周文孝：根据二月十八日英明的领袖给全国贫下中农的一封信，我们要开抓革命促生产的万人大会，当时正是星期日，遭到了“工农兵委员会”的很大打击。“三司”学生下去送肥，中午宣传毛泽东思想，十条、十六条，正在这时受到“工农兵委员会”的围攻，把学生送肥的汽车、摩托都砸烂。

康老：农村也是这样？

伯达：他们这个组织多会成立的？

周文孝：去年十二月初和今年元月初。

康老：他们组织以啥为主？

周文孝：以荣、转、复军人为主，都是旧社会当傅作义的兵，解放俘虏转业回家的，按理荣、转、复军人是个很好的组织，由部队回去的。拿我们村来说，荣转复有地主、土匪的儿子，劳改犯、旧军官的儿子，富裕中农的儿子，像丁汉板这样牛鬼蛇神甚至也有，地主翻天，四不清干部上台，整个把贫下中农专政、镇压。三月十六日晚我们一个同志叫岳万林从上海回去。

赵刚：去上海干啥去来？

周文孝：上海有一个农民总部，我们去上海学习“三结合”经验，回去遭受围攻、殴打，三月十六日晚，工农兵委员会要开斗争大会，当场有王心宽(流氓)宣布：“让反革命、“三司”观点的岳万林交代去北京告状，去上海学习反革命经验的事实，让他老老实实交代。”这时岳万林掏出主席语录要念，由郊区公安分局尹占山上去抢了语录，并撕烂，从板凳上揪下来殴打。四不清干部赵宽亲自拳打、脚踢。岳万万跑去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按总理四点指示办事。他们说总理四点指示是对你们专政的，就把岳万成捆了一绳。正在这时由三辈贫农李顺顺喊坚持十六条，十条，按毛主席思想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由劳动大学拉来一汽车人问李是什么观点，李答：“三司”观点。就被他们围攻、殴打，有一人往李顺顺嘴上打了一拳，他的拳头碰到李的牙上破了，反而说李咬了他的手，当即由郊区分局孙宝山出面把李逮捕了。晚上郊区分局尹占山对岳万林说：“球大的个，你干反革命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给你小孩也立下这笔帐了。”他们把四个耕读老师都劳动改造。

康老：啊，农村也抓人？

伯达：真不像话。

周文孝：丁汉板情况就是这样，××公社小坟大队有一妇女，被工农兵团打，这个妇女按毛主席十六条办事，另一个妇女叫董秀珍，是个地主老婆，说毛主席十六条不管用了，我就代表毛主席。还有一个，毛主席说不打好人，还不打坏人？

康老：啊！她就代表毛主席，她叫什么名字？

周文孝：叫董秀珍。××板公社就这样，还有毫沁营公社毫沁营大队有十八个小队，有八个小队都被打成了反革命。

康老：啊，农村有那么多反革命？

周文孝：不但是反革命，连劳动都不让，每天让开会，“工农兵”还撕烂窗户往家里扬土，不让学主席著作，这些人就是支部书记、四不清干部，还有四类分子。

赵刚：主席著作都不让学，真厉害。

周文孝：桃花公社就此一个例子，有桃花公社百什户大队，有十六岁的一个同学，被他们围攻殴打，还拉上游街。

康老：还拉上游街，他叫什么名字？

周文孝：叫杨怀用。

赵刚：杨怀用不是来了吗？

周文孝：来了。

康老：他们谁主持这样作的？

周文孝：由公社的武装部长录福宝，大队妇联主任丁玉芝，他们两人整个主权，不但这样就游街，就斗争，把十六岁的一个小孩还打成现行反革命、“三司”的特务、人民的公敌、社会的败类、民族分裂主义。

康老：这么大点小孩能成了人民公敌？能成了反革命？

伯达：岂有此理。

周文孝：还有百什户村的杨全套七十来岁，被他们围攻殴打，把“三司”观点的搞的抬不起头来，每天大喊大叫“剥牛的皮，抽牛的筋”，民族分裂搞的很厉害。

康老：农村越来越不像话，郊区有人没有？

周文孝：有，从军区抓郊区，自上而下，郊区武装部长白玉山抓社武装部。

赵刚：有自上而下抓的，由郊区抓的。

周文孝：不仅抓下去大砸，还给“工农兵”头头都发了枪了。

康老：农村还发枪？

赵刚：发了多少枪？

周文孝：桃花公社武装部给“工农兵”发了十七支步枪，七十五发子弹。

康老：他们的枪是从那里来的？

周文孝：不知道，反正他有枪，我有把握，有的说军分区给的，有的说郊区武装部给的。他们每天还扬言，谁敢来大队，公社造反，看不见老子有枪，军区已经开枪了，老子怕什么？整个把社员镇压的不能活动。

康老：真不像话，真是个专政了，这个武装部长姓啥？

周文孝：叫录福宝。还有土旗不多一点，土旗来人反映，他们来告状，向我反映铁帽公社，铁帽大队用一个地主的儿子，把一个贫农共产党员，三等残废军人捆到马尾巴上，拉了三十里。

康老：啊：什么？说的清楚点。

赵刚：把一个人捆到马尾巴上拉了十五公里。

康老：这么厉害。

周文孝：他们把一个没入过党，没入过团，真正当过二年土匪的成立了个组织，把支部书记推下台去，他当上支部书记了。

伯达：他们叫什么组织？

周文孝：叫“红卫军”。还有八拜公社，由军区去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串连为名，去了就宣传。实际去了挑动群众斗群众，把民族分裂搞的很严重，说“三司”是反革命，不要受蒙蔽了，立即退出，“三司”蒙人多，乌兰夫是大黑帮，他们想给乌兰夫翻案，蒙人没有好东西。原来这个村蒙汉团结很好，从他们宣传后，搞的很严重，小孩出来也骂蒙人，每天宣传蒙人没有好人。

康老：这个军人姓啥？

周文孝：不知道，反正是解放军。还有漆密梁村，他们组织了“坏人战斗队”，整个都是地、富、反、坏、右，有个支部书记没有入过党，利用职权，把中农成份改为下中农，在他的策划下，用四类分子、下台干部对贫下中农专政，凡是三司观点的，都被打成“反革命”，进行专政。

康老：你是一个公社一个公社的介绍，什么叫“坏人战斗队”？

周文孝：就是地富反坏右，不只“坏人战斗队”，还有“捉鳖战斗队”，还有“捉鬼队”。

康老：“捉鬼队”是那个地方的？

周文孝：南地的。

赵刚：以什么人组成的？

周文孝：以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四不清干部掌握，专贫下中农的政，他们去了一个军官给宣传：总理已经点头了，“工农兵”、“红卫军”、“无产者”是革命组织，总理已批准叫我们支持，是左派组织，“三司”是反革命组织，请你们受蒙蔽的立即退出，我们要抓“三司”的首要分子，也不知道是那个中央批准的？

康老：真胡扯，谁批准他们的？

伯达：岂有此理。

周文孝：这个时候有个不同观点的上去辩论，遭到他们村的“工农兵”上去围攻殴打，这个人就喊毛主席万岁，这时有个姓包的首长就说：“不要拿死老虎吓唬人”，这个同志说：“我们要按总理的四项指示办事”，姓包的首长又说：“四点指示是对你们专政的，周总理只是代表他周恩来一个人，中央那么多人他代表不了。”

康老：哼，真无耻。

周文孝：这阵农村，拿郊区说来，整个普遍是这样的，凡是“三司”观点的都被打成了“反革命”，拘留的拘留，抓的抓，打的打。

康老：周文孝你有什么要求？

周文孝：我忘了一个事，我们郊区三月十八日夺权，就打××逮捕了，这是我们农民公社最主要的一个领导，他对郊区的情况最了解，他知道郊区有多少贫农，多少地主，多少反革命，郊区闹的挺凶，所以他捉起来不放，要求康老、伯达同志，要求总理给往出放一放。

康老：你是不是让他来北京。

周文孝：就是。

康老：好，好的。

注：周文孝同志贫农出身，是呼和浩特市郊区农民“革命造反公社”参加总理主持的四方(内蒙军区党委，内蒙自治区党委，第三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红卫军”连同“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红旗军四纵队)代表会议的代表。

672. 陈伯达等中央首长参观红卫兵战果展览时的指示 (1967年4月7日)

参观的首长：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邓颖超、王力、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叶群。

一、陈伯达同志指出：不要求多，应该突出几个问题。

二、(提到一月四日，中央文革接见“揪王任重南下造反团”时，陈伯达同志的一段话要上报)戚本禹同志说：不要上，陶铸是革命群众揪出来的，要使人看到是革命群众揪出来的。伯达同志说：是群众揪出的，我们支持。(江青、张春桥都是这个意思)

三、(提到谭震林在农口的反革命复辟时)张春桥说：我不好回答这个问题。伯达同志说：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决问题嘛！你们两个红代会在一起研究一下嘛！

四、(清华附中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是否可用？)戚本禹同志说：做为历史事件可以反映。江青同志说：写此文的人是不是“联动”分子？伯达同志说：这个问题你们红代会自己解决。

五、(提到四月一日戚本禹同志文章是第三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伯达同志：你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提到最后用毛主席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戚本禹同志说：好！

六、(看到第三部分工作队打的旗号上写党中央、毛主席时)康生同志说：不要在旗上写这样的字，容易使人误解。(叶群、戚本禹有同样的指示)

七、(关于二月提纲是否得到刘少奇支持时)张春桥说：彭真向刘少奇汇报过。伯达同志说：他(指刘少奇)怎么能不知道。

八、江青同志指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要上版，交响乐《沙家浜》要上版，它使外国僵死的东西有了新生命。并指示：凡有“联动”分子的照片都要作技术处理。戚本禹指示：《智取威虎山》也很成功嘛！

九、关锋同志指示：北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抓的，要上版。(看到派出工作组一版)说：把一般工作组先要区别开，他们也是受害者。并指出：不要画的人太多，有刘、邓、陶、王就行了。(戚本禹也有这一指示)

十、(关于陶铸问题如何反映)江青指示：主要反映他(陶铸)是反革命两面派。还有批他的两本书，他在文教口做的坏事最多。并指示：改口号、改照片可以反映。

十一、叶群同志说：我带来林副主席两点指示：一是不要用林副主席语录；二是不要用林副主席单身象。

十二、张春桥同志一再指示：要反映两头，上头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头是毛主席红小兵的作用。我看你们对红卫兵突出的不够，要体现出毛主席是怎样率领着他的红卫兵去战斗的。一月革命突出毛泽东思想不够。这是毛主席发现的，要反映红卫兵(如同济大学)到码头装卸，保证列车正常运行。

十三、邓颖超指示：要突出表现“八·十一”、“八·一八”毛主席接见，“一月革命”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转折点。

十四、(提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戚给徐昕的信)戚本禹同志说：确实写过，但不要上报。应该突出革命群众，突出红卫兵。

十五、(关于李钟奇的照片可否上报)谢富治说：可以上吧！

十六、(谢富治见到自己的照片用铅笔写上“不要”)谢富治同志说：不要。叶群同志讲：你要有个原因，该上就上嘛！

十七、(关于革命干部亮相问题)谢富治同志讲：不要上那么多干部亮相的。(并用铅笔在版上写“不要上”(当我们提出要表现干部以实际行动亮相)谢富治说：不要上嘛！

十八、戚本禹指出：要重点地表现出反刘邓。

十九、(提到五一开会问题)张春桥同志同意开会。江青同志说：“六一”也可以开。还是轰动全国的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一周年。(提到五一国际劳动节国际友人要来时)江青同志说：有外宾这个问题可是很大。

二十、谢富治指出：可以先上报，让人家先来看，有问题再改。

二十一、谢富治又指出：复制一份小样，大一点，送中央文革，再送一份文字的。现在这样的看不清，有些问题现在也不好回答。

二十二、康老指示：一般搞展览都有个设计思想，每一部分有些什么问题，那些可以展览，那些不展览，先有个文章草案，然后画起来就好办了，你们的草案早点交上来。(此条可能不确切——原稿注)

二十三、(关于军队支左问题)施义之同志说：不要受此限制，山西、黑龙江都可以上。并指出：北京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要多照几张。

二十四、谢富治副总理说：

- 1、他的照片不要用。
- 2、表现解放军的少了一些，可考虑增加一些。
- 3、向红代会汇报一下，请他再看一次。
- 4、抽出一些有水平的同志，根据这些意见再仔细研究一下。
- 5、中央文革同志都来了，说明首长很重视。

6、要加强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成立了一个联络站。

二十五、陈伯达同志说：要派一个小组，专门来挑毛病。

张春桥同志一再指示：快把材料交上来嘛！把问题摆出来嘛！这样可以很快解决。

673. 戚本禹的讲话 (1967年4月9日 中央戏剧学院)

参加者：中央戏剧学院、“红旗文艺兵团”、“主义战斗团”、“长征战斗队”、“东方红战斗队”。

戚本禹：上海的材料(“红旗文艺兵团”送中央文革的材料)我看了，我向中央文革作了详细汇报，我们初步核对了。叶向真有错误，错误很严重，不只是萧望东、刘诗昆问题，甚至在李伯钊的问题上都有错误。找不到(叶向真)了。是吗？你们要她回来参加运动，逃避运动是不对的。有病出了院就要回来。(“主义团”李威：三分病、七分怕。)有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错误。搞特权不能因为是元帅的女儿，就逃避运动。逃避错误和群众的批评，要检查一下。你们要想个办法，特别是“主义团”的，通知她，让她回来。对她的错误还可以调查，“主义团”和“红旗”的同志都该调查，研究是什么问题，有什么错误。据我知道，她不但在学院内。在地质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树了一面红旗。首先是朱成昭的问题，朱成昭犯错误与她有关。(众：是叶向真把他拉下水的)反正她散布了不少错误的东西。她装成左派的样子，但办的都不是左派事。戏剧学院是会演戏的。她就演了一场戏。

在音乐学院实际上就是讲她的问题，我也讲了她。她的表演很能迷惑人。你们(指“红旗”)对“主义团”的态度要端正，我看，你们对他们的态度不太对。“主义团”有错误，在她的导演下，你们作了不少不好的事情。你们应该检查。(李威：我们一定检查！“红旗”鼓掌欢迎)。

(对“红旗”)对人家态度要好，我看你们有些盛气凌人。他们压了你们，你们得了一点理就压他们，我看你们“红旗”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不是很虚心的。我到有的学校别人对反对派就比你们高明，比如北航“红旗”。在工作队的问题上你们恐怕还是有点错误的吧！？叶向真、彭宣、刘诗昆他们就是这么个作风。

叶向真就是小汽车进、小汽车出，我写了信。江青同志看了后批评了她。以为她会改，结果她还是不改。

你们(“红旗”)在上海调查的材料很重要，这个就不说了。你们到上海调查这些材料也是坐小汽车的吗？(答：不是)如果你们坐小汽车就不会调查这些材料了。你们有很多正确的东西，作出了很多成绩，发现了一些重要问题，但要防止骄傲，第一不要压人，第二不要自己有点正确的东西就什么都正确。一贯正确，这样就会走到反面。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怎么能没喝过水？我是喝过水的，可能你们比我高明，恐怕不能一口水也不喝。(“红旗”一战士：我们十三期社论前就喝过“水”)喝了水有的吐出来了，也有的吐不出来。喝过水的也可以检查一下，找一找原因为什么会喝水？因为经验不够，水平不高。毛泽东思想学的不够。

叶向真被揭发以后，“主义团”可能有些灰溜溜的，你们要接近他们，帮助他们。(“主义团”：我们没有灰，坚决和她划清界限！众鼓掌)“战斗团”运动以来有很多错误。今天我也听出来了。叶向真有叶向真的账。你们有你们的账。她保萧你们不见得都保，她没斗李伯钊你们也不见得都是保李伯钊。你们有很多错误。我感到你们有掩饰态度。最后有些转变。

那个同志(马惠田曾当场揭发叶向真说过“肖望东是毛主席派来的，把肖的权夺过来以

后再还他”)还不错，比较实事求是，讲实话。(对“主义团”)不讲实话，就是叶向真，你们不要学叶向真，叶向真就是欺骗我们。

你们(“红旗”)也不要太反“主义团”群众。要反的话，首先要反我，我也保过她。也许他们(“主义团”)水平高，但是你们“主义团”应该比我认识清楚，因为你们接触多，经常在一起，但是你们没有很好作调查，我这是替你们开脱，但你们不能这样为自己开脱。她的左派只是表演，做出的样子是“左派”，实际上不是。这个问题我有错误，我没说过她很好，但在思想上认为她是左派。过去“红旗文艺兵团”要求见我，我没见他们心中有些内疚，上海的材料我看了，北京和音院的一些同志也给我写了信。这些同志很不简单，很能坚持真理，很好，做了艰苦的调查工作。他们的材料说服了我，我做了些检讨，今天在这儿也作了检讨。基本上是属实的，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这点精神是好的，是符合毛主席教导的，碰到问题都问一个为什么，坚持自己的看法，做深入调查。他们的材料有说服力，有大量材料，我看了一夜，建筑在事实基础上，他们的调查和我原来对叶向真的怀疑挂起钩来了，这些材料和我原来的怀疑是吻合的。因为我觉得叶向真在李伯钊、肖望东的问题上不是真造反，虽然说了一些造反话，但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说要斗肖望东，斗李伯钊，但她就是不听，始终没斗。我听叶剑英说，他女儿是左派，受围攻，受打击的。你们知道，象北航“红旗”这样受打击的左派，我是很同情的，所以我也同情她。而且他要求我支持艺术院校的少数派，所以我参加了叶向真组织的座谈会，听了他们的发言，在会上我看到他们有很多照相机，设备很高级，什么都有，是从哪里来的？我脑子里就怀疑。

叶向真的手法相当厉害，她和我有些联系，她在会上老找我，显示她很吃得开。当时姚文元同志对她也有怀疑，也提醒过我。

我没认识清楚，你们(“红旗”)认识得比我清楚，教育了我。我也有个认识过程嘛！因此你们对“战斗团”的同学不要求太高，当然“战斗团”自己不能原谅自己，自己要求高(些)。不要因此把哪个组织整垮，可以联合，在双方都做自我检查的基础上，看到对方成绩，我赞成你们搞联合，消除鸿沟，分清是非，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我相信排除叶向真这个因素后，你们联合的基础会更大些。

恐怕叶向真是不希望你们联合的，否则她就要要不开了。(“主义团”：叶向真是怕我们联合的，后来突然提出联合，想讨好对方，揭露她的问题。)

这个人是有办法的。(“主义团”插话：我们也在搞叶向真的材料，希望“红旗”提供一些给我们)你们如果内部发动起来了，材料就可以超过他们。(“主义团”：还是我们最知道内情。)对！有些话她和你们讲，不和他们讲。

叶向真现在是个学生，怎么批评法。你们去考虑。采取正确方法，不要“坐飞机”，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武斗。哪个人有错误都要批判，哪个人都没有特权。通过批评她主要对她有个认识。要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她的问题不要作斗争重点，斗争重点还是李伯钊及其核心，还有肖望东，还有刘邓文艺黑线。

你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叶向真的事是阻碍了你们戏剧学院的运动，成了你们学院运动的焦点，只有解决了才利于你们运动发展。你们运动的重点是通过叶向真发现一些问题。叶向真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文化部的问题我们正在研究解决，我们还要调查，依我们看，事实上也没有夺什么权。文化部的权实际上没有夺回来。他们不是搞了个“七人小组”吗？你们也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搞个“七人小组”嘛！不管是你们的，还是战斗团的，推荐一些真正好的左派，要毛选学得好的，运动中表现也不错的，推荐几个人，给我个名单，帮助我们一块儿做些调查文化部的情况。

希望你们文化部不要去了，文化部大楼只不过是个建筑，大印也不是什么权，文化部夺权是批透刘邓路线的问题，斗、批、改不搞好，就是占两个大楼、三个大楼也是没有用的。

你们要夺思想上的大楼，夺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权，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政治上把斗批改搞起，思想上批判刘邓文艺黑线。组织上建立左派队伍。你们现在还没有一支左派队伍，还是两派在斗啊！？

运动一开始你们斗九个同学(6·22事件)我就不赞成，不管学生有什么错误，我也不同意斗，不要归罪于群众，主要是工作队的问题，工作队不斗李伯钊是错的。

上次10月31日叶向真他们来找我谈，我听了后就不赞成，但叶向真很坚持自己的意见，两次斗争我都不赞成(指6·22、7·13)分清是非我是赞成的，我不同意你们用这次斗，两派互相攻击，两次斗都是工作队在搞的，只能归罪于反动路线，不能归罪于群众(鼓掌)两派要都同意，这些就可以既往不咎，不要再揪这些了。

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了，要搞大是大非，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当前的大是大非是批刘邓，对我们来说是批刘邓文艺黑线，批判十七年来包括肖望东的反动文艺路线。但不要局限于文艺战线。还有近四十年来的错误一定要批判。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针对刘少奇的。

从三九年甚至更早，在三七年刘少奇就曾讲：中国还没有斯大林，谁要作斯大林就要失败。他反对毛主席，他自己要作刘克思。三九年发表《修养》，要修正我们的党。毛主席写《新民主主义论》批判他。

他还说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军队要编入国军了”(众大笑)刘少奇还想作“红色买办”。解放后的事你们就知道得多了。

这个斗争是决定中国革命命运，是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是这个斗争重要啊，还是你们的“六·二二”重要啊？！我看你们对“六·二二”还是很有味道的，不要争了，认识统一了就行了。要争三天三夜也争不完，不要纠缠这些了。你们的“六·二二”能决定中国革命命运吗？只不过是大海洋中的小浪花，小水点，一滴水也不够，大家都鼓掌了，那就既往不咎了。双方对自己的毛病都清楚，最好都光明磊落，但不磊落也就算，年轻人好面子，讲话收不回来了，但过些时候就会检查的，青年人要承认错误很困难，我也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作过青年工作，要有个等待。主席也讲：一看二帮三等待。主席对犯错误的人就是等待很久，直到他跟党决裂。你们主要搞刘邓路线，着重批判十七年文艺黑线。这个不搞，权就夺不回来。

我们还要有新的东西，江青同志辛辛苦苦整理了些新东西，象《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你们不太知道这个重要意义，日本就知道。京剧演才子佳人，就象你们这儿演《茶花女》一样，你们这儿中间有演过的吗？不要紧，演过的人可以认识嘛。不要斗他们，你们斗了没有？(众：没有！)

我开始来看过你们的大字报，还有漫画，我很高兴，方向是对头的。后来就没有了。(群众：那是因为工作队来了！)不要再上当了，不要群众斗群众了，要共同对敌。大敌当前，内部矛盾要分清是非，老分两派不行。你们要团结起来战斗，不要老分裂嘛！联合起来了还会有两派的，但不能象今天这样水火不相容，“鸿门宴”的味道。

江青同志破了最大的四旧，搞了京剧、芭蕾舞、交响乐，还批了很多毒草影片。江青同志搞了《智取威虎山》，搞了十几次，才走了第一步，走第一步是非常困难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一句：万事起头难。我们鼓励首创精神，就是走第一步的问题，要提新的观点。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第一步的人要付出代价，要流血牺牲的。(举了伽利略的例子)所以说，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就是指第一步。江青同志搞京剧，可是走了第一步，是很艰难的，破了四旧，立了四新，树立了一块样板。京剧改革，江青同志花了很多的力，一个戏要看上十几遍，她是为革命事业来搞的，坚韧不拔。交响乐在西方是衰落的，颓废的，是爵士乐，但是在中国新生了，演了工农兵，你们还是要演嘛。

中央乐团的梁××还可以再演，出身不好，有什么大问题？只要拥护文化大革命，和家庭划清界限，还可以演。交响乐是个很大革命，可以演，苏联已经不敢演了，你们可以创造

工农兵。芭蕾舞是贵族的东西，苏联还是“天鹅湖”，看了以后，不能激发人们的斗志，反而腐蚀了，象喝了迷魂汤，演了后，不知东南西北，连自己家都不认识了，自己是哪个阶级也忘了。《茶花女》、《早春二月》都起过迷魂汤的作用。江青同志把迷魂汤变成了清凉剂。搞《红色娘子军》时，亲自到海南岛去体验生活。《白毛女》上海在轰它，我们要恢复它的名誉，请它到北京来演，还要都去看。(鼓掌)有缺点，但还是新生东西嘛。现在有人想否定《智取威虎山》、《白毛女》、《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我们就要支持这些新生事物，为之大喊大叫。如果搞完文化大革命，什么都没有了，那还叫什么文化大革命？！陶铸就是主张文化大革命后，电影、戏剧什么都不演，我们反了他。现在文艺界筹备演出，要有所创作，不要怕，可能犯错误，写了中间人物，错了就改，不要紧。这样的话，才是夺了权。占大楼没用，要占据舞台，为无产阶级舞台培养新的战士。真正这样，你们才能夺了权。夺权就是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夺权，从你们来说，就是要夺舞台的权，夺导演的权。这样就有人看你们的戏，看了就会为无产阶级事业去斗争。《茶花女》在封建社会能起一定的作用，它是为资本主义大喊大叫。我们现在时代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如果连什么时代也不知道，这就是周谷城的理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舞台，是否有为奴隶呼喊的戏呢？社会主义时代要编写演唱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鸣锣开道，大喊大叫的戏。每走一步要付出代价。要创造社会主义戏剧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任务够你们搞的。你们整风后联合起来完成嘛，不要老纠缠在“六·二二”上啦，“六·二二”是非常清楚的。

希望戏剧学院的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功勋！

(以上只整理印发出戚本禹同志在座谈会后的讲话内容，供大家参考，其他关于该院有关问题的阐述、辩论及戚本禹同志的插话略)。

674. 戚本禹关于《北京日报》的谈话 (1967年4月9日)

戚本禹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筹备会上说：最近的《北京日报》办得好，在批判刘邓的问题上，《文汇报》跟的最快，《北京日报》，第三天就跟上来了，《文汇报》还是状元，《北京日报》第二，《黑龙江日报》第三。《北京日报》七日的社论《打倒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出来的当天，毛主席说：“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各报要转载这篇文章，电台一天要广播六次。要表扬《北京日报》，最近第一流的文章在《北京日报》，以批判刘邓为中心开展报导，旗帜最鲜明，革命才有出路，过去《北京日报》是办的最坏的报纸，现在是办的最好的报纸之一。戚本禹同志对与会的聂元梓、蒯大富等同志说你们要大力支持《北京日报》，宣传《北京日报》，并且让吴德、高扬文、傅崇碧、刘建勋等同志给《北京日报》写文章。

675. 周恩来及其他首长接见天津驻军首长、革命领导干部及全体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10日 人大会堂安徽厅)

参加接见的有：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参加接见的还有李雪峰同志、郑维三等同志。

被接见的有：天津驻军首长萧思明、郑三生等同志，天津革命领导干部解学恭、胡昭衡、江枫、赵曙光同志及天津五个代表会代表。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

“井冈山”等作为特约代表也参加了接见。

周恩来：

各位同志！

正如伯达同志所估计的，我们的三次会开得很好，两方面的意见都听了。开始五个代表会议的代表来京，我们想应该有不同意见的代表也来，当时来得少一些。你们来了以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同大家接触。我们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有的是直接接触，有的是派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同大家接触，知道还有些单位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又增加了二十五个单位的十八位同志和财贸系统的两位。第三批是今天发现的，人数很多，主要是塘沽的，今天也在会上发了言。给了你们充足的时间，主要内容都讲了。总起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代表比五个代表会议推选出来的代表还要多。如果军队和工作的同志不算的话，两方面比较起来，不同意见的代表数量多，发言的人数和时间也占得多。我们充分地听取了你们的意见。以后还要听取你们的意见。今后你们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同派到天津去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记者谈，或者来北京到国务院和中央文革接待站去谈，我们还可以听取你们的意见。但你们能在本地解决的就不要来了。你们也晓得，我们这儿很忙。来了以后，也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影响生产。如果十分紧急必须来，要事先打个招呼，同意来再来。要来的话人也不要太多，一两个人就行了，不要来一大堆。你们晓得，十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来一个人和十个人、一百人讲都是一样。现在不是大串连的时候，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搞大联合、“三结合”和夺权斗争，事情很忙，一个人能讲清楚，何必来那么多人？不要以为来得人多就见，人少就不见。从来没有这个标准。你们回去传达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精简，要节约闹革命。

现在谈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一)

天津十个多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几个大城市比，跟上海不同，跟北京也不同。总的趋势是一个大方向，但过程不完全相同，应该承认，有它本身的特点。不错，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以后，北京轰起来了，上海、天津受到影响，全国也受到影响。同样，刘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迫害、受影响，天津也不例外。李雪峰同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北京、对天津都有影响。雪峰同志在北京有文字检讨。刚才同雪峰同志说了，印出来给你们看看。我们认为检讨是诚恳的，是愿意改正错误的。

但是，天津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了雪峰同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两个系统领导——省委和市委。后来天津划为直辖市，省委不管了。开始省委管大学，市委管中学、工矿企业、财贸。有这个复杂情况。从市委讲，今天你们清楚了，知道有个万张反党集团，开始很迷惑了一些人。我们发现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万晓塘死了以后，几十万人悼念，搞什么名堂？我们很奇怪。当时仅仅是怀疑。天津的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我只是有时开会，去天津一下，没有直接蹲过点。万晓塘的死，那么多人悼念，我有怀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问赵武成、李颉伯，越问越觉得离奇。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上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中学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了很大压制。万晓塘死又一次。九月十八日上午，赵武成检讨有几千人；下午万晓塘检讨只有几百人。万晓塘的检讨根本没有压力，算不上检讨，不象样子，象谈话一样。这样的检讨怎么会逼得万晓塘死呢？这个问题还要再追查。两次受到压制，中学红卫兵受到很大压制，工厂、机关也受压制。这跟上海、北京不同。全国也少有这样的事。对当时天津的红卫兵运动，对天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用群众示威施加压力，直接把刘邓的反动路线扩大、加深了。万晓塘死了，跟

着出来个张淮三，不仅继续执行反动路线，而且还继续布置搞阴谋，在工交口安插了他的亲信。刚才江枫同志的揭发就说明了问题。首先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的是江枫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把张淮三调到山西。他心里有鬼，没等找他谈话就自杀，没有死又调回来了。接着又搞公安局的反革命夺权，有些小将受了骗，承认了错误。在天津，万张集团控制达七、八个月之久，执行和发展了刘邓路线。这是主要的。(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来的同志对张淮三的走狗和爪牙还注意得很不够。张淮三同前北京市委刘仁有很密切的联系。这是个很坏很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埋藏了很多坏东西。塘沽也有，财贸、工交系统也不少。你们应该把矛头摆正！)后来经过讨论，告诉了解学恭同志。张淮三在公安局一·二〇“政治公社”夺权以前，实际上早有布置，万晓塘老婆也参加了。江枫同志实际上早就没有权了。张淮三的布置是一通到底的。就象北京彭真、刘仁早被揭出来了，但他们的黑手还伸在北京公安局。(康生同志插话：你们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搞了很多叛徒集团的调查，做了很好的工作。我提议，你们对万、张、刘仁，也组织个调查团，很好地调查一下。)就在你们鼻子底下嘛！你们要好好地调查。万张同刘仁集团有联系，同彭罗陆杨有联系。

北京公安局军管，才想到了天津公安局军管。北京公安局欺骗了北京政法学院的革命小将。天津市公安局内部夺权，也蒙蔽了一些小将。镇压“政法公社”，是派郑维山同志亲自去的。一·二〇以后，很乱，广大人民不满，比北京反映还大。军管以后，才扭转了局势。如果没有解放军，局势扭转不了这么快。你们想一想，如果从五月十六日算起，到二月十四日，九个月了；如果从六月一日算，也继续了八个多月。这么长的时间，天津的领导是瘫痪的。张淮三、赵武成，当然，还不能把赵武成说成是他们一伙的。赵武成的问题，还要他自己检查交代。

省委原来管大学，也插手了。比如天津工学院，两派都到北京来，是十月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一天。一派扭着阎达开，一派扭着李颉伯。阎和李的问题，要经过检查才能下结论。从过去的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精神面貌来看，阎达开比李颉伯好一些。当然并不是说阎达开没有错误。他正在检查。一个学校两个造反派，一个方面揪住一个，也有保的，也有反的，天工、南大就是这样。其他天大、河大等接触过一些，但不多。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省委领导瘫痪。有的同学在校内，有的在校外；有的到保定、到省委造反，后来又互相对打。打砸抢彼此都有一点，有多有少。这个情形怎么去领导？摆在中央面前是个问题。一月份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去上海。工人运动发展了，学生运动也发展了，领导了上海以工人为首的各派革命组织的夺权斗争，以首创精神号召了全国，是全国工人阶级之冠。还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这两件事有功，归于上海革命群众。是张春桥、姚文元同志领导的，影响了全国。这时，不得不考虑天津、北京怎么夺。在北京，成立了筹备小组，准备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开始有各种设想，设想了几个名称，主席确定叫革命委员会好。同样，李雪峰同志在北京多次检查以后，中央和毛主席认为检查是诚恳的，是好的，派他去天津推动这个工作，同解放军和解学恭同志接洽，帮助革命干部站出来，同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一道推动工作，进行筹备。当时，就设想成立革命委员会。

从大联合走向“三结合”(革命群众组织、解放军、领导干部亮相站出来)，在山西和贵州出现了。天津、北京也向这方面准备。在北京，以谢富治同志为首的筹备小组就是这样做的。天津，也是这样设想的。天津的发展过程，一月份仅仅是接洽而已。那时，形势还不明朗，万张反党集团还起作用。二月接管公安局，形势在扭转。这是公认的。以前是万张反党集团的黑手在活动，所以，接管公安局，群众放鞭炮，热烈欢呼，超过北京。北京自去年六月份就安定了，天津连交通警都没有了。二月正在筹备。原来，设想三月份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来，毛主席发现了开代表会议这个创议。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的代表不好产生，北大、清华、师大、北航就是合作不到一起。戚本禹同志很清楚。他们都是革命的，是经过斗争，受压迫的，但联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要经过很大的推动。北京的好处是离中央近，可以直接

帮助。谢富治同志说：“你们不合作，我们就不开会。”果然有效。我知道晚了，否则，告诉解学恭同志，天津也可以这么办。“八·二五”在外边，不合作起来就不开大学红代会，“逼上梁山”就好了。主席说，大学开了，为什么中学、工人、农民不可以开呢？北京这样做了，天津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我就给解学恭同志打了个电话。本来三月份就要夺权，这才推迟了一个月。到北京来汇报了一次，我们是同意了的。天津开了五个代表会，比北京多一个干代会。但八天开了五个会，时间仓促，筹备得不那么好，有遗漏的，保守的多了一些，主要是协商不够。不能用选举的办法。反修绵纶厂，是想要你们当主席的，结果落选了。这不是雪峰同志的“阴谋”。那时，他们没有来北京取经，我们也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们。选掉了绝不是阴谋。你们那里把一切问题都说成是雪峰同志有鬼，他也不好争辩。雪峰同志还要回天津工作，你们可以谈谈心嘛！什么都可以谈。但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吵一顿、吼一顿。选举以前，反修绵纶厂对雪峰同志还是欢迎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搞选举的。(康生同志插话：不能迷信选举。在一定的情况下，选举不如协商民主。)为什么不能选举呢？因为革命委员会还是临时权力机构，还没有团结到百分之九十五。要以造反派为核心，进行协商。

中学比大学更乱一些，分野更不清楚。都出去串连去了，二月份才回来，三月份军训才开始。过去，中学受万张集团的压制比大学还厉害。北京对中学过问得少了一些，散了一个时期，也是一、二月份才陆续回来。北京中学红代会，也不是很纯的，也有保守组织。正象伯达同志讲的，有曲折嘛！(伯达同志插话：这也是允许的嘛！)春桥同志讲，要想那么纯是不可能的，中学的界限很不清楚。工人里面有“野战兵团”，是万张反党集团搞的，在工交、财贸系统很有势力。李雪峰、解学恭同志一到天津，就看到了这个问题。“野战兵团”上面是保守的，下面不见得没有造反的，基层组织不能说一律不好，要同总部区别开来。对“野战兵团”总部，他们是主张取缔的，手续慢了一些。郑维山同志请示了全军文革，耽搁了。××军是三月五日报上来的，军委三月二十二日批的，并不是说有人支持。农村就不大一样了。农村经过四清，确实有一些下台干部想重新上台。中央有指示，在春耕大忙时，大队以下的不能夺权，下台干部不许反攻倒算。贫下中农的代表情况好一些。中学和工代会急了一些，可能保守组织多了一些。请示主席，主席讲，一下子联合起来，哪能没有保守组织？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清一色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连我们党、我们中央政治局也不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也不可能那么纯。天大“八·一三”，你们占绝大多数，你们就那么纯？我问蒯大富：

“清华‘井冈山’占多少？”他答：“占百分之九十五。”我说：“这里左中右都有了，要不右派跑到哪里去了呢？”没有左中右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一切推动力量都是矛盾的斗争。现在是阶级斗争，到共产主义还有先进与落后的斗争。当然，我们应该强调以左派为核心、为基础。同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三结合”的大方向，保守一点的组织，哪个代表会也会有的。我们基本肯定下来，但要做很大的改进工作。如果天津的工作有些问题，我和伯达、郑维山负很大责任。(伯达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郑维山同志插话：我负主要责任。)没有主要次要，我不同你们争。

雪峰同志，是中央和毛主席派去的，我们经常通电话。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有缺点，你们要多方面同他接触。他有顾虑，常请示出不出面，怕出去揪住不能工作。华北局就有一派，经常来问我李雪峰何时回来，要造他的反。我说毛主席派他到天津工作去了，因此传到天津。犯了错误，要允许人家改嘛：“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是整风的时候毛主席教育我们的。我们从延安来的人都知道。你们一解释就变成完全相反的意思了。不要理解为藏起狐狸尾巴。(张春桥同志插话：“夹着尾巴做人”，是指不要翘尾巴。)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的警惕性很高。

解放军，江青同志说了：解放军做群众工作，是一番苦心，满腔热情；但对情况不够了解，警备区过去也不归他们管。支农、支工容易些，支左就不那么容易。南大“卫东”是造反的，“八·一八”也做了好事，参加了北京“二司”的整风，吸收“卫东”不吸收“八·一八”也不好。天工，我们认为两方面都应该吸收，不进来就等。你进来要别人退出去那也不

行。革命的团结是需要的。江青同志讲了，你们都很拥护。解放军的确是一片好心，支左工作不知怎么做好，有时上了当，有时疏忽了。肖思明同志检讨了，很诚恳。一解释清楚你们就懂了。你们应该同肖思明同志、郑三生同志、解学恭同志、胡昭衡同志、江枫同志好好合作。我想他们是愿意同你们合作的。

(二)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的解释，全国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刘邓，他是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天津主要是万张反党集团。一个死了，一个还在嘛！十七年的统治影响很深。康老的话很重要，你们应该很快地做调查工作。当然，要实事求是，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有把这个集团挖深了，天津的主要矛盾才能解决。解放军同志和几位同志几个月的工作主流抓对了，特别是二、三月的工作，基本上应该肯定，但也有一些缺点错误。凡是有益的批评都应该接受。

(三)

讲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反对五个代表会、反对李雪峰，不要说是反革命逆流，叫反革命逆流不好；反过来，说五个代表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互相对骂也不好。这样不能达到大联合、大团结。应该上纲的上纲，不应该上纲的不要上纲。要紧紧地掌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对准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对李雪峰同志批评过分了一些，也不要紧。有些大字报、传单，说过头话，我看了很不安心，如谁反对周某某就打倒谁。干涉也不好，只得有机会讲一讲，我也不能贴大字报把它盖起来。过去在天安门贴某某的大字报，我就劝过，现在不劝了，反正外国记者也知道，你们的标准不是那么准的。使他们摸不透也好。这是一种思潮的反映，也不要过分责备。不是李雪峰同志本人喜欢什么标语。北京贴雪峰同志的标语也很多(其中，也可能有你们加了几张)，雪峰同志从来也没有向我说过。只要是好意的批评，就应该接受，就应该欢迎。人民内部矛盾嘛，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两种极端化的态度都是不好的。错误应该批评，不一定一批就得倒，那得倒多少？那不成了“打倒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了吗？反过来，也不是说不倒就不能批。要养成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批评过一点，只要是好意的而不是恶意的，也应该欢迎。

第二，不要随便宣布是反革命组织。互相宣布也无效。军委十条命令已经说过了，反革命组织要经过中央批准。我们要进行严肃的政治斗争。

第三，我们欢迎你们开门整风，但也不要过头，形成请罪风。请罪，天津确有此事。当时，也不光是天津，北京和其他地方也有，是一股风。包围军事机关，不外两种出发点：一，是有意见要求回答；二，是他们知道解放军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能怎么样，闹一阵子再说。一月二十八日军委命令以后，就不要包围了。解放军的任务很重，要同他们商量，不能有芥蒂，不要请罪。当时请罪成风。应该认真触及灵魂，改正错误，请什么罪。请罪差不多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专用词了。解放军要劝大家不要请罪，也不要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毛主席说了，解放军支左支错了，改了就行了；冲了军事机关，不冲就行了。如果是好的，还交了朋友，少数坏人抓住处理。一般地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意的。我们光荣、伟大的解放军，担负这么重的任务，支左、支农、支工、支交、军管、军训，哪能一点不犯错误？解放军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犯错误改了就不要计较了。解放军也可能认为，听话的、成份好的是左派，一下没有看准也是允许的，改了就行。

第四，谭力夫思想、“联动”的思想和行动、反动的血统论，要追究。但一定要把头头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分清楚。北京有个八一学校有，天津也有。你们中学生要查清。对反动头子，要扭送公安机关和警备机关，拘留起来，惩办和教育相结合。都是同学嘛，要好好教育。对广大受蒙蔽的群众要教育，对头子要给予惩罚。

第五，“野战”兵团，上层和基层要区别对待。已经有了公告，要按这个办事。以“野战兵团”的名义游行是不许可的。塘沽没有重视，支持错了改过来，不要揪住不放。

第六，革命组织不要勒令什么解散。如五个代表会议，已经开了，就是结合得不够，除了很保守的，一般的要教育，不要勒令解散，结果是无效，反而不好。除非特别事件，如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勒令做什么事还可以，一般不要轻易用。

第七，人民武装、保卫系统，由警备区和公安局很好地摸一下，负责清理。清理是必要的，要更深刻地揭发。当然，应当依靠群众，领导同群众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调查万张集团的影响。

第八，有些传单，有许多措词很不恰当，也有的有错误，要改正过来，象这样的传单以后最好不发。一般地都是教育，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主席还填上了“坚持不改和累改不改”的嘛！要给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把话说绝了并不好，结果也不起作用，失掉信用。有些提法北京都不用了，天津还有。北京去的同学要帮助一下。天津要向上海、北京看齐。

第九，现有的组织，如工厂、机关、学校，常常有两种或多种组织。有造反，有保守，也有双方都造反、也都有些保守性的，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勉励，开门整风。对保守的，要按伯达同志讲的办，促使他们把方向改正过来，两个都变成造反派不好吗？但要在斗争中考验、发展，不能强求、速成。有时需要等待，不能强制。除革命性以外，还要讲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

这些具体问题，在这里讲一讲。还有很多具体问题不能一一地讲了，你们回去自己解决。革命靠自己，解放靠自己。如果还是这些问题，以后就不需要再见了。

(四)

今后的处理方针：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扩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还需要做一段工作。原来急躁了，有很多缺点毛病，要共同努力，把它改过来。只要是造反派，就要坚决批判刘邓和万张反党集团，要立即行动。这是斗争的主要方向，在斗争中考验各个组织。要各自搞整风，作自我批评，讲联合，在斗争中联合。要改变办法，多协商，现阶段选举不十分适用。认识问题，要服从大的方针政策。协商能一致的，主流对了，具体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代表有缺点错误，要允许改；搞错了，也可以撤换。前天中学代表发言说，错了可以换，这种态度是好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希望你们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掌握大方向，认清主流，胜利前进！

可以散会了吗？(众答：可以！)散会！

(总理指挥大家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陈伯达：

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几句话。

我们认为会开得很好，发扬了民主，不同的意见都讲了。任何一方面，对不同意见都要遵循毛主席“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指示，加以认真思考。对群众一律不许打击报复。

一、大联合的主流，革命“三结合”的大方向，基本上是应该肯定的。

二、人民解放军××军，在天津做了很好的、大量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促进了天津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秩序的建立，促进了各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了城乡社会主义生产的稳定和发展。应该感谢人民解放军。

三、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不等于没有曲折，没有缺点和错误。譬如船在大海上向哪里去，方向是正确的，但总不会是笔直前进的，必然经过许多曲折和波折，才能达到目的地。

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联合、“三结合”，革命派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不能设想会没有缺点，甚至没有某些错误。有缺点或者错误，改了就行。有某些情况，局限于少数人谈判，放手发动群众不够，或者对革命群众的态度有错误，这些都要改。

五、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线路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是我们斗争的中心问题、根本问题。大家必须集中目标，拥护、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反对刘邓的反动路线，揭露刘邓这条反动路线在革命中所犯的各种罪恶。

六、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反党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配合北京现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革命高潮，同北京这个批判高潮相呼应，把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的问题结合起来。

七、刚才李雪峰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些自我批评。看来，李雪峰同志在工作中有缺点或者错误。群众的批评有很多合理的东西。我认为李雪峰同志应该欢迎这些有益的意见。同时我们应该指出：天津的主要矛盾是革命群众同万张反党集团的矛盾，斗争的锋芒应该针对万、张反党集团，而不是针对李雪峰同志。

八、同志们回到天津去，要按照毛主席的方针，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搞好大联合。

九、要学习毛主席对待山头主义的方法。各个山头主要地是实行自我批评，避免批评对方。只要是认真地、诚恳地实行自我批评，有什么缺点和错误，就都可以得到对方的原谅。我们的党就是用这种方法，在四二年、四三年、四四年三年整风中，才达到了党的团结。敢于作自我批评，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风格，是毛主席学生的朴素风格。

十、有错必改，肯自我批评，就是正确的大方向的一种表现。

以下有几点建议请考虑：

第一，革命的造反组织，被强迫解散的，自愿要恢复都可以恢复。同时，按自愿的原则应该实行大联合，扩大大联合，不要闹分散主义。

第二，保守组织解散后，不要用改换名义的办法重新恢复。已经恢复了的，也不要打、砸、抢的方法，而是用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争取分化瓦解他们。

第三，对顽固地坚持错误观点的、不肯改的保守组织的头头，要加以揭露，加以批判，进行政治斗争，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打击的是一小撮，避免扩大打击面。

第四，革命派对原来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他们要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应该表示衷心的欢迎，不要歧视他们。(热烈鼓掌)

张春桥：

我没有准备讲话。我们刚从上海回来，因为讨论天津的问题，我们参加了。上海、天津都是大城市，希望从天津的大联合、“三结合”中学到有用的东西。三天的会，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当然，两个城市不同，但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回忆上海的情况，根据伯达同志讲的第一条，大方向、主流基本是应该肯定的，说一些意见。

天津还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准备过程中。上海已经成立了。回过头来看，我们上海的大联合、“三结合”还没有你们做得好。(总理插话：情况不同，你们是首创嘛)正如语录里所说的，革命不是绣花，不可能按我们的设想，今天干什么，明天干什么，一切都按计划，不发生一点曲折。也不能象写文章，写一段不如意，撕了重写。革命就不允许这样。

我们上海的大联合，是在同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同保守组织的斗争中形成的。在发表《告上海市人民书》的时候，大联合已经形成了，并且不断扩大。开始，我们没想夺权，没想成立革命委员会。看到当时铁路不通、码头堵塞，铁路局长跑了，也没有售票员、司机，怎么办？码头停船，平时二十四艘，最严重的时候达到一百二十艘，货卸不下来。外国人污辱我们祖国，把我国国旗倒挂着，工人气愤极了。可是赤卫队跑了，造反派怎么也顶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从别处调人了，大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自动到码头、车站、工厂做工人。实际情况逼着我们不能不顶上去，把大权夺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毛主席肯定了这个大方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我们的大联合也不是那么纯洁的。我们的联合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彼此信任，我和姚文元同志一句话也没说，全是革命造反派自己定的。就是这样，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组织进来了。农民造反总部的一个负责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一审查，原来是个四不清干部，就在大联合中还贪污了几千块钱，整天同我们在一起开会，直到二月底才发现了这个人。他到处招摇撞骗，说毛主席同他一起照相。他还吹牛，说和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当时很迷惑了一些人。后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像片和毛主席的像片剪在一起。发现以后，我们通知生产队把他揪回去了。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他经常同我接触，开会就坐在我的旁边。后来发现是个“联动”分子，每次开会都带着匕首，总想找机会下手。他同我一起开会至少八、九次，好在没有下手。后来红卫兵发现了，把他也抓起来了。我们总想革命组织比较纯洁，但再想纯洁也不会怎么纯洁。我只给同志们举这两个例子。(伯达同志插话：听说“联动”跑到天津去了。应当充分揭露这个反动组织。发现“联动”要抓起来。)这说明我们队伍还不是十分纯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革命造反派的警惕性还是高的。

我们的大联合是革命的大联合，但毕竟有一个过程，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对大联合，既要有严格的标准，又不能象绣花那样细，总会有缺点错误，发现了问题，改就行了。我们也有没联合进来的革命组织，是革命组织，但多数人不赞成，只好说服这些组织，暂时放一放。为这样的事纠纷也很多。有的组织，这一段有这样的表现，那一段有那样的表现，只好等等。我们向他们说明，革命组织要接受群众的鉴定，真是革命的，总有一天会进来。现在还有这样的组织在外边。最近，这样的组织也有的同别的组织合并了。

大联合、“三结合”应该看作是一个过程，完成时间会很长。有缺点错误改正了，就不会妨碍革命的前进。不要使支流的问题妨碍我们前进。再好的领导，也会出现缺点或错误。要从大局出发，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们还有其它问题，我只说这一点。革命不是绣花，总会有缺点错误。这也算是一点学习心得吧！(热烈鼓掌)

676. 谢富治接见工代会全体委员的讲话 (1967年4月10日 市委大楼)

参加接见的还有吴德、傅崇碧等同志

开始代表们反映了一些工厂情况。

代表：从工交政治部、财贸政治部派人去调查代表的情况。

谢：怎么能用工交政治部呢？以后可不能用了，调查情况可叫工代会的人去嘛！

代表：保卫科和武装部配合支持保守派，又不叫夺权。

谢：公安部都可以夺权，保卫科为什么不能夺权，我支持夺，组长保卫档案。

傅：武装部的人不行可以接管，罢他的官，为什么不行。

(代表反映了很多军代表的情况)

谢：你们这么多情况，为什么不叫我给你们开个会呢？

(反映已把报告通过张亮同志上递了。)

谢：明天派一军代表常驻工代会，以后我们每星期开一次会，我有时间来，我没时间别人来，工代会和红代会要联系，要互通情报。(一)我们很对不起同志们，没及时听同志们的意见，这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以后一个星期召开一次会，又不要太多，一百人以下，可以叫那些意见多的工厂来，但不能叫保守派来，可以叫军代表来。

工代会同志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工作太多了，首先要抓大方向抓革命，工代会要发扬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工代会要支持所有的造反派，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支持工厂的造反派，给造反派指出大方向。搞革命搞什么？主要批判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无非是大大小小

的当权派，市委的彭真、刘仁、郑天翔等和工厂的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批判，从总根子刘邓，结合全国形势，结合工厂目前要彻底挖修正主义总根子，向北京日报，自己写的文章，工代会应该办报纸，报导出去，彻底把中国修正主义搞垮，搞烂、搞臭，这是总的方向，搞示威、搞批判。

要搞情况，大学搞的情况搞得好！当然他们不上工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要他们帮助你们，你们也要通过你们的报纸批判挖深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要批判刘邓，要批判反动路线，要把工厂的大方向搞好，要把北京的情况掌握，你们有发言权，你们可以和红代会、农代会写一个报告，抓大方向，不要武斗，要抓的及时，从刘邓到工厂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种种反扑形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要始终保持造反精神，但策略要讲究，讲究方法，因为我们有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支持各个工厂的革命造反派，按毛泽东思想支持，从毛主席的思想革命路线、政策上支持，要有组织的支持，不要老朋友，不要个人支持。

要抓大方向，要掌握政策，保持旺盛的革命造反精神，造反派的缺点、错误要很好改，要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不要叫人家抓小辫子。

(二)组织上要赶快搞，按系统、按部门联合，要抓重点，成立系统的大联合筹备小组，主要的要抓起来，要旗帜鲜明，每一个时期，形势要跟紧，要跟紧我们伟大领袖，要支持造反派。

傅：所有军代表统统要支持工代会，这一点在工厂里要亮相，工厂里一方参加工代会，军代表要支持他们，这样既支持了造反派，又支持了工代会，如两方面都还要看看，就先支持工代会，但具体问题不表态，不然军代表一支持就不好办了。只要看准就表示支持，军代表是造反派，至于保卫科呀，武装部呀，支持保守派可以斗争，但是现在要注意枪支、档案，也要注意那些可用的人，和解放军有意见的可以提，不要贴大字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领导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们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派两个人去工代会。

谢：要造反派的。

傅：谢副总理讲的很好，谢副总理讲到我们听下边的意见，你们有意见可以提，武装部区以上的有意见可以提，厂里穿便衣的你们可以批可以斗，可以罢官，区武装部受军区领导，厂武装部的可以批判、斗争、罢官，我明天再把区武装部的代表请来开个会，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可以撤出去，如不是左派占绝对优势的可以抽回来，派军代表，可以和左派商量，要支持左派，需要就去，不需要就不去。

谢：生产指挥部左派要占绝对优势，有些不太保守的但有实力的可以参加，否则就不要参加，有一定技术的干部，好的也可以参加临时指挥生产，这不算“三结合”，一个一个的结合，不要一下子都结合，大厂结合要经革委会同意。你们有事可开信到卫戍区去，给你们发证明，你们有事直接联系。工代会无条件支持。周景芳要和红代会讲，互相支持，互相关心，互相商量。

傅：我们坚决支持工代会革命左派，无条件支持。军代表有一定困难，他们刚下去不了解情况，但我提出当前要抓大方向，学习毛主席著作，抓两条路线斗争，抓对刘、邓、旧市委的斗争，工厂碰到问题要具体研究，不要打架抓人，不要把一个组织说成反革命，有材料送上来，不怕“五月围北京，八月血洗北京”，五、六十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没那事，我们了解好了。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撒大网捉鲨鱼，还要逮小虾。现行反革命例外，把受蒙蔽的人争取过来。军代表有些缺点，我们刚开了会，可能还没传达，明天再开一个区县军代表、武装部长会。

谢：你们工代会牌子响啦，金牌子不要弄坏了，希望我能多听到同志们的意见，同志们讲的这些意见和武装部开会交待。

周景芳：这次我们要根据两位同志的(讲话)精神贯彻下去，当前大方向是批刘、邓，批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很主要的是采取组织措施，工代会下面一千多个组织，还没有组织起来。建立系统的联合，才能掌握。吸收造反派，建立组织是手段，有的处于少数地位也不怕。

谢：工代会委员要把附近的工厂串起来，业余时间可以串门嘛，我们有千把个工厂，结果你们只有 47 个单位，这怎么得了呢？用什么形式承认他们，抓大联合筹备小组，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抓紧时间，一分一秒也不能迟，要集中力量干这些工作，可以经过调查，吸收、批准参加大联合，筹备小组设在工厂企业，不要设在机关。

677. 戚本禹给地质部机关“革命造反兵团”的一封电话信 (1967 年 4 月 10 日)

“革命造反兵团”的同志：

四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

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同志曾向我谈过地质部的情况，他们认为旷伏兆同志是个比较好的同志，要以参加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我向有关方面对旷伏兆同志的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查，觉得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同志对旷伏兆同志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我希望你们考虑革命小将的意见，支持旷伏兆同志，迅速建立地质部领导班子，抓革命，促生产，在革命和生产战斗中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同时，也希望旷伏兆同志能够很好地依靠和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包括炮轰过自己的，反对过自己的革命同志)，虚心向群众学习，改正自己的错误，把地质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以上只是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同志和我的一种意见，供你们参考。

678. 傅崇碧在北京市厂(矿)军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 年 4 月 11 日)

讲几个问题：

一、目前支工、支农的形势

主席发出指示后，在全国我军参加支工、支农的人数有××××，整个形势是大好的，工农业生产上升。从全国讲是大好形势。就北京来讲，工农业生产也是很好的形势。

军队支工、支农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叫我们军队投入这个战斗中来，要我们解决问题。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把支工、支农搞得更好，不辜负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很多同志做了细致的工作，有很大成绩。当然，也不可能一点缺点没有。我们有很大一部分部队同志没搞“四大”，对文化大革命接触不多，体会不深。去年军队不介入，特别是学校、工厂有一个时候刘邓路线把革命的工人、学生打成“反革命分子”，我们没有看到，没亲自体会，所以对造反派心情理解就不够。我们有些同志到工厂，农村去，往往看党员有多少，老工人有多少，完全唯成份论来看队伍的纯洁。成份也重要，但是仅从这点看那是左派，那是保守派就不对。不能只看党员多、干部多、老工人多、他们听话。他们有保守的一面，干部一般都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精神差。另一派年青人多，成分不纯，但是造反精神好，造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方向很对。可是我们有些人就认为这一派不大好。特别是我们部队讲纯洁，因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但是到工厂去作为区别革命派和保守派的标准就不好了。这个观点不加以改变，群众是有意见的。革命派中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左派。革命派，跟着毛主席走，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这要逐步锻炼。真正的革命左派，毛泽东思想水平是很高的，斗争方向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要单从成分、听话来看，应从两条路线的斗争来看，如果离开两条路线的斗争看左派、右派就没有准绳。在工厂中要看是否反对彭真、刘仁和他们保护的

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他们的错误是轻描淡写、避重就轻，还是彻底揭露，是包庇还是划清界限。有些人成分很好，为什么犯错误，就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为什么有的干部子弟搞“联动”？“联动”坏得很。你说他们成分不好？好得很。出身不能选择，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完全讲成分不对，不讲成分也不对。要进行阶级分析，不能光看听不听话，要看造不造反。我们要从这个圈子里跳出来。

另外，军队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武装部队的干部在那儿住久了，老婆孩子在那儿，就容易偏听偏信。有的认为保卫科长可信，我们说特别是北京工厂的保卫科长的话，只能听百分之三十，有百分之七十不能听，因为他们搞的是刘仁的一套，和工厂的当权派有联系的。县武装部的话也不能全听，只能听一半，因为他们和县里的当权派有联系，有的就是县委委员。武装部保守的多些，你们听多了不加分析就会犯错误。有人说是武装部长不能罢官，工厂的保卫科长不能批评，谢副总理说了可以批评，可以斗争，群众认为不行的，可以罢官，但是武器、机密文件不能动。这点你们要注意，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好的。

工厂的民兵也搞起来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民兵要放在后期搞，不然，左派占优势的好办，保守派占优势的就会对左派进行压制，有的地方一搞，工厂左派就害怕。所以你们要多听革命左派的话。

现在接管了×××个工厂，整个形势是好的。但是由于我们站队站错了，可能有点反复。《十条》下来，在工厂、农村可能有些反复。全国有，北京比较明显。工代会召开前，“红色造反联络总站”、“职工造反总部”等四大总部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没有，现在又想恢复四大总部。中央说学生不要下去了，但是大中学生坐不住，想往外跑，特别是中学更坐不住了，急于到社会上闹革命。闹革命是好的，但有点浮，想去串连，现在没有经中央批准去的已几百、上千了。到四川万县、安徽、青海去了。甚至到海南岛去了。军训搞不下去了。主要是工人、学生坐不下来。

现在矛头有些地方指向军队。现在军队接管面大，有工厂、学校，全部工作加在军队头上，军管、军训、支工、支农，所以矛头指向军队，有这个趋势。另外是矛头向着领导。有一个反复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看了两张大字报打倒你，火烧你，不要怕。林副主席讲的和事佬了。有的地方开始反对军管、军训，但绝大多数是欢迎的，少数人不欢迎，不足为奇。经过反复，锻炼我们的干部，军管会的同志能不能经受住？赶你们，不要怕，要经受住。电报大楼把我们军管会副主任弄起来了。江青同志说：“你太软了”。我说软点好，几千人都抓起来怎么办？我们要开门让他们冲，就是不能开枪。他为什么不敢冲国民党啊？因为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是好事。不要稍吹点风，你们就动起来了。三级风你们就晕船？四级风也不要晕船。

现在是很好的形势，北京游行，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刘利用做毛主席的接班人的威望欺骗了很多人。《修养》、《清宫秘史》要很好地批判。我们要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擒贼要擒王，就是刘、邓，北京还有小王：彭真、刘仁、郑天翔。

我们的宣传队下去也有的发生了问题，乱宣传。有的军代表去了，和保守派搞得非常热呼。有的说：“你们这组织党员多，成分好，是革命派。”保守派当晚就送给元宵吃。还有的军代表，工人提了意见，就在大会上点人家名字，说：“你反对我，我是解放军。”卫戍区的布告派军代表，但是我们不能擅自利用职权。不要认为冲军事机关，冲解放军，就看得那么严重。冲中南海、国防部、公安部也没有看得那么严重。我们要准备他来冲，他信任我们才来冲。

工厂的武装部、“三结合”不能和他们结合，这点要注意。

群众对绝大多数军管会反映很好。但是，有的地方左派占优势，夺了权，生产搞得好，也军管了。这样地方以后我们不要军管，最多给他们一些帮助。下一步我们慢慢调查一下，那里有了问题，我们的军代表就去和他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

二、军管时不要管死了。现在管的死，有些地方有包办代替。只要左派占优势的，夺了

权的，生产班子一定要左派占优势。现在有的搞了统一战线，各派都有代表，群众反映是和稀泥，搞平衡。我们要照顾各方面，但是左派在生产班子中要占优势，不要让他们当陪衬。现在有些人感到是陪衬，我们要大胆放手叫他们办，我们管方针、原则，毛主席著作学习，防止他们做陪衬，有这种倾向的要马上克服。

干部亮相站队问题，不能打倒一切、排斥一切、肯定一切，“三结合”不要忙，干部一定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在批判刘邓、旧市委、本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亮相，必须经过群众同意，我们包办不行。亮相，问题不少。北京成立革命委员会推迟了，就是让委员、常委们讨论两天，我们不包办。没有群众基础不行，“三结合”的班子必须经过群众同意，走群众路线。不通过斗争来亮相，不走群众路线，那非垮台不可。军代表要注意，不要搞人家的黑材料。

三、支左问题。这个问题绝大多数工厂表了态，石钢、二七车辆厂、琉璃河水泥厂表了态，群众很满意；有些我们是暗地支持了；有的我们就支持错了，特别是南口的，要请工代会帮助调查。我们弄清了左派，就坚决支持。支持了右派，就承认错误。沈阳军区对苏家屯车站就支持错了，主动承认了错误，群众很满意，群众可以原谅他们的错误。不要爱面子，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没什么面子。错了就改正，不要硬往里钻。清华“井冈山”、北大、师大、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等革命组织对工厂联系很多，他们在工厂做了很多工作，对工厂情况了解很多，要赶快派人去，取得他们的支持。

要支持工代会，这是中央文革承认了的，发了宣言的。成立时，总理、江青、伯达及文革小组的全体都去了。一百多个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工代会的委员是经过选择的，他们所在的组织绝大多数是左派组织，我们要听听他们的意见，那些是左派，那些是保守的。工代会同意了，学生同意了，我们很快就把情况搞清了，就可表态。你们不要不关心工代会，一意孤行。一个左派组织当中，有些缺点错误不要紧，给他们指出改了就行嘛！他方向对，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人想把工代会、农代会搞垮，我们不赞成，不能叫他们搞垮。我们脑子里也有保守思想，赶不上毛泽东思想，赶不上文革小组，赶不上群众，我们不要陷在框框中，坐井观天，外边情况不知道，是要吃亏的。工代会代表下去，你们军代表一定要好好和他们谈，征求他们的意见。

当前抓革命，要把反刘邓路线、反旧市委的旗帜举得高高的。从大专院校的红代会中搞些材料去念，去广播，把他们搞深搞透，使那些受蒙蔽的人觉悟，就会起来革命。工厂可写些文章，组织工人揭发。现在“气温”一天天上升，我们有些赶不上。《北京日报》接管了，搞得很好。文革小组说，地方报纸第一位是《文汇报》，《北京日报》是第二位，(发行)十二万份，今天可达十五万份。

现在有打架的苗头，要注意。地质“东方红”和京剧一团打架。有的工厂也有苗头。

要很快把左派组织壮大，联合一定要左派占优势，不然会把左派吃掉。当前搞联合要发扬革命精神，要朝气勃勃，不要像去年五、六月份时冷冷清清。

抓生产问题，注意不要吃老本。机器的保养，原料的供应，掘进的准备，都要搞好。生产的东西要运出去。要有个全面的安排，不要像五九年的马鞍形，要搞起来，持续上升。生产要保质，保量，还要搞新的创造和技术改革。

现在风吹得很厉害，“气温”有上升，工人有意见，谢副总理让赶快给你们打打招呼，避免犯错误。

679.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卷)

680.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2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卷)

681.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五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4月12日)

时间：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时五分至十三日一时四十五分。

地点：人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萧华、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及总政、总参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徐立清、李天佑、韩先楚、宋任穷、张国华、陈先瑞等。

被接见人：区党委代表：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李树德、李质、郭以青、张鲁。

军区代表：吴涛、刘华香、萧应棠、黄厚、刘昌、王良太、姜文启、诸方玉、敖长锁和独立二师杨德松、尤亚明、华民等。

军区造反派代表：邵仲康等24人

呼“三司”等革命造反派代表：高树华、郝广德等57人

“红卫军”等保守组织代表：张三林等9人(王铎、王逸伦没让参加)

总理：现在开会，内蒙古情况大致清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嘛！今天请后来的同志再谈谈。

郝广德：(给总理介绍)这是张孝同志。

总理：那个学校的(翻材料)？

郝广德：“火车头”的。

总理：有名字没有(指是否登记过)？

赵刚、宋学孔：没有，今天才来的。

总理：那一部分的？

郝广德：“火车头”的。(张孝说了一句，声音很低)

总理：你能说话吗？“火车头”代表替他说说。

张孝：能！(旁边两人扶起)

总理、康生：坐下吧！坐下吧！

总理：不是还有一位“火车头”的同志嘛？

包长胜：有，我叫包长胜。

总理：你替他谈一谈吧。(包讲张孝受迫害经过，谈到残废时)

总理：治不好了吗？快送到北京医院！

张孝：我说两句。

总理：坐着说吧！(总理抬起头)你谈吧！(对赵刚)快点送医院去看看。(张孝：控诉被迫害经过)

曹文生：他讲的与事实不符，他们写过反动标语。

总理：什么标语？

曹文生：“青松不怕火烧，‘火纵’不怕狗咬”，攻击解放军。

康生：就为这件事，应该不应该把人打成这个样子？

曹文生：谁打的，我不清楚。要严惩凶手，我们要为受害者申诉。(大家冷笑)(包长胜：严厉驳斥曹文生等人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等罪恶活动。)

总理：(对曹文生)我问你，现在为什么不放人？这是不是事实？！

曹文生：据说是放了。

总理：就因为这条标语就抓人？

曹文生：写的是反动标语。

总理：这样的标语，在北京都有，怎么能是反动标语呢？怎么能是攻击解放军呢？

康生：没有说解放军嘛！解放军你们说拥护，中央指示你们拥护不拥护？

曹文生：拥护！

康生：拥护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放人？

总理：拥护？！早就说了，你们到下面还不放人。

高利陶(军区宣传部干事)：揭发张三林造谣惑众的事实。

张三林：我不愿解释个人问题。(众笑)

总理：你是不是“三司”的？

张三林：不是，我是“红卫军”的，橡胶厂的。

总理：先说这件事，你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还不放人？

曹文生：下午曾打过加急长途电话。他们制造停车事件，他们是不符合公安六条的。

总理：那一条？你们扣了几个人？

曹文生：八、九个人。

总理：什么时候扣的？

曹文生：二月五日扣了两个，五个是二月八日扣的。

总理：二月八日到现在已有两个多月了，为什么到现在不放？

康生：中央命令在你们那里算数不算数？

总理：四点指示有效没效？

张三林：有效，今天又打电话回去了。

总理：有效为什么还不放人？北京的同志来了没有？

李天佑：来了。(陈先瑞走到前面去)

总理：北京军区派一个小部队，军事接管呼和铁路局。(众：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总理：你们为什么不放？就算有点嫌疑，已经扣了两个多月了嘛！

康生：抗拒两个多月了嘛！

总理：(对曹)你还有什么辩护的？(曹文生没吭声的坐下了。)(包长胜继续揭发铁路局两条路线的斗争及曹破坏生产的罪行。)

总理：铁路局问题知道了，现在由邮电局王连奎谈谈。王连奎揭×区控制邮电、非法偷听电话等罪行，谈了邮电局二月九日成立保守组织，十号就反夺权。这时总理、康生等首长都笑了)

总理：你们有几派？

王连奎：两派。

总理：你们“三司”观点的有多少人？

王连奎：我们“三司”观点的三百人，“无产者”一百多人。并说二月十号反夺权，他们叫“三结合”。

总理：他们叫“三结合”？

王连奎：邮电局还调动农民保权！

总理：保什么权？多少天？

王连奎：三天。

侯凤英：还搞录音。

众：他们对打电话都偷听，还延续时间。(王连奎继续揭发盗用中央名义打电话等)

总理：邮电局驻有多少军队？

王连奎：一个加强连。

总理：现在听听地方的。锡盟许名扬同志讲讲。

许名扬：现在还有十三人没放出来。

总理：你们那里还不放人？

许名扬：不放。

总理：什么时候问的？

许名扬：中午问的。

总理：吴涛同志，这个事情交给你解决。(吴涛：马上打电话)(乌盟玉宝讲扣押人的情况，哲盟郭玉讲一人“畏罪自杀”问题。黄宝玉补充哲盟农村资本主义复辟情况。)

陈振中(巴盟代表)：听说部队支持煤矿夺权后，现在停掌子面。现在三十多人未放，他们说是中央军委指示的。

萧华、王力：这是造谣！

总理：(叫起兰州司令员说)你们处理。(又对吴涛同志)注意，我们还要和你们单独谈谈。(又问了内蒙日报社情况。)

李雨楼：报社压制得很厉害，现在军队和“红卫军”非法占据报社。

总理：报社几派？

王力：报社有保守派吗？

李雨楼：两派。他们还有一百多人。

总理：报社谁管？

李雨楼：他们掌权着呢！

总理：登什么内容？

李雨楼：没听总理指示，登了地方问题。

众：登“抗大”，登军区。

总理：有报纸吗？

李雨楼：没有带，我是从监狱出来直接上火车的。(黄宝玉、高树华等送上两份报纸。)

总理：高树华同志谈谈“联动”情况。(高树华谈了中学生中“联动”分子问题。)

总理：让二中讲讲。(二中代表任卫东讲了“联动”罪恶和枪的问题。)

高树华：他们还有电台。

总理：还有电台？有名单吗？给我，有多少人？

任卫东：十几个。

高树华：还有反动标语：“打倒康生”等。

梁音亭(军区后勤部)：他们游行时打着刘少奇的像。

黄宝玉：新华书店一千多张刘少奇的像都被他们拿出来了。

众：还举起像高呼口号。

张三林：我们从新华书店拿出来烧的。

康生：你们拿着刘少奇的像游行没有？有没有四个像？

张三林：不知道。(霍道余揭露他们批判刘少奇是假的)

高惠娟：二中赵玉花说，苏修、蒙修支持“三司”，周总理也支持“三司”。

总理：捏造！

韩文达：他们在火车上审问时说：王力是个大混蛋，“三司”的后台，要挖王力的根子。
(总理、王力大笑)

曹燕玲(军区“红色造反团”): 军区文办正在整理王力同志的材料。

包力陶：怀疑中央的根子，这是军区某些人，他们要挖王力同志的根子。

总理：王逸伦的报告是不是都听了？

众：听了。有的是三月三十一日，有的在四月七日。

包力陶：(详细揭露×区问题)他们说造反派在“一·二二”、“一·二五”事件上是吃里爬外。(众站起来指王良太：说过没有？)

王良太：说过。(包力陶揭露军区某些领导人造谣蒙蔽群众，刘昌传达反革命策略问题。)

康小春：德山(呼市军分区副参谋长)曾念过一个特好消息说：“中央叫各大军区学内蒙。”

总理：(手挥一份传单)我这里也有一份，纯属造谣。

陈永华：今天六点半来电话说：××二师协助保守派对工学院等革命造反派实行武斗。

张鸿喜：我也揭×师情况。……

总理：王志有谈谈。

王志有(“八一八”): 他们说有两条黑线，一个黑报，要揪李富春、李雪峰，要揪黑根！

(回头质问王良太)你说黑根是谁？

众：(质问)王良太站起来！(总理没让王讲。)

总理：不要问了，很显然黑根就是中央嘛！

王志有：河西公司反夺权后，报喜时，我们提出意见，说不要让外边的人到厂子里来。他们说是总理点头，林彪同志也在场。

总理：真是！造这种谣言。(蔚洋：揭露电台军代表造谣和反夺权问题。)

总理：全部是造谣。

王力：造谣。

蔚洋：他们说，林副主席说：你们打的不狠，手太软！不如表海，进度不快。

总理：青海文件你们看到没有？

众：没有。

总理：(对于顺昌)你们记者有文件，明天给读一读。

蔚洋：他们造谣说：李天佑根本不支持“三司”。

李天佑：我白天去“东纵”，晚上又从“东纵”东门到楼上，他们纯属造谣。

总理：电台有多少军队？

蔚洋：由一个班增至一个排。

总理：周文孝把农村发枪情况谈谈。

周文孝：给桃花公社发17枝枪，30发子弹。

总理：今天会到此结束了。明天九点钟再开一次，内蒙问题就结束了。让肖华同志与军区同志谈一谈，还有记者和联络员同志和大家谈一谈，还有什么材料送上来，明天开会时间九点。不要再增加人了，观点不要说了，已经很清楚了，已经两个多月了嘛！不然人越来越多。群众不要互相对立，不要着急。你们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要等待一下。内蒙古自治区大、分区多，还有各旗县，还有牧区，电话传达不到的可以派人嘛！

铁路局去的部队明天天亮就到了。铁路那位同志，明天送到医院，总是可以治好的。

明天晚上九点开会，有材料还可以送上来。要等待中央的布置，同志们受苦了，这是为革命嘛！我们一定要把边疆的问题解决好。

明天结束这个会，要靠革命造反派团结起来。散会。

(全体起立，鼓掌欢送总理及各位首长，总理等招手致意，大家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682. 周恩来对安徽省造反派的电话指示
(1967年4月12日 军管会办公室)

参加单位：军管会负责人，“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红革会”、“工一司”、“工二司”、省及合肥机关职工“造反司令部”代表(反夺权派)。

听电话录音者：“红革会”王洪兴，“工一司”王启腾，“八·二七”周道元，省及合肥机关职工造反司令部代表陈明元，军管会主任钱钧，秘书王瑞根。

* * *

周总理：你是钱司令吗？我是总理。人都到齐了吗？

钱钧：来齐了。

周总理：来多少人？请一个代表和我讲话。

钱钧：来了十个，每人有一个机子。

周总理：十个人，推选一个代表讲话。

周道元：周总理，我是周道元，是“八·二七革命到底”联络站的。

周总理：你们今天一点钟要开会吗？开什么会？

周道元：开万炮齐轰严光，砸开省委阶级斗争盖子誓师大会。

周总理：你们的主题和中央的意见不相同了。你们对安徽省军区有意见，要先和中央商量嘛！你们这样做，不是把矛头指向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你们想一想了没有？

周道元：我们是群众自发的。

周总理：群众自发，要有领导的嘛！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你们这个主题，不同意你们这样做，这样会造成群众对立，对你们自己不利，军区和军管会不好派代表和军队参加你们的会议和出兵保护。你们是革命组织嘛！这样一件事怎么连我们商量也不商量呢？同志们啊！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反映到中央来嘛！你们应该和军管会商量，取得协议。当前矛头要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能把矛头对准严光呢？这是不对的，严光同志虽然有缺点错误，应该把矛头对准以李葆华为首的安徽省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周道元：我们考虑不周。群众想到许多事情是严光和李葆华一道干的。

周总理：我们已把这个问题在北京开会时与你们讲清楚了，就解释了嘛，当时，同志们都满意了。现在你们又把矛头对准解放军的负责同志，不是对准李葆华，这件事就不好办了。

周道元：我把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好吗？

周总理：电话上就不要汇报了。现在已经一点钟了，你们今天的会怎么办？

周道元：总理不同意就不开了。

周总理：不开就好了。这个会不开为好，开了不好办，群众要开对你们自己也不利，对军管会的威信也不好。

周道元：对严光的大字报能不能贴？

周总理：大字报主要应该对准李葆华。对严光同志的大字报可以送到省军区和军管会，不要满街贴。你们有意见可派几个代表来北京，人要少，五到六个就可以，好不好，你们商

量一下，我等你们回答。(代表们商量后)

周道元：我们大家讲了，坚决按总理指示办事。

周总理：那就好嘛！第一步可以找严光同志谈谈，消除误会了就不一定来北京，如果不一致，可以少来一些人。重新说一遍；第一，今天的大会不要开了；第二，如果同志有意见，可以先来找军管会谈一下，彼此内部解决(周道元插话：彼此内部解决)实在不能解决的话，派五、六个代表来北京谈谈。

683. 周恩来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第六次接见内蒙四方面代表谈话纪要 (1967年4月13日)

时间：四月十三日二十三点三十分——十四日二点二十五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接见人：总理、伯达、康生、萧华、王力、李天佑等中央首长。

总理：同志们，现在开会。本来昨天说了，不增加人了，今天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听一听。两个多月了，我们已经都分别征求了意见，问题已经清楚了，不再发言了。根据占有的材料，我们得出来的决议，现在宣布。会后再由中央公布，不宜拖得太晚。我先讲一讲，讲完了以后再由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肖华同志补充。

两个月来，研究解决内蒙问题，我们掌握的材料都研究过了，分别和同志们多次接谈，我们现在认为有这样几点：第一个问题：内蒙军区的个别领导人，不是所有的人，二月五日以来在支持左派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从一月下旬报社问题后，本来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可以解决得很好，报社问题可以承认错误。刘昌开始先承认错误，可是回去一商量就变了。以后群众要求见刘昌，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不见，问题就大了。后来革命造反派还是退了，可是事情并没有解决，群众还有要求，还有很多、很好的机会，同他们见一下，事情是可以很好解决的。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和造反派结合。要支左嘛，对了就结合，错了就改么！这还不是决定性质的时候，弄清了情况重支持。

到了二月五日，人们说的“二·五”事件发生了，性质就变了。“二·五”事件，一方面表明革命造反派，工人也好、学生也好、包括外地去的、北京“三司”去的、上海二医大的都是革命造反派，支左嘛，请愿也好，静坐也好，会见也好，无非还是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支持他们。他们相信军区不会对他们怎么样的嘛。一月二十八日，虽然军委有了不让冲击军事机关的八条命令，但静坐是在门口嘛，不外乎是等待。内蒙的造反派和外地的造反派多次行动的精神，包含一部分河西公司“八一八”的，有吧？(答：有)都还是相信军区会支持他们的，军委指示下来了嘛！说明广大群众相信军区。可是军区不能控制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区认为他们都是右派，不是革命的了，是反革命了，不可调和了。打了两发子弹，命中一发。韩桐同志他还不以为×区会开枪嘛，这完全出乎革命群众的意料之外。

二月五日以来，还不承认错误，继续犯下去，还说是反革命组织，是反革命活动。×区内部造反派也受压迫，所以二月五日以来，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严重打击了呼市“三司”、“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到现在我手里还收到材料，成百的人没有放。除四川以外，其他地方都是中央决定以后就改了。内蒙拖了两个月。×区支持了内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以及他们操纵的保守组织。

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全国要批判，内蒙当然是乌兰夫和他的一伙人，乌兰夫很早被拉下马来了，离开内蒙古，撤了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政委的职务，名义上留了内蒙古自治区的主席，留在北京反省。把他拉下来，不是问题就解决了。他下面有党羽，有他的代理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还在支持他。以王逸伦、王铎为首，确确实实就是他的代理人。在×区二月五日事件

发生以来，他们很活跃。二月七日王逸伦就出来了，到军区和各处活动，本来生病嘛！不仅在内蒙，就是到北京来也是这样，还在继续指挥内蒙古。尤其王铎更加活跃，王铎的老婆在内蒙人委工作的喽(权星垣：内蒙人事局局长)，不断打电话，还到北京劝降。

军区不是支持了左派，而是支持了乌兰夫的代理人，支持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支持也支持错误了。跟革命造反派对立，被王逸伦、王铎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这是必然的。他们原支持的保守组织，本来可以教育，一支持他们，就被利用了，就发展了，跟上来了，问题大了。比如说：“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是跨行业的组织，在北京会谈时就变成了“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有工人、农民、机关、铁路、学校，实际上还是个跨行业的组织。等一下我下面还要说。为什么这样变化，总有人在后面指挥，所以指出：内蒙古军区个别领导人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他们在北京的六名党委委员也承认这一点。

内蒙军区党委某些领导同志，不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把吴涛同志打成三反分子，停止他的工作。在乌兰夫下去后，吴涛不仅是第一副政委，他还是军区党委书记，他还是第一负责人。你们说是群众把他打成的，军区党委没写成决议，实际上是军区党委决定的。你们支持一部分人，名义上叫造反派，实际不能叫造反派。因为吴涛同志和军区的认识不一致了，因此就把吴涛同志打成了三反分子，停止了他的工作，行动受到限制，电话撤销了，不能办公了，不能行使职权，军区没有正式报告中央军委。青海司令员兼政委支持左派被免了，形式上做了报告，内蒙军区还不如他们。你们看了青海的文件没有？(答：没有！)看了安徽的文件没有？(答：没有)联络员，把青海文件找几份今晚去读一读。青海刘贤权也是司令员兼第一书记，把职撤了，他们还承担错误。可是内蒙军区，还不承认，说是群众打成的，是三反分子，没有撤职。

军区党委还完全能够控制局势，三十多人被军区党委捕了，说是群众组织搞的，事实是军区领导人搞的。直到现在不仅在内蒙，还到外省，到北京、南京捕人。军区党委的权力不仅在内蒙，还能到外省，有的同志问他们的手怎么伸得那么长，怪不得群众说有后台。肖主任，这要有规定。不然军权滥用有危险。解放军是光荣伟大的，应该珍惜伟大的荣誉。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军区党委是错误的，是严重无组织无纪律，不能把责任推到群众身上，这笔帐要算在军区某些同志的身上，要由军区党委负责。不仅如此，另一方面同样性质的错误，还擅自逮捕已经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自治区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并宣布他们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中央批准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嘛！在组织上、在工作上某些方面，军区还得受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处理区党委这是中央的权利，军区既不向中央报告，也不经中央批准，怎么能宣布是三反分子，还逮捕他们。因为他们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保守派组织就赶他们、捉他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找造反派。

这两件事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军区在京的六位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至于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过的错误，应当接受群众批评，在斗争中改正。他们也承认犯过错误，他们推行了刘邓路线。但逐步认识，逐步改正，站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一接触他们，看到他们的报告，感到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也向军区表过态，说明他们自己过去犯了错误，希望军区犯这个错误时间要短一些，劝军区改变态度，这种态度是诚恳的。可是军区听不进去，重复错误，时间更长，还不认识。尽管如此，到了北京还不认识。他们已经和造反派接近了，但不等于错误都改正了。应该接受群众的批评。即使是保守派，如果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也应该接受，在斗争中改正。在这次斗争中他们已经有所表现，应该要求区党委领导同志继续有所表现。今后也一定会有所表现。

内蒙军区有些负责人，在中央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两个月来继续采用两面态度进行对抗中央的活动。李天佑来了？忘了找曾山来。(前面坐)二月八日韩桐一死，曾山同志去了，去内蒙调查韩桐牺牲问题，已经查出来，是×区打的，弹头也拿出来了，口径与×区子弹相

同。人证物证都在了嘛。两方组织去调查了两天，检查时对四方都说清楚了。回来后，把帮助化验的女医生马上逮捕起来，他们说是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不好，那位女同志来了吗？(田光同志站起来)你身体好些吗？(答：好些！)押了多少天？(答：三十天)看！化验一下就押了三十天，这是内部长叫她干的，你们就拘留审问。不是因为家庭关系不好，社会关系不好，就是让她说韩桐的死是学生打的，不是×区打的。这不是对抗中央吗？(问田光)是不是这样？(田光答：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子，面对中央、中央文革，就是这样，完全是搞两面派。这件事最突出了，逮捕的人还不放，到今天才放出来(出来了吧？)，这就没法解释了。你看，这不是两面派？对这件事我们是很不满意的。拖了两个来月，远的地方扣人不讲，呼和呢？不能解释喽，铁路局还没放人嘛！直到今天我们部队人去才放出来，我们实行管制才行。这不是两面态度？我们对这个问题很不满意。我们解决各省问题，从来没遇到这么为难，用这么长的时间。

难怪群众反映，证实了你们说的“重庆谈判”。重庆谈判是我们同国民党谈判，你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你们认为是重庆谈判，以为只要夺了实权中央就承认，那才不会呢！中央怎么能这样，只有国民党才能那样呢！你们把中央看成什么！把你们置于何地！我们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领导枪杆子出政权。党的最高指示是符合人民最高利益的，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军区谈“三司”组织成份不纯。造反派组织扩大了是有不纯，纯也不是绝对的。

军区内部也不纯，要认识军区是多方面组成的。十七年了，内蒙二十年是一块一块解放的，东部是1945年日本投降解放的，最早嘛。二十一年半，我们吸收了许多旧的方面来的旧立场，旧的思想，旧的作风，旧的习惯，这些都在军队领导人中生长出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海拉尔就吸收了很多旧的东西嘛！都影响你们，才说出这样的话。

内蒙古事件，主要由王逸伦、王铎负责，其次由军区的某些领导人负责。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没有坏人煽风点火，不会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开始是王逸伦，后来是王铎，王铎到北京还闹，王逸伦有些被中央看穿了。王逸伦、王铎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军区某些领导人，在内部不完全点名，因为文件发表会到处传，我们要维护解放军整体的光荣，不都写出去好。我相信革命群众会理解的，我想这会得到革命群众的支持，这是第一部分问题。

王逸伦是个坏人，我们和王逸伦谈过话，康生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识破了他。下面请康生同志谈谈。

康生：王逸伦是个坏人。军区某些负责同志认为他是革命左派。同时王逸伦也欺骗了一些群众和一些群众组织。同志们会想到，哪些群众组织被王逸伦所支持的，哪些组织的哪一些人支持王逸伦，要认识到是受了王逸伦这个坏东西的骗了。

军区一些群众组织，一些干部，你们要认识到受了骗了。你们把坏东西认为是革命的，军区支左，实际上是支右，支持了坏人的。绝大多数被他支持和蒙蔽的群众是没有责任的。

这次宣布他是坏蛋，大家应该觉悟起来，同他划清界限，彻底揭露他，把这个坏人揭出来。

我过去不认识王逸伦，一次在接见自治区党委会上，我见过他。一看，我见他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是一个普通人。他的一些表现、做法、神态、言行，我总觉得他象个特务。我问他：你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呢？他吞吞吐吐讲不清楚。我们这些人见共产党人多，接触国民党人也不少(总理：味道不对！)我问他：在哪入党？他吞吞吐吐的讲，日本占了赤峰，他不当小学教员，到北京就入了党。问他：是什么组织？他说是特委会。内蒙有个特别委员会，那是工作组织，也不是党的组织。问他：你怎么入党的？介绍人是谁？他说叫李铁然、刘刚。李死了，刘在哪他不晓得。他入党又没有候补期，很奇怪。入党以后很快就到上海一个中央局训练班训练。为什么没有候补期？为什么一入党就要训练？入党的问题弄不清楚。这里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入党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有一个中统局(中央统

计调查局)，国民党特务机构在北京负责人李铁钟，前两字和他介绍人的名字一样。此人是他的外甥，是他培养入党的，是一个叛徒，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京的负责人。王逸伦是敌人，混进我们这里来，得审查，是历来怀疑的。

第二个问题，他去临河县委作工作，曾经跑到北京来，那时北京机关被破坏了。他在这个机关住了几天没被逮捕，别人都被捕了，唯独他没有被捕，我们花费了时间了解。这是第二点。

第三、以后他自己与另外两个人一道从内蒙经外蒙跑到苏联莫斯科。我没见过他，很奇怪。我问他：你到苏联干什么？他说跑到苏联去学习去了。我问他在那里学习，他说在东方大学学习，更奇怪了，那时，我正在东方大学，当时有个制度，去苏联学习的，必须经过我审查。我不认识他，他说见过我，我们根本没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员。我看了他的履历表，根本不是在东方大学，而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研究院。我不晓得这个组织。我问他是不是在苏联特务机关工作，否则，怎么能不知道呢？非党员去了，如果没有正式关系也是不可能的。

38 年他从苏联经新疆到延安，我问他，谁把你派回来的？他也说不清。在延安，组织审查过他，认为这个人历史不明，党籍不清。他自己也要求做一些教育工作，接受审查，可能是在延安女大当教员(杨鸿文：我在延安女大，39 年没见过他)，有可能没工作。

39 年组织部派他到敌后冀南，介绍说：“是个党员，问题没闹清楚，”这是 39 年，1940 年 4 月 15 日中央答复北方局：“此人过去历史不清，同时，还隐瞒过材料，还没办法考查，孔原说他很有问题。”他说孔原了解他，这是孔原的意见。他自己要求做些群众工作，以待审查。他说，加入党是绥远的一个组织。

再一条，1934 年河北组织大破坏，他跑到被破坏的机关住了几天未逮捕，很怀疑。组织部给北方局说：“刘桐”(王逸伦化名)有几点：第一点，党籍不明；第二点，1934 年 1 月间组织破坏可能被捕，没被捕；第三点，虽正式党员，但不宜做机要工作，可在坚强领导下，做一些文化教育工作。“(大家笑)。

据他自己讲，32 年冬从上海回北京，还找过这特务的外甥。据他讲，此人在台湾。

他怎么到了热河？当时想打通同东北民主联军的关系，找在社会上与热河有关系的人，建立交通联络，北京市委黑帮刘仁在晋察冀，知道他家在热河住，从冀南把他调到热河，建立联络点，并不是叫他作党务工作。他到那里就组织了私塾房，做了私塾先生。后来又做了敌伪兴农创作社的董管事。现在你们有一位同志，叫赵子良，是内蒙古商管局办公室主任，写了一个材料讲：“王逸伦自称家庭是富农，实际上是地主。从冀南来赤峰搞交通，实际变节了。在他家乡的敌伪兴农合作社当起职员来了。王逸伦吹他所谓的光荣历史，甚至在××文章上写过，赤峰解放是王逸伦配合苏军进城的，说他是“土八路”，引以为荣。当时，我在赤峰，我是他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赤峰 1945 年 8 月 9 日苏军经过激烈战斗进城的，8 月 16 日王逸伦才进赤峰，怎能谈他配合苏军进城？说他是“土八路”，根本没有的事，而是土匪头子。因为他会说点俄语话，和苏军搭上关系，在地富支持下，搞了二、三百土匪，成为省团，还有伪旗讨伐队姓包的，他自称司令，老百姓叫他是土匪头子。后来与八路军接了头，谈他是地下工作的，蒙蔽了热北第一书记兼司令。他的大部叛变为还乡队。这是王逸伦的光荣历史(大家都笑了)！后来在乌兰夫下当了副主席、自治区党委书记。

1964 年，进高级党校，在高级党校不学习，每天晚上找地方跳舞，在跳舞中间与女特务孙秀文睡觉去了。你们这个传单不是有照片吗？(拿出党委“井纵”揭露王逸伦的传单)(总理：还有裸体的照片！)(康老拿出孙秀文的裸体照片让大家看，笑着说)太难看了，不能看！可是王逸伦还觉得很好看呢(大家都笑了)！

孙秀文绰号叫“洋野妓”，经常到保加利亚、印度大使馆睡觉。王逸伦对其父、敌伪人员、国大代表称兄道弟，王逸伦同这个女特务鬼混，职工对此事很气愤，对他们注意了。一天晚上搞鬼，把他捉住了，他说他是天津运输公司会计，胡扯！挂电话问，没有。又扯，又没有。人家要把他送到公安局，他才说他在高级党校学习，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书记、副主席。

高级党校半夜三更才接回去了。这件事林枫、贾震没有严肃处理，就把此问题转到乌兰夫那里。乌兰夫怎么处理的？（王永和：根本没处理，照片是从乌兰夫家里抄出来的）这个人一不是共产党员，二不是革命的，更不是军区谈的革命左派。受他蒙蔽的群众快觉醒。总理讲的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颠倒黑白，把他当成好同志。

总理：王逸伦是代表一种人。四月五日有个传单解剖了一下，现在，康老解剖的更清楚了。

二、中央决定由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调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刘贤权同志是被赵永夫罢了官的。这个同志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给中央写了信，很有立场，很有见解。当时，他就支持青海的革命造反派“八一八”。赵永夫已经查明，是反革命分子。把刘贤权同志调内蒙，青海还有另外同志担任。吴涛同志任政治委员。在华北局揭发乌兰夫时，首先是高锦明同志，吴涛在会上的立场很好。王铎很坏，和乌一起哭哭啼啼。当时在会上划分两方面嘛。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改组内蒙军区党委，并对军区发生的问题进行处理。不要讲得太具体了，革命派会理解的，写在文件上就要出去，内蒙发生问题苏修、蒙修很快就知道了，在乌兰夫领导下的一小撮，还没有清理嘛，不仅是军区方面。但毕竟是一小撮，不要扩大，也要实事求是。对军区说的含蓄一些，军队还有高度集中，还有总政、总参、军委嘛。

刘贤权同志来之前，北京军区调一个副司令员代理一段工作。滕海清同志来了没有？请他来嘛，同大家见见面。

第三个问题，成立以刘贤权、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样更会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可以参加筹备小组，革命派有资格。必须左派占优势。也不要忘记保守派改变立场态度，保守派经过开门整风，改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基层有代表性的，也可以吸收个别的人参加，这有好处。他承认错误检讨的好，也可以嘛！不要有对立情绪，特别是“三司”、“八一八”等革命造反派组织要考虑这个问题，今后情况变化了嘛。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作个良好的开端。

自治区党委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同志，经过革命群众同意也可以参加筹备小组。他们犯过路线错误，经过检讨、斗争，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嘛。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筹备、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领导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负责处理善后问题，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的班子，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

第四，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律平反。被逮捕的一律释放，包括军队内被打击的干部和战士，包括地方和军队，包括各地区、各分区，统统按这个处理（鼓掌，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对杀死韩桐的凶手，要依法处理。二月五日出现，二月六日发出电报就要追查凶手，到现在已七十天才解决。枪杀韩桐的就是×区柳青，内蒙×区一直不承认，有的人还想替他辩护，而且造谣说是学生自己打死的。吴涛，你打个电话要严加管制起来！（侯凤英：×区还给他送酒送肉，还过礼拜六。）（吴涛：已经戴上手铐了。）不准跑掉！跑掉你要负责任嘛。这个在文字上就不要写了，你们知道，群众知道就行了。上次的电报你们登了小报，犯了错误。但是你们态度很好。提醒你们造反派注意，千万不要再加注解登出去了。对韩桐同志可以悼念，开个追悼会，但不要把这件事过分扩大。悼念韩桐同志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三结合”搞得更好，这就是更好的纪念他。主席有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韩桐牺牲的有代价，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了，夺权了嘛！新生了！他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第五、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乌兰夫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从各个方面揭深透。去年华北局会议就把他揭出来了，拉下马了，撤了第一书记、司令员兼政委，就剩下名义主席了。从策略出发，主要是考虑蒙修、苏修问题，没登报公开揭露。斗争是逐步深入的，现在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天安门也有大字报了，去年我还劝，现在我就不劝了。

乌兰夫的问题，要在内蒙公开揭露，但不登报，从政策各方面考虑。(郝广德：我们要求把乌兰夫揪回去斗！)先不要把人揪回去，以后再说嘛！你们的斗争对象很多嘛！

王逸伦实行隔离反省，实际上今晚已逮捕了。(掌声，热烈鼓掌声)

王铎停职检查，交给群众斗争批判。(热烈鼓掌声)你们负责带回去，保证按政策办事。

康老：王铎还要向王逸伦学习哩！(大笑)

郝广德：我们红卫兵带回去，保证安全。

总理：第六个问题：帮助革命组织恢复和发展。筹备小组、军区支左等单位注意，如军管地区“八一八”等地按军管原则办事，“八一八”还是要存在。各基层组织上面也可以有个总的机构，不要搞跨行业组织。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很重要的，最高指示嘛。现在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要恢复发展，自己要有个整顿，不要一恢复就猛烈发展。否则内部就变成左中右。把根基搞好慢慢发展，即或少点，但斗争精神旺盛，真正推进造反精神。大联合以革命左派为基础。保守派的人改正了错误，也可以吸收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参加，保持左派占大多数，要保持左派组织的优势，引导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要做政治思想工作，不要打击报复。一方面要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极少数几个人，内蒙是乌兰夫，现又加上王逸伦、王铎了嘛！不准把矛头指向群众，对保守组织进行教育，有领导的帮助他们整风，不要包围某一个组织，要教育，要说服，要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在内蒙是批判乌兰夫及王逸伦、王铎等一小撮。“工农兵革命委员会”、“无产者联合总部”这样跨行业的上层组织应当解散。我说的是上层，这是盖子，不是指基层。这个跨行业组织就是革命委员会了。承认“无产者联合总部”就代替了革命委员会。安徽的这样左派组织甚至也劝散了。

你们这个组织本身就是王逸伦、王铎利用的，受了蒙蔽，发展猛烈，方向错了，路子错了，要改变立场，改过来。底下的组织不要取缔，有条件的要回去参加造反组织，回去的要欢迎，要让他们分化。一时转不过来的，就先在原组织里。

郝广德：反对中央文革的怎么办？

总理：反对中央文革的，也是个别人么！只抓几个头子。上层组织的头子解散，回到生产岗位上去，有条件解散，有条件参加群众组织的人应回到本单位参加，不要他不行。反动的另外法办。由筹备小组负责考虑，不要打击。一律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你们也有些缺点，不要增加错误，要减少，不要因为他们很残暴的打了你们，他们把我们的同志打的“脱臼”，这是野蛮残暴的办法，不要报复。否则，那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气魄，把最后顽抗的孤立起来。十六条说：“右派最后处理”嘛。有“联动”思想，有行动，有责任送公安机关。你们不要用武斗报复。侯凤英来了吗？(侯站起)，你维护解放军的荣誉，江青同志很赞扬你，大家应该向侯凤英同志学习(侯：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江青同志开会太晚，没有来(伯达带头鼓掌)。个人“私”字一点不要，这就是破私立公的行为，不要打、不要砸，他们自己宣布解散就更好了，考验他们，不应该占的材料，叫他们交出来。王铎、王逸伦的儿子也得按政策办事。

第七、结合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平反，释放被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拥军爱民的活动，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挑拨破坏军民关系。

刘贤权司令员去以前，派北京滕海清副司令员去内蒙军区做部队内部工作。青海完全是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搞的，是逮捕了很大数目，比你们多。战士受蒙蔽，是坏分子干的事。××师不敢出来，怕群众，“八一八”学生给群众做工作。不是解放军错，而是有反革命坏人。北京“三司”也派了一些人去。解放军后来出去仍然受欢迎。我们应该学习青海“八一八”造反精神，希望你们这样做，做好。你们死人一个，打伤被捕比他们少，青海 200 万人，你们 1,300 万人，你们是边境，地大，全国第二，140 万平方公里，青海也 100 万左右，你

们这一点掌握好，你们是不是真正革命造反派，这也是考验。要按产业、按系统组织，学生归学生，工人归工人，农民归农民。学生要开红代会，总不要搞盖子。“三司”做对了，不要都是“三司”，不要“三司”代替革命委员会。每一步都按政策办事。草案下达以后的许多政策文件，好好学习，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造反派众：有！），解放军还是功大过小，不要军区犯错误就抓住不放，曾解放内蒙古么！解放军的人员还在那里么！应该把军民关系搞好，严防坏人挑拨。如王铎、王逸伦，还有没揭出的一小撮。

众：我们信任解放军！

康生：口头回答是一回事，还要看实际行动！

郝广德：我们接受考验。

总理：军队内部也要团结了。不要以为你们对了，回去打闹，要求军队一视同仁，不能歧视。甚至吴涛都有这错误，好的信任，不好的，有问题的靠边站，这不对啊！

吴涛：不是我说的。

总理：记在你的帐上了，把这事说穿了好！要在新的基础上考验大家。

要向广大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这是毛主席多次向我们说的。由四大、五大（大串连）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夺权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经济主义，搞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一一被击败了。更加相信毛主席这个指示。正因为我们这样做，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群众我们才能进行史无前例的、从下而上的新阶段的伟大夺权斗争。在“三结合”中尤其要这样，解放军保卫运动。北京经验，毛主席接见1,200万人，工人、农民、市民都参加接待了。前后不过四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可信的广大群众，没有解放军保卫，秩序不能这样好，同时也相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刘邓路线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整广大群众。经过一些曲折反复，我们应该反其道。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

要通过实践，回去要考验，来的时间长，比青海来的人多。回去都要好好传达嘛！要派人出去宣传。

第八、要深入广泛宣传中央关于青海问题决定的原则。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中共中央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通知和军委的八条命令（一月二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附注五点）。

针对当时倾向后补充的。主席指示，今年介入，当然早已介入。要支左。支右当然不对，错了，改正嘛。当然发展到这么严重就不好了。后来二月加了五点。

现在，支左、支农、支工发生了一些偏差，后来发十条，八条和十条结合在一起学习，防止另外新的倾向，不要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

中央这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坚决贯彻执行。当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说了，比如跨行业组织问题；还有不只王逸伦、王铎嘛！你们回去还有事做的。夺权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解决。

铁路不是已经进行军事接管了，报社当然不能现在这样继续下去。

王力：被赶出来的造反派同志要回去。

总理：赶出来的先回去，外单位的也回去。邮电局那种方法就不允许了！不能带武器看管劳动，不能偷听。每个问题不能都靠我。你们用点脑筋嘛！原则回答就这些。请伯达同志讲几句。

伯达：经过很长时间讨论，总理宣布了中央讨论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座的同志欢迎了，个别的不欢迎。（革命造反派热烈鼓掌）只有毛主席领导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无限信任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充满信任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伟大胜利！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胜利！是人民群众的一个大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的大胜利！是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大胜利！

关于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刚才周总理谈的很多，说的很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要看到这个问题，懂得这个问题，要看到整个人民解放军的保护作用。没有人民解放军的保护，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不可能搞起来的。所以要看到主流，要看到人民解放军的主要成就。

有的坏人混到我们的队伍里边来。这些坏人终究是要被揭露的。象刚才周总理和康老所讲的，王逸伦，枪杀韩桐的凶手，这就是坏人，混进我们的队伍里来干坏事！当然，也有一些好人做了坏事。另外因为不了解情况，把事情看错了，对好人做了坏事就改，改了就算了！他们要把错误引为教训。这样，我们的事情就做得要好些。

要重复一下周总理刚才说的。

你们回去不要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嘛！人民有权利向他们提意见的，要通过适当的途径提意见，不要公开在街上贴大字报。对人民解放军有损害的事都不要做，因为损害人民解放军的荣誉，是敌人喜欢的，毛主席不是告诉我们嘛，敌人所喜欢的，我们就不要做，我们对敌人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做敌人喜欢的事。刚才总理讲：要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军民团结。毛主席告诉我们，解放军最根本的是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非常重要，这个团结，就象平常讲的鱼水关系。鱼没有水不能活的，人民解放军不能离开人民，人民解放军是生活在群众中的。

另外一方面，群众也要懂得，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有几百万，正象毛主席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有的是坏人做了坏事，有的是好人做了坏事，发生了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思考，懂得动脑子。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问题，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你们现在是胜利者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胜利！说这样一条有好处。对个人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不要损害人民解放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保护这个关系，象保护眼珠一样。（热烈鼓掌）

总理：下面请萧华同志讲话。

萧华：我完全拥护中央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拥护总理和伯达同志的指示！

两个月来的座谈使我受到了很大教育。内蒙军区从一月份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个别领导人没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保守派，打击革命派，对军区内部持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实行压制、打击，使内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挫折。一些同志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我们听了很难过。如果再不改正，后果是严重的。

正如周总理传达说的，有坏人做坏事，有好人犯错误。坏人做坏事有王逸伦、柳青。王逸伦是埋在内蒙的一颗定时炸弹。柳青是第一个向革命群众开枪的，是坏人，性质十分严重，影响很坏，要严肃处理。

另一方面，好人犯错误，其原因是站错了立场，没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屁股坐在哪一边？矛头指向谁？是根本问题。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站在群众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一边？是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乌兰夫、王逸伦等人？还是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立场站错了，就全盘错了！还有认识糊涂，不做调查研究，受了欺骗上了当，要好好接受教训。按毛主席教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犯了错误就改。内蒙军区某些领导人，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屡次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但不改，还采取两面手法，支持保守组织夺权。抓人问题，总理几次指示，未放，直到昨天夜，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特别说明一点，林彪同志和军委从来未支持内蒙军区的做法，他们许多事

都未请示报告。

中央做了决定，内蒙军区要坚决执行，不折不扣。连同青海等地区的命令、文件，在军区内传达学习。立即把立场站正过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坚决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来。只有你们紧紧转过来，才能有效的说服广大革命干部、战士。

问题不在下面，在于领导。广大革命战士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只要你们领导干部态度鲜明、立场坚定，把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传达给他们，把一小撮坏人的欺骗戳穿！是会很快扭转的。事实上军区有许多干部、战士、家属、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同意某些领导人的做法。反而采取压制打击的办法，也是错误的。现在开始有所觉悟，特别是中央决定、负责同志的指示，为你们改正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相信，你们立场错了，很快能改正过来。某些同志虽有错误，你们是老同志，犯了一些错误，迅速改变过来！很快改过。千万不要错上加错，使矛盾转化。

刚才总理说过：毛主席说第一相信和依靠群众；第二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第三相信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所赋予我们的职责，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非常艰巨，非常光荣。

支持左派，首先是思想上的支援。首先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不只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在这方面应该平心静气、诚心诚意向小将们学习。他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表现在始终坚持了大方向。

同志们，战友们！特别是“三司”的同志们！你们对解放军的批评、斗争，是对解放军的爱护，如果没有你们的斗争，他们的错误就会越大，造成后果越大。今后，你们还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对部队同志提出批评，更好地互相帮助。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战斗的，要接受人民的监督。由于历史原因，内蒙地区的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又处于防修前线，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相信革命的左派，一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团结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一定能彻底批判刘邓路线，彻底地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打退大反扑，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军民团结一致，把内蒙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热烈鼓掌)

总理：需要说明两点：

需要军事接管的要很好准备，河西公司也要调整。军区的同志不能回去，还要商量。“三司”的同志们也可以晚走一天，你们多呆一天，不要过于急，已经七十多天了嘛！

明天念几个文件，如青海问题的决定等，军委八条，五点补充，十条命令等，还要做一些工作。

在北京接洽一下好，包括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同志，走马上任么！

另外一件事。财贸办公室林蔚然来了没有？(林站起来)向你说清楚，你不是代表，叫你来是要核对王逸伦的问题的。你跟王逸伦多年么！因为我们情况都掌握了，就没向你了解，你也知道自己的地位。

郝广德：他(指林)是王逸伦的脑袋。

林蔚然：我好好检查错误。

总理：大家也了解他(指林)，讲清楚，不然也说是作代表的。
现在宣布散会。

(革命造反派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周总理也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造反派热烈鼓掌欢送总理和其他首长，中央首长招手致意。)

684.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4月13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一卷)

685. 谢富治、张春桥、戚本禹、傅崇碧等接见中学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13日 人民大会堂)

戚本禹：蒯大富，听说你支持刘刚拆中学红代会的台的大字报？

蒯大富：没有看这张大字报。

李冬民：蒯大富很“关心”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大笑)

戚本禹：原来大家对你的意见很好。现在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意见？

群众：蒯大富可以代表刘刚。

戚本禹：不要这么说，蒯大富怎么可以代表刘刚？怎么样，你们双方各派一个代表把你们的观点简明的说一下，简单一些。中学生最近打得很厉害，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派我们来讲述意见。意见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指定由我来讲，谢富治同志是市革委会筹委会主要负责人，他有些看法和意见和我们一致，他也来讲讲。总的意见经过讨论，具体讲法没一块讨论过，仅供你们参考，有意见就不要在这儿讨论了，下去讨论。这并不是压制民主，对的接受，不对的可以不听。

下边主要讲三个问题：

- (一)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 (二)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
- (三)中学红卫兵的光荣战斗任务。

(一)如何对待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这个问题一说大家都知道，要爱护解放军。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怎样对待理解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中学红卫兵应正确对待我们的光荣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满街贴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我们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说炮轰李钟奇的人是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不赞成把矛头指向李钟奇。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同志都不赞成……，蒯大富也不赞成的……。四月四日会上讲过一次没有引起同志们足够的注意、重视。有人说炮轰李钟奇不是反对解放军，但是李钟奇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参加军训的，他是卫戍区副司令，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全市贴这么多大字报不利于斗争的发展，不符合当前斗争大方向。当然贴大字报的同志可能出于好的动机，但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经过了解和考察，李钟奇是好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热烈鼓掌)杨成武同志亲笔给我们写信，介绍他的经历，李钟奇同志是在六盘山带领小部队的起义过来的。三五年冬在骑兵连里当连长，后来当营长，参加过震动全世界的平型关战役，三八年当副团长是平汉线上八路军有名的副团长，日本鬼子很害怕他，后来又带部队到延安，参加保卫延安的战斗。解放战争是在华北，解放后先在中央军委工作，后来调到卫戍区工作。这个同志有错误有缺点可以善意地提出，但我们不主张打倒他，不主张炮轰他。他不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希望同志们考虑这个意见，我们也不强迫大家接受这个意见，我们希望大家考虑这个意见。

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工作中作了大量成绩，造反派有困难，解放军就支持。山西、贵州、黑龙江等地都是在左派困难时期支持左派的。有的部队指战员为了支左，挨打、挨抓，

腰被打伤。解放军不仅过去有功勋，文化革命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对左派有很大的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闹经济主义时，解放军挺身而出，反对经济主义，军事接管，夺了权，对铁路、工厂起了很大作用。接管后迅速恢复了生产。部队在支左过程中，把毛泽东思想带到那里，与同学一起学习毛著，他们作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红卫兵战士都应该看到这些伟大成绩。如果不看到这些，就会迷失方向。但是，解放军在有些单位支左过程中，出现了毛病，如青海、四川、内蒙就出了毛病。少数是坏人操纵的，多数是具体工作同志对两条路线斗争不了解，对运动不理解，对他们来说应该很好的认识。但我们认为多数是认识问题，跟不上，不能简单地看问题。这个情况，我们只要回顾一下自己的情况就可以理解。出了一点毛病怎么能说是刘邓司令部的？你们就是一直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的吗？蒯大富就曾经犯过很严重的错误，错误不小，你们的错误比他的小，谁还有不犯错误的？大风大浪里学游泳，谁还不喝几口水？我想你们这回回去检查一下，看是否都正确。我小时学游泳喝了不少水，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正确就看不起人家，否则就会走向反面。我就犯了很大错误，叶向真我曾经认为是左派，但看错了。你们为此就能说我就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吗？你们不会这样说的，你们对我好。(张春桥插话：上海蔡祖泉开始有些“保”，后来自己改正了，我说了几句公正话：“既然人家改正了，就不要揪了。”人家说我是蔡祖泉的后台。)

戚本禹：什么东西不要乱上纲，否则就不好办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一小撮，不要看成一大片，这样就会打击群众。我们自己喝了一些水，也要允许人家喝一些水，他们是老战士，你们是新战士(傅崇碧：“我们也是新战士！”)解放军犯了错误，你们要指出，但不能一棍子打死，怎么样，谢副总理？不能光允许红卫兵喝水，就不允许解放军喝水？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不清)，我们中国人民靠什么？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要爱护这个军队，象爱护眼珠一样。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没有她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四大”要靠解放军来保证，我们现在打倒刘邓，苏修是吃干饭的吗？没有解放军苏修早该进攻了。彭、罗、陆、杨正是和苏修里应外合，有些情况这里不必说。没有人民解放军，苏修就会捣乱，在任何地方都不要不爱护解放军。李钟奇本人也说：“这些小将很好，打倒我，我也不打倒你。”因此我们更应该爱护他们。解放军有他们的具体困难，他不能轻易地发表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不利于他们的事，你们不要要求他们象你们一样。李钟奇是我们部队的一个好同志，是好样的，是革命的，我们不能拿红卫兵的要求来要求他。

有些地方对解放军不分析，把支流当主流，这是不对的，把解放军的事，公布在大街上是不对的，我们不赞成。不加分析不对，不能说青海不好北京也不好，有些地方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后来又请罪，又承认错误。林彪同志说：不要请罪了。现在又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更错了。有些保守组织更危险。军队内是有坏人，但是是极少数，有些地方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不是同心协力，而把他们当成打击对象，不把他们当成阶级兄弟，这是错误的。林副主席当国防部长以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了伟大成绩。毛主席提出的口号：“向解放军学习”不是随便提的，就因为解放军好。毛主席从来没有指向四川省委学习，向旧市委学习，现在象轰西北局那样轰解放军大方向对吗？！毛主席号召向解放军学习，你偏轰，大方向对吗？！解放军在青海支左问题最严重，但在全国绝大多数是好的。别的地方怎样估计，一定要看主流，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方法不是革命派所采取的。要全面看问题。我建议你们北航“红旗”和清华“井冈山”要正确对待解放军，不然就会重犯历史错误。你如果重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把和解放军的矛盾公开化，那就不错才怪？！那时就不好对你讲话了，因为已经有先例。

上次有些学生冲国防部，刘志坚要镇压，结果叫我给劝阻了，第二次又去冲，也叫我给劝阻了，第三次还去冲，就不好说话了。如果哪个部队有错误，人家正在改正，你还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别人就很难办了。这点我希望同学们注意。最近我发现中学生水平很高，但在对待解放军这个问题上，大学比中学高。(群众：蒯大富可不高！没有调查胡乱支持。)蒯大富的问题你们可以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就允许人家改正嘛！(群众：他怎么老错呀？！)刘

刚给红代会贴的大字报不好，他只要收回就可以。(群众：有人说李冬民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亲“联动”……)我不赞成说李冬民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李冬民是反“联动”的嘛，他怎么能亲“联动”呢？但不能去反对刘刚，她也是好同志，大家通过讨论分清是非就算了。我建议你们两边不要再算这笔帐，不要再打了，好不好？你们对解放军和军训提了很好的意见，李钟奇支持你们，但贴李钟奇的大字报不是有功，傅崇碧不要整他们，他也不会，他是好人。两派不要互相埋怨了，我看你们有些同志还不如五六百年前的好汉，那时候没有毛泽东思想，不打不成交，李逵和张顺打架，后来宋江来了，说别打了，都是弟兄，上山喝酒去。你们不要去喝酒，但你们一定要联合，你们不要一点毛病就算老账，否则太对不起毛泽东思想了。那时李逵没有读毛选，毛主席语录一条也不会背。

现在新北大公社和地质“东方红”打架，我特别不满，干架，你们都是一家人，你们内部有矛盾，可以和稀泥，内部矛盾分清是非，就要和稀泥，你们不要怕和稀泥，这不叫右倾投降主义，这不叫和稀泥，他叫，你就和吧，你别怕。

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解放军，解放军从井冈山建立到现在都是正确的，敌人很害怕，威震天下。不能给解放军抹灰，我们一定要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解放军，眼里有沙子，我们应帮助洗掉，不要把眼睛挖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反帝反修的工具，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是大的错误，就象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一样。解放军是人民的一切，没有她就没有一切。我们要向解放军学习，个别的部队领导同志有错误要帮助他们，但极少数军队坏人可以轰，象罗瑞卿和他这样的人物就可以斗争，因为他不能代表整个解放军，因为他是反革命两面派。(谢副总理说：“是国民党。”)你们可以轰，轰得对。我们从来没说不对，但不能轰解放军。一个意思，不能给解放军抹灰，有错误有缺点内部解决，如果他们不接受，可以向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反映。

另外，我们希望同志们注意，中央文革不赞成大批同学出去，你们应该发一个通知，不应该再派人出去了。因为中央有明文规定，停止全国大串连，这是中央的指示，请遵照执行。可派几个红卫兵记者，但不要以中央文革的名义，了解一下情况就可以了。

(二)阶级观点和阶级路线。林彪同志最近有个录音报告，以后再讲。林彪同志说共产党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不搞阶级斗争就不是共产党。古今中外，一直存在着阶级斗争，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阶级烙印，我们要自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事物，指导行动，离开阶级斗争观点，就会犯绝大的错误，我们就容易看不清方向。对每一个问题的评价，对每一个问题的看法，如果离开了阶级观点就是错误的。如对待出身、青年等问题。青年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资产阶级的，干部子弟有属于无产阶级的，也有属于资产阶级的，应该用阶级观点来贯穿中学运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我们知道，中学运动一直就围绕阶级路线在争论，开始是反动血统论，后来是反动的出身论。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问题，也必须用阶级观点来对待成份。《毛选》一二七九页说得很清楚：“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这两边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开始是反动对联的出现，唯出身论，伯达同志说，这是封建的。但这不是独创，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也讲血统论，它认为德国人血统高贵，日尔曼人血统高贵，蓝眼睛的人血统高贵，黄种人血统低贱。古代也有，帝王将相的儿子血统高贵，奴隶的儿子血统就低贱。由于这种宣传长期统治人们的头脑，劳动人民认为自己的命运不好，不敢造反，农民起义领袖认为要请姓刘的作皇帝，因为姓刘的命运好，这是骗人的。现在有些人，接受了这些反动的血统论。有些人长期做官当老爷，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使他们自己认为血统高贵。人家不同意他，他就“打、砸、抢”来压人，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他们生活条件优越，忘记了劳动人民，走上了反动血统论的道路，所有的同志，红卫兵，特别是老红卫兵，更要特别注意，但这悲剧还没有结束，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觉悟，还搞“打、砸、抢”，有些人被关到公安部，有些人还没有放出来。

清华附中红卫兵写过“三论”，写得比较好，我对他们有感情，就到他们学校去了。找

他们座谈。会后他们散发传单，说我没有汽车，坐王力的汽车，还不知从哪儿听说我是十七级干部，说他们家趁俩。我没有汽车，我很高兴，他们分三、六、九等真可悲！八一学校的同学，连玻璃自己都不擦，出来见有人扣子没扣，就说是流氓，把人打一顿。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确实很可悲！还和他老子一块看帝王将相的影戏，受影响很深。做了二十世纪的唐吉柯德，他们还想翻案，说什么十年翻案，二十年掌权。我看他是掌不了权了！

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性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我们号召不同出身的人都要在大风大浪中改造思想。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要背叛他们本家庭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出身论》却号召人们不讲这些，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群众：《中学文革报》已被取缔。）光取缔不行，要批它的反动思潮，（群众：现在有些学校，一提出身就是血统论），说明有些人在反对血统论时想混水摸鱼，进行煽动，我们要注意这些。我们要紧紧抓住主席的两点：既反对唯成分，又反对忽视成分。首先要看出身，但不光看这点，他们出身不好，但欢迎他们造反，但不能否定出身，不能否定阶级分析，不能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生活中所受的影响。

(三)中学红卫兵的光荣战斗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对刘邓路线的大批判，每个红卫兵战士都应积极投入这个大批判，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学的斗批改，打倒“联动”。昨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汇报》的社论，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这个社论是好的，向全国推广。听说有人不赞成这个社论，向《人民日报》社提意见，提意见是可以的，我们表示欢迎，但这个东西是正确的。上海女六中小将的作法是有普遍意义的。有人不理解。有些学校大联合还要经过一个阶段，现在多数学校分为两派，有的是革命派与革命派；有的是革命派与保守派；有的是革命派与反革命派（“联动”派），革命派与革命派有原则与非原则的问题，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摘桃子的问题。有些革命派不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这是错误的。为个人摘桃子不是无产阶级思想，而是资产阶级思想。有些作法不对头，“私”字当头，不能团结，这错误不小。他能代表无产阶级摘桃子，我们就拥护他，如若代表个人或小团体，上纲的话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些作法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不能学习。革命派要联合，完全按《文汇报》社论办事，为什么要打内战呢？革命派与革命派应按社论去作。

革命派与保守派。有的派比较保守，全部检查这个方法不好，应该通过自己教育自己。革命派和保守派也可以联合，要在批判刘邓的基础上联合，把批判刘邓落实到学生是不对的。保守派保了几天也保不了。就是对错误有所认识，落实到保守派组织和班上也是不对的，不应该把矛头对准人。革命派和保守派联合也应按《文汇报》社论搞联合，时机不成熟，以后再说。革命派和反革命派（“联动”）不能联合，如果联合就是和稀泥，你喊“刘少奇万岁”我就不能和你联合，这种必须认识错误，必须用实际行动批判“联动”。但对于一般成员与头子要区别开来，多数是受蒙蔽的，和顽固分子要分开，不是和他们联合。对于这点《文汇报》社论没提到，除此之外，《文汇报》社论适合一般情况。中学的任务是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要好好学习主席著作，认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刘邓路线的毒害。

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要与本校的内部斗争结合起来，斗争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学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是与刘邓有关的。大批判、大联合也要结合斗、批、改。在进行斗、批、改的工作中，大中学校要有典型样板，将斗、批、改搞得象个样子。现在很多学校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清楚，现在打内战大方向不对。在斗、批、

改方面必须有经验。清华大学没有，你蒯大富太不高明，你们学校也在打内战，现在“井冈山”某战斗队又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蒯大富没有领导好，你怪谁？怪你！本来“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应该好好学习。《红旗》是代表党中央的，不是代表林杰或某一个人的。学校斗、批、改很重要，你们能作好就是完成了大任务。中学革命派必须大联合，在大批判中提高毛泽东思想的水平，在批判斗争中搞联合，我们不要打内战，最主要是参加大批判。通过大批判，在大批判中内部问题必须解决。

中学红代会不要学习大学红代会，他们那样不好，反刘邓路线没那么大劲儿，可打内战却那么带劲儿！放着整个刘邓路线不管，口号喊批判刘邓路线，可实际上不管。现在你们中学内战还在扩大，“联动”不管，却打内战。谢富治同志很生气。他是个老好人，不爱生气，但也生气了，生了很大气。地质“东方红”，“新北大公社”打得火热，对“联动”，中央文革提了好几次，让你们调查你们没干(群众：《兵团战报》没反“联动”)，应该写些批判“联动”的文章在小报上发表，不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兵团战报》不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同意。(群众有人说：红代会是改良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我认为红代会(中学)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时群众较乱：群众：大家安静一下，听首长讲。)我不是首长，他们二位是首长，我是普通工作人员。四中杨××来了没有？(说：来了。)你能给“联动”作些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吗？(杨：我不认识“联动”的，也找不着)“联动”讲“老子英雄儿好汉”，你老子是英雄，可以和他们多接触，但你不一定好汉。你可以请些大学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帮你作些工作，让“联动”的老百姓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你敢不敢？(杨：敢！)不要怕！好了，我就说这些！好不好。

张春桥：

我没有多少好讲的。我们商量过的戚本禹同志都讲了。我讲一点意见，全国红卫兵都在看着北京，我既在中央又在地方，主要在上海。你们住在北京，对全国红卫兵不大考虑。去年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今年中央决定不串连了，全国红卫兵不能到北京来了，北京红卫兵的行动对全国影响很大，我这几天在北京有一个感觉，大学、中学的红代会都成立了，我们希望你们一定走在前面，随时给我们提供经验，成为我们的模范。我说几句心里话，这两天我真有些担心，大专院校那样打法是错误的。

有同志递条子说炮打李钟奇不是炮打解放军，刚才戚本禹讲了，李钟奇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李钟奇是好同志，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十六条已经讲过，要把讲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人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严格区别开来，今后你我都会说错话，现在满街都有说李钟奇是“联动”后台的大字报，“联动”后台就是反革命，那你还可以说他是反革命。

有的同志递条子说今后可能会受到一些压力，我希望同志们不要压人，这是一个大辫子，你们整人家，下次就批评你们，我们要讲原则。我们的意见并不强加于你们，我们所谈的问题都是大问题，望你们考虑。现在一定不能离开大方向，离开一点，航向就错了！有些单独看来还是对的，但要和大方向联系起来看就不对了。我没有更多的话，我希望首都大中学生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全国作出榜样，全国都会跟你们走。你们一开红代会，全国都在准备开红代会。红代会的大方向应该肯定，你们要求改组，我不了解情况，我们常常在念一条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要大方向对，不要怕有缺点、有错误，已经做了的就不能象文章一样改来改去，我们可以经过共同努力，搞好一些。现在天津也正在闹这件事，三个会，中学闹得最厉害，里边有缺点，我想这是难免的，不可能一下子就搞得那么好。我们也希望你们在这方面搞好。总之，我希望你们能成为全国的模范，全国的榜样！

谢富治：

同志们、同学们，刚才戚本禹同志和张春桥同志都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要依靠群众，依靠解放军，依靠革命干部的三结合。依靠群众，当前最主要的，就是依靠革命造反派。三依靠，依靠解决军不可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领导的军队，在保卫文化大革命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有错误、有缺点可以在内部提，这条很要紧。我们要对解放军有正确的认识。

有人递条子说炮轰了李钟奇应不应该检查？炮轰了李钟奇要以高姿态自我批评，我看不必了，轰一轰对解放军也有好处，今后不要再轰了，明天不轰就好了。解放军对你们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检查了。(戚本禹插话：愿意检查就检查，不强迫。江青同志最近坐汽车在北京转了一圈，看了炮轰李钟奇的大字报后很不满意。中学红代会应用大字报糊上。)我不同意检查，我不同意，不同意轰李钟奇的人压轰李钟奇的人。另外，别的同学也应高姿态，不要再提这些人贴大字报的事了！我完全同意刚才两位同志的发言，刚才张春桥同志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张春桥主要在上海，他讲这番话是为了北京，也是为了上海，伯达同志也提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北京红卫兵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北京红卫兵要在这场大风大浪中继续起带头作用。首先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决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站在中央文革小组一边；坚决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这点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起了作用，特别是当前同刘邓的斗争必须彻底打垮，搞臭“联动”！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也要结合斗争彭、陆、罗、杨、旧市委大大小小反攻倒算的人和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学运动的关键，同“联动”的斗争并没有完全打胜，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把“联动”思潮批深批透，从组织上把“联动”打击瓦解，“联动”的头头儿还没有完全打败，他们还在活动；同时要把“联动”中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

对“联动”，中学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须相当努力。内部问题应该内部解决，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全力对敌。大方向一致，小问题保留，千万不要转移大方向！犯了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只能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得到解决。今天来的人很多，戚本禹同志也讲了很多，没有听取群众的意见，时间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再讨论了，明天回去再讨论吧，就这样做了。

傅崇碧：

同志们，刚才戚本禹、张春桥同志和谢富治副总理讲了，我认为同学给卫戍区贴大字报是好事情，对我们是一个鞭策，我们认为很好。有些意见我们认为很对、很好。我们一定要改正错误。前一段军训时间长了一点(即每天时间多了点)，有些学校强行推行延安中学的经验，我们有些人说了一些错话，我们欢迎大家批评。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欢迎大家提。我们已经找负责军训的同志作了一些整顿，我们犯了错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对解放军是爱护的，但不要在大街上贴大字报了，可以把大字报送到卫戍区，送给我们。已经贴了大字报也没什么，改了就好。贴了大字报的人也要放心，解放军把你们当革命小将看，不要想得太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解放军坚决和同学们站在一起，坚决批判刘邓，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垮、斗倒、斗臭！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批评一下没什么，有问题多联系，多帮助。

686. 李曼村的讲话 (1967年4月13日)

会议开始后，李曼村同志首先作了简要的讲话，他对四月十一日驻京部分院校、文艺团体的造反派集会游行以后到全军文革提出的意见说：“这些意见我们已经迅速向上面作了反

映，一定研究解决，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意见。”

李曼村同志讲话以后，各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提出了许多问题，李曼村同志作了回答。

重庆后工代会(简略后工)：全军文革的命令中指出后工“红总”是“右”派组织，应该取缔！这是谁发的命令？

李：不知道！

后工：我们因为不同意当时重庆市的夺权，警备司令部对此不满，就要取缔我们，调动几万人围攻我们，砸抢了我们 10 多辆汽车，抓了我们 40 多人，他们扶植保皇派，成立了所谓文化革命委员会，右派成了“左”派，他们点名要抓谁，警备司令部就抓谁，逼着人写检讨书、请罪书，还有两个营的兵力常驻校内(四月十二日才撤走)实行白色恐怖和法西斯专政，经常挑起武斗，保守势力集中住在一个楼，扬言要和我们血战到底，骂我们是右派，总后张池明和当地警备区有勾结。现在警备区人又急忙赶我们下去支工，当时打电话告诉全军文革，你们有人说：“后工红总就是坏”，“全军文革不管，你们自己搞”。你看怎么办？

李：这些情况不知道，现在可以表态，你们把“红总”打成“右”派组织，抓了那么多人是严重突出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已派了调查组去了，有十条(四月六日毛主席签发)作武器，这些问题可以解决。

后工：××军×副军长说：“你们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十条到现在还扣下不公布出来，造反派看不到。

李：(这时对全军文革工作人员说：赶快打电话去追问，十条为什么还不发下去？)

后工：取缔我们，抓我们的指示都是叶剑英搞的，我们要你澄清。

李：我不知道，没法澄清，我可以反映。

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代表提出：北京军区 3 月 28 日抓了我们六个人，全是造反派，现在还在隔离反省，一再交涉不放，还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不符合你们情况。”“这六个人是敌我矛盾。”有一个同志作了绝食斗争，他们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名押入监狱。负责看守的战士控告了这件事，北京军区追查控告的战士，我们要求保卫战士安全(同时拿出被抓同志在监牢里写的血书给大家看。)

李：我们要查办。

随后有许多革命组织作了汇报并提出许多问题，我们后勤学院的三个代表也作了汇报，李曼村同志很重视我们反映的意见，最后李讲了话。

李：今天谈的情况有的听(说)过，我们三月上旬派了几个联络组到西安、南京、重庆、大连、长春去了。四月六日林副主席亲自起草毛主席签发的十条，我认为可以说集中了全军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在军内同样有反复，这个反复各造反派程度不同都受到了打击，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听到消息的就派人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个严重情况？自一月四日刘志坚虽被揭发，但刘邓在军队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月十日发出各单位整风指示，各单位造反派进行了整风，革命造反派在这个斗争中立下了功劳，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次猛烈的冲击，成绩是很大的。但在斗争中有缺点错误。革命派整风前后，有些人过分强调冲击机关这些支流问题，否定大方向，以至无根据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形成反复、曲折，使许多人受委曲，这是件很不好的很严重的事情。但总是有反复的。现在“十条”已经下来了，我们有了这个强大武器，八条、四条也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个反复否定八条，四条，要坚决贯彻，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把文化大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你们受了委曲，凡是抓了造反派的都应该放出来，革命组织被无理取缔的、压制的都应该作严肃处理，立即恢复。有些要做调查，真正造反派是压不垮的，有人坚持斗争很好。同志们对全军文革有意见，要我们站在造反派一边，像个造反派的样子，

说我们在你们受打击、压制时旗帜不够鲜明，没勇敢站出来支持，说：“全军文革向何处去？”我们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同志们今天提出了尖锐的诚恳的批评，我们热烈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有错误，没有勇敢地站出来支持造反派，有时支持了保守派，我们一定做检查，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旗帜鲜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有的已经派人去调查了，如通信兵、防化兵 105 等，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发觉，有问题没有及时处理，我们如果及时采取措施，同志们是可以不受委曲的，革命组织可以免遭解散，同志们的批评我诚恳接受。

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就是大的解决，什么命令都是有斗争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有人不执行，靠同志们斗争嘛，我们是坚决执行十条的。

关于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四个单位“三支”通知问题，如果说卫戍区司令部那样答复的(指后勤学院“星火燎原”代表汇报时谈到的卫戍区关于下去“一支”的答复)任务暂时下不来，我同意恢复活动，按战斗组织活动，还要搞斗批改嘛！我再请示肖华同志一下，告诉你们，到底“三支”怎么下去还要考虑，如果有这样的单位，左派不占优势，保守势力还很猖狂，思想问题没有解决，下去怎么办，有问题。文化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三支”和斗批改关系如何解决？正在研究，还要有新的指示，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下去嘛！

当外地兄弟院校和文艺团体被抓跑到北京的同志们问李曼村副组长，他们到北京来合不合法？李副组长说：合法。并当即答应给这些同志安排食宿。

687.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7 年 4 月 14 日)

(见《系年录》第八十二卷)

688. 周恩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讲话纪要 (1967 年 4 月 14 日)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首先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战斗敬礼！

我首先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问候你们！(热烈鼓掌，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今天偶然的机会，把我带到广州来了。现在，我把来的原因给大家讲一讲：

明天就要开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了，今天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中央很关心这件事情，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了个通知。我与外贸部的造反派商量，因为情况比较紧张，他们要我来，我就下定决心飞来了。来了以后，已跟参加广州交易会的造反派战友们谈过一下，但是，小范围谈的，广大的造反派战友们没有听到，这是个抱歉的事情，所以又下了个决心，把你们请来了，现在向你们解释这个通知，借这个机会将有关问题加在里边一起讲一讲。

这个通知是发给广东省军管会的，并发中南财委，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省、市革命委员会。

现将这个通知的第一段念一下：“今年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四月十五日开幕。这届交易会是在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因此，一定要把这届交易会开得更好，一定要通过交易会把我国政治上、经济上的崭新面貌体现出来，以扩大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粉碎国内外阶级敌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谣污蔑。为此，中央要求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红卫兵、革命群众以及参加大会的工作人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突出政治，做好工作，共同努力开好这届交易会。”前言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这届交易会是什么情况下举行的。去年秋季交易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时举行的。今年的春季交易会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举行的。第二点是在抓革命促生产取得伟大成就的大好形势下举行的，这就要联系目前的形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十个多月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推动了运动开展，特别是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批转了聂元梓等七个同志的大字报，一声炮响轰动了全国。这张大字报轰动全国后，各地纷纷跟着起来，首先在大专院校进行“四大”，接着机关、企业、事业、工矿也起来了，形成第一个高潮。由于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个时候占据了五十多天的领导地位，派出了工作组，全国各地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内都派出了工作组，正象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说的那样，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实行白色恐怖。这时，毛主席在外地审查了一些大字报，看了一些中央文件，马上回到北京，撤消工作组，召开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和通过了十六条，宣布了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从那以后，北京几个中学组织了红卫兵，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形成了红卫兵发展高潮，从北京到全国各地，从学校到社会，后来发展了，又有个大串连，林彪同志称为“五大”。以后展开了两条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彪同志在国庆节报告以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不断的宣传报导，形成了第一个阶段两条路线的斗争高潮，持续了三个月，揭露和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认识错误，已经作了检讨，但是有的还不甘心，负隅顽抗，这又形成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后来，又采取了经济主义的新反扑。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要给予回击，后三个月比前四个月展开了更深入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说这三个月的斗争是全国阶级斗争全面展开。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是从上海以工人为代表的十一个组织(后来又发展到三十多个组织)，发表了二个通告，一个是反击经济主义，十条措施，一个是夺权宣言，上海工人不愧为工人阶级最大的队伍。又被毛主席发现，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宣布了。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到现在所说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是个新阶段，斗争浪潮席卷全国，不断发展，拿这两个阶级作比较，第一阶段是发动的阶段，把红卫兵青年突击队的精神带到全国，带到社会、机关、企业、工矿、农村、部队军事院校和文艺单位，都卷起来，大串连，形成了“五大”高潮，进行了两条路线斗争，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了三四个月之久，这个是组织力量的形成，是夺权的准备阶段。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不改。群众觉悟提高了，工人力量就在这时候显示出来了，对经济主义新反扑进行反击，因此，提出了夺权，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改的顽固分子(实际上已经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一伙)的权夺过来，这个斗争不是轻而易举的。全国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了，就应回到原地区、原单位进行斗争。从毛主席号召大串连到徒步串连，到过北京 1200 万人，有个时期在京停留人数 300 余万，那时，一方面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另一方面参观、取经、学习交流经验，回到本地区把运动搞起来，北京的同学和一部分干部也到各地串连，把各地的运动串连起来，相互促进，相互帮助，相互作用，形成了全国性的革命力量，这就不需要大串连了，而应回到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集中力量批判斗争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问题上各地还有些争论，但总的趋势是肯定了，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了，但不平衡，有些地方力量大，有些现在还小，有的组织比较早，有的组织比较晚，但革命总要靠自己，所以，毛主席下决心，宣布停止大串连，包括徒步串连，和取消今年四月春暖后恢复串连的决定。如果继续大串连，势必影响斗批改。运动起来反而不相信自己，过低估计自己，过高估计别人，好象非要别人不可，这是不符合各地发展情况的。某些地方发生些问题，北京红代会派一些人去是可以的，但不需要大串连。今年我们是要通过

大批判进行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临时委员会，这一阶段斗争比前一阶段还要艰巨复杂些。以造反派为核心，是基本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最后达到团结 95%以上的广大群众。要帮助与考察革命干部，也要逐步做到团结 95%以上的广大干部。

需要人民解放军支持。去年有个错误通知，军队不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运动来说是不可能不波及和影响军队的。我们部队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与劳动人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又怎能不介入呢？所以，毛主席提出，军队要介入，坚定的支持革命左派，依靠左派实行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军队的支持是新阶段的新因素。

夺权斗争既然是尖锐、复杂的，靠什么呢？毛主席说要依靠三种力量。第一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这是基本力量，是一切革命智慧的源泉。通过直接号召——报纸社论、中央文件、大字报抄传把全国几亿的革命人民发动起来。这是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空前伟大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是解放全国的武装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如果说去年第一阶段解放军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年以后就是参加与支持夺权斗争，参加与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对解放军来说，这个任务是光荣艰巨的。现在任务是很多，要支左、支农、支工。广东春季插秧要在清明后谷雨前全部插下去，没有解放军的支援和动员学校、机关、居民参加这个任务是不可能迅速完成的。部队下工厂宣传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了潜在力量，使工业生产节节上升，甚至有些工人前一段耽误了生产，觉悟提高后带着家属去加班；有些工厂生产成绩是很大的，听说十天完成一个月的任务，这是群众创造的奇迹，这样的力量是从那里来的呢？是从抓革命来的。去年十二月中央下达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宣传这个十条即是思想挂了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工人潜在力量发挥出来了。

军管是一种过渡的形式。一些地方造反派起来，还未采取一致行动，几种意见未成达协议，或者几派意见还未分清楚，特别是干部亮相不够，与以前错误没有严格划清界限和彻底决裂，干部不易结合起来，夺权、三结合有待于做准备。为了恢复革命新秩序，所以实行军管，现在的军管与解放初期的军管是不一样的。解放初期我们接管了国民党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保留旧人员，那时还有反动分子进行活动捣乱，对他们还要管起来。现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来……也是夺权斗争的继续，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有些敌人钻进来，拉出去，党内也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也要夺权，以前斗争是自上而下的发动，农村清匪反霸是夺权，五反有些人被腐蚀了，成了代理人了要夺权，三大改造是所有制上的改变，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五七年反右，六二年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三和一少，三自一包，包产到户，刘、邓思想。十中全会上主席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63年搞了社教、四清，这一切都是夺权，有些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的，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夺权。现在我们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所以，去年从下而上的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次搞得最彻底，是全面的夺权斗争，同时也是艰巨的。依靠群众的威力，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炮轰、轰不一定准，不准也没什么，不对也不要紧，可以帮助他改正缺点错误，不准改了就是了，但轰准了就很有效，就是很大的功劳。群众的威力是无穷的，逃不了的。在此期间，革命胜利进行，生产增长，要恢复秩序，建立革命新秩序。军管是过渡的，军管后地方上还要继续进行四大，发动群众，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革命的三结合。

尤其是边防地区，四面受敌人围攻，除越南是兄弟邻邦外，从海上说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印度反动派、苏修、蒙修也在窥伺我们，处于这种情况，必须要有巩固的国防。广东是边防地区，还有两个口，香港、澳门可以自由出入，它们随时可以钻进来，要依靠群众和军管建立革命秩序，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军管是促进大联合三结合，不是推迟，更不是代替。第三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革命干部。干部中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是因为刘、邓炮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了毒以后，干部受了影响和蒙蔽，一下子扭不过

来，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与这条错误路线决裂，划清界限，从历史上揭发检查刘、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事实，这样来锻炼我们的干部。这一条是根据革命历史总结出来的。

第二阶段要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斗争水平，要好好的思考，不能停留在第一个阶段了。

我们的主要矛头应首先对准党内头号和二号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斗争主要火力集中对准头号和二号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们就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文章里提到的是七大开始到现在二十二年来提了个纲，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还要靠全国广大群众，特别是大专院校的同学，因为你们是放假闹革命，你们有时间调查，领导干部从亲身的经历中揭发。这样夺权才能彻底，使我们党的领导权真正的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必须做好舆论和思想上的准备，才能更好进行夺权。那么，仅仅集中一、二个人，其他是不是就放过去了？不会的，揭发批判一两个人，必然联系到地方上一小撮，联系到本单位，看看那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革命造反派遭到迫害的，是处于反抗批判的地位，保守派受蒙蔽也是受迫害，受了蒙蔽后“保”了，两方面必须讲清楚，沟通了，也就明白了，造反派应该欢迎保守派的同志起来革命，对犯了错误的干部，我们还允许他改正，我们应允许群众犯错误，也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同时要教育他们认识错误，承认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使他们增加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仇恨，就能团结起来，这个团结是有基础的，是有原则的团结，不是和稀泥，不是合二而一。批判应有核心，批判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联系本地的，广大群众才能串连起来，目标明确了，共同进行斗争，才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这样才能团结 95%以上的群众，否则，革命大联合只是少数。联合是政治行动，争取多数，在思想一致基础上团结，但并不是联合了就没有保守思想了。联合的形式，一个学校只保留一个组织，如清华“井冈山”有一万多人，我对他们的负责人蒯大富同志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组织这样大，组织内就有左、中、右了，过去是外部，现在是内部展开斗争。有的，也可以几个不同观点组织同时存在，树立对立面也好。政治上团结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统一是暂时的，矛盾会不断的发生。统一后又会出现新生力量，又是少数教育多数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断循环，不断发展，人民内部矛盾是对立的统一，这是主席的精辟辩证法。这是个法则，敌人愈打愈少，我们愈打愈强。(注：这一段意思记录不很清楚)

刘少奇、邓小平所以错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他们却要保持新民主主义的秩序，所以，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矛头应当向上而不应向群众，群众是团结的对象，不是打击的对象，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对干部态度问题，已经有多篇社论了，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有两种偏向，打倒否定排斥一切，这不是群众的创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者创造出来的。工作组进校后把原来的党委干部都靠边站，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干部及领导瘫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果，责任不在群众，群众是公道的。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干部听说要三结合了，就急于要结合，忘记了清算自己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从领导上来的，但是，你执行了也有错误，要和错误决裂，彻底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大的当权派，也要和自己的错误告别，在实际中经受群众考验、批准。否则，变成都返回原岗位，恢复旧秩序，那还不是资本主义复辟？革命就是要前进，不前进怎么行？要建立新秩序，领导干部有的要撤换，有的留下来监督使用，有的要调动，有的提升，这样干部才能有新的血液，加上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再有解放军参加才能有新气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才能掌握的牢靠。这是百年大事。两种偏向中当前主要防备资本主义复辟的新逆流。

解放军参加了三结合是建立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三结合才能牢靠。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因此，从集体的意义上说，解放军是最可信赖的力量。当然，并不是说解放军部队的领导者是不犯错误的，任何战线的负责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我们应该相信，他们错误是会克服的，

人民解放军是集中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林彪同志亲自领导的，只要中央一抓就可以解决了，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即使发生了青海事件那样的问题，一到北京事情就很快解决了。赵永夫逮捕起来，把受压抑和委曲的人平反了，军民关系还是非常好，说明人民是热爱军队的。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失败，挑拨是非，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指向解放军，指向站出来的领导干部，许多地方有这样的征候。本来这些领导干部是很好的，但也有矛头对准他们，如山西的刘格平同志，山东、黑龙江、贵州，更不用说上海和北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夺权斗争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大家都沒有经验。这三方面都可能犯些错误的，新的领导是可能有缺点的，解放军领导干部也会有缺点的，但不能照抄，青海出了个赵永夫，各地要揪赵永夫之流。不根据客观情况出发，而是照抄，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在北京接见了许多省分的同志，情况都是不同的。安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挑拨，军队上了当。

夺权，毛主席曾说过：今年二三四月份可以看出个眉目。全国 29 个省、市(天津划为中央直辖市)都实现夺权这不可能，全国明年才能看出结果。这个问题很复杂的，不是所有地区都要夺权，有个连锁反映，都要试一试，要很好考虑，区别对待，并不是每一个省市第一书记都需要撤换。机关情况就更不同了，国务院各部的权，比如外交部的外交大权是属于中央的权，不能夺，监督，这要说清楚的。夺权的时间要长一些，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这是运动的总的形势，形势是大好的。

抓革命，促生产，搞了七个月，结果工农业生产超过任何一年，粮、棉、油、糖等都超额完成任务，工业、交通除一、二项外也是超额完成任务的，特别是交通，去年负担繁重任务。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各方面的任务都完成的很好。今年第一季度进行了夺权斗争，主要是经济主义搞新反扑，造成了一些暂时的损失，但由于中央的号召和工农群众的觉悟，事情很快的扭转过来了，三月份情况转变了，我们相信今后三个季度一定可以补足。广东一季度生产是增长的趋势，广东有更好的条件，更会夺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形势很好，一定要将这一届交易会开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抓革命促生产获得巨大成绩的大好形势体现出来。广州接近港澳，很多人要到广州来看看，他们到我国南方的最大城市来看看，广州要反映出全国的形势。这个月的交易会，我们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战役，要把这仗打好、开好。参加交易会工作的造反派，已经保证要打好这一仗，我们相信，广大革命派的战友，革命小将们，工友、农友、革命干部、同学也一定会保证打好这一仗。

我们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保证国家不变颜色，不变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主要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团结几亿人民象一个人一样，进行备战，一旦美帝国主义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来，我们便坚决粉碎，彻底消灭它！

你们不是问毛主席身体怎么样吗？我告诉你们毛主席身体好得很！(众欢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你们又问我们副帅的身体怎么样，我告诉你们，我们副帅身体也很健康。(欢呼：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

在毛主席健在，林副主席辅助得力的时候，敌人进犯便更可以消灭得干干净净。

正因为这样，我现在要联系的谈一谈国际形势问题。出口商品交易会要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经济上的新面貌，扩大影响。

支援越南反美战争，只有我们是全力支持的。今天真正能抓住美帝国主义痛打的就是南越，南越只有 1400 万人口，面积只有一个浙江加上半个江苏那样大，却拖住了一百万反动军队，美国侵略军除了海空军外有四十三万人，今后还有增加的趋势，南朝鲜伪军五万人，共五十万，南越伪军号称七十万，实际只有五十万人，南越坚持战斗，越南人民在胡主席的领导下，他们的豪言壮语，不管打十年或者二十年都要打下去，一定要消灭美帝侵略军，统一越南南北方。他们的英勇壮志我们是钦佩的。越南南方解放区的人民战争比我们的抗日战

争发展了，一个人打十个人，自力更生都是很好的。但也需要我们支援，除了中国支持外，其他国家是不过问的。现在侵越美军超过了朝鲜战争时的人数，而且还要增加，在朝鲜战场上南朝鲜伪军是主要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军队，土耳其也可以打一打。南越主要靠美国侵略军，他们是少爷兵，装备很多也很重，可是不经打，占据一个据点，什么也都得靠直升飞机运去，连吃水和洗澡用水也要运去，他们怕血吸虫。越南的天时地利对他们也很不利，天气潮湿，地利呢？水网地带，蚂蝗、蚊子，疟疾横行，马蜂和蝎子也很多，美国兵到越南都受不了，一百多人中有二十多人生病，住院的占美军人数 25%，里边有真病和怕死装病的，但是，南越人民有个嗜好，专门爱打美国兵。时间对越南人民有利。战争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打不下去退出越南；一种继续下去，扩大到东南亚，整个印度支那，进攻中国，两个前途。妥协，可能性不大，但不排斥。南越要打，人民要解放，别人不能作主。支援越南人民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任务，除了物资援助外，外汇援助最有力。

总之，这次交易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的成绩表现出来，对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搞得更好，中央提出的要求，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已有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交易会开好。

现在我把这个通知解释一下：

“(一)为了集中精力搞好交易会，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可在交易会结束后，有计划地组织几天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这只是一个时间，去年在大串连时期，外地参观安排到晚上，现在大串连停止了，也不能这样了，如果再搞晚上参观，又会引起很多人到广州来，这个事情不应重复了。现在有这个征候，冲火车的，抢上火车又有了，这是不好的，影响运输。过去有个时期黄浦、湛江、上海、天津等几个港口，货物堆积，运不出去，现在情况改变了，堆积货物现象没有了。这样做不利于革命运动，比如派几千人到北京去，一个观点，派一个人去就行了。去年是组织运动初期，接见后讲一讲，满意的回去了，现在不一样了。要谈夺权问题，坐下来谈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如我们谈内蒙古问题就谈了二个半月，昨天才解决，如果还是那样就影响国际信誉。现在北京要求出来串连又有苗头，红代会跟我谈时，我当时说个别事情可以，一松口又纷纷出来了，这就不符合我们协商的意见了。我与造反派也谈过，你们掌权了，对维持正常秩序也有责任，工作很忙，安排不好，抓了业务，忘了政治，只管政治，不管业务也不行了，政治、业务要结合的很好。现在是新阶段，新水平来要求大家。

本地的要参观，可以在闭幕后组织几天，不招待外地的了。

“(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往交易会的工作人员以外，由于广州接待任务繁重，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交易会外的人不去参观了。

“(三)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可在交易会结束后进行补课。”

一个月非常紧张，面对着各种客人，客人也要一分为二。按照外贸政策办事，资本主义国家平等相待，欺负我们，搞鬼都不行。如果他腐蚀干部，我们就要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这有些国家是不行往来的，美国、南非、以色列、葡萄牙等。除美国外，都是根据国际协定办事的。我们是遵守应尽的义务。对外商也要一分为二，有些是完全为了做买卖，互通有无，平等互利。也有友好商人，如日本和东南亚商人中有些是与我们友好的，对华侨商人也要一分为二，有一些是唯利是图的，把我们的出口商品换个商标转卖赚钱的，也有爱国商人。要区别对待。一般的互通有无，平等相待；对友好爱国商人，要给以优惠。宣传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爱国商人要多做工作，中日友好的做工作可以起作用，甚至西方有些商人受了影响也可以多做些工作；有些成见很深，思想反动的，做工作也不起作用，不要勉强，我们就不做，要把这些工作做到友好商人身上就能够起作用。我们还应该学会毛主席的基本功，用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方法宣传好毛泽东思想。工作业务很忙，工作以外还要学习，还要讨论问题，这就没有时间再搞“四大”了，要搞“四大”就要影响工作，如北京有个例子，服务人

员在开饭时候辩论起不同观点来了，争论不休，放下客人也不管了。这一个月要打大仗，暂停一下，以后再补课，没有什么损失。今年水平要比去年水平提高。一般也不实行内外串连，工作忙，个别访问搞些调查是可以的，但大串连是不行的，妨碍工作，听说这里有个静坐运动，你们如果去参加，不知道要坐几个小时，那就影响工作，如果要表示支持，可写张大字报派人送去表示同情就可以了。外面去串连，也会影响他们的工作。

“(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

下午就提出要求了。再次提出要求不要贴，对外商也不要送大字报，对象是外商，个别谈话效果更好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主要搞自己，所以，这种方式对外国人不适用。我们提出要搞革命新秩序整市容，要求大字报大标语贴得好一些，看来这就不大容易啦！再有个连锁反映，北京有什么这里很快也有了，北京揪什么人，这里也要揪什么人，这就没谱了。

“(五)交易会安排演出文艺节目，是经过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审查批准的，不要再作变动。”

我们批了两个革命现代戏：一个《智取威虎山》，一个《奇袭白虎团》，两个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地方要搞小节目，各派意见不同，你不准我演，我不准你演，为了避免争论，小节目都不演了，如果节目不够，就把交响乐团《沙家浜》调来。

“以上通知，可由负责同志交易会的全体工作人员传达，并向有关革命群众组织做必要的说明(不要张贴)。”

现在我来作说明。因为中央很重视这个事，所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四个名义发。

本文讲完了，现在再讲讲另外的问题。

第一讲讲群众运动。夺权斗争，斗、批、改，主要矛头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针对他们的反动言行，批深、批透、批臭，要全部力量进行。去年六、七月份刘、邓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偶然，对他们的东西不系统研究，就不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清楚。今年三、四月开始了实质性的批判，从“清宫秘史”到“修养”，批判系统了，但这还不够，大革命以来刘少奇的言论那是很多的，资产阶级系统思想散布到各个报告，系统揭发、批判，对于我国进行深入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很有必要。刘少奇在四九年发表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三月毛主席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决定，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指出全国解放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而不久刘少奇就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剥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就是高小毕业生看了也会感到愤慨！民主革命时期因为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左派的政党，只有两个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代表买办阶级的，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一点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连他党内也有人讽刺蒋介石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在马列主义发展的影响下，要革命的、反对蒋介石的都跑到共产党内来了，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进来不少。一大批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有民主主义思想，而无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参加到我们党内来，刘少奇是个老党员，他就是这样的党员，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没有转变过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出来不久后，他就违犯了。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即是社会主义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刘少奇却要搞另一个过渡，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不是限制它。有那样一伙，不认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如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如果相反，就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毛主席早就指出：在二十世纪，不可能搞起资本主义国家，土耳其“基马尔”只有一个。可是党内有许多党员很不清楚，现在就是要在群众中进行斗争，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高认识。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革命靠自己，群众未发动时，我们有发动的责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起来后，由他们自己做主了，否则，就是把自己当成诸葛亮，把群众当成阿斗。一个城市内，交流经验是必要的，正确的，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思想言论，联系本地区、本单位带有共同性的，我们都是受毒害的，应在一个战线上，共同批判，达到新的团结。

组织问题也接口，按行业，不应该跨行业。跨行业只能是革命委员会、红代会。不错，现在临时权力机构以革命造反派为基础，保守派改变的也要有一定的人参加，但不要占优势，造反派不但在政治上要占优势，还应取得领导地位，今天会场上两派都有，我们不是和稀泥，中央要我多留一天，帮助广东解决一些问题。

大批判中矛头对着谁？应该共同对着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过去受蒙蔽，现在彼此说穿，造反派有功，保守派有错误，造反派应该站稳立场，人家改正错误就应该欢迎。保守派承认错误站回来，就很好嘛！因此，组织上不应再要跨行业组织，成立政党式的跨行业组织，就成了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了。荣、复、转、退军人组织，要在全国发展，去北京请愿，当时，南京已有一个报告，林副主席已做了三点批示，其中一点就是不同意成立全国性组织。因为各单位都有人，都可以回到基层单位去参加革命组织，如果需要统一登记的，可以由民政部门去做。有些听了的，取消了，有些不听的，改名换姓，搞“红卫军”、“红旗军”，犯了错误，有的做了好事的，也都取消了。安徽合肥的“红卫军”是支持造反派的，做过好事，夺权后受了压制，解散了，现在为他们平反了，但跟他们说清楚，做了好事情的也不恢复了，还是要解散。我不了解广东的组织，比方说，一个单位有几个组织，有的叫“八三一”，有的叫“东方红”（随便举例这样），都到工厂各地去发展组织，这是不对的，应该取消这样的组织。初期，我们提倡学生去工厂，去点火，但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如夺权时，铁路局夺权，学生是不应该参加的，已经参加的，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也没有经验。林副主席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要看很多文件，工作比外面的更忙、更累）。你们经验不足，就帮你们认识错误。

夺权十全十美的，不可能没有缺点。夺权也是有反复的，不要因为一次夺权不大完全，就把夺权否定了。不要绝对化，毛主席是最反对绝对化的。

革命群众组织集中归口是必要的，基层单位是不是马上都回到各班，各车间？战斗小组可以回班、回车间、科室里面，上面有个领导机关，这样有好处。目前的状态是这样的为多，为好。归口是毛主席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对革命前进有利，但如何归口，同志们还要回去研究。

第二、对待解放军的问题。对待解放军应该尊重、信任。对个别的错误，可以用善意的态度，提醒，进行批评。如《广州日报》登了错误的文章，中央文革小组四点意见，四月十一日发下来的。根据这四点指示，改进工作，组织版面小组共同负责，用商量合作的办法。军管后，各项工作不可能做得十全十美，但是可以商量改进，不但对报纸，对其他事情，都应该这样子，不要轻易上纲，一上纲就变成斗争对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把对解放军领导批评的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马上传到港、澳和世界其他地方上去了。不利于人民解放军的荣誉，造成不良影响。有意见可以采取同志式的，友爱的态度写信，派少数代表个别谈，这是革命的态度，负责的态度，这也是最光荣的任务。

第三是对干部。需要利用原有的干部做工作，只要他们和反动路线决裂，划清界线，深刻检讨，我们就应该欢迎。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斗争经验，好的就发扬，错的就改正，不然工作就难以继续。我们应帮助他们认识错误，站出来，更好的工作，领导经验就发展起来了。领导经验是必须的。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将所有干部都恢复到原来的岗位，这是不容许的，那就是复辟了，就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付诸流水了。但总需要有群众的推动，军队的启发，帮助他们亮相，使他们站出来工作是必要的。属于那一类的问题，现在不要先定调子。

广东的革命三结合、大联合条件怎样？现在是逐步成熟。我接触了全国二十九个省、市

的一半以上省、市，条件都是逐步成熟的。就是象上海这个首创的地方，据张春桥同志介绍经验时，也曾说还有很多问题。如上海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领导的，后来学校一参加，就发了宣言。革命造反派占了优势，开代表会，成立全市的临时机构。北京、天津(中央属市)正在搞试验，以后北京、天津就发展到先经过由下而上的发动，有领导的经过红代会，这样时间需要长些，但是酝酿就更民主。不论需不需要夺权，都要搞“三结合”。

看问题不能绝对化，不能简单化，不要夺权对了就是革命的，夺权错了就是反革命，看待一切事物，绝对化是不对的。

革命派的战友们，广东的运动并不落后，发展是晚了些，但也可以迎头赶上的。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可以迎头赶上嘛！我们为什么不能赶上呢？要有这个信心。坚持原则，你们是能够经过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然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这不用太长的时间了。我号召你们，要迎头赶上去。

军管会是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后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689. 周恩来接见外贸部、外贸学院革命造反派

及各总公司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时的谈话

(1967年4月14日 广州军区珠江宾馆二楼会议室)

(3：10 总理身穿崭新草绿色军装，健步走进会议室，后随同军区负责人，黄永玉和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以及造反派代表多人。顿时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总理走到话筒前，示意要大家坐下来，众坐下后，总理把军帽放在桌上，神采奕奕，两枚领章愈加显得红光夺目。)

总理：北京外贸学院造反派都来了吗？(答：都来了。)外贸部的造反派都来了吗？(卢绪章答：来了200多)有300多人来！

今年春季交易会，中央很重视，应当认真搞。前天开了会，研究了，主席、林副主席和我都在，并起草了电报给你们，你们看到了没有？(众答：没有！)怎么还没有到？哎呀！我们的卢绪章同志做事可慢了。(卢答：下午2点到的)是啊！慢！没有飞机快，你看我都来到了。我给你们念一下吧！(众：鼓掌)(总理边念边解释，下边记录偏重解释)

交易会明天4月15日就要开幕了，主席很重视，现在军管，广东是个重点。现在夺权斗争向全国发展，(喝水)也有反复。我们看到了一月革命风暴，也看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扑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是考验我们锻炼我们的。我们目前要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打击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刘少奇的黑“修养”。戚本禹已写了文章了，把刘少奇的《修养》提出来了，也把七大以后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揭发了些，但是只是起了一个头。以后工厂、学校、机关都要以这个为主要矛盾，当然也要结合本单位，这样才能把全国统一在统一思想最高指示上来进行，这是一个大好的革命形势，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一定要把交易会开得更好，比上次还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崭新面目显示出来。去年那样大的运动，我们的工农业生产还是增长了嘛！贸易额也增长了。政治统帅一切，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力量是无穷的，所以要体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连敌人都知道我们在备战，甚至连蒋介石都认为我们是政治路线的斗争。正如主席所说的这是真正最广泛最彻底的由下而上发动的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十七年来最彻底的大革命。我们要粉碎国内外敌人的造谣诬蔑。交易会就必须明显体现出来，要求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做好工作，共同努力开好交易会。

这次外商有两千多人吧！(插话：日本八百多，西商××，华商××)是啊！你们要阶级分析一下，要一分为二，因为广州是个门户嘛！比较复杂，都要加以分析。你们自己开了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我读了，有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对他们平等互利，他们用腐蚀，用佣金的办法，我们是不欢迎的，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社会主义国家看待，有的我们要回击，我们不允许有人欺压我们，这就是政治影响，对待大小商要一律看待，要平等互利，当然如果敌对我们，我们就不要他来了。有些我们就不给他来，例如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走狗和有殖民地统治罪恶的如：西班牙、葡萄牙、南非还有以色列。就是资产阶级商人也要一分为二。比如日本友好商社，愿意发展日中友好，可以给他些便利，有些民主国家，他反帝，比如柬埔寨它在反美前线，还有非洲的坦桑尼亚等。

另外对中国的侨商，包括港澳在内都要一分为二，有的是爱国的，刚才造反派有的同志给我说，深信小交易会搞得很好，政治宣传起了效，读语录，连穿中山装都可以影响他们，要看对象嘛！所以交易会一定要显示出新的精神面貌，新的革命秩序，他们北京来的造反派首先要带头。你们是搞贸易的，你们是主力军，你们是直接参加的嘛；必须比去年打得更漂亮。去年是运动初期，广州比北京、上海乱些，外地多于本地，中学多于大学，他们到交易会参观提意见。各总公司、分公司(有人递条)内部争论比较少，他们都想把工作做好，有些旧的东西要批判，但要一分为二，不能说十七年的贸易方针都错了，有些贸易方面的工作是主席亲自管的，去年成绩还是很大的。

但是今年不一样，内部有几派，大家意见不一致，今天天亮前还听说外贸部造反派争论《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的那篇文章。大字报贴到大街上。有不同思想观点，但是为了打好这一仗，要行动一致，不能不有几条规定要大家遵守。

为集中力量开好交易会，不组织会外任何团体的参观，交易会组织内部不夺权。

去年搞了参观，因为去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今年同样，势必要恢复大串连，这与当前形势不符。

主席设想过，二、三、四月见眉目，现在要看二、三、四、五月了。前次中央稍微松点了，就不得了，你们讲安不下心，就是想去串连。我昨天才开完会，开完了给你们见面，现在大家都起来了嘛！非得要去包打天下不行，我看这个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给北航“红旗”打交道，他们要去新疆，我说看了你们的调查报告再签发，那知红代会一点头，他就跑了。

交易会不夺权，我来到一看，临时机构都成立了，造反派还是监督比较好，你们都是工作人员，所以一监督就进来了，大家不要忘了群众，这是临时性的象征性的临时机构。

各省、市要积极组织货源，我们对外要守信用，我们中国潜力大，就是要守信用，不像刘少奇在困难时期主张货币贬值。我和先念同志都是坚决反对的。

所有工作人员和参加外宾接待的宾馆、旅社、服务部一律暂停四大，会后补课，一个月的时间又工作又接待，又要大鸣大放，你有这么多的精力？一定要下定决心打好交易会这一

仗，陈列馆的大字报可以撕下来嘛！那又不是毛主席语录(众笑)，我看也不一定正确，有意见可以在小范围内交流经验，要专心致志，一心不二用，不然叫你拉队伍去支持，你去不去，叫你到南方日报静坐，你去了，自己的战场不打，去搞别人的，怎么行？你们可以给广州的同学说清楚，我们可以送一些大字报表示我们支持，不要花这么大力量，你们可以宣传中央的通知。

交易会期间不要在陈列馆和外宾所在宾馆贴大字报，前次有人主张把街上的大字报整顿一下，旧的撕掉，换新的，小学生上街撕大字报，收废纸的摊子赚了不少钱，大家说这是阴谋，搞经济主义，于是大家又停止了，废纸摊也关门了。现在街上颠的倒的都有。去年天安门前的大字报，先前好管，后来就不好管理了，有很多是今天打倒，明天没倒，一批判就倒，我看不见得。可以批判嘛！当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允许，反对林副主席统帅也不允许，(有人插话：反对周总理也不允许)我看可以嘛！你们外贸学院就有嘛！(众大笑)只要是善意的是可以的。我今天讲了这么多话，也没准备，你们可以给我贴大字报。有同志讲广州街上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语录，我看也可以，但不要搞成……(黄永玉：红海洋)对，搞红海洋也不好。

现在外国记者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也摸不清了。开始时，日本记者去年领了美国资产阶级好多大奖金，今年不行了，他猜不透了，我看叫他们迷糊一阵子也好，对敌人不能太老实。

交易会安排的文艺节目是经过中央、伯达、文革小组批准的，我最后确定的，有《智取威虎山》《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开始也考虑是否红卫兵组织也来几个节目，但是有几派，你要演，他要砸。也有人主张把北京的拉去，我看这不好，这不是说广州的红卫兵就不如北京了吗？哎，北京的交响乐怎样？(众答：《沙家浜》不错)对！对！可以把它调来，多样化，又有音乐。以上四个通知是四个具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下面解答几个问题。(总理站起来，理了理军服继续讲)

工艺美术改起来要有个过程，当然特别坏的要马上改。过去几个工艺美术学校搞塑林黛玉时；必须把红楼梦读得烂熟，思想行动都要学林黛玉，真见鬼，但现在塑起工农兵来，还不免受才子佳人的影响，但这要有个过程。

有些装饰品是报废好呢？还是出口好呢？现在世界市场还是主要在欧洲，说美国战略东移不完全恰当，这是邓小平他们提出的。西欧东欧生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越南打得很好，十四人抗击一个敌人，越南同志讲，最好打的是英国，我们听了手痒痒。所以说我们要支援越南兄弟国家，拿什么？说拿点美元，是钞票挂帅，是拜金主义？怎么能这样说，不对吧，越南人民有了外汇，就可以从西贡商人那里买到东西，我们争取多搞点外汇去支持越南人民有什么不好。温泉之水不可饮，但是可以洗脚吗。有些绣花拖鞋、塑雕是卖给资产阶级的，你们害怕腐蚀他？(群众笑)，首饰也有许多是劳动人民带的，我们不能批判王光美带项链，就去把少数民族的银箍子都拿掉。

过去靠侨汇造成了一些错误，侨痞有些是违法，从去年取消侨汇，储备，我同主席说：我明年不搞了。我采取主动了(众笑)。

(5点钟，总理讲)

看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我已讲了两个钟头了。我看看(戴上眼镜，看纸条)总之我是希望比上次交易会提高。(看一纸条后笑)你们来考我，我没法答复，好吧再说两点，一是宣传工作，一是军管。

宣传要灵活些，要看对象，如果有人问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是刘少奇？你说不对，那不是撒谎吗？或说我不知道，那也太不象样子了。你可以问他，你知道了何必问我？

广东军管时间还不长，目的是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希望你们为整体的人民解放军的荣誉，不要在街上贴大字报，可以直接找解放军商量。毛主席提出了三个相信和依靠，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大多数干部。广州尤其重要，解放军的

责任重大，要对付东南亚的反动势力，是门户。(黄永玉插话：还要对付蒋介石)东北方有蒋介石，解放军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很久没有做群众工作了，开始接触摸不准，发现了一些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也允许人家改。不能够说北京出现了什么样的人物，广州就一定有一个，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希望北京造反派好好向广州造反派宣传。

在交易会期间在街上给解放军贴大字报无论如何都不恰当，好了我讲完了。

**690.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14日 人大会堂)**

江青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大概就是七、八天前，我们还在一起开会，还和和气气的，几天就吵起来了，还武斗，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一、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就戚本禹去解决邮电大楼的武斗，过一会就来，和谢富治一起来。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二、我想讲一下我个人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六号《军委十条》下来以后，革命小将、革命战友心情都飞动起来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条，这十条下来后，很容易，很可能犯错误，一定要牢记1·28军委《八条》还是有效的。我认为目前的苗头是放松了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座谈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批判应该上纲，这个纲应该上到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现在矛盾不集中，很分散，很难斗倒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苗头是这几天指向军队。同志们，我们不依靠我们的军队依靠什么？有人贴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他是军委常委。最近几天，我围城转了一下，贴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刘少奇的。他(指李)我不了解，我调查了一下，他还是好同志，只是说错了话，要打倒他，这对吗？一定要谨慎，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上街，叫坏蛋，外国记者都搞去了。打倒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这是反常的，有人钻空子，你们不知道，上了当，是我感觉到的。

三、有人使你们打内战(指地院和北大)，还不自觉。邮电大楼已经军管，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支持邮电大楼的“红革会”，还发生了武斗，完全不维护解放军的荣誉，已经军管了，还去武斗。二、三天前，我，伯达，戚本禹叫他们不要搞了，要树立解放军的威信。可是他们还在干，北邮“东方红”就是支持，就是打。谢副总理告诉我，昨天搞了一天(指北大和地院)，要一起谈，地院“东方红”不干，要单独谈，单独谈也崩了。今天我们等了好久，你们还不来，我们不是战友了吗？(澄清：红代会给地院“东方红”打电话晚了。)

炮打谢副总理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你(聂元梓)应当做触及灵魂的检查。但打倒谢副总理，一切都归于聂元梓，我没有证据。你们开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斗王光英是好事。王光英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王是天津的大资本家。斗他是好事，应该斗。北大的事情很复杂。孔繁做过邓小平的秘书，他反对聂元梓，他难免作挑拨的事，使你们不团结。总而言之，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心里高兴，但放松了警惕，放松了对敌斗争，计较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我今天是批评你们的，特别是聂元梓同志，她斗争经验、生活经验比你们多，应该做出榜样。这次她应该负多的责任，但你们不能把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使香港的报纸又登上了，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新北大到处出刊物，净闯祸。凡属军管，那个单位就是有错误、有缺点，要维护我们自己解放军的威信，有意见可以提，不能把解放军不放在眼里。(广州对外贸易展览会被搞了。总理今天早晨乘飞机亲自去解决。康老插话：明天要开会，今天给搞了，所以那里军管了。)

李钟奇也不要贴了，(谢副总理：已经让北航派人给贴掉了)他就是说错了几句话，你们就打倒，搞错了方向，放走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拿出革命者的气魄把北京搞好，我完全信赖你们，我们共患难，我可以坦率的提出意见，我不对也可以提。象这样我很焦虑，邮电大楼打，北大也打，这不对，乱贴标语，不能这样，矛头不能对准解放军。军委《十条》对左派是极大的支持，极大的鼓舞，不能忘了维护解放军的荣誉。你们打内战，外国人登了。现在北京红卫兵自己打自己，成不了大器，那糟了，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你们能答应我不把武斗搞出去吗？(众：能！)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我先退席，有点感冒。(江青同志穿衣服时说：要允许改正错误。特别是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伯达：要叫李钟奇、谢副总理的大标语、大字报明天就看不到，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请大家继续发言。

姚文元：首先我完全拥护江青同志很重要的讲话，江青同志这些意见我们革命小将要很好思考，坚决的执行。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允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我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贴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是错误的，应盖上。

中央派我和张春桥同志去上海，回来两次，都感到很幸福，在北京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在北京的大、中学红代会的战友们，应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你们的行动对全国都有很大影响。我们在上海听到北京红代会组织起来了，这是榜样。上海的红卫兵希望你们，你们的一些不好作法也会带给全国，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我在上海几个月是有很深感受的。

回答一个条子：昨天《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文章和消息，我认为转载的好，转载的对。听说有同学去人民日报要求解释这个问题，这与今天这个事是有关的。当前的大方向是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中国赫鲁晓夫声势浩大的批判，是有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对世界革命有很大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总根子，挖掉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批判刚刚开始，要深入到政治、思想各界中去，对刘邓的批判使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都是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特别是和刘少奇战斗的。有刘少奇这个反面教员，显得主席更伟大。革命的大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现在集中力量，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文汇报》提出的重要问题。当前大批判可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个大批判壮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使中间受蒙蔽的争取过来，分化瓦解保皇组织，旗帜鲜明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其他方面这个批判也是起很大推动作用。至于有的同志有其他看法，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一点感想是局部和整体，要懂得全局(主席语录……)有人提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这在上海有体会，在革委会成立前，有这些问题北京应按伯达、江青同志讲的自我批评来解决，不要影响全局，不要影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局。我们希望北京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一切革命同志要维护其代表性、权威性，希望也早点建立，对全国有促进作用。

还有一点感想，在夺权前夕，(上海)革委会要另搞一套，中央文革有电报，他们分析是假的，是王力和张春桥一起搞的，我看有些同志应从“革委会”吸取教训(从正面讲)。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实际出发，从毛主席教导的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看问题)，无产阶级科学性是毛泽东思想，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无科学性，应按毛主席教导去作，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对我们都是考验，是否公字当头，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希望在座的同志都很好地考虑，把北京搞好，给全国、给上海做模范。

康生：近来对北京情况了解很少，各地各大区情况了解，青海、四川、内蒙的问题及其他大军区的问题。在支左中绝大多数是站在无产阶级正确立场上，是好的，从接触中，在某些军区少数同志，在支左中有些错误，这种错误大致有两种：一是好人做坏事，另一是坏人做坏事，如青海的赵永夫 2. 23 事件很坏，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同志。其他很多地方大概都是好人犯错误，在这次解决问题中，我再说一下，某些解放军个别犯错误，同志们不要动摇对解放军的信任，动摇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1·23 毛主席的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措施，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措施，这一点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依靠什么：1. 群众；2. 解放军；3. 绝大多数好的比较好的干部。如果只看到解放军个别人个别事犯错误，因此动摇对解放军的信心，要犯极大错误的。应看到 1·23 后的五条，28 日的八条，2·11 的十条经过中央、中央军委讨论的，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军训、军管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现在我们解放军担任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没有经验，因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有些不可避免，指出改了就行了。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这一点不管我们看什么问题也不可能离开这点，更不能有意无意地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讲这些，并非说北京同学犯了这方面错误，而是讲两个问题，北京各校要纷纷到各省，特别是青海、四川，其他地方。当然青海允许有些人去了，不要因此不相信当地解放军还能执行毛主席的命令，能支持左派，希望同学们解释，同志们心是好的。去支援当地的革命派，但需要统一行动、听中央意见。如果需要，中央会叫你们去的。2. 刚才江青所讲的，我们出现一种苗头(对解放军问题)，首先对谢副总理贴大字报，谢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谢副总理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军委的常委，谢副总理是解放军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这样一个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同志们随便写大字报传单上街，这是极大的错误。说谢副总理是邓小平的什么人(王力：谢副总理是最早的用文字揭邓小平的问题，斗争很坚决。)，这种东西出现是罪恶，是我们的耻辱。当然同志们一时冲动，立刻觉悟，自己搞掉了。昨晚谢副总理向我汇报了昨天情况，准备解决问题，地院“东方红”没有遵守谢副总理的指示，出了二十六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谢副总理肚量够大的，好些地方冲公安部都没发脾气，气量很大。昨天谢副总理不是退兵 30，而是 50，地院还不谅解，这一点地院应当自我批评。谢副总理不容易生气，昨天生气了说明问题，不是谢副总理要批评地院，地院应该自我批评。今天听说贴谢副总理的大标语，我认为一定是地院贴的，结果是北大，聂元梓有责任，聂元梓、孙蓬一我们挺熟。北京影响全国，北大的光荣，主席亲自批发北大的大字报，北大应保持光荣，应爱护光荣。应该检讨自己，应自我批评，应从思想上彻底消除这种思潮。

据说还有贴关锋的大字报(关锋：多贴没关系)我不知道是谁贴的，从今天才知道，有人对中央文革这样推测、那样推测，还分几派，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怎能设想小组在毛主席领导下，经一年考验(关锋：现在没有王任重、刘志坚、陶铸了)，这样是很错误的，对全国文化革命很有害。

另一方面，这事情也很怪，文化大革命初期，地质有薄一波煽动的保守派。师大是孙有余搞起来的，把林杰和关锋串在一起，他们的后台是康某人，当时我连关锋都不认识。(关锋：……)(此处原为空白)那是薄一波、孙有余搞的，我们造反派不应用这种手段，这是叛徒手段。

对解放军千万要谨慎，不能有任何动摇，大概有的同志参与军区问题，没有军队，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

必须有阶级观点、敌情观点，上次给大家看了香港报不是看到了吗？要警惕，遇事要想到有敌人，有外部敌人，凡是敌人高兴的事，我们就不要做，凡是敌人不高兴的事，我们就作对了。不好的大字报、漫画，《真理报》象宝贝一样。我们面前有美帝，现在通过日本记

者收集我们的大字报，日本记者懂中文，他们称赞日本记者，苏修不仅自己《真理报》登，国民党、香港常登塔斯社消息。要有阶级观点、敌情观点。如武斗，敌人高兴。武斗、黄色大字报供给敌人，照片低级的都给了敌人，现在开会，好一大串，牛鬼蛇神他们分散的，一集中好象他们样子大了，百丑图，本来一小撮，结果一大串，这些问题要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动”高兴。打砸抢不要搞，要自觉，违背自己诺言不是一件好事，三月比一月好，不要走回头路。

现在批判刘邓的同时，带着问题学，我感到过去学毛著不够，本来两条路线斗争很尖锐，自己不太知道。批判刘邓不是几张大字报小字报，几篇文章就解决了。天地宽极了，同志们有很大的用武之地。(戚：有个想法象“九评”那样，搞重型炸弹，驳之体无完肤)希望同志们投入这场战斗。4·8事件和4·11事件比起刘、邓那个大呢？那个是主流呢，那个是支流呢？北京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更应注意。有苗头不是大联合，而是打架，这样打下去，北京何时成立革委会？你们讲了团结，但打还是打。这个事情北大首先检查自己吗？地院也应该检查自己吗？能不能自我批评这是接班人五个条件之一。街上小报上关于奴隶主义，有人(中央机关中)借反对奴隶主义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毛主席讲奴隶主义是在反革命、反动路线统治下，不作分析、不思考就听，这叫奴隶主义。对毛主席正确路线坚决服从也算奴隶主义吗？反对奴隶主义，还要有纪律性吗？

最后，谈谈有人说谢副总理搞两面派，搞折中主义，大家想想什么叫折中主义？韩爱晶不赞成北大，也不赞成地院，这不是折中。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搞调和才是折中，站在正确立场上批评不是折中。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勇敢的人。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要互相攻击，不要抬不起头来。

孙蓬一不要以为犯了错误就抬不起头来。

谢富治讲话：

讲两句话。我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低，有些事情就处理得不太好，有辜负于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委托。昨天小将们打架，我想调解一下，但没有办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小将们学习。办事应调查清楚。昨天我事先没调查，情况不大了解，还很急躁，主要地是批评了地院“东方红”，而且发了脾气，也批评了聂元梓，最后走的时候也没有和聂元梓打招呼。同志们可以批评。北大贴我的大字报，我欢迎，这是一件好事，对我是有利的，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是多方面考虑的。今后，我们还是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我可以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缺点都可以批评，同志们不要感到有压力，我很感谢同志们。我对×××是坚定的左派我有意见，就不太高兴。我是很愿意跟毛主席干革命，但我觉悟低，跟主席不紧，错误很多，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也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提倡批评我，当然用什么形式可以很多了。

陈伯达讲话：

我说几句。不要上大字报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到各机关、学校去，我们说是你们的小学生，今天，我们还是小学生。大家积合起来的智慧比我一个人高得多，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向你们学习，向群众学习。

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斗争的前夕，我们的斗争是在胜利中前进！可是我们的道路并不那么平坦的。尤其这半年来，有很多情况说明了中央制定的十六条中所预见的运动中有曲折有反复，这个预见是对的。但有曲折也没什么，有反复也没什么。只要我们经常保持头脑清醒，动脑筋思考，我们就能迅速改正我们自己的缺点，错误。虽然这几天大家吵架，打架，但我看还是一片大好形势，梁山泊好汉不打不亲热，我看打两下也好，不要伤筋骨就好了，伤些皮肤没有什么。以后会不会再武斗？我不敢保证，这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刚才

一个同志递条子让我们再声明以后不要再打、砸、抢。我们什么时候提倡打、砸、抢？十六条早就讲了，而且还是毛主席写的句子：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还是有武斗，大家对十六条是否很好看过，我可以怀疑一下，不要怀疑一切。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十六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伟大文件。一个外国马列主义者说这是一个新共产党宣言，外国人都这么说，我们可以听嘛！无论如何这个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是表达毛泽东思想的文件，所以大家还要掌握这个文件，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个文件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件，要以它为武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刘、邓作斗争，这样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就不要把斗争矛头搞错了，要针对刘、邓反动路线，针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针对黑帮，不要迷失大方向。

现在好象流行一种摘桃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在日本投降以后提出来的，是指抗日胜利的桃子是落在人民手中还是落在美帝走狗蒋介石手中。在抗战初期，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就提出抗战胜利后是国民党的天下，不是人民的天下。那时候右倾机会主义以王明为代表，要把抗战胜利果实奉送给国民党蒋介石，送给美帝；但是毛主席提出说不行，桃子应落在无产阶级手中，人民手中，所以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夺的方针。毛主席这样一个坚强伟大的革命路线为全党所接受，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取得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胜利。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阶段，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我们无产阶级应当紧紧掌握已取得的胜利果实，并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并且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所以这是阶级斗争，不是那一小团体和一个小团体的斗争。什么叫摘桃子？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就完全错了。因为，如果我们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果实就可能丧失掉了。这是保卫无产阶级果实，夺权斗争也是保卫已取得的果实，把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继续推向前去。现在我们北京，无产阶级的首都，在一些学校、机关、工厂里出现了摘桃子的错误观点。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机关、学校，这个单位，如北大、清华上上下下都是万众一心吗？难道没有陆平吗？没有蒋南翔吗？没有黑帮吗？没刘、邓代理人？没有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吗？那样万众一心吗？清华是这样吗？其它大学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教改也不用进行了，什么革命也不要进行了。这样看法不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看文革果实，而是从一个学校、机关来看，争夺文化大革命果实，这本身就不是无产阶级，是充满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我重复一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果实是无产阶级果实，无产阶级大联合果实，无产阶级独占果实，不是抽象的那个人，那一个小团体独占的果实。文革最重要果实是能否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今天说这些话是包含着批评的，有些人很敏感，不要紧张，改就行了。

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文化革命中得到锻炼，重新改造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完美无缺了，其实，说完美无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可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还有个任务，是急须整风，要认真整风，不是敷衍了事的整风，三心二意地，你声音大，我声音大的整风。我有一次经过天津劝业场，两派一派一边喇叭，这边声音大，那边更大，想这样办法取得胜利，这样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好形式，喇叭车是资产阶级做买卖做广告的，适当时候，可以用，靠这来压制对方是靠不住的。

讲整风问题，要认真思考用头脑，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进步很快，有好多的文章，当然，不一定都是在北京出来的，其他地方也出了些，上海出了，有些不是大学生，中学生，工人也出了好文章，这是文化革命很好的成绩。边战斗边整风夺“私”字的权，真正有群众运动的一定有新创造，在整风中一定会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新东西。

在座的最近这样一种吵闹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调子有点高，双方都当成敌我矛盾，过去的不示弱，打的也不示弱。可是现在已经进了，打也打了，不要懊悔，有的同志也不要哭了，不要灰心丧气，有错误，无产阶级对错误是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再犯，仅是避免，能否

再犯，那就不一定，以后打起来也有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彼此戴高帽子，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好几次会议都介绍了主席在延安整风怎么处理山头主义的，就是要各个山头自我批评，当时有很多山头，全国有许多根据地，被分割着，大家都不承认，你们有好条件就是还不认识，那时被敌人分割着彼此不认识，讲你的山头不好，我的山头好，这样怎能联合呢？我的山头再好也有缺点，你的山头再有毛病也还有成绩，不然的话怎么能和敌人作战，能保存下来了，一定有成绩，这是群众的成绩，群众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各自霸占一个什么山头，只是一个比喻。各个山头要做自我批评，不一定批评别人，今天都恨不得把别人推倒，那怎么能大联合？毛主席的关于克服、处理山头主义的方法，以自我批评为主，不批评对方，可以善意批评，我们提意见应抱着商量的态度，留有余地，而不是命令的态度。你们各个山头能这样做吗？各有长处短处，应吸收对方的优点，自己有优点就不要老梁卖瓜，自卖自夸，这种神气不对头，建议你们多开联席会议，互相商量，如果争吵得厉害，双方人数可以相当，其实能够得到最后胜利的，还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靠拳头，不管你拳头再大，力气再大，不是真理也是不能胜利的，北大把喇叭打坏了，这不对，这是国家财产，劳动人民创造的。谢副总理的问题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很难理解，前几天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孙蓬一谈了三句话(用电话)；北京应是文化大革命的模范首都，大家应联合起来，不要武斗，建立新秩序。你们就各取所需，把不要武斗的也不要了。不应当给谢富治副总理贴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干了很多好事，为什么要这样搞他，那时只知道你们武斗，不知道搞到谢副总理头上来了，目的何在呢？这样做对国家影响不好，现在马上把这些大字报盖掉。

关锋是文革小组成员，是《红旗》副总编，大家知道我很官僚，我就请他管常委、编辑，实际是王力和他共同负责，他们是副总编，做了很多工作，很有成绩，如果说最近《红旗》的文章受群众欢迎的话，他们是有贡献的。

……把我同关锋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和王力、关锋同志是一起工作的，(伯达同志说还有戚本禹同志，伯达同戚的一段对话；王力同志没给翻译。)不要以为在这里有什么小空子可以钻，要走大路，不要走斜道。有意见可以提吧。

王力讲话：

同志间的批评，自我批评是要的，只限在这个范围内。要养成习惯，不可贴大字报。

691. 戚本禹讲话选登——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对刘邓的大批判 (1967年4月14日)

一、大批判大联合

中学当前的任务就是大批判，提高路线觉悟，认识毛主席路线的伟大，刘、邓路线的反动，同时要和本校内部的斗争联系起来，要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联系起来，深化斗批改，我希望你们大中专学校都搞个典型。主要是斗批，下一步搞成一个改的方案。你们老打“内战”，就失去了大方向。哪个学校可以开创一个经验嘛，可以向全国推广嘛。(戚本禹同志指着蒯大富说)清华也没搞出来，蒯大富也不见得高明。王光美就是一个很好的把柄，你们要好好地批嘛。可是最近，听说你们有个战斗组批判《红旗》评论员文章，这个文章也是能批判的吗？那是党的机关报，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北航我们也希望搞出一点经验来，学校斗批改是个光荣的任务，这个事情做好了，就完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任务。这个条件是要靠联合起来，否则就不能大斗大批大改。因此中学的任务就是大批判大联合。中学红卫兵现在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对刘邓的大批判。每个红卫兵战士都必须投入这个大批判中，只有经过大批判才能解决“联动”的问题。(谢富治同志说：要紧紧掌握住这个大方向。要联系本单位一段一段地搞。特别是中学的任务，将来要和“联动”的斗争结合起来。“联动”少数头头是反动透顶的。这一仗就是批叛刘邓，并没打完，邓还很猖狂嘛，在理论上要把他们批

倒批臭，在组织上要打倒，这一工作并未完成嘛。做了许多工作，还要去共同努力。因此内部的事情要用内部批评的方法解决，把主要力量要集中在敌人身上。内部的事情也要坚持原则嘛，主要的方向一致，小的问题可以解决，不要迷失方向。内部用批评和团结，犯错误就改了。）

二、创造条件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昨天《文汇报》发表了社论。今天不是有人反吗？中央文革小组认为这个社论是好的，作了广播。听说是有人反对，这里也有吧？社论可以提意见，但这个东西是正确的。上海六女中在大批刘少奇里搞联合，是有普遍意义的。运动也是不平衡的嘛，大联合是有条件的。大联合没有条件是需要创造条件的。各个学校现在都有些矛盾。比如说，革命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矛盾，革命组织与保守组织之间的矛盾，革命组织与反动组织之间的矛盾，各个学校都有矛盾。这三种情况，第一种革命组织与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其实是桃子的问题，其实这也是个大问题。有些人不能大公无私，为小团体为个人摘桃子。别人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去摘桃子嘛，就拥护他。如果为个人摘桃子，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有人的做法象太平天国的东王西王，不要学习那种私字当头嘛。其实那时太平天国不也是私字当头嘛！那些人，革命组织不能团结就会各个被击破。革命派要联合起来。大敌当前，不要搞“内战”。是“内战”重要呢？还是批判刘邓重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组织与保守组织的问题，女六中也谈到了，要采取一些方法是很好的，首先是采取一些方法来激励造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的同学，这些方法是很好的，然后那些保字号组织的那些同志就沉痛地检查了自己。这样就自己解放自己。可以慢慢搞联合嘛，社论批评了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落实到班级中去落实到个人中去，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应该弄清思想嘛，团结同志，批评了错误思想，弄清思想然后再搞联合。第三个问题是革命组织与反革命组织问题，这个问题是大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决不能“和稀泥”。你喊刘少奇万岁，“联动”万岁，还能跟你联合吗？对他们的要进行批判。少数个别人也要严肃的批判。他们认识了错误，还要看他们一个时期，不过也要把一般受蒙蔽的反动组织中的群众和“联动”骨干分开。《文汇报》的社论没有谈出这一点，也有点客观原因，可以以后补充嘛。除了这点，整个情况都是适合一般社论的。

三、一家人基本是分清是非，可以“和稀泥”

你们不要算老帐。认清是非，就要联合，否则就对不住毛泽东思想。新北大的，地质“东方红”的，我很不满意。一家人基本是分清是非的，就可以“和稀泥”嘛。这不是右倾，这是内部矛盾嘛，弄清是非就“和稀泥”也不怕。

内外之间有分歧，正确处理内部矛盾，不要学大学的样子，把谢富治同志都给气坏了。其实谢富治是个老好人。中学学习大学，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对刘邓陶为什么没有那么大精神呢？地质“东方红”，新北大都是革命派，现在闹对立。其实都应批评嘛，可实际上却不这样干。

四、希望首都红卫兵在斗批改中做出模范

张春桥同志说：北京的红卫兵对全国的红卫兵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在北京我有些感觉。北京开了两个红代会走在前面了，全国的红卫兵看见首都的红卫兵走在前头，都是兴高采烈的搞联合嘛，希望你们一直走在前头，成为全国大专中学红卫兵的模范。

局部要服从全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希望首都的红卫兵在斗批改中做出模范。全国是会跟着你们走的，人家跟着你们走了，现在你们又否定红代会，红代会的大方向是要肯定的。至于改组，我不太了解，可能也是有错误的，至于建立这样的组织，象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搞这样一个组织不能改来改去嘛，当时只能努力共同搞好。现在天津也是这样搞，那里搞得最凶的也是中学红代会。北京的红代会中也是有缺点的，不能上来就好。我们希望你们以后把它搞好，整个红卫兵工作(北京的)要成为全国红卫兵的典型。

谢富治同志说：北京红卫兵在这场大风大浪中要起好作用，听毛主席的话，当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

692. 谢富治、戚本禹等接见北京长途电讯局各组织代表的讲话 (1967年4月14日)

晚上八点五十五分，戚本禹等同志在掌声中进入会议室，坐下后，戚本禹同志微笑地问：今天有哪些单位来了？

各组织代表回答：“有北邮‘东方红’”，“有电报大楼‘红电’”，“有邮电部临时革命委员会”，“有邮电医院”，“有电报大楼‘红讯兵’”。

戚本禹同志面向邮电部等单位代表：你们都是电报大楼的吗？

答：我们不是。是支持“红电”的。

戚本禹同志：今天解决长途局的问题(面对邮电部等单位的代表)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邮电部邮电医院代表：他们打了成安玉副局长，和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来了。

戚本禹同志：两派都来了吗？

邮电部等单位代表：支持“红电”的来了。

戚本禹同志：邮电部门有没有支持“红讯兵”的？

邮电部等单位代表：没有。

“红讯兵”异口同声地说：有！不知为什么没有叫他们来。

“红电”代表及其支持者：他们是保字号的。

戚本禹同志：(严肃地)那不一定！我还要调查。你们说他们是保字号的，他们还说你们是保字号的呢！(面向“红讯兵”)对不对？

“红讯兵”代表(齐声地)：对！

戚本禹同志：北邮有支持“红讯”派的吗？

北邮学生回答：没有。

“红讯派”代表：有！有“红军”、“乘风破浪”等战斗队。

戚本禹同志：有两派嘛！怎么说没有？

北邮学生：他们只有五十多人，也快分化完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正向我们靠拢。

戚本禹同志(面对北邮学生)：你们是介入的，以后再听你们讲。今天我要请长途局同志讲，那一派先讲啊？

(“红电”先讲的，讲一个小时，由三个人互相补充讲的。戚本禹同志两次打断他们的讲话，叫他们简单些。我方代表讲了十五分钟左右，双方汇报完自己的观点后，“红电”派递条子)

戚本禹同志问“红讯”派代表：你们打人了没有？

“红讯兵”代表：(先读了一段最高指示：“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我将最近几天来向首长简单汇报一下，从六号开始，北邮“东方红”就冲进电报大楼，行凶抓人，将解放军干部韩金波同志抓走后拉到卫戍区司令部，又拉到通讯兵部，又打又骂。七号再次冲入电报大楼，下午又揪走韩金波同志去斗，毒打，侮辱，全身有二十余处伤痕，八号军管后，北邮“东方红”再次冲进大楼院内行凶打人，打伤我无产阶级革命派多人，并殴打军代表和解放军战士。十三号他们再次开广播车来大楼，破坏我召开的声讨刘、邓、陶大会，经过多次交涉无效，仍开广播干扰。我声讨刘、邓、陶大会被迫停止。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截断喇叭线，拿走喇叭。

戚本禹同志：打学生的事有没有？

“红讯兵”代表：坚决没有，这不是事实。(北邮学生没有人答话)

戚本禹同志：你们打了成安玉没有？

“红讯兵”代表：打了，在十三号事件中，长途局三天半罢工事件中六、七、八号事件中，成安玉就是他们的后台。所以我们揪了他去斗他。但他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拒不回答，什么都不知道，还歪着脖子示威，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实在气极了，在解放军被打，我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被打的时候，同志们都流下了阶级同情的眼泪。而成安玉却公开支持他们这样作，我们的一个战士忍无可忍，打了他一拳。在斗他之前，我们一再向同志们交待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但在气愤之时，还是有同志打了他。我们回去一定向此同志说服教育，要文斗，不要武斗。

(此时，“红讯兵”派的战士有人递条子：“坐在第一排戴眼镜的白头发的，即邮电部的副部长，邮电系统文化大革命工作团长、镇压群众革命运动的成安玉”。戚本禹、谢富治、傅崇碧同志看了后，长时间看成安玉，成当即低下头，手托腮，无精打采。)

戚本禹同志：(面对北邮学生)骂解放军哨兵为“保皇狗”，有没有？

北邮学生(戴黄边眼镜的)：没有。

“红讯派”王××：骂了一句，我听见了。

北邮学生：谁骂的？

“红讯派”王××：戴眼镜的，就是你。

北邮学生：我没有骂。

“红讯兵”李××：骂了，我也听见的。

北邮学生：我们战士对解放军战士是尊敬的。

戚本禹同志：把军管副主任强迫拉到中南海去有没有？

北邮学生：这事有个发生过程。警卫出动四十个人，打了我们的同学。

戚本禹同志：谁打的？

“红讯派”战士：四月八日，北邮学生冲进我们声讨刘邓陶大会会场，打伤了我们的人，解放军把我们救出去了，防止了严重的武斗。我们没有看见解放军打人，我们倒看见解放军被打了。

“红讯派”另一战士：军代表哈斯同志肚上被打了一拳，当时就蹲在地下了。一位连长被打了十二拳，有八名解放军战士被打。

“红讯派”李××：戚本禹同志，有一个叫莫英环的是我们局“红电”派的人，打了警卫部队战士两个耳光。

“红电派”××：北邮一个同学喊了一声解放军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解放军打了这个同学，这个同学一边哭一边走……

北邮一学生：当时我在场，解放军进去了。“红讯兵”在警卫保护下撤了出去。有个同学喊“要支持真正的左派”，姿势不太好。那个喊“要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的同学的姿势是这样的：“拳头攥的紧紧的，站在凳子上，弯着腰，将拳头对准了解放军战士的头”，大声喊道：“要支持……”，态度很不好。连长问：“你要干什么？”这时就连拉带打的推走了。

戚本禹同志：为什么要将军代表强拉到中南海？是不是你们强迫他去的？

北邮同学王××：不是强迫的，是请他去的。

戚本禹同志：他自愿去呀？

北邮同学王××：他不太——愿意去。

戚本禹同志：那还是强迫的。(场内活跃)

北邮同学：为了照顾解放军的威信，我们让他坐在司机旁边。

戚本禹同志：你们还是照顾解放军的威信？！(场内有笑声)

北邮同学：是这样的。可是他们打了我们的人。十四号他们砸了我们的喇叭，砸坏了广播车，打了我们的人。

戚本禹同志：他们已经承认了。

北邮一女学生：关于广播车的问题，我们七个人，还有一个司机，他们下来了二百多人，

五个人围住一个女学生打。

戚本禹同志(面向“红讯派”): 打了呀!

“红讯兵”战士多人回答: 没有打。

戚本禹同志(向北邮学生): 你们十三号下午调了一千多人到电报大楼, 一直搞到十四号早两点, 是不是事实?

北邮学生说: 我们调动一千多人不符合事实, 我们只去三百多人, 其他的人是听到我们挨打, 来支持我们的。晚上十点多就走了。

戚本禹同志面向学生问: 打人了吗?

北邮学生: 没有, 是抓打人凶手的。

戚本禹同志看着纸条问: 你们公布了三十六个人的名单准备要抓, 抓了四、五个人, 有王进、李宝智……

(接着李××汇报了被抓的经过)

“红电”代表: 抓凶手的大字报是我贴的。

“红讯派”崔××: 十三号夜里, 我在邮电部后门被他们揪住了, 他们打了我, 我现在脖子转动还很难受。白天发生的事情我不在场, 我从六楼下来时已经没事了, 我一点也不清楚。他们把我当成凶手, 打我, 揪我头发, 弄得我……(“红电”派及其支持者有笑声)我没打人为什么抓我? 打我?

学生(抓“红讯兵”崔××): 他是“红讯兵”头头, 他老打人。

“红讯兵”崔××: 我没打人, 我也不是负责人。

戚本禹同志: 今天下午两点钟的大会是谁主持的?

邮电部代表: 我主持的。

戚本禹同志: 你是成安玉这派的?

邮电部代表: 我不能说是他这派的。成安玉是原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 有错误要检查, 我们给他机会。经过排队, 大家认为他是比较好的干部, 有错误要检查, ……这几天他有几个表现我们认为不错……。

戚本禹同志: 今天大会大约有多少人?

邮电局部代表: 三、四千人。

戚本禹同志: 你们通过了军管会批准了没有?

邮电部代表: 军管会没有批准。我们听了成安玉被打, 要在大楼开会, 找军代表谈了, 很久没有同意, 又到卫戍区去谈, 一直没有解决。我们决定到邮电部去开, 但这时邮电器材厂的人已到大楼院里去了, 打电话来不及, 这就不好办了。恳求军管会批准, 军管会没有同意。他们提了三点意见。

戚本禹同志: 一直到最后, 军管会没有同意, 这说明你们是不对的。这是军管单位, 有权力, 你们外单位来是不行的。

邮电部代表: 那我们承认错误。

戚本禹同志: 你们喊了攻击军管会的口号, 贴了军管会的标语。(念标语)有没有?

邮电部代表: 没有。我们宣布了三条纪律, 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笑声)

邮电部另一派代表: 昨天打北邮小将事件, 军管表态不明确。

北邮学生: 砸广播车和打成安玉都是戚蕴华指挥的。

“红讯派”代表戚蕴华: 砸广播车我们是同意的, 那天我正去吃饭, 看见北邮广播车在广播, 我们给军管会提了几次, 不解决问题, 声讨刘邓陶的会没法开, 同志们气极了, 砸了广播车。

戚本禹同志: 抓成安玉是谁的主意?

戚蕴华: 我不了解这事。晚上我没有去, 打成安玉的事不清楚。那天他们抓我们的人, 我们到卫戍区去人不敢回来, 夜里两点多, 大楼院里没有北邮学生了, 我才去把他们接回,

呆在二楼礼堂，有两个北邮同学进入二楼礼堂，听说还去叫人了，我们怕发生冲突，又撤出二楼礼堂了。

北邮学生：我们两个人到礼堂去，看见他们正在斗成安玉，我们进去了，他们推我们，专往我们要害部位踢，说是内部会，不让参加。既然是内部会，为什么让成安玉来，斗成安玉我们也可以参加，他们不让，将我们推到礼堂中间。

“红讯派”代表：没有打他们。

邮电部代表：打人凶手动用战备车，我们提了几项要求，要军管会给予支持，一个也没有解决。三七夺权后，一直不让在电报大楼开会……。

戚本禹：邮电部有没有礼堂？有没有食堂？

邮电部代表：没有礼堂，有食堂，但太小，只能坐二、三百人。

戚本禹：有没有院子？

邮电部代表：有。

戚：那为什么不在邮电部开？以后没有经过军管会同意，不能在大楼开会！

邮电部代表：五项要求，军管会一点也不给我们答复。要求和他一起去卫戍区，军代表不去，他说你们去是你们自己的事。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红电》代表李××：“红讯兵”一百二十多人没上班，无线试验室有二十多人没上班，我们调查了。

北邮学生：开声讨刘邓陶大会，他们喊：三七夺权好得很。我们进去要与他们辩论，他们不辩论，我们也坐在那里。解放军打了《红电》和北邮战士。

“红讯兵”代表：赵××说，我们声讨刘邓陶大会，念完最高指示，第二个发言人刚发言，学生冲进来，冲上讲台把话筒抢过来，并说：“把门全关起来，一个也不让走。”武斗我们，打伤了我们的人，完全把我们围困在礼堂中间，不能出入。解放军来援救了我们。来了四十多人，分开两边，手挽手，我们从中间出来了，同志们都激动得哭了。他们确实把解放军打了，没有看到解放军打人。

“红讯派”代表李××：他们将我们主持大会的张××，郝××等推下讲台，打晕了过去。我被他们揪走，连推带打，说要将我带到公安局，在大门口警卫旁边，他们又打我，有良乡技校“八一八”红卫兵，有北邮学生，身上有北邮的牌子(校徽)。

戚本禹同志(严肃地)：对长途局的问题，你们闹了好几天了，提点初步意见。

第一，怎么对待解放军军管。我们认为“红电”北邮是有错误的，对军管是不欢迎的，有抵制的。你们可能会讲出很多道理，不管有多少道理，军管是经国务院批准，经中央同意采取的措施，是为了稳定长途局的。你们有抵制，不欢迎军管，并将军代表拉往中南海去，你们说他同意，我问了，是不同意的，这个办法是不好的，我们希望所有真正革命派的同志，要支持军管，维护军管的威信，否则，是要出事的，北京市军管单位把军代表拉到中南海，这还是第一个，你们还是首创，不过这种首创精神不能推广，假如你们有百分之百的道理。在军管的问题上是站不住脚的。骂解放军“保皇狗”，贴标语喊口号攻击解放军，你们不承认，但从你们的发言，我看你们是不欢迎军管。毛主席说过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军管是不能讨论的，邮电大楼担负着国际、国内重要通讯。你们对军管是不欢迎的，认为军代表偏心。不管你有什么看法，这是没有讨论余地，不能讨论的。你们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如卫戍区、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文革、林彪同志，还可以向毛主席反映。但是无论如何你们在下边不应该对军管进行抵制，就是要维护军管的利益。这没有讨论余地。青海出了问题，是否军管就不可信任了，就可以冲了，青海是一个坏人，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篡军，解决这个问题也还要军管。北京市没有这个问题。

傅崇碧同志是保卫毛主席的好战士，没有问题。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是坚决支持左派的，担负了重要任务，工作做的很好。如把北京看成青海，这是绝大的错误。学生是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不要采取这个办法。你们把军代表拉到中南海，不管口号喊得

多么好，“为保卫毛主席”，不管口号如何，这是不对的，这次可以不追究，但以后你们再这样搞，就要追究了。

小将有错误就改，最好你们不要去卫戍区，不要发动“东方红”战士去，他们很忙，不要去一千几百人，如再去，就找你们的负责人。

卫戍区担负保卫毛主席司令部的艰巨任务，担了很大担子。你们问题再大，是局部问题。今后你们不要发动大批人去了。把话说到底，哪怕电信局的军代表全错了，也要维护军代表的威信，何况情况不是这样。现在刘邓司令部就希望卫戍区垮，中学生贴了大字报，要批评，这是不是后边有人？要注意后边是不是搞羽毛扇的，很难说。青海学生回来说，在青海受到反动路线的迫害，回到北京感到很幸福。主要是有毛主席正确领导。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卫戍区(傅崇碧同志插话：主要功劳是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没他不行的。如不这样，会成什么样子？

为什么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时，把矛头对准卫戍区？这是要害，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你们要从革命利益考虑。不要再到卫戍区去了。你们有问题去代表就行了，你们不要去那么多人啦！

其他问题有军管，你们不要扰乱他们的工作，他们负担很大的、艰巨的保卫毛主席的任务呢。你们不要去干扰。

你们想一下就会明白，这么尖锐的斗争，如果没有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东方红”什么这红那红的会有什么局面？你们早就抓起来被枪毙了，你们还有四大自由吗？没有了。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第一我们要依靠革命群众，二要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我们是他们的支柱，他们也是我们的支柱，我们与人民解放军是鱼水的关系。第三要依靠革命干部，希望你们要考虑大局，要支持军管，要合作。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书面的、开会等等。但不要把他们带去，要维护他们的威信。你们把他拉去了，第二天怎么工作呢？要不信，我也发动一些人把你拉去……第二天你也不能上班！……

第二个问题：打、砸、抢。北京有过一次打砸抢的高潮，现在又有苗头，民族宫、京剧一团(群众插话：还有新北大)新北大是民族宫的继续，电报大楼，你们不算太严重，打、砸、抢此风不可长、不管那一派，打、砸、抢都是错误的。(这时学生插话说：我们是挨打的)难说，还要调查，(哄笑)(戚本禹同志对谢副总理说)他们(指北邮)是反对聂元梓这派的。

打、砸、抢是错误的，百分这百的错误，没有一点对的。(面对“红讯派”)你们砸了人家的车，把成安玉用汽车弄到郊外，这是你们干的，(“红电”代表有笑声，戚本禹同志面对“红电”代表)你们干的也不见得好一些。各打四十大板。(“红讯兵”代表马上站起来说我们回去马上把车装好，今后保证改正错误。)那好。(北邮学生说：他们把汽车砸坏了，油机喷嘴也弄坏了。)刚才人家已经承认错误了嘛！这只是程度问题。(北邮学生：不信请你去看现场，还在那儿放着呢！)你们得理不让人是不对的，你们这样我不同意。(北邮学生插话：“红讯兵”打了我们人。)你说他们打你们的人，你们也打了他们的人，你们敢保证一个人也没打。(北邮学生回答：没有)，我才不相信呢。(北邮学生大叫：我们挨打了！)(戚本禹同志严肃地说)我不想听你们诉苦，我想听听你们检讨。不管怎样，我看你们有点自我批评精神好不好？！这一点他们好，他们砸了车承认了，打了人也承认错误了。你们不承认。我看你们这么多人气势汹汹的开进去，不会怎么太文明的。我是知道的，你们文明我不相信。(北邮学生仍为自己辩护，戚本禹同志指着桌子上的材料)那么，我这些材料都是假的吗？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们不经军代表的同意就去开会，会上斗人，做喷气式。打砸抢我们坚决制止。你们还要打，就打吗？打一打有好处，就暴露了，哪派就好分了，再要发生打、砸、抢就找出幕后指挥者，逮捕法办。(长时间热烈鼓掌)(北邮学生王××：我们也要查出他们打人的后台)打砸抢不要搞。(“红讯派”热烈鼓掌)以后要搞“四大”，你们还要搞“五大”，打架，你们嫌四大不够，这样不好。

第三个问题：关于长途局的运动，主要依靠自己内部力量去解决，(“红电”及支持“红

电”的代表)不鼓掌,说明你们是不大赞成的。(北邮王××说:不是我们不鼓掌,你的讲话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们赞成。)(场内笑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赞成,不要去那么多人,他们需要你们时,可以派代表,参加他们的辩论,双方都要派代表去。最好还是依靠内部力量,尽量不去,他们如果自己能解决就行了。你们学校内部运动也没搞好,夺权也没夺好,你们还自顾不暇,还要去管别人,我们希望你们自己搞好自己的问题。长途局运动依靠他们自己搞,他们自己可以搞好。还有军代表。他们如果需要你们,你们可以派代表,如果你们看他们运动搞的真不象话,你们可以反映给我们,派一些代表关心关心就可以了。

长途局究竟哪一派是左派,没有调查。还要调查,我还没有完全材料,不好作结论。不过两派都不是反动组织。傅崇碧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我们完全一致。(红电代表李××说:党委一小撮人将我们“红联”五个人、“北京公社”两个人打成反革命了),你们组织里,当然也包括“红讯兵”,特别是“红电”,是不是有坏人?有不纯的?一千多人的队伍没有一个坏人?你们要警惕、考虑,可以内部纯洁组织。(“红电”李××说:我们已整风了,纯洁了队伍,已清理出二十多人……)你们可以开门整风,你们大多数是革命同志,你们整风了吗?(“红电”回答:开门整了)(戚本禹同志又面向“红讯派”问:)你们整风了吗?(“红讯派”代表)答:我们内部已经整风了。你们也应该开门整风。(“红讯派”代表)答:我们就要开门整风。戚本禹同志接着说:请“红电”参加,你们都是革命同志,要大联合嘛!不要这样对立。

(“红电”代表又说:这样的分歧应该由党委一小撮人负责)。

戚本禹同志回答:我看还要怪你们一点。大是大非要弄清楚,小是小非要求同存异,搞大联合。大方向一致,如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一致就要联合,如果批判刘邓不一致,就不能联合,对局内的当权派都认为确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可以联合。

毛主席语录怎么用法?用的对不对?你们都要有团结的愿望,(面向“红讯派”)刚才你们读一条语录,是敌对性的,用错了,毛主席对付敌人的语录都很精彩,但不能用在内部。团体打内战,有些小将互相打,就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语录用错了。对敌人,对刘邓的斗争应该不怕牺牲的,这是对的,是可歌可泣的。打内战还不怕牺牲就不对了,打个头破血流,何必呢?还是互相之间要有点自我批评精神,发扬长处,检查缺点,下次开会,希望听到你们大联合的声音。军代表有些倾向性是必然的,(戚本禹同志面向“红电”代表说)你们要考虑考虑,人家为什么倾向他们,不倾向你们呢?

夺权你们全不要夺了,现在军管领导下,军代表是给革命摘桃子,给无产阶级摘桃子。为个人摘桃子,吃了要不好受的,要肚子疼的,不会长生不老。

现在北京出现摘桃子论调,谢富治摘桃子,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桃子归军管会,军代表要物色出真正的革命派,好同志,真正能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只要是好同志,不管是否反对过自己,只要拥护毛主席、有干劲,有毛泽东思想,就要拥护他掌权,千万不要以为军管他是赞成我的,还是不赞成我的。要选出两派中最优秀的革命同志,组成联合掌权的班子,将革命、生产搞好。(“红电”赵××说:一月二十四日夺权以后,我们成立了“临时革命生产委员会”,军管以后,我们马上解散了,他们 7/3 抢权后,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也应该解散了!)。

戚本禹同志说:临时革命委员会是他们自己革命组织的权力机构,可以领导他们工作,(“红电”赵××、李××:现在已经军管,还存在干什么?)戚本禹:可以帮助他们工作嘛!这有什么不好呢?(“红电”李××说:他们取缔我们组织,将七人停职反省,交待问题,至今不能上班……)。

戚本禹同志说:其他问题要经调查研究,由军管会负责处理。(“红电”代表提出关于转业干部问题……)戚本禹同志说:这个问题不太了解情况,由军管会处理。

(北邮王××说:他们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演出、宣传)(场内笑声)。

(“红电”代表说：我们去卫戍区了解了，说有些人不属于卫戍区的，不知在干什么？)戚本禹同志最后说：我就讲到这里，下面请谢富治副总理讲话。
(群众热烈鼓掌)。

谢富治副总理讲话：

我完全赞成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支持他的讲话。中央文革小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毛主席的司令部，他们从始至终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北京卫戍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有很大功劳，军管工厂、学校、支左、支农等都有，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支左工作上，难免有些缺点，是少数的，所有的同志都可以提意见。北京卫戍区解放军一直是坚定支持左派的，保卫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保卫中央文革、保卫毛主席的。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有缺点，可以开座谈会，书面提意见，但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军。造反派与解放军要联合起来，在中央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领导下，就可以成为一支伟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就能将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造反派内部之间观点不一致，要用“四大”来解决，不要打、砸、抢。

首都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在毛主席身边，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带头作用。全市正在批判刘、邓、陶，电信局应从明天开始，要把刘、邓路线批透批臭，因为刘、邓是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挖掉中国修正主义总根子，也要批判有关的。象彭真、陆定一，要狠狠地批，狠狠地斗，掌握斗争大方向，紧跟着中央文革，搞好这项任务。内部问题可以通过整风解决，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有革命造反派要最听毛主席的话，对全国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起好的带头作用。要敢闯、敢于革命、敢造反，但要在科学性、组织性、纪律性上起带头作用。革命靠自己，邮电大楼是要害部门，为什么要军管？为什么戚本禹同志来开会？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个地方的。不要来邮电大楼打架，不要以为一打架中央文革就来人，你们要自己把这个地方的革命秩序搞好。

傅崇碧司令员讲话：

我完全赞成戚本禹同志和谢副副总理的讲话。邮电大楼、广播大楼很重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变，首先要搞邮电大楼、广播大楼，这说明是要害单位，很重要。中央文革、军委、国务院很关心邮电大楼，你们搞武斗，周总理晚上十二点钟把我们找去，要我们马上军管。五点钟宣布，时间很仓促，说明很重要。革命派要协助军管，把革命工作搞的更好，生产搞得更好。在批判刘邓路线中，你们要联合起来。对解放军提的缺点，我们要研究、检查，要告诉军管会注意这件事。军代表原来是临时的，(戚本禹同志插话：不应该是临时的，即便是临时的，也要绝对维护军管威信。)对，我说的意思是代理的，现在是正式的了。刚由军事学院去的，不会有倾向性，解放军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

我们很重视邮电大楼，你们(指“北邮东方红”)开着大喇叭去，几千人开会，总理也讲了，不行！这样我们要干预。江青同志今天告诉我，不允许去邮电大楼打。(戚本禹同志插话：以后在电报大楼开会，要经过军管会批准，否则是不行的。)去邮电大楼开会，一定要经过军管会同意。解放军和革命派是一家人，如同鱼水一般。你们骂解放军是“保皇狗”，战士也是青年，他也受不了。对警卫部队有什么意见，欢迎同志们提出来，希望大家协同军管会把革命生产都搞好。

693. 傅崇碧、北京卫戍区黄政委的讲话 (1967年4月14日)

傅崇碧讲话

同志们：

前天开了一个会(指的是向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十八级以下干部传达军级干部会议精神)，没有准备好，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同志们提了些意见。原来是要请杨代总长、谢副总理去讲讲话的，因在中央开会，未去。还好没有去，去了，看到那个情况(指当时递了许多条子，秩序不好)，就不好了。

我向总理、江青、伯达同志讲了，他们有时间，准备接见同志们。

这次训练，同志们做了许多工作，有些学校搞得不错，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一共训练 338 所大中学校(其中大学 9 所)，学生 31 万多，下面的同志不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做了很多工作，有问题的只是 30 多所学校，占 10% 多，绝大多数是好的嘛。30 多所学校中，有问题的也只是一部分，其他很多人还是受欢迎的。同志们很辛苦，学生有很好的反映，什么事情都是不平衡的，成绩是主要的，大家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现在不讲，将来总结。有同志要表扬，有功就是要赏嘛。

现在，训练已基本上告一段落，我们向江青、伯达同志、林副主席、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总理、林副主席批了，呈毛主席批了，主席批了就可以执行。训练完了，要好好总结一下。为了更好地完成下一期训练，原计划这个月的二十号撤出来，但主席未批准还不能撤。现在不忙撤，把收尾工作做好了再撤。

这次训练犯了什么错误呢？有人说“解放军犯了路线性错误”。我看，我们这次训练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中央文革是毛主席的总参谋部，江青同志讲了话，军委、中央文革(首长)接见了同志们，你们是一条线“改良主义”，这样讲是错误的，我们是毛主席派去的，是执行最高指示的。训练过程中发生了些波折，毛主席叫我们到大风大浪中去闯、去游，这有好处，可以锻炼我们。这次介入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从去年七、八月到一、二月是考验地方干部，有些人如省委书记经不起考验就垮了嘛；一月以后是考验我们军队，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经得起考验，有些人经不住要垮，要吃鸡蛋，六级台风就顶不住，到十二级台风就要刮到海里去了。训练中有些缺点错误，主要责任不在下面，而在领导，主要是卫戍区。我们(的错误)不是路线、方向性错误。什么路线？毛主席派去的人有什么路线错误，他们小青年说说不要紧，我们受围攻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说我当官做老爷，青年人，小娃娃，我的孩子比他们还大，他们是小朋友。我们这些人不要攻几句就受不了啦，你们这些人的儿子就那么听话？不要紧，要看到小将还年青，还幼稚，革命精神好得很！不要顶两句就受不了啦。我们不是摆老资格，我们饭比他们吃得多，路比他们走得远。有人贴大字报说李钟奇是“联动”后台，他是什么“联动”后台？李钟奇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主要是讲错了一些话，不是原则性问题，不是方向性问题，不是路线性问题，大字报不对，他们各取所需，四号、五号会议就不传达，有些传单是无中生有的。昨天开会有二百多人，把蒯大富也批评了。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讲了话，回头传达一下。

军训毛主席批示(每天)四小时，我们搞了五、六、七、八个小时，搞多了，不对，各级层层加码，这个不对。卫戍区规定不对，一律按四小时。小青年朝气勃勃，搞多了，搞死了，他们受不了。四小时管严一点，其余时间让他们搞文化大革命。

其次，延安中学那个经验是毛主席批的，要推广，但是北京条件不成熟，有的组织解散了。大联合要先从思想上联合，不能强行联合，有错误就改，这方面我们有缺点。

第三，红卫兵搞了选举也有毛病，红代会包办。红代会是好事情，是全国的事情，有人要搞垮他，是不对的。

还有喊错口号，说话不妥，有时生硬一点，有的点了人家的名，就说你太厉害，也有说你太软的。打倒刘、邓举不举手，这不怪你们，现在明确了，要喊打倒。当然，李先念、陈老总打倒不行，没请示中央不行。有些地方贴大字报，复盖了人家的大字报，这是不对的。

否定一切不是马列主义，青年人好否定一切，不对。

这次军训只有 10% 搞得不太好。你们受了围攻，受了委屈，我向你们道歉，对不起同志

们。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一、根据总理指示，不忙撤。做好收尾工作，善始善终。

开些座谈会，征求意见，欢迎给予批评，有些误解要和他们讲清楚，好好把收尾工作做好。有的人贴了两张大字报就非整人不可，这算什么革命同志，冲了中南海都没抓嘛，给文革贴大字报都原谅了嘛。他们不懂事，幼稚，他们是小学生，我们是大学生。要搞好收尾工作，把误会讲清楚，要好好找他们谈，特别是反对我们的人，他们不找我们，我们要找他们，要好好讲，不要以牙还牙，要耐心说服。我们要多批评自己，带动他们学会自我批评，给他们留下好印象。(战国时)赵国的廉颇和蔺相如闹意见，还负荆请罪，我们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为什么不能搞好(关系)呢？我们一定能搞好。

二、好好总结一下，好的经验在那里，坏的经验在那里，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总结，以营为单位总结，好的要表扬。

三、大联合方针是对的，好好帮助他们联合起来，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折不断，大方向是要联合嘛。将来学校那么多派，那还行，要联合，联合是大方向，但联合是革命左派的联合，“联动”是反动的组织，要搞垮，最近总理要把他们的爸爸妈妈找来开会，要他们签字盖章，再要活动就不行了。联合，我们这次搞得太快了，是好心，象打油一样……。

部队自己的总结好好搞一下，克服前天会上的那种情绪。你们那天的情绪不好，不要批评他们。幸亏那天中央文革的同志没有去，大家都像打了败仗一样的。搞四个小时，其余时间让他们闹革命，不要管得太死。争取二十五日做完，撤出来整训。等主席一批就撤出整训，少数单位要回去，整顿一下，质量更好些，下一批还要搞，不要打退堂鼓。

我还有两个会要参加，下面由邵秘书传达昨天会议的精神。

北京市卫戍区黄政委的讲话

我简单讲几句，不要很长时间。

中央文革、总理、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军训作了很多指示，对我们很关心，是很大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鞭策。我们知道，这个会本来是昨天下午开的，但未开成，因为(戚本禹同志的讲话)是中央文革集体研究的，为了弄清一个问题，给我打了两次电话，很慎重。我的感觉，主要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否中学里面都很满意，那也不一定。

我们只是希望中央文革讲一讲军训是有成绩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大方向没有错，就行了。可是不免讲了这些，还对解放军作了很高的评价。

现在军训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始终要依靠两条。一条是依靠毛主席，依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威信，每个人都要爱护自己的荣誉，一条是依靠群众。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对我们这样关心，经常给予支持，撑腰，我们就更应当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

昨天晚上在人大礼堂，同时在十点钟开了两个会，我参加了一个，处理内蒙的问题，伯达同志有个讲话，我传达一下有关对解放军的一段。伯达同志说：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决定，是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群众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你们回去不要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否则就错了，就要犯错误。对解放军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有权利对解放军提意见，但不要公开贴大字报，公开贴大字报就要损伤解放军的荣誉。这个事情做不得，我们不欢迎你们这样做。敌人喜欢你们这样做，凡是敌人喜欢的事，你们就不要去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解放军本身也要提高警惕，不要被坏人利用来挑拨人民解放军同整个造反派、整个群众的关系。现在关系有隔阂，要采取拥政爱民的办法去解决。从爱民——革命造反派出发，一定要搞好军民团结，官兵团结。这个团结非常重要，好象鱼和水一样，鱼离开水是不行的，解放军离开人民群众是不行的。林副主

席讲，没有地方就没有军队，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如果没有这几百万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要搞文化大革命也不行。人民解放军在“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中出了一些问题，犯了些错误，绝大多数是好人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当然，个别地方也有坏人做坏事。对待解放军要采取慎重态度。伯达同志说，这些问题对你们提出来是有好处的，无论如何不能损害军民关系，要搞好军民关系。(革命小将高呼：解放军万岁！向解放军学习！)伯达同志说，我要听其言，观其行。

昨天的两个会对解放军这样爱护，我们应该怎么样，下面提几点意见：

如何正确对待昨晚的两个会？

一、正确地看待革命小将对我们的批评。要有高姿态，高风格，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丝毫不要以为我们胜利了。我们要着重看一看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是严重的。中央、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这样关心我们，我们更要谦虚谨慎，防止可能发生的问题。中央文革已经三次出面了，再要出问题，就不好办了。

我们要广泛听取意见，特别是要听取那些反对我们的革命小将的意见，如发现确有问题，就要认真地改，善始善终，把军训搞完。

二、正确对待、解决小将之间的分歧

(这次会议后)可能发生两派之间的斗争，过去支持我们的，他们占了上风，认为胜利了，以此来压对方。所以我们还有艰苦的思想工作要做，不能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支持我们的，要说服他们，不要歧视(对方)，特别要注意，不要对反对我们的、要打倒李钟奇的，压他们一下。这样就加重了我们的工作，要做好，要耐心说服，防止搞得不好发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我们自己更不要去抓同学的小辫子。

三、这一段要始终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进一步掀起批判刘、邓，批判黑《修养》的新高潮。要结合学校的斗、批、改，狠狠打击本校的“联动”，防止他们趁机活动。对一般受蒙蔽的，要做好政治工作。不要把矛头指向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

戚本禹同志讲话后，形势好转，但也不能那么乐观，也可能发生新的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要做好善后工作，做好收尾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最后，一定要戒骄戒躁，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那次会(指向十八级以下干部传达军级干部会议精神)，我们有缺点，但也反映了你们一种情绪，这种情绪不好。主席、林副主席这样爱护我们，我们一定要做好样子，在阶级斗争中，我们一定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急躁，军训有缺点，我们负责，当然，你们指挥部也可以检查，但对连排干部不要批评。